上海史

History of Shanghai

CHIEF EDITOR: TANGZHEN—CHANG
DEPUTY CHIEF EDITOR: SHENHENG—CHUN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上 海 史

主 编 唐振常
副主编 沈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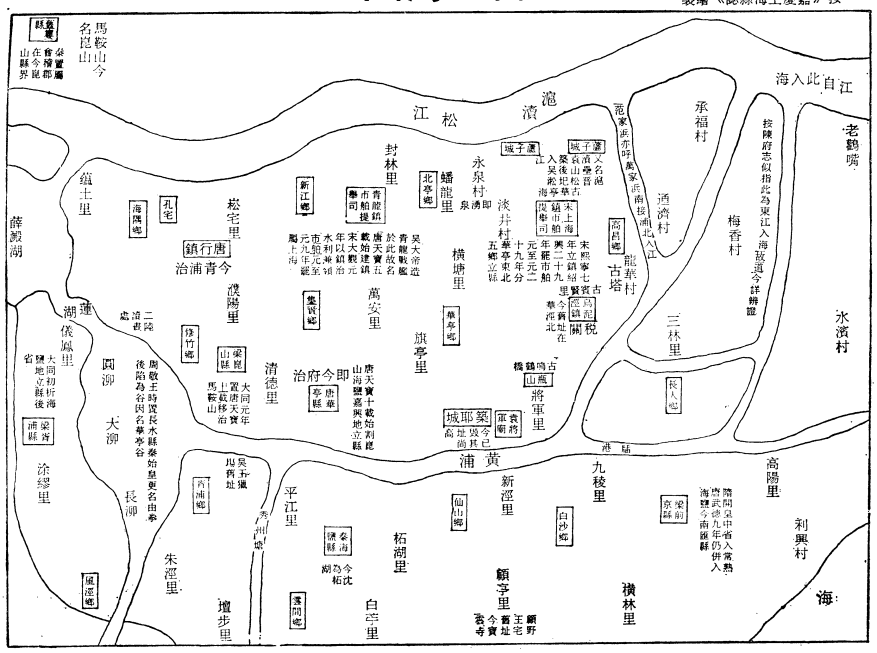
主要撰稿人

谯枢铭 卢汉超 熊月之 陈正书
郑祖安 李天纲 吴德铎 沈恒春

1000122024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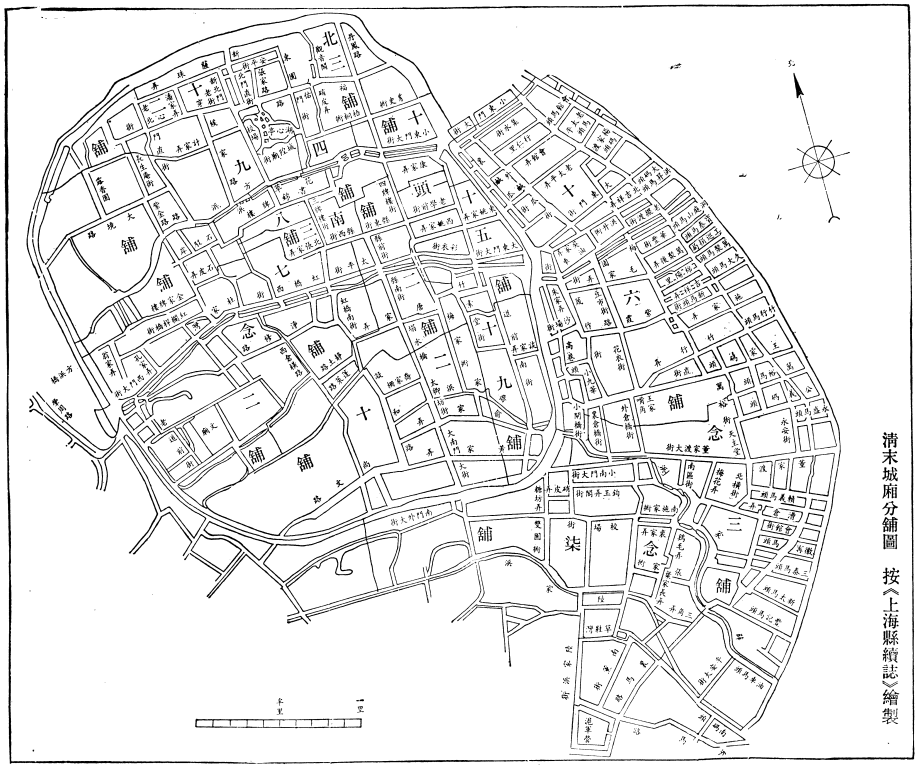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古上海圖



一八五五年上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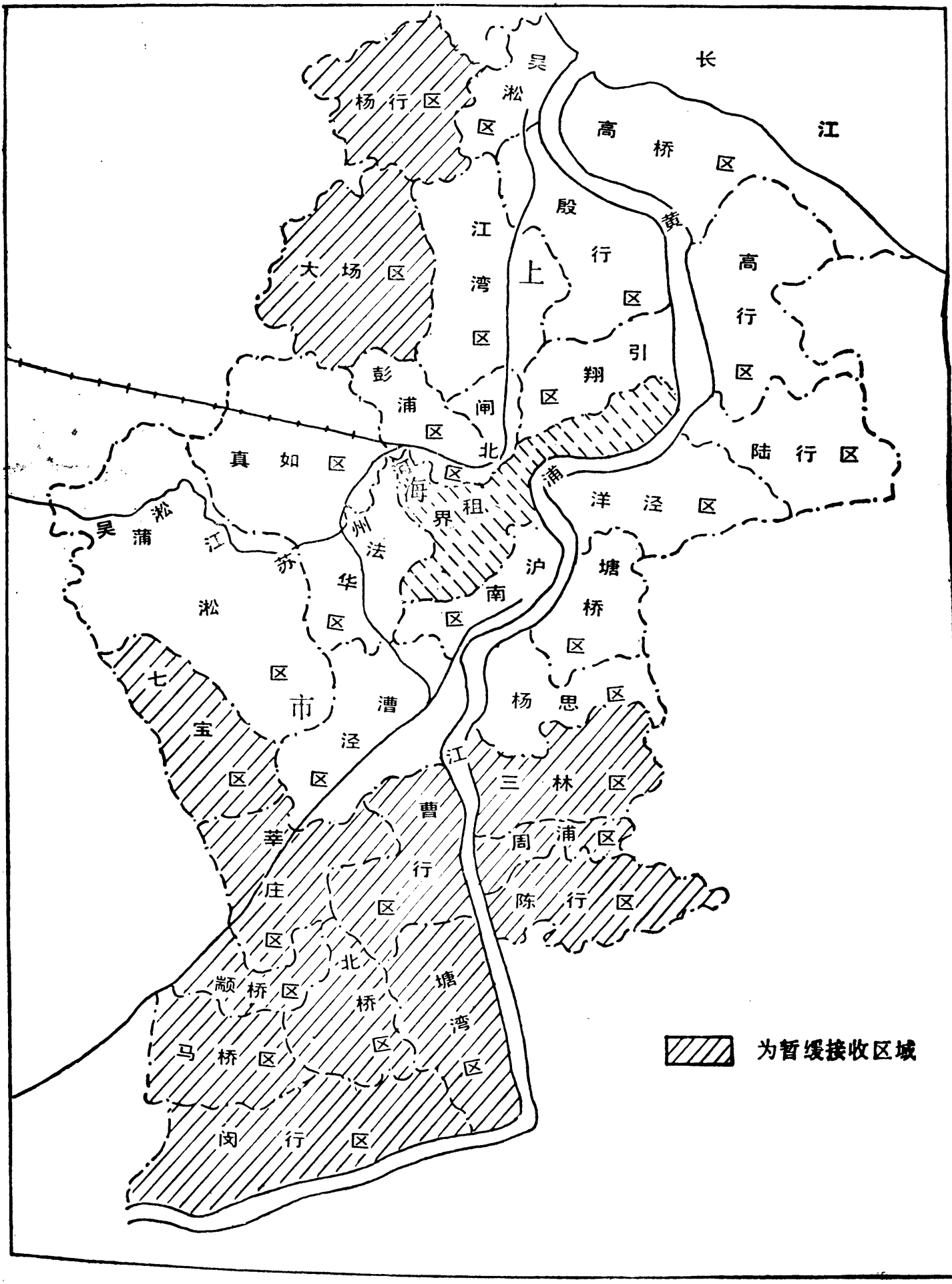
1. 英国领事馆
2. 怡和洋行
3. 大英轮船公司和沙逊洋行
4. 仁记洋行
5. 奥古斯丁·赫尔德洋行
6. 狄克逊医寓(一八六五年)
7. 东洋银行
8. 萧氏兄弟洋行
9. 颠地洋行
10. 中国海关
11. 特诺尔洋行
12. 史密斯·甘纳地洋行
13. 旗昌洋行
14. 会德丰洋行
15. 亚丹森洋行
16. 福格洋行
17. 英国教堂
18. 伦敦会
19. 美国领事馆
20. 美国圣公宗教会
21. 老码头
22. 法国领事馆
23. 英国美以美会
24. 美国浸礼会
25. 董家渡(罗马天主教)礼拜堂
25. 美国公理会
27. 英国圣公会
28. 英国圣公会礼拜堂
29. 伦敦会礼拜堂
30. 美国浸礼会礼拜堂
31. 伦敦会礼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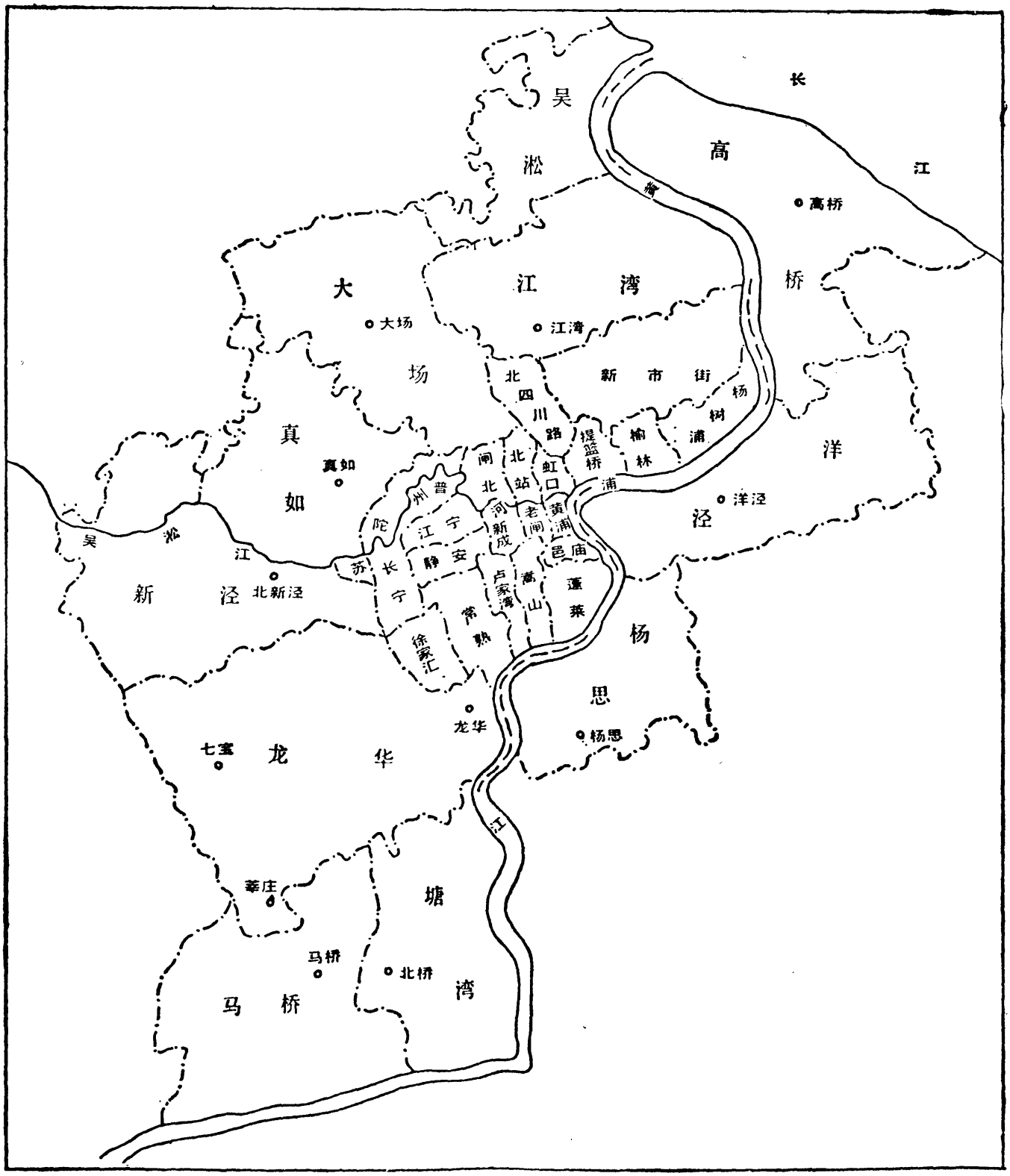
清末城廂分舖圖　按《上海縣續志》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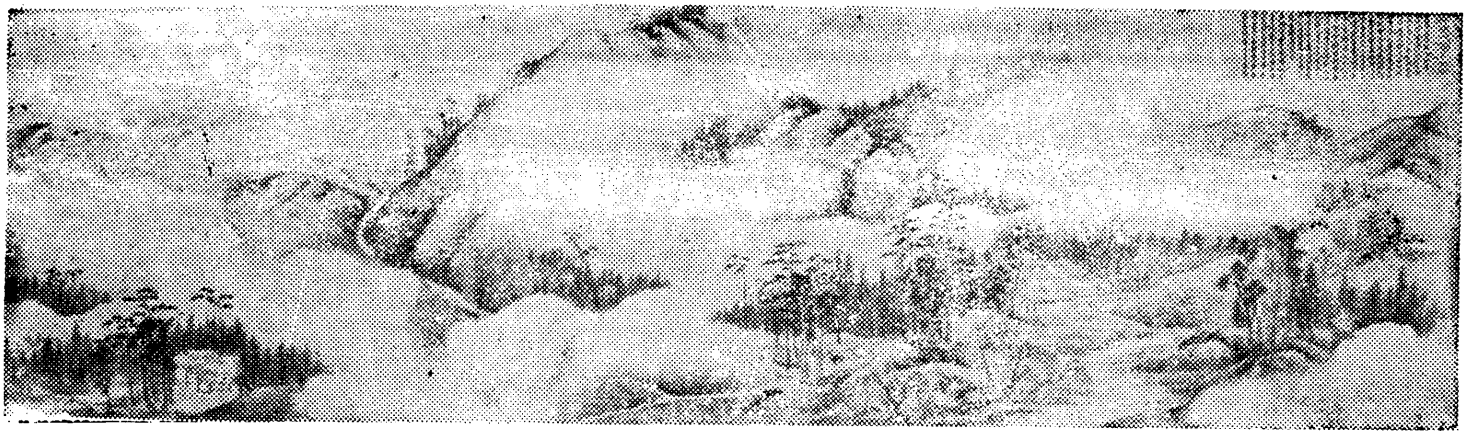
上海租界擴張圖

1927年—1937年上海行政区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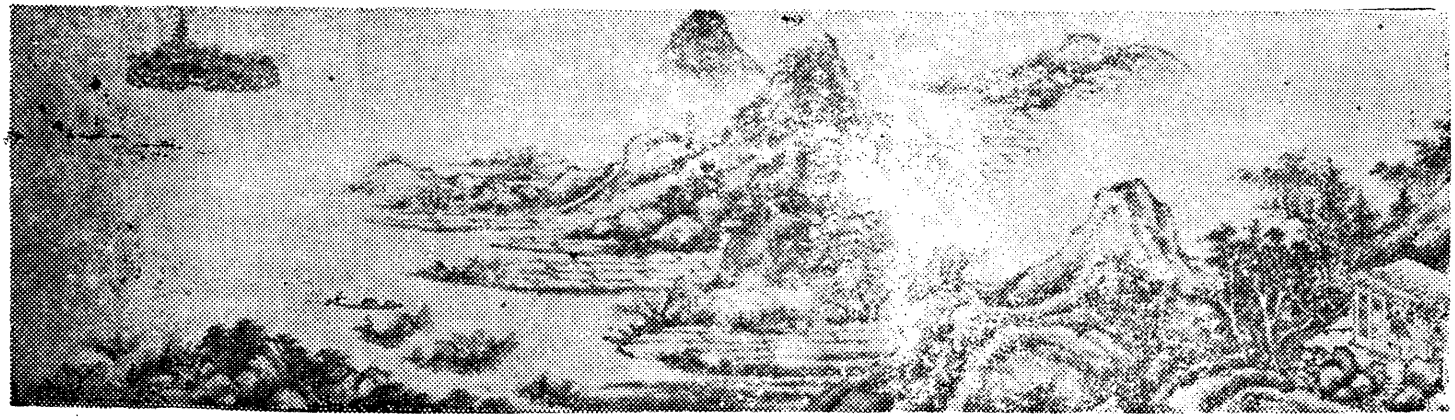


1946年—1949年上海行政区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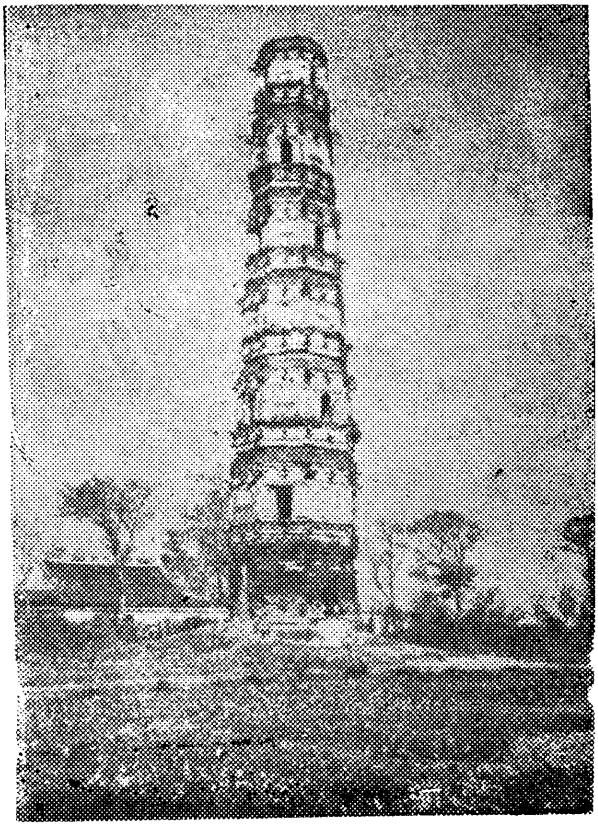




《天马山图卷》(明璩之璞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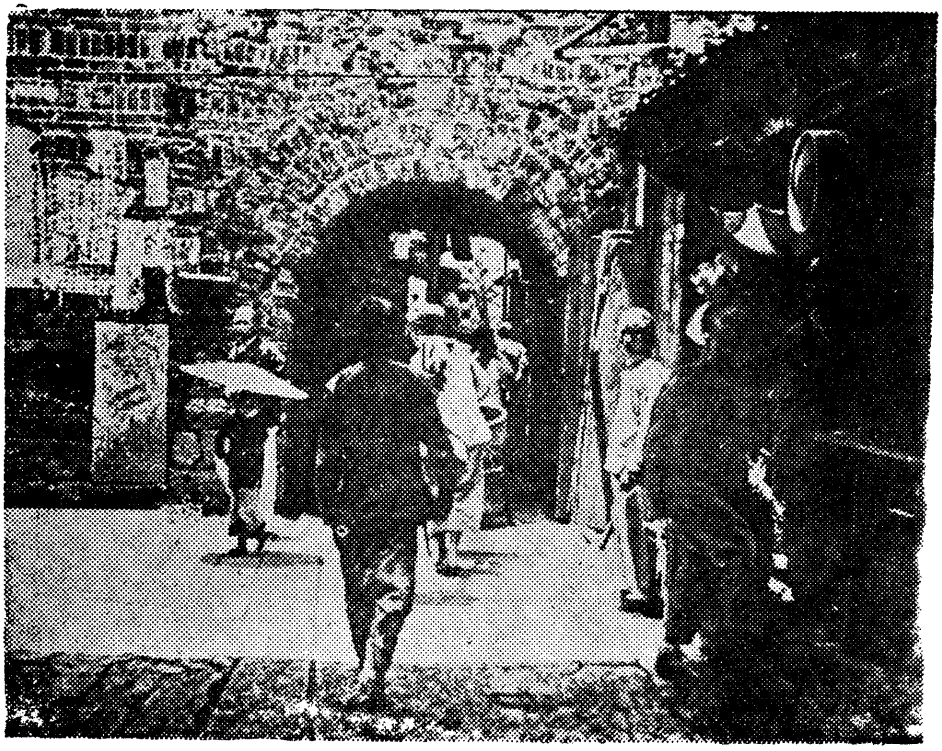
《峰泖图》(明沈士充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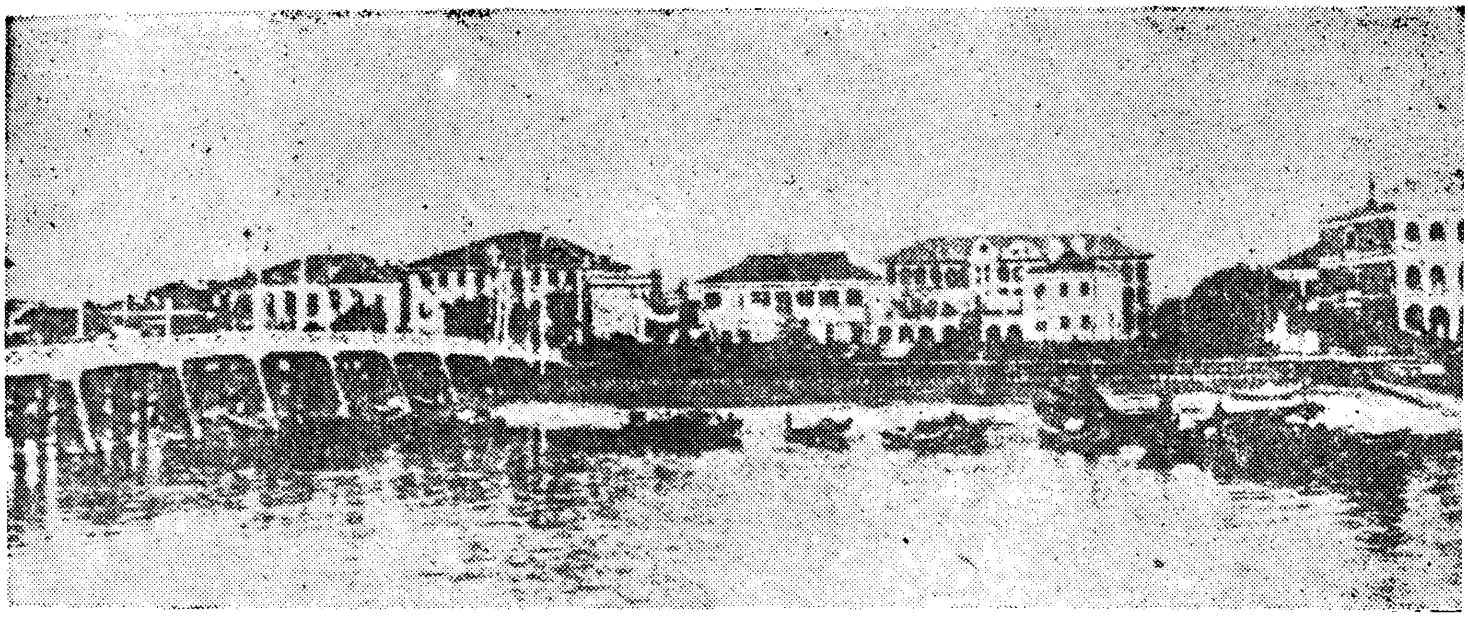
青龙镇报德寺塔



重修丹凤楼记
（康熙五十七年）



清末上海县城的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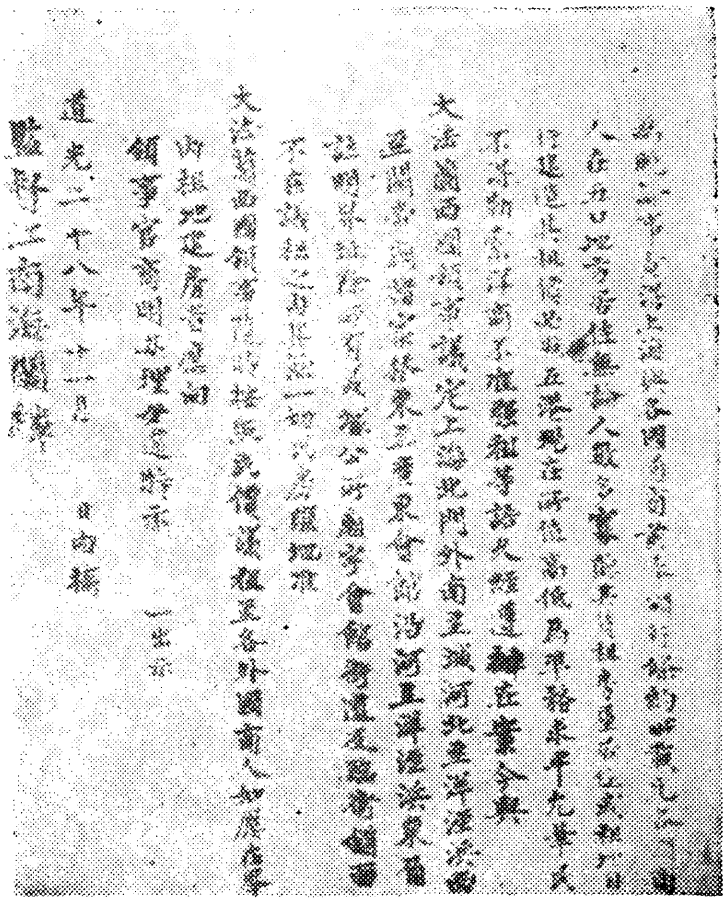
清末的外滩

清末南京路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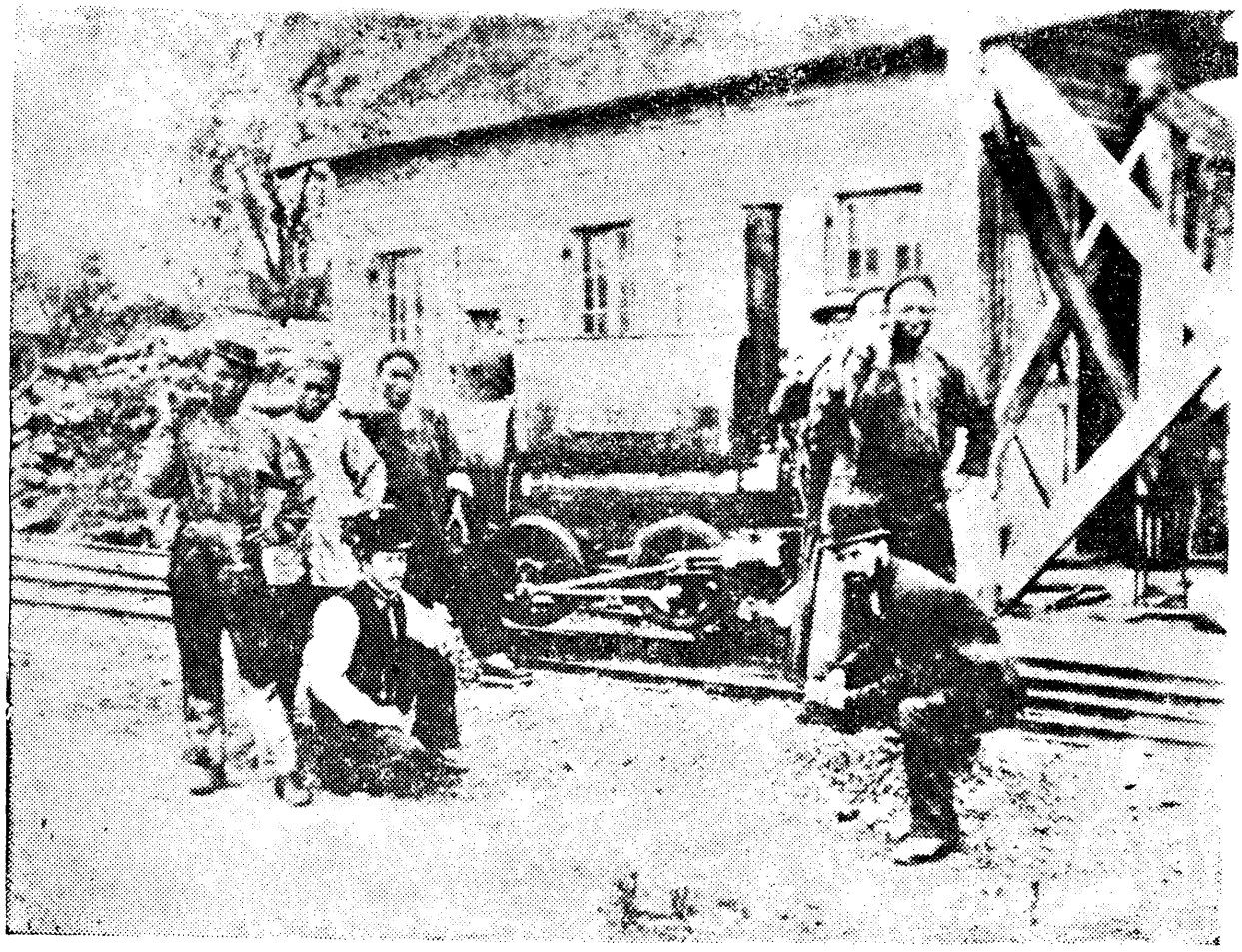


陈化成画像



1849年苏松太道确定法租界的告示

1876年开筑上海至吴淞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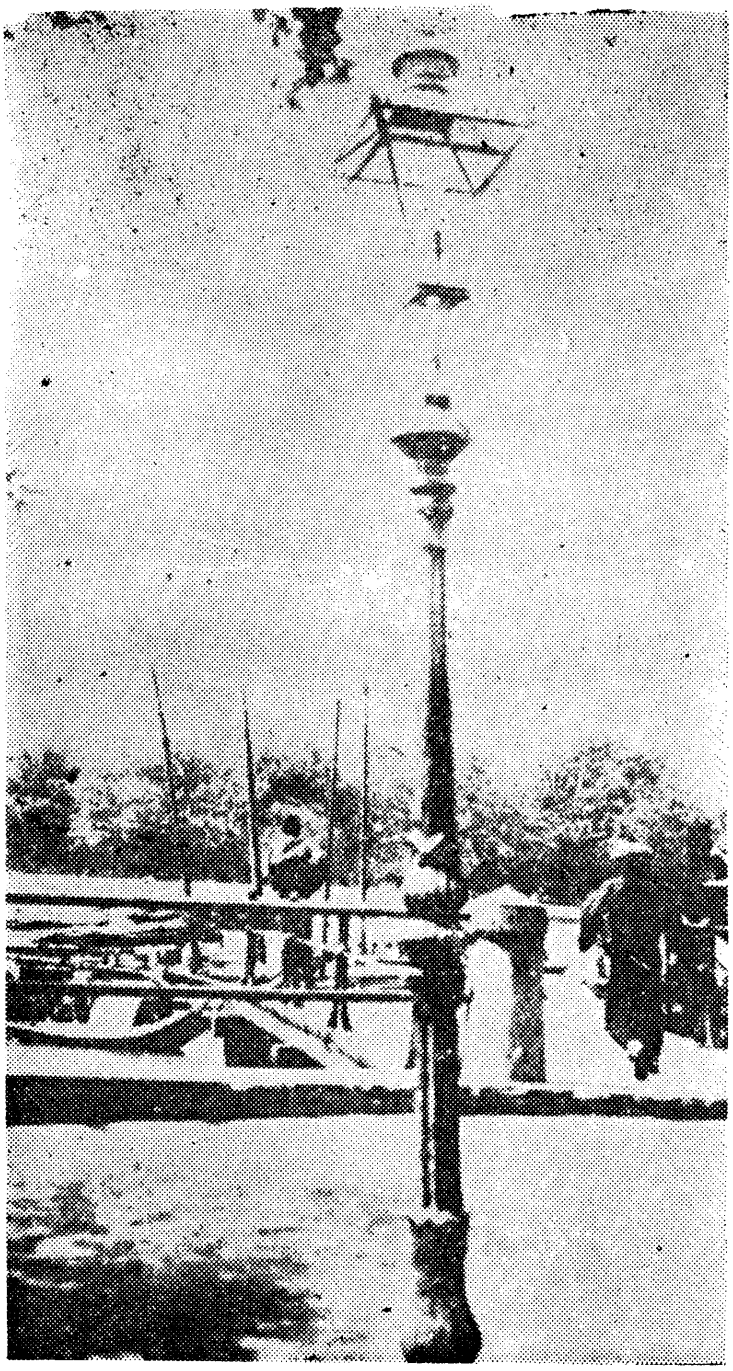
上海广学会印的
《列国变通兴盛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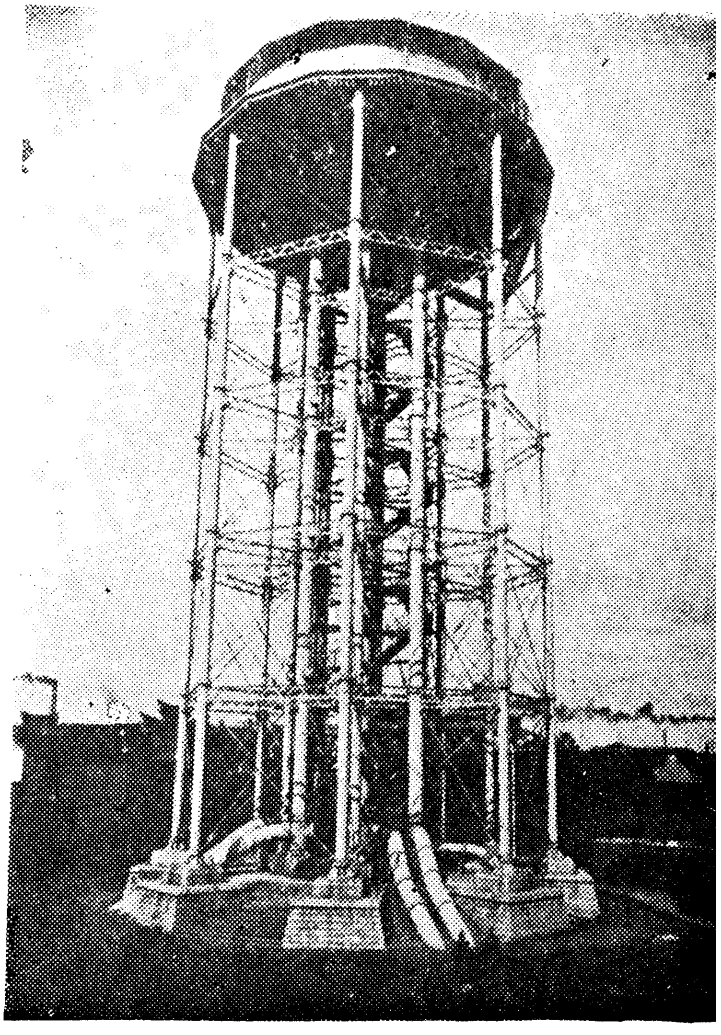
傅兰雅译的
《西经实物图说》

张　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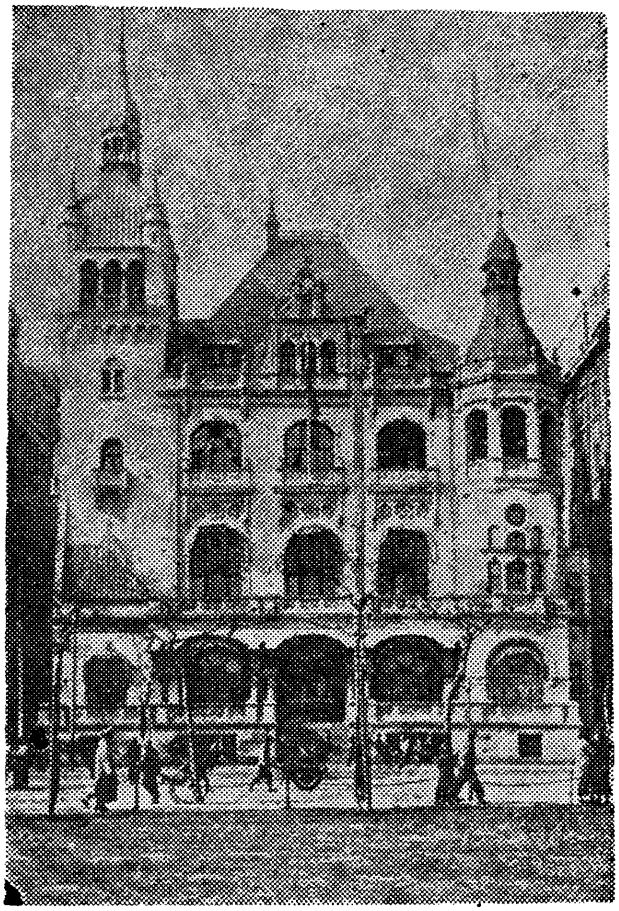


出现在上海
最早的煤气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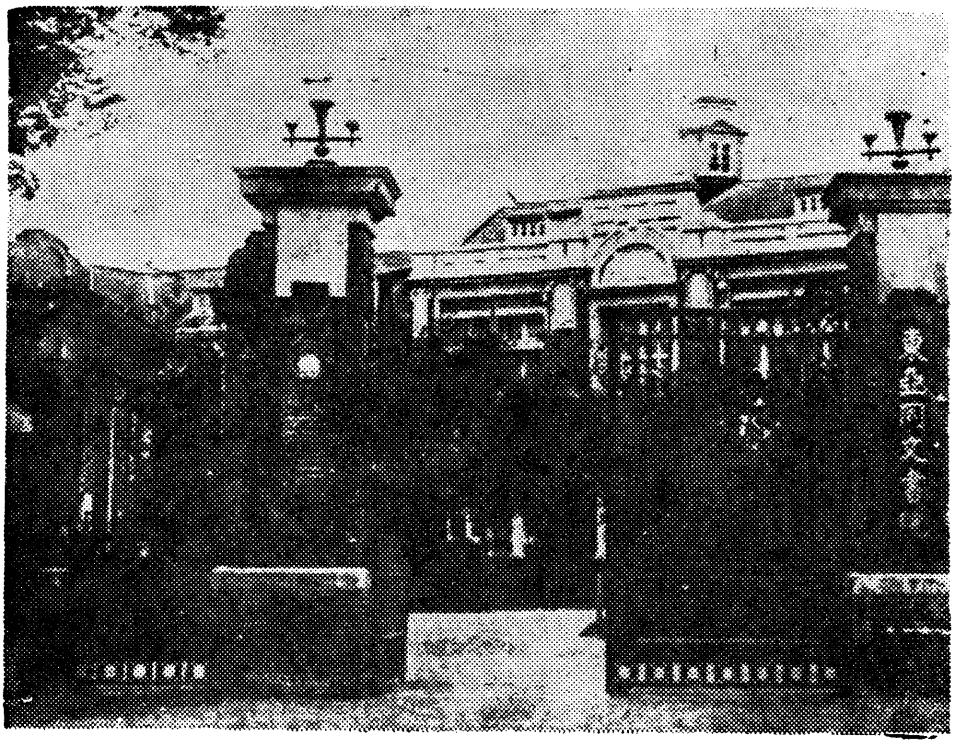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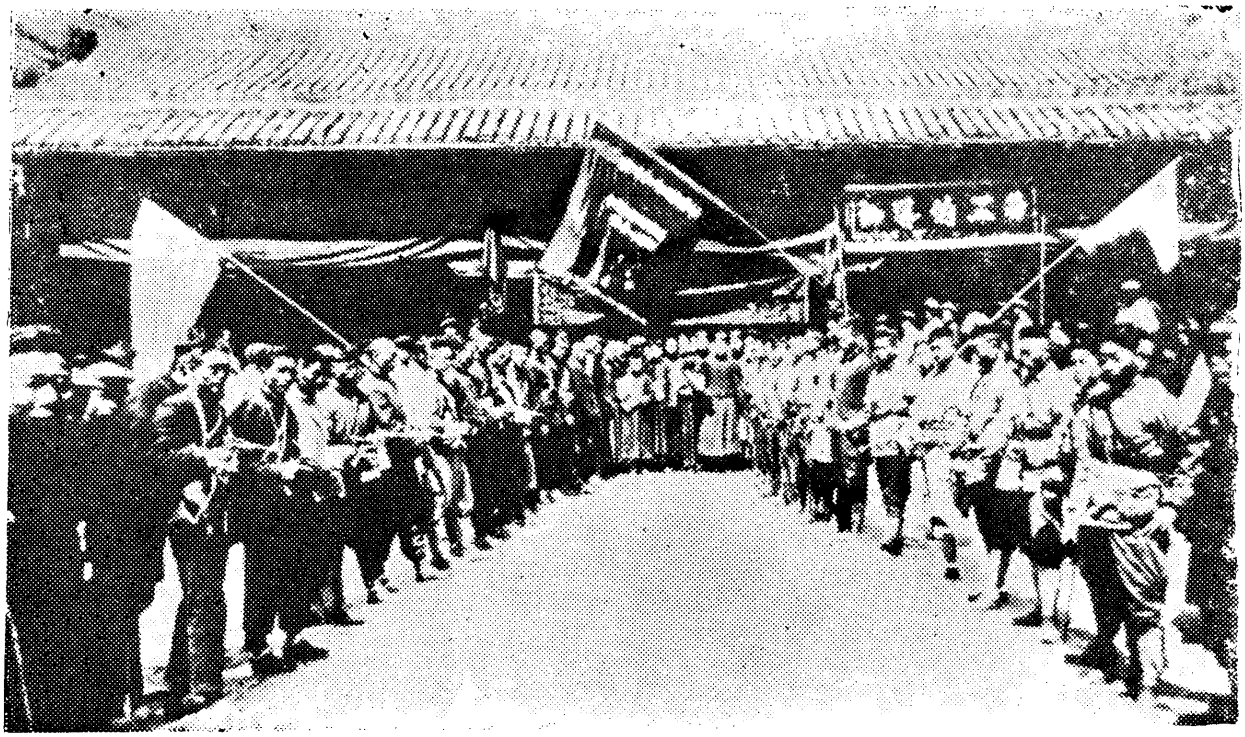
江西路自来水塔

旧中国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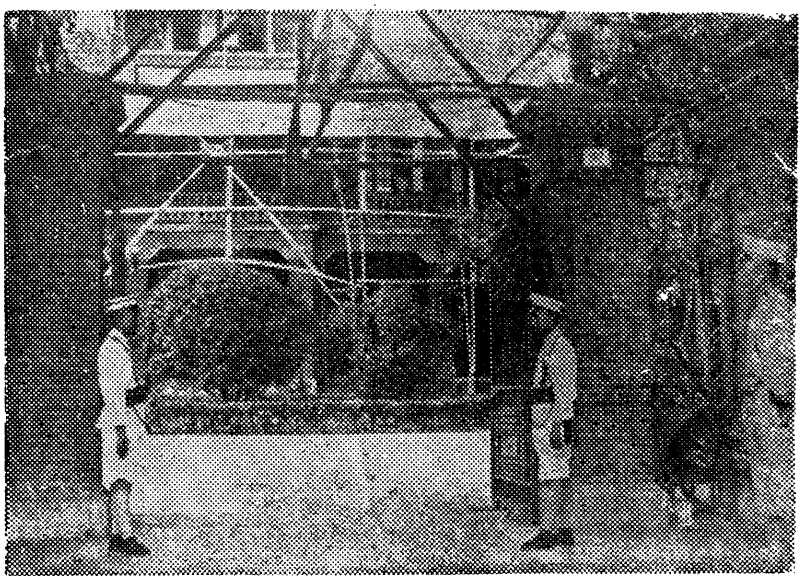
东亚同文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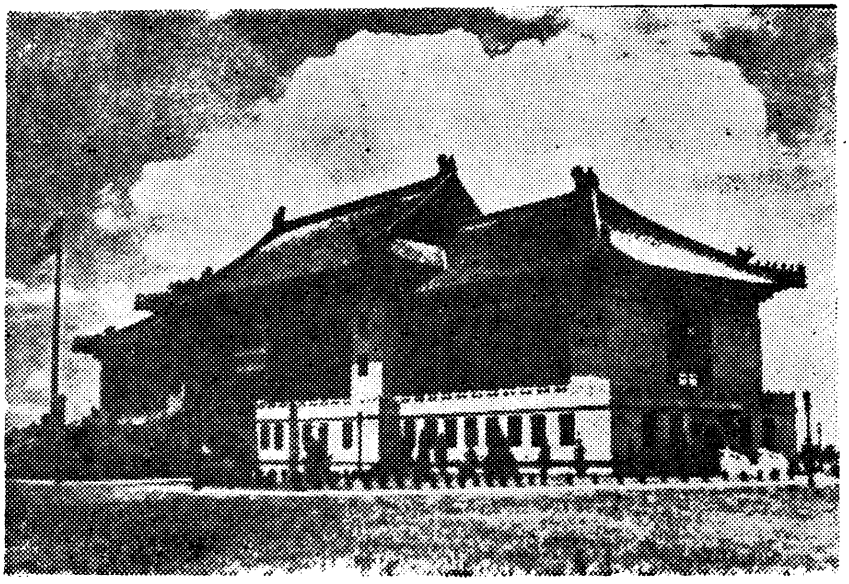




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举行纠察授旗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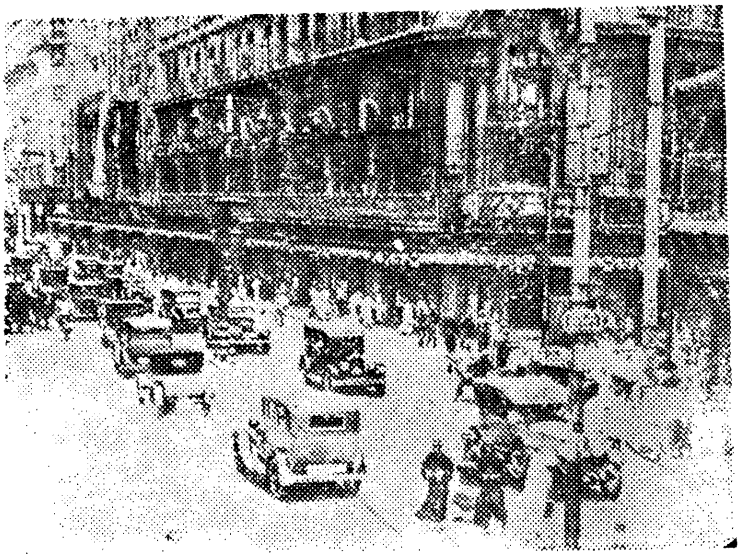
在枫林桥的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在江湾的国民党
市政府新厦

二十年代的南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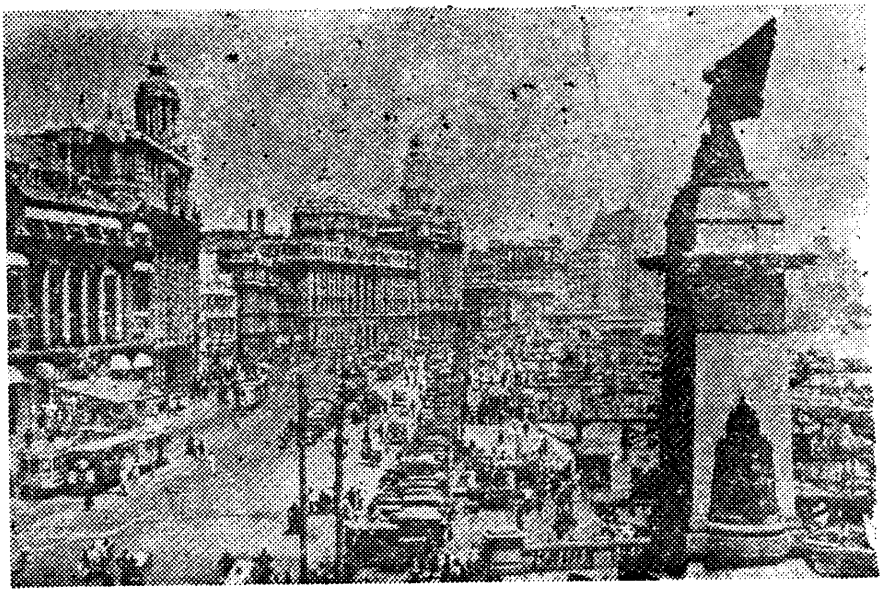


一·二八”事变中，
十九路军抗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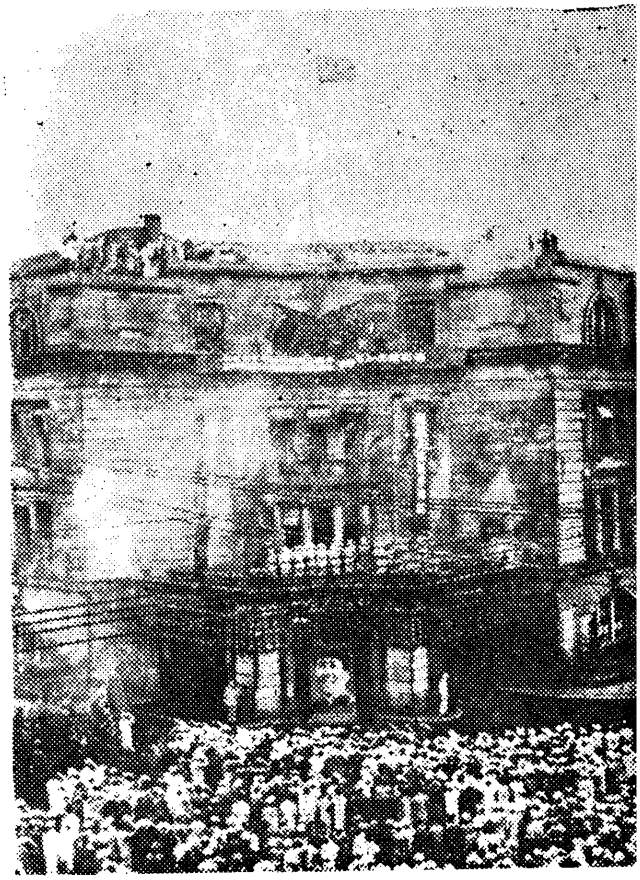


“一·二八”事变中，北站被日军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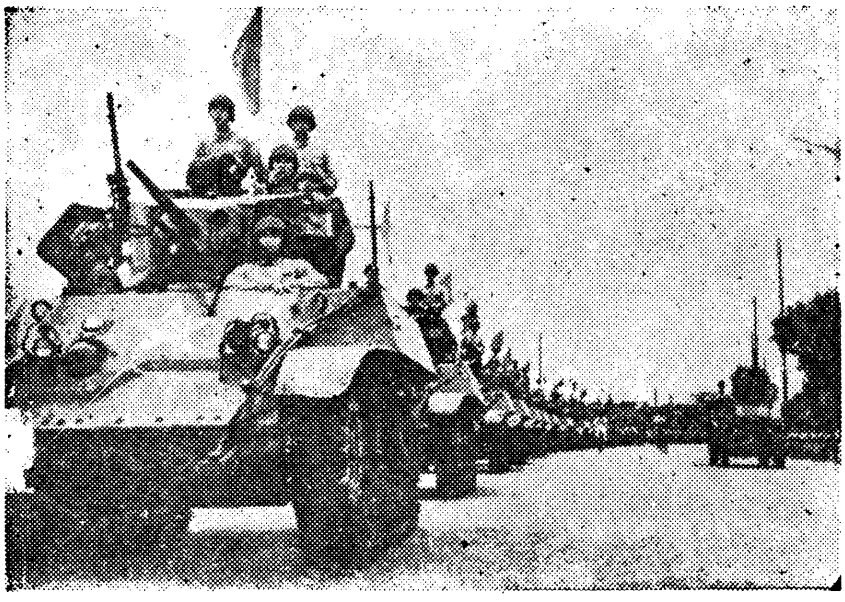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的外滩



上海解放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部队开向上海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古云间回溯…… 1

一、原始文化遗存…… 1

二、春秋吴越古战场…… 6

三、诸侯封国　士族庄园…… 8

四、海防要地——沪渎……12

五、前京县与胥浦县……14

六、华亭县的建立……15

第二章　上海的崛起……19

一、华亭经济的发展与上海务的出现……19

二、浙西水患与吴淞江的治理……23

三、青龙镇盛衰……26

四、上海镇兴起……30

五、市舶与漕运……34

六、云间又一新县……37

七、农业发展与植棉业的兴起……40

八、盐业兴盛　盐民悲苦……43

九、任仁发等的治水功绩……47

十、隐逸文人与上海文化……51

第三章　海隅名城　南吴壮县……55

一、上海县的建设与青浦县的分立……55
二、江浦合流 兴筑海塘 ……58
三、赋役沉重 人口外流 ……61
四、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66
五、海外贸易与御倭斗争……70
六、名人名园……75
七、蓄奴和奴变……79
八、抗清起义……82
第四章 江海通津 东南都会……87
一、清初高压政策对上海的影响……87
二、田赋变化 县境变迁 ……92
三、设立海关后的经济发展……95
四、沙船业的发展与行会组织的建立……99
五、城市发展 文教事业兴盛 …… 103
六、英国人觊觎上海…… 108
第五章 在炮火中开埠…… 113
一、“阿美士德”号远来…… 113
二、屈辱的上海之战…… 122
三、租界起源…… 134
四、事情没有结束——美法相继染指与英租界扩充…… 141
第六章 起义者与趁火打劫犯…… 158
一、小刀会起义…… 158
二、一对怪胎——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和外国人统治的工部局…… 170
三、太平军在上海地区的战斗…… 184
四、租界进一步殖民地化…… 199
第七章 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218
一、外国资本迅速发展…… 218

二、民族商业、航运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234
三、欧风吹来…… 243
第八章　洋务运动与近代企业的兴起…… 255
一、江南制造局…… 256
二、轮船招商局…… 262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 272
四、民族资本工业的兴起…… 275
第九章　改良思潮在酝酿中…… 284
一、西学东渐之势猛烈…… 284
二、改良思潮与早期改良派…… 304
三、上海——孕育改良思想的温床…… 311
第十章　维新宣传的中心…… 315
一、维新报刊畅行 学会大盛 …… 315
二、《时务报》崛起一时…… 323
三、新式学校举要…… 328
四、变法余波——反对"己亥建储"与成立"中国国会"… 334
第十一章　租界的扩展与东南互保…… 343
一、英美租界的扩展与国际公共租界正式形成…… 343
二、四明公所血案与法租界第二次扩展…… 347
三、东南互保…… 350
第十二章　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359
一、外资工业疾速发展…… 359
二、民族工业初步发展…… 364
三、金融业迅速发展…… 368
四、航运、铁路、市内交通及通讯的新发展…… 377
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勃兴…… 384
一、革命派风云际会…… 384
二、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 390

三、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398
四、抵制美货运动与大闹会审公廨案…… 409
第十四章　立宪派活动大本营…… 420
一、预备立宪公会等立宪组织…… 421
二、地方自治运动…… 427
三、上海商团…… 432
四、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态度的转变…… 435
第十五章　辛亥革命的关键地区…… 439
一、辛亥前夕的革命宣传…… 439
二、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445
三、上海起义…… 448
四、沪军都督府成立…… 468
五、空前高涨的民主热情…… 477
第十六章　多事的民国初年…… 485
一、为维护共和而斗争…… 485
二、反袁举义旗…… 488
三、文化界新气象…… 495
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 506
五、会审公廨被攫夺…… 509
六、越界筑路与法租界第三次扩张…… 511
七、拆除城墙…… 514
第十七章　近代经济的初步繁荣…… 517
一、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消长…… 517
二、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 526
三、民族资本企业举要…… 534
第十八章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545
一、《新青年》与新文化…… 545
二、“五四”以前上海工人阶级状况…… 556

三、从“五四”到“六三”…… 561
四、中国共产党诞生…… 570
第十九章　从军阀混战到“四·一二政变” …… 577
一、江浙战争…… 577
二、五卅运动…… 583
三、一场混战之后…… 604
四、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609
五、四·一二政变…… 623
第二十章　国民政府十年统治…… 636
一、白色恐怖和郊县农民暴动…… 636
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 643
三、特别市和大上海计划…… 650
四、官僚资本大本营和民族资本的衰落、破产…… 664
五、左翼文化运动的高涨…… 679
六、“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上海受到的惨重破坏…… 699
七、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713
第二十一章　一种过渡形态的城市生活…… 728
一、知识阶层的生活…… 729
二、市民阶层的生活…… 741
三、帮会——城市社会的赘瘤…… 756
第二十二章　“八·一三”英勇抗战 …… 769
一、上海战役始末…… 769
二、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 781
三、工厂内迁…… 786
四、难民工作…… 790
第二十三章　不屈的“孤岛”…… 795
一、“孤岛”的形成和演变…… 795
二、封锁掠夺中畸形发展…… 798

三、转变策略　保证坚持抗战…… 805
四、新闻出版和文艺界坚持斗争…… 812
五、上海伪政府和"七十六号"魔窟…… 817
第二十四章　租界变成日本殖民地…… 824
一、从"维持原状"到"交还"租界…… 824
二、掠夺搜刮　"以战养战"…… 832
三、物价狂涨　投机狂热…… 843
四、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胜利…… 848
第二十五章　争取和平民主…… 857
一、"天亮"之后…… 857
二、接收敌伪　人民遭劫…… 865
三、奋起反对内战独裁…… 870
第二十六章　形成第二条战线…… 885
一、反美斗争高涨…… 885
二、"向炮口要饭吃"…… 898
三、反迫害斗争的进一步深入…… 912
第二十七章　迎接解放…… 930
一、"币制改革"与经济崩溃…… 930
二、黎明前的战斗…… 940
三、解放上海战役…… 950
四、胜利会师　建立人民政权…… 958

附录：
1．上海史大事记…… 964
2．上海地区建置沿革表…… 995
3．上海历任知县(县尹)表…… 1000
4．上海历任道台表…… 1018
5．民国时期上海行政长官员表…… 1027
6．上海市区旧新路名对照表(中外文)…… 1028

序

唐振常

上海，在历史上曾经蒙受帝国主义列强所强加于它的屈辱。租界延续了近百年的生命。一百年中，在所谓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中国政府丧失了主权，洋人统治着这里的一切，人们称之“国中之国”。租界之不同于殖民地，只不过这块土地还属于中国。

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所称的冒险家，按其原意，是指从国外来的身无长物的各种到上海发横财的人。他们投机冒险，可以忽成巨富。

上海，又习惯于被叫做十里洋场。在洋场里，纸醉金迷，穷奢极欲，中外巨富挥金如土，一夜所费，足够民间度数十百年之资。

上海，又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改革、斗争最光彩夺目的舞台。晚清同光改革——世所习称的洋务运动，在上海最著成效；维新运动的启蒙功效，于上海而大著；排满反清的资产阶级革命，上海是国内的中心；尔后以从伦理文化上作探讨为依归的新文化运动，发端于上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于上海者达十年。

上海，屈辱的城市，光荣的城市。

中西文化的撞击与冲突，是横贯中国近代史的不容忽视的重要背景。两相较量，民族文化危机四伏，立脚不住。向西方学习，成为一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向往。学习什么？尽管较长时期是模糊

而朦胧的，终究逐渐在向前进。上海，通过租界，作了西方文化的实地展览场所。从道路设施、市政管理、文明卫生，以至文化现象、政治制度，眼所见，目所及，为华界的城厢与闸北起了楷模作用，并立即起而仿效。以至于孙中山屡称租界为市政模范。

上海以其地理上的优越位置，明清两代经济发达，形成世所习称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1843年开埠不久，即取代了广州的地位。上海，既是输入西方文化的窗口，又逐渐成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上海成为中国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重要城市，其影响与作用及于全国，至于世界。

多年以来，有志之士，追求中国的近代化。无疑，上海在全国的近代化程度最高。这所谓近代化，自然是指资本主义化。而上海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地位，不容否认，也不能否认，租界这个怪胎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之后，上海的地位起了变化。文化中心北移，这还可以说是势所必然。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削弱，从对国内来说，已经值得探讨；在国际上，则从昔日之有所影响于世界，变成了无足轻重，当年被称为“小上海”的香港，把上海远远抛在后面了。主观上，这只能归因于我们闭关锁国国策之使然。至于交通、市政、住房、卫生等等问题之日趋严重，更是人所共见。一句话，上海的老本吃不下去了。改革开放十年以来，这些问题，日渐引起上海以至全国的关心和议论。有人这么说，上海当年开埠之后取广州而代之，照此下去，也许广州不久就要向上海讨回它失去的地位了。这种说法，对于上海人而言，并非纯属杞忧。有识之士，提出了重振上海雄风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然何以振之，时不我待，出内入外，应该有所论定了。

正因为上海昔日有其雄风，加上它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近世以来，致力于上海的研究者颇有人在。可是，除了论文，就专史言，

则只有英国人写的上海史，法国人写的上海史，日本人写的上海史。不能说外人写上海史就一定是隔靴搔痒，但是，要其大指，则实或为公共租界史，或为法租界史，或侧重于地理历史，或只及于社会现象，而无完整的上海史，无中国人自己所写的上海史。（蒯世勋《公共租界史稿》也只是公共租界史）至华东师大刘惠吾《上海近代史》出，稍纠其偏。近代上海诚然是最丰富的历史现象的集中，但是，不上溯古代上海，亦不足以了解近代上海。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上海通史，由古及今，止于1949年。期望能够历史地看上海，了解上海。对于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缺而不述。对于大家所关心的上海地位之何以衰落，如何重振其雄风，本书作者自乏研究，也不敢希冀读者能从此书有所引发，但如能稍悟其一二，则已远出本书作者的厚望了。

末了，还得交代一下是作成书之渊源和经过。

1978年，酝酿制订全国史学规划的时候，远在北京的黎澍，写信给我，要我组织一个班子，写一部多卷本《上海史》。其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尚未恢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及历史学会方在着手重建，我把他的信交给了当时负责重建社联和历史学会的负责人。经过该会多次组织各科学者讨论，以为可行。1979年初，在成都举行全国史学规划会议，这个项目便纳入规划，而其任务则正式地落实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头上，责成我主其事。但我始终不敢认定为多卷本，只答应组织写一部《上海史》，甚至起初只称为《上海简史》。这样，在上海历史研究所内，设立了一个上海史研究室，调集人员，勉力从事。调集到上海史研究室的人员并不多，他们对于上海史更是或全无研究，或研究甚少。于是，边学边做，经过数年的努力，写成了若干论文及与上海史有涉的专著，（其多数论文已见于《上海史研究》论文集一、二两集）这些只能算中间成果。然后集中全力，写作《上海史》，数易其稿，方成是书。荒疏遗

漏，论列有失，皆所难免。首司其责者，应该是我。可以说，我之主编《上海史》，近于阴错阳差，至今对于上海史尚乏深入研究。所可喜者，参与编写是书的诸同志，经多年研究，已成专门。上海史的研究队伍，日益扩大，上海几家大学，都有专门人才；更因近年修志，又复人才辈出，是书诸作者能够加入这一行列，更值一贺。我个人觉得极感悲伤和遗憾的是，本书的倡议者黎澍已不及见此书而匆匆去矣。

1989年3月9日

前　言

上海，中国的骄傲。

有人说它是太平洋西岸的一颗明珠，有人说它是联结东西两个世界的桥梁，有人说它是通向中国的大门，有人说它是“近代中国的钥匙”，更多的人则说它是中国的这个中心，那个基地。凡此种种，一个意思：上海，在国际、国内地位异常重要。

然而，上海的形象清晰却又模糊。人们说各种各样的誉词，上海当之而无愧，但是人们似乎并不了解上海的全貌，迄今还没有一幅完整的上海的画像，没有一部按照上海历史本来面目勾划而成的著作，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完整的上海史。我们不揣谫陋，编写了这部书，——确切地说，一幅关于上海史的素描。如果人们在看了它以后，对历史上的上海能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厚望了。

这，就是几个上海市民献给自己伟大城市的一份薄礼。

一

中国本有编写地方史的传统。汉代成书的地方史，所遗目录甚多，原书虽大多散佚，然稽核后人征引，尚可窥其一斑。其中《三辅黄图》、《三秦记》，虽所述简略，已成肇始之作。后汉卢植的《冀州风土记》，朱玚的《九江寿春记》，杨洛的《哀牢传》，均属屡为后人征引的地方史。魏晋以后，地方史的著述，遍及中国南北各地，江苏的《吴地记》，浙江的《会稽记》，安徽的《淮南记》，山东的《齐记》，

山西的《三晋记》，陕西的《关中记》等等，还有专门记载地方人物的著述，如苏林的《陈留耆旧传》，陈寿的《益都耆旧传》，虞预的《会稽典录》等。刘知几说后面这些书都是"郡书"，用今天的话，就是地方史了。到了隋唐，地方史的编撰更见兴盛，书目俱见《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唐宋以降，地方史志明确分离，各为专著。图籍地志，受到朝廷的重视，成为地方官必修之书，日益兴盛。相形之下，地方史不太景气，但仍著述不断。苏州有吴昌绶的《吴郡通典》，扬州有姚文田的《广陵事略》，四川有张澍的《蜀典》，云南有冯甦的《滇考》等等。地方志以记述现状为主，其职责在于记录自然、社会各方面资料，以供研究参考。地方史以论述过去为主，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探寻其规律。史志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近些年来，无论在国际史学界，还是在国内史学界，地方史研究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国际史学界，由于历史研究日益趋于综合化、计量化、区域化，人们对史料的完整性、具体性、精确性以至论证的科学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地方史较之国别史，比较能够满足这种要求。所以，在国际史学界，影响最大的著作往往不是国别通史，而是区域史、地方史。在国内，由于实行改革政策以及各地自主权的扩大，各地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的刺激，由于全国性编修新方志的推动，也由于国际史学趋势的影响，一个地方史研究热正在兴起。

在这股地方史研究热中，城市史尤其是大城市史格外受到人们的注意。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不但已经出版或正在编写各自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史，而且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正在编写卷帙浩繁的世界城市史研究丛书，其中自然也有上海。就我们所知，美、英、法[4]、日、西德等国，都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上海史，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论文和著作。在国内，特别在上海史学界，对上海史研究日益重视，研究队伍在扩大，刊载上海史论文和资料的杂志在增多，研究领域在拓展，研究水平在提高，有关专史和有份量的论

文陆续问世。上海史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外国人研究上海史，由来已久。本世纪开头20—30年间，出版过一批上海史研究著作，比较有价值的有兰宁、库龄合著的《上海史》，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卜舫济的《上海简史》，霍塞的《出卖的上海滩》。这些书，就史料而言，颇有可采之处，就立论而言，虽不无可取，但总的说来，偏颇多于平实。最大通病在于把近代上海的发展完全归功于殖民者，名曰上海史，实际只是租界史，而租界史又主要是西方殖民者的历史。日本人在侵华战争前后也写过一批上海史著作，那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

国内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也非始于今日。撇开记载风物、沿革的《上海闲话》、《上海小志》不算，本世纪20年代以后就陆续出版过不下十部研究上海史的著作，如王揖唐的《上海租界问题》，徐公肃、丘瑾璋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蒯世勋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这些著作，比较客观地叙述了租界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上海的侵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30年代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集中了一批学者，对上海史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从古代到近代，搜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出版了《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等有价值的成果。遗憾的是，这项事业因抗战而半途夭折。除了上述成果迄今仍为治上海史学者所沿用，就是留下了几十万字的未竟之稿贮储于室。从总体上说，解放前国内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大多出于揭露殖民主义罪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直接配合收回租界的爱国斗争，因此，从政治上着眼较多，从道义、法律等角度评价租界较多，而对于上海是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海滨县城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近代大城市，对上海在国际、国内的地位，对上海在向近代城市迈进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演变及其规律，这样一些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更不用说写一部综合的上海史了。

无论从上海在国际、国内的地位，从上海史研究的现实和历史

状况，还是从史学研究的趋势来说，都需要一部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完整的上海史。作为上海的一个地方性的历史研究所，我们自应义不容辞地从事于此。我们所从1956年建立起，就把上海史列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进行了鸦片战争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五四时期的上海、五卅运动等专题研究，其重点在于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资料书。但是，由于无庸赘述的原因，科研人员一会儿奉命去搞"三史"，一会儿被拉去搞"四清"，十年浩劫中连历史所都取消了，系统研究上海史的愿望自然无从实现。1978年历史所恢复以后，这项工作得以继续进行。1983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正式把编写《上海史》作为市重点项目交给我们。数年勉力以赴，今日得成此稿。

二

我们认为，所谓上海史，就是上海城市产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城市形成以前这一地区的演变史。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影响。但上海毕竟有其自身的内容和独特的发展变化轨迹，上海史的编写，包括阶段的划分，重点的确定，只能从上海自身的内容出发，而不应只是在中国通史的框架里填进上海的内容。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对本书作了如下设计：全书上起上海陆地的形成，人文历史则起於吴越之交，下迄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时代而论，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部份，而以1842年6月中英吴淞之战为分界之标。全书以近代为主。古代上海虽说到清代已发展成为全县有50多万人的东南重镇，明清时期松江府经济发展诚然应受到重视，但上海作为典型的近代型城市，它的崛起主要是在开埠以后。因此，本书以约9/10的篇幅论述近代，尤侧重于开埠至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近代部份具体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1842年6月中英吴淞之战至1911年11月上海辛亥起义成功；(二)

1911年11月至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三)1927年7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里,我们没有套用史学界通用的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划分近代前后两阶段的标准,因为从上海的实际来看,无论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还是从政权的更迭,都是分为三个阶段更为合适。

城市是综合的实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口等各个方面,城市史应是诸方面综合发展的历史。一部上海史,即使是近代上海史,也不应只是展现殖民主义侵略与上海人民反侵略、封建主义压迫与上海人民反压迫的斗争史。本着这一想法,我们在处理小刀会起义、太平军进军上海、上海辛亥起义等问题时,没有停留在对这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称颂上,而是用更多的笔墨,叙述这些斗争与上海发展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把目光向更为广阔的方面扫瞄,诸如城市发展中的市政问题、人口问题、社会结构,上海在由古典县城迈向近代都市过程中人们的各种观念及社会习俗、风气的变化等等。

近代上海城市,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三家二方的特殊格局中演变、发展的。三家,即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这三家互不统属,又互相影响。三家当中,两个租界尽管彼此也有矛盾、互相拆台的纠纷,但在对待中国方面,往往又是一致的。至于政权结构、市政管理、社会组织、文化、风俗等方面,两租界则有着更多的一致性,因此,从政治、文化等角度来看,三家又可分为二方。租界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原有的基础,同样,闸北等地方的发展,也离不开租界的影响。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史,不但要叙述三家各自的发展,而且要分析相互的联系与影响。这就是说,要把上海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这些便是对我们这本书的总体构思。归纳起来,不外三条,一是地方性,篇章设置,阶段划分,重点确立,均依上海的实际而定。二是综合性,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三是

整体性，将三家二方作为整体研究对象。这三条，也是我们在研究中贯穿始终的原则。现在掩卷反思，我们感到，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这三条设想基本实现了。所谓基本实现，也就是没有完全实现，特别是综合性方面。例如本着综合性原则，我们原来设想，对在开埠以后，上海市民社会心理的变化作一比较清晰的勾勒，诸如人们的世界观念、义利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等。现在尽管在有关章节里有所述及，仍嫌不足。再如，我们原来设想，对近代上海的同乡会、同业公所、帮会等社会组织与上海社会特点，对五方杂处的人口特点与上海社会活力的关系，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海派文化的关系，对上海大城市的形成及其对周围地区的影响等等方面，都应作较深入的研究。现在看来，对于这些内容，研究不够充分，表达不够完整，有些很好的见解因散见在几个章节中而被淹没，显得零散、不集中。未能完全如愿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有关资料少而散，难以形成科学性的系统看法。资料对于研究人员，目前已成致命之伤。应该说，上海的资料是丰富的，但散见各处，又多设置人为的障碍，索看资料之难，有如唐僧取经。此事不改，为患正多，爰附及之。其次，集体项目，人手多，求浑然一体之统一难；另一方面，也是主要原因，我们对史料掌握不充分，理论准备也不够。这些想实现而没有完全实现的想法，正是我们以后在研究中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三

实事求是，是我们编写本书努力遵循的指导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力求在详实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上海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及种种历史现象。对于以往研究中，无定论或未涉及的自然要研究；有定论的也不盲从，而是经过严肃的研究，冷静的思索，提出自己的看法。本着这一思想，我们对于诸如

八·一三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等问题，都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本着这一思想，我们对租界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租界问题在全书中除了古代部分，几乎都要涉及。虽然我们在有关章节里分别地阐述了我们的一些看法，但这个问题具有全局性，也是至今学术界分歧较大、莫衷一是的问题，我们感到有必要在这里稍费笔墨，集中地阐明一下我们的意见。

说到上海租界，人们习惯上总把它与下列判断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冒险家的乐园，罪恶的渊薮，等等，这些是就政治、经济和社会而言。至于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或说是买办文化，或称为殖民地文化，或拟人化地称为洋场恶少，惨绿少年。这些判断本身并没有错，各自从某一侧面或某一角度道出了上海租界的状况、作用或影响。但是，如果把这些判断作为对上海租界作用或影响的总体评价，就不够全面，显非妥当。

我们认为，历时近一个世纪的上海租界，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消极与积极且往往混合在一起。

从政治上说，租界的辟建，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因为即使按照不平等的第一个《上海地皮章程》(1845年)，所谓租界，也仅仅是由中国地方政府划定一块地皮，租赁给外国人居住，其地的领土主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租界不过是外国人的居留地而已。但是在其后的岁月里，外国殖民主义者屡次违约，利用清政府的软弱与无知，豪夺巧取，把这里经营成中国政府权力所难及的地方，其面积亦不断增长。这些违背条约、侵我主权的行径，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租界，于法无据，于理难容。但是，这一格局的形成，使上海租界成为中国封建政府、军阀政府统治下的一个权力薄弱点，成为封建政府、军阀政府与不满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进步人们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反动势力

可以利用这一地方，一定程度地镇压人民或逃避人民的制裁。小刀会起义、上海辛亥起义时，上海道台吴健彰、刘燕翼都是逃入租界而得以活命的。进步的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地方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躲避他们的迫害。戊戌政变以后，维新志士康有为、黄遵宪利用租界，避免了杀头之祸。1900年12月，因参加自立军起义而遭通缉的蒉超，逃入上海租界，被清政府派人诱捕，又被租界工部局交涉索回，判以无罪释放。1903年的苏报案中，租界初则拒绝，捕人后拒绝清政府处死章太炎、邹容要求的事，已为人们所熟知。更有典型意义的是：1911年11月，上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举行反清起义时，不但在租界内策划起兵事宜，而且在起义以前，公开宣布起义日期与攻打江南制造局的具体时间，吓得清政府官员纷纷逃遁。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起义军敢死队队长张承榘中弹受伤后，竟返回公共租界南京路自新医院就医，由医生施行手术取出腿内子弹，并在医院疗养多日。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难以想象的。租界当局非有所厚爱于进步力量，资产阶级政府的法律观、道德观有所不同于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在相对程度上说，进步于封建主义，这是租界不同于华界的症结所在，因此，进步力量才能有限度地利用租界。封建、军阀政府，租界，人民进步力量（包括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构成了奇特的三角关系。租界当局有时偏向这一方，有时也会偏向那一方。何时何事偏向何方，租界当局完全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是受其母国的习惯、传统、价值观念支配的。租界当局的这种利益的不变性和策略的可变性，使得租界与中国封建、军阀政府的关系中，存在一定缝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进步人士的活动。1907年蔡元培有一段话说得最为明白：

> 盖自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

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①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进步人们自觉利用租界进行活动的心态写照。当然，他们不免太天真、太乐观了一些。苏报案出，才使革命派猛然大惊：原来租界也和清政府一样要抓人！但是，其时国内革命的中心在上海而非别地，亦有所以然。

从经济上说，外国资本主义者在上海租界及其周围地区倾销商品，开设银行，投资设厂，大肆进行经济掠夺。据统计，到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有81.2%集中在上海，银行业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均集中在上海。就全国而言，1930年、1931年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分别有42.8%、46%集中在上海。上海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掠夺的大本营。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外国在上海租界的经营，提供了近代工业、商业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诸如技术、设备、资金、电力、交通、通讯、保险等，使上海形成了比较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利用了这一环境，使自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40%，工人占43%，总产值占50%。1948年，上海工厂数占全国54.95%，工人占53.84%。上海不但是全国最大的民族工业中心，而且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解放前夕，上海已同世界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三百多个港口有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很长时间里，上海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1894年、1933年和1936年，上海分别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3.44%、53.77%和55.56%。上海也是国内埠际贸易中心。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九万亿元，占全国的75.2%；1940年，上海的比重更上升到88%。上海还是全国的金融中心。1936年上海有华资银行58家，占全国总数35%。

---

① 《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版，第一卷，第400页。

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一向是采取排挤、压制态度的，那么，民族资本为什么还能在上海这一弹丸之地取得较之中国其他地方更为迅速的发展呢？除了其襟江通海、地处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等优越的条件外，一个显然的因素，就是租界。有个外国人在30年代对这个问题作过仔细的分析，他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水源不洁，房租高，工资又比其他地方高昂。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处于动乱不安的状态，工厂发展遭到骚扰，而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许多本应迁出或开设在原料产地的工厂也都在沪设厂。虽然运费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别是在租界内，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扰。”① 对于一个工厂来说，安定的环境有时比地价、运费等条件更为重要。

从市政上说，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上海辟地，建房，修桥，筑路，设置警察，维持治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便利他们自己的生活，便利他们对中国的掠夺。但是，这些经营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近代化城市的典范。宽阔的道路，高耸的楼房，明净的橱窗，炽亮的街灯，严格而又科学的市政管理，这些都与古典的上海县城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人专门将租界与县城市容作过对比：“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② 租界市政设施的先进性、市政管理的科学性，刺激着上海的爱国士绅，南市马路工程局的建立，以及其后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设立，都是模仿租界逐渐使县城市政近代化的措施。总工程局下设户政、警政、工政等科，这种组织形式便是

① 劳福德(L.H.Layford)：《海关十年报告之五》，《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277—278页。

②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4—5页。

从租界搬来的，其所发布之各种规约章程，如规定市民倒垃圾的时间，规定“倒提生禽”属于违警等，明显是从租界市政管理条例中移植而来。同时，租界市政建设及显示出来的近代文明、外国风格、外国气派，也为那些无缘涉足西方的人提供一个观察、了解西方的窗口。很多人就是从这里观察西方、了解世界的。

从文化上说，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在上海兴学，办报，译书，传教，其中当然不乏虔诚的传教者和友好的文化交流使者，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为政治扩张、经济掠夺服务。但是，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由于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此类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学，传播了当时中国茫然无知的进步的新学问，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启蒙意义。由于上海在学术信息、西学人才、出版条件等方面，具有中国其它城市无从比拟的优势，上海成了近代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我们作了一个统计，据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189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译成中文的西书共556种，其中由上海翻译出版的有473种，占总数的85%以上（不包括一些未标明出版地址的书，而这些书很可能也是上海出版的）。北京、广州、天津、长沙、杭州等地加起来还不到15%（有少量书是日本人用中文翻译出版的）。上海译书不但数量多、内容广，而且信息新。很多西学新内容都是首先传入上海，再辗转传入内地的。人们从这些书籍中，了解天下大事，吸收新知哲理；晓得声、光、化、电、天、地、生、医；知道培根、瓦特、爱迪生；了解民约论、进化论，甚至社会主义学说，知道卢梭、达尔文，乃至马克思的大名。

由是以观，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市政、文化方面来看，租界的影响都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符合客观实际。这种双重影响主要是由近代西方与中国的矛盾所决定的。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二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矛盾。后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这两方面的矛盾，决定了上海租界同时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租界的存在，便利、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租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展览馆，提供了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接触比较的场所。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程度高的一方战胜、取代程度低的一方。这种文明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刚性规律，决定了通过租界显示出来的近代文明，必然以其巨大的力量，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租界的作用、影响，采取辩证的分析的态度，是贯穿本书的又一原则。

*　　*　　*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国内外的上海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吸取了本所以往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的经费资助；得到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支持；得到了本院领导及科研处等有关部门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本所领导及很多同仁的鼓励和支持，得到了本所资料室、学术秘书室及后勤部门的支持，还得到了海内外很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上海史研究室集体研究成果，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至第四章由谯枢铭执笔。第五章至第七章由卢汉超执笔；第八章至第十一章、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由熊月之执笔；第七章的第二节、第八章的第三、四节、第十二章、第十六章的第二、七节、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的第三节由陈正书执笔；第五章至第十八章由熊月之统一作了调整、修改。第十九至二十章由郑祖安执笔。第二十一章由李天纲执笔。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七章由吴德铎、沈恒春执笔。前言由集体讨论，熊月之执笔。附录之大

记由谯枢铭、熊月之、郑祖安、吴德铎分别编写；上海地区建置沿革表由谯枢铭编制；历代行政长官年表由杨其民、李德靖编写；主要新旧路名对照表、译名对照表由沈恒春编制；图片、插图由郑祖安提供。

唐振常、沈恒春职司正、副主编，写作之前，相与讨论，拟订提纲，设计全书，稿成之后，审订修改，补阙拾遗。现在的书稿，一般是二稿，有的是三稿。

计自命笔到定稿，历时三年有余。自然，酝酿和研究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几个人，有的研究上海史时间较长，有的较短，总的说来，皆非研究有素。本书效果如何，有待检验。即如前面所述之总体构思及具体设想，不过提供以待读者和同行检验，并非已完满无缺地表达于书中。昔梁任公论中国之新史学，每多卓识高见，石破天惊，令人色喜，但行之于实践，毕竟还有一段距离。今之史学，去梁任公阐发宏论之时，已有八十五年，其间发展，未可轻易为计，然近年来探讨史学理论、方法的呼声益高，甚焉者谓之为史学危机。我们这部上海史，也许无所创新，只算是摸索工作，投石问路，如因而得承各方指点，作者幸甚。

一九八七年八月

第一章　古云间回溯

一、原始文化遗存

上海，简称沪，别称申，是我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它位于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长江入海口处。历来就有“江海要津”、“濒海重地”之称。

同源于太湖的黄浦、吴淞（苏州河）二江，横贯上海全境，分上海大地为淞北、淞南、浦东三大片。两江支流纵横交错，五里一塘，十里一浦，构成著名的江南水乡。这里四季分明，气温适宜，光照丰富，水分充足，是全国农业高产地区。

上海地区全境有三种不同的地貌：淀泖低地，碟缘高地，河口沙洲。西部的青浦、松江县大部及金山县北部，地势低洼，高程在4米以下。以境西淀山湖为中心，分布着大小湖荡三十多个，是一片湖沼平原。东部的嘉定、宝山、川沙、南汇等县全部及上海、奉贤两县大部，地势高亢，高程在4米以上，平原之间夹有多道与海岸平行的沙堤，都属滨海平原。长江口的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和其他一些新涨出的沙洲，为河口沙洲。可见，上海境域地势平坦，不论哪种地貌，皆属平原，无深山茂林；仅境西有凤凰、厍公（陆宝）、佘（兰笋）、细林（神）、薛、机、横云、天马（干）、崑等几座山丘突起，最高亦不过百米，号称“云间九峰”。故前人概括上海的地形说：“南瞰黄浦，北枕吴淞，大海东环，九峰西拱，广原沃壤，尽境皆然。”①

今天的上海地区②，其淞南部分古称云间，淞北称嘤，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5—6亿年以前的地质时期，它就是古老陆块——扬子地台的一部份。在距今7万年前的中生代，由于地壳运动频繁，构成现在深埋于冲积层下的陆地基底。有些岩浆从断裂带涌出地面，形成今之九峰。到新生代、特别是第四纪以后，在江流海潮的共同作用下，以长江为主的河流，挟带来的泥沙不断沉积，逐渐形成三角洲冲积平原。当时气候寒冷多变，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海面时升时降，在不同时期，长江河口位置不同，形成多期相互重叠的古三角洲。至距今11000到7500年前，大理冰期过后，冰川消融，海面上升，古三角洲又大部沦为浅海。其后，海面上升渐渐减缓，泥沙堆积速度超过海面上升和地体下沉的速度，于是开始了新三角洲的发育。

据地质工作者的考证，6000年前的海岸线，大致从江苏常熟县的福山，经过太仓，进入上海地区，在嘉定县外冈、青浦县徐泾、上海县马桥、奉贤县邬桥、直达金山县漕泾一线附近，即现今称为"古冈身"的地方。那时冈身以西，已经在海浸海退的过程中，逐渐淤积成陆。大约不迟于6000年前，在这片沉积平原的冈阜之上，已经有了我们祖先的足迹，这里已成为今上海地区先民生息、劳动、繁衍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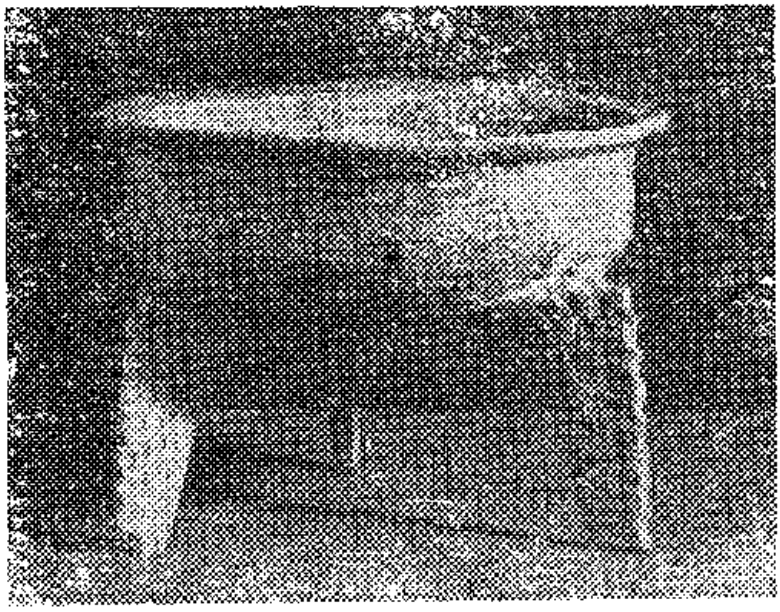
古冈身共三条，西面有沙冈，中间有紫冈，东面有竹冈，是不同时期的三条海岸线遗迹。近年来在这三条冈身及其附近，陆续发现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化遗址20多处，显示了

---

① 明万历《上海县志》。

② 在江苏、浙江两省之间。西与江苏苏州地区相接，西南与浙江嘉兴地区为邻，北起长江口的崇明岛，南至杭州湾中的大、小金山。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120公里，总面积为6186平方公里。全市包括市区及郊区的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金山、松江、青浦、崇明10个县。总人口为11859748人。市区面积349平方公里，分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吴淞、闵行12个行政区，有人口6320872人。（1986年底统计）

6000年来，各个时期这块土地上先民的生活面貌。



青浦崧泽中层出土的夹砂红陶扁凿足鼎

在位于沙冈西面的青浦县崧泽村，发掘了俗称假山墩的台形遗址，发现地下有三层原始文化遗存。下层，土质坚实，带有大量细沙，底部有深入生土层的圆形灰坑，坑壁有树枝编织的印痕，包涵遗物有较多的残陶片，动物骨骼，还有植物种子和果核。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多，也有夹砂黑陶。陶器基本为红色，表面经过打磨。残片经过复原，有炊器的鼎、釜；盛贮器的盆、罐、钵；饮食器的豆、盘等。这些器具的腹部有牛鼻式和半环式的器耳。动物骨骼有猪、狗、鹿、獐及龟甲、鱼骨、介壳等。还有用动物骨骼制成的骨镞。植物种子有属于籼稻型的谷粒和稻米，有野生桃和杏梅的果核。墓葬比较分散，均为单体葬，骨架仰身直肢，头向西北或东北，随葬物稀少。这些特点，和金山县查山遗址的下层遗存相同，都属于嘉兴马家浜文化类型，与江苏淮安青莲岗文化相近，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期，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种文化遗存，大约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经C_{14}放射性同位素测定，距今为5360±105年）。

这一文化遗存，正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

中层，比下层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这层主要为墓葬群，有大量的人骨骼和随葬品。随葬品中已有石器的生产工具，斧、磉、凿、铲、矛、纺轮和砺石等，还有一件装饰品——石璜。这些石器都经过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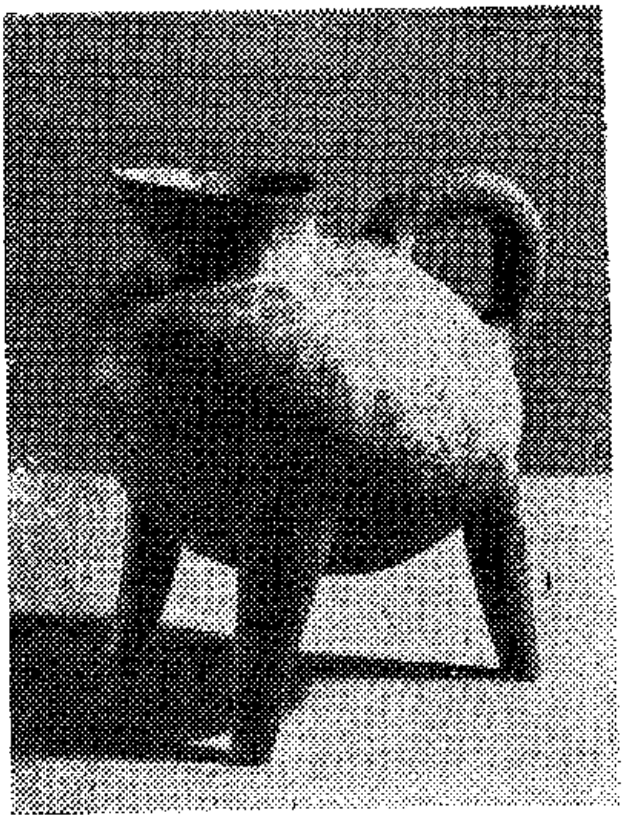
体磨制，刃部锋利，厚度均匀。陶器器形已增多，有鼎、釜、罐、盆、壶、瓶、豆、盘、杯等，还有陶纺轮、陶网坠、陶环等。多为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制成。制法以轮制为主，手制、模制为辅，往往一器由上下两半合成，合缝处附加堆纹加固。造型以平底圈足为多，鼎足已有扁方、凹弧、三角锥等多种式型，高矮不一，有鸡冠耳或横鼻耳。纹饰多种多样，有堆纹、弦纹、压划纹和绳纹。玉器只有玉璜，呈翠绿色，半环状。骨器有骨镞、骨锥、牙刀（以獐牙磨成）。墓葬成行排列，头向多改为南向。这些特征，显然晚于嘉兴马家浜文化，而早于杭州良渚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期晚期的原始文化遗存，称为崧泽类型文化。它隐约地显示了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中间的继承和发展。

这个时期，生产已有了长足进步，正是新石器时期末期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特征。

上层，与上海马桥、金山亭林、松江广富林等遗址的下层，都属杭州良渚文化类型的遗存，相当于中原夏文化，已处于父系氏族阶段，距今约4000年到2500年左右。当时农业生产已发展到用石犁耕种，用石镰收割的阶段，故有大量石制生产工具出土。如上海县马桥遗址出土了与中原铜钺相似的石钺，松江县广富林遗址出土的石制犁形器，以及各遗址出土的石镰、石刀、石铲、石矛、石磬、石凿等石器，通体磨制，并加抛光，既光滑又美观。突出的陶器是泥质黑衣陶，其次是泥质灰陶，以轮制为主，胎多灰色，外表有一层薄黑色皮，厚薄均匀，显出制作时经过打磨。器形种类很多，纹饰繁杂。如马桥遗址发现的有鬶陶壶、陶觚、陶尊，造形美观，制作精细。有的遗址还发现少数釉陶。松江县广富林遗址发掘两处墓葬，随葬品除日用陶器外，在男子左右臂侧均有石铲、石镞，近处有狗骨架一具；女子脚下有陶纺轮，及猪骨架一具。这似说明两性间的劳动，已有明确分工，男耕女织，男猎狩，女饲养。①

青浦崧泽遗址的上层，上海马桥遗址的中、上层，金山查山、亭

林遗址的上层，松江广富林遗址的上层，都发现了大量几何印纹硬陶片，这是浙闽地区古文化遗址普遍存在的一种陶器，也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特征之一。这个文化相当中原的商周文化。与硬陶同时出土的还有少量釉陶片，已接近早期的青瓷器。烧制这种硬陶和釉陶器，须高达1100 °C的火候，当时必已有了专门的陶窑。在这层出土陶器中，已经可以看到来自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



金山亭林出土的带把实足灰陶盉

例如上海马桥遗址的中、上层之间，发现了与甲骨文相类似的陶文，中层还出土与中原青铜器式样相同的石钺，中原形制的簋、豆、觚、觯、尊都有出土，其纹饰中有复杂的云雷纹、贝纹。这说明，最晚到西周时期中原文化已经传播到今上海地区。此外，马桥遗址出土了特型的青铜小刀，崧泽遗址也有一个铜鼎足出现，是上海地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象征，或者说已开始了青铜时代。其后，有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出土的、具有典型战国时代风格的铜戈、铜剑。

今上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从6000年前左右的马家浜文化类型，到4000年前左右的良渚文化类型，都明显地保持着浙闽古越族土著文化的特点，既不同于中原文化，也不同于江苏宁镇地区荆蛮族土著文化（湖熟文化）。例如从今上海地区几处古文化遗址出

① 上海博物馆《三十年来上海地区考古收获》，考古学报《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试掘》1962，第二期。

土的炊具，都只有鼎、釜；邻近上海的宁镇地区则使用鬲、甗。宁镇地区出土的陶器器形与纹饰，均与商周文化风格类似；今上海地区则与浙闽相同。直到良渚文化晚期遗存，才见到两者在同层中出现，如崧泽遗址上层发现了鬲足，马桥遗址的中层上部出土绳纹甗，已与宁镇地区的甗形器基本相同，这表明吴、越文化已逐渐接近与汇合。此后，又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与中原文化完全融合。那时，早已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考证。

二、春秋吴越古战场

今上海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也可上溯到三代。司马迁《史记》说：立禹为帝的"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① 这大约是发生在4000余年前的事情。现在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山有大禹陵。禹的四代孙帝少康，恐怕断绝了先祖禹迹的宗庙祭祀，封他的庶子於越，号为无余。而据晋贺循《会稽记》说："少康，其少子号於越，越国之称始此。"少康之子在越传国20余代，历殷至周，在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他的儿子名允常，拓展疆域，自称越王②。他拓土到今上海地区的南部，古海盐县全境都属越国。

西周建国之前，周太王的两个儿子太伯、仲雍，为避位让贤，把王位传给弟弟季历，躲到江南荆蛮地区来。这大约是发生在3000年前的事情。太伯、仲雍南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受到荆蛮族的欢迎，"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③ 太伯居于梅里，在无锡县东南六十里。武王克殷，吴国已经五传至周章。周武王寻求太伯、仲雍之后，正式封周章为吴王。今上海地区的北部，即吴国的东境。后来，吴二十世孙诸樊迁都到吴（今江苏

① 《史记·夏本纪二》。
②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③ 《史记·吴太伯世家》。

省吴县)距离上海就更近了。诸樊的父亲为寿梦(前585—前561年),始与中原相通。相传寿梦曾在国都之东，松江以南，修筑华亭,作为停留宿会之所①。后来,这个地方就定名为华亭。

吴国的北疆抵松江以南,至二十一代孙光,即国君阖闾(前514—前495年)曾在吴城去越都会稽的要道——淞南的由拳县境内修筑城塞,防御越国的袭击②。阖闾曾东巡到这里,即名此城为阖闾城。它的位置，大约在今上海市青浦县界吴淞江边③。

吴王阖闾于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伐越,深入越境，到柴辟亭、语儿、携李一线④。柴辟亭本古由拳县治所,后陷为谷水,即今青浦县泖湖地方⑤。语儿即御儿，今崇德县治所在⑥。携李在今嘉兴县南四十五里处⑦。阖闾在这一役中受伤，死于去携李七里的径。

吴新君夫差为报携李之仇,于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率军击越,大败越师,乘胜深入越境。途经海盐,遇大风,车败马失,骑士堕死,匹马啼嗥,筑城休息,名此城为马嗥城。后来,海盐曾设县治于此⑧。

越王勾践战败,浙西土地尽归吴国。两年后，勾践以美女、厚礼奉献吴王,贿赂吴臣。夫差又增加越王封地：东至句甬,西至携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纵横800里⑨。上海地区的归属也随着两国之间的战争胜败而变化,时为吴有,时为越占。

---

① 明正德《松江府志·沿革志》。
② 《越绝书·吴地传第三》。
③ 宋绍熙《云间志·古迹》。
④ 《越绝书·吴地传第三》。
⑤ 元至元《嘉禾志》,清光绪《青浦县志》。
⑥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
⑦ 《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
⑧ 《越绝书·越地传第十》,郦道元《水经注》,明《海盐图·建置考》。
⑨ 《吴越春秋》,宋范成大《吴郡志》。

吴越之间决定存亡的一场决战，正是在上海地区进行的。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6年)越王勾践大举伐吴，吴军御於笠泽，两军夹水而阵。越军乘黑夜，左右两翼鼓噪而进，中军潜涉过江，吴师大乱败退①。笠泽江就是松江，两军对垒的地方，大约在昆山县南，青浦县北境的吴淞江上。

越军渡过吴淞江，包围了吴都。周元王三年(前473年)灭亡吴国，吴地全境都入于越国的版图。

上述史实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界于吴越两国之间的上海及其邻近地区，在两国长期频仍的战争中，成了吴越古战场所在。

越王勾践既兼有吴越之地，又称雄江南，经七传至无疆。无疆是个好战的国君。他派军北伐齐，西伐楚。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威王兴兵反击，大败越师，杀死无疆，取浙西地并入楚国②。

楚考烈王即位(前263年)，用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考烈王十五年(前249年)春申君的封地从淮北迁江南。黄歇就以吴故城为首邑，领有现今上海地区。传说黄歇于吴开申浦，故后世附会称黄浦为黄歇浦或春申江③，而"歇浦"、"申江"也就成为上海的别称。

三、诸侯封国　士族庄园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0年)秦将王翦灭楚，取得江南，统一全中国。秦划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吴越故地设会稽郡，郡治在吴城。会稽郡辖二十四县，上海地区在嘹、由拳、海盐三县境中。

嘹县，春秋时代是吴国的嘹田之区。吴城东南直到海滨，原是

---

① 《左传·哀公十七年》，《史记·吴太伯世家》。

②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③ 《太平寰宇记》，明弘治《上海志·山川志》引冯允中诗。

一片沼泽地区，即《史记》所说“水去布生”的沮洳之地。经过吴民世代开垦，逐渐掌握火耕水耨的畽田方法：先放火烧掉田中杂草，灌水落种，待稻与草并生，长七、八寸时，一并截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①。这片广袤的土地，成为吴国贵族田产。《越绝书》有：“蛇门外塘坡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田，塘去县二十五里”的记载。当然田绝非世子所造，人民开地为贵族所占耳。秦代在这里设为畽县。现今上海地区的嘉定、宝山县全境，上海、青浦、松江县的北境，都属古畽县区域。

由拳县，春秋时代名长水，周敬王六年（前514年）设县②。秦改长水为由拳。《太平寰宇记》说：“秦始皇东游至长水，闻土人谣曰：‘水市出天子’，从此过，见人乘舟交易，应其谣，改曰由拳。”相传古由拳县治所在今青浦县泖湖，俗传泖中每风息云开，鹳鹳井阑毕见③。现今上海地区的青浦、松江县西境，都属古由拳县区域。

海盐县，春秋时代为越国的东北陲④，以煮海水为盐著称，故得海盐之名。传海盐县初治，设于华亭乡之柘林，秦代陷为柘湖（金山卫城东北六里），县治迁武原乡。明代，华亭南门有鹳井，尚可见井圈石刻海盐县字样，可证华亭（今松江）古属海盐。现今上海地区的金山、奉贤二县及松江县南境，都属古海盐县区域。

汉代，会稽郡各县先后为楚、荆、吴诸侯之国。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汉将军灌婴取会稽郡，高祖立韩信为楚王，辖会稽等六郡。明年分楚为荆、楚二国，立从兄刘贾为荆王，以会稽、鄣、东阳三郡地为荆国（因境内有荆山，在阳羡、宜兴界）。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反汉，攻入荆国，杀死刘贾。平定英布乱后，改立刘濞为吴王，管辖荆国故地。《汉书》说：“吴东有海盐、章山之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② 元至元《嘉禾志》。

③ 清光绪《青浦县志》。

④ 郦道元《水经注》，明《海盐图经》。

铜，三泖五湖之利，江东一都会也。海外鲲人岁时来见。”海盐是今上海地区的南境，三泖也在今上海地区，说明早在西汉之初，今上海地区的自然资源已被开发利用。鲲人者，东鲲之人也。东鲲为海外之国，史称鲲海，谢灵运《永明乐》诗有“化洽鲲海君”句。“岁时来见”，可见当时已有了相当的贸易往来。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大改天下郡县名称，改海盐为展武，改嘉为娄治（上应星宿、下有娄江）。后世曾在乍浦南三里许的海中，趁特大低潮时，发现古遗址，拾得新莽货币“大泉五十”一个，天凤五年展武县官秤锤一个，证明海盐县改名之事属实①。

东汉光武中兴，恢复西汉旧郡县名，娄治改称娄县。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为二，浙东仍为会稽郡，郡城设在山阴（今绍兴市）；浙西另设吴郡，郡城设在吴城（今苏州市）。吴郡辖县十三，包括娄、由拳、海盐三县②。

东汉，在今上海地区出现顾、陆两大姓为首的江东贵族。左思《吴都赋》说：“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建武年间（25—55年）陆闳曾任尚书令。东汉末，陆闳的玄孙陆康任庐江（今合肥市）太守，让年龄较大的侄孙陆逊带领幼子陆绩返回吴郡，移家于华亭谷。南齐陆道瞻《吴地记》说：“海盐县东北二百里有长谷，昔陆逊、陆凯居此。谷水东二里有昆山（松江县小昆山），父祖葬焉。”谷水亦称谷泖，其地在今上海地区青浦、松江县境。

吴郡顾氏有三族，其一在海盐县的亭林里（今属金山县）。东汉末，顾雍曾从大学问家蔡邕学习琴书，18岁被推荐出任合肥长，后为娄县令③。

汉末，东吴孙权为笼络江东士族，起用陆逊为海昌屯田校尉，

① 清乾隆《乍浦志》，道光《乍浦县志》。

② 《后汉书·郡国志》。

③ 《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顾雍为会稽丞。并将其兄孙策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陆逊，一个嫁给顾雍的儿子顾邵，结为姻亲，以巩固东吴政权①。可见顾陆二氏在江东之重。

陆逊以破荆州擒关羽之功，封为华亭侯，明年晋封娄侯。即由亭侯升为县侯。顾雍官至尚书令，封阳遂乡侯。两家子弟在朝为官者，人数不下数十。他们在上海地区拥有大量土地，过着豪奢的生活，他们的庄园："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②

晋太康元年(280年)东吴灭亡。陆逊的孙子陆机(字士衡)、陆云(字士龙)退居华亭故里，闭门读书。太康末，天下安定，陆氏兄弟与顾雍的孙子顾荣，离开华亭故里，北上中原，来到晋都洛阳。晋丞相张华很重视陆机、陆云的门阀与才能，曾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③，把他们推荐给朝廷任职。一次，陆云与北方名士荀隐在张华府中作客相遇，张华说你们都是名士，不必说一般的客套话了。陆云自报姓名："云间陆士龙"，荀隐答："日下荀鸣鹤"，时人称为"名对"④。上海地区古称云间，首见于此处。

陆氏兄弟在洛阳，不时思念华亭故里。陆机写的《怀土赋》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序言说："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对于云间的一草一木都寄予很深的感情。又在赠从兄陆晔的诗里说："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⑤，更充满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谷水阳、昆山阴，指的都是上海地区松江县境。

---

①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② 葛洪《抱朴子，吴失》。
③ 《晋书·陆机传》。
④ 《晋书·陆云传》。
⑤ 宋绍熙《云间志下卷·赋》。

晋惠帝元康初年(291年)天下已经处在大乱前夕，与陆氏兄弟一同入洛的顾荣，劝他们辞官回乡，二陆不听。至太安元年(302年)任前廷尉正的顾荣故意酣饮终日，不理公务，被免职回乡。陆氏兄弟为成都王司马颖的恩遇所牵掣，终于卷入八王之乱的政治漩涡，被人谮害，同为司马颖所杀。临刑之际，陆机还想念着故乡，叹息说："华亭鹤唳可复闻乎？"① 古云间滨海一带，芦苇丛生，为仙鹤栖止的地方，有鹤沙、鹤坡、鹤窠等地名，都在今上海地区南汇县境内。

四、海防要地——沪渎

西晋末年，中原陷入一场大混战。北方人为避乱纷纷渡江南来。佛教僧侣也随众南渡，为取得南方人士的崇奉，便在传布佛法时制造出"吴中二佛"的神话，以广宣传。上海地区的古称——沪渎，也随着这一神话的传播而出现。建兴元年(313年)在吴郡娄县界，松江入海口的沪渎，几个渔民遥见海上有二个人像浮沉，泛海沂流而来，认为是海神显圣，就传播开来。吴县华里的信士朱膺和东灵寺帛尼等乘船到沪渎海口去迎接。佛像渐近，就浦仰视，见二像背部各有维卫、迦叶的题名，即佛祖的两个弟子。接像的人非常踊跃，盛况空前，迎像入船，沿松江溯流至吴城蓟门，因为朱膺家近通元寺，就迎像入此寺供养② 。沪渎之名见于文字记载，这是首次。

在南朝战乱迭起，朝代屡更的历史上，沪渎多次以海防要地出现。

东晋成帝时，北方赵国派将刘徽率军浮海骚扰南方③，曾在沪

① 《晋书·陆机传》。
② 梁简文帝《吴郡石像铭》。
③ 《晋书·成帝本纪》。

渎登陆，抄掠上海地区。咸和九年（334年）朝廷任命虞潭为吴国内史，他亲到沪渎视察，在这里修筑城垒，派兵驻守，以防海抄。这处城垒，即沪渎垒。当时，吴郡各县正当兵乱年荒之后，百姓缺粮，饿死人很多，虞潭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得到人民的称颂。传说他还领导人民在海滨筑塘，遏制碱潮以利开垦①。虞潭是三国东吴名臣虞翻之后，是对上海地区早期开发很有功绩的一个人。

隆安三年（399年），会稽郡世奉五斗米道的士族孙恩倡乱，率领党徒从海岛登陆，袭击浙东、浙西。沪渎是孙恩抄掠吴郡的登陆点。当时，吴郡太守袁山松率众加强沿海防守工事，重修了沪渎垒②。沪渎垒有东西二城，东城广万余步，有四门，西城较小，在东城西北，因两旁有东西芦浦，俗称芦子城。③五年（401年）孙恩又率部在沪渎登陆。袁山松统兵迎战，因众寡不敌，全军战没于沪渎。

宋武帝刘裕曾帅军驻防海盐县旧治故邑城（在今平湖县界），阻击孙恩，孙恩溃败，至沪渎入海逃走④。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发生侯景之乱。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大将王僧辩收复建康（今南京市），侯景率众西逃，王僧辩派部将侯瑱率兵追赶。侯景逃到上海地区的吴淞江边，被侯瑱追及，侯景尚不及布阵迎战，他的残兵败将已纷纷举旗投降。侯景与心腹数十人乘小船向沪渎逃窜，在沪渎出海时，为减轻船载，还把二个儿子推落水中⑤。

经过东晋以来的几番战乱，沪渎这个名字渐渐为世人所知，它在东南沿海的重要地理位置，也渐渐受到世人的注意。至于“沪渎”之称的来源，据晚唐诗人陆龟蒙的《渔具咏》序言说：“列竹于海

---

① 《晋书·虞潭传》。
② 《晋书·袁山松附传》。
③ 《太平寰宇记》，绍熙《云间志》。
④ 《宋书·武帝本纪》。
⑤ 《梁书·侯景传》。

簄曰沪，吴之沪渎是也。”海簄即海滨，在海滨的浅滩上插列竹栅，以绳编结，向岸两翼张开，潮涨时淹没竹栅，潮落时鱼被阻于栅内而不得去，此种捕鱼工具，古称“沪”，今称“簖”。“渎”独也，独流入海也。吴松江古无支流，故称渎。由此可见，沪渎这一带海口之地，至迟不晚于晋代，已经有了渔民聚居的村落。

五、前京县与胥浦县

南朝梁、陈时期，在今上海地区曾经建立过前京、胥浦二县，隋灭陈后，这二个县也被撤废。

梁武帝萧衍夺得政权后，吸取了前代的经验，认为依靠江东士族力量，政权才有稳固基础，国家才能安定。于是新增设许多郡县，安排地方士族人物出来作官。天监六年(507年)分吴郡的娄、海盐、海虞三县地，另设信义郡，郡治设在南沙城，不久改南沙为常熟。信义郡领县六：信义、海阳、前京、海虞、兴国、南沙①。其中的前京县，在海盐的东北隅，其地当在今上海地区的金山县和浙江省平湖县境。因为地近京浦，故名前京②。是上海地区最早建立过的一个县。

太清三年(549年)又分海盐、前京二县地，设立胥浦县③。其地在今上海地区金山县境；金山县西南四十里有胥浦乡。

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年)侯景自立为汉帝时，曾经以胥浦和海盐二县地设立武原郡④，海盐县治即在武原乡。侯景之乱平定后，撤掉武原郡，并胥浦于前京。

陈朝是南朝最后的一个朝代，也是版图最小的一朝，国土全部

---

① 《隋书·地理志下》。
② 明《海盐图经》。
③ 《梁书》。
④ 《梁书·侯景传》。

缩入江南。但又虚张声势，在旧有郡县的范围内，分划出不少新的郡县；甚至一县分属二郡。永定二年(558年)以原属信义郡的海盐、前京和盐官县，另立海宁郡①。祯明年间(587—589年)又于吴郡之下设吴州，管辖钱塘、海宁二郡②。上海地区的南部与北部，分属于二郡。隋平陈后，新设的郡全被废除，州县也重新区划。前京县虽被废掉，但前京城却存在很久，至宋代尚有遗迹可寻。南宋诗人许尚就寻访过前京城故址，他赋诗说："庐落皆无有，依稀古堞存。登临认遗迹，林莽暮烟昏。"

六、华亭县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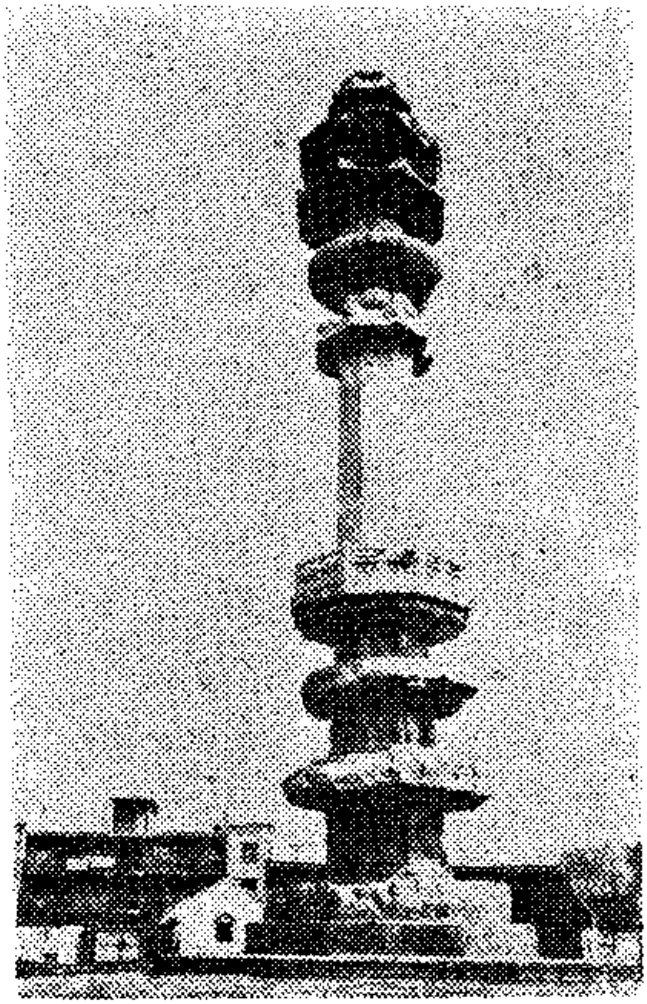
东晋以来，华亭因久设海口防镇，至隋唐已经成为云间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唐初这里人口尚少，整个苏州管区，仅有11857户③，故垦种面积还限于古冈身以内。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颁布均田法，鼓励人民开垦荒地，至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已经历时近百年。当时天下承平，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户口兴旺。苏州地区人口已逐渐增加到76421户④，增加近六倍之多。开垦荒地也越来越多，渐渐从冈身内向冈身外发展。开元元年(713年)重修了西南起盐官县境，东北抵松江的捍海塘，⑤以抵御碱潮，便利垦荒。近年地质调查发现，西南起上海市南汇县的航头，向东北经过下砂、周浦，过川沙县的北蔡、宝山县境的江湾、月浦，迄于盛桥的地下，有条断断续续的砂带，西去冈身约30公里，与冈身相平行；砂带西侧曾陆续出土许多唐代器物。这条砂

① 《陈书·高祖本纪第二》。
② 《陈书·世祖本纪》。
③ 《旧唐书·地理志》。
④ 《旧唐书·地理志》。
⑤ 《新唐书·地理志》。

带有可能是唐开元年间所筑捍海塘的遗迹。

唐开元、天宝之际，云间地区已有华亭、青龙2镇及22乡。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此时云间户数定已超过10000户；晚唐陆广微《吴地记》说是12780户。唐制6000户为上县，这里早已超过上县的标准。天宝十年(751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请朝廷，割本郡昆山县南境、嘉兴县东境、海盐县北境之地，立为华亭县①。华亭县东北境的华亭海，即今上海市区。



唐代陀罗尼经幢(现存松江城)

华亭县东南是大海，北面临长江，水环山拱，原野平衍，土地肥沃，水产丰富。当时有“嘉禾(即今嘉兴)在全吴之壤最腴”的称道，而华亭的麦禾豆麻产量都比嘉兴高。临海地区又可以煮海水为盐，殖芦苇为薪，蔬菜遍野，鱼虾满塘，海产更不可计量。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苏州当小官，曾到过上海地区，他的《吴中苦雨诗》说：“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盛称上海地区海产之富。

天宝末年(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北方遭受极大破坏，南方的经济地位日渐上升。当时有“天下仰给东南”之说。华亭县既是江淮漕粮的重要供给地，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也是两浙食盐的主要产区。贞元年间两浙岁运米七十五万石，输送京师①。宝应年间在嘉兴设立盐监，在华亭白沙乡（今上海地区奉贤县境）设徐浦场贮盐②，当时，盐税居天下税收之半。

唐代末期，藩镇割据，混战不已。浙西沿海多为起义人民所据，王敖据昆山练祁（今嘉定县城），王腾据华亭县境③。乾宁四年（897年）镇海节度使钱镠派部将顾全武攻取华亭，钱镠据两浙及福建的一部份，共十三州地，建立吴越国。华亭先属苏州，后改称中吴军。至后唐同光末年，因京师大乱，朝命断绝，遂僭号宝正，于嘉兴县设立开元府，将华亭、海盐二县转隶开元府④。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钱镠卒，遗命："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他的儿子钱元瓘袭位，依遗命去国仪，用藩镇礼，罢开元府，重置中吴军，华亭、海盐二县又重归中吴军。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于嘉兴县置秀州，又划华亭、海盐二县属秀州⑤。从此，今上海地区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钱氏吴越国国土狭小，三面受敌，不得不力求保境安民，不敢稍懈。所以，尽管赋税繁苛，劳役沉重，但物价稳定，生活安宁。钱氏统治两浙80余年，办成几件受到后世称赞的好事，其一就是在吴淞江沿岸大搞圩田水利，初步形成上海地区的河网化，为浙西农业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浙西民间称钱镠为"海龙王"，善于治水，即由此而来。

上海地区处于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东缘，西部地势低洼，常因湖溢江涌发生水患，东部为沿海冈阜，地势高亢，常有旱灾。钱氏教导人民因地势之高低，井之而成圩田，即于环湖低洼地区，吴

---

① 《新唐书·食货三》。
② 元陶宗仪《古刻丛钞》。
③ 《新唐书·周宝传》。
④ 《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
⑤ 《十国春秋·文穆王世家》。

淞江南北两岸，开纵浦通江；又在浦的两侧，挖横塘以分水势；浦塘下分设泾、沥等分支，引水入田，使水流蓁布而缓泄，尽得灌溉之利。每隔五里至七里设一纵浦，又隔五里至七里设一横塘，纵浦与横塘间，圩圩相接，水行圩外，田成圩内①。更于浦塘与干河相接处，沿江濒海泄洪水口，多设闸堰，以控制水位，保持低洼地不积涝，高阜地有水流灌，旱涝均可保收。

钱氏为保持这一整套河网工程的效用，使堤岸常固，浦塘常通，还专门设立都水营田使负责经常管理，下统四部撩浅军8000—9000人，常年检查维修②。因为有这套水利工程，钱氏统治的数十年间，岁多丰稔，库存充盈，谷价平稳，一石米不过数十文③。

五代时期，太湖产丝区的苏、杭、湖、秀诸州，都属吴越国。当地生产的蚕丝与丝织品为全国之冠，且驰誉海外。钱氏向朝廷奉献的贡品，主要也是文绫、绛纱。华亭县丝纺织手工业也很发达，能织出精美的丝织品，行销国内外。

吴越国很重视发展商业，在沿海广设博易务，开辟贸易市场。同时，大力开展海外贸易，与日本、高丽、契丹通商。后唐清泰末年（935年）钱元瓘多次派使赴日，嘉兴人蒋承勋数度至日本，日本国左大臣藤原忠平也有书赠吴越王④。秀州华亭县的青龙港，是吴越海上交通的一处重要港口。

---

① 宋郏亶《水利书》。
② 《十国春秋·吴越二》。
③ 《十国春秋·吴越五》。
④ 木宫泰彦《日中交通史》。

第二章　上海的崛起

一、华亭经济的发展与上海务的出现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吴越忠懿王钱俶纳土归宋。秀州华亭县，经过吴越80余年的安定生活，人口繁聚很快，尽管宋初华亭所管乡数已减少到13个，但全县户籍却增至54900余户，[①] 达唐代初建时的四倍有余。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二十三路，秀州为浙西路，仍辖有嘉兴、华亭、海盐、崇德四县[②]。

靖康之难，宋室南迁，北方人民随高宗南渡，两浙人口骤增，华亭县籍户增加到97000户有奇[③]，较北宋又增加近一倍。建炎年间金兵过江，胡马所过，燔灭一空，唯独华亭偏居海隅，得以保持安宁。建炎四年（1130年）为解决高宗行在众多扈从官员的吃饭问题，诏令浙西以银10万两、钱10万缗，籴粮备用，储放于华亭[④]，华亭一时成为后方供应基地。这时的华亭已经成为吴会诸邑中较大的城镇，人烟稠密，里闾日辟，全城有坊巷27处、庙宇46座[⑤]。在县镇通波塘畔，立有唐代大中十三年(859年) 建造的石经幢一座，高九点三米，呈八角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和捐造

---

① 宋绍熙《云间志·版籍》。
② 《宋史·地理志》。
③ 宋绍熙《云间志·版籍》。
④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记》。
⑤ 宋绍熙《云间志·坊巷·寺观》。

者姓名，姿态雄伟，雕刻精美，显露出盛唐的艺术风格。县南五代时期建成的兴圣教寺，至宋熙宁、元祐年间又建立起一座四面九级的高塔，是宋代砖木构筑、楼阁式浮屠的代表作，也是全城最高的建筑物，至今尚巍然矗立。

宋代华亭的经济发展，大大超过前代。在农业方面，宋代以前华亭的田亩数、产量及赋税，都已无法考证。南宋只留下一个全县缴纳田赋的数额：夏税 153352 贯有零，秋苗粳米 112316 石有零。① 夏税征钱，秋苗征米，称交纳钱粮。按五代钱氏在两浙所定赋额，为每亩三斗。宋初朝廷派王方赞均两浙田赋，定为"亩税一斗者，为天下之通法"② 。但地有生熟，田分上下，产量不同，又须分别定税。宋华亭县的赋额，定为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其后增益不一③ 。上述税额，虽然不算高额，但历宋一代，岁岁有逋欠，竟无一岁完纳。据南宋端平年间权吏部侍郎袁甫的记略："华亭岁入苗，号逾 10 万石，实 67000 有奇，县官岁督才38000止。"④ 这是真实情况。宋代两浙水灾连年，少有平稔，豪官占田甚广，如南宋初的抗敌英雄和王杨沂中，在苏、秀占有大量田地，一次即拨昆山县良田四千亩为"粥米资"⑤ ，赠给亲戚，他名下的田地正不知有多少。这些田都是免税田。所以端平元年（1234年）华亭知县杨瑾修复经界，重定税额，以岁缴 57810 石为数⑥ ，刻石留据，比原定秋苗减少一半。县民称赞这个税额是"赋税就实，足称良法美意矣！"到景定四年（1263）贾似道行公田法，以告牒、会子等一纸虚文，逼夺民田为

---

① 宋绍熙《云间志·税赋》。

② 明正德《松江府志》引杜宗桓《上巡抚周忱书》。

③ 宋鲍廉《琴川志》，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

④ 清《重修华亭县志·田赋上》引权吏部侍郎袁甫记略。

⑤ 赵翼《陔余丛考》。

⑥ 明正德《松江府志》引宋端平元年知县杨瑾《修复经界始末记略》。

官田，加征苗米，华亭县的田赋税额，竟超过旧额158200石有奇；官民田土税粮总数达到422820余石①。这是历史上上海地区的第一次重赋。当时，家居上海地区莘庄的太学生叶李曾上书论略，书中有："公田之害，惨于青苗；似道之罪，浮于安石"。此种重赋之法，弄得百姓家破民怨，以迄宋亡。

宋代的盐税，在国家总收入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税收的一大来源，还直接关系着边防的供输。雍熙年间因西北用兵，粮草缺乏，就让商人输刍粟至边塞，发给引券，到浙淮盐区取盐。前代发展起来的华亭盐业，这时更加兴盛。县境东南滨海一带，包括今上海地区的金山、奉贤、南汇、川沙四县之地，数百里无禾黍菜蔬，盐田相望，场场相接，自西南而东北，有浦东盐场，领浦东、金山、遮山、柘湖、横浦五个分场；袁浦盐场，领袁浦、六鹤、横林、蔡庙、滅漯五个分场；青村盐场，领青村南北二场；下砂盐场，领下砂南北二场、大门场、杜浦场等四个分场；还有南跄盐场。前四个盐场，均派有催煎官，也称盐场监官；南跄场因距离县治太远，由昆山县（后分设嘉定县）江湾场交纳②。此外，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在长江口外的崇明岛上，又改原属韩侂胄的废庄为天赐盐场，划归淮东管辖。当时，华亭的盐场，都属于浙西盐提举司管辖，县城设有买纳、支盐二官，或称为县盐监。全县的盐产量祖额（即最初的定额）为547349石有奇；至南宋增加至128000袋有奇（宋制50斤为石，6石为袋）③。实际上，祖额不过是个虚数而已，南宋时最高的年产量，也未超过83000袋，常年只有70000袋左右④。产量提不高的原因，主要是盐官克扣亭户工本，强迫盐丁生产，故盐户生产积极性低下。绍兴年间曾有15年不发官给工本费，拖欠亭户金额竟达197000缗。华亭盐户一直上告到朝廷，才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

① 明正德《松江府志·田赋》。

②③ 宋绍熙《云间志·场务》，清《重修华亭县志·盐法》。

④ 明正德《松江府志·盐业》。

提举浙西茶盐，他到任不逾年，尽数偿还了所欠工本费，当年所获盐利"即赢巨万"①。南宋中期以后，盐官多是贪污不法之徒，吞没盐户工本，虐待盐民，横加捶楚，开庆年间华亭县盐监（买纳官）黄震上书说："自嘉定后，提举以出剩充苞苴，盐监官以势要得辟阙，会盐价减，物价日增，人户无所偿本，徒鞭挞以强其输官，逃亡大半，存者日苦。"②反映了盐官的贪暴，盐民的痛苦。这正是南宋时期盐产量低落的原因。

宋代酿酒业也在华亭发展起来，南宋时华亭县的酒税也是一项重要税收。祖额初为66250贯，至南宋又逐年增加，实办110589贯余③。乾道以后，因长期征收不能足额，才议蠲减。当时，华亭县的南四乡：仙山、白砂、云间、胥浦，因硷水为害，皆成斥卤之地，将应征的秋苗改缴缗钱。参政钱良臣请准朝廷，就用这笔钱补交酒税缺额。时人议论说："利之在官者，轻为之名色，则其后卒不可去，为他日无穷之弊。"④酒税本起于唐代中期，但直到宋初才定为制度，州县城内都设立酒务酿酒，市镇乡间也许人民自酿，征收其岁课。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秀州已有17处酒务，即：秀州城，华亭、海盐、崇德三县，青龙、上海、赵屯、六盈、泖口、崧子、广成、徐沙、魏塘、石门、牛进、州钱、汉盘等市镇，岁收104952贯⑤。

华亭县的商业也很繁荣（青龙镇港口的海外贸易下文另述）。商税岁入相当可观。税务祖额为61713贯有奇⑥。按《通考·征榷考》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40万贯以上者3处；20万贯以上者5处；10万贯以上者19处；5万贯以上者30处。苏州为5万贯以上州之一。华亭一县的商税额竟达6万多贯，足见其商业发展的程度。当时除县城设有征税的场务外，海隅乡的汉城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〇。

② 清嘉庆《松江府志·田赋志（盐法）》引《黄氏日抄》。

③④ 宋绍熙《云间志·场务》。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

⑥ 宋绍熙《云间志·场务》。

里(赵屯),新江乡的崧宅里,白砂乡的南桥里,枫泾乡的白牛市和高昌乡的上海等地,也都设有商税场务。

随着农副业和盐业的发展,酒税、商税场务的设置,华亭县全境逐渐形成许多物资交换的中心集镇。县境东北90里的高昌乡上海浦一带,农民、渔民与盐户交错的村落,至北宋中期已生齿日繁,财富日增,舟车往来,商贾辐辏,因而出现上海务之名。为什么得名上海呢?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根据郏亶《水利志》,说松江之南有大浦十八,其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黄浦掩有上海浦,故得名上海;二是古代所说的海之上洋,今也称海上,由上洋而得名上海;三是旧有华亭海之名,在青龙港湮塞后,中外商船都转至此地登岸,故称上海①。

二、浙西水患与吴淞江的治理

吴淞江与沿江诸浦受海水潮汐的影响,容易湮塞,不易彻底疏理,这是浙西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大难题。从北宋到南宋,虽然历朝都进行过浚治,但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五代吴越数十年间在吴淞江流域兴建的圩田水利工程,进入宋代后不过三、四十年,就已大部毁弃。有的由于失修,逐渐崩圮;有的毁坏,则纯属人为。如端拱年间,两浙转运使乔维岳只顾漕运舟楫通行便利,不管堤岸堰闸施设的水利作用,凡碍舟行的一概毁除②,这无疑是一次大破坏。宋代的田赋制度,规定品官限田免税,也为豪强侵占土地开了公行之途,吴淞江两侧的江浦堤岸多被平毁,或开为田,或种植茭菇菰蒲,以致疏泄水道日隘,导水圩堰渐渐隳弃。

---

① 清嘉庆《上海县志·沿革》。

② 明王鏊《吴郡志·水利下》。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发生了吴淞江泛溢,淹田没舍,百姓流离。乾兴元年(1022年)又暴雨成灾,积水浸野。天圣初(1023年)江淮制置使赵贺奏报太湖塘岸毁坏及沿海诸浦湮废的情况。当年就修堤排涝,恢复良田数千顷,流民有26000多人归来①。但是,对于引起灾情的原因,并无人深究,以致再遇大雨,又成泽国。直到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府,他遍访灾区,俯察水情,在《上宰相书》中说:"太湖纳数郡之水,湖东一派谓之松江,积雨之时,湖溢而江涌,横没诸邑,遂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致河渠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势。惟松江通海,漫流始下,或一岁大水久而未耗,来年暑雨复为渫焉。"② 他又详细地研究了前代的治水方法,指出当今水患的原因。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文中说:"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水利,自是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万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渫,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湮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湖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利。"③ 范仲淹亲历海滨,率役兴工,开五大浦疏导诸水,东南入吴淞江,东北入海。工程用掉钱粮183500贯。竣工之后,又吸取五代吴越国常置撩浅军的经验,设农田水利使者,专管湖塘河渠的养护④,大大改善了吴淞江流域的农田水利。范仲淹本有继续疏治吴淞江的愿望,还未及兴工,即奉调离去。至宝元元年(1038年)两浙转运副使叶清臣,又因为吴淞江下游华亭与昆山之间的蟠龙汇河道回沆迂缓,阻遏江流,以致水泄不畅。他不顾当地豪强的反对,决心疏浚盘龙汇、沪渎港,裁弯取

① 《江南通志(稿)·大事记》。

②③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

④ 《宋史·河渠志》,同书《范仲淹传》、《叶清臣传》、《吴中水利通志·卷一》。

直，新辟河道，使水流径直入海。施工前，叶清臣专程到上海祭祀通济龙王祠①。嘉祐六年（1061年）两浙转运使李复圭又按上法，疏浚了吴淞江中游的白鹤汇②。经过这一番治理，减少了吴淞江的泛溢，初步形成今吴淞江中下游的江道。其残留旧道，就是今上海市闸北区的虬（旧）江。

宋初，吴淞江宽达九里，堪称是一条大江。当时，江流湍急，风涛浪涌，常常倾覆漕运船只，因而庆历二年（1042年）在太湖出水口处，修筑了一道长堤，横截江流，以减缓水势。这一来，江源减弱，流势不畅，冲刷泥沙无力，造成下游诸港浦的淤塞。庆历八年（1048年）又兴建吴江长桥，江流更加减缓，江面逐渐缩窄，渐减至五里、三里。至元祐年间，苏轼上书说："自长桥挽路之成，公私漕运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艰噎不畅，江水不快，软缓无力，则海之泥沙随潮而上，日积不已，故海口日湮灭，而吴中多水患。"③这正是庆历以后，吴淞江发生水患的一个新原因。大约在嘉祐末年，浙西又因大雨发生水灾，大水久渫不退，直到熙宁六年（1073年）才有昆山郏亶上书论治水方略，朝廷即任郏亶为司农寺丞，命他提举兴修吴淞江水利，当时募六郡民工，齐集吴淞江治水。郏亶忽略了吴淞江上流自然条件的改变，"欲略循古人之法"治理，当然不会成功，只修了一年多，就弄得"民以为扰，论议沸腾"，连变法派的主将吕惠卿也说他"措施乖方"，只好罢役停工④。此后，虽有沈括视察两浙，多所建议，又有毛渐开大盈、顾会二浦，徐确淘封家渡至大通浦出海口，仍不见明显的效果。直到大观元年（1107年）中书舍人许光凝奏议才说："吴中积水，视去岁损二尺，前岁损四尺，良由浚松江清入浦之力。"⑤积水仍然未能尽退。长时间的江浦湮塞，积水漫野，给

---

①② 《宋史·河渠志》，同书《叶清臣传》、《吴中水利通志·卷一》。

③ 《江南水利通志·卷八》引苏文忠公《进单锷水利状》。

④ 《宋史·河渠志》，同书《郏亶传》。

⑤ 《吴中水利通志》。

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时人单锷说："三州之水，为患滋久，较旧赋之入，十减其五、六，以日月计之，则水之为患于三州，逾五十年矣。"① 这和上文所述华亭县的岁赋情况，是完全相符的。直到南宋灭亡，吴淞江的水患仍未完全消除。

三、青龙镇盛衰

华亭东北 54 里，吴淞江边、沪渎海口，有个青龙镇，古代大大有名。相传吴大帝孙权曾置青龙战舰于此，故得名②。自东晋以来，历代都在这里设戍，以防海抄，隋唐更派镇将驻守。当时，从海上入沪渎，溯吴淞江去苏州，或经顾会浦（通波塘）下华亭，沿大盈浦西南行去嘉兴，都要经过这个水上交通路口。因此，青龙镇已是华亭东北的大镇，有"控江而浙淮辐辏，连海而闽广交通"的称誉。

中唐时期，日本遣唐使来中国，新开辟了南路海上交通线，从日本九州直趋长江口。日本圣武朝遣唐使多治比之成一行，在中国完成使命后，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十月从苏州返棹回国，其后遣唐使也多取此道返航③。苏州附近的港口，只有常熟福山和华亭青龙二港。于是，青龙港有逐渐发展成浙西重要海港的趋势。

青龙镇也是江南佛教发展极盛的一个地方。因为海舶往来，"行人有蹈风涛万里之虞，怵生死一时之命"④，故镇上居民事佛更虔诚。天宝二年（743年）镇南建报德寺（宋代改名隆福寺，清代为吉云禅寺），占地六十亩，建筑宏伟，梵宇瑰丽，一时为东南名刹。长庆年间又建七级宝塔，建塔前，沪渎港"与海相接，茫然无辨"⑤，入

---

① 《江南水利通志·卷八》引吴兴单锷《水利论》。
②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
③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④ 陈林《隆平寺藏经记》。
⑤ 《松江府志·名迹志》载《灵鉴宝塔铭》。

港船只常常失势，飘入深波；建塔后，望塔进止，怵心顿减，得安全入泊。长庆元年(821年)在镇北与报德寺相值，建国清寺(宋代改名隆平寺，明为城隍庙)，也是重楹复殿，观雉相望。当时，青龙镇有佛阁为东南之雄的称誉。

至宋代，海上贸易更胜前代。宋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因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是海船往来的重要港口，正式设立为镇①。江南各县都是一县设县镇一处，唯独华亭一县设有二镇，足以说明青龙镇在浙西的重要地位。当时，国内外的商船已云集此港，"自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②。青龙镇已是"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族之所会"③的繁盛之地。

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青龙镇的繁荣，北宋初期，青龙镇已是烟火万家的大镇，镇上设有管界水陆巡检司，驻有镇将防守、缉私。天圣二年(1024年)青龙镇巡检、侍禁太原王继斌，在这里为镇将兼管镇务④。景祐年间才派来专职的理财官员。镇上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管理机构完备，不亚于县镇。

青龙镇的税收也比县镇多，熙宁十年为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九贯四百三文，华亭县城镇是一万六百一十八贯六百七十一文⑤。镇上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时人比之杭州⑥。宋迪功郎应熙留下一篇《青龙赋》，描绘青龙镇的概貌说："粤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浙淮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平分昆岫之瞻光，

---

① 《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二册，职官四四。

② 《松江府志·名迹志》载《灵鉴宝塔铭》。

③④ 宋绍熙《云间志》载陈林《隆平寺藏经记》及吕谔《福善院新铸钟记》。

⑤ 《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二十九册，食货一六。

⑥ 清《青浦县志》引梅尧臣《青龙杂志》。

夜猨啼古木；占得华亭之秀色，晓鹤唳清风。咫尺天光，依稀日域，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概括起来，就是舶商云集，衢市繁华，梵宇壮丽，风光秀美，俨然东南一巨镇。

青龙镇以其海舶交集之胜况，梵宇亭台之壮丽，龙舟嬉水之美誉，临江望海之风光，招引来不少名士。北宋诗人梅尧臣曾在湖州任税官，他的叔父梅询是苏州知府，因而常常往来于青龙江上，曾专程到此观潮，看龙舟竞渡之嬉。留有《青龙海上观潮诗》一首：“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回如鼻吸。老鱼无守随上下，阁向沧洲空怨泣。摧鳞伐肉走千艘，骨节专车无大及。几年养此膏血躯，一旦翻为鱼者给。无情之水谁可凭，将作寻常自轻入。何时更看弄潮儿，头戴火盆来就湿。”① 梅尧臣似乎还在青龙镇居留过一段时间，写过一部《青龙杂志》，也就是第一部青龙镇志。稍后，又有诗人兼书法家李甲（也有人名之为李申）字景元，自称华亭逸人，往来吴淞江上，至青龙镇留恋不返。苏轼在《题李景元画》的序言中说：“景元名申，本儒家子，落魄诗酒间，尤善墨戏，米元章画史尝及之，往来松江上，不知其所终。”② 同时，隐逸文人李行中字无悔，在青龙江东岸筑亭，苏轼为亭题额为“醉眠”，并赋《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绝》，其中一首：“君且归休我欲眠，人言此语出天然。醉中对客眠何害，须信陶潜未若贤。”当时苏辙、李常、陈舜俞、张先、秦观、晁端佑等，也都有诗唱和③，传播一时，流为美谈。

由于青龙镇海上贸易的发展，政和三年（1113年）在秀州华亭县设立市舶务，派来专任监官，并将青龙镇改名为通惠镇④，以示通商互惠之意。但到重和年间，青龙江逐渐淤塞，溯江而上的海舶遇到困难，以致“蕃舶鲜至”，一度撤掉专任监官，改由县官兼摄舶

① 宋绍熙《云间志·下卷·诗》。

②③ 宋绍熙《云间志·下卷·诗》。

④ 《宋史·食货志》，《宋会要》。

务①。宣和元年(1119年)集民力开修青龙江浦,经过浚治,水道又通,海舶接踵而来,于是又恢复了市舶务②。

宋室南迁,随高宗南渡的北方人民,不少人留居在青龙镇,一时人口骤增,更加繁华。建炎三年(1129年)为抗击过江南进的金兵,名将韩世忠曾帅军拒金兵于秀州,即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③。在这里训练士卒,修治战舰。四年二月,金兵自临安北退,携带所掠辎重,由苏、秀沿塘岸东行,韩世忠尾随追击,大破金兵于黄天荡。这一年,提举两浙市舶司的刘无极曾经建议,将华亭市舶务移至青龙镇,还未施行,至绍兴二年(1132年)又决定将两浙市舶司从杭州移至华亭,并设分司于青龙镇④。

南宋偏安一隅,财政困难,更加重视海上贸易之利,采取了奖励外贸的措施。如蕃舶入港,例赠酒食或设筵招待。日本、新罗等东北亚的商舶,往来更加频繁。庆元五年(1199年)日本泉涌寺僧不可弃俊芳(大兴正法国师)随日本商船到此,在华亭县超果教寺从北峰宗印学天台宗八年⑤。这时正是青龙镇最兴盛的时期。嘉定年间镇监赵彦敔在镇东北新建镇学学宫,弦歌闻于百里。淳祐年间镇监林鉴,大治坊巷、桥梁、道路,成效昭著⑥。

南宋中期,青龙镇的海上贸易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乾道二年(1166年)设在华亭的两浙市舶司被撤废。因为有人上书说:华亭的市舶提举官,因蕃舶多出入明州(今宁波市),常年都驻在那里,名为抽解、收税,其实是骚扰地方。其它几个市舶务,往来船只不多,市舶官终年不到,所以建议撤掉这个机构⑦,孝宗同意这个建议。设在华亭的两浙市舶司虽然撤掉,青龙市舶务又继续存留了

---

①② 《宋史·食货志》,《宋会要》。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建炎三年十二日丙申条。

④ 《宋会要》。

⑤ 木宫泰彦《日中交通史》。

⑥ 清《青浦县志》。

⑦ 《宋会要》。

一段时间，终于因为杭州、秀州近在京畿，国防的重要性更大于海市，朝臣献策说："南北贸易之际，能保其不泄漏事实，以延衅召变乎？"所以在光宗继位之初，就下令禁止商船到澉浦；宁宗更化之后，更禁止商船停泊江阴、温州和秀州①。此后，只剩下明州一处市舶务了。于是青龙镇日趋冷落。

青龙镇进一步衰落的原因，是地理环境发生了变迁。原来华亭县东南境自五代时期柘湖湮塞，设堤堰十八处抵御碱潮。到北宋政和年间，地方官员欲涸柘湖为田，就决堤堰泄湖水，却不了解华亭的地势，东南高亢西北低洼，决堤之后，湖水未曾泄出，海潮却浸入为害。东南境的仙山、白砂、云间、胥浦四乡，都成了斥卤之地；碱潮还波及到苏、湖、秀三州的邻近县份，使大片土地不可耕种。为解决这个灾害，乾道七年(1171年)孝宗特委派太傅丘密为秀州知府，不惜人力与重资，大兴修筑，恢复了濒海18堰，又新筑起一道捍海塘②，即后世所说的里护塘。这道海塘的修建，使海岸线继续东移，海口与青龙镇的距离日远，吴淞江浦港更加湮郁不畅，海船越来越难溯流而上，青龙镇也日渐萧条。

四、上海镇兴起

南宋初期，位于吴淞江接海口附近的江湾镇，即有发展成新港的趋势。绍兴六年(1136年)昆山县知县张汉之上言："……商贾舟船多是稍入吴淞江，取江湾浦入秀州青龙镇。其江湾正系商贾经由冲要之地，其间有不到青龙地头收税，便于江湾浦路出卖客旅，得以偷瞒商税，不无走失课利，乞于江湾浦口置场，量收过税。"③这个上言并无下文，不知是否曾在江湾设置税场。到了开禧二年

① 宋《宝庆四明志·卷六》。
② 《宋史·丘密传》，楼钥《南四乡记》。
③ 《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二十九册食货十七。

(1206年)位于长江口南岸的黄姚镇(今宝山县月浦附近)，又成了海舶辐辏之地。当时有臣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① 黄姚税场称为黄姚买纳场。后来，因为江潮浸啮，江岸坍塌，当地又无榷货场，未能得到发展。位于吴淞江南岸的上海，较比他港，地理位置更加优越，至南宋晚期，渐次"人烟浩穰，海船辐辏"，开始取得贸易港口的地位。不知何时恢复了青龙市舶务，并转移到上海(据宋常棠《澉水志》载：澉浦市舶务是淳祐六年（1246年）恢复的)。

宋代，海舶来到上海，还不能象今天一样进入黄浦江。当时，黄浦虽然已与吴淞江相汇，但远非如今日浩瀚的大江，直到元代初年，浦面的阔度只有"尽一矢之力"② ，即约五、六十米。黄浦一名，不见于宋代以前史、地诸书的记载。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在丘密的水利条奏中才有："华亭县东北有俞塘、黄浦塘、盘龙塘通接吴淞大江，皆泄里河水涝"③ ，初见黄浦之名。后至淳祐十年(1250年)，邑人高子凤为西林（浦东三林塘西)南积善寺撰碑记，碑文中有："西林去邑不十里(疑为八十里之误，邑当指华亭而言)，东越黄浦，又东而汇北，其南抵周浦，皆不及半舍，寺之在周浦者曰永定，在黄浦者曰宁国，而西林居其中，盖所谓江浦之聚也。"④ 说明去西林，要东越黄浦，黄浦流向为东而折北，与吴淞江相聚。黄浦本来是三江之一的东江残支，东江在北宋初已经湮塞，故熙宁年间苏、秀大水时，王安石《送人宰吴江诗》说："当知耕牧地，往往菱蒲青，三江断其二，泽水何由宁。"⑤ 东江故道即被阻断，淀山湖及浙西平原来

① 《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三十册，食货十八。
② 元至元《嘉禾志》。
③ 《宋会要·食货八》。
④ 《松江府志·名迹志》引高子凤《南积善寺记》。
⑤ 胡叶盛《水东日记·卷十》。

的水流，自秀州塘横潦泾逶迤而东，流入黄浦。一部份继续向东，从闸港新场一带径直入海；另一部分折向北流，注入吴淞江。待乾道八年里护塘建成，东流入海之口又被截断，就全部北流，与吴淞江相汇入海。当时，已经呈现出黄浦江的雏形，但海舶尚不能进入。故宋代海舶之来上海，都是从海口入吴淞江，抵达沪渎，再从宋家浜入泊于镇北的顺济庙下①。

上海，自北宋熙宁年间设上海务，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到南宋末期，已经是"华亭县东北的巨镇"。但它始终不同于青龙镇，没有正式设镇、派驻镇监，镇务皆由市舶分司提举官兼领。从景定末年到宋亡为止，任职市舶分司的官员，现在尚可以查到的，有缪相之、董楷、陈珩、赵维良、费寀五人②。景定末，缪相之任上海市舶分司使。当时，上海士人唐时措、时拱兄弟买韩氏旧屋，改建为梓潼祠（文昌宫）以祀孔子，缪相之大力赞助此举，帮助修建了两庑、门庐、棂星门等③。至咸淳三年（1267年）浙江天台人董楷奉调接替缪相之，唐时措又提出在梓潼祠后筑屋，以为"诸生肄业之所"，即办镇学。至咸淳五年（1269年）建成，"清池之上，横以飞梁，为堂六楹"，董楷题额为"古修堂"④，这是上海最早的学校。

董楷在市舶分司使任内，给早期的上海镇留下了不少"津梁堂宇"，深得上海镇民的爱戴。当他离任之日，百姓都遮道相留，不忍放行。据他所撰的《受福亭记》碑刻说："自念钝愚，于市民无毫发补益，乃痛节浮费，市木于海舟，陶埴于江渍"。自市舶分司（即后来的上海县衙，位于今小东门内方浜路南的光启路上）之西北，建拱辰坊，坊北有益庆桥，于桥南凿井筑亭，即受福亭；亭前广场，都铺上砖石，是"一市阗阓之所"，即市场中心；其东北有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是文昌宫，原来是土房，今改为砖瓦房，

① 清褚华《泽国纪闻》。

② 明嘉靖《上海县志》。

③④ 明弘治《上海志》引董楷《古修堂记》。

于其地建为文昌坊；坊北又建致民坊，尽致民坊旧为神祠，今改建为福谦桥；由福谦桥至齐昌寺之间，建泳飞桥。这个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南宋末年上海镇的面貌。

宋代上海镇形成前，在沪渎和龙华已有静安寺与龙华寺。对这两处寺庙的建立时间，历来就众说纷纭，疑莫能明。兹略作考证，简述于下：

静安寺，传说建于三国吴大帝赤乌年间，这个传说由来已久，然终无确证。宋人文字已含怀疑之意，如杨潜说："赤乌十年康僧会入境，孙仲谋始为立寺建邺，曰建初。建初者，言江东初有佛法也。岂沪渎寺相继创建耶？"① 三国时代，沪渎之名尚不见于志籍，这里海天迷离，人烟稀少，似尚未具备建立寺庙的条件。明《宋濂集》说：江东始创之寺有三，一是金陵建初寺，一是太平万寿寺，一是海盐金粟寺。也没有提到沪渎重玄寺。赤乌建寺之说，本于寺存"赤乌碑"的传说，但有关此碑记载既不见于宋绍熙《云间志》，也不见元至元《嘉禾志》，其最早记载，见于明代志书，有意见认为是明人本元钱岳和王逢的诗句而讹拟。钱岳诗有"悲凉断刻三江底，想见雄风六代前"句；王逢诗有"碑在赤乌年，僧指青灯夜"句。二人的诗句何所根据，不得而知。清孙星衍指出："静安寺有赤乌中建兴沪渎重玄寺之文，遂讹为有赤乌碑"② ，说得很有道理。也有人说碑是宋代所刻，后来漫漶不可识，仅能模模糊糊地看出赤乌二字，就称它为赤乌碑③ 。另说，静安寺本梁重玄寺，唐名永泰禅院，宋大中祥符年间敕名静安寺，南宋嘉定年间僧仲永始迁来今地。宋范成大却说：梁重玄寺在长洲县西北二里，又名能仁寺，入宋为承天寺④ 。独有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说："静安寺在华亭，宝正元年置"，宝正是

---

① 绍熙《云间志·寺观》。
② 《云间志》重刊序言。
③ 清嘉庆《上海县志·古迹》。
④ 宋范成大《吴郡志》。

后唐同光末年吴越王钱镠自建的年号，为公元926年。何说为是尚待查考，然非建于吴赤乌年间，则可断定。

龙华寺始建年代，早期的志书都说："空相寺(龙华寺曾用名)在龙华，张仁泰请于钱忠懿王始建。旧号龙华寺，治平元年改今额。"因为有旧号龙华寺这句话，后人考证："殿宇创于唐垂拱三年(687年)，废于黄巢时镇将张郁之后。"为证明这个时间，又找出唐皮日休《夜泊龙华诗》一首：

"今市犹存古刹名，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不见波心塔影横。"①

皮日休是咸通时人，据尹师鲁所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说，皮日休避广明之乱，投奔钱氏。正好与上说相呼应。但皮日休这首诗，不见于《皮子文薮》和《全唐诗》，直到清初才见著录，难免非后人托名之作。至于龙华寺塔，也只能创建于隋唐以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六月乙丑"颁舍利于诸州"，在雍州等三十州分别建塔②，这大概是江南建造佛塔的最早时间，苏州虎丘山寺塔，即建于此时。

五、市舶与漕运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统帅伯颜率兵入临安，宋亡。南宋最后一任提举上海市舶分司使、兼领镇监的费寀，即以上海镇归附元朝。元朝廷为了表彰他，授予金牌千户衔，兼领镇守上海总管府总管。当时，沿海民船无人管领，多流为海盗，费寀请准朝廷，录入民船户籍，免其徭役，得海船数千，水手万人，为后来的海运漕粮，增加了人力物力。因之，元朝廷又颁赐虎符，加授武德将军，管

① 清康熙《上海县志》。
②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

领海船万户，后来迁怀远大将军，授浙东宣慰使，卒赠江夏郡公。他的儿子费拱辰，袭父官爵，接任运粮万户，封良显侯。孙子费雄官昭武大将军。① 费氏一族为元代上海的巨室。

元世祖既得江南，统一中国，十分重视海上贸易，鼓励蕃舶往来。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上海、澉浦、庆元三处海港设立市舶司。② 翌年，下诏说："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互市，皆从所欲。"③ 当时，朝廷派往海外贸易的海船，多为官船，选派有经验的商人携货出海，换取珍宝、香料等奢侈品，供皇室贵族享用。也有些私人船只出海贸易。志书说："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剌、交趾诸蕃，往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④ 可见，元初上海港口海上贸易的活跃。尽管元日之间曾发生元军东征之役，但朝廷对待日本商人，却格外宽厚，破例允许日商以黄金兑换日本急需的铜钱。⑤ 日、朝等国的商船停泊港口，也主要就是庆元与上海。为了保护海上交通与海港贸易的安全，至元十八年（1281年）派征东留后军镇守上海。至此，上海开始以一个新兴的海港面貌，呈露于世。

元朝平定全国后，财赋依靠东南地区供给，当时，南粮北运成了一个大问题。自南宋以来，横亘中国的汴水早已干涸，黄河也改道南徙。初时运河不通，漕运只好自浙西涉江入淮，再经陆路运输转入永济渠，北达大都（北京），旷时费力，故朝廷诏令别开新河。但初开河道，岸狭水浅，不能负重。⑥ 至元十九年（1282年）伯颜回忆起平定江南时，曾经命张瑄、朱清等将南宋库藏图籍，自崇

① 明嘉靖《上海县志》。
② 《元史·食货二》。
③ 《续通考》卷26。
④ 清嘉庆《松江府志》。
⑤ 《元史·世祖本纪》。
⑥ 《元史·河渠志》。

明海道载运京师，以此认为海运漕粮可行。遂请于朝廷，自征东军调出张瑄、朱清，与上海管军总管罗璧一同负责，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首次载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路运往京师。初次创行海运，因路途不熟，沿山求屿，风信失时，直到下年方才到达。其路线是：起自太仓浏河口，经崇明入海，过通州海门县，黄沙连头，万里长滩，沿山岙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东海县，至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凡13350里。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开辟了一条海上运粮的新线，比以前的航线径直。明年，千户殷明略又找到一条更便捷的路线。即从太仓刘家港出发，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公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上海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①。

海运漕粮，当时还是风险很大的事，在茫茫烟水中，寻找一条通捷的运粮海道，尽管航海与造船技术已有很大进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粮船一遇风浪，难免漂溺。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运粮578520石，实到433905石，平均每石约损失二斗六升左右，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因此，朝廷责令运粮官员赔偿。中书省曾为此上言："张瑄、朱清海道运粮，以四岁计之，总为一万石，斗斛耗折，愿如数以偿；风浪覆舟，请免其征。"② 才免去他们赔偿。

张瑄、朱清对元代开辟南粮北运的海上通道，促进航海技术的发展，是有功的。二人本是上海沿海一带的海盗，劫掠往来商船，称雄海上。元军至江南，率众归顺，授金牌千户。因为海运漕粮有功，由运粮万户，升为宣慰使，后来，张瑄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朱清为大司农。张瑄是上海嘉定县人，建府第于上海乌泥泾镇。当时，他们的田园馆舍遍于江南，私船大舶交通海外，车马满塞门巷，

① 元危素《海运志》。
② 《元史·食货·海运》。

仆从带金虎为千户、万户的人有数十。这二人恃权逞强，多行不法。在海上更加豪横，“有拂其意者，则缚而投诸海”，不知枉杀了多少性命。到大德六年(1302年)僧人石祖进把他们不法之事，整理成十条罪状，上书奏闻。中书省也主张罢职查问，二人皆伏诛，全家流放漠北①。

六、云间又一新县

元初，上海镇仍属华亭县。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华亭县为府，明年改名为松江府，隶于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镇发展很快，镇上既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又有商税局；既有海运漕粮的万户府，又有贮放漕粮的太平仓；还有酒务、商务、巡检司、水驿、急递铺等诸般机构。这时的上海镇已非一般市镇。宋、元间邑人唐时措撰文说：“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贮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② 当时，上海镇已经“领户六万四千有奇，岁计粮十有二万余石，酒醋课税中统钞一千九百余锭”。按元制江淮以南，凡3万户以上者为上县③。上海早已具备了设县的条件。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提出分建上海县的意见。据说是因为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成了分县的契机。当时的松江府尚隶于嘉兴路，路有卒来府公干，自以为来自上级机关，对府监很不礼貌，引起府监的大怒，说我是四品秩，他的长官不过六品，竟敢以僚属待我，因而互相争吵，至于诋辱④。知府仆散翰文慨然以地大户多为理由，提出分建上海县，并以松江府直隶行省的

① 清同治《上海县志》。
② 明弘治《上海志·建设志》，唐时措撰《建县治记》。
③ 《元史·百官志》。
④ 清《松江府续志》。

奏议。这个意见得到江淮行省的支持，上报到朝廷，当年就获得批准。翌年，松江府决定划出华亭县东北五乡凡二十六保，分设上海县。其乡、保名如下表：

乡别	保数	所属保名
长人乡	六	十六保、十七保、十八保、十九保、二十保、二十一保
高昌乡	九	二十二保、二十三保、二十四保、二十五保、二十六保、二十七保、二十八保、二十九保、三十保
北亭乡	四	三十一保、三十二保、三十三保、三十四保
新江乡	三	四十四保、四十五保、四十六保
海隅乡	四	四十七保、四十八保、四十九保、五十保

经过县区分划，田赋分家，建制人员等的准备事宜，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设立上海县。县境东西广 160 里，南北袤 90里。东至大海 50 里，西至华亭县界 110 里，南至华亭县界 72 里。北至苏州府嘉定县界 18 里。至元二十七年松江府有 163936 户，上海县分得 72502 户①。

上海初设县时，置正、副监县各一人，正监县为蒙古人(或色目人)，称达鲁噶齐，副监县一人为汉人，又称镇遏总管万户，下有县尹、县丞、主簿、教谕、训导各一人。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二十二日主簿郗将仕首先卜廨莅事，县尹周汝楫至三十一年始到任。即以原来的榷货场为县署。在此以前，榷货场曾被用作镇遏总管府运粮千户所，改作县署，则感地方过于狭小，“庭宇湫隘，藏楗无度，系囚无

① 明正德《松江府志》。

圈”①。大德二年(1298年)适有并市舶司归庆元的朝命,翌年就迁县署于阜民桥北的市舶司旧舍。市舶司的厅堂两庑,较旧榷场宽大,但已处处朽坏,大费修补。至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间,上海遭受台风袭击,风雨交作,海潮涌岸,沉庐漂屋,县署也被冲毁,“县庭仅撑立,而牖壁无完”。县达鲁噶齐雅哈雅忠显倡议改建,他说:“守(市)舶之旧,而不思改观,以雄井邑,又将以(市)舶目吾县”②,首先捐出自己的货财,以供重建费用。县尹、县丞、主簿等也都赞成附和,邑里富绅纷纷募金资助。大德六年(1302年)正月开始动工,经两个多月竣工,“葺琴堂之陋,持吏舍之摧,俨神祠之饰,完圜扉之关”③,旧有堂宇修葺一新,还新建谯楼三间,置鼓于上,以报更点。至此,县署才粗具规模,稍称壮观。

上海县学,原为宋末邑人唐时措、时拱兄弟所立的“古修堂”,也称镇学。建县后升为县学,即委任唐时措为县学教谕。县尹周汝楫到任后感到学舍过于简陋破旧,提议修建新舍。元贞元年(1295年)朝廷下崇儒诏书,浙西廉访佥事朱思诚按行上海,松江知府张之翰也一同到来,正遇上县学修葺因经费不足停顿,他们出面委托家居上海的乡万户费拱辰出力助成,费拱辰欣然允诺,捐赀建学。于是,“制正殿,完讲堂,买邻地而起斋舍”,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修葺一新。至大德六年(1303年)松江府判官张纪和上海县尹辛思仁、县丞范天祯等又捐俸增修了学宫的外门、墙垣等,松江府也拨下学田五百亩以供“春秋荐奠、廪士养老之资”。当时集贤殿直学士赵孟頫正在上海,就请他撰写了《修学记》一文刻碑。

上述两次县学修建,是就“古修堂”原有旧舍因陋就简修补而成,其“祭器、书籍、殿堂、斋序咸阙焉”。至大三年(1310年)浙西廉访佥事吴彦升巡察上海,目睹县学隘陋,提议另建新学宫。任上海市舶司使、浙西盐司副使的邑人瞿霆发,积极赞成,出资买民田500

①②③ 明弘治《上海志·建设志》、唐时措撰《建县治记》。

多亩赠给县学，又以县署西侧官地15亩为基址新建县学。但计划不周，“斋庐未治也，庖廪未克也”，所以至延祐元年（1314年）县丞王珪又把县学迁回旧址。至正五年（1345年）县尹刘辉到任，才在县学内创建教谕厅及讲习堂；十一年（1351年）县达鲁噶齐兀奴罕、县丞张议又倡议营葺，邑士费雄也捐金助役，新建了棂星门、大成殿门、斋舍20余间，并加高墙垣，更新廊庑，扩建讲堂，使县学焕然一新。落成之日，僧人觉玄以所募化的田荡600多亩赠给县学，用作永嗣修葺的基金①。到此县学的学制规模、堂舍、斋室，才渐为完备。

七、农业发展与植棉业的兴起

元代上海地区的农业生产，较前代发展更快。上海建县后，垦种面积迅速增加，灌溉条件续有改善，每亩田的征收税额虽与南宋大致相等，但总数却增加了三、四倍。宋代以前，上海地区的田亩数，虽历经核查，但没有一个准确数目，到元至正年间终于勘定出确数，后代再无多大变化。尤其是，元初引入棉种，沿江沿海高阜地区有了适宜生长的作物，为以后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元初，江南的田赋税额仍按宋代旧额征收，至元十四年松江府括勘税粮458900石有奇②。这个数额比宋末约增加36100余石。元代，初定天下赋税，地税中田每亩二升有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③。以这个税额论，平于唐、宋，不算高额。但是，元代松江的良田美土，几乎皆为权豪占据，权豪包隐田粮，不纳赋税，于是田赋大部落在小民头上。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松江富

① 明嘉靖《上海县志》，黄溍撰《县学修建记》。
② 明正德《松江府志》。
③ 《元史·耶律楚材传》。

民曹梦炎愿岁输米万石，以求官职，他占的田亩，至少也有百顷。大德年间籍没张瑄、朱清两家田产，虽已查不到准确的数字，但至大三年（1310年）仅拨还田宅一区给他们的后人，其数即达百顷①。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籍没田产，拨赐给后妃、宗亲、大臣、寺庙等。松江全境田地总数不过4500余顷，富室大家田产如此大量集中，其属于小民者就微乎其微了。无田的大量人户都被权豪役使为奴。至大二年（1309年）乐实上奏说："江南平垂四十年，……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②元朝廷也深知这个弊端，故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推行经理法，令占田者自己陈报占有的田亩数，有敢隐瞒的，许可揭发首告③。结果，有一部份包隐田粮得到纠正。延祐三年（1316年）以上、中、下三等分则，计数起课，松江府前后续增夏税秋粮至745000余石；各色钞锭丝绵在外④。这比宋末几乎增加一倍，成为历史上上海地区的第二次重赋。

上海设县后，分得松江府田亩总数的少半。但上海地近海隅，土地常受海潮冲击，致成卤瘠之壤，不宜种稻，尤其是高昌、长人二乡，即使平年，农民也仰食豆麦。田虽为下等，赋税却为上数，两税总数近四十万石。有些贫户实在无力交纳，只得破家转徙。至治元年（1321年）河北真定人邓巨川来任上海县丞，到任的翌年，正遇大旱，秋收之际他亲自下乡踏勘，听取百姓陈述，得其利弊，上书行省，请求将田赋应缴的稻米，改为豆麦，"从土之宜，以纾民困"。不久，邓巨川以廉能被选为行省掾属，到任后又力陈上海地区百姓的困苦，得到行省的支持，呈报中书。至泰定二年（1325年）得到批准："听以豆麦为秋税，并著为令"⑤。上海人民感激他，为他树碑

① 《续资治通鉴》大德二十五年三月(24)条。至大三年十一月戊子(51)条。
② 《元史·武宗本纪》。
③ 《元史·食货志》。
④ 明正德《松江府志》。
⑤ 清嘉庆《上海县志·人物志·邓巨川传》。

立传。

上海地区沿江、沿海的土地，时有坍陷入水的；还有抛荒积荒、水深长荡有额而无法征收的，所以土地面积始终没有搞清楚。直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才定准为：垦种官民田地、山、池、荡21309顷73亩有奇。定税额为：夏税，生丝569斤有奇，绵109斤有奇，麦57619石；秋粮，米326001石有奇，钞1275锭有奇。实际上，终元之世，上海县在平常年景，只能征得：丝430斤余，绵93斤余，麦45445石，米256813石余，钞同定额①。

上面说过，上海沿江、沿海土地多为卤瘠之壤，不适于种稻，农民苦于田产微薄，难于承担岁赋。宋末元初始从闽广传入棉种，试种棉花，获得很大成功。元人陈高有桐花(棉花)诗："炎方有桐树，衣被代蚕桑，舍西得闲园，种之渐成行。"② 这正是上海引种棉花初期试验的情景。一经试种成功，传播推广很快，正如邑人褚华所说："邑种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③

上海县最早植棉的地方是乌泥泾，元陶宗仪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指闽广)。"④ 植棉能在乌泥泾发展起来，还应当归功于黄道婆的倡导。黄道婆本上海县人，早年流落崖州(海南岛)，从黎族人民学得一套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元贞年间遇海舶归来，回到乌泥泾居住，她携回一部纺织机，并教会当地人碾除棉籽、振弦弹棉、脚踏纺车等工具的制造和操作方法，又教会大家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的技术。这使乡人大受其利，"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据说黄道婆能在被褥带帨上，作折枝、团

① 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志》。

②③ 褚华《木棉谱》。

④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凤、棋局的花纹，邑人又从而发展成象眼、绫文、云朵等花[①]。于是，植棉和纺织手工业在上海全县、松江全府，都迅速发展起来。

黄道婆死后，人们"感恩洒泣而共葬之"。为表彰她的功绩，在乌泥泾修了祠堂纪念她。元诗人王逢作歌称颂她说：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缲，组雾绸云灿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归，千轴乌泾夺天造。天孙漫司巧，仅解制牛衣；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荒哉唐玄万乘君，终缅长衾共昆弟。赵翁立祀兵火燬，张君慨然继绝祀。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享当愧死。"[②]

王逢诗中所说的赵翁，即乌泥泾人赵如珪。他的儿子赵庭芝，至治元年(1321年)中进士，是元代登进士第的第一个江南人[③]。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乡贡士张守中因黄道婆旧祠已毁，又于他的祖茔之南[④]，为之另立新祠。张守中即王逢诗中的张君。清代又有人在上海县城中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为黄道婆立祠，妇女们岁时结伴前去礼拜，呼作黄娘娘。

八、盐业兴盛　盐民悲苦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盐的生产与流通，认识到"其利最广"，和田赋一起，是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的两大支柱。因此，在取得江南的下一年，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两浙转运盐司使于杭州，其下领有34处盐场，松江府境内有浦东、横浦、袁浦、青村、下砂共五场。后来，随同上海县的分立，下砂盐场划归上海县。

松江府、包括上海县的盐业生产，在元朝统治者的严密控制和

---

① 清褚华《木棉谱》。

②③④ 清同治《上海县志》。

强力压榨下，产量曾达到当地盐产历史的最高点。元初，盐课无定额，至元十四年两浙共办盐44000引，每引400斤，价5两。至元十五年定准两浙盐额岁办109000引，十八年增加到208562引，大德五年又增加到40万引，至大元年复增余盐5万引，总额达45万引①。大德年间盐额骤增如是之多，据元叶知本说："是灭里(纳速剌丁灭里)虚抬盐额，作四十五万引包办，以此诿罔朝廷，营求运司。"②但灭里任两浙盐司后"肆其威虐"也无法完成，年年逋欠。到至正二年才减去10万引。当时，松江府五场定额为156000余引，上海县下砂场定额为33415引有奇③。从松江府五场的定额总数看，约为宋代产盐量的一倍。

元代盐产量定额是个无法完成的虚数，如松江府五场定额为156000引，实办只有74900引，仅及定额的一半。尽管如此，实际产量仍较宋代的岁产实数有很大增长。这主要因为元代盐场的生产组织较前代有了改善。宋代盐场生产以灶为单位，"淮浙盐一场十灶，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④。到了元代开始把分散的灶户，归并为团，实行聚团公煎。元陈椿《熬波图咏》第一图说："归并灶座，建团立盘，或三灶合一团，或两灶为一团"。并灶结果，首先是可以更多地使用煎盐铁盘。铁盘很大，广袤数丈，须生铁10000—20000斤铸造，非一户一灶可以使用。使用铁镬煎盐，通夜不停，可煎两镬，约得盐60斤。用铁盘煎盐，昼夜可以煎六盘，依盘之大小，每盘可得盐300至600斤，一日可得盐1800到3600斤⑤，成十倍地增加产量。其次是更合理地使用灶丁劳力，盐团内部按工序、工种分工，除灶丁外，还有柴丁、车丁、火工、验工等⑥，分工合作，加快

① 《浙盐纪要·沿革》。
② 明正德《松江府志·盐业》，元叶知本《陈减盐价书》。
③ 明弘治《上海志》。
④ 宋《朝野杂记》淮浙盐条。
⑤ 《两淮盐法志·卷十八·灶具》。
⑥ 元陈椿《熬波图咏》。

了生产流程。浙西煮海煎盐采取淋卤法，其生产程序为：开辟摊场，舁潮浸灌，聚灰摊晒，篠灰取匀，筛水晒灰，淋灰取卤等。各工序有重有轻，有难有易。一团合三灶，约50—60户人家，100—200丁口，也可以合理调整强弱劳力。故陈椿写扒扫聚灰工序说："丁工老幼男女分布场上，用扫帚木杷扫闭推聚成堆。"①

元代统治者对盐场的生产管理，也比前代控制得更严密。在华亭和上海县城都设有盐局，派大使、副使各一员，各盐场置司令、司丞、管勾各一员；还有军队驻守。其并灶建团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防止盐的私产私销。如下砂盐场各团周围都筑有围墙，"（墙）上置乳头，仿佛城池"，外有官军把守巡警。陈椿这个曾任盐场司令的人，就直言不讳地说："并海立官舍，兵卫森军营，私鬻官有禁，私鬻官有刑，团厅严且肃，立法无弊生"②。同时，还在江浙沿海，加强了海上缉私。元贞二年（1296年）命江浙行省以船50艘，水工1300人，沿海巡禁私盐③。尽管采取了这些防范措施，仍不能禁绝私盐，因为官府本身就是最大的私盐犯。如大德七年（1303年）江浙行省平章阿尔、左丞高翥、安祐等，诡名买盐15000引，增价转卖，谋取暴利④，就是被揭发出来的一例。但是，这种生产管理方法，却给灶户增加了很大痛苦。他们被关在团场内，行动完全没有自由，"团门慎出入，北军守其旁"，在蒙古士兵的看守下，灶户形同狱囚。灶丁的劳动也是极辛苦的，陈椿形容说："男子妇女，若老若幼，夏日苦热，赤日行天，则汗血淋漓；严冬朔风，则履霜蹑冰，手足皴裂；悉登场灶，无敢闲惰。尤其是妇女，"少妇勤作亦可哀，草间冬日眠婴孩"⑤，真是一幅灶丁受难图。

元代盐场拘籍灶户煎盐，由官府拨给煎盘和草荡，计丁课盐，

---

①② 元陈椿《熬波图咏》。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元贞二年八月。

④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大德七年二月。

⑤ 元陈椿《熬波图咏》。

官给工本。上海县下砂盐场共有草荡3094顷，元明之季，每个灶丁拨给草荡十八亩左右①，就靠这些草荡的茅草升火煎盐。据陈椿说："亡宋年间官拨草荡，此时盐数少，近年累蒙官司增添盐额，别无添拨草荡，以是每岁煎盐不敷，才行起火，便行缺柴"②，无柴也得出盐，灶户被逼无奈，只好花钱买柴。买邻场柴，当然要负债，增加盐的成本，而交纳盐课所得的工本钞，又少得可怜。延祐年间，浙西正盐每引给工本钞20两。盐运司规定"每银一锭，准盐课四十锭"，则每引的工本钞，实际上只有白银五钱③。中间又要经过各级盐官的层层克扣，灶户以"人面如灰汗如血，终朝彻夜不得歇"的艰辛劳动，换来的一点钱，喂不饱全家老小的饥腹，许多灶丁出于无奈，只好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团场，流亡异乡。

元代的盐场，穷了千万家灶户，却养肥了几家盐官。上海下砂盐场，历宋、元两代均为瞿氏把持。瞿氏其先本河南汴梁（今开封）人，随宋室南渡来到上海，南宋嘉定年间瞿榆维始任下砂场盐监，遂世居下砂镇，他的儿子瞿哲、孙子瞿君用都继为下砂盐监。宋末，瞿氏已经称雄海隅，富甲一乡。宋元更代，瞿君用的儿子瞿霆发率下砂盐场之众，归附元朝。元朝廷任命他为上海县盐局副使，授进义校尉的官衔，并提举上海市舶司，后又升任两浙都转运盐使④。这个靠剥削盐场灶户发家的大盐官，在延祐二年（1315年）自占和佃官田达7300顷，⑤成为元代浙西的最大地主之一。他的弟弟瞿震发、电发，儿子时学、时懋、时伦，孙子先知等，或为提举，或为监税，在元代世任盐官。

元代上海滨海沙涂未列入田籍，不纳田赋，故灶户饥民靠涂田

---

① 明嘉靖《上海县志》。
② 元陈椿《熬波图咏》。
③ 《元史·食货志》及吴贵芳《古代上海述略》。
④ 清《南汇县志》。
⑤ 明万历《上海县志》。

种瓜、芋、麦、豆以充饥，但涂田也渐渐为豪富所占有。天历二年(1329年)，瞿时学占有的沙涂田，竟达3900余顷①。故元末上海邑人袁凯有《沙涂行》诗说："西起吴江东海浦，茫茫沙涂皆沃土，当时此产不归官，尽养此地饥民户"，"一旦淹与强家有，强家犬马厌菽粟，强家下陈尽珠玉，君不闻江头浦边三万家，秋雨秋风夜无烛"，这正是深有感触的不平之鸣。当时，上海浦东的仕宦富室，以下沙瞿氏为最盛，故当地有瞿家湾、瞿家路、瞿家园等名称。当时，浙西园苑之胜，曾以下砂瞿氏园最有名。至明初，瞿氏百年之积，尽被籍没，家道才衰落下来。

九、任仁发等的治水功绩

从宋代延续下来的吴淞江水患，到元代越发严重了。至元二十五年以前，江南初定，朝廷致力于东征，无暇顾及吴中水情，新上任的蒙古、色目官员，久居漠北，也不懂得江南河网地区治水的重要性。地方豪权趁势占据湖洲港汊，封土为田。这使两宋以来，逐渐兴建起来的水利施设，破坏殆尽。南宋所置的三部约三、四千人的制水军，也军撤营废。于是，河港湮塞，水脉不通。时人吴执中上书说："吴淞江旧云可敌千浦，今两岸涨沙将与岸平，其中仅存江洪不过二、三十步，深亦不过二、三尺，湖水所至，比之旧时，万不及一"②。太湖泄洪之道，既已壅噎如此，一遇大雨，自然横溢为灾。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十三年(1286年)、二十五年(1288年)连续大水，平(苏州)、松、嘉、湖农田被淹，百姓流离，至"鬻妻女易食"。③浙西道按察使雷膺请于朝廷，发廪米20万石赈济。到至元末年，浙西水患越发不可收拾了。

---

① 明万历《上海县志》。
② 元吴执中《水利议》。
③ 《元史·河渠志》。

元代最早留意浙西水患的，是江淮行省参政燕公楠，他根据上海布衣潘应武请求疏浚淀山湖的上书，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表奏说：浙西诸郡之水聚于太湖，湖有几处入海河道，有淀山湖者，富家占据为田，以致湖水涨浸，损坏田禾。朝廷命左右司郎中都尔迭失兴工疏浚，明年又遇大雨霖潦，再命浙东宣慰使哈剌台等选知水人合浚湖泖。他们请出潘应武勘察筹划①。潘应武陈述淀山湖淤塞情况说："宋法禁人占湖为田，为泄水路故也。后权豪势要之家，占据为田，今山寺在田中，虽有港溇，阔不及二丈，湖泥淤塞，深不及二、三尺，潮水、湖水不相往来"②，以致引起上游水涨泛滥。宋代淀山，即文中所说的"山寺"还在湖水之中。绍熙《云间志》载："淀山在薛淀（即淀山）湖中，周围三百五十步，高三十丈，形四出如鳌，上建浮屠，下有龙洞，屹立湖中"，至元代已淤入田间，今更远离淀湖。潘应武的决放湖水方案是："淀山湖东大小漕港、斜沥口、汊港口，固是水之尾闾门，今为权豪占据为田，此处水路卒难复旧。淀山湖北有道褐浦、千墩浦、小沥口等处，去江颇近，水势顺便"③，即放弃湖东自大盈浦经青龙江出海的故道，以避权豪的阻难，另于湖北开新水道以通吴淞江。至元三十年（1293年）这项工程得到江浙行省参政梁温都尔的支持，征调民伕十三万，开新港三条，各阔三十丈；还疏浚了近处的赵屯、大盈二浦，以导湖水顺畅迅刷而下④，由是吴淞江上游水患有所减轻。

淀山湖排水问题虽然稍得缓解，吴淞江的淤塞问题更加严重。当时江浙税粮已甲于天下，而平（苏州）、秀、嘉、湖四郡，更占江浙总数的十之七、八。至元末年的大雨成涝，湖漫江溢，田禾尽淹，亏失税粮百余万担。直到这时，吴淞江治水问题，才引起朝廷的重视。

---

① 清《青浦县志·水利志》。

②③ 潘应武《决放湖水议》。

④ 清《青浦县志·水利志》。

大德元年(1297年)任命彻尔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导治水，当年发卒数万，疏导过吴淞江浦，二年(1298年)设立浙西都水营田使司于平江(今苏州)，三年(1299年)又在各处河渠设闸堰七十八处①。但这些措施收效并不显著。大德八年(1304年)任海道千夫长的青龙镇人任仁发慨然上书，议论治水方案。他指出治水无效的原因是："居位者未知风土所宜，视浙西水利与诸处无异，任地高下，时之水旱，所以水患频仍也。"而历次河工失败之由，则是："募夫役必取办于富户，部夫督役必责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乐，是以猾吏豪民构扇沮之，朝廷未见日后之利，但厌目前之扰，所以成事则难，坏事则易。"② 这些议论，都恰中时弊，引起朝廷的重视，即任命任仁发为平江都水营田使司都水少监，助行省平章彻尔疏浚吴淞江。

任仁发的治水主张，最根本的是三点，即："浚河港必深阔；筑圩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大德八年(1304年)十一月的治水工程，就是任仁发领导的，他贯彻了自己的主张，在西起上海县界，东抵嘉定县石桥浜的吴淞江段上，挖深1丈5尺，开阔25丈，并设置许多闸窦，役工15000人，用工165万有奇，至翌年二月竣工。这次工程被称誉为"物无疵厉，民无夭阏，而事竟成"。③ 大德十年(1306年)任仁发又按既定计划，开挑吴淞江东西两处河道，包括华亭、上海县境的赵屯、大盈二浦，白鹤、盘龙二江，计长37里有奇；并于庙泾以西，盘龙以东，开挑出水口五处，于新泾置闸二座。经过这二次疏浚，吴淞江水患大为减轻④。

皇庆元年(1312年)以都水监转隶大司农寺管辖，任仁发也被调赴北方治水。至至治三年(1323年)吴淞江又渐为涨沙湮塞，而权豪势家侵占水面，插莳芦苇，到处成为荡田，以致税粮连年亏失。

---

① 清《青浦县志·水利志》。
② 元任仁发《水利议》。
③ 清光绪《青浦县志·水利志》。
④ 《元史·河渠志》。

上海县延祐七年灾伤58700石，至治元年灾伤49000余石，二年109000余石①。泰定元年（1324年）中书省奏命江浙行省左丞多尔济巴勒（旧译朵儿只班）和已经年老休政、退居青龙镇的任仁发出来领导浚治工程。是年冬十二月动工，开吴淞江道，长度为大德年间所开里数的三分之二，深阔如初；又浚大盈、乌泥二河；至明年春竣工②。

泰定二年（1325年）中书省建言：治理吴淞江若不设立衙门管领，每次挑洗费钱粮、损民力，可革罢松江府，设立都水营田使司，所管华亭、上海二县拨属嘉兴路。三年（1326年）如议罢松江府，设都水营田使司于松江，掌管江南水利③，以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密兰，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张友谅为正使，再度起用任仁发为副使。这年任仁发又在上海县的潘家浜、乌泥泾各置二座石闸，以遏浑潮，任闸内清水冲渲江道。二闸受吴淞江水，南注黄浦，那时浦小于江，上流建闸，水势顿缓，两岸渐成沙涂。元诗人王逢也说："我来初避地，黄浦渐生洲"④。天历元年（1328年）又撤掉松江都水营田使司，重新恢复松江府旧制。

任仁发是我国元代的一位水利专家。他在吴淞江水患频频，蒙古、色目官员不谙南方自然条件，不懂得治水方法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向居位者力陈疏导吴淞江的策略，撰写了《水利议》、《开江议》等名篇，总结了前人的治水经验，探讨了吴淞江疏浚的关键所在，提出了一整套治理方案，并以大半生精力，从事治水实践。任仁发不仅为家乡人民造福，也为北方数条河道的治理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个大有功于人民的人。元末明初邑人顾彧歌颂任仁发的功绩说："不是青龙任水监，陆成沟壑水成田"⑤，表达了上海人民对

---

①② 《元史·河渠志》。

③ 《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三》泰定三年正月6日。

④ 明嘉靖《上海县志》载王逢《文翠洲诗》。

⑤ 明顾彧《竹枝词十二首》。

任仁发的感激之情。

任仁发字子明，号目山，是元代上海县青龙镇人。年十八岁，中南宋咸淳年间的乡榜。至元十二年元兵南下，得见平章游某，很受赏识，起用为宣慰掾，派他到近海岛屿招安亡宋官民，就地任命为青龙镇水陆巡警官。至元二十年后，数次征调浙淮军，发海船远征交趾，任仁发以海道千夫长从征。二十五年罢征交趾之役，他又参加海上漕运，转输直沽。从大德至泰定年间，两度出任都水营田使司副使（或称都水少监），凡苏松境内吴淞江浦的开江置闸，差不多都是出于他的设计规划。还参加过大都惠通河杨隐闸的修建，汴梁黄河决口、水浸归德府的治黄工程，镇江练湖淤塞的疏导，杭州盐官海塘崩陷的填复等工程。天历以后以中宪大夫、浙东宣慰副使致仕，年73岁卒，葬于上海县新江乡干山北骆驼墩。任仁发还工书善画，他的画在当时已经著名，曾奉旨画渥洼天马图、熙春图，都藏于朝廷秘府监。

十、隐逸文人与上海文化

上海僻处海隅，远离大都，当时交通又不便利，是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元代，一些亡宋遗民和不愿为元朝高压政策服务的文人，违忤权贵，逃避迫害的士人，以及赋性恬澹，喜爱田园风光，不想出仕的布衣，多选定上海，作为退身隐居之地。他们相结同游，纵情于峰泖之间，放舟于江湖之上，到处品题吟咏；也有的闭门著书，开门授业，带出一批门徒。这些隐逸文人的活动，对元代上海文化的发展，起了启迪和推动作用，功绩亦不可磨灭。其中最著名的有：

王逢字元吉，自号席帽山人。江苏江阴人，生于大德年间，初学诗于延陵（今镇江市）陈汉卿，他的诗才气俊爽，青年时代已经颇有名声。曾经作《河清颂》一篇，得到朝廷大臣的赏识，推荐他出来作官，他推说有病，坚辞不就，隐避于无锡梁鸿山。后来因父为

松江库司，常来松江谒游，很喜爱青龙江一带水乡的明秀景色，就在江畔筑梧溪精舍居住下来。精舍内有萝月山房、冥鸿亭、小草轩等构筑。他隐居在此，吟诗自娱，写下《梧溪集》八卷。至正末年张士诚占据平江（今苏州），平、松一带成为战场，青龙镇正是平、松间的要道，难免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春，王逢迁居到乌泥泾镇，住在亡宋张骥院的故宅，题其堂为俭德，名其园为最闲。最闲园中有藻德池、怀湘坡、乐意生香台、幽贞谷、濯风所、卧雪窝、流春石、海曙岩等名胜，都载诗人的自记。又辟园东荒地种菜自给，名青园。迁居后的生活，就以赋诗授徒为业，故在《文翠洲诗》的序言中说："予自至正丙午侨隐最闲园馆"，"癸亥始携门生共登临焉"。到明洪武初，朝廷听到他的文名，想擢用为官，他固辞不起，年七十岁卒。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诸暨（浙江）人。泰定四年进士，博贯经史，雄于诗文。初任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后为江西儒学提举，还未及上任，遇兵乱，避地杭州。张士诚闻其名，想用他，杨维桢不肯去，并且复信斥责张士诚说："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东南豪杰又何望乎？"还上书朝廷讽丞相达实特穆尔纳贿，怕遭受报复，就携家避祸至松江，在郡城迎仙桥西北筑草元阁隐居。他经常往来于华亭上海间，与诗人王逢、张昱、张宪、马麐、朱木等游。云间的名胜古迹，他们无处不到，到则吟咏题诗。在上海有题顺济庙《丹凤楼诗》、费察府第《云锦楼诗》、静安寺《绿云洞诗》、青龙镇任氏《来青·览辉楼诗》等等。他的《丹凤楼诗》如下：

> "十二湘帘百尺梯，飞飞丹凤与天齐。天垂紫盖东皇近，地接银河北平低。笑屠秋空戎马阵，神灯夜烛海鸡啼。嫦娥昨夜瑶池燕，笑指蓬莱西又西。"

丹凤楼上有宋陈珩手书的匾额，有元赵孟頫所写的记事碑，又有杨维桢这首诗，时人称之为三绝。当时，上海有一批青年，跟随杨维桢学习，后至明初，有些已经成名，如贝琼、顾瑛、钱鹤、赖良、薛伦

等。

元明更代，洪武二年朝廷聘请杨维桢赴京师纂礼乐书及修《元史》，他一再推辞，明年有诏赐安车诣阙。他留在朝中四个月，编写礼书条目完毕，《元史》纲目也初定，就以白衣告退。宋濂有送杨维桢《还吴淞诗》："皓仙八十起商山，喜动天颜咫尺间，一代辽金归宋史，百年礼乐上春官。乡心只忆鲈鱼鲙，野性懒随鹓鹭班，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还抵家中而卒，年七十六岁。遗著有《东维子集》、《复古诗集》、《丽则遗言》、《铁崖古乐府》等。

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个藏书家。他曾在南宋作过秘书院小史，宋亡，来到青龙镇隐居。因为原来的工作关系，喜欢藏书，曾聚书至八万卷，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史小说，靡不具备。他的书目以甲乙分十门，在青龙镇筑万卷轩以贮之。据《五茸志逸》载，元文宗时（1328—1332年）在讲筵中语及唐代聂夷中的诗，文宗问有无文集？诸学士都答没听说过。有人说青龙镇的庄肃富于藏书，文宗特旨访其家，果然查到了聂集。后来，高丽想以黄金千两换取他的藏书，他不肯。庄肃死后，子孙不知道爱惜书籍，有的书为虫鼠蚀啮，有的书为人盗窃，有的书被家人卖掉，以供饮酒赌博之资，还有的书被拆开裱糊墙壁，残余的也编帙散乱，所存无几。至正六年（1346年）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于其家，得五百卷。继命学士危素到青龙去选取，其家恐怕兵遁图谶犯禁，就一把火烧光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当时"江南藏书家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

赵孟頫，虽然不属隐逸文人之列，但他在至元二十四年出仕以前，曾在上海进行过活动；大德中任江浙儒学提举时，又有上海之游，在上海留下不少碑额。他的书法、文章、诗画，都给上海文化增添了光彩。赵孟頫字子昂，是宋室宗亲，因赐第于湖州，遂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他的父亲赵与容在南宋末年曾任嘉定县驻黄姚场大使。哥哥赵孟倜，宋末参加过文天祥的军事幕府，失败之后，

隐身入道，后又皈依佛门，出家在松江本一禅院。妻子管道升是上海县小蒸镇(今属青浦县)人。他经常留连于松江、上海，为两地寺院写了不少碑额。如松江南禅寺、普照寺，泖上崇福寺，上海丹凤楼，都留有他的手迹；他书写的亭林宝云寺碑，尤为世人所重。《南汇县志》载：赵孟頫曾在下砂镇停留，故附近寺庙的碑记、钟铭，多出于他的手笔。他还手书宋苏轼《前赤壁赋》全文刻石存新场镇永宁寺，至明代万历年间为郡守方岳贡移置于松江和衷堂，今已不见。

第三章　海隅名城　南吴壮县

一、上海县的建设与青浦县的分立

元末，上海县经过短期骚乱，旋即平定。随着明王朝的建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元至正年间，爆发农民大起义。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的高邮兵从通州渡江，攻取平江(今苏州)。作战失败的元军统帅王以敬率部退到松江。元江浙行省另派元帅特古呼斯镇守松江。二部元军互相争衡，王以敬部鼓噪哗变，纵火焚掠，携带抢劫的财物，北走通波塘，降于张士诚。驻在嘉兴的元军赶来趁火洗劫，松江郡城死者填街塞巷，大火一月未熄。张士诚部将史文炳自泖湖入古浦塘，进取松江。华亭、上海二县俱为张士诚所有。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派徐达引兵围平江，松江府守臣王立中向徐达投降。朱元璋派荀玉珍为松江知府，祝挺为上海知县。二十七年，上海县民钱鹤皋勾结张士诚旧属韩复春、施仁济等，发动叛乱，聚众攻下松江，杀死荀玉珍。钱鹤皋自称元江浙行省左丞，派总兵姚大章攻取上海。知县祝挺逃出县城，与主簿郑著、李从吉等联络乡里大户，起兵复县，里长唐翼斩姚大章于西沟，上海被祝挺等收复。徐达派骁骑卫指挥葛俊攻下松江，活捉钱鹤皋，本打算东屠上海，祝挺派人急报：贼已擒，邑已复，民已定，不劳大军前往。由是邻县死亡枕籍，上海却"毛草未动，民安堵如故"①。明年(1368年)春正月，吴王朱元璋即皇帝位于金陵，定 国

号为大明，建元洪武。从此，进入明朝统治时期。

明初，改金陵为南京，苏州、松江二府直隶南京。又立天下按察分司41道，合苏、松二府为苏松道。江南因张士诚之乱，战火频频，许多人避居海隅，上海县人口大增，洪武初全县户籍达114300户有奇，人口532800余人②。在当时，这已属江南人户最多的县份之一。朝廷因为上海民众事繁，于洪武九年（1376年）特增加华亭、上海二县县丞、主簿各一人③。

宋末元初，上海县镇只有拱辰、福会、文昌、致民、福谦、咏飞6坊，到明中期已增多至21坊。拱辰坊南增加肇嘉坊，长生桥北增加永安坊，咏飞桥北增加联桂坊、对面为宝华坊，第一桥东增加登津坊，县治南增阜民坊，县治东即四牌楼，为宣化、崇礼、泽民、集庆4坊，县东还增加敷教、澄清、迎恩3坊，县南增明通、公溥2坊。已有街巷10条，即新衙街、康衢巷、新路巷、薛巷、梅家巷、观澜亭巷、宋家湾、马园街、姚家巷、卜家街。县镇四郊分布镇、市各11处。镇有：县南的吴会镇、乌泥泾镇，县东南的下砂镇、新场镇、周浦镇，县西北的盘龙镇、青龙镇，县西的唐行镇、赵屯镇，县东的三林塘镇、八团镇。市有：崧宅、泰来桥、杜村、白鹤江、杨村、诸翟、鹤坡、东沟、北蔡、闵行、高家行④。

明代上海地区的海防镇戍，比过去历代都强，都严密。洪武初，因倭寇屡次侵掠海滨，十九年（1386年）太祖下诏，严禁通番，派信国公汤和整饬江浙沿海。汤和在浙东、西沿海设卫所59处。在松江府境设金山卫，管领前、后、左、右、中及中前、中后七处守御千户所。前后左右四所设于金山卫城，中所设于松江郡城，中前所设于青村城，中后所设于南汇嘴城。青浦镇（今宝山县城）设吴淞守御

① 明弘治《上海志》载，杨维祯撰《祝大夫碑》。
② 明弘治《上海志·人口》。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三。
④ 明弘治《上海志·坊巷·镇市》。

千户所，属太仓镇海卫管辖。卫所之下，又设若干防堡，如川沙堡。濒海设有墩塘，上设瞭守哨。地方另设五处巡检司，即黄浦、三林庄、南跄、吴淞江、新泾司①。

明代上海县的教育事业普遍发展起来。洪武八年(1375年)诏令全国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延请有学行的秀才训迪军民子弟。十六年(1383年)又诏郡县以民间自办的方式，增加社学，聘请老师教育子弟②。上海县初期举办社学 49 所，后来发展到 96 所，还有乡绅出资举办的义塾，如三林塘镇储氏办的筠溪义塾，青龙镇章氏办的清忠书院，下砂镇瞿氏办的鹤沙义塾。至明末，上海的"少年子弟，援笔成文者，立登庠序，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隆焉。"③这是明代以来，上海地区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上海县西北郊的海隅、北亭、新江三乡地势低洼，常受湖水浸渍，雨涝欠收，田赋久逋。正德年间松江知府喻时提出分县之议，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巡抚都御史夏邦谟、巡按御史舒汀奏报朝廷，提出分华亭县北境的集贤、华亭二乡弱半之地，上海县西北的海隅、北亭、新江三乡之半，凡五乡九保之地立青浦县，设县治于青龙镇。到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大举入侵，掠青龙镇，焚烧房舍，闾里荡然，田荒民散，青浦县又被撤废。据说当时华亭徐阶在朝为相，他认为瘠土荒区，分县后一律征收赋役，人民恐怕难以支持，也力主撤县④。

至隆庆六年(1572年)，本邑人、在朝任兵科给事中的蔡汝贤提出恢复青浦县的奏议，得到巡抚都御史张佳允的支持，于万历元年(1573年)又恢复了青浦县，迁治所于唐行镇。万历五年(1577

---

① 明正德《金山卫志》。

② 明嘉靖《上海县志·建置》，清《松江府志·学校》。

③ 叶梦珠《阅世篇·学校一》

④ 章有谟《景船斋杂记》

年)知县屠隆请准将华亭县集贤、华亭乡的余下部份，上海县新江乡的残半，一并划归青浦县。青浦县前后所得凡5乡14保。上海县经过这次分割，仅剩下长人、高昌2乡15保。县区的四至缩小为：东至海50里，西至青浦县界36里，南至华亭县界72里，北至嘉定县界18里。东西广86里，南北袤90里。人户减少三分之一，田地尚存14947顷①。

二、江浦合流 兴筑海塘

明代，上海地区治水得法，收到显著成效，基本上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水患。

明初，吴淞江中下游段为潮汐涨沙壅塞，已不甚通畅；黄浦也沙洲日积，潮水不通。拖到永乐初年(1403年)，吴淞江自夏驾浦至南跄浦口，约130余里的江面，已菱芦丛生，渐成平陆。三年六月朔雨，到十日不停，高原水深数尺，洼地丈余②。当时，苏松地区财赋居全国首位，不容朝廷忽视，苏州知府汤宗即以“坐视水患”之罪，罢官下狱。成祖深感忧虑，决定派户部尚书夏元吉赴江南治水。

夏元吉一到江南，即向地方人士广征治水之策。上海县叶家行诸生叶宗行应征上书，献吴淞江治水方略。他建议放弃吴淞江下游故道，别引太湖水由刘家河入海，再于上海城东北浚范家浜接黄浦，承泖湖水通流入海。夏元吉经过实地勘察，反复讨论，认为叶宗行的意见可行。他上奏朝廷说：“……宜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诸水入刘家河、白茅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难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口，可逕达海，宜浚令深阔，直接大黄浦，以达泖湖之水。此

① 明万历《上海县志》。
② 清《重修华亭县志》。

即《禹贡》三江入海迹。”① 永乐皇帝批准了这个治水方案。夏元吉征集民工20余万人，开工疏浚，他自己也身穿布衣，终日往来工地擘划，盛暑曝晒日下，从人张伞遮阳，他说：人民这样劳苦，我怎能忍心独求安适呢？民工见了，也人争尽力，工程进展很快。翌年，完全恢复了旧有河港，下流尽通，积水入海。

上述工程的实现，使吴淞江上游水源分泄江海，下游江浦合流，拼力冲沙，免除湮淤，解决了吴淞江治水的难题，为以后的疏浚打下牢固基础。清人俞樾在同治《上海县志》中评论说：“自（夏）忠靖开夏驾浦入刘家港，而上流之势分，开范家浜通黄浦，而下流之势并，迄今数百年来无大水为灾者，公之力也。”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夏元吉的功绩还不仅如此，更取得一个始料不及的收获，从此重洋巨舰可直驰上海城下，为上海港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继夏元吉后，明代还有几次疏浚吴淞江和黄浦的重要工程：

正统四年（1439年）秋，苏松地区淫雨连绵，大水淹没稻禾，漂屋溺民，积水成灾。巡抚工部侍郎周忱到松江视察赈济，他看见上海、嘉定两县沿江淤沙，茂草丛生，就征调民工浚其上流，使昆山顾浦诸水迅流急泄，尽涤下流沙壅，凡民间私筑堤堰尽数毁去，在江心立表以示水位②。

天顺四年（1460年）巡抚左都御史崔恭巡视松江，补修永乐年间遗留未浚的东段，自昆山夏驾浦、中经上海白鹤江迄嘉定庄家泾，长13700丈。又浚大盈浦至吴淞江、新泾至蒲汇塘入江，使低乡水潦泾泄。又在黄浦两岸，自曹家沟开河至新场，浚华泾、六磊塘、鹦窦湖、乌泥泾、沙冈、竹冈诸水，通流入浦，使高乡干旱得解。上海人民深深感激他，名曹家沟新河为都台浦③。

正德十六年（1521年）苏松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朝廷命巡抚都

① 《明史·河渠志》，同书《夏元吉传》。

②③ 《明史·河渠志》。

御史李允嗣治水江南。李允嗣见苏松水道已尽为势家所据，就划水道为井地，户占一区，命势家计工计田造浚川耙，用巨筏数百曳木齿随潮进退，击汰泥沙，置小艇百余，尾铁帚导之。采用这个方法，疏浚很快，翌年全部竣工①。

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入侵东南沿海，为防倭船溯吴淞江直上，沿江各处多钉栅筑堤，江流受阻日甚。倭寇退走后，议行疏浚，因工程浩大，民力、财力俱已衰竭，无力兴工，只好听之任之。隆庆三年（1569年）水情严重，巡抚都御史海瑞到江南视察，目睹人民困窘之状，奋然以身独任。他计算当浚的河道，缩小宽度减半，约需工银76000余两。就借支军饷，挪用历年导河所余，又将巡抚衙门所积赃罚银两，及清理管内各仓所贮米谷等，采取以工代赈之法，兴工疏浚。他上书朝廷说："吴松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说明可以一举两得②。这次工程两月而竣。上海段实开6531丈8尺，建闸于二坝（清代闸废，地名犹称老闸）。

上海地区东、南境都是大海。自从南宋乾道年间丘密修筑海塘，建瀕海十八堰后，元代大德和延祐年间曾二次发生海溢。明永乐二年（1404年）七月台风骤至，暴雨急淋，又发生海溢溃塘，漂溺千余家，近海田地尽为海潮浸没，朝廷曾命水官何傅督修海塘。过了60年，成化七年（1471年）秋，又遇大风海溢，沿海居民被漂溺者以万计，水退后，尸骸遍野。巡抚都御史毕亨命松江知府白行中督工兴筑海塘，东起嘉定，西抵海盐，筑堤52517丈，面广2丈，基址倍之，高1丈7尺。其中属上海县境的一段为17748丈。这处海塘，即南宋丘密所筑捍海十八堰故址，俗称里护塘。当时，十八堰只有张泾堰犹存，其余各堰皆已废圮，不可查考了。又因故有旧址，筑为外堤，起自滅漾，至平湖县界，共53里，俗称外护

① 《明史·河渠志》。

② 《明史·河渠志》，同书《海瑞传》。

塘①。

成化捍海塘修筑后，经历了弘治七年、正德元年两次海溢的考验，有效地阻挡住海潮的侵袭。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部分海塘年久颓圮，时值倭寇入犯，上海太学生乔镗倡议兴修，自愿捐钱助役。巡抚蔡克濂委任他督修，乔镗既出钱又出力，率领乡民奔走工地，南起一团（大团），北至川沙堡，长约90里，两月完工。这时塘东又涨出大片土地，经过开垦，已阡陌相连，时苦旱涝，就开水窦八处，海潮溢，塘东之水得泄于塘西；天时旱，塘西之水得通于塘东，乡民称颂②。

万历三年（1575年）夏五月，大风鼓涛，海潮骤至，冲坏漴阙、川沙等处海塘，漂没庐舍人畜无数，碱潮所过，禾黍全枯。华亭知县杨瑞云冒暑循海行200里，目睹海溢造成的惨状，上报到府。松江知府王以修提请修复，但工费浩大，无处筹措。巡抚侍御史邵陛、巡抚中丞宋仪望、督盐侍御史王藻都自愿捐银助成，知府王以修也捐献俸银，凑成1100两，加上河工费积余260两，就用这笔钱修复850丈海塘。十二年（1584年）上海知县邓炳又接筑沿海外塘，即外捍海塘，次年由继任知县颜洪范建成，长9250丈，也称小护塘③。

三、赋役沉重　人口外流

明代上海地区田赋最重，徭役最繁，纵横相比，既超过明前各朝，也重于同时各地区。由于赋役超过了人民的负担能力，迫使人口大量外流。

明初，太祖怒苏松地区曾为张士诚守土，将没收张士诚部下所

---

①② 清嘉庆《上海县志·海塘》及同治《上海县志·水道》。

③ 清同治《上海县志·水道》。

占田地，及当地富豪田地，都列为“没收官田”，加重田赋，以示惩戒。当时，定天下田赋为四等：民田，每亩税3升3合；官田，每亩税5升3合；重租田，每亩税8升5合；没官田，每亩税1斗2升。苏松的田地，又另按私租簿为税额，增赋二倍，至每亩收7、8斗①。天下的官田数，为全国垦田总数的34％；苏州官田数竟占一府总田数的62％；松江更高达本府总田数的84％②。官田越多，赋额越高，苏州一府秋粮为2746000余石，松江为1400000石③。这个赋额是宋代的七倍，元代的四倍，是上海地区历史上的第三次重赋，也是最重的赋额。

苏州粮赋虽然比松江高一倍，但其辖区面积大，下属有七个县，松江仅有华亭、上海二县，所以实际上松江的赋额比苏州还高。明代上海邑人叶梦珠说：“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尤甚矣。”④这个分析很透彻。在松江的两县中，上海的田地又比华亭差，境内东南滨海一带，地多斥卤，西北低洼，常遭涝灾，沿江沿海滩涂，又时有坍塌。但官收田赋，一切不问，故上海农户负担之重，痛苦之深，更超过其他地方。洪武十三年（1380年）朝廷发现苏松地区赋额连年拖欠，“知取民之不均”，下令稍减：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征三斗五升；以下仍旧⑤。经过这次减赋，松江府的税粮尚有1029000余石。上海县的赋额为：夏税，大麦3907石4斗2升9合5勺，小麦67560石3斗1升9勺，丝3708两有奇，绵1027两有奇，钞5809贯有奇；秋粮，粳米233717石9升9合5勺，糯米

① 《明史·食货志》。
② 梁方仲《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的统计》。
③ 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
④ 明叶梦珠《阅世篇·赋税》。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〇。

203石3斗，赤米262601石4斗9升4合5勺，黄豆72143石3斗3升4合5勺，斑豆4201石1斗4合3勺，赤豆655石7升2合1勺①。

建文二年（1400年）有诏令说："苏松准私租起税，特以惩一时之顽民耳，岂可为定则，以困一方。宜悉予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① 确乎宽松了，惟诏命甫下，靖难之乱已起，遂成口惠而实不至。到宣德初年（1426年），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所欠粮赋，已积数百万石，虽然官府连连催逼，仍然收不上来。五年（1430年）朝廷升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侍郎，总督南直隶苏松等地的粮税。江南士人杜宗桓上书周忱说："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他提出"均额"的解决办法，即："官田地粮额均作一，则无少轻重，于官无损，于民则均，均则之后，其苏松逃民争先而回矣。"② 这个建议虽然得到周忱的赞赏，因朝廷已下谕减税，定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再议均粮，势已不可行。

经过减税，松江府税粮减去302885石有奇，上海县减去128300石有奇③。周忱数次视察华亭、上海二县，目睹田地荒芜，人民外逃的情况，知道仅仅核减这点税额，尚不足以解救人民的困苦。于是，宣德八年（1433年）奏准朝廷，实行加耗折征例。原来农民除按规定数缴纳税粮外，还须增交附加税，以解决诸如粮食入仓的运输、损耗费，军马草粮费，抛荒田应缴税，甚至上海地方并不养蚕，夏税丝绵也要出钱购齐，附加税又名加耗。往往正粮一石，须加耗八斗，甚至超过正粮。周忱限定加耗数：每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五、六斗，所有费用，悉以此支付，若有剩余，用以备赈，名为济

① 明弘治《上海志》。

②③ 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引《杜宗桓上周忱书》。

民仓；折征，即以银两折米，或以布匹折米①。这个办法，每年可省米60万石。

周忱之后，又有一些地方官员，设法改革征税的办法。如弘治八年（1495年）巡抚朱琓定分乡论田加耗例，上海东乡土质较差，每亩加1斗1升；中乡亩加1斗3升；西乡土质略好，亩加1斗5升②。嘉靖十八年（1539年）巡抚欧阳铎、知府黄润在清查版籍的基础上，核定赋额，规定只征粮米及折核白银，结果"民田之赋反加"③。隆庆三年（1569年）施行清丈均粮法，定上海县田地（包括池塘、滩荡）实数为20664顷57亩有奇，分全县为上、中、下三乡，各亩均科正粮2斗5合，上乡加耗9升，中乡6升，下乡3升④。此后，又有一条鞭、一串铃等法。这些修修补补的办法，都没有触及重赋的根本，重赋不彻底减轻，人民仍然难以承受。

明代上海地区的徭役，是套在人民颈上的另一个枷锁。经常性的大役有布解、北运、南运、收银、收兑等差使，都是每隔5年编定一次。布解，即解送粗细布送往北京，每次松江府派人40名，内上海县15名，由本县大户承担。北运是解送白粮到北京，每次松江府派人208名，内上海县90名。南运是解送白粮到南京，每次松江府派人35名，内上海县10名。收银就是催粮，凡户田百亩以上者都要签充，松江府定员880名，内上海县230名。收兑就是粮长，也称仓兑，松江府定员705名，内上海县190名。此外，还有小役，如总催、经催、总甲、塘长、该年等等，名目繁多，扰民极甚。这些徭役"皆以有土之民应之，而缙绅例有优免，不预焉。"富家大户一被签点，官府供应、衙役需索，都要派在头上，往往一役未完，已经倾家荡产⑤。据明邑人董其昌说："总甲一役，三县皆然，惟上海

① 《明史·食货志》，同书《周忱传》。

②③④ 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明史·食货志》。

⑤ 明叶梦珠《阅世篇·徭役》。

最称烦苦”，“一遇上司巡历，如按院驻扎、兵道查盘、随巡公署，以至抚台巡海，宝山、川沙、南汇诸衙门，俱责总甲承值，备办铺等项及上房书吏、门厨，纤悉取给，无所不备，每于一处，约费百余金，破产荡家，莫可告诉。”① 甚至贫户欠粮，也要粮长赔补。于是，民间视之如陷阱，一被签点，举家逃走。

到隆庆四年（1570年）巡抚都御史海瑞推行一条鞭法，以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上总于府，府总于布政司，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徭役与丁粮两税合一，一县的丁粮输入官府，再由官府另行签募，以充一年之役。万历二年（1574年）开始征收均徭役银，全县共收13548两有奇②。自此人民虽减徭役之扰，却又加重税额许多。

由于田赋过重，徭役频繁，苏松地区农民大批弃田外逃，人口锐减。松江府从洪武朝到弘治朝的一百年间，户数从25万降至20万，减少五分之一；人口从121万降至62万，减少一半。上海县户数从114000，降至92000，也减少五分之一；人口从532000，降至26万，也减少一半多③。周忱分析外流人口的去处，认为最多是大户苞荫。因为明代的权豪都享有优免赋役的特权，很多农民托身权豪，自愿寄身家田产于其名下，受其庇护，当时称作诡寄。于是，势家巨族田连郡县，贫苦农民多成为佃户或奴仆。也有许多农民逃往城市谋生，周忱说：“苏松人匠，丛聚两京”④，其实流亡者何止两京，较小城镇也可以安身，这正足说明上海周围城镇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

① 明董其昌《上海总甲议》。
② 明万历《上海县志·赋役》。
③ 明弘治《上海志·人口》。
④ 《皇明文衡》卷二七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

四、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上海地区从元代兴盛起来的棉纺织手工业，在国内外商品交流的刺激下，生产日益发展，市场日益扩大，至晚明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朝廷鼓励植棉，并且准许以棉花和棉布代折税粮，从政策上推动了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棉花一斤准米二斗；棉布每匹准米一石。”① 一亩棉花可以折七石粮，植棉之利也胜于种稻，经济利益更鼓舞了农民植棉、织布的积极性。尤其上海地区，明初太祖就指定：“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② 所以，上海滨海地区植棉面积迅速扩大，到明代中晚期，“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③ 随棉花产量的激增，棉纺织手工业也随之急遽发展。至正德年间，上海县和整个松江府“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子夜不休”④，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手工业中心，得到“衣被天下”的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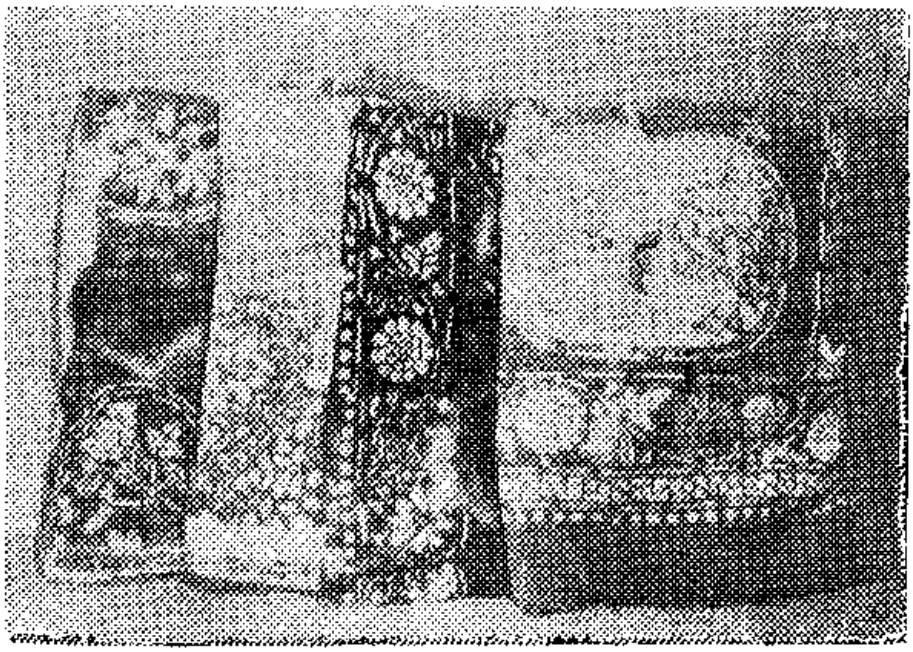
明初尚在农村中以副业生产为主要形式的棉纺织手工业，到明中叶已经进入城市，出现不少专业生产户。正德《松江府志》说：“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晨复抱纱以去，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城市中的棉纺手工业，不但纺和织的生产过程实现了独立化、专门化，还在城郊市镇出现印染、踹布、纺织工具制造等专业生产基地。如枫泾（属金山县）就曾是印染和踹布作纺集中的地方，当时依染色之不同，有蓝坊、红坊、漂坊、染色坊等分工。踹布，是专门以足踹元宝石，碾压布匹，

---

① 《明史·食货二》。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
③ 徐光启《农政全书》。
④ 明正德《松江府志》。

使布质紧薄而有光的作坊①。七宝镇专门生产纺车，故镇东街被称为纺车街。

明代上海生产的棉布，品种甚多，大宗的产品主要有三种：一为标布，或称松江大布，幅阔尺许，匹长2丈，16尺为平稍，20尺为套段，这种布远销西北，时值每匹一钱七、八分；二为中机，比标布稍窄，幅阔5、6寸，匹长2丈，销于湖广、江西诸路，价与标布相等；



松江印花布

三为扣布，俗名松江小布，或短头布，幅阔8寸，匹长1丈5、6尺，单销于江西饶州一带，每匹值银六、七分。此外，还生产高丽布、芦纹布、格子布、云青布、斗纹布、紫花布等等②。松江特产三梭布、尤墩布、飞花布等。上海地区生产的棉布产量高、品种多、质量好，故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

明中晚期，随着棉布市场的不断扩大，商品竞争的日益激烈，

① 《枫泾小志·拾遗》。

② 叶梦珠《阅世篇·食货五》。

上海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改进了生产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当时，上海棉布的市场已经扩大到全国，“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①。并且打开了国外市场的销路，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② 国内外商品市场需要量不断增加，同业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徐光启担心上海地区竞争的前途，说：“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其价值仅当十之六七，……则后此数十年，松之布当无所泄哉！”③ 为保持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明晚期上海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已有不少改革，一是革新生产工具，如轧花车发展成搅车，比碾轴的生产效率提高三、四倍；纺车也从单锭一线手摇式，改为三锭三线脚踏式，从日纺 4 两提高到 8 两至 1 斤。二是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有名的“七宝尖”、“龙华尖”等高级产品；松江还有“丁娘子布”，即飞花布，由郡城东门外双庙桥的丁姓妇女织成，布极精软，织法秘不示人。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中，又产生出棉纺织品的加工业和织造机户，出现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的趋向。“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④ 这一新生的行业，百余家暑袜店使“合郡男妇”都成了它的雇佣工人，这种包买包做的生产方式，正是工业资本发展初期的一种形态。与此同时，纺织手工业也从一家一户的专业生产户，向联合生产的机户发展。崇祯二年（1629 年）华亭知县郑友元将本县应交纳的解梭布 16185 匹，棉布 48930 匹，全部包给城

① 明万历《嘉定县志·田赋考·物产》。
② 姚叔祥《见只编》。
③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④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风俗》卷二。

内机户织造，机户们联合起来，分工赶织，只用了二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完成①。可见机户生产能力之强。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正向着手工业作坊、工场的方向迈进。

棉纺织品商品生产与流通，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繁荣。明中叶后，到上海地区来采购棉花、棉布和棉布加工品的商贾，从全国各地络绎而至。据叶梦珠说："前朝(明)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两，少亦万计。"② 这些大商人来时，又随车、随船携来各地的土特产品，如南方的糖、药材、香料．北方的大豆、油脂、皮革，等等。他们居留在上海，"徐售其货，徐收其布"，往往一住数月。他们的交易，多数是通过上海的经纪人——牙行，即商业资本家代为办理的。"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能取得布商的信任，转手获利，就可以发大财。据邑人褚华说：他的"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内常客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械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③ 通过商品交流，上海街道上商肆林立，市场内百货毕集，时人比之为"市货盈衢，纷华满目的苏州"，称上海为"小苏州"。

上海周围的市镇，也随上海的繁荣日渐发展。上海既已成为"游贾之仰给于邑中，无虑数十万人"④ 的商业城市，凡商旅交通之所经，商贩鬻易之所至，附近的许多小市镇，也都伴随发展起来。如上海西南的朱家角镇，本名珠街阁，一名珠里，因为西南通泖湖，东北接三分荡，北与昆山相近，成为商贾往来的通津，明代已很著名。商榻镇也是商贩往来苏、松二郡的必经之路，每当日暮，过往商贩就在此下榻，得名商榻。上海西北的诸翟镇，一名紫堤，因为与嘉

---

① 清康熙《松江府志》。
② 叶梦珠《阅世篇·食货五》。
③ 褚华《木棉谱》。
④ 黄佩瑾《关于明代国内市场问题的考察》引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

定、青浦二县互为犄角，是三县棉布的集散地之一，故发展成名镇。安亭镇介于上海、昆山、嘉定三县之间，是重要的贸易孔道，四方布商咸集，名盛一时。终明一代，上海地区新兴起的市镇，有63个，差不多都是正德至万历年间发展起来的。

五、海外贸易与御倭斗争

明太祖很重视海外贸易，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即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到洪武二年（1369年）发生了倭寇抄掠苏松沿海，登陆崇明，杀人夺财的事件。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官军出海捕贼，大败倭寇。翌年二月停罢黄渡市舶司①。另在广州、泉州、宁波三地设市舶司，与海外诸国进行"朝贡式"的贸易。这时，上海已经不是市舶港口，也非规定的"贡船"入境之地，所以港口的发展缓慢下来。

永乐初，由于明政权已经稳固，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三年（1405年）决定派三宝太监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下西洋，前后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抵非洲东岸。他们启航的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随船前去的有不少上海水手。上海医士陈常也是其中一人。陈常字用恒，从外氏邵艾庵学得医术，有名于当时，永乐十四年以医术随船远航，历洪熙、宣德两朝，凡三次往返，经历了自占城到忽鲁谟斯的三十余国②。当时，海外船舶也开到刘家港市易，"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③

---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九。
② 清同治《上海县志·人物志》。
③ 清光绪《太仓县志》。

永乐十年（1412年）平江伯陈瑄提议：在嘉定县之青浦筑土山、立堠表，以便利海舟进出长江。永乐皇帝很赞成这个意见，遂临海构山。山成之后，御制《宝山碑记》刻石立于山前，碑文有"嘉定濒海之墟，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淼无际，凡海舶往来，最为冲要"，"今年春乃命将士，相地之宜，筑土山焉，以为往来之望。其地东西各广百丈，南北如之，高三十丈，上建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洋空阔，遥见千里，于是咸乐其便。"①（这座土山在万历十年七月为海潮冲没，但宝山之名与石碑存留至今。）既有宝山这个海口标志的指引，黄浦江水道又畅通，故国内商船与私人海舶，不时出入上海。弘治时郡人钱福说：上海的商贾"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贸易，疾驶数十里如反掌，又多能客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不数年可致巨产。"② 说明当时，上海的商人已经溯长江而上，远去湖北，又沿海北行，与河北、山东通航贸易，但由于倭寇侵扰沿海，朝廷施行海禁政策，上海不能公开对外开港罢了。

明朝对日本的贸易，因受倭寇的阻扰，施行"朝贡"制度，凭朝廷所发勘合，十年一贡，限定宁波一处开港，设立市舶司。至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领主的朝贡船，在宁波港相争互斗，骚扰地方，朝廷下令罢废宁波市舶司。此后，日本海商反自如往来浙闽海域，与中国海盗勾结，指引倭寇入掠沿海村镇。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在中国海贼王直的引导下，倭寇大举来犯，连舰数百，蔽海而至③。当时，苏松沿海卫所，长久无事，士气消沉，武备松弛，无力抵挡。在宝山堠表的指引下，倭船首先在嘉定青浦登陆抢掠，再循海南进，攻破南汇千户所城。四月十五日从浦东渡浦而来，直捣上海县镇，知县喻显科仓惶逃遁，倭寇大掠于市，满载而去。从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七日，五次焚掠县镇，

① 清光绪《嘉定县志》。
② 明弘治《上海志·后序》。
③ 《明史·日本传》。

杀死镇海卫指挥武尚文、上海县丞宋鳌、镇抚胡贤，砍伤指挥黎鹏举，县民死者盈路，并两次火焚县衙、民舍，上海县镇半成丘墟，浦东沿海二百余里，尽为倭寇所据①。

上海人民几遭劫戮，决意筑城御倭。邑人顾从礼上书说："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物，皆由无城之故，"要求修筑城垣；松江知府方廉也表示："斯城不筑，是以民委之盗也。"全镇人民自动出钱、出地、出力筑城。首议者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门。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捐田500亩，银2000两，拆房数千楹，助筑小东门。县学博士王相尧撤屋献地，罄资助筑。贡生张泮不但散家资助役，还亲自参加担土运石，累得一病不起。从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兴工，十二月筑城完竣②。

上海县城，城围九里，高二丈四尺，有门六座，东名朝宗，南名跨龙，西名仪凤，北名晏海，跨龙门迤东为小南门，名朝阳，朝宗门迤北为小东门，名宝带。另有水门四座，东西门相对跨肇嘉浜，小东门跨方浜，小南门跨薛家浜，均与城濠相通。城上有敌楼2座，雉堞3600有奇，箭台20所。城外有濠环抱，长1500余丈，宽3丈。后到嘉靖三十六年(155[illegible]年)海防同知罗拱辰又于四门之上增筑四座敌楼，沿墙增加箭台，在东北城要害处，增筑高台层楼三座，名万军、制胜、振武。万历中侍御史秦嘉楫又于万军台上重建丹凤楼，楼分三层，置陈珩旧额其上。时游人多登楼远眺江景，故有凤楼远眺一景，为上海八景之一(其余七景为：海天旭日、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蒹葭、江皋霁云)。城建成后，专设海防道于上海，董邦政为首任海防佥事。

上海县城刚刚筑成，还未及牢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十八日倭舟七艘，突入吴淞江，打败停泊在黄浦中的崇明水师，

---

① 明万历《上海县志》。

② 郑祖安《上海旧县城》。

登岸逼上海东门，登上城外民楼，破壁俯瞰城中，董邦政以兵力微弱，撤城固守。新筑城墙，多有崩坏，董邦政命神枪手于城崩处击贼，当之立毙，贼不敢近，掠四郊而去。围城十八天，至二月六日围解。当时，兵备佥事任环率兵300及少林僧兵88人来援，沿江进袭与贼战于叶榭，颇有斩获。浙江参将卢镗也率师航海赶来，与任环合力再战，大败倭寇于五里桥。至三月二十日各路倭寇的船只，会集于黄浦，准备出海逃窜，值海上风雨大作，倭船多覆没，余倭又回船登岸结垒，分据下沙、新场、柘林、周浦，互为犄角，作长期拒守之势①。夏秋两季屡袭川沙、南汇，入冬围青村千户所城一月，城中火药俱尽，倭寇乘夜破城，纵火彻晓，尸积成丘②。是年冬调浙江参将俞大猷为南直隶副总兵，镇守金山卫。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是上海地区御倭斗争最激烈的一年。三月，有新从日本到来的倭寇千余人，窜犯浦东，海防佥事董邦政迎战于浦东陆氏园，为首一倭将，身着红衣，跨白马，手持双刀，往来冲击，极为嚣张。海防战士陈瑞挺身出斗，仅数合，立劈之于马下，贼众大惧，仓惶而退。陈瑞口啣贼首级，穿浦泅渡，两岸观战的人，都大加赞叹，齐呼壮士，董邦政即任命他为千夫长③。

四月，朝廷派侍郎赵文华到松江视师、祭海。赵文华是奸相严嵩的义子，到松江后"黩货恣横，民苦之不减海寇"，因与总督张经论兵不合，上书诬劾张经"纵寇縻财，屡失战机"，并劾参将汤克宽"想俟倭寇饱载出洋，再报功塞责"④。朝廷偏听偏信，下旨逮张经与汤克宽问罪。当时，俞大猷、汤克宽正大捷于王江泾，擒斩倭寇1980多人，是御倭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胜⑤。是年八月，赵文华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合谋，调南直隶与浙江所属各路官兵，会剿陶宅之倭，浙江兵分三路，南直隶兵分四道，东西并进。倭寇集中精锐，冲

① 明万历《上海县志》，明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

②③ 明万历《上海县志》及明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

④⑤ 明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破浙江兵阵，又引南直隶兵入伏，官兵大败于颛桥。倭寇气焰大炽，四出抢劫，官兵震慑①。

十月以后形势略有转机。佥事焦希程、游击曹克新大破倭寇于周浦。先是总督杨宜派武林人胡亘、朱洸潜入周浦敌巢，焦希程、曹克新乘虚率兵夜袭，胡亘与朱洸纵火焚倭所居永定寺，贼大乱，四处奔逃，官兵追斩数百人。总兵俞大猷，副使王崇古又尾随追击，杀敌于老鹳嘴，焚倭船八艘。赵文华窃功自居，向朝廷报称："水陆成功，江南清晏"，逕自还朝请赏去了②。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是倭寇侵扰上海地区最后的一年。五月初上海城攻守之战，也是最后的一役。三、四月间有新来倭船数十艘，入掠县境，均为官兵所败。五月一日由海盗徐海所引的大隅、萨摩倭船五十余艘，自吴淞突至上海。海防佥事董邦政正率兵外出剿贼，城守力薄，形势危急。全城缙绅献议，请准通判刘本学出库银二千两为赏格，招募敢死之士守城。倭寇昼夜攻城不下，至十八日夜，窥城之西南，地旷人稀，取竹造梯，以布为级，趁夜半守城人困倦之际，舁梯登城。守城民夫杨钿首先警觉，大声疾呼，人皆惊起，登城之倭刺倒杨钿，钿以身压梯上倭寇一同坠城而死。城上炮石雨下，倭不能支，退涉城濠。时值涨潮，浦口堰水高数尺，倭不知深浅，相挽溺于濠水中。明晨，贼弃营垒，从南浦逃遁。城中人出视，见衣裾浮在水面，拽衣得尸，争入水得67尸，皆受重创，头颅肿大如斗，口圆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指日本人）③。从淹死的人数看，也可知参加此役的倭寇人数不少。此役之后，上海围解。六月间，倭寇满载抄掠的财货，乘船千艘东下出海，仅为过境而已。

倭寇入侵上海地区的三年间，县邑连遭兵洗，备受蹂躏，里闾

①② 明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及明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

③ 明万历《上海县志》及清同治《上海县志》。

半化为墟。县境西北的青龙、蟠龙诸镇，县南的乌泥泾镇，昔称繁华，经过倭寇的焚荡，屋舍颓败，鞠为茂草。县境东南的下砂、新场，往日歌楼酒肆，尽成瓦砾。南汇、青村两千户所城，都被倭寇攻破，城圮屋倒，人烟灭绝。松江郡城也两被围攻，纵火城外，庐舍焚毁殆尽。一时沿海数百里，满目疮痍。

六、名人名园

明代尊崇文士，学术文化颇见发达。上海亦多名士，其中佼佼者，首称陆深、潘恩、徐光启3人。

陆深字子渊，号俨山，先代是汴梁人，随宋室南迁，移居上海浦东。生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幼从父学。弘治十四年(1501年)参加应天乡试，中第一名，十八年(1505年)考进士，中二甲第一名，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因翰林文士得罪宦官刘瑾，统统谪放外任，陆深也调南京主事。他父亲反为他庆幸，说："同汝者，皆我闻天下贤者名也，抑又何辞！"正德初刘瑾伏法，陆深又回到翰林院，十三年(1518年)任国子监司业。又过三年，丁父丧返里，在浦东旧居后乐园中，运土筑高冈，有"俨然山也"的情趣，自号俨山。并作七绝一首："望中城郭故依依，乔木千章水合围，风动海门闻鹤唳，鲈鱼正美客南归"，表示了恬退归隐的思想，假满之后也不还京。朝里的同僚交相推荐，起用为国子祭酒。嘉靖八年(1529年)轮讲经筵，讲稿为阁臣桂萼删改，他面奏皇上："嗣后且存诸臣所见，各尽其忱"，因此得罪桂萼，谪为福建延平府同知，迁山西提学副使，再移任浙江，升四川布政使，十五年(1536年)内调回朝任光禄卿，次年又改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十八年(1539年)任詹事府詹事。他已经62岁，即告老返乡，回到上海，在后乐园中度过余年。二十三年(1544年)陆深68岁病卒，死后赐祭，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陆深的书法很有名，楷书颇具赵孟頫遗绪，行书、草书宗法李北海。明代上海的几个名书法家，如张旭、顾从礼，都跟他学过，并通过他的引荐，以书法供奉内廷。他的书札有明人小品的神韵，极为后世推崇。著作有《俨山集》和《俨山外集》。

陆深的住宅在浦西，县城东门内长生桥南，据说其址宽广，堂宇宏大，门内重堂複道，庭立三门，题"学士第"，是张屯手书。东有高阁，因在学宫之后，故称"临黉"，内室叫"静胜轩"，为家居之所。旁有书斋两处，一名"知非"，一名"知还"，静胜轩后还有一个"知命堂"。后来，其地就称陆家宅。其故址，今称陆家嘴①。

潘恩字子仁，号湛川，后改笠江。先代本常州人，元末避乱，迁居上海。祖父和父亲都作过小官，是官宦世家。生于弘治九年（1496年），少年时诗文、制艺已有名乡里，受到陆深的赞许。嘉靖元年（1522年）应天乡试，以诗中第九名举人，次年到北京会试，联捷成进士。初任祁州知州，以治行卓异改任钧州，六年（1527年）升南京刑部员外，十二年（1533年）升广州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时靖江王骄横不法，潘恩拘捕了受他庇护的坏人，受到诬陷，事情澄清后，擢升为四川布政使左参政。二十一年（1542年）调任山东按察副使，受命监考，因语忤严嵩，被诬为诽谤朝政，逮捕下狱，谪广东河源县典史。二十九年（1550年）又擢升江西按察副使，三十一年升浙江布政使左参政，明年按部巡视到海盐县，值倭寇来犯，城内无兵，他鼓励吏民，昼夜登城巡防，城得不破，事平升云南按察使。他到任后，揭发徽王和伊王掠人子女，强占民田，杀害无辜的罪恶，二王削职戢伏，于是声名大著，擢升刑部侍郎，再升南京工部尚书。四十年（1561年）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他的次子允端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吏部认为父子不宜同居法曹，将允端调南京工部主事。给事中张益上书说："潘恩溺爱，允端奔竞"，潘恩因此乞

① 《明史·文苑传·陆深传》及清嘉庆《上海县志·人物志》。

归，68岁谢政。此后优游林泉，至万历十年（1582年）87岁病死。朝廷赐祭，命工部营葬，赠太子少保，谥"恭定"。

潘恩的诗文都负盛名，著作有《笠江集》、《周易辑义》、《诗经辑说》、《诗韵辑略》、《祁州志》、《美芹集》等。

潘恩居第在城隍庙东北。其处有条东西向横街，东部一段名梧桐巷，西部一段为安仁里，潘宅就在巷内。其主要建筑有"四老堂"，是他与三个兄弟惠、忠、恕四人退休后，共同聚宴之所。他的次子允端增葺"世春堂"、"慈保堂"、"宁寿堂"、"父母其顺堂"和"豫园"。

豫园，是潘允端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会试下第归来，在住宅西侧的隙地，聚石凿池，构亭艺竹，开始构筑的。以后屡作屡止，垂二十年，至万历五年（1577年）他从四川布政使解职归来，一意经营，以备奉父觞咏其间，故取"豫悦老亲"之意，名曰豫园。园中林壑佳胜，楼阁富丽，冠绝一时，为上海园林之首。范濂夸它是"江南土木的一奇迹"。① 明末，潘氏家业渐衰，豫园也改属他人，园亭渐渐残毁不堪，终成菜圃。现存的豫园，是清代乾隆年间由地方士绅集资购来，重新修葺的，与明代豫园已不尽同。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上海普通农家。少年勤奋好学，又参加农业劳动。20岁在金山卫考中秀才，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应天乡试中第一名。乘间南游粤桂，开始接触西方商人、传教士和他们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三十二年（1604年）会试，中第88名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旋升赞善。在北京与意大利人利玛窦结交，入天主教。从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知识，还自学兵机、屯田、盐荚、水利诸书，以备施用济世。与利玛窦一道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译成的数学名著。三十五年（1607年）父丧回乡守制，三年期满回京，仍在翰林院供职。又依西人熊三拔介绍的西方水利知识，撰成《泰西水法》一书。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军事告急，经略杨镐四

① 《明史·潘恩传》及清嘉庆《上海县志·人物志》。

路丧师，京城震动。徐光启接连上书，要求练兵自效。神宗赞许他的勇气，擢任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派他到通州训练新兵。但当时兵员、粮饷、军械都不足，虽连上十议，也无人支持。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称病辞职。不久，继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又战败自杀，辽阳失陷，朝廷才又想起了他，以紧急军务召回。他上《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提出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的主张，朝廷想重用他，兵部尚书崔景荣却不同意，再次称病告退。天启三年（1623年）再次起用徐光启为礼部侍郎，时魏忠贤专权，要引为同党，他不肯同流合污，遭魏党智铤的谗劾，五年（1625年）又落职南归。崇祯即位（1628年）召还为礼部左侍郎，署理部事。当时，财政窘绌，国用短缺，徐光启献屯田、盐政诸策，得到褒纳，升为礼部尚书。又命他监修新历，诏西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等推算历法，他"熔西人之精算，入大统之型模"，于崇祯四年（1631年）进《日躔历指》、《测天约说》、《割圜八线表》、《黄道升度》等书，完成了贯通中西的《崇祯历书》126卷。五年（1632年）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文渊阁。这时，正值周延儒、温体仁把持朝政，不容他有所作为。入阁仅一年，于崇祯六年（1633年）病卒于官，享年72岁。卒赠少保，谥"文定"。

徐光启作官数十年，廉洁奉公，生活极其俭朴。早年在翰林院为官，口粮还要家人送来北京；后来任礼部尚书，太仓张溥来拜访，见他居室仅广丈，一榻无帷，床上的被子都是家乡粗布的，感叹说："古来执政大臣，廉能博雅，鲜公之比"。死后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他以毕生精力为后代留下《农政全书》、《徐氏庖言》等六十余种著作，是个学贯中西的大科学家。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以"富国必以本业"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基础，系统地论述了以屯垦立军、以水利兴农，积极备荒救荒的三项政治措施，全面地介绍了当时所掌握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并分析和整理了经过自己实验和调查的材料，内容极为丰富，是一部

具有总结性的传统农学巨著，全书于徐光启死后六年（崇祯十二年，1639年）刻刊问世。

徐光启的旧宅在太卿坊，有“后乐堂”、“尊训楼”等构筑，清代已全毁。现在光启路的九间楼，相传是他为父守制之所，意大利人郭居静（又名郭仰凤，其原名为 Lazare Cattaneo ）至上海传教，就住在这里。大南门外康衢里（南市区桑园街）旧有南北二园，名双园，是徐光启退老之居。徐家汇原是徐光启的农产别业，旧有崇祯所赐“儒崇人表”、“文武元勋”二个牌坊，还有董其昌所书“瀼西草堂”的匾额，后来改建成徐家汇天主堂①。今沪西徐家汇南丹路辟有光启公园，以纪念这位古代科学家、政治家，光启墓即在园内。

七、蓄奴和奴变

明代上海地区盛行蓄奴，故顾炎武说：“人奴之风，吴中为甚”②，松江府属，更是吴中之最。大户人家奴仆上千，少的也有十数人。蓄奴，本来是元代蒙古贵族的遗风，元季隐居上海泗泾的陶宗仪说：“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③元初在上海掌管漕运的张瑄，奴婢成群，其中佩金虎的千户、万户，多至数十人，余下可知。明代不仅承袭下这个恶习，且有所发展。苏松地区赋役沉重，人民难以承受，贫穷的只好卖身投靠，充当富家奴仆，稍有田产的，也经不起横征暴敛，甘心献田诡寄，托身豪富庇荫。明代的缙绅之家，大都享受优免赋税的特权，凡士人考

① 《明史·徐光启传》，清嘉庆《上海县志·人物志·徐光启传》，《先文定公行述》。
②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③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取科第，就可以免去徭役；中了秀才，可免2人①。万历年间，董其昌在华亭、上海一带，“有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有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②。当时，华亭、上海二县有功名的人家，雄于江南，田地几乎尽属生员之家，“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③。

奴仆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一入主家，毫无人身自由，唯主人之命是从。据《研堂见闻录》载：“吾娄（指松江）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比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尽管在人格上，要受到这样的屈辱，还情愿卖身投靠，也足以说明明代赋敛之苛刻了。遇上富而不仁的主人，还常常受到斥责、捶扑，甚至被迫害至死。吴履震在所著《五茸志逸》中，记载有上海豪富人家虐奴的两件事：一件是作过御史的秦凤楼，性情严刻，在任时每听到笞挟犯人发出的哀号声，感到很快意，罢官回家，家奴有犯错误的，也用刑具惩罚，奴仆畏之如蛇蝎。另一件是潘恩之父潘奎所眼见，隔河一家富豪，常常鞭挞奴仆，如奴仆畏避潜逃，即诬为偷窃，贿通衙役速捕，陷诸死地，被冤杀的奴仆前后有四十多人。不但奴仆个人一任宰割，奴仆的子女，也要辈辈为奴，任凭主家驱使、买卖。个别奴仆的后代，经过艰苦奋斗，考试中举，仍然改变不了自己的阶级地位，“江左风俗，凡奴婢子折芹者，皆从主姓，无少长悉以叔祖称之，即位通显，不敢抗行。”④这种阶级压迫，如此严酷，如此沉重，主仆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必定有一天会激化起来。

至明末，崇祯六、七年间（1633—1634年）陕西农民起义的队伍，正纵横至苏皖，朝廷从苏松等地调兵去征安庆、守桐城。当时，

① 《明史·食货志》。
② 翁元升等《参豪宦董其昌书》。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④ 董含《三冈识略》。

原驻扎在上海青村、南汇等地的明军将佐，都拥有大批奴仆，奴仆随主出征，常与起义队伍相遇，懂得了不少造反的道理，开始萌发反抗思想。这些人返回上海地区后，到处宣传义军的口号，组织各种道会。家在青村的曾羽王说："乡民顿兴立教，有一拜天、二拜地，三拜朱朝灭，四拜我主兴之语"①。这正是农民起义军发动时期的一种行动。乡民的会道组织虽然暂时还没能形成起义，确已出现跃跃欲试的苗头。

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明福王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政权，颁布的诏书有"与民更始"之句。于是，讹传"与民更始，奴仆辈尽行更易，不复奉故主"。这很可能是奴仆们的附会，想趁清兵南下，一时统治失驭之际，来求得自身的解放。在上海，由县城到闵行、周浦、航头、下沙、大团，以及华亭诸镇，奴仆千百成群，沿家索还卖身契②。川沙乔氏有世仆名顾六，年近60，赤贫无依，首先起来，一呼百应，统领千人，逐一到主家索还文契。对于平日待奴仆刻薄的主人，要杀要打，名为报冤。稍有避不还契者，千人围拥，烧杀立至。徐光启的相府，也没能避免。更有的奴仆，威逼主家请酒、算工钱，稍不如愿，就打骂凌辱③。往日侍立堂下，如今升坐主位，往日动辄挨打，如今动手打主；积年陈怨，于今尽吐。

整个江南几乎同时行动，但起因又各不同。新场镇举人朱襄孙，创立"怀忠社"，以示不忘故明，远近人士要求入社者，来者不拒，惟独不许奴仆、奴裔入社。这种阶级歧视，引起奴仆们的不满，公推叶宅纪纲康君甫为首，杀死朱襄孙全家六口，纵火焚宅。下沙焚劫王省陆，青村杀死镇抚陆剑南，高桥打死陶待诏④。松北的嘉定、宝山也动乱起来，吴淞镇富室瞿氏家奴名宰者，揭竿而起，

①② 曾羽王《乙酉笔记》。

③ 姚廷遴《历年记》。

④ 清光绪《南汇县志》。

聚众千人，手刃其主。大场支家、戴家，南翔李家，都发生类似事情，邻近的昆山、太仓声势更大。一时豪富之家闻声股栗，呼号乞命。

造反的奴仆，很快就遭到残明政权的镇压。苏松兵备道程峋派刘河营游击贝集率兵星夜赶到上海，擒斩顾六为首的数人，又捕杀上海东北郊吴淞、大场、南翔等处的奴仆首领20余人，杖毙数十人。另一游击王某，擒斩新场的奴变首领康君甫等7人。松江知府陈莲石也派通判何源带兵捕杀沈庄奴仆首领李长，又在青村斫杀数十人。上海知县彭长宜，也枷死数人①。经过这一番血腥镇压，上海地区的奴变才平息下来。至清初，奴仆们又向新政权提出"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于子孙"的要求②，也未得到清王朝的同情，终以控斩乱奴的命令，彻底扑灭了奴仆们盼求解放的希望。

八、抗清起义

明末清兵南下，江南各地普遍发动抗清起义，上海地区尤为激烈。

南明宏光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占扬州，渡江进入南京。清军统帅多铎派参将洪恩炳为安抚使来到松江，明松江知府姚序之、同知赵之全弃官离去，华亭知县张大年举城投降。上海邑人王世倬，在扬州降清，改着清装，列卫仪，乘宪轿归来，招抚上海。上海知县彭长宜封金交印于主簿卢志琏，脱身返乡。卢志琏往迎王世倬，王突发急病，猝死苏州，松江府照磨陶涣暂领上海县事。

是年闰六月初，明吴淞提督吴志葵率水军自崇明入泊黄浦，驻

① 清光绪《嘉定县志》、嘉庆《上海县志》。

② 《研堂见闻杂记》。

军米市塘。上海县绅商民众醵金馈送，表示忠于明室。吴志葵领兵入松江郡城，洪恩炳仓惶逃遁。吴志葵打开府县仓库，尽取库藏，燔烧图籍，又令缙绅出资助饷，屯兵泖湖。

闰六月十五日，清兵数十骑间道至上海城外，在北郊徐家桃园暂憩。派人入城要求供应。县民在南明水师官兵的怂恿下，见清兵人马不多，又无战斗准备，以为可以轻取。匆匆集合民众，"一呼千人出城，有披单衣而空手，有穿汗衫而执仗，有跣足而肩竹竿，有衣冠齐楚而袖短械，欢呼笑语，呼朋拉伴，而往打仗焉。"这是一支多么奇特而又可笑的队伍，竟然要与身经百战的清兵相斗，何异于驱羊群赴虎口，其结果不问可知，"清兵看见，纵马而出，劲弩利箭，远射近砍。砍不数人，而狂呼奔走，挤拥而退，有跳水逃命者，仓惶奔窜者，砍伤头臂者，带血淋漓者，哀哭乞命者，绕城喊救者，人践马踏者，惊呆任杀者，不一时而死百人焉。"① 上海县民的第一次抗清起义，宛如一幕闹剧，就这样一哄而起，惨然而败。清兵没有进城，即行退走。

二十二日南明监军荆本彻领沙船百号到上海，声称楚王即位武昌，改元神武，急征粮饷。吴志葵部的把总沈虎臣也率兵到上海助征。荆本彻即命沈虎臣抄没家居县镇的明官宦的家私，并趁机抢掠富家大室，在上海整整洗劫了三昼夜，装满沙船，扬帆入海而去。行前，荆本彻委任明尚书潘恩的后裔潘复(字公权)镇守上海。潘复受命之后，晓谕六门，查点营兵，巡视城池，准备抗击清兵。他还与在上海的西人传教士潘国光联系，请潘协助。潘国光号用宾，不明国籍，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来到上海，得徐光启孙女之助，购买城北安仁里潘氏旧居"世春堂"，改建为天主教会，称"最一堂"，因与潘复结交。

七月初四日，嘉定抗清义师失败，起义人民多冒雨渡浦，逃来

① 姚廷遴《历年记》。

上海。潘复更义愤填膺，决意领导上海人民抗清。因受到主管县事的陶渙阻拦，初六日杀陶渙于城东。二十一日潘复召集县民齐集演武场，举行抗清起义誓师大会，当众宣称：明帅左良玉收复南京，援军即将到来，以固民心。至八月初三日清兵破青浦县城，初四日破松江郡城，二十二日破金山卫城。潘复看到周围抗清据点，已一一失掉，上海孤城难守，率家人逃遁入海，随海盗而去①。上海的第二次起义，尚未接触清兵，已告破灭。

上海东北邻嘉定县的抗清起义，是乡绅明左通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领导的。闰六月十二日清廷颁布薙发令，"留发不留头"的消息一传到嘉定，顿时激起民众的反抗怒火。乡民放火烧掉清兵的战船，揭开抗清的序幕。乡绅侯峒曾听说明太史徐研为护发自杀，十分悲恸，认为"既能死，曷不奋大义！"决心组织义民，保全嘉定城。与好友黄淳耀、渊耀兄弟，上海举人张锡眉、国子生朱长祚等，率领全县人民抵抗。起始，于北门外仓桥炮击清兵，打死清总兵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李成栋闻讯大怒，决定攻下嘉定后屠城。清兵在攻占外围据点后，七月三日大举攻城。初四日黎明，趁大雨滂沱，劈开东门。时守城义民已经三日三夜未离岗守，饮食断绝，疲惫不堪，加上周身被雨淋透，再也无力支撑，抵抗宣告失败。侯峒曾带领两个儿子，逃回家中，跃入后园叶池殉国。黄淳耀兄弟至平日读书的西林庵，题绝命辞于壁，自缢而死。嘉定人民连遭清兵三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死者数万，十数日间，城无人语，野无炊烟。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嘉定三屠"。今嘉定县汇龙潭公园有民国年间建立的"侯黄烈士碑"，以纪念抗清的烈士。

松江郡城的抗清斗争，是乡绅明兵部左侍郎沈犹龙、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部主事夏允彝、举人徐孚远等领导的。陈、夏、徐三人

---

① 清嘉庆《上海县志》，姚廷遴《历年记》。

②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嘉定县志》。

都是云间名士，几社的创办人。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工诗、词、古文，精通经史，落笔惊人。崇祯十年成进士，任官不久京师陷落，事福王于南京，献防江练兵策，谏福王且莫"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宅之内"，不听，乞终养而归。夏允彝与陈子龙齐名，望隆海内，名冠词坛，天下莫不知云间陈、夏。清兵南下，陈、夏共商起兵抗拒，夏允彝认为："是不可为，而义不可已"。闰六月明总兵吴志葵收复松江，沈犹龙召集陈、夏、徐等，共议抗清，诸人共推沈犹龙为主，又邀在籍的中书舍人李待问、麻城知县单恂、罗源知县章简、举人张寿孙、义兵头领蔡乔等，领兵分守各门。又联络吴志葵、黄蜚的水师，在外声援，互为犄角。八月三日清兵攻破青浦，切断郡城与泖淀的联系，又用青白布缠头，诡称是黄蜚所部明兵，诈城而入，未经战斗，城已易帜。守东门的李待问，下城回家，自缢而死。守南门的章简被俘，不屈遇害。沈犹龙出走东门，中箭身亡。蔡乔持80斤铁鞭巷战不胜，遁身入海，投奔石浦名将张名振。徐孚远跳城奔闽，夏允彝投水殉难，陈子龙隐身湖泖，初托迹浮图，组集义兵，继续抗清，后来与夏允彝之子夏完淳密通南明，策动清军提督吴胜兆起义，事泄被执，跳水自杀。城中士民死者2万余人。清兵四门纵火，素有"云间锦绣"之称的郡城，化为瓦砾之墟①。八月初六日吴志葵、黄蜚移师黄浦，准备入海远飏，为清兵追袭于豆腐浜口（后改名得胜港），兵败被俘，不久遇害。

金山卫城指挥使侯承祖也抗清拒守。清兵八月二十二日攻城，守城的藤牌兵素称饶勇，与清兵对战，矢石如雨，清兵登竹梯攻城，守城兵以藤牌蔽矢，随登随砍，坚守三昼夜。城西守卫稍弛，清兵用小船叠于城下，蚁附而登，城遂失陷。在巷战中，侯承祖马蹶被俘，就义于华亭县学前。弟承祚、长子世禄、承祚子世鼎俱从死。世禄被俘时，身中四十余箭，遗诗说："身沾雨露心难死，肉委泥沙骨

① 清《重修华亭县志》，姚廷遴《历年记》。

亦香”①，时人闻之泪下。

九月以后，抗清起义转向上海乡间。东南乡有孔恩领导的抗清起义发生。孔恩字贞伯，上海周浦人，为本县庠生。弘光时，招募乡民开垦海中瞿山，孔恩倾家应募，招结百人至瞿山，羁留月余，因无法生活，败兴而返。时清兵已至上海，孔恩等逗留在海滨护塘一带。当时，六团湾的渔民、盐民，都不愿薙发归顺，正想聚兵反抗，值孔恩率众到来，慷慨陈词，以大义激发群众，数日之内聚兵千人。于是，杀牛宰羊，祀告天地，宣布起义。一举攻下新场镇，旗开得胜，万众欢呼，揭竿而起者数万。孔恩率领他们攻打川沙、南汇城，仓促之间，无暇练兵，又缺坚锐兵器，乌合之众，攻城月余不下。清兵总督李成栋九月二十日黄昏发兵，自上海县城渡浦，乘夜行军，天明已到川沙。自张家栅开刀杀起，不分男女老幼，一直杀到南汇北关为止。义军四散逃匿，沿途百姓横遭杀戮，死者不下万人，孔恩也溺死河中，起义遂被残酷镇压②。此后，上海四乡村镇，家家户户都用黄纸书写“大清顺民”四字，贴于门上，老幼都剃头编辫，衣着窄袖，非复昔日光景了。

① 清《重修华亭县志》，《金山县志》。

② 曾羽王《乙酉笔记》，《南汇县志》。

第四章　江海通津　东南都会

一、清初高压政策对上海的影响

清初，浙闽沿海尚存南明残余政权。当时，张煌言、张名振等奉鲁王监国于浙江舟山，郑成功举义旗于福建沿海。他们仍有恢复故明王朝的志向，常常率兵从海上来袭。江南各地的明遗民，也暗通声气。清朝廷深以为虑，因此，对江南施行高压政策，企图以压服的手段，消除隐患。清政府采用的办法，诸如以"通海罪"捕杀江南地方士绅和知识分子，以"禁海、迁界"的办法，阻断海上交通，以"奏销案"褫夺知识分子的功名，如此等等。这对上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度造成相当严重的危害。

顺治二年(1645年)在松江府设提督，首任提督为吴胜兆，掌管苏、松、常、镇四府的军务。四年(1647年) 吴胜兆接受太湖义军明进士吴易、周谦等的策反，与舟山南明政权联络，约定于四月十六日举兵反正。苏松地区的士绅陈子龙等也同时聚众起义。舟山答应派兵从海上接应。六月十五日明定西侯张名振帅水陆军78000人，战船千艘从舟山到达崇明，夜半海风骤起，战船自相撞击，尽皆沉没，张名振仅得小舟自双阙返回舟山①。吴胜兆等待舟山兵不至，他的副将詹天祥知道起义已经失败，就和都司高永义等擒吴胜兆，解送江宁(今南京)斩首。驻守上海的吴胜兆部下参将佘某也

① 清《重修华亭县志》，郑达《野史无文》。

同时就擒被杀。

上海地区受上述事件株连的人很多，初谋起义签名的人有1000多，被以"通海罪"逮捕的同谋犯，却有数千人。一时刮起告讦之风，人人自危①。现在尚可查到的、上海县死于此役的有名人士，有乔景星、乔世忠、翁英、沈济仲等数十人。金山抗清名将侯承祖的次子侯世荫，也被株连。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刚刚十七岁，曾为吴胜兆起草檄文，也被逮捕，押送江宁。他在江宁狱中写成《南冠草》乐府诗数十阕，当押赴刑场，路过钟山时，还谈笑自若，大呼："好山色，某今日得瞻高皇帝孝陵而死，尚复何憾！"② 凛然就义。今松江县荡湾村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供后人追念。

顺治十年(1653年)明定西侯张名振又引兵入吴淞，时苏松提督张天禄正征闽未归，由苏州总兵王璟掌管军务，驻兵上海小东门外。九月初，张名振与王璟战于东沟，王璟大败，退保上海县城。明海艘鱼贯入浦，旌旗蔽空。王璟不知所措，清兵纷纷逃跑，闭城奔窜。明水师至闵行，掠取所需，满载出海。事后，王璟羞愧成怒，出告示恫吓人民说："逆贼张名振志图抢掠，突入江浦，……乃有无知奸猾之徒，从而猖獗，有执梃而阻遏官兵者，有包戴网巾者(明代发式)，有讹言惑众者，有恐吓官府者，种种悖道，本应荡洗，今姑网开一面，令尔自新。"③ 告示也从反面说出上海人民心怀故明的情绪。至月中，江宁巡抚周国佐提督军务，率兵来到上海。王璟深恐上海人民揭露他畏缩逃避的丑态，竟诬报上海城内百姓皆"通海"，激怒周国佐，定谋屠城，准备自浦南至静安寺，尽数烧杀。上海知县阎绍庆和乡绅、原遂安知府曹垂灿等听到这个消息，急忙赶到抚台行营，长跪陈情，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保，全城人民才免遭屠戮。

清朝廷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颁发禁海令，"严禁沿海省

① 清褚华《沪城备考》。

② 叶嘉莹《夏完淳传》，清光绪《青浦县志》。

③ 清嘉庆《松江府志·武备志》，姚廷遴《历年记》。

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应置重典”①。这道命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当时，上海东南沿海一带人民，主要靠捕鱼和织网为生，以青村为例，约有渔船五、六十艘，一日两潮，捕得大鱼值数十金，小鱼也值银数两。无船之家，就肩挑贩卖，辗转获利。织网，内河有缯网、扣网，外洋有希网、长网、拖网，无论男女，无田可种者，都会织网，其利也数倍于种田。故在海禁初期，百姓想方设法抗拒。“鼎革后，海禁尚未甚严，即岁奉严密犹得易船为筏，人可备食诸味。至顺治十六、七年并绝开排之例，人仍于涂次张网。自苏、宜两大人巡历后，家有藏网者以叛逆论，而民遂无可下手矣。”② 不许片帆下海，则乘竹筏下海；不许开排，则于海涂设簖捕鱼；还可以尝到海鲜。但是，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北伐失败，退踞金门、厦门，收复台湾，游艇入犯，飘忽南北，清朝廷增加恐惧心理，派兵部尚书苏纳海、侍郎宜理布巡历江南、浙江、福建，进一步严饬海禁，下令迁界，从此，不但不许渔民有船，也不许渔民有网。“康熙二年，海中鱼盛之极，漂入海滩，居民与兵丁争抢之，然居民拾者，一见兵丁即委去，惟恐罹于法也。”③ 这年六月抚道差官在护塘外的树木上，悬挂界牌，上写“居民过限者，枭示！”连到海滩拾鱼，也遭禁止。素以“海产错异”见称的上海，再也见不到海味了。滨海人民既失海洋之利，遂断度命之源，只好改行转业。

顺治十七年（1660年）对东南沿海下迁界令，首先在福建沿海施行。“顺治十八年迁沿海居民，以垣为界，三十里外悉墟其地。”迁界令非常严刻，命令一到“沿海居民即日必须携妻负子登道，原有房屋尽数烧光，片石不留，人民枕藉于途，死亡过半。”④ 江南比较缓和，上海地区因为“松属沙滩，素号铁板，船不得近，不在迁弃之列”。但在海滨广设墩台，增加兵力。“松江郡设墩台十七座，每墩

①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

②③ 曾羽王《乙酉笔记》。

④ 《福建通志·海防篇》。

间悬六里，达于南汇。康熙二年以内墩离海过远，声息难通，乃建外塘斥堠，巡防瞭望，内外相资，为他堡所不及。”① 实际上，沿黄浦设立的墩台，实有数十座之多，“沿海自吴淞海口而入，率浒筑土墩，高方数丈，上匝土墙，内盖小房，谓寨台”。其后，“更架木为台，九里一建，置鼓其上，一闻寇警，鼓声相应，则官塘要路，在在有之，不但沿浦也。”② 上海人民虽然免于迁界之祸，但是，浙、闽等省因迁界缺欠的税课，都摊派在苏松人民头上，上海百姓饱尝征敛之苦。

明代松江府的赋额，累年拖欠，习以为常。顺治十五年（1658年）给户部的上谕说：“江南无锡等县，历年钱粮欠至数十万，地方未见有大破积弊征比完结者，皆由官吏作弊，上官不行严察，且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今责成抚按大破情面，彻底清察，如仍徇庇，别经发觉，即治抚按以溺职之罪。”③ 这道严厉的上谕一下，地方雷厉风行起来。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上海近邻的嘉定县，乡绅生员欠粮，有数十人被兵备道擒拿，锁于尊经阁中，还未及处分，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驾崩，被擒者都被放回。是年六月江宁巡抚朱国治造抗粮册送部，内开未完赋税的文武绅衿 13517 名。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应严加惩处。于是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县的乡绅张玉治等 2171 名，生员史顺哲等11346名，俱行降革。其中属松江府籍的有 2000 多名④。这就是清初轰动全国的奏销案。

奏销案，实质上是清廷对江南乡绅和知识分子怀明抗清的一种惩罚手段。本来想将这些人全都解送北京，后来稍加缓和，规定在旨到之日能交纳完毕者，免于提解。于是，各家纷纷筹措银两，到处借贷。当时，惟一可以借到银子的地方，是清兵军营。向营兵

---

① 《江南通志·海防篇》。

② 叶梦珠《阅世篇》。

③ 顺治《东华录》之十。

④ 顺治《东华录》及嘉庆《上海县志》。

借钱，真是向豺狼谋食，明知其害，而事急不容多虑，往往借十两，扣除利息只有九两，再估足纹银，不过八两，换钱完串，就剩下七两多了。一月以后，营兵追还欠债，“引类呼群，万亩之产，举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没之，尚不足以清理，鞭笞絷缚，窘急万状。”① 最后，只有弃家逃走。有田人家都忧心忡忡，情愿以每亩一两的价格，卖田交赋，但无人过问，甚至降到每亩五分，也没人要。上海的旧乡绅，多在此案中破产；举贡等知识分子，也尽数被革除功名。此后，数年之间，苏松的风气为之不振。松江知府张升衢上疏说：“一经题参，玉石不分，淹滞至今，几近数载。遂致怀才抱璞之士，沧落无光，家弦户诵之风，忽焉中辍，一方文运，顿觉索然，岂非文教之衰微，而守土之扼腕也哉！”②

清初南来的文武官员，多是凶狠残暴之徒，也给上海人民带来不少痛苦。顺治三年，任苏松提督的马进宝是个杀人如麻、无恶不作的恶棍，每次巡历沿海，居民妻小都倾城而出，避之数十里外。每年春秋二季，各营纳银五百两，才能免巡。他以私通南明为由，诈取大户资财，多至数百万两。③ 不仅武夫如此，有的文官也贪婪凶残，杀人如刈草菅。康熙初年，任松江知府的张羽明，奢侈淫纵，无所不为。上海西郊泗泾东北龙珠庵有个僧人，是明安昌王之子，改名徐二官，薙发隐匿，为奸人告发。张羽明认为这正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以谋逆案上报，株连乡里至数百人，问凌迟者 27 命，斩绞者七、八十人。周浦镇西生员蔡宿一，家为巨富，也被株连，全家籍没，身死狱中。为此案流徙满洲的家族，有五、六百人。张羽明乘机勒索无辜，取得不下万金。④

自晚明繁荣起来的上海城市，经过这样的摧残，变得萧条冷落，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被扼杀。当时，任松江知府的

---

①② 叶梦珠《阅世篇·赋税》。

③④ 曾羽王《乙酉笔记》。

鲁超，就毫不隐讳地说："……又以近海受盗，缮城隍、修斥堠，民力凋蔽而岁比不登，近海之田几同斥卤；又海禁严切，四民失利，故往时为大家富室者，今多萧然悬罄矣。"①

二、田赋变化　县境变迁

清初革除了明末"冒滥浮加"的各种赋税，税额稍有减轻，但浮粮仍然繁重，而且催征严厉，给上海地区的人民和地方官吏都造成很大的痛苦。后来，为加强征比，分担逋欠，遂将各县一划为二，建立许多新县。

清代的田赋，是依照明万历年间的旧额征收的，据说是因为"时宫阙灰烬，百度废弛，明季赋额屡增，而籍皆毁于寇，惟万历故籍存"② 的缘故。当时，松江全府岁赋为平米 120 余万石，每亩科3斗6升5合不等；上海县为平米 388399 石（内征粮平米 341365 石，折粮平米 47034 ）③。这个数目虽比明代重赋有所减轻，但为数仍然过多，是人民难以持久承受的。明代虽有虚额，却不责令必完，清代则严令地方官完纳，否则难免参处。因此，顺治年间岁岁压欠，积累的欠额总数竟超过千万。前后来任的官员，也往往席未暇暖，已褫职撤换。顺治十二年（1655年）任松江知府的李正华，是清初少见的好官，地方人士评论地说："布衣蔬食，官舍肃然，而吏事精勤，案牍山积，纤悉必就为裁决。"④ 但也困于积欠粮额过多，想多有几个人分担责任，十三年（1656年）奏准朝廷，中分华亭为二县，以西南境的枫泾、胥浦二乡及仙山、集贤、华亭、修竹四乡之弱半，取古汉县名，设立娄县，与华亭同郭分治，设治所于华亭水次

① 康熙《松江府志·序言》。
② 《清史稿·范文程传》。
③ 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
④ 叶梦珠《阅世篇·宦迹》，姚廷遴《历年记》。

仓，后迁寿安桥西故明司业朱大韶宅。至十四年（1657年）李知府还是没能逃过“催征积逋不力”的惩罚，被降职而去。

从顺治二年平定江南，到康熙初年，苏、松二府的田赋年年拖欠，各级地方官都认识到，越积越多，积重难返，问题更难解决。康熙四年（1665年）江宁巡抚韩世琦上疏，请求减轻苏松浮粮，他说：“窃恐继此以往，日甚一日，民髓愈枯，民力愈绌，若终欲盈，而不亟图变计，则鸠形鹄面，啼饥号寒之黎，不胥填于沟壑，必离散于四方。”① 说得非常恳切，既说出百姓的痛苦，也指出问题的严重，但未得到批准。此后，又有巡抚马祜、给事中严沆、御史孟雄飞、左都御史吴正治、布政使慕天颜、给事中任辰旦等，屡次陈请减轻苏松赋税，都无结果。二十四年（1685年）江宁巡抚汤斌又上疏说：“两府与常、镇、嘉、湖壤地相接，而赋额轻重悬殊。即江、浙、闽、楚并号财赋之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当大省百余州县之赋，民力所日绌也。”要求“蠲免无益之虚额，而收垦田之实课，”以实现“野无不耕之土，户无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赋税充而国用足”。② 这些为民请命的奏疏，终于引起康熙皇帝的注意，二十九年（1690年）下谕说：“苏松浮粮一事，朕刻刻在心，此明之弊政，岂可踵而行之，其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以闻。”经大臣们的议论，以“旧额不应裁减”为由，再次驳回陈请。终康熙之世，上海地区田赋始终未减。

到雍正三年（1725年）兼领户部事宜的怡亲王，看到解决苏松逋赋问题的时机已到，因为新登上皇帝宝座的雍正，正想在人民中间广播恩泽，以取得拥戴，遂奏请酌减苏松地区税额。雍正当即准奏，命将松江府正额税银蠲免 15 万两；上海县减去 49700 余两。当时，百姓真感到皇恩浩荡，竞为雍正诵经立碑，盖造龙亭，聚会演戏。雍正还下谕说：“蠲租赐复，不过行吾心之所安，使斯民共沾实

① 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

② 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

惠，并无一毫市恩之念。”① 后来，到乾隆二年(1737年)因苏松浮粮仍多，再次减额 20 万两；上海县减 13169 两；是年又减办白粮917石，减银 1112 两。经过雍、乾两朝减赋，上海县实征本色米 72356 石有奇，折色银 84173 两有奇②。

雍正二年(1724年) 六月两江总督查弼纳也想采取增加县分，分担逋负的办法，解决地方官员的不安情绪。提议：江南为财赋重地，而苏、松、常三州之县，尤为繁剧，请将所属的十三县各分置一县。是年九月得旨，依议分县。雍正三、四年间，先后分华亭县的云间、白沙二乡之大半，设立奉贤县，置治所于青村千户所城；分娄县的枫泾、胥浦二乡，设立金山县，置治所于金山卫城(篆馆镇，一名小官镇)；分上海县长人乡大半设南汇县，置治所于南汇嘴千户所城；分青浦县的北亭、新江二乡，设立福泉县，与青浦同廓分治(至八年又撤福泉重行并入青浦)；分嘉定县东部滨海地区设立宝山县，置治所于吴淞千户所城。又将苏州府辖的太仓州，改为直隶州，领镇洋、嘉定、宝山、崇明 4 县。这样，上海吴淞江以南地区已增至 8 县。吴淞江以北、昆山县以东，则属太仓州管辖。

经过这次变迁，上海县仅剩下高昌乡和长人乡的少部分，田亩数也减少到 7749 顷 66 亩。县境的四至变为：东到大海 50 里，西到青浦 36 里，南到华亭 72 里，北到太仓州宝山县界 12 里，东西长86里，南北宽 90 里③。至嘉庆十年(1805年)上海县又经过一次分划。这年，两江总督陈大文奏请分上海县东部滨海地方设立川沙抚民厅，治于川沙堡城。划上海县高昌乡、长人乡各一部份，南汇县长人乡部份，归川沙抚民厅管辖。上海县境本有海岸线 17748 丈，经过这次划分，上海县境已远离海岸，境内再也无海可见，仅称近海而已。上海县还剩下原来长人乡的十分之三，高昌乡的十分

①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
② 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
③ 清嘉庆《上海县志·界至》。

之九，缩小到元代立县时的三分之一不足。田亩缩减到6894顷52亩。全县人口，据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清查，男丁为248025口，妇女为236162口，合计总数为527472口（内中还包括优免人丁183口，当差人丁43102）。① 此后，上海县的疆域、田亩、人口数，稳定了一段时间，再无多大变化。

三、设立海关后的经济发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克塽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二十四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困境中，渐渐复苏。初设江海关于华亭县澉浦，因公廨狭窄，二十六年(1687年)移驻上海县城宝带门内。在海禁初开的数年内，仍有许多限制，如只许沿海居民500石以下的船只出海，所去之处，停泊港口，往返日期等，都有规定。当时，出入上海港的船只不多，设关五年之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全年关税收入只有22000两。因为税收金额甚微，朝廷也不太重视，只委任上海县就地协理；知县只派家人去关上收税。至雍正三年(1725年)江苏巡抚张楷才奏请委派苏松兵备道监收。时苏松道驻在苏州，仍由上海县办理。

至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完全解除，海区大开，国内外商船往来逐渐增多。苏松道远在苏州，实在无法控制，道台王澄慧才在上海大东门内圈地14亩，兴建道台衙门，至九年工成。乾隆元年(1736年)又将太仓州并入苏松道，改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人们简称苏松太道，或海关道、上海道、沪道。上海江海关统辖的海口，原为六百里内的二十四处，雍正七年以庙湾等六处归并淮海道，变为十八处。即：吴淞、浏河、七丫、白茆、徐六泾、福山、黄田、澜港、

① 清同治《上海县志·户口》。

黄家港、孟河、任家港、吕四、小海口、石庄、施翘河、新开河、当沙头、漂阙①。

乾隆年间的上海港，已经相当繁荣了。“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樯比栉。”②“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③至乾隆中、晚期，聚集在上海港的船舶，已渐增至三千多号。其中以江南的沙船居多；南方粤、闽、浙的估船、乌船、蛋船次之；北方山东、直隶的卫船较少；间有东洋日本、朝鲜和西洋安南、暹罗等外国商舶。当时，国内出海贸易的商船，都得先请海关及地方官的双重批准，依成式造船，烙号刊名，领取执照，才放出海，出口时检验，回港时销号。外国进口船只也须注册，规定滞留期限，如果因为风信关系，不能按期返棹，须得到地方官衙的同意，具保给照，出航时吊销。

清、日之间的商船往来，开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来往频繁，到康、雍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舶，一年已达八十余艘④。这些商船，差不多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称作“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上海港。故时人说：“邑(上海)商船有愿行货海外者，较远人颇便，大概商于浙、闽及日本居多。”⑤从上海出港到日本的沙船，大者可载货 50—60 万斤，中等的20—30万斤，小的万斤左右。从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银、铜、海产、漆器、珍珠等。开往西洋安南、暹罗的洋船，比沙船容积大，结构坚，大者可载 80—90 万斤，一般也可载 60 万斤左右。从上海运

---

① 清同治《上海县志·海关》。
② 清乾隆《上海县志·序言》。
③ 叶梦珠《阅世篇》。
④ 木宫泰彦《日中交通史》。
⑤ 叶梦珠《阅世篇》。

去丝绸、棉布、陶瓷、运来砂糖、苏木、槟榔、樟脑、檀香等，每年也有数十艘。

上海港进出的外国商船，远不及粤海的广州、闽海的厦门，也略差于浙海的宁波。江海关的岁入税额，居四海关之末。乾隆十八年(1753年)各关的岁入情况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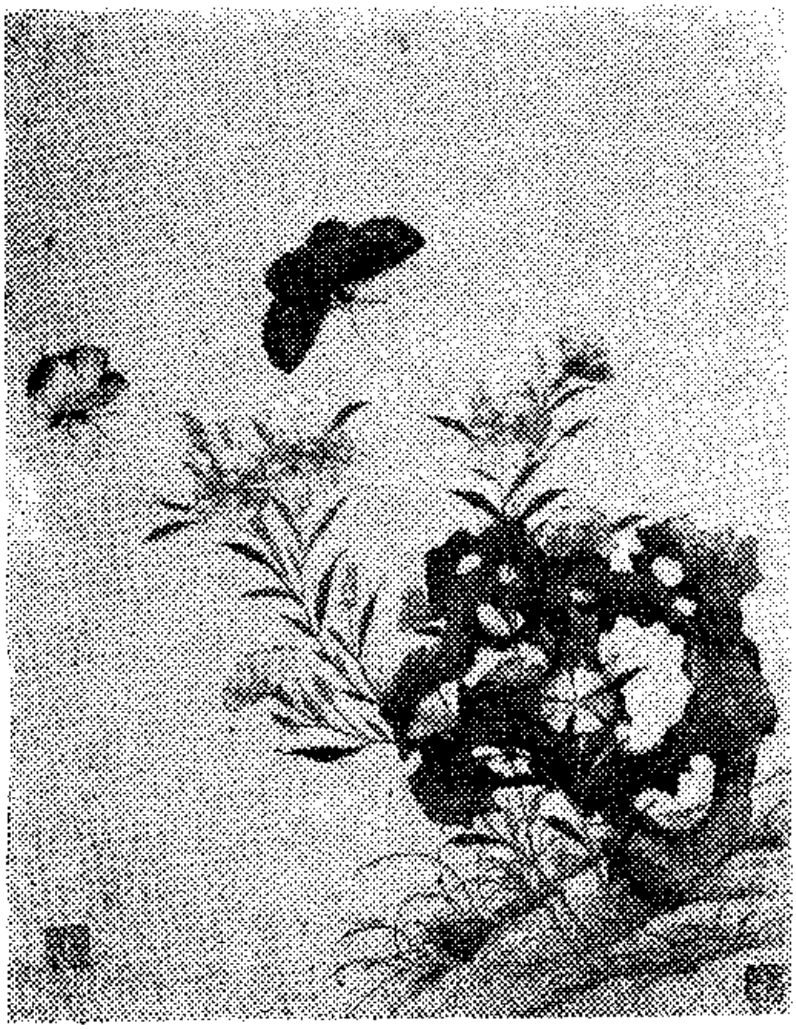
粤海关　五一五、一八八两
闽海关　三一四、四四八两
浙海关　八七、六五四两
江海关　七七、五〇九两①

当时，欧洲来华商船，主要集中于广州一港，南洋商船多至厦门，江浙两港入泊的多是国内沿海船只，和少数邻国的商舶。故江海关所订《商税征收规例》，也只规定：安南商船货税进出口，俱以七折征收；东洋(日本)商船货税，进口以六折征收，出口不论货物，概收银120两。另收船钞，按船身梁头丈尺科征，一丈以内，每尺征钞银一钱五分，一丈以外，每尺征钞银二钱二分。但对去日本的海船另有规定，二丈以内，每尺征一两，二丈以外，每尺征二两。②大概从东南亚一带来的商船，皆可援引安南为例；从东北亚来的商船，皆可援引日本为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廷下令："严禁洋船再到浙海，止许在粤收泊交易"，这个禁令对上海港并无多大影响。因为当时欧洲商船，尚未到过上海，日本、安南等邻国商船，也不在禁令范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议定，每年去日本办铜2百万斤，需铜本银384000余两，特许对外禁止出口的生丝、绸缎，经由浙江乍浦、江南上海，向日本出口③。国内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地往来上海的船只，更数以千计。国内外运来的货物，一部份从上海直接运往苏州、杭

① 《大清会典·户部关税》乾隆十八年奏销册。
② 清同治《上海县志·海关》。
③ 《大清会典·兵部海禁》。

州、镇江、南京销售，大部份汇集上海港口，等待转口贩运。这时的上海港，已经成为国内外、南北方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至嘉、道年间，随同海运漕粮之路的重开，沙船运输业空前发展，上海港更趋繁荣。当时，黄浦江中自南及北，五、六里路空泊无隙。“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①



露香园顾绣

上海港的发展，更促进了上海地区原有植棉和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雍、乾以后，上海农民几乎已专仰植棉和纺织为生。邑人张春华说：“吾邑木棉远及数省，业农者罕见种稻。”② 后来，还出现了专门租田植棉的棉农，故当时已有花田、花租之名。植棉面积扩大，原棉产量增长，促成上海棉花市场的活跃。“郭稍东而南，几于比户皆售花者，名

① 嘉庆《上海县志·风俗》。

② 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

花市。清晓村人肩花入市，有司其价值者，两造俱备，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其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① 还有专门为闽、粤商人收买花衣的洋行，"棉花之上白者，碾去核曰花衣。洋行铺户代闽粤诸贾贱价收之。"② 到了秋季，闽粤商人"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而去。上海的棉布，比前代产量更高，花色更多，质量更好。前代极负盛名、秘而不传的"丁娘子布"，上海三林塘已能大量生产，故有"娘子鸣机丁氏布，美人刺绣顾家工，不胫走关中"的歌谣。顾绣，也是上海独有的一种工艺美术品，是明尚宝丞顾名世家人，从内庭学来的绣法，当时称为绣画，尺幅之素，价值数金。各省商人，都在上海城内设局收购布匹，外国商人也派人来上海收购"南京布"。如嘉庆十四年(1809年)从中国运到美国的这种布匹就达三百七十六万多匹。自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到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每年运往美国的"南京布"多时达八十万匹，少时也有二十万匹。③ 当时，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欧、美、亚市场，很多也是从上海港运出的。上海地区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已经显示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正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四、沙船业的发展与行会组织的建立

沙船业是从元代海运漕粮开始在上海兴起的行业。明代因海疆不靖，沙船业的发展停顿不前，嘉靖年间的御倭斗争，曾使用沙船在沿海巡逻。清初随海禁开放，海上交通日益频繁，沙船业迅速发展，至乾、嘉时期已经成为上海地区经济的一大支柱。

---

① 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

② 杨光辅《淞南乐府》。

③ 方诗铭、刘修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

沙船，是为适应北洋海道水浅沙多的特点制造的一种平底船。因为它可以出没沙洪之间，空载时又须装沙压舱，故名沙船。上海港与山东、直隶、关东的交通运输，主要是使用这种船。它是随北洋海运的兴盛而兴旺的。据当时人的著述说："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① "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担。"② 可见当时北洋海上运输量之大。

初时的沙船，载重量不超过1000石（约50吨）。到清雍、乾之季，旧有沙船的数量与载重量都已不能适应运输的需要，经过改革，新造的沙船，其载重量增加了一、二倍。乾、嘉年间聚于上海黄浦的沙船，约有3500—3600号，大者可载官斛3000石，小者1500—1600石③。按此数计算，上海所有沙船的一次总运载量，已经达到25万吨到30万吨之间，这在当时，是一支运输能力很大的商船队。这支船队承担着自上海至山东芝罘、直隶天津、关东牛庄、营口等北洋诸港的运输业务；还承担浙、闽、粤等南洋诸港及长江沿岸苏、皖、赣、鄂、湘、川等省以及海外诸国转口商品的运输。一般月余往返一次，一年航行三、四次，其货运量居上海港货物总进出量的首位。

清道光年间，沙船又承担起海运漕粮的任务。清初，漕粮北运都通过运河，至嘉庆初运河淤塞，漕船受阻。朝臣提议重开海运。朝廷考虑造船设官，用费浩大，迟迟未能实行。道光五年（1825年）协办大学士英和上《海运疏略》说："海运累有成议，全漕似未可轻试，而臣窃以为暂雇商船分运漕粮，则不虑此。闻上海沙船有三千余号，大船可载三千石，小船可载千五百石，多系通州、海门土著富民所造，立有会馆、保载牙行，运货往来，并不押载，从无欺骗等情。关东一岁数至，沙线风信是所熟悉，不致歧误……由上海至天津，

---

①③ 包世臣《安吴四种·海运南漕议》。

② 谢占壬《海运提要》。

风顺七、八日可到，至迟不过旬日，从无阻滞，较之运河，迅速倍蓰。"① 这个奏疏得到批准，又经两江总督琦善、江苏巡抚陶澍等商定具体的海运章程，于是，重开前代海运漕粮之路。

根据英和的提议，在上海雇用沙船1562艘，装载苏、松、常、镇四府和太仓州属漕粮1429000石，白粮81500石，从上海港运出，抵达天津港交卸。自道光五年冬至六年夏，全部运齐。由于海运稳快，上下称便，得到朝廷的表扬。当时官给的运费不低，船商有利可图。规定："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四钱，且载时每石加耗米五升，卸载时以平斛收。"② 船商们都踊跃受雇，这也为上海沙船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上海港沙船的拥有者，都是本县及邻近地区的富商，是早期的商业资本家。当时，造沙船一艘，大号的须银万两，中号的也需数千两，"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③ 上海、崇明、通州、海门等各帮沙船巨商中，有船数艘者，极为普通。如崇明殷氏，侨居上海，有沙船十数艘④，资本至少也有一、二十万，还算不上巨富。崇明东乡的富户"率以是起家，沙船盛时多至百余艘"⑤，如汤源兴、沙益、张元利等。张元隆"立意造船百只，以百家姓为名"⑥。造船百只，如无百万家资，那是不敢有此设想的。上海港内3500—3600号沙船的总资本，少说也有三千数百万两白银，可以算得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资本了。一艘船一年往返的运费收入，可得数千，甚至上万，除船上水手分得百分之一、二外，其余都属船商所有，其赢利也是极高的。上海的豪富以沙船商为首。

---

① 清同治《上海县志·海运》引《海运全书》。
② 包世臣《安吴四种·海运南漕议》。
③⑤ 齐学裘《见闻谫笔·海运海漕议》。
④ 姚廷遴《历年记》。
⑥ 吴贵芳《古代上海述略》引张伯行《正谊堂集》。

随着沙船业的发展，在船上工作的耆老、舵工、水工等船员迅速增加。大号沙船有舵、水手三十余人，小号沙船也有十五、六人，平均以20人计算，聚居在上海港的船员，也有六、七万人。港口码头上，还有靠双手和双肩，装上卸下的大批搬运工人，他们多是上海附近地区的农民，脱离生产流入城市，转而成为早期的码头工人。这种行业，在当时称为箩夫、杠夫。他们分行分界，由夫头带领工作，一般流民不得随便插入。箩夫、杠夫的队伍，也有一、二万人，再加上来自全国的商贩、牙人，进进出出，显露着上海港运输贸易的昌盛与上海县城市的繁荣。

上海地区的沙船和浙、闽、粤的乌船、蜑船、估船，往来碇泊于上海港的数量越多，随船而至的商贾、船员在上海停留寄居者也渐增。于是，一种以传统宗法制度为依据，以地域观念为核心的组织——会馆，在上海出现。会馆成立的宗旨是“以敦乡谊，以辑同帮”。最早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海和崇明籍船商，在上海城东马家厂建立的商船会馆。继之，又有乾隆十九年(1754年) 安徽徽州宁国人，在斜桥南建立的徽宁会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福建泉州人、漳州人，在咸瓜街建立的泉漳会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广东潮州人，在洋行街建立的潮州会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浙江宁波人，在荷花头建立的浙宁会馆。船商们很富有，会馆建筑得十分堂皇富丽，会馆内都供奉航海保护神——天后圣母，还建有为酬神演戏而修建的戏台和看楼。《泉漳会馆兴修碑记》阐述建馆设保护神的目的说：“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照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天后生日，各会馆都举行祭祀大典，内外灯彩辉煌，笙歌喧沸，热闹非常。

当时，从欧洲来的外舶，主要集中于广州；从南洋来的商船，集中于厦门。商品货物再由闽、广转运至上海。船商携带着各种货币，须在上海存放、兑换，于是，钱庄业也在上海迅速兴起。通用于

各地的货币，有银两、有制钱、有番银。番银也称洋钱，即西班牙、荷兰、墨西哥等国家的银元。外国商船"率以番银当交会"①。各国银元与中国银两、制钱的比价，时有升降，"乾隆五十年，洋价一千二百文"②。做兑换生意的钱庄，遂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乾隆中叶组成钱庄总公所，以联合钱庄业的力量，统一兑换率和利率，互相支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钱庄总公所集银千两，买下豫园内园的晴雪堂房屋，作为全行业集会之处。到嘉庆二年(1797年)参加钱庄总公所的业户，已达149家③。

上海港商品流通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市场的扩大和国内外商品在上海的竞争。商人们为维护本行业的利益，垄断经营特权，和统一商品质量、价格，在钱业公所成立后，又有鲜肉业公所、药业公所、京货帽业公所、北货行公所、成衣公所、花糖洋货业公所、油豆饼业公所等纷纷成立。这些公所，虽然还未能跨出封建经济的藩篱，但确是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迈出了很大一步，成为后来建立商会的基础。

许多行业公所成立后，也选择邑庙豫园内外作为集会之处。因之明末早已荒芜殆尽的豫园，就由阖邑商民集资购买下来，划归城隍庙管理。当时，城隍庙东首已有东园，就改称豫园为西园。又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构筑，到乾隆末年已粗见规模，即如今日之豫园。园外围绕城隍庙形成的庙会市场，后来也渐渐固定下来，发展成杂货商场，即今日城隍庙的雏形。

五、城市发展　文教事业兴盛

海上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上海通商城市的形成。从

① 嘉庆《上海县志·序言》。
② 《淞南竹枝词》。
③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钱业承办祭业各庄名单》。

康熙中叶到道光初期的二百年间，上海港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数一数二的重要港口，上海县也成了江南最繁荣富庶的县份，文教事业空前兴盛。时人曹晟在《觉梦录》中说："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区区草县，名震天下。"并非是自我夸耀。

明末清初，上海县城还是一个仅10条小巷的蕞尔小邑，到清中叶的嘉庆年间，城内已有大、小街巷60多条。既有南北、东西走向，纵横交叉的大道，如新街巷、太平街；又有横贯县城的薛家浜、肇家浜、方浜等河流。街巷的发展，已跨越城墙，在大小东门外的港区，方浜入浦口以北，出现了两条南北走向的里、外洋行街；从洋行街往南，又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大街，为如意街及外街；再往南，便是内外篾竹街和以大豆、棉花交易而得名的豆市街、花衣街；其外便是滨浦大街①。当时，上海城的东南一隅，非常繁华，人烟稠密，市井喧阗，尤其每年春初，闽、广商人乘舟载货来沪，码头上船舶密集，帆樯如林，浦岸上摩肩接踵，人声喧腾；到了深秋，棉花上市，花衣街上市场活跃，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故时人有"一城烟花半东南"之赞。

洋行街（即今阳朔路），是闽、粤商人萃集、洋货商号林立的一条新街。那时，欧美和南洋诸岛国的商船，都在广州、厦门入泊市易，再由闽、粤商人用通航外洋的大船——洋船，运到上海来销售或转口。经营洋货的商号，被称为洋行，商人也被称为洋商。洋行出售的货物品种很多，上海城内普通人家也都开始购用洋货。有一首《淞南乐府》说："日本花巾脑沃雪，暹罗藤管口喷烟"，正反映出这种情况。当时，洋行街常象集市一样，熙熙攘攘，行人络绎不绝。洋行街的贸易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商品交流市场的形成，正迫使自然经济解体，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

经济繁荣，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兴隆。乾隆元年（1736年）苏

① 清嘉庆《上海县志·图说》。

松太道翁藻来上海就任，他很重视人材的选拔与培养，以教育为当务之急，三年（1738年）带头捐俸，购下明陆深旧宅东隅之地，建立启蒙书院，培育幼童。十三年（1748年）又和知县王侹共议，以康熙年间籍入官产的原西人潘国光寓所，即明潘恩世春堂旧址，建立申江书院，聘清名儒凌如焕、谈起行等执教，使县中读书子弟除以举业为主外，兼学实用的学术。这个书院为朝廷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材，如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纪昀齐名的文史学家陆锡熊，就曾肄业于此；与音韵、考据学家嘉定钱大昕、王鸣盛等以诗文共称的“乾嘉江南七子”中的赵文哲、黄文莲，也都毕业于申江书院。到三十五年（1770年）巡道杨魁又扩地增建，改申江为敬业书院。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分别为书院题写“果行育德”、“海滨邹鲁”的匾额。道光八年（1828年）巡道陈銮又在县南蕊珠宫，即南园或也是园的内园，设立蕊珠书院，从敬业书院选取优等生36人深造，取其中十八人为“登瀛上舍”。

宋元以来，上海即以“文秀之区”称誉江南。明代，云间画派兴起，上海董其昌为其巨擘。清初，董门弟子贾淞、沈士充、顾若周继之而起，称为“云间三家”，顾昉字若周是南汇下沙人，善绘山水，骨气清秀，一时与“四王吴历”齐名（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本常熟人，寓居上海三十余年，康熙间入天主教，当过司铎，是最早引入西洋画法作画的画家，名噪一时。乾嘉之间，上海海道畅通，人文会萃，各地有名书画家也多挟艺来沪，上海艺文之风更加兴盛。当时任上海道的李廷敬，崇尚风雅，交结名流，常常集聚海上书画名家于平远山房书写、绘画，更推动了上海地区的艺文发展。当时，书法有张智锡、莫秉清、王睿章，以“三铁笔”著名，他们得秦章汉篆之法，笔力浑厚遒劲，有“虬尾盘屈”之势。王睿章是南汇航头人，其子王南石善绘山水，高古清雅，近于倪云林。嘉道之后，西洋绘画渐次移入，给上海画坛带来一股新风，终于融中西土洋于一炉，形成上海画派。

李廷敬还常常招致一些诗人筵集，赋诗、联句，李筠嘉是其中的一人。他集投赠诗篇辑为《春雪堂集》六卷。李筠嘉还是清代上海的最大藏书家，在邑东慈云楼藏书六千余种，有藏书目八卷。

音乐、戏剧进入上海，始于明末，盛于清初，清中叶已普及开来。弹词的前身为弦索，发端于中州。明末直隶人张野塘，工于弦索，因罪谪发太仓卫。当时，昆山人魏良辅善南曲，偶至太仓听到张野塘唱歌，极感美妙，遂与野塘定交，后来又把会唱南曲的独生女儿，嫁给张野塘为妻，使南、北曲融成新音。张野塘更定弦索，使与南曲相近，改三弦之式，身稍细而鼓圆，以文木制之，名为弦子。其后又有杨六者，创造"提琴"，仅两弦，以生丝张小弓，贯两弦之间，相轧成声，与三弦合奏，其声柔曼婉扬，于是成为江南名乐。清初，善弦索的有范昆白、陆君赐、郑盛琦、胡章甫等①。当时分苏州、太仓、嘉定三派，以苏州清音最好听。陆君赐是华亭顾大申家的常客，遂传苏州清音于松江、上海，到乾、嘉年间已在上海普遍流行。

除此之外，还有十不闲，或称十样锦、十番乐。使用的乐器有：鼓、笛、木鱼、板拨、钹、大铙、小铙、大锣、铪锣等。合奏时，其音始繁而终促，嘈杂难辨。后来，又加上笙、管、弦等，创为新十番，大概就是江南丝竹的先声。那时，端午节黄浦江中龙舟竞渡，声乐齐鸣，"此奏十番，彼唱清曲，龙舟绕船游戏"②。

最早传入上海地区的戏剧，是江西弋阳腔。晚明嘉隆之际，有弋阳人来到松江唱戏，"一时翕然崇高，弋阳人遂有家于松者"③。上海则有潘允端从苏州购来的一班唱昆曲的小戏班，一时被称为"雅丽"。苏州昆曲在上海盛极一时。到清乾隆末年，原来流行于浦东乡间的花鼓戏，一名东乡调，开始进入上海城。演唱花鼓戏，男敲锣，女打鼓，合以胡琴、笛、板，所唱皆"淫秽"之词，宾白也用土

① 叶梦珠《阅世篇》。
② 杨光辅《淞南乐府》。
③ 范濂《云间据目抄》。

话，村民全能通晓。初时，屡遭官府的禁止，但民间却很喜爱这种通俗的演唱，故"演必以夜，邻村男女键户往视"。① 禁者自禁，唱者自唱，观者自观。后来，改良剧情，发展成正戏。当时，各地的滩簧，如锡滩（锡剧）、甬滩（宁波戏）等，相继传入上海，人们认为花鼓戏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剧种，就称之为本滩，后改名申曲，现在称为沪剧。

清中叶，上海城内在地方官绅的协作下，还兴办起各种社会福利事业。育婴堂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设立的，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又进行扩建。曾在雍正朝任御史的曹一士极力赞助，并撰文说："念彼貌然，独非人子？谁顾谁覆，等于敝屣，我既收之，我为若父，若不得生，曰我杀汝。"② 后来，经费不继，吁请海关资助。上海道李廷敬定例，每年由海关公项内拨钱补助。同善堂创办于乾隆十年（1745年），后因资金困难而停顿。嘉庆五年（1800年）上海知县汤焘捐钱购置北郊地，与邑人朱文煜等创办义冢，题名"同仁"；县里的绅商为推广这个义举，共同捐款购下乔氏房屋，改建为同仁堂，于嘉庆九年（1804年）正式开设，依靠各行业捐款，办理各种社会慈善事业。

上海城市的繁荣，又带动周围乡镇的发展，四郊市镇也已星罗棋布。明末上海地区有名的市镇，不过20几个，处于发展中的尚有30几个，总数近60个。到清代，在雍、乾、嘉、道四代新兴起来的市镇，增加80多个，总数达到151个③。由于外地人口大量流入，上海县户籍也明显增加，据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户籍册报，全县城乡人口总数已增加到528442口④。如果再加上水上流动人口，总数已超过60万。有60万人口的县份，当时在江南算得上是人口

① 杨光辅《淞南乐府》。
② 同治《上海县志·善堂》。
③ 王文楚《上海市大陆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④ 清同治《上海县志·户口》。

次多的大县，在全国也居人口最多县份之列。

总之，清嘉庆、道光年间，上海港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商港；上海县也已经成为我国江南的商业城市。它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较早地步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并以转口商品，通过东西两洋和长江等内河，冲击着沿海与内地之间的闭锁状态，与各地区发生了联系。一些新生事物，如船队、会馆、钱庄、洋行等不断在上海出现，标志着作为沿海通商城市的上海，正迸发出巨大的潜力，试图冲破封建制度的樊笼，向近代化的方向前进。

六、英国人觊觎上海

上海在乾、嘉年间，已经取得"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称号。它控江踞海的地理位置，优越的港口条件，开始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注意。当时，垄断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正为广州海关对外商规定的种种规则而不满，为海关官吏的勒索行为而愤懑，急于在粤海以北，接近丝、茶产地的江浙沿海，开辟新的通商口岸。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东印度公司派出数批人员，沿粤海北行，向闽、浙沿海作探索性的寻觅。不久，就有人向该公司献议说：上海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商港。

是谁首先注意到上海呢？据裘昔司说，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毕谷(Pigou)。① 而据另一位美国人马士的记载：当时该公司名为毕谷的职员共有三人。一是查礼·爱德华·毕谷(Charles Edward Pigou)；二是威廉·亨利·毕谷(William Henry Pigou)；这两个毕谷是亲兄弟，虽与中国商人发生过业务上的联系，但俱无随船来华的记载，而且时间也较晚。第三个毕谷，名弗里德利奇·毕谷(Frederick Pigou)，他确曾受公司之命，转移广州港的商业障

① 裘昔司《上海通商史》(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e Shanghai)。

碍，另寻新的通商口岸。他先后管理过奥古斯塔号(Augusta)和玛丽公主号(Princess Mary and York)两条船，于乾隆二十年前后到过广州和宁波，并曾接触过从上海去的商人，但他本人也没有到过上海①。

也有人提到佛林德(James Flint)，即洪任辉②。此人曾在广州学习汉语，熟谙中国内情。乾隆二十年（1755年)东印度公司曾命大班哈理逊(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辉从澳门乘船赴浙海开辟新港。他们停泊于定海，后抵达宁波，请求宁绍台道，愿于浙海关纳税，许其运货到宁波市易。浙海关当然"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闽、粤海关则有异议。乾隆皇帝认为"此之所利，即彼之所损"，并从政治方面考虑，传谕说："复多一市场，(外商)杂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③命以增征关税的办法，阻止英商赴浙。但英国商船于二十一、二十二年(1756、1757年)连年运货到宁波贸易。朝廷看到"不禁自除"的政策不能奏效，遂于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正式宣布："严禁洋船再到浙海，只许在粤收泊交易"。二十三年(1758年)无英船赴浙海。二十四年(1759年)东印度公司又因广州"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决定再派洪任辉随船去宁波定海市易。洪任辉到达定海，浙江地方官不许他前往宁波，饬令折返广州。洪任辉见势难如愿，就扬帆而去。不过，并未返回广州，而是逕赴天津，要上北京告御状，指控粤海关的勒索陋规和行商的拖欠货银。乾隆皇帝是个要面子的人，得到洪任辉的控状，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下谕"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并以"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将洪任辉押解澳门，圈禁三年④。英国商人开扩北方口岸的试

① 马士(H.B.Morse)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② 徐蔚南《上海商埠的开辟》。

③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

④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

探活动完全失败了。洪任辉虽然曾多次往来浙海，但也无到过上海的记录。

东印度公司虽然已经知道上海港的存在，但直到此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在洪任辉失败之后，英国人改变了作法，决定通过外交途径，派正式使节访华，要求增辟商港，在其使节提出的开港名单中，仍未提到上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使来华，要求增辟宁波、舟山、天津为商港，并请求拨给靠近珠山（舟山）的海岛，和靠近广州的地方各一处，供英国商人居住。这个要求，正是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设立租界的一个原始思想。它一提出，立即遭到清廷的严辞驳斥："天朝尺土俱归版图，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暎咭唎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① 这次碰壁，并未使英政府绝望。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再度派阿美士德（Lord Amherst）来华谈判。仁宗皇帝对英使的到来，不甚欢迎，未及觐见，就领赍回国。英国人想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新辟港口的企图，也告失败了。

英国投机商人并没有等待外交谈判的结果，早在洪任辉的活动失败后不久，，就有走私货船从舟山群岛直趋上海附近，到达钱塘江口的小羊山，避开中国海关的干涉，进行海上走私贸易。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地方官奏准，对在小羊山的商民严加限制，规定："江南小羊山地方，如有赴山佣工、贸易者，地方官给予印票，守口员弁稽查验放，仍会巡洋及守口员弁严行稽查，如有无照民人偷漏赴山者，将疏漏之守口员弁参处。"② 小羊山是个居民极少的荒僻小岛，为何突然会有许多人赴山佣工、贸易呢？正因为有走私洋

①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② 《大清会典事例·兵部绿营处分例》。

船的到来，才招引趋利之徒，冒险而至。上述的朝廷规定，并未被认真执行。因为嘉庆六年(1801年)又重申前令，并对渎职官员规定了具体的惩处办法："江南省小羊山地方，如有无照民人偷漏赴山者，守口员弁照无照人民出口例；一、二名者罚俸一年；三名以上降一级留任；五名以上降一级调用；十名以上降三级调用；巡山员弁亦照此例议处。"① 这次的惩处规定，依然没能阻止住偷漏赴山者，走私船只仍不时到来。至道光年间，有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即以此岛为据点，对上海进行间谍、走私鸦片等活动。当时载运鸦片的走私船只，不断开到，烟土源源运进上海。道光十八年(1838年)两江总督陶澍曾奏报，在上海南关外等处，仅一次就查获窝藏鸦片41000余两②。后来，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攻击乍浦、吴淞，郭士立也是从此岛提供各种情报的。故菲利浦绘制的《历史地图集》(Philips'：《Record atlas》)明确地标记小羊山为"郭士立岛"。

偷偷摸摸的走私，当然不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开辟通商口岸的企图，英国政府早已着手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上面说到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受命到中国沿海侦察。他携带着《圣经》、药品、航海图和测绘仪器等，从曼谷搭乘一艘福建货船，前来中国。这时的郭士立"改用了中国姓名，穿上中国服装，冒充中国人。"据郭士立自己说："我早在离开暹罗之前，就已归化中华帝国，成为其国民了。我采用了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士立，偶尔也穿中国服，已被认可为该国一份子"③。郭士立乘的船，经过海南岛、厦门、台湾、定海、宁波、上

① 《大清会典事例·兵部绿营处分例》。

②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记》。

③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引郭士立《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C.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and 1833)

海，终点是天津。他一路上记录航海路线和港口水域的情报，了解各停泊口岸的民俗风情和经济情况。他本想潜入北京，刺探朝廷的情报，但苦于不会北方语言，所以在天津搜集到所需情报后，即于同年十月返回澳门，向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人详细报告了中国沿海各口岸的情况，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东印度公司决定派郭士立陪同该公司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取中国名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船，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 二月 出发，六月二十日凌晨闯入吴淞口，换乘一条小艇，擅自开进黄浦江。一任吴淞炮台守军鸣炮警告，郭士立深知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命船继续前进，直抵上海城下。上海港的重要地位，完全为英国人所确认，他们充分注意了上海的特殊有利条件，足够地估量了它的发展前途。于是，上海成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军舰打开中国大门，夺取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

第五章　在炮火中开埠

一、“阿美士德”号远来

17 世纪中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建立的时候，欧洲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时，各洲的海上交通已经逐渐畅通，新兴的资产阶级加紧向世界各地开拓扩张，寻求殖民地。清朝政府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所没有经历过的课题：西方资本主义逐渐东来。

面对中国所处的世界大势，清朝政府全然无知。其总的趋势，是对于对外贸易限制加紧，如前章所述，英国几次企图打破此种格局，均未成功。从 19 世纪中叶起，中国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连绵不断。清朝统治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清朝政府更加强了它的闭关政策，希望通过闭关杜绝外来势力和国内反清力量结合的可能性。这反映在唯一的通商地广州，所订贸易章程繁杂，限制日多，而西方商人的走私和海盗行径的加剧也从另一方面增加了广州对外正常贸易的困难，促使清朝的粤海关当局对外商重申各种禁例。

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大班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e)决定派遣一条叫做“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的商船，从澳门出发，顺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勘探，寻求新的通商地点。

“阿美士德”号原是英国布莱克沃尔船厂造的一艘 506 吨的巡

洋舰。东印度公司用2500美元从它的委托人怀特曼洋行(Whiteman & Co.)租赁来运载各色细布、羽纱和棉花，当然也少不了走私鸦片。船上配有70名水手，名义上由礼士(Captain Rees)任船长，但实际上负责这次远航的是一名叫林赛 (Hugh Hamilton Lindsay)的英国人①。

林赛时年30岁，是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的一名高级职员。为了便于活动，他根据自己教名的谐音，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胡夏米。船上的另一名重要人物就是郭士立。郭士立后来是鸦片战争时期屈指可数的一名"中国通"，"阿美士德"号航行以前，他就已在中国沿海布道传教，广泛接触中国百姓。如前文所述1831年，即"阿美士德"号航行前一年，郭士立曾搭乘中国商船作过一次从广州到天津的航行，并在同年8月20日左右到达上海，虽然逗留短暂，没有机会和上海地方官员接触，但他对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国内贸易的发达，印象极深，认为上海是清帝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②。

由于谙读汉语和先已在中国沿海作过航行，郭士立化名郭甲利，在"阿美士德"号上充当翻译和随船医生，事实上他是林赛最重要的副手。

这两个人久在澳门，恐怕被人认出，所以除了各用化名外，还伪称"阿美士德"号从孟加拉湾开来，因商务关系驶往日本，不让清政府知道他们受雇于东印度公司。此前，东印度公司利用"阿美士德"号在广东沿海走私鸦片，获利甚巨③，但这次航行船上却未装一箱鸦片。东印度公司寄希望于这次侦探活动，不希望发生意外的麻烦。

---

① B·Lubbock: The Opium Clippers，第97页。

② C.Gutzlaff，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1833，第109页。

③ A.H.Clark，The Clipper Ship Era，1843—1869，第58页。

2月26日，“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由于风浪，在广东海面滞留了一个月才到达粤闽交界处的南澳岛。4、5两月和6月上旬，林赛和郭士立在福建、浙江沿海侦探，先后到厦门、福州、宁波活动，与当地官员接触，均无结果。6月13日，“阿美士德”号离开宁波继续北航，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上海。

英国船只在闽浙海面的活动，早已引起清朝地方官员注意。“阿美士德”号尚未进入江苏附近海面，上海官府已接到浙江官府的告急咨文。浙江方面估计该船在宁波无所获，可能北上江苏，要求长江和沿海各口一体防范。为此，苏松太道一面张贴告示，严禁沿海居民与夷船交易，一面在长江口附近作了相当的防范，准备堵截英船进入长江。

6月19日，“阿美士德”号终于出现在长江口外。欧洲商船驶入这一地区，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林赛和郭士立几次试图从海上作业的渔民中找到一个引航人，尽管出了重金却都失败了，没有人愿意为这艘官府明令禁止的外国商船领航。于是，林赛等人一面测量航道，一面尾随中国渔船，摸索着向西北方向行驶。

20日凌晨，他们到达吴淞口。林赛和郭士立等将“阿美士德”号停在吴淞口外，换乘一条狭长的小艇，擅自闯入黄浦江。吴淞口守军鸣炮示警，林赛等全然不顾；船至黄浦江蕴藻浜口，清政府派船堵截，令其立即驶离上海。林赛以必须面见上海道亲递公文为理由，强行前进。船行二十余里后，林赛等见无人阻拦，就登岸察看当地农民生活情况，然后继续开船。下午四时，他们终于在上海县城东门外的天后宫登陆，在黄昏中进入熙熙攘攘的上海县城。

颇费了一番周折，并且完全是用武力撞开上海道署大门后，林赛一行见到了上海知县，接着，又在天后宫见到了上海道台。尽管上海地方官员们再三要求他们离沪，并拒绝作任何商谈，林赛等还是强行将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呈文递给道台。

这篇呈文，可以看作是英国资产阶级对上海最早的通商宣

言：

英吉利国船主胡夏米谨禀苏松太兵备道大人，转报上宪。现在大英国船已至此，并进口欲买卖。船装载洋布、大呢、羽毛等货。旧时大清与大英国贸易微少；但此百年间增加十倍，因此两国彼此获大益。向来每年小船七八只至贵国，如今每年大船七十、八十只到中国，带本国的货物来，买运贵国的茶叶三千万斤及湖丝等货，银几百万圆。又，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国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无奈其买卖大为赚钱。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而希冀贸易于中国北方之埠头沿利。倘贵国的商，买我本国的货，我们买贵省的茶叶湖丝等货，则两下均受益。又加国之饷，增民之生活计。商贾皆欲藏于县之市，又添两大国友道结交之义。此是彼此至重之事，是以我恭禀大人俯念以此事情，转报上宪；如可始创，贵省与本国生理始虽少微，亟添甚大，而开大利路于将来矣。禀赴大人台前，万望施行。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①。

上海道台对此事的反应，是紧抱闭关政策下清朝地方官员对一切涉外事务的典型态度：根本拒绝接受呈文。在林赛等人的坚持下，道台才将呈文录了一份副本，于次日给了林赛如下的答复：

天朝钦命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监督海关吴批示，该夷船人胡夏米等知悉，据禀，希冀贸易，转报上宪等情，查该夷船向无在上海贸易之例，未便违例据情上转。合行驳饬，原呈掷还，即速开船，遵照旧例回粤贸易，毋得迁延自误②。

---

① 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卷上，第47～49页。又，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部分，1833年第410号，第73页载有该件的英文文本，惟个别数字略有出入。

② 许地山编：《达衷集》，卷上，第49—50页。又，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部分，1833年（410号），第79页。

林赛拒绝接受原禀，并马上复书辩驳，文中夸耀大英帝国广阔的地域、无上的权威，声言英国决不能容忍上海道在批文中所用的侮辱性字眼，并坚持要求将原呈转递两江总督。

接到林赛的复函后，或许为信中的措词所慑，上海道台改变了倨傲的态度，并派人要求追回他的批文，但林赛等人却以为道台的复函是"中国外交的一份最好的样本"①，拒绝交回；上海道台还要求查看宁波官府给"阿美士德"号的公文，以便他照式复制，这种荒唐的要求遭到林赛的耻笑。此外，林赛指责道台在批文和言谈中使用"夷"字作为对英国的称呼，对此，上海道回函称：

> 中华自上古圣人该书传世，书内说得明白：南方谓之蛮，东方谓之夷，北方谓之狄，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今，总是照此称呼。况中华舜与文王都是大圣人，孟子尚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岂是坏话？是你多疑了②。

对于这样的引经据典，林赛不甘示弱，由郭士立起草了一份回函辩驳。前已述及，郭士立是早期的中国通，所以下面这封由林赛出面的回信照样引经据典，来说明"夷"字确是对英国的凌辱：

> 大英国船主谨悉知夷为称外国人的人称，大英国民人东夷。一者：贵国的古人称朝鲜东夷，夫英吉利民人的本地，向大清国西方。二者：大英国的属地方向大清国东西北南。三者：《大清会典》卷十一称苗、羌、蛮、貊等，居在中国与夷人同样。四者：苏东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由此观之，称夷人者，为蛮、貊而已矣。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

① C. Gutzlaff，前引书，第211页。

② 许地山编：《达衷集》卷上，第52—54页。

人，激怒结仇①。

这场“夷夏之辨”的争论虽似琐碎，却颇能代表当时清政府虚骄外交的特点，以及西方殖民者有备而来的逼人气势。结果是，上海官府在公文中用“英国”代替了“夷”。双方在会见礼节上也展开了一场争论：上海官府坚持“夷”人不得在中国官员前坐下，林赛等则要求平等待遇。相持不下，最后达成双方都站着谈话的妥协。

然而就在这些似乎可笑的礼仪之争纠缠不已时，林赛等人已抓紧在上海活动。由于此前欧洲船只从未到过上海，所以他们对黄浦江水道的测量就特别仔细，这时“阿美士德”号已驶进吴淞口。测绘工作由礼士亲自主持。为了侦探吴淞口的清军防备情况，林赛等在上海县城逗留不到二天就乘船来到宝山。在宝山和吴淞，林赛等获得了许多有关清军内部情况的资料，并很轻易地就得到了参观吴淞炮台的机会。

他们一边参观吴淞炮台，一边感叹：清朝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防卫废弛的情况令人吃惊。他们奇怪地注意到，吴淞要塞内的墙上虽然挂满了箭，却没有一把弓，士兵告诉他们，弓全部放在对岸——这样如何应急？他们还注意到清军使用的武器极不一致，刀、矛、火枪杂用②。郭士立这样叙述他所见到的吴淞炮台：“这是一个巨大的建筑，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安置大炮，然而一支最微不足道的军队就可以占领它。因为他们不懂得设防的技巧，却一意倚靠那些防御土墙的厚度。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就发现炮台的结构都落后于欧洲。……弹药非常糟糕，枪炮到处乱扔，安置的方位也错。大炮的火门往往很大，开得毫无比例，我确信其中有些炮口对炮手比对他们所要射击的目标，更容易发生危险。中

① 许地山编：《达衷集》卷上，第52—54页。

② C.Gutzlaff，前引书，第216页。

国是升平日久了，他们所有的军事装备都已陈陋不堪。”郭士立甚至感叹，这个巨大的帝国究竟靠着什么才能维持一统①？

上海官府煞费苦心不让林赛等在沪买卖，对他们刺探军事情报却毫不防备。24日下午，上海官府允许林赛等旁观五百多名吴淞驻军进行的一场检阅。江南提督亲自主持检阅，并在事先向林赛等声明演习并非针对他们。林赛后来报告东印度公司说：“中国军官待我们非常客气，允许我们查看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人只有一把刀和一面盾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火枪全都很脏，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林赛对这次检阅的结论是：“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②

7月1日，林赛、郭士立带同“阿美士德”号上的另外两名人员，驾一叶小舟，从吴淞口偷偷驶往崇明。他们在崇明逗留一天，四处活动，散发传教小册子和通商揭帖。林赛、郭士立事后津津乐道他们这次“探险”，盛赞这个世界最大的冲积岛屿的富裕和人民的好客，对崇明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沿海地区投石问路的代表，林赛等人最关心的是上海的贸易情况。林赛自己说，他一到上海，就被进入黄浦江的众多的船只所深深吸引。在吴淞逗留的日子里，林赛有心数着进入黄浦江船只的数目，统计的结果是，一星期内有400多艘从一百到四百吨位的大小船只，经过吴淞口，驶往上海县城。林赛注意到，这些船只大多数来自中国北部的天津和奉天等地，装载着那些地方出产的面粉和大豆。还有大量福建船涌入上海，平均每天30或40艘，其中许多船只来自台湾、广州和东南亚各地。林赛等认为，上海享有中国南北贸易中转站的地位，由于中国南方

---

① C.Gutzlaff，前引书，第214—215页。

② 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部分，1833年(410号)，第207页。

省份的商船一般不能越过长江北驶，上海的地位使它可以垄断国内贸易。

在上海县城、宝山、吴淞等地，林赛、郭士立等日夜活动于市廛里巷间，观察百姓生活，了解各货行情，并随时作了记录。古老的市镇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批行动古怪、经久不去的外国人，自然引起了市民们的好奇，围观者不绝。林赛等便乘机散发各种揭帖，向百姓解释"我远商来到此处，带有本国之货物，欲做买卖而已"，要求"四方君子，不必怀疑心，乃彼此以友心相待，则可使两国均受益矣"①。有的揭帖还夸耀英国的强大，幅员辽阔，"忻都斯坦古国（即印度——引者）各地方皆入英国版图矣"云云②。

与此同时，上海道台、松江知府、上海知县都分别出示告示，严禁百姓与外商贸易。为了制止"阿美士德"号上的人员上街购物，上海官府几次派人给船上送去大米、鲜肉、蔬菜、水果等各种食物，使他们在沪生活无虞。但林赛等拒绝接受官府的赐予，每日上街购物，这既是为了了解商情，更主要的是表示他们享有通商买卖的权利。

"阿美士德"号上的人员作为不受欢迎的人，处处受到冷遇，他们在上海继续逗留的理由只是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两江总督的答复。六月底，上海道台、江南水师提督、松江知府等地方文武官员齐集吴淞，商量对策，结果决定采用"不加理会"的办法。官府除了派几名官员对林赛等进行监护外，不再限制他们的行动；但每日劝说他们离开上海。同时，官府进一步严厉限制人民与外商的交往。

完成了在宝山、吴淞一带的侦探后，林赛等于七月五日又回到上海县城。知县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答应再次向道台转达他们

---

① 许地山编：《达衷集》，卷上，第61—62页。

② 《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故宫博物馆《史料旬刊》，第13期。

通商的要求。7月7日，上海道台回文仍要求“阿美士德”号迅速离沪。

至此，林赛等觉得在沪作更多的逗留已无意义。他们在上海买了一些苏州的黑绸和南京的棉布。8日，“阿美士德”号离开吴淞口，继续北上，先后到过山东威海卫附近的刘公岛、朝鲜、琉球，最后于1832年9月4日回到澳门。

“阿美士德”号这次到上海，共逗留18天。由于上海地方政府坚决执行清廷的闭关政策，林赛等没有能够得到任何令他们鼓舞的消息，可以说是废然而去。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这些代表人物终于进入了长江流域，到达了处于中国海岸线中点的上海，仅仅这一点，就在以后的历史上逐渐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林赛和郭士立回到广东后，分别向东印度公司当局提交了详尽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一致强调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国内贸易的发达，以及上海一旦开放对欧洲特别是对英国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报告中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清朝政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和外交的虚弱。针对上海道台对“阿美士德”号来访先硬后软的态度，林赛满怀鄙意地写道：“这样的人就是遍布帝国的满清官员：屈从招致侮慢，反抗和挑战会引出礼貌和友善的表白。”① 郭士立在叙述他们向上海道强递呈文时写道：“看来当我们坚决要求时，每一件事都成为事实，而当我们谦卑地请求时，那怕是最轻微的事情也遭到拒绝。”② 这些话对西方人士认识清政府是很有影响的。1870年，一个英国报人在上海的一次颇有影响的演讲中尚引用林赛的上述评论，以证明与清政府交涉必须持强硬态度③。鸦片战争后几十年还有人记得这些东印度公司先遣队员的话，那么，在英国发动侵华

---

① 《阿美士德号在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部分，1833年(410号)，第78页。

② 同上，第13页。

③ H.Lang,Shanghai,Considered Socially，第12页。

战争之前，它们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

林赛在9月7日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董事会作正式报告时说："作为一次商业上的投机，我们的航行必定被认为部分地失败了，因为我只卖掉船上的一部分货物。"① 其实他却是满载而归的，一份详尽的中国沿海航行图已经绘制出来，关于中国沿海城市的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物产贸易以及清朝的政治、军事情况的报告已迅速地通过东印度公司送到英国本部。一向未被认真注意的上海，在英国资产阶级的视野内清晰起来，开放这个中国口岸的要求也逐渐明确起来。"阿美士德"号来沪后十年，英国资产阶级终于通过鸦片战争达到了开放上海的目的。

二、屈辱的上海之战

"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航行后不到两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1834年4月，该项法案生效；7月，英国派驻中国的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J. Napier）到达澳门。此后，德庇时（J.F.Davis）、罗宾臣（G.B.Robinson）、义律（C.Elliot）相继担任商务监督。这些变化，表明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日益迫切。从派驻商务监督起五、六年间，面对清朝政府坚决的闭关政策，英国政府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方针逐渐酝酿成熟。1840年6月，英国终于以所谓禁烟问题为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

在广东，因抵抗派林则徐等严密设防，英军未能侵入广州，遂调兵北上，转攻厦门，又被闽浙总督邓廷桢率军击退。1840年5月，英军沿海北犯，攻占浙江定海，8月，英舰八艘闯到天津海口。清廷

①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致广州分行大班信件，1833年5月8日，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部分，一八三三年（410号），第3页。

震动，道光皇帝以主和派琦善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议和，将林、邓革职。1841年1月，英军在谈判之际突然攻陷珠江口沙角、大角炮台，道光皇帝又决定对英宣战，派皇侄奕山赴广东主持战事，将琦善锁拿回京。5月，奕山率军抵广州，初小胜，后大败。5月27日，奕山乞和，订立《广州和约》。

为了给北京的朝廷施加压力，达到发动战争的全部目的，英国侵华军从1841年8月起，由广东出兵北上，在我国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发动一连串攻势，先后占领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1842年3月，英军放弃宁波，继续北上，攻占江浙海防重镇乍浦；六月初，英国舰队到达江苏省的长江口外。英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夺取中国东南重镇上海了。

闽浙烽火日紧的时候，清政府估计到英军可能北上骚扰长江口，在江苏省的沿海地区作了一定的防范。

首先是两江总督牛鉴受命亲往长江口防守，驻于江苏省上海县。牛鉴，甘肃武威人，进士出身，任两江总督前是河南巡抚。牛鉴为人，愚庸懦弱，象大多数儒生出身的清朝官员一样，不谙军旅之事，对准备与之交战的英国，更是一无所知。他单一地强调吴淞口的重要性，认为“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①。乍浦失守后，牛鉴奏请道光拨兵增加长江口的防卫力量。5月24日起，他从上海出发，周历巡视江湾、杨行、宝山、吴淞一带四天，作了战备布置。布置之一，是在吴淞口修筑海塘，“拨兵三百名，各戴五色面具，衣虎衣，隐身塘后，时跃出土塘之外，互相跳舞”②，竟想用这种愚蠢的方法，吓退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军队！这位总督大约以为他是与什么原始部落打仗，其愚昧无知由此可见。

清政府的另一安排是调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任江南提督，驻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9。

② 袁陶墨：《壬寅闻见纪略》，《鸦片战争》(三)，第94页。

守吴淞口。陈化成，号莲峰，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时年已70余。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在福建抗英，曾用连环轰击，使入侵英船"随拒随走，情形狼狈，立向外洋逃驶"①。陈化成早年就从事"捕洋盗"，以后又督办水师多年，故在清军中，是一个难得的比较懂得水战的将领。

调任江南提督后，陈化成不避风雨寒热，居住在吴淞口的军营里，与士卒同甘苦。有记载说他，"冬则踏雪巡营，夏则海潮作时，帐房水深尺许，未尝一移营就燥地"②，故号令严明，军纪整齐，军中士兵爱戴地呼他为"陈老佛"③。《穿鼻条约》订立后，英军一时没有北上，有人建议吴淞口撤防，但陈化成始终警惕不懈，"时擢小舟往来海滨风浪中"，严密注意敌情。

吴淞口正式开战前，陈化成对战胜颇具信心，生死也已置之度外，曾对牛鉴云："外洋所恃不过枪炮，某经历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炮弹中入死出生者数数矣，今日火攻，颇有把握，愿以身当之，苟得挫其锋，援兵一鼓，西贼不足平也。"④ 牛鉴据以奏报道光说"提督陈化成心如金石"⑤。

当时长江口的防备情况大致是：川沙境内有东炮台，宝山境内有西炮台，夹峙吴淞口。从东炮台到上海县城，中隔黄浦江，由此登陆，是弃易就难，英军轻易不敢从事；且川沙临海地带，地形较复杂，船只容易搁浅，不是防守的重点。吴淞镇外的西炮台，虎视江口，俯扼要津，夺取西炮台，可从陆路直达上海县城。因此吴淞炮台是英军入侵上海的主要障碍，当然也就是清军需要全力防守的主要阵地。

---

① 《清史稿·列传·陈化成传》，卷39；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第292页。

② 夏燮：《中西纪事》，卷8，第1页。

③④ 王拯：《陈将军画像记》，《龙壁山房文集》，卷5；《鸦片战争》(六)，第291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0。

关于吴淞口的设防情况，牛鉴曾这样奏报道光皇帝："由西炮台而至宝山县城之东门，土塘约有六七里之长，其深港又较远四五里，处处有炮，即处处可击，处处并有接应之兵，彼亦断无飞越数丈壁立之高峰，豕突犯我之理。再由东门以至小沙背一带，深港去岸已有十余里之远，此处止有预备陆战，截其来路，而我兵已层层设炮，节节埋伏，彼不能携带大炮犯我内地，虽有火枪火箭，亦断不能敌我之大炮抬炮，与夫百余尊虎蹲炮位，此理亦不辨自明。且我之火箭喷筒毒火之类，均已预备齐全，堪资得力。"① 他显然认为吴淞口的战备已经十分周密。

牛鉴在向皇帝作上述报告时，战争已迫近了。6月9日黎明，长江口外出现了星星点点的英国战舰，大小共约20余艘。这些战舰逐渐接近吴淞口。这时，牛鉴接扬威将军奕经檄，令其对英军"权宜羁縻"。牛鉴奉命，"遣弁赍札赴洋船"求和，被拒②。一场战争势所难免了。

宝山知县周恭寿以吴淞口外洋面辽阔，密请牛鉴毋守海口炮台，而在黄浦江稍深处的东沟、江湾两处设伏，牛鉴不从③。这时，黄浦江左岸吴淞口的守备情况是，陈化成守海塘，徐州总兵王志元守小沙背，周恭寿守宝山。其中只有陈化成一支是劲旅，周恭寿只不过作为县令坐镇宝山，而王志元所率驻防小沙背的守军500人，本来是浙江提督余步云部下的溃兵，被牛鉴奏请留下，守此要害，兵纪极坏，"终日骚扰，居民汹汹"，战争一开始，一触即溃。黄浦江右岸的东炮台，由川沙营参将崔吉瑞率兵守卫，在砖筑的码头上，架有27门炮④。

牛鉴在战前吹嘘长江海口防备如何严密，布置如何周当，但英

---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0。
②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
③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4。
④ 高龙信编：《江南传教史》，卷3，第24页。

国方面一开始行动，马上暴露了吴淞口防卫的松弛。6月11日晚，英军乘着雨夜阴霾，对吴淞炮台以及通往黄浦江的航道作了一次详尽的侦察。英军"复仇神"号舰长荷尔(W.H.Hall)亲自率兵在吴淞炮台前登岸，查看地形，他看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就有清军官兵。荷尔甚至"很容易将他们捕获，作为俘虏"，但竟没有被清兵发觉①。

据英军侦察，从吴淞炮台到宝山镇，共有大炮约134门，炮台都是用泥土构筑的，前面打有木桩；只有临近蕴藻浜处有一座坚固的半环形正规炮台，其上置有十门二十四磅弹的铜质大炮②。

6月16日凌晨，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巴加(W.Parker)根据天气和海潮情况，决定开始军事行动。上午6时，英军以战船7艘，汽船6艘及运输船数十艘，侵犯吴淞口。汽船按计划将战船拖带到预先指定的海面，其中"皋华丽"和"布郎底"是两艘吨位最大的战舰，充当先锋，直驶吴淞炮台正前方。陈化成下令开炮，击中这两艘先锋舰，但仅受轻伤。这时，英国的其他四艘军舰都相继逼近炮台，吴淞炮台全线开炮，英舰被击中多次。英国方面记述道："炮火很厉害……中国军队的火力不但猛烈，而且也很准确。""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③

发炮的同时，清军出动几十艘兵船和大型明轮船在江面上与英军作战，但所射炮火除了激起巨大的水柱外，没有给敌舰以任何伤害，这些战船在岸上阵地失守前，就纷纷掉头逃命。英军只派了一艘"西索斯梯斯"号，稍经炮击，就将江右的东炮台占领了。

牛鉴在宝山城内，闻塘岸炮响，又闻报前线战况尚顺利，遂率部到阵地督战。刚到宝山城外3里的小沙背，"遥见敌船巍如山

---

① W.D.Bernard: The Nemesis in China, London, 1846, 第323页。

② 同上，P.324。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48、228页。

立，桅悬巨炮，直向化成营中施放”①。牛鉴在如此危急之时，尚没有收起他的总督仪仗，英军在舟口樯头瞭见他的乘舆，知系大官，排炮对准小沙背猛发，牛鉴随兵多被击毙，牛鉴骇奔。这时英军已从小沙背登陆，王志元的徐州兵立时崩溃。据载英军初登小沙背时，“仅八九人，而塘上数千兵，皆望风溃矣”②。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与牛鉴的遁逃有很大关系。因为牛鉴此时已使一卒坐其乘舆，自己则弃冠靴，杂军校而走，由河南参将陈平川以盾牌兵800拥回宝山，随即马上与宝山县令周恭寿弃城由西门遁出，逃往嘉定。这样，西炮台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守备韦印福等已阵亡。更有甚者，由于层层贪污，清政府以巨资制造的武器竟多有劣品，“炮子多砖心，比至贼船而灰，炮门且裂”③，腐败的政治在战火纷飞中更显露了它的罪恶。在这危亡的关头，陈化成见军无后援，抚膺顿足叹曰：“制使（按指牛鉴——引者）杀我矣。”④其时，英军蜂拥而上，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在吴淞炮台上展开。

中国守军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参与这场战争的英国人在叙述这场长枪对长矛的肉搏时写道：“凡是亲眼看到中国的士兵，以那种顽强的斗志和决心来保卫他们阵地的人，没有哪一个能够对中国士兵的英勇，拒绝给予充分的尊重。”⑤“有一座炮台，其中所有炮眼都被击毁，大炮也都几乎全部打坏，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中国兵站在城垒上，在‘布郎底’号的密集炮火下，不断地挥动着旗帜。”⑥陈化成身中流弹，“颠复起，犹手自燃巨炮，伤重喷血死”⑦。吴淞炮台失守。英军在当天占领

---

① 《鸦片战争》(六)，第294页。
②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
③ 袁翼：《江南提督陈忠愍公殉节略》。《鸦片战争》(六)，第290页。
④ 夏燮：《中西纪事》，卷8，第2页。
⑤ W.D.Bernard: The Nemesis in China，第328页。
⑥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35页。
⑦ 王拯：《陈将军画像记》。

了宝山。

吴淞保卫战持续了约二个半小时。在战场上牺牲的官员除了陈化成外，还有守备韦印福，千总钱金玉，把总龚龄垣，外委许林、许攀桂、徐大华、姚雁宇①。兵士死伤数字没有记载，据英国方面估计约达200名；英方仅死中尉、士兵各1名，伤18名②。

英军占领宝山后，获悉上海城内大乱，城中官员和殷富人家正在匆忙携资逃亡，于是决定迅速占领上海。6月19日，英军分水陆两路，侵夺上海。陆路英军系炮兵马队和皇家炮兵分队，约一千人，带同工程兵及地雷队，从上海县城北郊的新闸直趋县城北门，未遇任何抵抗。英军仅派一士兵爬过城墙就打开了城门，城内的官员、士兵已逃逸一空。上海就这样失守了，当水路英军溯黄浦江而上，在下午1时到达上海县城外时，他们的同伴已在那里开门迎候了。

在上海的历史上，这是她第一次沦入外敌之手，沦陷得这样轻忽，这样卑怯，连道光皇帝接报后也疑窦丛生，迭问："[究竟] 该处是否有将弁防御，曾否交锋？""该处兵弁究有若干，何以尚未交锋，遽致失守？现在文武员弁，作何下落，有无逃避情事？"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当外敌凌夷，国土危亡的时候，这些受封疆之任，有守土之责的督抚大员到哪里去了？这些平日鱼肉百姓却号为"父母官"的道县官员，一个个都露出了怎样的面目？

总督牛鉴从吴淞前线逃回宝山城后，马上从西门逸出，仓皇出逃。行四五里，他亲眼看到宝山城东门一带火起，又见西炮台存贮大量火药的仓库被焚烧，火光冲天；又闻报敌船两只已闯进海口。他明明知道敌军必将侵夺上海，却以"上海无险可守，知已不可复

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24（下），第8页。
② W.D.Bernard: The Nemesis in China，第329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1。

问”①，不作任何临阵布置，于当天黄昏逃到嘉定。在嘉定两天，似乎觉得还不安全，于6月18日，收集溃兵2400多名，逃到昆山驻扎。同时向道光谎报战情，粉饰罪责。上海失守后，他又与伊里布一起，是最早向道光皇帝吁请对英求和的大员。7月4日，英军还未全力进溯长江，他就向道光唱出“中外同系赤子，休兵并免夷伤”的调子，并用清朝官员典型的自欺欺人话语说：“彼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伏。”② 但他毕竟太无本事和有渎职之罪，所以在道光皇帝决定对入侵者“投以肉食”时，牛鉴却被革职拿问了。

随牛鉴一起出逃的宝山知县周恭寿，仓皇中坠马受伤，干脆到罗店养伤，一应事务，委员代理，战火中居然当起寓公来了。候补知县周沐润则与牛鉴一起逃到嘉定。

驻在松江的苏松太道巫宜禊，在宝山失守后，并不准备守卫上海，而在6月17日到上海县城内拿走了一点银两、军火、文卷等物，准备出逃。当他在19日再来上海取物时，城已陷，巫宜禊也就“安居”松江，听任上海沦入外敌之手。

上海知县刘光斗，在宝山失守的当夜就逃出上海县城，守备王嘉谟从之。翌日，未见英军踪影，即返回城内，但为愤怒的百姓所殴，县衙门也在他出逃时被毁，监犯全行被放。刘光斗再出县城，逃往松江避匿。而牛鉴在给道光的奏章中，竟编造一套慌话，说是，英军侵夺上海时，“知县刘光斗带同兵勇出城迎敌，被枪箭致伤右臂等处，挤入稠众之中，……见城已失，投入江中，刘光斗漂至下游，经渔户捞起。”③

负责上海军务的是扬州参将继伦。在长江口一带备战时，牛鉴将其调赴上海，总管上海防务，算是两江总督安排防守上海的军

---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0。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3。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7。

事首领。但这个参将却是个逃跑司令，吴淞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上海，他第一个带头逃跑，并且找了个藉口，说出城去收集吴淞战后的溃兵。但他并不向吴淞方向去，而远赴上海县城外70里的泗泾驻扎。象刘光斗一样，他在翌日见英军未来，又折回上海，但百姓"咸以其首先逃避，争欲得而甘心"①，使他不敢进城。再过一日，英军占领上海，继伦自然藏匿城外。

至于一般的守军将领，临阵脱逃的更是比比皆是。即以防守宝山城外小沙背的王志元为例，这支队伍本来作为陈化成的后援力量，但前线炮响，这里马上作鸟兽散。事后耆英等还以"小沙背地僻兵单，势难固守"为由，替他辩护。其实陈化成孤军无援，与小沙背守军的溃逃有直接关系。王志元这支队伍军纪极坏，后来有人揭发王军"调防吴淞，兵号七百，实则五百，给发兵粮，每名扣制钱四文，兵不为用，骚扰尤甚"。道光下旨严查，耆英等虽声称查明王无贪污情弊，但也承认王志元"不能约束兵丁，颇滋骚扰"，这支乱军对吴淞一带百姓之为害可知②。

这就是外国军队第一次侵入上海时，清朝文武官员"防御交锋伤败失守之实情"。入侵者也看出了他们与之作战的政府有着怎样的危机，一个英国军官写道："在我军快要到达时，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的官吏已将老百姓'搜括'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必然会使这些受苦的人们大胆地起来，反抗这些官吏的压迫。……结果是：在吴淞炮台陷落后，老百姓起来报仇了，他们谴责这些清朝的官吏是卖国贼、胆小鬼，危险刚一发生，官吏就逃跑了。老百姓并且起誓说决不容许他们再回来。"③

人民对于没有能力守护国土的政府官员，当然是鄙视痛恨的。牛鉴"拥兵护逃，众口交詈"，成为民族罪人，江浙人民还作民谣以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1。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0。
③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41—142页。

讥之："一战甬江口，督臣死(按指裕谦)，提臣走(按指余步云)；再战吴淞口，提臣死，督臣走。"① 上海人民痛殴临阵脱逃的刘光斗、继伦，正是这种痛恨心情的流露。人民对于敢于浴血奋战抵抗外敌的将士也给予了应有的敬仰。陈化成英勇阵亡后，有一个叫刘国标的武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负其尸匿于芦苇之中，十天后嘉定县令练廷璜设法得之，祭于上海城内关帝庙，"邑人争请哭奠，绘遗像祀之"② ，清廷赐谥忠愍。陈化成吴淞口抗英，与广东的关天培，定海的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一样，在鸦片战争史中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英军占领上海后，马上派兵在上海附近地区进行侦察，但除了在城里发现大量军火库存，知道清政府曾准备力守此城外，没有发现在城陷以后还有进一步抵抗的迹象。城里所存军火一部分被英军劫掠上船，其余大部分被毁。

6月20日，英军派"弗莱吉森"、"麦都萨"号等船，沿黄浦江上溯，探寻通往苏州的水路。一路上继续破坏中国沿江防务设施。21日，"复仇神"号加入这一行列，继续向黄浦江深处航行约70公里。这些船只曾到达松江南门附近，并在泖湖一带测量水道。因黄浦江上游河道纷歧复杂，英军无法找到通往苏州的河道，又怕船只在水草丛生的河汊中搁浅，这才在松江城外"燃炮而退"，返回上海③。

6月22日晚，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 (H.Pottinger)从香港经厦门、舟山到达上海，决定沿江而上进攻南京。当晚，英军在上海城内鸣号集合。23日上午，英军全数退出上海，会泊吴淞口外，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是俟增援部队一到，即西进侵犯长江。

英国侵略者从6月16日侵夺宝山，十九日侵夺上海，至23日

① 《中西纪事》，卷24(下)，第9页。
② 《中西纪事》，卷8，第3页。
③ 博润等修纂：《松江府续志》，卷19。

退泊吴淞口外，历时约一周。值得注意的是，英军这次侵占上海、宝山两地，除了破坏清朝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外，较之以前在浙江等地那样大肆抢掠烧杀，有所收敛，部份地采取了收买人心的一手。英国方面的记载说，由于上海的繁华富裕和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英军首领曾决定"不让这个城市遭到抢掠"，① 这话自然未可轻信，清朝官员的说法甚或过之，显然是为了减轻失地丧土的罪责，并为开和议张本。无妨看看这些官员的奏折所说。牛鉴奏称："该逆前陷定、镇、乍浦，日以抢掠奸淫为事，近闻上、宝之陷，并未杀戮一人，遍贴伪示，以安民为词，其居心实不可问矣。"② 江苏巡抚程矞采也说："该逆前进上、宝两县，因商民播迁不少，是以掳掠无多，并无伤人及奸抢妇女之事。"③ 钦差大臣耆英则更进一步奏报道光说："该逆在上海，将官仓谷石支给民食。并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④

耆英等提到的英军告示，是英军占领上海后的第二天即6月20日在城内外张贴的。这份告示值得一读，它是英国炮舰政策的辅助品，说明英国资产阶级在凶恶的军事行动中，有意要买人心和制造舆论：

> 大英官宪晓谕各店铺知悉：照常开张买卖。大英国大宪谕上海居民知悉：照得本国与百姓，毫无战意，最可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大有益矣。但大清官不要议和，是以有衅端也。此次本地匪类，乘机抢夺官民，诚属痛恨甚矣。此后该匪再敢抢劫，本臣宪从重治罪，不稍宽贷⑤。

后来璞鼎查有一份"解释"战争起因和提出战争目的的有名告示，也是在英军撤离上海时开始张贴的。告示用中国习见的语言写成，并极力模仿天朝诏书的体裁，仅从那个"海内皆兄弟"式的开

① W.D.Bernard: The Nemesis in China，第332页。

②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3。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2。

⑤ 《鸦片战争》(三)，第329页。

头，就可知英国方面怎样企图制造温和的面具："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国家不一也。而万国之中，无不为天父上帝所治者，即无不为一家兄弟也……"① 英国从占领上海起开始使用另一副面具，从一个侧面说明它已感觉到勒索的目的将达，战争接近尾声，应该用另一种手法以减少最后进攻长江的阻力了。

虽然如此，这支远征军在上海还是时时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据一个当时住在城里的中国人记载，英国人在上海县城内"四出抄掠财物及鸡鸭等，并奸淫妇女"，城内著名的私人花园宜园被他们抢劫七次，"骨董物件，内外一空"②。不仅英国人的记载承认发生过掠夺古玩之类的事情③，而且，英军在退出吴淞口时，以英国水师副将名义在吴淞附近张贴的告示，也有点不打自招，告示称："倘有英国人等上岸，向尔民人相害盗掠，尔等不可即行逃走，应赴本副将船上诉冤，以凭查出实情，即治其盗掠之罪也。"这份告示还强迫当地人民上英船售卖农副产品，如不服从，"将带人上岸巡游村乡，到处强取拿。"最后更威胁道，如发生捉拿杀毙英人事件，英军"定以相近之村乡灭毁，并将查出原犯等，逐一绞死"④，露出了占领者的凶恶面目。英国军队退出上海时，还勒索了三十万元的所谓"赎城费"，后来这笔钱被计算在《南京条约》的赔款项内。

7月5日，由70余艘船只组成的英国舰队分成五支纵队，在先行舰队的带领下，陆续侵入长江。9日，英国舰队未遇任何抵抗就越过了长江第一重门户江阴炮台。21日，英军在遭遇激烈的抵抗后攻陷镇江。8月初，英国兵舰已经停泊在南京的下关。道光皇帝完全屈服了，他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匆忙赶到南京"议和"。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鉴，于8月29日踏上英国"皋

① 《鸦片战争》(五)，第452页。
② 乔重禧：《庚难日记》。
③ W.D.Bernard: The Nemesis in China, P.332。
④ 《鸦片战争》(五)，第454页。

华丽”号军舰，一字不易地接受了璞鼎查的全部和约条款，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上签了字。

上海，便在这次条约中被“出卖”了。1843年秋天，第一批英国人安然进入了他们在去年夏天凭着炮舰火枪才能进入的地方。上海就是在这样一种屈辱情况下开埠了。

三、租界起源

英国用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大门。“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这个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的主要题目，通过战争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南京条约》第二条载：“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①。上海在大炮的威逼下开放了。

英国公使璞鼎查指派曾在印度炮兵队任职的英国陆军参谋乔治·巴富尔(GeorgeBalfour)为首任驻上海领事，任期3年。巴富尔时年34岁，鸦片战争时来到中国，《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在广州处理赔款及行商欠款等事务。1843年11月8日，巴富尔带着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等，乘一艘小火轮，从广州到达上海，当日便进城投递照会。翌日，上任甫及四个月的上海道台宫慕久“会督在城文武，亲赴大关与之接晤”，据称，巴富尔与宫慕久交接时“情形极为恭顺”，双方议定上海于11月17日开埠②。巴富尔很快在城内觅到房屋，设立领事馆。11月14日，巴富尔发布公告，宣布上海开埠，同时将其领署地址通知英商。

这以后的一个半月中，进入上海的外国商船共有七艘。它们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1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0。

大抵是匆忙的过客，做完生意即离沪它去。1843年底，在上海登记居住的英国人是25名。然而，近代来华外人中的两大支：商人和传教士，却已随巴富尔一起来到了上海。

1844年初，在上海外滩沿江一带划地造屋的就有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仁记洋行(Gibb Living ston &Co.)、义记洋行(Holliday,Wise&Co.)、巴地洋行(Wolcott,Bates &Co.)、宝顺洋行(Dent&Co.)①。上海开埠后一年，在这里设立的英美商行已有11家，分别由23个商人常驻上海。这些外商都在上海城内租有房产，安置家眷，一面在城外觅地建房，设立商行、仓库和临时码头②。

传教士也来到了上海，并开始定居。其中重要的有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麦华陀之父麦都思(W.H. Medhurst)。麦都思1835年就来到中国，这时开始在上海定居。另一名在上海定居的美国传教士是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雒魏林的妻子成了第一个在上海定居的外侨妇女。

这些外国人来到上海，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为“屯物经商”和“携眷居留”而需要“租地造屋”。对此，《南京条约》并无具体规定。关于这些问题，是在1843年10月8日订立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中才作了若干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是：

> 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第六款)
>
> …… 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须照五

① G.Lanning—S.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第282页。

② William Charles Milne: Life in China，1857，第370页。

港口之现在所值商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准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宪；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第七款）①

订立上述条款的钦差大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即《虎门条约》签订一个月后，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对该条约订立的经过，和如何规定外商在通商口岸的租房租地办法，作了较详细的申述，很能反映出当时制定这些规定的背景和清廷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耆英说："上年暎夷在江南就抚时（指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时——引者），本请在五口任其自择基地，建造夷馆，臣耆英因内地港口非澳门、香港系属海岛可比，且该夷所欲住之地，皆系市廛，断难任其自择，坚持未许。该酋行至上海、宁波，又随意混指，各该地方官悉皆置之不理。"于是耆英提出外人在五口"永久相安"的办法是："应由中华地方官会同该夷目，各就近地民情，议定在何地用何项房屋或基地，租给居住修造，华民不许勒索，该夷不许强租。"耆英报告道光说，经过他和两广总督黄恩彤等人的"反复开导"，"该夷始就范围，不敢坚执自行择地之说"，而"数月以来，华夷相安，甚为静谧"，他由此满足了道光皇帝就外人在华居住问题下达的"妥为料理，万勿别生事端"的愿望。耆英在奏折中颇为得意地说："现已将止准在五口租房租地，并由地方官指定地段，准其行走贸易，不许逾越尺寸，列入善后条约，以杜衅端。"②这个鸦片战争后期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主要人物显然认为，由于订立了《虎门条约》，清政府在限制外人在五口的活动方面赢得了一着。这种见解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同，《虎门条约》的这些规定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

---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5—36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

然而，清朝的统治者们没有想到，恰恰是这些限制性的规定，后来成为外人在中国土地上攫取“租界”的滥觞。

世代居住在上海城外的农民们，都不愿意将土地租给外国人。上海开埠初期，租地成了一个突出的矛盾。外国商人虽然大部分住在城内，但他们的眼睛却已瞄着县城北面的临江地带。后来被称为外滩(Bund)的这一地带，当时还只是阡陌田野和芦苇纤道，大部分各有地主。主人们拒绝出租自己赖以生活的土地，外国商人往往是在巴富尔和上海道的亲自陪同下，由麦华陀作翻译，强行租地。据麦华陀等人回忆，当时农民们的抵制非常强烈。例如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所在地的原主是一位老年妇女，当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官府圈定时，她宁死不肯离开家园，甚至当面责骂上海道台，直唾其面，谓“决不将地皮卖给洋鬼子”！①后来成为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的那块地皮本来是一块被大小河浜围绕的小岛，土地的主人就利用这一地形，设置吊桥，和前来租地的外国人周旋多时。②

虽然如此，在强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护持下，这些外商都先后租到了土地。但是，已经打开了中国门户的英国人并不满足于这种局面，巴富尔一直在酝酿着一项更深远的计划，即企图促使上海地方政府正式圈出外滩一带的土地，专供外人租地造屋用。为此，他从1843年起就在各洋商的租地活动中与上海道宫慕久时缓时续地进行着交涉，直到1845年11月，终于有了结果。这里，我们需要叙述一下上海开埠初期清政府在上海的外交情况。

《南京条约》后，清廷派两江总督璧昌、江苏巡抚孙善宝，“督同”江苏候补道员咸龄、上海道台宫慕久办理上海“夷务”（亦即外

---

① H.Lang: Shanghai,Considered Socially.第22页；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传经堂书店铅印本，卷1，上海开埠事略。

② H.Lang前引书，第22页。

交)。璧昌、孙善宝两人视办"夷务"为畏途,接旨后实事未办一桩,却先向道光上了一道奏折,声称恐怕英国领事到沪后,"知有大员驻节,事无巨细,辄向臣等干求,转多窒碍",又说"臣等渥受殊恩,忝膺封圻重寄,大纲小纪,综理敷施,万不敢惮劳畏难,而体制攸关,实未便轻举率行,致为中外民夷所玩亵,此时一切事宜,自应由该道(按指宫慕久——引者)等禀商核办。"巴富尔上任后,璧昌果然借口正在考核武闱乡试,"不克分身前往",推掉了直接责任;孙善宝则一本正经地"查"出了巴富尔"系属该国守备,职分较卑",他作为"职分高"的江苏巡抚,"毋庸亲与筹议,自可不必遂行接见,借示天朝体制,以别等威"云云①,也推掉了应负的责任。而咸龄其时还未到上海(只在孙善宝左右当差),所以上海开埠的最初几年内,实际办理所谓夷务的只有上海道宫慕久。

宫慕久,山东平州人,举人出身。同治《上海县志》对他任上海道期间的作为作了八个字的评价:"力持大体,抚辑中外",并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他对外国人的态度。其一是:"西商有狎视厅县者,慕久戒之曰:吾官虽尊,无刑柄;彼虽小,有刑柄,朝廷分职意也。慎毋狎,将加若刑。商遂戢焉。"其一是:"凡西商有馈送,不能却者,则镕其物一室中,去官后,封职如故。世尤重之。"② 给人们画了一张既能对外商作"合理斗争"又不贪污受贿的好官图像。上海开埠时,璧昌、孙善宝几次在皇帝前保奏他"人极诚实稳练","对地方情形,日渐熟谙",说他"质直出于自然,庸介本乎天性,于华夷通商诸务,断不致徇私忘公,洵为实心可靠之员",定可在开埠后"华夷杂处,在在均关紧要"的上海,"将应办各事宜逐一豫筹妥当"③,就是说,宫慕久是一个完全能秉承清廷旨意办理上海通商事务的地方官。

---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0。

② 《同治上海县志》,名宦。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8,卷70。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被清政府器重的（宫慕久后来从上海道升任按察使也说明了这一点）办外交的地方官手里，埋下了将来遍布中国通商口岸的租界制度的根子。秉承了清廷对外国人采取的“划定界址，不许逾越”的政策，宫慕久与巴富尔进行两年谈判的结果是，上海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

1845年11月29日，正是上海开埠两年之际，宫慕久以上海道的名义发布了一项告示。告示首先引用了关于允许外商在五口贸易，和由地方官“审慎议定”外商“租地架造”事宜的上谕，然后宣布：“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接着，便公布他与巴富尔商定的《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23款①。

这个章程，后来被侵华外人视作上海租界的“根本大法”，其主要内容是：

一、划定界址。除上述洋泾浜（即今延安东路）、李家场（即今北京东路）分别为居留地的南北界址外，东面以黄浦江为天然界限；西面在1845年的章程中没有确定，至第2年9月24日，才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议定以界路(Barrier Road，即今河南中路)为界。这块居留地的面积约830亩。

二、确定租地办法。由租地人直接向中国业主商议，议成，由双方分别呈报上海道与英国领事。由“华官与领事会同遴派中英正直人士四、五名，估定房价、地租及移运屯地等费”，再由双方分别呈报上海道与英国领事。“出租人与承租人之凭件，系一种契纸形式，须送呈道台审查，加盖钤印，然后移还关系各方收执”，所以这种租地契约，俗称“道契”。年租(annual rent)与押手(deposit money，即保证金)均由原业主收领，每年完租时期定为阴历十二月十五日。

---

① 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5—70页。

三、规定"永租"与"华洋分居"。外国商人租赁土地及建筑房舍后，经呈报可在任何时候退租，退租时中国原业主须将其保证金如数退还，而中国原业主则"不得任意停止出租"。换句话说，承租外商一旦租定后，即可无限期地租用下去，这种做法，在1845年以前租地时已采用，通过《土地章程》开始制度化了。不但如此，居留地内的中国业主不得将土地租给中国人，亦不得建造房屋租给中国商人。这就是所谓"华洋分居"制的具体规定。

四、容许租地外商以简单的市政设施管理居留地。章程第十二条规定："洋泾浜以北之租地与赁房西人，须共谋修造木石桥梁，清理街路，维持秩序，燃点路灯，设立消防机关，植树护路，开疏沟渠，雇用更夫。"其费用由租地人分担。更夫的姓名，须报告地方官查核；其负责管领之更长，须由道台与领事会同遴派。1846年12月，租地外人利用这一条规定，推选了一个有3人组成的"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n Roads and Jetties)，负责征收捐税及居留地的建设事宜。

五、英国专管。章程规定"倘有他国商人，欲于洋泾浜以北界内租地建屋或租屋居留或屯积货物者，须先禀明英国领事，得其许可，以免误会"。这种由英国领事专管居留地的办法首先遭到美国的反对。1846年美国领事在居留地内升悬国旗，以表示向英国的专管权挑战，但遭到英国领事的"抗议"。这一年便由上海道在《土地章程》末加了第24款："在特许英商租地之范围内，除得悬挂英国国旗外，任何国人不得悬挂该国国旗。"①

六、章程修改办法。章程规定："嗣后关于本章程如有增改，或解释，或改变形式之必要，均由双方官员随时商议，众人如有议决事项，须呈报领事，转与道台商妥决定后，始得发生效力。"

1845年的《土地章程》，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

① A.M.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and Council，第7页。

京条约》及其附约在地方上实施的产物，其侵略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此产生的上海租界，当时还只是官方指定的通商外人聚居地，处于一种纯粹的居留地的地位。《土地章程》不仅明确规定中国保有居留地的领土主权，而且表明中国仍保留居留地的土地管辖权（第一条）、司法权（第十二条）、行政权（第十三条）乃至对居留地外人的决议有最后的审核权（第二十二条）。

然而，溃千里之堤的蚁穴却已形成。尽管清政府在国门已破、闭关不能的形势下，想用划地居留的办法来约束入侵者；尽管上海道在划定居留地以后，以为可以将来沪外人统统送进居留区，从此天下太平，"无纷扰之弊"，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美、法资产阶级正接踵而至，与英国分一杯羹，他们蓄谋在中国的开放口岸上海获一驻足之地，然后再图侵越；而已经站稳脚跟的英国人则已不满足于黄浦江边的尺寸之地而在觊觎界外之地了。在强权和欺诈前，清朝政府对于外国人的软弱的限制政策一开始就遇到了挑战。

四、事情没有结束

——美法相继染指与英租界扩充

《南京条约》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美国和法国在1844年相继迫使清政府订立《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和英国相同的在华权益。上海，也成了美、法可以染指的地方。美国政府在1846年指派旗昌洋行（Russell &Co.）商人吴利国（Henry G. Wolcott）为第一任驻上海代理领事。1848年12月，又指派另一名旗昌洋行商人祁理蕴（John N.A.Griswold）接任美国驻沪领事。法国政府则在1847年1月任命剌萼尼使团（来华订立《黄埔条约》的法国外交团）中的三等随员敏体尼（L.C.N.M.Montigny）为首任驻沪领事。

并不是建立几个领事馆，或者划定黄浦滩头的弹丸之地，就能

安置这些野心勃勃的领事和他们所代表的侵略势力。第一块外国租界的出现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无尽的冲突和灾难的开始。阁弱的清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划定界址，不许逾越”的政策在1845年以后屡受冲击，其最初的结果是在上海县城北面出现了各自为政的三块外国人居留地。

我们先看美国人的举动。美国领事就职后，先在英国租界内设立领事馆，接着便发生了前述所谓“升旗事件”。虽然上海道顺从了英国领事的要求而在《土地章程》后附加了第24款，美国方面却不加理睬。与此同时，美国圣公会(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主教文惠廉(W.J.Boone)已悄悄地在苏州河北岸地价较廉的地方广置地皮，建造房屋，发展美国势力。在造成了一定的既成事实后，文惠廉在1848年向上海道台吴健彰提出交涉，要求将虹口划作美国租界，交涉旬日，得吴健彰口头同意，但没有划定界址，也没有订立任何协议。

为了打破英国人对租界(当时大部分美商住在英租界)的专管权，祁理蕴和他的继任者金能亨(E.Cunningham)不断向上海道台施加压力，要求美国人有直接租地权。金能亨也是美国旗昌洋行的商人，1852年起任代理美国领事。这一年3月，金能亨故意送三张英租界内的地契给吴健彰，请他直接钤印发还；吴以《土地章程》第十四款的规定，要他先与英国领事联系，得其许可。金能亨拒绝这样做，并采取强硬态度，要求吴健彰在24小时内将地契钤印发还，否则将以“极端手段”对付。吴健彰拖延未答，金能亨乃致最后通牒，以停付关税，请求美国公使指派军舰来沪相耍挟。吴健彰马上屈服了，次日即将钤印后的地契三张送还。金能亨交涉成功，在3月16日公告美国侨民，宣布美国已取得在上海的直接租地权，“不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① 英国方面不久

①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353年3月20日。

也作出和解姿态。① 此后，各国商人在英租界内租地均直接通过各该国领事(无领事者委托他国领事)，将契据转呈道台查核后钤印发还。英美在租地问题上毕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英国专管的局面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在沪租地的"权利均等"，为英租界日后的"国际性"埋下了种子。

再看法国人的动作。敏体尼在1848年1月到达上海后，有鉴于英美关于"专管"的争端，不愿意住在英租界，就通过法籍主教赵方济(F.X.Maresca) 在上海县城和英租界之间的地段内租到了房屋，设立了领事馆②。他写信告诉法国公使说："房屋很小……，但住在里面，就象是在法国一样。"③ 敏体尼的野心，当然不止是要在一个领事馆内生活得"象是在法国一样"，他要扩而广之，在上海为法国人取得一块法国的专管租界。

他很快地找到了这样的机会。半年后，有个叫雷米(Remi)的法国商人(此人后为敏体尼的女婿)来到上海，向领事提出购买土地的要求。敏体尼据此向上海道台吴健彰正式提出租界要求。

上海道在划定英侨居留地后，打算让这块土地供所有来沪外商"租地建屋或租屋居留或屯积货物"之用，即有"到此为止"的想法。《土地章程》中关于界内土地"华人之间不得租让"和不得"租与华人"的规定，就是要让已经划定的区域尽量容纳较多的外人。有关"永租"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这一目的："永租"可以防止本来就不愿意出租土地的原业主翻悔，逐渐把该区内的中国业主清出，在不扩大这块居留地的情况下，容纳不断增加的外国人。这些都是清政府官员认为划界以后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外国人居留问题的表现。而英国是近代史上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侵华

① G.Lanning&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第288—289页。

② 在今天的金陵东路(四川南路和溪口路之间)北首。

③ 1848年1月27日致使馆函，法国领事馆档案。《上海法租界史》，中译本，第31页。

国家，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清朝官员希望划界后所有外国人租地事宜都与英国领事去交涉，上面谈到的英美在升旗、租地问题上发生争端时，上海道台偏向英国方面，就流露了这种情绪。所以，敏体尼要求租界时，吴健彰就根据《土地章程》，要他与英国领事联系，在已经划定的英国租界内居留。

敏体尼不为所动，他复信吴健彰，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提出强硬要求。吴健彰则用拖延代替拒绝。其间，满人麟桂接替了吴健彰①，敏体尼继续向麟桂施加压力。这时，敏体尼已明确提出他所指望的法租界是“沿洋泾浜地区，它和英租界正好隔河相望”，声称“这是唯一能适合我国侨民居住之地②”。

麟桂逐渐屈服。先是让雷米在1849年初租到了他所要求的12亩土地（在今四川南路延安东路东南角），接着，又同意就划定法租界发布一告示。敏体尼紧追不放，要求在告示文字上逐句讨论，修改“对大法国不尊重、不礼貌的词句”。交涉数月，到1849年4月6日，双方签字换文，麟桂的告示正式发出。告示引用《黄埔条约》第22款的规定，宣布“本道台会同法国领事敏体尼勘定上海北门外一处地：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注明界址”，允准法人租地，并称“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至各国人如愿在界内租地者，应向法国领事商明办理”③。一块由法国专管的居留地就这样产生了，全部面积约986亩。

这样，到19世纪40年代末，离上海开埠不到6年，英、美、法3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都占有了侨民居留地，也就是后来习

---

① 麟桂任上海道台至1851年11月，接着由吴健彰复任。

② 《上海法租界史》，第38页。

③ 《上海法租界史》，第42—43页。关帝庙诸家桥约当今西藏南路附近，广东潮州会馆原址在今南市区龙潭路上。

称的“租界”①。这些租界，在清政府看来，只是上海城外的荒野之地，“一片泥滩、三数茅屋”，远远没有上海旧城重要，把它划作外人居留地正与耆英所谓“该夷欲住之地皆系市廛，断难任其自择”的精神相符。在清政府看来，英国人在广州气势汹汹地要进城，在上海他们却愿意住在城外，这不是好事么？《土地章程》得到了两江总督的批准②，而美、法租界的出现在当时也并没有引起注意。

然而，各国竞相在上海城北的沿江地区划定租界却是别有用心的。3个外国租界都东临黄浦江，南北分别夹峙通往内地的两条主要河流吴淞江（即苏州河）和洋泾浜，西面则腹地纵深，足可延伸。它们都坐落在通往长江口和通往物产丰饶的江南地区的内外要道上，控制了这样的地点，足以扼上海县城之咽喉，控制整个上海商埠。选择这些地点作租界不是偶然的。例如，敏体尼选择法租界的地点就是因为：“他看出这个地段有许多优点。首先，交通方便，三面都沿着可航行的水路（黄浦江和两条河浜），对运转货物极为重要。其次，也是主要的一点，它靠近商业中心。……对敏体尼来说，靠近县城建立租界，这是绝妙的一着。”③敏体尼的活动是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法国驻华公使陆英（S.E.A.Rouen）在1849年初访问上海时对敏体尼的策略表示赞同，并亲自了解了上海地方的情况，而其时法租界划界谈判正在加紧进行中④。3个租界中最重要的英租界，更是英国政府处心积虑的产物。璞鼎查在订立《南京条约》后路过上海，就有意选择黄浦江边的这块地方作为侨民居留地。英国人自己评论这事说：“璞鼎查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战略上的原因，他所选择的地点，东面有宜于航行的宽阔河流，其余三面有

① 英、美租界一般称作Settlement，有居留地、住宅区的意思，法租界自称Concession，有特许、渡让的意思。过去有人根据日本的译法，将前者作“居留地”，后者作“租界”。本书一律称为租界。

② A.M.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and Council，第5页。

③ 《上海法租界史》，第35页。

④ 《上海法租界史》，第46页。

可供防御的河浜。”① 这说明英国一开始就是将侨民居留地作为一个殖民体来考虑的。

在划定英租界以后，美、法两租界的相继出现，是清政府原来的限制意图的两次失败，而在这期间，清政府还遭受了另一次同样性质的失败，这就是英租界的扩充。这次扩充是在英租界划定后不到3年提出来的，耐人寻味的是，扩充的起因不是租地问题，却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案。

《虎门条约》曾规定外人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上海开埠初期也曾议定“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但上海的传教士们从来就没有遵守过这些规定，他们既要传教，就不甘囿于上海县城及四周的范围，而是到处游荡，尽量扩充传教点，吸引教徒。麦都思等人就不止一次到上海远郊传教。1848 年，终于因此而发生了“青浦教案”。

这一年 3 月 8 日，麦都思和另两名英国传教士雒魏林、慕维廉(W.Muirhead)又私自驾舢板船到离上海县城 90 里的青浦去传教。在散发布道书时，他们与当地运送漕粮的水手发生争殴，麦都思等人险些不能生还；后经青浦官府闻讯前来护持，才保住了性命，返回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R.Alcock)②，借了这个题目，大做文章。

阿礼国首先要求中国方面“惩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阿礼国以停付全部关税、用兵船封锁 1400 只即将北上的粮船作为要挟，并限令上海道台在 48 小时内给予答复。上海道台咸龄指出麦都思等人私去青浦本属违法，且“斗殴细故，不足深诘”，阿礼国闻言大怒，公然在道台衙门“语侵观察(按指咸龄)，适持长枋折叠扇在手，乃以扇拍观察之首而击之”，受此殴辱，咸龄除了“拂衣而入”

---

① H.Lang: Shanghai,Considered Socially,第16页。

② 巴富尔在 1846 年 10 月 7 日辞职回英，由阿礼国继任上海领事。

外，竟一筹莫展①。3月19日，阿礼国没有接到答复，指派副领事罗伯逊(D.B.Robertson)乘兵船前往南京要挟两江总督。在阿礼国的威逼下，清政府屈服了。这时正好路过南京的钦差大臣耆英"煦煦然惟恐伤其意"，马上作出了向英国人屈服的决定。3月23日，十名水手被带到英租界的新关前枷号示众，其中两名所谓"主凶"还被判处徒刑和流刑。1000多艘粮船白白地被阻半个多月，清政府却还向英方赔款银300两。上海道咸龄也未能幸免，他因"办理不善"而被两江总督李星沅免职。

青浦教案如此解决，连英国政府也觉意外。阿礼国采取强硬行动时，正值英国更换驻华公使，他既没有来得及请示离任公使德庇时也没有得到新任公使文翰(S.G.Bonham)的批准，两人都对阿礼国的自作主张表示"遗憾"，因为他们都认为清政府如果认真对付，英国在上海并无阻止千余条进贡粮船北上的力量②。事实上，当时阿礼国仅有两艘小型军舰，一艘开到南京要挟去了，能够封锁港口的仅是一艘装了10门小钢炮的双桅船，但是由于上海道对敌情的无知，这样一艘小小的英国军舰只发了几炮，就镇住了派来为1000多艘粮船护航的50艘中国兵船。阿礼国完全是靠无赖成功的，但他讹诈成功后，英国政府马上表示满意，阿礼国连同副领事罗伯逊都受到夸奖。青浦事件报到英国外交部，外相巴麦尊(Lord Palmerston)马上批准了阿礼国"处理危局的干练行动"③。

青浦教案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从而更助长了上海外国人的气焰。阿礼国在青浦教案后马上提出扩充英租界的要求，这种要求几乎没有遭到抵制就被接受了。1848年11月27日，上海道

---

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11，第3—5页。

② A.Michie: The Englismanin China(《阿礼国传》)Edinburgh and London, 1900, Voll, 第134—135页。

③ G.Lanning—S.Couling: TheHistoryofShanghai, 第299页。

台麟桂张贴布告①，宣布英租界北界由李家场推进到苏州河南岸，西界由界路推进到周泾浜（今西藏中路）。英租界的面积扩大到2820亩。

将近3000亩的英租界，将近1000亩的法租界，和苏州河北面没有划定界址但相当开阔的虹口美租界，这几千亩的土地，在开埠后几年的时间内，都变成了外国人享有租地特权的区域。这在鸦片战争后开埠的五个口岸中是仅有的。而当时来到上海的外国人有多少呢？

1843年底	25人
1844年	50人
1845年	90人
1846年	120人
1847年	134人，其中87个英国人
1848年	159人，其中女性7人
1849年	175人
1850年	210人
1851年	265人②

就是说，到英租界已经扩充、法租界最后划定时，上海的外国人不过170余人，这个数字还包括家眷、仆佣，有些人往往还不是上海的长期居民，不过因为经商的缘故，在上海逗留罢了。划定法租界时，法国在沪侨民不过10人，上海开埠10年后，外侨数字一直维持在200多人③。所以，各国以侨民居留为理由而纷纷要索并扩大租界，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

---

① 该布告的英译文载于1851年3月29日的《北华捷报》。

② H.Lang: Shanghai,Considered Socially，第24页；《上海法租界史》，第18页；并参照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41页。

③ H.Lang: Shanghai,Considered Socially；第24页；《上海法租界史》，第18页；并参照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41页。

然而，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能量，却又不是用侨民的人数所能衡量的。随着这批数量并不算大，但个个野心勃勃的外国人的进入，上海的面目正在发生着它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着这种变化的，莫过于滨临黄浦江的外滩的变迁了。为了了解这种影响深远的变化的概况，试从外滩北面的李家场开始，对开埠后 10 年左右的黄浦滩，作一巡视。

李家场(一称李家庄)，原是吴淞江和黄浦江交汇处的一个小村落。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在这里设过营垒，吴淞失陷，英军从水路进犯上海时，这里的守军还发过几炮，但没有给英军以任何损伤。上海开埠后，这里已经荒圮，仅四周有沟围绕，还能依稀辨出当日的炮台旧迹①。英租界初次划定界址时，这里恰在北界之外，但英国领事巴富尔却看中了这块俯视通津的地方，想方设法要把它弄到手。

英国领事馆原在上海城内，租的是大东门附近的西姚家弄顾姓的一幢有 52 间屋子的大宅子。但巴富尔以为领事馆在城内，虽有能就近与上海道台联系之便，却与新辟的英租界相距甚远，和外滩的新海关也不在一起，因此他不惜违背英国法律关于不准驻外领事在驻地租地建造领署的规定，在 1846 年 4 月 28 日以 7000 元的定洋(其中巴富尔还私垫了 4000 元)，租下了李家场 100 多亩的地皮。这块英租界以外的地皮租下不久，巴富尔就卸任了。继任的阿礼国不仅商得了英国政府对这一违例行动的批准，而且通过青浦教案达到了扩界的目的。英租界的北界拓展到了苏州河南岸，李家场这块百余亩的土地也就被囊括进去了。1849年 7 月 21 日，阿礼国便迁入李家场的新领事署办公；1852年领事署翻造了新房，黄浦滩出现的这幢两层楼的西式楼房，从此成了英国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侵略势力的中心。

---

① 胡祥翰：《上海小志》，卷1，上海开港事略。

英国领事馆迤南，是鳞次栉比的外国商行。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各式各样的洋行120多家，而其中重要的几乎都集中在外滩。根据1855～1857年的外滩地图，从毗邻英国领事馆的怡和洋行开始，由北至南的滨临黄浦江的洋行有大英轮船公司(P.&O.Steam NavigationCo.)、沙逊洋行(Daniel Sassoon&Co.)、仁记洋行、琼记洋行、萧氏兄弟洋行(Shaw Bros.&Co.)、宝顺洋行、图诺尔洋行(Turner&Co.)、华记洋行(Smith Kennedy&Co.)、旗昌洋行、会德丰洋行(Wheelock&Co.)、天长洋行(W.RAdamson&Co.)、裕丰洋行(Hilam Fogg&Co.)。这些洋行大多数在鸦片战争前就和清朝有贸易，在香港、广州或印度等地设有总行。上海一开埠，他们马上在这里设立了分行。

在众多的洋行中，出现了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它座落在琼记洋行和萧氏兄弟洋行之间。丽如银行原是一家规模很小的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起初设总行于孟买(1842年)，后来将总行移至伦敦(1845年)，并改名丽如银行。1848年起在上海设立分行，"很快做了不少生意"①。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是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主要英国银行。丽如银行的规模虽然不能与后来的英国汇丰银行相比，但它的出现却标志着外国金融势力开始进入上海。

嵌在这些绵延不绝的西式建筑中，有一座中国式房屋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宝顺洋行南首的中国海关，它被称作"江海新关"或"北关"。上海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起设江海关，"专司海洋商船税钞"，此后关税行政几度变更，初由清政府内部司员监收，康熙末年又由苏州巡抚带管，遴员代理。从雍正八年(1730年)起，清廷将原驻苏州的分巡苏松道加兵备衔移驻上海，并兼理关税行政②。

---

① 《北华捷报》，1893年11月24日。

② 嘉庆《上海县志》，卷5，《关榷》。

鸦片战争前，江海关设在县城小东门外。开埠初，征收外商进出关税，只是在洋泾浜北面设了一个盘验所，并没有建筑关署。到了1846年，随着开埠初期贸易的激增，上海道宫慕久才在外滩头坝面浦的地方建了一所关署，专征外商进出口税收，而小东门外的海关便成了专征国内商税的机构了。为了有所区别，便将外滩的新关署称作"新关"或"北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下，各地的关税征收机构往往是对商人进行敲诈、渔利的地方，但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这个上海新关，却是走向另一面，成了外国商人偷漏走私的所在。有人记述，这个海关"无侵渔之弊，而偷漏甚至。盖中外语言不通，而西人又桀黠狡诈，往往以小艇运货出口，乘间扬帆而去，不及讥诘；即使及之，而货之贵贱多寡已不可稽，华官又恂懦模糊了事而已。"①

外国领事馆也多设在外滩。李家场英国领事馆外，在外滩南端的洋泾浜口，是法国领事馆。这一北一南的两个领事馆，夹峙着黄浦滩头这簇勃然而起的西式建筑群，颇具象征地显示着英法两大西方强国在上海的地位——它们俨然是黄浦滩上这些洋行主的主人。在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尤其是在上海，外国领事总是该国商人利益的保护者，他们有时甚至不惜违背本国政府的意愿（各国政府从侵华全局利益出发的意愿有时与其本国商人的愿望不尽相同），去迎合商人们的利益，正如一个美国人所写的那样："特别是在那些条约口岸，他们的领事对于商人们的愿望一般都十分同情。"② 而不少外国领事其实是由商人兼任的。例如在开埠后十年内，美国领事一直由旗昌洋行的商人兼任，以致美国在上海有过一个所谓"旗昌洋行时代"。一些当时和清政府并无外交关系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等国，都有英美商人作他们

① 王韬：《瀛壖杂志》，第2卷。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24页。

的领事。这些国家的所谓领事馆，有些就设在外滩的洋行里。例如，宝顺洋行大老板比尔(F.C.Beale) 以一个英国商人而兼任葡萄牙领事、荷兰副领事和普鲁士代理领事，而葡萄牙领事馆也就设在宝顺洋行内。

外滩的初期繁荣，是贸易兴旺的结果。上海开埠后的最初三年，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1846年11月1日，香港英商中国邮报(China Mail)就报道说："迄今为止，上海是新开各口中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唯一港口，但上海的贸易量已经达到许多人所预期于所有北部港口者的总和。"① 据统计，1844年上海进口货计值501,335镑，出口货计值487,528镑，第二年进口货就增至1,224,079镑，出口货增至1,344,650镑，到40年代末，一直维持在相应的水平，至50年代初又有激增②。增长得最明显的是上海在全国出口中的比重。1846年上海的出口占整个中国出口比重的七分之一，但到1851年很快就增长到三分之一，而在紧接着的以后几年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③。

这种增长与鸦片战争后一个时期内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有关。由于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英国资产阶级一度欣喜若狂，以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但是中国社会内部传统的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对外来商品有顽强的抵抗力，加上鸦片进口所消耗的民间财力，使得外国一般工业品在中国远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受到欢迎，而中国的丝、茶等产品却成为欧美各国的热销商品。这样，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指出

---

①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②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附表1。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3页。

的那样："中国市场的特点是：自从它根据1842年的条约开放以来，中国的茶叶和丝向大不列颠的出口额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额，整个说来却没有变化。"① 上海出口贸易的激增，首先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同时，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上海地处长江口，与著名的丝茶产地相距密迩，内有长江、运河和江南密集的水网通向中国最富庶的苏、松、杭、嘉、湖地区乃至更深的腹地，外可通四海、出大洋、直达欧美。对于这种形势，中外双方都有所估计。耆英在1843年五口开埠时说："统计五口，应以广州为首，上海为尾，将来贸易，似亦惟该二口为最旺。"② 密切注视对华贸易形势的英国方面的估计更为积极和具体。英国驻华公使兼商务监督德庇时在1844年第一次巡视广州之外的新开的沪、甬、闽、厦四埠后，认为"凡商务成功之要素，上海、厦门二埠皆具而有之，……而以上海为尤善。" ③ 他在1847年2月24日的一封信中说，在他看来，"在适当的时候，上海将吸引大部分对英贸易，因为当茶叶可以在接近产地之处交付给我们的时候，决不可能长期负担沉重的运费自华北运往广东。"④ 强调了上海地理位置在贸易上所起的作用。同年发回英国的一份商务报告说："上海因邻近中国最富庶的区域，特别是主要出口商品的产区，故将成为广州的劲敌，并将夺取广州很大部分的货运量。上海在中国去年对英丝出口20000包中已经占了16000包，在中国出口5700万磅茶叶中占了1000万磅。"⑤ 事实上，"上海自开埠以后，即成为中国之生丝市场，所有

---

① 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0。

③ 班思德(T.R.Banister)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民国二十年译印本，中文部分，第38页。

④⑤ 英国议会文件：Reports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Commons on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1847, P.8；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25—626页。

泰西各国采办之华丝，几全由该埠供给”①；而阿礼国在1849年就估计茶叶贸易中心，也将由广州移至上海②。当时西方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就是丝、茶两项，一旦丝茶贸易中心移向上海，作为进口大宗的非法的鸦片贸易也必随之而来，整个对外贸易的重心也就从广州北移了。经济利益，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生命线，利之所在，趋之若鹜，这是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性格，上海在开埠后的地位日渐重要，主要也是服从于这一规律的。

一个在1843年底曾在上海作过短期逗留的英国植物学家福钧(R·Fortune)，数年后重来上海，他这样写下了重见黄浦滩的观感：“我在英国住了将近3年之后，现在(1848年9月)又坐在上溯黄浦江开往上海的一只中国小船里了。驶进上海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樯桅如林，不仅是前次来上海时引人注目的中国帆船，而且还有颇多的外国船只，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现在泊在上海的有26只大船，其中很多船只运来英国各工业区的产品，并且装着生丝和茶叶驶回英国去。但是，除了航运以外，更使我惊异的是江岸的外观。我曾听说上海已经建造了许多英、美的洋行，我上次离开中国时，的确有一、两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座规模巨大的新的城市了。”③

这样的记述应是可信的，殖民者们确实在这块土地上开拓他们的天地了。当然，近代上海的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天然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埠以前的历史发展，等等，都是不应忽视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由于殖民者们的经营，上海确实在变化，在发展，县城北面的“泥滩与茅屋”的土地上，确实在隆起一座新的城市。“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

①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563页。

②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56页。

③ Robert Fortune: A Jouret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1852, 第12—13页。

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① 上海便是他们在远东落户、创业、建立联系的一环，并且日渐成为最重要的一环，而黄浦滩的变化则是它的形象化的表现。

滨江面浦的众多洋行，几乎没有一家不与鸦片发生关系，有的洋行说到底只是一个鸦片行。例如，怡和洋行的老板渣甸（William Jardine）本来就是一个大鸦片贩子，以贩卖鸦片致富而组织该洋行，而怡和洋行又是上海开埠后第一个向上海输入大量鸦片的洋行。英国的怡和洋行、颠地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在开埠后不久即成为在上海经营鸦片的主要洋行。吴淞口外，从一开埠就出现了六艘以前从未到过上海的鸦片趸船，它们分别属于怡和等6家洋行，而从此以后，这些鸦片趸船也象它们的主人一样，成为黄浦江上常来常往的“客人”了。至于一般“商船”进行鸦片走私，则已如苍蝇脚上必然携带毒菌一样，成为见怪不怪的事了。

如前所述，外国一般工业品在五口通商后一个时期内并没有能在中国打开太大的市场，嗜利如血的西方资产阶级就用毒品来补偿他们在对华贸易上的逆差。仅以输入上海一埠的鸦片为例，开埠后不久，输入上海的鸦片数量已接近战前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总数之半，并且逐渐递升。1847年输入上海的鸦片数量为16,500箱，1849年为22,981箱，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则已超过了30000箱②。这些数字都是在鸦片还是作为违禁品的情况下统计的，当然无法包括其它难以计数的更隐晦的鸦片走私。在中国市场对外国一般商品开而不畅的形势下，鸦片走私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对华商品侵略的主要方式。有人记载，19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大船运公司，例如怡和洋行、颠地洋行、旗昌洋行、华记洋行、仁记洋行、琼记洋行、麦克威克洋行（Macvica&Co.）、孖剌洋行（Murrow&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4页。

② 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39页。

Co.)、广隆洋行(Lindsay & Co.)和帕栖人的洋行中，鸦片和茶叶贸易已有平分秋色之势。鸦片贸易一向故意背人耳目，而茶叶贸易则大肆宣传"①。上海则是鸦片走私最猖獗的一个口岸，"沪埠进口之洋货，实以鸦片首屈一指"②。

鸦片既是禁止进口的，那么，这种在上海进口贸易中"首屈一指"的商品是怎样进来的，也就不言自明了。巴富尔到上海第一年就发现怡和洋行走私鸦片的劣迹，但当他报告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时，后者却明白告诉他，这是"要靠他们(清政府)自己"管理的事。不过，如果说，在开埠初巴富尔还将鸦片走私情况如实报告上司，以冀引起重视的话，那么，不消几年，鸦片走私在上海已是公开的秘密了。1850年，领事阿礼国甚至公开对因走私规模不如别家大而向他诉苦的广隆洋行老板霍格说："只有两条路可走，—— 实行走私，否则，你就根本不必做生意罢！"③ 就是在阿礼国这一类"政府代表"的公开和隐蔽的支持下，"上海，…… 在前一世纪的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的一个真正黄金国。这些外国人都是惑于想在这个据传充满了发财机会的海禁初开的国度里，一图侥幸或转眼发家致富的希望，而来到这里的。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和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④

上海在近代的繁荣和发展，黄浦滩头这一座新城的隆起，在它的朦胧时期就已是这样地带有罪恶的印记，罪恶之下，是中国人民的屈辱。但是，在正义与邪恶之战中，正义虽然终将是胜利者，历史却不会永远在正义的战胜攻取声中前进。正如暴力曾在历史上

---

① Basil Lubbock: The China Clippers, Glasgow, 1922, 第320页。

② 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39页。

③ 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88页。

④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中译本，第86页。

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恶”的势力有时也会带来人们始料不及的结果。朦胧的黄浦滩，不是一首传统中国的田园诗，而是近代殖民主义者的东进序曲，灾难深重的中国封建末世社会，成了它嘎然作响的最好的舞台。我们马上就要看到，19世纪50—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加速了这首殖民曲的完成。

第六章　起义者与趁火打劫犯

一、小刀会起义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使得"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首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不仅承受着"旧税加新税"的沉重负担，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首当其冲地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杼轴之利甲天下"的苏松太地区，在仅及土布价格三分之一的洋布倾销下，"布市消减大半"，"商贾不行，生计日绌"，甚至专以织布为业的村庄，竟已"无纱可纺"，濒临破产边缘①。外国船只的大量涌入，又使素称发达的上海沙船业出现"市舶飘零"的凋落局面。同时，因广东、福建航运业破产而失掉生活来源的不少小手工业者，也沦落来沪，境遇悲惨。

压迫与反抗是一对孪生子。在清朝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掠夺下，上海地区很早就酝酿着人民起义的风暴。从1848年至1853年，上海及其附近的镇洋（今太仓）、青浦、南汇、华亭、嘉定等地不断爆发农民"抗粮"、"殴官"、"拒差"等斗争，打击封建统治者。如：1853年7月，上海、华亭两县抗粮群众，冲进上海县

①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

署，打伤知县袁祖德，烧毁催粮船；八月十七日嘉定农民千余人，捣毁县衙，驱走县令，放出被监的罗汉党领袖徐耀和无辜人民①。在上海租界内，人民反租地、反掘墓斗争也不断高涨。痛斥殖民主义者"以鸦片毒我生灵，以洋船掠我资财，蚕食鲸吞，得寸进尺"，"强占民地，挖掘坟墓，高起洋楼"，发出"别无他途"，只有起来赶走侵略者的呼号②！到了1853年9月，上海终于爆发了震动中国东南的小刀会起义。

小刀会是中国南方民间秘密团体天地会的一个支派，1850年左右由福建华侨陈正成创立于厦门，其主要成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上海与福建之间频繁的海上交通与商务联系，福建小刀会成立以后，很快就传入上海，并且由于在上海吸收大量失业或濒于失业的水手和其他劳动者参加而迅速壮大起来。

但是小刀会不是上海唯一的秘密团体，与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有密切关系的，除了与小刀会同属一个系统而势力更大的广东籍的天地会外，还有上海本地的塘桥帮、庙帮和由这两帮合并而成的百龙党以及罗汉党等秘密会党。这些秘密团体的成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水手、游民和部分行会商人及其上层人物。

这些秘密团体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组织，统名为小刀会，内分"七帮"或"七党"：福建系统的建帮和兴化帮，广东系统的广帮、潮帮和嘉应帮，浙江的宁波帮和本地土著的上海帮。③代表广东天地会的刘丽川，被推为这个新党的首领。刘丽川是广东香山人，1845年在香港参加天地会。从1849年起，他定居上海，因为能说英语，曾为上海商行的经纪人和丝茶糖业栈伙，并通过行医等活动在上海扩大天地会的影响。除了刘丽川外，小刀会的重要领导

① 上海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875页。
② 《北华捷报》1851年8月9日。
③ 《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遐迩贯珍》，见《汇编》第36、128页。

骨干还有福建小刀会首领李咸池、李仙云和本地秘密团体的一些领导人，如百龙党首领潘起亮，罗汉党首领徐耀，青浦天地会首领周立春等。

1851年1月，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所向披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驰骋半个中国，打到长江流域。从1853年1月起，仅仅两个月，太平军占武昌，下九江，夺安庆，势如破竹，于3月定都南京。这个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正在酝酿起义的上海小刀会成员。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仅半年，小刀会就在上海正式领导了起义。

1853年9月4日，小刀会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由周立春率领一支农民军，扬言要袭取青浦，实际却绕道进军嘉定，于五日凌晨占领嘉定，建立革命政权"义兴公司"。宣布"帅兵伐暴，志在扫除贪官污吏"，"与百姓秋毫无犯，惟问绅富索银"，并说"各邑岁歉之后，惨被贪官勒扰，民命难延"，因此，"一应赋税钱粮，全行蠲免，一应在案人犯，概行赦归田里"。① 起义后，嘉定"城内外开店如常，倒觉更为热闹"。②

嘉定起义的胜利，振奋了小刀会战士的斗志。这一年9月7日（阴历八月初五），按照惯例，上海地方政府的官员在清晨要聚集城内文庙，祭祀孔子。小刀会领袖们机智地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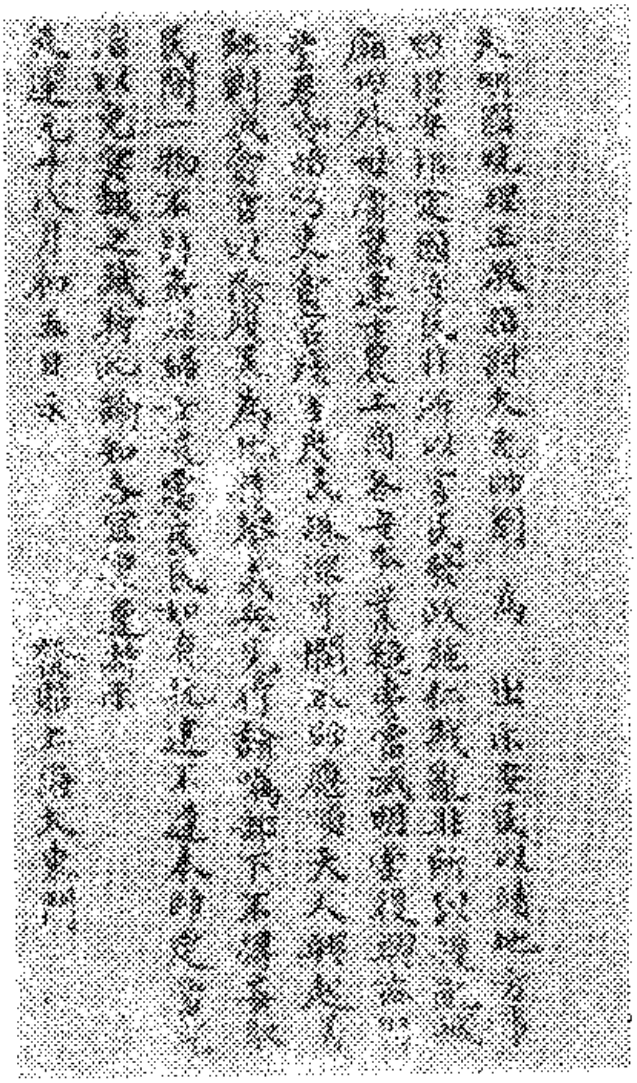
七日早晨，头包红巾，手执器械旗号的小刀会战士从北门和小东门胜利地攻进了上海县城。上海知县袁祖德企图抗拒，在县衙门内当即被杀。上海道台吴健彰则"象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印"③，被免于一死。但不到一个星期，吴健彰便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逃出了县城。上海的其他一些官员，如海防同

① 《汇编》，第28页。

② 《忆昭楼洪杨表稿》，《汇编》，第912页。

③ 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706页。

知蓝蔚雯、右营参将门震豫等，都闻风逃往松江①。上海人民热情欢迎起义军，不少人头裹红巾，自愿参加了起义军，当天晚上，城内已恢复了平静。一个目击起义的外国人写道："如此，一座有居民二十万及有高垣围绕的城池，被那些只有长矛和小刀的党人占据了，而全役只死了一个人。"② 小刀会起义的迅速成功，反映了人民普遍的反抗要求，和清朝统治的腐败和虚弱。



小刀会告示

根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传统宗旨，小刀会在上海建立"大明国"政权，推刘丽川为第一首领，称作"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不久，为了争取太平天国的支持，小刀会又将国号正式改称"太平天国"③。刘丽川上书洪秀全，自称"未受职臣"，请求迅速派人前来领导，"以慰民望"。上海城堞则"升悬太平天国旗号"，给人以小刀会遥受南京节制的印象④。刘丽川、李咸池等小刀会首领在上海城内外分别张贴告示，揭露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衙门竟同市肆"，

① 同治《上海县志》，卷11《兵防》。
② 《北华捷报》，1853年9月10日，见《汇编》，第60页。
③ 《上海法租界史》，第81页。
④ 《汇编》，第11—12，第130页。

“官府直如盗贼”；规定起义军“不得妄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宣称小刀会“锄奸除暴，为民非所以害民；发政施仁，戡乱非所以扰乱”①，鲜明地表示起义的目的是为民谋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小刀会起义军在占领嘉定、上海后，迅速由此两县派兵出击。嘉定起义军在9月9日攻占了宝山，9月17日攻占了青浦；上海起义军在9月10日攻占了南汇，13日攻占了川沙。这样，从9月5日至17日12天内，上海小刀会先后攻占了6个县。

接着，小刀会以主力向太仓进攻，一度占领太仓，计划与苏州小刀会配合，夺取苏州。但清政府镇压了苏州小刀会，并集中兵力在太仓和上海小刀会激战，起义军失利。9月22日，嘉定被清军攻破，周立春被俘牺牲，徐耀等率嘉定起义军进入上海。同日，青浦、宝山两县起义军也被迫退出县城；25日、27日南汇、川沙两县城又相继失陷，起义军主力退守上海。9月28日，清政府派来镇压起义的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的部队进驻上海城郊，小刀会由进攻转入防御。

小刀会起义发生在鸦片战争后对外开放的上海，必然与已在上海开辟租界的各国侵略者发生关系，这是以前的农民起义所不曾经历过的局势。刘丽川等人在处理同上海外国人的关系方面，一开始就表现得比较策略。小刀会政权宣布“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②，表现了与清朝统治者盲目虚骄的不同态度。小刀会宣布保护外侨财产“仍与各国照常通商”③。小刀会占领上海的当晚，刘丽川就亲自会见美国公使马沙利(H.Marshall)，说明“起事反抗清朝当局的意图”，保证“对于外侨一定秋毫无犯”④，9

① 《汇编》，第4页。
② 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汇编》，第17页。
③ 《汇编》，第15页。
④ 《北华捷报》，1853年9月10日，《汇编》，第57页。

月15日下午，刘丽川又正式会见各国驻沪领事，宣布小刀会属于太平天国领导，要求各国严守中立①。刘丽川还亲自接见外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等人，向他们宣传小刀会宗旨，婉言拒绝了传教士在起义军内部施教的要求，又通过来访者转告在沪外人"不用畏惧"，表现了比较成熟的对外政策②。

但是，小刀会对欧美各国光明磊落的态度并未改变各国对它天生的敌意。起义一开始就遭到外国侵略者的破坏。如前所述，美国第一个插手上海城内发生的事件。上海道台吴健彰是美国旗昌洋行的一名股东，起义一开始，美国公使马沙利就亲自出面要求释放被俘的吴健彰，在遭到拒绝后甚至准备派出200名士兵公开劫走吴健彰③。不久，美国就利用小刀会内部关于处置吴健彰的意见分歧，派了两名租界的"头面人物"，潜入县城，将吴健彰化装成商店小伙计，手执破伞，偷偷来到城墙根，用绳子将吴拦腰系住，缒出城外，藏匿在英租界的美国领事馆内④。

在美国的支持下，吴健彰很快在上海露面，并以苏松太道的身份重新活动。10月，清政府派来镇压小刀会起义的部队抵达上海，其主要头目是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和署理按察使吉尔杭阿。这些部队主要来自清军围攻太平天国的"江南大营"，也包括一部分称为"抚勇"的苏州地主武装。他们开抵上海后，主力部队驻在新闸，叫作"北营"；另一部分驻在龙华镇，叫做"南营"⑤。此外，还有吴健彰率领的上海本地清军。

从1853年秋天到1854年春天，这些清军曾多次向上海县城发动猖狂进攻，其中从黄浦江向县城的猛烈炮攻还得到外国船只

---

① 《北华捷报》，1853年9月17日，《汇编》，第62页。
② 罗孝全：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汇编》，第63页。
③ 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汇编》，第706页。
④ 《上海法租界史》，第80页。
⑤ 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兵防。

的掩护。但进攻屡遭失败，伤亡惨重。吴健彰的军队借口攻城，多次在紧贴上海县城外的繁华地区纵火。1853年12月7日，在大东门外进行大规模的焚烧和抢劫。一个目击者写道："时上海城外居民，俱为吴道所率广勇大肆焚掠，由小南门至大小东门，纵火延烧，通宵连日。百年富庶精华，席卷殆尽。士民市庶逃窜乞哀，昏夜号哭，焚死被害者何可胜道！所虏器用财贿，载入广艇大舟而去。报诸大营，以为尽烧贼巢也。主军政者称快，据奏论功。噫！红巾所不忍为者！"① 这个并不同情小刀会的人所作的记载，真实地写出了趁火打劫的清朝"官兵"才是真正的强盗。

鸦片战争后，没有外国的支持，清朝政府就无法独力镇压国内人民的起义。上海小刀会的起义过程，较早地说明了这一点。清政府在小刀会起义一年后还没有能够攻下上海县城，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还没有得到上海的外国侵略者的全力支持。美国在起义之初虽然出面将吴健彰救出并支持他重掌上海地方政权，但并没有公开反对小刀会。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清政府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英、美、法三国都以"中立"的面目出现，其原因除了暂时观望，最主要是想借"寇"自重，以此勒索更多的特权。当这种"买卖"使他们"称心"，而小刀会占据上海令他们"厌烦"之后，他们马上撕下"中立"的面具，公开插手镇压起义。事态的发展就是这样。

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后，英、美、法三国马上把上海租界划为"中立区"，声称无论小刀会或清军都不得利用租界进行军事活动。在中国的土地上擅自划定"中立区"，这本来就是一种破坏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而在紧邻上海县城的广阔区域（租界）内排斥小刀会进一步活动，这又破坏了小刀会的外围势力，使起义军固守的上海县城在一开始就有形同孤城之势。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中立"，三国也并未保持下去。由于战

① 姚际唐：《避氛后集》，《汇编》，第863页。

争，江浙两省的运输受到阻隔，而这时的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超过广州，战争对贸易造成的影响就很突出。起义使大量的外国货物（主要是鸦片和棉纺织品）在仓库里堆积如山。1854年5月6日的《北华捷报》在一份关于上海贸易情况的报道中说："自上海县城为三合会（即小刀会——引者）党徒占领以来，商业陷于停顿。……进口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上海最大的鸦片商行怡和洋行在1855年1月致香港总行的报告中说："鸦片市场仍然连续的不景气"，"虽然价钱这样便宜，但仍然没有人买。"① 各国商人当然厌恶这种局面，他们在《北华捷报》上公开宣称："由三合会以及其他秘密会社的目无法纪的徒众联合组成的集团，占据县城一年以上，破坏商业，消耗物资，向富人征收捐税，使所有留在城内的各阶层居民都遭受贫困、穷乏，被迫困守在城墙之内。这个集团是难于取得我们的同情和好感的。"冒险家们承认，由于小刀会起义，他们在上海，"无论是在走路、乘车、或在外做事，总是惶惶不安"，他们禁不住叫出了"日日夜夜萦绕在脑际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这种罪恶活动有没有早日终止的希望呢？外侨居民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在碧绿的田野上散步？什么时候可以再去访问农村，再从这个狭隘的城郊市廛到青山之上、绿水之边去逍遥散步，重享心旷神怡的幸福呢？"②

为了重享他们在这块被入侵土地上的"心旷神怡之福"，外国侵略者终于撕下"中立"的伪装，举起了屠刀，不惜用血与火来换取殖民者的安宁和逍遥。

奇怪的是：外国军队首先进攻的是驻扎在租界西北角的清朝军队。他们要"荡平"的是城里的小刀会政权，为什么却先向前来镇压小刀会的清军开刀呢？这好象不合逻辑。实质上是，英美法

---

① "上海怡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见《汇编》，第491页。

② 《北华捷报》，1854年10月21日，《汇编》，第433页。

各国已把上海租界看作是它们在东方的一块殖民地，进攻清军是为了维护所谓租界的“安宁”。当时驻扎在新闸一带的清军“北营”，因为紧贴租界的关系，经常与在跑马厅和花园弄（今南京东路）西首骑马散步的外国人发生磨擦，老资格的传教士麦都思也在那里受到过惊吓。为了保护所谓租界侨民的“安全”，以英国领事阿礼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决定“不愿意再让这些讨厌的邻居驻在租界门口了”。于是发生了所谓“泥城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lat)。①

1854年4月3日，阿礼国借了一起小争端，给上海道台吴健彰和吉尔杭阿送去了最后通牒，限令清军在次日下午4点前撤离并搬至租界西面2英里外，否则他就要攻打、毁灭这些营房。4日下午，英美军队约300人集结在英租界西首的泥城浜附近（约当现在的南京东路六合路口），听候答复，结果清军拒绝撤退。四时，英军炮击北营，并因风纵火，清军略作抵抗后很快溃败，而营房被焚毁。

这场持续不到2小时的战争得到外国侵略者的高度重视。战争一结束，上海租界内的“全体侨民”就由走私商人广隆洋行老板霍格(W.Hogg)、鸦片贩子宝顺洋行老板比尔和金能亨带头，分别致函英国领事阿礼国和美国领事马辉(R.C. Murphy)，称颂他们“为了保持租界的安全而采取了迅速和坚决的措施”。②这场战争还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在给驻华公使包令(J·Bowring)的信中“表示赞成上海英国当局的行动”，并代表英国政府

---

① 据一个参加这场战役的美国商人魏德卯记载，这个名字的来源是这样的，据说有一个水手在泥城浜旁边滑了一脚，踩到污泥里了，他把沾满了泥的脚拔出来时说：“这一战很可以称作‘泥脚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oot)”，一个印刷上的错误，把脚(foot)排成了平地(flat)，于是，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了。见《上海法租界史》第114页所引魏德卯《远东生活回忆录》（第9页及其后）。因此战在泥城浜附近进行，故中文作“泥城之战”。

② 《汇编》，第397—398，403页。

宣称“女王陛下政府完全表示同意”①。甚至在半个世纪后，上海的外国人还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这场战争，《北华捷报》在1904年4月4日还专门纪念了“泥城之战”50周年。

外国侵略者之所以如此重视这场为时极短、规模很小的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泥城之战”是他们用武力来“保护”租界“安宁”的第一次尝试，而尝试的“成功”增加了他们“制订保障上海租界永久安全的进一步办法”的信心（下一节将详细叙述这个问题）；从当时的局势来说，这场战争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就范，则有利于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小刀会。

“泥城之战”的第二天，吴健彰就亲自到租界表示希望以后不再发生敌对行为。三个月后，咸丰皇帝以许乃钊“督师上海，日久无功，处处为夷所挟制”，革了他的职，将吉尔杭阿擢任江苏巡抚，仍驻守上海。吉尔杭阿是怎样一个人呢？当时美国驻华使馆代办伯驾（P.Parker）曾当面夸奖吉尔杭阿，说以自己在中国20年的经验，“认为最大的人物伊里布、耆英及贵抚臣而已”②。伊里布、耆英在订立《南京条约》时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吉尔杭阿的地位虽不及他们，其作用却是相似的。伯驾的评论得到外国人的普遍赞同，他们认为伯驾“与当地官员交往频繁，能够评定他们的品德和才能”，“而吉尔杭阿的态度和风采，足证伯驾博士将他评为中国三大官员的估计是正确的。”③吉尔杭阿和侵略者们的关系是不言而明的了。这样的人物上台后，上海的局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期间海关和租界的变化，我们留待下一节叙述）随着中国主权的沦丧，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步子加快了。正如一个英国人评论的那样：“中国人（指清朝的上海地方政府）与外国官吏的关系，在

① 《北华捷报》，1854年9月16日，《汇编》，第432页。
②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书店版，第156页。
③ G·Lanning—S.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卷一，第306页。

泥城之战以后，比以前更加融洽了。”①

所谓“融洽”，就是勾结起来镇压小刀会起义。勾结的第一步，是由租界当局在上海县城北门一带筑起一道围墙，切断县城和外面的联系。这是由美国公使麦莲(R.M.Maclane)提议，经麦莲和吉尔杭阿两人“合衷熟商”，最后会同英、法两国作出的决定，而具体联系此事的，则是在洋泾浜自设“泰记”(一作大记，外人著作称为Ta—kee)商号，推销外国商品的原怡和洋行买办杨坊，他在吉尔杭阿的指使下，“说西人于东北筑土城，断城接济”②。从1854年 9 月起，法国第一个开始筑墙，接着，美、英已先后完成了各自负担的一段，整个工程由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LaGuerre)派兵督造。这道围墙，处于洋泾浜南岸和县河北岸之间，东起黄浦，西至郑家木桥(约当今浙江南路附近)，将上海县城和租界之间的交通完全阻断。《北华捷报》宣称，这样做是为了“增加官兵成功的机会”③。而“成功”地在中外间联络此事的杨坊也因之“叙劳由同知得道员”④。

由于法租界紧邻上海县城，法国在镇压小刀会的活动中特别起劲。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很早就主张以武力对付小刀会。围墙筑成后，他迫不及待地挑起事端。12月 9 日，他以起义军不肯拆毁洋泾浜南岸炮台为借口，命令法舰炮轰县城和小东门炮台两小时之久。14日，辣厄尔宣布自即日起，法军与小刀会政权进入战争状态。1855年初，辣厄尔联合清军，向上海县城发动猛烈进攻，挑起了“北门之战”。

1月 6 日，法国领事馆前面的法军两尊炮向县城东北面连续轰击一小时，当北门城墙被轰开一道缺口时，240 名法军在法舰“贞

---

① A·Michie: The English man in China，卷一，第140—141页。

② 同治《上海县志》，卷 23，《游寓》。

③ 《北华捷报》，1854年 11 月 25 日，《汇编》，第 441 页。

④ 同治《上海县志》，卷23，《游寓》。

德”号和“高尔拜”号的炮火掩护下，从缺口处攻入县城①。

机智勇敢的小刀会战士，在首领潘启亮的指挥下，沉着地隐蔽在被炮火映红了的一个当铺的高墙后面，给法国侵略军以出其不意的伏击。一个当时住在上海县城北门外亲睹这场战斗的美国传教士写道：“（起义军阵地前的）空地上布满绊络中藏长尖的铁钉，足履其上有入无出。此外复有几个很深的污水坑，满贮粪溺。全地早已严密布防，走入不上二步即不免投入陷阱了。设使他们（法军）下城直奔此地，必至全军覆没……”② 在小刀会的痛击下，法军狼狼逃窜，被击毙击伤军官四名，士兵约六十名，跟着法军屁股后面进城的清军死伤2000余名③。

“北门之战”以侵略者和清军被打得头破血流、伤亡惨重而告结束。战后，外国侵略者和清军只能以加强封锁来代替武装进攻。封锁的主要目的是切断县城的粮食和火药供应。

“北门之战”后，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困守了上海一个多月的小刀会起义军，决定突围，北上镇江参加太平军。1855 年 2 月 16 日，正是咸丰四年的除夕，那天深夜，起义军在刘丽川的领导下悄悄打开西门，进行突围。第二天黎明，他们在上海近郊的虹桥和清军相遇。在激烈的遭遇战中，刘丽川壮烈牺牲，起义军的其它首领如徐耀、周秀英也都在突围战中献出了生命。潘启亮所部和福建帮各有一部分起义军分别到达太平天国境内，在太平军中继续战斗。

小刀会起义，始终没有得到太平天国的支援，孤军奋战了17个月，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派；但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终于失败了。他们的革命精神永垂史册。

---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 155 页。

②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汇编》，第512页。

③ 《汇编》，第 540 页。

二、一对怪胎——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和外国人统治的工部局

上海县城又落入清政府手中，便出现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刘丽川的头被砍下后“传示各营”，清军在城内进行大搜捕，抓到起义者即刻“凌迟枭示”，甚至已死者也被“开棺出尸，沿路抛弃。”① 屠杀的同时，清军还在上海城内纵火焚烧，乘机抢劫民财，整个上海县城火光冲天，哀声不绝“东南半城顿为灰烬”②，“西南一带城垣半已轰倒”③，富庶的上海县城遭到一场空前的劫难。

当血腥和硝烟在屠伯们的庆功声中渐渐淡去时，上海城慢慢地恢复了平静。商人们又来到了市场，人群又在县城的大街小衢中出现，十六铺和小东门一带，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忙。租界上的洋人们又开始悠闲度日，新跑马场上的马蹄声似乎重又清脆起来④，外滩和花园弄上，时时可以看到西洋仕女们乘着牛头小车，在晨昏时悠然而过。

但是，上海就这样平静吗？一场持续了十七个月的战争，就没

---

①③ 毛祥麟：《三略汇编》，卷5，《汇编》，第824页。

② 王韬：《瀛壖杂志》，卷3。

④ 上海开埠后，外国商人经常在外滩新海关北面一条河浜（今九江路）北边逶西向界路一带跑马，逐渐形成一条跑道。中国居民因见此道由跑马而成，遂呼之为“马路”，这条“马路”约当今南京东路从外滩到河南中路这一段。上海地方俗称街道为马路盖源于此。1850年左右，外商在沪组织“上海跑马总会”，圈界路以西、“马路”以北一块方圆约80亩的土地为跑马场兼作花园，这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场，因其东南端设有“五柱球”(Fives)球房，俗称“抛球场”。而“马路”因其通往这个新辟的花园，也被命名为“派克弄”，意为“花园(Park Lane)弄”。一八五四年，上海跑马总会的股东们乘租界地皮大涨之时，高价出售原跑马场，用所得部分价款，在今浙江中路和租界西界（今西藏中路）之间重新租占了一块百亩以上的土地，仍辟为公园和跑马道，是为新跑马场。

有给它带来任何影响吗？ 在租界上的强邻们久留不去的年代里，这是不可能的。古老的城墙里面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会与它北面的“邻居们”丝缕相关，我们从前面的叙述里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然而，事情还远不止这些。

在近代中国，外部势力总是利用中国内部的腐败、无知和动乱，制造或利用可乘时机，榨取利益。如果说，外国侵略势力在1840年是利用了清朝的腐败，发动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继而又在1845年利用了清朝官员的无知，在上海攫取了第一块租界，种下了一颗准殖民地的种子，那么，在 1853—1854 年间，它们更是利用了中国的动乱，让这颗危险的种子破土而出。

这些殖民主义的开拓者们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早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时，上海的外国人就行动起来了。1853 年 4 月 8 日，英、美领事分别主持会议，以保护各国侨民安全为名，讨论“正式组织一支防御力量”的问题，结果决定成立上海义勇队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后称上海万国商团)，在沪的所有英国人一律编为义勇队队员，聘请前印度孟加拉第二步枪军团的军官屈隆孫(Tronson)充任团长。同时，又组织了一个由美国副领事金能亨参加的五人协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co—operation)，负责侨民与官方，领事和各国驻沪海军之间的联系。4月 12 日，阿礼国主持了由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和海军官员参加的全体侨民会议，决定修筑所谓长期防御工程，其主要内容是在洋泾浜和苏州河之间，沿泥城浜(约当今西藏中路)自南而北掘一障以土垒的阔壕沟，名曰护界河(Defence Creek)。这样，英租界的四周都被水围绕了起来，形成一个防御体系，宛若一座由护城河环绕的独立城池。①

在中国的土地上划一块防御区，组织武装力量，修筑防卫工事，这些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当时并没有被清政府所关注，当

① G.banniag—S.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第305—306页.

然更谈不上抗议和阻止了。清政府这时关心的是怎样对付“内寇”，对于外国人在上海的军事力量及其措施，不但没有提出反对，甚至还有“借重”的意思。例如法国军舰“喀西义”号于1853年3月由宁波来沪“保护侨民”，上海道台吴健彰“代表抚台恳切要求法国领事派这艘海防舰援救南京”①，吴健彰还曾“致函英使，请助清廷攻打太平军”②。由于当时各国还维持“中立”面目，这些要求未被接受。

更进一步的僭权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第二天，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起义群众捣毁，租界当局马上派兵占据了海关。阿礼国、金能亨各出布告，宣布从9月9日起，实行所谓“领事代征制”，即在中国政府无力收税的情况下，由英美领事向各国商人征税，存于领事馆内，至于将来是否移交中国，据阿礼国声称，将由英国政府决定。惯于走私的各国商人，这时乘机蒙混过关，有些公开拒纳关税。法国领事爱棠(B.Edan)以中国政府无力保护正常贸易为由，公开宣布法国商人可以不纳关税③。而英美商人的所谓纳税，也只是出具一个甘结——远期支票，承诺在将来某日付清应缴税款。不久，就是这样的收税也由于英美之间的矛盾而名存实亡，到1854年初，美国和英国先后宣布放弃领事署代收关税的办法。上海完全成了自由港。

清政府这时正需要大量税款用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而上海关税则是其中的大宗，如吉尔杭阿所言，如果上海外商“抗税不交，则不但上海一营立即断饷，即金陵、京口红单船等营，亦皆无可协济”④，所以上海道台吴健彰逃出县城后，急于恢复税收。上

---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58页。

② 《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6页。

③ 爱棠致美国商人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2卷，第15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9卷。

海海关的税收是由上海道台兼理的，但吴健彰原来的海关官印已被小刀会没收，他只得奏准咸丰皇帝，向常州漕运使商借官印应用，并在1853年10月10日发出“关税征收事宜仍按旧例办理”的通知。接着，吴健彰作了三次努力，企图恢复上海海关，但都归于失败。

吴健彰既是旗昌洋行股东，又是靠美国人救出来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努力，便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853年10月通知各国领事说，上海海关将设在停靠在浦东江面上的两只船上，要各国商人从10月28日起到那里去交税。但这个计划遭到英、法的坚决反对，各国商人也都拒绝付税。两只充作海关的船名“羚羊”号和“羊神”号，是吴健彰向外国买的鸦片船，一些外国人明其底细，称作是“一只裂缝特别多的破船”，主张武力驱逐①。果然，还没有到10月底，这个水上海关未收分文关税，就被英国炮舰赶跑了。

吴健彰又作了第二次努力。1854年2月9日，他在苏州河北岸重设海关，各国领事虽然表示承认，暗中却怂恿各国商人拒绝纳税。在领事的包庇下，外国商人互相引用不纳税的实例进行公开反抗，有些商人则将货物运往吴淞后偷偷装走。最后，他们只向上海海关出具一张保证书，说是只要其他国家的商人交了税，他们以后一定补交。作了这样的空头保证后，这些满载货物的船只便扬长而去，苏州河北岸的上海海关仍收不到税。

吴健彰的最后办法是把海关往内地方向挪。四月底，他在黄浦江上游的闵行镇和苏州河上的白鹤渚设立两个税卡，凡是内地输往上海的丝茶，先在这两个税卡缴税。这个办法遭到英、美、法等国的激烈反对。5月1日，三国领事联合照会吴健彰，声称在内地设关是违反条约的。新任美国公使麦莲宣称，中国“必须对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负完全责任”。5月9日，三国领事又发表通告，

① J.K.Fairbank: Provisional Systemat Shanghai in1853—1854。

"要求商人帮助他们，提出他们所能获得这些内地关卡的任何勒索，特惠权或其他违章行为的实据"，实际上是鼓励各国商人对内地收税寻衅，而各国商人暗中确实也收到不必正常办理纳税手续的通知①。在这种种威胁和阻挠下，内地设卡征税的办法也未能实现。

英、美、法各国这样设置重重障碍打击上海海关，使它一直陷于瘫痪状况，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要夺取它们觊觎已久的中国关税行政。阿礼国在和吴健彰的交涉中，早就提出由外人"帮办"税务的建议，而阿礼国本人作此设想则更早。1850年10月他就曾在一封公函中表示过"改良海关行政"的"理想"。1854年6月15日他给英国公使包令一份备忘录中，就此提出了具体办法，这些办法是，"道台和各有约国领事应会同指派一个外国税务委员，两个一等通事，一个或几个中国录事，以及一个或几个外国人充任海关验货员。……外国税务委员应在海关内办公，并且一切公文应由他审阅稽核。税票应有他的签署，同时一切中文案卷和簿籍不但应送交他核阅，而且应送交各领事和道台核阅"②。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为外人管理中国海关画了一张蓝图。这时，阿礼国已开始和吴健彰就海关行政引进外国人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中，阿礼国以归还领事代征期间所得的关税相诱。吴健彰在重设海关的努力中处处碰壁，而大宗关税长期无着落，势必影响清军的兵饷，而他本人也有因此而受朝廷贬黜危险③，因而在谈判中很快屈服了。6月21日，美国公使麦莲与两江总督怡良在昆山作了一次会晤，吴健彰也参加了。怡良为了争取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革命力量，在那次会晤中授权吴健彰与各国领事进行谈判，"速将上海商税事

①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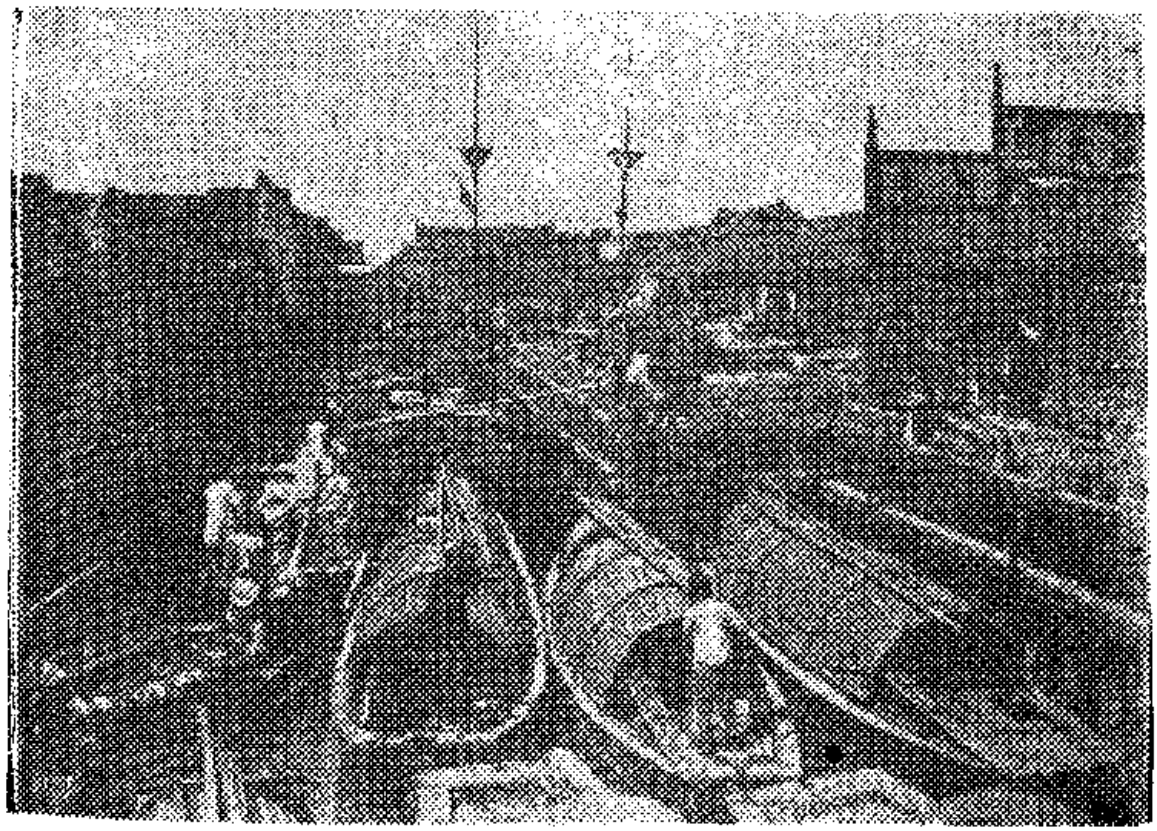
② 同上，第113页。

③ 吴健彰终于未能保住官职，就在税务谈判正在进行时，光禄寺少卿程恭寿参其通敌，咸丰未作任何查核，在这一年七月将他革职拿问了。

宜，从长计议，妥为办理，勿致各夷有所藉口”①，6月29日，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举行了一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订立了关于上海海关协定八款。这份海关协定是列强攫取中国关税行政将近百年的发端，其第一款称：

> 海关监督前所感到的主要困难，一向是在于无法罗致诚实、精明和熟悉外国语言的关员，以履行条约和执行海关章程。惟一适当的补救办法，似乎就是在海关机构中引用外国人才，由道台审慎选择任用，以弥补道台阁下深以为苦的缺陷，并借为有效而可靠的工具，以利办事②。

吴健彰和三国领事分别在这份协定上钤印签字。7月6日，三



江海大关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8。

② 《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15页。按这份协定的中文本未见，此处是根据外人著作中所引档案译的。江恒源编《中国关税史料》第三编第2页称协定“共计九条”，不知何据。今从前说。

国领事联名在《北华捷报》上刊登布告，以新制度及其实施日期，通知外商。12日，三国领事指派英国人威妥玛(T.F.Wade，当时是英国驻沪副领事)、美国人卡尔(L.Carr)、法国人史密司(M.A.Smith)在7月12日组成了关税管理委员会。上海海关的关税行政从此落入外国人手中①。由于英国在华商业利益最大，这个三人委员会主要由威妥玛当家。一年后，威妥玛回任副领事，英国指派了另一个狂妄的侵略分子李泰国(H.N.Lay)继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人帮办税务"的制度写进了《天津条约》。1859年，李泰国被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为总税务司，由上海肇始的这种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先被推广到广州，继而被扩展到全国各通商口岸，严重地侵夺了中国的主权，加重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屈辱的象征。

领事代征期间英美领事共征得税款银887000余两。前面谈到，在谈判海关引进外人问题时，作为交换条件之一便是缴还这部分欠税。但这种承诺大部分并没有兑现。英国政府借口清政府没有尽到保护上海英商的责任，把英国部分的40多万两一笔勾销了。美国欠税30余万两，拖延了两年多，最后才交出73000余两，其余的以代征手续费和其他借口，也一起赖掉了②。不过，关税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上海的税收算是恢复了。从7月12日开关起到11月30日，上海海关征收新税银864000余两③。这些税收，马上被清政府挪作军饷，去镇压革命。对此，清朝统治者竟有感激之意，曾国藩曾在一封私信中写道："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

① 这时的海关仍设在苏州河畔吴健彰曾充作海关之用的那所房子里，后来迁入外滩以西的一堆栈中，1857年才定设于外滩，建立了一幢古庙式的关署（在今外滩海关大楼原址）。

②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16—117页。

③ 《北华捷报》，1854年12月9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7页。

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①

然而，就在清政府不惜以贱卖主权换取维持封建统治的财源之时，这些商贾之国的君子们却正在上海营建他们的“共和国”。他们利用小刀会起义所造成的动乱局面，仗恃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制造出一个“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来。

近代资本主义有一种同资本前的野蛮入侵者不同的特点，就是惯于利用侵略的“合法性”，具体地说，就是重视条约、章程所起的辩护和赖以为据的作用，把赤裸裸的侵略行动披上一层“言之有理，行之有据”的外衣。在上海租界问题上，他们就是这样。1845年的《土地章程》被上海的外国人视作“根本大法”，但到了1854年，他们已觉得这个章程的内容不敷应用，不能作种种有利于扩大权益的解释了，但是他们不愿抛弃章程，因为这是个护身符。于是动脑筋要将它修改一番，以适合新形势下“有章可循，有法可据”的要求。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领事阿礼国。1853年6月下旬，他就提议由英、法、美三国自行修改《土地章程》。修改的主要目的，是要共同组织一个市政机关，管理全部三国租界。这一提议未得到法、美两国的积极响应。特别是法国领事对此感到为难，因为法国当时并无军事力量在沪作后盾，既不敢拒绝联合，自置于所谓共同保护体（当时主要指抵抗太平军可能的进攻）之外，但又不愿放弃法租界的“独立”。而美租界当时还没有界址，虹口一带主要是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区域，大部分美国商人仍在苏州河以南活动，所以美国对租界行政的“统一”也不甚热心。9月，上海县城被小刀会占领，租界内的修改章程问题稍稍搁置了一下，但马上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在这以前，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大约仅500人左右；县城被占领

① 《覆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文集》，世界书局版，书牍，第75页。

后，大量华人由于战乱而涌进租界，据租界当局的一份正式报告估计，这时的中国居民人数剧增至20000以上①。这样，划界之初的华洋分居局面自然被打破。阿礼国等人一致认为，要管理众多的华人，租界在行政上的需要更迫切了；而在行政上有所举动，第一步便是要"立法"，也即修改1845年的土地章程。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854年7月8日②，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和法国领事爱棠，正式宣布了经三国公使共同签字的新土地章程14款。同年7月11日，这个章程在英国领事馆内召开的租地人会上通过，名为《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一般称作第二次《土地章程》。这个章程完全是由三国公使草拟，在外国人自己的集会上通过并在租界内实施后，当作既成事实，才移文通知上海道台，着其办理有关事宜，根本没有遵守第一次《土地章程》的规定，与清政府作任何形式的商议或谈判，而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地方政府处于瘫痪状态，道台吴健彰本人也成了租界内的"难民"。三国领事正是利用了这种时机，以遂其野心图谋。所以，这个新章程所反映的只能是外国侵略者的意图，它在许多主要之点上对1845年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以适应外国侵略势力的需要。这次章程对前《土地章程》所包括的主要方面有如下的重要改动③：

一、租地范围。确认了1848年的扩界，将它写入章程而"合法"化了，并加上麟桂与法国领事敏体尼商定的法租界四周地界。当时美租界尚无正式界址，故未列入。租界面积扩大到3808亩，与第一次章程相比，扩充了三倍多。

---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134页。

② 这个日期系根据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档案，见《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37页。《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10上，页22—25）和Jesus所著Historic Shanghai（页93）则称这次章程公布的日期是1854年7月5日。今从前说。

③ 1854年《土地章程》全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0—82页。

二、租地办法。仍由外国侨民直接向中国业主洽商租地，取消第一次章程各国商人租地须先得到英国领事许可的规定，改为由租地人向该国领事呈报并转移道台查核。取消押手，由租地人将地价一次付与中国业主。在每年12月15日，由租地人直接向中国政府完粮。在本次《土地章程》所附的“租地契式”中虽然尚有“永租”字样，但实际上租界当局通过上述租地办法（地价一次付与中国业主），已擅将外侨租地的“永租”变为“卖绝”，从而巩固了外国人占有租界土地的基础。

三、默认“华洋杂居”。这次《土地章程》取消了“华洋分居”的有关规定，因而等于默认了“华洋杂居”的事实。但章程所附“租地契式”载有“若华民欲在界内租地赁房，须由领事官与中国官宪酌给盖印契据，始可准行”。同时成立的工部局在它的第二次董事会议上擅自决定向中国居民征税，照房租价值的8% 征所谓“巡捕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政府并不希望租界内“华洋杂居”。这次章程公布后不久，各国领事曾以华洋杂居后所谓卫生和风纪问题联名致函上海道台蓝蔚雯，请其设法维持。道台不无埋怨地回答道：“昔年以条约及章程（按即第一次《土地章程》——引者）之故，租界内不得华洋杂处，故无纷扰之弊。今者五方杂处，毫无甄别，游民盗贼之麕聚，亦固其所。若长此不更，租界内地，将两受其弊，亦惟有设法防范而已。”① “防范”的措施之一，是上海道在1855年2月24日公布了“华民居住租界条例”，对中国人居住租界作了种种繁杂的规定，但结果未能实行。此后，租界的居民大部分是中国人，由极少数外国人统治极大多数中国人的局面由此形成，这在租界的历史上是一项重大的变动。

当中国人大量涌入租界之初，在外人社会中有一场关于是否

---

① Jesus: Historic Shanghai，第98—99页，此处据程灏节译本《上海通商史》，商务印书馆版，第31页。

容纳华人居住的争论，一部分外国人以租界的“宁静安乐”为由，提出驱逐中国人①，而大部分外国人却以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代表后一种意见的是“一最有势力之西侨”，他的一番话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冒险家们的心情。他在肯定“与华人杂居，异于广州之隔离制度，亦不无利益”后，对阿礼国说：“余之职务在于最短期间致富，将土地租与华人或架成房屋租与华人，以取得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利益，倘此为余利用我金钱最善之方法，余只好如此做去。迟则二三年，余希望能捆载而归，则将来上海之沦为沧海，或化为劫灰，又与我何涉？执事幸勿望吾一辈人自愿流亡在此水土不合之地多年，以求繁荣也。实则，吾人均系赚钱与实事求是的人。吾人之职务即在赚钱，愈多愈好，愈快愈好。——为达此目的，一切法律范围内之办法均认为良善。”② 这种意见占了上风。中国人有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神圣权力，由本来只是“划地居留”的外国人来讨论是否允许中国人居住，这是一种离奇的现象，但在屈辱的近代上海，租界内的华洋杂居却只是因为殖民者的贪欲才得以实现的。

四、变“更夫”为巡捕。章程第十条含混其词地载有“设立更夫或巡捕”(establishing a watch or police force)的字样，实际上已将第一次章程中只在夜间报更鸣警这种职责极为简单的更夫，一变而为武装巡捕。这种武装巡捕，加上一年前成立的上海义勇队，组成了上海租界最早的武装力量。就在通过这次《土地章程》的7月11日租地人会议上，通过了工部局组织巡捕的决议，并在工部局董事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发信到香港，聘请曾在香港巡捕

---

① 当时确实曾驱逐过中国居民。英国领事阿礼国在1854年就曾“设法毁华人之屋而逐之”，1855年初，“华官乃正式驱逐租界华人，并毁其屋，于是华人之流离无归者数千人，咸归咎于西人”。见《上海通商史》，第32页。

② Rutherford Alcock: Capital of Tycoon,(1863)，卷一，第37—38页，译文见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

房任高级职务的克列夫登(S·Clifton)带同"优良"巡捕来沪,由克列夫登任捕房"总巡"。在接着制定的捕房服务规则二十七条中,给予巡捕以奉领事命令搜查军器和解除华人武装,"协助"征税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权限。

五、成立工部局。这次《土地章程》对中国主权最赤裸裸的侵犯就是成立工部局(当时称作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后来改作Municipal Council,意为市政委员会),作为总揽租界全局,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以外的统治机构。在通过《土地章程》的租地人会议上,英国领事阿礼国直言不讳地声称:"此种市政机关的最初的功绩之一,或者应该说因其创立而自然发生的最初又最大的利益之一,便是使驻在当地的文武官员由于一种严重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可是不能为任何法律原理所容许的许多办法成为合法。"① 换言之,作为资本主义法治国家来的这位领事,完全清楚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土地上设立这种行政机构是非法的,但是,为了建立他们在中国的这块殖民乐园,他们准备抛开所有足以妨碍他们行动的"条约根据"和中国政府的法令,让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是,为所欲为;而在阿礼国看来,当时太平军占领南京和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恰恰构成了这种所谓"严重的需要"。

六、章程修改办法。第十四款载,章程"须三国领事官会同道台商酌,详明三国钦差及两广总督允准,方可改办"。这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它根本未能缚住侵略者的手脚,此后章程虽曾多次修改,但均未与中国政府"商酌",也未得中国方面的批准。

根据第一次《土地章程》的规定,章程的任何增改,均须与中国地方政府商议,得道台同意后始得发生效力。1854年的《土地章程》是在完全撇开中国政府的情况下,由侵略者直接决定的,其根据

① 《费唐报告》,第一卷,第36—37页。

即使按照西方的法律标准也是难以成立的。美国作家雷塞就曾写道："在香港殖民政府工作的英国法律顾问们长时期内对工部局的法律地位提出疑问，虽然这种怀疑从来没有妨碍过它的权力。"① 当时侵华各国商人和他们的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这次《土地章程》标志着上海的各国领事当局和他们的商人们已统一起来，可以合谋建立"自治政府"了。阿礼国说："新法律（按即指此次《土地章程》——引者）的制定，具有一种明白的企图"，即是："经由租地人，为全体外人社会，获得自治的权利和为市政目的而征税的权利；由此二端而得有手段，以保障外人社会本身的安全与幸福。"② 这段话道出了这次《土地章程》的全部要害所在，包括阿礼国辈理想中的"独立自治国"的全部大纲。

所谓"自治的权利和为市政的目的而征税的权利"，即是夺租界所在国——中国的主权而行使一种殖民地的行政权，成立工部局就是这种行政权的象征。7月 11 日的租地人会议通过《土地章程》后，马上根据章程的第十款组织工部局，第一届董事会由五人组成，他们是凯·威廉（W.Kay）、金能亨、费隆（C.A.Fearon）、麦都思、金大卫（D.O.King）③。工部局在后来的日子里完全发展成为一个殖民政府机构，是外国在租界内行使殖民权力的最重要的工具。

所谓"由此二端而得有手段，以保障外人社会本身的安全与幸福"，则是夺中国的警察权、司法权的巧妙的但也是赤裸裸的辞令。工部局成立后，由其董事充当法官，每人轮流担任一周，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民刑案件。而租界内的外国人则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这样，清政府在租界内就没有什么司法权可言，虽然即使根据不平等条约和《土地章程》，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及无领事国侨

① Ernest O.Hauser: Shanghai,City for Sal,第43页。
② 《费唐报告》，第1卷，第36—37页。
③ The History of Shanghai,卷一，第320页。

民仍属中国官府管辖。

最后，所谓“租地人会”，当时不过49人，但它不仅煞有介事地通过这次《土地章程》，通过组织租界防卫委员会（Defence Committee），而且还讨论表决工部局提出的其他议案（例如同年10月17日、11月10日两次讨论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借款征税案）。证以上引阿礼国所谓“经由租地人”的话，可以看出，在阿礼国等辈的心目中，这个租地人会已俨然是这个“独立自治国”的“立法机构”了。

立法、司法、行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外国侵略势力就是这样对清政府划给外国商人通商居住的居留地进行这样精心的“改造”，以适应殖民者的“商业精神”的需要。可以这样认为，从1845至1853年，上海租界基本上保持着外侨聚居区的性质。租界内虽有永租和华洋分居的规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清政府限制居留地扩大的意图的；界内虽有外侨组织的所谓三人“道路码头委员会”，但还属于自助性质，不享有行政权，更无“自治权”；清政府对界内的中国居民还在行使征税、管理等权，对租界的事务还有一定的审核权。但是，从1853—1854年起，出现了所谓“上海义勇队”，经过武装“保卫租界安全”的泥城之战，特别是通过第二次《土地章程》和成立工部局后，租界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出现了一个殖民地性质的“独立自治国”的雏形，这个“自治国”的政府就是工部局。清政府原来旨在限制西方影响扩大的外侨集居地，成了一块它越来越无法行使主权，而西方各国则可以按照他们的面目改造的特殊区域。这是清朝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即使在1854年，他们也根本没有看到它的严重性，因为上海租界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时也只是初露端倪罢了。

一个英国的上海史作者写道，1854年上海产下了一对孪生子：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和外国人统治的工部局①。我们不妨引申其

① The History of Shanghai，卷一，第318页。

意，说这是在上海的阵痛中分娩的一对怪胎。畸形的海关制度和变相的殖民政府工部局是在中国痛苦的痉挛中产生的，它们是外国侵略者利用动乱趁火打劫的产物。但这还仅仅是第一幕，"海燕于波浪掀天中攫鱼最多"，上海历史上接下去将要演出的一幕，仍然是1854年的旧剧新演。不过，在苦难的近代中国，西方列强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攫鱼充饥的海燕，而是翻江倒海的恶蛟。

三、太平军在上海地区的战斗

太平天国的首府天京，离上海不过300公里之遥，这场巨大的农民战争，必然给上海的历史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是在1860年前，由于北伐、西征以及1856年的内讧，太平天国与内外敌人开展着艰苦的斗争，无暇顾及东南。上海的官商士绅们一直惴惴于这支力量一旦东征对他们的危害，但迟至1859年末，太平军并未东征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的鼓舞下爆发的，但并没有得到洪秀全的正式承认。总之，在太平天国的最初10年内，它对上海的影响还是间接的。

这种局面到了1860年有了变化。

1860年3、4月间，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忠王李秀成，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从皖南进击浙江，攻入省城杭州；当清政府惊惶地从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分兵增援杭州时，浙江的太平军却突然主动撤出杭州，迅速回到皖南，与预先安排在那儿的英王陈玉成所率各路军队会合，对围攻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实行迅猛的反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江南大营全军崩溃。

太平军出奇制胜地粉碎了江南大营，为东进苏、杭和上海创造了条件。在干王洪仁玕等人的决策下，太平军决定用较大的兵力夺取天京东南的富庶地区。在李秀成的指挥下，太平军在5—6月间连续攻占了常州、无锡和当时苏南政治经济中心苏州。六月

底，李秀成的部队已逼近上海。

太平军在上海附近各县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6月22日，克嘉定，30日下青浦，7月1日占松江，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在进攻青浦时，由于得到城内人民的支持，进攻更是顺利，“城上白旗一扬……顷刻失守”。①

但是，当李秀成率军准备乘胜夺取上海时，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敌人。

在经济上，特别是商业上的迅速发展，上海在当时英、法和清朝朝廷谈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②，以及租界内已存在的一个“独立自治国”的雏形，这些都使侵华各国把上海视作一个最重要的据点。所以，李秀成所率领的太平军在上海将面临的敌人，除了清清楚楚的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地主、官僚外，还有面目不那么清楚的外国干涉者，以及作为两者桥梁的买办分子。

1860年夏，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关键的时刻。英、法两国在北方同清廷进行强硬交涉，要取得《天津条约》的全部侵略权益，与此同时，它们没有放松对上海的“防护”。太平军破江南大营并继续东进后，英、法马上作出反响。英国公使卜鲁斯(F.W.A. Bruce)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在上海作了紧急磋商，决定公开承诺所谓保护上海安全的义务。5月26日，正当太平军攻克常州、还未进攻苏州时，在上海的英、法两租界和县城各城门口，出现了由卜鲁斯和布尔布隆联合出面的公告。公告称：

“上海为各国通商口岸，本城华商与各国侨商有极广泛的关

---

① 吴大廷：《吴清卿太史日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五)，第337页。

② 1858年6月《天津条约》订立后，清政府和英法谈判的地点即移往上海。同年11月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都在上海订立。咸丰帝甚至有意让各国公使常驻上海，谕令谈判大臣桂良等可允各国“将钦差移至上海，专办通商事务，以后各国如有商办之事，即在上海商办”(《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二)。

系。如果上海成为内战的舞台，则商业定将受到严重损害，而华洋人士之但求安居乐业者也必蒙受重大损失。为此，本人与法（英）国对华远征军总司令阁下一致同意，我国海陆军方面采取形势所必需之措施，以便保护上海居民，不使其遭受屠杀抢劫，并阻止内部暴动，同时，上海城区亦在保护之列，不使其蒙受任何外来之攻击。”①

这份布告同时送交给上海道台吴煦，由吴煦“分贴于他管辖的内地，甚至可能张贴至苏州”②。吴煦在小刀会起义时署理松江知府，曾奉吉尔杭阿之命，与杨坊一起联络各国，参与镇压起义。他与上海的外国人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英国在华喉舌《北华捷报》称他“聪明伶俐”，在任时“肆应得宜”，“凡是认识吴道台的人，大概都很喜欢他，本报深信这种说法是不错的”③，可见其深得外人的欢心。吴煦得宠的主要原因是他“大胆地”投靠外国在沪势力来维持上海的“安定”局面。作为清朝的地方官员，当北京的朝廷还在和英法交战未已的时候，吴煦却非常起劲地设法用求得外国人的支持来保护上海，当时一般清朝官员还不敢这样做④。由于地主士绅和买办商人很清楚上海一带的清朝军队已经没有能力抵抗太平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借助洋兵这一着上，吴煦和前面提到的杨坊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英法公使在会商了上海防卫问题后，决定共同用 1200 人的兵

---

①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 243—244 页。

② 同上，第 244 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第 390页。

④ 两江总督何桂清曾是吴煦的支持者，他在江南大营崩溃后以借师助剿为名于 1860年 6 月逃往上海，匿于租界，并和署浙江巡抚王有龄联名上奏朝廷，请“坚其和议，俯如所请”，借重洋人兵力“助剿”，为咸丰所斥。同月，何桂清被革职拿问，1862年 12 月处死。

力守上海县城，另派500—600人驻守上海北面的江湾和西面的徐家汇，在董家渡教堂附近，驻法军200多人。英租界的“义勇队”自小刀会退城后，几年来形同解散，这时也重新组织起来。吴煦在6月7日贴出“安民布告”，称：“英法两国既允与(中国官员)合作，并派精兵至水陆各要隘布防，本地区安宁可以有所凭借”，① 把抵抗太平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外国干涉军上。

但是，英法虽然在上海布置了一些兵力，却并不愿意完全卷入这场战争，这是因为这时英法在北方与清朝中央政府还处于剑拔弩张的关系中，他们不可能动用太大的兵力来支持清朝的上海地方政府。上海官府无耻地“想把这次以敌人身分来的外国兵转变为中华帝国的友军”，但侵略者的态度则可以从英国领事密迪乐(T.Meadows)对吴煦的一番话中看出：“我们保护上海县城，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办我们的事，也是办了你们的事。但是一旦我们这种共同利益的关联停止了，我们的保护也就同时停止。”② 在英法还没有最后迫使清廷屈服的形势下，这些话是有代表性的。

上海的官绅大约可算近代中国第一批有“商业头脑”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在争取英法军队庇护的同时，还用金钱去“等价交换”一支雇佣军来为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而战。这时，在上海外围地区，就有这样一支奇怪的队伍在和太平军作战，这就是由自称加入了中国籍的美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

华尔(F.T.Ward)原是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水手，曾在中美洲一带当过海盗。1851年，他在一条从旧金山开往上海的三桅轮船上充任大副。他首次来华，可以说是来去匆匆，但当他在1859年再度来到上海时，结识了泰记洋行的老板杨坊，他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杨坊这时已“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

① 《太平军在上海》，第91页。

② 《上海法租界史》，第243页。

拥资百万"①。他花钱捐了个候补道的官衔，和上海道台吴煦过从甚密。两人这时正担心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华尔便毛遂自荐，自称只要中国方面供给军费，他能招募一支洋人的军队去对付太平军。这个计划得到吴煦、杨坊的赏识，于是由杨坊出面，双方订立合同，规定华尔每攻下一城，便给一笔巨额赏金。

华尔有了钱，果然很快招募了一支百来人的军队，主要由水手组成，其中大部分是菲律宾人和原来流窜在澳门的各国散兵，因为所用武器是外国枪炮，故被称作"洋枪队"。7月 16 日凌晨，占领松江的太平军主动出城，计划暗袭上海，华尔便乘此机会，在黄昏时率洋枪队对松江进行突然袭击，居然占领了这个县城。于是华尔领到了三万两关银的赏金。他马上扩大队伍，按照杨坊的命令，准备袭取青浦。8月 2 日，洋枪队进攻青浦未成，靠着杨坊的资助，华尔再次扩大了队伍，9日，令其副手白齐文(H·A·Burgevine)进攻青浦。这次，洋枪队遭到李秀成从苏州亲自率领的援军的狠狠打击，据李秀成自述，8月9日的青浦大战中，"两阵交锋，自辰至午，鬼军大败，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二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庄(一种西式前膛炮——引者)百余口，得其舟只数百余条，当解青浦之困。"② 华尔在青浦之战中受了伤，离开上海，到法国去治疗。

太平军又在 8 月 12 日乘胜收复了松江。这样，李秀成便率军直抵上海。18日，太平军抵达上海县城西南九公里的徐家汇。

由于相信盘踞在上海县城北面的是和太平天国有着共同信仰的"西洋番弟"，李秀成在进攻上海前，曾亲自写信给当时正在上海的英国公使卜鲁斯，说他准备带兵来沪，劝外侨在其屋上悬挂黄旗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请勒追革员京米捐款，再行押解来浙捐输军火片"。

② 罗尔纲：《湘乡曾氏藏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开明书店版，第114页。

以资辨认，以免大军到时遭受骚扰①。

可是这些"洋兄弟"是怎样对待太平军的呢？他们是用仇敌般的炮火迎接李秀成的部队的。有关这场战争，还是让英、法人去说话，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津津乐道於抗击太平军的成功，从而作了最清楚的招供。

英国人白伦在《中国太平叛党志》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星期六，即八月十八日，攻击开始了。叛军紧紧地逼近城下，他们已经预先驱逐了驻在城外的清军。可是在这里，他们却遭遇到我们山炮的霰弹和榴弹的剧烈射击；我们的水兵用他们的恩费耳德来福枪，塞克兵用他们旧式的布朗贝斯毛瑟枪也使他们蒙受了重大损害。叛军在发现他们的努力无望以后，便于夜间退却到射程以外的地区去了。……在星期一，叛军又来攻城，……全作单线行动，每人都拿着一面旗子。我们炮火的有效杀害使他们改变了进军路线，他们在英国居留地的郊区附近继续前进。就在这个地点，从我们海军炮兵所发射的火箭和榴弹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退却。夜间，快炮船'先锋号'溯江前进，向他们的营地发射了一些13英寸口径大的炮弹。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攻击上海的结果，于是他们毁弃了营地，并且在射程以外的地区逐渐退却。"②

法国人史式徽在《江南传教史》中写道：

"(八月十八日)叛军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家汇。诸王之一的忠王，就在这里设了司令部。午后，忠王的先头部队已迫近上海南门城厢区，同时，满载叛军的兵船也驶进了黄浦江。县城沿黄浦江的东段和南段是法国军队分防的地区，当叛军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249页。

② Lindsay Brine: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lina，1862年第254—256页，转自华安世：《太平天国》，第279页。

一出现，法军只要对准他们扫射一阵，足可阻止他们前进。

翌日，八月十九日，叛军部队沿黄浦江入侵到城墙和法租界之间的城厢区，……防守主教大堂（按指董家渡教堂——引者）的十二名法国兵，很有办法护卫圣堂。海军中尉勒伯勒东命令'强力'号舰的海军登陆，向城厢区开炮，许多中国房屋着了火，抢劫者也逃得无影无踪。同时'强力'号由比泰尔海军上尉率领，溯黄浦江而上，靠近董家渡后便向该地区的街道逐条扫射，一艘英国炮舰向上挺进得更远，这种示威很有成效，董家渡的混乱平静了……

二十日，忠王从徐家汇出发，企图进攻上海西门及租界，这地区是由英国兵防守的；同法国兵昨天的炮火一样，英国人的炮火很快地迫使太平军后撤，并当场击毙了数百名太平军。

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长毛停止进攻。二十二日，英军的一名译员福雷斯特带了一个随员，扯着谈判的白旗，来到叛军前哨，受到一名长官的接待。这位长官对于洋人如此无情地以炮火相见，深表怨愤①。

李秀成这次进攻上海的兵力不超过3000人，无心久战，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的一支残部猛攻嘉兴，李秀成的后路受到威胁，只得回师救援嘉兴。

太平军这次进攻上海只打了三、四天仗，却引出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外国侵略者虽然和清朝政府处于战争状态，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它们敌视太平天国的态度，它们终于在北方的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在上海和太平军打了第一仗。如果侵略军在北方迫使清廷就范，那末，它们转而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迹象已是非常明显了，可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对此并无认识。李秀成把这次外国军队参战看作是"同教兄弟"的"背信"，尤其痛恨法国

①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7页。

军，以为他们之所以帮助清军只是为钱财所惑，“我知法人定受贿银，而别国人亦有分焉”①，把事情想得如此简单。撤兵时，李秀成给英、美等国领事发出一信，说：“若我有志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汝中有人思及此情而悔汝前愆，仍与我等和好为美乎？”②对外国干涉者的面目仍无所认识。

就在上海的英、法军队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的当天(8月21日)，在北方，英法联军攻下了大沽炮台。接着，英法联军相继占领了天津(8月24日)、北京(10月13日)，迫使清政府和英、法、俄订立了《北京条约》，10月底，侵略军陆续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J.Hope)和代理上海领事巴夏礼(H.S.Parkes)奉额尔金J.B.Elgin之命，于1861年2月率领一支舰队由上海沿长江而上，往返约两个月，查看如何在长江流域落实条约所赋各项侵略权益。其间，他们到达天京。巴夏礼在天京同太平天国进行了谈判，他代表英国重申“中立”立场，但却要求太平军保证不进攻上海、吴淞周围30英里(100华里)地带。太平天国方面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幼赞王蒙时雍表示可以接受这个要求。但天王洪秀全得到报告后立即反对。他允许不伤害不帮助清朝的外国人，但是不能接受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地区的约束。经过五天的谈判后，洪秀全作了一点让步，即接受英方的要求，但只限于本年内③。4月2日，蒙时雍发表一个军令，内称“我军于本年内并不作攻击上海吴淞的计划”④，太平天国对于不进攻上海的承诺仅止于此。

1861年12月27日，何伯命令英国驻天京“狐狸”号舰长班汉向太平天国提出四项要求，其中第三项称：“不侵及上海、吴淞周围

---

①②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页。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228页。

④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上册，第269页。

百里地带，太平军并未遵守，此后应严禁”①。太平天国派章王林绍璋和巴夏礼谈判，1862年1月1日，幼赞王蒙时雍、章王林绍璋等出面照会英方，对英国的无理要求断然加以拒绝。关于不进攻上海周围百里问题，照会答称：“今春我国诚然签订此项协定，但就道义而论，天下莫非上帝所造，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所以允准此约，唯念贵国与我国同源耳。贵国赖商务为生，我国以疆土为重。我国本体谅同类之至意，始准于年内不攻上海吴淞，签约后即严令我境内各营将领一体遵行，据各营将领禀报均已谨遵命令。但我天兵责在杀妖，岂可玩忽职守？上海吴淞尚无妖兵，忠王侍王当不派兵攻取该地，若贵国愿负驱逐妖兵之责，则我天朝可派员安抚该地，不仅保护人民，且可保护贵国商务。是以贵国何以惧我天兵进入百里之内耶？本年将尽，（按照会之日为太平天国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引者），协定满期后，我国不能仅以贵国商务为念，而不攻取该地。”②

谈判破裂了，太平军进军上海势在必行。这时太平天国已在浙江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首次攻占了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此前，太平军已攻克了和杭州隔江犄角相望的绍兴，12月底，又占领浙江省府杭州。就在上述照会发出后不到一星期，李秀成留一部分将领镇守杭州，亲率五路大军，向上海水陆并进。这是太平军对上海地区的第二次进攻。李秀成在1月7日谕上海松江军民书中，警告已与之较量过一次的上海外国当局：“上海贸易之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自谕之后，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敌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③

侵华各国早已把上海视为禁脔，太平军进攻上海而与英、法各国“两不相扰”是不可能的。英国外交大臣罗赛尔（J.Russell）在

①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838页。

② 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338—339页。

③ 《李秀成谕尚海松江军民》，《太平天国》（二），第744页。

太平军占领宁波后就说："为了人类和商务上的利益，也由于上海华人人口的众多，以及和上海县城无法分离的租界，我们要求上海这个县城和这个口岸应该得到保全，不使其陷于和宁波同样的命运。"① 上海的英法军事当局则公开"通告各有关方面"，声称"上海县城及其周围包括吴淞在内，现已为英法军队所占领"，倘太平军"胆敢进犯该地，将自蹈险境"②。

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纷纷躲进外国侵略者张开的这把保护伞下，他们并竭力促成官府上报朝廷，正式求得外国军队的庇护。许多地主士绅联名给江苏巡抚薛焕等呈文，吁请"借洋兵助剿"。江苏有一个叫潘曾玮的地主还带同浙江地主龚橙复，从上海航海赴北京，"诉称乡闾被陷，恳请借用英法等国官兵，速筹规复"③。江苏巡抚薛焕在1862年初迭次奏报朝廷，申说上海"官绅商民"的共同意见，即向英法驻沪当局请求调兵"协助官军保守上海，克服宁波，以及江宁、苏州等地"④。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势力日大的曾国藩这时也几次表态，他的见解与那些因封建特权被剥夺了而"情殷桑梓"的江浙士绅们略有不同。曾国藩认为，"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其势犹如"回纥助唐"，但他强调借洋兵"助守上海则可"，理由是"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守之"⑤。北京朝廷完全同意了他的这种看法，1862年2月11日的上谕说："英法两国自换和约后，彼此均以诚信相孚，此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上海为通商口岸，自宜中外同为保

① 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叛乱与扬子江贸易的文书，1862年4月8日》第37号，《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313—314页。

② 《太平天国亲历记》，下册，第361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469—470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

⑤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451、469—470页。

卫”①。上海既是英法各国认为最值得加以“保护”的通商口岸，清朝统治者又决心“利用”这种保护，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的第一幕便在这里首先开场。

上海的官商士绅们因为切身的利害关系，在借用外国侵略势力抵制太平军方面，比清廷走得更快些。就在清廷决定“借师助剿”的指示下达以前，上海的官商士绅已有了两个动作。

一个是成立上海会防局。这是一个在英国直接指使下由上海官府和商界的头面人物组成的一个联络性的筹饷机构，由巴夏礼和上海道吴煦、候补知府吴云、候补直隶州知州应宝时等议定，于1862年1月13日成立，附设于上海城内的源通银号内，“专捐进口出栈之洋货及报新关出口之土货，俱以供洋兵会防沪城之军糈”②。但会防局的作用还不止是供应军饷。据上海官绅所呈《筹议借师剿贼章程》载，会防局（或称“公所”）的任务是“酌派清正官绅数员，逐日与贵国办事之人，商酌集饷、调兵、设探报、备供应诸务。有应贵国照会中国抚、藩署者，有应抚、藩署照会贵国者，均由公所派定官绅及贵国派办军务之人承办”③。会防局名义上由应宝时、吴云、潘曾玮、顾文彬“四君主之”④，实际上完全仰外人鼻息，其主要作用是利用这些半官半绅、亦官亦绅的人物，充作外国（主要是英国）侵略者与清朝官方之间的桥梁，协调“会防”和进攻太平军的步骤。上海官绅对外国在沪势力的趋奉，连正奉曾国藩之命率领淮军到上海的李鸿章也觉得过分：“吴道与杨道（指吴煦和杨坊——引者）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媚洋人者无微不至”⑤。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

② 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卷2，建置。

③ 赵烈文辑：《上海会防局资料及其它》，《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9页。

④ 冯桂芬：《显志堂稿》，第4卷，第20页。

⑤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10、17页。

上海官绅的另一个动作，也是会防局成立后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支持华尔重组“洋枪队”，并充当联络者和军饷供应者。在青浦受伤后到法国去治疗的华尔，1861年春又回到上海。这次他提出了一个新计划，就是组成一支以中国人为主的队伍，由洋人加以训练和指挥，去和太平军作战。这个计划得到他原来的支持者杨坊及其后盾吴煦的支持，为了笼络华尔，杨坊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华尔为妻。本来对华尔的举动并不满意，至少不愿加以公开支持的英、美当局，这时对于他这个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计划也表示赞赏。华尔从1861年夏开始在松江招募、训练队伍，其饷银全由清朝官方支付，大部分来自江海关税收入。华尔的许多枪炮是从美国买来的，英国海军司令也向他提供了不少武器装备。为了迷惑太平军，“使太平军相信自己是在和欧洲部队打交道”，“洋枪队”的中国士兵“训练得很好，配备了很好的干部，穿着欧式军服和皮靴，因此样子和外国兵差不多”①。这支队伍很快从1000多人发展到6000人，并被称作“常胜军”。

这时在上海地区的清朝军队数量虽多，大部分却是苏常溃军之余，几乎丧失了战斗力。李鸿章在六月率淮军8000人到达上海，算是唯一有战斗力的一支清军。李秀成在上海的主要对手是英法军队和华尔的洋枪队。英法军队初期有480名英国陆军、水手和水兵，800名印度兵，400名法国陆军和水手，后来续有所增，大约共有近4000名英法海陆军，携带大炮30尊，由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英国驻华部队司令士迪佛立（C.W.D.Staveley）和何伯联合统率，总的指挥权操在何伯手中。华尔的洋枪队士兵虽然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但已非杨坊、吴煦所能控制，李鸿章说，华尔的队伍“头目均系洋人，岂中国官所能钤制”，“英人隐然以常胜军属之外国”②，是说了真话的。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262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页3、7。

太平军这次在上海地区的军事行动，从1862年1月底开始，到6月下旬结束，持续了5个月，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超过了前次进攻上海之战。但是，李秀成始终没有集中优势兵力直接进攻上海，战争一直在上海外围地区进行，对上海县城和租界的威胁并不大。在上海外围地区的较大战役有以下几次①：

（一）高桥之战（1862年2月24日）

1862年1月11日，由谭绍光、郜永宽等率领的太平军约30000人，逼近吴淞，13日到达离英国领事馆不过一英里半的北郊一带。20日太平军围吴淞，占高桥，浦东方面几乎全部为太平军所占领。但华尔在2月16日假扮西洋打猎商人，潜入太平军占领区，侦察形势。在了解情况后，华尔率军700人，在何伯、卜罗德等人率领的英法军配合下，于2月24日击败高桥太平军。3月1日，英法及华尔军又败谭绍光等于上海东南的南桥（今奉贤）等地。这场战役使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感激涕零，大约从这时开始，华尔的军队有“常胜军”之称，而华尔“一年以前还是一个‘臭名昭彰’的人，‘劫掠外国的冒险家和海盗’”，这时“却成了正在江浙两省有所行动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足资信任的盟友和同僚”。英国公使卜鲁斯“竭力主张在各主要口岸创设这样的军队”②，后来浙江出现与此相类的“常捷军”等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队，就是因为华尔在上海开创了这个中外反动派认为“成功”的先例。

（二）王家寺、龙珠庵之战与周浦之战（1862年4月4日、17日）。

李秀成鉴于高桥的失败，决定先铲除“常胜军”的巢穴——松江。为此，必须切断它同上海的联系，夺取上海至松江交通线上的七宝、泗泾等地。4月4日，太平军战士约4000人与英法军、“常胜军”激战于上海西南之王家寺、龙珠庵。次日，双方又激战于泗泾。

① 参见牟安世：《太平天国》，第348—356页。

②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81页。

太平军失营垒共15座，伤亡600余人，英法军伤亡不满百人。这样，太平军夺取七宝、泗泾，进攻松江的计划受挫，被迫退到华漕、诸翟一带，此时，浦东一带太平军，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之中。太平军在浦东的军事中心周浦，储备着大量的军需、给养、财物，自然成为侵略军劫掠的重点目标。4月17日，英法军队2400多名，在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和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的指挥下，向周浦太平军发动了进攻。太平军损失800多人，周浦失守。

这两次胜利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由英、法军队和"常胜军"近4000人组成的联军转向西北，溯苏州河而上，4月29日占领南翔，5月1日占领嘉定，随后折回松江，于5月12日占领青浦，17日占领南桥，20日占领柘林，21日占领奉贤（今奉城）。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在南桥镇西被太平军击毙。

（三）太仓、嘉定，青浦之战（1862年5月17日—6月9日）

由于外国军队在五月份相继占领了上海外围许多城市，"清兵自松江、泗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营一百余座，城城俱有鬼兵把守"①，李秀成不得不从苏州赶到前线，亲自指挥战斗。5月17日，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在太仓取得了胜利，击毙清知府李庆琛并覆其全军五千余人，"当破清营30余座，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②，这是太平军在上海外围转败为胜的第一次决定性战役。李秀成乘胜进军，于26日克复嘉定及南翔。28日，另一支太平军占领泗泾。29日，李秀成大败华尔，"松江以及太仓，大小营寨一百三十余营概行攻破"③，但进攻松江未成。6月9日，太平军克复青浦，生擒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占领嘉定、青浦是太平军的重大胜利，外国联军的气焰被打了下去，李秀成回忆这段的战绩时说："那时洋

① 《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第140页。
② 同上，第141页。
③ 同上。

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① 英、法军从嘉定退守上海租界时，李鸿章报告朝廷：“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② 稍后，曾国藩在其奏折中说得更明白：“青浦、嘉定二处，发逆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③ 这时，太平军已逼近上海城郊，其前锋一度进至虹桥，漕河镇，法华镇，徐家汇，静安寺等地，“他们在田间与村庄里所举起的烽火，从租界内屋顶上已可看得很清楚。”④

但太平军还是没有向上海租界和县城进攻，6月下旬，李秀成率领部队不战而退出了上海附近地区，其原因大致是：松江还在华尔的“常胜军”占领下，李秀成的主要兵力还在于“将松江困紧”，似有先占领松江再进攻上海的打算，而当松江尚未攻下时，曾国藩的部队却已逼近天京，洪秀全急令李秀成回师解围，据李秀成自传：“那时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诏到松江追我，诏甚严，不得已，将松江兵退回，然后转苏州，与众将从长计议。”⑤

应该说，当时太平军还没有把占领上海放在首要地位，并没有集中全力进攻上海，而是取一种能则取之，不能则暂缓的态度。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一是把上海视作“蕞尔弹丸之地”，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二是只是把外国干涉军作为帮凶来看待，而实际上，此时（《北京条约》订立以后）此地（作为外国势力集中盘踞的上海）外国军队已是太平军的主要敌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单凭英法和“常胜军”有限的兵力是难以抵挡起义大军和城内大量起义同情者的联合进攻的。《北华捷报》在太平军离开上海后供认：“租界内本国人口中，便有成千上万的叛军侦探，还有成千上万同情叛军

---

① 《李秀成自传原稿笺　》，第１２页。
② 《李文忠公奏稿》，卷1；《筹办事务始末》，同治朝，卷6。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１。
④ 《太平军在上海》，第348页。
⑤ 《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第144页。

的人……，大家可以看出，当时租界防御薄弱，确实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只要太平军用上五六千人坚决向我们进攻，他们便能占领上海城和租界。"①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对于占领上海的重要意义估计不足，对于英法干涉者缺少认识，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在鸦片战争后的新形势下，这场农民起义在视野上的局限性。

四、租界进一步殖民地化

太平军虽然没有攻入上海县城和租界，它对上海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1860年以后的几年内，上海的面目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特点是，围墙里的上海县城仍维持着它作为一个繁荣的封建县城的古老的面孔，但几经战乱，加上旧式县城本身的局限性，多少已有点没落的味道。而在县城的北面，作为入侵者的西方资产阶级却正在按照他们的面目来设计那块城郊的特殊区域。战乱造成了最适宜的条件，僭权的霉菌便在那样的温湿度中迅速地发酵起来。由于旧县城的相对静止，租界的发展和变化，便极大地代表着整个上海城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和上海的政治（包括由太平军在上海地区的活动而形成的军事形势）以及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行文的方便，在这一节里我们先分别叙述这一时期上海在政治上的变化，而把经济发展留到下一章去讨论。

（一）越界筑路和法租界的第一次扩充

越界筑路，即越出租界范围，在租界原有的界址外修筑街路。这是上海租界当局扩充租界面积的一种重要手段。从19世纪5(年代起到1925年五卅运动为止，上海租界当局往往利用各种借口

① 《北华捷报》，1862年10月25日，《太平军在上海》，第368页。

在界外修筑道路，然后胁迫中国政府加以承认，将越界筑路区域划入租界范围。越界筑路成为帝国主义在上海扩充租界的前奏曲，并且在扩充租界暂时被制止的情况下，越界筑路却从未停止。越界筑路对今天上海城市的布局造成不良影响，由于许多街路是在一种非法的情况下由租界当局仓促修筑，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所以它们往往带有很大的权宜之计的成份，缺乏城市发展在正常情况下所应有的统一性，从而造成了上海马路在今天尚存留的散漫无章的状况。越界筑路最早便是出现在太平天国期间。

前已述及，太平天国在上海周围地区活动使上海的各国侵略者惶恐不安，想出种种"保护"上海安全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修筑军路，以便英法军队和"常胜军"运送士兵和军火。在租界附近和离租界较远的地区修筑的军路计有：徐家汇路(1920年改名为海格路，即今华山路)、新闸路、麦根路(今淮安路)、极司菲而路(今万航渡路)。

英国人所喜欢的跑马运动也成为越界筑路的一种辅助手段。有一个似乎有点蹊跷的现象：上海一带战争打得越是激烈，英国人的马蹄声也越是响得热闹。1854年，正值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期间，英国人一面在和清军打那场不打不相识的"泥城之战"，一面却在起劲地"跑马"。就在那一年。"上海跑马总会"出售了原来在界路西首的跑马场，用所得的部分价款，在贴近泥城浜东(约当今西藏中路经北海路、湖北路、浙江中路、芝罘路回至西藏中路这样一圈)的地方开辟了所谓"新公园及跑马场"，面积在百亩以上。到了1862年，正值太平军在上海地区大规模活动、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人日夜恐惧的日子里，跑马场的股东们却又在租界以西的界外地区圈了一块430多亩的土地作为新跑马场(约当今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上海图书馆和体育宫等所在地)，规模大大地超过了前两个跑马场。

跑马场的几易位置，一个原因是外国老板们为利润所驱使，利

用战乱发财。1860年前后，江浙一带和上海附近的大量难民涌入租界，地价大涨，造屋出租成了获利最丰的行业，于是外国老板们乘机牟利，大做地产生意。例如，第三个跑马场在泥城浜西岸圈定下来时，共花了 12500 两白银，而他们出让的那百余亩旧跑马场，却足足收进了 49425 两白银①。但是，在金钱之外，变动跑马场的更重要原因，是为租界当局的"自卫"和扩充考虑的。为了修造一条通往抵抗太平军前进的军路，租界当局在跑马总会股东们的支持下，将派克弄向西延伸，穿过公园跑马场（约当今南京东路从浙江中路起至西藏中路这一段），然后再从泥城浜越过租界界线，造一条二里长的公路直达西郊的静安寺，与已经筑好的徐家汇路相连。这样，原在租界内的跑马场被道路拦腰截断，自然只能易位，但从外滩穿过租界中心地区到与太平军作战的前沿徐家汇，便有直达公路可走。外国老板们既赚了钱，又支持了他们的"自卫"事业，待到战争结束，界外这一条平坦大道（名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便成了英租界的自然延伸，1866年起正式划归工部局管理。

与此同时，法租界也在谋求扩充，并且在手法上比洋泾浜以北的英国人更为直截了当。1860年底，法国领事爱棠以索租地皮的法国人日益增多为理由，向上海道吴煦要求"更正"法租界东部的界址。当他就此事向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报告时，布尔布隆明确指示他："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向上海官方要求，把我们的租界一直扩展到小东门的那条小河，这条小河和一条从小东门一直通黄浦江的街道相平行。"上海道吴煦首先同意"更正"法租界东部界址，他答复爱棠说："顾念我们的良好关系，我愿热诚设法使您满意。"结果，爱棠的要求很快得到满足。1861年 4 月 19 日，爱棠宣布"这件事情得到了可喜的结果"，"现在法租界已经伸展到了它的合法界线的最大限度，到达了不久前烧毁的城关地区（按指 1860 年 8 月

① 吴贵芳：《从派克弄到南京路》，《上海风物志》，第 49 页。

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焚毁的城墙——引者），刻了字的界石已经正式安放好了。”①

但是，法国政府却对爱棠没有拿到的小东门的地皮更有兴趣。原来法国皇家邮船公司与法国财政部订立了一个协定，邮船公司由此得到了办理印度支那邮务的特许权。法国外交部长图弗内尔（Thouvenel）为此写信给爱棠说：“由于主要航线要经过上海，邮船公司很想先在这个港口有足够的地皮，以便造办公室、码头、栈房和邮务营业上所需要的各种房屋，因此，该公司要求我在法租界内可资利用的地方为它保留一块两公顷大的地皮。”② 对此，爱棠表示为难，他知道小东门一带向来是上海最拥挤的地段，早有人满之患，因此准备在吴淞弄一块地皮作为替代，却遭到法国外交部的严词拒绝。与清朝官员打过不少交道的爱棠于是向布尔布隆求援并献策说：“上海道台对百姓已经没有权威性，不可能承办这件事，征购地皮的命令最好来自更高级的官方，最好由恭亲王下令给抚台和道台，叫他们派人出空小东门至法租界现在界线之间的所有地皮和房屋，交给法国人；必要的话，可以派军队占据，象以前成功地做到的那样……”③

布尔布隆采纳了爱棠的意见，在北京向恭亲王奕䜣提出上海法租界的扩界问题。清廷这时正要“借重”英法的兵力来对付太平天国，不愿为此开罪法国，奕䜣答应，“法租界南面界线一直延伸到出小东门直通黄浦江之小河沿”。这一命令通过两江总督薛焕传达到上海。十月二十九日，吴煦张贴告示，通知小东门外的地主遵命出租土地。邮船公司很快租到了小东门外贴近黄浦江的三十四亩土地。这件事的结果促成了法租界的第一次扩展，法租界在靠近黄浦江的边界延伸了 650 多米，扩充面积近 130 亩。

---

①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 294—295 页。

② 《上海法租界史》，第 302 页。

③ 《上海法租界史》，第 305 页。

（二）对租界华人的征税问题和“自由市”计划

据称，1860至1862年间居住在租界内的中国人一度高达30至50万人之多①。这个数字很可能是夸大的，但由于战争的影响，大量人口流入租界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华人在租界内的高度集中，便发生了对界内中国居民的管辖权问题，它集中地表现在上海地方政府对这些中国人的征税权问题以及一些狂妄的侵略分子提出的“自由市”计划中。

1862年7月，上海道台吴煦致函英国领事麦华陀，请其助查租界华人人数，以便道台对租界内华人象对城内居民一样征收税项。麦华陀复函拒绝，说：“对界内华人，敝领实未便承认贵道台此种征税之权，盖历年以来，地方官与本领事间，早经谅解，凡地方官对于界内华人行施管辖之权，必须得有英国领事官之同意。兹已有如许华人赖吾人保护，分沾吾人之利益，殊觉不便背弃此项规则。”②

差不多与此同时，工部局所属防卫委员会公然提出成立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的上海“自由市”计划。上海租界内的一些狂妄分子认为随着太平军的退却，上海周围30英里已经“廓清”，事情已不止是对界内华民的管辖权问题，而是乘此机会谋求上海“独立”的问题。工部局防卫委员会委员金能亨等在6月20日上书工部局，具体地指出“自由市”计划，即将上海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置于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英、美、法、俄四大国的保护之下，组织政府，举办税收，负治理责任，使上海成为中国的第一城市③。这个计划提出后，一时成为《北华捷报》上讨论的中心问题。

由于英国政府的反对，“自由市”计划很快被否决了。在上海

---

① H·Lang: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第25页；《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59页。

② 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部分，第3期，1864年，第10页；《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60页。

③ C·A·Montalt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第208页。

租界问题上，英国政府和工部局存有一定的分歧。工部局从上海洋行大班和外商们的直接利益出发，企图在一夜之间变上海为他们的殖民地，让这块地方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英国政府则从侵华的全局利益出发，不希望上海租界当局有太大的独立性，以至影响它对侵华全局利益的考虑。这时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失败之前，清政府和英法政府正在"中外同心灭贼"声中度它们的蜜月，英法已认定它们的最大利益所在，是扶持清政府，消灭太平军。1862年前后，太平天国尚有相当的力量，英国政府不希望看到上海工部局的活动过多地削弱清政府的镇压力量，所以，无论对征税问题，还是对所谓"自由市"计划，英国政府都持一种有限度"照顾"清政府利益的态度。

9月8日，英国公使卜鲁斯就上述两问题训令麦华陀："英商在上海所住之地，中国并未卖与英国，亦未租与英国作为英国国家之地，不过是准英商在此居住，俾有相聚而居之益。英商在上海租住之地仍属中国之地，中国官仍收该地钱粮。……近来英商在上海所住之地大为改观，不但不专是外国人居住，更觉外国人所住仅有十分之一。从前定住此地之意，原要英商与华人相远，现在英商图利，租地造房屋赁与华人，是情愿与华人相近，而英商转住在华人之中。上海英商之意，以此等华人既住在英商所造之屋，又在英商所租之地，中国官即不能管。本公使现在明示该领事知悉，中国从未将自管百姓之权让与英国，而英国亦从未要得此权，且即有之，亦从不肯用此权，该上海英商虽有此意，该领事官切不可听信、帮助。"①

11月5日，卜鲁斯又专就征税问题训令麦华陀说："据申陈请本公使酌夺上海道要在尔所云英国界内抽捐之事，本公使查和约，

① 《洋泾浜劝捐案》，同治二年，承修官志删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编号0424。

此等事件本公使并无管理之权，如果上海道在上海城内城外抽捐，亦可随时便在尔所云之英国界内一律抽捐。此时中国军饷充足，不但中国有益，亦与英国有益。"①

法国公使柏尔德密(J.F.G.Berthémy)在1863年6月8日对中国政府在租界内的管理权限也作了这样的训令："查外国总领事在上海一定明白，除中国人有服役外国人及服役本国素所保护之人不计外，其余侨寓租地别项之中国民人自应均听中国官员管理。惟本国总领事仍当按照从前，可以在境内盘查中国之叛乱罪犯及劫盗等匪徒，随时拿获，并依问例，凡侨住之中国人均须摊派出钱，为巡街修路诸经费并一切紧要公项所需。再，凡中国人在本国租地侨寓者，由中国官员收纳捐项，其量资劝捐自有一定公共章程，如照别处居民一体派捐并无轻重，则本国自毫无拦阻。本国所过问者，或勒派本国租地之中国人较之别处居民所捐特为加重，或于别大国租地之中国人所捐可以轻减，独于侨住本国界内者故加苛派，如有此等情事，则本国即不能依允也。"②

英、法公使的这些话是代表各自政府说的，其中已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例如柏尔德密公然反客为主，把居住在法租界内的中国人当作"侨民"看待，并对清政府在租界内的权限加上许多限制。但是，英法公使的训令毕竟比上海工部局的那班露骨的殖民者显得态度有所不同，其原因已如上述。"自由市"计划因其政治意义太大，为各国坚决反对而罢，但英、法公使从侵华全局利益出发的训令却没有完全被上海租界当局所接受，尤其是与外国老板们利益直接有关的征税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863年6月12日，上海道台和英国领事曾有一个协定，规定由工部局向租界内华人征收巡捕捐20%，以其中一半转交道台，但这始终是一纸空文，没有

① 《洋泾浜劝捐案》，同治二年，承修官志删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编号0424。

② 《洋泾浜劝捐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实现，从此中国政府在上海租界内的征税权被剥夺了。

（三）外国租界的分合和第三次《土地章程》

1854年订立《土地章程》时，上海的外国租界一度算是"统一"的，工部局是英、法、美三国租界的行政机构，《土地章程》则是三国租界共同遵守的"根本法"。但是，法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一开始对此就颇为勉强。法国人认为在这个共同体中，法国只有义务而缺少权力："为了要法租界放弃自己的特权，承担共同的负担时，租界的界限就向外延伸到法国人居住区的尽头，而涉及到保护法国人时，租界的界限就又拉回到洋泾浜了。"① 因此，《土地章程》虽经三国公使批准，法国领事在处理实际事务时却对章程不加理会，爱棠称："至于我这方面，我没有公布过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法令承认这个章程对我和我国侨民的权力。"② 在上海法租界内，法国领事的权力大于一切，他实际上是这块特殊区域内的行政首脑，工部局对法租界内事务没有多少说话的余地。这种局面维持了几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为了所谓共同抵御的需要，工部局和英美两国领事竭力反对法租界的独立体制，一再催促爱棠在法租界内实施《土地章程》，并通过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要求爱棠在《土地章程》上签字。

法国人却另有打算。布尔布隆认为，在法租界内"保护全体侨民的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主动权应完全掌握在法国领事手中，为此，他指示爱棠大胆谋求法租界的"独立"，并告诉他可以以《土地章程》未经法国皇帝批准为理由，向英、美宣布《土地章程》中"有关法租界的部分从此成了一纸空文"。③ 法国这样做，是准备公开在法租界内成立一个类似于工部局的组织，用以"健全"法国在这块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201页。
② 同上书，第203页。
③ 同上书，第320页。

土地上的管理。1862年4月29日，法租界内公布了这样一份由爱棠签署的领事馆布告：

本领事谨通知本租界居民，兹根据和中国先后签订之两条约规定的管辖租界之权利，为谋求法租界内之秩序、安全和公共福利，特设立公董局董事会，由董事五人组成，受全权委托，处理并掌管租界内之一切事务①。

5月5日，爱棠召集法租界内的租地人开会，向他们介绍五名董事，并宣布董事任期二年。5月9日，法租界董事会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商量"行政管理"事务以及"全面组织行政机构"。董事会首先决定向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征收房捐，按每年8%计算，而欧洲人的房捐仅按每年0.5%的比例征收，相距如此悬殊，连《上海法租界史》的法国作者似乎也有点"难堪"，在叙述至此时强词夺理地辩解道："不要忘记，外国租界对待中国人原则上是宽厚的，当初，租界的地皮原来是应该全部留给外国人的。"② 中国人住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成了外国人的"宽厚"的证据，侵略者的逻辑竟是如此颠倒。

公董局的第二个决定是加强巡捕房的力量。从这一年6月1日起，法租界巡捕房归公董局直接管辖，巡捕房人员全部由法国人，或宣布服从法国领事馆并从此归法国裁判权管辖的外国人组成。公董局还任命了巡捕房正副总巡，规定总巡的职权是：指挥全体巡捕，监督道路检查员的工作，监督收税员的工作，照管道路、码头、路灯和一切有关路政的事务，查究巡捕的罪案。这些职权使总巡成为法租界内非战时武装力量的头目。

同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一样，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会也是由在法租界内拥有一定地产的纳税人"选举"产生的。但是公董局的决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325—326页。

② 同上书，第331页。

议，非经法国驻沪总领事明令公布不得执行。这样，法国领事实际上在法租界内拥有最高权力。相对而言，公董局在法租界内的权力，没有工部局在英租界内的权力那么大。不过，法租界从这时起在拼凑一套殖民地式的统治机构，如公董局、巡捕房、租地人大会以及义勇军和稍后出现的会审公廨等等，却是与英租界基本相同的。

1866年7月11日，法国领事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公布了《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18条，对公董局的组织办法、选举与被选举人资格、公董局职权、领事与公董局的关系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作用相当于洋泾浜以北的《土地章程》，但在侵夺中国主权方面更加赤裸裸。这个章程除第五条载有"经总领事会同道台指定的中国士绅或商董一人或数人，如得董事会认为适当时，可以顾问资格出席董事会会议"外，通篇不提中国政府，好像这完全是在一块没有主权国的新土地上立法。而这一条加了如许限制的规定，在它订立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也根本未见实行。中国对法租界内事务完全没有发言权。

法租界闹独立的同时，英、美租界却在搞合并。就在法租界正式声明退出名义上的三国租界行政统一前一个多月，1862年3月31日，英租界在每年例行的租地人会议上正式通过议案，决定将虹口的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但是，如前所述，虹口美租界本来只是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在1848年和上海道台口头商定的，既无协议，连界址都说不清，美国作家马士曾经说它是"长成的"(Growed)①，实际上说它是蔓延的更恰当。为了将它与苏州河以南的英租界合并，美国领事在1863年积极策划要给这块由传教士充当先锋而滋生出来的特殊区域定界。6月25日，美国领事熙华德(G.F. Seward)和上海道台黄芳订立章程，规定美租界的界址如下：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英文版，第349页。

西面从护界河(即泥城浜)对岸之点(约当今西藏路桥北堍)起，

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

沿杨树浦向北三里为止，

从此向西划一直线，回到护界河对岸的起点①。

美租界大致划定界址(当时仍没有标明位置，树立界石)后3个月，9月21日，两租界正式宣布合并，一般称为洋泾浜北首外国租界，以区别于洋泾浜以南的法租界。也习称公共租界。

这样，在19世纪60年代初，上海的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惜投靠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天国，使它在上海租界内的主权丧失殆尽，外国侵略势力对租界内的行政权、司法权、警察权、征税权等多方面的侵夺，都反映了上海租界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而在外国侵略势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法租界的分离，英、美租界的合并，形成了近代上海两大租界的基本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上海城市的发展。同时，作为公共租界自治象征的工部局在行使它的权力时并不能完全得心应手，困难不是来自清政府的干预，却是来自租界内部。工部局在“行政方面曾经被一部分顽梗的纳税人(指外国商人——引者)所抗拒，这些人拒绝缴纳他们个人没有赞同的捐税，所持理由是构成租界特许状的地皮章程的颁给并不是由他们应当服从的一个权力机关所做的”，而这些外国商人的这种态度又“始终受到香港英国最高法庭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工部局认为1854年的《土地章程》已不适合，应该搞一个新章程来作为他们的“条约根据”，用以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巩固租界制度。

1865年3月10日，工部局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专设一个修改《土地章程》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同年4月成立后，在各

① 《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66页。

国领事的授意下完成修改草案，并于翌年3月的租地人会议上得到通过。这就是被称作"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的来历①。以后，章程内容虽然又有增加与修改，但再未进行如1854、1866年这样大的更动，它铸定了上海公共租界的这一所谓"根本法"的模式，作为工部局统治租界的"法律依据"存在了70余年。这次章程是在变上海为自由市的企图遭到失败后予以修改的，它明显地体现了赋予工部局极大权力，以造成一个事实上的"自治政府"的意图，其主要表现是：

(1)扩大租地人会议为纳税西人会，使之成为洋泾浜北首外国租界的主要议决机构。纳税人会议的成员不再限于租地人，凡"所执产业地价计五百两以上，每年所付房地捐项，照公局(即工部局)估算计十两以上(各执照费不在此内)或系赁住房屋，照公局估每年租金计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都有选举权。"选举权资格的放宽是为租界"自治制度"创造较广的统治基础，增强纳税人会议的有效性，使之更接近侵略者心目中的"市议会"。

(2)赋予工部局极大权力。严格地说，工部局(Manicipal Council)的名称是这次修改《土地章程》后才确定的，它比1854年章程中的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更具有政府权力机构和职能部门的意义。这次章程规定，工部局不仅有增加征收捐税之权，而且有制定附则之权，这种附则(by laws，一译附律)经纳税人会议通过和领事批准，即可作为法律在租界内行使。这次《土地章程》中出现的附则42条，以及关于工部局可以提出附则的规定，是外国侵略者在租界章程上的一大"发明"，它使租界当局可以不受主权国的任何约束而制定为侵略势力所需之"法律"，同时又取添补形式，不须作大的更动便能达到目的。1866年后《土地章程》之所以未作大的更动，附则的产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作家密勒(Thomas F·Millard)曾经评论道："对于租界所需的治安权

① 该章程全文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291—307页。

来说，《土地章程》总是显得太笼统。所以在适当的时候，规定了……这种犹如美国城市中的市政条令和治安规则的附则，用这种办法，租界创造了它自己的一套法律。”这段话，说出了这次《土地章程》中带关键性的问题，即章程的最终目的是让工部局更接近于一个“自治政府”。

法租界公董局章程在1868年4月由法国外交部作了一些修改。第二年，各国驻华公使根据其本国政府的训令，同时批准了公共租界的《土地章程》和法租界的《公董局章程》，批准书由英国公使阿礼国、德国公使李福斯(G.V.Rehfues)、美国公使卫三畏(S.W.Williams)、俄国公使布策(E.de.Butzow)、法国公使罗淑亚(L.J.E.Rochechouart)于1869年9月24日在北京签字，内容如下：

一八五四年七月八日由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等国领事遵奉各所属全权公使训令，为加强上海全体外侨的安全和管理所公布之《工部局章程》和《土地章程》，已由经验证明不足以应付本埠不断增加数量的居民的治安管理的要求。因此各该国领事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和德国公使的核准，于一八六六年三月间召集的租地人特别会议上，修改前项章程，并经征得各国政府正式同意。

但在此期间，由于法国政府的分离活动，一八六六年七月公布了法租界《公董局章程》，其后又由法国总领事于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修改，现此项章程在洋泾浜南岸的法国租界内正式施行，所以前述修改之《土地章程》仅在洋泾浜北岸之公共租界发生效力。

因此，为避免长期延搁而产生危及公共福利和安全的结果，下列签字人，今暂时代表其各自政府，宣布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四日公布的法租界《公董局章程》和一八六六年三月间修改的公共租界《土地章程》及附则，自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起，分别在洋泾浜两岸租界内具有法律效力，严格施行。

我们将此项议定书饬仰驻上海的各该国领事，即行公布两个租界章程，俾众周知遵照①。

前已述及，即使在1854年的《土地章程》中，也有此后章程的修改"须三国领事官会同道台商酌，详明三国钦差及两广总督允准"的规定，但是1869年的《土地章程》既未提交清廷或两江总督批准，也未与上海道台会商，只是在五国公使批准后，由上海领事团通知道台而已。所以连后来被上海工部局专程请来为租界制度辩护的南非法官费唐(R.Feetham)，也承认章程的效力一开始就已"发生疑问"②。至于法租界公董局章程则更是法国领事独断独行的产物。由于这两个章程在洋泾浜南北两块外国租界上的"严格施行"，清政府对界内事务丧失了任何权力。

(四)司法权的沦丧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清政府对这些国家的侨民已失去了作为主权国所应行使的司法权力。但是，在上海，由于租界制度的存在，清政府的司法权丧失得更为严重，它不仅失去了对有关无约国侨民案件的审判权，而且对居住在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逐渐丧失了完整的司法权力。这个过程也是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基本上与各国对清政府在上海租界内的行政权的侵夺同时进行的。

1845年订立《土地章程》时，关于租界内的司法管理有这样的规定："倘有赌徒，醉汉，肇小滋扰，伤及商人，即由领事行文道台，依法裁判，以资儆诫。"可见清政府对租界内的案子仍保持审判权。该章程还规定对于违反该章程者，英国领事有"审查犯规之处，决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419—420页。个别译名有更动。

②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简作《费唐报告》)第1卷，第110页。

定应否处罚”之权，但这个规定是对中国居民以外的外国人而定的。所以其时华人在租界内犯罪，仍送上海县审理①。1846年，江苏督抚会奏朝廷，移苏州督粮同知为松江府海防同知，驻于上海，管理一般的中外通商交涉事宜，其中主要的一项即是处理华洋纠纷②。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期间，英、美领事利用上海地方政府陷于瘫痪的时机，对大量涌入租界的中国居民实行司法管理。据英国外交公报所载，仅在1855年间，英国领事审理并结案的案件就有500起之多③。一旦有了先例，英、美领事当局就据以为理，公然夺取清政府的司法权。小刀会退城后，虽然案情重大者亦送往城内，但大部分都在租界内由外国领事当局审结了事，不再通过上海县衙门，而上海官府对此也持默认态度。可以想见，只要不“麻烦”县道衙门当局，一般以保位保禄为念的清朝地方官员对此是难得会有异议的。只有当需要财源军饷时，地方官府才想到县城北门外的大量中国人也是辖下的“大清臣民”，但当上海道为此提出交涉时，却已为时过晚。外国领事当局侵夺中国权益的一个常用方法，就是先造成一些既成事实，然后胁迫中国官员认可，以“惯例”作为抵制清政府行使权力的“理由”。所以到19世纪60年代初，外国领事已公然以界内华人的保护者自居。前已述及，当上海道台在1862年为征税事与英国领事交涉时，领事竟答：“历年来地方官与领事间早经谅解，凡地方官对于界内华人行施管辖权，须经英国领事官之同意”。这条“理由”同样被英国领事用来抵制上海地方政府对租界华人的司法权。

在攫夺中国司法权方面，侵华各国的步骤是一致的。1863年美国领事在划定美租界时，也在划界章程上蓄意限制清政府在美租界的司法权。该章程第三款在伪称“绝对承认中国官厅对美租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8、70页。
② 吴馨等修，姚文楠等纂：民国《上海县志》，卷14，外交志。
③ 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

界内中国人民的管辖权”的同时，竟规定清政府的“拘票非先经美领事加签，不得拘捕界内任何人等”①，等于否认了清政府在美租界内的司法权。法租界的情况大致与此相同，上海官府的拘票也必须事先得到法国领事馆的签署，否则不能在法租界内进行拘捕。并且从1865年起，法租界内除了中法人民的商务案件由道台或道台派员到领事馆与领事“会审”外，其它涉及法租界内的中国人案件，完全由领事单独审理。

此外，侵华各国还蓄意侵夺清政府对于没有与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外国侨民的司法权。在这一问题上，上海地方官员竟图省事而拱手出让主权。1863年12月，英、法、美、俄、葡等国领事当局曾致函上海道台黄芳，请将对无约国侨民的司法权“由我领团授与工部局，并由本团监督其施行”，对于这一无理要求，黄芳竟答：“查无领事代表之外人与大众杂交，同用外国语言，本官厅实无从辨别管理。来函请由贵领事等代表本国授权与工部局，取缔此类外民，同时由贵领加以监督，以免贻误等情，尚觉妥善。”② 于是，工部局取得了对无约国家在沪侨民的司法权。

一方面是清朝官员的昏庸无知，一方面是租界当局的狡诈层出，公共租界在1864年起就出现了一种叫做“理事衙门”的审判形式。所谓理事衙门，就是上海道台派理事前往英国领事馆，会同英国陪审官一起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案件。上海道台还派海防同知前往租界审理民事案件。但无论何种案件，均有外国陪审官（一般由英国副领事充任）参与，而且，“（外国）陪审官在中国审判官审断案件时，实际上颇起活跃的作用”③，甚至在判决书上，在上海道台的署印之下，还要加上英国领事签署的“Approved”（批准）

---

① 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02页。

② 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第135—136页。

③ A·M·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 1925, 上海，第52页。

字样，可见这种“理事衙门”实际上是由租界当局作主的。“理事衙门”开始设在英国领事馆内，1868年底迁到了南京路上。

“理事衙门”算不上是一个司法机构，只能算是一种连一点文字根据都没有的审判形式。当这种非正式的司法程序在租界内进行时，外国领事又在着手炮制他们所需要的“依据”了。1867年起，英国领事文极司脱（C.A.Winchester）就和上海道台应宝时会商组织正式法庭的事，他们订立了章程10条，在1868年12月28日得清朝总理衙门批准，翌年4月20日，英国领事麦华陀按其政府训令，将修正章程10款颁布，名曰《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麦华陀在公布这个章程时，声明其有效期为一年，但直至1927年所谓上海临时法院成立前，这个章程从未废止。所以，会审章程事实上是公共租界半个多世纪里畸形司法制度的主要依据①。

会审章程规定，由上海地方政府“遴委同知一员，专驻洋泾浜，管理各国租地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各案件”，“准其将华民刑讯、管押及发落枷杖以下罪名”；对于案件涉及“洋人必应到案者”、“为外国服役及洋人延请之华民”和“无领事管束之洋人”，外国领事得亲自或派员“陪审”；上海官府在拘捕为外国人服役的华人前，必须经领事允准，“如未得该领事官允准，不得拿获”；更为荒唐的是，外国领事既得参与“会审”，与中国审判官同时审理案件，又可以接受“上诉”，章程第六款规定“倘两造有不服委员所断者，准赴上海道及领事官处控告复审”，这样，一旦外国领事与中国审判官意见不合（这种情况是屡屡发生的），领事就能够以“上级法庭”的身份对案件作再审，中国审判官员处于实际上的无权地位。

这个章程在名义上也收回了一点权力，例如前已述及的上海官府在租界内拘捕华人，曾要得外国领事“允准”，而会审章程则作了“中国犯逃避外国租界者，即由该委员（按指中国会审官）选差径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69—270页。

提，不用县票，亦不必再用洋局巡捕”的规定，而所审案件如果“案情只系中国人，并无洋人在内，即听中国委员自行讯断，各国领事官，毋庸干预”。这些本来只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于本国人民的勿庸置疑的权力，但在上海却是经过道台和英国领事几年的“磋商”才得到的。并且，在外国侵略者的僭权活动中，条约、章程往往只是他们起步的一个蹬台，会审公廨的章程也是如此。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剧，这个章程也未能严格执行，而所“忽略”的部分，却总是对侵略者的僭权活动有所限制的部分。

会审公廨章程为英、美、德等国所接受，却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法国对清政府司法权的侵夺更加赤裸裸。它宣称会审章程第一条关于涉及中国人的案件由中国官员按照中国法律单独解决，以及中国审判官得派差径提逃犯于租界内的规定，与法租界的“司法习惯不合”，拒绝参加。但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始审判的同时，法租界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1869年4月，法国领事和上海道台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建立一个定期会审的常设法庭，由道台或其代表每星期三次来法国领事馆，“凡属法租界中国居民的案件，无论民刑轻重，概由领事和道台，或者他们双方的代表，以对等地位会同审理”。①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两个外国租界内出现会审公廨，几乎与第三次《土地章程》同步。三国公使“暂时批准”《土地章程》和英法租界会审章程的出笼，相差仅五个月。这个事实并非偶然。《土地章程》主要是个行政章程，它不可能兼顾太多的司法问题，但它在司法权方面的“不足”，恰恰由同年公布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弥补了，后者可以视作对前者的补充，或者是它的分章。它们都是在变租界为自由市的企图中形成的，其共同目的，就是要使上海租界逐渐独立于中国政府，成为一个西方列强控制的“共和国”。

---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441页。

我们已经叙述过，在小刀会起义的战火中，上海出现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雏形，其表现是租界内出现了有行政权力的工部局，有立法权力的“租地人会”和处于含混状态的外国领事当局对中国司法权的侵夺，以及各国驻沪军事力量和万国商团等。这是殖民地式的上海租界形成的初级阶段。这个“独立自治体”的雏形，经太平天国战争，尤其是60年代初太平军在上海周围地区的活动而日益成熟。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江南地区空前的战乱，清政府在《北京条约》后对侵华列强的进一步屈从，大量中国人进入外国租界造成的华洋杂居的局面以及由于人口骤增带来的“繁荣”和管理等种种问题，修筑军路所形成的租界在事实上的扩充，这些都形成了殖民地式的“自治体”发育成熟的最适宜的条件，上海租界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急骤发展起来。到19世纪60年代末，阿礼国辈所企望的“独立自治国”已在上海基本形成，其表现是，租界内享有充分行政权以及一部分立法权的工部局、公董局，经过扩大的资产阶级议会性质的纳税西人会，严重侵夺中国司法权的会审公廨和早已成为殖民者护身符的领事裁判权。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一块土地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所在国无法干涉的行政、立法、司法相当完整的统治形式，说明上海租界以各国侵华势力为背景，至此已完成了它的殖民地化过程。

这块殖民地的面积，大大地超过了上海旧城。几百年来号为“东南都会”的上海县城，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咄咄逼人的冲击下，显出了它作为封建县城故有的局限性，相对静止了，而县城北门外洋泾浜南北的两租界，却在中国内战的刀光剑影下，在殖民主义的血与火中迅速发展起来。“租界日盛，南市日衰”①，上海县城成了租界的附庸，围城里面发生的故事不再举足轻重，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上海城北租界的发展便极大地代表了整个上海的发展。

① 吴馨等修，姚文楠等纂：《上海县续志》，卷2，建置上，城池。

第七章　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一、外国资本迅速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通商的五个口岸中，上海第一个出现了专供外国人租地聚居的居留地。其它通商口岸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居留地时，上海的外国人居留地已日渐脱离清朝政府的控制，演变成了后来习称为“租界”的特殊区域；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广州、宁波、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等地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区域时：“出生”最早的上海租界已经进入了它的成年期。

上海租界实际上是用强权移植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仿制品。如前所述，它在模仿资产阶级的国家模式方面唯妙唯肖，可称麻雀虽小，五脏齐全。但是，说它是仿制品，又表示出它并非真正的、完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它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通过侵略强加给中国的。它是侵略的产物，就必然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这种性质随着中国居民大量进入和定居租界而日益突出，“洋人管理华人”，成为上海租界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

中国居民向租界汇聚，可以说是上海开埠以后人口流动的基本特点。开埠初期的 1850 年左右，由于华洋分居政策，租界内人口在当时整个上海人口的比重中不足 0.1%，可称微不足道。但是，经小刀会、太平天国两次战争，这种人口比重的情况就明显改变了。到太平天国结束后的 1865——1866 年间，上海公共租界和

法租界人口分别占上海人口总数的 13.4%和 8.1%，即两个租界的人口比重，已占上海人口总数的 21.5%，也就是说，这时（租界出现后 20 年）全上海每五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居住在租界内了，而这时租界的面积只是全上海面积的 0.57%①，并且在以后的年代里，人口比重不断提高②，这清楚地反映了租界的吸引力，而进入租界定居的，绝大部分是中国居民。

租界制度既然是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那么，为什么在租界产生以后，总的趋势是，进入上海租界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呢？在众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上海出现了这种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在中国的广大的地区，人民遭受的却是沉重的封建压迫、频繁的兵燹战乱。在腐败的封建统治和西方侵略的冲击下，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破产，民不聊生，啼饥号寒，大量破了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人无家可归，只得流入看上去颇为繁荣和谋生较易的租界地区。特别是在战乱的年代里，租界的"独立"所形成的特殊状态，使它能提供相对的安定生活因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不仅是贫苦人民，还包括不少地主士绅、富商巨贾乃至失意官僚、退役军官等等也进入租界，这些人往往挟资而来，在租界或其附近经营各种行业。这样，大量中国人汇聚上海租界，形成人口鼎盛，百业兴旺的繁荣局面，即使在和平的年代里，也足以吸引各种阶层的人们生活和谋利。

上海，象是上了轨道的铁车，它的畸形繁荣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不断向前发展。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上海进入了它的稳定发展时期。

作为上海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是中国对外贸易中

---

① 参阅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 页及及附表 2、附表 3。

② 到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2 年，上海租界占上海总面积的 6%（不包括越界筑路区域），而租界人口比重超过全上海人口的半数而达 62·2%。

心的北移和由此而来的上海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北移，是在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至50年代已是十分明显，到了60年代则趋向完成和稳定。所谓"北移"，主要就是指上海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上海在这种变化中充当了主角。

1844年，从广州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是1550万美元，从上海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是250万美元。第二年，广州的英国进口商品贸易额减少了约1/3，而上海的英国进口商品贸易额却增加了一倍。同期的对英出口贸易额两个口岸都有增长，但上海的增长趋势要猛得多①。以后两地的对外贸易额虽时有波动，上海的英国商品进口贸易额在十年内一直没有达到1845年的水平，但外贸总的趋势却是穗降沪升。以40年代下半期(1845—1850)为例，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趋势：

1845、1850年广州、上海主要外贸数字对照表②

项目	计量单位	广州		上海	
		1845	1850	1845	1850
生丝出口	包	6800	4300	6400	17000
茶叶出口	磅	76000000	55000000	3800000	22000000
棉花进口	磅	77000000	64000000		
对英国贸易总额	元	31000000	16000000	11000000	12000000
进口美国商船数	只	93	70	17	62

① 据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所列数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5页。

② 根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页所列数字编制。



茶叶装往外洋

进入50年代以后，贸易重心北移上海的速度更快了。上海在全国出口商品的两项大宗商品：生丝和茶叶贸易上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生丝几乎全部通过上海出口①。1853—1855年间，上海正处于小刀会起义时期，但丝茶出口仍是方兴未艾。1854到1855年间从上海出口的茶叶即达8000多万磅②。仅从上海运往美国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进口贸易也是如此，当时除了非法的鸦片贸易外，棉布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50年代中期(1855)，上海进口的美国棉布（粗哔叽）已相当于广州的一倍以上。此外，船舶进口也已经成倍于广州，到50年代末，上海进口船只已是广州的三倍半③。

马克思在1858年指出："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员限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403页。

② 《北华捷报》，1860年1月7日。

③ E.Griffin: Clippers and Consuls, 1938，第399—400页。

于在广州经商。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① 持续了十余年并且主要在中国南部进行的太平天国战争也没有能阻止对外贸易北移的这种大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外的形势更促成了上海对外贸易的稳定持续的发展。

就国内来说，由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长江，外国侵略势力可直达汉口并由此进入中国更深的腹地，上海的西侧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纵深度得到空前的发展；上海北面的广大地区也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相继辟为商埠，成为外国商品的消纳地和转运站，这些口岸的贸易绝大部分都通过上海中转。就国外来说，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和美国的形势对上海的发展都极为有利，日本在明治前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而日本外贸中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几乎全部通过上海，就是日本对欧美的贸易也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上海进行；60 年代前半期的美国内战也影响了上海，由于这场战争，世界原棉供应一度短缺，一个时期内，中国棉花成为丝茶以外的出口大宗，几十万乃至百万担棉花涌至上海港口，例如，在棉花贸易高潮的 1864 年，上海进出口船只的吨位达 187 万吨，而 1860 年时的吨位还只有 43 万吨。60 年代后期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较快的时期，而“其进步最大者，厥惟上海”② 。

到了 60 年代末，上海对外贸易出口总额持续超过 3000 多万海关两，约当广州出口额的三到四倍。1869 年上海的全部进口货值将近 4900 万海关两，而广州则不过 500 多万海关两，只相当于上海的九分之一③ 。这种比例在 60 年代以后基本上维持着，而广州以外的其它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开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625 页。

②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 106 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 册，第 1615—1616，1611—1612 页，附表。

汉口增长较快外，在同期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从60年代起，上海已不可逆转地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有人对这时的上海作了颇为恰当的譬喻："盖上海一埠，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耳。"①

对外贸易的发展，引起了上海经济的一系列变化。

19世纪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在上海贸易发展中首先应运而生的是航运业的兴起。

最早进入中国远洋运输系统的是英国的大英轮船公司（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这家公司被上海《字林西报》称作英国轮船公司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②，40年代起就在欧洲和印度之间开辟定期航线，1847年左右首航香港，1850年，它的航线延伸到上海。随着业务的发展，1851年起，大英轮船公司把每月的航行改为每两周一次。这家航运公司以贩运鸦片和金银出名，在上海，它还承担大量的生丝出口运输。据估计，仅1860年它从上海承运的生丝就达五万件，收取运费162000多英镑③，连英国商人也承认："大英轮船公司的董事们同中国的交易全是史无前例的最赚钱的买卖。"④这家公司长期得到英国政府高达四、五十万英镑的财政资助，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垄断了上海到香港的海上运输。

但是，从60年代开始，在贸易急剧发展的形势下，大英轮船公司遇到了各国的激烈竞争，各洋商开办的远洋运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中重要的有1862年法兰西火轮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开辟的东方航线，1867年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太平洋邮轮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1868年进入中国的

---

①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06页。

② 《字林西报》，1877年2月3日。

③④ 《北华捷报》，1860年12月29日。

英国海洋轮运公司(Ocean Steamship Co.)等。70年代中期起,日本的三菱邮轮公司开始在日本与上海之间航行,不久就垄断了中日之间的全部贸易运输。80年代以后,德、俄、加拿大等国的远洋轮运都已直达上海。1880年,美国的远洋轮运公司利用巴拿马铁路,开辟了一条由纽约直达上海的海上航线,改变了原来美国商品通过伦敦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中国的迂迴线路,中美贸易运输的局面由此大为改观,利用新航线的美国轮运公司,几乎独揽出口到中国的美国棉纺织品的运输,而上海在对外贸易中所起的枢纽作用更大了。事实上,从60年代起,各国在对华远洋轮运上已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切外国轮船,不论其最后的目的地是哪儿,它都要先开到上海。"① 上海进出外轮的数字成了中外贸易增减的可靠的计量数。

与远洋运输同步发展的,是近海和长江航运,它们同样为外国资本所霸占,并且成为外国资本之间激烈争夺的阵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门户洞开,沿岸新增了镇江、九江、汉口等通商口岸,从上海到汉口之间的内河航运以及上海附近的沿海航运成为各洋行获利最丰的业务。据统计,60年代初,上海有20家左右的外国洋行各自拥有一两艘轮船,航行于长江和沿海口岸之间② 。上海稍具规模的洋行几乎都置备轮船参与长江航线上的竞争活动。与此同时,专业轮船公司层出不穷,例如,1862年创办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中日[沿海和长江]轮船公司(China & Japan [Coast & Yongtze River] Stea m Navigation Co.),1865年创办的英商中国商业[商人]轮船公司(China Mercantile [or Merchant] Stea m Navigation Co.),1867年创办的英商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 tion Co.),1868

① 《北华捷报》,1863年2月21日。

② Liu Kwang Ching: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1874,1962年版,第38页。

年创办的英商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等等。

这些洋行或轮船公司以美国的旗昌，英国的怡和、宝顺为最重要，它们经过剧烈的竞争，在1867年达成一个为期10年的协议，旗昌和它的两个主要对手怡和、宝顺划定“势力范围”：长江航运由旗昌独占，除宁波以外的上海以南的沿海航运则由英国的轮船公司“承包”。当时旗昌轮船公司实力雄厚，是长江航运上的霸主，主持者是美国旗昌洋行大股东、曾任美国驻沪代理领事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的金能亨。据1873年的财产估算，旗昌轮船公司有资本2万股，共计225万两，另有上海法租界、虹口、浦东栈房地业、各通商口岸栈地和上海驳船公司股分将近45万两①。但是旗昌独霸长江航运的局面没有维持到10年就发生了变化。“异军突起”的是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在1872年组织的太古轮船公司（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它以大幅度降低运费的办法向旗昌在长江上的垄断地位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竞争，终于迫使旗昌在1874年与它达成了在长江航运上联营的协议，旗昌独占长江航运的局面从此结束。3年后，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轮船招商局以220万两的价格买下了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财产，结束了旗昌在中国内河和沿海15年的活动。此后，英国航运势力横行长江，上海的外国轮船公司几乎由英国人包办，其中重要的如1873年成立的华海轮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1879年成立的扬子江轮船公司（Yangtze Steamer Company）、1881年成立的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的投资，有的全部、有的主要来自英商。

对外贸易的发达促成了由外商投资的航运业的发展；航运业

① 《申报》，1874年3月21日。

的发展又引起了一个新兴的行业：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它同样处在西方商人的控制下。

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外国人就企图在这里开办造船业及与造船有关的锻冶、制绳业。50年代初，上海同时出现了五、六家与造船有关的外国洋行，其中有日后成为耶松船厂(Farnham&Co.)一部分基础的美商杜那普(J·Dewsnap)开办的虹口船坞，以及其它一些昙花一现的洋行。不过，"在那些日子里，还很少有人认为在黄浦江上制造轮船是可能的"①，所以这些所谓与造船业有关的洋行，大多还只能为过往轮船作些修补工作，或制作小船，不少造船公司连个船坞都没有。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北移，进出上海的船舶急速增加，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在50年代后期有较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虹口和浦东这两个中心。1856年，在吴淞有一家由美国人贝立斯(Nicholas Baylies)组建的船厂。这家船厂在这年7月制成了一艘长68呎，载重40吨、马力12匹、吃水2呎8吋的轮船，取名"先驱号"(Pioneer)，这是外国人在上海制造的第一艘轮船。同时，在下海浦和租界对岸的浦东地区也开始出现了英、美人经营的外国船厂。英国人密契尔(A、Mitchell)在浦东开办了第一家外国船厂；接着，在1859年一个有造船经验的苏格兰人莫尔海(D.Muirhead)在浦东又设立了一家浦东火轮船厂(Pootung Dock)。据该年的《上海年历》(Shanghai Almanac)记载，这家船厂的经营业务有造船、铁工、机器工程和炼钢等，项目的繁多，为前此所仅见②。

但是，上海船舶修造业的真正发达是从60年代开始的。60年代，正是上海对外贸易的高潮时期，上海港地位日益重要，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外国船厂在上海得到极大的发展。下面这份记录

---

① G、Lenning & S·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第1卷，第384页。

②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350页。

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外国造船厂开办的空前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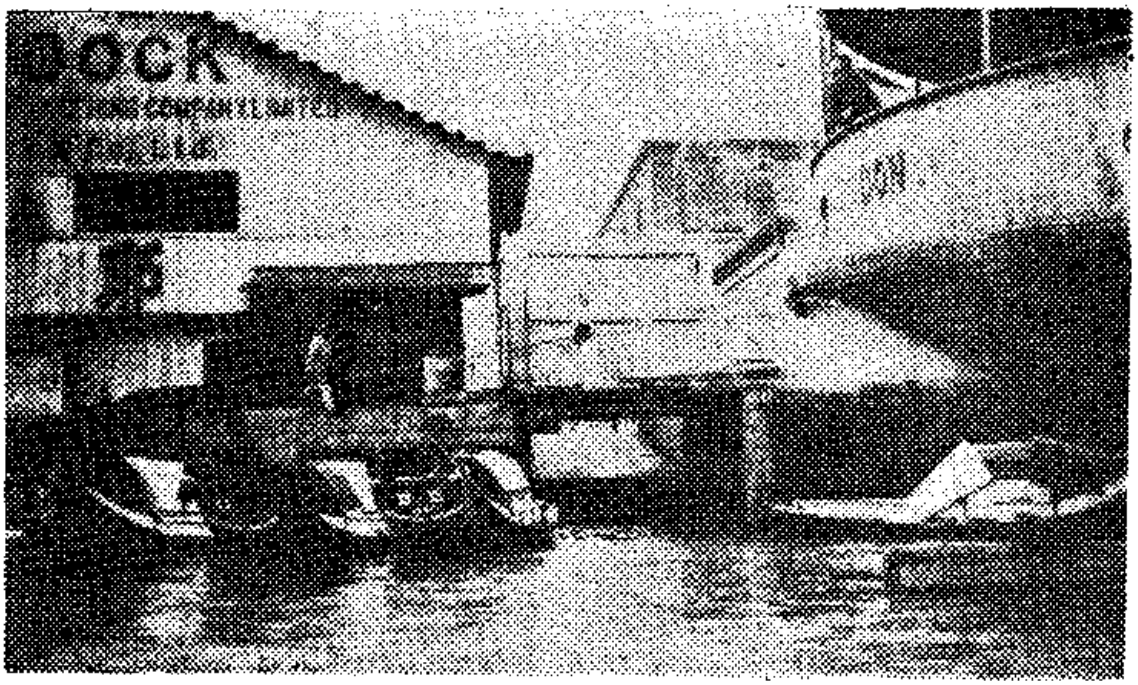
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外国在沪开设船厂一览表①

开设年份	船厂名称	开设地点
1860	虹口造船场(Hongkew Ship Yacht & Boat Building Yard)	虹口
1861	宾夺船厂(Pinder G.H. & Co.)	虹口
1861	柯立·兰巴船厂(Collyer & Lambert Co.)	浦东
1862	祥生船厂(Nicholson & Boyd Co.)	浦东
1863	德卢船厂(G.H.Drew & Co.)	浦东
1863	旗记船厂(Hunt & Co.)	虹口
1864	耶松船厂(Farnham & Co.)	虹口
1864	莫立司船厂(Morrice & Behncke Shipwright & Blacksmith)	浦东
1864	莫莱船厂(Mulley & Co.)	浦东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860到1864年的5年中，上海新成立了9家外国船厂，在那些年代里上海每年都要冒出一、二家外国船厂，这在西方资产阶级远未开始对中国进行工业投资的年代里确实是罕见的。不仅如此，50年代开办的外国船厂，在这时也作了扩充而有很大发展。例如前面提到的莫尔海在浦东建立的造船厂，到60年代"已成为远东重要的企业了"②。这些外国船厂，使上海地区无本国的民族造船业可言，就是在外国船厂之间，竞争也十分激烈。曾经独霸长江航运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1862年附设了一个机器厂，专门修理本公司的船只，但由于上海各船厂的迅速发展，这种自备修理的机器厂就显得不合需要，仅开办了两年就

① 根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352—353页所列资料编制。

② W.F.Mayers: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1867年版，第385页，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17页。



耶松船厂

停业了。而在众多的外国船厂中，最重要的并且日后成为上海造船业巨头的是祥生和耶松两家。

设在浦东的祥生船厂是由英国人开办的。在1865年时，它已能制造载重200吨，马力70匹的小轮船，修理船只的总吨位在4000吨以上，当时被称作"东方设备最完备的企业之一"①。70年代开始，它和耶松一起，分别兼并上海几家规模较大的船厂。由浦东火轮船厂创办人莫尔海组织的浦东炼铁机器公司(Shangh ai and Po-otung Foundry and Engineering Co.)，本来是利用浦东火轮船厂的一部分设备专门从事船舶机器制造的公司，在当时是设备较为先进的企业，但开办不到两年，就在1874年转卖给了祥生厂。虹口的上海船坞公司(Shanghai Dock Co.)是另一家发展较快的船厂，这家船厂在1862年新建了一个长280呎，吃水14呎的新船坞，在当时是各船厂中规模较大的一个，但在70年代后期也为祥生所

① 《字林西报》，1864年4月21日。

得。祥生船厂在兼并原有船厂的同时，还加紧自身设备的更新，1880年，它增建了一个长450呎、宽80呎的新船坞，成为可以容纳和修理上海港内最大轮船的船厂。

设在虹口的耶松船厂原来是由美国人创办的，初创时其经营范围不限于船坞，还包括建筑设计、施工等项目。但不久它吸收了不少英国资本，又先后兼并了许多设在上海的英国船厂，于是耶松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英国资本的专业船坞公司了。1872年，耶松吞并了原属浦东火轮船厂的船坞，接着又对浦东船坞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而一年前它已以最高标价取得了与它近在咫尺的上海船坞公司的"老船坞"的租赁权。这样，60年代发展较快的虹口上海船坞公司和浦东火轮船厂就被耶松和祥生吞并完毕，而其余规模远逊被吞并的两家船厂的小厂就更是它们的囊中之物了。祥生和耶松自然成了上海船舶修造的两大企业。1884年，耶松船厂为怡和轮船公司修造的"源和号"(Yuen Wo)轮船，船长280呎，载重2000吨，时速11海里，在当时可称巨轮。清政府也成了这两家船厂的大主顾，单是耶松、祥生两厂在1882至1893年所制造的37艘大小船只中，清政府即定购了19艘，超过半数。

与此同时，各洋行、船厂纷纷在黄浦江沿岸选择地段建造仓库、堆栈、码头，码头仓栈业与航运、船舶修造业一样，在60年代贸易兴旺的日子里得到快速发展。一个经常住在上海的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F.Mayers)在1867年写道："近来外国人在沿江一带已购置了很多场地，现已建造起不少宽敞的仓库、船坞和码头。"① 这些仓栈码头，占据浦江两岸最好的地段，使两岸地价大增，例如1875年《申报》曾载："金利源(按，即指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码头，河面之位甚长，而又座落上海最繁盛之处，其往宁波等处各码头及船埠

① W.F.Mayers: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1867年版，第385页。

一切，当今之值，实皆倍于五、六年也。”① 下面这个例子足见70年代初期的黄浦江边已是谁家的天下。1872年4月17日同一天在上海《字林西报》上登载广告的就有：金方东码头（Kin Fong Toong Wharf），旗昌轮船公司码头（S.S.N.Co.'S Wharf），加罗花洋行码头（Glover & Co.Wharf），点耶洋行码头（Kroes & Co.'S Wharf），大英轮船公司码头（P.& O. Co.'S Wharf），怡和码头（Jardine's Wharf），浦东码头（Muirhead's Wharf），旗昌轮船公司虹口码头（Hongkew Wharf），琼记洋行码头（Heard & Co.'S Wharf），万昌公司码头（Pacific Mail Wharf），顺泰码头（Hunt's Wharf），惇裕码头（Trautmann's Wharf），公和祥码头（Shanghai and Hong kew Wharf），耶松码头（Farnham's Wharf），仁记码头（Gibb,Livingston& Co.'s Wharf）②，不难看出，这些码头挂的几乎全是洋商的招牌。

外商码头堆栈业的发展主要是凭借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享有免税等特权，同时也因其经营方法较为灵活。清政府的招商局曾认为，上海港“洋栈占十分之七八”“国人之未有码头者，都竞向外栈”，是因为：“一，外栈可避免各种特捐；二、外栈之不顾成本，暗放价目”③。各码头因为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修筑技术，也使效率成倍增加，据一位正当航运船舶业飞速兴起的年代里到过上海的中国人记载：“沿黄浦一带江岸，用大木植桩，贯穿铁条，排列十余里，广数丈。其码头恰与轮船相当，可用马车径运货物至轮船，无须驳船也。”④

---

① 《申报》，1875年3月13日。按金利源码头在法租界外滩，旧顺济庙基，见《上海县续志》卷2，第26页。

②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8页。

③ 《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第83页，见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586页。

④ 黄协材：《沪游胜记》。

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向中国推进银行势力，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流通领域。开埠后外国银行在上海的发展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过程。

前已叙及，开埠后不久的 1848 年，上海就有了丽如银行分行。丽如银行是 19 世纪 80 年代前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银行，也是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银行 1842 年在印度孟买成立时，原名 Bank of Western India(西印度银行)。当它在上海设立分行后三年，获得英国政府特许，更名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 (东方银行公司)；而它最初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中文名称也不统一，在广州称作“银房”，在福州称作“东藩汇兑”，在香港有人称它为“金宝”，还有“旧银行”、“泰丰”等叫法，直到它在上海设立分行后，才逐渐剔除了其它称号，根据它在上海的名称统一作“丽如”①。这家银行名称的变化：由“西印度”而“东方”，由杂称而统一，颇具象征地显示了英国银行势力东渐的轨迹，以及上海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它的中英文名称的变化都发生在设上海分行后，而中文名称则根据上海而统一，这些都表明英国对华金融势力已开始随贸易重心一起北移上海。

步丽如银行后，50 年代进入上海的外国银行有：总行设在印度孟买，1855年在上海设立代理处的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总行设在伦敦，1854 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的呵加剌银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Ltd.)；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 China)1854 年在上海设了代理处，1857 年该行和亚细亚特许银行(Chartered Bank of Asia)合并为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don & China)后，1861年将上海的代理处改为有利银行分行；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 China)1857 年开

①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 183—184 页。

业后马上在上海设立分行；以上都是英国银行。1860年，第一家法国银行——法兰西银行(Comptoir d' Escompte de Paris)在上海设立分行。

到了六十年代前半期，由于美国内战而引起的欧洲棉花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投机事业迅速波及中国各通商口岸，上海成为中国棉花出口的主要口岸，仅1863年下半年，从上海输出的棉花就达36万担，价值在200万英镑以上①。在这种形势下，外国银行更蜂拥而至上海，进行金融投机。他们充当掮客，从事汇兑买卖，彼此进行激烈的竞争。1864年，上海出现了所谓金融高潮，一般银行股票都利市三倍，汇率的波动变化莫测，上海的金融市场在那一年内"没有一夜安宁"②。但是，这种"繁荣"的局面完全是虚假的，充满了投机的性质，不到两年，随着美国内战结束，棉业马上出现危机，而上海迅速从金融高潮跌到金融危机，在1866年出现了开埠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恐慌。这一年，不但在投机狂潮中开办的银行纷纷倒闭，就是50年代在上海已立稳脚跟的汇隆银行等也遭到破产或股票大量贬值的命运。

到60年代为止，虽然已有相当数量的外国银行进入上海，它们利用经济形势的波动，竭力投机牟利，但是，总的说来，这时的外国银行在中国尚处初期，它们在上海的金融势力，还不足以达到控制上海金融市场和贸易资金周转的程度。其原因如下：首先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完全纳入世界流通范围，主要的交易方式仍是物物交换制，银行所起的信贷和流通作用在这种交换形式中没有显示出巨大的利益。其次，许多大洋行自身备有足够的资金，在贸易的金融周转上不但不依靠银行，而且还和银行有着竞争关系，例如英国的丽如银行在50年代和美国的旗昌洋行就有着竞

① 《北华捷报》，1864年1月9日。

② J.W.Maclellan: The Story of Shanghai，1889年版，第33页。

争，而后者因与中国商人以及银钱业者保持着直接联系，在竞争中总是处于优势。再次，初期的外国银行在经营方式上也未能适应形势。例如，当时一些外国银行对储户不仅不付利息，反而要抽取手续费，这就使银行存款对一般市民没有吸引力。此外，由于中国人一般不信任纸币，尤其不信任外国银行所发的纸币，1863年以后，上海虽有外钞流通，“但是上海的中国人不象香港的中国人那样，他们对钞票不大理会，因此，没有一家银行有过大量的流通额。”① 外国银行的纸币发行业务也未能顺利展开。

可见，外国银行在60年代还没有形成一股控制中国金融的势力，但这种势力已在酝酿之中。一家后来成为半殖民地中国最重要的外国银行——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Ltd.）正是在这场风潮中初露头角。

汇丰银行筹建于1865年，由久居上海、香港的英国怡和、仁记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德国、波斯等国商人发起。发起书上写道：“目前在中国的银行，只是总行在英国或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活动，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汇丰银行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② 这样，汇丰银行就成为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由于它的宗旨是“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即直接为外商在华经济活动服务，它的后台是在中国活动多年的洋行大老板，因此在远东经商的人们都对它发生兴趣。汇丰银行在1864年7月起招股，不到半年，股份已经认足。1865年4月，汇丰银行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同时营业。它开张后不到一年，就遇上了来势凶猛的上海金融风潮，但由于它得到上海各大洋行的支持，所以不仅度过了这场危机，而且还在危机中崭露头角。例如，当各银行在风潮中纷纷缩短汇票支付期限，以减少风

① C.Mackenzie: Realms of Silver，1954年版，第59页。

② 《北华捷报》，1864年8月6日。

险时，汇丰却坚持6个月的支付期，从而赢得了声誉和外商的好感。此后几年，汇丰年年获利，到1868年，汇丰银行的股票就出现了升水，为它日后取得英国在华金融势力的堡垒地位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商业、航运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随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上海航运业的发展，外资金融业的兴起，上海的民族商业、民族运输业和民族金融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这些行业中出现了民族资本家。

19世纪60年代，上海民族商业已相当繁荣。中国人开的店铺，不但遍于县城之内，而且渐渐地在租界发展、繁荣起来。时人记载：（租界）"南北地广十余里，洋房联络，金碧万状。其间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茶坊则楼架三层，最上者，一茗需钱五、六十；若登酒楼，非费十余金不可。……界内之盛，实由华民之铺户杂处其间，商旅咸集故也。"①

这些店铺中，很大一部份是转售进口商品的洋杂货店，尤以进口的机制纺织品为盛，因此颇负盛名的是"清洋布店"。

上海开埠以后，进口商品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机制棉纺织品。1845年，上海进口工业品总值为1224079镑，其中棉布（包括灰布、白布、阔幅绒布、印花布、斜纹布）进口值1083185镑，占进口总值88%以上；如果加上棉纱4812镑，各类毛纺织品约37977镑，手帕2300镑，蔴纱678镑，总计达到1128952镑，占进口总值的92%以上②。这样大量的纺织品要在上海市场销售，或通过上海销往内地各口，除了外国人自己开设拍卖行、叫庄行，依靠一批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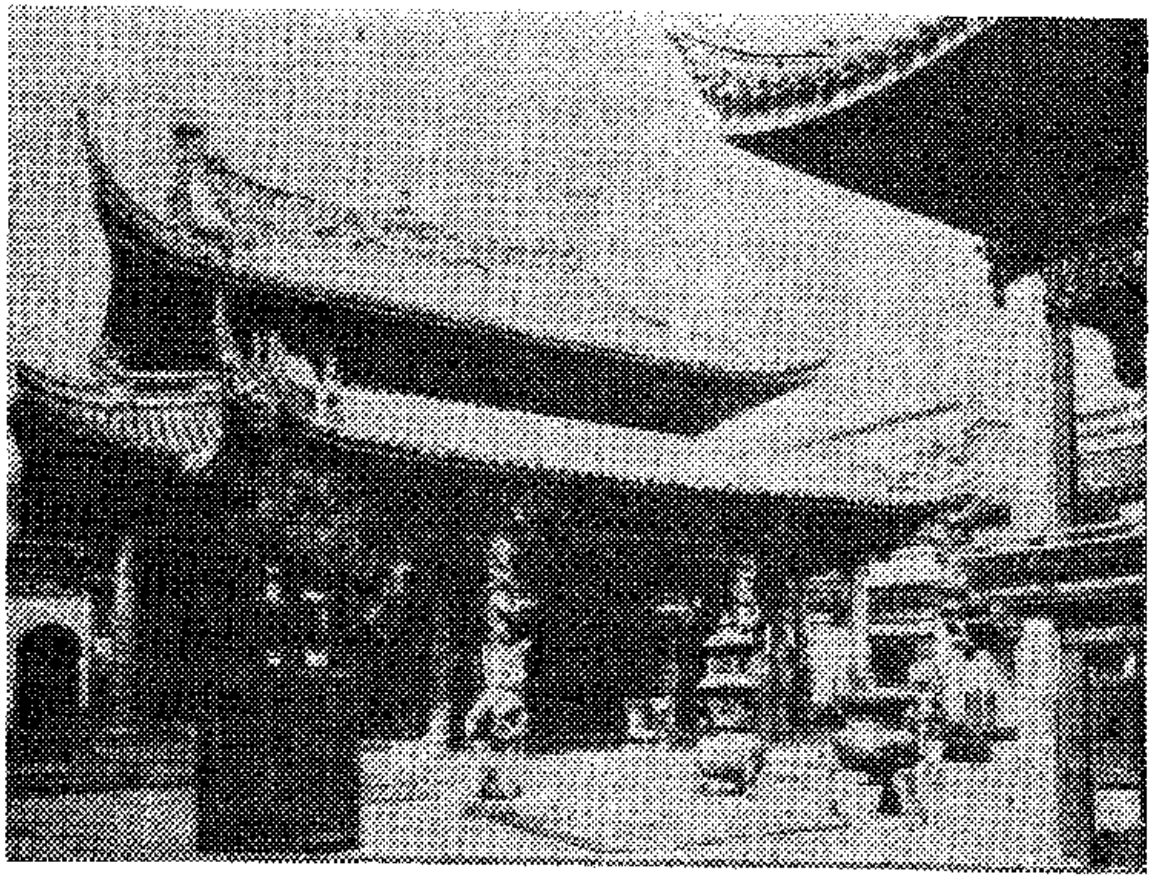
① 毛祥麟：《墨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0—131页。

②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40页、第146页、第147—149页。

办销售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华商私人资本。1850年以前，洋行为了打开棉货市场，首先利用上海原有的京、广货店，或者允许以10天期庄票购货，或者由洋行委托寄售，甚至送货上门实行赊销，无形中把上海传统的京、广货店纳入了洋布销售网。1850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涌现了一批以专售洋布为业的商店，时人称为"清洋布店"。这一年，上海绅董郑锦云在大东门外，开办了第一家，称为"同春洋货号"（又叫同春字号洋布抄庄），经营内庄批发和零售。随后，大东门内义泰、协丰，南京路抛球场恒兴等洋布店相继开办。到1858年，这类清洋布店已有15家左右。它们的资本，大多在2000—3000两（规元）之间，规模最大的是1853年开办于南京路河南路口的增泰洋布店，开办资本达10000两。这些洋布店的开办者多为士绅，唯有恒兴洋布店是由商人——原蔡同德堂老板投资。它们的经营分批发和门售两种业务。批发的对象，不仅有邻近上海的宝山、南汇、奉贤、松江等县的商号，而且有来自内地的掮客。他们为经营之便，陆续在上海设立办庄，也称为"申庄"。仅批发一项，各庄每年营业额平均约3、4万元。这些清洋布店雇用的职员、工人、学徒，一般约12—16人，除经理外，还有进货、会计、出纳、栈司、头柜、二柜、大司务（炊事员）等；商业利润最高可达2、3万两；有些洋布店只经营门市零售，如：同春、鼎丰等，每年盈利也达1—2千两，利润率大多在100%以上。1860年，浙江海盐的肉铺小商人陈理本来上海，以200元薄资，在老北门城墙脚下设一布摊，零售洋布，一年以后就以200两资本开办了日新盛洋布店，到1875年又以2000两资本开设一家新的布店，即日新增布店，1885年，陈理本病故时，资本累积已达数十万元，雇用职工从最初的3人发展到20余人。这类布店，无论从资金的积累、营运，还是从业务活动、商业利润，特别是内部的雇用关系，显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它们的店主，无论其出身如何，都已经成为民族资本家了。1858年，上海洋布公所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昼锦

里成立，“至此洋布业开始有了资本家的组织。”①

上海开埠以后，内外贸易的繁荣，导致了新式航运业的发展，对上海民族运输业影响很大，它促进民族运输业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轨道。



商船会馆

1825年，清政府运送漕粮改河运为海运，重振了上海沙船业。最盛时，每年集结于上海的沙船多达3000余条②。上海开埠之初，有记载的船数约为每年1600—1800条左右③。沙船担负漕运与历代封建劳役已经有所不同，船主们接受清政府雇用，由上海北航天津，清政府“酌给水脚银两”，其业务则由熟悉航务的绅士负责。1847年，清政府在上海专设了海运总局，派员专司其事。沙船船

① 《上海棉布商业》，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1979年版，第11页。

② 玉溪、齐学裘《见闻随笔》，第2卷，第9页。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15, 1846年9月，第467—468页。

主多为崇明、通州(今南通)、海门、南汇、宝山、上海等地的富裕之家,他们每造一船需银7000—8000两,最多的船主拥有沙船40—50条,船主对于自己的沙船有独立的支配权,出海经营活动完全"由商人自派,以三股之二当差,以一股自留运货"①。即使是"当差"之船,在运送漕粮至天津以后,就可以由船主支配。一般即转道关东,由登州、牛庄等地装运豆饼、大豆等货南归销售求利,这些活动,显然已是纯粹的商业活动。但是,整个沙船业则并没有摆脱封建经济的束缚。

在沙船业的经营活动中,船主及船上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致是:货物买卖由船主或他的代表主持;货物确定以后,沙船进港,由船工头目到船行取提货单,并确定出航船数;船上人员的构成,有船长、河长(引水员)、舵公(也有称大副的)以及另一些小头目(如,掌管锚链的、掌管帆缆的、管伙食的,专职在船上神龛前烧香的),最低层的是一批"伙计",即水手。船上的人都归船工头目管辖,如果"有人向他们(指船工头目)抱怨某个船工调皮捣蛋,很可能那个倒霉家伙就会被扣了工资。"②船长的工资是相对固定的,19世纪50年代就有不少船主聘用外国人来做船长,工资每月大约在30—50元(指墨西哥银元);一般船工的工资,则依据所载货物,抽取一定的力钱发给,在工资以外,还允许船上人员(包括伙计在内)按职务高下,捎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到达目的地后,他们"有权按自己的利益进行贸易。"③

上海开埠以后,上海的沙船业一度还很兴旺,不但担负着漕运,贩运土货,而且积极地寻求转运"欧洲出产的货物"④。据1860

---

① 段光青著《镜湖自撰年谱》,第92页。
② Trade Reports,1876年,琼州,第197页。
③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第1260—1265页。
④ (H.C.Sirr: China and Chinese,第1卷,第223页。

年，赫德记述："过去许多年来洋货都是由中国帆船运来的"①，1852年，上海沙船装运的进出口货值"估计不少于1400万两白银，进口与出口的比例超过8：5"②，由于贩运之利厚于漕米水脚，"南市各沙船，盛时皆不愿装载粮米"③。

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资轮船凭藉《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中国沿海及长江流域，渗入埠际贸易的航运业，剧烈地冲击着上海传统的沙船业。对于沙船业来说，外国轮船在埠际贸易航运业中居于优势地位，大致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技术先进，速度快；二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借子口税单得以往来内地而享不再重征之待遇"④；因而运费比沙船低廉；三是轮船有武装，又有治外法权保护，不必担心海盗的袭击。因而，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的沙船业一落千丈，"无资贩卖，停泊在港者以千百号计"，这些船长期搁置江滩"船身朽坏，无力重修"而"日久废弃"⑤。

沙船业的衰落，使得一部份死抱着木船的沙船业主，遭到亏损，即使是"稍有资本者，欲望转机，依旧放棹，而年年亏折，终归于尽"⑥。更多的沙船业主则转而寻求新的生计。其中，一部份人着眼于改革木船，兴建新式车渡、木轮快船，力求从提高生产力的途径中谋求出路。60年代，就有镇海人蒋德庸兄弟，在上海投资建造有轮驳船，在船上安装了靠人力转动的水轮，虽然还要"转借人力"，设计亦"尚未尽善"，但是，与沙船相比，已有进步⑦。不久，上海又出现了一家华商集资的"车渡公司"，他们建造了一种比沙船

---

① (G.Lanning—S.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第388—389页。

②③ 《字林沪报》1884年1月25日，1887年6月23日。

④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77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8卷，第41页。

⑥ Trade Reports，1881年，牛庄，第3页；《沪报》1884年10月28日。

⑦ 《上海新报》1870年7月21日。

更宽的木船，在船尾安装一部脚踏转轴的机械，专航于上海、苏州之间，单程一次约需 24 小时，可以载客 60—70 名，时人称这种船为车渡①。约于1885年，又有广东人伦国材、罗初屏等人，在上海集资筹建广顺源木轮快船公司②。然而，上海开埠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在航运业中力求以发展生产力与洋商争利的这种努力，却遭到了“不知变通，掩塞聪明”③的清政府的扼杀，广顺源木轮快船公司创办不久，就遭到“制宪批斥”，以“中国向无此例”为由，“着不准行”。从此，欲靠自力改进船舶技术的努力，往往“畏缩不前”了④。

在沙船业不景气的日子里，有不少人转而租雇、购买洋式夹板船、轮船。夹板船最初是外国人造的一种简易的机帆船。它有西洋式的船体，中国式的索具，固定的或转动的齿轮和洋式风帆，造价约每船 4、5 千元墨银，每船可载重 180 吨左右⑤。与沙船相比，夹板船不患风浪、盗贼，50 年代就有华商租赁，60 年代以后，租雇者日益增多，据 1865 年统计，夹板船进港总共 274 艘，其中，华商所租雇者 237 艘，占 86.5%⑥。有些沙船业主干脆购买夹板船以取代沙船。60年代初，一个姓郭的广东人，在上海“广备轮船，行赴通商各埠，装运各货，势若天下之利，可以独擅者。自后，沪商之购沙船者生计日绌”⑦。美国人马丁(W.A.P.Martin)在游记中记述：1860年前后，他乘坐了中国士绅张禄昇购买的一艘轮船来到上海。这个张禄昇原是“科举考试中已名登金榜”的文人，当他看到新式轮船后就深深地为轮船之利所动，于是抛弃了“赋诗填词的文人生

---

① 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 年，上海，第 340 页。
② 《申报》1889 年 8 月 17 日。
③ 陈炽《续富国策》，第 4 卷，第 15—16 页。
④ 《申报》1889 年 8 月 17 日。
⑤ Trade Reports,1865 年，牛庄，第 14 页。
⑥ Trade Reports,1865 年，牛庄，第 14 页。
⑦ 《汇报》1874 年 10 月 16 日，第 1 页。

涯”，“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事业”①。

上海航运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挂外国旗帜的中国民族资本船商。据海关统计，1861年下半年，在上海华商船舶中有“193只悬挂英国国旗的，129只悬挂美国国旗的以及50只悬挂其他国国旗的”②；“彼等名义上俱属洋籍”，“实则全为华人所有”③。在这种华商航运业中，华洋关系大致是这样的：中国船主为了取得洋旗庇护，在购买了外国夹板船后，又花费巨资向外国领事馆交纳注册费，另外还须花100银元一个月，以代聘一名洋人出面充当“船主”。华洋船主之间的关系又以下述方式确定：先由中国船主开具出售这条船的证明，交给挂名的洋船主，同时，由洋船主开一张票面价值比该船价值高得多的押据，交付中国船主。该船要投入实际运营时，中国船主还须以每月40--50元聘请一名洋船长；在每个航次中，以10元左右请一名洋人充当该船理货员，专与各地海关打交道④。这些轮船的产权直接归属华商，所获利润当然亦归华商，这些中国船主实质上已经成为进行着“可悲的”“自由贸易”⑤的民族资产阶级了。制造这种可悲局面的，则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的禁锢，是不平等的税率。华商若不走此途，即会因“洋税厘金，交受其困”，再加以海盗袭击，地方封建恶势力的盘剥，“华商之守分者，不能获利”，是势所必然。

上海民族金融业与民族商业、航运业发展相仿，在19世纪50—60年代也开始发生一系列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地表现在钱庄的经营内容、范围、活动方式等方面。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钱庄的营业活动，大都以兑换货币为主，

---

① 马丁：《中国游记》(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第204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60—461页。

③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71页。

④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第1331页。

⑤ 同上书，第1333页。

即替各地来沪的商人将银两兑换成制钱。上海开埠以后，逐步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的中心，洋商要在这里推销商品，由于华洋隔阂，接触不易，交货、解款多有不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便要谋求钱庄为媒介。钱庄在华洋贸易中的活动，是以5—20天为期的庄票交付行商，行商以庄票与洋行交易；到期时，无论行商所需支付的款项是否已汇到上海，洋商只需持庄票向钱庄提款。这种短期的信用往来是钱庄介入内外贸易之初的主要营业活动。在这种营业中，对于行商的条件是苛刻的，不仅要有保人，而且利率也较高，一般起限就在4.5%左右；当行商由内地汇款到上海后，扣除所借款项本息，剩余的款项也必须存入该钱庄，而钱庄给这类暂存款项只付给极低的利息。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各地行商，特别是豆米业、丝茶业，每逢春秋二季赴内地采购，需要大量款项，为了防止届期周转不灵，往往明知吃亏甚巨，也不得不与钱庄往来。这样，庄票的使用，渐渐地由国内埠际贸易，推广到国际贸易；上海钱庄所开庄票也为外国银行所承认，可以在外国银行营业中与他们所开的支票相互抵充，即已经渐渐地介入了国际资本主义金融业务，到1859年前后，上海"南北二市每日银票往来何止千百万数"①。

随着上海钱庄介入国际资本主义商品、金融业务，其营业范围也不断扩大。19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各地豪绅官僚挟金银浮财避居上海租界，一时之间，上海市面上游资充斥，于是钱庄扩大存、放款业务，大量现银源源流入钱庄，庄主又转而放款给资本短拙的商号；另外，上海钱庄还开始介入了有价证券交易及生金、生银、期票等投机买卖。19世纪40年代，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已随着外国洋行传入了上海，60年代初，上海西商金融市场上，银元和汇票的买卖，日以百万计，投机交易，有时延到深夜。

---

① 《北华捷报》1859年6月4日，《上海钱业重整业规公启》。

整个 1864 年，洋商金融投机市场“没有一夜安宁”的①。上海华商在 50 年代前后，就以购买洋股的方式介入了证券交易活动，其中不乏钱庄人士。如：1860年法兰西银行到上海开办分行以后，“华人赴该行愿入股者纷纷不绝”②，其中不乏银号、钱庄与富商大贾。1858 年，上海的 8—10 家大钱庄，“对黄金、白银、上海规元及墨西哥鹰洋从事投机，……获致厚利”③。这些活动说明，上海的民族金融资产阶级较早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金融活动方式。

60 年代末，上海钱庄还开始接受外国银行的银拆④。所谓银拆，就是由外国银行对华商钱庄的短期放款。它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金融势力，开始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控制，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是钱庄业与外国金融势力的进一步结合。这对于钱庄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钱庄营业活动不断扩大、发展之际，钱庄业内部也在 1859 年、1863 年多次修订业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1866 年所作的决定：以九八规银为统一的记账虚银本位⑤。这一决定，在当时币制极不统一的历史条件之下，对于内外贸易及钱庄自身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由于上海之成为近代中国外贸商业的中心，上海的民族航运业、民族金融业与商业，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已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代资本家。

---

① 麦克莱伦《上海简史》(J. W. Maclelian: The Story of Shanghai)，1889 年版，第 63 页。

② 《申报》1872 年 7 月 27 日。

③ 《北华捷报》1858 年 6 月 12 日。

④ 《北华捷报》1859 年 6 月 4 日。

⑤ 《银行周报》，第 3 卷，第 43 期，第 36—37 页。

三、欧风吹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内少数民族进据中原的事情屡屡发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契丹、女真等等；元清两朝，蒙古人和满人更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达三百余年之久。但是，就象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①，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在经济、文化上都远远落后于被征服者，所以他们进入中国的中心地区后，渐渐地和文化发达的汉族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1840年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国家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具有“较高文明”的入侵者。当中国的门户在鸦片战争中被强行打开时，西方国家已先后进入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而闭关自守的中国还处于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的后期。资本主义文明对于封建主义文明具有无可怀疑的历史进步性，这样，西方文明就给落后的中国封建末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不是被同化。

但是，这些较高的文明不是一个善意的老师带到中国来的，却是由以发财为原则、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来到中国的侵略者于有意无意之间顺便捎来的。在近代中国，西方文化大部分还是作为鸦片、棉布和丝、茶贸易的副产品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并非单纯中世纪式的攻城略地，抢劫烧杀；他们在打开中国门户后，还要久留不走，进行所谓“自由贸易”和传播“基督福音”。上海是西方入侵势力盘根错节的一块主要基地。在这里，他们辟有大块租界，享有种种特权，使上海几乎成为他们移植在异国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的一块家园，这样，他们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带到他们长期生活和经营贸易的地方。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上海得西方文明风气之先的地位。

欧风渐来，开埠后的上海，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在政治、经济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的同时，文化和社会风尚也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

西方入侵者在上海进行的文化渗透，主要是通过传教、开办学校和出版书报这么三条途径，这里先叙述一下传教活动。

西方宗教在上海的传播，分两大派系，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

天主教在上海地区的传播，可以追述到明代。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徐光启在广东韶州教书时，结识了天主教传教士郭居静，听到了关于耶稣救世的说教。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徐在南京又结识另一位天主教传教士罗如望(P.Jean de Rocha)，并受了洗礼，加入了天主教。这位上海人的入教，对日后上海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郭居静由徐光启带到上海，开始了天主教在上海传播的历史。郭居静，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在上海逗留2年，领洗200人，并创设圣母玛利亚祈祷所。在徐光启的影响下，不但其子孙皆入教，徐家汇周围地区很多人都受洗入教。在徐光启第四代孙女的资助下，上海城内安仁里建立了一座天主教堂——敬一堂，俗称老天主堂。据记载，1663年，江南共有12座大教堂、5万多名教友，上海就有2座教堂、4万名教友。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天主教遭清廷禁止，在欧洲的母会，亦因宗派斗争，在欧洲被解散。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受到很大挫折，上海城内的老天主堂改成了关帝庙。1814年，耶稣会在欧洲恢复。1838年，法国传教士罗伯济(deBési)被派为江南教区大代权，负责包括上海在内的教务。1840年，耶稣会派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艾方济（Francois Estéve)、李秀芳(Benjamin Bru-

eyre)三位传教士来上海，并命南格禄为驻华耶稣会会长。三人于1842年抵沪。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规定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不久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于是，天主教在上海转趋兴盛。

为了缅怀对传播天主教有很大贡献的徐光启，南格禄决定将耶稣会中心会院设在徐家汇。这里有徐光启的墓，墓旁住着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清澈的河边还有一座小教堂。1847年3月，就在这座小教堂旁边，徐家汇耶稣会修道院开始兴建，7月竣工。同年，徐家汇藏书楼创立，楼内藏有陆续从各地收集到的省府厅县志，有各种名贵碑帖约12万册，书志2100多种，还有许多中文报刊，名贵的西文图书，外人在华出版的外文报刊约8万册，还藏有各种古币等珍贵文物。藏书楼到19世纪末已初具规模。1848年，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成立。1851年7月，徐家汇天主堂竣工，同月31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堂祝圣典礼，4名主教、20多名神父、修道院修士、徐汇公学学生及很多外侨参加，还有外国军官多人，极一时之盛。这座天主堂是中国第一座按西方建筑方式建造的教堂，“秀丽的希腊式的教堂加上中国宫灯的装饰，在很长的一个时期被认为是上海的一个奇观”①。

1853年，董家渡天主堂建成，称为圣沙勿略教堂，据说它是当时上海，“而且是中国第一座巨大的天主堂”②。这年3月20日（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举行开幕典礼，前来观礼者不下万人，法国领事敏体尼及一些法军武官亦在其内。

1873年，耶稣会在徐家汇建造了天文台，先设肇嘉浜边，后移天主堂旁，设有气象、地震二部，与世界各天文台站建有联系。1900

①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221页。

② 《上海研究资料》，第2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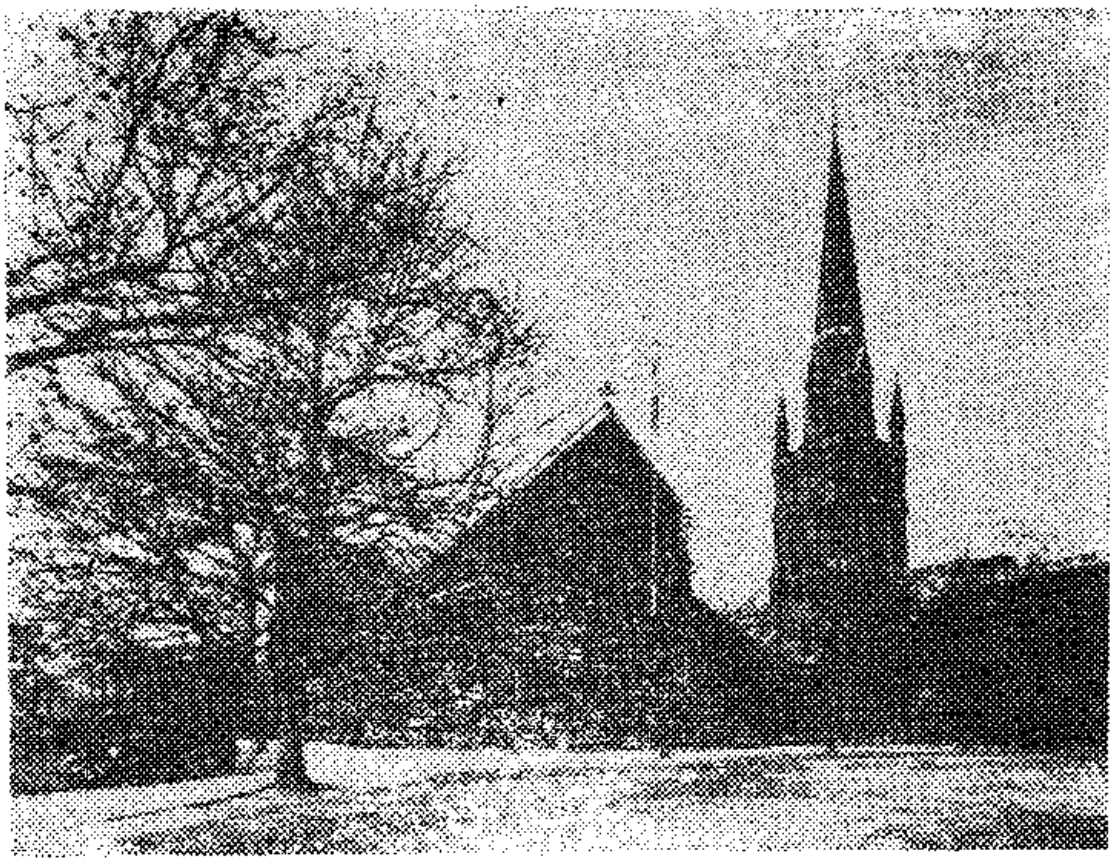
年又在上海近郊佘山顶上建造天文台，专事天文观测，并在外滩建了一座报风塔。

据统计，到1875年，上海有天主教传教士132人，其中大多数是法国人。

基督教方面，最早来上海活动的是基督教伦敦会，最早来上海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是麦都思。麦都思，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835年抵广东，后至山东，上海、浙江、福建等处活动，不久回国，1839年再次来华，1843年被派至上海传教，另一名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也在这年来到上海。1845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奉派来上海；1847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也来到上海。他们是美国最早派到上海的传教士。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教士，开始时并不多，1855年仅有传教士20多人，但增长速度很快，到20世纪初年，上海已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中心，据1903年的统计，这年上海有基督教各种差会团体共20个。

基督教各差会在上海陆续建造了一些教堂。1848年，英国圣公会在英租界一块田野上建造了圣三一堂。由于建筑材料太差，这座教堂在两年后的一场大雨中倒塌了，于是作了修缮，费时12年。1862年拆去重造，7年后落成。这座教堂，位于江西路、汉口路口，为一座哥德式建筑，红砖花窗，钟楼高耸，教堂前有花园一座。它在1875年以后被指定为基督教北华教区的“座堂”。另一座著名的基督教堂是慕尔堂，位于西藏路汉口路口，造于1887年，由美国监理公会建造，初名监理会堂，1900年改名慕尔堂（Moore Memorial Church）①。到20世纪，基督教大教堂在上海不断涌现，如国际礼拜堂、怀恩堂等等，小教堂更多。

① 现在的慕尔堂，又名沐恩堂，是1929年在原址重建的。



圣三一教堂

各种教会为了扩大影响，除了直接传教，开办学校、出版报刊，还举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医院、育婴堂等，比较著名的有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山东路麦家圈仁济医院、圣路加医院等。

随着外国侨民的增加（到1900年，公共租界已有外侨6774人，法租界有外侨622人），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也被带到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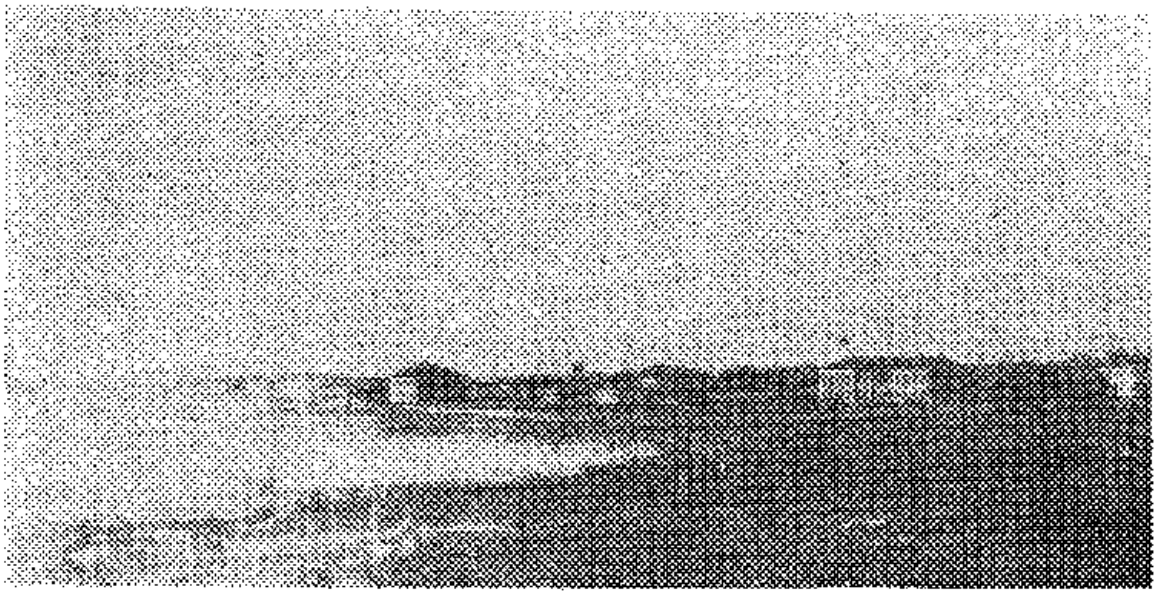
上海开埠初期，外国人在这里所盖房屋，多属洋式平房，这种平房包括一个长走廊，以适应天气炎热时避暑需要。当然，也有一些中西合璧的楼房。王韬记述他在1848年来上海在外滩所看到的情景：

> 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①。

① 王韬：《漫游随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之后，外侨住房日趋考究。1857年一位外国人记载，当时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这些建筑物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①。宽敞的花园洋房也多了起来。这种房屋大部分拥有花园和后院的两层楼建筑物，楼上为主人一家的卧室，仆人则住在附属的建筑物里。这种宽敞的楼房里，一般住四、五人，它属于公务员、小商人或洋行职员②。至于洋人中的下层如海员、流浪汉等，则住在一些条件粗陋的小客栈里。

吃的方面，在上海的外国人基本上保持他们本来的习惯。面包、牛奶、肉类是他们的必需品。1881年，法租界就有三家面包店，所用面粉是从美国旧金山运来的。一家英国人在这里经营的牧场拥有168头奶牛，每天可生产1000公升鲜奶和200英磅乳酪。外侨所需咸乳酪是从丹麦进口的。在上海市场上，供应着各种西洋蔬菜，诸如色拉菜、包心菜、芦笋和各种水果③。各种肉类，



1862年的外滩

①② 参见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第77、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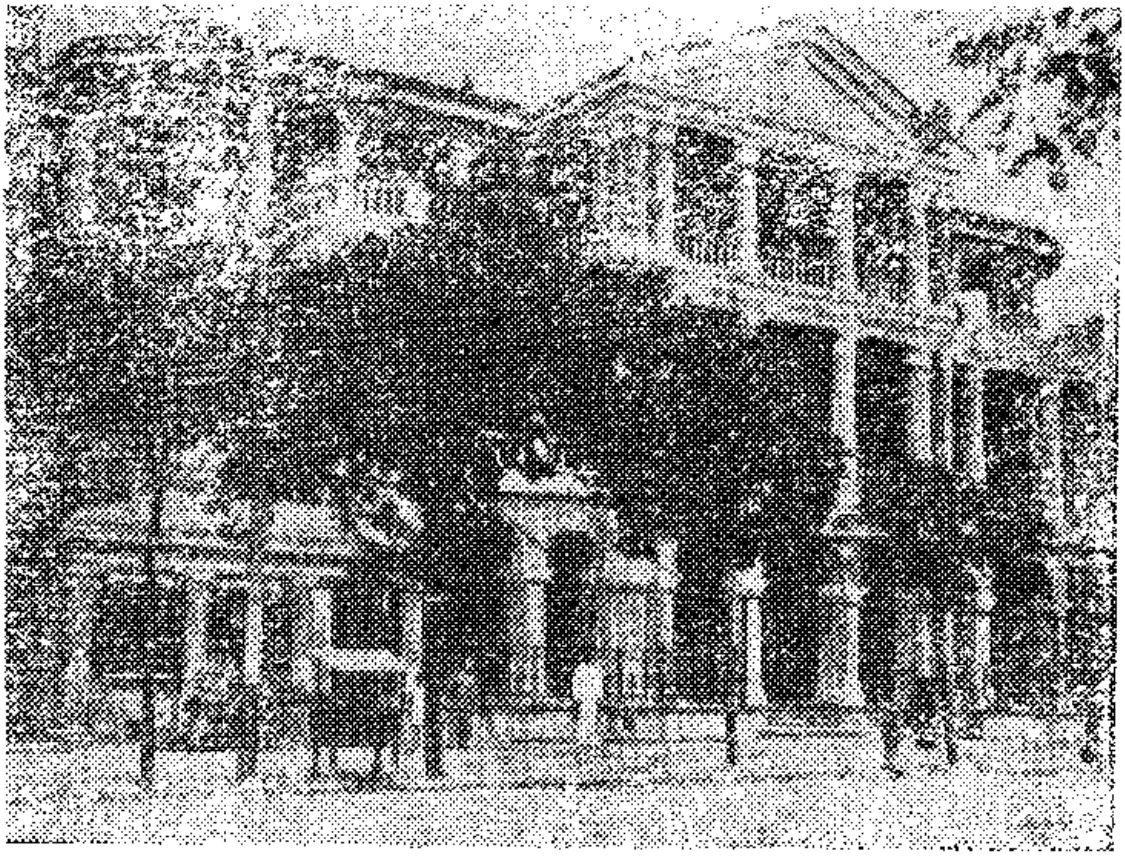
③ 同上书，第78页。

市场上也很丰裕。1849年，牛肉和羊肉每斤107文，鸡蛋每只6至7文。1850年，牛肉每元18磅，羊肉每元12磅，面包每元12条，红糖6元一担。冰块是洋人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冬天他们可以从中国人的冰房里获得；夏天，一是靠储藏在冰窖里的，二是从北方运来的补充。不过运冰损耗很大，每运4000担，就得融化掉1900担。1851年，因上年冬天储冰太少，洋人便在报纸上大叫"无法在整个夏天享受到这种有益健康的奢侈品"。一个冰窖的主人，乘机哄抬冰价，"对其所储藏的冰块开出惊人的售价"①，大发其财。当然，洋人的食品结构也有一些变化。中国的特产绍兴黄酒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味道鲜美的青蛙被他们加工成咖喱蛙肉。

娱乐方面，室内活动有观戏、舞会等。开埠之初，洋人颇为无剧场看戏所苦恼。1850年，英租界出现一个业余剧团，在一个仓库房里演出，他们称之为"新剧院"，后来改称"帝国剧院"，条件极为简陋，连靠背椅也没有。第一次演出时间为这年12月12日，演出剧目有"势均力敌"(Diamond cut Diamond)、"梁上君子"(Roof scrambler)。以后还演出过"爱情、法律和药品"(Love,Law and Physic)、"合法继承"(Heir at Law)、"楼梯下的高等生活"(High Life Below Stairs)、"筋疲力竭"(Used up)等等。不久，又成立了业余戏剧俱乐部即大英剧社。1856年第一次使用台前垂幕。50年代后期，有一个魔术团和一支舰艇上的演出队到这简易的剧场演出。英国人的业余剧团出现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有业余剧团出现。1866年，上海第一个现代剧场兰心戏院(Lyceam Theatre)建成，地址在圆明园路，供大英剧社演出。1871年，这个戏院被火焚毁，1874年又重新建造。

舞会在早期上海是很罕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洋人中男

① 《北华捷报》，1851年6月7日。



英国人所建的上海总会

女比例悬殊①。1850 年 11 月，租界举行了第一次舞会；1855 年，举行赛马会的舞会。此后不久，外侨中出现一个跳舞教习，大概是为了适应越来越多人的跳舞要求。但男女比例问题仍是阻碍跳舞发展的一个因素。1864 年，共济会会员举行第一次舞会，出席者男女比例还是十比一。

户外活动有赛马、打猎、划船等。1850 年，洋人即在南京路之北，河南路之西，购地约 80 亩，辟为公园，人称老公园，作为跑马场，是为上海第一个跑马场。1850 年举行了第一次赛马，只开了一天，有 7 个项目。1854 年，洋人在泥城浜之东，购地另辟一跑马场，人称新公园，是为第二跑马场。1862 年，他们另购一块地皮，即

① 例如，1873 年，法租界外侨中，15 岁以上的男性为 221 人，女性仅 42 人。1895 年，公共租界外侨中，男性为 2068 人，女性为 1227 人。见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第 4 页。

今人民广场一带，作为跑场，中国人习称为跑马厅，而将原有跑马场地售出。售出原有跑马场所得款项，被作为“上海运动事业基金”，用以发展运动事业，诸如板球、棒球、划船等。赛马是一种十分吸引人的运动。每年5月、11月各举行一次。每到赛马时节，围观者人山人海，“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接踵”。由于中国缺乏专门参赛的马匹，只好用蒙古种的马权充。1854年秋天的赛马会上总共10个项目中有4个项目都是在中国马中进行的。参赛的马还有澳大利亚马、阿拉伯马等。

打猎是洋人十分喜爱的活动。海边的野鸡、野鸭，太湖里的候鸟，都是他们喜爱的猎物。英国人为了在长江和运河里打猎，还特地设计了一种小船。

划船运动始于1852年，这年在黄浦江里举行赛船会，参加者主要是商船船员。1857年又举行过一次赛船会，这次使用了赛艇、快艇等。1864年，成立了上海赛船会。赛船初在黄浦江、苏州河里举行，继因上海航业发达，河道拥塞，乃改就昆山青阳港举行，英国人名之曰恒利(Henli)①。每年的赛船运动，在上海成为一大盛会。届时，游人群集，竞相观看。报载1872年赛船时盛况，“西人赛舟之举，中西观者如堵，拥挤异常，与观斗驰马时仿佛然，亦不得谓之非大观也”。比赛的具体情况：

> 今日下午，乃西人赛船之第一日也。于苏州河面，在石桥之西，齐集演驶，以快夺得锦标之举。一点钟之时，则赛兵船之小者，旌旗飞扬，戈矛照耀，最足骇悦心神。一点半钟，则赛八人打桨之舟，共有两艘，激浪如飞，排桨连击。此一艘皆苏各兰人所驾驶者也，斗捷争先如鸳鸭，其他船内则英美法等国之人居多。此苏各兰人，盖即英国北部之人也。两点钟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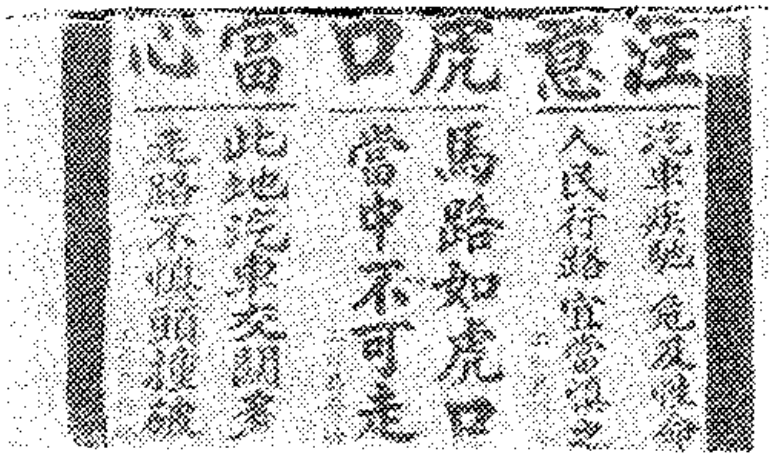
① 恒利，本为英国赛船之地名。1906年在青阳港赛船时，据说“上海往观者，几至万人空巷。”(卜方济：《上海租界略史》，118页)。

刻，赛兵船之小舟。三点钟，赛四人打桨之船。三点三刻，赛一人打桨之船。胜者勇跃奔腾，波骇云诡。西妇顾而乐之辄多所赏赉，以奖其能。盖即古人水嬉之遗意也。至四点半钟，则赛四人打桨之舟①。

可见，到1872年，西人在上海赛船已颇具规模。

另外，其他一些体育活动也有所开展。1858年5月，在虹口举行了第一次三柱门球赛，由英舰"高飞"号职员及上海代表11人参加。1866年，香港队与上海队进行了球赛。1867年，上海足球会成立。

外侨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对中国居民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一些富裕的华人，不但所盖房屋与洋人一样，花园洋房，而且室内傢具、摆设也完全西化。20世纪初年，上海出现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上海体育会等组织，开展各种健身活动。



工部局发贴的交通标语

随着租界的出现，近代的先进的市政设施、严格的市政管理在上海出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对近代文明的看法。其中最明显的是照明和用水条件的变化。

租界开辟之初，"燃点街灯"就是与修桥筑路同时进行的。稍后，外滩南京路一带都以煤气灯照明，俗称"自来火"，因其管道从地下通出，故又称"地火"。1865年起，设煤气公司于汉口路，次年迁往新闸，当时私人用户仅58家，但用于公共照明却很普遍，租界

① 《跑船小记》，《申报》壬申(1872年)九月二十七日，第3页。

各马路下遍埋煤气管，引火照明，所谓“银花齐吐，当未设电灯时代，固足以傲不夜城也”。由于上海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最“敏感”的地区，80年代初，当世界上最早的发电设备在英美刚刚出现时，上海马上亦步亦趋地跟上了。1882年起，电灯开始在上海租界内出现，1892年，工部局建造发电厂，街灯成为市政的一项重要建设。

但上海旧城内却长期没有有效的公共道路照明设备，城内有些地方虽有“天灯”，入夜却仍“几同黑暗世界”。人们大多还是“日落而息”。在开埠初期，甚至家用油灯也不普及，如有人在1910年左右记载说：“七十年前火油入口只洋人点用，如同治五年入口只二万九千八百四十二加仑，自华人行用后，光绪三年入口有多至四兆加仑之多，光绪三十年，几至一百五十七兆加仑，此数尚增加不止。”① 说明火油照明尚是开埠后的舶来品，故被称为“洋灯”，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上海一般市民所用②。所以，当电灯和发电厂在租界内出现时，这种超出传统想像力之外的新事物也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置。当道患其滋事，函请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谣诼乃息。”③ 先进的东西毕竟有其生命力，电灯在上海市民心目中逐渐从惊恐疑忌的怪物变成令人称羡的夜明珠，时人呼之为“赛月亮”，同时使没有这种设备的地区也非谋仿效不可。因为这时，“租界均有电灯，英界犹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而“城内之天灯，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 ④。但上海县城及南市到光绪末年才开始有当地绅商“装设电灯以惠行旅”。最早的电厂设于十六铺桥南堍，最早的内

① 《徐愚斋自叙年谱》附《上海杂记》，内篇，第11页。

② 据记载，上海地区，“光绪以前，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荧荧如豆。未几，有火油，灯明亮远胜油灯。……于是，上而缙绅之家，下至蓬户瓮牖，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灯盏淘汰尽矣。”见《南汇县续志》卷十八。

③ 《上海小志》，卷二。

④ 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志》，第146课。

地电灯公司设在南市紫霞路，开始虽然“电力甚微，只及于外马路及大码头大街一带”①，但现代文明有其始，则无虑其终，电和电灯开始普及“华界”，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城市用水情况的演变与此极为相似。《上海县续志》载：“上海市区域居户之饮料，向取汲于黄浦之潮流，水质浑浊，本不宜于卫生，自英租界有自来水之设，邑人屡议仿办。”② 经过消毒的自来水与电灯差不多同时（1881 年）出现在上海租界内，但“华界”的仿办却并不顺利。世世代代用惯了河水、井水的上海居民开始看不惯这种不是自己亲手打上来，却是从不知来自何方的铁管里流出来的水，“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③。租界自来水公司为了打开营业局面，将自来水遍赠各用户，尤其是先劝说城内外各茶馆和熟水业率先饮用，以示其无害，并采取各种用水优惠办法，为用户提供方便，于是用者渐众，风气渐启。到光绪末年，人们已用赞许的态度来记述自来水的“引进”了：“自通商以后，西人于租界中装设自来水管，导浦江之水而澄清之，乃激贮于高塔，以管分注于各处，居民便之。城内及南市之人，昔饮河水，污秽不堪，易致疾病，近亦遍装水管，居民饮濯称便，且有益卫生也。”④

从害怕用电会“遭雷殛”，因而“人心汹汹”，到称电灯为“赛月亮”、“颇便行人”，乃至主动加以引进模仿“以惠行旅”；从“谓（自来）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到从卫生角度认识河水“污秽不堪，易致疾病”，乃至“遍装水管，饮濯称便”，这个过程，可视为西方物质文明渗入上海市民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种心理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习俗和消费概念的变化。

---

① 《上海县续志》，卷二。

② 《上海县续志》，卷二。

③ 《上海小志》，卷二。

④ 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志》，第 146 课。

第八章　洋务运动与近代企业的兴起

最早在上海出现的近代企业，为外国殖民主义者所经营。中国人自己在上海经营的近代企业，始于60年代中期，工业方面以江南制造局为发轫，运输业以轮船招商局为开端。与整个中国近代企业一样，上海近代企业最初并不是由资本家而是由清政府经营的；最初创办的机器工业不是用于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的商品生产，而是用于军事消耗性的军火生产；发展的顺序不是如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轻工业而重工业，而是政府经营的军事工业在先，政府经营的运输业、重工业、轻工业在后，以轻工业为主体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则在最后。

清政府在上海的近代企业，与整个中国一样，最初是由洋务官僚出面创办、经营的。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标志着上海，也标志着全国洋务运动的实际开始。

所谓"洋务运动"，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了镇压人民起义，同时也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而发起的学习西方"长技"的运动，它是缩小中国与西方差距的近代化运动，也是同光之间的改革运动。

1840年以后，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在与外国的交往中，一些讲求实际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并不是想象中茹毛饮血的化外蛮夷，而是在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远较中国先进的国家。为了更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为了使中国强盛起来，不同阶级、阶层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还在鸦片战争进行之际，林则徐发觉英国船炮较中国坚利，便购买一些，供兵勇演习；又命人仿造了一艘轮船，向道光皇帝

提出大规模仿造坚船利炮的建议。鸦片战争刚结束，魏源便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后，农民领袖洪仁玕、地主阶级改革派冯桂芬几乎同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与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坚船利炮的威力，于是开始了仿造西洋船炮的实践。

本章特就上海三家有典型意义的洋务企业之创立经过、企业规模及其作用影响，分别论叙如次。

一、江南制造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命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等仿造洋船洋炮。他们用手工先制成中国第一部蒸汽发动机，后又制成一艘木壳小轮船，命名“黄鹄”，船长50余尺，每小时能行6海里。对此，曾国藩虽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但总感到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乃于1863年派容闳携款赴美国购置“制造机器的机器”，准备正式建立近代军事工业。

1862至1863年，李鸿章在英人马格里的鼓动下，命道员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和马格里在上海、苏州等地分设三个洋炮局，雇募英、法等国员工制造开花炮弹。为扩大规模，李鸿章认为象曾国藩那样派人到外国购买机器，路远价昂，又无把握，“不若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这样，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济①。基于这个想法，他责成丁日昌在上海访购外国的现成“制器之器”。

1865年，丁日昌看中了上海虹口地区的旗记铁厂（Thos Hunt & Co.）。这家铁厂原是一个名叫科而（T.J.Falls）的美国人

①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2页。

所开，为当时上海外商所办铁厂中较大的一家，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六十年代初，这家铁厂曾因替清军订造过一些包括大炮在内的军器，遭到其他外侨的反对，这也是科而愿意售出的原因之一。议购之初，科而索价十万两银以上，未能成交。这时，因贪污案被革究的海关通事唐国华及同案人张灿、秦吉等愿集资四万两，购下铁厂全部机器设备，报效军需，以赎前愆。厂内其余铜、铁、木料等件，另值银2万两。丁日昌认为这桩买卖可行，遂向李鸿章请示，表示购买铜铁等件的2万两银子自己可以负责筹借。李鸿章认为良机不可错过，立即拍板成交。他将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将丁日昌、韩殿甲旧有炮局并入，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韩殿甲、冯焌光、王德钧和沈宝靖等人一同到局总理局务。同年，容闳从美国购办的100余台机器运抵上海，经李鸿章奏准，全部归入局内。这样，江南制造局便粗具规模。

江南制造局正式成立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此前虽有安庆内军械所和苏州、上海等处的洋炮局，但它们不但规模小，而且主要不是使用机器而是靠手工生产的；金陵机器局虽然也创立于1865年，但时间已在下半年，规模亦小。所以，江南制造局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是上海也是整个中国第一家近代工业。

江南制造局原址在虹口，后来迁移到城南。动迁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制造局原址当时已被美国殖民主义者占为租界，居住其地的外国人为安全计，坚决反对在那里生产军火。几年前科而在厂里制造军火时已遭反对，现在要大规模生产军火，他们反对更烈；其二，制造局初设之时，李鸿章等人即已认为厂在虹口每年房租六七千两，实为过费，"兼之洋泾浜习俗繁华，游艺者易于失志，厂中工匠繁多，时有与洋人口角生事，均不相宜"①；其三，随着

①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4页。

工厂的发展，机器日增，厂地狭窄，无法安置。1866年，丁日昌奏请扩充，朝廷谕准，于是定议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乡。1867年夏正式动迁。

高昌庙新厂较虹口老厂规模大多了，占地70余亩，分建各厂，包括机器厂、洋枪楼、锅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库房、煤栈、轮船厂、筑船坞，设有各种管理机构，如公务厅、文案处、报销处、支应处、议价处等，还有中外工匠居住的宿舍。以后规模迭有扩大，1868年增设翻译馆；1869年增建汽锤厂，另建枪厂，并将上海广方言馆移入局内；1874年建操炮学堂，又在龙华设黑药厂；1875年改汽炉厂为铁船厂，继又改名锅炉厂，在龙华设枪子厂；1876年在松江城内建火药库；1878年改汽锤厂为炮厂；1879年增设炮弹厂；1881年改操炮学堂为炮队营，又创设水雷厂；1890年设炼钢厂，1892、1893年又先后添设栗色火药、无烟火药两厂。江南制造局在高昌庙占地面积至1876年已达400余亩，在龙华的火药厂、枪子厂等又占地270余亩，两地加起来近700亩。据统计，到1904年，江南制造局已有13个工厂，1个工程处，各厂职工总数达2913人，房屋1974间，加上管理机构，全局共3592人，房屋2579间。1905年4月，清政府将江南制造局的船坞部分划分出来，成为江南船坞，归海军部管辖，主要修造中外兵商轮船，制造局则专门制造军火。自此以后，江南制造局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江南制造局以制造枪炮、弹药、兵轮为主，也造过一些工作母机及其他机械。

江南制造局自创办之日起，便以制造枪炮弹药为主。从1867年到1894年，共造各种枪支51285支，炮585尊，水雷563具，铜引4411023支，炮弹1201894个。这些军火主要供应南洋系统和北洋系统的军队及军械所，供应各炮台、军舰，以及两湖、两广、闽浙、云贵各省军队。这些枪炮都是仿照西方制造的，其式样一般较西

方落后一代。例如，江南制造局60年代所造枪支以前膛枪为主，当时西方已盛行后膛枪；70—80年代所造枪支以林明敦式后膛枪为主，而当时西方新式枪支已是毛瑟后膛枪、必利洋步枪及黎意新枪。当然，这些兵器较中国自己先前的进步多了，质量亦佳。光绪六年所造口径六寸、四十磅的阿姆思脱郎炮，试放时，据一位外国目击者说：炮身表面“备极光润，选铁亦极精良，炮车亦毫无遗憾”，每炮共演放六次，所加火药较常用时多至二倍，“各炮俱无震动形迹”。这个外国人慨叹：“铸炮之事殊非易易，而上海之华人能尽其技，真难能可贵也”。① 光绪十九年，造成新式后膛大炮，演试结果，“子弹出膛，准头极好”②，与购自西方的新式大炮并无二致，“中西观者啧啧称叹”③。同年，仿造新毛瑟枪成功，该枪膛线六条，“子路甚准，开放装退，极为省手，”每分钟可放22至25次，距靶200码能洞穿一分五厘厚的铁板，并击入后面松木一寸四分，经中外人员验收，认为此枪“坚致灵捷，与德国新毛瑟枪相等，其速率、线路更驾漫利夏之上”④。李鸿章经过察验认为，以上这两项枪炮能与外洋“一律精利，洵为难能可贵”⑤。日本陆军中将川上操六看了新毛瑟枪演试以后，“动色叹羡，谓彼国中村田大厂所造殊不能及，乞取两枝以为标准”⑥。

江南制造局所造枪炮数量并不算多，各种枪支平均年产不到2000支，各种炮平均年产21尊，这一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清朝军队的要求。但是，江南制造局毕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它生产的军火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895年总结甲午战争教训时说：“枪炮子药宜自行推广制造，此次用兵，颇知购用外洋枪炮之弊，……各种洋枪，以老式马梯

---

① 《申报》，光绪五年六月初六日。

②④⑤⑥ 李鸿章：《上海机器局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七，第1—3页。

③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八，第16页。

尼、老式毛瑟为最，上海制造局所造快利枪能兼其长，历试有效。"① 在中法甲申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前线中国军队对江南制造局军火"征调纷繁"，该局"加工赶造，昼夜不停，储备未尝缺乏"② 。从江南制造局向各省出售军火收入的银两数目来看，数目较大的几年如 1884、1894、1895、1900、1904 年，均是中外发生战事的年头，而中外基本无战事的 1890 至 1893 年，数目较小③，这说明江南制造局生产的军火是对外作战的中国军队所迫切需要的。

江南制造局前身——美商旗记铁厂的业务，原以修造轮船为主。制造局创办之初，因忙于制造枪炮，造船之事一度停顿。1868 年，曾国藩奏请拨留专款造船。同年 8 月 18 日，江南制造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也是中国使用机器制造的第一艘轮船造成下水，船长 185 尺，宽 27.2 尺，马力 392 匹，受重 600 吨，由曾国藩命名为"恬吉"（后改"惠吉"），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9 月 15 日，"恬吉号"试航于黄浦江，曾国藩等亲至登临，航速顺水每小时 120 余里，逆水 70 余里。曾国藩认为该船"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尽管"恬吉号"轮船的式样属比较陈旧的明轮，吃水浅而易倾覆，但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轮船，船上除部分机器系买外国旧件修整而成，锅炉、船壳等部件均由中国自己制造。"恬吉号"试航以后，报载"上海军民无不欣喜"④ 。

"恬吉"之后，江南制造局又先后造成"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保民"7 艘轮船，还有小船 7 只，质量也越造越好。其中"海安"、"驭远"二船，均长 300 尺，宽 42 尺，马力 1800 匹，受重 2800 吨，装炮 20 尊，可载士兵 500名，在制造技术、

---

① 刘坤一：《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297—298 页。

② 刘坤一：《复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同上书，第 298 页。

③ 历年细数见《江南制造局记》卷四。

④ 《教会新报》，1868 年 10 月 10 日，第一卷六号，第 24 页。

载重吨位等方面，均较以前几艘有明显进步。1872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陪同英国提督沙德威尔(Admiral Shadwell)参观时，发现“这兵轮的各部分，除了涡轮和曲拐之外，都是局中自己所制造。提督发现了几个技术上的缺点，但大体上认为它应算是修造得很好的船只”。①这些轮船几乎每艘下水，都引起当时上海各界人士的注意。《申报》报道六号轮下水的情景如下：

> 昨日制造局六号轮船落水，阖城官绅以及士女往观者不下万人云。局中工匠艺精业熟，较之去岁五号轮入水更为妥贴，真有驾轻就熟、从容不迫、好整以暇之妙，故入水时水不扬波，附近小舟均无碰撞之势。岸上观者如云，工匠似火，亦未伤损一人。闻从前数船入水时，船旁撑木有碰伤工匠者，岸侧小舟因激溅波澜互相击动，甚至有掀翻河内，激赴岸上者。日昨均无其事。以身高数丈、数十丈之轮船落水，比长安拖坝之小舟尚觉平稳暇逸，亦可谓技精入神矣。②

江南制造局除造船之外，还承修了大小轮[illegible]11艘。1885年以后，以经费拮据，停造轮船，只管修理。

江南制造局的主要产品，在开始时并不以商品形式在市场流通。所产军火绝大部分由清政府拨给各军事单位作为军事消费，并不作价；所造轮船无代价地调供军用；修理船只也主要是无代价地为海军服务。从1884年起，江南制造局才向调拨军火单位收取成本费用，“仅就实用工料核算，向不多开”，产品开始具有商品性质。1902年起，所属炼钢厂生产的钢铁，因自用有余，开始向其他厂商出售，“商厂购办，纷至沓来”，这些售出的钢铁已属正式的商品了。

---

① 《英领事商务报告，1872年分(页152)，上海》，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8—289页。

② 《申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二、轮船招商局

上海轮船招商局创办于1873年，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新式轮船航运企业。

兴办轮船航运事业的任务，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已提到中国面前。主要因素有二：其一是漕粮河运改海运。清承明制，每年向江南湖广等地征收几百万石漕粮，由运河运京。道光六年，因清江浦一带运河淤塞，河运被迫改为海运。太平天国占领东南半壁时期，漕粮无从征收，海运自然停顿，运粮沙船零落凋敝，且沙船远不及轮船负重行速。雇用外资轮船运粮，顾虑既多，费用亦昂。中国运粮工具亟待更新。其二是外国航运业的侵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外贸中心逐渐由广州北移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被迫开放长江，增开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营口、烟台等口岸，地处沿海开放口岸位置当中、作为长江门户的上海，对外贸易量就迅速增长。以1863年与1860年相比，上海港进口总值由4100万两增加到8200万两，翻了一番；出口总值由3100万两增加到3800万两，增加二成；再出口总值由1200万两增加到3600万两，增长二倍。上海港船舶进出口的数量和船舶总吨数也都增长二倍以上。鉴于贸易与航运的迅速发展，从1862年起，已经攫取了在中国沿岸和内河航行权的外国资本开始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了旗昌、公正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在航运业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仅从上海到汉口往返一次，每吨货物就收运费40余两。贸易的增加，航运的厚利，对于正在兴办洋务企业而为资金犯难的官员、商人们、自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中国人了解轮船航运的优越性、重要性，倡导兴办轮船航运业，也是由来已久的事。鸦片战争刚结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便已指出，轮船不只是可供作战之用的战舰，也是极好的交通运输工

具，以其用于运输，载重量大，亦“不畏风飓之险”，用于通讯，则长江大河，昼夜千里，“可省邮递之烦”①。以后，倡导洋务的大员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也一再提及轮船在航运方面的重要作用，提议设局造船。但是，由于经费拮据等多种原因，轮船航运业迟迟没有兴办起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最初所造船只也都是兵轮，没有一艘用于航运。

上海创办轮船航运业，在19世纪60年代已有策划。1867年，候补同知容闳与常镇道许道身等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并订出章程，拟集资40万两，分为4000股，“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打算先购轮船两艘，专跑长江一线，如果生意兴旺，再增购两艘，分航天津、烟台与福州、香港；主张公司所有司事，均由股东选举②。这是一项完全商办轮船公司的创议。后因总理衙门事务倥偬，未获批准。容闳等人的设想虽然一时没有实现，但中国人自办轮船航运业的议论并未止息。五年后，上海轮船招商局终于创办起来。

轮船招商局得以创办的直接导因是关于是否裁停闽沪造船厂局的讨论。1872年1月23日（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以造船糜费太重，直隶又遇严重水灾，奏请朝廷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的造船业裁停。总理衙门令内外大臣讨论此议。

造船事业，关系国防，是洋务事业的重点，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因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宋晋的意见。但是，此前闽沪厂局所造船只，仅平调给国家使用，并不作为商品出售，因此，造船越多，需费越巨，时间一长，财力自然支绌。经费问题确实很突出，不容不考虑。在此情况下，轮船招商，发展航运业，使造船经费有所着落，将造船事业维持下去，正是解决问题的好办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

② 《海防档》，购买船舰，第824、836页。

法。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都看到了这点，认为闽沪局厂可造一批商船，“平日则租与商人装货，有事时装载陆兵”。由于曾国藩不久病逝，署南洋大臣何璟对此又不积极，于是创办轮船招商局的任务便落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的咨询以后，便饬令有关人员筹划轮船招商之事。1872年2月，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一些广帮商人，议定轮船招商章程九条，主要内容为：公凑资本三十万两，推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或发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李鸿章嫌其过于简略，令津海关道陈钦与江海关道沈秉成等续议。

1872年5月，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道员吴大廷，将其对轮船招商的意见禀呈李鸿章，认为此举困难重重，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用人难，等等。李鸿章批示说，所陈五难，真正做起来都不难，设埠、揽载问题可以先费后省，人弃我取；保险可由商人向洋行议办；用人问题也无足深虑；招商问题比较棘手，但是如果“物色殷商所深信之官，使之领袖，假以事权”，这么一来，“官为之倡，行之有益，商民可无顾虑是也”①。最后一条，也是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的思想出发点。

李鸿章态度虽坚决，但他当时是北洋大臣，如以上海为中心办轮船招商局，他无权直接干预。因此，他把自己的想法咨送总理衙门。主持总理衙门的奕䜣对此举积极支持，于6月19日（五月十四日）函覆李鸿章，要李“遴谕有心时事之员，妥实筹维”②。李鸿章遂即进行创办工作。

1872年6、7月间，李鸿章乘验收漕粮的时候，与沙船商界领袖人物、具有丰富海运经验的浙江候补知府朱其昂、知府衔朱其诏兄弟仔细地商量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事宜。8月，朱其昂等拟成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第906页。

② 《海防档》，购买船炮，第918页。

一份《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含序言和章程20条。章程主要内容是：（一）在上海设立轮船商局，是为了使官、商联系，所有官长、商人应办一切事件，均由商局会同办理。轮船商局犹如外国之轮船公司，管理商局者须遴选精明公正、留心时事之员，“所有官场习气，概行除却”。（二）各省机器局所造商轮，由商局招商租用。若商股不足，则由商局禀请将剩余股分作为官股。（三）航运业初创之时，由商局承领各口揽载，并减省运费，以招徕顾客。（四）暂减租价，以鼓励商人租用，俟生意兴旺再行酌加。（五）招商轮船须向外国保险，倘外国不肯，须由机器局或商局自行保险。（六）商轮酌用水师兵勇，以备不虞。（七）在上海洋泾浜一带择地设立码头，其余各口亦应添设码头。（八）轮船上舵工水手，由商选用约束。（九）商轮进出港口，所载货物，应与洋货一样，免缴筹防、落地等捐。（十）请由官招商采煤，以供轮船使用①。

这个章程，根据招商局初创的特点，从华商的利益出发，考虑缜密，切实可行。李鸿章阅后，十分满意，认为“所拟各条，似尚妥密，较诸其余各员条陈，尤为扼要切实”②，遂命朱其昂等在上海筹办。谁知署南洋大臣何璟、江海关道沈秉成等对此却不热心，要求缓办，且以招商局一开，“沙船全归轮船，老关税项大减”为虑。1872年11月25日（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何璟因丁忧离职，淮军大将张树声兼署南洋大臣。张为李之旧部，亦热心洋务，对轮船招商局事自然赞成。至此，创办轮船招商局的道路才最后打通。

不过，为了考虑反对者的意见，朱其昂等对章程重加修订，另拟了一个《轮船招商局条规》。这个条规共28条，与初拟的《节略》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第911—915页。

② 《海防档》，购买船炮，第862—863页。

20条相比，大部分内容相同，不同之点主要有二：（一）《节略》规定商局事务由商局遴选公正之人办理，并摈除“所有官场习气”，《条规》则明定商局公务由总办主裁，总办由李鸿章委派。前者重在商办，后者则强调了官督。（二）《节略》规定商局成立以后，“承装海运仍归商人”，《条规》明定非商局轮船不得承装。由自由竞争变成了一家垄断。这一条规，是轮船招商局日后的办事准则。

朱其昂等一面修订章程，一面招商集资。他们领到李鸿章拨借直隶练饷局存款20万串制钱作为官本，收到李鸿章股份银5万两，上海富绅郁熙绳股份银1万两。1873年1月14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定名“轮船招商分局”，总局设在洋泾浜永安街。

轮船招商局创办伊始，因无国产商船可买，遂向外国轮船公司购买。1873年1月19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从英国购买“伊敦”一船，第二年又从英国购买“永清”、“福星”、“利运”3船。1874年从福州船政局拨来“海镜”轮，从英国购来“和众”、“富有”、“利航”3船，以后船只逐年增加（见附表），到甲午战争以前，已有30余艘。

轮船招商局初创时，只购置了上海一处码头，座落在浦东烂泥渡北。1874年购进耶松码头，租定与该处相连的两个码头，又在宁波添造了码头。1877年接收旗昌轮船公司所属诸码头，在上海的有金永盛、虹桥、金益盛、南码头、金利源、金方东等。1890年添置广州码头，1892年添置香港、汕头码头。招商局创办时，即购置了上海陆家嘴栈房，可储米60000余石，同时租定天津栈房5处，可储米48000石。以后栈房逐年添加，上海、天津栈房不断扩增，汉口、九江、宁波、温州、汕头等处均设有栈房。招商局创办时，拟将“伊敦”轮向洋商保险公司投保，竟遭拒绝。经商请怡和、保安二洋行，亦只肯以15天为限，且保费昂贵。1875年，招商局另招股

本，自设保险局。1876年，设仁和保险公司，集股20万两，试办一年，得利颇厚，继招股25万两。1878年续创济和保险公司，集股50万两。1886年，这两家公司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

轮船招商局第一艘轮船"伊敦"号于同治十一年冬试航，航线由上海至汕头，结果平安往返，试航成功。船上所悬旗帜为总理衙门规定的黄羽纱所制三角龙旗，龙身为蓝色，同时悬挂局旗——双鱼旗，亦系黄羽纱所制，双鱼亦为蓝色。由于这两种旗号均有蓝色，在海上远看不甚清晰，所以，同治十二年七月局旗便改为红底黄月的布旗，以后便一直沿用下去。

轮船招商局最初4船的航线是："伊敦"往来上海、长崎、神户；"福星"往来上海、烟台、天津、牛庄；"永清"往来上海、汕头、香港、广州；"利运"往来上海、厦门、汕头。以后，随着船只的增加，航线也越多越长。到甲午战争以前，已形成沿海、内河、远洋三大系统，远洋可至英国、美国、日本、南洋各处，沿海可南至香港、汕头、台湾，北迄天津、牛庄，内河可至长江各口。

轮船招商局初由朱其昂筹办、经营。朱是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1865年捐候补同知，任浙江海运委员，1867年受命管理沙船运漕事务，颇善排解船商之间的纠纷。但他对外不善经济，不熟悉洋商情况，在购买"伊敦"、"永清"等轮时，费款过钜，远远超过轮船实值之数，并且招集商股乏术。他经营半年以后，招商局很不景气。鉴此，1873年7月，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到局充总办，让朱其昂专办漕运业务，其余劝股、添船、造栈、揽载、开拓航路、设立码头等事悉交唐廷枢经理，不久又札委徐润、盛宣怀等人会办局务。

唐廷枢，广东香山人，初在香港英人所办学堂接受教育，继充翻译，1858年到上海，任职于海关，曾充总翻译。1861年受雇于上海怡和洋行，代理该行长江各口生意，两年后升为总买办，1870年主持该行新设的船务部工作，投资于英商主办的公正、北清轮船公司，并同怡和洋行经理等筹组华海轮船公司。由于他在轮船行业

中工作多年，熟谙业务，所以他到局后，重订章程，广招商股，另在牛庄、福州、香港、横滨、新加坡等十九处设立招商分局，使招商局颇有起色。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分明是与洋商争利，因此引起了洋商的忌恨。他们乘招商局羽毛未丰之时，采取跌价竞争等办法，企图将其挤垮，跌价幅度竟达 50% 乃至 75% 以上，到闽粤水脚由三四角减至一角，宁波 2.5 元减至 0.5 元，长江 5 两减至 2 两。招商局被迫跌价竞运。由于根底不厚，营业不振，挪借钱庄款项达 60 余万两。在此情况下，清政府给轮船招商局以有力的支持。李鸿章手谕江浙漕米除沙船装载以外，统归招商局运输，并且按照原定运价计算。1876 年，李鸿章又急筹官款 50 万两，作为局中存款，这才帮助招商局度过难关。

洋商本想通过跌价压垮招商局，没想到有些洋行本身也承受不住跌价的打击。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由于跌价损失过重，无法重振，1876 年底甘愿将产业全盘出让。唐廷枢、徐润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和支持，于 1877 年 2 月 17 日（光绪三年正月初五），以 222 万两的价格，将该行 16 条轮船及各处码头栈房全盘买下。招商局至此规模扩大，根基巩固。

招商局盘进旗昌以后，英商太古洋行忌恨愈甚，进一步跌价倾挤，招商局被迫跌价，损失很大，只能以北洋运漕之盈余弥补长江水脚的亏损。光绪三年底，招商局在长江方面与太古洋行、在津闽方面与怡和洋行订立齐价合同，议定在各主要航线上，实行统一运价，避免竞争，合同为期三年，187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以后，合同期满，竞争又起，于是再订立新的齐价合同。

1884 年，因中法战事吃紧，轮船招商局与旗昌洋行密订合同，将船栈作价暂交洋行代为经营，事定照数收回，轮船亦换用美国国旗。翌年，中法议和，招商局按议将船栈收回自管，重订章程，力加整顿，并改为官督商办，盛宣怀被命为招商局督办，马建忠、谢家福

为会办，唐廷枢则北上专办开平矿务局。1894年中日战起，招商局故技重演，将轮船分售洋商，第二年又如数买回。

据统计，从1873年到1895年的20多年中，轮船招商局在长江大海往来运货收入，每年平均200万两，就纯利而言，1873年盈2100两，1874年盈24000两，以后盈利数时有涨落，1893年盈利高达276400两。从1873年到1895年总计盈利181万多两。这对于上海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的商品流通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商的经济侵夺。还在1879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就写道：

> 自中国设轮船招商局，而洋商与我争衡，始则减价以求胜，继因折阅而改图。彼之占我利权者虽尚有十之四，我之收回利权者已不啻五之三。通计七八年间，所得运费将二千万，虽局中商息未见赢余，而利之少于外洋者，已二千万矣①。

运漕、运货、载客之外，轮船招商局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874年，招商局创办刚刚一年，日本出兵谋占台湾，招商局奉命派船运输清军渡台，守卫台湾。1880年，中俄边界军情吃紧，招商局轮船又装载皖楚诸军赴山海关洋河口防俄。中法战争前后，招商局又相继运送清军到广东和台湾，并派出船只到英、德等国运回武器，装备清军。总办唐廷枢曾说，轮船招商局之设，益国益商，益于民船，益于地方，诚非妄论。

附表：

甲午战争以前轮船招商局的船只*

年　月	船名	来　源	备　注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	伊敦	英　国	因用煤多，装货少，同治十三年停航，光绪五年在大沽口翻沉
同治十二年二月	利运	英　国	光绪十一年售与北洋作兵驳

①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245页。

* 本表根据《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交通史航政编》、《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国营招商局产业总录》等资料编成。

（续表）

年　月	船名	来　源	备　注
同治十二年二月	永清	英　国	1903年改为趸船
同治十二年三月	福星	英　国	1875年在僚木洋被怡和洋行船撞沉
同治十三年正月	海镜	福州船政局	
同治十三年三月	和众	英　国	1881年在乌邱屿附近被英舰撞沉
同治十三年十月	富有		1890年触礁
同治十三年十月	利航		
光绪元年三月	日新		
光绪元年四月	厚生		光绪三年十二月触礁沉没
光绪元年六月	成大（夹板船）	江南制造局	
光绪元年八月	保大	英　国	光绪十三年触礁
光绪元年十月	丰顺	英　国	1912年改为趸船
光绪二年五月	汉广	湖　北	1881年触礁
光绪二年九月	江宽	英　国	1918年在汉口被撞沉
光绪三年正月	江汇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快也坚。共盘购轮船十六只，小轮船二只
光绪三年正月	怀远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飞似海马，光绪九年触礁
光绪三年正月	江表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徽州，光绪十六年卖出
光绪三年正月	江天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湖北
光绪三年正月	江靖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气拉度，光绪八年改为驳船
光绪三年正月	江源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俾物乐
光绪三年正月	江孚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南京
光绪三年正月	江通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河南，1922年失火被毁
光绪三年正月	海珊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江西，光绪八年改为趸船
光绪三年正月	海晏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盛京
光绪三年正月	镇西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山西
光绪三年正月	镇东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山东
光绪三年正月	海定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保定

（续表）

年　月	船名	来　源	备　注
光绪三年正月	海琛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直隶，1904年在五星礁沉没
光绪三年正月	江长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四川，1878年沉于长江
光绪三年正月	美利	盘购自旗昌洋行	原名美利，1883年在安南河口搁浅
光绪三年正月	七里	盘购自旗昌洋行	系小轮船
光绪三年正月	熙春	盘购自旗昌洋行	系小轮船
光绪六年	美富		光绪十一年售与福建作兵驳
光绪六年	兴盛	由"大有"船改造①	光绪九年被英船撞沉
光绪七年	致远	英　国	1918年失火被毁
光绪七年	普济	英　国	1917年在吴淞口被撞沉
光绪八年	拱北		光绪二十一年在西海口被炸沉
光绪八年	图南		
光绪八年	江裕		
光绪十三年	广济		为浅水轮，1908年改作镇江趸船
光绪十五年	新裕		1916年被军舰撞沉
光绪十六年	固陵		
光绪十七年	新丰		
光绪十七年	新济		
光绪十九年	快利		

附局轮船

年　月	船名	来　源	备　注
同治十三年以前	洞庭		光绪八年改码头船
同治十三年以前	永宁		光绪十三年改为海昌，光绪二十一年改为趸船
光绪元年	大有		光绪六年改为兴盛
光绪元年	富阳		
光绪元年	汉阳		

① "大有"为附局轮船，见本表后面。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凭藉刚刚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倾销棉纺织品。棉纺织品在中国进口商品中所占的比例直线上升。据统计，1842年，棉制品在中国进口总值中占8.4%，为第三位，到1867年，棉制品占21%，为第二位，到1885年，就上升为35.7%，占进口贸易的第一位。进口洋布，质好价廉，给中国传统手工棉纺织业以严重的冲击。

有鉴于此，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办机器织布，以与洋商分利、抵制洋布的意见。1861年，冯桂芬已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① 所谓"织具"，即指用机器织布。1874年，李鸿章指出：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对于中国女织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②。稍后，郑观应亦云：中国东南各省所种棉花很多，如果用机器制造洋布，"则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对于洋人来说，也可"分彼之利权"③。建造中国自己机器织布的问题，已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876年5月，李鸿章正式委派魏纶先到上海筹办机器织布事宜，拟由江苏、直隶各筹公款10万两，定购机器，另招商股，购料招工。据李鸿章说，魏纶先是他的世交，"会计最精，商情最熟"④，可是魏纶先筹办活动并不顺利。上海商界对这位久居北方的魏纶先不够信任，投资很不踊跃。

---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②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50页。

③ 郑观应：《易言·论商务》。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页。

1878年，改由彭汝琮进行创办织布局活动。彭是一个被革了道台衔的人。这年10月他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上禀帖，请求李、沈奏准他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不久，彭又北上天津，亲谒李鸿章，陈述办厂计划。计划分设厂的章程8条、预算细目24项。按照这个计划，机器织布局将集资50万两，轧花、纺纱、织布兼营，拥有布机800台，雇用英国工匠传习纺织技艺。同时，彭汝琮还提出聘请郑观应为会办，唐汝霖、卓培芳和长康为帮办。郑、唐、卓均是当时上海洋行的买办，长康也是熟悉商情的人。半个月后，李鸿章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彭开始了筹建工作。

1879年2、3月间，彭汝琮等拟购虹口下海浦潘源昌和记栈房，作为局址，计有地皮70余亩，洋房10余栋。旋因股份未能应手，资金短缺，筹办布局事宜受阻，彭汝琮等只得歇手。1880年春，李鸿章派翰林院编修戴恒主持局事，郑观应等再次入局。筹建布局的具体事务主要由郑观应经手。

郑观应在上海当买办已经多年，经验丰富，业务熟悉，在商人中也有号召力，所以筹建工作比较顺利。郑观应首先致函当时中国驻美副公使容闳，要容在美国聘请一位纺织工程师来上海进行实地考察。容闳聘请了纺织工程师丹科(A.W.Danforth)。丹科到上海后，郑观应与他研究了机器设备的订购问题，研究华棉与美棉、印棉的不同特点。随后，郑观应派翻译梁子石携带一些棉花随丹科到美国去试织，同时也寄一些棉花到英国进行试验。试验结果比较满意，于是决定请丹科任工程师，来沪进行建厂技术指导。

1880年10月，为保证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务顺利进行，李鸿章特上著名的《试办机器织布局以扩利源而敌洋商折》。折中，李鸿章指出，用机器代替手工，其利无穷，现在上海设局仿造布匹，正是为了"稍分洋商之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应当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税收方面，布匹如在上海零

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果运销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其余内地沿途税厘，一概免除。这是非常优厚的特权。照此办法，上海机器织布局将获得专利 10 年，其产品倘在上海零售，要比洋货少纳 5%的进口税；倘销入内地，要比洋货少纳 2.5%的子口税。就与洋货竞争而言，至少在税收方面，机器织布局占了很大的优势。同折中，李鸿章给机器织布局委派了 6 个经理人员，郑观应专办商务，龚寿图专办官务，戴恒、蔡鸿仪、经元善和李培松为会办。郑观应的地位有所上升。

经郑观应与丹科等勘察，机器织布局的厂址选在杨树浦沿江的一块地方，300 余亩。所以选在这里，郑观应认为有三大优点：一、地沿江滨，装卸货物方便；二、不在租界，不需向工部局纳捐；三、地面宽阔，又近马路。到 1881 年底，机器织布局的股份基本招齐，1883 年，织布局订购的机器陆续运到。眼见织布局开机在即，不料忽起风波。原来，1882 年冬至 1883 年，上海发生金融风潮，外国在华银行收回了对上海钱庄的一切短期信用贷款，致使大批钱庄、商号和中小企业倒闭，而上海机器织布局所招股份中，尚有 14 万两没有收到现银，郑观应将这个数字的股票作为抵押，得银 7 万两使用，折耗了 7 万两。同时，织布局经办人员中，矛盾重重。在此情况下，郑观应被迫离职，李鸿章派人调查。此后，机器织布局事务陷于时断时续状态之中，主要负责人屡次更换。郑观应之后，一变而为经元善，再变而为龚彝图，三变而为马建忠。

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曲曲弯弯，上海机器织布局总算创办起来了。1889 年底，一套具有 35000 纱锭、530 台布机、5座立式大汽炉（即锅炉）的完整的纺织设备安装完工。12 月 24 日（农历十二月初三），上海机器织布局锅炉正式点火，高耸的烟囱冒出了滚滚黑烟，当压力计指针到达 30 磅时，启动阀打开，500 马力的轮机当即旋转如飞。是时，观者如堵，厂内外欢声雷动。

上海机器织布局年产布 18 万匹。开工第一年，颇为兴盛，年

终结算，除去开支，盈利 20%。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它的开办成功，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洋商争利，对于鼓舞民族士气，都有一定意义。开办之初，在上海的外国人前往参观，“莫不叹为奇举”。对此，李鸿章很为高兴。他致电中国驻英使臣薛福成，要代购新式纺织机器，并在资金方面给布局以方便。正当他们谋扩建之时，1893 年 10 月 19 日，机器织布局清花间突然起火，从上午 7 时左右，一直烧到下午 5 时，厂房全部焚毁。起火后，布局曾请上海租界饬令救火会前往救援，租界竟推托布局在租界之外，“厄于成例，不得前行”，坐视大火蔓延。事后估算损失不下 70 余万两。

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毁了，但李鸿章创办新式织布厂的决心并未毁灭。就在大火后一个月，李鸿章便调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槼负责规复织布局。1893年 12 月 13 日，盛宣怀来到上海，会同聂缉槼、丹科等人，对灾后布局所剩地基、余屋、损伤机器、钢铁废料等进行了清点，提出将所剩资财折价先归商股，至于官股的损失，则由以后新办纺织厂“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逐步归还。规复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1894 年 4 月新厂建筑已基本完成。9 月中旬，新购机器安装完毕，9 月底，新的织布厂开车投产。这个厂，按照李鸿章的意思，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其地址仍在机器织布局旧址，规模较原局还大些，有纱锭 64,556 枚，布机750台。

四、民族资本工业的兴起

近代上海民族工业首先在船舶修造行业中兴起。

上海开埠以后，进出于上海港的船只急剧增加，据统计，1843 年进入上海港的外国船只仅为 7 艘，1845 年已有 87 艘，1855 年 7

月至1856年6月进入上海港的轮船达到了489艘，60年代以后发展更为迅速，1863年进入上海港的各国轮船竟然多达3400余艘①。上述数据说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的中心，这样大量的船舶由欧、美、日本远航来到上海，经过一个航次所造成的自然损伤，需要修理的船舶数量是极为可观的，一个发达的船舶修造业是必不可少的依托。60年代前后，尽管上海已经有不少家外资船舶修造厂，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它们不可能完全垄断，这就给近代化的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上海原有的打铁手工业，特别是这个行业中的船作（包括修理木船、锚链等等手工打铁业）小手工业者，便很自然地加入了船舶修理的行列中去。虽然他们实际上只是处于辅助、协作、附庸的地位，他们总还能承揽一部份打造零星机件、锚链及其他船用铁器的生意，从中逐步地积累起微薄的资本，逐步添置一些简单的机床，他们中的一小部份就转化为近代船舶修造行业中的民族私人资本企业。据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1966年统计，在1895年以前，上海已经有12家民族私人资本机器厂活跃于船舶修造业，其中有10家是从手工作坊转化而成的，最早的一家叫发昌机器厂。

发昌机器厂，最初称为“发昌号”。它是由孙英德、方举赞两人合伙兴办的。他们两人都是上海旧打铁铺学徒出身，满师以后又都在上海打过散工，50—60年代就从外商船厂手中承揽一些零星锻造工作，兼营废铜烂铁的买卖，1866年，他俩凑集两、三百元，购置了一些简陋设备，开办了“发昌号”。“发昌号”开办之始即与外商常有往来，当时外国人称他们为“发昌先生”②。1869年前后添置了新式的车床，到70年代初，它已有2台车床和10多名工人

①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1883年12月12日，第676页。

了，同时，已经有了锻冶、焊接、车削等比较齐全的工种，并已改称为“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1873年，它在《申报》登载广告，称：“本号娴习西国奇巧技艺，照依西国法式镌刻铜版地理舆图与山水、人物、兽头、翎毛、花卉各款画图，并能将银、铅、铜、铁、锡各等器皿镀金，俨若真金无异……”据该广告说，它还能镀银、镀铜、铸造铜像、仿制英、华古玩器皿。除了上述工艺制造外，它还兼营金、银、铜、铅、化学药品及零星机件的进口业务①。可见，70年代初，它的生产能力、经营业务都有很大的发展。

1876年，发昌机器厂又在《申报》上刊载了出售小火轮的广告说：它已经“自造数只，连船身并机器各样俱全”。1879年以后，年轻的方逸侣、孙寿轩接替了父辈。他们自幼在上海读书，对西方文化、技术的接触远远超过了前人，不仅通晓英文，懂得数理，而且还学会了绘图、设计，再加以他们都在“发昌号”工场里做过一些零星活计而富于实际经验。这些，对于他们在以后的20年间，努力开拓新的事业有着重大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之下，1890年，该厂已有车床10多台，牛头刨床2台，钻床3台，龙门刨床1台，二英尺对径元盘铡床1台以及手揿锄头1座，在机器设备大量增添的同时，雇佣的工人也已经发展到200多人，俨然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近代企业了，此时它已正式被称为发昌机器船厂。1879年——1900年之间，见之于文字资料，发昌机器船厂至少建造了8条轮船，其中，1887年造的“泰通号”是一条平底双轮刷沙机器船——挖泥船；1893年造的“汉阳号”轮船是卖给朝鲜华侨商人的，通行于济物浦（今仁川）与汉城之间，这是早期民族工业产品打进国际市场的可贵记录②。当时《北华捷报》载文，说：汉阳号的成功，

① 《申报》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16日。

② 《申报》1887年（光绪13年）6月25日；《北华捷报》1893年6月2日，第785页。

"正可说明中国资本家们具有极可信赖的企业精神"①。

据资料记载，1895年以前，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已有：光绪初年开办的均昌、甘章两船厂，1873年开办的虹口铁工厂，70年代初开办的建昌铁工厂等12家；另外，还有一家专业的翻砂厂——顺记厂。在上述13家企业中，除了创办于1894年的戴聚源铁工厂专营轧棉花车的零件生产以外，其余都与船舶修造业有关，其中如均昌船厂、广德昌机器造船行都有制造轮船的记录，足见早期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兴旺。然而，这种兴旺终究属昙花一现，好景不长。上海外资船舶修造业在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就开始了以耶松、祥生两厂为主角的激烈争夺垄断地位的竞争，90年代，正当发昌、均昌等华商船厂进入发展兴盛时代，耶松、祥生已兼并了大量外资船厂，并进一步合并，几乎垄断了整个上海的船舶工业，发昌等厂由于资本微薄，始终没有自己的船坞，在造船方面不能不仰仗于外资船厂，甲午战争后，耶松船厂就将发昌机器船厂作为兼并的对象，在耶松船厂的竞争下，发昌机器船厂迅速衰落，连年亏损，雇佣工人迅速从200多人下降到60多人，1899年不得不宣告由耶松船厂租办，1900年又被迫以4万元廉价地转让给耶松船厂，成为后者的一个车间②。其他一些华商船厂大多也在这一时期先后破产，其中个别厂，如：均昌机器厂为了维持奄奄一息的命运，被迫转产，改为经营小量纺织机件修配业务，才得以苟存③。

民族私人资本船舶修造业之所以迅速地由盛而衰，除了上述帝国主义的兼并、压迫以外，应当看到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政策上，对民族工业不仅不加保护，却对外国船厂给予多方关照。1868年，中英修约谈判时，允许英商船厂所需的一切机器、物料进口时可以免纳关税；1881年，又与德国签订了德商船厂修船免税新章。

---

① 《北华捷报》1893年8月18日，第249页。

② 《申报》1899年7月11日；《学术月刊》1965年，第12期，第66页。

③ 《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34页。

从此，各国“一切未能预言而实用修船各物”进口关税一律免除①；另外，清政府又把大批订单送到了外资船厂手中，单是耶松、祥生两厂，在1882—1893年间所造的37条船中，得自清政府订购的，就有19条之多②。

近代上海文化事业发达，民族资本印刷工业因之而较早地兴起。1876年，徐家汇土山湾有华商邱子昂与法国人翁相公合资开办印刷所，首先采用石印技术。但是，设备简陋，全靠人力，“印刷异常费力”，再加以它所印的多为“唱经”，因此影响甚微。不久，创办《申报》的美查兄弟，在南京路泥城桥堍开办点石斋印书局，使用了转轮石印机，并且配置了引擎，印书的能力迅速提高，石印技术的声名也随之而传开了。于是，1882年，徐润支持他兄弟徐鸿基集资创办同文书局。他们之所以仿效点石斋开办石印书局，一是看到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因而“心窃慕之”③，二是了解到点石斋用机器印刷，“获利之钜且易”④。这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近代工业进入上海以后，对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所发生的刺激作用。同文书局在西华德路开办后不久，就从北京宝文斋觅得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以及《资治通鉴》等等，陆续加以重新印刷，它装备了12架石印机，雇佣了500多名职工，营业盛极一时，它所印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尽管在版本、文字上多有谬误之处，但是，技术上的进步使它所印的书“字迹清朗”，为时人称颂为“佳本”，一时之间同文书局“声誉益隆”⑤。直至1898年，同文

---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第310页、394页。

②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第358页。

③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1页。

④ 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70页。

⑤ 钱基博：《版本通义》，第61—62页。

书局停办了，停办的原因大致是“印书既多，压本愈重”①。足见主要还是由于经营思想没有能与时代合拍、所印之书销路不广之故。

继同文书局以后，又有李盛铎于1887年，在上海会审公堂北面，开办了“蜚英馆”石印局。它的规模也很可观，而且与英商点石斋书局并肩而立于南京路泥城桥东堍。它拥有火轮石印机10余部，厂屋数10幢，内设总校处、绘图处、褾书处、钞书处、画格处、描字处以及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处、积书处、堆纸处、装订处等等部门，“门分户别，井井有条”②。同一时期，在湖北路627号又有罗海龄开办机器印刷厂，它所印刷精致的地图，以雕版精细、标图清晰、准确而风闻于世，而且开创了彩色印刷之先河，当时外国人评论说，这家印刷厂的技艺“足可以比得上英国的印刷术”③。

机器缫丝业是上海早期民族资本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1881年，在上海苏州河北岸，一家新颖的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公和永丝厂诞生了。它是最早在上海开办的华商近代缫丝工厂。公和永丝厂的创办者是当时被外国人称之为上海“杰出的中国商人”黄佐卿④。蚕丝的出口历来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但是，19世纪70年代，由于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迅速发展，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日丝成为激烈角逐的强力对手。1873年，日丝出口还不足1万担，到1883年却已经超过了3万担。同一时期，中国的土丝出口量却从6万多担下降到5万担左右⑤。机器缫丝质量远比土丝好，在国际市场上能获得巨大利润，这就刺激了民族资本缫

①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7页。
② 《申报》1887年（光绪13年）1月13日载《记蜚英馆》。
③ 《北华捷报》，1888年11月23日，第567页。
④ 《北华捷报》，1902年7月6日，第131页。
⑤ 黄逸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第1272页。

丝工业的兴起。黄佐卿向意大利订购了100台缫丝车，开办了公和永丝厂。虽然，1883年到1887年之间，由于技术上还不熟练，所出之丝质量较差，营业还不兴旺，但是，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土丝在国际市场上节节败退之际，对于抵制日丝的竞争显然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能力，黄佐卿刻意提高工人的技术，提高厂丝的质量。该厂所产的厂丝在色泽与洁净等方面迅速地得到了改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信誉，渐渐地打开了销路。1887年，他增加投资，扩建工厂，丝车增加到900多架，尽管它生产的厂丝在国际市场上价格还高于日丝，由于质量坚挺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1893年，法国绸商开始电请上海各洋行与"公和永"签订定货合同，销售量逐年上升，"公和永"也因此而成为上海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中堪与外商匹敌的少数企业之一。

继公和永丝厂之后，在甲午战争以前，上海开办的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还有坤记、裕慎、延昌、正和、纶华等许多家①。但是，这些厂大多数没有站住脚跟，先后都关闭了。1894年前后，上海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祝大椿筹集资金约50万元，也开始筹建丝厂，名"源昌"，但它的开工及发展都已经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了。

除了以上3个影响甚大的行业以外，近代上海早期民族资本还追随着外资工业的步履，在大约九个行业开办过企业。如：1878年董家渡的高记木材厂，1882年左右一度开业的中国玻璃制造厂；1883年前后开工的裕泰顺火轮局，1886年在杨树浦开办的华商上海机器制冰公司，机器轧铜厂，1887年创建的中西大药房以及80年代末投产的伦章造纸厂，1890年开办的燮昌火柴厂和轧花行业的棉利公司等等企业。它们之中，有的才开工便停业了，有的本小利微勉力维持，以后大多为外资工业所吞并，棉利公司则是上海华商棉纺织业的先河。

---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72页。

1895年以后，近代化的棉纺织大工业生产才发展成为上海民族工业的主体。在此之前，中国人办的棉纺织业"还完全操于洋务派官僚手上。如：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焚毁后重建，称为华盛纺织总局)，以及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总局。由于所谓"十年专利"的阻滞，直到1894年末才有商办的裕源纱厂在上海麦根路(今淮安路及苏州路南段)开机投产。

贸易—金融—工业，这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心在上海形成的历史的逻辑过程，近代民族工业在上海的崛起的历史进程与上述逻辑过程基本吻合。它的崛起，首先是适应于日益频繁的国际、埠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很突出地表现在船舶修造业之一马当先地发展起来，以后又有缫丝、轧棉等工业都是与内外贸易紧密相关的；但是，有一部份民族近代工业的兴起，却并不完全如此，它们之兴起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如：木材加工业、玻璃制造业、制冰业、制药业、面粉业、印刷业以至造纸业，这些行业的兴起，与同类的外资工业在这一时期的形成，有着共同的原因——适应于租界内日益增多的西人生活的需求（物质的与精神的两方面）。同时，也反映了在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情况之下，中国人(首先是上海人)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正在日渐改变，以致从另一个侧面推进着这些行业中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并且由此而推动了生产力在广度与深度上迅速地发展，对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的瓦解起着积极的作用。

上海早期民族工业的崛起，有着它自身的特点。历来认为早期民族工业的主要内容便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而开办的土产加工工业。这一点，在早期上海民族工业中，恰恰并不占主导地位。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895年之间，上海兴起的11个行业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中，只有打包业、缫丝业、轧棉业与棉纺织业与之有直接的关系，而其中的后两种，直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最后几年才产生，而上海的民族缫丝工业远不及广东顺德一带发展之迅

速，而属于掠夺资源范畴的制茶业、蔗糖业等等，都还散布于各产地。实际存在于上海早期民族工业中的，更主要的部份却是适应东西文化冲撞后交汇需要的制造工业，这才是它的真正的特色所在。

第九章　改良思潮在酝酿中

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推动着中国在通往殖民地的斜坡上下滑，也刺激着不甘沉沦的人们求索救国道路。西学东渐，来势日猛，近代工业亦开始出现于东方古老帝国，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于是在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以变法为手段，以实现民族独立和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上海是近代西学传播的中心，是近代工业的主要基地，改良思想的主流在这里酝酿、产生，很多改良人物在这里出现、成长，并从这里辐射全国。

一、西学东渐之势猛烈

西学是作为中学的相对之词出现的，泛指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文化，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神学等各个方面，它是在西方产生、发展起来的，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在近代以前，中西文化本无轩轾优劣可言，各自都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并且都依照自己的轨道发展着。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西方东侵，导致了西学东渐热潮的兴起。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屡战屡败，国势危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由对胜败原因的探求，追溯到文化差异之所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对西方文化进行研究。明摆着的事实是，西学与强盛、先进的西方联系在一起，中学与衰弱、落后的中国紧密不可分，爱国的人们由此萌发了学习西方的思想，也因而比较热情地介绍西学，鼓动人们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来到中国的

西人包括传教士，为了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同时推广资本主义文明，他们不能看着中国老是踯躅在封建、闭塞的境地，自然要以宣传西学为己任。两方面不同的动机，共同促成了西学东渐的热潮。

西学在上海的传播，可以上溯到明代大学士上海人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等西书的翻译介绍，以及他对天主教的信仰。由于他的原因，上海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重要基地。可见那时西学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在于宗教。近代则不同，宗教之外，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等影响都很大，传播的方式、规模也都大不同于以前。从西学传播方式来说，传教以外，主要有这么三种，一是兴办学校，教授西学；二是翻译西书，介绍西学；三是发行报刊，宣传西学。

甲午战争以前，由传教士和其他外侨开办的允许中国学生入内学习的学校有徐汇公学、裨文女塾、文纪女塾、明德学校、清心学校、经言学校、圣芳济学堂、圣约翰书院、圣玛利亚女校、中西书院、中西女塾等。

徐汇公学创始于1849年。当时江南发生了大水灾，很多难童无家可归，徐家汇圣依纳爵天主堂传教士晁德莅遂收容难童12人，供给膳宿衣着，一面教书，一面传教。第二年即1850年正式建校，取名徐汇公学，因奉耶稣会主圣依纳爵为主保，故亦称圣依纳爵公学。1851年学生增至31人(近代著名学者马相伯即于是年进入此校)，教员增至4人。首任院长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3)，意大利人，1846年来华，他博学强记，深通中文，1850年升为司铎。他在徐汇公学先后任教10余年，用拉丁文写了一部《中国文学读本》，为初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广泛使用。徐汇公学初由徐家汇圣依纳爵天主堂领导，后改由上海教区主教领导。院长均由耶稣会嫡系的神父担任。院长下设校长，相当于教导主任，负责教学，均由耶稣会修士担任。学校以法文和宗教课为主要课程，有一课不及

格便不能升级。教室的前二排座位叫"光荣座"，专门留给法文成绩最好的学生坐。毕业时，要求对法文、拉丁文能读会讲，否则不予毕业。因此，徐汇公学毕业学生，均通法文与拉丁文。为此，日后蔡元培等人曾专门向马相伯讨教拉丁文。徐汇公学纪律极严。学生绝大部分住宿校内，从早到晚均要受严格的纪律约束，甚至上厕所也要排队前往，小便限五分钟，大便限十分钟，超过时间要罚跪，打手心，打屁股，罚吃白饭，罚星期假日不准回家。学生宿舍从早上起身后就上锁，一直到晚上临睡前五分钟才开门。吃饭时规定先吃素，后吃荤，不许发出大的声响。徐汇公学是教会学校中纪律严明的典型。解放后，徐汇公学接办为徐汇中学。

裨文女塾创办于 1850 年，创办人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Eliza Gillette)，地点在上海西白云观（今方斜路)，始创时只学生 20 人，后来改为裨文女子中学。这是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解放后，这所学校接办为上海市第九中学。文纪女塾，1851 年创办，创办人为美国传教士琼司女士(Emma Jones)，地点在虹口，开始时学生仅 8 人，以后续有增加。学生除了学一般西学和四书五经外，还学习纺织、缝纫、园艺、烹调等技术。这个学校后来改为圣玛利亚女校，解放以后与中西女塾等校合并为市三女中。明德学校，由天主教耶稣会在 1853 年创办，地址在南市董家渡，先为小学，后扩充为中学，解放后接办为上海市蓬莱中学。清心学校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M. Farnham)夫妇创办。范约翰在 1860 年创办了男塾，其夫人翌年创办了女塾，这两所学校后成清心中学和清心女子中学（解放后接办为上海市市南中学和上海市第八中学)。经言学校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创办于 1867 年，地址在徐家汇，聘法国拯亡会修女圣心和保禄来华任教，专收教内女生，设有医科，并注重刺绣等手工。1898 年改名崇德女校，后来改为徐汇女子中学。圣芳济学堂由法国天主教会于 1874 年创设，校址初在法租界，10年后迁移虹口。学堂最

初只有4名外侨儿童，以后陆续增加，1880年开始招收中国儿童。后又迁移陕西北路，是上海时代中学前身。圣约翰书院，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Bishop Samuel Schereschewsky)创办，是在圣公会1878年设立的培雅、度恩两校基础上合并而成，地址在梵皇渡路，开始有学生49人，第二学期增至71人，后来扩为圣约翰大学。书院先后设立文理学部、神学部、医学部和预科，1888年以后开始注重英文和自然科学。圣玛利亚女校，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于1881年创立，由原上海文纪、裨文两女校合并而成，黄素娥为首任校长，开始时招生40余人，以后陆续增加。这个学校在解放后与中西女塾等校合并为市三女中。中西女塾，由林乐知和监理会另一位传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在1890年创办，校址初在汉口路西藏路，后来迁到江苏路，学校教授中西文字和各种实用之学，后来改为中西女中，解放后并入市三女中。

这些由教会或其他外侨开办的学校，总的趋势是，学校数量由少到多，教育程度由低到高(先是小学，然后是中学、大学)，学生来源由贫到富。这些学校初期招生，学生来源多数为穷苦人家，免费供读，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起，逐渐变为从富庶家庭的子女中挑选学生。这种变化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它说明了上海口岸趋于半殖民地化。要在洋行林立、新式机关层出不穷的上海谋到较好的职业，一般中国旧式学塾出来的人物已显得不相适应，于是教会开办的新式学校身价陡增，应学者众，自然无需再从贫苦阶层中免费吸收学生。其二，传教士们开始有意识地从中国人中比较富有同时也是比较有势力的阶层中吸收学生，目的是为扩大影响。林乐知有一番话把这一点说得最为明白，他说："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地为乞丐开办义务学校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地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吗？"①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教育对象的变化反映了西方殖民势力扩大其文化影响的努力的升级，这种升级是与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同步的。教会学校的“升格”是70年代以后上海新式教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下面就以鼓吹“打进富有阶层”的林乐知开办的中西书院为一典型，剖视一下这一时期的上海教会学校及其特点。

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开办于1881年，校址初设于上海法租界八仙桥林乐知住宅的对面，占地约五亩，时人称之为“林公馆”或“林华书院”。不久，又在上海虹口吴淞路设分院，因受地界限制，难以发展。为了容纳更多的学生，林乐知以将近4万银元的价格，向上海著名的买办徐润买下了位于虹口昆山路与吴淞路交界处的一块地皮，占地十三亩，充作校舍，称“中西大书院”。1884年后，其余两院皆归并于昆山路大书院。

林乐知开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希望以此“触及在中国人中施展影响的源头”，尤其希望通过中西书院在以前“无法传教的”阶层中吸引学生①。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办学目的。学校开办之初，学生已达200多人。林乐知吹嘘说，“每一个学生都毫无例外地来自居住在上海的最优良的家庭，并且几乎包括中国每一个地区的人”②。1882年1月，中西书院的学生迅速增加到330名，并还有近百名入学申请者因校舍缺乏而不能录取，林乐知对此颇觉得意。最令他满意的是招进来的学生中有许多16至20岁左右的“中国文学的毕业生”，意即那些从小受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私塾学生，这些学生正是他培养的重点对象。他们大都来自上海的官僚、士绅和富商家庭。林乐知很明白地说明自己在这些阶层中吸收学生乃是作为一种传教的手段：“当人们知道几乎没有一个

①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90页。

学生来自普通教会学校所能接触到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就会懂得我们这种举动是何等重要了。我们曾充分估计到这个阶层中已经入校的许多人物会为学校所带有的宗教色彩而感到畏缩，但在华人的心目中，这项事业所能预期的种种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① 他估计中西书院可办成千人大学。

为什么当时上海的官僚士绅家庭愿意把子弟送到中西书院受教育呢？除了上海租界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林乐知在中西书院中强调施教方法上采用中西并重的原则。按林乐知的计划，中西书院全部课程完成期限为 8 年，除了英语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政治、法律等课程外，约有一半时间是学习"中学"。课程大致内容有"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及"书法"等，同时不强迫学生上圣经课，仅在每天上课前有一简短的"恭读圣经"和"祈祷"仪式，学生也不一定当教徒。这种安排使学校较少宗教气息，容易被官僚士绅阶级所接受。此外，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吃洋行饭"正在迅速成为一种诱人的职业，后来成为旧中国政治中的一大势力的买办人物正在迅速形成，这些人物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在中西书院这类宗教气息不很浓厚的教会学校里，学得充当买办或在洋行任职的职业本领。事实上，中西书院大部分毕业生都在外国控制下的海关、铁路和商行任职。林乐知也看到，他的学生们"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语，因他们盼望藉此在商业兴盛的上海谋得较好的差事"② 。

传教士和其他外侨在上海创办新式学校日趋增多之时，清政府也在上海创办此类学校，上海的有识之士也着手创办新式学校。他们创办或与外国合办的学校主要有广方言馆、格致书院、梅溪书

---

①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第 91 页。

② W·B·Nance："Soochow University"，纽约 1956 年版，第 15 页。

院。

上海广方言馆是以学习外语为主，兼习其他西学的学校，创建于1863年。先是，1859年2月，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奏请朝廷开设外国语言文字学校，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之际，朝廷无心无暇计及于此。1861年，战事已平，奕䜣、桂良等人重提开设外语学校之事，冯桂芬也提出在上海等地设立翻译公所，教授中国幼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1862年，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校正式创办。翌年3月11日（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江苏巡抚李鸿章乘机向朝廷提出在上海开设外语学校的意见。在委托幕僚冯桂芬代拟的《奏请设立上海学馆》的摺稿中，李鸿章不但一般地论述了开设外语学校的重要性，而且特别说明了在上海这个地方开设外语学校的必要性。他说，上海为洋人总汇之地，中外交涉繁杂，各国均设有翻译官，中国方面则缺少这方面可以信赖的人才，遇事往往吃亏。同时上海洋人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在这里设立外语学校，可以博采周咨，集思广益，收到在其他地方无法具有的良效。折上，仅17天，令准。不久，广方言馆破土兴建。

上海广方言馆最初拟名似乎是“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此名始见于李鸿章请设上海学馆的奏稿中。其后，在冯桂芬拟订的试办章程中，正式定名为上海“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此名用了4年，1867年改名上海广方言馆。把外国语言文字称作“方言”，不无天朝老大的意味。

广方言馆最初设在上海城内旧学宫之后，敬业书院之西，由上海县儒学教谕章安行择地购料，负责筹办。据时人记载，学馆建筑“楼阁房廊，制极宏敞”。堂中有李鸿章、冯桂芬所写楹联。李联：“声教遍中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夏，四方专对裕通材”。冯联：“九邱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二联精神一致，重在一通，通中西之学，宣示了他们办学的目的。1869年11月，江海关道涂宗瀛以江南制造局已设译书馆，与广方言馆事属相类，禀准南洋

通商大臣，将广方言馆移入江南制造局。学馆新址在制造局西北隅，1870年初建筑竣工，计楼房、平房共8座74间，楼上24间为翻译馆，楼下及平房50间为广方言馆。1870年2月，广方言馆迁入新址。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以各省已设学堂，兼习外国文字，足备译才，而"工商各业，尚无进步"，奏请改广方言馆为工业学堂。至此，广方言馆性质既变，名亦不存。不久，工业学堂又由陆军部重定名称，分为专门、中学、小学三部分，统称为兵工学堂。

广方言馆初办时，学生额定40名，以后续有增加，最多时每届80名。学生入学采取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年龄限为14岁以下，后来改为15岁以上，20岁以下。学制初为3年，开始时学生均为免费住馆就读，并由馆方发给伙食费每日一钱，1894年以后有所变通。学习课程，开始时以外文、算学为主，兼习经史词章，1870年以后增加重学、天文、地理、勘探冶炼、机器制造、行海理法等课，由一般地培育外语人才变为培养多方面的科技人才的综合学校。广方言馆所开外语有英、法、德等语种，多聘外国学者如著名的林乐知、傅兰雅、金楷理、璞琚等担任教习。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进行译书练习，江南制造局所出版的中译西书中，有不少是广方言馆学生译的。

广方言馆历时42年，培养了500—600名擅长外语、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人才，他们后来或在外交部门工作，或充海关翻译，或到工矿办实业，或到学堂教书，在近代外交、教育、文化界都有一定影响。其中陆征祥、胡惟德代理过国务总理，担任过外交总长，至少有9人担任过驻外公使，如杨兆鋆、刘式训、吴宗濂等，担任过各种学校校长、教习，担任各种翻译的更多。一位广方言馆学生说："一馆之中，极勋位于首辅，展奇韬于秘府，遍使节于环球，振古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①

① 吴宗濂：《上海广方言馆始末记》，《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前附。

格致书院是中外合办的以学习近代自然科学为主的学校，创办于1876年。先是，1874年3月5日，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首倡其议，24日，中外士绅议定募捐银两，创立格致书院，并推选了董事。以后两年多时间内，董事会开了9次会议，讨论筹集经费、择地建房、购置图书器具等事。造房事宜由徐寿负责，院址在北海路。院内设有格致堂，供讲授格致之学，还设有书房即图书馆，内置各种中西书籍报刊，以备查阅，并设有博物馆，内有各种工艺机械、实验器具、生物标本、化石、摄影绘图器材及天文、地理、交通、枪炮等样品模型。开设格致书院的目的，据董事会发往各处的条陈，是“原令中国人明晓西国各种学问与工艺与造成之物”。条陈特别声明：“凡各种传教之书，断不可入馆书房。”1879年11月1日，格致书院在《申报》刊登招生启事，内称课程分西国语言与格致实学两种，学制三年，书院提供饮食。由此可见，格致书院既不同于以经史词章、八股制艺为主的中国旧式书院，也不同于传教士所办的某些朝夕祈祷诵经的教会学校，而是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

格致书院事务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由中外董事组成，担任过华人董事的有唐廷枢、徐寿、王荣和、徐建寅、华蘅芳、徐华封、张焕纶、王韬、赵元益、李平书等，西人有麦华陀、傅兰雅、伟烈亚力等。格致书院于1876年6月正式开院，院务初由徐寿主管，1884年徐寿逝世，改由王韬主管。1897年王韬逝世，由赵元益接管。戊戌政变以后渐趋冷落，1913年停办。

格致书院初建时，傅兰雅、徐寿等即译辑《格致汇编》，介绍初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备启蒙之用。格致书院除了招生授课，还兼有社会教育的功能。对于书院的博物馆、书房，非书院人亦可入馆参观阅览。对于书院的科学讲演，任何人均可入内聆听，也可参加考试，合格者发与课凭。来院讲演的，多为中外学有专长的学者，徐寿、华蘅芳等本人就是中国著名科学家，他们主持书院讲席十来年。书院在讲演西学的时候，还辅以幻灯教学，备有各种实验仪器，有效

地提高了教学效果。由于这些原因，格致书院在当时上海，既是一个引力巨大的科学磁场，也是一个辐射力特强的科教基地，来院肄业的学生多的时候有几百人。从1886年开始的季课、1889年增设的春秋两季特课中，李鸿章、刘坤一、薛福成、盛宣怀、郑观应、龚照瑗、胡燏棻等热心洋务的人们都参加了命题，所命之题亦多关涉西学。学生们在课艺中，宣传各种近代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还有不很系统的进化论，论证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重要性，并且超出自然科学范围，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格致书院的新式教育，培养了相当一批新式人材。例如：叶瀚在戊戌时期创办《蒙学报》，发起蒙学公会，成为上海维新界活跃人物，1900年反对"己亥立储"的请愿通电，"中国国会"的召开，以后的拒俄运动等等，他都积极参与其事。赵元益参与创办《新学报》，宣传科学；瞿昂来参与《经世报》笔政，鼓吹维新。钟天纬创设三等学堂，革新教学方法。诚如一位学生所言：格致书院里的新鲜气息，使得"四方风动，群彦四起，实为后日维新之基"①。

梅溪书院初名正蒙书院，1878年创办，1882年改名梅溪，创办人张焕纶。在国势凌弱、教育落后的情况下，他深感科举之溺人，救时人才之匮乏，认为"国家盛衰，系乎风俗人才，而风俗人才尤急于蒙养"，于是起而创办了梅溪书院。

张焕纶明确规定，梅溪书院"不授帖括，以明义理、识时务为宗旨"②。学生的组织管理、作息制度均参照西国学校之法，课程有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歌诗，1884年以后添设英文、法文，还有内容丰富的体育游戏，如击球、投沙囊、投壶、习射、蹴踘、超距、八段锦等。教学方法也较旧式书院有很大改变，自早晨起床到晚间休息，各有定程，吃饭有教师同席，睡觉有教师同舍，师生关

① 钟天纬：《刖足集》，后附年谱。

② 《上海县续志》，卷十八，《张焕纶传》。

系比较融洽，不象旧式书院俨若猫鼠。张焕纶在梅溪书院，还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中法战争爆发时，他让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夜晚则率领他们在上海城内巡逻。后人评论，梅溪"是上海最早实行军事训练的学校，同时是上海童子军的老祖师"。①

梅溪书院开始纯系私人创办，创始人除张焕纶外，还有沈成浩、徐基德、范本礼、叶茂春、张焕符等，这些人都是张焕纶在龙门书院的同学。他们分任数学、化学、舆地、体育等课，书院经费全由私人捐助，各位创办人或出房屋，或出钱钞，或捐助校用杂物，资助最多的是校董姚天来。书院初创时，教员教书纯尽义务，不取报酬。

由于梅溪开中国小学校学习西学的先河，因此在创办伊始，社会上疑忌甚深，入院就读者甚少，经教习、校董动员，并送自己子弟入学，才有 40 来名学生。后来由于成效日著，生徒日众，到 1882 年已有学生近百人，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学校。是年，苏松太道邵友濂叹服张焕纶"用志之宏，任道之毅，而虑其力之或不继也"，乃拨款扩建校舍，并建洋文书馆，聘请通晓西文的担任教习②。1902 年，清廷令各地书院改为学校，梅溪书院改称官立梅溪学校，民国以后称梅溪小学。

广方言馆是官办学校，格致书院是中外合办学校，梅溪书院是私立学校，这三所不同类型的学校，都以讲授西学为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人主动学习西学的热情。

甲午战争以前，上海翻译、介绍西书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一个是广学会。

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一名翻译馆，成立于 1867 年冬，设于江南制造局内。广方言馆移入制造局后，翻译馆与广方言馆并设一幢楼内。翻译馆翻译人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英美学者，

---

① 李纯康：《上海学校溯源》，《上海研究资料续集》。

② 邵友濂：《梅溪书院记》，《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如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人；一部分是中国学者，如华蘅芳、徐寿、徐建寅、华世芳等，广方言馆的学生也参加了一些翻译工作。这种翻译多由西方学者口授，中国学者笔述。到1907年，翻译馆共翻译出版了各类书籍159种，1075卷。这些书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科学技术，诸如蒸汽机制造法、五金冶炼法、火药制造法、枪炮制造法，涉及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矿物学、农学、工程学、教育学等，不少书成为西学启蒙教科书。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地学浅释》，即著名地质学家赖尔所著的《地质学纲要》；《决疑数学》，是关于新的数学分支概率论方面的书籍；《合数术》，讲的是关于对数表造法；《化学鉴原》，包括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容，概述了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各种重要化学元素的性质，译者徐寿在书中创造了以西文名第一音节为中文名称的命名原则，钠、锰、锌、钙等名称都是此书首创。这些书都是第一次介绍进中国，对中国科技界影响深远。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书籍中，虽然绝大多数属声光化电一类，但也不是没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不但在一些史地、政法书籍中，零星地谈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且还有这方面的专书，最著名的是《佐治刍言》。这部书共三卷，由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1885年出版。全书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为宗旨，认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国以民为本，国政以能惬民心为本。这是当时中国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最为系统的一本书，出版后一版再版，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梁启超认为它是“言政治最佳之书”①。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1894年改称广学会，最初的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of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照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下》，1896年质学会刊本，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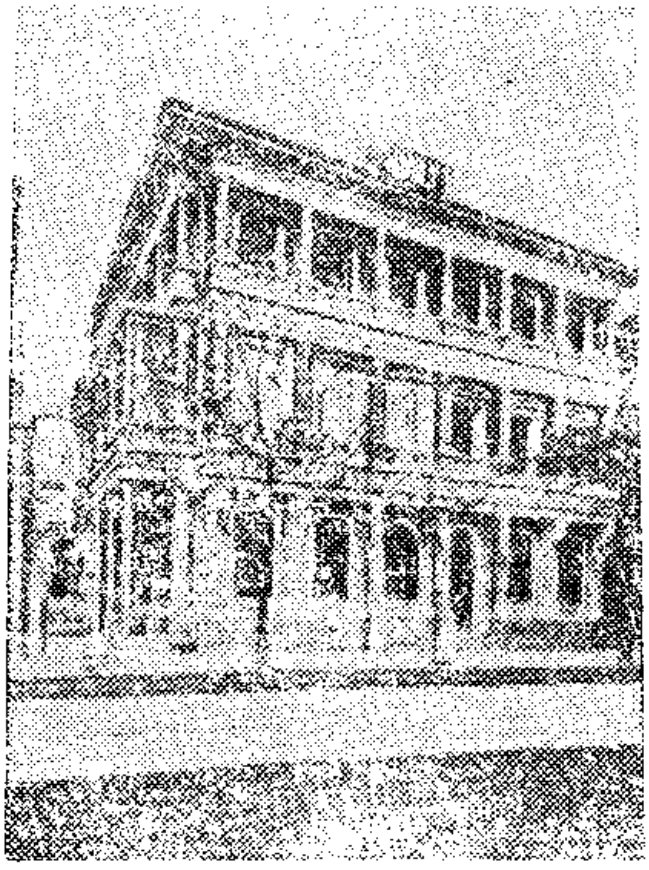
字面直译可作："在中国人当中广泛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于此可见其宗旨。广学会最初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倡导组织，发起人有39个，其中除了传教士，还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德国驻沪总领事佛克（J.H. Focke）、有利银行经理伯斐细（F.C.Bishop），赫德还长期出任广学会会长（或称总理）。它的历届董事会除了传教士外，还有英美两国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和在华外人中的知名人士。所以广学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教会方面的组织，它实际上是一个代表英美等国利益的、由传教士具体经办的最大出版机构。其主要工作人员除韦廉臣外，还有李提摩太、慕维廉、艾约瑟、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等，韦廉臣、李提摩太先后任总干事。广学会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传教士们用汉字著西书，译西书，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编译）、《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李提摩太译）、《列国变通兴盛记》（李提摩太译）、《自西徂东》（花之安著）、《西国学校》（花之安编）、《文学兴国策》（森有礼辑、林乐知译）、《格致须知》（傅兰雅编）等多种书籍，内容除宗教外，涉及各国政治历史、自然科学等。其中最有名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前书共24卷，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叙述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包括文化、思想、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革命过程。全书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脉络清楚，文笔简练，对于不太熟悉世界大势的中国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梁启超对此书绝口称赞，认为是"西史中最佳之书"。后书共16卷，刊载中日甲午战争大量史料，有助于刺激中国人民的觉醒。广学会在戊戌以前出版的书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世界各国变法自强的介绍，鼓吹中国实行变法。这些宣传客观上对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兴起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曾向广学会订购89种书籍，可见其影响

之大。

除新式教育、出版西书外，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是这一时期上海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19世纪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报纸，唯一合法的所谓报纸是渊源久远、历代相承的朝廷的邸报，无非刊登皇帝的诏书、皇室动态、官员任免升黜等事项，阅读的对象也只限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上层。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等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方始编辑出版了一批近代化的中、外文报刊。五口通商后，办报的风气渐及上海，作为近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新闻报纸开始在上海出现。

甲午战争以前上海的报刊多达几十种，都由外国人创办。其中西文报刊有：《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又名《北华先驱周报》或《先锋报》，1850年8月3日由英人奚安门 (Henry Shearman)独资创办。周刊是上海出版最早的英文报纸。1864年7月1日，因于需要刊载的关于船期及商业材料日多，奚安门乃别出一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而《北华捷报》则成为它的每周增刊。1881年改由公司经营。报馆初设汉口路，1887年迁九江路，1901年迁外滩。此报为上海租界工部局之喉舌，故在外侨中影响尤大。此报直至1951年停刊，历时一



早期的字林西报社

个世纪，最多发行数达7817份，是上海也是整个中国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西文报纸。《皇家亚细亚文会北中国分会报》(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8年发刊，每年一册，伟烈亚力编辑。《上海每日时报》(Shanghai Daily Times)，发刊于1861年9月15日，1862年停刊。《晚差报》(Evening Express)，1867年10月1日发刊，琼斯(C.Treasure Jones)编辑，几年后停刊。《远东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67年发刊，每季一册，由伟烈亚力等人编辑，1872年易名《中国评论》(China Review)，每二个月一册，1923年易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每月一册。《上海通信》(Shanghai News Letter for California and the Atlantic States)，1867年10月16日由美国人创刊，每月一册，1874年并入《上海差报》。《上海差报》(The Shanghai Courier)，1868年10月1日发刊，郎格(Hugh Long)编辑。《上海锦囊与每周差报》(The 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Courier)，1871年1月4日发刊，1875年并入《晚报》(The Evening Gazette)。《晚报》创刊于1873年6月2日。《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1874年发刊，由葡萄牙人陆芮罗(Pedro Loureiro)发行，后由巴尔福编辑。《循环》(The Cycle)，1870年5月7日发刊，主笔为詹美生(R.Alexander Jamiesson)。这是一份专谈政治与文学的刊物，每周出版，发刊一年后停办。《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1879年4月17日创刊，英人开乐凯(J.D.Clark)等编辑。为上海重要晚报之一。此外还有《密勒氏评论报》该刊系美国人密勒(Thomas F.Milland)所创办，英名Millan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后由鲍威尔(J.B.Powell)接办，英名改China Weekly Review，中名仍旧，斯诺曾为之工作，言论持平，影响颇大。建国后始停刊、《上海英商会报》(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Journal)等。

中文报刊有：《六合丛谈》，1857年1月26日创刊，为月刊，由伟烈亚力主编，墨海书馆印行，翌年迁至日本。这是上海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内容有科学、文学、新闻、宗教等。撰稿人除了伟烈亚力，还有慕维廉、艾约瑟、韦廉臣等英国传教士，也有一些中国文人的投稿。其中刊载的上海宝山人蒋敦复写的《海外异人传该撒(今通译恺撒)》，是最早的中国人撰写的恺撒传记。《上海新报》，1861年12月创刊，是《字林西报》的中文版，也是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初为周刊，1862年5月7日起改为每二日出一纸，周日停刊，由伍德与林乐知编辑。此报开始主要刊登商业、物价消息，兼载新闻，1868年增加新闻篇幅，1870年又增刊"机器图说"。1872年4月《申报》创刊，《上海新报》从这年7月2日起改为日报，削价与之竞争，8月又革新版式，报道刊载黄浦江风景画，巨厦与帆樯相映，颇足代表上海地方特色。后来《申报》请人游说，谓"同系英商，何苦相煎！"1872年12月31日，《上海新报》因字林洋行集中精力办《字林西报》而停刊。10年后，《字林西报》主笔巴尔福(Frederic H. Balfour)，延请华人戴谱笙、蔡尔康续办中文报纸《沪报》，1882年5月18日发刊，内容仍多半译自《字林西报》，自七十三号起改名《字林沪报》，1900年卖给日本人的东亚同文会，改名《同文沪报》。《申报》，为《申江新报》之简称，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为英人美查(E.Major)所有。美查初与其兄做茶叶、布匹生意，因亏本，改行经营报纸。他延请钱昕伯赴香港，调查报业情况。钱昕伯与香港报人王韬有旧，钱昕伯了解了香港办报情况，回到上海后，美查便创办了《申报》。《申报》初办时，延浙江人赵逸如为买办，蒋芷湘为主笔，每二日出报一张。自第五号起(1872年5月7日)改为日出一纸，添聘何桂笙、钱昕伯襄理笔政。《申报》初期内容多为文人雅士之诗文谈荟，亦有不少鼓励中国学习西方的议论。美查除主持《申报》外，还编印了《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等文学月刊。他还在申报馆经售在英国印刷、加上中文说明的画报——

《瀛寰画报》。这是在中国发行的第一份画报。美查还发行了由点石斋印刷的点石斋画报。1889年，已入老境的美查决定回国，乃添招新股，将其所营企业改组为美查有限公司。1907年，《申报》营业不振，盘与原申报馆买办席子佩，名义上仍属西人。1912年，席子佩又将《申报》售给史量才，至此，《申报》便成为纯属华人的报纸。此外，还有几份中文报刊：《彙报》，创刊于1874年6月16日，由曾经留学美国的容闳发起，集股万两，投资者大多为广东人，延英人葛理(Gley)为总主笔，黄子韩、贾季良等为编辑。同年9月1日，由葛理出面承顶，易名《彙报》，延管才叔为主笔，因营业不佳，乃吸收新股，于1875年7月16日易名《益报》，延朱莲生为主笔，办理不到半年，朱氏辞职，报纸亦就此停版。《新报》，由道台冯焌光用官费创办于1876年11月23日，每日一张，周日停刊，中英文合刊。第二年由继任道台刘瑞芬接办，并于1877年6月11日(光绪三年五月初一)取消英文，变成一张纯粹由上海官府办的中文报纸。当时中国人称之为"官场新报"，外国人则目之为"道台的嘴巴"(The Taotai's Organ)。此报办到1882年7月14日，被新任道台邵友濂裁撤。《小孩月报》，1875年出版，范约翰(J.M.W.Farnham)编辑，文字浅近易读，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益闻录》，1878年创刊，初为半月刊，不久改为周刊，1898年与《格致汇编》合并，易名《格致益闻汇报》，仍为周刊。《图画新报》，1880年创刊，到1913年停刊，上海圣教书会出版，每月发行，有地图、风景、天文、地理、科学、风俗、时事、名人像等。

这些报刊中，介绍西学较多、影响较大的是《格致汇编》、《万国公报》和《西国近事汇编》。

《格致汇编》，1876年2月创刊，初为月刊，1890年起改为季刊，由傅兰雅编辑，格致书室发售，撰稿人除傅兰雅外，还有徐寿、徐建寅、艾约瑟、慕维廉、玛高温、丁韪良、李提摩太、华约翰等，内容有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地质、生物、生理、医学等各种自

然科学，并报道中国及西方自然科学研究动态。《格致汇编》办得颇为生动，设有格致略论、格物杂说、算学奇题、互相问答等栏目，并附有很多插图。这本杂志是当时中国西学启蒙的重要参考读物，广方言馆、格致书院的学生是这一杂志的热心读者，有些学生还为这一杂志译文撰稿。



《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前身是《教会新报》，1868年9月创刊，创办人林乐知，为周刊。初以教会内容为主，两年后开始登载一些政论文章。1874年9月，从第301期开始，改名《万国公报》，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刊物，仍为周刊。1883年7月，因林乐知忙于中西书院事务无暇顾及而停刊，1889年2月复刊，改为月刊，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到1907年因林乐知病逝而停办。《万国公报》以大部分篇幅报道世界各国时事；刊载不少自然科学知识，诸如《格物探源》、《万国地图说略》、《格物穷理》等；登载了中国一些出使人员的日记观感，如李圭的《环游地球略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万国公报》还直接刊载一些鼓吹变法的文章，其中有外国人写的，如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也有中国人写的，如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洋务》、《变法自强》、《除弊》等很多篇，郑观应的《西学》。孙中山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也发表在1894年的《万国公报》上。《万国公报》历时久，介绍西学内容多，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不光王韬、郑观应、康有为、

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受其影响，连光绪皇帝也颇受影响。他在戊戌变法时期便读过《万国公报》。

《西国近事汇编》，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从1873年开始，到1899年止，内容根据西方报纸按年译辑，凡各国内政外交、农工商务、党派战事均有叙述。编译人员屡有变易，1873年金楷理译，姚棻述；1874年至1881年，林乐知译，蔡锡龄述；1882年至1884年，钟天纬编辑；1885年、1886年，郑昌棪编辑；1887年至1889年李岳衡编辑；1890年张通熙编辑；1891年至1893年蔡祚来编辑；1894年至1896年王汝驹编辑；1897年凤仪译，汪振声编；1898年杨召芬译，汪振声编；1899年范熙庸编辑。《西国近事汇编》对于当时知识界了解世界各国最近形势很有参考价值，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便说："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

报业、出版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印刷技术的改进，印刷业是传播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早在1843年，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就在上海山东路上创立了一家中文名为"墨海书馆"的印刷出版机构，这是铅字印刷工艺首次传入上海。在这以前，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也曾在澳门试用西洋印刷术，但却遭到意想不到的破坏："秘雇匠人制字模，谋泄于有司，刻工恐罹祸，举所有付诸丙丁以灭其迹"①。麦都思在开埠后的上海租界内开办铅字印刷厂却没有遭此磨难，当时墨海书馆的印刷机器并不先进，转动机器的是一匹老牛，但仍引起人们的好奇，上海竹枝词有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② 这家书馆的主要出版物是《圣经》和传教书，但在它的副产品中，却贡献了几部重要的科技书籍。例如，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数学著作《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的物理学著作《重学》，

①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53页。

② 胡祥翰：《上海小志》，卷四。

合信编著的化学著作《博物新编》等；欧几里德的名著《几何原本》曾由明代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前六卷，墨海书馆第一次出版了全译本。这些书籍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版，向中国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西学东渐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有些译著的影响还远及东瀛，例如：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从上海传到日本后，被多次翻刻和译刻，日本还出版了《博物新编译解》，竟象过去注释儒家经典一样注解这些汉译西籍，墨海书馆的其他译著也在日本被大量翻印，在日本早期接受西方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①。

1859年，美国传教士又在租界内设立美华书馆，“其时国人竞研科学，美华书馆出版数理之书最多”②。1876年，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采用石印技术印刷宗教用书，这是石印技术最早传入中国。后来又有英国人创办点石斋石印书局，其出版物畅销多年，石印术又从上海传播到武昌、苏州、宁波、杭州、广东等地，甚至远及日本，日本的石印术最早就是从上海传去的。当时上海的印刷物在远东堪称最为精致，上海县志记载客寓上海的著名买办徐润，“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版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诧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③，反映了在西方技术影响下，中西印刷业在上海竞相发展的形势。

在西学传播方面，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室。傅兰雅，英国传教士，1863年来华，1868年受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在此凡28年，先后翻译西文著作129部，为在华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数量最多的一人。1885年，他在上海开设了格致书室，类似于现在的科技书店，专门出售科技

①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第120页。
②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55页。
③ 《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七《游寓》。

图书和期刊。在1886年印行的书单上，共列有371种书籍、地图、图解和地球仪等，其中外国作者写的有175种，中国作者写的有196种。到1888年，格致书室出售的图书，增加到878种，其中外国作者写的有650种。格致书室先后在天津、汉口、汕头、北京、福州、香港、沈阳、烟台、厦门设立了分销处，大量科技书籍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到1888年，即格致书室开办的前三年中，售出的书籍已达15万册。到甲午战争期间，格致书室在全国各分销处的"销售量激增"，究竟激增到多少，惜具体数字不详。日后，上海一家英文报纸评价格致书室"是多年来中国学习的麦加"①，指明了它在西学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二、改良思潮与早期改良派

在抗御列强使命的推动下，在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驱使下，在西学的影响下，上海思想界出现了一股以学西方、变成法、发展工商、改良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维新思潮。

这一思潮自19世纪60年代初年开始出现，其标志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问世。在这部书中，冯桂芬提出了学习西方、制造新式机器、改良政治制度等富有近代气息的改革要求。到70年代，先是郑观应相继写成《救时揭要》、《易言》两书，后是张焕纶提出改革教育、改良政治思想的主张。此出彼起，如响斯应。至80年代到90年代甲午战争以前，改良思想渐趋成熟，出现了《盛世危言》那样影响深远的著作和格致书院青年学生丰富而尖锐的改革议论。综观30多年改良思潮酝酿、发展过程，前后可以冯桂芬、郑观应为主要代表。冯、郑思想留待下面介绍，这里先简述一下不甚

① Shanghai Times，1911年6月21日，转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40页。麦加(Mecca)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它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也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为人所知的张焕纶的改良思想和格致书院学生的改良议论。

张焕纶，上海人，字经甫。1846年出生在上海旧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幼随父识字读书，青年时入上海龙门书院肄业。他不拘于迂腐空疏的义理、考据，而是不断关心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世之学，对地理学 军事学都有深入的研究。1878年 他创立正蒙书院，后改梅溪书院，是为中国近代新式小学教育之嚆矢。1897年，南洋公学创办，聘他为总教习，负责全校教务。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与康有为等维新派接触颇多。

张焕纶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主要活动也在上海。他对列强欺凌、掠夺中国的暴行，对清廷愚昧、落后的识见感受痛切，很早就萌发了雪耻救国和启蒙发聩的思想。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男儿三十不得志，七尺雄心未肯死。臂弓腰矢气昂藏，手缚猛虎如犬豕。即今边塞起风沙，碧眼胡人吹悲笳。文武泄沓酣未醒，辄抚髀肉三嗟呀。"① 他向当时的封疆大吏们提出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诸如广求边才以对付边患频仍的危局；翻译西方律例，教育中国官员，以适应日益纷繁的中外交往。他请求清朝政府，洋务摺子一律发抄，让天下百姓共知共晓，以期群策群力，千万不可让少数人专断其事。1878年，他向即将赴欧洲担任中国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提出，西方富强之本不在"炮械之利"，而在于先进的政治制度。他说："今之论西国者，曰财货之雄、炮械之利而已，岂知西国制胜之本不在富强，其君民相视，上下一体，实有暗合儒者之言，则其为政教，必有斐然可观者。"② 这里所说的"君民相视，上下一体"，实际就是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这表明张焕纶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中国只学西方船炮技术，不学政治制度是舍本逐末。同时，张焕纶还提出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说："国家盛衰，系乎风俗、人才，而风俗、人才尤急于蒙养。西国孩童皆有书院，犹得古者小学之意"，中国不如先

① 张焕纶：《冬猎行》，《自有乐地吟草》。

② 见《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一。

在通商各埠设蒙养书院，吸取西人之法教育孩童，以后再逐步推广，“教者政之本，教成则政立矣”。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启蒙教育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实行季课，聘沿海各地关心时务的官绅出题，学生依题作文，1889年起增设由南北洋大臣命题的春秋两季特课。所命之题，多关科学与时务。从现存的1886年至1894年的《格致书院课艺》来看，共77题，其中关于富强之术、政治刑律的有28题，占1/3以上，如《中国近日讲求富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议院论》、《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等，学生们在课艺中抒发了改变中国贫弱处境的种种设想。

学生们竭力赞成中国兴办各种近代企业，诸如纺织、缫丝、采煤、冶铁、机器、铁路、邮电等，但反对用封建官场的一套程式与方法去经营近代企业，对官督商办的批评尤烈。他们说，中国企业虽然也有公司之名，但权力仍在官僚之手，“位尊而权重者，专擅其事；位卑而权轻者，不得而问”，所谓总办，多以二、三品大员充任，企业之内，“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官有权而商无权，到头来，营业不振，危害匪浅。他们认为，应仿照西人之法，总办由董事选举产生，董事由股东中选举产生，“删除一切官派，全以商贾之道行之，亦全以民主之权行之，不称局而称公司，不问官阶但问本领”。他们提出，为适应工商业的发展，在中央应分户部之半设立商部；在各大埠设通商公会，维护工商者利益。

学生们猛烈攻击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他们说：“我中国幅员之广、物产之饶、人民之众，甲于五大洲，然而地利不能尽，国用不能充，弊政不能革，刑罚不能简，民困不能苏，国威不能振。下有贤才，不能遽用；上有庸佞，不能遽退”，造成这些弊病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君臣人民不如西方，而是政治制度不如人，“上下之情隔焉故也”。他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改君主专制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度。中国如果开设议院，一利尽地利，二利筹国用，三利除弊

政，四利简刑罚，五利苏民困，六利振国威，七利举贤才，退庸佞。总之，议院一开，百废可兴，百弊可除。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迷信议院制度，但在那专制高压的年代，能够如此为资产阶级议院制度大唱颂歌，这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青年学生还对当时思想界已经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对议院制度的种种非难，诸如设议院后君无权、民有权，容易倒行逆施；设议院是用夷变夏；中国幅员广阔，虽开议院亦难通下情等，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青年学生的议院有益无害论，虽然不无简单、偏激之处，但其鲜明的民主色彩则是时人少有企及的。格致书院监院王韬和出《议院论》课题的郑观应看了学生们的议院论后，大加赞赏，认为"确有见地"，许象枢、杨史彬、陈翼为的课艺被评为超等第一、二、三名。学生们的有些见解，还被郑观应等人吸收到自己的著述中。

冯桂芬是江苏吴县人，字林一，号景亭。1809年出生，道光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他逃到上海，入李鸿章幕。他是林则徐的学生，思想颇受其师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他目睹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上百弊丛生，乃不顾疾病缠身，不畏时论攻击，毅然于1861年写下了《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设想。

"抗议"二字，据冯桂芬解释，是沿用汉人的古语，意为"位卑言高"。全书40篇，其重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变官制，汰冗员。冯桂芬认为，当时中国在官制方面主要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官员全部由上级任免，二是冗员太多。因此，他写了《公黜陟议》、《汰冗员议》等文章。

冯桂芬建议，将会推和保举官员的权力下移，无论京官还是地方官，都先从较低层中选举，供上级提用，以得票多少为先后，未被选举者不得任用；对各官的考核，也以下层人们拥护与否为准。这与当时清廷实行的专制统治有很大不同，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从众原则颇有相通之处。

对于冗员，冯桂芬认为有的可以全裁，有的可以合并，有的可以酌裁。员多以至于"冗"，是专制政权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汰冗员是近代改良派普遍议论、反复提出的问题，冯桂芬是注意此问题较早的一位。

二、复乡职，复陈诗。冯桂芬在《复乡职议》、《复陈诗议》等文章中指出，清代治民之官颇少，这很不利于民情上达。他主张，仿效古代办法，在知县与百姓之间，设一似官非官的乡董。这些乡董负责处理民间争讼，帮助征收赋税。乡董的任期，全部3年一易，表现好的、有功劳的，可以举荐升擢，不称职的可以随时罢免。冯桂芬又主张，鼓励民间用《竹枝词》一类通俗的诗歌，表达自己对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意见，反映自己的苦情。

三、制洋器，采西学。到19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强迫清政府对外开放了16个通商口岸，外国公使已获得驻京许可，西人来华，络绎不绝，至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已有外国人2757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亦已为不少中国有识之士公认，但就整个中国来说，对西方还处于无知的境地，相当一些人夜郎自大，盲目排斥西方的一切。鉴此，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特地写了《制洋器议》、《采西学议》，大声疾呼学习西方一切有用的东西。冯桂芬认为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说到了点子上。

冯桂芬主张先从学习西方船炮入手，可以在通商各口设立船炮局，请几个洋人，招选一些聪明善思的中国人学习其法，然后教给工匠，命工匠仿造。除此之外，还可先在广东、上海设置翻译公所，遴选颖悟幼童，提供膳宿，聘请西人教他们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冯桂芬的这些改良思想，据他自己说，有的是参酌古制，加上自己想法；有的是"譬以夷说"，即参照了西人的学说。《校邠庐抗议》稿本寄给曾国藩后，京师、长沙等处很多人借去传钞。曾国藩阅后，击节赞赏，认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事实上，他的

很多设想在后来被付诸实施或部分成为现实了，如兴办船炮局、办外语学校、改革官制等，有些思想在以后其他改良派那里得到了发展。直到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还曾命令将《校邠庐抗议》印刷给百官，询问何者可以实行，何者不宜实行。

郑观应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1842年出生在颇得西方风气之先的广东香山（今中山县）。自幼随父习诵儒书，1858年奉父命到上海学商，以后长时期生活在上海，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当买办，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并在好几个企业中投资。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痛恨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歆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痛心于中国的积贫积弱、专制愚昧。他为此常常坐卧不安，寝食俱废，酒酣耳热之际，每每举杯问天，拔剑斫地。郑观应从60年代起，开始撰写时论，1873年结集出版，书名《救时揭要》。全书收文24篇。在书中，郑观应谴责了殖民主义者招买华工、虐待华工的行径，提出了禁止鸦片的具体设想，还提出了发展中国新式航运业、由商民自办轮船的主张。

1875年，郑观应基本写成《易言》一书，以后续有增订，1880年出版，全书36篇，郑观应自称主要讲“自强之道”。

《易言》是19世纪70—80年代影响最大的变法著作之一。早期改良派王韬认为此书揭弊痛彻，指路有方，词畅不繁，意显不晦，真乃“救时之药石”。1887年，有人将此书翻印，易名为《洋务抉要》，可谓揭明了此书的真谛。

1885年以后，鉴于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边疆危机的加深，随着认识的深化，郑观应又写了著名的《盛世危言》。这部书1892年写成，以后又续有增订。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除了重申《易言》已经提出的变法主张，还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发展工商，进行商战。郑观应看到，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传统的以侵占土地为主要目标的侵略方式不同，他们主要通

过经商，吸吮膏血。他认为这种侵略方式比明火执仗的强盗式的侵略还要狠毒，因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敌国无形”。郑观应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所谓商战，就是商品竞争。他认为，要提高中国商品的竞争能力，首先必须发展中国工业，生产出量多质好价廉的商品；其次，必须使中国商品与洋货在税收方面平等，取消外国商品低税的特权；再次，中国必须不断改进制造工艺，应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制造技术、先进的机器，还要自制机器，不能光靠从外国进口。

二、兴办学校，培育人才。郑观应认为，要变法，就要有大量新式人才，而要有此人才，关键一条在于兴办学校，因为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他大略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和日本办学育才的情况，认为中国应该参考他们的做法，大力开办各类新式学校，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学生除了学习中国传统学问，更要学习各种自然科学。学生学成，国家给予功名，予以录用，并且鼓励学生到外国留学。郑观应还提出了设工艺院的设想，主张院中开设制造、织布、缝纫等课，让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入内学习，使他们各学一艺，藉以谋生。郑观应满怀希望地指出，各类学校开办起来，则中国人才越来越多，到那时，“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①

三、开设议院，改良政治。郑观应认为，议院制度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西方国家所以比中国富强，最根本一条，就是他们实行了议院制度。对于挨欺被打的中国来说，议院制度还是御侮救国的良方。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② 在甲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

午战争以前，将开议院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来认识的，郑观应是第一人。郑观应宣传开议院的重要性，不但写进书里，而且到处鼓吹。1893年，他在上海格致书院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就是《议院论》，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

《盛世危言》问世以后，在思想界影响很大，倍受称誉，有人认为此书"针膏肓而起风痹，震痴聋而启昏愦，则此编实医国之灵枢金匮也"①。1895年，此书被送到光绪皇帝那里，光绪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臣僚们阅读。以后，民间书坊竞相私刻翻印，版本不下20来种。郑观应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里说：《盛世危言》问世后，"当世阅者称其详晰，无美不收，销场甚畅，大为书市获利。查各处翻刻约已销一万五千余部"②。20世纪初年，有人将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40年社会思潮概括为依次递嬗的六种世风，第三种就是用《盛世危言》命名的"盛世危言之世风"，由此亦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上海——孕育改良思想的温床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潮酝酿、发展史上，上海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查一查戊戌变法以前改良派思想家，不难发现，他们脑中改良思想的形成，与上海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冯桂芬、郑观应、张焕纶在前文已经述及，不赘论，且看一看其他人：

王韬，是与郑观应齐名的早期改良派，他本是江苏长洲（今吴县）人。1849年，21岁时来到上海，进入英国教会办的墨海印书局作编辑，开始接触西人西学。13年后，他因故离上海赴香港，1874年在港创办《循环日报》，大力宣传改良思想，1884年重返上海，两

① 吴广霈：《〈盛世危言〉跋》。

②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978页。

年后主持格致书院，直到 1897 年逝世。王韬前后共在上海生活了 26 年，他的改良思想就是在上海逐渐萌发的。他原先所读之书，“不过经史诸子与历朝诸君子文”，所立之志，不过“刻意嗜古，有心著作”，到上海后，震于西人之强盛，产生了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的思想。

宋恕，是早期改良派中独具特色的思想家，宣传全面学习西方，主张从官制到服饰都以西方为楷模。他的改良思想，是在读了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所译西书以后受到启发而产生的。1891 年，他始居上海，在此写了他的名著《六斋卑议》，以后居上海多年，曾在上海求志书院襄阅课卷。

钟天纬，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熟知的早期改良派，他在宣传西学、改革教育方面都很有贡献，在甲午战争期间曾与经元善等人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他本人是上海人（籍贯华亭，即今松江），广方言馆的学生，很长时间在上海工作。

其他具有改良思想的人也有不少与上海有关系，如在 1884 年就提出开设议院的张树声，曾任两江总督，管理过上海。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全面学习西方的郭嵩焘，在 1856 年就到过上海，对于英国人在上海租界的经营情形大为惊奇，并从此注意研究西方。著名的早期改良派薛福成，不但曾为格致书院学生出题，而且十分重视上海所出西书。他在 1890 年奉命出使欧洲之前，曾认真搜集、研究江南制造局所出西书。

戊戌变法中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想形成也与上海有一定关系。康有为自述，他 1879 年开始认识到西方“治国有法度”，并非夷狄之类，原因之一是读了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1882 年，他乡试返粤，途经上海，见“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于是大购西书而回，“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第二年，他购置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①。梁启超自

述，他1890年18岁入京会试，“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②。

上述这些人改良思想的酝酿、形成，之所以都与上海有一定关系，这是因为：

第一，上海是当时中国传播西学的主要基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介绍西学的机构主要有三个（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上海占了两个，而且就规模而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都远较京师同文馆为大。此外，上海设有众多的传播西学的学校。这一格局，使得上海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基地。

第二，上海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物质文明的最大窗口。当时外国在中国虽然设了众多租界，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上海。英、美、法等国殖民主义者在这里建房、筑路、设厂，设置管理机构，把西方一套搬了过来。无缘涉足西方的中国人，从上海租界那些高耸的楼房，整洁的马路，轰鸣的机器，炽亮的电灯，看到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胜于雄辩的事实，有力地涤荡了视西人为夷狄的传统偏见，使人们认识到西方很多地方较中国进步。这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学习西方的思想，也为人们学习西方提供了一个可供模仿的橱窗。

第三，上海汇集了一大批热心西学的知识分子。除了前面叙及的一些知名的改良派生活在这里，著名科学家华蘅芳、徐寿、华世芳、徐建寅等人也在这里，不少有心介绍西学的传教士也在这里，如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这使得上海出现了其他地方都没有的西学人才群。这些人才，担负着教育、翻译、报刊、出版等不同工作，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对于广大爱国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具有很大吸引力。格致书院出题课艺，应试者遍及江

①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6页。

②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4页。

苏(包括上海)、浙江、广东、安徽、天津、福建、直隶、湖南、河南、山东等处,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样,那些生活在上海的爱国之士,由于长期受西学熏陶,比较容易成为热心西学、系统宣传西学的改良派,如郑观应;原来不在上海的,来到或经过上海,也受到这里新学空气的感染,转而吸收西学,逐渐成为改良派,如康有为;原来不在上海也无缘来到上海的,亦能通过阅读上海出版的报刊、书籍,受到西学影响。同盟会会员曹亚伯曾生动地记述过这种影响:

> 旋张(长善)示予一书,名曰《格物探源》,乃上海广学会所译。予生长于极闭塞之兴国州崇山中,见此新书,极其快意,欲借一读,张故靳而不与。予强借,顿悟守旧之非,即入大冶县福音堂为信徒。于是家庭革命、社会革命之思想,日往复于胸中,不顾自身之一切,时与旧习惯相抗矣。①

在特殊的政治格局中,西学的大量传播,使得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孕育改良思想的温床。

---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

第十章　维新宣传的中心

1895到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在全国主要有三大基地：北京、上海、湖南。变法策源地在北京，新政活跃点在湖南，舆论宣传中心则在上海。

一、维新报刊畅行 学会大盛

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政府再次惨败，1895年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失地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在前此的半个世纪里，中国虽然已屡被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打败，但那是世所公认的强国，对于日本，中国朝野虽对其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刮目相看，但总以为这个"蕞尔岛国"不是"天朝大国"的对手，不能构成对中国的威胁。战争的结局如此出人意外，使得中国的积弱更加彻底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等大片领土，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同意日本资本家在中国自由设厂投资。这样，俄、德、英、法等国，势必援引以往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竞相效尤，扩张在华势力。瓜分豆剖，这种危如累卵的形势威胁着中国。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人们的空前觉醒。1895年5月，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清朝政府拒签《马关条约》，迁都西安，加紧练兵，变法图强。要求虽未达到，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则由此正式开幕。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刊载中外新闻，发表时事

评论。同月，他与帝党领袖文廷式等发起组织强学会，主张通过集会演说，购置西书讲求西学等方式，鼓动变法。这种以办报刊、兴学会为主要形式的宣传，很快在湖南、两广等地推广开来，上海发展尤为迅猛。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到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了近40种报刊，其中27种都是在上海发行的。它们是：《强学报》《时务报》《苏报》《指南报》《通学报》《农学报》《集成报》《富强报》《萃报》《实学报》《新学报》《算学报》《求是报》《蒙学报》《演义白话报》《译书公会报》《游戏报》《笑报》《采风报》《华报》《苏海汇报》《画报》《中外博闻报》《格致新报》《时务日报》《工商学报》《昌言报》。全国有50个学会成立，在上海的有8个，它们是上海强学会、算学会、农学会、蒙学公会、不缠足会、戒鸦片会、译书公会、医学善会。可谓报刊蜂起，学会林立，极一时之盛。

报刊和学会所以一时会在上海如此繁盛，首先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努力的结果。康有为等人认为，要救国就要造就人才，要造就人才就要讲求学术，要讲求学术就要"合群"，使人们联为一体，而"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合千万人之群的最好办法就是兴学会，创报刊，办学校。上海，是南北总汇之区，学子走集之所，又有着丰富的中外图书器艺，正是合群和讲求自强之学的理想地区。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十分重视在上海构建舆论基地。其次，上海有一个规模颇为可观的外国租界存在，清廷对这里的控制能力较他处薄弱，文网较宽，这正是维新宣传的良好条件。再次，上海地区文化发达，文化人比较集中，印刷出版能力远较他处为强，这也是学会、报刊得以盛行的重要因素。

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　京师强学会成立以后，康有为于1895年11月抵达上海，筹划成立上海强学会，以与京师强学会相呼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捐银1500两为开办经费，江西人邹凌瀚

捐银500两、申洋600余元，上海其他官绅亦有捐助。次年1月，上海强学会在王家沙正式成立①，制订了《上海强学会章程》。活跃于江浙的维新名士及很多名儒硕彦相率入会，有康有为、张謇、黄遵宪、章太炎、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汪康年、邹代钧、屠仁守、梁鼎芬、蒯光典、陈三立、岑春煊、沈瑜庆、龙泽厚、左季同、周化钧、乔树楠等。《上海强学会章程》揭明立会宗旨："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任务有四项：一、译印图书，讲求西学，以广见闻，去塞求通；二、刊布报纸，报道中外新闻，以广学识；三、设图书馆，广购中外图书，以备考镜研求；四、开博物院，置办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声光化电各式仪器资料，以益智慧。章程规定了入会条件、入会手续和会员义务，并表示如果条件允许，强学会将立学堂以教人才，创讲堂以传孔教，派游历以查矿藏、考民俗，设养贫院以收乞丐，教工艺。

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会开始出版机关报《强学报》。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继《中外纪闻》之后创办的另一份报纸，也是上海的第一份维新派报纸。《强学报》由康有为的两个弟子徐勤和何树龄主编，上海强学会书局铅字排印，似为五日刊，登载中国时务，兼译外国新闻，宗旨为"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创刊号上发表了康有为的《强学会后序》，揭明创办强学会的指导思想，呼吁国内通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踊跃入会。《强学报》还刊文批评弊政，宣传变法。

《强学报》以孔子纪年，一改以帝王年号纪年的传统作法，这既是为了适应当时改良派乐道的保国保种保教（保孔教）的宣传，也是对以帝王为中心的专制统治的不敬。这一做法，是善窥风向、反对民主的张之洞所不能容许的。所以，《强学报》刚出三期，就被张

① 有些论著将上海强学会称为"强学会上海分会"，不妥，因为上海强学会与京师强学会是并列的，无隶属关系。《上海强学会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本会"总会立于上海，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事实上，它的成员也不限于上海，而遍于江、浙、皖、赣、川、湘、桂等省。

之洞下令封禁了。几乎与此同时，京师强学会遭到顽固派的弹劾，"罪名"是"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被朝廷禁止。维新形势进入暂时的低潮，上海强学会也风流云散。

农学会与《农学报》　农学会亦称务农会，创办于1896年12月，发起人有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蒋黻。他们认为，"农学为富国之本"，然而中国已久远不讲农学，为了"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于是创设此会。他们所谓的农学，主要包括：农、圃、林、泽（水产物及取水藻为肥料之类）、畜牧（包括饲养六畜及养鱼、育蚕、养蜂等）、酿造（造酒、制糖、纺棉、剥麻、刻漆、熬樟脑、作染料等），实际上包括了今天通常所说的农林牧副渔的所有内容。创办之初，农学会曾设想做这么一些事：（一）筹款开辟荒田，作为学会公产，以备进行农业实验、兴办学堂使用。开荒之前，先在江浙地方购田试办。（二）创办农学报，译载各国农书农报。（三）采用西方新式办法，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四）研究、仿造西方新式农具。（五）设售谷所、验蚕种等处，推广粮食、桑蚕、家畜的优良品种。（六）开办务农学堂，研求农学。这些设想，后来有的实现了，如办报、译书，有的没能实现。

农学会于1897年5月发刊了机关报《农学报》，时人也称之《农会报》，这是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初为半月刊，第二年改为旬刊，共出315期，到1906年1月停刊。主办人仍为罗振玉、朱祖荣等人。栏目有"各省农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农会博议"等，东、西报选译内容均与农学有关，此外还有农学专著、专论连载、农学会会务报道等。

《农学报》的出版，得到了当时维新人士的普遍支持。创刊号开首一篇，就是梁启超为《农学报》写的序言。序言强调了研究农学、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认为要救国，就要发展工商，而要发展工商，就非要发展农业不可，"商务赢绌之率，则恒视出口土货之多寡为差。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

而养其指趾，虽有圣药，终必溃裂"①。序言盛赞农学会创办人志愿宏大，可钦可佩。在"农会博议"一栏里，张謇、马良、汤寿潜、叶瀚、陈虬、陈炽等人均有支持农学会或议论农学的文章发表，谭嗣同还将他的《浏阳麻利述》长文付诸连载。

《农学报》译载了大量的东西方农学专著，诸如日本稻垣乙丙的《农学入门》，英国康发达的《蚕务条陈》，法国蓝涉尔芒的《农具图说》，荷兰佛里寺省牧牛公司的《荷兰牧牛篇》，美国啤耳的《厩肥篇》等。《农学报》发表了很多中国学者的农学论著，如朱祖荣的《蚕桑问答》、张寿语的《农学论》、汪曰桢的《湖蚕述》等。《农学报》还发表了不少地区的物产表、农副牧业发展近况。这样，它既大量、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及日本的农业科学技术，又提供了国内各地的农业信息，这在当时以农立国的中国来说，有着重大的实用意义，这使得倡导改革的维新派和那些虽反对政治上改制、但希望中国富强的一般士大夫，都对之热烈欢迎。所以，《农学报》出刊以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欢迎。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浙江巡抚、安徽巡抚、杭州知府、江宁知府、顺天府尹、保定知县、清苑知县等，先后札饬所属地区购阅《农学报》并分给各书院。一时间，研究农学蔚成风气，很多地方成立了农学会支会或类似于农学会的组织，如浙江瑞安成立了农学会支会，苏州成立了农学会，梧州成立了务农社，江西成立了劝农会。由于农学会和《农学报》注重于农业科技的介绍、研究，政治色彩不象强学会、《时务报》那么强烈，所以，戊戌政变发生以后，农学会、《农学报》并没有遭到什么不测。

不缠足会　不缠足会创办于 1897 年 6 月 30 日，发起人有梁启超、汪康年、邹凌瀚、张通典、吴樵、谭嗣同、龙泽厚、赖振寰、康广仁、张寿波、麦孟华。会址初设时务报馆内，后移大同

① 梁启超：《农会报序》，《戊戌变法》第四册，第 537 页。

译书局。

缠足陋习，自宋以后，谬种沿袭，愈演愈烈，成为压迫广大妇女的残酷枷锁。嘉庆、道光年间，具有启蒙思想的李汝珍和俞正燮分别在《镜花缘》和《癸巳类稿》等书中，对此发出猛烈的抨击，然而在社会上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缠者自缠，三寸金莲仍被视为妇女形体美的重要标志。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妇女缠足愈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加之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传入，优生知识的介绍，反对妇女缠足自然成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紧要课题，也构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宋恕等人对此都有专文批评，康有为更是很早就进行了反对妇女缠足的实际努力。1883年，他在老家广东南海就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制订会章条例，动员亲友入会，倡议妇女不缠足。1895年，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在广州再度提倡妇女不缠足，成立粤中不缠足会。上海不缠足会正是在此影响下成立的。

据梁启超等人所拟的《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上海不缠足会是全国性的组织，总会设在上海，各省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可酌设小分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之女子不得缠足；所生之男子不得娶缠足女子；已缠足的女子八岁以下者须一律放解；会员所捐之款，除用于会务，其他剩余部分，拟用于设女学堂，设妇孺报馆、妇婴医院、恤嫠局等妇婴福利事业。《章程》所以特别强调不缠足女子的婚配问题，因为创办者考虑到，“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作此规定，可使会中同志互通婚姻，无所顾虑，从而将不缠足推广开去，革除缠足陋习。

不缠足会初创之时，会务由汪诒年代理，移至大同译书局后，由康广仁代理。据汪诒年记载，不缠足会创办以后，张之洞“特为作序以重其事。其时各处士流致函会中表示赞成或条列疑义相与磋商者，几乎日有数起。至于开列姓名请为隶名会籍，或且以劝导为己任愿列于会董者，尤不可数计。会务之发达，真有不崇朝而遍

远近之概”①。几个月内，湖南与潮州、福州、嘉定等地均有不缠足会出现。戊戌政变以后，兼办会务的大同译书局被封闭，不缠足会也停止了活动，各种册籍均散失无存。

译书公会与《译书公会报》　译书公会创立于1897年，创办人为董康、赵元益、恽积勋、恽毓麟、陶湘等，会址在上海新马路，以采译西方及日本各种切用书籍为主，意在“开民智，广见闻”。②“挽回风气，富国保民”③。公会集股20份，每份500两，延请总理1人，协理1人，英、法、德、日文翻译数人，另延一些校对、抄写人员。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译书团体。同年10月，译书公会发刊《译书公会报》，周刊，共出20期，1898年5月停刊，由恽积勋、陶湘等主持，章太炎、杨模任主笔。辟有西报选译、东报选译、法报选译、德报选译、译书连载等栏目，间或发表一些中国学者的论著。选译的报纸，主要有英国的《泰晤士报》《律例报》《东方报》，法国的《勒当报》《法国权报》《中法新汇报》，美国的《自立报》《纽约报》《铁路报》，德国的《东方报》，日本的《东京朝日报》《大坂朝日报》《时事新报》等。英文翻译有沈晋熙、胡浚谟、张国珍、胡惟志、张书绅、陈佩常、施仁耀等，法文翻译有吴宗濂、周传谋、潘彦，日文翻译为日本人安藤虎雄。译出书籍有译自法文的《增订五洲通志》《东游随笔》，译自英文的《交涉纪事本末》《中日构兵纪》《拿破仑失国记》《五洲舆地图考》《泰西志林》《英民史略》《延寿新法》，译自日文的《今世海军》。

蒙学公会与《蒙学报》　蒙学公会创立于1897年，发起人为叶瀚、曾广铨、汪康年等，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儿童教育问题的团体。他们的出发点是：要救国变法必须求才，要求才必须兴学校，兴学校必须重视儿童教育，因为已经成人的士大夫们，接受封建教育年

①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六，第5页。

② 《译书公会报·启事》。

③ 《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60页。

深月久，“本根已坏”，对他们教育已很困难，“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岁以下之童子乎？”因此，儿童教育问题关系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不可不重视。公会本拟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一、立会，“连天下心志，使归于群”；二、办报；三、编书，译编浅显通俗的儿童教科书；四、创办儿童师范学校。四者之中，“先以书报为起点，而以会学为归宿”①。后来实际的努力，亦主要在编书办报。公会会员分为三种：一是议事之会友，负责定章编书之事；二是捐助之会友，负责集资垫款，购赠书器等事；三是议事、捐助二者兼为。蒙学公会于创办同年十一月发刊《蒙学报》，由叶瀚等负责，周刊，全用白话文。《蒙学报》是儿童启蒙读物，将青少年幼儿分为四个阶段，5至7岁、8至12岁、13至18岁、18岁以上各为一个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实施教育。内容有幼儿训育、少儿师范教育、妇学、东西各国报章选译等，并刊有图说。

《演义白话报》创刊于1897年，创办人为章伯初、章仲和兄弟。章仲和是梁启超学生，梁启超曾为此报和《蒙学报》作《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蒙学报》与《演义白话报》都是中国近代最早白话文刊物，它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启民智的思想指导下创办起来的，此后几年，白话文报刊纷呈迭出，如《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等，不下十几种，这与《演义白话报》影响不无关系。《通学报》创办于1897年2月，任独编辑，初为旬刊，后改月刊，是中国第一份专门研究外国语的刊物，内容有关于英语与世界语，分历史、地理、理化等学科，由浅入深，性质如同函授讲义。6年后停刊。《集成报》创刊于1897年5月，创办人为陈念劬，旬刊。《萃报》创刊于1897年8月，创办人为朱克柔，周刊。二报均是中国最早的文摘性刊物，文章摘自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各种中外报刊。《指南报》创刊于1896年，由李伯元创办，《汕

① 《蒙学公会公启》，《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58页。

戏报》《笑报》《采风报》均创刊于1897年，由李伯元、吴趼人等创办，四报都是文艺刊物，“大抵记叙官场的笑柄、社会的趣事，以及歌楼舞榭、妓院娼寮、茶肆酒馆的新闻。其行文也，皆以诙谐讽刺之笔，痛快淋漓地揭露真象，隐去姓名，意在加以箴规，促其悔改”①。

二、《时务报》崛起一时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创立的众多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

创办　1896年1月北京、上海两地强学会被禁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斗志不屈，决心继续进行维新宣传。黄遵宪、吴德潇（季清）、邹凌瀚、汪康年和梁启超等人经过筹商，决定利用上海强学会余款1200两（其中原余银700余两、租赁房屋退金350元、器物图书变卖钱200余元）、黄遵宪自捐1000元、邹凌瀚自捐500元，共2000多两，创办一份宣传变法维新的报纸，这就是《时务报》。

《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创刊，为旬刊，报馆设在公共租界内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梁启超主笔，汪康年经理馆务，另聘张坤德为英文翻译，古城贞吉为日文翻译，郭家骥为法文翻译。参加笔政的尚有麦孟华、章太炎、徐勤、欧榘甲等，王国维也曾在这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书记员。诸人当中，办报之功首推梁启超，“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

① 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第296页。

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①。《时务报》出版69册以后，由于张之洞等人的干涉，以及办报人汪康年、梁启超之间的龃龉，汪康年排走梁启超，于1898年8月17日停刊《时务报》，改办《昌言报》。

内容　《时务报》设有论说、谕旨恭录、奏摺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译者连载等栏目，宗旨是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重要文章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麦孟华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徐勤的《中国除害议》、欧榘甲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严复的《辟韩》、赵而霖的《开议院论》等。主要内容有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反对泥古守旧，疾呼变法维新。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以梁启超《变法通议》中的《自叙》和《论不变法之害》讲得最为透彻。文章从自然界的昼夜递嬗、寒往暑来讲到人类的进化发展，从古代中国各种制度的演变，讲到当今世界各国的盛衰兴替，指出变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古今之通例，天下之公理。文章认为，变有主动的变，有被动的变；有进化的变，也有退化的变；弱国可以变成强国，强国也可以变成弱国；独立国家可以变为殖民地，殖民地也可以变为独立国家。一个国家究竟朝什么方向变，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是否顺应世界潮流，奋发图强，主动进行变法。文章列举中国种种衰败腐朽状况，指出中国如果不振奋起来，主动变法，就会沿着败弱之路变下去，变为不堪设想的殖民地。

要变法，就要廓清阻碍变法的偏见和谬说。文章针对所谓当今成法乃三祖八宗所遗，不可变法；变法势必导致“用夷变夏”；中西国情不同，西法不适于中国；中国正值穷蹙之日无力变法等说法，一一进行了驳斥和剖析，指出中国舍变法别无他路可走。文章

①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第四册，第526页。

写道：

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闭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①。

第二，批判蒙昧主义，主张变科举，开学校。变法怎么变？《时务报》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时务报》很多文章都指出封建蒙昧主义对人才的摧残和毒害。徐勤在《中国除害议》中列数中国存在十三大害，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封建蒙昧主义范围的，诸如：无学为害、忘国为害、蔽塞为害、愚瞽为害、束缚为害、虚骄为害等。维新派特别着重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认为"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②，科举考试不能培养人才，只能培养奴才、败坏人才。由于科举制度数百年的积习，中国被搞得一片愚昧，"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③。他们认为，如果要"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④。

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广开学校，自京师至州县，分别开设大学、小学、女学、幼学等各类新式学校，"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同时开办政务学堂，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校的教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指政治学说；艺学，指科学技术。

第三，抨击专制主义，要求兴民权，开议院。维新派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出发，猛烈地攻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他们认为，中国所以积贫积弱，病根就在封建专制："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至亿姓，游

---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时务报》第二册。

②③ 徐勤：《中国除害议》，《时务报》第四十四册。

④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

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①。他们说，君主和人民是本于“通功易事”的原则而确立的一种契约关系，君主本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拿出布米粟丝等一部分劳动所得养活他，是要他为人民排解纠纷，兴利除害。君主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就是失职，人民完全有权废之另立。

维新派认为，要根治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兴民权、开议院，“中国名分素严，而政治仍多隔阂，若不急开议院，则上下之情不通，即门户之见不化，又安望有富强之一日耶？”②为了给中国开议院寻找依据，他们宣称，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他们援引《周易》、《尚书》和《孟子》等书中的一些片言只语，证明中国古代就有类似于议院的制度，这个制度后来被专制君主取消了。他们一再强调，变法如果不从开议院这个根本出发，那么到头来势必一事无成。

此外，《时务报》的很多文章，如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汪康年的《商战论》《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麦孟华的《公司》等文，都谈到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光练兵制造武器不行，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开工厂，办公司。他们要求国家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他们呼吁民族工商业联合起来，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时务报》连载的译著中，以黎汝谦、蔡国昭翻译的《华盛顿传》最为著名，这一传记连载了十一册（第一至十一册），是中国第一次较为详细地介绍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生平。

影响　《时务报》的文章宣传变法，反对守旧，态度鲜明，议

---

① 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② 赵而霖：《开议院论》，《时务报》第五十三册。

论透彻，而且文笔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也有少量比较古奥的，如章太炎的两篇文章），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时务报》初创时，每期销售4000份左右，半年后增加到7000份，一年后遽增到12000份，创当时报刊发行量最高纪录。时人称赞它“议论精审”，“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瞿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①。尤其是那些正在苦闷中寻求救国真理的知识分子更是甘之如饴。鲁迅回忆他早年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情形时写道：

> 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②

这《华盛顿论》的题目，大概是受到《时务报》连载的《华盛顿》影响而出的。

《时务报》风行一时，主笔梁启超也因之名扬海内。一个并不赞成维新的人记载说，当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③。二十多年后，严复还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任公文笔原是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④。

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全国各种宣传变法的报刊相继创办，其在上海的前文已述，外地著名的有《国闻报》、《湘学报》、《湘报》、《知新报》等，有的刊物公开地以步《时务报》后尘为荣耀，如《知新报》最初拟名为《广时务报》，其义之一为推广《时务报》的宗旨，之二为广东时务报。

《时务报》饮誉于世，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也成为上海和各地

---

① 汪恩至：《时务报书后》，转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83页。

② 鲁迅：《朝华夕拾·琐记》。

③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7页。

④ 严复：《致熊纯如》，《学衡》第十二期。

维新人士的集散地。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多次记录他到时务报馆会见各地维新志士、阅读维新报刊的情况。不少学会的联络点最初便设在这里，如农学会、不缠足会等。就时局、变法等问题来信来访的更是络绎不绝，为此，时务报馆曾规定每天下午三点为接待时间，"如有要事，尽可立谈数语"。社会各界也给《时务报》以很大支持，《时务报》创刊半年，便收到捐款 13000 元，两年内累计20000余元。

当然，对《时务报》的宣传，也有人表示不满和反对，这就是封建顽固派和假维新派。例如，徐勤的《中国除害议》猛烈攻击科举制度，与张之洞思想相抵触，梁鼎芬便秉承张之洞意旨，致书汪康年说："徐文太悍，直诋南皮（张之洞，南皮人——引者），何以听之！"在他们的干涉下，全文未连载完即中辍。再如，《时务报》第二十三册转载了严复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名作《辟韩》，谭嗣同见后，连声称赞"好极"，张之洞阅后大为不满，亲自写了《辨〈辟韩〉书》一文，托屠仁守之名发表出来。文中攻击严复"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非为是，文字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①。

维新派的称颂，顽固派的攻击，反映了同一个实质：《时务报》的变法宣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新式学校举要

创办新式学校是时代的要求。兴学——启蒙——救国，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逻辑，也是他们反复宣传的内容。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以后的几次上书中，多次谈及这个问题。梁启超的名著《变法通议》连"自序"一共十四节，其中八节都是谈的这个

① 《辨〈辟韩〉书》，《时务报》第 30 册。

问题。他的一句名言："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典型地反映了维新派对新式教育的重视。

开办新式学校是维新派再三提出的要求，也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等人所能接受的。它比开设议院拥有广泛得多的社会基础。所以，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新式学校开办了不少，天津中西学堂、南京储才学堂、江南陆师学堂、北京通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杭州中西书院、绍兴中西学堂、长沙时务学堂、京师大学堂相继创办，形成一股开办新学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上海的成绩也颇可观，先后创办了南洋公学、经正女塾、小学堂和东文学社等风姿各异的新式学校。

南洋公学　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创建于1897年，创始人为盛宣怀。

盛宣怀，江苏武进人，字杏荪，号愚斋，1844年出生，1870年入李鸿章幕，颇受器重，1873年以后历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督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督办。盛宣怀经营实业多年，每看到各项实业的兴办、新政的实施，甚至外交、海关等要害部门，都要聘用外人，他总觉不安。他深深地感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和科技人才的匮乏，认识到"兴学树人为当务之急"，于是进行了创办新式教育的努力。1895年，他在津海关道任上，就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1902年改为北洋大学堂），是为中国人自办高等教育之嚆矢。1896年，他又请求在京师、上海各设一所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课以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以备官府选用。同时，他请求在上海筹设南洋公学，由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岁筹经费十万两，不久奉旨允准，并被委为督办。盛宣怀于是进行了南洋公学的筹创工作。

"公学"名称的由来，也是盛宣怀参照国外惯例而定的。当时西方各国如办学经费半由官捐、半由公助者，则为公学，南洋公学的经费由他负责的招商、电报两局筹集，既有官捐，亦有公助之意，故

名公学。

南洋公学校址设在当时尚属偏僻的上海西郊徐家汇北部，1897年4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七日)正式开学。是时，新建校舍尚未落成，乃借校门对面民房上课，到1899年夏，校舍落成后始搬入。公学首任总理何嗣焜，字梅生，江苏武进人，为盛宣怀同乡。首任总教习为张焕纶。作为督办，盛宣怀对公学只抓要事，如审批重大规划、章规及重要报告，余事均放手让何、张处理。大抵学校行政、建置校舍等事由何嗣焜负责，教学之事由张焕纶负责。

南洋公学设有四院，即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创办之初，仅有师范院1班，招生40名。先设师范院，意在造就师资，推广教育。是为中国有师范教育之始。师范院所招学生均为所谓"成材之士"，年龄在20至35岁。这些人于国学素具根底，有些人已是秀才、举人，所以他们入学后一般不再修国学课。学生入学须经严格考试，录取入学后仍不断考核，评定等第，实行淘汰制，不合格者除名。学生不仅不交学费，且享受数量不等的伙食费和奖学金。师范生课程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生毕业后或留校任教，或出洋留学，或从事其他职业。师范院学生日后有成就者颇不乏人，著名的有章宗祥、钮永建、孟森、雷奋等。

南洋公学自1897年秋始设外院，相当于小学，招收120名学生，年龄在10至18岁之间，由师范院中优秀者担任教习。由于这些学生年龄悬殊太大，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入学试读两月后，经过考核，按程度不同分编为4个班级，相当于4个年级。第一班毕业后可递升到中院第四班。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风云人物蔡锷，曾在外院肄业数月。外院课程主要为国文、算术两种。由于当时中国尚无合乎时代要求的教科书，于是由师范生次第编写或迻译，有些教科书一度风行全国，如师范生朱树人编的《蒙学课本》，为全国各地小学所采用，被后人称为"第一本国文教科

书”①。中院始设于1898年春，相当于中学，亦分四班，毕业后升上院。中院课程有国文、外文、数学、史地、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上院相当于大学，其课程自1901年始设。

师范院、外院、中院的学生均寄宿于学校。由于外院学生年幼，学校特聘美国人福开森博士为监院，另选若干名师范生帮助管理。在这位洋监院的管理下，学校纪律极严，早晚均有人巡查，随时随地有师范生手执两尺多长的竹片监视其旁，上课时亦有人在窗外查看，见有不认真者，一一记下，课后罚以面壁，或打手心以示儆戒。学生就寝，有两名师范生值宿，半夜还要查铺。学生遇到师长，必垂手站立，鞠躬行礼。学校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有体育课和军训，并于1899年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这在上海轰动一时，不光市区，就是远郊，乃至苏州都有人专程前往一睹盛况。

此外，南洋公学还在1899年秋开设了译书院，聘张元济为主任，严复翻译的《原富》，就是首先由这里出版的。译书院又附设东文学堂，招生40人，专学日文。1900年北洋大学学生因避战乱来沪就读，南洋公学于是又添设铁路班，是为学校有工程科系之始。1901年又开办特班，目的是培养高级人才，聘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为总教习，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均为此班学生。

经正女学　经正女学创办于1898年，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

创办女子学校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议论、酝酿已久的事。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女教》篇中已有“广立女塾”之议，不缠足会创设时便有开办女学的打算，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亦有一节专论女学问题，但直到1898年，这个议论才通过经元善的努力化为现实。

经元善，浙江上虞人，字莲珊，号亨颐，1840年出生，1857年赴

① 上海通社同人：《事物原始》，《上海研究资料》，第21页。

沪经商，以后长期生活在上海，1881年起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他是一个爱国心很强烈的民族资本家，也是新式教育的有心人，1893年他就在上海城南高昌庙创建了一所经正书院，向学生教授中西各学。经元善认为，光设立普通的学堂，还不能解决中国人才匮乏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学堂或各式书院，都收男不收女，而女子教育意义重大，“有淑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中国欲育人才，谋富强，必先重母教，兴女学。当时上海已有若干女学，如圣玛利亚女校、中西女塾等，但那都是外国教会办的，经元善决定自办一所。他从1897年开始筹办，这年12月，他请了50多位西国妇女，在静安寺路的一个私人花园里，讨论办学计划，草拟了女学堂的简明章程。1898年5月31日，经正女塾正式开学，校址与经正书院一样，也在城南高昌庙。

经正女学初创时，聘提调1人，总管校务；延请中文教习2人，西文教习1人，招收8至15岁的女学生20余人。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夫人被邀请每月访问一次，林乐知的女儿林梅蕊任西文总教习，并兼授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1898年10月底，经正女学又在城区设分塾1所，延请中西教习各1人。翌年初，学生总数增至70余人。学校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如《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女红、图画、医学间日习之；西文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琴学等。

经正女学的创办得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社会上很多其他人士的支持，梁启超、康广仁、严信厚、郑观应、汪康年等人一道参预了女学的创办事宜，先后助资助力的还有谭嗣同、文廷式、张謇、赵凤昌、沈敦和、周舜卿、施子英、朱幼鸿等各界人士50多人。

1900年秋，经元善因反对“己亥立储”，被指名缉拿，逃离上海，经正女塾也随之停办。但兴办女学的风气却在上海吹开了，20世纪初，爱国女学、女子中西医学校、务本女塾、城东女学、宗孟女学

等在上海次第开办。

钟天纬与小学教育　钟天纬，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鹤笙，1840年出生，1872年入上海广方言馆肄业，颇受教习林乐知赏识。1875年应徐建寅之聘赴山东雒口机器局任职，兼为家庭蒙师。1879年随李凤苞出使德国，1881年回国，翌年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甚多。钟天纬是个思想进步的改良派，也是对近代教育颇有贡献的教育家。

钟天纬长期学习、生活在上海，对西方教育内容、方法熟悉，对中国旧式教育弊端洞悉甚深。他认为中国封建私塾的旧式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不科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而这些书"说理深奥，通儒耆宿皓首所不能通者，童子岂能领悟？"方法以记诵为主，不重理解，这只能使幼童"但以记诵为能，而于书中之意义茫然"，达不到教育的真正目的①。于是，他提倡"教授新法"，进行了小学教育改革的努力。1883年，他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书之余，教育儿子、内弟、族弟、表侄、姨甥等读书，便"一以新法教授"，先从识字、讲解入手，而不是从死背经书开始。1896年，他与张焕纶、宋恕、赵颂南、孙仲瑜、胡中巽等人在上海组织申江雅集会，七日一集，讨论改良教育问题。同年，他在盛宣怀的赞助下，在上海城南设三等学堂，继续采用新法施教，一改以往只求记诵、不求理解、违背教学规律的陈旧方法。据说前来就学者初甚观望，后见成效卓著，"负笈者日众"。1898年春，他与朱问渔、戴倜侯、徐伟仁、朱葆元等，在格致书院成立了一个提倡新式教育的兴学会，商议改良教育问题。一个与会者记载一次会议情况：1898年4月23日下午，雨，格致书院，"钟鹤笙大会同志，欲兴中学破蒙新法，诸人列坐静听，使朱君葆元宣说。西国教小儿，自三岁至六岁，所用之法皆寓意于戏具而皆有学问根本，以炼其心思焉。有书以载之，名曰《儿童花园》。

① 火山：《钟天纬》，《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654页。

又述父母教所生婴儿条约，曲折有精理"①。这段材料很重要，它说明钟天纬的教育"新法"，实际上主要是西法。同年，钟天纬筹集经费，进行更大规模的教学改革的试验。他在城南高昌庙地方设立棠荫、董威、湖海、平安四所小学，自编字义、歌谣、喻言、故事、智慧、格言、女鉴、经余、格致、史略、文词、词章共12册教科书，由浅入深，作为初学者的课本，总名为《读书乐》。此外，他还编了《蒙学镜》《教授新法》等书，由书局出版，以推广新式发蒙教育。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新式学校除上所述，还有育才书塾、东文学社等。育才书塾于1896年冬创设，创办人王柳生，初设国文、英语、算术等课程，招收学生24人。此校后来改为上海南洋中学。东文学社创办于1898年，创办人罗振玉。先是，罗振玉因创农学会，办《农学报》需译大量日文资料，乃聘日人藤田丰八为日文翻译，后考虑应培养中国的日文译才，于是在1898年7月在上海新马路之梅福里设立了东文学社。校务由邱于蕃负责，教务由藤田丰八负责，并聘田冈岭云、诸井六郎等任教员。这是上海第一所开设日文课的学校。学社初办，仅有学生6人，后来逐渐增多。1899年5月以人多地隘移至江南制造局前的桂墅里，课程除日文外，还有数学、物理、化学等。王国维是最初六名学生中的一员，他与罗振玉的关系亦由此开始。

四、变法余波——反对"己亥建储"与成立"中国国会"

改革之路向来曲折。1898年9月21日，封建守旧势力的总代表慈禧太后悍然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下令废弃新政，捕拿

①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193页。

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杨深秀等维新六贤惨遭杀戮。无数爱国人士寄予厚望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但是，反动的屠刀并不能斩断维新救国的激流。不屈的人们从百日维新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诚如当时一位维新志士所言："严冬大雪，万物皆白，而后春阳温温，草木勾萌发达；苦雨凄风，连月不开，而后春光融融，山川列锦错绣，维新六君子流血，乃为吾国民苏建国之思想也"①。戊戌政变以后发生在上海的反对"己亥立储"的请愿和"中国国会"的召开，就是资产阶级志士仁人进行维新救国努力的重要活动。

反对"己亥立储"　光绪是一位想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力排众议，毅然下令变法，起用新人，颁布一系列变法诏书。他赢得了一大批维新派的拥戴，被视为中国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首蒙其难。但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并未绝望，因为明显的事实是，慈禧垂老，光绪年轻，未来是属于光绪的。有朝一日这位皇帝亲政，还有可能领导变法。所以，他们不遗余力进行保皇活动。慈禧太后也看到了这一点，感到光绪虽然无权了，但他的存在就是对自己的威胁，不废除这个皇帝，终究不得安宁。

还在戊戌政变以前，慈禧太后就密拟了废立计划。政变后，光绪被囚于瀛台，慈禧曾想加害于他，造出光绪"病重"的舆论，后因英、日等国的干涉，未敢轻动。谋害不成，慈禧决定取消光绪的帝位。戊戌年冬，她密电南方各督抚，探询他们对废立之事的意见，余人多诺诺，独刘坤一谔谔，他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刘坤一是两江总督，与英国联系密切，他的话不能不引起慈禧的重视。废立之事暂寝。但是，听着海外一浪高一浪的保皇声响，慈禧太后又忍不住了。1899 年底，军机大臣荣禄密献计策：建立

① 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戊戌变法》第三册，第 156 页。

大阿哥，“育之宫中，徐篡大统”。慈禧称善。大阿哥即皇太子。清朝前期，雍正皇帝鉴于康熙末年皇子夺嫡倾轧的教训，曾有“永不建储”之谕，此后相沿成例，不立太子。但是此时慈禧太后废帝心切，也顾不得什么祖宗遗训了。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她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于仪銮殿，决定立嘉庆皇帝曾孙、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作为同治帝载淳之子，以废除光绪，并预定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光绪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时值干支已亥年，是以史称“己亥建储”。

立储的诏书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曰：

> 朕以冲龄入承大统，……入继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维，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

上谕发出，海内震动。康有为等在海外发动华侨通电反对，“先后发电者四十六处，一电皆数万千人，多言若果废上另立新主，必皆不认，且必合众讨贼”①。各国驻华公使亦不支持，表示拒绝入贺。立储之谕传到上海，绅商士民大震，到电报局问讯者“户限为穿”。候补知府、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认为光绪皇帝“有志振作”，很不满于废立之举，乃急电在京的盛宣怀，请上言挽回。盛复电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② 经元善气不为馁，于1月2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合上海绅商士民1231人公电北京，反对立储，

① 康有为：《致濮兰德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5页。

② 惜阴：《经莲珊电请收回立大阿哥成命》，《人文月刊》二卷六期。

要求保护光绪皇帝。电称：

总署王爷中堂大人钧鉴：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列名者除经元善外，还有叶瀚、张通典、王季烈、蔡元培、章太炎、唐才常等。

上海反立储请愿，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梁启超主办的、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上海出版的《苏报》、《新闻报》等均发表文章，支持请愿，反对立储，有的文章还号召人们向上海绅商学习。请愿通电发出第二天，上海绅商集会研究反对立储的具体办法，发出公启，呼吁全国工商各界阻止立储，如果朝廷一意孤行，“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在上海请愿的影响下，旅越华侨、湖南旅沪绅商等相继发表联名通电，反对立储。

慈禧太后闻讯，惊恨交集。迫于内外压力，她一方面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废立计划，一方面下令严拿经元善等人。经元善辗转逃到澳门。

这一场立储和反对立储、废皇与保皇之争，实质上是戊戌变法中维新与守旧之争的继续。因为此时，无论在维新派还是守旧派看来，光绪皇帝都是维新的象征，变法的希望。康有为、经元善等人要保的，不是专制守旧之皇，而是开明维新之皇，慈禧、荣禄等要废除的，也不是一般的派系倾轧的首领，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斩断维新之线。然而，这次斗争与戊戌变法中的斗争也有很大不同。这一次反对立储的突发点，就国内而言，不是在北京，而是上海。它表明，戊戌政变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的集结地，已由专制高压的北京，南移到清廷权力难以充分施展、比较自由的上海。

“中国国会”的召开　反对立储的请愿事过不久，义和团反帝烈火在北部中国迅速蔓延开来。1900 年 6 月中旬，英、俄、美、日、德、意、法、奥 8 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进行武装干涉。慈禧太后掌握实权的清朝政府被迫宣战。上海等处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其他爱国人士认为这是挽救中国命脉的重要时机，于是筹划召开了“中国国会”。

“中国国会”起源于正气会与自立会。

正气会是由丁惠康、汪康年、唐才常、沈荩等人于 1899 年创立的，实际负责人主要为唐才常①。唐才常，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是同乡同学挚友，志趣亦同，世称“浏阳二杰”。他曾积极参加湖南维新活动，百日维新中，应谭嗣同之召赴京参预新政，中途闻政变消息，乃折返湖南，转赴上海，避地海外。他在日本结识了康有为，自请受业为弟子。1899年，他回到上海，以日人田野橘次名义，设东文译社（在新马路梅福里）作为掩护，暗中与丁惠康、汪康年、沈荩等人组织正气会。所以取名“正气会”，《正气会会章》解释说：“本会以正气命名，原因中土人心涣散，正气不萃，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创此会，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②。“爱国忠君”，正是正气会的宗旨。正气会宣言中，一方面宣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人们保家卫国，挽救民族危亡；一方面认为“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表示“妄议君父者，请勿列名会籍”。这与当时康有为等人宣传的爱国保皇宗旨是一致的。

正气会会章规定会员入会之始，至少捐洋一圆，以后每月至少

---

① 近年有研究者据宋恕日记，断言正气会主要创始人为丁惠康而不是唐才常。其实，早在 1903 年，参与正气会其事的日人田野橘次已经指出，正气会主要成员有汪某、丁某（即汪康年、丁惠康），“而湖南青年党首领唐才常及沈克诚，实赓此会首领，沈为事务员”（见田野橘次：《哥老会巨魁唐才常》，《自立会史料集》第 209 页）。

② 张篁溪：《记自立会》，《自立会史料集》第 3 页。

捐洋八角，作为会费；上海会员，每逢礼拜日午后集会一次。正气会选会长1名，任期1年，另设会计1员，议事、干事若干，诸人均不支薪水，纯尽义务。

正气会成立以后，唐才常等积极进行活动，发展会员，并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取得联系，据说"声息所通，东至苏浙，北至河陕，西南至巴蜀、两粤，同志纷纷响应，加入正气会"①。他们从康有为处取得一些海外捐款，用以筹备武装，策动"勤王"，即运用武力，逼迫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再靠光绪皇帝维新。

不久，唐才常等"以正气二字，含义狭隘"，于是改正气会名为自立会，所组之武装名自立军，并遥奉康有为、梁启超为正、副会长。1900年7月，唐才常以自立会之名"近于激烈，未易普遍"，乃于26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以挽救时局为名，约集上海维新人士80多人，在愚园南新厅召开会议。到会者除唐才常外，还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吴彦复、叶瀚、狄楚青、张通典、沈蓉、龙泽厚、马相伯、毕永年、林圭、唐才质等。叶瀚主持会议。他宣读并由会议通过的大会主题是：一、不承认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定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国会"（也叫"中国议会"），与会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分别选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随后，"国会"发布宣言，由容闳用英文写出，严复译为中文，主要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宗旨宣布后，"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但有两个人对此不满，一位是毕永年，另一位是章太炎，他们认为这个宗旨既不承认清朝政府，又要请光绪复辟，自相矛盾。毕永年劝唐更易宗旨，与康有为保皇会决裂；唐不从，毕后来愤投普陀，削发为僧。章太炎再三争辩无效，乃割辫易服，

① 张篁溪：《记自立会》，《自立会史料集》第2页。

以示决裂。7月29日，“中国国会”在愚园再次集会，确定会计、书记的人选，并确定唐才常、郑观应、汪康年、丁惠康、吴彦复等10人为干事。

“中国国会”成立以后，自立会便并入“国会”之中，自立军也自然成为“国会”的一部分，称“中国国会自立军”，所刻关防字样均冠以“中国国会”四字，如“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关防”、“中国国会统带自立中军各营关防”等。

“中国国会”成立以后，唐才常等人即赴汉口等处部署武装起义，旋因机密泄露，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于8月21日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捕获，次日即被杀害。清廷严令缉拿有关人员，“中国国会”遂告云散。

“中国国会”的成立，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国会”，虽然参加者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会议并未通过某种宪法之类的东西，但打出“国会”旗号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勇敢挑战。因为近代所谓“国会”，本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物。戊戌变法时期及其以前，资产阶级改良派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和召开国会的要求，但每次都如石投海，当然更未成为事实。这一次，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不承认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毅然举行“国会”，这就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专制统治的断然否定。这次“国会”，虽未明确宣示推翻慈禧专制统治以后所建国家的政体形式，但从会议主题和宣言，还是可以看出其思想意向的。会议主题第四项“保全中国自立”，所谓“自立”，即排除帝国主义侵略之后的民族独立；第五项“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实即要用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取代中国封建落后的方面。容闳起草的对外宣言①，更清楚地写道：中国国会“决定不

① 这个宣言赵必振译作《自立会通告各国旅汉侨民示》，见《自立会史料集》第37页。

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声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这个宣言所揭明的自立军八条军令的第八条写道，"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废除"①。由此可见，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打算在推翻慈禧专制统治以后所要建立的正是一个排除民族压迫的、独立自主的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自立会成员唐才质日后亦说，唐才常等之所以召开"中国国会"，"欲用国会或议会名义，号召国人论政，又可为他日国是已定召开正式议会实行宪政之准备"②。

"中国国会"选举的正会长容闳，是中国著名留美学生，副会长严复是著名留英学生，英、美正是各具特色的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会议选举此二人为首脑，从一定意义上表明当时人们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向往。议题的通过，正副会长的产生，均由与会者投票决定，说明这次会议本身也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一次尝试。正因为如此，这个"国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身与其会的章太炎说，会议召开时，有不少人震于"国会民权"之新说，乘兴来会，这说明"国会"召开之前，它所遵循和宣示的"国会民权"新说已传布开来并吸引了不少人。镇压自立军起义的张之洞攻击说："试问外国国会乃国家所设下议院之称，岂此等会匪之所可冒充乎？"③他并为此专门写了《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这说明，单是"国会"之名已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惊恐。

"中国国会"所以能在上海召开，除了上海有外国租界、政治空气比较自由以外，与上海当时的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关系。从1898到1900年的短短3年中，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

① 《自立会史料集》，第17—18页。
② 《自立会史料集》，第73页。
③ 《自立会史料集》，第155—156页。

军入侵中国等事件接连发生，爆发点都在北部中国，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一隅，则基本无战事，比较安定。于是，各地绅商、知识分子云集沪滨，严复、唐才常等人都是这时来到上海的。这些人饱经忧患，忧国伤时，正是"中国国会"能够召开、形成不小规模的重要社会基础。上海在戊戌以前，已成中国传播西学的中心，这使得上海人受西学熏陶远较他处为深，这是"中国国会"能在上海召开的文化因素。张之洞在分析"中国国会"成立原因时就说：国会中人，大率诵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颇为不少，他们或因目击中国大局阽危，愤激不已，而又略知外情，进用无阶，怀才自负，"在沪又习闻民权之说，遂以变本加厉之心，迫而为行险侥幸之计"。①"中国国会"反对慈禧，拥护光绪，这与英、美等国态度相近，所以中国国会的召开，也得到上海租界当局的支持。据唐才常称：唐才常在上海，与英、美、日三国领事"均极情密"，"本年上海所立国会，一切用款及电报各费约七千余元，均是英、美、日各国帮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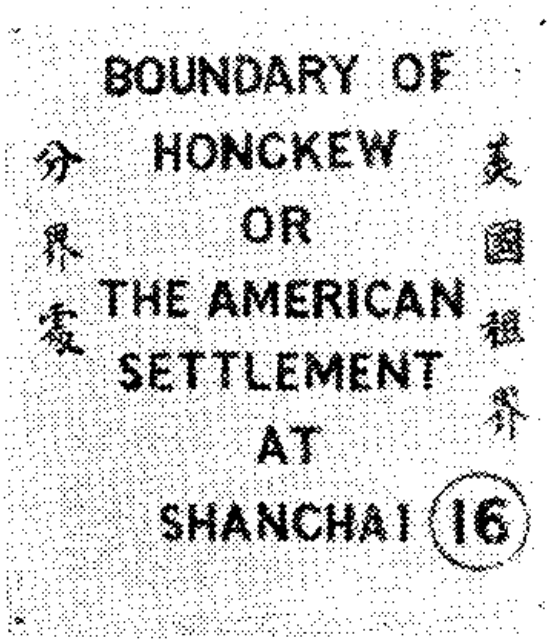
自立军失败了，中国国会亦瞬即消失。但是，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前进，数年之间，革命运动于上海勃兴，许多维新志士亦转而投身其中。

① 《张之洞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自立会史料集》，第169、170页。

第十一章　租界的扩展与东南互保

一、英美租界的扩展与国际公共租界正式形成

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以后，外人习称之为外人租界(Foreign Settlement)或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其后，英、美租界又有扩展，到1899年正式称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美租界界石

1863年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与上海道黄体芳议定美租界界址时，并未树立界石。英美租界合并后的第八年，即1871年，工部局自行于自来火厂对面的苏州河北岸及杨树浦的高郎桥树立界石。1873年，熙华德又提出重定租界北面界线。美国副领事白拉福(Bradford)提出，租界西面，应从苏州河北岸原定之起点，一直向北3里，然后向东划一直线，接连租界东界的北端作为北线。这一提案较原定美租界扩大许多，遭到上海道沈秉成的否定。在此情况下，熙华德另提一议，从租界西面苏州河北岸起点，划一直线，到当时靶子场稍北之处，然后再划一直线到原定租界东界的北端。熙华德提议的这一界线，日后被称

为熙华德线。熙华德线较白拉福提议的界线扩充范围要小些，较原定界线仍扩大不少。上海道台仍不同意。此后，工部局强行按照此线扩展租界范围。

1883年7月，工部局拟定在北河南路与浙江路桥（俗称老垃圾桥，因当时尚未筑北浙江路，故以此桥为标准）北岸一带设警，并决定向这一带中国居民征收各项捐税。这一地带，倘照熙华德线，则在租界境内；倘照1863年原定界线，则系租界之外。居民们素属中国官府管辖，已付捐税，因此，当工部局向他们编订门牌、征收捐税时，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对。1884年，工部局将拒付捐税的华人拘解会审公廨，中国官员未予追究。

围绕着这一带租界扩张事，工部局与上海道交涉多年。1889年9月14日，美国领事干纳迪（J.D.Kennedy）致函工部局，说是上海道龚照瑗已同意按熙华德线划定（从后来的事实看，龚照瑗并未同意）。工部局接信后，立即在自来火厂桥对面、老靶子场和杨树浦七里桥建立三座高50英尺的竹塔，并照熙华德线树立标记。第二年4月，中国官员对熙华德线进行核查，结果"拒绝给予正式承认"。工部局依然自行其事，在熙华德线内造屋、筑路、修塔、设警征捐。上海道多次提出抗议，均不得要领。北河南路至老靶子场一带中国居民纷纷撕去工部局所订门牌，拒交房捐。1892年11月，工部局函请领事团采取必要措施，切实解决租界北界问题，领事团致函上海道，请其派员共同处理。

1893年，上海道与领事团派人会同工部局工程师多次开会、实地察看，于6月基本按照熙华德线划定了美租界新界址，同时拟定了《虹口租界章程》八条。7月22日，上海道聂缉槼复函批准。这次扩张后，美租界面积为7,856亩，英美租界总面积达10,676亩。

殖民主义者并未因这次租界扩展而满足，仅过两年，1895年，工部局又提出扩展租界的要求。这一年，工部局致函领事团，请求设法帮助扩展租界，理由是：鉴于租界及其邻近地区华人人口的剧

增，粉厂、丝厂等工厂的创设，此后房屋、居民还会有增无已，“现有界址以内可供应用之地位势非拥挤不堪，决不足与此种扩张以相当之适应”，因此亟须扩展租界。1896年1月，工部局将要求扩展租界的理由，附所拟新界的地图一张，函达领事团转呈北京公使团。此后，公使团即与总理衙门交涉。总理衙门不予答复。1898年，工部局又向上海道直接交涉。上海道蔡钧态度强硬，予以拒绝。其3月13日复函堪称义正辞严，引述如下：

上海以地势关系，自初即面积狭小。自租界创设以来，吾国人民麕集，以致时至今日，以面积与居民之众多相较，且有过小之感。实难于租界以外，通融一尺一寸之地，另立租界。若谓洋人之侨居于此者为数常增，则敝道所属之国人且增五倍有余。且本地外侨不仅居住于租界以内，于界外租地建屋者颇为众多。此足见洋人人口之多寡，固无与于租界面积之大小也。

尤有进者，租界界外地带，中国政府亦早设置警局，开辟街道，点燃路灯，凡此种种设备尚须按时扩充。洋人之居住租界界外，如徐家汇、北泥城桥以外，率皆未遇阻挡，而条约未有明文规定租界面积须依洋人户口为数多少之比例而行增减。

故对于贵领袖领事共同商议所拟租界扩充 计划之提议，敝道以为最好维持现状①。

殖民主义者碰壁以后，领事团转而与两江总督交涉，公使团复与总理衙门交涉。1899年4月，总理衙门屈服，命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受工部局要求。工部局委派与刘坤一有相当私交的福开森(J. C. Ferguson)赴南京与刘面商。刘坤一竟委派福开森与随员余联沅作为代表来上海，会同上海道李光久与各领事会商租界扩充问题。5月8日，租界扩充界址会商妥贴，并经刘坤一批准。这样，英美

① 《工部局报告》，1898年，第282页。转见《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70—471页。

租界再次扩张成功。据上海道布告，扩展后的公共租界四至为：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嘴角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又由静安寺镇划一直线，至新闸苏州河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仍以下至周家嘴角直线上为止。6月20日，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召开临时会议，通过重订土地章程第一款关于租界界址的规定。12月，北京公使团批准了重订的《上海土地章程》，所订公共租界四至更为详明：

北——自小沙渡起，沿苏州河，至接连泥城浜之西约七十码之处，由此处朝北至上海宝山两县之交界线（今海宁路西端），循此界线至接连虹口河地方，朝东直至顾家浜口（今军工路南端）。

东——黄浦江，自顾家浜口至洋泾浜口（今延安东路外滩）。

南——洋泾浜，自洋泾浜口至接连泥城浜处，由此向西循大西路北首支路及大西路，至静安寺镇后之五圣庙（今延安西路东端）。

西——自五圣庙朝北至苏州河小沙渡。

7月1日，工部局开始在扩充区域内设置巡捕。次年6月，又将公共租界分为北、东、西、中四区。北区包括旧虹口租界之西部，以虹口河（即横浜河）为东界；东区包括旧虹口租界东部及扩充区域，即黄浦江以北、虹口河以西之地；西区指泥城浜以西地区；中区即旧英租界。

经这次扩充，公共租界面积净增 22,827 亩，比原来增加两倍，总计达 33,503 亩。

这次公共租界大行扩充以后，为防现有租界以外各国都要求开辟租界，经中英双方议定，改公共租界为国际公共租界，意为无论何国籍人均可享受居住租界的权利。

二、四明公所血案与法租界第二次扩展

法租界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第一次扩展以后，又不断谋求再次扩展。

1874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强行穿过四明公所筑路，导致了四明公所血案的发生。

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人的会馆①，正式建于嘉庆八年(1803年)，有正殿五楹，崇祀关帝，地址在上海北门外二十五保四图。随后又购地造房，增加了丙舍(停放灵柩之房)、墓地、祠堂。以后又续有扩建。1844年，四明公所地产编入官图，并由上海知县批准免去税课。1853年小刀会起义时，公所房屋全被烧毁，几年后又重新修建，规模较前更为宏大。计有正殿、后殿、土地祠，两翼设龛，土地祠旁置丙舍。别建济元堂，作为同乡集会之所，还有赊材局及馆丁寓舍。

法租界在1849年建立时，四明公所被划入。因公所此前不纳税课，故仍被同意免除捐税。法租界当局对于租界内的坟墓极为反感，认为"这些坟墓是传染疾病的巢穴，特别在炎热季节"，表示为了消灭这些坟墓，不惜进行任何尝试，"不管这种尝试多么艰巨"②。1861年12月，一个法国人曾拟买下四明公所地皮，平去坟墓，在上面开辟三条路，即八里桥路、宁波路和西贡路，后未果行。但是，法租界当局占领四明公所的企图并未终止。1863年，法租界议定贯穿四明公所墓地建筑宁波路、西贡路，但没有付诸实施。1873年，法租界当局决定动工筑路。宁波同乡会奋起反对。1874年1月27日，法租界公董局收到宁波同乡会一份请愿书，内云：

---

① 旧宁波府治之内，会稽山主峰上有四穴，象窗一般，通着光线，故宁波别称四明。

② 《上海法租界史》，第469—470页。

"我们认为，象这样筑路，势必使车马通行于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阴灵不得安宁，此乃亵渎之事；至于起棺改葬而扰乱遗骸，我等也并非愿意"①。宁波同乡会建议改变路线，并表示愿意分担因改变路线而需的费用。过此不久，宁波同乡会又请求法租界当局阻止筑路，表示"我们宁波府六县的生者和死者定将为此永远感恩于您"②。应当说，宁波同乡会的要求合情合理，然而法租界当局竟断然拒绝。1874年4月7日，公董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对宁波同乡会"敬奉祖先的观念自当表示敬意"，但法租界不能抛弃欧洲人讲究卫生的习惯，所以坚持迁墓筑路。4月27日，宁波同乡会再次呈文法国总领事葛笃(Godeaux)，要求重新考虑。葛笃认为可以考虑，并要公董局总董瓦赞(Voisin)重议此事，可是瓦赞不予理睬。

法租界当局的蛮横行径激怒了上海人民特别是宁波同乡会的人们。1874年5月3日下午，愤怒的人们聚集在四明公所周围，进行抗议。他们赶走了一名巡捕，并到法租界路政管理所工程师佩斯布瓦(Percebois)的金神父路住所抗议，佩斯布瓦竟向人群开了两枪，当场打死一人。群众愈加愤怒，越集越多，他们放火烧屋，殴打了佩斯布瓦的家人。租界出动巡捕进行镇压。晚七时许，密密匝匝的人群包围了公董局，向里面的洋人抛掷砖石。英美租界巡捕、法舰"水蛇"号的水兵应公董局之请赶来镇压，群众六人被杀。此时，上海知县率员赶到，驱散了群众。这一天，中国共被打死七人，伤者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

血案发生后，引起外交交涉。经法国公使与总理衙门多次交涉，1878年8月双方达成协议：中国赔偿法国37,650两，法国给被杀的七名中国人家属恤银7,000两；法租界放弃原筑路计划；四明

① 《上海法租界史》，第471页。
② 《上海法租界史》，第472页。

公所及其所属地方免纳捐税。

1884年，法国挑起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8月，法国海军中将孤拔(Gourbet)率领舰队进攻福州、基隆等处，并进而封锁长江口。中国在吴淞一带设防，防止法舰冲入。按照战时国际公法，当时中国政府完全有权收回法租界，法国方面亦已意识到这点，法租界的官员、商人已作了离华的准备，法国代理领事葛林德(Collin de Plancy)把法租界托给俄国领事代管，降下法国国旗，换上俄国国旗。可是软弱而又不明国际公法的清朝政府，不但见未及此，且谕令沿海各地，"对敌国商民仍一体保护，凡该法国官吏、商民、传教士等，如愿留居我国，各安生业者，仍予一视同仁，照常保护"①。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战时状态解除，三色法国旗又飘扬在法租界上空。法租界于是轻而易举地渡过了一次可能被收回的难关。

1896年，正值公共租界积极进行扩展活动的时候，法租界也提出了扩展的要求。1897年，公董局再次决定强占四明公所，以便修筑马路。1898年初，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de Bezaure)照会上海道蔡钧，正式提出扩展租界的问题，要求扩展的范围为法租界以西八仙桥一带、浦东一部分、吴淞一部分，蔡钧断然拒绝，并说明四明公所之事20多年前已有协议。5月，公董局藉口建造学校和医院，强行要求征收四明公所部分地产，又遭四明公所拒绝。7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国殖民主义者决定强行占领四明公所。法国兵舰"侦察"号陆战队弁兵拆毁公所围墙，强占了四明公所，并开枪打死了两名中国人，伤多人。旅沪的30万宁波人群情激愤，掀起反抗怒潮。次日，旅沪宁波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轮船上的宁波籍水手一律上岸，被西人雇用的宁波人一律辞职。愤怒的人们向法国殖民主义者抛砖投石，击碎路灯，致使法租界当晚一片黑暗。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法兵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

① 《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辑，第三期。

人群扫射，随后又分道出巡，随意屠杀无辜人民。是日，计有17人惨遭杀害，伤者无算。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

事后，江苏布政使聂缉槼、上海道蔡钧与法租界多次交涉，法租界重提扩展租界的要求。1898年7月24日，达成协议。为保全四明公所，聂、蔡原则同意扩展租界的要求。9月2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S.J.M.Pichon)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四项：一、确定法租界的扩张；二、维持四明公所土地权；三、四明公所坟地不得掩埋新尸或停柩，原有旧坟亦应陆续起送回籍；四、在四明公所地面上可以开筑交通上所要的道路①。

1899年6月，法租界扩展界址议妥，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今西门路、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法租界原有面积1023亩，这次新扩1112亩，比原来加倍有余。至此，法租界总面积达2135亩。

1900年1月27日，上海道余联沅公布了法租界新的界址。

三、东南互保

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接踵而起。这一运动于1898年在山东发轫，逐渐扩展到华北、东北，1900年进入高潮。充满爱国义愤而又愚昧落后的团民们，挥舞着中世纪的大刀长矛乃至赤手空拳，身藏护符，口念符咒，与拥有快枪利炮最新装备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们杀洋人，惩二毛，烧教堂，毁铁路，断

① 参见《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辑，第三期；《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297页；《上海租界的形成及其扩充》，《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二册，第62—63页。

电线，一面是激于爱国义愤而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一面则反映了狭隘的盲目排外的农民意识。

帝国主义者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900年6月10日，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攻，血腥屠杀义和团。

以慈禧太后、载漪为代表的一部分清朝统治者，由于在对待光绪皇帝、对待康有为、梁启超和己亥立储等问题上，与英日等帝国主义有着严重的分歧，结下了很深的仇怨，也由于愚昧无知而相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想借义和团的力量，雪恨消怨，抵御外侮，毅然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对外宣战，要求普天臣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结果中国惨败，团民遭殃，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京津地区战火纷飞、尸横遍野之际，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却兵不血刃，中外相安。这是什么原因呢？乃由于有所谓东南互保的协定。

东南互保之议是由阻止英国对长江流域的占领而引起的。长江流域是英帝国主义觊觎已久的地方。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部兴起以后，英国资产阶级担心长江流域也掀起反帝风暴，危及他们的利益，于是想出兵占领。1900年6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仑(Pelham Warren)致电英国政府，要求在长江流域“采取适当步骤”。翌日，他被授权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们“将要受到帝国海军的援助”。同日，英国海军部命令增派兵舰到南京和汉口。英国出兵长江流域的目的，嘴上说是为了帮助中国保护吴淞和“弹压土匪”，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借机造成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老于世故的刘坤一、张之洞对此自然一目了然。长江流域是这两位封疆大臣的辖地，是他们的命脉所在。尽管他们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属于亲英派，但他们还不愿也不敢眼看英国侵占而不管。他们进行了阻止英军占领的种种努力。

张之洞一接到英国总领事关于英国将派兵“援助”的通知，便立即“力阻”。他告诉英国总领事，长江以内上下游，由他与刘坤一力任保护之责，必可无事，英国水师千万不要开入长江，“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①。刘坤一也对英国派兵入江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英允保淞，确系诡计”②。因此他电令上海道“密阻”。空口反对，当然无济于事，刘、张于是在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对外方面，张之洞、刘坤一一面致电中国驻英、美、日等国公使，要他们向所驻各国说明“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特别请美国出面“与各国切商保全东南大局，不可遽派船入江”③，一面嘱咐正在上海的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和上海道余联沅等加紧与各国驻沪领事联系，妥筹保护办法，并照会各处外国领事，要求洋人暂停携眷进入内地，“洋人如无要事，戒饬暂勿外出游玩打鸟，免为小事致生枝节”④。对内方面，张、刘札饬所属各地，注意保护洋商洋教士，凡洋人与华人发生交涉，“务宜诸从宽恕，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以冀相安”⑤。

英帝国主义原想独占长江流域，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野心一时还无法实现。英国将要出兵长江的消息传出第二天，俄国就用茶船载兵 150 名侵入汉口，后为英国所阻退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表示将派兵舰侵入长江流域。法国政府明确表示：“如果英军在上海登陆，法军也将登陆”⑥。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害怕加深与其他列强的矛盾，只好改变进军长江的初衷，命

---

① 《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 327 页。
② 《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 329 页。
③ 《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 330 页。
④⑤ 《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 328 页。
⑥ 《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 241 页。

令其驻上海领事和军事指挥官："除非遇有明显的紧急情况，现在不要派部队在上海进行登陆"①。

在此情况下，一个既能保住长江流域、又不开罪于列强的"东南互保"的计划，经盛宣怀等人的努力，酝酿成熟了。还在6月20日，盛宣怀便致电刘坤一，谓："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任保护，勿任干预。"②英国答应不出兵长江后，盛宣怀又加紧在外国领事与张之洞、刘坤一之间穿针引线。

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上谕秘密传到上海，这对正在进行中的旨在维护中外相安局面的东南互保的计划不啻是当头一棒。此时，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以极大的勇气，一面命令所属各地不准传发宣战诏书，一面加速与各国领事密商议约。6月24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谓必须在正式奉到开战之旨以前，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③。刘坤一接电后，意尚犹豫，张謇为之陈说利害，他于是电询张之洞是否可行，张之洞立即表示同意，并请刘"即刻飞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并派道员陶森甲迅速赴沪与议此事。刘坤一意乃决，电令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紧急会商。沈瑜庆、何嗣焜、沈曾植、顾缉廷、杨彝卿等人也参与了联络工作。

6月26日，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举行会议，盛宣怀以两江、湖广两总督共同聘请的帮办名义出席，经过谈判，当日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

---

① 《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241页。

② 《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323页。

③ 《盛京堂（宣怀）致张之洞电并致李中堂刘制台》，《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332页。

《东南保护约款》共9条，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传教士产业，均归两江、湖广总督切实保护；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仍照常停泊，但必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各国以后如果不经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各国传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共10款，主要内容是：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众滋事，或抢劫伤人，无论华洋地界，均须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租界、华界均需添办新扩各种筑路、挖河工程，务使闲民有事，生活有资；请中外各银行及钱业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租界、华界均需添募巡捕，加强巡逻，租界周围，由中国军队搭盖棚帐，常川驻守。

这两个章程，从内容上看，达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预期的目的，既遏止了英国及其他国家对长江流域包括上海的侵占，也不开罪于这些国家，有效地维护了长江流域局势的稳定。其中有些内容，有的国家曾表示不能接受，如《东南保护约款》第五款规定：“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至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这一条完全是针对外国的。不少国家开始不同意。日本认为这条不合国际公法，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坚持原议说：“议内此条最重，如此款不行，他款虽允无益。”① 这一条原则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

① 《义和团运动》第三册，第342页。

从章程草拟过程，可以看出刘坤一、张之洞等人颇费心力。上海道等原拟草案中，本无关于制造局一条，刘坤一看后，急电加入关于制造局一条，即《东南保护约款》的第七条："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这一条关键是上一句，完全是针对外国而言的，至于下一句，纯粹是官样文章，因为制造局的军火，既可用于"防剿"，也可用于反对外国。事实上，当时制造局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其中自然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反对八国联军的，所以"洋人颇以接济北路军火为憾"①。

就在议订《东南保护约款》的那天，荣禄向沿江各处督抚寄来清廷对外宣战的明旨，这对互保约款的订立是个极大的障碍，盛宣怀急电苏州、镇江、江阴、南京、安徽、芜湖、九江、南昌、武昌、汉口、襄阳、龙驹寨、西安、太原、保定、长沙、成都各电报局，要他们对宣战诏旨"不准传抄，如有泄漏，惟该局员是问"②。互保约款订立第3天，即6月28日，宣战诏书已在上海等地轰传开来，盛宣怀电询刘坤一、张之洞是否坚持原议，刘、张当即表示"无论北事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一切后果由他们两人"一力承担"。上海各国领事见刘、张态度未变，乃照会上海道余联沅维持所议，互保约款在事实上开始实行。

《东南保护约款》订立以后，盛宣怀立即电告两广总督李鸿章，同时，刘坤一、张之洞分别致电福建、浙江等处督抚，认为他们"似可一律照办"，共保大局。李鸿章表示全力支持，山东巡抚袁世凯表示愿采取同样态度进行中外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照此精神与俄、英、美、日等国订立了《福建互保协定》。浙江布政使恽祖祜认

① 《盛宣怀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182页。

② 《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176页。

为,《东南保护约款》的订立,"保全性命财产无数",乃是"第一等识力功德",表示努力按同一办法行事。四川、陕西、河南等省督抚表示赞同,这样,中外互保的范围便由原来的东南、华中等处扩大到南起两广、北迄山东、西至四川共10多个省的广阔地区。

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已对入侵各国宣战,地方政府竟与敌国订立协议,保持和平状态。论者亦往往以此而责东南互保之成立为卖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分析其性质,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情况和事件的实质。

《东南保护约款》的实施,确实阻止了义和团运动的南进,且看当时情况,在互保的范围内,督抚们派兵勇在各大城市日夜巡逻,对各教堂拨兵保护,并到处张贴镇压义和团的通告。刘坤一对上海更是"加意保护",上海的清军都以毛瑟后膛枪替换旧式枪械,黄浦江各港口增调了太湖水师前来防守。帝国主义对于上海租界更是戒备森严。1900年,万国商团增设了海关队和日本队,到这年年底,商团人数已有855人(1890年只有245人)。英、法等国都增派军队到上海租界。8月18日,英国率先调2000名印度兵在上海登陆(企图独自占领上海),法、德、日等国见状,亦陆续派兵到上海。英国独占上海的计划受挫。一时间,上海兵营遍布,浦江军舰连片。直到1902年,帝国主义列强才达成协议,从租界撤军。由于帝国主义和东南督抚加强了对东南的控制,义和团反帝烈火在东南一带便无法燃烧。单纯从感情上说,也可以说它是对反侵略战争的阻挠。但是,考虑这场战争是否必须进行,不能不计及义和团运动的愚昧落后与其对反帝和盲目排外之间的界线不分,也不能不看到清政府平常卖国屈辱,一旦有事,既无充分的作战准备,竟驱使以迷信武装的农民群众为战争工具。义和团反帝战火如真在东南燃烧,上海及东南必继天津和北京而为帝国主义者所焚毁掠夺,可以预卜。

另一面,《东南保护约款》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英国独

占长江流域的阴谋。1900年6月30日，即约款订立后第四天，一艘英国炮舰开赴汉口，盛宣怀立即根据约款，询问此行目的。英国领事说明并非为了军事目的，并答应电告英国水师提督"以后不再派船入江，如有更调，必先知照"①。正因为这一约款的某些内容有碍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所以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批准。7月4日，即约款订立的一周以后，英国首相向中国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对东南督抚维护商教的措施予以极高的评价。英国乐于执行那些便于执行的条款。但是，英国政府绝不能把它作为对自己有约束力的'约章'来看待，因为它包含有英国不能委弃的条约特权，并且把中国政府理应承担的义务加诸英国政府。"② 德国、法国、日本、美国政府也先后表示同意实行部分条款，但不肯"明立条约"。7月13日，上海领事团照会上海道余联沅，各国政府不同意在《东南保护约款》上签字。帝国主义不愿意因签字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恰恰证明这一约款本身具有遏制侵略的作用。

《东南保护约款》的订立，稳定了上海地区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上海的发展。由于北方战乱，上海地区稳定，所以不少绅商携资南下上海，一批纺织缫丝、面粉工厂由此得以兴办，据统计，从1901到1905年，上海、苏常等地新办工厂企业有62家之多。一批文化人在此时期群集上海，如严复就是在战乱中从天津南下上海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的师生则因战乱成群拥入上海，教员王宠惠、陈锦涛等率学生进南洋公学续学，南洋公学因之特设了铁路班。据上海租界5年一度的人口统计，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1900年的人口总数由1895年的29万多人增加到44万多人，增长近50%。华界人口增长幅度当较租界更大，因为当时租界对华人进入尚有控制。

---

① 《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178页。

②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901年，第11页。转见《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424页。

《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第三条写道："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且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闲民有事，可致消患无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上海市政建设的发展。

第十二章　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1895年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的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由此，日本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进行资本输出的特权。根据以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英、美、德、法等国，同时取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

在上海开办工厂，实际上早在开埠后不久就开始了，甲午以后所不同的是凭藉着条约，合法化了，于是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时期，或称之为"外人兴业时期"。大规模地开设工厂，自然要选择地理位置，选择易于获得原料、能源、劳动力的城市，交通灵便、通讯设备优越的城市。在这些方面，上海较其他通商口岸远为优越，因而成为他们集中投资之地。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上海的外资企业急遽增长。与此同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上海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上海的金融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也都有了迅速发展。

于是，上海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一、外资工业疾速发展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竞相在上海投资设厂。条约签订当年，美商鸿源纱厂，英商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德商瑞记纱厂，便在上海设立。到1911年以前，帝国主义各国在上海开设的企业主要有，英商增裕面粉厂，瑞镕造船厂等21家，美商美昌机器

碾米厂、华章造纸厂、英美烟公司等5家，德商固本肥皂厂、永丰洋行(羽毛加工厂)等4家，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东方百代唱机唱片公司等，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内外棉三厂等8家。据统计，从1895到1911年，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91家，开办资本为4855.4万元，其中上海为41家，2090.3万元，厂数占45.1%，开办资本占42.8%。于此可见上海在全国外资企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外资企业的增多，使得上海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了。甲午战争以前，上海工业门类有船舶修造、缫丝、棉纺织、水、电、煤气等11种，甲午以后又增添了火柴、毛纺织、面粉、制革等11种。在这些工业门类中，重工业有4项，其余18项为轻工业。轻工业中又以纺织工业为主，投资总额占整个上海外资工业投资的49%以上，这就奠定了近代上海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上海设立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几个垄断集团，诸如怡和集团、英美烟公司、日本东亚兴业会社、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内外棉集团等。下面让我们剖析一下几个垄断集团的形成情况。

(一)怡和集团。怡和洋行是最早进入上海的英商洋行。19世纪40年代初，它的第一任驻沪代表德拉斯与他的五个伙伴，在黄浦滩最北端，紧挨着英国领事馆，建造起第一幢正方形二层楼房，此后50多年中，它一直充当着经济侵略的急先锋。

怡和集团是靠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家的。怡和创始人查顿(William Jardine)在"这桩事业中，不到廿年工夫即已获得100万镑的巨利。"① 凭借着这黑土白骨堆起来的资本，怡和洋行在华工业投资方面占据了优势。1895年前，就在中国开办工厂8家，其中3家在上海，投资规模在外资工业中居于首位。甲午前夕，它又投资

① 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页。

于日商三井洋行开办的上海轧花厂。同时，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强行运进纺纱机2万锭，力图打入纺织工业。

《马关条约》签订，中国政府的禁令无形打破。怡和洋行立即在杨树浦开办怡和纱厂，占地70亩，开办资本100万两，纱锭2万枚。1897年5月开工。1898年纱锭增加到4万枚，1901年前后更增至5万枚，资本扩大到150万两。怡和纱厂开办以后，采取了西方垄断财团惯用的手段，即企业自身投入部份资本，通过发行股票吸收华商游资，控制、营运散户股东提供的大量资金。这一点，在怡和纱厂招股章程中写得很清楚。它的资本"共分一万股，先发行七千五百股，其中发起人摊认五千五百股，下余两千股在上海公开招募"①，在这里，"所谓发起人摊认的股份，有一部份实际上握在华商手中"。"至于在中国公开招募的股份，则更以华商为主要认股对象"②。可见，华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据有人估计，怡和纱厂"实际上资本的80%以上是中国人投资"③。但是怡和洋行不仅指派总经理、工程师，而且制定了便于洋行控制纱厂的章程。据章程规定，纱厂的人事权、利润及佣金的分配权、资产处置权全归总经理；股份不得随意转让、总经理有权拒绝股份过户；股东大会发言、文件必须用英文，等等。这样，怡和洋行牢牢地掌握着纱厂的所有权、管理权，从而达到了以尽可能少的投资去最大限度地控制、利用华资的目的。

1911年之前，怡和洋行在上海开办的工厂还有怡和打包厂等5家，见下表。

---

①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1895年7月2日，第2页。

②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

③ 引自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二辑，第51页。

1895—1911年怡和洋行在上海开办的工厂①

开办年月	厂　名	开办资本	工人数	地　址	备　注
1895	怡和纱厂	100万两	3000	杨树浦路46号	
1902	怡和冷气堆栈	50万两	500	杨树浦	除冷藏外还生产冰蛋
1905	怡和制材厂	15万两	200	杨树浦	
1905	振华纱厂	30万两	720	杨树浦兰州路4号	与华商合办
1907	怡和打包厂		300	北苏州路52号	
1910	公益纱厂	75万两		劳勃生路150号	与华商合办

除了开办上述工厂，怡和洋行在1895年前后已经成为上海金融资本巨头，它拥有汇丰银行股票16万股，约120万港元，它还联合汇丰银行组织中英银公司，拥有10万镑股权；另外，它还在上海、香港等地广泛投资于轮运、码头、仓库、地产、保险各业。总之，1895年以后，怡和洋行已经迅速发展为一个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融为一体的帝国主义垄断财团了。它的总行"名义上设香港，但实际上是设在上海"②，其地在公共租界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27号。

(二)英美烟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Itd)

1902年，英美烟公司在伦敦成立。同年九月就在上海南京路9号设立分公司，开始了它在中国的侵略事业。

首先，它接收并改组了原先在上海的英国、美国烟草销售、生产的企业。1902年它买下了原美国烟草公司在上海的全部产业，

① 本表资料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辑，第330页—331页；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3页—25页；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54页等著作综合整理。

② 萍叶登著《侵略中国的英美财阀》，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9页。

1903年将这些产业移交英美烟公司所属英商美国烟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1905年后者改名为大英纸烟有限公司(British Cigarettes Co. Ltb.);同时,英美烟公司指定美商收买老晋隆洋行(Muslard & Co.)的产业及经销业务,定名为麦斯塔德公司(Mustard & Co.)。以上两家进行了分工,大英纸烟有限公司负责制造纸烟,麦斯塔德公司负责推销业务。

第二,扩建卷烟生产工场。在上海是扩建了原浦东工场,到1906年已经把它从几百个工人的小工场,扩建成拥有2500多工人的中型卷烟厂。以后,又先后在汉口、沈阳开办了工厂。

第三,组建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卷烟销售网。1902年,委托买办开办绥远、包头烟栈;1903年收买天津玉盛合烟号为代销店;1906年收买广西陈泰记杂货号为公司驻梧州的代销行……。这样,便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卷烟销售网。

第四,开辟烟叶生产基地。英美烟公司在上海开办分公司以后,马上派出大量人员,到全国各地调查烟草生产的情况及潜在能力。特别是自称为东洋烟草先驱的托马斯(J.A.Thomas)到上海不久,就到内地广为调查,他发现山东的气候、地质情况与美国加罗利亚州十分相似,便从美国带来100个烟草种植者,到山东各地去传播烟草种植技术,使山东很快便成为烟叶生产的重要基地。

总之,1911年以前,英美烟公司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垄断集团之一了。

(三)日本的上海、钟渊、内外棉三大纺织集团。

甲午以后,日本对华工业投资有二大中心,一在东北,以路矿重工业为主;二在上海,以纺织业为主。1911年以前侵入上海的主要有: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和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

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是三井财团、三菱财团合资的纺织工业垄断集团。1895年就派山边丈夫等人到上海,筹建"东华纺织公司",

正当筹办之际，董事会认为在日本本土设厂更有利可图，即将设备转运神户，停止了在沪建厂活动。1897年，它又以中日合资名义，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138号开办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1909年前后，该厂又拟订了增设棉纺部的计划。尽管这一时期它在沪的棉纺织业活动并未成功，但是它依然是第一个侵入上海的日本垄断集团。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是三井财团在我国最主要的工业垄断企业之一。1902年，三井洋行上海分行行长山本条太郎集资收买华商兴泰纱厂，改名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一厂；1905年，山本又租办华商大纯纱厂，并于翌年4月盘买该厂，改名三泰纱厂。1908年，上述二厂合并，组建上海纺织有限公司，资本 100 万两。

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是日本在上海的最著名工业垄断集团之一，1888年创办于大阪。内外棉一、二两厂办在大阪。早在1884年（明治十七年）棉花商川邨利兵卫就到浙江余姚，以后又多次到南通、南翔等地调查棉花生产情况。1904年（明治三十五年）川邨氏就向内外棉董事会提议到上海设厂，当时董事会对于到上海设厂是否有利抱怀疑态度，直到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在沪获得高额利润的消息传到大阪以后，内外棉董事会决定派川邨到上海谋一席之地①。1911年初，川村来到上海，杨树浦沿江一带早已为英、美等国工厂所占据了，于是他就把目光转向公共租界沿苏州河岸，买下了西苏州路宜昌路一带土地，当年 11 月内外棉三厂即正式开工。

二、民族工业初步发展

1895至1911年，上海新办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 112 家，占全国

① 参阅元木光之编著《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日本木下印刷所 1937 年（昭和 12 年）版，第 45 —49页。

总数之25.1%，开办资本 2799.2 万元，占全国总额之28.6%。这一时期，上海民族工业无论数量、门类、开办资本及工业密集程度，在全国均遥遥领先。

甲午以后，首先在上海得到发展的是纺织业。1895 年到 1898 年之间，先后开办了裕晋、大纯、永泰、裕通 4 家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纱厂。它们的开办资本总计约 105 万元，共有纱锭 7 万余枚。很显然，由于在短时期内开办了这么多纱厂，对原棉需求突然上升，市场上"花价因争买而益涨，工价因争雇而益昂。"① 于是，1898 年后棉纺业投资几乎停顿。民族资本工业投资开始转向，集中于缫丝业、面粉工业、造纸工业、机器制造业等部门。1900—1906年间，有振纶、仁记、源昌等 8 家缫丝厂在上海开办，资本总额 277.7 万元；造纸厂有龙章等 3 家，开办资本总计约 70 万元；这一时期，上海的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也有显著发展，到 1907 年止，先后开办了 11 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 117.8 万元，其中著名的如：大隆铁工厂、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等。日俄战争期间，北方面粉市场畅销，刺激了上海民族面粉工业的发展，先后开办的有阜新、华兴、中兴等 6 家华商面粉厂，资本总额 166 万元。

1907年以后，既因为北方面粉市场呆滞，大量面粉积存，又受到上海"棉制品市场日趋活动"的吸引，上海民族资本的投资方向又转移到了棉纺织业②。1907—1910年间，有九成、振华、同昌、公益 4 家华商纱厂在上海兴建，资本共 282 万元，纱锭总计 5.8 万枚。但是，这 4 家纱厂之中除了同昌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外资的渗入。

1907—1911年，民族工业在染织、毛纺、制革、烛皂、水电等业都有发展，尤其是 1907 年上海内地电灯厂以及 1910 年闸北水电

---

① 盛宣怀：《愚斋存稿》，第五卷，第 41 页。

② 杨大金编《近代中国实业通志》1932 年版，第 12 页。

公司的开办，对于上海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代上海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推进了上海杨树浦、闸北、沪西等工业区的形成。

杨树浦工业区　杨树浦本是黄浦江的一脉支流，因先前杨柳成行而得名。19世纪60—70年代，杨树浦两岸约两万余亩土地上，还是人烟稀少的农田①。据传，在杨树浦上，离黄浦江一里许，有一座小有名气的木桥——高郎桥，桥下柳荫丛中孤零零地蹲着一幢砖木小屋，透过飘拂的柳枝，隐约可见四个墨写的大字："来煽茶馆"，所谓"来煽"的含义是"顾客无多，须客至然后煽炉应客"，可见"非常冷落"②。1895年以前，已有少数几家工厂，如：华盛纺织总厂、怡和丝厂、英商自来水公司等在此开办。甲午以后，随着中外近代工业的发展，在公共租界东区、北区及华界引翔乡，沿杨树浦岸狭长地带，形成了上海最早的工业区。外资工厂有：英商怡和纱厂、怡和制材厂、怡和冷气堆栈、老公茂纱厂、瑞记纱厂、上海纺织会社一厂等等；民族企业如华盛、华新、大纯、振华等纱厂，均云集于此。显然，杨树浦工业区初创时期的特点，一是以外资工业为主体；二是以纺织工业集中而著称于沪上。

闸北工业区　这是一块随着上海民族工业初步发展而兴起的工业区。它包括吴淞江新闸以北的大片地区。上海开埠以后，吴淞江开始通行小轮，"于是新闸、老闸之间，亦见起色"③，但是，19世纪90年代以前，这里基本上还是一片农田。甲午以后，黄浦江岸逐步被外资工厂霸占，公共租界殖民当局为了适应经济扩张、输出资本的需要，于1899年又一次大肆扩张租界，北面已经迫近闸北的南境。正在兴起的民族企业，大多势单力薄，没有力量去黄浦

---

① 参阅王际昌、罗志儒著《上海社会研究的背景》，1929年版，第41页—42页；第68页，《上海社会分区图》。

② 穆藕初：《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上卷，第19页。

③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册，第46页。

滩与外资工业争夺地盘，所以比较集中地在吴淞江以北的闸北兴建。最著名者是1897年开办的商务印书馆，它不仅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业，也是经营较好的民族企业，1904年它购买了宝山路东侧80余亩土地，建立了设备比较完善的近代印刷厂。此外，还有永兴路的怡茂皂厂、华康路的顾顺记机器厂、川公路的祥泾丝厂等等。它们形成了一个以民族中小工厂为主的工业群落①。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于电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于是由李平书等发起，于1910年创办了闸北水电公司。它除了招募商股以外，还由苏淞太兵备道库拨给部份资金。创办之初管理上的混乱、设备简陋，供电价格昂贵，从潭子湾引水，水质也很差。但是，它对于正在发展的民族企业来说，还是有所助益的。

沪西工业区　它的初期，主要是民族企业集中地，与闸北有相似之处。这里的外资企业有戈登路上的内外棉三厂，宜昌路上的一度落入日商手中的九成纱厂等。民族企业中较著名的有戈登路底的大隆铁厂、曹家渡的立大面粉厂、小沙渡路的泰丰罐头厂、西苏州路的有余油厂等等。正是这些中、小型民族工厂改变了这里历来绝少行人的荒僻景象，为沪西工业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沪南工业区　这是一个狭长而沿江的工业区②，大致位于南市东起老白渡街，沿外马路、里马路（即中山南路）向西，然后接龙华路、斜土路继续西行，直到局门路。这里实为上海近代工业发祥地。1867年（同治6年），江南机器制造局移到这里。1895年以后，民族工业进一步在这里发展，既有规模较大的工厂，如：1907年创办于南码头的求新造船厂，开办资本就达70万两之巨；1910年开

① 参阅《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29年版，《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第48页后插页地图。

② 参阅《上海社会研究的背景》第68页后插图：《上海社会分区图》；《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49年版上册《上海市区图》；下册《上海分幅总图》。

办于南市机厂街的申大面粉厂，资本也有20万元。但是更多的是规模很小的"弄堂工厂"，仅南市机厂街，就有同昌油厂、同昌协记纱厂、永源针织厂等。类似的情况在南市里马路、外马路、丽园路、外日辉桥等地也都存在。其中有不少小工厂很快就被大厂并吞了，但是也有办得很有起色的，如：1911年在南市羊尾桥开办的南阳烛皂厂，开办资本仅5000元，由于经营得好，所产太阳牌肥皂、地球牌洋烛很快在国内打开了销路，不到3年，资本增至2万元①。

三、金融业迅速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上海金融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到80年代中期，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的款项调拨总额中，已占80%。但是，当时上海金融业的活动领域，还局限在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汇兑业和拆放业务上，与清政府中央及地方财政之间的联系还不广泛。90年代以后，上海金融业有了很大发展，对于清政府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起来。

1890年，德华银行在上海开办，以后几年，日本、俄国、法国、比利时、美国、荷兰的银行相继进入上海（见附表）。它们集中在公共租界中区的东北角，北起领事馆路（北京东路）、南至汉口路、东临外滩（中山东一路）、西迄老闸路（山西南路）的这一金融区之中。各国银行的开办，改变了英国独占的局面，然而，以汇丰银行为首的英国金融势力依然在上海金融区居于首位。甲午以后，它们除了经营中外贸易中的汇兑、拆放业务以外，更重要的是谋取、处置对华的财政、铁路、矿山等方面的借款。

---

① 《国货月报》，1915年第一期，调查栏，第三页，《南阳烛皂厂之调查》。

1890—1911年间在上海开办的外国银行①

开办年月	国别	银行名称（西文名）	沪行地址
1890年	德国	德华银行(Deutsche Asiatische Bank)	黄浦滩路14号（今中山东一路，下同）
1893年	日本	横滨正金银行(The Yokohama Specie Bank)	黄浦滩路31号
1896年	俄国	俄华道胜银行(Russo Asiatic Bank)	黄浦滩路15号
1899年	法国	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 Indo—Chine)	黄浦滩路29号
1899年	日本	台湾银行(The Bank of Taiwan)	黄浦滩路16号
1902年	比利时	华比银行(Banque Belge Pour l' Etranger)	黄浦滩路20号
1902年	美国	花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	九江路A字1号
1903年	荷兰	荷兰银行(Nether Lands Trading Society)	黄浦滩路21号

这一时期，上海民族金融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钱庄营业范围的扩大和华商银行的开办。

上海的钱庄早有南市、北市之分。所谓南市，指开在县城里的钱庄；北市，指开在县城以北租界里的钱庄。上海开埠以后不久，就有钱庄在北市开办，最早的如方润斋所开的“北履龢”（即寿康钱庄之前身）②。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南市钱庄大多搬迁北市，战事平息以后又多半迁回。以后的几十年间，“南市藉历史上商市之凭借，故营业赖以维持，北市随租界为发展，故营业亦日有进步，双方对峙，势均力敌。银拆则北裕于南，洋拆则南裕于北。”③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开始变化，从以下两个附表可以看到，20世纪初北市钱庄已经占了优势。

① 本表资料来源：《上海金融机关一览》上海银行周报社发行，1920年版；中国金融年鉴社丛书《上海的银行》艺文书局，1949年版。
本表所列地址均为开办时的地址。

②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0页。

③ 姚公鹤：《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62页。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北市钱庄数量变化①

年别	上海钱庄总数	南市		北市	
		钱庄数	占总数百分比	钱庄数	占总数百分比
1873	178	75	42.2%	103	57.8%
1883	58	23	39.7%	35	60.3%
1893	82	23	28%	59	72%
1910	91	17	18.7%	74	81.3%

南、北市钱庄盈利对照(单位：两)②

年别	北市盈利	南市盈利	总计	北市占总数百分比
1903	1,173,300	417,500	1,590,800	73.8%
1906	883,800	358,000	1,241,800	71.2%
1909	904,900	115,000	1,019,900	88.7%

同时，上海钱庄的营业，已超越了汇兑、拆放等业务，开始直接与国家财政发生关系。首先，银拆大幅度增加。1900年前上海市面上银拆一般保持在二、三百万两，1900年后急剧上升，“最盛时期总数约千数百万两”③。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根据《马关条约》、《辛丑和约》的实施细则，上海外国银行取得了巨额赔款、对华贷款的处置权，这些银行在将巨款汇去本国之前，或转交清政府之前，需要有一个暂存生息的出路，从而大幅度地增加了对钱庄的银拆。1910年已“将近二千余万(两)。”④另外，新办的一批华商银行，招

①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第32页、第94页。
②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7页。
③ 中国银行编：《各省金融概略》，1915年版，第213页。
④ 马寅初：《马寅初演讲集》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一集第2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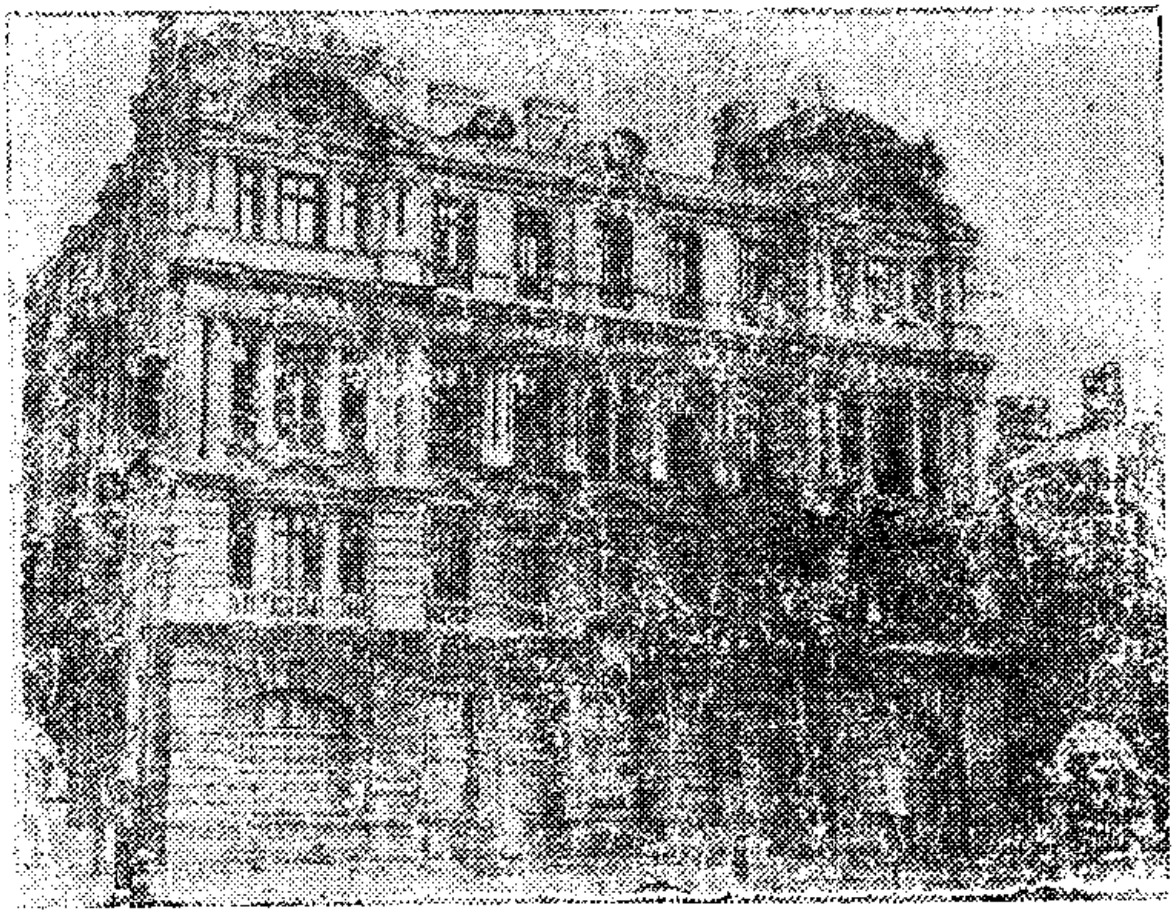
股筹款过程中，也有一笔相当可观的现银，需要有个暂存生息的出路，也是银拆急增的原因之一，如：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开办之际即有181万两白银"分存南北各钱庄代为拆息"①。其次，接受道库存款。《马关条约》对日赔款及庚子赔款加在一起本息共计近10亿两，都要以中国关税、盐税等收入偿付，而各地税收又"扫数解交上海关道"，由上海道与江海关向外国银行"拨解洋债赔款"。所以，上海道库"保管之款，为数独巨"②。1904年，清政府"责成江海关道将所收关税及赔款银两随时分别存放殷实庄号生息"。于是，上海钱庄又获得了巨额的"道库存款"，平均每月约600万两，常年存款约200万两。

银拆的猛增及道库存款，一方面使上海钱庄营业活动能力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由于银拆的90%以上掌握在外国银行手中，"一旦外国银行实行收回，可以致钱庄之死命"。③这又加深了钱庄的附庸性。无论是猛增之银拆，还是道库存款，都与赔款、外债有关，特别是道库存库完全来源于关税、盐税等税收，就使上海钱庄与国家财政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创办银行是中国朝野议论已久的事。19世纪50年代，洪仁玕就提议学西方、办银行。以后，容闳、郑观应等人又多次提出，80年代中期，李鸿章也提及这个问题。然而，华商银行却千呼万唤未出来。

甲午以后，巨额赔款、累累国债，清政府财政危机日亟；洋务企业资金日拙；"新政"以来所办的商办企业资金之短缺，这一切使"新式"银行之巨额利润，无论对于清政府户部、洋务巨子、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成了极大的刺激与引力。这就是说"国势商情已逼

①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页。
② 马寅初：《关税会议与关款存放问题》见《商业月报》第五卷，第12号。
③ 《马寅初演讲集》第一集，第231页。



中国通商银行

到此境界”①，促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诞生。

1897年5月27日，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办。以后又陆续兴办了一批。1897—1911年，全国共开办17家华资银行，其中10家在上海开设了总行或分行。（见下页附表）

这些银行由于各自性质不同，所以就地位与影响而言，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户部银行之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交通银行之兼有国家银行与专业银行性质，信成、信义等银行之为商业银行等等，各不相同。对于上海崛起的华商银行，帝国主义视若眼中钉，始则力图吞并，继则排斥打击。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无论是营业情况还是

①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第41页。

1897—1911年上海开办的华商银行①

开办年月	银行名称	总行所在地	沪行地址	备注
1897	中国通商银行	上海	中山东一路7号	
1905	户部银行上海分行	北京	中山东一路23号	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辛亥后改名中国银行。
1906	四川浚川源银行	成都	宁波路	1912年迁到南京路集益里。
1906	信成银行	上海	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	另外在北苏州路176号开办分行
1907	信义银行	镇江	北河南路鹏程里	马相伯发起创办。
1907	浙江兴业银行	上海	北京路230号	
1908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	上海	北京路240号	
1908	交通银行	北京	中山东一路14号	上海分行。
1908	裕商银行	上海	南京路	
1910	浙江银行	杭州	北京路39号	上海分行。

实际的地位，“外商银行与钱庄，”“均远在（我国自办的）新式银行之上。”② 然而，新式银行的开办依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大进步。

中国通商银行的开办及其营业活动是有重要影响的，这里略作介绍。

中国通商银行是盛宣怀发起创办的，额定资本500万两。1898年收足半数，其中100万两是由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投资，78万两由李鸿章、王文韶等洋务官僚投资，余为商股。它开办之际便确定了“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的方针，聘用英国人美德伦（A.M.Mai-

① 资料来源：《上海金融机关一览》上海银行周报社发行，1920年版；《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217—220页；杨荫溥著《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16—125页；徐寄庼著《最近上海金融史》，1932年，增改三版。

②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页。

tland)任洋大班①。银行章程规定："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并由银行给予"权柄单"。章程还规定："权归总董"，洋大班的权柄单"由总董给予"②。盛宣怀说：总董与洋大班之间"立有合同"，"如有不合，随时可撤"，另外还派陈淦兼充华大班"互相钳制"，"遇有要事，应由总董会议签押，然后照行"；对于人事权，权柄单上明确规定：洋大班可以"代本银行雇佣"，但是"须先将雇用之人姓名籍贯及从前所办何事详注单上，呈请各董核准，方可雇用"，如要停歇也必须"先与各董议妥"③。

通商银行开办初期，主要营业活动有三项。（一）吸收存款。1911年以前，除了得到户部拨存100万两以外，每年的存款最多时有346万两，最少时也有129万余两。除去少量零星散户，存款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企业及达官贵人的私款，如：1898年苏州道台的米款3万余两、仁济和保险公司存款40万两、江浙铁路公司存款80万两、荣禄的私款31万两等等。（二）拆放业务。放款对象既有洋行、钱庄、官办企业，也有民族资本的工厂企业，如：大生纱厂、大纯纱厂、龙章造纸厂、华兴面粉厂等等，1911年之前都向通商银行借款十至十五万两左右。（三）发行钞票。通商银行获得发行钞票的特许，于1898年开始发行。银元券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5种，银两券也有数额相同的5种，共发行银元券235万元，银两券50万两。这些钞票是委托英国，在伦敦印刷。正面印英文，反面印中文、满文，正反两面都印有龙纹及币值，并有洋大班的签名。

甲午战争以后，上海金融业成为控制中国财政经济的枢纽，是

---

① 《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2页。

② 《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上海市文化局文献委员会藏，转引自《中国第一家银行》第99页、101页。（文件系银行总董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等十人于1897年拟订，标题上的"中国银行"是指中国通商银行。）

③ 《时务报》第30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

1894—1898年清政府财政外债与上海的关系①

年月	借款名称	国别	款　额	抵押品	与上海的关系②	备注
1894年11月9日	汇丰银款	英	1000万两（库平银）	关　税	1、作为抵押品的关税，必须由通商各关备规银关票。此项关票须由江海关监督并两江总督盖印，由上海税务司签字，交付各有关外国银行上海分行收执。（指汇丰、德华、麦加利）此项关票可抵完中国通商各关税饷。 2、凡还本、付利在上海交付。由上海汇丰、德华、麦加利银行查收。	所借款项在上海以上海规银交付③。
1895年1月26日	汇丰镑款	英	300万镑（18,653,961两）	关　税		
1895年6月20日	瑞记洋款	德	100万镑（6,217,987两）	关税及江苏盐课、厘金		
1895年6月28日	克萨镑款	英	100万镑（6,217,987两）	关　税		此款在上海谈判成立，款项在上海交付④。
1895年7月6日	俄法借款	俄、法	4亿法郎（90,517,516两）	关　税		所借款项中500万两划入上海道胜银行作股⑤。
1896年3月14日	英德借款	英、德	1600万镑（97,622,400两）	关　税		
1898年2月19日	英德续借款	英、德	1600万镑（112,776,779两）	关税及七处厘金⑥		

① 本表资料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598—733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0页；《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168页。

② 本栏所列为各条约共同的内容。各条约与上海关系特有的部份见备注栏。

③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页。

④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56页—176页。

⑤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Ⅰ卷，第626—628页；第671—672页。

⑥ 这里所列七处厘金是指：松江、苏州、浙东、九江货厘；宜昌、鄂岸、皖岸盐厘。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Ⅰ卷，第733页。

庚子赔款及1901—1911年财政外债与上海的关系①

年月	款项名称	国别	款额	担保	与上海的关系
1901年9月7日	庚子赔款	各国	4亿5千万两（本息共计9亿8千2百2拾3万余两）	1、新关进款余剩。 2、进口税切实增至值百抽五增加的收入。 3、各口岸五十里内常关进款。 4、全国盐税。	1、此次款项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 2、有关各国派银行董事一名到上海，组成庚款委员会。 3、江海关税务司帮同办理。 4、各省摊赔每月应由各省备交上海。 5、各省汇交款项由上海道拨付各国在沪分行，由各银行出付回执。 6、1912年以后，关税保管权被汇丰、德华、道胜三家上海分行占据。一次世界大战后完全被汇丰银行独占。
1905年4月26日	镑亏借款	英	100万镑	关税及山西盐、厘、烟酒税	还本付息在上海处置，由上海汇丰银行查收。
1911年4月15日	币制实业借款	英、美、德、法	1000万镑	东三省烟酒税、出产税、销场税；各省盐斤加价。	1、由上海汇丰、花旗、东方汇理、德华银行经手收支。 2、度支部委托大清银行（以后改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办理。

由《马关条约》、《辛丑和约》的巨额赔款及随之而来的累累外债所决定的。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Ⅰ卷，第1005页—1006页；第Ⅱ卷第703页—710页。刘秉麟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9—41页。

日本凭借《马关条约》勒索白银2亿两，加上所谓“赎辽费”3000万两，总计2亿3千万两。为了偿付甲午军费及上述赔款，清政府在1894—1898年间，7次举借巨额外债。每一笔外债都与江海关及上海外国银行直接相关。

庚子赔款本息合计9亿8千2百余万两。清政府在1911年以前又举借二笔巨额外债。这些款项的具体处置，主要也在上海办理。

可见，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同时，由于国家的大宗财政收入落入上海外国银行的手中，当然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

四、航运、铁路、市内交通及通讯的新发展

1895年以后，上海的航运、铁路、市内交通、通讯设施，都有很大发展。为上海近代经济中心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马关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还规定了可以租栈房存货，免去内地各项杂税等等。以后，通过1902年中英商约、1903年中日商约，上海附近以至整个长江流域、大川小河的航行权完全开放了。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强烈地吸引着外国资本，经济侵略日趋深入。

甲午战争以后，英商大英轮船公司(P.&O.Co.)、海洋轮运公司(Ocean Steamship Co.)、中英轮船有限公司(The China Shippers Mutual Steam Navigation Co.Ltd)，法商的法兰西火轮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等等，继续控制着上海到欧洲的远洋航运；所应当注意的是日、美等国势力的日益发展，美国与上海之间的远洋航运的新发展，在于利用了巴拿马的铁路，开辟了由上海到纽约的捷径，使美国轮运公司的运费几乎压缩了27—47%，从而

"几乎独揽出口到中国的美国棉纺织品的运输"①。日本自从三菱邮船公司于1875年开辟了上海航线以后不久，便把中日间贸易运输"控制在自己手里"了②，1885年三菱、三井合伙开办了日本邮船公司，更进一步推进了在上海的远洋航运，1896年日本政府又实施了《航海奖励法》，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邮船公司"垄断了这个流通部门"③。与上述情况相应，美国的进口贸易于1892—1901年之间，由占上海进口总额的10%上升到14%；日本则由7%上升到11%④。

就埠际贸易而言，自从1872年旗昌轮船公司将"它的全部财产，以二百二十万两的高价卖给中国的轮船招商局，结束了它在中国内河和沿海的十五年的活动"⑤。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以及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迅速取代了旗昌公司的地位，垄断了中国沿海与内河的航运，竭力地排斥、打击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势力挤进了内河、沿海航运业。1896年，日商大东新利洋行(大东轮船公司前身）的火轮开始航行于上海—苏州之间。1904年前后，日本邮船公司在上海买下汇山码头，创办湖南轮船公司。不久，法国东方轮船公司也插足长江流域航运业。同时，上海民族航运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897年，盛宣怀宣布对"内河小轮之权利招商局不再过问"，解除了在内河航运中民族资本"不准另树一帜"的禁令。不久，就有戴生昌等几家商办内港轮船公司行驶于杭州、嘉定、苏州、上海一带；1903年以后，又有大达内河小轮公司、沪绍行轮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嘉沪轮船局；在沿海

① Commercial Reports,1880年，上海，第99页。

② American Neptune,1957年10月，第313页。

③ 柴垣和夫著《三井和三菱——日本资本主义与财阀》，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第50—51页。

④ 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51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272页。

航运方面，还有崇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宁绍轮船公司以及担负着北方海区沿海航运的开平矿务局船队，专航于上海——秦皇岛——天津——营口一线。

随着航运业的发展，上海的河道、港岸设施也有改善。

《辛丑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在上海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革水道各工。"并专门开列了实施细则①。反映了上海港的吞吐量迅猛发展的要求。进出上海港的轮船，1875年进出3854艘，总吨数达259万吨；1895年发展到6807艘，740万吨；1901年达到8361艘，1078万吨②。但是，1905年前后，黄浦江河道"在非常浅潮时期，河口沙滩（吴淞外沙）深仅15呎。溯江而上约三哩，航道分为二，其一极浅，仅及八呎，只便帆船往来；其一为'旧船航道'有沙滩。吴淞内滩潮水极浅时，深只十呎至十一呎。自两河道间岛屿之上端，以达公共租界，航道殊广，但有数处浅滩起伏。在港口本部，河床深处过于狭小。江面过狭之处有二。自汇山起（指汇山码头——引者）有沙滩一"③。这种状况与上海港吞吐量的迅速发展很不适应。

1905年，上海建立黄浦河道局（后改称浚浦局），负责疏浚黄浦江河道。从1905—1912年，吴淞外沙滩由原深15呎开挖到21呎，吴淞内沙滩则基本被铲除了，原来仅8呎深的帆船航道，加深到了19呎④，足供轮船进出。当然，得益者首先是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从拓宽加深的航道中获得了优越的航运条件，更由于浚浦局掌握着"自江南制造厂起，至扬子江口止"河道两岸的"涨滩公产"⑤，

---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Ⅰ卷，第1007页—1008页。

② 罗志如编《统计表中之上海》1932年版，第52页。

③ 原载浚浦局丛书第八种《上海商埠》1929年版，第104—105页，这里转引自《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三编，第516—517页。

④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三编，第5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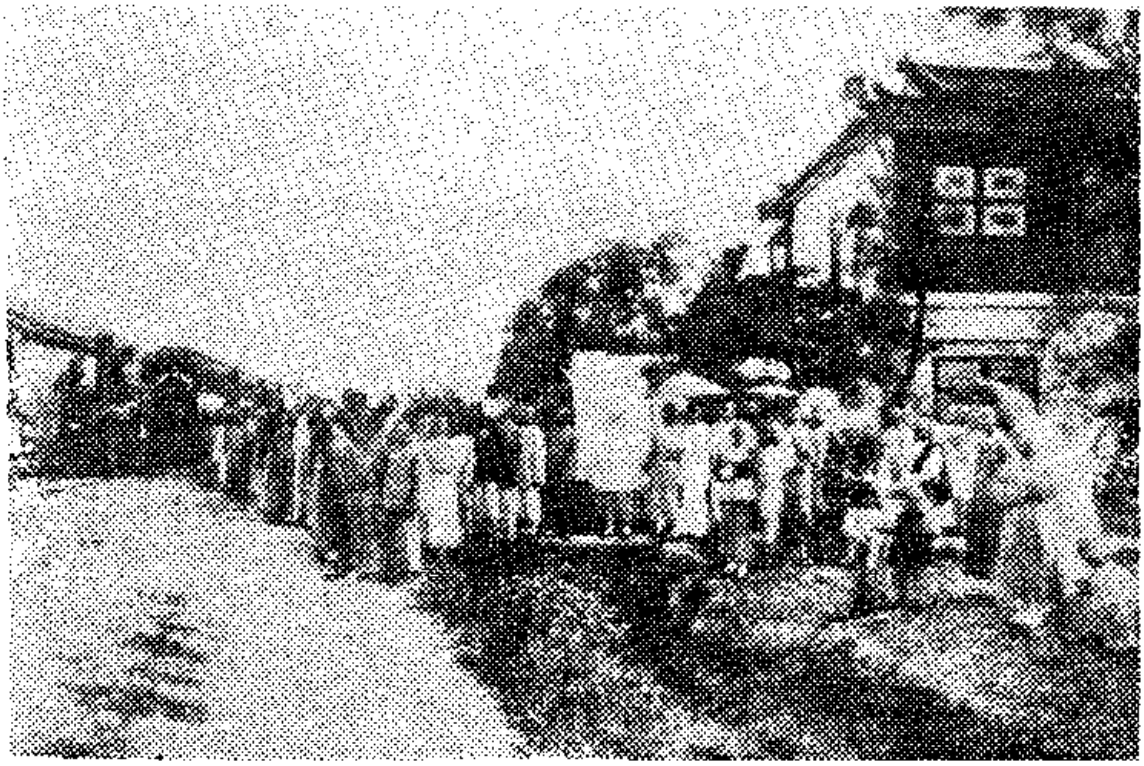
⑤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三编，第515页。

而为帝国主义霸占港岸大开了方便之门。

1895年以后，上海港港岸设施也有很大的发展。在上起白莲泾、下至东沟，长 108,518 呎的上海港岸上，据 1866 年统计，浦西有仁记码头、旗昌码头、琼记栈等 17 处，浦东一线有怡和栈、李百里栈等 17 处（其中包括天后庙、外国坟地在内）。到了 1906 年，上海港岸增添了大工厂 20 家、造船厂（船坞）三家，轮船公司六家，还有三大煤、油码头①。

在此期间，上海铁路运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通过"铁路借款"，大肆攫取在华建筑铁路权。清政府也在建筑铁路方面作了一些努力。1896 年，清政府委派盛宣怀为总办，自筑淞沪铁路，1897 年 2 月 17 日开工，翌年 8 月 5 日完工，9 月 1 日正式通车。20 世纪初，又有几条铁路开筑、通车。其中，沪宁铁路于 1905 年开始修筑，1909 年 4 月建



淞沪铁路通车

① 《上海社会研究的背景》第 19 页—29 页。

成通车；沪杭甬铁路的苏路段，于 1907 年 4 月动工，1909 年 9月沪杭线通车。稍后，津浦铁路于 1911 年从黄河南北二边，南北分路通车（1912年黄河大铁桥建成，全线通车）。这样，到辛亥革命前后，上海铁路已可南到杭州，西到南京，北达天津了。

上海市内交通的近代化，包括城市道路建设与运输工具的近代化两个方面。近代化的马路首先出现于租界。1895年以前，从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到六马路（今北海路），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到军路（今徐家汇路）等等都已建成。它们的延伸与发展往往是不合法的，即“越界筑路”。越出租界修筑道路，当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但道路的筑成，却促进了市内交通的发展。1890年前后，公共租界已经越界筑路 40 华里之多。

1895年以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更加紧了界外筑路。公共租界工部局先后修建了虹桥路、白利南路（今长宁路）、罗别根路（今哈密路）、北四川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等；法租界公董局先后修建了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一段）、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等二十多条马路①。

上海市内的货运工具，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还是杠棒、绳索与人的肩背。60 年代，从苏北传来了小车（独轮车），一人推行可载货 400—500 斤②。80 年代后期，出现了新的人力货车，它形似卧榻，故称榻车，运货可达一吨，且稳定安全，逐步得到推广③。20世纪初，又出现一种车身狭长，行动灵活的人力货车，俗称老虎车，更能适应日益拥挤的大街小巷④。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上海货

① 上述资料参阅《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89—101页；郑祖安著《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见《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1—205 页。

② 《申报》1876 年 2 月 17 日。

③ 《工部局年报》1887年，第 56—57 页。

④ 《工部局年报》1903年。

运主要依靠上述三种人力车。据1912年统计，上海有棚车650辆，老虎车305辆，小车5790辆。值得指出的是辛亥以前在公共租界已有了四辆货运汽车。①

与近代化交通迅速发展的同时，上海又成为我国最发达的近代讯息中心。

1896年3月，大清邮政总局在上海海关后院正式开办。以后，总局虽然迁往北京，但是各地邮件"概须由上海转寄，于是上海邮局遂成为各处邮局转寄邮件之要枢"②。

与之同时，上海还成为我国有线电报、电话通讯最发达的先驱城市。自从1884年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到上海，到1895年，上海在国内的通报范围已经北通北京、东北到山海关、西北到西安，西及汉口、西南直通沪州，南已可与广州通报了③。近代国际有线电报，自从1871年4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将第一条国际水线由香港敷设到上海以后，于当年8月又从日本长崎将水线引伸上海，1883年5月，英商大东电报公司又将欧洲——新加坡——香港——川石山的国际水线伸展到上海。到20世纪初，上海的国际有线通报已可以直接与日本、香港、新加坡，直至欧洲联系，另外还可以由陆线转接恰克图，进而通过俄国西伯利亚陆线的转接与欧洲通报了④。上海还是近代市内电话通讯的先驱，早在1882年2月，大北电报公司就在外滩建立了第一个电话交换所；1907年10月，上海正式建立了电话局并开放电话安装、通话；到1910年，英商上海德律风公司已在上海安装了一万号电话交换设备⑤。

20世纪初，上海又首批进入了发展无线电通讯的行列。1908

---

① 《工部局年报》1912年。

② 谢彬著《中国邮电航空史话》，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79页。

③ 参阅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话》、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等著作。

④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226页—228页；第64—66页。

⑤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227页—229页。

年，淞崇无线电报局建立，开始应用长波无线电通报；同年，外人在汇中旅馆安装无线电报作为商用电台，受到舆论反对，于1909年由清政府收买拨归上海电报局，这一年上海电报局就应用500瓦火花式无线电报机开办船舶电报业务①。

上海，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了。甲午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以前，这10多年间，上海的近代工业、航运、铁路、市内交通、通讯技术设备都有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上海金融业的发展，使上海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多功能的经济中心。这样，上海就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她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也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

①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229页；《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勃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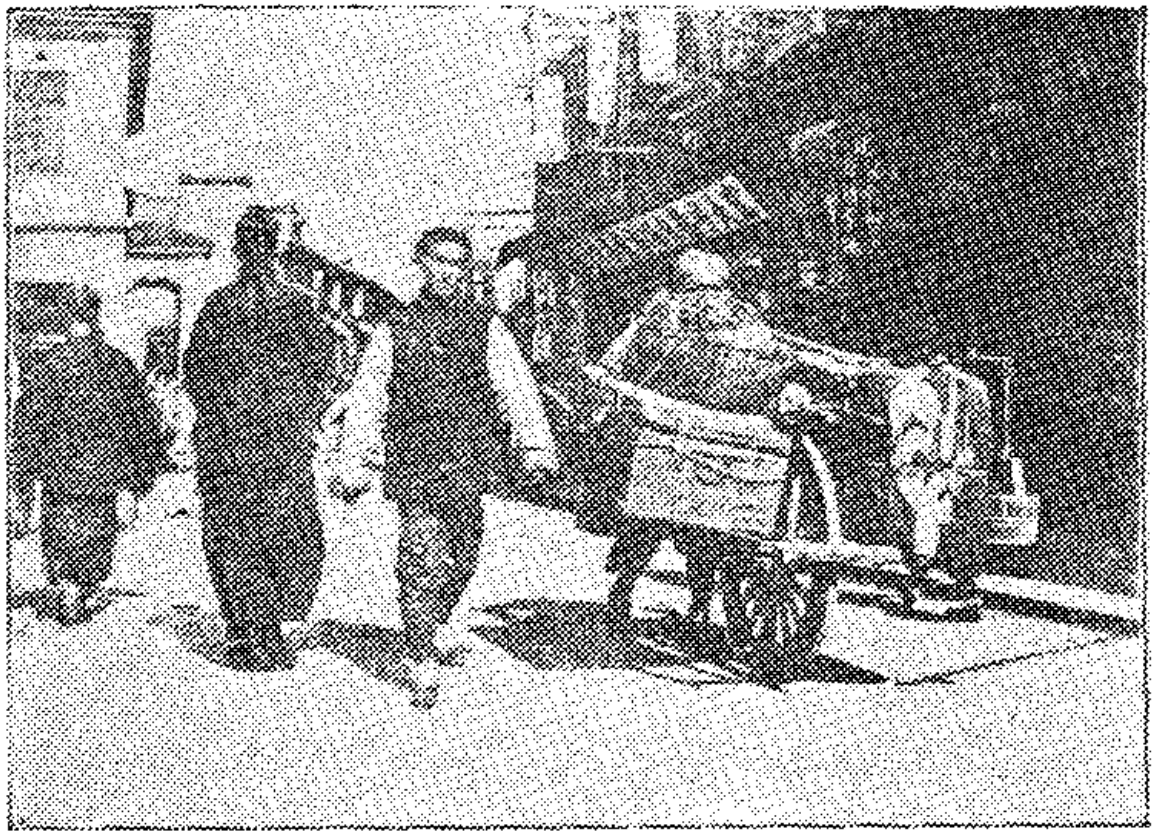
一、革命派风云际会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以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向中国勒索了4亿5千万两巨额赔款，本息共计9亿9千多万两；並且强迫中国拆毁大沽炮台及从京师到渤海一线的所有炮台；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规定清政府向侵略者"谢罪"。至此，在人民心目中，"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发矣"①。

20世纪初年，中国革命风潮的萌发，主要策源地有两个，在国外为日本，在国内则是上海。

在晚清风云多变的政治斗争中，上海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可以利用的一块特殊地方。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是在上海英国领事的庇护下逃往香港然后避地海外的。康有为自记此事云：1898年9月24日抵沪，英领事命人告以朝廷正在缉拿康有为，一旦捉到立即"就地正法"的消息，并以兵船将康有为藏匿起来。上海道闻讯，"连日搜船，追问英领事甚急，既知救在英船，派人来，则船主不准登船。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来，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夹护之"，

① 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第一册第9页。



清末上海街景

最后将康护送到香港① 。戊戌政变时，著名维新派黄遵宪正滞留上海，朝廷谕令查拿，上海道派兵围住黄的寓所。租界当局“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许捉人，并派巡捕、包探多名，准备截留黄遵宪。英国驻沪总领事向清政府南洋大臣声明：“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问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② 寓沪西人亦恐黄遵宪遭受不测之祸，“议聚众劫之他徙”③ 。尚未果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适在上海，乃电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请其援助。林权助遂向总理衙门“抗议此举有碍中日交谊”，借口是黄原被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后开缺。总理衙门迫于压力，只得令上海道放黄出走。1900 年 8 月，自立军起义失败，参与其事的 湖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 163 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戊戌变法》第一册，第 326 页。

③ 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235 页。

南人龚超逃入上海租界，同年12月，被清总兵颜某派人诱出租界逮捕。事为龚超一位友人侦知，乃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及英领事求助，“英官以清吏此举影响租界主权及居民治安，遂在会审公廨提出抗议，卒将龚超提回租界审讯”①，判以无罪释放。龚超出狱后，又投身反清革命。这些事实向人们表明，在上海这块地方，清朝的统治权力已不能象在其他地方那样充分行使。

上海，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通商口岸经营的最大租界所在地。在租界内，帝国主义者设置了行政、司法等较为齐全的统治机构。租界当局按照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进行统治。英美日等国与清政府有着尖锐的矛盾，对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尤为不满，所以，他们对反对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的维新派比较同情。租界当局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进行统治，实行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法治，对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有着本能的不满。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只要不杀人放火，只是用文字或口头宣传反对统治者并没有犯罪。所以在租界当局看来，康有为等人所作所为，从法律上讲也是无罪的。租界里住着众多的外国侨民，至1900年，法租界有外国人622人，公共租界有外国人6774人，这些外侨从事着商业、工业、传教、教育等各种不同的职业，他们希望有一个民主、自由、安定的环境，租界当局自然不肯让清朝政府干涉租界事务。这样，在租界、清廷、新党这三角关系中，租界有时就会倾向新党，而新党也注意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的环境。特别是在戊戌政变以后，京师等地乌云压城，上海这一地方对维新派、革命派来说，更有吸引力。可以说，象反对“己亥立储”那样大规模的请愿，如果不是在上海，那么在国内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看到了这点，利用了这点，使得上海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活动据点，成为他们在国内的最主要集结地。蔡元培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

---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0页。

盖自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①。

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蒋智由、林獬、叶瀚、王季同、汪德渊、乌目山僧(俗名黄宗仰)等集议成立中国教育会。4月27日，中国教育会正式成立，会址在泥城桥福源里，蔡元培被推为事务长即会长，王慕陶、蒋智由、戢翼翚等为干事。以后陆续加入此会的还有钟宪鬯、吴稚晖、陈竟全、章太炎、金天翮、屠寄、丁祖荫、龙泽厚、徐敬吾、吴葆初、敖嘉熊、蒋维乔、马君武、马叙伦、陈范、张继、刘师培等人。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1892年考中进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补编修，但他不以做官为意，思想维新，1898年9月回绍兴兴办教育，提倡新学，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他愤于清廷之腐败，渐生反清之志。1901年7月，他来到上海，受聘为上海澄衷学堂代理监督，8月，又应聘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9月，清廷令各地书院一律改为学堂，教科书成为最迫切的需要。蔡元培熟谙中学，又通西学，在士林中威望甚高，他于是邀集同志，以兴办教育为号召。中国教育会其他创办人亦多为思想激进者。蒋智由，字观云，后成为有名的改良派，那首脍炙人口的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堪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就是出于他的手笔。林獬，字少泉，改名白水，后来成为知名的革命派、著名报人。叶瀚，字浩吾，本是上海格致书院学生，创办过《蒙学报》，反对"己亥立储"请愿的参加者，"中国国会"的发起人之一。其他王季

① 蔡元培：《读章氏所作〈邹容传〉》，《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0页。

同、汪德渊、乌目山僧都是当时上海比较活跃的新派人物。

中国教育会成立后，蔡元培于同年夏天游历日本，适遇中国留学生入学成城学校受阻事件发生。吴稚晖、孙揆均因出面与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抗争，被日警逮捕，旋被勒令回国。蔡元培担心吴等回国将受清廷严惩，慨然承担护送之责。8月13日抵沪，教育会举行了欢迎大会。吴稚晖从此成为中国教育会的重要人物。

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知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①，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计划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及有关学术诸书，创办工厂、公司。这些后来多未实现，因为这个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不久，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便把这个教育会卷到革命的旋涡之中，成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团体。

南洋公学是当时上海唯一的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学校的教员、学生中每多热血爱国之士，当时社会新旧思潮的冲突在这里反映得特别明显。学生们爱读新书，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东京留学生办的《国民报》在这里大受欢迎，大家都很崇拜梁任公，有的学生别号也署作"××公"。他们组织了一个演说会，以爱国为宗旨，明确宣称："惟现在之国不必爱，而未来之国良可爱也；老大帝国奚足爱，新中国则必爱"②，可是学校里有些教员的头脑却很冬烘，他们只准学生阅读《大清会典》、《圣武记》一类书，禁止学生看新报新书，甚至学生的衣着入时一点也看不惯，"压迫得很厉害，黑袜子也不许穿，说是流氓；白鞋子又说走起路来没声音，好象是扒儿手"③。五班的国文教员郭镇瀛尤为守旧，一味强调忠君守礼，反对新思想、新学说，学生们都很鄙视他。1902年11月16日，郭镇瀛上课时，发现讲桌上（或说座椅）放着一只洗净的墨水瓶，便认定

① 《选报》第21期。

② 李新：《中华民国史》一，上，第145页。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70页。

是学生有意侮辱他(因郭面型似一倒置之墨水瓶)。他当时大发雷霆,责令坐在前面的学生伍正钧三天之内查出放置墨水瓶之人。3天后,伍答无法查出,郭便蛮横地说:"反正是你们这一群学生捣的,你代他们记大过一次"。过了几天,郭声称已查出放瓶之人,并通过校方,以知情不报之罪名将伍正钧、贝均和陈承修三个无辜的学生开除了。五班学生不服,当晚开会议论此事。第二天,学校当局又以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着全体一律开除"。这引起全校学生公愤,大家一起罢课,排着长队向督办盛宣怀请愿,结果不得要领,全校6个班学生愤而集体退学。蔡元培同情学生,向校方力争无效,也辞职离校。

南洋公学退学学生约200人,后经校方和家长的劝诱,返回一部分,但仍有145人坚不返校,知名者有贝季同、穆湘瑶、沈联、胡炳生、俞子夷、伍正钧、平海澜、张季源、张大椿等。蔡元培规劝大家:"不要散,我们组织一个学校"。中国教育会本有创办学校之意,于是趁此机会创办了爱国学社。

爱国学社校址设于中国教育会楼上,后又添租左邻房屋,并租右邻空地作操场,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任学监,教员有蒋维乔、叶瀚,以后又添聘了章太炎等人。学社经费主要由乌目山僧向哈同夫人罗迦陵募来的10000元(因罗信佛,拜乌目山僧为师,故有此捐),蔡元培向南京蒯光典借来的6000元,还有学生自捐的一小部分。爱国学社于1902年12月14日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代表中国教育会致辞,提出办学方针:一、养成国民的资格;二、锻炼督制社会的手段;三、将理想普及于全国。实质是要学生以民主爱国的精神自勉。

爱国学社极为重视向学生灌输爱国、民主思想。其章程明白宣示:"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① 吉田氏即

① 《选报》,第35期。

吉田松阴，西乡氏即西乡隆盛，二人都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推动变革的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是他们在维新前后的讲学之所，他们向学生灌输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对中国青年学生影响很大。爱国学社学生分寻常与高等两级，学制定为二年。寻常级设有修身、算学、理科、国文、地理、历史、英文、体操等课，高等级除了这些课程外，还有伦理、心理、论理、社会、经济、政治、法理、日文等。学生管理采取民主自治的办法，学生分为若干联，每联20—30人，听任学生自行加入某联。每联公举一联长，凡有兴革，多由学联开会议决，交主持者执行。学校也实行民主管理，最高行政人员称议长，议长下面有个评议会，一切学校行政都要由评议会讨论。

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影响下，南京陆师学堂于1903年春也发生了学潮。爱国学社派吴稚晖前往声援，陆师学堂学生章士钊、林懿均等31人退学来沪，进入爱国学社。爱国学社规模扩大不少。

爱国学社教员思想多较激进，蔡元培、吴稚晖均对清廷不满，章太炎上课并不用课本，只是坐着闲讲，“多述明清兴废之事”。学社每周在张园有一次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①，演说者除蔡、吴、章等教员外，还有一些学生。这样，以爱国学社为基地，以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为中心，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有的是从日本回来的，各省来的人也很多”②。张园演说成为当时宣传革命著名之举。

二、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

叙述拒俄运动之前，先略述一下十分短暂的拒法运动。

---

①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73页。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载消息：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当地游勇，请求驻屯谅山的法国军队入境援助，同时向法国洋行借贷巨款，答应事平之后以全省矿权作为酬谢。消息震动了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各界。4月25日，在留日学生的激励下，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联络寓沪绅商300—400人，在张园召开拒法大会。会上，广西人龙泽厚首先登台演说，号召对于卖国的王之春，“我们广西人应共食其肉”。随后，徐敬吾、关德甫、马君武、梁啸庵、钱宝仁、吴稚晖、邹容、倪士铨、蔡元培、叶瀚、冯镜如等相继演说，“宣明外兵干预为中国亡国之原，西粤沦亡为全局糜烂之始”，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共阻王之春的卖国行径。会议通电清政府，强烈要求严阻法兵入境，并要求免去王之春官职以谢国人。第二天，他们又在广肇公所集会，通电全国，呼吁各地各界人民声援“拒法惩王”的斗争。后来确凿消息证明，所谓向法国借兵借款之讯，乃系误传，并无其事，拒法风波随之平息。拒法运动虽稍纵即逝，却反映出了当时上海人民炽热的爱国情感。

拒俄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01年，二是1903年4月至9月，三是1903年10月以后。1900年，俄国在参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同时，单独出兵强占了东三省，并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这个章程规定沙俄交还奉天，但要在沈阳设总管一员，奉天将军所办要政，均应让总管明晰；规定奉天省城等地留俄兵驻防，在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解散。这实际上是要永远霸占奉天。这一章程被清廷否决，增祺被“交部严加议处”。驻俄公使杨儒与沙俄重新交涉归还东三省问题。1901年2月16日，沙俄提出旨在独占东三省和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约款12条，主要内容有：沙俄留兵保护东三省铁路；沙俄有要求革办中国东北将军大员的权利；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中俄边界各处矿权及他项利益，不得让与他国，中国不得在这些地方自行造路。消息传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杭州、苏州、港澳及海外华侨

纷纷集会、致电、抗议沙俄侵略，要求清廷拒签这一约款，其中以上海声势最大。

1901年3月15日，上海各界200余人在张园集会，致电清廷与各省督抚，并致电中国谈判代表杨儒，要求“力拒俄约，以保危局”。会上，汪德渊（后为中国教育会成员）发表《告中国文》（又称《告同志文》），揭露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指出如果清廷一旦签约，“诸国亦必相率效尤，则我禹域神州不出一月之间，将尽沦于异族，衣冠之胄，从此降为奴隶矣，神明之裔，从此夷为牧圉矣”，呼吁全国“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① 接着，汪康年、温钦甫、蒋智由、薛仙舟相继发表拒俄演说。

这次集会以后，风传沙俄胁迫中国谈判代表将于3月25日、26日正式签订约款。上海各界于是又发起一次拒俄集会。3月24日，士农工商各界近千人集会张园，外国人来旁观者亦有几十人。会上，问天居士、王子琦和另一人各出撰文一篇，宣示公众，然后，先由孙仲瑜演说此次集议宗旨，共4条，内称：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中国主权之心，“此次集议，筹挽救俄约之法，以后凡我同志之人，务各劝导乡里故旧、族党亲戚及新进后辈，使人人知中国危亡在即，非开通智识不能竞存立于地球之上，即不能保守中国向有之土地，若至土地既失，则牛马奴隶听命于人”②。接着，吴趼人、何春台、蒋智由、温钦甫、陈澜生、吴君遂的代表方守六、李惟奎、孙季刚、黄宗仰、周雪樵、魏少塘、汪康年、薛锦琴、钱维骐等十几个人相继发表演说，时人记载谓：“诸君均极激昂慷慨，听者耸然拍手称是，其沉痛处能令闻者兴起。”③ 其中薛锦琴为一女子，仅十几岁，演说很有特色，她不但揭露、抨击沙俄，而且把批评矛头直指清廷。她说：“中国之败坏一至如此，推原其故，实由居官者无爱国之

①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
②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
③ 《纪第二次绅商集议拒俄约事》，《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

心，但求保一己之富贵，互相推诿，将一切重大要紧之事任其废置，而在下之士民又如幼小之婴儿，不知国家于己有何关系，视国家之休戚，漠然不动其心。”① 这不仅攻击了昏官，而且触及到封建专制与国家败弱的关系。当时报纸评论薛的演说“洞明时势，慷慨陈说，尤令人钦佩无已”② 。大会致电清廷，要求“勿受恫吓”，坚拒约款；致电刘坤一等地方督抚，求速奏请朝廷，宣示约文，请各国公断，以冀挽回大局。大会同时致电伦敦，请英国政府出面“倡义力阻”。

上海 1901 年 3 月的这两次拒俄集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苏州、南京、浙江象山、杭州、营口、香港等处爱国之士纷纷来电来函上海，赞扬上海爱国志士“发愤力争，义声传播，遐迩钦佩”③ 。有些人还寄来银元，以示援助，数目有60元、10元、1元不等。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在中国谈判代表的据理力争下，沙俄所拟 12 约款终于作废。1902 年 4 月，中俄代表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军队在 18 个月内分三期从东三省撤出。

1903 年 4 月 8 日，按照条约，是沙俄从东三省第二期撤兵的期限，沙俄理应履行条约，从金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等处撤退军队，谁知，蛮横的沙俄届期拒不撤兵，并制造借口，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4 月 18 日，沙俄向清廷提出 7 项新的要求，力图使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消息传出，不屈的中国人民又愤怒了。

4 月 27 日，由汪康年等人发起，上海各界 1000 多人又一次集会张园，数十人发表演说，抗议沙俄的侵略。会议认为，“俄人蟠踞东三省，久假不归之意愈益彰著。如我国人不行力争，必立致瓜分

---

① 《薛女士锦琴演说》，《中外日报》1901 年 3 月 27 日。

② 《中外日报》1901 年 3 月 25 日。

③ 《苏州许君来函》，《中外日报》1901 年 5 月 7 日。

之祸"①。会议致电外务部，声明"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会议还致电世界各国外务部，声称对于俄国新的撤兵条件，"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无涉"②。会上，演说者声泪俱下，参加者群情激愤，大家争助捐款，表示一片精诚之心，甚至有人当场脱下钻石戒指作为捐助。

4月30日，由冯镜如、易季服等发起，上海1200人再次集会张园。爱国学社、育才学堂的学生，务本女校、爱国女校的女学生参加"尤见踊跃"。会前，冯镜如等发起成立中国四民总会议事厅，"此会以保全中国国土主权为目的，凡一切与中国有关之事，会中人皆当设法干涉之"③。会上，蔡元培、叶瀚、黄宗仰、王季同、吴稚晖、龙泽厚等人均表示赞成，最后议定将名称改为"国民总会"。会名议定之后，蔡元培首先登台演说开会旨意，接着马君武演说，随后，"诵《爱国歌》前二章，千人同声，音节甚壮。既而争先题名，中国万岁之声震屋壁"。

会议正在进行之中，东京留学生发来电文："俄祸日急，留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愿赴前敌，求协助"。蔡元培读完电文，与会者皆感振奋。中国教育会会员龙泽厚高声说："吾上海同志独非中国国民乎？东京学生可结义勇队赴战，吾辈岂可放弃责任耶？"④说完，率与会者站立大草场，排成队伍，向东一鞠躬，以表示对东京留学生的敬意。礼毕，复入座，讨论组织义勇队以响应东京留学生的事。同时，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致电东京留学生表示赞成，并且特派汪德渊、朱莲溪二人赴东京联系。

会后，爱国学社学生即组织了义勇队，但一时缺乏教练人选，

---

① 《张园会议传单》，《苏报》，1903年4月27日。
② 《寄各国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3日。
③ 《中国四民总会处知启》，《苏报》1903年4月30日。
④ 《张园集议》，《苏报》1903年5月1日。

无法积极进行。适值此时，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潮，章士钊、林懿均等31人离宁来沪，进入爱国学社。这些学生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正是理想的军事教练。于是，由章士钊、林懿均等和学社中原有之体育教员何海樵、何山渔分任教练。旋得东京电，留学生义勇队已改名军国民教育会，上海义勇队于是也相应改名为上海军国民教育会，并致函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表示此会虽由拒俄发起，但以后当推广开去，对于一切外来侵略都要誓死反对，“直与普世界外族异种战死而止”，并且发誓将此斗争进行到底，“东京虽散，永远不散；东京虽散，上海不散；肢体虽散，灵魂不散”。信首第一句话就是：“军国民教育会万岁！万岁！万岁！”激奋之情，溢于言表。爱国学社的教员、学生共有96人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分为8小队，早晚训练，以应拒俄之需。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蒋维乔均为会员。据一位会员回忆，训练时，“蔡师亲自参加，对学员更多鼓舞。他同样穿操衣上操，从不脱课，同样轮做小队长，学喊口令”；操衣的领、袖、裤管上均饰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①。

尽管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沙俄还是不肯从东北撤兵。1903年5月，尼古拉二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废除交还中国东北的条约。10月，沙俄宣布停止同中国谈判，派兵1000余人，强行占领奉天，在清行宫及将军衙门等处，升起沙俄旗帜。东北人民奋起反击，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拒俄运动。但是，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这次运动都没有上次声势浩大。在东京，因不少拒俄积极分子回国分头活动去了，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在上海，因苏报案的发生，声势也大逊于前。

1903年12月，蔡元培、叶瀚、王季同、陈竞泉等在上海组织了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在愚园集会一次，签

① 俞子夷：《回忆蔡元培先生和草创时的光复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七辑，第6页。

名的有100多人。同时发刊《俄事警闻》报纸，社址设在新马路华安里703号，后迁新马路昌寿里52号，1904年1月12日正式成为对俄同志会机关报。《俄事警闻》自12月15日创刊，日出一期，至1904年2月25日终刊，共出73期。26日起，改名为《警钟日报》，继续出版。

《俄事警闻》以大量文章揭露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讲俄国夺我们东三省的来历》、《说庚子年俄国夺占东三省的情形》、《讲俄国夺我们黑龙江近地的事》等文章，配以揭露俄军屠杀、残害中国人民的漫画，堪称是沙俄侵略东三省的简明历史。《俄事警闻》警告国人，沙俄侵占东三省，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此报第一号便刊出一幅《瓜分中国图》，告诉国人瓜分之祸迫在眉睫。

《俄事警闻》发表了《告政府》、《告外务部》、《告领兵大员》、《告留学生》、《告村塾师》、《告全国儿童》、《告全国女子》、《告出家人》、《告无业游民》等70多篇以《告×××》为题的文章，呼吁全国不同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和不同阶级、阶层、职业、政治态度、宗教信仰的人们振奋起来，共抗沙俄。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对俄同志会"以时局迅变，非复可以对俄二字为吾人唯一之责任"，于是在3月13日议决改名为争存会。

对俄同志会成立以后，上海还成立了对俄同志女会，会址在上海大南门宗孟女学堂内，郑素伊、陈婉衍、童同雪三人为总议长，郑素伊独力捐银三千元作为会费。1904年1月21日，对俄同志女会决议设立中国赤十字会，拟于宗孟女学堂内，添设医学科，聘医学女教习，讲述速成医学，并购买医疗器械及药物，"谓中国一旦有事，愿赴战地云"①。

---

① 《对俄同志女会之议案》，《俄事警闻》1904年1月26日。

拒俄运动既反抗沙俄的野蛮侵略，也反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朝廷既已无法又无力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的人们（主要是学生）只有凭着一腔热忱，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侵略斗争了。因此，群众性的拒俄运动本身，就是对清廷的极大不信任和抗议。爱国的人们自然容易由拒俄而产生反清的情绪。《中国白话报》上有一篇文章尖锐地揭明了拒俄与反清革命的关系：

> 就是俄罗斯将我们十八省都要抢去，将我们四万万同胞都当做他的牛马，那个贱种的皇帝也不来管你。他们只有本事管我们中国人，平常称甚么大□（当为清——引者）皇帝，圣明天子，只要见了俄国人，就象小鬼见阎王一般……我们现在若不去想法子，快快救我们的国，恐怕不久我们的财产都要被那些不要脸的贱种败完了，我中国人种都要灭尽了。唉！现在我们还不去想法子救我的祖国吗？若然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必定要把那些贱种赶出去，然后可以救我们的国。只有这一线的生机在这里，那是甚么呢？就是革命排□（当为满——引者）。①

对于沙俄各种贪婪的侵略要求，清朝政府和不少地方督抚包括中国驻俄公使亦曾据理力拒，但是对待群众性的拒俄运动，清廷则持反对态度。他们一怕群众集会容易导致革命，二怕人民拒俄妨碍他们与帝国主义的联系。1903年5月，正当上海拒俄运动怒涛翻滚之时，署湖广总督端方便致电两江总督，谓上海爱国学社生徒，响应东京留学生，组织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并妄度此事“必有康、梁、孙文诸逆居中主持”，要求查禁拿办②。张之洞在一份致刘坤一的电报中，也把拒俄与革命联系起来。电云：

> 新党因俄约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

---

① 吴弱男：《告幼年诸姊妹》，《中国白话报》第十二期。

② 《密札防匪》，《申报》1903年7月1日。

人，满口皆“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多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等语。查此等议论举动，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能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①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曾于1903年6月派钮永建、汤尔和二人往天津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劝袁对俄一战，袁拒之门外，不予理睬。这在当时影响很大，增加了爱国学生对清廷的不满。《苏报》1903年6月5日披露了一则清廷严拿留学生和禁止拒俄运动的上谕，要各地督抚对于回国学生“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青年学生一片爱国热忱，换来的却是血腥镇压。学生们愤怒了，一切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愤怒了。《苏报》上刊载了张继的一篇文章，及时地道出了压在人们心底的愤懑：

> 试问汝满人入我中国以来，我果何负于汝？汝竟以我大地江山，为汝之囊中物，送人赠友，毫不顾惜？……非因不去，良果不佳；小丑不除，大敌难御……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②

反清革命的怒涛在拒俄爱国的狂飚推动下卷地高涨。

三、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1903年，上海发生了史称为“苏报案”的震动中外的事件。其事，显露了清廷必欲置革命人士于死地的决心，也显出了清廷对革命力量的恐惧。效果适得其反，镇压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增强了人民的斗志，而革命之势骎成燎原。

---

① 张之洞：《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张文襄公电稿》，1918年排印本，第45卷。

② 自然生(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年6月10日—11日。

《苏报》原是一份普通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由胡璋经理，其妻生驹悦为日本人，胡璋便以她的名义在日本总领事馆注册。《苏报》初聘邹弢主笔，刊载一些市井琐事、社会新闻。由于经营不善，难乎为继，1898年出售给陈范。

陈范，原籍湖南衡山，生长于江苏阳湖（今常州），又名彝范，字叔柔，号梦坡，1889年乡试中举，再未应试，任江西铅山县知县，1894年因教案落职，滞居上海。其兄陈鼎本系翰林院编修，因同情康、梁获罪，被削职监禁。陈范"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于是出资购下《苏报》自办。苏报馆初设公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外滩，陈范接办后，移至汉口路27号，以后便一直在这里。其规模很小，据人回忆：

> 那时的《苏报》是怎样的呢？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后两间。前半间有两张大写字台，陈梦坡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台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所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再说那后半间呢，一边是排字房，排列几架乌黑的字架；一边是一部手摇的平板印报机。这排字房与机器房，同在一房，真有点挤了。前半间沿街是两扇玻璃门，玻璃门每扇上有"苏报馆"三个红字。推门进去，有一小柜，柜上有一块小牌，写着"广告处"。这位专管广告的先生，和气极了，见了人总是含笑拱手。①

陈范聘其妹婿汪文溥协助办报。汪文溥字幼安，号兰皋，举人出身，也是阳湖人，思想亦颇进步。陈范接办以后，《苏报》政治色彩日趋明朗，先是抨击顽固守旧，宣传改良维新，继而不满专制独

①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82页。

裁，宣传反清革命。

《苏报》倾向革命，以报道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为起点。1902年12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以后，《苏报》即加报道。1903年初，陈范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达成协议，由会、社成员供给《苏报》每天刊登的材料，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按日轮流撰写论说，报社则月赠学社100元以为资助。这样，《苏报》实际上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舆论阵地。2月，《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报道、声援此伏彼起的进步学生的退学、罢课风潮，成为反映学生运动最积极的报纸。4月，拒俄运动掀起高潮，《苏报》不断报道拒俄活动情况，将中国国民总会提案、公启等文件登诸报端，发表文章予以支持，并明确鼓吹革命。5月13日的论说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以后，《苏报》的火药味日趋浓烈。

5月27日，陈范正式聘爱国学社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6月1日起，《苏报》实行"大改良"，突出宣传革命，连续刊载《康有为》《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驳革命驳议》等文，公开鼓吹反清革命，举国为之震动。

1903年春，正值上海革命风潮越涌越急之时，青年革命家邹容从日本来到这里。邹容，四川巴县人，字蔚丹，一作威丹，1902年留学日本，是爱国学生运动的活跃人物。回国后，他与章太炎同住在爱国学社，志趣相投，二人与张继、章士钊结为兄弟。

还在日本时，邹容就开始着手写《革命军》一书，回到上海后完稿。书名以"革命军"三字为题，已标明了它的政治色彩。全书约2万字，分为7章：1.绪论；2.革命之原因；3.革命之教育；4.革命必剖清人种；5.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6.革命独立大义；7.结论。全书篇章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在书中，邹容大声疾呼革命、革命！中国要独立，必革命；中国要富强，必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

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在短短的一千几百字的《绪论》中，他竟用了45个“革命”。书中尖锐指出，革命就是要革清朝的命，因为清朝既是一个极端专制的封建朝廷，又是一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邹容愤怒地斥责清朝列皇列帝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慈禧太后是“卖淫妇”；揭露所谓皇恩皇仁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邹容号召人们，高举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等人宣传的自由、民主的旗帜，以华盛顿等人为榜样，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提出25条建设方案，主要内容有：1.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2.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国家总统由议员选举，议员由各省选举。3.在国际上为完全独立国家，与各大国平等。4.全国男女都是国民，所有国民一律平等，男女平等，没有上下贵贱之分。5.国民享有生存、言论、思想、出版等天赋之自由权利。6.人民拥有合法的反对权，政府如果违背民意，人民有权推翻重建。这是一幅独立、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蓝图。

《革命军》写好以后，邹容把它送给章太炎过目。章太炎看后，深为书中迸发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大为赞赏，亲自提笔作序。序文说：言辞激烈，浅显易懂，是此书的长处。值此举世昏昧之时，不震以雷霆之声，就不能唤起人们的觉醒。邹容此书，就是这样的振聋发聩的雷霆之声，读了它，那怕是糊涂透顶的人，也会羞愧愤懑，汗流浃背而彻底悔悟，从而认清清朝政府的反动面目。如果以此书作“义师先声”，动员民众从事反清革命，就会收到万众一心、材士知返的效果，而对于屠沽负贩之类缺少文化知识的人说来，其启蒙教育的作用，更不可估量。

《革命军》在1903年5月底印成单行本。6月，《苏报》相继发表章士钊等人的《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的广告和章太炎为《革命军》作的序文，推荐《革命军》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称赞《革命军》“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文极犀利，语极沉痛，”读

了以后，无人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愿书万本诵万遍”。书本来就写得好，加之名人作序，报纸宣传，一时间，《革命军》不胫而走，广泛流行。

与《革命军》同时问世的，还有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风潮涌起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在海外爱国华侨中，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原来的保皇道路，转入了革命的行列，连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徐勤等人也有倾向革命的表示。可是在戊戌变法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康有为，却不能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仍然坚持保皇道路，极力反对革命。他得悉梁启超等人企图冲破改良藩篱、进行反清革命的自白信件，看到华侨中酝酿的越来越炽的革命情绪，于1902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信大旨相同，后信更具有代表性。在后信中，康有为坚决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罗列了中国不能进行革命的四大理由，一曰革命惨酷，如行革命，中国四万万人要死去一半；二曰国情特殊，地方大，人口多，国俗旧，与美国、法国大不相同；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四曰光绪皇帝圣仁，享有天命，将来能够领导变法。康有为还攻击革命派的“反满”口号是无的放矢，说是满汉早已平等。他的结论是：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康有为以前是变法维新的领袖，这时是保皇派的魁首，又是科班出身的有名文人，门生信徒遍天下，他的这些信件被他的学生编印成册，广为散发，影响很大，严重地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章太炎原来也是维新信徒，追随康梁，自断发割辫之后，思想大变，舍维新而言革命。他看到康有为反对革命的信件，深感必须廓清康有为在革命问题上散布的迷雾，把人们从保皇的旗帜下争取过来，于是写下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一战斗论著。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章太炎怀着对清朝专制的满腔

仇恨，以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谬说。首先，章太炎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压迫汉族的问题。他说，在清朝政府里，高官勋爵，满人为之，汉族官吏只供驱使陪衬，官位稍高，就有满人监视，所以，实际上满洲贵族是主人、汉人是奴隶。章太炎列举了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屡起的文字狱，直到戊戌政变，残杀捕拿维新党人等一系列镇压汉人的罪恶，指出满汉根本没有平等，康有为的所谓满汉早已平等乃是昧于事实的瞎说。其次，章太炎驳斥了所谓光绪"圣仁英武"的观点，认为光绪赞助变法，主要是害怕慈禧废置自己而采取的铤而走险的办法，其实，"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他是一个连五谷也分辨不清的阘茸之人。第三，章太炎揭露了所谓"立宪"的实质，认为清廷即使实行立宪，仍然解决不了民权的问题，虽然下院能有汉人参加，但上院却是满族的王公大臣，按照议会制度，下院议定之案，上院可以否决，结果还是清朝封建专制的天下。第四，章太炎回答了革命要流血的问题，认为革命免不了流血，立宪也要流血。他举了日本等国立宪流血的例子后说："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第五，章太炎驳斥了所谓光绪皇帝享有天命的胡诌，认为所谓"天命"，都是人们穿凿附会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第六，章太炎驳斥了所谓中国国情特殊，"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的谬论，严正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第七，章太炎分析了革命与外国干涉的问题，认为一方面，中国革命成功，可能有外国干涉，但这也不可怕；另一方面，外国看中国革命成功了，便会反过来承认中国是友好国家，并不干涉。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首热情的革命颂歌，它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深刻揭露，对于革命是开民智、去旧俗的救世良药的精辟论述，对于革命与立宪孰难孰易的辩证分析，闪耀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光辉，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未来的胜利信心。书中对康

有为的批驳，成为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为时数年的大论战的前哨战。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写好以后，章太炎曾请人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结果没有带到。1903 年 6 月，它与《革命军》同时刊行，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6 月 20 日，《苏报》在"新书介绍"一栏中介绍此书："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非特康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6 月 29 日，《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发表了章文的摘录，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对一班封建士大夫，震动尤大，起到了《革命军》那样通俗宣传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同盟会成员汪东有一段回忆，颇能说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当时的宣传效果：

> 尤其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蛊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当为《苏报》——引者），偷偷地把它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①

爱国人士"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进步运动，邹容《革命军》的革命怒吼，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反满雷鸣，《苏报》日甚一日的革命鼓动，在黄浦江畔汇成了雄壮的革命交响乐。爱国的人们为之激奋，清朝政府为之颤抖，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短兵相接，终于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二四页。

还在爱国学社师生集会张园抗法拒俄之时，清朝统治者就已经注意到这股不安份的力量，并开始了镇压的计议。商约大臣吕海寰函告江苏巡抚恩寿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①。恩寿命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捉人，租界工部局多次传讯过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均以其无军火枪械，只有舆论宣传而未加干预。6月，清政府加速密谋逮捕革命党人事宜。《苏报》6月3日译载西报《查拿新党》文，谓据得自北京密电，清政府拟捉拿为首之人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汤尔和4人。6月5日，《苏报》又刊出《〈字林西报〉述查拿新党事》等消息，谓清廷欲查拿者共6人，一系翰林，一系举人，一系商人，一系沙门，一系已辞职之某员，即张篁溪《苏报案实录》中列举的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太炎、吴稚晖、黄宗仰。真可谓凶讯频传，乌云翻滚，然而活跃在上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所畏惧，继续着越来越激昂的革命鼓动。

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邪说，已饬查禁密拿"。第二天，清廷据魏电下旨："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着沿海沿江各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②。这份谕旨本是针对爱国学社的，尚未提及《苏报》。6月23日，署湖广总督端方致电魏光焘，提醒魏在镇压爱国学社时，不要漏了《苏报》："上海《苏报》系衡山陈编修鼎胞兄所开，悖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③。魏光焘随命上海道袁树勋及专为镇压革命而赴沪的候补道俞明震将爱国学社与《苏报》一道查禁，并点名捉拿邹容与章太炎。魏光焘在致端方、恩寿的电文中说："旋因上海爱国会演说虽禁，复有设

①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辛亥革命》第一册，第372页。
②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一册，第408页。
③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一册，第444页。

在上海租界之《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因饬一并查禁密拿"①。

经上海道与公共租界当局反复交涉，6月底双方终于达成拘捕革命党人的协议，"所拘之人，须在会审公廨由中外官会审，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内办理"。6月29日上午，中西警探巡捕直抵苏报馆，指名捉拿陈范、程吉甫、章太炎、邹容、钱宝仁、龙泽厚，当场抓去账房程吉甫，30日又在爱国学社逮捕了章太炎，在女学报馆抓走陈范之子陈仲彝及苏报馆办事员钱宝仁，龙泽厚与邹容应章太炎之召分别在是晚与7月1日自动投案，陈范逃亡日本。7月7日，《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苏报馆财产全被没收。

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捕以后，清廷恨不得立即置之死地。清政府派人多方活动，传说曾提出由上海道出银10万两将诸人审实处决，另送300两给工部局，为工部局严词拒绝。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表示"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没有接受清廷"引渡"或处决的要求。

从7月15日开始，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的额外公堂，多次将章太炎等人提往审讯。审判员名义上由谳员孙建臣、上海知县汪瑶庭及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共同组成，实际上是迪比南作主。清廷延请西人古柏和哈华托二人为律师，监外的革命志士也为章太炎等人请了博易和琼司两个外国人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章太炎和邹容对于指控他们鼓吹革命的事供认不讳，并据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律师古柏指控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所说"载湉小丑"四字为"诋毁今上圣讳"，章太炎反驳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并没有什么侮辱的意思。辩护律师博易发问："此案原告究系何人，其为北京政府耶，抑江苏巡抚、上海道台耶？请明白宣示！"孙建臣只得承认

① 《辛亥革命》第一册，第421页。

他是奉清政府之命担任原告，并当场将江苏巡抚饬令拘拿章、邹等人的札文出示。这样，在上海租界这块中国土地上，以章太炎和邹容等为被告，以清政府为原告，以外国人为裁判，出现了国家政府与自己人民打官司而听裁于外国人的极其耻辱的怪事。

经过多次会审和幕后交涉，迁延到12月24日，额外公堂宣布审判结果：钱宝仁、程吉甫，一为报馆伙友，一为司账，既非馆主，又非主笔，即行释放；陈仲彝因系馆主陈范之子，"姑准交保寻交伊父到案"①；龙泽厚虽与苏报案无关，但因参加自立军勤王之事，暂押待理②；"至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判为永远监禁。结果公布，上海领事团对此发生异议，社会舆论亦对此大加攻击，认为，被告方面已久系囹圄，"在法律及道德上均属不合"，要求将控案注销。拖到1904年5月21日，额外公堂改判章太炎为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自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后来，邹容不耐狱中之苦，于1905年4月3日病死狱中，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东渡日本。

清廷制造苏报案，本想杀一儆百，藉以扑灭革命烈火，谁知事与愿违，"引渡"之事既未成功，重判章、邹又未得逞，相反，却刺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苏报》被封以后一个多月，另一份宣传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报》便在上海问世，创办人就有原《苏报》主笔章士钊等人。《国民日报》继承《苏报》宣传革命的主旨，发行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③。1904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在上海相继创办《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到辛亥革命以前二、三年，革命报刊更是接踵而起，竞相创办。《苏报》被禁

---

① 钱宝仁、程吉甫、陈仲彝三人在十二月三日已开释。

② 龙泽厚不久亦以查无实据而获释。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5页。

了，章、邹被判了，但资产阶级革命浪涛却是封建统治者无法遏抑的，它在上海越涌趋急，呼啸向前。其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光复会的成立。

光复会的前身为暗杀团。东京留日学生的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以后，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效俄国虚无党之所为，实行暗杀”。他们秘密成立了暗杀团，以杨笃生为首，成员有何海樵、苏鹏、周来苏等人。他们以清廷君臣为主要目标，第一个暗杀对象就是慈禧太后。他们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学习制造炸药。1904年上半年，他们秘密潜入北京，在慈禧太后出入必经的西直门与颐和园之间埋窖地雷，装上引线，以司发火，等候月余，无奈慈禧深居简出，诸人终无下手机会，而旅费业已告罄，于是不得不南下上海。

密谋暗杀慈禧太后的团员中，何海樵原为爱国学社体育教员，与蔡元培关系甚密。他回到上海后，即访问了蔡元培，密谈数次，介绍蔡加入了暗杀团。不久，暗杀团成员苏凤初亦偕同志数人来沪，蔡元培代为租屋以供居住。蔡元培以爱国女校教员钟宪鬯、俞子夷懂化学，且可从科学仪器馆购买仪器药品以供制造炸药，乃将钟、俞介绍加入暗杀团。以后他们便在租界里的一个僻静弄堂里，研制炸药。

1904年11月，暗杀团改组扩大为光复会。先是，1903年10月，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多次密商，认为要反对清朝统治，须组织一革命团体，决定由陶成章、魏兰、龚宝铨分别往浙江、安徽、上海等地联系。1904年初，陶、魏到上海，晤蔡元培，旋赴浙江联络会党。9月，魏、陶相率回上海，原拟在浙江等地起兵响应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后因华兴会起义夭折而未果。11月，龚宝铨等与蔡元培商量，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定名为光复会。当时，浙江志士中，声望最高的是章太炎，其次是蔡元培，章太炎尚在狱中，众人乃推蔡元培为会长。

光复会又名复古会。所谓“光复”，照章太炎的解释：“改制同

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①。光复会入会誓词有四句话：“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②。由此看来，光复会是以浙江志士为主的、排满色彩浓重的革命组织。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即邀陶成章参加，随后入会的有徐锡麟、赵声、吴春阳、黄炎培、秋瑾、刘师培、李燮和等。

光复会成立后，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暗杀，二是暴动。蔡元培等人把主要精力放在暗杀上。他们一面在报刊上介绍俄国虚无党人的历史，宣传暗杀；一面继续制造炸药。在爱国女校讲课时，他们注重化学课，挑选女生加入制造炸弹的小组。此外，还开办速成训练班，招收青年学习理化和催眠术，引导他们参加暗杀活动。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则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进行暴动方面。

1905 年 8 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推孙中山为总理，总部设在东京。10 月，蔡元培在上海由黄兴主盟参加了同盟会，并被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同盟会上海分会在吴淞中国公学和老西门宁康里创办健行公学，设有秘密机构。不过，同盟会虽成立，光复会并未象兴中会、华兴会那样取消旗号，而是继续在独立活动。

四、抵制美货运动与大闹会审公廨案

拒俄运动之后，上海在 1905 年又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这一运动由于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而起。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美国资产阶级开始以欺骗、拐带、绑架等

---

① 章太炎：《序〈革命军〉》，《苏报》1903 年 6 月 10 日。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127 页。

各种手段诱骗中国劳动人民去美国，参加开发西部的劳动。到同治末年，每年出去的人数在10万左右。勤劳的华工在美国垦荒田，筑铁路，开果园，种树木，卷烟，织布，洗衣，打缆，做靴鞋，养牛马，使得荒凉的加利福尼亚等处各项工商业大大地兴旺起来，“变得花团锦簇、繁华无比，这都是中国人一点一点的血，一粒一粒的汗来铺成功的”①。70年代中后期，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工人罢工斗争此伏彼起。为了转移美国工人斗争视线，美国资产阶级不断制造虐待华工、排斥华工事件。他们颁布排斥华工法案，公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如加州的宪法曾规定：“凡中国人不许有选举权，不许受雇于公家职业”，“凡各公司不许用中国人”等等。1894年3月31日，中国出使美国大臣杨儒与美国政府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声称保护寓美华侨，实际上很多条款限制、歧视华工。这个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对华工的迫害、虐待有恃无恐。例如：1900年，在檀香山的美人借检疫为名，放火烧毁唐人街，华侨损失财产260余万，旧金山专住新到华人的木屋，用粗木作槛，上面盖着薄板，“又黑暗又龌龊，秽气蒸天，臭不可闻。四边架着木板数条当作床桌，比坐监牢还苦。口渴了只好吃冷水，肚皮饿了只好吃黑面包，不然就是硬米饭，吃也吃不饱的。衣服污烂了也不能洗，亲眷朋友要探问也不能进去。天天有巡捕看守门外，不能出来一步。还有一种非官吏非百姓的流氓烧药物来熏他们的头面，而且偷空里抢夺银钱”②。

种种非人的待遇，激起了华侨的强烈反对。1904年条约期满，华侨报纸和国内报纸不断刊载要求废约的言论。年底，旅美华商联合一百几十个地方的10多万华侨，联名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商务部及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除苛约。清政府指示梁诚修改约款，

① 《同胞受虐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第4页。
② 《同胞受虐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第11页。

原则是："今宜禁下等之工，而上等之工不与也；今宜禁受雇美人之工，而自行制造之工不与也；今宜禁未入美境之工，而业经在美之工不与也。"① 这个要求已经是很低的了，与华侨要求相去甚远，可是连这样的条件美国政府也不肯接受，磋商数月，无所通融。1905年春，美国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与清政府交涉，"盖欲以恐吓手段，催我迁就订约"，意在继续保持禁止华工的条约。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导致了全国性的控诉美帝国主义排华罪行、抵制美货的运动。运动的中心就在上海。

1905年5月5日，上海《时报》提出，华工禁约如果签订，"辱国病商，损我甚巨"，因此深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所以对付之。5月10日，《时报》又刊出《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列举美国虐待华人的苛例，指出禁约万不能续订下去，因为此约一损害国家之尊荣，二玷辱国民之人格，三失两独立国彼此同等相待之权利，"彼来，受我保护；我往，乃受彼苛禁虐待，天下不平事孰有逾此？"四失万国通商应享之利益。《公启》指出，禁约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全国应当"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②。同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对付之策。会长曾铸提出抵制办法：以两月为期，如果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迫中国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这个提议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会议致电清廷外务部、商务部、南北洋大臣，说明"事关国体民生，吁恳竣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遍电汉口、宜昌、镇江、天津、重庆、烟台、南京、九江、芜湖、安庆、泗州、广州、福州、厦门、汕头、梧州、长沙、沙市、香港、杭州、苏州等处商会，要求协力拒约，"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曾铸(1849—1908)，福建同安人，字少卿，1901年在上海贩运大米，获厚利，成为资本家，拒约抵货运动起，他积极

① 《商部复驻美大臣梁星使函》，《时报》1905年5月7日。

② 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第14—16页。

投入，在当时威望很高。

上海商务总会的倡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商界、学界、女界、工界闻风兴起接踵开会。5月21日，曾铸与上海美国总领事会谈。美领事提出以6个月为限，6个月之后，美不改约，则听任中国抵制美货。曾铸不允，谓只能限两个月，到7月20日为止。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集议，讨论抵制美货办法，曾铸、戈朋云、叶瀚、汪甘卿、周箴金相继演说，当场，上海铁业、机器业、洋布业、火油业、洋广五金业、面粉业、木业共7个行业公所的巨商祝兰舫、项如松、邹琴涛、苏葆笙、丁钦斋、徐文翁、朱葆三、林纯翁、曹子翁等签字，表示不进、不卖美货。会后签字者又有钟表、航运、裁缝、印刷、瓷器、纸张、烟业、医业、珠宝业等70多个行业。同日，上海商学会举行特别大会，到会者1000余人，周廉生主持大会，徐凤石、穆杼斋、苏筠尚、姚义门、尤惜阴、武仲英、张竹君、陆应麟、曾血公相继发表演说，坚决抵制美货。尤惜阴为表明不用美货，当众毁弃所购美国手表。此后，各界人士纷纷集会，表示在各自行业内以实际行动反对美国禁止华工的条约。据《广劝抵制美约说》一书归纳，抵制美货分官抵制、私抵制两大类。官抵制内容为不雇美人、不发美人入内地护照。私抵制内容为：不受雇为美国人的翻译、写字、厨役、细崽、车夫、乳媪；不卸载美船货物；不登美人广告；不入美教堂；不乘美船；不入美学堂；不入美医院；不购美货，包括停办未定货，退办已定之货，不在美银行存款，不与美商通商，不购美国书籍，等等。

上海各学堂的学生积极参加了抵制美货运动。5月5日以后，美国教会在上海所办学校的教员、学生纷纷离去。5月22日，清心书院“全学解散”，中西书院学生亦自是日起停课，纷纷退学。7月7日，施兰英女士借广西路榕庐召开百余人会议，务本女塾学生张昭汉、王湘龄、廖斌相继演说，认为在抵制美货的同时，“宜运动资本家，亟兴工业制造，以济本国之用，以杜外溢之利”，并拟结一

持久永远之中国妇女会。8月，上海学生特组织一“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公定章程，相约严守：日夕所用读书文具概不用美货，所穿衣裳及食物玩器概不用美货，每日调查美货牌号，登诸会内，供众知晓。9月8日，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特别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李登辉、何剑吾、吴趼人、李毅轩、魏万侯、林森、许培庵、颜惠庆等相继演说，表示华工禁约不废，抵制美货不止。会后，吴趼人、李毅轩游历杭州、宁波等地，计划联合各地拒约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在戏剧界，著名艺人汪笑侬为拒约事，在10日特排一戏名《苦旅行》，取波兰遗事，“表明不爱国之恶果与无主权国民之苦况”。

据统计，上海有商务总会、沪学会、商学会、文明拒约会、女子拒约会等20多个团体、80多个行业参加了抵制美货运动。上海近郊的南翔、嘉定、真如、南汇、吴淞、松江、罗店、江湾、闵行等处也各自举行了抵制美货的集会。抵制美货运动很快从上海波及全国，广州、北京、天津、苏州、无锡、宁波、营口、香港等160多个城市都有抵制美货的集会和实际行动，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海外华侨、留学生也以实际行动遥为声援。

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以后，美国政府非常震惊。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olt)致电驻华公使柔克义，要他威胁清政府，“一切应由中国政府担其责任”。柔克义奔走于京、津、沪等地，指使美国领事干涉拒约运动，并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要求清廷“电致各省督抚，一体禁阻”。他还通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清廷镇压拒约抵货运动。5月16日，即上海商务总会议决抵制美货后不到一个星期，美国驻沪总领事罗志思(J.L.Rodgers)即致函上海道袁树勋，要求参加各商董抵制美约的集会，企图直接阻止拒约抵货运动。5月21日，罗志思又送一文给时报馆，请求刊登。该文一面威胁说：中国人拒约抵货，“窃恐有损无益，”一面辩解说，美国只禁华工入境，并非禁止商人、游客、学生等，要求华商、游客、学生等对美国“暂息浮议，勿淆视听，遽行抵制”。同日，上海三马

路慕尔耶稣堂集会，五六名美国传教士登台演说，“大旨谓此事系华人误会”。

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止抵货运动。8月21日，清廷下令各省督抚禁止抵制美货运动，声称中美两国关系，自应由政府出面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要各地督抚晓谕商民，务令照常贸易，“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①。上海是这次运动的中心，清廷格外注意。8月22、23日，清政府特地两次电令两江总督周馥，要求严办拒约运动的为首者曾铸等人。周馥不肯触犯众怒，答复朝廷说：“查曾少卿为人急公好义，众望素孚，此次相戒不用美货，众人公同决议，渠不过为发电主名。若遽革惩，且恐众怒难犯，转致滋生他变。”②

这次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者是中国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同外国资本既有矛盾又有联系，所以他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已潜存着妥协性。以曾铸而论，他在领衔通电抵制美货后不久，就不止一次地与美国公使、美国领事酬酢，引起了舆论的非议。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在运动一开始就接二连三发表文章，讽刺、反对抵货运动，因而遭到上海各界的强烈反对。上海工商学界曾散发《不阅〈中外日报〉公启》。先前卖美货的商人与不卖美货的商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发生意见分歧，张謇、汤寿潜、周廷弼、汪康年等出面“疏通”，主张已进口的美货由上海商会贴上印花然后出售。这得到卖美货商人的支持，却促使抵货团体分化。

由于清朝政府的压迫，抵货队伍的分化，由于曾铸等人自身的软弱性，加上当时风传有人要暗杀曾铸，作为拒约抵货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曾铸退缩了。8月11日，他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以

① 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第47页。
② 《时报》1905年9月13日，见同上书第48页。

后，便不再参与抵货活动。在书中，他一方面颇为壮烈地表示："死于美人，死于业美货者，皆仆正当死法，虽死犹生……，愿曾少卿死后，千万曾少卿相继而起，挽回国势，争成人格，外人不敢轻视我、残贼我、奴隶我、牛马我，有与列强并峙大地之一日"；一方面又表示："我死之后，不可与死我者为难。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①

自此，资产阶级抵制美货运动开始从高潮下落，但是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爱国知识分子中仍有相当一些人坚持斗争。他们一方面揭露续卖美货的"奸商"，反对"疏通"调和，一方面强烈呼吁将抵货运动进行到底。以戈忠为首的"公忠演说会"联络文明拒约社、人镜学社及学、商、工三界人士集会，反对所谓"疏通"办法，认为"疏通之说即是破坏抵制"。8月31日举行大会，到会者千余人，戈忠、朱连魁、吴跗人、俞国桢、姚义门、连慕秦、周廉生、冯仰山、沈兆鹏、王清甫、顾维精、尹鹤林次第演说，"均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勿为讹言所惑，致散已成之团体"。清廷禁止抵制美货的上谕发布以后，公忠演说会等团体集会如故，号召国内外拒约团体"大增抵制新力，以迫美人转机"，如遇意外压力，"则各人誓当永远永远不用美货"。9月以后，戈忠为首的公忠演说会实为上海，也是全国抵货运动的中坚。

上海工人在拒约抵货运动中表现得相当坚决。上海工界和平社工人于10月26日、11月26日两次集会，第一次集会有500多人，一致表示坚决将斗争进行到底，"此禁约如一日不废，彼美货当一日不用"，并决议每年夏历六月十八日开纪念会一次。上海报关行工人、刻字同业会工人、成衣业工人也都分别集会，表示坚持斗争。嘉定及附近各县农民为反对美国虐待华侨，焚烧了一些美货以示抗议，还流传着因拒约抵货而出现的《哀同胞歌》，歌词云：

---

① 《时报》，1905年8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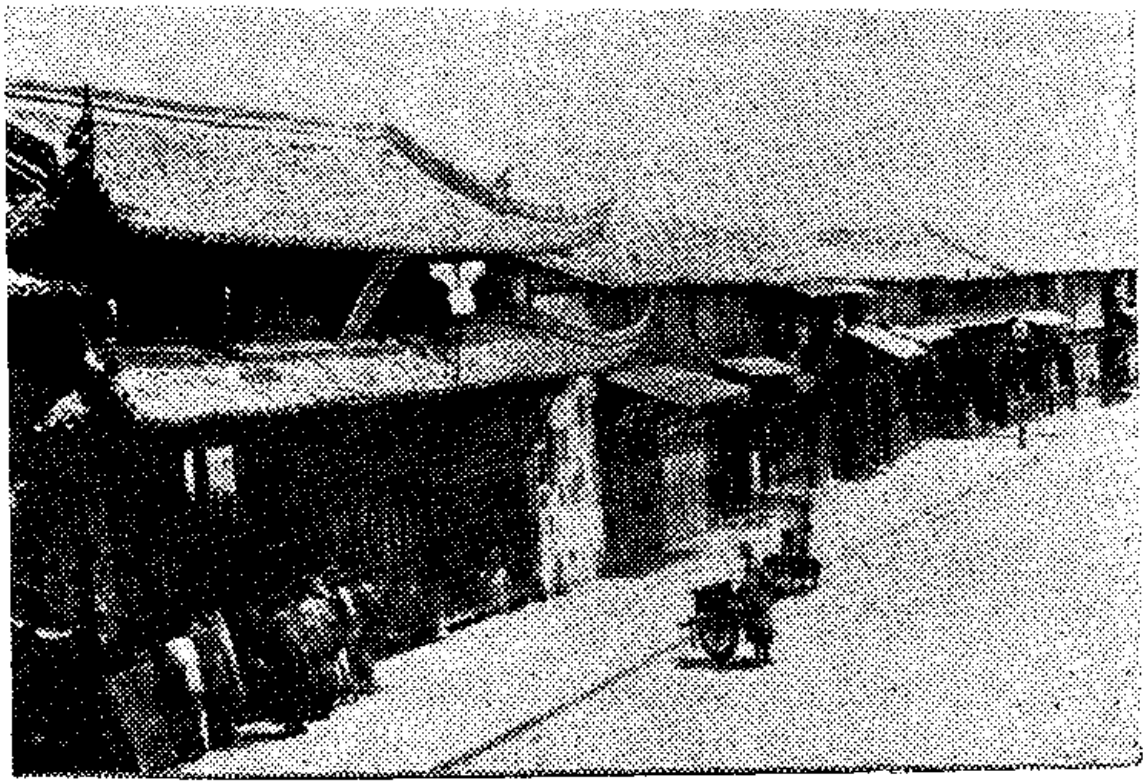
哀同胞，哀同胞，死期将到了，死期将到了。外人手段狡复狡，屠我不用刀，灭我不用枪和炮，暗中布置巧，绝我生机监我脑，试看美约森森令人魂胆消。

哀同胞，哀同胞。受毒原非小，受毒原非小。航洋渡海程途杳，空求生计好，横来苛虐苦无告，波及士与商，身家性命都难保，最怜饮泣吞声木屋囚徒老。

哀同胞，哀同胞，大家休要躁，大家休要躁。振起国民四百兆，能得团体好，始终不被白人笑，热血涌如潮，生死关头争一秒，那怕大西洋里风急浪头高。①

抵制美货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却在继续高涨着。这年年底"大闹会审公廨案"的发生，就是这种热情高涨的标志。

"大闹会审公廨案"又叫"黎黄氏案"。1905 年 12 月 8 日，一



南京路会审公廨

① 《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一期，第 88—89 页。

个四川已故官员黎某的妻子——黎黄氏携带女孩15人，行李百余件，乘长江班轮"鄱阳"号来沪，准备回广东原籍。工部局捕房据镇江来电，云系拐匪，遂在码头以"拐骗人口"的罪名将黎黄氏拘捕，送往会审公廨。中国谳员关炯之、金绍成与英国陪审员副领事德为门(B.Twyman)进行审理。关炯之以串拐证据不足，拟判押公廨女所候讯。德为门认为此案应查核，须由捕房带回。关炯之认为，《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中没有关于女犯押于西牢的规定，且又未经道台批准，因此拒绝由捕房带回。德为门骄横无理地说："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被激怒的关炯之也针锋相对地说："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并即饬廨役将黎黄氏等带下。德为门恼羞成怒，竟喝令巡捕上前将黎黄氏等夺下，捕头莫特生(Gibson)指挥巡捕一拥而上。双方发生争执，廨役二人被打伤，被告亦被夺去。金绍成离座上前弹压，不料巡捕目中无人，持棍欲击，被金将木棍夺下。此时堂下乱作一团，廨役便将大门关上。巡捕挟被告无法出门，径向关炯之索取钥匙，关怒斥道："毁门可，打公堂可，即杀官亦无不可！"① 愤然离去。巡捕打开大门，将黎黄氏押赴西牢，女孩15人被送济良所。

殖民主义者蛮横无理的行径，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事发第二天，广肇公所召开同乡大会，进行抗议，并致电外务部、商部，剖白黎黄氏身份来历，说明黎黄氏系官家眷属，扶柩归籍，故仆从甚多，并非拐带。下午2时，上海各界人民聚集于商务公所，进行抗议。12月10日，绅商代表趋道署见上海道袁树勋，要求官府维护主权，据理力争。袁派人赴领事团及英国领署提出抗议，并照会各国领事，同时嘱关炯之、金绍成暂停与英副领事会审。此后，袁树勋多次与领事团交涉，要求释放黎黄氏，撤换德为门，惩治行凶打人的莫特生等巡捕，可是领事团不予理会。北京公使团根据

① 岑德彰编译：《上海租界略史》，第219页。

清政府外务部的抗议，于12月13日电命上海领事团将黎黄氏押回公廨女所释放。15日下午，工部局捕房将黎黄氏一行径送广肇公所释放，故意不递交会审公廨，以示轻侮。

黎黄氏无辜被辱，就这么草草释放了事，会审公廨竟被英副领事如此胡闹，这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积压的反抗怒火又迅速燃烧起来。18日，公共租界中国商号罢市，愤怒的人群围攻了老闸捕房和市政厅等处，巡捕开枪镇压，华人死伤30余人。领事团命各国团练兵出防、水兵上岸，驻扎领署、捕房、银行等处。租界总巡布瓦斯辣根(Boisragen)记载其事：

> 自上午九时卅分起，有暴徒一大队，开始围攻老闸捕房，英印巡捕冲锋十数次，然均被迫退回，半小时后，暴徒遂占优势，冲入捕房，就楼上壁炉放火。十时警钟大鸣，数分钟后，救火车赶到。是时暴徒已改向市政厅进攻，巡捕开枪，立毙三人，又有店伙二人，匿于对面屋内，亦为流弹所伤。暴徒闻枪声稍退，但仍未四散，迨英舰水兵赶到，始陆续向四面马路散开。是役也，华人死于市政厅前者三人，死于南京路与江西路转角者一人，死于附近各处者三人，总计死者七人，因伤致死者数人，受伤者若干人。①

从这个殖民主义者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人民不畏强暴的英勇反抗精神，也可以看出殖民主义者镇压人民的凶残态度。是日，德国、比利时两领事外出，因上海人分辨不出他们与英人的区别，一在南京路受击，一在威海卫路受辱。上海道致函慰问，并致歉意。为防事态扩大，上海道一面劝说中国商人开市，一面发布告示，严禁再生事端。

12月21日，两江总督周馥来沪，下令会审公廨开审，其余问题留待后商。23日，公廨开审，英方仍派副领事德为门为陪审员。

---

① 见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第220—221页。

当即为关炯之拒绝。捕房仍派前次行凶肇事的巡捕全数到庭，这又引起中国方面的愤怒。但周馥秉清政府意，一味妥协退让，最后达成协议：一、华方许巡捕到庭；二、领事团许以后女犯将由公廨收禁；三，英方不撤换英副领德为门（不久调往镇江）；四、捕头莫特生等，工部局以未经审判，是非莫属，不允惩罚。英国肇事凶犯没有得到惩罚，相反，在罢市中被捕的华人却被判了 10 年以下的徒刑。事后，清政府又以袁树勋个人的名义赔偿英国银 5 万两。

本来，会审公廨大门以内，是中国官员负责，不容巡捕进入，此案发生后，巡捕便可以到堂了。这样，租界当局便可以利用巡捕来挟制会审公廨。大闹会审公廨案终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但上海人民也通过此案向殖民主义者显示了不容凌辱的民族正气。

第十四章　立宪派活动大本营

1905年，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结束了，日胜俄败，因此诱发了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本是立宪国，俄国是专制国；日本是小国，俄国是大国，结果却是小国得胜。这对专制的中国震动极大，“世之论者，咸以专制与立宪分两国之胜负”①。这给资产阶级改良派提供了要求立宪的充分理由，也促使清政府中一些官员认真考虑立宪问题。1904年时，驻法公使孙宝琦就曾提出这一问题，请求“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纷起响应，要求立宪之声不绝于耳。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立宪要求更为强烈，甚至一些满洲贵族也以“日以立宪胜，俄以专制败”为词，要求清廷实行君主立宪。

清政府为了争取舆论，笼络立宪派，欺骗人民，抵制革命，作出预备立宪姿态，1905年8月派出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规定从改革官制入手。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许诺，得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真诚拥护，为他们进行立宪宣传和组织提供了合法依据。因此，资产阶级立宪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立宪团体竞相出现，其著者有预备立宪公会、宪政预备会、宪政公会、政闻社等。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最为集中的上海，不但走在这一运动的前面，而且成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活动的大本营。

---

① 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十二期。

一、预备立宪公会等立宪组织

预备立宪公会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立宪团体。发起人主要有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铸等人。它宣称"本会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因朝廷关于预备立宪的谕旨中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一语，"故定名为预备立宪公会"。会章规定，凡本国人年在20以上，与本会宗旨相合，有会员2人介绍，均可入会，但有四种人不合入会资格，即吸鸦片烟、营业卑贱、贪污犯赃和经商破产未能清偿者。公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2人，会董10余人，管理公会事务，均由选举产生，另设驻办员、书记员、会计员各1人，编辑员、调查员、宣讲员各若干人，均由会长、会董商定聘任。会章规定，每年9月间开常年会一次，每月第一、第三星期日为职员常会之期，是日下午3时为董事会常会期。公会事务所设在上海静安寺路54号。

在预备立宪公会第一次大会上，郑孝胥代表公会作报告。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皆是家天下之制度"，全国人民生活在虐政恶俗之下，累世终身，不知治世为何物，逐渐形成"苟安偷活"特质，对于国政取"苟安"态度，对于身家取"偷活"态度。他指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就是为了革除"苟安偷活"这两种特质，因此本公会的宗旨，也可以说是"责难"和"图存"二项。"如何便是责难？凡内政外交之得失，我等细加研究，发为议论，以备朝廷采择是也。如何便是图存？凡工商实业之利病，我等力为调查，尽心提倡，以求民生之发达是也。"①

预备立宪公会首任会长为郑孝胥，副会长为张謇、汤寿潜。郑

① 《预备立宪公会题名表》，《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205页。

孝胥，福建闽侯人，字苏戡，举人出身，1891年任中国驻日使馆书记官，后升为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归国入张之洞幕，曾在上海任江南制造局总办，1903年到广西助岑春煊镇压当地人民反抗，1905年辞归上海，他家资丰厚，在许多企业中有投资。他之所以被举为会长，可能与岑春煊对预备立宪公会的资助有一定关系。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以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便表示愿捐1万元作开办费，并允负担常年费每年1000元。郑为岑的老幕僚，由他出任会长自然合适。张謇，江苏南通人，字季直，1894年状元，甲午后从事实业和教育，创办了很多工厂和学校，是当时影响很大的著名民族资本家、教育家。他名为副会长，实为预备立宪公会的最主要领袖。他在1902年就提出开设议政院的问题，1903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很有感慨，回国后就酝酿立宪问题，1904年受日俄战争结局的震动，开始从事立宪活动，积极推动张之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提出立宪请求。1911年2月以后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汤寿潜，浙江山阴人，原名震，字蛰仙，1892年进士，为著名的早期改良派人物，著有《危言》行世。1900年在上海参与策划“东南互保”，1903年擢署两淮盐运使，辞不受，投资近代工商企业，鼓吹实业救国。1905年，以四品衔总理浙江全省铁路，领导了浙江绅民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他在浙江绅商中颇有威信。

预备立宪公会的会董和一般会员中，也有很多是著名绅士和资本家，诸如张元济、沈同芳、李平书、王清穆、周晋镳、许鼎霖、周廷弼、夏曾佑、高凤谦、徐润、温宗尧、夏瑞芳、虞洽卿、荣宗敬、荣德生等。预备立宪公会初成立时，仅有会员近50名，到1908年已有345名，1909年有358名。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报》刊载《章程题名表》，介绍了333人，他们绝大多数为江、浙、粤、皖、闽等东南沿海人，也有少数其他省区在上海有所活动的人。其中江苏籍143人，浙江84人，广东47人，安徽、福建各20人，贵州4人，江西、湖南、东北各3人，四川2人，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各1人。这说

明，预备立宪公会是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的立宪团体。这种情况，与当时上海人口构成有密切关系，据1905年和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人口籍贯构成统计，排在前四名的亦是江、浙、粤、皖。

预备立宪公会是在岑春煊等清朝大员资助下成立的，公会的会员中也有相当一些人是前任、现任和候补官吏。据统计，1908年题名表的333人中，有186人为前任、现任或候补官吏，有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驻外使馆参赞等大员九名，还有翰林院的翰林、中央各部顾问、咨议官、郎中、主事、地方上的道台、知府、知县等，这反映了预备立宪公会与统治集团有相当广泛的联系。当然，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亦官亦商，但时尚以做官为荣，故填写职业时可官可商则多从官不从商。

另外，预备立宪公会中从事实际工作的，有相当一批人是学习政法归国留学生，如编辑员孟森、主持该会讲习会的雷奋、联络骨干杨廷栋等，他们在此之前就翻译过介绍西方民主思想和议院制度的书籍，如卢梭名著《民约论》第一个完整中译本就是杨廷栋翻译的。熟悉立宪制度，因此，这部分人成为预备立宪公会中知识丰富、思想活跃的少壮力量。会员黄炎培日后回忆说：这些人“都是当时留日学生中负盛名的。而讲习会必请这几位先生为师；修订章则，非请这几位先生不可”①。

预备立宪公会的实际活动可分两项，一是宣传立宪，二是参预请愿。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时便已决定，编辑出版关于宪政的刊物两种，“一供上等社会之省览，并作为本会之报告；一另编白话，便于宣讲，开通下等社会之知识。”他们从1908年3月起发刊《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到1910年停刊，共出四十六期。这是所谓“供

① 黄炎培：《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宪政》创刊号，1944年1月出版。

上等社会之省览”的专门刊物。另有一种《预备立宪官话报》，注明为预备立宪社发行，可能就是它的“开通下等社会”的白话报，此报自 1906 年 11 月创刊，共出六期。这两种报纸均在上海出版。另外，公会还在北京出版《宪志日刊》。这些刊物主要内容是，发表会员们对国会、法律、地方自治等问题的见解，报道会务进展，反映全国立宪运动情况。

报刊之外，预备立宪公会还编辑出版了很多关于宪政方面的书籍，诸如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邵羲的《日本宪法详解》、汤一鄂的《选举法要论》、孟森的《咨议局章程讲义》、沈其昌的《议员要览》等。这些书多角度地介绍了资本主义立宪制度，为要求立宪的人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些书籍不但畅销上海、江浙等处，而且远销内地和边省，其中《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分别发行二十七版和十六版，单是广西一省就订购了 10 万部。

清朝政府预备立宪的许诺本是骗人的诳语，但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却是真诚地期望实行宪政。他们对清廷久拖不决的态度表示不满，于是发起了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07 年初，湖南绅士熊范舆首先上书请开国会，拉开这一运动序幕。第二年，这一运动便在全国展开。开始时，预备立宪公会对此运动处于迟疑状态，后见各省纷纷提出速开国会请求，态度才积极起来。1908 年 4 月 15 日，公会决定成立国会研究所，每星期三开研究会一次，专门讨论国会问题。研究所第一次会议决定：“我国开设国会不可再缓，此次研究，以编定草案为目的。草案内容以拟一至简捷之办法，定一至短之期限，而又不可与正当之法理相背，务使此简捷之国会可逐渐进步，成一至完备之国会。”① 同年 6 月 30 日、7月 11 日，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代表公会，两次致电清政府宪政编查馆，要

① 《国会研究所第一次、第二次议案》，《预备立宪公会报》第七期。

求"上念朝事之艰,下顺兆民之望,乘此上下同心之际,奋其毅力,一鼓作气,决开国会",并提出以二年为限。8月11日,广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南、吉林、山东等省代表联合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这是立宪派发起的第一次联合请愿活动。其中江苏代表雷奋、孟昭常,安徽代表方皋都是预备立宪公会的骨干。

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与"九年筹备立宪清单",要求各省于第二年成立咨议局,预备立宪公会于是要求会员积极参加各省咨议局选举活动。张謇被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立宪派先后联合发起3次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活动,预备立宪公会的张謇、孟昭常、雷奋、杨廷栋、方还、孟森是这些请愿的发起人和积极参加者,第一次国会请愿团就是由张謇出面,由孟昭常、方还、杨廷栋等人具体联络全国16省50余名代表,于1909年12月在上海成立的。

预备立宪公会与同时期其他立宪团体相比,不但成立早,人数多,组织健全,而且历时最久,一直坚持到1911年,而其他著名团体如政闻社1908年即遭查禁,湖南的宪政讲习会因主要人物杨度、熊范舆等从政而陷于涣散,因而它在立宪运动中影响很大。

政闻社是梁启超等人于1907年10月在东京创立的立宪团体,其政纲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其发起人除康有为、梁启超外,还有徐佛苏、蒋智由、黄可权等,推马良为总务员,徐佛苏、麦孟华为常务员。马良,江苏丹阳人,1840年出生,字相伯,11岁进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开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后获神学博士学位,并加入耶稣会,被授职为神甫,1872年任徐汇公学校长,1881年任驻日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1903年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他赞赏立宪派的活动,乐意接受梁启超等人的推戴,于1907年12月,不顾年老体衰,东渡日本,参与政闻社活动。

为了更有效地推动立宪运动，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移上海，社址设在南京路，马良、徐佛苏、麦孟华、侯延爽、汤觉顿等亦回国。3月3日，政闻社在四马路万家春举行招待会，宴请上海学界，报告该社宗旨和成立经过。马良在会上发表演说，说明政闻社本部移沪原因："天下断未能不造因而能得果，则国民断无不用力而能得宪政者。此政闻社所以虽发生于东京，而必移于内地，为积极之进行者，以此故也"。①

总部移沪以后，政闻社会务有所发展。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向北京、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西等处派出代表，进行活动，并在上海与其他团体组成"国会期成会"，发表意见书，认为"请开国会为今日急务"。1908年7月，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出请愿电，要求"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开国会"。但总的来说，政闻社活动并不顺利。1908年6—7月间，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奏请朝廷，不但要求三年召集国会，而且要求将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大怒，于7月25日下令将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查传管束。8月13日，朝廷又以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下令严行查禁。政闻社被迫解散。

此外，上海在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之前，还有一个宪政研究会，它由上海文化界人士组成，如龙门师范学校的教员袁希涛、沈恩孚，广明师范学堂教员黄炎培，《时报》总理狄楚青，《时报》主笔陈冷、雷奋，女子蚕桑学堂教员史家修（即史量才）等。这个小团体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前就开始活动，1906年12月发刊《宪政杂志》，宗旨是"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以后，这个研究会很多成员都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

---

① 《政闻社上海披露会纪事》，《政论》第四号。

二、地方自治运动

地方自治是立宪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06年，载泽等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向慈禧太后提出必办三件事，第二件就是地方自治。1908年清政府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明确地将实行城镇乡地方自治规定为第二年应办之事。1909年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运动遂在全国展开。在这一运动中，上海不但走在全国前面，而且很有建树。

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自1905年就已开始，到1914年奉令停办，历时近10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时期，从1905年10月至1909年6月；二是城自治公所时期，从1909年6月至1911年11月；三是市政厅时期，自1911年11月上海起义以后至1914年3月停办。这里主要叙述辛亥革命以前的两个时期。

1905年，上海地方绅士郭怀珠、李平书、叶佳棠、姚文枏、莫锡纶等人，“惕于外权日张，主权浸落，道路不治，沟渠积污”，创议设立总工程局以整顿地方，就商于上海道袁树勋。袁树勋深韪其议，他认为，朝廷正鼓励变法自强，但苦于库帑空虚，人才匮乏，加上官民之情不通，上下不相信任，所以无法百业并举，如果能“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即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那么，官民就会有休戚相关之谊，而无上下隔阂之虞，乡绅们倡设总工程局，正是一个极好的办法。1905年8月6日，袁树勋通知郭怀珠等人，表示对于设立总工程局一事，“极愿赞成”，希望即日开会集议，妥订章程，克期举行，同时提议将原有南市工程局撤除，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等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郭怀珠等人得到上海道支持以后，立即着手草拟章程，进行设立总工程局的实际筹备工作。9月10日，上海绅商各界在学宫明伦堂集会，传达上海道的意见，宣传地方自治的意义，讨论选举董事问题。9月17日、9月

24日，绅商各界两次集议，选出议董候选人58人，郭怀珠等人又另推18人，一共76人，一起呈请上海道核定。10月16日，袁树勋照会总工程局，决定由李平书担任领袖总董，莫锡纶、郁怀智、曾铸、朱佩珍4人为办事总董（简称总董），姚文柟、刘汝曾等33人为议事经董（简称议董）。总工程局先在外施家弄暂借民房为局所，11月3日（夏历十月初七）正式成立，11月11日接管南市马路工程局（沪南浦滩毛家弄），将局所迁入，并启用刻有"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钤记"字样的印章。

总工程局分议会和参事会两部分。议会为代议机关，由议董33人组成，内举1人为议长。首任议长为姚文柟。参事会为执行机关，由领袖总董、办事总董、各区长、科长组成。总工程局下设户政、警政、工政3科，每科设科长1人。户政科下设户籍处、地产登记处、收捐处。警政处下设巡警处、消防处、卫生处。工政科下设测绘处、路工处、路灯处。3科之外附设1裁判所，推举正副裁判官各1人，裁判违警事件及民刑诉讼案件。

总工程局存在4年中，其实际权力远远超出其名称所标示的市政工程范围。除了拓建道路、修建桥梁、疏浚河浜、改建城门、添修路灯等市政工程外，举凡户籍管理、门牌编排、地产登记、捐税收支、平抑米价、查禁鸦片、违警事件及一般民刑诉讼等，均归管辖。总工程局已是一个具有相当权力的地方行政机构。当然，这些权力是不充分的，因为重大事件包括总工程局总董、议董的人选，需经上海道核准才行。

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要求全国各地督抚督饬所属地方迅速筹办。4月22日、4月27日，上海道、上海县相继照会总工程局要求照办。李平书等人请求将总工程局改为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得到了两江总督的批准。于是，从6月18日（夏历五月一日起），上海地方自治的机构由总工程局变为城自治公所。

城自治公所分议事会和董事会两部分。1910年2月15日，议事会成立，选举沈恩孚为议长，吴馨为副议长。3月20日选举李平书为总董正，莫锡纶为总董陪，王震、顾履桂为董事，朱开甲、梅豫彬等12人为名誉董事。城自治公所行使的权力，较总工程局只略有扩大，但变化不大。

总工程局与自治公所共历时6年。6年中，共辟建、修筑道路100多条(或段)，修理拆建桥梁六十余座，新辟改建城门9座，建筑驳岸10处，修造码头6个，设置巡警300—400人(各年不等，最多为450多人)，设立警务学堂1所，招收巡警生240人，设立巡警肄习所1所，平均每年裁决民刑诉讼及违警事件1700多起。福佑路、大境路、露香园路、西青莲路、紫金路、豫园内各路、尚文路、凝和路、蓬莱路、吉庆路、斜日路、肇周路，福佑路吊桥、老北门吊桥、新北门吊桥、安澜桥、安仁桥、北香花桥、紫荆桥，尚文门(新西门)、拱宸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大达公司码头、积谷仓码头等，都是这段时间辟建的。6年间，自治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市政管理的章程规约，诸如《总工程局违警章程》、《总工程局巡士上差职务》、《上海城区域公立简易识字夜塾简章》，此外还有食物店铺卫生规约、管理渡船规则，押店、戏园、影戏场、滩簧书场、弹子房管理规约。这些章程规约，有的还带有那个时代所难免的封建色彩，如关于戏园、影戏场"男女必须分座"的规定，但大多数是属于去腐朽、愚昧而趋文明、开化的，如《违警章程》中规定，以下情况均属违警：聚众抽头赌博，平白无故在人丛中骑马疾驰，深夜在马路高歌，在道路、河浜乱倒垃圾，在街上随意大小便，车子在路上不分左右乱行；《简易识字夜塾简章》规定，一切文盲，无论艺徒负贩苦力，均可免费入夜塾识字；卫生规约规定，任何店铺均不得出售臭腐变质的肉、鱼、水果、菜蔬，各项食物摊店屋舍器具务须清洁，不得污秽。其中有些规定，显然是从租界市政管理条例中移植来的，如《违警章程》规定"倒提生禽"属于违警。

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发起和领导这一运动的，大多是上海工商教育界知名人士。核心人物李平书，原名安曾，改名钟珏，字平书，优贡出身，曾署广东陆丰、新宁、遂溪等县知县，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此后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他是总工程局领袖总董，城自治公所总董正，同时又是预备立宪公会会董。总工程局总董、议董，自治公所董事、名誉董事中，朱佩珍、曾铸、郁怀智、王一亭、李厚祐、苏本炎、顾履桂、张嘉年都是商界名流，曾铸、李厚祐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郁、王、苏、顾、张均为商团会长，朱、郁、王、李及张美翊（总工程局议董）均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王一亭、李厚祐还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董。

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是一种爱国运动。地方自治运动首先在上海发生，并不偶然，它与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市政布局有密切关系。清末的上海市政，分为两部分，一是华界，一是租界，这两个部分的市容、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别。一般说来，租界房屋高敞，道路整洁，设施先进，管理有序，华界则相形见绌。1883年，《申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

> 上海自有工部局以来，泯隘逼仄之路悉化而为康庄，乡间鄙陋之区皆变而为阛阓。四方之人趋之若江汉之朝宗，商贾往来，无远勿届。街衢之间，日事洒扫，迂者直之，陂者平之……，以中国界内之地较之租界，不啻有天渊之异焉。①

这种论断，不无过甚其辞之处，但租界市政建设、管理较华界先进，则是事实。这种鲜明的对比，强烈地刺激了上海的爱国绅商。整顿市政，建设近代化的上海，成为他们迫切的愿望。上海道在批准设立总工程局时说："上海为通商大埠，最得风气之先，外患之刺激日深，绅民之感情自异。"② 这段话很明白地说明上海绅商创设总工

① 《申报》1383年10月27日。

② 《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

程局时的爱国心理。上海地方自治机构最初名称不是自治公所而是总工程局，这也表明上海绅商从整顿市政入手将上海建设、改造为一个文明的、先进城市的想法。

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也是一种民主运动。地方自治与集权专制是相对的，在近代，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等思想在行政制度中的体现。近代以前，中国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等人就曾针对专制弊端，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地方自治思想，并提出乡官民选的具体主张。近代，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冯桂芬提出过"复乡职"的主张；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陈虬写过一篇《分镇》，主旨便是地方自治；梁启超更明确地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出据湘自立，仿照西人"各行省之自治"。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以后，一方面，清朝政府极端腐败无能的面目暴露无遗，资产阶级爱国人士或努力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运动，或期望清廷改弦易辙，进行变法。后一派中有些人是地方名流或家业丰厚的有产阶级，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权力、财力，在地方举办事业，实行改革。另一方面，西方政法书籍大量被翻译介绍进来，其中有一些便是关于地方自治的书籍，诸如：《普鲁士地方自治行政说》，德国莫塞述，日本野村靖编译，商务印书馆重译并出版；《地方自治论》，马赛讲述，汪贡夫笔译，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另一种《地方自治论》，日本桑田熊三著，陶懋立译，文明书局出版；《英国地方政治论》，英国希西利洛度科著，日本久米金弥译，赵必振重译，新民译印书局出版。此外，关于宣传介绍东西方各国宪法的书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地方自治的内容。地方自治的主要特点，就是扩大地方自主权，以地方之人，用地方之力，办地方之事，这正是力主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特别是那些在地方上有名望、有财力而又爱国的绅商们渴望以求的事，于是，地方自治便成为他们比较理想的事业。

另外，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的董事、名誉董事、议长等，均实行

选举制，任期制，这种选举，尽管还是限选，不是普选，有纳税额等条件的限制，但是这种制度实施的本身，便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的示范。各种章程、条例的制订，也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这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时代，对于不知民主议会为何物的人们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的民主运动，它对于建设一个文明的、近代化的上海确实作了不少实际的努力，对于提高上海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觉悟，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清政府颁布地方自治章程，主要是为了欺骗舆论，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治运动，态度则是真诚的。当清政府骗局被揭穿，反清革命风潮骤起之时，领导上海自治运动的人们由立宪转向了革命。李平书为首的一批自治运动领袖，或运动清军，进行策反工作；或筹集巨款，支持革命；或率领商团，投身起义；或直接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三、上海商团

商团之设，始于租界，最初并无华人参加。（详见第五章第三节《租界起源》）1905年12月大闹公堂案以后，巡捕罢岗，由万国商团维持秩序。他们漠视中国居民的利益，屡起纠纷。为此，虞洽卿等人认为，必须建立华人商团以资自卫。虞洽卿发起创立华商体操会，作为建立华人商团的准备。1906年，他向公共租界工部局交涉，在万国商团中设立中华队，其队员即在华商体操会会员中选拔。同年，租界以外的上海绅商士民，“有鉴于国民躯体羸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诟”，认为欲图强国，必先强种，发起成立了各种体育会，锻炼体魄，研习武艺，以备保卫祖国之需。先后成立的有：穆湘瑶等在沪南创设的沪学会体育部，李平书、王一亭等在南市创设的商业体操会，郁怀智等在沪北创设的商余学会，苏本炎等在

沪城创设的商学补习会，吴馨等在沪西创设的士商体育会。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上海著名绅商，参加者有工商店东、职员，还有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除了徒手操、柔软体操、木枪、杠子、田径运动外，还有兵式操练，聘请社会名流演说致富图强的各种道理。

1907 年 5 月，上海道瑞澂奉令禁绝境内烟馆，由总工程局 总董具体办理，限期肃清。当时东西南 3 区共有烟馆 336 家，城内烟馆 196 家，雇用伙计总共有 3000—4000 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禁绝烟馆的布告张贴以后，烟商们聚谋抵抗，一时谣诼蜂起，举邑惊惶。鉴此，总工程局领袖总董李平书、办事总董曾铸商请上 述 5 个体育会派员维持地方秩序，由曾铸捐资补助伙食。于是，五会会长乃组织临时商团，设司令部，分区出防，历 3 昼夜，地方安谧，烟馆如期禁绝。瑞澂以各会员义勇可风，各赠银章一枚。不久，为求事权集中，指挥裕如，五会联合，定名称曰“南市商团公会”，推李平书为会长，并规定各会会员每晨操练，以 3 年为毕业期，毕业后，由上海道发给文凭，升入公会为团员。公会经费来源，一是酌收会员费，二是各董募集。商团公会有颇为完备的组织机构，下设评议部、董事部、正副会长、司令部、军需部、经济部、文牍部、交际部、卫生部。

其后，地方每有不靖，官厅辄请商团帮助维持治安。时沪南区每至黄昏，常有流氓伤人越货，名曰“采灯花”。官厅请商团出面镇压，供以武器，揭示通衢曰：“匪徒胆敢与商团抗者，格杀勿论。”流氓怵于商团之声威，销声匿迹，不复逞勇。商团因此颇得官厅信任。上海道拨给商团步枪 160 支①，子弹 5000 发，专供商团出防之用，并允许商团自购杂色枪械以作训练会员之用。据此，商余学

① 《上海县续志》卷十三作“一百六十支”，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作“一百二十支”，兹从县志。

会自置枪60支，商学补习会自置40支。至此，商团由先前的体育团体发展成为拥有一定武装的半官方的军事团体，团员总数达300人。

1910年底至1911年初，英国企图侵占云南片马，日本侵略朝鲜，忧时之士均为国家前途担心，商团公会乃应形势之需要，大加扩充，除原有之基本队外，又设预备队，工、商、学界青年1000多人踊跃参加。公会乃分四处操场，从事训练。同时，上海各界各业亦先后自组商团，如清真（回教）、韫怀（珠玉业）、洋布业、水果业、豆米业、书业、参药业、志成（杂粮业）、花衣业、纸业、永义（镌业）、伶业、沪西、闸北、沪城、南区、高昌庙、十铺、十五铺、十九铺、二十七铺、第一工商团，还有商务印书馆体育部、救火联合会体育部。1912年2月18日上海商团情况有个调查，其组织、人员、领导人情况如下：

名　　称	团　长	人　数
商团公会	李　平　书	600
商余学会	郁　怀　智	300
商学补习会	苏　本　炎	320
救火联合会体育部	毛　子　坚	80
闸北商团	钱　贵　山	120
清真商团	沙　善　余	70
韫怀商团	杨　栋　生	80
洋布商团	郁　葆　青	100
水果商团	江　荣　侪	40
豆米商团	张　乐　君	120
商务印书馆体育部	张　廷　桂	80
沪西商团	朱　鉴　堂	100
书业商团	陈　润　夫	100

（续表）

名　　称	团　长	人　数
参药商团	苏　本　炎	100
中区商团	莫　锡　纶	60
志成商团	叶　惠　钧	40
集益商团	张　乐　君	60
西铺商团	毛　子　坚	40
十铺商团	龚　子　范	40
十五铺商团	凌　伯　华	40
共计：20个单位		2,490

这个统计并不完全，例如花衣业、纸业、永义、伶业等商团都没有包括在内，同时各商团的人数也不都是上海起义以前的情况，因为随着革命的发生，不少商团人数均有增加，但它基本上反映了上海商团的情况。它说明商团的主要成份是商人。

1911年3月12日，南北商团公会在南市斜桥西园召开特别大会，到会者1000人。沈缦云在会上宣布“拟先立一全国商团联合会”。4月8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召开大会，2000人到会。会议公布章程，推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会长。它名为全国商团联合会，实际上只是上海各区、行业商团联合会。

四、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态度的转变

立宪派属于资产阶级上层，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实行宪政，废弃专制，以便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清朝统治者对他们的立宪要求，始则哄骗，继则拖延，终则镇压，这就不断地加大他们对朝廷的

离心力。武昌起义的爆发，更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清朝由怨转恨，甚至投入革命的行列。

上海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以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赵凤昌、沈恩孚、杨廷栋、雷奋、黄炎培、史量才、狄楚青、李平书、袁希涛等经常聚集在《时报》馆楼上的息楼和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讨论政治问题，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一味鼓吹立宪、请愿变成赞成革命、宣传民主共和了。这在狄楚青主办的《时报》上很清楚地反映出来。

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后3天，《时报》在一篇题为《论政治思想与革命势力消长之影响》的社论中就明确写道：革命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清朝政府太腐败了，“今日革命风潮之所以遍于各省者，实由政府腐败有以致之也”。这篇社论还颇有见地地指出，由爱国而请求立宪的人们，在请愿遭到朝廷拒绝、镇压以后，势必由立宪而走向革命：

> 故今日之议员，对付政府，不论如何激烈，犹出于忠君爱国之热诚。倘当道恶其激烈，不惮出百计以排去之，则激烈者去而阘冗者来，微论于政治无补也，试问此辈激烈之议员，能蛰伏终身、不谈时事乎？抑将别有所举动，以与政府试一搏击乎？夫欲与政府试一击搏，非投身革党不为功，斯则可虑之甚也。①

这些所谓“可虑”之辞，实际道出了他们中一些人自己的心声。此后，《时报》又陆续发表《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忧乱危言》、《鄂乱之各方面忠告》等社论，说明“革命为专制政治下之产儿”，“革命实由今日之政府造成之也”②，并称赞革命党治理下之武昌“警政修明，暴徒匿迹，闾阎安堵，市肆不惊”，其秩序之整齐，节制之森严，实

① 孤愤：《论政治思想与革命势力消长之影响》，《时报》1911年10月13日。

② 孤愤：《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时报》1911年10月16日。

出人意料之外①。

有些立宪派人物态度的转变，在武昌起义以前就已开始。这以沈缦云等人最为典型。

沈缦云，江苏无锡人，1868年出生，原姓张，名翔飞，幼入上海教会办的培雅书院读书，12岁入赘上海沈家，改姓沈，名懋昭，字缦云。沈家是开办铁厂的资本家，沈缦云来到这里先是读书，接着学习技术和经营管理，1905年筹设上海信成银行，自任经理，1906年参加李平书等人组织的南市商业体操会，1907年任上海南北市商会董事、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1909年任上海总商会议董。1910年，他被上海总商会推为代表，赴京请愿，进见庆亲王奕劻，要求速开国会，遭拒，思想由拥护立宪转向革命。《沈缦云先生年谱》记其事曰：

> 先生痛陈当时商界困难情形，谓：商力疲则国势弱，征税轻重不平，则人得避重就轻，而民情涣散。迩来挂洋旗、入外籍者日见其多，是国未灭而种先亡。字字沉痛，发人深省。语至请开国会，声益高，气益盛。庆王曰：子来为国会乎？答曰：然。曰：朝廷既有九年筹备之诏，何得多渎？曰：何不缩短期限，以慰天下人民之望？曰：国会能否速开，朝廷自有权衡，非人民所得而请求。曰：各国立宪，无不出自人民要求。曰：此风不可长，予不谓然。言至此，庆王起而送客。先生退而叹曰：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请自此辞。乃束装返沪。②

沈缦云返沪以后，即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主动支持于右任创办《民立报》，认股2万元，垫资3万元，并经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类似于沈缦云这种情况的，还有叶惠钧、王一亭。叶惠钧，名

---

① 庸：《忧乱危言》，《时报》1911年10月20日。

② 《沈缦云先生年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页。

增铭，是上海杂货业的代表人物，志成商团的领导人，1908年参加预备立宪公会，1911年初加入同盟会。王一亭，名震，字一亭，浙江吴兴人，1867年出生，早年习业钱庄，业余在广方言馆学习外语，1900年担任大阪轮船公司买办，1906年任上海信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与李平书发起组织商业体操会，1907年任日清轮船公司上海分公司买办，同时，进行多方面的投资活动，在上海立大面粉厂、申大面粉厂、沈阳地产公司、上海义清地产公司等企业中均有投资，并创办了上海内地电灯厂。他是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先后被举为总工程局、自治公所议事会议董。他1906年参加预备立宪公会并担任会董。1910年结识陈其美，大约同年参加同盟会。于右任办《民立报》，他也是资助人之一。

武昌起义以前，沈缦云等人已与陈其美、宋教仁等人联合行动。1911年初，沈缦云与宋教仁、叶惠钧等发起组织全国义勇队，设总机关于上海，由宋教仁编订章程，沈缦云主持召集，刚要正式成立，被清政府勒令解散。于是，沈缦云等便舍去义勇队之名，改行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这一组织后来成为上海起义时攻打江南制造局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年5月，沈缦云还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总会，由上海日报公会、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等10个团体联合组成，6月11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5000人，公推沈缦云为会长。这个组织，实际是以革命派为骨干、有立宪派参加的联合团体。中国国民总会会章宣布“以提倡尚武、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实际是组织反清军事团体。它所办的模范体操团，后来在上海起义时，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立宪派态度的转变，壮大了反清革命队伍的力量，为以后的上海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十五章　辛亥革命的关键地区

一、辛亥前夕的革命宣传

苏报案以后，鉴于清政府的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宣传活动有所压缩，不象苏报案以前那么放言无忌，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持续高涨，由于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及其先进的通讯、印刷条件，这里依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内宣传中心。

从1905年到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先后出版了10多种报刊，主要有：《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

《国粹学报》创刊于1905年2月23日，月刊，报社设在福州路老巡捕房东面的惠福里，主编邓实，主要撰稿人除邓实外，还有黄节、刘师培、章太炎、陈去病、马叙伦、王国维等多人。邓实，祖籍广东顺德，1877年出生在上海，长期学习、活动于上海，1902年主编《政艺通报》，1905年初主持成立国学保存会，同时主编《国粹学报》。《国粹学报》主要通过阐扬旧学，重申"夷夏之防"、"外夷内夏"等传统民族思想，宣传反清革命。《国粹学报》历时7年，1912年停刊。

《竞业旬报》创刊于1906年10月28日，是竞业学会的机关刊物。竞业学会是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团体，以中国公学学生为核心。《竞业旬报》编辑主要有傅君剑、张丹斧和胡适，傅系同盟会会

员。《竞业旬报》为一白话文刊物，公开宣布的主张是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实际以宣传反清的民族主义为宗旨。在《中国的政府》、《中国政府歌》、《发辫谈》等文中直言不讳地揭露清朝政府是专制的政府、卖国的政府：

> 军机大学士，宫保尚书郎，平时娓娓谈经济，鬼来不敢高声张。若问相公有何能，插标卖国真高强。割地输金奉强盗，杀儿剐女喂犬羊。

《竞业旬报》不断报道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情况，揭露清廷假立宪的骗局。《竞业旬报》于1909年1月停刊。

《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月刊，主编兼发行人为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主要撰稿人有陈伯平、徐寄尘、燕斌等。这年7月，秋瑾被捕遇难，《中国女报》随之停刊。11月，为继承秋瑾革命遗志，《中国女报》与另一妇女杂志《女子世界》合并，改名《神州女报》，主要撰稿人除陈伯平、徐寄尘外，还有秋瑾好友吴芝瑛等人。《神州女报》发刊三期即停，辛亥革命以后又出四期。《中国女报》、《神州女报》都是以妇女为宣传对象的革命刊物，它们尖锐地抨击封建的纲常名教，热情地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呼吁广大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参加革命。《神州女报》对秋瑾事迹宣传尤多，矛头直指清朝政府，销售量达5000份，影响颇大。

《民声丛报》系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创办，1910年5月发刊，仅见两期，主要撰稿人有雷昭性、林白水、于右任等。

诸报当中，影响较大的要数《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四报都是于右任创办的。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右任是其笔名，1879年出生于穷苦的农家，1903年中举，因讥刺时政，鼓吹革命，遭到清政府通缉，辗转逃到上海，先入震旦学院肄业，旋因不满校方以宗教束缚学生而离校，参与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赴日本，访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在日本参观各大报社，学习办报知识，1907

年4月2日在上海创刊了《神州日报》。

《神州日报》社址设在上海福州路老巡捕房对面辰字582号，出版了20年，到1927年停刊，在不同阶段政治色彩也不一样。初创时，于右任为经理，同盟会会员杨笃生任总主笔，编辑、撰稿人有王无生、汪允宗、叶仲裕、金淮、汪彭年、邵力子等，多为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校友。《神州日报》发刊时，便拒绝使用清朝帝王年号，而用干支和公元纪年。它频繁地报道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清革命活动，包括同盟会在1907年4月的钦廉起义、5月的黄岗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言词之间，渲染了反清起义的正义性，革命党人的英雄主义，起义队伍严明的纪律。6月2日的一则报道说：革命党"纪律甚严，除官员外概不骚扰"，"如此严明，较之我们巡警局有过之无不及也"。它还热情地宣传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英雄百战为自由，王权扫地诡谋消"，号召人们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有的报道公开转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颠覆现政府，谋立共和政体，分配土地，使国民亲爱、自由、平等"。

1907年6月20日，于右任辞职，《神州日报》由叶仲裕、汪彭年分任经理。同年末，叶仲裕离开报社，不久总主笔杨笃生亦他去，报纸遂由汪彭年独办，汪允宗等任主笔，政治色彩亦趋向缓和，时有请开国会的议论。

于右任离开《神州日报》，又创办了《民呼日报》，社址在山东路望平街一百六十号，1909年5月15日发刊。取名"民呼"，意思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又作"人民的呼声"解。《民呼日报》由于右任自任社长，担任编辑撰稿工作的有范鸿仙、徐天复、陈飞卿、吴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锡三等。《民呼日报》对清朝政府的攻击，不象几年前《苏报》那样单刀直入，而是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它表面不直接宣传反清排满，而在事实上鼓动人民反清革命的情绪。它以大量篇幅揭露清朝各级官吏的贪污、暴虐、宿娼、纳妓、赌博等腐败行径；报道中国各地，尤其是陕甘等地的严重灾情，指出

灾区赤地千里，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状，究其原因，不只是由于天灾，而且由于人祸，因为那些地方的官员为保个人官位，故意匿灾不报。它不断发表文章，揭露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阳托立宪之名，阴施压制之实，认为要恢复"天赋之民权"，必须"打破专横之政治"。它还刊文声援当时各地风起云涌的夺回路矿权利的爱国运动，抨击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民呼日报》的宣传，深受人民欢迎，发刊不久，销数便占上海各报之冠。

《民呼日报》采取比较策略的革命宣传方法，本是为了免蹈《苏报》被清政府封禁的覆辙，但既要宣传革命，总难免要引起清政府的迫害和镇压。1909年8月2日，上海道蔡乃煌以甘肃护督指控《民呼日报》社侵吞甘肃赈灾捐款为由（当时甘肃筹赈公所设在《民呼日报》社内），疏通租界当局，将社长于右任、主笔陈飞卿拘捕。《民呼日报》至8月14日被迫停刊。事后查明，赈灾捐款分毫未被侵吞，但租界会审公廨在9月8日宣判时，却以所谓"不安本份，迭被控发"为辞，判于右任逐出租界，陈飞卿具结开释。

于右任获释后，志不为屈。这时，同盟会正好委派景耀月抵沪协助工作，经过筹画，他们决定改头换面，创办一个《民吁日报》。9月28日，上海许多报纸都登了一则题为《民呼日报之最后广告》，内云：本报"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于右任不便公开出面了，《民吁日报》乃以范鸿仙为社长，朱少屏为发行人，成员除原《民呼日报》人员外，另增了景耀月。10月3日，《民吁日报》正式发刊。

有位读者说："《民呼》和《民吁》，只差两点而已，精神丝毫不变"。于右任自己也说："民呼报被停刊，等于人民的两只眼睛被挖，但我们还有嘴巴，我们还要吁，还要奋斗"①。事实亦然，《民吁日报》不但编辑人员、报纸版式与《民呼日报》大体相同，其宣传风

① 张云家：《于右任传》第58页。

格也一脉相承。它公开标榜的宗旨是：振发国民精神，痛陈民生疾苦，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但实际上，它的重点仍在攻击清朝政府，揭露立宪骗局，宣传民主思想。有一篇时论明白地说，现在国势濒危，民生憔悴，风俗腐败，"孰为为之，至于此极？彼恶劣之政府，与贪鄙之官吏，其酿造此种恶现象之罪，殆上通于天矣"①，有的文章公开宣传说，中国败弱，根源就是专制制度，中国"欲夺专政而图国家之进步者，与其举欧美共和立宪之政治，以促政府之猛醒者，勿宁举欧美独立自治之国民，以促国民之自觉也"，就是说，与其行立宪，不如行革命。

《民吁日报》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它连续载文揭露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阴谋，对1909年12月伊藤博文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一事，宣传尤多，共发表20多篇评论和报道。这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日本驻沪领事两次照会上海道蔡乃煌，要求封禁该报。11月19日，上海道疏通租界当局，蛮横地查封了这份报纸，拘讯了社长范鸿仙等人。经过几次所谓的审讯，会审公廨作出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予深究完察，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由被告切实具结领取可也"。这样，《民吁日报》仅存时48天便被迫停刊。

《民吁日报》停刊后，于右任在上海爱国资本家沈缦云、王一亭等人的资助下，又创办了《民立报》。《民立报》创刊于1910年10月，社址在三茅阁桥，社长由于右任自任，编辑、撰稿人有宋教仁、范鸿仙、景耀月等。宋教仁系1910年冬从日本回国，他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担任编撰工作的还有徐天复、吕志伊、马君武、王无生、王印川、章士钊、叶楚伧、张季鸾、谈善吾等，担任外勤记者的有陈其美。这些人中不少是同盟会会员。

《民立报》继承《民呼》、《民吁》的传统，开始时采取比较含蓄的

①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5日。

方式宣传革命，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它的火药味也日趋浓烈。它直斥清朝政府为“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公开支持各地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爱国运动。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民立报》社的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范鸿仙、吕志伊都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宋教仁被推为文书部长，陈其美被推为庶务部长。不久，中部同盟会决定《民立报》为其机关报，民立报社也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络机关。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民立报》成为报道各地革命消息的权威报纸。它及时报道各地响应起义的情况，阐明反清起义的正义性，指出“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下之产儿”；它向人民介绍革命党的政策，说明革命党人为民起事，纪律严明，并非乱党，革命党在湖北起义以后，武汉三镇商民，“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革命党领导的国民军“治内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它刊载的《中国革命宣言书》，揭露清朝统治者种种暴行，号召人们同仇敌忾，奋起革命，“同指北廷，挞彼元凶”，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

《民立报》发刊后，深受读者欢迎，日销数多达两万余份，为当时国内销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内地“得其一纸辄费小洋数角不惜也”。①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受到《民立报》宣传的影响，他日后回忆说：

>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②

由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一脉相承，报名都以

---

① 杨微：《光复汤邑小史》，《辛亥革命》第七册，第159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5页。“民立报”原书译作“民力报”，兹予改正。

"民"字打头，所以被人们称为"竖三民"（与"竖三民"相对的是"横三民"，即《民权报》、《国民新闻》和《中华民报》，三报均创刊于民国初年，齐头并进，故有此称）。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上海革命宣传品中，既有日报，也有杂志，既有《竞业旬报》那样通俗易懂的宣传，也有《国粹学报》那样古朴典雅的宣传，既有隐晦含蓄的革命鼓动，也有激昂直露的反清呐喊。这样的革命宣传，适应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需要，使得本已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熏陶的上海人民更加倾向、热心革命了。

二、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1905年8月20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这个组织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组成，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成立以后，便开展同改良派的论战，频繁地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为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中心的上海，也有了新的发展。

同盟会成立时，便已内定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1905年10月27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在上海亲自主盟，吸收蔡元培参加同盟会，并携带孙中山的委任书，正式委派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此后，蔡元培以个别谈话方式，发展了黄炎培等一批人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春，蔡元培因事他往，同盟会东京本部决定将上海、江苏二分会合并，派高旭为会长。高旭，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字天梅，一字剑公，留学于东京法政大学，后为南社创始人之一。他思想激进，先后编辑《觉民》、《醒狮》、《复报》等刊物，宣传革命，其假托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作的反清诗歌，传诵一时。

同盟会在上海有两处秘密机关，一是中国公学，一是健行公

学。中国公学创办于1906年春，是专为归国留日学生所设。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公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严加限制，激起留日学生强烈抗议，有3000多人愤而退学回国。为了继续学业，留学生姚宏业、孙镜清等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校舍初租北四川路横浜桥民房。两江总督端方在舆论压力下拨款支持，并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校务实由王抟沙（敬芳）主持，革命党人陈伯平、马君武等任教员。1906年2月正式开学。不久，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创办人之一姚宏业愤投黄浦江自尽。嗣经各方人士呼吁，清政府于次年在吴淞拨地百余亩以建校舍。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吴淞中国公学得以建成。公学师生很多是热心革命的青年，校内革命气氛很浓，著名的革命宣传品如《革命军》和《民报》在校内都广为流传。校中设有同盟会机关，由梁乔山、谭心休、马君武等主持。学生们组织了革命团体竞业学会，发刊《竞业旬报》。许多革命志士出国、归国经过上海时，都在中国公学里停留，中国公学于是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机关。健行公学为革命党人高旭、朱葆康、柳亚子、陈陶怡、沈蛎、陈去病等人所办，校址在西门宁康里。健行公学继承了爱国学社的传统，高旭、朱葆康、柳亚子等人，以《黄帝魂》、《法国革命史》、《荡虏丛书》等鼓吹革命的书籍为教材，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复报》、《洞庭波》等革命报刊，亦以健行公学为总汇，由这里散发出去。高旭等人还在距健行公学不满百步的宁康里某号设立同盟分会会所，因其屋初为革命同志夏昕渠养病之所，故名"夏寓"。这个联络站于1906年秋移至八仙桥鼎吉里4号，仍标曰"夏寓"，高旭、柳亚子等均居于此。1907年下半年，清廷加紧对革命的镇压，健行公学被迫解散，鼎吉里机关亦随之取消。此后一段时间里，上海革命运动处于低谷，直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才有新的起色。

由于革命派内部的意见分歧，章太炎、陶成章于1909年2月重组光复会，从同盟会中独立出去了；由于历次武装起义，特别是

黄花岗起义，使革命骨干力量受到重大损失；由于孙中山等人忙于筹款募捐，策划起义，东京同盟会总部人心涣散，无法有效地领导国内革命运动。此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得到同盟会的领导和支持，而孙中山等人此前发动起义的地点多在两广、云南边境，对长江流域注意不够。于是，建立一个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统一机构的问题便十分现实地提了出来。

1910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赵声、居正等人在东京召开同盟会分会长会议时，便提出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策动长江各省革命工作”，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会后，宋教仁便为此事筹措经费，不久，离开东京回到上海，与陈其美、章梓、郑赞丞等密谋。1911年3月中旬，陈其美等人所进行的筹备工作已渐就绪，旋因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即，宋教仁、陈其美等南下参加起义，未能即时召开成立大会。4月28日凌晨，宋教仁、陈其美等乘轮到达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他们只得重返上海。不久，谭人凤等人亦来这里，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之事重新提起。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在上海湖州会馆召开，与会者33人：宋教仁、陈其美、涂潜、邓道藩、陶咏南、陈勒生、史家麟、郑螺生、李孝章、王源水、王辟尘、王蔼庐、张仁鉴、潘祖彝、林琛、李洽、梁鉴、李光德、倪纬汉、范鸿仙、姚志强、杨谱笙、吕志伊、江镜清、胡朝阳、章梓、张卓身、周日宣、曾杰、沈琨、谭人凤、谭毅君、陈道。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及《总务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为总务会干事，分掌庶务、财务、文书、交通、会计五部，并以史家麟、吕志伊、范鸿仙、谭毅君为各部候补人（其中史家麟兼庶务、会计二部）。两天后再次举行会议，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

总会章程规定，“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表明了这一组织的政治色彩。中部总会的总部设在上海，

在各处设立分会。总部所以设在上海，成立宣言说得很清楚："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实际上是利用了上海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辟有外国租界的特殊政治格局。宣言指出，所以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因为"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①，说明了它与中国同盟会的关系。这样，上海便成了整个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此后，中部总会确定了首先在湖北省城发动起义、四方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相继派人到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联络组织，运动新军，策划起义。革命火种由上海撒向内地，革命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起来。指挥部所在地上海，革命形势自然也日趋高涨。

三、上海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上海，革命党人大受鼓舞。《民立报》迅速发布革命胜利消息，报道各地起兵响应的情况。座落在法租界三茅阁的《民立报》馆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每天各方人士往来不绝。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组织起义响应武昌的问题立即被提到上海革命党人的议事日程上来。中部同盟会和光复会上海支部都在积极活动着。

武昌起义后，中部同盟会的主要精力便放到了领导、督促各地革命党人起兵响应、支援武昌方面，上海起义的领导重担落到了在沪的陈其美等人身上。

陈其美，浙江吴兴人，字英士，1878年1月17日（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生于商人家庭，6岁入塾读书，14岁到一家当铺当学徒，1903年赴上海，在同康泰丝栈当助理会计。1906年夏留学日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七页。

本，入警监学校，结交了留日学生中一些革命青年，同年冬加入同盟会，翌年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春受遣回上海，往返浙沪及京津等地，联络党人，密谋革命活动。1909年在上海接办革命机关天宝栈，策动江浙一带的革命运动。这年夏天，拟与浙江龙华会首领张恭发动浙江起义，因叛徒告密未果。1909年至1910年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公开以《民立报》采访员身份进行活动。他在上海参加了青帮，为大头目之一，在各酒楼、茶社、戏园、澡堂等场所，多有党羽。武昌起义后，他在上海“急图响应，奈人械兼乏，未易遽发”①。他先后到南京、杭州策动两地党人起兵响应，两地则希望上海先发动。他只得折返上海，继续活动。

1911年10月24日，陈其美与在沪的同盟会员宋教仁、范鸿仙、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在《民立报》馆讨论行动计划，“决议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②。当时，在上海士绅中最有声望的，是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最主要领导人、预备立宪公会董事李平书。同盟会争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他。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等同盟会员都是城自治公所议员，与李平书过从甚密，特别是沈缦云，被李平书视为“莫逆交”。陈其美嘱沈缦云等向李平书进行试探，并由沈介绍与李相见。

李平书在武昌起义以后，思想也在翻腾。他与沈恩孚、吴馨、莫锡纶等城自治公所或商团领袖密商，“佥谓时势至此，不能守关门主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就在这时，沈缦云找上门来了。李平书记道：

> 武昌起义，沪上一日数电，闻者兴会飙举，而缦云窃忧之。一日语余曰：“顷得私电，汉阳有难保之信，万一失守，武昌亦危，若此次失败，我汉人尚有噍类耶？”言次唏嘘不置。余曰：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7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48页。

"某亦知报纸捷电之不可尽凭，盖筹之熟矣！此次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言未已，缦云跃然起曰："先生有此意耶？日来沪上党人正谋此举，特非先生赞同不可。今欲介同志于先生，其可一见乎？余曰："可"。①

经沈缦云介绍，10月29日，李平书与陈其美在成都路贞吉里李平书寓所相见，"告以保民宗旨，彼此随时协商，互相尊重主义，避免侵犯"。② 李平书转向了革命，沈恩孚、吴馨、莫锡纶及城自治公所议员王引才、警务长穆杼斋也都站到了革命一边，加上已经加入同盟会的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这样，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由立宪转向了革命，上海商团成了革命党人掌握的一支武装。

在陈其美与李平书接触之前，另一位上海革命志士李显谟回到了故乡。李显谟，上海人，字英石，光绪优贡，初肄业于南京陆师学堂，转入将弁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为第六期骑兵科毕业生。他始终没有参加同盟会，但赞成革命，拥护武装起义，并在事实上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他回国后，被派入新军第九镇徐绍桢部（徐是同盟会会员），担任马标第一营管带。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奉徐绍桢命赴武昌联络，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他绕道上海时，会见了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黄兴是10月24日由港抵沪，25日与宋教仁等启程赴武昌的），黄兴等人劝他留在上海参加中部同盟会的活动，经徐绍桢电示同意，李显谟便开始了在上海的革命活动。李显谟在上海活动，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是李平书的族侄，平常往来密切，与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中很多头面人物是世交。李平书很放心地将商团的指挥权交给了李显谟，请他担任商团教练。11月1日上午，由商团联合会集合所属各商团团

① 《沈缦云先生年谱》附言，李平书撰《哀文》。

② 《通敏先生行状》，《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论文集》上册，第822页。

员2000余人，在南市九亩地举行盛大的检阅典礼，李显谟担任检阅官，并被推为商团临时总司令，统一负责指挥训练。商团总司令下辖六个司令：沪学会商团，穆杼斋为司令；商余学会商团，郁怀智为司令；沪西士商商团，吴馨为司令；商业体操会商团，名义上李平书为司令，李指定朱少沂代理司令；商学补习会商团，苏本炎为司令；闸北商团，钱贵山为司令。各个商团司令在总司令的领导下，负责本商团的操练和指挥。

联络商团的同时，陈其美等人还联络、掌握了中国敢死团、敢死队两支群众武装。

中国敢死团是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份的群众武装。1911年3月，震于英国侵占云南片马等事件的发生，同济大学学生朱家骅、邵骥，《民立报》广告部主任徐霁生等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敢死团，公开宣布的宗旨是"联络敢死同志为国家后盾，战事起后，立即召集训练行军法则，备赴战地"，真实意图是借抵御外侮之名，行反清革命之实。他们登报征集团员，得500余人，内多青年学生，也有闸北、南市、沪东的警官，以及军营的下级官佐。敢死团以《民立报》为通信处，总部设在爱文义路，推朱家骅为团长，徐霁生为总务，还有军事设计、筹募、文牍、交涉等各色人员，赁湖北路日华照相馆为议场，每周集会一次。武昌起义胜利消息传来，敢死团员们欢呼雀跃，推选朱家骅、黄国华等5人为代表，与黄兴、徐宗汉、马伯援、张竹君等革命党人同舟西上，支援革命，同时察看形势，决定上海响应的办法。朱家骅离沪后，徐霁生代为主持团务。获悉陈其美等人准备在上海起义以应湖北的消息后，敢死团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同盟会组织的领导，参加起义。

敢死队是张承槱等人组织的以帮会力量为主要成份的武装。张承槱，湖北枝江人，字蓬生，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为于右任的的学生。1911年10月17日，即武昌起义后7天，他潜来上海，进行革命活动。他与刘福标、田鑫山、孙绍武、王老九等青红帮领袖频繁

接触，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与他们歃血为盟，发誓“结为兄弟，共同生死，驱逐满奴，复兴汉业，以敢死之志，抱必死之念，以报国家”。① 诸人共推张承檍为大哥，刘福标为二哥，田鑫山为各处联络员。刘福标，原是在邑庙卖拳的江湖艺人，练得一手好镖。十步之内，百发百中。一次，在杨树浦，刘曾当张承檍面试镖，当时一狗由马路上迎面而来，在十步以外，刘扬手一镖，即中狗腰，狗当场死去。又击一树，亦应声而中。刘福标不无得意地说：“希望在数日内能击中上海刘道台就好了。”刘福标自有把兄弟300余人，均骁勇敢战。田鑫山，湖北黄陂人，原为北火车站附近一裁缝店里的工人，在帮会中为五爷，人称田老五。后在攻打制造局战斗中，刘、田均冲锋在前，中弹受伤。张承檍、刘福标等组织了一支3000余人的敢死队，原欲西赴武汉，参加反清革命，事为于右任所知，曰：“既有如此多人，何必往汉口，就在上海动手亦无不可”。张承檍接受师说，遂在上海谋事。经于右任介绍，他们与陈其美取得了联系，“每晚在民立报馆聚会一次，交换意见，互相报告，讨论进行”。②

此外，在上海起义以前，陈其美、李平书、张承檍等人都曾对驻守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清政府军警做过一些策反工作。

当时，清廷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所驻守军警情况是，驻守在吴淞和黄浦江两岸军警计有：吴淞炮台守军，总台官姜国梁；沪军巡防五营，分驻上海、宝山两处，督队官徐占魁；沪军巡防营驻浦东官兵，管带章豹文；吴淞营官兵，参将许宏恩；海巡盐捕营官兵，统领朱廷燎；济字军三个营，统带黎天才；吴淞巡警总署警务区警士，区长杨承溥，巡官黄汉湘；闸北巡警总局巡逻队警士，队官陈汉钦。驻守南市高昌庙及城厢军警计有：上海道署亲兵、县署练勇、守府署练勇、参府署练勇；上海巡警所警士（不隶属闸北巡警总局）；沪军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51页。
② 《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52页。

巡防四营官兵；沪军巡防营驻制造局官兵，统领梁敦焯，沪军巡防各营均归其统率；炮队营官兵；江南制造局护卫亲兵、护厂警士；巡防水师五营官兵，管带王楚雄；抚标亲兵新中营，驻守龙华；太湖水师第五营，驻闵行附近；海军飞霆舰官兵，舰长林建章。总计驻吴淞、上海一带清廷军警共10000余人。

很显然，要在上海举行起义，必须解决如何对付这批驻守军警的问题。这项工作主要是光复会上海支部做的，同盟会陈其美等人也做了一些。陈其美曾派同盟会会员周南陔策反了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南台台官施泽、北台台官潘碧澄、狮子林台官于连会等；李平书与姜国梁及沪军巡防营统领梁敦焯有旧，"驰往说合，俱不反对"。

中部同盟会积极进行上海起义准备的同时，光复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还在1911年4月，陶成章、李燮和即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设立了锐进学社，由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持，表面上发刊《锐进学报》，实际作为光复会联络机关。旋因陶返南洋，李回湖南，锐进学社工作无大进展。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燮和认为"淞沪东南门户，而天下财源之所委输焉，得之，则长江以南，可无血刃而定也"①。乃急赴上海，进行起义准备。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原名柱中，1874年出生，曾在长江求实书院读书，1904年，与同志七、八人组织反清团体黄汉会，次年，在湖南宝庆策划起义，事泄未果。1906年春，任教于安化驰省师范学堂，招集党人谋在长沙举事，为官府侦破，乃逃亡上海，遇陶成章，加入了光复会。同年东渡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经香港至南洋爪哇，教华侨子弟学中文，宣传革命宗旨，在当地华侨中颇有威望。光复会重建后，李燮和任南部执行员，地位仅在章太炎、陶成章之下。1911年，李燮和应黄兴之召，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事败，转赴上海。

①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第七册，第40页。

旋回安化看望母亲，其母已殁逾年。湖南官府闻李回乡，严令缉捕。李脱身走汉口，闻武昌起义爆发，遂赴上海①。

李燮和来到上海，收到泗水华侨电汇银币万元，作为活动经费。适值清廷调海军与长江水师会攻武昌，他与光复会员王文庆等分途努力，王文庆往杭州，章梓往南京，柳承烈、张通典等往苏州，李则自留上海，欲谋封锁吴淞，扼江海之口，阻止清廷海军西进。王文庆至浙江后，约集革命党于湖州、嘉兴之间，并遣百人至李燮和处。李将他们分派到上海附近各地，密谋一齐发动。同时，李燮和召募一批青年，编成敢死队，内多中国体操学校和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学生。

当时，驻扎吴淞、上海的清廷军警中，很多军官是湖南人，李燮和便利用同乡关系进行秘密活动。吴淞巡官黄汉湘为湘乡人，李燮和与其接触，"一见，语辄合"②。通过黄，李又与上海闸北巡逻队官陈汉钦秘密接触。通过陈，李又与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以及江南制造局附近炮兵营哨官成贵富等湖南人发生联系，章、王等皆"愿以所部为民军"③。通过黄汉湘，李燮和又与海巡盐捕营统领湖南人朱廷燎取得了联系。朱又将吴淞警务区长杨承溥介绍给李燮和。杨为松江人，对上海地方形势熟悉。这样，李燮和通过黄汉湘、陈汉钦，象串珍珠似的，将上海及其附近的军警串通起来，基本上控制了上海、吴淞的军警，"淞沪两地军警皆静待后命以应起义"④。这为上海起义排除了主要的军事障碍，铺平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上海起义是在中部同盟会、光复会上海支部共同领导下，革命党人领导的敢死队、上海商团、起义后的上海军警等武装共同努力下取得胜利的。

---

① 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第五十七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④ 《辛亥革命》第七册，第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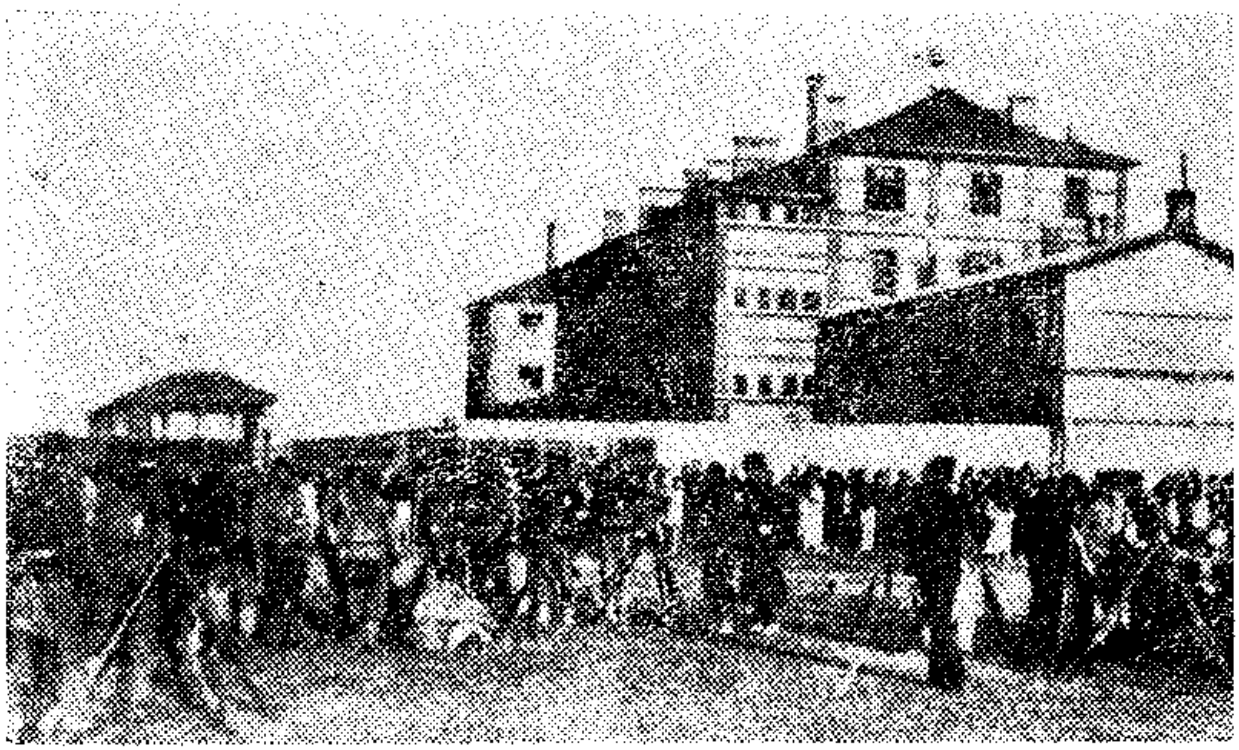
中部同盟会和商团方面，陈其美等人本来的想法是，上海起义须待南京、杭州等地发动以后再动，10月底、11月初，忽然传来消息：清廷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泊吴淞口，运江南制造局所制枪械以济汉口清军，“急攻汉阳，民军告不支”。指挥汉阳民军作战的黄兴亦致信在上海的同盟会员，告以汉阳危急，“亟盼宁、皖响应，绝彼海军后援”①。11月1日晚，陈其美与李平书等在城自治公所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陈、李外，有吴馨、叶惠钧和刚从德国回来的同盟会员钮永建。会上，陈其美提出以“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代替先前的视南京等地而动的方针，钮、叶均表示赞成，吴馨不同意，认为上海兵备道在松江有左营衙门，在苏州有右营衙门，如果上海率先起义，松、苏两地清军可能迅速到沪增援，阻力很大。钮永建当即起立说：“苏州混成协统刘之浩已赞同起义，我即刻到松江去响应，切断清廷援军”②。于是以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上海首先发动的决议。

10月底、11月初，光复会方面，尹维峻自浙来告，王文庆已在浙江募集千余人，编为义勇军，与杭州革命党已经约定，在11月6日起事，要李燮和同时举兵。李于是通知陈汉钦，要陈转告已经联络好的军警，与浙江同日起事。汉阳告急的消息传来以后，李燮和于11月2日与陈其美会面，讨论共同起义事宜。会议决定，第二天，即11月3日下午4时，闸北与县城同时发动，闸北以巡警为主，县城由商团负责，两处成功后再合力攻打江南制造局。会后，陈其美、李燮和便分头进行准备。

当晚，李燮和将光复军白旗发给已经联络好的军警，约届时举火为号，兵士则袖缀白布条为标志；并遣敢死队兵目周厚德将光复军白旗送到吴淞，告知巡官黄汉湘具体办法，上海军营的通知任务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4页。

② 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第149页。



上海光复军在闸北操练

则由闸北巡逻队陈汉钦负责。

本来约定的起义发动时间为3日下午4时，不料，因情况突变，陈汉钦在上午便提前起事了。原来，陈汉钦进行起义准备的秘密被上海巡警暗探队队官汪景龙发现，这个顽固的汪景龙用手枪逼迫陈汉钦面见巡警局长姚捷勋，殊不知姚捷勋早被陈汉钦疏通，因此汪景龙告发陈汉钦谋反时，姚不置可否。汪大怒，开枪击陈，不中，姚大声呵止。这时警卒汹汹鼓噪，忽然巡警总局隔墙火起，汪景龙见状大惊，慌忙逃走。姚捷勋对陈汉钦说声"子善自为之"，亦离职他去。陈汉钦速告李燮和，李果断下令提前发动。上午11点，陈汉钦率众占领巡警总局，命令局中巡警易帜起义。尹村夫、吴龙泉等人率领的闸北商团也参加了起义。下午2时，闸北未经战斗，已被民军占领(起义军警、商团统称民军)。

11月2日晚，同盟会方面，陈其美与李平书等在城自治公所讨论第二天起义具体步骤，同盟会员杨谱笙、高子白均到会。会议决定由县城警务长穆杼斋负责地方保卫事宜，由李平书通知商团及

救火联合会，共同守卫城厢内外各重要地方。会后，李平书连夜召集各商团负责人临时会议，当众宣布有关起义问题，略谓时局日见紧张，愿各商团竭力保护桑梓，如果听到南市救火总会钟楼鸣钟9响，继以13响，即派团员分段出防，维护治安。9响、13响，隐寓九月十三日（即公历11月3日）之意。

11月3日清晨，陈其美以军政府名义，委任李平书为上海民政总长，并由李出面，请谙于外交的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上午，陈其美等在西门外斜桥西园举行会议，凡与革命党有关的重要人物均到，约定下午2时会齐，进攻制造局。

下午，闸北起义胜利消息传出，驻扎浦东的沪军巡防营由章豹文率领，巡防水师五营官兵由管带王楚雄率领立即响应，易旗反清。上海道刘燕翼立即从上海城逃入位于租界内的洋务局，上海知县田宝荣亦闻讯逃走，上海城的军警业已转到革命方面，上海城已是一座毫无抵抗力量的空城。下午2时，小南门救火会联合会钟楼钟声按预定信号响起，上海商团各部、张承榘率领的敢死队、中国敢死团，聚集南市九亩地，据说有数千人之多，陈其美、李平书、沈缦云、杨谱笙、吴馨、徐寄尘、郑师道等数十人均在。其中最整齐的是商团，武装齐备，枪械精良，由叶惠钧率领，其次是敢死队，均有赳赳武夫之慨。会上，陈其美、李平书、沈缦云等都登台演说，宣布起义，当场扯毁清朝龙旗，改悬起义白旗，并分发参加起义人员每人白布一条，宽3寸，长6寸，绕在左臂，统称革命军。商团总司令李显谟宣布商团作战命令：一、协同敢死队攻打制造局；二、进攻上海道；三、各分队分段防守城厢内外，维持治安。随后，兵分二路，商团大部分去分段防守城厢，敢死队等则进攻江南制造局。

城厢方面，由于没有抵抗力量，因此没有发生冲突；商团顺利地占领了各处。其分布为，由冯少山率领沪西商团占领南城、西城；尹村夫、冯润生率领商余、清真、洋布、韫怀、伶界等商团占领东城、北城；刘舜卿率领书业商团占领硝磺局。到下午四时，各城楼

均悬挂大白旗，城门均由革命军把守。黄昏时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张承檍等人退回县城，直奔上海道台衙门，守署亲兵已经反正。敢死队直入三堂，放火烧了道署，接着又烧了参将署。① 到晚上八时，整个上海县城包括道、县衙门均为革命军所占。然攻打制造局之役却颇不顺利。

攻打江南制造局是上海起义过程中唯一硬仗。起义以前，李平书曾以制造局提调身份，劝说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不要再运枪炮支持清军，又告诉他"人心瓦解，怕局中区区守卫，不足以抵制，不如另筹保全之策"。然而张士珩冥顽不化。11月3日，他听说闸北起事以后，立即抽调炮兵入制造局助守，在江边列排炮六尊，要口设水机关枪，大门口设小钢炮，戒备森严，准备一战。

11月3日下午3时许，张承檍、刘福标等人率领的敢死队作先锋，从斜桥直扑制造局后门西栅，陈其美等率众随后跟上。敢死队一马当先，到了高昌庙附近，风声鹤唳，纷乱紧张，商店均已闭门搬家，张承檍高声大叫："同胞们，不要害怕，我们今日起义，除杀满洲奴隶贪官污吏外，决不伤害吾等同胞，请大家放心！"但是人们都怕制造局门前变成战场，仍然携带行李狂奔。

5时，敢死队乘制造局放工之际，自西栅栏潜行至局门前，向里冲去。忽然，随军督战的陈其美叫大家暂缓进攻，他来说服守卫制造局的军队，可以不流血。他只身入内，对守军作了一番演说，然而守军不予理睬，出其不意地将他拖了进去，为张士珩所拘。以敢死队为先驱的革命军见状大怒，毅然发动进攻。经过一条约半里长、二丈宽的走道时，围墙上的守军先放一排空枪示警。敢死队见无子弹，便抛掷炸弹，向里猛冲，至铁栅门约四、五丈距离，共投弹10余枚。忽然守军机枪齐发，子弹密集扫来，革命军应声而倒者30

① 关于放火烧道署、参将署事，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说系光复会派来李征五率领敢死队所为，然张承檍回忆录云其亲见，似较可信。

余人，队长张承榘胫部被炸伤，右腿复中一枪。刘福标被炸去左脚踝骨，田鑫山亦受枪伤。此处是走道，左右是墙，无处躲避。敢死队只得向后撤退。前队尚未退出，后队又冒死向前冲去，再次被守军击退。前有劲敌，后无援兵，革命军只得退回县城。

听说陈其美被拘，正在城自治公所的李平书，急偕商团总司令李显谟赴局见张士珩，要求开释。张不允，说："书生不知利害，妄思革命，徒送死耳。"李等怏怏而出。过一会儿，王一亭又与李平书赴局见张，以自治公所和商会名义保释陈其美，张仍不允，说是陈其美自称系《民立报》访事，那么应由该报具结，保证"以后不来局滋扰"。王、李等只得再回城商量。这时已是午夜 12 点了。

在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会所，李平书向大家报告了制造局节节设防，殊难攻袭的情况。这时，忽然得到上海道署总账房朱葆三密报说：上海道刘燕翼已密电两江总督，谓上海革命党人起事，商团尽叛，两江总督已调清军向上海进发，并饬令无论革命党人或商团团员，捕擒后立即正法等等。情况相当危急。王一亭站起来激昂地表示："事急矣，有进无退，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即由王一亭草成商团团员反攻令，由李平书签名发出。商团团员闻讯赶来参加者约 600—700 人，编为两队。出发前，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三人向众痛哭誓师，愿众团员于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末云："勉矣诸君，祝尔成功归来！"① 誓师毕，团员们群情激昂，浩浩荡荡地向制造局进发。这时已是 11 月 4 日凌晨 1 时。李显谟偕冯少山率领负责通讯的马队，在阵地附近指挥作战；高一谋（商团军事总教练兼商团司令部参谋）、朱少沂（商团基本队司令）留守毛家弄商团司令部负责联络工作。李平书则坐镇城内救火会联合会，掌握全局。

---

①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第 158 页。

张承橚率领的敢死队退回县城，在巡警学堂稍事休息，得到不少市民的支持与参加（包括一些江南制造局工人），号称“不下千数百人”①。他们重整旗鼓，重攻制造局。

光复会方面，李燮和等听说陈其美等攻打制造局受挫，急忙召集陈汉钦等人于锐进学社开会，决定悉起已经起义诸营会师猛攻制造局。十一月四日凌晨二时，各路军警抵达龙华镇，计有章豹文率领的驻在浦东的巡防营，驻在南市的沪军营，陈汉钦率领的闸北巡警，王楚雄率领的水师营，李征五等人率领的敢死队。李燮和下达进攻命令，诸军颇有难色，李燮和发表演说，谓“今日之事，乃拿破仑所谓最后十五分钟者，大局存亡在诸君一勇怯间耳。无已，燮和请为诸君先登。”② 乃手握炸弹前行，将士皆感奋，齐向制造局冲去。

这样，第二次攻打制造局的共有三支兵力，即上海商团、张承橚领导的敢死队、起义了的上海军警。三者当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军警。这三支兵力，在凌晨二、三点钟的时候，将制造局三面围住（另一面是黄浦江），频频攻击，军警攻前门，商团、敢死队攻后门。李燮和担心诸营并起，不相统一，且各自为进退，不利于作战，乃派沈克刚、平智础、公羊寿文、柳作屏等奔走，通令协同作战。

在前门阵地上，沪军营打先锋。当时局门坚闭，守军凭墙射击，沪军营队目王介夫中弹身亡，其余死伤 10 余人。李燮和令易队再攻，闸北巡长王得超冒弹向前，连掷三枚炸弹，炸开大门，守军退守二门。双方相持不下。光复会领导的敢死队一部分人绕至旁边，钱林一毁其墙壁，周德厚、潘永强、姚敏、江寒、朱照、邵汝干、余武华相率跃入。守军居高临下，开枪固守，一枪打落王得超的帽子，王得超仰面掷弹，轰然一声，敌楼炸毁，守军纷纷跌下，余皆哗

① 《革命逸史》，第五集，第 264 页。

② 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第五十七号。

溃，来不及逃跑的，皆袖缀白布投降。

在后门阵地上，仍由张承楹率敢死队打先锋，商团跟上。正攻打间，随敢死队而来知道局内军械所在的江南制造局工人，乃拆墙翻身入内，不到一小时即将步枪库打开，拖出一些步枪来参加战斗，接着又打开子弹库，于是，凡是无枪前来参战的，均往该处取枪取子弹，战斗力大增。厂内工人放火烧了总办张士珩住宅，霎时火焰上冲，高入云霄。正在夜色朦胧中作战的革命军，见之倍加兴奋，攻局愈烈。

前门已克，局内火起，后门难守，张士珩急命新调入局的巡防营和炮队营抗击，无奈二营早为革命党疏通，“巡防营观望不前，炮队营屡调不出”①，不得已，张士珩急请海军飞霆舰救援，谁知该舰也早与革命军有约，回以“炮未安齐”，不予理睬②。眼见大势已去，张士珩偕亲信乘事先备好的小轮船逃入租界，后来逃往青岛。局内守军均绕白布投降，制造局遂被攻克。这时，已是11月4日上午9时。

制造局攻克后，革命党人急忙寻找陈其美，可是到处都没有，后来据反正人员报告，才在厕所旁边的一个储藏钢铁的小房间里找到他。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是：

> 只见他手足带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靠着板壁，默然不动。一看，原来他的发辫从新凿的洞孔拉出房外，房外梁上挂着一个铁钩，发辫就紧紧缚在上面，所以他一动也不能动。同志们给他打开镣铐，放下发辫。他已经手足麻木，不能走路。李燮和传令扶着他走几步舒舒筋骨，然后叫他回去休息。③

在中部同盟会、光复会和商团武装的共同努力下，攻打制造局

---

①② 《辛亥革命》，第七册，第93页。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32页。

的战斗持续了 16 个小时，革命军共死伤 80 来人（3日晚进攻时，张承橒所率敢死队已死伤 50 余人，4日凌晨进攻时，李燮和所率之人死伤 20 余人，两次共计 80 来人）。

吴淞方面，巡官黄汉湘在 2 日接到李燮和关于起义的通知后，立即通知所属各营。3 日上午，黄汉湘特邀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吴淞警务区长杨承溥、商会总董谢蔼光、自治会议长冯鼎棻等人在吴淞警署，议设军政分府于复旦公学，传令诸军皆易帜反清，并发给光复军白旗。令下，炮台守官姜国梁、南汇营游击龚先耀、吴淞营参将许宏恩等皆表示从命。另有一些人在观望，而五营统领梁敦焯则不赞成。他在得到黄汉湘起义通知后，便电告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派兵援助。电报被黄汉湘派人在电报局截获，黄乃派朱廷燎率领所部处理梁敦焯及其部属，梁逃走，其部为朱所收。其余观望诸军因而慑服。吴淞遂为革命党占领。吴淞军政府成立后，黄汉湘被推为总司令，朱廷燎为水军司令并兼总参谋，杨承溥为民政长。

由于上海起义是在比较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上海居民对此已有一定思想准备；而且起义时，在县城及租界基本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因此，在起义过程中，无论华界还是租界，社会秩序都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骚乱。

11月 3 日，闸北、南市、县城反正后，各城门上遍树白旗与革命军旗。树旗之时，“群众鼓掌欢呼，声隆如雷”①。是时，“商店照常开市，人民熙攘往来”。城中通衢遍贴告示，分为两种，一为《上海军政分府示》，示云：

> 照得武昌起义，同胞万众一心。凡我义旗所指，罔不踊跃欢迎。各省各城恢复，从未妨害安宁。上海东南巨埠，通商世界著名。一经大兵云集，损害自必非轻。今奉军政府命，组织

①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150 页。

各界输诚。兹已纷纷归顺，具见敌忾同情。惟愿亲爱同胞，仍各安分营生。洋人生命财产，切勿乘此相侵。转瞬民国独立，人人共享太平。①

一为民政长李平书所发，精神与军政分府一致，示云：

上海巨埠，保护华洋。免受兵火，独立主张。凡我商民，切勿恐慌。照常营业，痞棍宜防。如有闹事，军法照行。本军府示，各各传扬。②

告示所贴之处，“万人攒首，相聚而视，每阅至痛快处，鼓掌声大作”。③

是日夜里，各商团分区出防，维护治安，凡监狱改过所、硝磺局等要地，防守尤严，救火会亦全体戒备，“闾阎安堵，匕鬯无惊”④。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民军占领城厢时，南市新舞台演戏如常，观众看戏亦如常，“似不知本城有变者”⑤。伶界商团部分团员，在演完夜戏后，便去参加攻打制造局的战斗。

租界更无骚乱。上海起义发动前几天，租界当局已据各方面情况判断，革命党人能在“任何时候占据上海”，并确立了“中立”的方针。起义发动前一天，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Fraser,E)奉命发出告示，要求在华英人既不参与反对清政府的战争，也不参加镇压革命党人的战争，否则，一经查出，即处500镑以下之罚金，或监禁两年以下。11月3日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照会英国驻沪总领事，声称上海已经光复，请总领事协同维持租界的治安。

起义过程中，对于上海火车站问题，租界与民军曾发生一些矛盾。11月3日闸北起义后，民军30—40人便进入上海火车站（即

---

① 《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1页。

②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2页。

③⑤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1页。

④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50页。

北站），并派一人驻守电话室。此人开始干预电话的机件时，被英籍车务总管濮爱德拘捕。根据濮爱德的请求，并经领事同意，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借口沪宁铁路系借英款建造，以保护路权为名，派遣租界武装万国商团进驻租界外的火车站。

已被命为军政分府民政长的李平书认为此举侵犯了中国主权，于4日上午特派上海商团公会模范队副司令、闸北商团会董兼指导尹村夫、闸北商团教练吴龙泉前往交涉。抵火车站后，尹村夫以民军名义，向濮爱德提出4点要求：1.将站顶龙旗卸下；2.撤退万国商团；3.由民军驻防；4.负责为革命军供应运输车辆。经再三争论，濮只同意第一条，即将清朝统治的象征龙旗卸下，换上民军旗帜，其余各条须请示上级后才能决定。此时，英国驻沪总领事表示："一旦革命党领袖派出一支显然有组织的军队来保护车站，万国商团便应从该站撤出"，只要这条铁路不为任何一方运输军队与军火。是日晚，万国商团从车站撤出，闸北商团接管了车站①。车站主权的收回意义重大，确保了沪宁铁路置于民军的控制之下，为日后会攻南京提供了重要条件。

上海起义成功以后，周围各县竞相响应，宝山、松江、青浦、崇明、嘉定、南汇、奉贤、川沙相继宣告独立。

宝山在上海起义的第二天，即11月4日被民军占领。是日清晨，由已经起义的吴淞巡警和盐捕营兵士组成一支队伍，计50人，径入宝山县署，拘捕了知县胡调元，搜获大宗窖银，被解送到吴淞军政分府。警局巡官仲杰以民军队长身份进驻宝山县城三日。11月7日，各界共推绅士钱淦为宝山县民政长。

松江于11月6日宣告独立。上海起义发动前夕，同盟会员钮永建即自告奋勇地回松江策划起义，阻止驻松江清兵援沪。11月

① 尹村夫：《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第209页。

4日，上海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松江，人心恐慌，下午，一个姓谢的国民军职员到松江商会报告上海起义情形，谓民军“于地方丝毫不扰，商民悦服”，然后劝说商会，“令众一体悬旗欢迎”，响应上海，宣告独立。商会诸人应允，于是城内外店铺居户，纷纷赶制白旗，作好独立准备。11月5日，苏州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原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起义，自任苏军都督。松江本属江苏管辖，获悉苏抚程德全独立宣告后，各界人士即于11月6日晨在城自治公所集议，宣布独立，成立松江军政分府，推钮永建为军政部长，谢宰平为民政部长，沈思齐为执法部长，钱选青为财政部长，另专设参谋部，为四部之总机关。军政分府印信，因来不及现刻，仍用原松江府大印，只是铲去满文一角，以示光复。松江府下属之华亭县、娄县，亦同时宣告光复，原二县县令改称各县民政长。宣告独立后，军政分府发出安民告示一道，内容与《上海军政分府示》大同小异。一时，城内城外，白旗高挂，告示遍贴，市面安堵如常，“人民皆欣欣有喜色”。

青浦亦于11月6日宣告独立。上海起义后，青浦革命党人许咏霓、沈葆钧二人自上海返青浦，策划独立。青浦县令蒋澜江见清政府大势已去，早就作好逃遁准备。11月4日，蒋澜江正在偷运物件作潜逃计，许、沈二人在饮酣之后，深夜突入县署，声言民军已到，令蒋速交印信出衙。蒋言：“弟系汉人，革命素所赞成，此次预备欢迎，已制白旗两面，并有上黎都督（元洪）书一封，请君等观看。惟有八旬老母，恐致惊骇，乞缓至明晨，全家出署”。许、沈不允，蒋仓皇出奔。署中大乱，许、沈急写安民告示，又唤铜匠将蒋交出之印铲去满文。这时，狱中犯人暴动，到5日晨，监犯逃跑一空。局面混乱，难以收拾。许咏霓乘轮返沪，沈亦他去。地方绅士急忙开会，推举临时民政长，仍以蒋澜江为知县，并设机关、司令、干事、保安四部，维持秩序。11月6日，获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告独立电，青浦士绅乃将电文挨户宣告，人心始定。11月12日，青浦各界集

议，宣告青浦军政分府成立，公推徐彭龄为民政长，陈承澍为司法长，钱学乾为财政长，军政长一职暂缺。

崇明于11月6日宣告独立。上海军政分府即于11月6日派民军数十人开赴崇明，与当地士绅接洽进攻办法，受到崇明各界的热烈欢迎。驻守崇明的苏松镇总兵段日陞闻讯逃走，其所统领的中、左、右三营官弁一律易帜起义。下午5时，绅、学、军、警各界代表在县自治所集议，宣告独立，公推周福增为军政分府临时司令长，原县令王绍曾为民政长。

嘉定亦系11月6日宣告独立。11月6日下午6时，县自治公所在与上海军政府联络之后，宣布独立，金沙塔顶及四门城楼上白旗高挂，自治公所、营署、警局、学堂及各户人家均门插白旗，起义人员臂缠白布。独立后，原县署文官知县以下，武官游击以下，全部解职，政权归自治公所。8日，陈其美派杨夏汾为指挥长，率领沪军并敢死队数十人抵嘉定，进行镇抚。同日，嘉定军政分府成立，陈楠为司令，负责全县军政，秦汾、叶涛、戴思恭、秦沅、廖家驹、黄守孚、秦曾钺、梁鸿耀为参谋。9日，议定许苏民为民政部长，廖世经为司法部长，印有模为财政部长。南翔方面，于11月7日成立民政事务所，推李树勋为市长。11月26日，嘉定接到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状（当时嘉定隶属江苏省），许苏民为民政长，民政署下设总务、主计、学务、警务四课，分别以戴思恭、潘伯恒、葛文珪、叶涛为各课之长。嘉定宣布独立之夜10时许，曾有吴淞兵40余人乘舟抵嘉定，径入县署，在官府搜索去银元5100元，雇小车运赴吴淞，后被陈楠等截回。独立时，嘉定监狱因派兵防守，未发生纷乱，独立后，监狱撤防，11月18日深夜，犯人多名脱械越狱，被新军发觉擒获，第二天，嘉定军政分府开特别裁判庭，将越狱首犯翁得胜等10人判处死刑，立即枪决。除此之外，嘉定起义后，没有特别的动乱。

南汇县、奉贤县、川沙厅均于11月7日独立。11月5日，即上

海起义成功第二天，奉贤、南汇、川沙的绅士王忍庭、唐少兰等找到城厢内外总稽查长李卓民，要求上海军政分府拨兵光复各镇。李为南汇人，在上海起义中曾率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的战斗。他当即向上海军政分府作了反映。军政分府遂命李卓民率领商团敢死队20人，续命张志成率民军20人赴南汇等地。11月7日中午，商团抵南汇县城，城内巡警当即在局内树起白旗，大开城门，城内商团、学生50人排队出城欢迎。民军入城，县令赖葆臣交出印信和公款。此前，南汇绅商各界已推城自治公所董事顾忠宣为民政长。李卓民乃委派敢死队队长戴汉斌为驻南汇司令，会同顾忠宣维护治安，并发贴安民告示数十张。

奉贤县境，以南桥为中心点。11月6日，因南桥镇巡防营管带余梦熊赴沪，有兵变的可能。南桥镇绅士陈端甫、庄笛僧、宋惕深等3人急忙筹款抚慰，同时飞请松江酌派师船。7日黎明，陈、庄等人收取巡防营军械，随后，合镇铺户悬挂白旗，表示独立。8日，陈端甫率众入城，县令赵濉鸿已先期将印信交于自治公所，自行逃走。9日，巡防营管带余梦熊奉江苏都督程德全令，照常供差，所有军械如数归还。于是，各界在南桥镇集议，公举朱家驹为民政长，陈鸿恩为司令长（陈力辞，乃以庄登瀛权理），陆渠为财政长，孙寿同为司法长。

川沙厅是和平反正的。当李卓民等率众前往南汇并欲往川沙时，川沙人黄炎培走谒陈其美，说明川沙已顺从革命，不必派员前往；另一川沙人张志鹤去见李平书商订川沙独立告示。黄、张二人联名具牍，请上海军政府发给新枪40支，以资防卫。11月6日，张志鹤从上海警务长穆湘瑶处借调武装20人开赴川沙。川沙原是地方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起义基础较好，上海起义后，川沙守军已转向革命。张志鹤率众赶回川沙后，城守千总张复庵主动前往联系，表示愿听革命政府指挥。张志鹤遂与当地商界领袖召集商团，命张复庵指挥，维持秩序。厅署办公人员早已星散，川

沙厅同知刘嘉琦，为一莅任不久懦弱无能的人，听说独立之事，惊惶不知所措。张志鹤偕人去见他，他讷讷几不能出一语，惶恐地交出印信。张志鹤乃借用原印，仅削去右边满文，以示光复。7日晨，川沙厅四处张贴安民告示，白旗招展。江苏都督府成立后，川沙改厅为县，方鸿铠任民政长。刘嘉琦向方表示，在川沙任内两袖清风，别无长物，老夫妻俩日后生活还有困难。方鸿铠倒也通达情理，不但没有加害于刘，而且赠银若干，雇船将刘礼送出境。

上海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上海是国际上著名的通商巨埠，向为中外瞩目。上海起义成功，帝国主义租界当局采取"中立"政策，这对于正在与清军作战的武昌民军，对于纷起的各地起义，都是巨大的鼓舞。上海又是清廷军火生产的重要基地，它的起义成功，不但阻止了江南制造局军火运往湖北清军，而且使这些军火为民军所用，这对于增强民军、削弱清军具有直接的影响。上海是长江门户，它的起义成功，直接阻止了清廷海军西援，减轻了武昌民军的压力。而且，上海还是江浙政治、经济中心，它的起义，引起了江浙的连锁起义，为攻克南京奠定了基础。对于上海起义的重要意义，孙中山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吾党之士，"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①。

四、沪军都督府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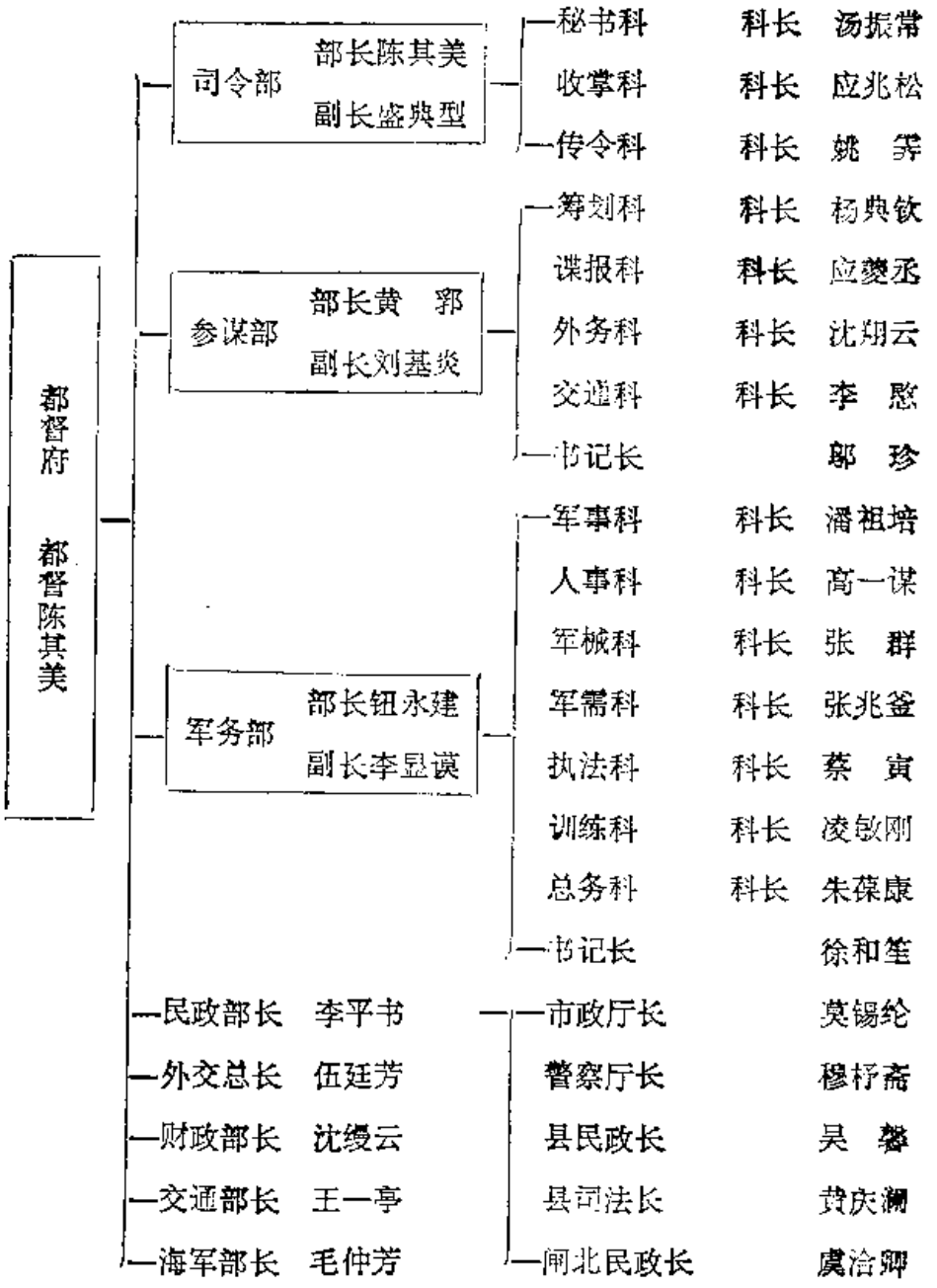
上海起义后，成立革命军政府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按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中山选集》，第208页。

照同盟会纲领，上海成立的革命政权名称应为“上海军政分府”。事实上，在起义过程中和革命政权正式成立以前，陈其美等人已以“上海军政分府”的名义发布宣言和告示，并委任了民政总长、外交总长等官员。

11月6日下午2时，上海各界代表陈其美、李平书等近60人，在上海城旧海防厅署举行会议，筹组上海军政分府，推选都督。会议由李平书主持。会上，有人提出，上海为交通大埠，光有军政分府不够，“应另行举一沪军都督，招集大队雄军北进，以定国是，并为我东南门户之备”。大家同意。于是进行推举。对于沪军都督的人选，会上主要提了两个：李显谟、陈其美。李平书、商团代表及起义军官均推李显谟，同盟会代表推陈其美。双方争持不下。同盟会代表黄郛脾气急躁，首先拔出手枪威胁李平书，说是陈其美率先进入制造局，立了第一功。在场的起义军官也都拔出手枪，说陈其美进入制造局后即被拘禁，制造局是李显谟指挥起义军和商团打下来的。陈其美当场提出一张未经协商事先拟就的都督府人选名单：陈其美任都督，李燮和、陈汉钦、钮永建、章梓、李显谟等十人为参谋。名单一宣布，会场顿时大哗，一片混乱。陈其美卫士、原敢死队刘福标，突然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陈君莫属，倘有异议，请饷吾弹！”在场各界代表面面相觑，大惊失色，纷纷夺门而出，会议闹成僵局。第二天，同盟会的《民立报》便有会议“公举陈英士为沪军都督”的报道。后经李平书等人居间斡旋，才达成协议。11月7日下午，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

根据《沪军都督府条例》和1911年11月19日《申报》发布的《沪军都督府职员表》及其他有关资料，沪军都督府的机构和人员构成可列表如下：



都督府职员中，都督一职最为重要。按照《沪军都督府条例》，都督不但负责都督府全局事务，兼任司令部部长，而且，司令部、参谋部、军务部均直辖于都督，受都督之指挥命令；各部各科初级将校以上，均由都督亲任；凡发布命令及赏罚、任免各部及各营文武人员，均属都督之权限；关于军政重要事件，由都督召集临时军事参议会决议施行。实际上，都督府一切军政大权，均由都督掌握。

陈其美担任此职，决定了都督府的革命性质。在都督府各部正副部长共11人中，除伍廷芳为社会名流，毛仲芳为海军起义将领，盛典型身份待查外，其余8人均系革命党人（陈其美、黄郛、刘基炎、钮永建、沈缦云、王一亭为同盟会员，李平书、李显谟是起义前便参加革命的商团领袖）。这表明，沪军都督府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革命政权。



沪军都督府发给沈缦云的护照

但是，在沪军都督府的成立过程中，由于陈其美等人没有顾全大局处理好与光复会李燮和等人的关系，导致了革命队伍的分裂。

在上海起义过程中，李燮和等人是立了大功的。上海、吴淞的军警主要是他们联络的；率先成功的闸北起义是他们领导的，江南制造局也主要是他们领导起义军警攻克的。制造局攻克后，李燮和就被推为民军总司令，驻局办事。之后，他还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总司令名义发布告示。在上海军政府人员酝酿过程中，李燮和也一直被提名为总司令。但是在11月6日下午筹组军政府时，陈其美却完全撇开光复会一批人，在职务安排上，也把光复会的人撇在一边，仅提名李燮和、陈汉钦担任没有实权的参谋。这就惹怒了光复会系统的革命党人。

陈其美这样做，是有预谋的、有组织的。还在上海起义以前，陈其美已经开始了排挤光复会的活动。据当时在陈其美左右的章天

觉回忆，上海起义前夕，陈其美密召亲信集议，讨论对付光复会的方法。他说：

> 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下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政治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①

在联络军警过程中，陈其美也居心与光复会争夺。他曾命同盟会员周南陔，利用同乡关系，把已被光复会联络好的吴淞炮台台官姜国梁拉到同盟会一边来，完全听同盟会调度，并说："姜已得了光复会一笔钱，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费"。② 陈其美周围的人还对周南陔说："李燮和不是我们的人，不可信任"，"光复会专门同我们捣乱，破坏我们联络军队的工作"。③

沪军都督府成立以后，光复会系统的人群情愤怒，吴淞军警准备有所举动。李平书急忙去见李燮和，说："今日之事，大局为重，愿公一言"。李燮和曰"诺"，便在制造局与军警长官会面，安慰他们不要妄动，"静待后命"④。经与陈其美协商，陈其美拿出一部分钱财慰劳军警，李燮和交出兵权，他的沪军总司令一职遂被解除。以前，黄汉湘、朱廷燎等已在吴淞成立军政分府，为了表示不服陈其美管束，与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乃拥李燮和为吴淞军政分府都督。于

---

①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论文集》，第831页。

②③ 周南陔：《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43、45页。

④ 《辛亥革命》第七册，第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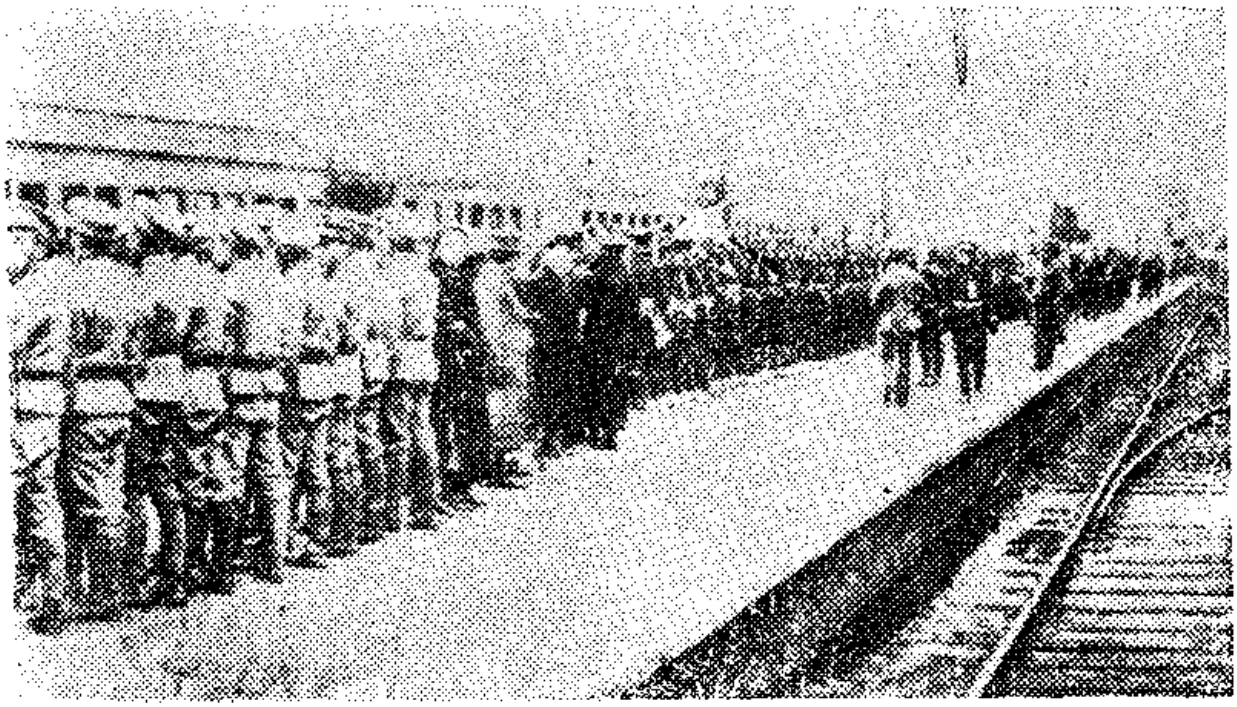
是，上海出现了两个都督并存的局面。11月9日，李燮和去吴淞，途中，遇刺客发枪狙击，子弹掠耳而过，其随身卫兵中弹而死。人皆怀疑系陈其美所为，于是，光复会、同盟会关系日益紧张，后来竟发生了陈其美派人刺杀陶成章的惨案。

11月16日，光复会元老章太炎自日本回国，下榻吴淞军政分府。他与李燮和夙称至交，劝李削去都督名号，称总司令，改隶江苏都督程德全麾下，以示不争权利。李依议，遂取消都督名号，改称光复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吴淞中国公学。

陈其美谋取沪军都督权位虽有不顾大局的一面，但这并不影响沪军都督府的革命性。沪军都督府成立以后，立即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战果、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扫除封建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表现在组织兵力会攻南京和支援北伐，颁布民主法令，荡涤封建旧俗，酝酿建立革命临时政府和欢迎孙中山。

上海起义以后，江苏、浙江相继独立，唯有江南政治中心南京仍被清军固守。武昌起义以前，中部同盟会就曾策划夺取这一重镇，派柏文蔚等同盟会员去对驻守在南京的新军第九镇进行策反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等担心新军不稳，将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调驻城外秣陵关，而将原驻浦口的江南提督张勋率所部江防营调驻南京。上海、苏州、镇江、杭州等地反正后，徐绍桢在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推动下，于11月7日发动起义，被张勋击败，退守镇江。南京不仅是虎踞龙蟠的军事重镇，而且是上海至武汉的必经之地，不攻下南京，就无法使已经独立的两湖与富庶的东南各省连成一片，革命的成果便无法巩固。

11月5日，即上海起义成功的第二天，上海军政分府即颁布《檄南京文》，宣布"本军政分府拟上溯长江，恢复江宁，克日会合武汉、皖、浙光复军，共伸天讨，诛锄野蛮之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①。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即组织沪军先锋队600人，由洪承点



上海光复军前往南京支援

任司令，参加攻打南京的战斗。吴淞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亦派黎天才率淞军600人参战。11月1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分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提议组织江浙各处联军，会攻南京，由徐绍桢任总司令，得到程、汤的赞同。11月13日，徐绍桢在镇江设立联军司令部，并在上海设立总兵站。先后参加联军的部队有林述庆的镇军、朱瑞的浙军、刘之法的苏军各3000人，黎天才的淞军、洪承点的沪军各600人。11月22日，联军各部离开镇江向南京进发，经过几天的激战，于12月2日攻克南京，张人骏、铁良、张勋等狼狈逃窜。在这一战役中，出师首功，即攻占南京城外、长江边上的乌龙山，就是黎天才指挥淞军及一部分浙军立下的。

南京攻克后，民军士气大振，立即筹划北伐事宜。还在11月27日，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北伐先锋队便发表组军启事，得到了各界的支持。12月5日，上海各界千余人在张园召开北伐联合会成立大会，推程德全为会长，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统一军机、共

① 《上海军政分府檄南京文》，《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

谋光复为宗旨。1912年1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北伐，组织鄂湘、宁皖、淮扬、烟台、关外、山陕六路大军，拟取道河南、山东、直隶，会师北京。李燮和被命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陈其美亦命沪军的刘基炎所部三营、盛典型所部四营参加北伐，受李燮和节制。海军的海容、海琛、南琛三舰亦受命参加北伐。1月16日，海容、海琛、南琛三舰驶抵烟台，20日，刘基炎率北伐军2000余人乘轮驶抵烟台，准备一旦和谈决裂，立即挥戈北上。后来，南北议和成功，北伐遂止。

在会攻南京和支援北伐方面，沪军都督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除了派遣军队、供应军火外，还承担了相当数量的军费，诚如陈其美所云："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诸师，皆取道申江，纷纷供应，饷糈告匮，则问沪军；军械不敷，则问沪军；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①。

沪军都督府成立以前，革命党人即以"上海军政分府"的名义发布宣言，历数清朝专制虐政、卖国罪行，号召"凡我三吴健儿，均当效忠于祖国，以建共和之基，不当尽力于满朝，以贻万世之辱"②。他们还发布《檄南京文》、《檄镇江文》、《檄浙江、福建文》、《告海军同胞文》等，号召一切爱国的人们，共同努力，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对于弃逆投顺的满洲将士，亦以人道为怀，视为同等，决不加害。在经济方面，他们宣布废除一些不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苛政，裁撤除盐、酒、糖各税捐外的所有统税关卡，裁撤除海关外的所有税关，蠲免1911年的下忙丁漕和此前的积欠丁漕，豁免除为地方所用以外的各种杂捐。沪军都督府成立至包括中华民国宣布成立以后，沪军都督府发出一系列函电，抨击清朝，动员清廷官员反逆为顺，共奠神州，奉劝外国侨民遵守万国公法，切勿助清为虐。

---

① 陈其美：《为请取消沪军都督事呈孙中山文》，《申报》，1912年2月11日。

② 《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39页。

沪军都督府发起召开了革命烈士追悼大会，隆重悼念为民主革命献身的上海及其他各地烈士。沪军都督府发布了一系列告示，通令剪去象征臣服清朝的辫子，禁止赌博，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军人游逛妓院，宣布改皇帝年号纪年为公元纪年，废除军队中的割耳、穿耳箭等毒刑，废除跪拜旧礼，不得沿用体现等级名份的“大人”、“老爷”之类的称呼，代之以“先生”、“君”等。

武昌起义和全国各地起义的胜利，向革命党人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问题。1911年11月9日，湖北都督通电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江、浙、沪都督认为上海为交通枢纽，又为列强注视之地，正是筹建临时政府的合适地点。11月13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向武昌、长沙、安庆、南昌、苏州、浙江、太原、西安、福州、广州、济南、桂林、云南、贵州等处都督发出通电，请各派代表来沪，议建临时政府。15日，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会，成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主张各省原咨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这个意见没有为鄂军都督府接受。后来，上海方面接受了湖北的意见，各省代表赴武昌开会，同时各省留一人在沪，以“联络声气”。11月30日至12月3日，代表们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了会议，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会议结束前一天，即12月2日，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会议当即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各省代表却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大元帅人选问题争论不休。此时，孙中山于12月25日回到了上海，受到了沪军都督府和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孙中山是从巴黎经香港回到上海的，离开巴黎前夕，他给上海《民立报》发来电报，告以行期及归国打算，《民立报》将此电登诸报端，因此，孙中山尚未到沪，各界已作好欢迎准备。12月25日，《民立报》以《欢迎！欢迎！》为题，发表专栏言论，热烈欢迎孙中山归来，认为“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是日早晨，细雨如织，上海外滩十六铺

金利源码头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各国领事和外国记者亦赶来参加。孙中山乘香港轮入港，沪军都督府派"建威"兵轮，由参谋沈虬斋前往吴淞口迎迓。轮船快靠岸时，孙中山立在轮船的上层，身着黑色西服，脱帽高举右臂，向欢迎群众含笑致意。他一上岸，便被欢迎的人群和记者们围住了。随后，由乌目山僧领到哈同花园招待午膳。沪军都督府特在宝昌路408号预备一处敞雅安全的住所供孙中山居住。12月25日下午三时，由中国同盟会总部发起，在黄浦滩汇中旅馆，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是晚，举行宴会，席间，传来南京选举结果，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群情激奋，黄兴高兴得高呼三声"中华民国万岁"。

沪军都督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它在反封建统治的同时，也有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上海起义后，军政分府本已宣布免交钱粮，后来又重新征收，置当时农民水灾歉收的困难于不顾，一味催征。1911年12月，上海附近的青浦县香花桥、南汇县赵家楼、昆山县等地农民奋起抗租，沪军都督府派兵前往镇压。对于因反对虐待而举行罢工的江南制造局工人，沪军都督府也屡加压制。制造局工人发起成立"制造工人同盟会"，宣传反对压迫，要求平等，"如有不平等之事，一体罢工"，入会者千人以上①。陈其美闻讯，立即明令禁止罢工。

1912年7月31日，沪军都督府撤销，改为江苏都督行辕。从成立到撤销，沪军都督府计为时8个多月。

五、空前高涨的民主热情

在上海起义、会攻南京和支援北伐等斗争中，经过革命思想熏陶的上海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助饷热潮，表示了对新生

① 《民立报》1912年7月8、9日；《申报》1912年6月23日。

的民主政权的衷心拥护。

上海起义以前，许多青年欣悉武昌起义爆发，自动组织起来奔赴武汉或其他地方参加革命，前面述及的组织中国敢死团的同济大学学生朱家骅等人，就是在武昌起义后由上海乘舟西上武汉投身革命的。革命党人张承槱住在北站附近，一些裁缝工人和帮会群众，时常找他讲有关武昌革命的情形，恳请介绍他们到武汉从军。上海起义过程中，更有不少群众主动参加攻打制造局的战斗。据回忆，在攻打制造局的战斗中，“形形色色人等不约而来参战者有数千人”①。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但有相当一些群众自动参战则是无疑的。

上海起义以后，各界人民更是积极参军。11月5日，上海军政分府发出招兵消息，不到一天，即告满额。山西路盆汤弄某烟纸店姓王的学徒，只17岁，瞒着家人，径自报名参军。父母托人四处寻找无着，数日后，忽得儿子家书，略谓热血男儿正宜奋身杀贼，儿现已投入敢死队，演习有成，即赴前敌，“设或裹尸马革，虽死犹荣；如能痛饮黄龙，归来侍奉”②。沪军、光复军、巡警在上海扩充兵员，共达4个师，尚不包括商团。上海起义后，参军人数估计在4万人以上。学生、工人、商民、妇女及各省旅沪人士还纷纷自行组织军事团体，请缨杀敌。这类群众性的军事组织计有25个。学生军事团体有：陆一等人发起的中华学生军，黄凤长、尹建勋等发起的学生北伐队，张雪耻、施馥等发起的学生军，卞建章等发起的学生守卫团，中华民国学生团，学生北伐团，周鲁、孙信琪等发起的国民军北伐团，何海鸣、胡仰等发起的志愿决死团（初名决死队），由敢死团改编的北伐义勇宪兵队，王养吾、黄列侯发起的中华民国北伐先锋队，十字军北伐队，陈其昌等发起的沪宁北伐义勇军，黄鼎

① 《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64页。

② 《汉族青年之热诚》，《民立报》1911年11月29日。

等发起的铁血团，中华民国义军。女子军事团体有薛素贞等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等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又名女子北伐队），葛敬华、葛敬诚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林复等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沈珮贞等发起的女子尚武会。各省旅沪人士组织的军事团体有贺昇平、王泽放组织的河南北伐军，蒋凤棠、易著勋组织的旅苏湘团联合协济会，汤漪、桂林等组织的江西北伐队，黄郛、盛典型等发起的直豫皖三省北伐军，旅沪四川人发起的蜀汉军，旅沪川、滇、黔、桂四省人组织的四省北伐联军。

这些群众武装团体得到了沪军都督府的热情支持，很多奔赴前线，在推翻清朝的武装斗争中立下了功勋。张雪耻、施馥等组织的学生军400余人，随沪军刘基炎赴烟台，支援北伐，攻克了黄县。志愿决死团五百余人在总代表陈血岑的率领下，奔赴武昌，被革命政府改编为近卫宪兵。中华民国北伐先锋队120余人奔赴南京以后，直属黄兴指挥。十字军北伐队300人奉陈其美之命，开赴秦皇岛待命北伐。女子北伐光复军奉李燮和之命，驰赴南京参加会攻南京的战斗。她们"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①。从军女子们表示，"一国兴亡，匹妇亦肩责任"②，"兴亡之责，昔已签遗巾帼，光复之功，今宁独让须眉！"③沪军都督陈其美称赞她们："军歌齐唱，居然巾帼从戎；敌忾同仇，足使裙钗生色"④。各省旅沪人士组织的军事团体，在回乡参加反清斗争中，也多有功绩。

参军主要限于青年，助饷则涉及各个阶层。沪军都督府成立以后，财政问题是一大难题，为此，军政府多次召集大会，号召社会各界助饷。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章太炎、程德全、李平书、伍廷芳等演说鼓动。社会各界群起响应，各种助饷会、募捐会竞相成

① 《女子敢死队出发》，《申报》1911年11月26日。
② 《尚侠女学代表薛素贞上陈都督书》，《申报》1911年11月13日。
③ 《女子军事团传单》，《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
④ 《巾帼英雄》，《申报》1911年11月29日。

立，有沈缦云、徐久成、庄希泉等组成的南洋募饷队，邬振馨、李征五等发起的中华民军协济总会，由上海储蓄同志会与镇江商团公会共同发起的馈送军食联合会，胡寄梅、虞洽卿发起的节费助饷会，邵廷玉等发起的售物助饷会，方樵苓、陈文鉴等发起的军事募捐团。在1911年11月14日的动员会上，到会的商界人士“争先认书银行股份，或公债票，或捐助军饷，或担任劝募，一刹那间顿集巨万”。①在同年12月12日的动员大会上，动员之演说尚未结束，“而坛下即纷纷起立，索笔者，索纸者，口报者，书名者，不及半钟，而顿然书成四万余元”②。各行业、同乡会助饷亦很踊跃，沪宁绍水木工业所、沪南油豆饼米麦业、洋布业、木行业、纱业、木业工所、洋广北货海味业、骨器杂货业、绍酒业、沪北钱业保安会、红帮成衣业、绸业等都以实际行动认捐助饷。天水秉安记一家就捐助军饷银五万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支持新生的革命政权，旅沪广帮商家在两天内就支借了80多万两银子。

妇女、儿童们也力所能及地参加了助饷活动。妇女们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女界协赞会、劝募手工御寒品会、女子募饷团等团体，伍廷芳夫人、沈缦云夫人等都参加了这些活动，不少妇女将耳环、戒指、金表、手镯等捐充军饷。一位名叫程秋琴的女士，捐助金环、金戒指时，并赠诗一首，内云：“千针万织苦勤工，积蓄金钗助军功。劝我同胞诸女士，大家灭满戮元凶”③。表示了妇女支持革命的高度觉悟。有的儿童甚至将家长所给的糕饼费节约下来，以助军饷。

文化界的捐助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学生们除了从自己微薄的零用钱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捐助外，还组织宣讲社、游艺募捐团，四出宣传，劝说社会各界资助革命。和安小学、育贤女学、中西学堂、

① 《维持财政之大会》，《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
② 《财政大会议》，《民立报》1911年12月4—5日。
③ 《民立报》1911年11月11日。

龙门附属小学、圣约翰学堂、南洋大学附小、先春义务小学、上海中等商校、南洋中学、聚秀女学等校师生均积极捐款。民立报社全体职员各以月俸2/10汇缴军政府，商务印书馆以3日售书全部所得助饷。南社成员陈布雷等发起书画助饷会，以所得润资悉助军饷。医生余伯陶等发起医界助饷团，每人以一月医疗所得助饷。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盖叫天等，说书艺人王绥卿、王效松、王子和、周杏泉等，弹词艺人沈廉舫、程鸿飞、凌云祥、郭少梅等发起义演助饷。佛教界的清凉寺住持清海、海潮寺住持应乾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从1911年农历腊月初八日起，设水陆道场49昼夜，所得礼佛香火之资，悉数捐作军饷。

收入微薄的上海工人也投入了助饷热潮。江南制造局办事员及各厂头目，下至工匠、夫役等，义务工作一星期，所得工资全数充作军饷，据说"各工匠均非常踊跃"①。船厂、炮厂一次就有440名工人参加捐助，共捐近540元。为了赶造前线急需的枪炮，制造局工人日夜加工，"局中每日出枪之数，较之从前可增数倍"，"各工匠以此事关系民军甚巨，莫不乐而忘疲"②。在江浙联军会攻南京时，为及时修理前方的坏损枪炮，制造局炮厂炮匠十人赶到南京前线修理枪炮。更有甚者，1911年12月3日有一乞丐，至民立报馆，捐银元一块，请汇解军前。第二天，《民立报》以《江湖落魄人也知大义》为题，报道此事，并发议论："丐者尚知大义如此，温饱之家将何如？席丰履厚、坐拥千金者又何如？"事近滑稽，由此却可见当时群众拥护革命热情之一斑。

民主热情的高涨还表现在形形色色的政党竞相成立。上海起义成功以后，除同盟会和光复会公开活动外，上海还成立了大小3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都公开宣言拥护共和，但实际主张各不相同，有

① 《申报》1911年12月5日。

② 《申报》1911年11月16日。

的拥护孙中山，倾向革命，有的后来成了袁世凯的工具。这些林林总总政党的出现，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各政治派别在新形势下争夺权利的反映，也是人们希望用民主的政党政治取代独裁的专制统治的心理反映。这些政党很多都不限于上海一地，而是全国性的，这也说明了上海在全国所处的重要政治地位。

表列起义后的上海政党如下：

名　称	创建时间	发起人或领袖	备　　注
中国同盟会	上海起义后公开活动		1912年6月与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
光复会	上海起义后公开活动		称上海光复会总会
共和建设会	1911.11.16	会长姚文栋，副会长王河屏、秦毓	
中华民国联合会	1912.1.3	会长章太炎，副会长程德全	1912.3.2改为统一党，事务所设黄浦公园对过29号
国民公党	1912.4	名誉总理岑春煊、伍廷芳，总理王人文，协理温宗尧	初名中国共和研究会，本部设白克路侯在里
公民急进党	1912.3	周福鹏、徐扫千发起	本部设宝善街祥麟里
中华共和促进会	1911.12.22	名誉正会长伍廷芳，名誉副会长陈其美，总干事厉明度	事务所初设派克路，后迁斜桥台州公所
中华民国宪法预备会	1911.12.29	会长李平书，副会长伍廷芳，总务部部长郑允恭	后改中华民国宪政党，正领袖为伍廷芳，副领袖为李平书
国民协会	1911.12	发起人为张嘉璈、杨景斌等，1912年1月选温宗尧为干事长	事务所有二处，一设西门外，一设贵州路
商界共和团	1911.12.18	发起人为朱葆三、吴登瀛等	事务所设白克路侯在里740号
共和统一会	1911.12	发起人为伍廷芳、张謇等	1912年2月与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联合为统一共和党，上海交通处设五马路祥麟里13号

（续表）

名　称	创建时间	发起人或领袖	备　　注
统一共和党	1912.2	由国民共进会、共和统一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而成	本部初设南京，后迁北京，上海有交通处
自由党	1912.2	蔡之韶、谢树华等发起，孙中山为名誉主裁，李怀霜为副主裁	本部后迁北京，上海设有机关部
上海公民会	1912.1.14		事务所设大马路保安堂
民　社	1912.1	黎元洪、蓝天蔚等为发起人	事务所设江西路A字五十号。1912.5.与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共和党
民国公会	1912.1		本部设泗泾路江西路6号
大同公济总会	1912.3	张震亚、章水天等发起	总会所设成都路562号
共和建设讨论会	1912.4.13	汤化龙为主任	
中华进步党	1912	正主裁谭人凤，副主裁李经羲，名誉主裁苏本炎	事务所设北四川路洪吉里
工商勇进党	1912.2		事务所设三马路鼎丰里对面
国民党	1912.春	发起人为潘昌煦、朱寿朋等	事务所初设西门外林荫路，1912年5月与统一党、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此国民党不是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
东　社	1912.3	发起人黄仲、郑仲诚等	事务所设广西路414号
国民竞进党	1912.4	发起人徐蕴玉、汪子静等	机关部设东乔家浜46号，初名国民自竞党，成立不及一月，宣告解散
少年中国党	1912.4		事务所设四马路商务印书馆隔壁楼上
政见商榷会	1912.5	主任黄兴、程德全	事务所设江西路18号

（续表）

名　称	创建时间	发起人或领袖	备　　注
共和党	1912.5.9	理事长黎元洪，理事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	临时事务所设三马路小花园2号。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国民共进会联合而成
闽民公会上海支部	1912.6.9	会长姚志梁，副会长江确生、李伯埙	
东亚大同社上海支部	1912.6	支部长蓝麟	1912.8改名大公社，黄兴为总社长
共和统一党上海支部	1912.7	廖宇春、张孝急等发起	事务所设西武昌路和乐里
中华国民共进会	1912.7	发起人陈其美、应夔丞	总部设法租界维尔蒙路97号
中国社会党	1911.11.5	发起人江亢虎	事务所设大马路虹庙对面楼上
中华民国工党	1912.1	正长朱志尧，副长徐企文、钟衡臧	事务所设在小西门
女子参政同盟会	1912.4.8	中国社会党本部女党员发起	由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会联合而成
女子同盟会	1912.2	会长吴木兰	会所在西门内曹家桥
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	1912·1	发起人汤汉民、朱广明	
神州女界共和协进社	1912·3·16	张昭汉、伍廷芳夫人发起	事务所设北四川路9号

第十六章　多事的民国初年

一、为维护共和而斗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推翻了，盼望已久的民国成立了，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

然而，这一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帝国主义干涉下，在袁世凯拥护共和的许诺下，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个口口声声"拥护共和"、以国民公仆自诩的袁世凯，执政以后，就接二连三地颁行《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法》、《戒严法》、《乱党自首条例》等一系列反动法规，杀戮异己，查禁民党，废除孙中山在任时制定的《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把《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的言论、集会、出版等基本自由和选举参政的民主权利剥夺殆尽，最后彻底打落"中华民国"招牌，复辟帝制，把中国重新拉回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一切衷心企求民主共和人们的强烈反对。维护共和、反对专制的斗争此伏彼起。在这场斗争中，上海是重要的战场，上海资产阶级革命党、上海人民走在了前列。

对于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上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早有警惕的。1911年12月6日，民国还未成立，南北议和尚未进行，上海

《民立报》就发表社论，认为袁世凯如果能将南方革命军镇压下去，则必“一跃而居九五之尊”；如果南方势盛，无法镇压，则必附和独立，“冀夺总统而为之”。相当深刻地分析了袁世凯必欲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趋势。南北议和举行前夕，上海革命党人以军政府名义致电各省都督、各军政分府，表示“和议难信，人心惶惶，万勿为袁所愚，而误大局。乞速北伐。君主立宪，国民誓不承认”。① 12月18日以后，南北议和在上海进行，南方首席代表是沪军都督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谈判期间，陈其美等人也倾注了不少的精力，时刻注视着谈判的进展。袁世凯获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又为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反对袁世凯复辟专制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宋教仁。

宋教仁自1911年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活动。他认为上海既“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②，正是进行政治活动的好场所。围绕着维护共和的问题，宋教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限制袁世凯而主张责任内阁制。还在1911年12月26日，在哈同花园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与会者共商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组织方案，孙中山、黄兴力主总统制，宋教仁便坚决主张责任内阁制。他作此主张，主要因为，当时已经商定，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就要让给袁世凯。1912年3月，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更主张内阁制。他的表面理由是：“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③。实际原因则是，袁世凯为总统已无法更易，行总统负责制，则权在袁手；行责任内阁制，权在内阁，而内阁通过竞选还有争取的希

① 《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P. 259。

② 《宋教仁集》上，第365页。

③ 《宋教仁集》下，第460页。

望。

第二，组织国民党。要想通过竞选，组织责任内阁，就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912年7月，宋教仁在上海多方活动，不惜降格以求，将同盟会纲领中一些激烈的内容舍去，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8月，国民党成立，宋教仁被选举为理事，并代理理事长。

第三，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鉴于国会将在1913年初举行，届时将正式选举总统，而就当时形势而论，袁世凯将被举为总统无疑，为此，宋教仁提出了"先定宪法，后举总统"的主张。在宋教仁看来，"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①，先定宪法，使宪法充分体现民主共和精神；后举之总统，则唯有遵宪法行事。所谓"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就是要用宪法约束袁世凯。

宋教仁的这些努力，不断取得成效，他于是到处发表演说，进行竞选活动。袁世凯利诱他，赠以绨袍与巨款，他不理；袁世凯威胁他，他不怕。他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的参众两议院的初选揭晓。据全国19省统计，在选出的500名众议员中，隶属国民党籍的有338人，而隶属于支持袁世凯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的仅131人，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13年2月，在第一届国会的复选中，尽管袁世凯耍尽手腕，国民党仍以压倒多数取胜。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总席数45％强，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总共才得223席，仅占总席数的26％弱。宋教仁的成功，构成了对袁世凯权力的直接威胁。袁世凯在威胁、利诱都无效的情况下，对宋教仁举起了屠刀。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与黄兴、廖仲

① 《宋教仁集》下，第460页。

恺、于右任等人话别后，刚要登车北上去同袁世凯作斗争，却被藏在暗处的凶手开枪射击，子弹从后腰打入穿透腹部，经送铁路医院抢救无效，22日清晨去世。

宋案发生，举国震怒。“追究主谋”的呼声从上海传向全国。袁世凯煞有介事地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袁世凯是贼喊捉贼，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要真的查个水落石出。3月22日，陈其美即与黄兴联名致函上海租界巡捕房，指出此案虽不是在租界发生，但难保凶手不是藏匿租界，要求租界当局“严饬得力探捕，加意侦缉”，并允捕获凶手后，赏银1万两。陈其美还利用自己熟悉上海秘密会社的有利条件，暗中派人协助租界捕房进行侦探工作。不久，即捕获行刺凶手武士英及其指使人，——青帮头目，时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的应桂馨，并从应的寓所搜出了应与袁世凯政府往来密电等罪证。宋案真相大白。

二、反袁举义旗

宋教仁被刺案件，暴露了袁世凯的凶残面目，惊醒了那些先前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革命党人。反对专制、维护共和问题，严重地摆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面前。

1912年3月24日，孙中山急忙从日本长崎赶回上海。在东三省任筹边使的章太炎，闻宋教仁噩耗，也弃官南下上海。4月13日，国民党交通部在上海张园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与会者2万人，陈其美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说，居正、徐血儿、吴永珊(玉章)、于右任、沈缦云、伍廷芳、高一谋等相继发表演说，愤怒谴责袁氏暴行，决心继承宋教仁未竟之志。

不过，对于如何解决宋案的问题，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分歧很大。3月27日，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在同孚路21号

黄兴寓所开会讨论，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以除后患，黄、陈不同意，主张靠法律解决。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党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面前，表现为欲反又举棋不定的犹豫态度。

对于袁世凯来说，刺杀宋教仁仅是除去眼前一块绊脚石，他还要扫除一切障碍，开辟通往帝制的道路。1913 年 4 月，袁世凯擅自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企图以 2500 万英镑巨款扩充军备，镇压革命党人。6 月，袁世凯悍然下令罢免属于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准备武力镇压革命党人。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迫举兵反袁。7 月 12 日、15 日，李烈钧、黄兴相继在江西湖口、江苏南京宣告独立，举兵讨袁。16 日，陈其美在上海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南市。18 日正式宣布独立。

上海讨袁军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此前，袁世凯已调遣海军中将郑汝成到上海控制海陆军；派臧致平为团长，率兵乘舰南下上海，进驻江南制造局；原驻沪海军中，亦有一部分被袁世凯收买，倒向袁世凯一边。讨袁军方面，总共有兵力几千人，由沪防各营、敢死队和原守制造局的部分浙军组成，兵力远弱于敌军。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陈其美等人首先把希望寄托在和平接收江南制造局上。7月 17 日，李平书等上海商界上层人物，成立了上海保卫团，以市政厅为事务所，推李平书为团长，莫锡纶为副团长，陆崧候、顾馨一、王引才、贾季英、朱鉴堂、苏筠尚、马骥良、凌季潭、毛子坚为参议，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宗旨。18 日，陈其美、李平书往见江南制造局督理陈洛书，策动北军和平退让制造局，遭到拒绝。19 日，李平书、王一亭再赴制造局，与陈洛书、郑汝成面商，“告以上海刻下秩序不安，若再坚持，设有变端，商民生命财产势必糜烂不堪，务请顾全大局等语”①，还是不得要领。20 日下午，李平

① 《民立报》1913 年 7 月 20 日，《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第 711 页。

书再次进行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他约请郑汝成、臧致平、陈其美及海军司令李鼎新在南市高昌庙自来水厂内会谈。李平书提出制造局中立、局内军火一并封存的方案。这个方案，貌似中立，实际是站在讨袁军一边的。因为当时制造局控制在北军手中，封存军火实质是封存北军军火。当即遭到郑汝成等人的严拒。

就在陈其美等人进行和平解决问题努力时，北军在制造局外黄浦江一带，昼夜开掘防壕，并在制造局局门附近，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了，陈其美毅然下令讨袁军向制造局发起进攻。

7月23日凌晨2时55分开始，从斜桥陆家浜到南会馆、黄浦滩边，讨袁军61团陈其蔚、37团梁敦焯及福字营刘福彪，率领部队分路全线出击，激战一小时之久攻进了制造局第一重大门。北洋军大炮、机枪向正在进攻第二重大门的讨袁军轰击。泊于吴淞口外的海筹、海琛等3艘巡洋舰，也以密集炮火轰击讨袁军。讨袁军冒着炮火依然"奋勇万倍"。打到早上8时多，讨袁军死伤百余人，暂时休战。23日晚10时、24日晨2时45分讨袁军又向制造局东、西两侧发动猛攻，东栅门一度被攻陷，但是又一次遭到北洋海军巨炮猛轰，被迫撤出，死400余人，伤200余人。24日陈其美获悉郑汝成密令若讨袁军再度进攻则以巨炮轰击南市讨袁军司令部，鉴于当地居民密集，为免祸及居民，于当天上午将司令部迁到闸北沪宁车站以北的南海会馆。24日晚9时许，钮永建率松军沿铁路向制造局佯攻，诱袁军出局追赶，另一路军即向制造局西栅门发动猛攻，直打到25日晨6时，持续轮番冲击7个小时，消灭袁军600余人。但是由于守局袁军得到海军巨炮支持，一直未能攻破。25日到28日钮永建率军每晚轮番向制造局发动进攻。郑汝成为了保全制造局，一方面调动兵力向吴淞炮台发动进攻，同时丧心病狂地下令海军，以巨炮向南市、闸北滥施轰击，造成大批居民死伤。

公共租界帝国主义当局以“中立”为名，派巡捕和万国商团进驻闸北。陈其美被迫将司令部移至吴淞。

7月26日，郑汝成下令海圻、海琛二巡洋舰及联琼号炮舰向吴淞炮台发动猛攻，这时原台长姜国梁已受郑汝成重金收买弃台而去，陈其美任命居正任吴淞要塞司令，白逾恒任要塞总监。居正接任后，亲临炮台指挥战斗，经过激烈炮战，联琼号舰首击穿，烟囱轰毁，扯白旗投降，海圻、海琛两舰丧胆逃遁浏河口，向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告急求援。

7月28日，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率肇和、镜清等舰，载海军陆战队5000余人抵沪，从川沙九洞一带登陆，迂回江湾，从侧面配合陆路进攻吴淞。从7月28日到8月12日，除了北洋海军舰队轮番从海上以巨炮正面轰击炮台，陆路又有北洋军包围进攻。其间，首鼠两端的程德全还以重金策动刘福彪于8月7日反叛，为居正、钮永建率军痛歼。8月2日居正等发表通电，表示“以百死之身，率诸健儿守此要塞，身可毁而志不可夺，家可破而气不可馁。”十余天之间，血战数十场，讨袁军大半壮烈牺牲。最终因寡不敌众，接受红十字会柯司医生调停，于13日凌晨率余部撤往嘉定。上海二次革命至此失败。

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更加有恃无恐。1913年10月，他强迫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11月，他下令解散国民党。以后，他更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1915年5月，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8月，授意成立为帝制造舆论的“筹安会”。12月31日，下令复辟帝制。对于上海，他也加强了统治。他于1913年7月28日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击败上海讨袁军以后，便取消了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上海市政厅。派员接管了闸北和南市，改称闸北工巡捐局和上海工巡捐局，又借故罢免了上海县署民政总长吴馨。北洋政府还下令禁止销售在上海出版的《民权》、《民立》、《民强》等进步报纸，加强了对上海的专制

统治。

但是，上海人民、上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以各种方式进行反袁斗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先匿居租界，旋避地日本，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正当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活动的时候，他又回到上海，策划讨袁事宜。要讨袁，必先除去袁在上海最主要的爪牙郑汝成。陈其美决定刺杀郑汝成。11月 8 日，他获悉两天后即 11 月 10 日为日本天皇登极之日，驻沪日本总领事馆届时将开会庆祝，作为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将去祝贺。他于是与革命党人杨虎、孙祥夫等密商了刺郑计划，由王晓峰、王明山具体执行。11月 10 日上午 11 时，郑汝成乘车经过外白渡桥时，王晓峰首掷炸弹，毁郑车后轮。王明山开枪击郑，郑下车逃走。王晓峰冲上前去，掣其衣肘，连击数枪，郑汝成立即倒地毙命。二王旋被租界巡捕逮捕。审讯时，二人慷慨陈词："郑汝成辅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知吾人讨贼之义"①。不久，二王被解到上海镇守使署，遂遭杀害。

刺杀郑汝成成功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士气大振，决定乘势策动反袁武装起义，经过一番努力，他们联络了驻沪海军肇和舰上的一些将士，决定于12月 5 日下午四时发动起义，并布置了在江南制造局、上海县城内、闸北等方面的响应工作。是日下午，起义按时发动，革命党人很快夺取了肇和舰，但因找不到炮弹库房钥匙，未能及时发炮轰击江南制造局，而炮声就是响应的联络信号，发炮不及时，其余各路响应计划均受挫。12 日清晨，起义被北洋军镇压下去。

在此期间，上海还发生了爆炸《亚细亚日报》的事件。《亚细亚日报》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由帝制分子薛大可主办，总部设在北京，1915 年 9 月出上海版。是月 11 日，《亚细亚日报》上海版刚一创刊，就收到署名"君主之敌"和"中国公民一分子"的警告信，声明

"如再鼓吹君主问题，必以激烈手段对付"。接着，就于1915年9月12日、12月17日两次被炸，第一次炸死了一名门警，第二次，炸弹从二楼窗口掷入，主任刘笠佛差一点被炸死。最后被迫停刊。

袁世凯统治期间，上海人民还举行了罢工、抵制日货等不同形式的斗争。1912年12月，上海银楼工人3000人罢工。1913年5月1日，上海各界在南市九亩地集会，宣告袁世凯三大罪状：暗杀国民党领袖、破坏共和、擅借外款，决定成立全国公民会，并要求国会弹劾袁世凯，呼吁各省拒绝奉行袁世凯政府的军事命令。5月26日，上海工党领袖徐企文率七、八十人以"中华民国国民军"为旗帜，发动起义，进攻江南制造局，战败牺牲。1914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太古、怡和三大轮船公司船员因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1914年11月，上海锯泥水木等业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在二马路三鑫楼及鲁班殿会议，决定举行同盟罢工，"并刊送传单，号召企业，愈集愈众，有数万人之多"①。12月，上海人力车夫反对增收车租举行同盟罢工。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为条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欲置中国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并且立即与袁世凯政府进行秘密谈判。消息披露，整个中国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2月，轰轰烈烈的反对"二十一条"斗争，首先在上海爆发。上海各界人士纷纷起来，组织"国民爱国社"、"对日同志会"、"同志救亡会"等群众团体，发表宣言，散发传单，救国呼声腾地而起②。3月18日，上海各阶层人民在张园召开"国民大会"，数万市民同仇敌忾，汇成了愤怒的海洋，"拒绝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口号响彻云霄。"国民大会"决议全市各行业一致行动，抵制日货③。5月7日，日本公使不顾中国人民的

---

①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一〇〇一)第2804号，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见彭明《五四运动史》第63页。

② 见《申报》1915年2月初连续报导。

③ 《时报》1915年3月18、19、20，报导。

义愤，公然发出最后通牒，限令袁世凯政府于48小时内签约，接着袁世凯无耻地于9日接受了日本的蛮横条件。上海人民反袁抗日的怒潮进一步高涨，痛心地把这两天定为"国耻日"，上海的大阪公司、三井煤栈等日资企业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议决抵制等事"并且"编发传单，不准与日商工作。"① 上海工商界组织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劝用国货会"。著名报人戈公振、黄礎生、周瘦鹃等人创办《国货月报》，成为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主要阵地。② 他们以"挽回外溢的利权，发达工商事业"、"求富强"救国家为号召，派出国货调查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调查民族工业生产、销售情况，在《国货月报》上为之宣传。上海人民的爱国抵制日货运动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上海市场上"所有经售日货之各店铺，皆已除去商标，不为销售"、"向用日本器具之店号、茶馆，均改接中国货"③，日本正金、住友等银行的汇兑、存放业务受到打击，发行的纸币遭到了拒绝使用，最显著的是虹口一带日商所开的商店、番菜馆几乎"无人过问"了④。1915年8月，袁世凯总统府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什么中国民智卑下，难以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紧接着，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洋洋万言，以一问一答的论辩形式，说明中国只有去共和、行君宪，才能臻于富强。这两篇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本影响最大的文章发表后，舆论哗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相继发表宣言、演说，予以批驳，但他们当时身处国外，对国内影响不是很大。在此情况下，梁启超毅然在上海出版的《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文中，梁启超深刻地指出，在辛亥以后的中国，君主专制是万难恢复的，因为"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

① 《时报》1915年4月10日。
② 《国货月报》1915年8月创刊号。
③④ 《时报》1915年3月25日。

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这好比庙里的木偶泥菩萨，原来大家都很虔诚地相信它、供养它，后来一旦被人亵渎，投诸溷腧，再把它取回来重入殿龛，那么就谁也不崇奉它了。在辛亥以前，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其尊严已渐渐失去，辛亥以后，君主声名更臭不可闻，现在要想恢复君主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在民国制度下，杨度等人竟妄议改行君主制，实属破坏国法，应当严惩。梁启超文章发表以前，袁世凯已有风闻，他派人送梁20万元嘱勿发表遭到拒绝。袁又派人前去威胁：“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无所畏惧地回答：“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①。梁启超的文章道出了很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发表后，传诵一时，影响很大。

三、文化界新气象

民国建立以后，上海的教育、出版、文化界出现了一派颇为繁荣的气象。

教育方面，上海除按教育部的规定，各学堂全部改称学校，又新创了不少学校。1912年创立的就有：上海女子法政学校，由闵兰言、柴育霖、李华书等发起，1912年2月开学，设正科与备科两科，招收16至30岁学生80名。女子看护学校，由张竹君发起，1912年3月1日举行招生考试，招收16至25岁学生60人，学制3年。大同学院，1912年3月19日由立达学社在南市创办②，首任

① 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② 辛亥革命后，在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执教的留学生和知名人士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等11人，因不满原清华学堂外国教会的办学方式，辞职赴沪，组织立达学社，旨在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以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故名立达。见沈德滋等：《上海大同大学简史》，《上海文史资料》1980年第二辑。

校长胡敦复，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1922年更名大同大学），它是上海创办最早的私立大学。民国法律学校，1912年4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女子工业大学校，由陈澄溪等创办，1912年7月1日开学，分高等、速成两科，招收学生300名。上海图画美术院，由乌始光、刘海粟、丁悚、汪亚尘等1912年11月创办（1920年改名上海美术学校，翌年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私立学校还有务商中学、共和女学、紫金两等小学等，由市政厅（城自治公所改）开办的小学有11所。据统计，从1912年到1915年，上海共添设小学40余所，中学、专科学校7所，大学1所。在新创的学校中，女子学校与政法学校占了相当的比例，这表明，随着民国的建立，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对文化的需求较前迫切，同时表明人们对于废除专制建立法治也有很大的热情。1914年，地方自治奉令停止，教育行政归县公署附设的学务办公处管理，学校日益减少。到1917年，整个上海除高等学校外，有各种学校186所。

民国初年，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上海学校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小学一律废止读经一科；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清朝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各种教科书中有悖共和精神的内容，一律予以修改。此外，通俗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12年5月，章太炎与于右任、王正廷、田桐、张謇、张继等发起通俗教育研究会，认为革命成功以后，应当注力于通俗教育，以期培养人民之建设能力。其宗旨是：“以研究通俗教育设施方法，为普通人民灌输常识，培养公德，并发启有关社会教育之各事物”，教育方针是“注重卫生、谋生、公众道德、国家观念四主义”。该会以上海事务所为通信机关，在北京设通信处，在全国各地分设通俗教育会。

在新时期的学校里，读新式书，呼吸的是较为自由民主的空气，学生们的思想也活跃多了。一位当年在南洋公学中院（相当于中学）就读的学生后来回忆说，民国初年，“自由民主之风甚盛，这就是初出鸟笼的学生在学业和生活方面踏进了无管无束、放任自

流的境界”，不但可以自由回家，而且“有许多外地学生晚间时常溜出去看戏，看电影，甚至周六晚上也有开旅馆赌博的”，学生们阅读的书也较前大为广泛，“小学里看不到的《红楼梦》《西厢记》等小说，现在都可以随便阅读”①。当然，这种情况也反映青年学生对民主与无政府的界限不清楚，对自由与纪律的关系不了然，这是专制已垮、民主尚未真正确立时的过渡现象。

出版方面，民国初年上海新成立了一批出版机构，出版了一大批书籍、杂志。

出版机构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等。中华书局创建于 1912 年。民国成立以前，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部主任陆费伯鸿等预料清朝的末日即将来临，新的时代就要开始，遂密谋编撰一套适应新时代的教科书。武昌起义爆发时，书已基本印成。陆费伯鸿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与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集资 25000 元，自创中华书局，于民国元年元旦正式开业，发行所设于福州路，陆费伯鸿任总经理，戴克敦为编辑长。中华书局出版宗旨为：“(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它出版的《中华新教科书》，在民国初年大受欢迎。此后，中华书局陆续创办《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等杂志，在当时影响较大。

亚东图书馆创办于 1913 年，由安徽绩溪人汪孟邹、汪原放等人经营，馆址初设福州路惠福里。汪孟邹与章士钊、陈独秀等人有旧，受到章、陈的支持，起初出版各种地图，颇得章、陈等人好评，日后，以出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每周评论》、《少年中国》、《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等书刊闻名于世，并且出版

① 周浩泉：《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一九七九年第六辑。

了新式标点分段的白话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受到当时知识界的称许。

此外，原来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亦有新的起色。商务印书馆原以出版新式教科书闻名，没料到中华书局异军突起，出了《中华新教科书》，使得商务的《最新国文教科书》遭到冷落，商务于是改出《共和国教科书》与中华争雄，稳住了阵脚。此后，商务规模逐步扩大，到 1914 年资本达 200 万元。

民国初年出版界的新气象最突出的表现是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竞相怒发。除先前已出版的《民立报》等报纸外，又有很多报刊问世。报纸方面，属于国民党、自由党方面的有：《太平洋报》，创刊于 1912 年 4 月 1 日，社长姚雨平，经理朱少屏，总编辑叶楚伧，参加笔政的尚有柳亚子、苏曼殊、李叔同等；《中华民报》，创刊于 1912 年 7 月 20 日，邓家彦创办；《民国新闻》，创刊于 1912 年 7 月 25 日，吕志伊、姚勇忱等发起，邵元冲为总编辑；《民权报》，1913 年 3 月 1 日创刊，戴季陶、何海鸣等主编。《民国西报》，创刊于 1912 年夏，为西文报纸，主要用英文，1913 年起兼用法文，是同盟会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是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创办的。其中，《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以言论激烈著称于世。属于共和党、进步党的有：《大共和日报》，1912 年 1 月 4 日创办，社长章太炎；《民声日报》，1912 年 2 月创办，章太炎弟子黄侃主编；《东大陆报》，创刊于 1912 年 7 月 10 日，康宝忠任总编辑。属于其他政党的有《国权报》，为国家学会报纸，1912 年 5 月 15 日创刊；《共和报》，中国共和研究会创办；《民报》，国民协会创办；《共和宪政杂志》，中华共和宪政会创办；《中华民生报》，中华平民党创办；《大同民报》，大同民党创办；《工商日报》，工商勇进党创办；《齐民日报》，东社创办；《女子共和日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创办；《觉民报》，中华民国工党创办；《国民临时报》、《社会日报》、《人道周报》、《社会党月刊》，均为中国社会党创办。此外还有一些。这些报刊分属

不同党派、团体，观点各异，甚至互相攻讦，但是它们在民国初年一下子涌现出来，给舆论界带来蓬勃生机。这些报刊不但可以互相批评，而且敢于点名道姓地批评当局。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章太炎主持的《大共和日报》就不止一次地批评他；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开头几个月，不少报纸也敢于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这表明，民国初年舆论界的空气确实比较自由。

上海文艺界也有一些起色。新剧在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上都有一些进步。新剧，即早期话剧，又称文明戏，是辛亥革命前几年由李叔同、陆镜若等从日本移植进来的。这种剧表演内容多取于政治小说、社会新闻等，与现实联系较为密切，演出用对话体自由发挥，时称幕表制，配以现代舞台装置，形式活泼，因此颇受社会欢迎。新剧1907年始兴于上海，有王钟声创办的春阳社、任天知创办的进化团、徐半梅创办的社会教育团，还有一社、天义社、仁社、慈善会、启知社、亦社、广济社等（1905年1月，一社、天义社、仁社、慈善会合组为上海演剧联合会）。有些剧团不但在上海演出，还到苏州、镇江、南京、武昌等处演出，所演剧目有《迦茵小传》、《黑奴吁天录》、《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史可法》等，宣传民主革命、种族革命，为反清革命推波助澜，很受人们欢迎。民国初年，新剧有了新发展。从1912年1月起，上海又有爱群社、新剧同志会、开明社、自由剧团、醒社、飞鸣社、新剧俱进会、新民社、民鸣社、启民社、移风社等新剧团体相继成立，真是云蒸霞蔚，一派繁盛气象。诚如一位当事人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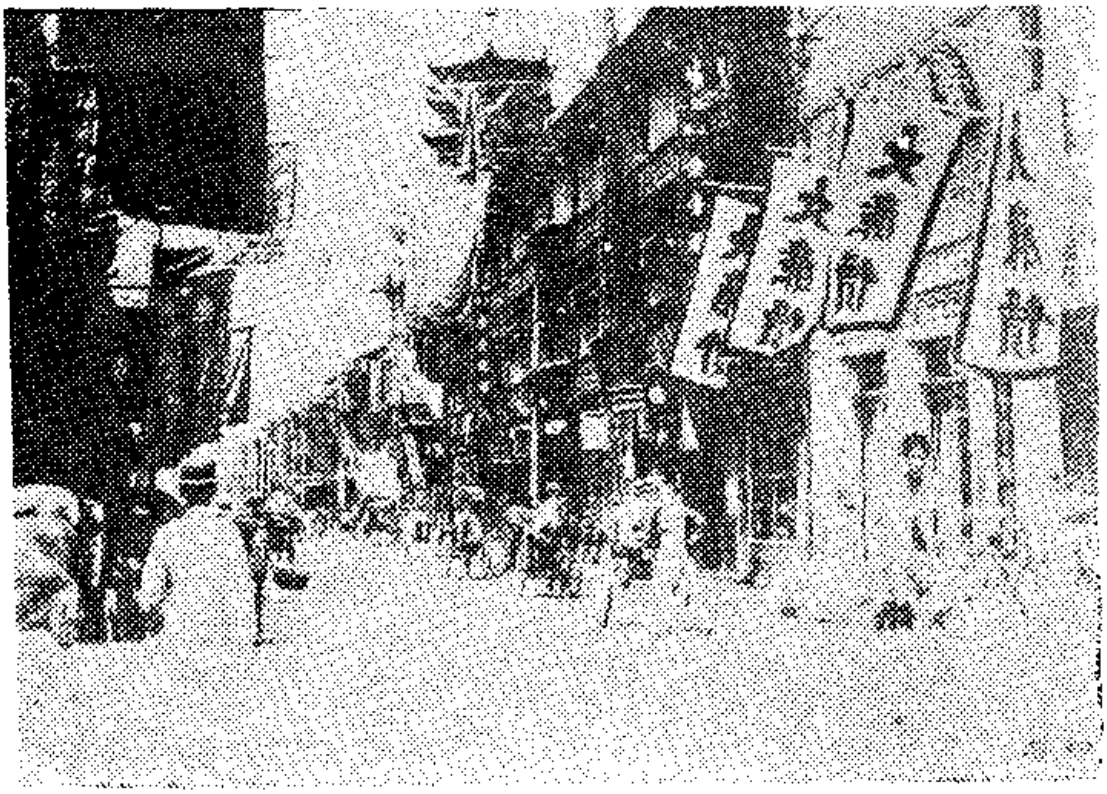
> 就此你也办剧团，他也组剧社；投资的人也有了，演戏的人也有了。不到半年工夫（指1914年——引者），上海一共出现了五、六处长期开演新剧的戏院，真是盛极一时。①

这一时期的新剧内容，除了继承辛亥以前的传统，有一些拥护

① 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

共和、赞成革命的剧目，还开始出现了“家庭戏”即伦理剧，开阔了新剧的题材范围。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格调低下、专门迎合小市民心理的剧目，诸如《西太后》、《三笑》等。在演员方面，这时不但出现了女子新剧团，而且开始了男女同台合演的历史。这一先例，是张梯云组织的民兴社开创的，民兴社设在法租界的三洋泾桥歌舞台原址，由于法租界没有禁止男女合演的规定，张梯云于是学外国人的样，来个男女合演。这在当时新剧界，是个冲破世俗偏见的大胆举动，影响很大，据说“一时相当吃香”①。为了使新剧健康发展，新剧同行们在1914年3月5日成立了新剧公会，有300多人到会。他们还创办了专门研究新剧艺术的刊物《新剧杂志》，并组织新剧团进行汇演，积极开展剧评工作。

中国民族电影事业也从此时在上海开始。中国第一次放映电



民国初年福州路街景

① 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页。

影，是1896年8月11日，地点在上海徐园，当时称为“西洋影戏”。以后徐园经常放映电影，所映多为法国电影，美国电影商亦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在海宁路乍浦路口搭建了一座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正式兴建的第一座电影院。中国人在上海第一次自己拍摄电影始于1913年。1909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在上海投资建立亚细亚影戏公司，并开始摄制电影。由于营业不善，他在1912年把公司转让给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另一个美国人萨弗。翌年，亚细亚影戏公司聘请美化洋行广告部买办张石川为顾问。张石川本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据他自己说，“差不多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张”，要他做顾问，他想到了比较熟悉的新剧。他与新剧界的朋友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人商量一番，组织了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雇佣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亚细亚影戏公司负责供给资金和发行影片。同年，郑正秋编写了《难夫难妻》电影剧本，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这是中国人在上海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中国拍摄故事片的开端。《难夫难妻》以郑正秋的家乡广东潮州的买卖婚姻为题材，描写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由媒人撮合，经过种种繁文缛节，最后洞房成亲。影片以讽刺的笔触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难夫难妻》是在香港路亚细亚影戏公司的露天摄影场内拍摄的，全片共长4本。与此同时，亚细亚影戏公司还拍了反映革命党活动的《上海战争》。“二次革命”中，上海革命党人发动了攻击江南制造局和吴淞炮台的军事行动，当时京剧界、新剧界不少倾向革命的戏剧工作者如夏月润、夏月珊等均积极参加了这一行动，亚细亚影戏公司特地拍摄了新闻短片《上海战争》，纪录了革命军攻打制造局和吴淞炮台的情况。1913年9月29日，《难夫难妻》与《上海战争》同时在新新舞台放映，轰动一时，既宣传了反

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民主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斗争。以后，张石川又相继拍摄了一批短片，诸如《活无常》、《风流和尚》、《二百五白相城隍庙》等，不少系滑稽打闹的娱乐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细亚影戏公司倒闭，张石川与新剧家管海峰合作，在徐家汇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并于1916年拍成影片《黑籍冤魂》。此片描写一个姓曾的封建大家庭因吸食鸦片，父亲气恼而死，妻子投河自尽，不懂事的儿子中毒身亡(误将鸦片当糖吃)，女儿沦为娼妓，自己流浪街头，一个富庶之家弄得家破人亡。影片生动地揭示了鸦片带来的社会危害，实质上是对帝国主义输入鸦片所致罪行的控诉。张石川担任此片导演并饰主要角色。这部影片制成后先后在上海及各有电影院的城镇放映，影响颇大，甚至在7年以后，即1923年宣布鸦片公卖时，上海新爱伦影院又将此片重映，观众争看，连日不衰。

这一时期，上海体育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气象。中国旧时传统，文武分途，体育竞技之类属于武人的事，文人不必习他，一般民众更无兴趣。近代意义上的群众性体育运动是由外侨带入上海的。19世纪50—60年代，外侨已在上海开始了赛马、划艇、板球等体育活动，并开辟了公共运动场。1889年，圣约翰书院在学校礼拜堂前旷场上举行体育运动会，是为近代上海第一次体育运动会。起初中国学生受传统观念影响，视这种跑跑跳跳的运动为耻辱，规避参加。但从这年起，圣约翰书院每年都要举行两次运动会，久而久之，学生也就习惯了。圣约翰书院以后成为上海高校中的体育先进单位。1892年，跑马厅内建了一个游泳池，为游泳总会所有，享用者仅限于此会的股东。是为上海第一座游泳池。1894年，圣约翰书院开展兵式操活动。190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老靶子路建了一个操场，此后每年举行体育比赛。1908年，上海青年会开设体育训练班。1909年，建成上海青年会健身房(在四川路)。行

落成典礼时，体育班表演各种体育活动，观者数百人。同年，上海青年会在施高塔路建一运动场，并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运动会，有15个比赛项目。

这些都是外侨和教会组织发起的体育运动，在此影响下，中国人自己也进行了一些体育活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上海梅溪书院在张焕纶主持下进行军事训练，虽说是为了抵抗外国侵略，也可算是一项体育活动。1904年，南洋公学与东吴、中西、圣约翰等书院发起组织"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每年按季举行足球、网球、田径等项比赛。1905到1906年，虞洽卿、沈缦云等倡设上海华商体操会、上海南市商业体操会、上海体操会等，以练习体操、健身卫生、尚武强种为目的。1908年，浙江商人叶贻铨集股在江湾创办万国体育场，占地千余亩，中有三道跑马圈，外圈铺成草地，主要供华人赛马用。1914年，南洋、圣约翰等大学与江浙其他大学联合成立"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参加的学校有南洋、圣约翰、沪江、东吴、之江、金陵共六所大学，以后每年举行比赛，其中1914至1917年的四届足球锦标全被南洋大学获得，1914至1916年的三届田径锦标尽为圣约翰大学所夺。这些大学生的体育比赛，在当时"十分引起学校与社会的注视"①，1915年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更使上海掀起了一阵体育热。

远东运动会创议于1911年，由菲律宾体育协会发起，邀请中国、日本等国参加，每隔一年在东亚大城市举行一次。首届远东运动会于1913年在菲律宾举行，中国代表由青年会率队参加，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体育运动会。1915年5月15日至22日，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获得足球、排球、游泳、田径四项锦标。这是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体育运动会，也是中国在国际体育运动中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这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民以莫大鼓舞，官府也由此开始重视体育运动。1915年8月，江

①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528页。

苏巡按使委托设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开办体育传习所，令江苏省所属60个县每县选派2人来所受训，毕业后回各县公共体育场任场长及指导员（教练）。传习所在同年11月下旬开课，1916年首期学员140人中有130人获得毕业证书。江苏省公署还于1915年10月下令各县筹办公共体育场，上海当即筹办，于1917年落成，地址在斜桥北堍，占地26亩，建有办公楼2座，健身房1座，300公尺跑道1条，足球场1个，网球场2个，室内篮、排球场各一。上海有群众公用之体育场自此始。

民国初年，上海文坛上兴起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流派，这就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的得名，一般认为是因为这一派作家所写作品，多为爱情题材，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故名。有人从他们惯用的"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两句套语概括出"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这派作家，很多人笔名中有鸳、蝶、雏、鸳、鹤等字，"总爱在禽鸟昆虫中打滚"，这也是此派得名的一个原因。在"五四"以前，这一派作家不少人认为"鸳鸯蝴蝶派"是美名，乐于承认，及至30年代，鸳鸯蝴蝶派遭到郑振铎、鲁迅等人的批判，这一派作家则更多地自认是"民国旧派小说"。这一流派的代表性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也有人称此派为"礼拜六派"，他们自己也乐于承认，大概因为这是一个中性称呼，无所谓褒贬。但治文学史的人们，一般均称此派为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酝酿于清末，盛行于"五四"前后。1908年吴趼人所写小说《恨海》为其滥觞。1909年的《小说时报》、1910年《小说月报》相继问世，刊载此类小说日多。到1914年，以《礼拜六》为骨干，以《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眉语》、《好白相》、《繁华杂志》、《香艳杂志》、《上海滩》、《销魂语》等杂志为重要阵地，鸳鸯蝴蝶派以很强的势头繁盛起来，五四前后为极盛时期，到30年代，仍有不

少市场，余波未息。据统计，先后在上海出版的鸳鸯蝴蝶派杂志、报纸共180种，单1914年创刊的载有此类小说的杂志便有21种。一时，蝴蝶满天飞，鸳鸯遍地游。究竟先后一共发表了多少此类小说，已无法确切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刊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目录》，便有65页之多。这可能还不是全部。

鸳鸯蝴蝶派并没有严密的团体组织，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徐枕亚、王钝根、朱鸳雏、严独鹤、范烟桥、陈小蝶、徐卓呆、程小青、秦瘦鸥、周瘦鹃、陈蝶仙、包天笑、冯玉奇等，其作品内容因时因人有很大差异，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也并不都是鸳鸯蝴蝶。徐枕亚的《玉梨魂》是公认的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玉梨魂》全书三十章，1912年发表，写一个名叫何梦霞的青年才子与一个美貌的寡妇白梨影一见钟情，经常有诗词酬答，书信往还，但在礼教束缚下，寡妇不能再嫁，白梨影虽深爱何梦霞但不能成为眷属，于是便介绍自己的小姑筠倩与何订婚。然而何仍爱着小寡妇。白梨影与筠倩均因婚姻不自由而抑郁致死，何梦霞后东渡日本，辛亥革命时回国，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阵亡。《玉梨魂》发表后，风行一时，曾再版数十次，行销几十万册，并被编成新剧演出。其他很多此类小说，格调上与此相近，最后结局，或殉情，或团圆。不少作品以四六骈体文形式出现，情节雷同。后期鸳鸯蝴蝶派作品除了哀情以外，还有不少是以武侠、侦探、暴露黑幕为题材的。李涵秋的《广陵潮》对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心态描述，就颇有社会史料价值；路滨生编的《中国黑幕大观》，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的政界黑幕便有所揭露。很多作品虽然从字面上看去，有不少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但通观全篇，仍能激发起人们对封建礼教的不满。

鸳鸯蝴蝶派在民国以后的上海兴起，决非偶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民国建立以后，人们并没有一种解放感、幸福感，而是极度失望、苦闷，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只得到哀情艳史中寻找慰

藉。鸳鸯蝴蝶派后期作品，以宣传除暴安良的武侠、暴露社会黑幕为重要内容，也是人们对黑暗政治绝望的一种曲折反映。

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

民国初年的上海，和全国一样，在民主、共和思想应时而兴之时，同时存在着一股与时代思潮相悖的思想，这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封建精神支柱孔孟之道的颂扬，二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诽谤。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孔孟之道的颂扬随着孔教会的建立推向高潮。民国成立后，鉴于祀孔的废止和各地反孔的举动，如将孔庙改为学校等，一批封建遗老忧心如焚，亟谋抗拒。1912 年 10 月 7 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据称这一天是孔子诞辰），由沈曾植、陈焕章等发起，孔教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上海绅士姚文栋在组织工作方面出力甚多。成立大会在山东会馆召开，与会者 60 人左右，均排班行三跪九叩之礼。事务所设海宁路西 1798 号，总部设在上海（后迁北京），在全国各地设有若干分会。上海地区除上海支会外，还有松江、青浦、嘉定、宝山、南汇、奉贤等支会。上海支会设于文庙，发起人有李鸿进、曹骧、姚文栋、蔡尔康、陆文麓、莫锡纶等 51 人。孔教会的活动之一是不断呼吁定孔教为国教。当这一要求被国家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以后，他们群起攻击，执意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1913 年 10月，陈兆焘等 52 人自称代表上海商人，致书总商会，抗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定孔教为国教提案的否决。书中认为，“孔教之旨，以孝教民，以仁弭乱，集群圣之大成，开万世之统绪，固吾国教育大家也”，将孔教视为安邦定国、消灾弭乱的不二法门，“国教定而邦基乃固，圣道昌而祸乱不作”①。上海人姚明辉并作题为《废孔教育之大

① 《上海商人致总商会请定孔教为国教意见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九号。

危》的长篇文章，认为孔教是中国不可须臾或缺的宝贝。孔教会的另一项活动是发起各种各样的祭孔活动。1913年2月，在文庙举行丁祭，上海有11个团体，共计2000余人参加，一时搞得复古气味十分浓厚。孔教会于1913年2月发刊《孔教会杂志》作为机关刊物。这一杂志出至1915年10月，共出版13期。

康有为是民初反对民主、鼓吹尊孔的重要思想代表。他在民国建立前夕，便发表了《共和政体论》、《救亡论》等一批文章，认为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民国建立伊始，他率先发表《中华救国论》等，继续宣传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的老调。《孔教会杂志》创办后，康有为亲为作序，并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大量发表鼓吹封建专制主义的文章。1913年11月，康有为任孔教会总会长，并于这年底移居上海。

在《不忍》杂志及其他杂志的文章中，康有为把辛亥革命以后一切错误和过失都算在民主、共和头上，对共和、博爱、自由、平等之类的资产阶级民主口号一一骂遍。他写道："夫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共和而必至分争分裂；号为博爱，而惨杀日加酷烈；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①。应当说，康有为所说的民国成立以后，中国仍有争乱、惨杀、困苦等丑恶现象，这是事实，但这不是民主共和带来的，而恰恰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辛亥革命后，广东、江苏、湖南等不少地方的学校废除尊孔读经，把孔庙改建为学校或习艺所，停止了祀孔典礼，这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冲击封建传统思想的好现象，康有为却认为这是"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陵夷，法守隳斁，礼俗变易"②。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③康有为对民国这也看不惯，那

① 康有为：《蓄乱》，《不忍》第四册。
② 康有为：《中国学报题辞》，《不忍》第二册。
③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不忍》第三册。

也看不惯，又重弹起民主共和不能行于中国的老调。他说，中国土广民众，不行专制不能为治。以中国之程度，行君主立宪制尚不可，更不用说实行民主共和了。他甚至追悔自己戊戌以来鼓吹君主立宪是犯了不察国情的大错误："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设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逾墙飞瓦也。若未行立宪而超入共和，则是小儿慕飞船之悠扬天空，而遽欲学焉，未有不颠坠而死者矣。"①

孔教会的其他人物，如陈焕章等，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并将俄国人盖沙令的尊孔言论译出，刊于《孔教会杂志》上，抗议、斥骂各地的反孔举动。

民国初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反对自由平等、鼓吹尊孔这一情况的出现，原因固然不是单一的，有的是出于对民初假共和、真专制现状的不满，有的是从保存国粹以与西方文化、宗教抗衡的想法，但主要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泛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辛亥以前，资产阶级对它虽然进行了猛烈冲击，但很不彻底。孔孟之道本是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尊孔复古的逆流恰好迎合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因此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声称孔学是"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次年，他下令全国一律行祀孔典礼。1915年，他通令全国学校恢复被南京临时政府废止的读经课程。鲁迅说过："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之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思想上的尊孔复古与政治上的复辟帝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

① 康有为：《国会叹》，《不忍》第五册。

五、会审公廨被攫夺

上海起义期间，帝国主义乘战乱之际，攫夺了会审公廨，以后又对其进行一系列的变更，使其管辖范围、审理程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会审公廨之设始于1864年，按照有关章程，会审公廨由上海道选派同知主持其事，廨内所设通事、翻译、书差人等，均由委员雇用，同时酌雇一、二外人，办理与中国无约国人犯罪案件，审理牵涉洋人到案的案件，由外国领事或领事派员参加会审。上海起义以后，清朝上海地方政府被推翻，上海道派出的办理会审公廨的官员失去了合法身份，对新生的沪军都督府，帝国主义又拒不承认。在此情况下，帝国主义驻沪领事借口维护租界和平治安，于1911年11月10日发出通告如下：

> 照得租界华商居民人等，为数甚众。查民刑诉讼事件，本为特立之会审公堂办理。兹欲保守租界和平治安，惟有必使会审公堂与押所仍旧接续办理，为急要之举。因此立约各国领事，特行出示晓谕居住租界之华洋商民人等一体知悉。揆情度势，凭其职位权柄，暂行承认已在公廨办事之关炯之、王嘉熙、聂宗羲三员为公廨议员，仍行随同该领事所派之陪审西官和衷办事；并准租界上海西人工部局巡捕收管公廨押所。尚有公廨所出业由该管领事签印之民、刑二事传单牌票，后经该管陪审官照例签印之谕单等件，均应出力照办①。

通告颁发以后，驻沪领事团又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所谓"权宜措施"，包括规定谳员的薪俸由领事团用存于领袖领事手中的中国政府经费支付，扩大会审公廨审案范围，"所有在公共租界内发生的

① 《领事公会示谕》，《民立报》1911年11月12日。

刑事案件，包括应判五年以上徒刑的案件在内，概归会审公廨处理”；扩大外国陪审官陪审范围，对于纯粹华人民事案件，“外国陪审官将予以监视”；剥夺会审公廨华官行政权，所有公廨雇用员役，均归外国人掌握。

这样，会审公廨诚员的任命权被帝国主义掠夺了，公廨诚员名义上还是华人，但实质上已不是中国官员，而是外国领事的雇员。会审公廨从官员的任命权、公廨的管辖权到公廨的行政权，全部落入帝国主义手中。从此，租界内的司法权，完全被帝国主义所侵夺。

对于帝国主义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沪军都督府曾经进行一定的斗争。陈其美在1911年11月19日曾写信给领袖领事，告知他已派姓徐和姓蔡的两人担任交涉使，干预会审公廨事务。徐、蔡二人后来受到租界的阻挠。民政总长李平书、外交总长伍廷芳曾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表示要设法收回被清政府出卖的主权，特别是在上海，“由于外国拥有重要而广泛的利益，我们认为迫切需要订定一些临时的办法，以遏阻外国的侵略与掠夺，并以保证使未来的改革获致结果”①。1911年12月底，伍廷芳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的名义颁行《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表示对于上海租界的行政、警察等权，“应俟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对于会审公廨被掠夺，《规则》特别列了一节，内云：

> 上海会审公堂，前此所派清廷官吏，大半冗阘，是以腐败不堪。上海光复后，该公堂竟成独立，不复受我节制，此种举动，理所必争，尤宜急图挽救。②

但是，由于当时推翻清廷的斗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由于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困难，上海革命政权还无法立即收回被帝国主义

---

① 《摘抄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及外交总长伍廷芳所发致各省都督通电大意》，《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49—1150页。

② 《外交总长颁行〈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申报》1912年1月1日。

侵夺的租界主权，只得“暂时维持旧有的习惯”①。

六、越界筑路与法租界第三次扩张

从19世纪60年代起，外国殖民主义者不断在上海租界以外地区进行筑路活动，史称“越界筑路”。

越界筑路本是非法的。考之1845年的第一次土地章程，本无此项内容。1869年，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会片面地在土地章程修改草案中规定：

> 租界内执业租主、有关议事人在内，会议商定，准其购买租界以外接连之地、相隔之地，或照两下言明，情愿接受西人或中国人之地，以便编成街道及建造公花园，为大众游玩怡性适情之处。所有购买建造与常年修理等费，准由公局（即工部局）在第九款抽收捐项内，随时支付。但此等街道、公园，专为公用与租界以内居住之人同沾利益。合行声明。②

这样，工部局就攫取了越界筑路的权利。1879年再行修改章程时，又进一步规定工部局不仅可以越界筑路，而且工部局巡捕得在这些界外路上维持治安及管理交通。1869年的土地章程并未经中国官府认可，越界筑路的种种条文完全是租界当局自我编造的护符。但是，殖民主义者却以此为依据，大肆进行越界筑路活动。

公共租界自修筑徐家汇路、静安寺路、极司非而路等路以后，1869年筑卡德路（今石门一路），1870年筑杨树浦路。修筑这些道路的经费，当初并非全由工部局支付，而是由中外捐款，中外人士

---

① 《摘抄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及外交总长伍廷芳所发致各省都督通电大意》，《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149—1150页。

② 朱梦华：《上海租界的形成及其扩充》，《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二册，第49—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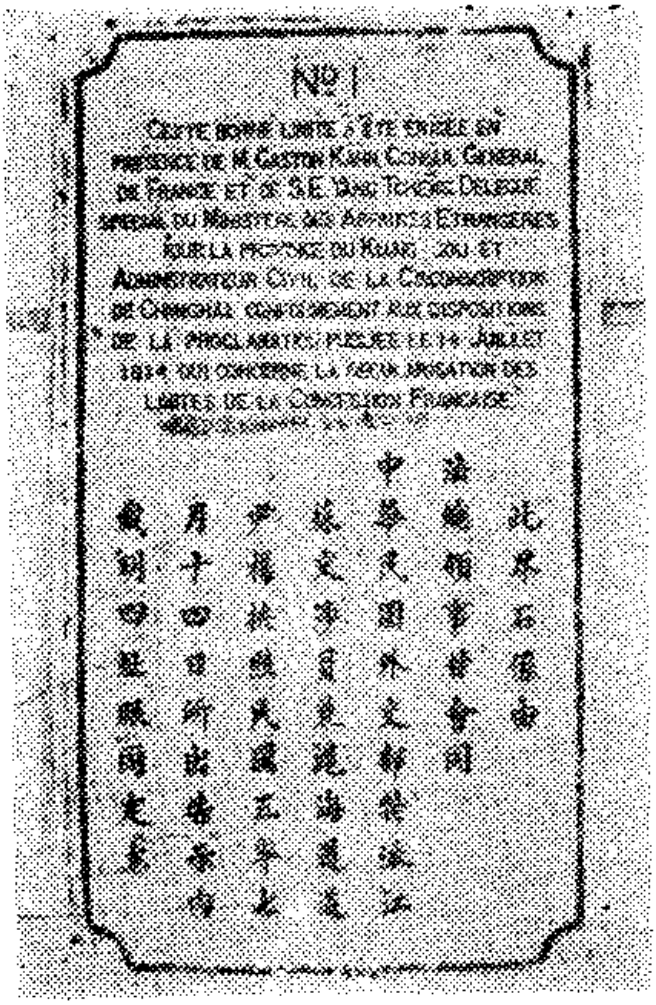
均有捐助。当时捐款办法是：步行者每人5两，骑马者每人10两，单马车每辆20两，双马车每辆30两，各路居户每家30两。靠公众捐助筑路毕竟有限，后来，工部局将界外筑路费列入预算，于是筑路规模更为扩大。1877年，上海道对越界筑路提出抗议，说是中英、中美、中法历次条约，"规定外人购地之权，仅限于教堂、住宅等，至于购地筑路，意义不同，条约并无规定。且外人现有供作娱乐用之马路已足，无须再增。故抗议工部局再行越界筑路，同时并令地保不准售地"。① 以后，上海道又不止一次反对此事。可是殖民主义者置若罔闻，继续在界外筑路。殖民主义者借口维持治安，在越界筑路地区设置巡捕。1884年，工部局开始派巡捕巡视静安寺路，在卡德路建立捕房，是为工部局在界外设警管理之始。1900年，工部局设立清丈局，管理租界外一英里之内的土地清丈事宜。1901年始筑虹桥路、白利南路(今长宁路)、罗别根路（今哈密路)。此后，殖民主义者又在越界筑路地区兴办公用事业，安装电灯、自来水，并征收捐税，称为"特捐"、"特税"。越界筑路地区的地权，"半以路权而丧失，半随水电而俱亡"，成为变相的租界。由于路筑到哪里，租界便实际上管理到哪里，越界筑路成为租界变相扩张的一种手段，因而越界筑路逐年增多。据统计，从1862到1925年，公共租界越界筑路达41条之多，面积达五万亩。

法租界在越界筑路方面，较之公共租界毫不逊色。太平天国时期，法国军队以防守租界需顾及徐家汇天主教堂，遂用军工从上海县城西门沿方浜桥至徐家汇，修筑成军用大道，以后渐修渐长，到1882年已达八公里半，这就是徐家汇路（今肇嘉浜路)。1899年，法租界公董局接办这条路，抽收车捐。同年，法租界第二次扩充，当时除东、北二方有城河浜、北长浜为天然界限，西、南二面均未划定。1900年，公董局乘开拓八仙桥一带新租界之机，自顾家

① 《工部局报告》，1877年，第54—55页，转见《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88页。

宅至卢家湾修筑一条长1350公尺、宽15.245公尺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1901年筑宝昌路(后改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东段)、善钟路(今常熟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1902年筑华龙路(今雁荡路)、宝建路(今宝庆路)、杜美路(今东湖路)、毕勋路(今汾阳路)、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陶尔斐司路(今南昌路东段)。1907年,又筑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911年筑宝隆路(后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1912年筑祁齐路(今岳阳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1913年筑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恩理和路(今靖江路)、古拔路(今富民路);1914年筑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高乃依路(今皋兰路)、莫利爱路(今香山路)。

1913年,法国公使康德(Conty)向中国政府提出法租界外马路的警权问题,企图再一次扩大租界面积。1914年2月,袁世凯电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会同警察督办萨镇冰、交涉员杨晟等与法方交涉。郑汝成等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要求初持拒绝态度,后因北京袁世凯政府急欲取得帝国主义支持,允诺租界扩张要求,上海地方政府才与法方议妥法租界扩张条件,主要内容是:一、华兵得自由通过租界;二、华探得在租界内自由逮捕人犯;三、公董局须扩充华董名额;四、非道契地不得征收地捐;五、垃圾粪船码头不得靠近华界;六、法人使用华民地亩,须给相当之价值,并须于三个月前预行通知。同年4月8日,由交涉员杨晟与法国总领事甘世东(Gaston)签订了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的协定十一条。协定对于界外马路上的修理、经费、捐税、管理以及马路两旁华人房屋田地的免捐、华人坟墓的保护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7月,袁世凯在核准法租界界外马路划分警权协定时,特与法国公使康德商议了在法租界驱逐革命党人的办法,其第四条云:法租界及界外马路区域内,不得用为阴谋内乱反抗中国政府之根据地,也不得为乱党之逋逃薮,如有上项情事,法国警察应严行设法查办拘禁,或驱逐出



法租界界石

界①。

所谓法租界界外马路警权划清以后，中国方面所获得的权益是在法租界公董局中增加两名华董，在薛华立路建立了一个会审公堂，便于华人诉讼。法国方面，则不仅在界外马路得以行使警权，征收各种捐税，并且规定马路两旁居民和原有租界内居民一样缴纳房捐。这样，法租界越界筑路地区又成为事实上的新租界。

至此，法租界公董局管理的地方，新增了法租界以西的大片土地，北自长浜路(今延安中路)，南至斜桥徐家汇路；东自麋鹿路(今方浜西路)、肇周路、斜桥，西至英之徐家汇路(今华山路)，与原有租界合在一起，共达 15,150 亩，为 1849 年初划法租界面积的十五倍，为第二次扩张时面积的七倍。这就是法租界的第三次扩展。

七、拆除城墙

上海县城，周长九里，到 1911 年前后，城高一丈四、五尺(初建时约二丈四尺)，城门 10 个，另有水门 3 座，环城有城堞 3600 个，

① 《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三册，第 66 页。

敌楼 4 座、箭台 20 所，层台 3 座。原先紧回于城外的护城河至此也多淤塞。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建成以来，经历了 360 年风雨、战火的侵蚀。已衰败不堪，而在近代以商品流通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它更成了障碍物。城门低隘，交通梗塞，到 19 世纪后期就成为城内资本主义繁荣的一大障碍，当时"稍挟资本之商皆舍(城内——引者)而弗顾，"纷纷把店铺迁入租界。因此，早在 1900 年就有拆城之议，1905、1908 年又多次有人呈请拆城，改建马路。这些努力都被当时封建守旧势力阻挠而未能实现，只是在旧城墙上增开了三个城门聊以应付而已。

1912 年 1 月 13 日，姚文楠等人又向苏、沪都督及民政总长李平书呈请拆城，立即得到沪军都督府批准，并组织了城濠事务所主持其事。由上海县署民政长吴馨任所长，南市市政厅市长莫锡伦任副所长，下设总务科(科长梅问羹)、工程科（科长工程师潘克恭)、交涉科(科长陆伯鸿)。当时估计整个工程约须费用28万元左右，一时难于筹集，先由闸北水电公司已还道款中拨借规银 5 万两。拆城工程于 1 月 19 日动工，从东城内道署东首及救火联合会前面的城基开始，然后从西北顺城而拆。拆城过程中，为了解决填濠所筑之马路与法租界马路交界而涉及的路权与警权问题，由吴馨出面与法国领事经过反复协商，订立了《华法马路联络办法》，以妥协让步求得法租界工董局的承认。到 1913 年 6 月，城北部拆城筑路工程基本完成，但是资金已耗十万余元，鉴于后面工程资金竭蹶，城濠事务所经江苏都督程德全批准，将城基下土地定价由原地市民出价承领，以解决资金问题。整个工程于 1914 年冬全部完工。北段所筑之路取名民国路(今人民路)，南段取名中华路。上海城墙拆除了，环绕旧城的民国路、中华路以及陆续修建起来的马路，把旧城、城外华界和租界联系在一起，近代上海新城市基本定了型。

拆城过程中，城西北的一段城墙上，建有一座大境关帝庙，或因人们对关帝的崇敬，唯这一小段没有被拆除，至今遗迹犹存，倒

也留下了有价值的古城文物。另外，上海人民为拆城筑路承担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仅就城基附近的土地高价承领一项，上海居民就付出了 120 万元的代价，而真正用于筑路、拆城的仅近 30 万元，绝大多数被北洋军阀拿去用于内战了。

第十七章　近代经济的初步繁荣

辛亥革命以后，到20年代中期，上海进入了一个经济初步繁荣的时期。大规模的工厂成批地在城市的东北、西北等部位开办起来；沿着黄浦滩一弯新月形的江岸，巍峨的大厦一幢接一幢地矗立起来；外滩银行以及邻近的九江路、宁波路一带构成了足以左右中国经济的近代金融中心；市中心的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静安寺等地带形成了繁荣奢华的商业区，近代化的大型百货商场、装潢精美的各种专业商店鳞次栉比，初展了勃勃生机，上海正向着发达的近代工业城市与繁忙奢侈的商业、消费城市合璧的方向迈进。促成这一繁荣的两股经济力量，一是侵入上海的外国资本，一是处于黄金时代的民族资本，它们在上海日渐繁荣的过程中共同发展着，在这过程中又充满着在不平等条件下的竞争，充满着压迫与反压迫的矛盾与斗争。

一、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消长

上海起义之后，外国资产阶级非常担忧：驯顺的清朝官员垮台了，究竟将会由什么样的政权来接替？租界这块乐土还能维持下去么？历来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由之而来的种种特权能继续庇护他们的企业利益么？因此，一时之间，上海的贸易、汇兑、拆放等等都受到了冲击；更令他们揪心的是，以关税作抵的债赔各款本息，能不能安全保住？历来承办此事的上海道刘燕翼已经躲进了

公共租界洋务局，明白表示不再过问此事①。接替他的"新的共和派官员"会不会照旧把关税收入拨解各国银行呢？

正当上海的洋大班们忧心忡忡之际，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伙同江海关税务司墨贤理(Henry Ferdinand Merril)，相当默契地串演了一场趁火打劫的活剧，夺过了中国关税这个聚宝盆，送到了外滩银行洋大班们的手中。

安格联于1888年来中国，先后充任天津、南京、上海等要津的税务司，以其干练赢得了赫德的赏识。1910年，由赫德推荐担任副总税务司。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又继赫德而出任总税务司②。1911年11月3日，安格联函令墨贤理，转告邻近各关，"我们的方针是这样的：关税是外债的担保品，因此税务司应当向有关方面说明，为了避免外国干涉，关税必须以总税务司或领事团名义暂时存储，如果有外国银行可以存入税款，最好用总税务司的名义"③。其实，不待他下令，墨贤理已经下手了。他一面向大清银行建议将税款存入该行，一边已擅自下令海关，每天上午将前一天收到的税款交给他，由他"存入汇丰银行总税务司税款账内。"④ 仅仅5天，存入洋关税款即达98000两，常关税约1000两。他不仅控制了江海关，而且控制了苏州、杭州、汉口、九江等关，当年11月10日以前，他又通知了宁波、镇江、芜湖等关，一律照此办理⑤。上海起义以后，代表新政权的民政总长李平书，一度力争夺回关税控制权，他向墨贤理指出：过去道台的任务由他接办，海关税款收据应由他加盖关防，并提出海关税款应当移交给他。李平书的这些合法

① 墨贤理致安格联函第106号，见《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4页。

②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科 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 1911年11月3日，安格联致墨贤理函，引自《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3页。

④ 1911年11月4日，墨贤理致安格联函，同上书，第154页。

⑤ 1911年11月7日—10日，墨贤理致安格联函，第107号、108号，同上书，第156—157页。

要求都被墨贤理蛮横拒绝了，而且以各国武装将予干涉相威胁，于是作罢①。中国关税（包括洋关、常关、船钞）就此完全落到了安格联手上。

总税务司安格联是帝国主义的总代表，但是，作为一个英国子爵，他又首先是英国的代表，乃至是汇丰银行的代表。他命令墨贤理将全部税款存入汇丰银行，这一行动立即在上海各国领事团内部引起异议，领事团向安格联提出，关税收入应由上海各国银行原有的庚子赔款委员会掌管②。安格联当即通过公使团领袖公使朱尔典拒绝这个提案，他强调指出：关税收入首先应当是1900年以前的外债担保品，然后才轮到庚款委员会，因此由庚款委员会掌管不恰当；他提议由与中国外债有关的上海各国银行组成一个新的特别委员会收存全部税款③。争论的结果是决定由上海各外国银行总董去决定。11月23日，上海各外国银行总董在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18号，麦加利银行召集会议，作出六项决定，主要内容是：税项、款额由总税务司负责开单，交委员会收存；税款由汇丰、德华、道胜三家银行“均分收存”；总税务司每周向委员会提交一次督察各地将税款“汇交上海”的具体执行计划。

根据以上决议，安格联于12月2日，责令东北、两广诸关，改变过去不向上海汇交的做法，今后“一律解沪”。并且在银行委员会六项决议之后加了二条：一是每季度拨付债赔情况必须向北京各国公使团报告；二是以上方案遇有必要时可以修订④。

如果说赫德任总税务司的时代，控制了中国的关税，但是，关税的征收、存放、汇解、提拨之权还是由上海道掌管，可以说“钱袋”还是捏在中国政府的手中，只是在使用税款、征收税额、设立税项

① 1911年12月11日墨贤理致安格联函，第112号，引自《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64—165页。

② 1911年11月23日朱尔典致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呈，同上书，第341—342页。

③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41页。

④ 以上资料参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42页、344页、350页。

等方面须听命于赫德；那么，当安格联出任总税务司以后，首先就把“钱袋”直接拿到了自己手上，不仅关税中抵付债赔各款的本息部分，而且将剩余部分，即史称“关余”的部分，也全部无息地存入了汇丰、德华、道胜三家银行，并且听凭安格联支配。

1913年善后大借款以后，上海汇丰、德华、东方汇理、俄华道胜以及横滨正金等银行，又获得了巨额的盐税无息存款。安格联为上海外国银行（首先是汇丰银行）夺来了巨额关税、盐税，这是上海迅速地成为控制近代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重要条件之一。

1912年以后，上海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就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变化而言，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日本与美国势力的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日、美两国垄断财团对中国经济掠夺、角逐的重点在东北地区，但是，这种掠夺与角逐的活动中心却在上海。这是因为他们以金融控制中国财政及投资的“大轴戏，皆以上海为基点。”① 日、美金融势力在上海的迅速发展，都是以财政贷款为主要的活动内容。1911到1914年，中国对外借款及与之有关的条约、合同约计53宗，其中英国占22宗，日本16宗，法国9宗，美、德、俄各3宗，另外7宗与各国均有关系②。所有这些草约、合同，几乎都与上海汇丰、德华、东方汇理、华俄道胜、横滨正金、花旗等银行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汇丰银行在对华财政资本输出之中，占着绝对的优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局面也在不断变化。1916年，中国各种对外借款，几乎为美国独占，因此被称为“美国的借款年”；1917—1918年的借款则几乎被日本所垄断，所以也就被称为“日本的借款年”③。与财政借款活动相适应，上海外滩的银行势力，也在发生着变化，翻开上海金融区

---

① 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的新动向》见《中外经济拔萃》1939年3月，第3卷，第3期。

② 参阅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③ 樋口弘著《日本对华投资》，第143页。

的地图，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的银行大厦接二连三地矗立起来。1916年，在美国花旗银行大厦（九江路1号）门前，挂起了日商住友银行(Sumitomo Bank Ltd.)的招牌，不久，它又以30万两白银，在九江路5号兴建了住友银行大厦；1917年，在这幢新建的银行大厦中又开办了日商三菱银行（Mitsubishi Bank Ltd.)，在福州路3号建起了日商三井银行大楼；1918年，在南京路上相继建立了美商美丰银行（American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日商朝鲜银行(Bank of Chosen)、日商上海银行(Shanghai Bank)；1919年，又有美商友华银行（Asia Banking Corporation)、菲律宾银行(The Bank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分别在九江路及黄浦滩路开办；同年，美国远洋航运业的代表，运通银行(American Express Co.)在九江路41号开办，1921年，美国大通银行（Equitable Eastern Banking Corporation)在南京路99号成立。在这一时期，英国在上海新开办的银行，只有1925年的大英银行(P.&.O.Banking Corporation)一家。上述情况，比较实际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金融势力在上海的消长情况。

1912年以后，上海外商银行的职能已发展到掌握贷款、控制财政、投资于路矿以及给各国在华工业以金融支持等业务为主。如：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控制善后借款之日方贷款500万镑（合4898万日元)；台湾、朝鲜、兴业三银行掌握着1917—1918年之间，日本对华最主要的借款——“西原借款”约14500万日元①。1914年以前，美国花旗银行，控制着对华借款、汇兑、期票及贴现业务，1916年改组为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这时它在沪资产总额约800万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美国的金融势力已

① 樋口弘著《日本对华投资》，第143—149页。

经跃居英国之上，但是，在上海（当然即意味着在中国）美国金融势力依然屈居于英国之下，直到1927年汇丰银行始终在上海居于首位，这一年汇丰的纸币发行量约为2673万美元，花旗银行发行纸币近10万美元；汇丰的资本总额达36892.5万美元①，上海花旗银行资本总额才有12500万美元。对于英国在上海金融势力的争夺，美国、日本始终在策划、谋算，从四国银行团、六国银行团、五国银行团及新银行团的演变，斗争即寓意于此。其中不少活动就演释于上海，如：美国芝加哥大陆银行副总裁阿卜脱（Abbott）于1919年前后多次来沪活动筹建新银行团、争取烟酒借款②；日本于1918年冬，在上海开办“取引所股份公司”，力图“操纵上海市面”③，等等，都在中外经济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日、美银行在上海金融中心崛起之际，德、法两国的银行势力则正在被排挤、衰落。德、奥所据有的庚款及其其他借款，随着段祺瑞政府的参战，被英国汇丰银行接管，德华银行也于1917年被迫关闭；同年，中法实业银行，由于巴黎总行的严重亏损而停业，并于1921年宣布关闭④。

日、美经济势力在上海的迅速发展，还表现在工业与商业方面。

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在上海棉纺织业的投资，还只有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一厂、内外棉三厂等少数几家。辛亥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的八大纺织系统，先后打入了上海，1913—1925年共在上海办厂29家。（见下表）

---

① 徐寄庼：《最近上海金融史》第453—454页；461—462页；美元与英镑之折算据兰以琼：《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第205页。

②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页；《民国日报》1919年3月2日。

③ 杨荫溥：《中国交易所论》，第37页。

④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第214页。

1912—1925年日本在沪开设纱厂情况①

年别	纱厂名称	所属财团	在沪地址	备注
1913	内外棉四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西苏州路	
1914	内外棉五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澳门路	
1916	上海纺织三厂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杨树浦路90号	
1918	日华纱厂一厂	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浦东陆家嘴	收买美商鸿源纱厂
1918	日华纱厂二厂	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浦东陆家嘴	
1918	内外棉七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西苏州路	收买华商大纯纱厂
1918	内外棉八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西苏州路	
1918	内外棉九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麦根路60号	收买华商裕源纱厂
1920	东华纱厂	东华纺织株式会社	华德路87—88号	
1921	公大一厂	钟渊纺织株式会社	平凉路100号	
1921	日华纱厂三厂	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劳勃生路98号	
1921	日华纱厂四厂	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劳勃生路98号	
1921	内外棉十二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西苏州路	
1921	内外棉十三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劳勃生路62号	
1921	东洋纺织一、二、三厂	东洋纺织株式会社		
1921	裕丰纱厂	东洋纺织株式会社	杨树浦路98号	
1921	同兴纱厂一厂	同兴纺织株式会社	戈登路181号	
1921	同兴纱厂二厂	同兴纺织株式会社	杨树浦路90号(甲)	
1921	丰田纱厂一厂	丰田纺织株式会社	极司非尔路200号	
1921	丰田纱厂二厂	丰田纺织株式会社		
1922	内外棉十四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劳勃生路62号	

① 本表资料来源：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辑《日本对沪投资》，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5—56页。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1929年版，第8—9页间附表。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78—579页。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214页。

（续表）

年别	纱厂名称	所属财团	在沪地址	备注
1922	内外棉十五厂	内外棉株式会社	戈登路146号	
1922	大康纱厂一厂	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	杨树浦腾越路2号	
1923	大康纱厂二厂	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		
1924	日华喜和纱厂	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劳勃生路76、80号	收买华商宝成纱厂
1924	日华纱厂八厂	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吴淞蕴藻浜	收买华商华丰纱厂
1925	公大纱厂二厂	钟渊纺织株式会社	杨树浦路40号	收买英商老公茂纱厂

从日资纱厂开办的年代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对于日本来说是对华投资的极好时机，然而，从1914—1918年5年之间所开的纱厂仅7家；而1921—1925年这5年之间，尽管历来认为这是战争结束后欧洲资本卷土重来的时代，然而，日本人在上海所办的纱厂却有20多家，比欧战期间多了近二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涉及国际及日本自身的原因固然不少，然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1918年在上海召开的特别关税会议，对税收政策作了调整，促使日本尽快地改变纺织品输出为直接到上海开办纺织厂。1918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特别关税会议，讨论了二·五加税问题，将由原定值百抽五，提高到值百抽七·五，尽管它的执行还有待于再次"召集特别关税会议共同解决"①，但是，上海会议上所确定的"从价课税五分"②，对于日本输出纺织品而言，实际上已经要增加附税，从而决定了日本垄断财团认为把纱厂直接办到上海，更有利于与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纺织业进行竞争。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东方的竞争能力的削弱，也为日本在上

① 马寅初：《吾国关税问题》，见《马寅初演讲集》第二集，第188页。

② 《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第728页。

海的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如果翻阅一下上海工业区的地图，可以看到普陀、杨浦工业区，沿着蜿蜒的黄浦江和苏州河西段，日商纱厂星罗棋布，鳌头独占①。

与日本相比，英国在上海的纺织工业就相形见绌了。1914—1918年间，英国资本的纺织厂，只有1914年由香港迁沪一家，它就是杨树浦纱厂（也称为新怡和纱厂）；另外，于1918年前后，收办了德商的瑞记纱厂，改名为东方纱厂②。1918—1925年之间，英国资本在上海的投资，也仅仅是一度收买、租办了3家华商纱厂，它们是曾由英商经营的原郜声涛所办崇信纱厂；委托英商庚兴洋行经营的，吴麟书所办统益纱厂；以及原震寰纺织公司投资，由英商信昌洋行租赁经营的纶昌纺织染整印花有限公司③。

这一时期，美国工业资本在上海的发展也是很快的。仅1916至1918年就在上海开办了13家工厂，其中影响很大的有属于摩根财团的中国电气股份公司（1917年）、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1917年）、以及属于洛克菲勒财团的美孚洋行所办的一系列油灯、油罐、洋烛、玻璃工厂。1919年至1925年间，又开办工厂12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纸板制品公司、沙利文公司以及德士古洋行的一系列制罐厂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慎昌洋行的发展。1902年，它开办于泗泾路，当时只是一家极小的贸易行，以掮客业务赚取佣金为主，1915年在圆明园路建造了大楼，独家经营摩根财团所属奇异电气公司产品，1917年它已归属于美国太平洋开拓公司，1921年以后停止了出入口业务，倾全力于上海工业，它开办的工厂有慎昌机械厂、慎昌蛋粉公司、慎昌发网厂、美华制刷厂等④。

---

① 《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第48—49页间插图《上海东西区纺织工业略图》。

②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153—154页。

③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6—28页。

④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53—359页。

这一时期，作为上海工业动力的电力工业始终控制在英、美资本手中。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斐伦路电厂于1910年装置了6000瓩的发电机①，1913年4月杨树浦电厂落成以后，相应的配电所，地下电缆等设施也相继建成，为上海电力公司奠定了基础。上海的煤气、自来水及其他公用事业也基本上控制在英国垄断财团手上。

总之，1912—1927年间，虽然日、美资本在上海迅速发展，而英国的工业垄断势力也依然在这里牢牢地盘踞着。外资金融业的发展，外滩银行大厦的兴建，上海各工业区外资工厂的迅速增加，推进着上海经济迅速地繁荣起来，这种繁荣固然是适应于帝国主义经济掠夺所需要的繁荣，然而，它在客观上又形成了与封建小生产经济的强烈比照，从而对于进一步摧毁封建经济基础，刺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

民国建立以后，人们普遍认为，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今后应当是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的时代了。孙中山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尽力的即在此事。"② 这话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人们致力于发展工商，振兴实业，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列强自顾不暇，给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上海的民族工商业更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成为上海经济迅速繁荣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为了看清这一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总体面目，让我们先看

①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38—339页。

②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钱别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一些枯燥的统计数字。

1912—1927年上海华资工厂发展概况表①

年别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工厂开办数	16	14	8	17	24	12	22	30

年别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工厂开办数	30	40	39	33	33	54	46	73

1911—1927年上海华资银行发展概况表②

年别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当年开办数	2	1	2	2	3	3	3	4	9
当年停歇数		1	2			1	1		1
实际开业数	9	9	9	11	14	16	18	22	30

年别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当年开办数	12	18	12	4	3	1	4	2
当年停歇数	2	4	10	4	2	7	4	6
实际开业数	40	54	56	56	57	51	51	47

① 本表数字依据：杨大金编《近代中国实业通志》；上海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上海社会局1933年编《上海之机制工厂》；吴承洛编《今世中国实业通志》等著作相互校订后所得之数据。罗志如所编《统计表中的上海》第63页，提供的数据虽然也表现了同样的趋势，但是，由于它是以1928年这一年存在的注册工厂为基点的，因此与实际情况互差较大，故不采用。

② 本表数字依据：《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217—278页；上海银行周报社编《上海金融机关一览》；中国金融年鉴社1949年编《上海的银行》等著作，相互校订所得之数据。

华侨在沪投资发展情况(单位：折合人民币，元)①

项目 / 年别	投资户数	投资数额	年平均投资
1900—1919	13	39,284,500	1,964,225
1919—1927	23	39,163,000	4,895,575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1912年到1927年，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民族资本工厂开办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增长；第二，民族金融业发展，以新式银行的迅速发展为显著特点；第三，华侨在上海的投资明显地增长；第四，这一时期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呈阶梯型趋势，从工业来看，1912至1914年工厂年平均增加数为12.7家，1915至1918年工厂年平均增加数为18.8家，1919至1925年为年平均增加37家；从新式银行来看，1911至1913年，实际开业银行每年都是9家，1914至1918年，年平均开业数为16家，1919年至1927年，则为49家。除个别年份偶有起伏以外，三个时期显示出三个层次。

在上海的心脏地区——公共租界东部的金融区内，不仅外商银行大厦于20年代初开始，一幢接一幢地挺立起来，而且涌现了一大批华商的银行大楼，它们虽然相对地矮小一些，却也都以钢骨水泥建成，而且十分坚实。它们一批批地建筑于北京路、宁波路、江西路、汉口路、九江路一带。在新式银行勃然兴起的同时，传统的钱庄业，在这一时期也在继续发展，并依然在华商金融业中居于优势地位。辛亥革命后，上海钱庄业一度因"市上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各种商业，顿形疲滞，市面银根因之骤紧"②。1912年，南北

①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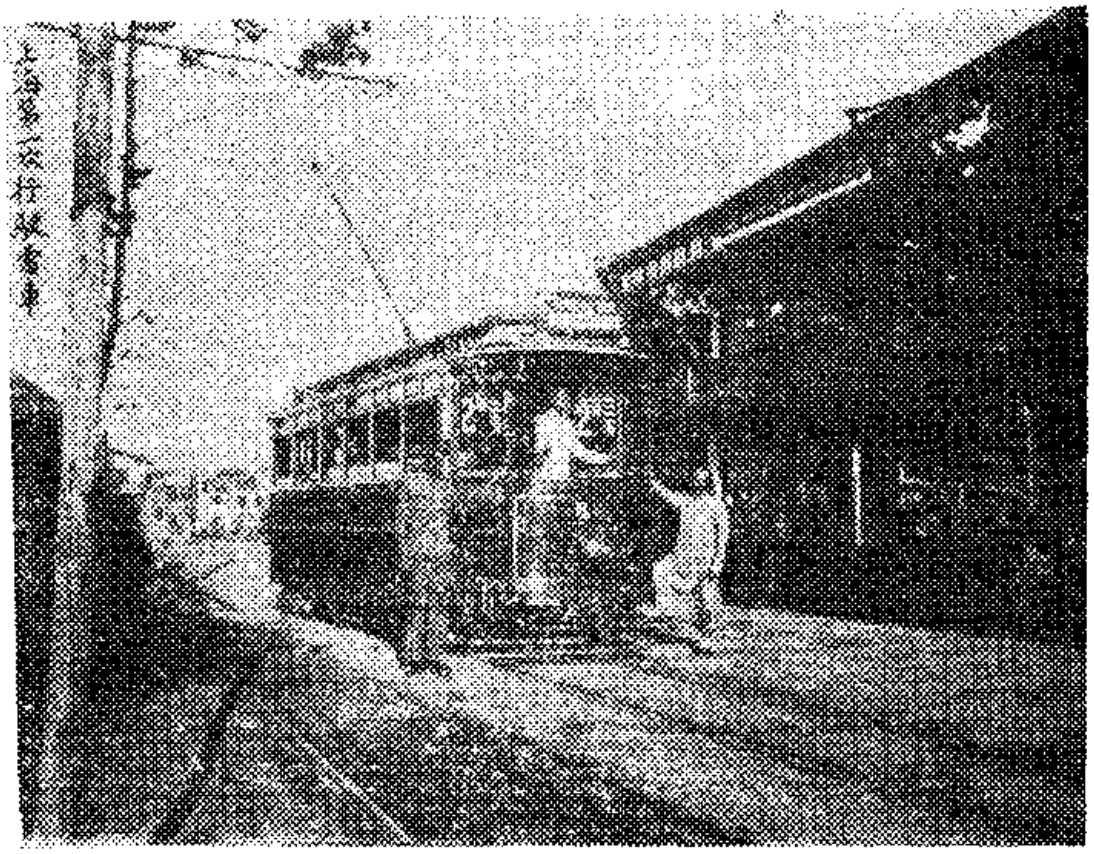
② 《申报》1911年10月16日。

市倒闭的钱庄达27家，1913年就开始恢复，新办的钱庄有6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上海钱庄随着内外贸易及工业的发展，不断地发展上升，1914年上海开业钱庄40家，1916年为49家，1918年为62家，战后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1920年达到71家，1923年84家，1926年达到87家①。钱庄业的发展不仅在于开办数量的直线上升，而且表现在营业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的营业已由兑换、贴现、汇兑、生金生银买卖、存放款，进一步发展到代发银行纸币、代售股票债券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工、商业放款的发展。如：福康钱庄的工业放款，1925年约35万两、1926年约42万两、1927年约72万两；福源钱庄的工业放款，1925年约47万两、1926年约50万两、1927年达120万两以上③。1920年，上海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在九江路开幕，接着又有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纱布交易所、金业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等等相继开办，上海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金融市场。

这一时期，上海商业发展最引人注目。繁华的南京路上，到20年代前后，除了西商惠罗公司、泰兴公司、福利公司等著名公司外，华商公司、商场日益增加。曾经遐迩闻名的新世界商场，在1917年开办的先施公司，1918年开办的永安公司等新颖的大百货公司面前，已略逊一筹了。同时，一大批专业商店，诸如：精益眼镜公司、邵万生南北货店、王宝和酒楼、裘天宝银楼、五芳斋点心店、一乐天茶楼、浴德池等等，包括洋杂货、照相、洋布、服装等约三十余种行业，近200家专业商店，雨后春笋般地开办起来，“各公司竞治装潢，橱窗陈设都趋美术化，极其辉煌灿烂”，使南京路有了“小巴黎”之称④。

---

①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8页。
② 杨荫溥《中国金融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28页。
③ 《上海钱庄史料》，第784—786页，第802—804页。
④ 《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丛书》，《上海风土杂记》，第2—3页。



上海最早的有轨电车在南京路上行驶

民族商业的兴旺，还表现在全国各地商帮都到上海开设大批从事批发业务的行号。据1918年统计，各地商帮在上海开办的行、号约有340余家。其中，四川帮阵容最强，约有74家，集中在福州路，其次为汉口帮，约有58家，集中于广东路、汉口路；广东帮约46家，集中于江西路、四川路；山东帮约42家，集中于山东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①。

法租界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及其两侧永安街、紫来街、洋行街一带，更是华商批发行号集中之区。集中于这里的行号有广建帮7家、福州帮10家、瓯台帮1家、天津帮16家，河南帮3家，总计约37家之多②。20年代前后，这里的华资商务，已经“远出城内”，“大资本的营业”(指批发商)和骑楼式的建筑，已经“成为全上

①② 《上海商业名录》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海的特色”。① 除此以外，一些颇有声誉的专业商店，如：协大祥洋布店、余生源南货店、聚兴银楼、鸿运楼酒家等等，也先后发轫于此②。

1914年填洋泾浜并于1915年完工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也已成为商业繁华之区。洋行之集中是这条商业大街的特点。据1918年统计，这里集中了近20家洋行，除了3家股票商以外，其余十几家都经营进出口业务，著名的如：壳件洋行、美大洋行、千代洋行等等③。中法实业银行、万国储蓄会以强大的金融实力居于爱多亚路的前列(1号、5号)。华商企业也在这里迅速地发展，到1918年，这里有华资行号、商店约63家之多。其中，山东帮批发行号阵容最强，约有18家，其他如：洋杂货、木器、洋布、西服等等亦是一应俱全，至于耸立于爱多亚路、西藏路口上的“大世界”则更为市中心的繁华添上了浓重的色彩④。

这一时期，上海商业繁华之区，还有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静安寺、南市方浜路、小东门、民国路(今人民路)、城隍庙等等。与市中心灯红酒绿、贸易发达的商业街区相对应，上海城市的东、北、西北翼，工人聚居的杨树浦、曹家渡、闸北等地，出现了不少低层次的消费商业网点。如：小有名气的杨树浦高郎桥一带，在1914年德大纱厂开办以后，“粮食业、薪炭业、南北货业、鱼肉业、糟坊业、杂货业、砖瓦业、小菜市，及其他一切小贸易与小车夫、人力车夫、运货脚夫等，先后来集于此”，不久，这里即“地方百业，蒸蒸日上”了⑤。在沪西曹家渡、小沙渡一带，成千上万由各地汇流而来的贫民、工人聚居之区，也出现了熙攘繁杂，低层次消费商业。较为著名的如：小沙渡西侧被称为“石灰窑”的所在，原先是一个大荒场，

---

① 《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丛书》，《上海风土杂记》1932年版，第5页。

② 《上海商业名录》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③④ 《上海商业名录》，1918年。

⑤ 穆湘玥《藕初文录》上集，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9页。

随着日资纱厂在这一带开办，20年代前后，在这个荒场上出现了30—40个以凉席搭建的棚子，出售华洋杂货、“爱国土布”、粮、油、蔬菜，也开办了茶馆——明月茶馆，不时还有本滩戏、大京班、江淮戏等流浪艺人在此卖唱献艺，昔日的大荒场变成了繁闹的“沪西大世界”①。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出现了一批中、小资本家，特别是中小商业资本家，他们的出现，为1919年前后马路商界联合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即使在一些大企业资本家的队伍中，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华侨、留学欧美归国学生、小商人，以至学徒、职员出身而成为大资本家的人数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

荣氏企业的创办人荣德生，15岁到上海钱庄当练习生，荣宗敬14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当学徒，15岁以后又改往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习业3年，他们的父亲荣熙泰也是自幼入铁肆习业的小商人②。

刘氏企业集团的创始人刘鸿生，出身也不富裕，守寡的母亲为了供他读书，几乎把家产变卖光了。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刚刚读完一年级，就为了挑起家庭重担而辍学，踏上社会。他的第一个职业是当教师，以后又转入工部局当了翻译③。

上海华商电车公司的创办人陆伯鸿，虽然在清朝末年中过秀才，却从未踏上仕途，而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中法学堂学习，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归国后就进入华商电气公司当工程师④。

永安集团的创始人郭乐、郭泉兄弟，出身于广东中山县一个农

---

①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远东出版社，第79—96页。

② 《荣家企业史料》第3—4页。

③④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集，第402—406页，第621页。

民家庭，迫于生计，17岁的郭乐远涉重洋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先是当一名菜园工人，以后经由堂兄郭标介绍，进了由郭标与马应彪合伙开办的永生果栏当个小职员，经过几年艰苦的小职员生涯，才自设永安果栏，以此渐渐起家，到20年代前后，才到上海办起了永安公司及后来的永安纱厂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办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起家于"香港经营怡兴泰号，贩运土洋新货于日本、香港、暹罗之间。"②像他们这样，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起家的人物，在这一代新颖企业家之中，可算得凤毛麟角的高门第了。

先施公司总公司创办人马应彪，最初为澳大利亚悉尼永生果栏的合资人；上海先施公司的创办者黄焕南，虽然也是澳大利亚华侨，幼年却是广东中山县米铺的学徒③。

德大、厚生两家纱厂，在20年代是颇负盛名的华商纱厂，它们的创办人穆藕初，出生于一个行将破产的小棉花行主之家，14岁就迫于生计进了另一家花行当学徒，以后又当过小职员、教师和海关职员，他奋发自学，在妻子与友人资助下，34岁才赴美留学，攻读农学获硕士学位归国，他是我国唯一与西方泰罗制创始人泰罗有过直接交往，并第一个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引进了泰罗制的企业家④。

冠生园的创办者冼冠生，大隆机器厂的创办者严裕棠，都是学徒出身。冼冠生是上海五马路竹内居食品店的学徒，严裕棠则是印刷厂学徒出身。天厨味精厂创始人吴蕴初，则是一个"兵工技师

---

① 《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②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2页。

③ 参阅《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46页。

④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5页。

出身的资本家”。著名的实业家胡厥文，早年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辗转来到武汉，在汉阳铁工厂当一名工人。华生电器厂的创办者杨济川，家道贫寒，16岁失学，以后就进了上海的一家洋布店当个学徒。大中华橡胶厂的创始人余芝卿是旅日华侨。新亚化学制药厂创办人赵汝调是日本千叶医科大学药学科毕业生。美亚织绸公司创办人蔡声白则是美国理海大学工学学士。著名华侨银行家，北四行之一的中南银行创始人黄奕住，出生于福建南安县楼霞乡农民家庭，迫于生计，21岁流浪到了荷属爪哇，在三宝垄干了5年苦工，以后开办了一家小商店“垄日兴行”，经营糖、米、咖啡贸易①。以上仅以著名企业家略举一、二，这些企业家与昔日高官显爵、买办巨富转营工商业者相比，大多出身微贱，但是，他们或在长期的学徒、职员生活中学习了技术，积累了不少经营、管理企业的经验；或者游学欧、美、日本，旅居东南亚、澳大利亚，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生产技术、企业管理等方面，耳濡目染，接受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因此，在上海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能施展所长，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在中外资本的激烈竞争之中，取得一定的成功而获得了卓著声誉。

三、民族资本企业举要

上海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一些著名的企业，大多是在1911年至1925年前后，创办、发展起来的，这里简略地介绍其中几个著名的企业集团在上海创办、发展的大略情况。

（一）荣氏企业集团

辛亥革命以前，荣氏企业已经在无锡开办了茂新机器面粉厂

① 参阅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版。

和振新纱厂，并且参加了上海、无锡两地7家面粉公司组成的“办麦公会”。辛亥革命以后，荣德生应邀出席了北京工商会议，对发展实业更为雄心勃勃。他们一方面继续扩充无锡茂新、振新二厂的生产规模，同时又积极筹划到上海进一步发展实业。

荣氏兄弟在上海的实业活动是从1912年开始的，这一年他们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工厂——福新机器面粉一厂。1912年中，荣氏无锡茂新面粉厂的办麦主任浦文汀兄弟与销粉部主任王禹卿兄弟商议，合伙到上海自办面粉厂。他们勉强凑集了资本2万两规银，却还难于成事，荣德生得悉以后就表示愿意出资2万两，合作创办，当年11月，定名为福新机器面粉厂，向上海鸿章纱厂总经理郑培之租下了闸北光复路新闸桥下地基、厂房，由荣宗敬向茂生洋行订购美国机器，因为得到分期付款之通融，福新机器面粉厂很快就建成了，并于1913年开机生产，是为福新一厂。当年就获利32000元。这是荣氏企业集团在上海立足之始。

1913年5月，荣氏兄弟又以“恒记公司”的名义，租办了原上海中兴面粉厂，改名为“中兴恒记面粉公司”，押租规银5000两，年租2万两。由于营运资本不足，向江苏银行押贷，接受江苏银行派员监督财务。1915年中兴恒记面粉厂正式让盘，改称为福新四厂，买价则经过长期磋商到1919年2月才确定，为中兴厂原投资额的40%，即12万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荣氏企业还在上海增开了福新二厂和福新三厂。这两家厂的开办资本，绝大多数来源于福新一厂的利润积累转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氏茂新、福新诸厂生产的“绿兵船”牌面粉，畅销于欧洲、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各国，盈利激增。仅以福新一、三两厂统计：1914年，福新一厂盈利4.8万元，1915年盈利18.9万元，1916年一、三两厂盈利14.41万元，1917年为18.87万元，1918年为14.62万元。5年之内，两厂合计盈利81万余元。

巨额的利润为荣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累积资本。大战期间，除了在无锡开办茂新公司，建立茂新二厂，租办泰隆、宝兴二厂以外，福新公司还在汉口开办了福新五厂。在上海，福新公司于1915年开办了福新四厂、1917年开办福新六厂，增加了生产能力，每日5700包；同时，福新一厂两次增资，由1912年的4万元，到1914年的6万元，1918年更增加到30万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氏企业在上海的显著发展，是开办申新棉纺织一厂。该厂于1915年10月开车，拥有12240纱锭，开办资本额定为30万元，实收21.75万元。1916、1917两年盈利达13.87万元；1918年，增资到实收30万元，当年盈利就达到22.25万元。1917年，申新系统在上海盘购了日商恒昌源纱厂，核资40万元，改名为申新二厂，为申新系统增加了1万纱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有英、法等国卷土重来的影响，以及上海金融风潮的冲击，但是，荣氏企业还在继续发展。1918年买下了德资波弥文洋栈及打包厂，以30万元资本开办了福新七厂（于1920年开工投产）；同年11月，又建成福新八厂，租办了上海华商元丰面粉公司；1919年，申新一厂添设美国纺纱机2.5万锭，布机400台；申新二厂添置3.4万锭；另外，在无锡、汉口分别于1919、1921年，建办申新三厂、四厂。

荣氏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迅速发展，促进资本的进一步集中，为了便于加强对各系统工厂的管理、控制，荣氏集团以35万元巨资购地造屋，1921年荣氏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江西路58号落成，荣宗敬任总经理。以后，荣氏企业的资金调动、原料设备采购、产品的推销，由总公司统一处置，各系统、工厂则分头负责生产。这种统一的管理、控制对于荣氏企业以后顶住帝国主义的倾销，比较快地从战后的衰退中获得转机，是有积极意义的。

1922至1925年，荣氏企业经历了一个由低落到回升的发展过程。为了比较确切地认识荣氏企业在这一时期低落的程度以及

回升的速度，就需要对实际的统计数字作科学的分析。

1921—1925 申新系统产量①

年别	纱(万件)	布(万匹)
1921	3.6	18
1922	8	36
1923	6.6	70 2
1925	7.5	97.6

1921—1924 福新一、三、七厂产量②

年别	产量(万袋)
1921	317.1
1922	220.1
1923	301.9
1924	474.9

1921—1924 年荣氏企业盈亏情况(万元)③

年 别	申新盈亏	茂新、福新盈亏	总 盈 亏
1921	82.7	12.15	94.85
1922	634	−50	584
1923	−925	20.27	−904.73
1924	−384	857.56	473.56

从荣氏企业的整体考察，1923 年是不景气的最低点，总计亏损达 900 多万元。然而，不难看出在整个不景气阶段中，荣氏企业表现了三个特点：第一，产量下跌幅度不大。申新系统棉纱下跌 14000 件以后，又迅速回升 9000 件，而棉布的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上升；福新系统面粉产量在下跌 97 万袋以后，立即又回升 81.8 万袋。如果把外粉渗入的情况联系起来看，很显然，当 1922 年，外粉输入突然猛增 4.8 倍的巨大压力之下，福新的产

① 两表资料来源：《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 109 页、177 页、169 页、173页。
② 这一项统计数，因为原始资料缺损，故以 1920 年列入。
③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 156 页、第 169 页、第 173 页。

1921—1924年外粉输入情况(单位：万关担)①

年　别	输入量	年　别	输入量
1921	75.7	1923	573.8
1922	360.9	1924	660.1

量受其冲击而急剧下跌了，可是，以后的几年中尽管外粉不断地如潮水般涌来，福新系统却很快站稳了脚跟，不仅没有连续下跌，反而有了一定的回升。第二，企业内部盈亏相济，互相支撑。1923年，纱价狂跌，申新系统依靠发展棉布生产力挽狂澜，另一方面福新、茂新这一年略有盈利，对挽救企业也起了积极作用；1924年，更明显地表现为依靠棉布、面粉的盈利，使整个企业在不景气的衰退中站住了脚跟。第三，荣氏企业的亏损，从生产与流通两个领域中分析，显然不是由于生产的下跌而造成亏损，这一点从上述诸表的比较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足见其主要亏损原因在流通过程之中。这就说明了封建军阀割据，是造成这一时期荣氏企业不景气的主要原因。

（二）郭氏永安集团

从澳大利亚悉尼永安果栏起家的郭乐、郭泉兄弟，早在1907年香港永安公司开办后，就到上海四川路三和里设立了"办庄"(即驻沪办事处)，1915年又在四川路A131号设立了香港永安水火保险公司的代理处。这是永安集团进入上海滩的先声。

1913年，郭氏兄弟决定筹资50万港元开办上海永安公司，在澳大利亚华侨中得到热烈支持，资金募集远远超过50万元，1914年又决定开办资本扩大到200万港元，并于1915年决定派郭泉、郭葵来沪筹办。

①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7页、第171页。

郭泉、郭葵来沪后在四川路三和里办庄建立了临时办事处，着手选择铺址。他们认为从外滩到昼锦里(今九江路、山西路)一带，已经商店林立、热闹非凡了，而日升楼(今华侨商店)以西，还处于店面错落不齐的冷落地段，于是决定在这里择定铺址。至于设在路南还是路北更有利呢？他们派了两个职员，在南北两边的人行道上作了一番过往行人多少的比较统计，结果是确定了路南行人比路北多，而且发现当时上海的富豪大户多居住在南京路以南，他们来南京路往往是由南而后北，于是决定在路南开设上海永安公司。不日，郭氏兄弟拜访了地产大王哈同，商量租地。这一片约13亩土地，1900年哈同仅仅以13万两规银买进的，现在，哈同见永安集团有油水可榨，就提出年租5万两，30年期满后连同所造大楼一并归还的苛刻条件，当时社会上多以为条件过于苛刻，无利可图。郭葵则认为30年之内，可以赚进20吨黄金，于是忍痛签约，从1916年4月起租。地皮租定后，郭乐亲自来到上海主持筹建工作。他一面与陶桂记签订合同，一面就通过香港永安公司向英美购货，还派司理杨辉庭到日本采办货物。这一年年底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经过二年营造，永安公司大楼建成。1918年8月20日，上海各大报纸登出上海永安公司开幕广告，9月5日，正式开幕，公司门前人山人海，整个商场从底楼到四楼挤得水泄不通，一天下来营业额达一万几千元，开业后20天左右就把所准备的三、四十万元货物销去了大半。上海永安公司以“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顾客永远是对的！)为营业服务的口号，严格管理营业人员的服务质量，营业方式上又不断地花样翻新，营业蒸蒸日上。1918年获利润14万元，到1923年利润已超过100万元。

与永安公司同时开业的联号企业，还有大东旅社与天韵楼游乐场，营业都很兴旺。1918年，大东旅社的房金收入约7万元，1919年上升到25万元以上；天韵楼的门票收入，1918年约2万余元，1921年竟达到20.6万元之多。另外，当永安公司开幕之际，账

房间就开始吸收存款业务，1918年，存款额约17,600余元，1921年存款户由16户增加到398户，存款额达58万余元，于是正式成立银业部，形成了永安公司自身的金融系统。

从1918到1920年，永安公司利润额总计约为144万余元，除去历年发放股息、花红61万余元以后，盈余滚存额达到83.6万余元。郭氏兄弟以此为基础，于1920年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号召，提议开办永安纱厂，受到华侨普遍支持。1921年春，订立招股简章，准备招股300万元，简章公布以后，不到两个月认股额已超过300万，1921年4月，由郭氏兄弟与梁创等四人在永安公司五楼设立永安纱厂筹备处，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纺纱机20480锭，当年10月又增订10240锭；同时在杨树浦西湖路购买地基58.37亩动工建造厂房。1922年9月中旬永安纱厂终于开机投产，实收资本600万元。这一年年底，又进一步筹设布厂，向英商泰和洋行订购织机510台，1924年，布厂开工。这样，一个以商养工，商工并茂的永安企业集团就建立起来了①。

（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下简称南洋）是上海华侨企业巨子。据统计，到1949年为止，华侨在上海的工业投资共50家企业，投资总额达5100万元（人民币——新币），其中卷烟业二家，而南洋在1949年解放后核定资产为2380万元，即占华侨在沪工业投资之46%以上，足见其作为华侨资本在上海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②。

南洋之进入上海，始于1915年。当时有一位金石家叫王世仁（秋湄），受简氏兄弟聘请，到上海为南洋推销香烟。他到上海以

---

① 资料引自《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② 参阅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第105页；《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661页。

后，看到整个上海卷烟市场几乎被英美烟公司的“强盗”和“大炮”（即强盗牌和大炮台、三炮台）所占领，不仅“茶楼戏院，告白如麻”，而且，英美烟公司与上海销售卷烟的20余家大同行“订立有约，不能代售别家之货”，即使是“小同行170余家，亦受其大同行之压力，不敢代售别人之货。”他从南京路一直跑到里外虹口，“竟是不但无人肯定货，即欲将货交托其代卖，卖出而后交银，亦竟有多数拒而不纳。”跑遍全上海，总算找到四家零售店，热心国货，愿与之订约代售。为了打开销售市场，他采取了削价贱卖，多给佣金等方式，以南洋所生产的“双喜”、“喜鹊”、“蓝马”、“飞船”等优质香烟抵制洋烟，这一年年中，恰逢上海人民掀起爱国抵货运动，王世仁立即加入了上海国货维持会，南洋的卷烟受到国货维持会的重视、支持，更受到爱国民众的欢迎。于是愿意代理者日益增多，纷纷争相与南洋订约，在上海人民的爱国抵货运动推动下，南洋在上海的销售市场终于打开。

1916年，为了进一步打开上海市场，王世仁租赁了南京路390号，开设南洋沪局（指发行所），由他担任沪局主任，于4月10日正式开幕。对于南洋沪局的开办，英美烟公司“极为震惊”，立即胁制各代理店不准为南洋销售，接着，又以削价倾销等手段，企图一举挤垮南洋。王世仁一方面增加代销佣金，减低批价以稳住代理同行；另一方面，他四出奔走，兜售产品，几乎跑遍了上海2000多家妓院，诱之以利，促使他们专销南洋的香烟。为了与英美烟抗衡，他又雇佣了一批人去调查消费者的心理，了解消费者对南洋产品的意见。他发现，上海的上流社会吸烟者，往往以价贵为佳，在这个市场领域中削价销售反而会失去市场，因此，他立即向总公司提议，以改进质量取胜的意见。经过一番努力，南洋没有被挤垮，而英美烟公司的种种手段，到了1917年已失去了效用。市场既经打开，南洋觉得往返运输，讯息不灵，于是决定在上海开办卷烟厂。

1917年2月，南洋开始在上海筹建卷烟厂。它以3万两规

银，买下了上海百老汇路（今长治路）的一处旧栈房，建起了五层楼的宏伟工厂，先后安装了15架卷烟机，到这一年五月，增加到22架，每天可以产烟60—70大箱。

1918年，南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将总公司迁到了上海南京路12号①。这样，南洋的活动中心就由香港移到了上海。1919年，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再次改组，将额定资本扩大到1500万港元，并且开始向社会招股。改组以后，将旧厂加以扩建，并进一步新建了工厂。1920年，在原建于百老汇路的卷烟厂近旁，已新建了4个工厂，机器设备增加的速度也很快，1921年比1920年增加116.6%，1922年比1921年增加35.7%。1923年以后，由于英美烟的倾销，南洋的盈利有所波动，却还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见下表）。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又在浦东新建了分厂。

1922—1927年南洋盈利状况（单位：万元）②

年别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盈利	408.5	309.5	48	122	230.1	28.7

（四）刘鸿生企业集团

刘鸿生因家道日衰而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中途辍学，凭着他的英文功底，于1909年到上海开滦矿务局充当跑楼（即推销员）和写字，1912年升为买办。他不仅从买办薪金、回佣中获利，还利用买办职务之便，与上海义泰兴煤号合作，从事经销开滦煤炭的活动，从中获取30%的利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刘鸿生开始独立进行企业活动。

刘鸿生在上海创办企业的活动，开始于1918年。这一年，他

① 《上海商业名录》1922年版，第401页。

② 本表资料根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及吴承洛《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等著作。

买下了浦东南码头与建源码头之间的一小块空隙之地，修建了一座简陋的木结构码头，以便于扩大他与义泰兴合作的煤炭销售业务；同时，他又投资于上海华商柳江煤矿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他与义泰兴合作经销的大多是英商开滦煤矿的烟煤。但是，他向上海开滦矿务局隐瞒自己的独立活动。这就说明，刘鸿生企业从一开始就既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刘鸿生日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那时候我还很年青，虽然口袋中的钞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短短的买办生涯中，使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我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作点事。"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

刘鸿生从多年经销煤炭的实践中知道，要进一步在上海发展企业，就必须有自己的码头、堆栈，必须在浦江沿岸争一席之地。1919年，他把原有的简易木码头抵押给银行，委托売件洋行作中间商购买英商裕丰码头，创建了义泰兴董家渡北栈；1921年底又一次以北栈作抵向银行贷款，买进怡和洋行浦东沿浦空地以及亚细亚火油公司沿浦空地，共182亩，建立了义泰兴董家渡码头南栈。1924年，为了适应煤号营业发展，又租下浦东白莲泾北首沿浦，原属公记码头土地105亩，当年10月建立了义泰兴白莲泾栈；1923年，上海水泥公司龙华水泥厂开工以后，深感生料、水泥运输不便，买进了周家渡沿浦江土地250余亩，修建水泥专用码头，耗资32万元。这些设施不仅为刘氏企业节省了大笔运输、堆栈费用，而且由于刘氏堆栈、码头向华商开放使用，既利于减轻华商对洋栈、洋码头的依赖，又可赚取大笔租金。

1920年是刘鸿生企业全面推进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元旦，他在上海江西路61号设立了鸿生火柴厂筹备处，农历十月，鸿生火

① 《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柴公司在二洋泾桥四川路3号正式开幕，日后，它为刘鸿生博得了"火柴大王"的头衔。同年，他参与发起上海水泥公司筹建工作并担任董事，1922年出任总经理。当时，怡和洋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英商水泥的销售，它企图以委托刘鸿生包销英商水泥为诱饵，让刘鸿生放弃办厂自制水泥的计划，刘鸿生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加速了龙华水泥厂的建设。当上海水泥公司资金不足之时，刘鸿生就将义泰兴北栈向上海安康、志裕钱庄作抵押贷款，同时，他又从四明银行、兴业银行、上海煤业银行取得了金融支持。1923年7月，在龙华沿黄浦江广1200英尺，占地210亩的土地上，一座钢筋水泥建筑的宏伟厂房落成了。它那巨大的烟囱，时称远东"独一无二之烟囱"。1923年8月上海水泥厂投产，当年年终产量已达19万桶。

1920年，刘鸿生开办的企业还有福泰煤号。这是他直接投资于煤炭经销的第一家企业，地址在上海王家码头。刘鸿生与义泰兴合作以及开办福泰号经销煤炭的秘密，在1924年终于为开滦矿务局觉察，尽管开滦矿务局想加以干涉，但是，刘鸿生企业集团此时已羽翼丰满，他与上海华商用煤大客户都已建立了密切关系，因而矿务局又不能公开翻脸，于是它提出了开办上海开滦煤售品处，要刘鸿生参加。刘鸿生一边与矿务局合作，以10万元资本参加售品处的营业，占了1/4的股权；一边又独立地开办了元泰煤号(1925年)、东京煤公司(1926年)。为了充分利用各栈大量煤粉，(在当时条件下，除了将部份煤粉销售给水泥厂供转炉使用，大部分煤粉还无法利用。)他把在日本观光时学到的制造煤球的技术引进了上海，于1926年2月筹建了中华煤球公司，开创了以煤粉和粘土制成煤球供市民应用之先河。

1925至1927年，刘鸿生企业又有了新的发展。1925年，他盘购了燮昌火柴公司上海、苏州两厂；1926年增资10万元，将元泰煤号改组为元泰股份有限公司；同年，鸿生火柴厂也增资50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27年又开始筹建大华保险公司。

第十八章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一、《新青年》与新文化

辛亥革命，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缺少系统的深刻的批判，辛亥以后，沉渣重新泛起。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知识份子的坚决反对。上海是封建主义思想泛滥的重要基地，也是进步人们奋起还击的重要战场。新旧思想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充当进步思想文化号角的是《新青年》。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于 1915 年，创办人陈独秀。"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参预"二次革命"遭到通缉，亡命上海，旋逃亡日本，1915 年回到上海。他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为同乡，因此常到书店去。一向重视报刊宣传作用的陈独秀向汪孟邹提议，出一本杂志，认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①。汪孟邹感到力不从心，将他介绍给另二位安徽同乡，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欣然同意。1915 年 7月，出版杂志谈妥，定名为《青年杂志》，同年 9 月 15 日正式出版。《青年杂志》为月刊，陈独秀任主编。在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新青年》就这样诞生了。

《青年杂志》问世后，群益书社收到了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32页。

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建议将《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陈独秀表示赞同。于是，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起初，《新青年》编辑、出版均在上海，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随之北迁，但仍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旋获释，随即辞去北大教职重返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返上海。参加《新青年》撰稿的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吴虞、易白沙、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

《新青年》一问世，就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弥漫于思想界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青年杂志》创刊宣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便宣称，科学与人权，如舟车之有两轮，不可偏废，“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即后来所说的民主。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很快流行开来，民主被称为德先生(Democracy)，科学被称为赛先生(Science)。《新青年》认为，西洋人所以能由黑暗走向光明，就是因为有德、赛二先生，“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等人，就是以这种无所畏惧的气概，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的。

《新青年》向专制主义发起了猛攻。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等文指出：民主政体代替君主政体，自由代替专制，是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既然已经无法闭关自守，也就无法摆脱这一规律的制约。《新青年》的作者们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真正实现充满了信心，认为民国以来，中国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这并不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实行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专制主义思想没有肃清，存在着与

民主政治不相一致的旧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取代清朝专制是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即使民主政治今后还可能被新的什么制度取代，但可以料定，这个制度一定比代议政治更能沟通民情，而决不会倒退回专制政治。

怎样才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呢？陈独秀等人认为，最关键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觉悟。陈独秀说：

>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①

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窒息了中国人民的民主精神，造成了自卑、服从、懦弱等国民劣根性，形成了利于专制统治而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文化土壤。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中都有一些有识之士如陈天华、严复、梁启超等见及于此，认为不进行广泛而持久的民主启蒙就不能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只要推翻清朝，建立民主政权，制订民主宪法，民主政治就能实现。辛亥以后的现实证明，民主政治的建立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得多，人民的民主意识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远比其他因素重要得多。陈独秀等人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增强人民民主意识的问题，也就是鲁迅后来屡次谈论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从这个思想出发，陈独秀等人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扫除一切

---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仰赖政府、希冀贤人的不符合民主精神的错误观念，那种日日仰望善良政府出现、仰望贤人政治到来的想法，“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他们相当深刻地指出：“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①

《新青年》迎头痛击了正在泛起的尊孔复古思潮。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均点名批评了孔子及孔子之道，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揭示了封建时代精神偶像孔子与历代政治偶像皇帝之间的联系，说明了孔学在封建时代被权贵们吹捧的实质。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一卷六号和二卷一号上，发表《孔子平议》上下二篇，首开这一时期点名批判孔子的先例。文章指出，孔学在春秋之世，号称显学，但不过是九家之一，并不独尊，只是从汉高祖开始，孔子才“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逐渐被抬举起来。汉武帝为了蔽塞天下之聪明才智，搞文化专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以后历代帝王皆以孔子为傀儡，搞“滑稽尊孔”，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历代帝王为什么要捧孔子而不是捧别的什么人呢？易白沙认为，这是因为孔子思想中具有与别人不同的几个特点：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易白沙将历史上孔子其人其学与后世帝王涂饰过的孔子加以区别，并从孔学自身内容与封建专制主义内在联系的角度，对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尊孔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进行了分析，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很强的说服力。1916年9月，康有为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并以孔孟伦理为立国精神。这是典型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对此，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文章多篇，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陈独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时代不同了，孔子那一套在当代中国绝对行不通，“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这一切，与今日之社会均格格不入，“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① 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共和势不两立，孔子思想决不能适应现代中国，所谓祀孔主张，“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荒谬绝伦；所谓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一是违背现代实际，二是违反思想自由原则，三是违反宗教信仰自由原则。陈独秀一语中的地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②，在民国提倡尊孔，只会导致帝制复辟。

在批判孔子之道时，《新青年》的作者们特别注意批判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完全违背了自由、平等、独立的原则，与民主共和精神“绝对不可相容”。陈独秀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这么一来，天下所有人，或为臣，或为子，或为妻，无一能逃此网罗，“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由三纲而派生出来的各种“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②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①。这就从自由民主的思想出发，全面地否定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封建伦理道德与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系起来，作为三位一体的东西加以考察，认为家族制度是君主专制的基础，封建伦理道德是维护这两者的精神支柱，“孝”于家长是“忠”于君主的基础，忠于君是孝于父的推广。他写道：

> 详考孔氏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其于销弭犯上作乱之方法，惟特孝弟以收其成功。②

吴虞尖锐指出，封建伦理道德中“孝弟”二字，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儒家主张孝弟，其目的是“专为君亲长上而设，但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弒夺之祸”，这从根本上来说是违反人道的，侵犯了臣子卑幼者的人格之权，“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③。鲁迅在著名的《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抨击封建“仁义道德”的实质都是“吃人”。吴虞非常赞赏鲁迅的看法，特写《吃人与礼教》一文。他说：“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④。

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时，《新青年》的作者们十分注意批判封建的节烈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胡适的《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文，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鲁迅认

---

①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②③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为，封建的节烈观念，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一不道德，二不平等，是压迫妇女的枷锁，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均有害无益。他还把封建节烈观与封建的忠君思想联起来，认为社会越是到"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越是提倡节烈，"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一语道破了守节与忠君的内在联系。胡适的文章是由当时两件所谓"守节"事情激发的。第一件，1918年，某地一唐姓妇女在丈夫死后九十八天内，不顾他人劝阻，先后采取投水、绝食、服砒霜等方法九次寻死殉夫，终于自杀成功。事发后，北京《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个名叫朱尔迈的人写的《会葬唐烈妇记》，高度称颂唐氏殉夫行为。文中又以某地一俞氏女的事情作为陪衬。俞氏女十九岁，因未婚夫病亡，绝食七日，欲以死殉夫，经家人苦劝后始进食，但仍表示寻机自杀，即使服丧三年后，也要以死"归报地下"。朱尔迈的文章一面称赞唐氏之行，一面为俞氏担忧，说是"俞氏女果能死于绝食七日之内，岂不幸甚！"现在活下来了，如果以后没有自杀机会，怎么办呢？文章祈祝唐烈妇的阴魂能够帮助俞氏女，使其自杀成功，"以成其节。风化所关，猗欤盛矣"。第二件，也是发生在1918年，上海一个名叫陈宛珍的17岁女子，因未婚夫突然病夭，遂潜自仰药而死，距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这本是一件惨事，谁知上海县知事却据此呈报江苏省长，要求予以褒扬。耳闻这两件事，胡适非常气愤，写了《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上。文章发表后，一位名叫蓝志先的人对文中一些观点提出责难，胡适又写了《论贞操问题》等作答。胡适在文章中尖锐批评朱尔迈的那种议论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他仔细辨析了现代人爱情专一与封建守节观念的区别，指出封建节烈观是束缚广大妇女的紧箍，是残害无数妇女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他说："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

女，罪等于故意杀人”。① 胡适认为，不但要坚决反对殉夫惨剧，而且应允许寡妇再嫁，对于那些与已故丈夫本无恩义、年纪又轻、家道又苦的女子，更应劝她改嫁，“为个人计，为社会计，为人道计，都该劝她改嫁”。他认为那种一味要求妇女为丈夫守节的观念，只是“忍心害理，男子专制的贞操论”。胡适从资产阶级平等思想出发，提出了与封建贞操观相对立的新的贞操观。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贞操观是压迫女子、放纵男子的极不平等的道德观念：

> 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分。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②

胡适指出，要讲贞操，就应该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胡适提出的这种贞操观，是五四时期民主思想在贞操问题上的反映。

批判孔子之道是为了解放思想。《新青年》的作者们在批判孔子之道时，鲜明地提出了破除偶像的问题。陈独秀在著名的《偶像破坏论》中提出：“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阿弥陀佛是偶像，耶和华上帝是偶像，玉皇大帝是偶像，一切宗教家所尊崇的神佛仙鬼都是偶像；君主是偶像，节孝牌坊也是偶像……，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应该破坏！他以讥讽的笔调形容偶像：“一声

---

① 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

② 同上。

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是无用"①。综合陈独秀对偶像所下的定义，至少有这么三个要素：一、无用；二、受人敬重；三、骗人或害人。可见他并不是要破除一切信仰，而只是破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阻碍社会进步的僵死的封建经典和封建迷信。在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号召青年们，冲破网罗，解放思想，自主而不屈服，进取而不退隐，进步而不保守，讲究实用，摈弃虚文，敢于怀疑那些被人奉为天经地义而不切实用的陈腐教条，用理性和科学来衡量一切，"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②。这种不崇拜任何偶像，不迷信任何经典和权威，自信、求实、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当时在黑暗中苦闷、悲观的青年，呼唤了思想解放高潮的到来。在这种思想解放汹涌浪潮的冲击下，什么圣经贤传，什么金科玉律，什么伪君子，假道学，旧风俗，旧习惯，全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一一被押到被告席上剥去画皮。诚如鲁迅所说："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③。这强烈地刺激了国民的觉醒，在中华民族进步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独秀、胡适等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他们认为，时代在前进发展变化，文学也要发展变化，要表现新思想、新事物，就需要新的文学；要使新思想为最大多数人所能接受，而不是为少数文人所私有，就必须提倡白话文。他们举起文学革命大旗，主张推倒雕

①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③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六页。

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字革命，胡适倡之于前，陈独秀响应而发展之于后，一时风行草偃，对知识界影响极大。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被认为是开时代之先河的新作品。《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身体力行，还写出了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旧时代不同的新鲜活泼的白话文、白话诗。他们并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汉字问题。

从1918年10月起，《新青年》开始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这时其主要阵地已从上海移到北京，故不具论。

在《新青年》宣传的民主思想的激荡下，上海美术界也向封建顽固思想发起了攻击，发生了著名的“模特儿事件”。1917年，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美术专科学校）师生冲破重重阻力，采用西欧美术界早已风行的人体模特儿写生。在这年的成绩展览会上，他们赫然把人体习作素描陈列出来。消息传出，震动一时，参观者初见那一丝不挂的裸体画，莫不瞠目结舌，议论纷纷。一般封建守旧之人，更是群起攻击。有位校长惊骇得不能自恃，破口大骂此事倡导者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蟊贼，太伤风败俗了”。两年后，一位名叫饶桂举的美专学生回家乡江西南昌举办绘画展览会，内有几张人体素描，又引起轩然大波。江西警察厅勒令展览会关闭。禁令中竟然写道：“裸体画系学校诱雇穷汉苦妇，勒逼赤身露体，供男女学生写真者。在学校方面，则忍心害理，有乖人道；在模特儿方面，则含苦忍羞；在社会方面，则有伤风化，较淫戏淫书为尤甚……不谓上海美专画妖刘海粟、江小鹣辈孽徒……公然提倡淫风，言之痛心”。不久，江苏教育会通过了禁止模特儿的提案。同时，报上出现了一系列攻击刘海粟的文章。一位上海议员在文章

中写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刘海粟提倡模特儿，足以丧失本性之羞耻，引起肉欲之冲动……，成何体统？成何世界？成何人类？”要求严惩始作俑者刘海粟。刘海粟写信申辩，谓艺术上的人体写生与黄色的裸体画是两码事，不能同日而语，要画人，就必须“审察人体之构造，生动之历程，精神之体相”，非进行模特儿写生不可。无奈风气未开，模特儿仍不能为当时上海舆论所容。直到20年代中期，孙传芳占据上海时，这一斗争还在继续。

孙传芳到上海时，听说模特儿事件。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问上海知县危道丰“什么叫模特儿”，危答：“模特儿就是赤屁股的姑娘！”孙传芳听后好久说不出话来，授权危去办理。此前，危已下过“严禁美专裸体画”的命令，刘海粟不屈服，并在报上驳斥危“出言无稽，谬妄不伦，腾笑万邦”，还指斥危“不学无术，招摇撞骗”。此时危道丰又玩弄花招，伪造“刘海粟启事”，迫使刘就范。刘坚持己见，表示“刀锯鼎镬，所不敢辞”，并致书孙传芳，再三强调模特儿“为艺术之必需，为美专绘画实习之必要”。但是，刘海粟有理终敌不过孙传芳有权。孙下令通缉刘海粟。在法庭上，刘海粟据理力争，认为所谓“败坏风化”的罪名无法成立。最后，法院以刘海粟曾在报上指斥知县危道丰“不学无术，招摇撞骗”为辞，以所谓侮辱政府命官人格的“罪名”，罚款50大洋了结①。

这场纷争，实际包含这么两层意思，一是练习绘画基本功是否可以进行人体素描，二是裸体艺术是否就是“提倡淫风”，核心是后者。世俗不理解绘画要练人体素描的道理，那是无知的表现；认为裸体艺术就是“有伤风化”、“提倡淫风”，则是封建禁欲主义在作祟。我们知道，在欧洲，古希腊裸体艺术曾盛行一时，到中世纪，封建禁欲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裸体艺术几乎绝迹，到文艺复兴时期，

① 商一仁：《刘海粟与人体模特儿写生》，《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6辑。

资产阶级提出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禁欲主义，裸体艺术被视为最能表达这种思想的理想形式，从而风靡欧洲。刘海粟倡导人体素描，这是他取法欧洲画法的表现，而把这种裸体画展览出来，并与顽固守旧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不单是绘画的艺术问题，而是寓有冲破封建禁欲主义禁锢的深意。

二、“五四”以前上海工人阶级状况

上海是中国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据估计，1894 年上海有产业工人 36220 人，占全国工业工人总数的 47%①；1910 年，上海有工人 78151 人(含崇明)，占全国总数的 31.7%②；1919 年，上海有工人 514068 人(以 1920 年数字代替)，占全国工人总数 26.4%。

上海工人出现的时间也最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外资船舶修造业中，他们就已产生了，1865 年，上海外资船厂的中国工人已有 600—700 人。与整个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一样，上海工人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种势力的压迫和剥削。

他们工资低。19 世纪 70—90 年代，无论是外商工厂还是中国工厂，诸如祥生船厂、耶松船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燮昌火柴厂，工人工资一般都是每天 200—300 文(当时银元每元合1080文)。以后，工资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1905 年前后，上海纺织工人平均日薪为二角四分，木工、铁工日薪为七角三分，厨师月薪为 15 至18 元③。童工工资更低，通常是成年工的一半或 2/3。这些工资，相当于英国同类工人的 1/4 到 1/6。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 1202 页。

② 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 1184—1192 页统计数字计算。

③ 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 1225—1230 页统计数字推算。

他们工作时间长。1894年以前，上海机器织布局、各缫丝厂工人每天工作11小时。1905年前后到1915年前后，上海工厂多为每天工作12小时，个别单位不同，如商务印书馆为每日9小时，翻砂业每日则长达15或16小时。许多纱厂不许因吃饭而停车，“工人们只是在最饿时才吃饭，一边看着织布机或者守着缫车或纱锭时，一边吃一两口饭”①。

工人们的劳动条件也很差。丝厂的缫丝间里，常年保持着高温，女工们终日将手浸在水里，手指常被烫伤、脱皮，脸被热气薰得发白，细弱的躯体，在冬天也常为汗水浸湿。

工人们除了遭受中外资本家的剥削，还要受到封建剥削。有的外商厂里，实行包身工制度，工人（主要是童工）由包工老板以包工契约的形式包来，一般3年为期，在此期间，生死疾病父母不得过问。包身工每日在老板的棍棒监督下劳动，完全没有人身自由。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的生活极其悲惨。1908年出版的一本日文书记载，当时上海工人，“就他们出入工厂的服装看来，（男工）穿着又破又脏的棉布衣服，戴着脏了的小帽，女工则围个红围巾，手中提着竹筐，里面放着两餐食物，在工厂所设的饮水处，以酱豆腐之类佐食，就算进餐了”②。1916年出版的《中国的大门》一书，更细致地记载了当时上海纱厂女工的困苦情形：

> 他们的家离工厂常常有好几英里，但是他们总是付不起一、两文钱去坐一辆手车。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年青的女工以每月两元五角的工资供养一个寡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她每天早晨四点钟便起身上纱厂，因为她步行到纱厂要花两个钟头。到下午六点钟她们日工交班后，还要步行两个钟头才到家。这个年轻的姑娘常常把月光当成破晓的曙色，在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06页。

② 《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1908年版，第十一辑，第448页，转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256—1257页。

半夜三点钟更早的时候便起身了。在天气好的时候，这种步行倒没有什么，只是在走到朝着同一方向的一群另一些纱厂工人一起以前觉得寂寞一些罢了。可是在冬季寒冷的日子，寒风刺骨，下着雨，道路非常泥泞时，步行是什么情况呢？对于缠足的妇女，对于穷得坐不起有五、六个人同座的手车的妇女，这种情形是最难堪的。远处走来一群人在浓雾中摸索前进。一个可怜的人终于走到了纱厂的大门，蹲坐在又冷又湿的地上，等候纱厂放汽笛。有人带着怜悯的口气问他："是不是从远处来的？"她费力地站起来，一半恐惧、一半反抗地说，"从虹口来的。"虹口离此地将近三英里。在她灰白的脸上浮起一个浅笑，但她累了，她是这样极端地困乏了，而在前面等着她的，却是十二个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的劳动。①

这里所以不避冗长地征引这么一段材料，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出当时工人的家庭负担、交通条件和疲惫情况。

在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工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抗斗争。1859年，为了反对西方海盗掠夺华工，上海码头工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史的第一页"②。1879年7月，耶松船厂丁金生等40名工人因工头剋扣工钱，进行罢工。9月，祥生船厂郑晋卿等10来名工人因外国监工无理殴打中国工人而罢工。1883年5月，江南制造局工人因反对厂方延长工作时间，结队去见总办，抗议厂方的这种行径，要求恢复原先工作时间，受到总办严重责罚并被驱散。1890年8月，江南制造局新任总办刘祺祥决定将工人每日工作8小时改为9小时，工人们罢工半天，以示反对。《北华捷报》记载：

---

① 格美薇：《中国的大门》(M.N.Gamewell: The Gateway to China)，1916年版，第223—224页，转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250页。

② 麦克里廉：《上海史话》(J.W.Maclellan: Story of Shanghai)1889年版，第46—47页，转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308页。

新任总办刘大人认为对所付工资而言，八小时工作太少，决定延长至九小时。工人们坚持不肯同意。大部分工人当然反对这种新办法，小部分虽愿(屈服)，也不敢明言。于是，到了新章实行的那天，锅炉里烧起了蒸汽，汽笛发出了鸣声，机器开动了，没有一个工人敢走进大门去工作。起初看来，这情况怕要坚持些时，因为双方不肯让步。但到了下午，工人们看着他们的行动不能影响局中的总办，总办很可能下令长期停工，便决定慎重从事，勉强同意了。①

甲午战争以前，上海工人的反抗斗争，虽有一些，较全国其他地方，反抗斗争的规模、次数也是比较多和大的，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零星的，联合的意识也不强。1895年以后，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加，工人素质的提高，上海工人反抗斗争的规模较前扩大，水平也较前有所提高。1898年11月7日，上海东唐家弄纶华丝厂，因亏耗而欲减女工工资二成，女工200人群起反对，结队到丝厂经理处抗议。外国巡捕应召赶到，用水龙驱散了抗议的工人。同年，虹口宝昌丝厂女工百余人亦因厂方剋扣工资而罢工抗议。1909年，新大丝厂、裕慎丝厂、勤昌丝厂；1910年元丰丝厂、瑞顺丝厂；1911年协和丝厂、宝和丝厂、晋昌丝厂、长纶丝厂、锦华丝厂、勤昌丝厂工人相继因工资问题举行罢工。罢工之外，工人们还采取破坏机器、消极怠工等方法表示反抗，有的工人甚至放火烧毁纱厂棉花。

从总体上看，五四以前，上海工人反抗斗争的次数日趋频繁。据统计，从1879到1894年，上海工人罢工次数为9次，1895到1913年为七十多次（同期全国工人罢工总次数为116次）；1914到1919年为85次（同期全国为一百余次）②。不但次数急速增多，而且在全国工人斗争中的比重日益加大。

---

① 《北华捷报》，1890年9月5日，转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250页。

② 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第93页。

在斗争中，上海工人逐渐出现了联合的趋向。1905年4月，杨树浦集成纱厂进行罢工。厂分南、北二分厂，南厂工人于4月23日罢工，厂方欲从北厂中抽调一半工人往南厂工作，以挫败工人的反抗斗争。南厂工人乃往北厂联络，北厂工人群起响应，相率罢工，“顷刻间，南北两厂共集二千余人，声势汹涌，将大引琴（擎）、机器、电灯、厂花棚等打毁，玻璃窗均遭击碎”①。1911年8月，晋昌、长纶、锦华、协和四家丝厂女工2000人举行同盟罢工，联合抗议厂方剋减工资、加添工作时间。1914年以后，同盟性的工人罢工更趋增多，1914年11月，上海锯木泥水等业工人“先后在二马路三鑫楼及鲁班殿会议，假同盟罢工，要求加给工价，并刊送传单，号召企业，愈集愈众，有数万人之多”②。1915年上海人力车夫联合罢工，有2万多人参加。1919年上海三新纱厂工人罢工，有8000多人参加。工人们在斗争中组织了类似工会的团体。1912年，徐企文组织了中华民国工党。1916年，由俄归来的侨工华荣，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华工农联合会”。1917年，商务印书馆职工杨昌元等发起组织了“集成同志会”。

在斗争中，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逐渐增强。1905年12月，公共租界英翰印书馆工人，因印书馆经理迫害承印抵制美约传单的工人而“大动公愤，全数罢工”③。在1911年的上海起义中，工人们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在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时，上海搬运工人、在日本企业中做工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

综上所述，随着历史的发展，上海工人队伍日渐扩大，工人反抗斗争次数日趋增多，斗争规模逐渐扩大，联合倾向日益明显，政治意识日趋增强。上海工人逐渐成长起来了。

---

① 《时报》，1905年4月30日。

② 中国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一〇〇一）二八〇四，转见彭明《五四运动史》第93页。

③ 《时报》，1905年12月5日。

当然，由于上海工人来源复杂，有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由于封建习俗的影响，这些工人以同乡关系结成各种地方帮会，这对工人运动产生了一些影响。这种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互通声气，联合斗争。1911年9月，分散在各个工厂的广东木工匠近1000人，因要求增加工资，联合进行罢工，几乎涉及了上海所有船厂。这种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上述这次罢工由广东木工发起后，宁波帮的木工非但不参加，反而以比广东木工低的工资，顶替罢工工人上班，使船厂工作继续进行，实际上帮了厂方的忙。1912年亦有类似情况。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工人阶级的成熟才逐渐消除。

三、从“五四”到“六三”

1919年4月下旬，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上海各界立即作出反应，纷纷通电抗议，呼吁举国一致“为外交之后援，助专使之勇气”、“据理力争”、“以挽主权”①。5月4日，北京各校3000多学生集会于天安门前，提出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斗争口号，游行队伍受阻后，更激起了愤怒，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反动政府捕去学生31人，激起北京学生以及全国各界的无比义愤，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上海人民投入五四运动，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19年5月6日——6月3日。声援北京学生；要求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收回青岛；掀起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1919年5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报道了北京学生爱国斗争，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爱国斗争的罪行。上海各界

① 《民国日报》1919年4月27日、29日、5月6日等。

立即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6、7两日之间，上海复旦大学、南洋公学等33所大中学校、上海日报公会、留日学生救国会、江苏教育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等纷纷通电全国要求立即释放爱国学生，拒签和约，惩办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但仍然宣称要听候法庭审讯。

5月7日，上海各界团体2万余人，在老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提出“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收回青岛”、“取消日本大借款”、“释放被捕学生”等政治要求。会后由南而北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向外滩原德国总会南北和会代表请愿，当队伍经法租界时遭到租界巡捕干涉阻拦，被迫分散，部分代表抵达外滩后向和会代表唐绍仪、朱启钤要求转达上海人民的意愿。

5月9日，上海学生以纪念“五·七”国耻日为号召，停课一日，四出宣传。同日，上海部份商店也宣告纪念国耻日停业一天，贴出了抵制日货，争回主权等等标语。

这时，又从北京传来了北洋政府加紧镇压爱国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愤而辞职的消息。上海教育界立即掀起了声援北京教育界对北洋军阀的斗争。5月11日，上海44所大中学校，在法租界霞飞路原寰球中国学生会内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12日，上海各团体各举代表一人，于法租界霞飞路220号，成立了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要求惩办以段祺瑞为首的卖国贼，“以清祸源”，电请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严斥日本无理要求，并“电法相、美总统及各国代表主持公道，誓达到保存国权目的。”这以后，在上海学生联合会、国民大会事务所的发动指导下，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各校学生组织了抵制日货劝告团、劝用国货会、演讲团，到全市各处宣传、演讲，拆除日商广告，调查市场上各商店日货情况，催促商界各团体讨论抵制日货办法。在学生爱国热情推动之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旅沪商帮协会于5月9日会议决定：提倡国货，不装运日本货，不使用日本钞票。19日又号召各

帮商号具结止进日货，对国货不要乘机抬价。上海颜料、棉花联合会、纱业、煤炭、麸业、西药业、糖业、北市绸缎业、木商、南货业、洋杂货海味业、腌腊业等几十个行业会所，都召集会议，作出抵制日货的种种具体办法。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时报》、《新闻报》等7家主要中文报纸发出停载日商广告、日本船期、汇市商情。钱业会馆宣告本市各钱庄拒绝收受日币。原设在上海的日商取引所（即交易所）吸收了不少华股，当1919年抵货运动之高潮时期，上海各业不仅相约不到该取引所参加交易，而且大多数华股宣告退股提款，转而积极支持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创办。“五四”期间，上海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经济侵略以一定的打击，民族工商业乘时而起，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抵货运动中，有少数资本家只顾一己私利，或偷运、偷售日货、或调换商标出售日货、或偷售货品给日商，这些行为很快遭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上海市民的痛责，学生、职工及各业商人纷纷组织救国十人团，到各商铺检查、销毁日货。其间，永安、先施等大公司一度主张仅仅停止进口日货，对已进的日货要售完为止，立即遭到各界反对，被迫宣布从5月22日起一律停售日货。

正当上海人民以抵制日货运动向日本侵略者开展斗争之际，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等人，背着总商会多数议董和会员，于5月9日发表通电（“佳电”），说：“青岛应由中日直接交涉归还”。与当时中国人民一致要求和会无条件归还青岛的正义呼声背道而驰，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佳电”发出后，立即遭到上海各界的严厉指责，虞洽卿等人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名义也立即通电全国，否认“佳电”代表上海商界意见，对“佳电”加以驳斥。上海人民于10日以后愤怒警告上海总商会，责令总商会议董对朱、沈等加以处置，责令朱、沈辞职，总商会议董立即召开会议，包括虞洽卿等在内的议董一方面对“佳电”持否定态度，但是对朱葆三等人又持宽容态度，甚至要以朱、沈假辞职的手段搪塞，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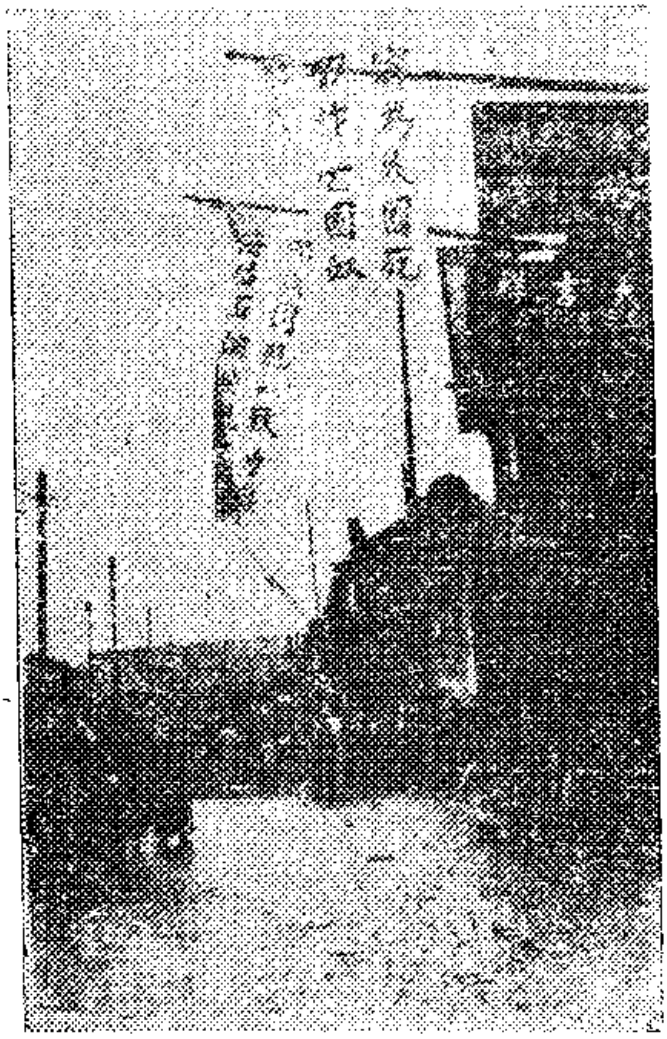
于13日发"元电",一方面宣告取消"佳电",一方面却不提朱、沈之错误,意在搪塞,立即遭到全市各界谴责。朱葆三、沈联芳还勾串一部分专营对日贸易的商人、勾结北洋军阀政府,企图蒙混过关,愤怒的学生于5月30日派代表至总商会及朱葆三住宅抗议、责问,终于迫使朱葆三、沈联芳辞职。

在与总商会的妥协倾向开展斗争的同时,京津学生代表方豪、王秉乾等来上海,揭露北京军阀镇压学生罪行,21日上海学生得悉北京学生于19日又遭军警迫害,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上海学生联合会立即动员上海大、中学校学生一体罢课。经过一番斗争,于26日上午10时,上海52所大、中学校学生2万余人,集会于老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会场上各校以校旗标明行列,整齐肃穆,齐声宣誓:"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宣誓完毕后,各校学生举着校旗,以严整的队列、坚实的步伐,绕原上海旧城示威游行一周,队伍"首尾经过,约二时之久",市民夹道观看者无不为之感动。各业工人纷纷响应,或组织救国十人团、或主动停工、或对本店、本厂资本家施加压力,促进他们一起行动。5月31日又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纪念爱国学生郭钦光受难的追悼大会,会后提出要求工商各界罢工、罢市。当时总商会态度暧昧、上海县商会接受了学生会的意见,召开三次会议,爱国归侨凌有光等在会上慷慨陈词,要求商界一体罢市。五四运动在上海正向着高潮——三罢斗争迈进。

(2)6月4日——6月12日,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

6月4日下午,上海商界各业店主人等几千人会集于南市上海县商会,准备作出全市罢市的决议。北洋军阀淞沪护军使派遣步兵三十八团第二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以"上海已发生二次义和团"为词,派马队到南市配合驱赶,上海县商会正副会长愤而辞职。就在此时,上海学生联合会接到北京"六·三"事件中,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于是上海学生立即行动,到全市各商店、工厂动员

罢市、罢工。



五四运动中的宝山路罢市

6月5日，上海三罢斗争全面展开。凌晨上海学生联合会派出大批学生，到南市逐一要求各店铺罢市，于是南市一带华商最早实行了罢市，9时左右罢市浪潮扩大到法租界，各商店纷纷闭户，店门上贴出“罢市请命”、“商学一致”、“挽救学生”、“罢市救国”等等标语，11时前后公共租界华人商店也一律罢市，南京路上先施、永安两大公司起初还在犹豫，到11时前后见南京路各华铺纷纷关门，亦宣布闭市，约到12时左右全市所有商店全部停止营业，华商各戏院、剧场、游乐场也都一律停止营业。小学生也一律罢课。学生、职工纷纷走上街头，发表演说，要求释放被捕爱国学生！外争国权！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内惩国贼！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时之间上海主要马路上人山人海异常拥挤，白旗飘扬，遍于全城，“租界各处，均有游街运动”。下午5时各界代表集会于宁波路卡尔登西菜馆，议决6日继续罢市，通电全国宣布“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并建立了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

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首先爆发于沪西曹家渡小沙渡一带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中午11时30分左右，汽笛长鸣，女工们愤怒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口号，约6000工人全体罢工，紧接着陆

家嘴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2万多工人关车出厂走上街头。在日商纱厂工人纷纷罢工的同时，上海码头工人、沪宁线、沪杭甬线铁路工人也发出通告，“一律停业，与学界一致行动”。工人罢工开始以后，马上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得到卢永祥支持，调军队到沪西、沪东一带，在各工厂门口贴出布告，禁止工人罢工。但是警棍、告示禁止不了工人斗争的决心，罢工斗争从5日开始以后冲破了军警的阻拦，迅速地发展，6日上海华商、英商、法商电车公司工人一致罢工，全市电车交通顿时瘫痪。6日宣告罢工的还有求新机器厂、英美烟厂、日商华章造纸厂、海关全体华人职工以及其他几家小厂的工人。到11日左右，上海罢工达到高潮，全市大小工厂，包括手工业工人、店员等总计10余万人投入了罢工斗争。尤其是沪宁、沪杭、淞沪三线铁路工人、上海海员工人、钢铁机器业工人的罢工，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上海工人阶级在罢工斗争中，忍受着饥饿、失业的威胁，顶住了军警的镇压，在他们的旗帜上写了“万众一心，罢工救国”的口号，上海10多万工人的大罢工，使上海交通停顿、水电危急、生产停顿，甚至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各种电讯设施也无法维持，正是全国和上海这种不可抗拒的巨大压力，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于6月10日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3)6月12日——7月初，上海人民拒签和约的斗争。

6月12日早上7时，上海各校学生、各界代表聚集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黄炎培等知名人士也赶到会场，庆祝初步胜利，简短的庆祝仪式以后，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体育场西北大门出发进行庆祝大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巨型横幅，上书“敬谢工商界，三国贼除，故请开市，”队伍所过之处各商店燃放爆竹、沿途夹道群众拍手欢呼，游行直到下午一时许才结束，这一天上海各商店全部开市。12日以后，上海各界继续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工人的罢工余波也时起时伏，斗争的目标是拒签和约。南京路、法大马路(今金陵东

路)、河南路等各主要街道的商店门口都挂出大幅白布,上面写着:"未经国民许可,签字誓不承认"、"万众一心,誓不签字"等等。21日午后2时,上海工商学报各界集会示威,坚决要求拒签和约,坚决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及其他一切密约。23日上海工商学报联合会发表宣言:"北京当局纵允签字,吾人誓不承认,并否认欧战中中日一切胁诱而成之密约。"27日,巴黎和会将于28日下午2时签字的消息传来,上海各界人民焦急万分奔走相告,当天下午几万人聚集公共体育场,"誓不签字!"的呼声如雷霆般传遍上海的上空,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等人在大会上大声疾呼,最后决定:(1)电巴黎专使:"务请抵死坚持(指拒签——引者),否则国人必有以待公等!"(2)通电各省,一致召开国民大会,共同奋起拒签和约。(3)发表宣言,誓不承认和约。(4)宣告抵制北京政府,宣告由段祺瑞操纵的"新国会"对内对外一切举动,不生效力。6月29日,7月1日,又多次在公共体育场聚集万人大会,一致否认巴黎和约。在中国举国人民怒视之下,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上海人民在五四运动中,和全国人民紧密团结,终于取得了胜利。

上海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学生青年发挥了先锋、桥梁的作用,他们四出宣传、发动,最早实行了罢课斗争,不断地推进着运动的发展。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他们宣传国货、检查各商店日货情况,督促各商店停售日货;在三罢斗争中,他们不但是最早的发起者,而且当资产阶级动摇之际,他们主动地加以监督;通过三罢斗争,不少学生来到了工厂,与工人群众共同战斗,从中第一次看到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他们之中不少先进分子开始走上了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五四"以后出现了不少工人补习学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着积极的作用。

上海新闻、出版、教育界,文艺界,在五四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上海的报刊杂志中,大多数成为运动中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上海妇女运动在"五四"期间最突出的是几万名女工投入了政治大罢工，显示了妇女运动的真正力量所在。当然在运动中知识界以及资产阶级中的妇女大多也投入了运动。

构成上海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力量是上海几十万工人，他们的罢工斗争不仅是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纪元，也是促使五四运动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五四期间，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经受了政治斗争的锻炼。

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不断地分化，它的上层之中，亲日的极右翼始终站在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一边，遭到上海人民的唾弃；另一部分亲英美的上层分子，一度也参加了运动，但是总是以各种方式干扰着、阻挠着运动的迅猛发展，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中，有一小部分人，始终与学生、工人共同斗争，尤其是一部分爱国华侨，在三罢斗争中也起着进步的作用，然而他们往往以避免暴力、要求以"有秩序"的斗争方式束缚着自己也束缚着群众的手脚。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特别是各中小商店业主，大多态度较为坚决，在三罢斗争前后还提出了拒纳捐税的口号，罢市斗争能坚持到12日，他们的作用也是应当承认的。

卢永祥、徐国梁、杨小川、沈宝昌等北洋军阀、官僚则始终充当着镇压人民斗争的凶手。他们派军警驱散人民的集会，强行"劝告"开市，滥捕工人、学生，宣布检查信件、书报，徐国梁甚至叫嚷这次运动是"二次义和团"，穷凶极恶地调动军警加以镇压，在运动高潮时期，他感到上海的警察在人民的感召下已不可靠，就向卢永祥提出调动北军进入市内，卢永祥当即调动三十八团交给徐国梁指挥。在上海工人罢工进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以后，卢永祥、杨小川之流也曾电请段祺瑞政府罢免曹、陆、章，目的则在于丢车保帅。五四运动以后，他们面对马列主义在上海广为传播，又进一步疯狂迫害进步报人，1919年6、7月之间，当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串通一气，提出所谓新闻出版法以后，租界当局尚在研究讨论之

际，华界的卢永祥、徐国梁却跑得比洋主子还快，立即宣布了华界的新闻出版法，卢永祥一再说上海出现了“过激党”，声嘶力竭地命令淞沪警察厅厉行出版法，传讯进步报人，封闭进步刊物，一再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进步报人，在妄想扑灭马列主义传播的大合唱中充当了最凶恶、最可耻的角色。

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在上海人民五四运动斗争过程中的态度，可以说是与他们在巴黎的表现、态度，呈现出同一的曲线，这条曲线的基调，就是无视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如果说他们在巴黎与上海的态度有什么不同的话，则在于租界当局认为上海租界是他们的统治之地，决不允许中国人民的斗争，干扰租界的秩序。美国公使芮恩施给上海总领事萨门司的电文说：对于上海人民的运动“既不要予以鼓励，亦不要加以反对”，“除非遇有非法和过分的行动”。这个电文可以代表美国的态度。要找到“非法”或“过分”行动的借口是极容易的事，实际上在上海商团、巡警镇压人民运动的罪行中也不乏美国人的踪迹。然而，由美日矛盾所决定，美国不仅希望在运动中从经济上挤垮日本，发展美国的经济势力，而且从政治上号召“欧美归国学生”不要放过“担当大任之机会”，希望借机培植亲英美的势力。

日本从驻沪领事有吉明一再向卢永祥等施加压力，促其“严重取缔”爱国运动，“勿稍放纵”，并且多次提请上海领事团“派兵出而弹压”，鼓吹以“高压手段扑灭罢工”等活动中。可见，他对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仇视心理，已是穷凶极恶的了。

英、法两国实际主宰着上海租界，他们无视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允许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扰乱了租界的“秩序”。他们在南京路、福州路、带钩桥等地武装镇压上海工人、学生，多次制造血案。“六三”以后，租界当局既害怕上海人民反帝浪潮日益高涨，更仇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上海传播。6月22日，法国驻沪总领事韦尔登，首先发布“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宣称

"无论书籍、杂志、新闻纸及印刷文件，非预将底稿一份送法捕房及法总领事署，不能在外发行"；7月8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也发表了"印刷附律"提案，提交西人纳税会讨论，于10日通过，企图以之禁阻马列主义的宣传。与此同时租界当局多次迫害《民国日报》、《救亡日报》、《学联日报》等报社主笔叶楚伧等人；在三罢斗争高潮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借口"有害治安"强迫上海学生联合会事务所搬出公共租界，刚搬到法租界又于11日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取缔。7月3日法租界当局又封禁了上海国民大会的办事处①。

总之，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具有独特的开创性的地位。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第一次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传播，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首先在上海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斗争，在上海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它们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的曙光已从上海升起。

四、中国共产党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下，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建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和愿望。从1920年开始，他们进行了建党的筹备工作。

1920年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分别在上海与北京进行建党筹备工作。恰在这时，由于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共产国际决定派人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中国，随同前来的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Кузнецова）、秘书马马耶夫（Мамаев）及其夫人萨赫

① 以上资料引自《五四运动在上海》等书。

雅诺娃(Сахбянова)，还有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4月，他们到达北京，与李大钊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去见陈独秀。

陈独秀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主编《新青年》杂志。他热情地接待了魏金斯基一行。他们畅谈了建党问题，一致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决定立即进行发起建党工作。

当时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组织的《星期评论》社，参加者还有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刘大白、沈仲九等，三是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后两支力量后来发生了分化，但当时都支持五四运动，都讲社会主义，都被时人视为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经陈独秀介绍，魏金斯基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他们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经常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参加讨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戴季陶、张东荪等。魏金斯基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赞成者于1920年8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参加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先后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英、李达、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李启汉、刘伯垂等。陈独秀被选为书记。这些人有的留在上海，有的分散到广州、武汉及日本、欧洲等处进行发起工作。上海发起组通讯处设在法租界大自鸣钟《新青年》发行部。1920年12月，魏金斯基离开上海去广州，陈独秀亦应邀赴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上海发起组相继由李汉俊、李达代理书记。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各项活动。他们把《新青年》改组为自己的机关刊物，系统地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

苏俄革命的文章。从1920年9月到1921年7月，《新青年》共刊载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长篇文章7篇，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20多篇。从第八卷一号起，《新青年》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与此同时，《新青年》开展了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名为社会主义，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批判，开展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办了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重点宣传关于共产党的知识、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经验和列宁的重要著作。他们通过在《民国日报》工作的邵力子，把该报副刊《觉悟》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他们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诸如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考茨基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发起组在1920年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包括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个部分，提出了消灭剥削制度、废除资产阶级政权、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宣言原件为俄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发起组内部以此作为接纳党员的标准，起着临时党纲的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在渔阳里6号举办了一个共产主义干部培训班，对外公开挂的牌子是“外国语学社”。学员多是全国各地革命团体选送的，如1920年暑假，肖劲光、任弼时等就是由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这里学习的。学员多时约60人，少时约30人，学习的内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和外语。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他与魏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讲授俄文，袁振英、沈雁冰教英文，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其中以俄文为主。1921年春，这个培训班先后选派20多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内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汪寿华、彭述之等。这个外国语学社于1921年冬结束，学员除赴苏联留学外，其他都

分配到国内各地工作。在创办外国语学社的同时，上海发起组委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俞秀松任书记，机关便设在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的很多学员都被发展为青年团团员，计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梁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发出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接着，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天津、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加强了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面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袁振英、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均为撰稿人，同时设有《读者投稿》专栏，发表工人来稿。他们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向资本家作斗争。在他们的帮助下，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了筹备会，陈独秀等人以"参观者"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由陈独秀等人草拟的机器工会章程(草案)，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草拟的最早的工会章程。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近千人。这是上海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12月，又改组成立了印刷工会，会员1300多人。为了推动工人运动，上海发起组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负责。1921年5月1日，他们组织领导了"五一"纪念会。大会原定在法租界举行，遭到租界当局无理禁止，改在公共租界公共体育场召开，又遭破坏，最后在杨树浦与叉袋角两处分别举行了纪念会，两处共有一万几千人参加。工人开会纪念自己的节日，这在上海是第一次。

上海发起组还担负着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指导工作。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即写信给李大钊，要李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陈独秀还写信给济南王乐平，商讨

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王乐平是山东省议员，与王葸美是亲戚，由此，王葸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了党组织。陈独秀还指导了广州的建党工作。武汉党组织也是在上海发起组的推动下建立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先后委托李汉俊、刘伯垂从上海去武汉筹建党组织。李汉俊在1919年已与董必武相识，那时董必武刚从湖北到上海，与李汉俊比邻而居，李向董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被董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①。因此，李汉俊到武汉后，便把建党任务交给了董必武。旅日留学生中的共产党日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都是在上海入党后去日本的。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的陈公培是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赵世炎则是旅欧以前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上海不但是建党理论的宣传中心、党的干部培训中心，而且是全国建党工作的活动中心和事实上的指导中心。

随着建党各项准备工作的完善，正式成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Maring)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14日改住麦根路32号公寓。马林(1883—1942)，荷兰人，1920年8月被委任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3月从莫斯科启程来华。与马林同期到达上海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可尔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他们到上海后，即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加速了建党的进程。在马林等人的建议下，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进行了商量。他们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

---

① 《一大前后》，二，第292页。

1921年7月23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除陈公博住大东旅社，其余代表均住在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这个住所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她与博文女校校长相识，博文女校离开会地点较近，又值暑假，师生多不在校，比较清静。是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日本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共计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陈独秀、李大钊因忙于所在单位公务未能来沪出席会议。大会会址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楼上为李书城夫妇卧室，楼下为客堂，会议即在客堂举行。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陈未出席，临时推举张国焘主持，由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马林、尼可尔斯基致词祝贺，由李汉俊、刘仁静翻译。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7月24日至30日又举行过五次会议，25日、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30日晚上8点多钟，第六次会议刚开不久，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会场，说是要找“社联的王主席”。这引起了代表们的警惕，当即决定休会，分别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搜查了会场，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告诉巡捕，说是请了一些大学教授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巡捕无所获，说是希望你们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予政治活动，随即离去。当晚12时左右，代表们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与李达的寓所里聚会（陈当时不在上海，陈夫人高君曼与李达夫妇住在里面），决定转移会场。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转移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续会，众人同意。第二天，代表们分头乘车来到嘉兴。马林、尼可尔斯基因系外国人，过于引人注目，未去。陈公

博亦因故未去。7月31日11时许，会议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下午6时闭幕，代表们当晚乘车返沪。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共15条，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和党的各级组织原则。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当时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出版书报刊物、建立工人补习学校以提高工人觉悟，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决议规定，中国共产党"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反对军阀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对于共产国际，党中央机关每月都应提出报告。大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由于党处于秘密状态，这个成立宣言后来没有公开发表。大会最后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这两副重担就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为挑起这两副担子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最后都没能摆脱失败的厄运。"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①。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49页。

第十九章　从军阀混战到“四·一二政变”

一、江浙战争

民国以后，北洋军阀篡夺了政权。北洋政府内帝国主义控制的各个派系互相争权夺利，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军阀割据和连年混战的极其黑暗的局面。

在军阀们的眼中，上海有着税收和鸦片的两宗巨大收入。上海税收之丰，全国无处可比；而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销售或在上海转口，使任何染指于上海庞大鸦片市场的人，转手可致千金。在军事上，上海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占有上海，就有了武装装备的重要保证。光这些就使大大小小的军阀都对上海垂涎不止了。

从行政区划说，上海应属江苏省管辖。但自袁世凯设立淞沪护军使以后，先后担任护军使的杨善德、卢永祥、何丰林都是皖系段祺瑞的人物。属于直系的江苏都督冯国璋权力不及上海。特别是在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由其部下何丰林补任淞沪护军使后，上海事实上成了浙江的附庸。在经济上，卢永祥从上海予取予夺，特别是与何丰林上下其手，大做鸦片生意，抽鸦片税以充军饷和满足私欲。这早就使冯国璋妒恨在心。齐燮元担任江苏督军以后，急欲将上海这块肥肉从卢永祥手中夺过去。江浙、直皖两系之间的磨擦，因上海而加剧，但因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而江浙两省的地方绅商为了“保境安民”，又硬逼着两省军民长官签订了《江浙

和平公约》，才使双方暂时没有爆发大战。

1923年，直系曹锟贿选总统，卢永祥通电指责，奉系、广州革命政府等南北反直势力的代表纷纷前往杭州，加紧筹划反直联盟。直系和卢永祥的矛盾顿时激化。这时，北京政府命孙传芳由赣入闽，孙军攻进福建后赶走了总抚王永泉，并与王部杨化昭和旧李厚基部臧致平大战。杨、臧苦战不敌，从闽南退到闽北，进入浙江境内。卢永祥接纳了两军，改编为己部。杨、臧两部本善于打硬仗，改编后还有1万余兵力。卢永祥的军力得以扩充壮大，浙江周围的苏、皖、闽、赣几省对此大起恐慌。以前闽、皖是暗助浙江，反对江苏的，但这时福建已入孙传芳之手，安徽张文生和齐燮元也已勾搭上手。四省相通，卢永祥已处于包围之中。齐燮元见下手时机已到，加紧调兵遣将，在曹锟、吴佩孚的支持鼓励下，1924年9月，借口卢永祥收容臧、杨两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第三条："……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宣布讨伐浙沪。酝酿已久的江浙战幕拉开了。

齐燮元方面的军队（亦称苏军），最初动用的兵力（包括各处要塞的军队）计有8万1千人①，分三路东进。第一路分三线进逼上海。中线由昆山、安亭前趋黄渡、南翔，然后沿沪宁线直取上海；左线由浏河、太仓捣吴淞之背；右线由安亭分兵下攻朱家角、青浦，斜插松江，切断浙沪之间的联系。第二路进驻宜兴周围的张渚、蜀山、乌溪等处。第三路由广德、泗安攻吴兴，断长兴退路，可直趋杭州。齐燮元亲自担任三路军总司令。孙传芳大部及赣军一部分则从浙西北捣浙江之后，配合齐军正面攻击。卢永祥和上海方面的军队包括各地要塞驻军共约9万1千人。由卢任总司令，也分三路。第一路以上海为据点，防守嘉定、黄渡、南翔、浏河、青浦等上

① 关于齐军和浙沪联军的参战兵力各种记载出入颇大，这里是根据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内的统计。

海外围据点，拱卫上海，这是浙沪联军的主力部队。第二路攻长兴，进而上逼宜兴、常州，断沪宁铁路扼制南京，另分兵迎拒广德来犯之敌。第三路驻守衢州、江山、龙游一带，扼守仙霞岭抵挡孙传芳及赣军从背后侵袭。

9月3日拂晓，齐军宫邦铎师挺进黄渡向浙沪联军前哨进攻，双方正式开火。4日，驻太仓齐军重兵猛攻浏河，卢军坚持不住，向罗店方向退去，臧致平急忙赶赴前线援救。5日，卢军拼力反攻，夺回浏河，赶走齐军。以后几天中，齐卢两军在浏河周围反复拉锯，数度对峙河流两岸，互相寻机决战，突破对方防线。

在4日齐军进攻浏河的同时，一部分齐军从太仓过陆渡桥突袭上海外围西北重镇——嘉定，嘉定守军寡不敌众，几难支持。卢方第一路军司令何丰林闻讯，慌忙命据守南翔的杨化昭前往援救。杨率3000精锐紧急驰援，与齐军交锋。齐军不敌，向后退去。杨部乘胜反击，分三路往攻娄塘、陆渡桥和外岗。5日，齐军还从赵屯进兵强攻白鹤港以逼青浦。卢军败退重固，齐军紧追不放，重炮猛轰重固，市镇几成一片焦土。6日，杨化昭在嘉定得胜后分兵援救重固。8日，齐军撤出重固。

几天中，齐军猛攻卢军阵地，卢军节节防守，强硬抵挡，并拼力组织反击。双方伤亡惨重。以后这段战区的战斗一时变得似乎很有规律："每天在拂晓时，照例由一方先来一排炮，然后对方接着还击，互相轰击，震耳欲聋，一直连续到十时左右，枪炮逐渐稀疏而至风平浪静……一直到下午天将黑时，又以上午同样方式互相轰击起来，直到夜里八、九时，又逐渐平静下来。"① 在战争的前半期，交战双方主要拉锯在浏河、嘉定、黄渡、白鹤港、青浦一线，都无重大进展。

炮火虽然在几十里之外，然而这时的上海城却早已陷入于一片混乱之中。如以往一样，每有战事发生，华界居民纷纷携儿带

① 马葆珩《齐卢之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

女、提箱挟被地涌向租界。连日间南市、闸北一带通向租界的道路，途为之塞。何丰林还将城南高昌庙一带划为军事区，将留下的穷苦百姓不管男女老幼一律强行朝外驱逐。齐卢之战的烽火延烧江浙大片土地，两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两省贫富见军队开来如遇虎狼下山，惊逃一空。两地大批难民也向上海涌来，其中以太湖周围各地难民最多。铁路受阻，他们便从水路赶逃上海，单从镇江换乘长江轮逃沪的"每日平均有一千二、三百名"①。上海人口拥挤，特别是租界内四方汇聚，人满为患。据称"本埠租界内加增之江浙两地难民总数将近五十万"②。

但逃居上海华界的难民并没有就此安然无恙。浙军和沪军在华界内拼命招工拉伕送往前线。原住华界的居民和逃来的难民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在9月3日开战这一天，浙军在闸北招工600余名，在南市城厢内外则大肆拉伕，"表面拉捉无业游民，然均拉强壮者……又闻前晚邑庙内亦有拉鸡三之举，亦系见强壮者方拉"③。这天在十六铺被拉去的小工有100余人。4日，西门拉伕300余人，闸北"拉得夫役千余名"④。浙、沪两军在上海拉伕极端残酷，他们看见身强力壮者就一拥而上，"以两人合一手铐拽之而去"，或者是"用绳连缚，驱登汽车。"这些苦工被直送北站，立即运往前线去为军阀卖命。华界居民和难民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点灯，人们看见士兵拔脚就跑。那些在租界内上工，家住华界的人甚至连家都不敢回，每天设法在租界内草草过夜。

战争使上海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华界首当其冲，陷入一片萧条之中。由于前方开仗和后方拉伕带来的动乱恐慌，南市各商店相继闭门停业，市面突然转为冷落。因受战事影响，许多工厂被迫陆续停工。据当时报纸的报道，"南北织袜厂有大小三

①② 1924年9月9日《申报》。

③ 1924年9月4日《申报》。

④ 1924年9月5日《申报》。

百余家，男女工人不下万人，现因战事发生，各厂都先后停工”①。江南造船所为全国著名的大型造船企业，但“因战争更换所长，不发工资，宣布停工”②。江浙战区内，工商凋零，农业经济破坏，加上对外交通阻塞，使得上海的原料来路切断，产品销售渠道也减少。作为连锁反应，上海工商业和民生不可避免地受到沉重的打击。上海城内外原有营造厂十余家，但“因砖瓦、石灰来源断绝，水木工匠出门恐遭拉伕，故都停工”③。上海本为江浙丝经的大宗销售市场，但战争一爆发，上海的丝市寥落到了极点：“最近一月中平日盛销之厂乾二经，成交不满百包，盖锡、湖产丝最盛之区域，均因时局不靖，锡厂停止工作，湖商不敢发丝与乡民摇经，加之交通中断，运输艰阻……丝交日趋清淡”。④在局势动荡、工商百业零落的情况下，上海洋厘急涨，银根奇紧，外埠汇划不通，金融衰颓，一些钱庄经不起市面的压力陆续倒闭。更可怕的是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因输入日少，而人口猛增，粮价天天在直线上升，且购买还十分困难。失业、贫困、动乱、恐慌、流离失所，百姓怨声载道。

在浏河、嘉定、黄渡、白鹤港、青浦等前线拼力相峙时，孙传芳部与赣军的一部分却顺利地突破了仙霞岭，迅速进入浙江境内。卢永祥本以为仙霞岭有险可恃，不料驻守仙霞岭的浙江边防副司令张国威投降孙传芳，并引兵开路。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孙军乘胜长驱直入，克庆元、龙泉，拔江山、常山，军下衢州，兵锋直指杭州。这时坐镇杭州的卢永祥慌了手脚，情知第三路军变化，浙江大势已去，不得不决定交出政权，让浙人自治，自己则移沪督师，集中军力于嘉兴和松沪一带，继续作战。9月18日，卢永祥偕浙江省省长张载阳仓皇离杭，抵沪后在龙华建立了总司令部。

① 1924年9月10日《民国日报》。
② 1924年10月10日《民国日报》。
③ 1924年10月6日《申报》。
④ 1924年10月9日《申报》。

原来相峙在前线的齐军乘势加紧发起强攻。但由于浙沪联军这时战线已大为缩短，兵力比较集中，齐军并未能立即得逞。

占领杭州后的孙传芳在稍事整顿后，即刻向松沪用兵。10月1日，孙军与据金山的齐军两面会攻松江。2日，石湖荡发生激战。7日孙、齐两军从叶榭乘木筏暗渡黄浦江，直扑松江火车站，并由得胜港进袭明星桥、新桥等处。卢永祥慌忙调兵援助。但松江城大军压境，情势十分严重。守城司令兼第三军司令王宾携眷逃往上海。8日，松江被攻下。松江为此次战区要地，又是上海外围的重镇，松江一失使卢永祥陷入险境。于是他急调各处部队强攻，以图收复松江。十日新任第三军司令何丰林亲自上阵督战强攻，还下令"军士后退者斩"。他与孙传芳部大战于明星桥，孙军败。11日，卢永祥下令分三路发起总攻，但总攻失败，卢军反而不得不退守莘庄以西的曹家庄。上海守军惊惶失措。当夜联军总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一些将领主张总司令下野。卢永祥眼见辖地大半已失，士气涣散，而皖、奉两系援军又远水难救近火。败局已定，他不得不召回前线的何丰林。第二天，卢、何通电下野，即东渡日本，一走了事。

9日，青浦因浙沪驻军退出而为齐军占领。12日，嘉定因守军抽援莘庄，城防软弱，被齐军乘虚攻入。卢、何出走后，南翔驻军向真如方向撤退。齐军一月余来重兵久战不下的南翔，15日竟不战而得。同日，浏河在海军的配合下，也被齐军攻克。

孙、齐两军源源开进原先浙沪联军的防地，援齐的直系鄂、皖部队也步步进逼上海。浙沪联军一路节节向后溃退。但来者也好，去者也好，沿途奸淫掳掠，大肆烧杀。在嘉定，联军退出后，"城内外苏兵云集，满街满巷，约近二万之众，傍晚即动手抢掠，各户均遭其厄，留家看守之人辄被刀枪逼勒财物"①。在南翔，"南北横街完全焚毁，只剩瓦砾之物。泰康桥附近火势仍盛，黑烟突突，横亘长

① 1924年10月17日《申报》。

空"①。在方泰,"全镇被劫一空,妇女被奸者达数十人,产妇及幼女亦莫能免"②。在大场,退兵索食索物,恃凶逞横,"乡民扶老携幼,纷纷向上海奔避,大多单衣赤手一物未携"③。在青浦,居民"无论贫富,概被搜查,即下而至于草舍茅屋亦多闯入,见有可食者食之,值钱者取之。其余家具笨重物件,不能携取者,即便毁坏或纵火焚烧"④。在黄渡,连遭兵匪劫掠,"按户索饷,绑票勒赎,不遂其愿,纵火焚屋……迈妇幼女,横被行强,灭绝人道"⑤。退兵拦劫回乡难民时,更不像话,不仅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一并攫去,而且还将"各难民所穿衣服一律剥下,甚至脚下鞋袜不论新旧,概令脱去"⑥,在吴淞,17日被兵匪抢劫,焚毁铺户房间计44户,76幢,平房40间,财物损失44200元。乱军还在镇上"按户收取人头税,每人三元,幼稚减半,无一幸免"⑦。

这次军阀战争前后虽然只一个多月,但对上海和江、浙两省人民来说,真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

二、五卅运动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改组了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二七惨案"⑧后由于受到反动

①③ 1924年10月17日《申报》。
② 1924年10月11日《申报》。
④ 1924年10月14日《申报》。
⑤ 1924年10月22日《申报》。
⑥ 1924年10月23日《申报》。
⑦ 1924年11月8日《申报》。
⑧ 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郑州、长辛店等地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杀死工人40余名,伤数百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政府摧残而转入低潮的工人运动重新兴起，农民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革命又逐渐走向新的高潮。

为了迎接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等20人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确定了有关的各项政策和应该采取的措施，明确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将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大会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民众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压迫。

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在全国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上海的工人斗争又大规模掀起，上海工人运动的如火如荼的发展和五卅事件的爆发，终于导致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发生。

早在1923年，共产党人邓中夏担任上海大学的校务长并聘请了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沈雁冰等党的领导同志和优秀干部以及一批进步的学术界人士担任学校的领导或教师，宣传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上海大学的学生既读书，接受书本教育，也参加社会工作，经受社会实践的锻炼。他们深入到工厂、学校、社会团体，接触群众，认识社会。1924年4月以后，上海大学还开办了平民夜校，吸收大批工人在业余时学文化，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提高他们的斗争觉悟。上海大学成了当时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和引导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以后上大毕业的许多学生如革命的种子散播各处，成为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坚强骨干和领导者，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党还先后派出了李立三、项英等前来上海和邓中夏等

一起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他们选择了沪西小沙渡这个工人集中、苦难深重的地区作为工作的重点。小沙渡是日商纱厂的集中地。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极端残酷。厂里分日夜两班，工人每天"六进六出"①，连续工作12个小时。每逢星期六，还得加"礼拜工"6小时。工人没有吃饭时间，吃饭时不得关车。上厕所也受到严格限制，须到工头处去领所谓"厕牌"。工人的工资被压得相当低，一般一个工人每天的收入只有三角钱，刚进厂的工人只有二角左右，甚至更少。但就是这么低的工资，还要遭到厂方和工头的种种克扣勒索。他们经常以拖延发放工资、用小洋铜元代替大洋、硬性规定工人将一部分工资存储厂内以及制定花样百出的罚款规定，对工人强行进行盘剥。工人还遭到了资本家和工头的野蛮侮辱。他们将工人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经常斥骂工人为"贱种"、"亡国奴"，并且拳打脚踢，任意摧残。工人下班时，每人都要受到厂方的抄身检查。日本工头还肆意调戏女工，如不顺从就以开除相威胁。

为了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并制止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利用封建把头从农村中用廉价骗来大批穷苦人家的小女孩，充当"养成工"。资本家利用她们去替代成年工人，乘机大量地开除有反抗精神的工人或拟借故开除工人。

对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这个地区的广大工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多年来，他们曾举行了许多次罢工。这是十分有利于开展革命运动的地区。党决定在原来的"小沙渡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一个更大规模的"沪西工友俱乐部"。

1924年秋，俱乐部正式成立。俱乐部推广学文化、举办生动活

---

① 日班每天上午6时进厂，下午6时出厂；夜班下午6时进厂，第二天凌晨6时离厂。

泼的演讲会、故事会、游艺会等等，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参加。从这里工人们对于什么叫“帝国主义者”有了认识，懂得了资本家为什么会发财，工人又为什么受饥挨冻的原因，并且明白了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改变自己处境的道理。

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展得相当快。到1925年2月，会员已近1000人，在19个工厂中还建立了俱乐部小组。在各小组中迅速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在一些工厂内建立了党的组织。经过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的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一批骨干力量，并有了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

1925年2月2日，内外棉八厂粗纱间的一个日本工头恶毒殴打一名女工，遭到了工人的纷纷指责，厂方乘机贴出布告将粗纱间50余名工人全部开除，以养成工来替代。此事引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怒，决定立即实行全厂罢工。

党非常重视八厂工人的罢工，决定利用有利形势，发动一次全市日商纱厂的同盟总罢工。为此还专门设立了罢工委员会。

9日下午，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工人蜂拥出厂。4个工厂的9000名工人渡过苏州河，一齐汇集到北岸潭子湾田野上举行了罢工集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刘华宣布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宣布组织工人纠察队，护卫自己。

第二天，罢工工人排着队伍高举着“反对东洋人打人”和“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的旗帜，浩浩荡荡地开到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十四厂门前，高呼口号，动员厂内工人一起参加罢工。厂内工人闻讯立即冲出厂门汇入罢工队伍中。在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的鼓舞下，这几个厂的养成工也不愿像奴隶一样地生活下去，毅然挺起腰杆加入罢工行列。日本资本家手中历来比较听话的“工具”、抵制罢工工人的后备军也起来反抗了。

12日，上海内外棉11个工厂的15000多名工人全部投入罢工。罢工怒火还在迅速蔓延。小沙渡周围的其他许多日商纱厂的

工人纷纷起来支援内外棉工人。沪东杨树浦的一些日商纱厂工人见沪西斗争蓬蓬勃勃，也先后举行罢工表示坚决支持。到18日止，上海已有22家日本纱厂的35000多名工人投入了罢工①。在罢工中，各厂工人同声抗议日本资本家的野蛮行为和残酷压迫，纷纷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条件，一致要求：1、不准打工人；2、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剋扣；3、发还储蓄金；4、加工资十分之一；5、罢工期间工资照发；6、不得无故辞退工人；7、释放被捕工人。②

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在上海引起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上海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捐款援助罢工工人。上海工商学各界40多个团体还组织了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宣传罢工意义，进行社会募捐活动。

罢工在经济上给了日商沉重的打击，据当时日本总领事给日本外相的函件称，罢工使各厂每日的损失总计约12000两③，而罢工的趋势还将迅速扩大到日商在上海的整个纺织业。其次，中国的反帝浪潮已经逐步开始高涨。罢工表面上看来是日本纱厂的劳资斗争，但很可能发展成为广泛的排日运动。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与工人进行复工谈判。

2月25日，在谈判中日本资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党考虑到这次罢工在经济上已狠狠地打击了日本资本家的利益，在政治上也打击了他们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威风，因此决定罢工工人按谈判协定复工。三月一日各厂全部复工，罢工胜利结束。

2月罢工使工人亲身感受到只有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才能迫使外国资本家让步，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困境。这次斗争锻炼了工

---

①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320页、第363页。

② 华岗《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第101页。

人队伍，增强了反帝信心，取得了斗争经验。2月罢工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紧密地和广大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了。工会的威信大大提高，工会会员大批增加。这些都为五卅反帝运动准备了条件。

4、5月间，上海市场棉价高涨，纱价跌落。日商纱厂资本家借口纱市不景气，撕毁2月协议，又开始剋扣工人工资，拖延发放工资的时间，打骂侮辱工人。为了打击工会和向工人反扑，日商纱厂联合会决定采取强硬态度开除"不良分子"，如工人进行罢工，则以关闭工厂来威胁。

在纱市清淡的情况下，罢工对工人不见得有利。为了对付资本家的挑衅，各工会决定用怠工方式作斗争。于是5月初，由内外棉三、四、八、十二、十五厂、同兴第一厂、日华第四厂等工人相继怠工，开始与资本家"软磨"。

工人的"磨洋工"使日本资本家难于应付，他们便开除工人。5月10日后，3天内工会活动分子被开除的达30多人。14日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被无故解雇，5名工人遭毒打并被当局逮捕。十二厂工人不堪忍受，愤而掀起罢工。十二厂的罢工影响了靠它供给棉纱的七厂的织布生产，资本家乘机宣布关闭七厂。

15日傍晚，七厂约600名夜班工人照样去上工。厂方将大门紧锁。共产党员、工会积极分子顾正红等高声呼喊"不发工资不回去"、"我们要上工"，率领大家破门冲进厂内。日本工头和职员见工人蜂拥而进，挥舞着木棒铁棍向工人狠狠打来。一些工人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等见工人们惨遭毒打，赶忙奔入物料间，每人拿了一根打梭棒，抵御敌人的攻击。正在这时，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手执武器带领一批打手赶到。工人们怒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不开工就要发工钱！"面对汹涌如潮的工人队伍，敌人下了毒手。川村首先向带领大家前进的顾正红恶狠狠地开了一枪，接着打手们蜂拥而上，用铁棍、刺刀猛打乱砍工人。顾

正红连中4枪，送医院后不幸牺牲。同时受伤者10余人，被捕3人。

顾正红的惨死激起了内外棉纱厂工人的无比愤慨。第二天，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的7000多工人一齐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罢工工人又在潭子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会后工人们走上街头，沉痛宣传顾正红的壮烈牺牲，动员更多的工人参加罢工。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通告，呼吁全国各界团体援助上海工人。上海的党组织一方面积极组织各厂工人开展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另一方面决定在5月24日在潭子湾举行盛大的顾正红追悼大会，动员各界人民支持工人斗争。

24日这一天，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1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挂着顾正红的遗像，白色帘幕后面停放着顾的灵柩，上面覆盖的白绸上写着"东洋人打死中国人"八个大字。会场四周挂满了各工会、各社会团体献送的挽联、挽幛。公祭大会由刘华主持，各界代表发表演讲，"为顾正红烈士报仇"，"誓死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口号响彻云霄。整个会场变成了悲壮、愤怒的海洋。追悼会既是一个控诉会，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反帝斗争动员会、宣誓会。一个参加追悼会的记者在《民国日报》上这样激动地写道："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集会，在上海我敢说是空前的。"①

对于革命人民的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当局也作了准备，凶相毕露地加紧了镇压活动。顾正红事件发生后，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出大批巡捕往沪西巡视，并从虹口抽调日本巡捕驻扎罢工工厂，以对付工人的冲击。他们逮捕并审讯七厂其余被枪伤的工人，逮捕上街宣传顾正红事件的工人，还将前往验尸所领取顾正红遗体的工人代表也拘送捕房。工部局总巡麦高云甚至狂妄地指令巡捕："当捕房官员认为情势足够严重，可以使用卡宾枪或左轮手枪而决定开

① 1925年6月26日《民国日报》。

枪时，应对准暴民中最有威胁性的一部分人射击……不得朝天开枪。”①

当社会各界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顾正红表示普遍的愤怒，特别是广大学生热情宣传惨案真相，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时，租界当局竟转而镇压学生。5月23日，文治大学学生会两名委员在上街为工人募捐时被巡捕逮捕。第二天，上海大学学生结队去参加顾正红的追悼会，在途经租界时，4名学生被巡捕捉去。租界当局竟以“扰乱治安”之名，定于30日由会审公廨审讯这6名学生。

帝国主义公然无理逮捕学生，更激起上海学界怒火。25日，上海大学、文治大学等校学生成群结队赶到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会审公廨置之不理。26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宣言，公开表示“我们为什么要受‘租界’内‘法律’的支配呢？”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努力于下列各种活动：1、废除不平等条约；2、收回租借地；3、取消领事裁判权；4、请日本资本家履行迁厂回国的宣言。”②

在这前后，上海租界当局还在进一步强化它的统治。早在4月底、5月初，工部局重新又捡起“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童工问题”4个提案，准备在6月2日的纳税人临时特别会议上再行开议。这4个提案以前曾因参加纳税人会议的法定人数不足而未获通过。这4个提案，特别是前3个，完全是为了加强殖民侵略统治，加紧控制中国人民而设的，如“增订印刷附律”规定租界内的一切印刷品，包括书报杂志、传单广告，乃至于一般油印品，在付印前必须要经过工部局的审查，否则就要受罚款处理。这样一来，在租界中的中国人就根本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了。

① 《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文件》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588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621页。

"增加码头捐"规定，码头捐从原来的按价抽1‰，提高到抽3%。中国商人负担因此加重，最终必然转嫁到大多数劳动人民身上。"交易所注册"规定中国人开办交易所要到工部局去注册登记。历来中外商人办交易所都到中国政府机关立案。这一规定，工部局侵犯了中国权力，中国商人则将受到束缚和勒索。这些压迫中国人民的提案不仅在社会上遭到了强烈反对，而且也直接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上海资产阶级也极力抵制。但租界当局不顾上海人民的激烈反对，随着开议时间的接近，反而紧锣密鼓地大肆宣传，并拉拢纳税人，准备在6月2日强行通过这4个提案。

在各界人民的反帝情绪越来越高涨的形势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分析形势，讨论斗争策略。会议认为，应该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伟大的民族斗争的高度上去，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上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在会审公廨非法审讯被捕学生的5月30日组织群众前往租界中心进行反帝大示威，向全市人民宣传顾正红的惨死和学生的无理被捕，同时抗议工部局的4个提案，坚决抵制它们的通过。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还决定通过由共产党掌握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派出宣传委员、学生代表、工人代表前往各校去召开学生大会，演讲宣传，积极动员爱国学生在5月30日勇敢地走上街头开展演讲、在租界中心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示威，向殖民统治发起坚决的冲击。

5月30日清晨起，各校学生怀着高昂的反帝激情，从四面八方陆续汇向公共租界中区。各校在出发前都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如上海大学把近400名的学生编为38个小组，同济大学学生结成4个中队，再分为16个小队。学生们一路演讲，一路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商店橱窗上、马路的电线杆上、来往车辆上到处都贴着反帝标语和传单。在一份《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大运

动宣言》中这样写道：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然而自从帝国主义强迫开埠以来，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吞声忍气的蜷伏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比十几国的奴隶还不如！

我们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犯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前驱！

我们希望全上海的中国人闻风起来！

我们希望全中国被压迫的四万万同胞闻风起来！①

在会审公廨大门口，大批学生等待着对6名被捕学生的审讯结果。学生们群情激昂，将这里变成了宣讲台。他们向广大市民揭露租界当局颠倒的法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枪杀工人有理，而中国学生在自己的国家中声援受难同胞反而有罪，横遭逮捕。学生们高呼口号，要求会审公廨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和工人，周围听讲者也纷纷大声疾呼："还被捕学生、工人自由！"

帝国主义一手控制的会审公廨对六名被捕学生进行了"审讯"，宣判对他们还押或交保100元暂释，但须随传随到，等候"特别审理"。这个决定激怒了公廨门前的学生和听讲市民，大家冲着公廨高呼："收回会审公廨""收回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

到下午，上海人民的反帝情绪达到了高潮，无数工人、职工加入了演讲行列。在公共租界内到处都可以看到反帝演讲队。这些演讲队边讲边前进，越来越向市中心南京路靠拢。不久，在南京路上，每隔十几家商店就有演讲队员在活动，行人被他们的演说和响亮的口号所吸引，都纷纷停住了脚步。商店中的许多伙计和顾客也都顾不得买卖，从店里跑向街头。有的跟着演讲人呼喊，有的为演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685页。

讲人鼓掌叫好。群众越聚越多，“轰轰的声浪，象狂风怒潮横扫南京路”①。

帝国主义的租界统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大规模的声势汹涌的示威。工部局慌忙出动大批巡捕驱赶演讲队，企图制止反帝宣传。但是演讲队员毫不畏惧，听讲者更是团团围起，赶也赶不走，止又止不住。

下午 2 点多钟，老闸捕房巡捕将 3 名演讲学生拘送捕房，不料这 3 名学生所在的整个演讲队的其余 15 名学生也一齐跟着踏进了捕房，提出如不释放 3 名学生，愿意一起坐牢。在老闸捕房附近的几个演讲队也先后被强行拘入捕房，在他们的后面簇拥着大批示威群众，跟着也一起踏进了捕房。当这些被捕者和示威群众走向捕房的时候，在人行道上，沿街商店的窗口和阳台上，挤满了人群，“他们有的挥着拳头，有的挥着手帕，有的挥着帽子”，向这些不畏强暴、奋勇向前的英勇战士致以敬礼②。

被捕者和簇拥着被捕者涌向老闸捕房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个个没有胆怯之色，而是斗志昂扬”③。老闸捕房一时竟人满为患。3 点多钟，租界当局不得不释放了拘押的 100 多名学生，但一部分学生仍关押在内。

被释放的学生拥在捕房前不走，一定要求释放所有的被捕者。附近一带聚汇的示威抗议群众愈来愈多。

3 时 45 分，英捕头埃弗森突然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在他身边的一列巡捕都举起枪来。子弹呼啸着飞来，站在前面的共产党员、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立即中弹倒下，他连连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共青团员、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肩部中弹，他踉跄地仍呼喊口号，巡捕又向他胸部连开三枪，他终于

---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 666 页。

② 同上书，第 667 页。

③ 同上书，第 678 页。

倒地。帝国主义者的枪击，打死了13名演讲队员和示威群众，而伤者难以计数。繁华的南京路上流淌着中国人民殷红的鲜血①。

南京路的血案震动了整个上海。帝国主义杀害顾正红的旧债未清，现在又犯下了大肆屠杀群众的滔天罪行。当天傍晚，沪西工友俱乐部立即召集各厂工会干部举行紧急会议，商量斗争办法。晚上，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分别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急电全国各界告知事件真相，呼吁紧急援助，另一方面继续上街演讲示威，斗争到底。这天晚上中共中央也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各阶层群众进行广泛的罢工、罢课、罢市，在上海造成巨大的革命声势，形成为强大的反帝运动，与帝国主义的屠杀作坚决斗争。会议还决定联合各工会公开成立统一的上海总工会。

第二天5月31日，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租界当局调来了万国商团，开来了炮车，还集中了许多消防水机。南京路、外滩一带巡捕马队来往奔跑，如临大敌。示威的学生、工人不顾生命的危险，冒着狂风暴雨继续进入租界进行演讲和散发传单。“打倒帝国主义！”“上海人民速起反抗外国人的残暴！”“罢市！罢工！罢岗！罢课！”的呼声夹着风声、雨声在上海大地上轰响。

这天晚上，在民族革命运动的急风骤雨中，上海总工会诞生了。总工会由李立三担任委员长，刘少奇担任总务科主任。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庄严地发表告上海全体工友书，号召全上海工人立即行动起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从6月2日起实行各业工人的全体总罢工。

这一天，学生、工人等继续上街活动。上午南京路上聚集了无数的示威群众。外国巡捕拼命地挥舞警棍，并用水龙狠狠地冲射队伍。9时许，在永安公司附近巡捕又向示威者开枪，当场打死两

① 今南京东路733号泰康食品商店附近，即当年被枪击者倒卧血泊之地。1985年纪念五卅运动60周年时，特在此立碑，以示纪念。

名群众。11时，在南京路上示威群众愤怒地用石子向巡捕掷去，外国巡捕丧心病狂地连续开枪，打死3人，并打伤许多名示威群众，造成了又一次骇人听闻的血案。

6月1日，一些外商企业的工人已陆续开始罢工。2日，日商内外棉厂工人全部罢工，英商怡和纱厂、杨树浦发电厂、工部局工程处和总铁厂以及英商电车公司等大型工厂和重要企业都纷纷罢工。3日租界内的外商工厂大部分工人都加入罢工行列，浦东英美烟厂的1万多工人也投入罢工。罢工规模越来越大。海员、码头工人、货栈工人、驳船工人先后进入罢工，外商的洋行、银行、报馆等的职员也纷纷参加罢工，连外人机关雇佣的佣人、厨师、汽车司机，甚至巡捕房的华捕激于义愤也加入罢工队伍。

同时，上海的学生坚决响应"三罢"号召，与工人紧相呼应，实行了总罢课。6月1日，上海大学、南洋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法政大学等高等学校和绝大多数中等学校的学生都宣布罢课。第二天，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中西女中等教会学校的学生，冲破重重阻挠也参加了罢课。圣约翰大学校长禁止学生参加爱国活动，以停办学校来威胁学生，学生毫不胆怯，决定从此不再回校。爱国师生，脱离了圣约翰大学，自行筹办光华大学，后以6月3日为建校之日。几天中，上海参加罢课的学生达5万名左右。

在强大的反帝怒潮中，商人也投入斗争，举行罢市。上海广大的商业职工坚决主张罢市。上海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出于对帝国主义血腥罪行的愤慨，并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愿意响应三罢。但上海市总商会控制在上层资产阶级的手中，他们对于与帝国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犹豫不决。5月31日下午，总商会开会，仍想请求政府进行外交交涉，不作罢市决定。总商会的摇摆使广大市民非常焦急，学生、工人、店员以及中、小商人源源不断地涌到河南路桥堍的总商会，一时竟集合了数千人。总商会被层层包围，只准进，不准出："不管是什么人，总而言之，罢市罢工不通过，谁都别想

出得去"①。在上海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反帝热潮的推动下，晚上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②终于签发了罢市通告，宣布上海商界于第二天实行罢市。

6月1日，公共租界内的公司、商店纷纷关门罢市，电车停驶，热闹的大街变得冷冷清清。公共租界那五光十色的繁华完全消失了，这沉沉死气使帝国主义者非常地忧虑，非常地害怕。

上海人民的罢工、罢课、罢市全面实现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热情空前高涨。为了巩固发展有利形势，党决定将五卅斗争迅速推向全国，让它成为全国人民的伟大的民族爱国运动，另外决定在"三罢"基础上立即成立上海工商学各界人民的反帝统一组织，以便公开地和更有力地与帝国主义租界统治作长期的斗争。

6月4日，在反帝高潮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联合会由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4个团体组成，它是在工人阶级联合下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小商、小手工业者）以及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上海反帝联合阵线组织。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6月7日发表宣言，郑重声明："我工商学各界，不惜罢工，罢市，罢课，而甘掷此巨大之牺牲，决非盲目之排外，盖深知其与上海市民之生存及中华民族之独立，均有重大之关系。"宣言庄严宣告："治外法权之取消，与租界市政之收回，实为本会抗争之重心。"在宣言中，工商学联合会并提出了17项交涉条件，作为上海人民反帝运动的具体纲领：

先决条件：

1．宣布取消戒严令；

2．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

① 《国闻周报》第九卷第21期心冷："五卅杂忆"。

② 当时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正在北京。

3．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4．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正式条件：

1．惩凶，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的凶手论抵。

2．赔偿（包括死伤者、罢工、罢市和学校被损害等四项）。

3．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声明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4．撤换公共租界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5．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

6．订立工人保护法，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不得因此次罢工而开除工人。

7．捕房应添设华捕头，各级巡捕，华人须占全额之半。

8．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和交易所领照案。

9．制止越界筑路。

10．收回会审公廨。

11．华人有担任工部局董事及纳税人代表之权。

12．取消领事裁判权。

13．永远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

帝国主义在上海疯狂屠杀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和上海人民掀起的空前规模的三罢斗争震动了全国。在北京、天津、青岛、大连、济南、唐山、开封、郑州、西安、成都等数十个大中城市中，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愤怒地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和抗议集会。这些城市中的学生和商人都踊跃进行了罢课、罢市，几乎所有由帝国主义者开办的工厂、矿山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6月19日以后，广州和香港的工人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使香港变成了一个“死港”。从上海点燃的斗争火炬，在全国形成了燎原之势。这是上海租界的统治者及南京路镇压示威群众的刽子

手所绝对没有想到的。

在上海，为了维护住租界统治和日益损失的巨大经济利益，外国侵略者一方面调兵遣将，继续残酷地镇压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另一方面开始玩弄阴谋手段加紧瓦解“三罢”。在这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上海的反帝阵营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在革命人民强烈声讨英、日帝国主义者开枪杀人的罪行时，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减少中国对美货的抵制以及抬高自己的地位，装扮成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主动提出由美、英、日、法、意和比利时6国组成一个“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来“调查”五卅事件。这个“调查”可以掩盖真相，缓和舆论指责，解脱租界当局的尴尬困境，因而得到了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赞成。6月10日，六国委员会成员开到上海，他们的根本宗旨是想通过“从宽处理”被捕学生，“撤退一部分陆战队”等一些微小的让步来换取上海人民停止“三罢”，停止反帝斗争。

北京政府和上海的上层资产阶级早都把希望寄托在外交谈判上。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北京政府派出了蔡廷干、曾宗鉴为特派员来上海解决沪案。到上海后，他们就公开声称：“余等所希望者，为缩小罢工罢市之范围，缩短罢工罢市之时间，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则风潮自易收缩，交涉自易解决。”①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是6月3日从北京返回上海的。到上海后，他秉承北京政府的意旨即向交涉署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② 总商会最初同意进行罢市，但事实上十分害怕“事态”扩大，因此又通告要商界“严守秩序”“静候解决”③。

当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时，曾邀请总商会参加，但总商会并不愿意和大众站在一起，相反却认为堂堂总商会，是上海民众

① 1925年6月9日《热血日报》。
② 1925年6月4日《申报》。
③ 1925年6月9日《申报》。

之首，因此拒绝加入这个群众性的联合组织。6月6日，工部局撇开工商学联合会，派人同虞洽卿单独商量五卅惨案的解决办法，这益发加重了总商会自以为高出于众，对五卅事件“应负全责”而单独处理的倾向。果然，在6月10日，总商会置工商学联合会于不顾，召集全体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一个处理五卅问题的独立机构“五卅委员会”。为了实施自己的主张，第二天“五卅委员会”不顾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先前已经提出的17条，另外单独拟订了一个13条的交涉条件，这个13条的大部分内容是和17条相近的，但对17条中的一些条件显然作了原则更改。如将17条中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解除巡捕、商团之武装”等条款一笔勾销，将“惩凶”、“赔偿”、“道歉”这些在17条中都有着具体内容的条款改成极为含糊或极为简单的语句。13条而且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否认工人阶级的权益的，它将原来规定的“订立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一点，完全删掉，易以“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这种不痛不痒的提法，明显地是对工人阶级利益和工人运动的出卖。总商会单独行动，另拟交涉条件，使上海的反帝阵线迅速出现了裂痕。

第二天，总商会就急急忙忙将13条送呈蔡廷干和曾宗鉴，蔡、曾又迫不及待地在13日一早就把13条送交上海领事团，报纸亦于同时发布了这个13条。

对于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变化，党曾告诫要提高警惕。当两特派员无视17条，不将其提交领事团交涉时，1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集了群众集会。大会通过宣言，重申17条的正义要求，坚决表示如不实现这些条件，决不停止斗争。这次大会再次显示了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坚定信心。当总商会的13条在报上公布以后，17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召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集中反对总商会以

13条来代替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条。大会通过宣言，坚决表示：

> 我工商学各界罢工罢市罢课，一致牺牲，乃为反抗帝国主义，以求民族之独立、自由、平等……我全体市民认为工商学联合会议决提出之十七条为最低交涉条件，绝对无退让之余地，对于总商会修改提出之条件是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以与帝国主义妥协，本大会万难承认。①

总商会独行其是，以13条来降低上海人民的正义要求被无情地揭露了，但六国调查委员会和政府交涉员却就这些条件讨价还价。六国调查委员会只愿意就13条中的前5条进行磋商，把谈判仅仅限制在对五卅惨案的一些善后处理上，对要求改变租界统治状况，取消外国侵略者在沪特权的根本条件一概置之不理。北京政府这一方面，交涉员以13条为基础，非常强调上层资产阶级所迫切希望达到的收回会审公廨、增加工部局华董等强烈愿望。显然，谈判双方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在谈判桌上，帝国主义者把军阀政府代表仍视作奴才一般，盛气凌人，骄横跋扈。谈判出现僵持局面。6月18日，六国委员会竟悍然拒绝继续进行谈判，离沪返京，弄得军阀政府的交涉员狼狈不堪，五卅事件的外交交涉就此停顿下来。这次谈判这么快地结束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反帝统一战线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民族资产阶级出于对帝国主义者暴行的愤慨和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投身于五卅反帝运动，参加了罢市斗争；主要代表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甚至还和工人、学生等联合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也日益加重。它对帝国主义心存害怕并抱有幻想，对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恐惧与

---

① 1925年6月18日《《新闻日报》》。

日俱增，而它对自身经济利益更是最为注重。故在最初，它把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当双方谈判破裂，帝国主义者态度强硬，上海罢市困难越来越大时，连中、下层资产阶级对“三罢”也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其消极倾向越来越严重。

罢市给予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经济利益以沉重的打击，但另一方面，民族工商业家为此也失去了生财之道，时间一久，其利害矛盾更加地突出了。上层资产阶级在各方面的加紧活动，交涉无望和经济损失的日益严重，使中下层资产阶级对“三罢”终于从怀疑动摇走向抵制。6月19日，在总商会的会议上，大部人要求取消罢市，会议遂决定在21日商界对外开市。

对于商界态度的变化，总工会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在20日，总工会专门就商界开市问题作了研究。鉴于大部分商业资本家已不可能再留在统一战线内部，决定让商界有条件地开市，上海总工会向总商会提出：1．总商会要登报宣布继续对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2．工商界继续拨款援助罢工工人。总工会号召全体工人不要受商界开市的影响，仍旧坚持罢工，“不惜牺牲一切，始终为民族利益的忠实保卫者”。①

上海广大的工人、学生对商界准备单独开市，背离“三罢”局面反应十分强烈。总商会为此不得不郑重地与工商学联合会共同商讨开市宣言与开市日期，结果完全同意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开市条件，并将开市日期推迟5天，延至端午节后。

6月26日，商界开市。但外商企业的广大工人以及学生仍旧坚持罢工、罢课，反帝运动的声势依然轰轰烈烈。上海的工商界基本遵守开市协议，仍如以前那样在经济上支持罢工，同时提倡国货，抵制外货。帝国主义发觉反帝运动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于是采取对华商工厂停止供电之一法。

---

① 1925年6月28日《民国日报》。

工部局电气处借口电厂工人罢工，停止了对租界内工厂的输电。停电一实行，华商工厂大部分被迫停工或减产，经济利益顿时大受损失。那些受损失的资本家经不住这个巨大压力，立即改变常态，对工人的罢工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们先是要求电厂工人立即复工，当遭到拒绝后，开始对工人罢工大肆进行污蔑攻击，到最后甚至于背弃诺言，不惜以停止向罢工工人援助生活费，来讨取租界当局的赐供电力了。

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势力从北方推进到了江南地区。为了能在新的地盘站住脚跟，它不惜献媚于英帝国主义，与租界当局勾结，共同扑灭上海的反帝烈火。6月中旬，2000名奉军开进上海。22日，奉系军阀委任邢士廉为淞沪戒严司令，宣布上海戒严。邢士廉一上台，就通告禁止反帝活动。接着又明令禁止工人罢工和取缔工会。在帝国主义当局不断的吹捧、怂恿和直接指使下，7月23日，戒严司令部悍然封闭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3个团体，并将这3团体的工作人员捕去多人。

邢士廉充当帝国主义的走卒，镇压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激起了上海广大工人、学生及各团体人士的无比痛恨。2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总工会、学生联合会、洋务工会等团体都派出代表前往戒严司令部交涉，提出强烈抗议。4000多名海员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往戒严司令部示威，警告邢士廉如在25日中午12时以前不将海员工会启封，那么在上海的中国轮船的海员将全部举行罢工。华轮海员罢工将使水路交通全部瘫痪，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25日邢士廉被迫下令将海员工会启封，并释放了所有被捕的海员。在海员工会启封后的第三天，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被启封。

但是客观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帝国主义和军阀已经勾结起来，加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三罢，上海

的反帝统一战线已经破裂。从革命队伍内部来说，由于经济来源的减少，数十万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也发生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以迎接更大的战斗，党决定在上海地区改变总罢工的策略，有组织有条件地动员工人复工。

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指出复工"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号召工人阶级"以更进一步的团结组织，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分子，继续斗争——在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的目的"①。根据党的指示，上海总工会通过了《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提出了罢工工人复工的最低条件：1. 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2.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3.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4. 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5. 工人一体上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6.发给罢工期内工资50％；7. 增加工资35％；8. 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9. 赔偿死伤学生、工人。②这些条件的提出，充分反映了党所领导的总工会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工人解放和维护各界人民利益的原则立场。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条件并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实现，谈判主要是在各业、各厂的工会和所在行业、工厂业主之间进行，一般只能停留在有关各业、各厂工人的具体的实际的问题的交涉上。在程度不等的部分条件得到了实现后，从8月下旬开始到10月上旬，上海各业、各厂的罢工工人陆续复工。

上海的五卅运动至此告了一个段落。五卅运动是由中国共产

① 《向导》第125期。

② 1925年8月12日《民国日报》。

党领导的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伟大反帝运动。这次波澜壮阔的运动，发动于上海，磅礴于全国，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势力，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壮大。在上海，这次运动所提出的明确的反帝目标和形成的巨大革命声势，第一次激烈地冲击了租界的整个统治，使“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这次运动并使广大人民看到了封建军阀的反动面目，认识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要坚决展开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正是在五卅运动的鼓舞和影响下，上海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不屈不挠、继续斗争，酝酿和准备着掀起新的革命风暴。

三、一场混战之后

江浙战争结束以后，援齐鄂军张允明部、齐燮元军、孙传芳军先后开进上海，各自抢编浙沪联军的残部，扩充自己的势力。孙传芳委齐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司令，然后离沪去杭专意经营浙江地盘。张允明占据了上海兵工厂和龙华护军使署，自称奉总统命令负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毫无离沪之意。接着，齐燮元将白宝山调回，任命原第一路军司令宫邦铎为淞沪镇守使。宫军驻扎闸北，张仍留守龙华，一北一南，形成割据上海华界的局面。

在江浙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奉军大获全胜，奉系势力大为扩张，不仅从关外进入关内，还迅速伸向长江下游。12月11日，重新上台的段祺瑞政府下令免去江苏省督军齐燮元之职，任命下野的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经江浙战争以后，卢已无实力，奉系张作霖即派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张宗昌南下，名为助卢，实系乘机来抢占江南地盘。

奉军沿津浦线大举南下。江苏地方人士忧心忡忡，纷纷发电提出卢、齐都是东南战事的祸首，坚决反对卢永祥南下宣抚，并拒绝奉军南下入境，以免重开江南战端。齐燮元急忙调兵遣将，准备

用武力抗命抵挡，但他遭到了部下的抵制，许多将领不服调遣，连在上海的宫邦铎也称病请假，按兵不动。齐燮元不得不弃宁到沪。

段祺瑞密任卢永祥旧部陈乐山为第四师师长率军赴松江驻扎。松江是浙江的屏障，陈部的进驻使孙传芳大感威胁。孙传芳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发兵讨陈。两军在嘉善开仗。上海的宫邦铎和张允明均采取中立。陈军失利，沿沪杭铁路向上海败退。孙军进驻松江，陈乐山不得不通电辞职。

张宗昌率奉军前锋抵达南京。卢永祥也从徐州赶来。孙传芳为了不使闽浙地盘受威胁和谋取上海，决定联合齐燮元大举抗阻奉军和卢永祥南下，并首先和齐驱逐可能依附奉、卢的上海宫邦铎和张允明。孙军沿沪杭铁路迅速前进。宫邦铎因部下受齐燮元的运动，被迫自动辞职离去。孙、齐军联合猛攻张允明部。沪杭铁路被毁，双方在闵行、漕河泾、徐家汇等处发生激烈战斗。张部不支，从龙华、高昌庙向上海城内败退。一部分队伍退入南市一带大肆抢劫，张允明率5000人逃入法租界，被租界当局全部缴械。上海遂为孙、齐所占。齐燮元对外自称为浙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自称第二路总司令，两人联衔宣言拒绝奉军南下。

苏、沪又有爆发大战之势。两地人民纷纷通电呼吁，要求和平安宁。1925年1月12日，乘张允明、宫邦铎被逐去之际，上海市总商会致电段祺瑞，强烈要求在上海从此废除护军、镇守两使的设置，再次恳请政府在上海不再驻军，并将兵工厂迁移于外，“以此为沪人于半年中三经战祸之代价，庶几此后商民尚有一线生机。”①

在江浙和上海人民反战声浪的压力下，段祺瑞执政府顾虑到上海情况的错综复杂，1月15日下令：（一）淞沪护军使着即裁撤。（二）上海为通商重地，不宜驻兵，嗣后永不驻兵，亦不得再设军事机关。（三）上海兵工厂设后着陆军部饬令停止军事工作，暂交总

① 1925年1月13日《申报》。

商会接收。17日执政府又发布命令，严厉查办齐燮元，没收其所有财产，又正式任命孙传芳为浙江督办。孙传芳此时主要还是以浙江为根本，见浙江督办到手，而上海各机关处处为齐军抢先霸占，遂决定暂时避开齐卢矛盾，停止出兵助齐。

奉军和卢军进入江南，齐燮元调动所有兵力抵挡。双方在镇江、丹阳、无锡等地大战。齐燮元无论在兵力和声势上都不及对手，节节败退。1月27日齐军在无锡附近陷入包围，齐燮元慌忙逃往上海，第二天即东遁日本。

28日，奉军先头部队抵达上海。29日，张宗昌到沪，奉军1万余人，其中包括雇佣的白俄军队1500人开进上海。同日，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宣布上海为特别市，直属中央；并电请上海市公所李平书等11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建上海特别市。2月1日，上海特别市筹备会议议决将上海、宝山并为一起，建立淞沪特别市，并草拟了筹备纲领。

陆军部长吴光新到沪主持新的《江浙和平条约》，孙传芳从杭州赴沪与张宗昌合签和约。和约规定：孙主浙江，奉系据有江苏；奉军退至昆山以西，孙军退回松江，各方都不在上海驻兵；上海兵工厂移交上海总商会管理。进驻上海兵工厂的孙传芳部乘撤离之际，抢运大小炮数十尊、快枪300余枝、枪炮弹数百箱送杭，孙军并在上海招募新兵、小工，接收张允明、齐燮元的残部运往松江，扩充实力。张宗昌虽将大部分军队撤出上海，但其补充旅改名为"清乡军"，以清乡为名仍赖在上海附近不走，与此同时，奉军继续将大批部队和军火源源不断地南运。两军在上海以外南北对峙，各自锐意扩军备战，形势仍然十分紧张。

5月，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张作霖见上海局势混乱有机可乘，于6月13日悍然派奉军2000人以"维持秩序"为名进驻上海。21日，奉军大批开入上海，宣布淞沪戒严，由20师师长邢士廉担任淞沪戒严司令。上海华界由此完全落入奉系的统制之下。帝国主义

者则增加了一个镇压反帝运动的得力助手。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强行查封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和洋务工会。9月18日又强行封闭了上海总工会。

奉军一路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早已使地方人民怨声载道，现在竟进驻上海，使江浙、上海又遭战祸威胁，这引起了江浙和上海广大人民的严重不安和强烈谴责。奉军在上海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疯狂镇压革命运动的行动，更是激起了革命人民和进步力量的严厉声讨和坚决抵制。8月，奉系杨宇霆受命督苏，姜登选授命督皖，苏、皖两地的地方大小军阀个个都惶恐不安，与奉系矛盾也大大激化。

孙传芳数月来秣马厉兵，训练整顿，军力更为壮大。孙又在东南地区广为联络，扩大自己的影响。当奉军破坏条约单独开入上海后，浙江直接受到了严重威胁。奉军日显孤立，成了众矢之的，孙传芳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去掉心腹之患，以实现久已蓄藏的称雄东南的野心。

10月初，孙传芳在杭州召集苏、皖、闽、赣、浙5省要员秘密会议，商讨驱奉策略。10日，孙传芳以准备秋操为名，下达紧急动员令，调兵遣将，赶运军火给养，并管制水陆交通。奉军布防，北自关外，南达江南，兵力相当分散。上海、江苏的奉系兵力本来就不足，杨宇霆一听说孙传芳调动大军全力来攻，知道不敌，为了保全兵力和使孙传芳失去进兵借口，急令邢士廉部立即撤出上海。

15日，孙传芳宣布自任浙、闽、苏、皖、赣5省联军总司令，统辖五军。下令第一、第二军向上海挺进，第四、第五军猛攻宜兴，孙亲率第三军居中指挥。16日，孙部第二军从松江进占上海。奉军大部已撤至苏州，来不及离开的一营宪兵缴械投降。孙部第四军占领宜兴，余部分别向沪宁线各地猛进，追袭奉军。当天，孙传芳与浙江省长夏超、福建督办周荫人联名通电执政府和各省督办，指斥奉军破坏了“上海永不驻兵”的《江浙和平条约》，声明讨伐张作霖。与

此同时，齐军旧部乘奉军兵败如山倒之际，纷纷起而驱奉。几天中，孙部五路大军在原齐军的配合下，迅速地据常州，占丹阳，克镇江，攻下南京。杨宇霆及江苏省省长郑谦仓皇出逃。孙部乘胜渡江，追击北撤奉军。奉军节节败退。孙传芳随军进袭，由临淮关至蚌埠，由南宿州至符离集。安徽督办姜登选也弃职遁逃。11月7日孙部攻下交通重镇徐州城，缴获奉军的大批军火给养。孙传芳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迅速地攻下苏、皖两省和一个上海，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决定不再北上，准备首先竭力经营已经得到的这一大块地盘。

孙传芳的胜利震惊了整个东南地区，闽、赣、皖、苏地方的大小军阀势力纷纷归附。11月底，大家公推孙传芳为浙、闽、苏、皖、赣5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孙分别任命了各省的省长和总司令。孙传芳成了东南5省军政的最高统治者。

5省暂趋一统使东南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局面，同时使受5省拱卫的上海暂时进入了一个没有战争骚扰的比前安定的环境之中。对于上海，孙传芳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他雄心勃勃，亲自掌握，决定划上海为特别区，设立一个“淞沪商埠督办公署”。1926年5月4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正式成立。孙传芳亲任督办，直接控制上海的大权。又找来一位著名的学者丁文江来充任会办。丁文江是个地质学家，但对政治、军事兴趣浓厚。他急求中国统一，对孙传芳寄予极大的希望。他认为孙是“可以用兵力统一中国”，因此接受了孙的聘请①。在“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下面还设立了一个参议会，设参议员9人。孙传芳提出了建立一个“大上海”的设想，这就是通过“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这一机构，“把地方的行政权集中在一处，使它有能力可以改良原有的市政，筹备未开的商埠，解决外交上的悬案，渐渐把租界以外的上海造成功一个模范市，然后以模范市的成绩，为要求收回租界的根据”②。然而，这不过是一个设想，

① 蓝显光《我和在君》。

② 1926年5月6日《申报》。

在“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存在的一年不到的时间中，可以看到它仅仅比较成功地做了两件事：一、把闸北、沪南、浦东、沪西、吴淞5大区的行政初步地统一起来了，为以后上海设市奠定了地域基础和提供了管理上的方便。二、与外交领事团进行了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虽然主要是名义上的“收回”，外国侵略者在公廨内仍保持着很大的特权，但毕竟为其最后的完全的归还走出了第一步。除此以外，“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改良市政”只是在上海修路造桥、抓抓卫生而已，所谓的“模范市”和“收回租界”之类那完全只是动听的空言了。孙传芳毕竟是一个地方军阀，在整个中国军阀勾心斗角争战不已，局势动荡反复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更大用心当然还是在于争权夺利，抢掠地盘以及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镇压人民斗争和革命运动。而这位“好人政府”倡导者之一的丁文江在这样的局势和这样一个军阀的手下管事，当然不可能有大的施展和实现自己的愿望。随着形势的发展，丁文江已经“发觉孙传芳也不过只是一个以割据为满足的军阀，无意统一中国”①。他很失望，如同“好人政府”的其他倡导者，对吴佩孚从推崇到失望一样。而这时国民革命军正摧枯拉朽地击败着各地的军阀势力，眼看孙传芳也难以抵挡住北伐军的推进，于是，就在这一年的12月底，丁文江借口一次车祸受伤，辞去会办之职，不久，也离开了这个多事的上海。

四、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5年至1926年春，广东革命政府消灭和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以及隐藏在政权内部的军阀力量，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国民革命军决定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把革命推向全国。

① 蓬显光《我和在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进入两湖，在击溃盘踞中原的吴佩孚军阀势力后，挥兵江西，向东南军阀孙传芳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北伐军在前方的胜利进军，大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使各地的工人运动重又活跃起来。自"五卅"运动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也顿时重新兴起，上海总工会又公开亮出了牌子，在它的组织下，罢工、游行等又开展起来。为了加强对上海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领导，组织反对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罗亦农、赵世炎先后来到上海，罗任上海区委书记，赵任上海区委组织部长兼总工会党团书记。

从中山舰事件① 以后，中国共产党已开始产生直接建立工农武装的思想。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研究分析了北伐战争给长江下游带来的新形势。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罗亦农在会上正式提出了以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进军的主张和开展自治运动的口号："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我们"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② 。6日，上海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人民奋起反抗黑暗的统治："帝国主义的外人，卖国的军阀、官僚和大买办阶级，就是我们的死敌！一切苛捐杂税，就是我们的催命符！……一条路是受压迫而死，另一条

①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抵达后，蒋诬称共产党要暴动，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李之龙，接着又强逼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②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9月3日。

路是起来反抗而生。前一条是死路，也就是亡国之路。后一条路是生路，也就是谋中国民族独立到自由解放之路。"① 在上海区委的领导下，立即发动建立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在闸北宝兴路还秘密地举办了武装起义人员的训练班，各区区委都派出一个委员，重要的产业工会也派出负责党员参加军事训练。另外，积极地开展了自治运动的宣传工作，以发动和团结各阶层的群众共同起来反对军阀孙传芳。

这时在上海酝酿参加武装起义和进行自治运动的，主要还有另外二个方面的力量。

一是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会力量。资产阶级早就要求上海地区实行和平和自治，但遭到了军阀政府的严厉打击。在孙传芳的压制下，虞洽卿失去了淞沪商埠会办和总商会会长之职，由他所掌握的南、北市保卫团也被解散，闸北自治公所也被当局接收。民族资产阶级和军阀政府矛盾趋于尖锐，迫切希望取得政权，解除身上的压迫。

另一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的力量。原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的执行委员会主要都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组成，接受中共上海区委的领导。但这时蒋介石派出了钮永建为驻沪特派员，来上海建立了办事机关。钮通过黄金荣等的关系，联系了一批流氓无产者、帮会分子，组织起武装力量，钮还联络了浙江的夏超，准备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上海区委积极地与虞洽卿和钮永建进行了联系，争取他们一起参加武装起义。然而事到临头，虞洽卿却害怕暴动了，态度暧昧而冷淡。上海区委把国民党钮永建看作为进行起义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但钮这时一心想走拉拢收买孙传芳的部下倒戈的路子，以取得政权。经不断地推动和谈判，钮永建才勉强答应加入起义，但条件是要由他们一方来发动起义。不过，钮永建直到起义爆发前夕，

① 《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1926年9月6日。

都未作充分的准备，连作战的具体计划都没有一个。

10月初，北伐军向江西孙传芳部发起强攻，围袭南昌。10日，另一路北伐军攻克吴佩孚据守的武昌。武昌的胜利既粉碎了孙传芳联吴夹击北伐军，进而吞并两湖的美梦，又使江西战场上的孙军转入被动地位，江西一动摇，又加剧了孙军内部的分崩离析。

15日，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保境安民"，召回江西等处的浙军，脱离孙传芳而独立。16日，夏超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民政长，令部下沿沪杭铁路向松江进军。夏超倒戈使上海人心大为振奋。

这时，钮永建暗中正在与上海驻军和淞沪警察厅进行谈判，因成败未晓，对立即发动起义迟疑拖延。上海区委迁就依赖于钮永建的指挥，最后才商定于24日凌晨前举行起义，由钮永建方面发炮为号。

其时，浙江的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夏超宣布独立以后，孙传芳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向夏军发起突然袭击。夏部主要兵力是警备队，作战力弱。被孙军一压，立即向杭州回逃。23日，孙军攻下杭州。当夜，中共上海区委得到夏军被击溃的确切消息，眼见上海的敌人加岗设哨，警探四出，显然已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因此被迫紧急决定：停止行动。但一些区的工人纠察队已进入战斗或已遭到了敌人的镇压。南市的一支工人纠察队从斜桥出发，英勇地袭击了制造局路上的第二区警察局的一个派出所，从敌人手中夺得了两枝短枪和四枝长枪。但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奚佐尧在另一处不幸被敌巡防队查获逮捕，惨遭杀害。浦东的起义在事前就走漏风声，起事前，主要领导人江元清、陶静轩等先后被警署捕去，陶静轩后也遭残害。钮永建方面，事前早已获得了夏超兵败的消息，但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派出一支武装队伍去进攻徐家汇警察署。敌人早有准备，起义武装放了一阵乱枪后，便都逃得无影无踪。

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就这样失败了。事后中共上海区委连续

召开会议，认真总结失败原因，认为这次起义：1.失去了暴动的有利时机。2.过分信赖了怯懦畏缩的资产阶级，对于钮永建方面的武装力量估计亦过高，失去了自己主动地位。3．起义技术准备也不充分。上海区委决定："以后上海的运动，应很坚决地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以后特别要认定自己为一切的中心……这是全党的很严重的问题。"① 这次起义因全局未动，起义者的力量事实上损失并不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发展继续在高涨。工人纠察队继续加紧进行武装训练和收集武器，准备待机发动新的斗争。

1926年11月，北伐军终于攻克九江、南昌，占领了江西全境。12月又攻下福建全省。接着，挥师直指浙江。

孙传芳眼看自己已陷入困境，亲赴北方向张作霖求援，张派直鲁联军张宗昌南下抵挡北伐军和抢占地盘。上海和苏浙皖三省人民为此极度不安，两处的自治运动迅速高涨。11月14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成立。28日，"五卅"时被封闭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恢复，改名市民公会。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在市民公会中还建立了党团组织。市民公会发表宣言和《告上海市民书》，拒绝奉军南下，要求将上海划为特别市。自治运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11月底，孙传芳密令上海防守司令部和警察厅强行取缔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暨全浙公会、新苏公会、全皖公会。1927年1月，又悍然封闭了市民公会。

北伐军继续在迅速推进。1927年2月胜利攻下杭州，前锋已进军嘉兴。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进抵松江时，实行上海工人总罢工，并发动第二次起义。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通告，号召全市工人从第二天起进行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

①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临时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5日。

军，打倒孙传芳，”“取得上海”①。19日凌晨，罢工令下达，从6时起，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这一天，杨树浦、引翔港、南市、小沙渡、浦东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内的15万人参加了罢工。参加罢工的不仅有纺织、烟草、交通运输、邮政、印刷等产业工人，而且连南京路各大公司的职员及各业大批手工业工人也加入了罢工队伍。第二天罢工人数激增到27万5千人，第三天又增加到35万人。第4天，即22日，罢工人数已达36万人以上②，达到了上海工人历次罢工的最高纪录。这次总同盟罢工明确地宣布：“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

孙传芳此时已准备弃沪远走，因此毫无忌惮地对上海人民狠下毒手。在罢工第一天，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发布布告叫嚣对革命群众要“格杀勿论”，接着出动大刀队上街疯狂捕人、杀人。南市机器工人蔡建勋和史阿荣因发传单当场被捕，立刻被就地枪决。老西门有市民传阅传单，也被大刀队砍杀，大刀队还恶狠狠地将一人的首级悬在电杆上示众。一个浦东小贩口呼“卖大饼”，大刀队心虚神慌，以为是叫“打败兵”，上前用刺刀将其乱刺而死。上海的街头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20日，在嘉兴的北伐军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停止了向上海的进军。中共中央得讯后，对是否举行起义犹豫不决。经反复讨论，到21日傍晚决定还是发动武装起义。22日中午，各界紧急成立了一个“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对罢工和起义并不积极的钮永建和虞洽卿都进入了这个机构。但发动起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立即将罢工转为起义，于当晚6时采取行动。

是日傍晚时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两艘敌舰的起义

---

① 《上海总工会举行总同盟罢工的通告（第二号）》1927年2月18日。

② 施英《上海总同盟罢工的汇录》。

官兵，向高昌庙方向发炮 20 余响。炮弹使岸上的军警一片混乱，纷纷拔脚向租界逃逸。按原定计划，两舰开炮后，浦东工人应乘小轮迅速上舰取得武器武装自己，然后一起进攻浦西兵工厂。但炮发后，浦东工人队伍却没按时组织好上舰，而这时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舰因建康、建威的炮弹落入法租界，借此赶来警告和监视。两舰起义者孤立无援，不得不撤离军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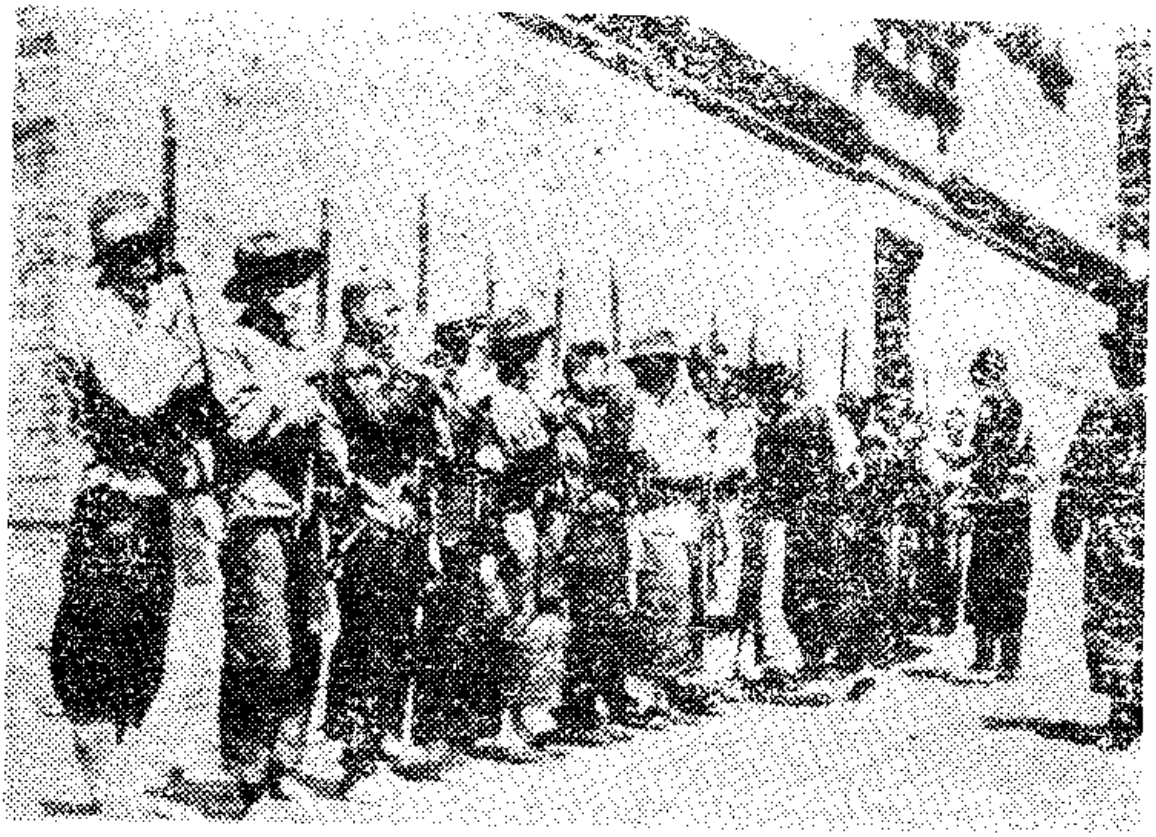
起义的整个计划都被打乱了。浦东的工人纠察队因没有上舰取得武器，因而未渡至浦西。南市工人纠察队因得不到浦东工人纠察队人员和武器的支援，也没能前往攻打兵工厂等要害部门。至于闸北等处离黄浦较远，听不清起义的炮声，所以除少数起义者与敌警进行巷战外，大多也没有投入行动。

这次起义又草草地失败了。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约有 40 多名工人被敌人杀害，300多人被捕。起义的失败使总同盟罢工也难以继续下去。24日，上海总工会向各工会发布复工命令。同日，中国共产党就结束总同盟罢工发表了“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明确指出：“现在你们虽然宣告暂时停止罢工，但决不是对孙传芳和李宝章让步，而是准备更进一步的新斗争。上海总工会说得非常之对：‘非因退让而复工，乃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①。

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党内对工人暴动作了全面的回顾和认真的分析。瞿秋白尖锐地指出这次起义的错误是：事前未作好充分的准备，党中央最初的政策动摇不定，以及没有处理好罢工与起义的关系等。他对由国民党要人、大商代表与工人阶级代表联合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将就资产阶级”，也提出了批评。

两次起义的失败，既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同时也使党和工人阶级获得了丰富的经验。针对国民党钮永建方面的对发动新的起义不赞同、不支持的态度，党决定完全独立地领导发动第三次武装起

①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1927 年 2 月 24 日。



工人纠察队在操练

义。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经郑重研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又称“特务委员会”)作为领导起义的最高决策机构。特别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中央局委员彭述之、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罗亦农、赵世炎、尹宽、汪寿华、王子璋8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之下还建立了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

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为发动起义积极进行准备。他们整顿和恢复各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通过它们在工人、城市贫民以及各阶层人士中开展广泛深入的思想发动和组织落实。他们建立了一支由五千人参加的庞大的工人纠察队，筹集武器，进行了认真的军事训练。对于起义的具体行动，则作了极为细致的部署，制订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计划，将全市分为闸北、南市、沪东、沪西、虹口、浦东、吴淞七个作战部，各部都确定了本部主攻目标、参加人数、行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等。

党在积极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又加紧开展自治运动。这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在进军途中的反共倾向已经有所认识和戒备，对于北伐军到达上海后，可能出现的不利于党和工农群众的局面也有了一定的估计，因此竭力想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党和工人阶级有一个坚固的支柱，也使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即面临一个既成的革命局面，不致于如南昌一样可以随意地摧残党和工会力量。陈独秀在特委会的会议上，非常明确地指出："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如果，北伐军来后不承认这个民选代表，就第二步可以民众提出，重选正式政府。"① 3月7日，恢复后的市民公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制定了市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确定了与国民党提出的以区域为单位的选举法相反的以职业为单位的选举法。12日，上海市临时市民大会举行成立大会，宣布："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市民之意志，接收上海政权。"② 大会选出市执行委员计共31人，内共产党员11人。这次大会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对掌握上海的政权有把握了，同时使发动和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更加主动了。

3月中旬，北伐军从江浙两面向上海加紧进逼，直鲁联军先行到沪的第五路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毕庶澄打算投降，但又提出保留职位，划取地盘等条件。19日，北伐军已攻克松江、吴江、宜兴，兵临上海城下。举行起义的时机成熟了。同日，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和各产总举行联席会议，罗亦农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并提出了上海区委的行动大纲，在大纲中明确要求："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

①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28日。

② 1927年3月13日《中报》。

——民选市政府……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打倒直鲁联军，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革命民众市政府。"①

20日，北伐军白崇禧部从松江攻下了市郊新龙华，炮声隐隐，上海城内工人和市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蒋介石另有企图，忽又密令白崇禧，暂时不向市区进军，白崇禧乃按兵不动。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似箭在弦。21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正式作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定。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罗亦农代表中共上海区委宣布于21日中午12时实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并立即全面发动武装起义。

正午12时，南市救火会的钟声敲响，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汽笛齐鸣。工厂停产，商店闭门，铁路不通，轮船歇航，电讯中断，全市无数工厂、作坊、手工工场、商店、车站、码头、机关等的80万工人开始举行总同盟罢工。

参加起义的罢工工人迅速地向预定的地点集合，在租界中的起义者纷纷赶往华界。战斗开始了。工人们操起木棒、扁担、锄头、斧头等英勇地与反动军警搏斗，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从各个方向扑向指定的攻击目标，在全市7个区域内都发生了壮烈动人的战斗场面。

在南市，法商电车、电气自来水公司、华商电气公司、法商求新造船厂、上海兵工厂的工人纠察队在下午1时迅速汇集到老西门一带，邻近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中区的群众也陆续赶来支援。1时30分武装进攻开始。起义者首先占领了第二区警察署，接着集中全力进攻淞沪警察厅。淞沪警察厅设在大东门旧上海道道台衙门内，它是反动军阀在上海的主要堡垒之一，是这次武装起义的一个主攻目标。警厅的头目早已逃走，剩下的警察立即扯起白旗投降，迎接起义军入内。仅花了半个小时而且未动干戈，淞沪警察厅就

① 《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1927年3月19日。



工人纠察队整队出发

被占领了。起义者在这里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在攻下南市各警察机构后，各路工人纠察队大队人马一齐奔向反动军阀在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基地——上海兵工厂。驻厂守军连长听到起义的枪声早已不知躲到那里去了，守兵见大队压境，也举起白旗投降。起义者在此得到了轻重机枪多挺，无数步枪、手枪及大批弹药。许多徒手起义者都有了武器。电话局被占领，南火车站的敌人已逃逸无踪，铁路工人控制了站上的车皮，为起义工人运输物品。在4小时不到的时间中，南市全区都已经在起义者的掌握之中了。

虹口南临租界，北接市郊。敌人只设警署没有驻军，军事力量比较薄弱。起义发动后，电力、丝织和冶金工人急攻虹口中心警察署，一举将其夺下。逃散的警察指使地方流氓前来工会捣乱，袭击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的警署。工人纠察队对这些流氓予以坚决地武装镇压，狠狠地打击了反动警察的嚣张气焰，工人纠察队自此全面地管理起这个区域的治安和秩序。

虹口以东的沪东地区是工厂区，工人集中。罢工、起义开始以后，起义者立即围攻沪东警察署，将全部警察缴械逮捕。下午1时左右，杨树浦与引翔港两处还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共10万群众参加了大会。会后，起义者整队出发向闸北进军。一路上起义队伍攻打警察分所，砸烂马路岗亭，解除了许多警察的武装。队伍行至天通庵车站附近，从吴淞方面正好有一列兵车开来，它是去援助北站敌军的。起义队伍迅速拆毁路轨，使兵车出轨倒地。双方激烈交战，车上以机枪向起义者扫射，起义队伍猛烈还击。闸北的工人纠察队也赶来参战，与沪东工人纠察队两面夹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才结束。沪东起义队伍在得胜后立即向北站挺进，配合闸北工人纠察队作战。

沪西与沪东一样也是工厂区，工人声势浩大。起义开始后，工人纠察队首先往攻曹家渡第五区警察署，俘虏警察60名。接着，工人纠察队渡过苏州河到闸北，与小沙渡工人纠察队汇集合攻第四区警察署。守署警察顽固不化，双方激烈交火，纠察队总指挥在冲锋时不幸中弹牺牲。全体纠察队队员奋力强攻，击毙击伤警察多名，终于将第四区警察署攻下。两支工人纠察队将占领的区警察署和其他警察分所全部查封，然后一起由西向东往攻北火车站，支援闸北的起义。

这时黄浦江以东的浦东地区和远离上海市区的吴淞地区遵照指令也同时爆发了起义。浦东沿江，工厂、码头、仓栈林立，总同盟罢工令下后，浦东工人立即投入战斗。工人纠察队首先急攻素为群众深恶痛绝的烂泥渡第三区警察署，迫使150名作恶多端的反动警察全部缴械投降。接着工人纠察队攻占三区警署一分所和二分所，并分头搜捕游巡队，迅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在搜捕游巡队的路上，工人纠察队遇见一批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鲁军正在围扰地方商人组织的"保卫团"。工人纠察队即向鲁军发起攻势，迅速替保卫团解脱了困境。保卫团与工人纠察队一起联合防卫管理浦东全

区，并使浦东得以顺利地建立了新政权，召开了浦东区各业人民的代表会议。

吴淞是上海的咽喉，控黄浦江之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吴淞历来设有炮台，屯驻军队。当北伐军从江浙两面步步进逼上海时，毕庶澄的一部分溃兵及吴淞驻军企图从吴淞水路夺轮逃离，吴淞镇周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吴淞工人与市区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罢工起义。铁路、冶金、纺织工人的武装队伍包围敌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守军无路可逃，弃阵投降。地方商人保卫团也与工人合作，之后成立了吴淞区人民代表会。

南市、虹口、沪东、沪西、浦东、吴淞六个地区在几小时中快速而顺利地为起义者全部占领了，唯有闸北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胜负未定。闸北的北火车站，是上海对外的陆路交通枢纽。毕庶澄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此，除警察岗亭外，设置的重要军警据点就达 20 多处。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在闸北主攻的目标为北站、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第五区警察署、广东街警察分署、中华新街警察分署 6 处。起义爆发后，闸北 10 余万工人立即分头向各主要攻击目标发起冲锋，与军警进行了顽强的搏斗。4 个小时以后，起义者已胜利攻下了湖州会馆、第五区警察署、广东街和中华新街警察分署，全区所有岗警都被工人群众驱逐逃散。

战斗集中在东方图书馆、北站和天通庵车站。东方图书馆守军不多，但他们依仗武器精良，弹药充足，负隅顽抗。起义队伍将东方图书馆团团围住，并不断缩小包围圈，终夜攻打，不让敌人动弹。在北站驻扎着鲁军重兵和白俄军，毕庶澄亲自坐镇于此。起义爆发后，鲁军用大炮向工人乱轰，白俄兵驾着铁甲车也发炮猛轰工人。到夜晚，鲁军在车站北面纵火企图突袭起义队伍。大火蔓延，烈焰冲天，北站附近的数百间民房顿时陷于一片火海之中，男女老少的难民呼天喊地向起义者防线投来。工人纠察队将他们一一安顿，并出动水龙，冒着危险离开防线前去扑灭大火。工人纠察队舍

已为民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难民和附近的居民，他们纷纷取来木板、砖石、麻袋为工人纠察队修筑、加固工事，一些年轻人并坚决要求参加起义队伍，与工人纠察队一起攻打北站。火势渐渐熄灭，敌人见无机可乘，工人纠察队又防范严密，不敢发动突袭。

一夜过去了，第二天黎明起义队伍向三处的守敌再次发起强攻。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冒着枪林弹雨亲赴火线，指挥战斗。起义工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随着支前者的不断增加，参加进攻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在天通庵车站的敌人被沪东工人纠察队和闸北工人纠察队两面夹住，半夜里想趁黑突围逃窜，没有成功。寒露冷风、断水缺食使这些残兵败将饥寒交迫，困乏不堪。工人纠察队加强政治攻势，从阵地上反复对他们进行攻心喊话。到中午时分，敌军连子弹都将打光了，士气丧失殆尽，被迫向纠察队举旗投降。除少量士兵逃入租界外，400余名敌军作了纠察队的俘虏。在东方图书馆，守敌被工人纠察队紧紧包围、孤立无援。到下午4时30分部分守敌换了便装，企图蒙混脱逃，被全部活捉，其余守敌见情，亦即全部缴械投降，东方图书馆终于被攻克。

只剩下北站最后一个敌垒了。北站南面毗邻租界，工人纠察队不可能对其迂回包抄，但敌人则能进可退，回旋有地。北站又具有大楼制高点，周围的民居经守敌的再次纵火，已经烧毁大半，变成开阔地。毕庶澄凭借这些有利的条件作最后的挣扎。

天通庵站和东方图书馆敌军被消灭后，闸北所有的起义队伍和沪东、沪西等处的工人纠察队援军，都齐集北站周围。周恩来、赵世炎下达了向北站发起总攻击的命令。各路工人纠察队冒着敌人机枪、大炮和迫击炮的扫射轰击，毫不畏惧地向前突击。机枪、步枪的子弹象雨滴般地射向敌阵，手榴弹接连在敌军中猛烈开花。战斗进行到下午五点多，毕庶澄眼见大势已去，即丢下部队逃入租

界。白俄兵顾不得铁甲车也纷纷改换便衣匿入租界。北站其余守敌均作鸟兽散。进攻北站的各路工人纠察队见敌人阵脚大乱，即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了整个车站的各个部分，俘虏了所有来不及出逃的敌人。到6时，北站已经完全控制在起义者的手中了。

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30个小时的日夜殊死战斗，歼灭了3000名直鲁联军和2000名反动警察，缴获了长短枪近4000支、轻重机枪1000多挺。上海的工人阶级用鲜血和生命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黑暗统治，使上海第一次归回到了人民怀抱。

在武装起义胜利的革命高潮中，3月22日，举行了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1千余个团体的4千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上，选出了由各界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丁晓先、侯绍裘、王汉良、陆文韶、郑毓秀、谢福生、李泊之、王景云、顾顺章19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计10人，超过半数。

上海临时市政府诞生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最后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在近代上海历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它极大地震动和打击了在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统治，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奋勇无畏、坚韧不拔的顽强斗争精神。

上海工人浴血奋战光复了上海，但这时胜利中也隐伏着危机，蒋介石及其军队这时正向上海赶来，准备劫夺起义的硕果和扑灭革命的烈火，一场反革命的暴力政变将要来临了。

五、四·一二政变

在北伐军进抵新龙华的时候，上海总工会曾派交际部主任赵

子敬等前往慰问，并恳切要求北伐军迅速开入上海市区，与正在浴血战斗的工人纠察队一起合击直鲁联军，解放上海。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按蒋介石的密令，对总工会的请求毫不理会。但当22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白崇禧立即率部大踏步地跨进上海。在他之后，蒋介石也急忙从芜湖乘船赶来上海，攫取胜利的果实。

蒋介石早年浪迹上海交易所，因投机失败而出走广州，投入革命政权，并逐渐掌握军权，先是取得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要职，北伐开始，又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率军北上。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势力和上层资产阶级互相勾结，进行反共、反革命的活动。

攻克南昌之后，1927年3月11日蒋介石密令爪牙枪杀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6日，又唆使走狗武力解散了拥护新三民主义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并封闭了南昌学生联合会。第二天，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总工会等被"流氓"捣毁、死伤多人。23日，在安庆的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也遭到蒋介石收买的"流氓"的猖狂围攻，伤6人。

3月26日，蒋介石乘坐楚谦舰抵达上海。他从高昌庙码头登岸乘车直驶法租界祁齐路（今岳阳路）交涉公署，即以该署作了自己的行辕。法租界当局立即派出政治部主任前往问候，并送上一张上有"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先生入法租界可带武装卫兵十名"的特别通行证。公共租界也派员前来向蒋介石递送公共租界的特别通行证，并向蒋致意，如须进入公共租界时，可先以电话通知，以便当局预先开启界门，并派警员前来保护。华人能带着武装人员自由通行于租界，这是自租界开辟以来少有的特殊待遇。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显然已有了解，并寄予了希望，他们称他为"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指上海）局面的人物"①。蒋介石随即公开向租界当局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

① 1927年3月28日《字林西报》。

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① “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②

上海的大银行家、大实业家、商业团体的领袖、青红帮的头目等纷纷登门前去拜望蒋介石。在蒋介石到达的当天晚上，新成立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会长虞洽卿就前往交涉公署叙旧，蒋介石安慰他：直鲁联军已全部撤到长江以北，勿庸担忧，声称“自己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③。29日，商业联合会的一批头面人物全部前往交涉公署拜谒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些大资本家加以勉励，并暗示他们，“劳资”等问题将由自己一手妥为解决：“至劳资及维护商业问题，旦夕间即有具体办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生命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④ 3月30日，蒋介石专门建立了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任命陈其采、陈光甫、钱永铭、虞洽卿、钮永建、吴荣鬯、秦祖泽、汤巨、顾馨一、王晓籁、徐国安、汤济沧等15人为财政委员会委员。其中不乏商界要人，而陈光甫、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也就此踏入了蒋介石的“政界”。经陈光甫等人的出面筹划，4月1日，由银行公会垫借200万元，钱业公会垫借100万元给蒋介石，表示上海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他的支持。

蒋介石对上海人民的新政权——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已经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的临时市政府，在3月29日举行政府委员的宣誓就职会。白崇禧、钮永建、陈光甫、杨杏佛、郑毓秀、谢福生六人拒绝到会。会议正在进行时，蒋介石送来专函，竟要市政府暂缓成立。函称：“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请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

① 1927年3月31日《字林西报》。
② 1927年4月2日《字林西报》。
③ 1927年3月28日《申报》。
④ 1927年3月30日《申报》。

定。”① 与此同时，白崇禧也送来一信，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市政府委员，而且表示应取消临时市政府。在蒋介石、白崇禧的指使下，钮永建、虞洽卿、陈光甫、杨杏佛、王晓籁、谢福生、郑毓秀以各种理由先后递呈临时市政府，正式提出辞职，这种分化瓦解临时市政府的行动，给新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到4月6日，蒋介石竟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的管辖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7日，蒋介石踢开临时市政府，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由其亲信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陈果夫等15人组成，宣称这是“上海最高机关，有处决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大权，并指挥当地党务”② 。这就是说，蒋介石已根本否认了上海临时市政府这个上海人民最高权力机构的存在。

在这一期间，蒋介石同时加紧了发动反共、反人民的血腥政变的部署。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等8人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监委紧急会议，通过了由吴稚晖提出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建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的措施，对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分别看管监视”，并提出了197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的名单。4月3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宋子文等10余人日夜和刚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举行秘密会议，会上讨论了蒋介石的以“分共”为中心的提议，制订了举行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和计划。5日，蒋介石借口“日来形势严重”，宣布上海戒严，并下令已受到革命影响，比较同情工人的驻沪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立即开拔南京，另外将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迅速调来上海。周凤岐原是卢永祥的部下，卢败后投靠孙传芳，孙出走后为

① 1927年3月30日《民国日报》。

② 1927年4月9日《申报》。

蒋所收编。他是一个刻骨仇视人民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旧军阀，他统率的部队成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支可靠力量。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还需要大批走卒和打手，在他的唆使下，青帮的大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纠集了一大批流氓、帮会份子组织了一个中华共进会。这个名称还是沿用辛亥革命时一个组织的名称，企图借此掩人耳目，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中华共进会既有蒋介石作为后台，还得到租界当局的支助，有钱，有枪，有势力，积极地准备用暴力来捣毁工会和屠杀工人。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四月五日，还由一些流氓、工贼拼凑组成了一个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工会为招牌，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破坏活动。它的最主要目的是扰乱工人队伍，引诱工会团体入伙，破坏和搞垮已经在上海广大工人群众中具有很高威望的上海总工会。

对于蒋介石在北伐路上的反共倾向和来到上海后敌视革命的行径，中共党内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认识和思想准备的。在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前一天，特委会召开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①。在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当天上午，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了区委会议。会上研究了上海的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当前的工作问题。罗亦农明确地指出："现在反革命的势力已集中于上海了，张（静江）、戴（季陶）已来上海，蒋（介石）也快来了"。"蒋在江西已开始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牺牲。这个斗争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②。当晚6时，蒋介石已进入上海，上海区委举行了活动分子会议，向大家阐明对蒋来上海

①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

②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

的看法："今天政局已有非常危险的局面"，"蒋来别有用心，我们应当有明确观念。他将集中势力与C.P.（共产党）算账。"区委在报告中还强调必须牢固掌握工人的武装："这次工人大流血大牺牲夺取许多枪械为自己解放的保障，上海工人武装有力，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与一切行动都有保障，同时C.P.也跟随有力。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①

上海的形势在进一步地恶化。3月30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就政治形势及对策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在上海准备打击的四个目标是："共产党、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左派。"4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又召开活动份子会议，罗亦农代表区委作了"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提醒大家：上海已是"反革命与革命争斗的焦点"，蒋介石的"烧工会"，"捣毁工会"的行动，正在酝酿中。"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罗亦农提出党在目前采取的策略"唯有与蒋奋斗"，具体是：1.所有上海的工人，要积极准备，认定自己是主体，去领导各阶级民众起来奋斗。2.保持武装力量，不缴械，不投降与退却。3.分化瓦解右派的军队。罗亦农要求在武装冲突爆发的时候，"各工人群众、学生群众、国民党群众马上起来罢工、罢课等运动，并使群众赶到闸北援助工人，绝对不能疏忽与弛[迟]缓"②。

党内的一些领导人清醒地估计了这时的斗争形势，采取了一些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团结和扩大革命力量，加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训练的具体措施。但是应该看到，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是

---

①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

②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

极为错综复杂的，敌我力量又明显地大相悬殊，党中央这时的政策从总的来说是软弱的、摇摆的。

就总书记陈独秀来说，他对眼前形势的恶化有相当的认识，但他又抱有幻想，希望形势缓和，“尽可能避免冲突”。在3月25日特委会会议上，他表示要行动起来，与蒋介石作决斗。但在第二天上海区委会议上，他却又改变了说法。在会上，他提出“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通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①。28日，他又向区委布置了如下的意见：“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② 对已经正在明目张胆地加紧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的要求“差不多都可答应”，这是明显的妥协，至于要蒋积极投入反英，更是不现实的幻想。因为蒋介石已经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联络，根本不可能指望他起来反英。另外，想以迫蒋反英，转而来减少他对人民的“进攻”，那就更是不切实际的策略了。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共同签署了一个联合宣言，在报上公开发表，即告《两党同志书》。宣言称：“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③ 陈独秀3月26日的谈话，还可以说是蒋介石甫抵上海面目还未完全暴露时的不切实际之想，但陈汪宣言发表于4月5日，则影响甚坏。陈独秀通过这个宣言，意在表白共产党的诚意，缓和紧张空气，但这恰为即将向上海革命群众开刀的蒋介石所利用，它的出笼麻痹了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以及许多工人的思想，使他们失去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警惕，后果是严重的。

---

①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

②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28日。

③ 1927年4月5日《申报》。

从上海广大的工人纠察队员和工人群众这一面来看，他们大多都仍沉缅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建立新政权的胜利的欢乐之中，对于征战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军及其领导者蒋介石基本都还保持着一种尊崇的态度，蒋介石对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群众玩弄欺骗的手段，他们一时不能识破。蒋介石刚到上海的时候，社会上即传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枪枝将被收缴。上海总工会派赵子敬往谒蒋介石，询问此事。蒋介石亲自接见赵子敬，拍着胸脯说："至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①"4月6日，上海总工会3000余名工人纠察队在闸北青云路集会，蒋介石派人前去向工人纠察队赠送了一面上书"共同奋斗"的锦旗。所有这些同样也松懈了工人纠察队的斗志，使工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麻痹大意的思想，因此，当蒋介石在短时间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就措手不及，迅速处于瓦解的状态。

4月9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已安排就绪，他让白崇禧和周凤岐担任淞沪戒严司令，并委派其心腹特务处长杨虎亲自监督阴谋计划的具体执行，自己则狡猾地离开上海避往南京。

4月11日，蒋介石正式下达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律实行清党"。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立即布置"中华共进会"的喽啰们迅速准备行动。二十六军的大批士兵开往全市各处，布满街头。蒋介石把3000多名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及其领导者看作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的最大威胁，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开刀。当晚，由杜月笙出面，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者汪寿华诱骗至家中，武力将其绑架，然后秘密送往郊外杀害。

12日凌晨，"中华共进会"的大批武装流氓从租界出发，分头前往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在闸北，4时许，有60余名臂缠白布黑"工"字袖装的"工人"向上海总工会所在的湖州会馆猛烈开

① 1927年3月29日《申报》。

枪，守在总工会门口的20多名纠察队员英勇还击。双方枪战不到10分钟，从黑暗中突然冒出大批二十六军武装士兵，喝令双方停战，其中率队的二师五团团长邢霆如向纠察队说："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的械。"说毕，将所有"工人"的武器全部收缴。这些"工人"毫无反抗地被士兵们用绳索捆绑起来。邢霆如对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①说："既有今夜这件事发生，请你们同我们到二师司令部见我们师长商议解决办法。"顾顺章偕6名纠察队员同往。在路上邢勃然变色："他们（指"工人"）的枪械既已被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命令卫队立即强行将顾等的武器缴下。随后，邢等重返湖州会馆，用机枪对准大门，命令所有的纠察队员、办事员都出来，将所有武器集中一边。接着大批士兵拥进总工会，就此将上海总工会占领了。

5时许，6名臂缠"工"字袖章的"工人"开枪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射击，守卫在楼上的工人纠察队员被打伤。当双方正在激烈对射之时，从宝兴路方向开来一批二十六军士兵，高呼"不要打，我们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调解的。"二十六军士兵到达门前，令纠察队开门。纠察队员见是国民革命军，毫无疑心地开门迎接。但大门一开，士兵们一拥而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搜索一通，将纠察队员的60余枝步枪全部收去。与此同时，印刷所对面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东方图书馆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约在5时20分左右，200—300名身穿军服臂上同样缠着"工"字符号的武装流氓向东方图书馆发起猛烈的冲锋，枪杀了铁门前纠察队副队长杨凤山。但这里防守严密，武装流氓从正面攻不进，就绕到图书馆后面的嘉庆里两面夹击。工人纠察队在每个窗口叠起米包，予以还击，从每个窗口里吐出的子弹交织成紧密的火网，使敌人不能接近图书馆。战斗进行到8时许，二师五团的大批队伍赶来，他们将

① 顾顺章在1931年时叛变投敌。

东方图书馆团团围住。那个邢团长向工人纠察队发出通牒："贵处与某方发生误会，此种不幸事件，应即时双方停战，敝部特派第五团邢团长前来调停，如有某一方面不服从调停者，即解决某一方面，调停时间以十一时为限。"过后邢团长命令全体纠察队员集合，他向纠察队员发表谈话说："二十六军系人民之武力，民众之军队，愿意保护你们纠察队。昨日晚上，我们敝部接到报告谓有人将于今晚冲突，同时总指挥部亦接到同样报告，故发下训令，命我们军部防备，今早又得到白总指挥的电话，要我们军队将双方缴械，我们已拿到反动派三十余人，将予严办。现在我只得奉长官的命令执行，你们可将枪械尽数藏起来不动，关起门来不要开枪……外间对于今早这件事情发生误会，最好由我们派一连徒手士兵与纠察队徒手游行一次，表示切实联络。"① 在武装流氓的袭击进攻和国民革命军的帮助镇压之间，工人纠察队迷惑了，邢团长的花言巧语使工人纠察队将二十六军看成了打击坏人的可靠力量，毫不犹豫地空手跟着一连士兵上街游行。但当大部分工人纠察队离开后，所有原来散布在宝山路一带的二十六军部队立即冲进东方图书馆，占领了每个房间，然后从楼上到楼下严密地搜索一通，将全部武器和重要财物都搜掠去。

在南市，凌晨4时45分左右，二十六军一师的一个营长率一个机枪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冲锋枪队带着4挺机枪将南市华商电车公司紧紧包围，对准公司的南北两大门，猛烈开火。一排排手榴弹也向公司内院狠狠掷去。6时多，公司的大门被冲锋队打开，守卫在里面的工人纠察队不得不全部缴械。凌晨4时30分，二十六军一师另外的一营兵力将南市工人纠察队总部三山会馆团团围住，限令纠察队全部缴械。纠察队不允，便用机枪猛烈地向三山会馆开火。纠察队被迫还击。双方相持到7点钟，已经攻下华商电

① 1927年4月13日《申报》。

车公司的部队也赶来参加围攻。困守在里面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

与此同时，在浦东、沪西、吴淞、江湾等处的工人纠察队都遭到了武装流氓的袭击和二十六军的武装压迫。到上午9时左右，上海总工会及各处14个地方的工人纠察队共计2700名工人武装纠察，全部都被解除了武装；在战斗中，约有120人牺牲，180人受伤。

以武装起义赶走直、鲁联军，支援了国民革命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竟遭到了"革命军"的缴械和残酷屠杀，全市震惊。上海广大的工人和各界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惩处凶犯，交还收去的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就在当天中午12时，上海100多个团体的5万多名工人和市民在闸北青云路的广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市民大会。大会议决：（一）拥护工人武装，（二）要求交还枪械，（三）拥护上海总工会，（四）游行示威，（五）发表宣言。会后当即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向湖州会馆进发。当到达湖州会馆时，游行群众高声呐喊，一拥而入，将上海总工会机关重新夺回。这一天，全市许多地方的工人、市民都举行了群众大会。一些区和行业的工会、妇联、学联、店员总联合会、国民党市党部等许多团体组织都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或派出代表前往白崇禧处要求他采取行动。下午，南市的30万群众冒雨整队前往龙华，向白崇禧请愿，坚决要求发还纠察队的枪械和释放被捕的工人。

上海总工会鉴于局势严重，上海的工人阶级已处于危急中，当天召开会议，决定上海工人再次进行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抵抗反动派的压迫。

13日，全市20万工人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举行了大罢工。上午10时，总工会再次在青云路广场举行群众大会，会上详细报告了前一天各处工人纠察队被军队缴械的情况，无限悲愤地指出：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是上海工人牺牲了不少生命，从直、鲁联军手中夺来的，其目的是在于武装自己和保障工会。现在工人纠察队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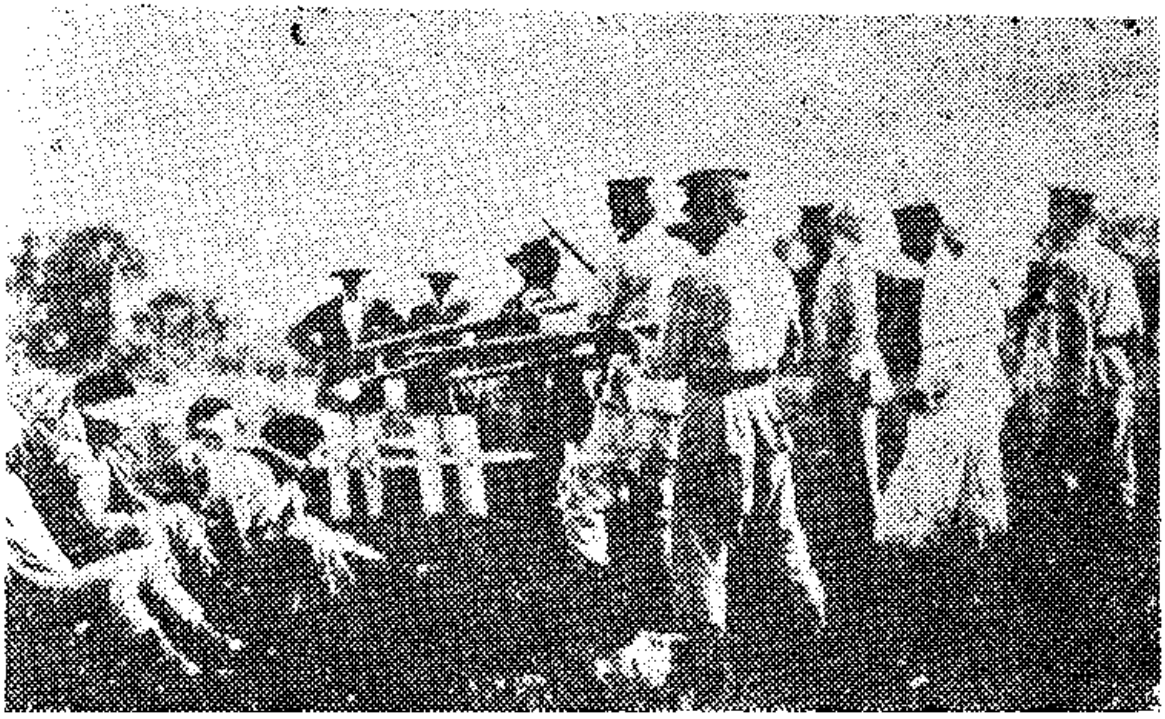
军队缴械，“工会已失保障，工人不能自卫，是无异摧残工人等之生命”①。大会议决下午再次举行游行示威，去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

青云路大会结束以后，下午1时，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等整队出发。队伍前由军乐队和大旗开路，继为工人纠察队、各工会队伍和劳动童子军，最后是社会团体的代表。游行队伍高呼“收回工人武装”、“为一切死难工友报仇”、“打倒新军阀”等口号，从青云路至东横浜路，再转入宝山路，当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守候着的二十六军的大批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冲出，向工人猛烈开枪，机枪不停地扫射。游行群众没有防备，来不及退避，纷纷中弹倒地。宝山路上尸体横藉，血流成河。当场牺牲100多人，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敌人在宝山路一带宣布特别戒严，每条里巷都分派武装士兵站岗，禁止任何人员通行。为了掩盖自己的血腥罪行，死者被迅速用大卡车运往郊外埋掉，一些重伤者，也被送去强行活埋。在这天下午，南市5000—6000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后，也举行了游行示威。当队伍经过南车站时，守卫在车站四周的二十六军部队也悍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当场打死了十余人，打伤数十人，又制造了一起血案。

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在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全部解除以后，反动派开始大规模地“清党”和镇压革命力量。13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通告取消上海总工会，另外设立了“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此后“一切有关工会之事宜统归该会完全指导办理。”②14日，上海警察厅奉白崇禧之令发布查禁工人集会的命令，宣布工人集会与罢工概以反革命论罪。原上海市总工会下属的区、行业工会组织纷纷被查抄封闭。同日，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① 1927年4月14日《申报》。

② 1927年4月14日《申报》。



枪杀革命群众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中国济难会、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等革命机关、团体，都被反动军警搜查封闭。一些同情工人纠察队，对当局行为有所不满的社会进步团体，也遭到了反动派的威胁取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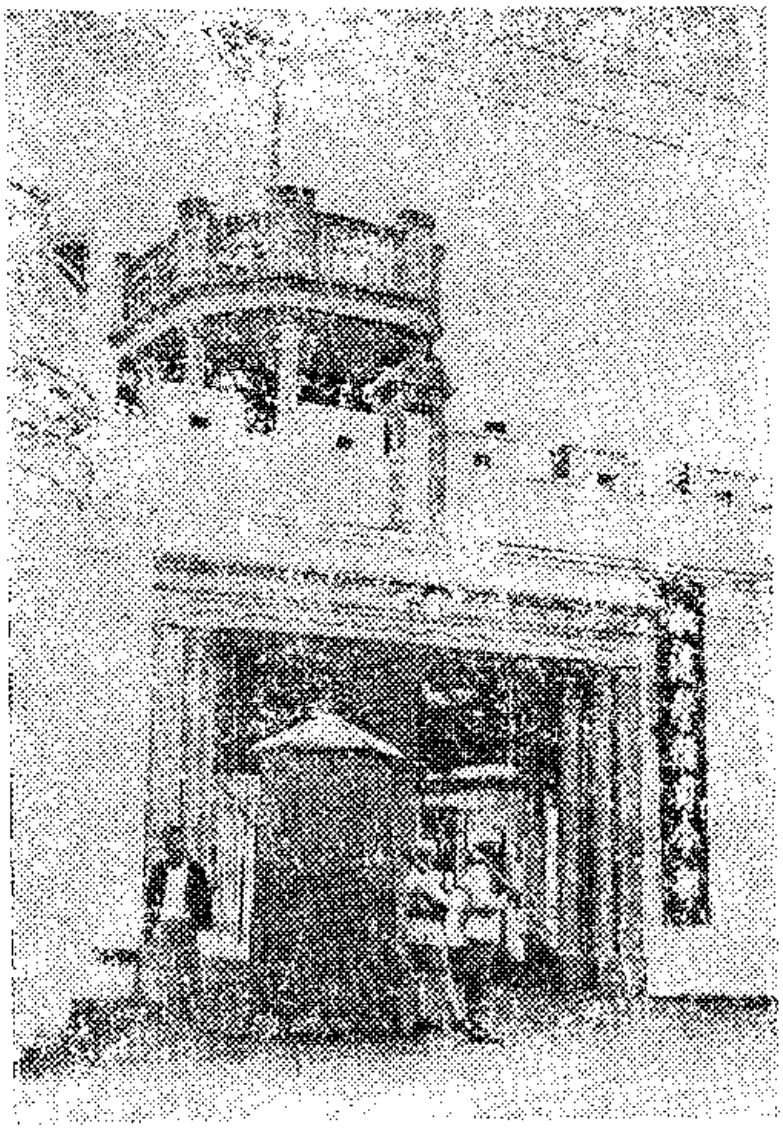
反动军警日夜出动于街头，在上海疯狂地大搜查、大逮捕、大屠杀，并大批通缉“危险份子”。仅仅只有 4 天的时间，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会领导者、革命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捕者就有 500 人，被杀者 300 人，另外逃亡或失踪者达 5000 余人。

腥风血雨，昏天黑地。上海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完全被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政变所篡夺了。蒋介石用镇压革命人民的卑劣行动，将上海变成了蒋记国民党的天下。

第二十章　国民政府十年统治

一、白色恐怖和郊县农民暴动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3月个以后，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导致国共在武汉一隅暂时维持的合作局面亦告结束。国民政府利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猖狂地反共反人民，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各



淞沪警备司令部

地。从1927年到1928年的上半年有337000多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到1932年以前，被屠杀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①。此外，失踪者不知其数。在上海，国民党驻沪特别军法处和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的特务、军警，并利用青红帮势力，到处搜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在城南枫林桥畔的特别军法处和警备司令部内及以后设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关满了被捕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他们在这里备受虐待和酷刑的摧残，最后大部分被送往枫林桥南和龙华的荒地、坟场中秘密枪杀。上海的报上每天都登载着"捕获共党"、"处决共匪"的消息，老百姓人心惶惶，他们把警备司令杨虎和特别军法处处长兼各军政治部主任陈群称为"狼虎成群"，暗中还流传着"白日青天满地红，青天白日杀劳工"的民谣，讥刺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血腥迫害。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考虑到武汉环境非常恶劣，革命力量不如上海强大，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相对来说，便于隐蔽；又可利用租界，开展工作，因此中央机关于9、10月间，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继续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但由于白色恐怖加上党内的左倾错误，中央机关以及上海地方党组织都遭到了敌人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少党的领导干部和优秀党员被敌人捕杀，英勇地牺牲了。

1927年6月26日，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遭到逮捕，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7月4日被杨虎杀害。7月2日，中共五届中委、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因叛徒出卖被捕，19日被枪杀于枫林桥南。1928年2月，中共五届中委、江苏省委委员许白昊、陈乔年、郑复它由内奸告密，先后被捕，6月6日，在龙华就义。同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英租界被捕，由工部局引渡给淞沪警备司

① 数字引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



逮捕共产党员

令部，21日在西郊被杀害。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不幸被捕，30日在龙华慷慨走向刑场，英勇就义。1930年4月19日，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也不幸在上海被捕，解往南京，第二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到杀害。1931年1月17日和18日，一批党内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分别在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举行秘密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租界当局出动巡捕前往大举逮捕，并将被捕者全部移解给淞沪警备司令部，2月7日夜间，24位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在龙华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集体杀害。在他们中间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林育南，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左联作家李求实、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共青团江苏省委委

员、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党的机要工作人员李文(女)，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青士，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女)，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何刚，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女)等。

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原先上海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各进步工会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和勒令改组，工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大批被捕被杀。上海总工会所属各产业工会及区工联等领导机构，均被迫转入地下，各基层工会委员会也都不得不进入隐蔽状态。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工会，指使流氓、工贼先后组织了“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工统会”)、“上海工人总会”、“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工整会”)等反动工会，在工人中招摇撞骗，挑拨工人内部的团结，打击陷害进步分子。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人数从82万锐减到了28万人。

1927年7、8月间，国民政府公布了所谓“上海劳资调节条例”和“上海解决劳资纠纷暂行条例”，成立了“上海劳资调节委员会”，限制工人罢工自由，并允许资本家在每年规定的日期可自由解雇工人。以后，又动辄借口军事上的需要，宣布戒严，严厉禁止罢工。在反动政府的保护下，中外资本家猖狂向工人反攻倒算，他们不仅推翻了大革命时期与工会签订的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的种种协定，而且大批开除具有斗争精神的老工人，代之以新的从农村招来的尚不了解工会的新工人。中外资本家还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工人阶级。1927年12月，上海棉纱业中的中、日、英三方的纱厂资本家就组织了一个“上海纱厂业联合委员会”，专门串通共同对付工人罢工和镇压工人的反抗斗争。在白色恐怖和工人运动低落的情况下，上海工人的生活日益恶化，失业工人越来越多。

上海市区党的活动和工人运动受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压迫和抑制，但这时上海四周的郊县的农民运动，却因为处于相对薄弱的

统治环境中，因此却并没有走向低落。在中共江苏省委和当地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各县农民根据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多次举行暴动，用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的压迫和剥削，使上海的斗争局面仍然展露出一种生机。

1928年8月，具有斗争传统的崇明西沙农民，在中共崇明县委书记陆铁强和县委委员俞甫才的领导下，发起抗租抗息斗争。在斗争中，革命队伍日益壮大。11月初，“崇明县革命军农工联合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党决定在11月15日举行全面暴动，还击敌人的白色恐怖。西沙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使国民党当局和地主土豪惊恐万分。国民党太湖督办、崇明大地主王清穆在11月上旬急派重兵开来崇明岛，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农民斗争。由于形势的恶化，暴动计划未能实行。

1927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巡视员陈云深入青浦、松江地区开展农民运动。陈云在青浦恢复了党对地区的领导工作，广泛发动群众组建了农民协会和农民革命武装，并促使郊县各农民革命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928年元旦过后，在陈云和青浦县委书记夏采曦、县委常委吴志喜、陆铨生的领导指挥下，小蒸的农民首先开始暴动了。3日上午，一支暴动队伍埋伏在小蒸镇西北方向的河道边。当一艘国民党水警的逼租船驶入伏击圈时，几支枪一起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昏头转向。5日傍晚，吴志喜率领一支队伍在小蒸之南一带的村镇，先后镇压了地主土豪5人，暴动者还在周围张贴了许多革命标语和布告，大造革命声势。为了取得武器，加强武装斗争的力量，以后几天中，暴动队伍又进攻了范浜新镇等处的团防局，并对一些团防局发动了政治攻势。他们从团防局和地主那里先后缴获和收到的枪支达40支左右，装备增强，声威大振。

与小蒸相近的松江枫泾农民，紧接小蒸暴动，也进行了暴动。

1月11日，武装农民处决了7个恶贯满盈的地主恶霸。12日陈云赶到枫泾与大家一起研究夺取枫泾的计划。当晚，约有500人的暴动队伍手持枪支、大刀、钉耙、铁条等向各处的自卫团发起进攻。除枫泾镇以外，周围自卫团的枪支全部被暴动农民夺到手。但是敌人从嘉兴和松江方面派来了大批的军警，在枫泾一带挨户挨村地搜查，许多抗租农民被捕，参加暴动的吴志喜和枫泾农民军指挥陆龙飞等领导人都被捕受害。暴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进攻枫泾的计划未能进行。

在小蒸、枫泾暴动浪潮的推动下，嘉定的农民也行动了起来。1928年3月，嘉定六里乡党组织抓住春荒时机发动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的"五抗"斗争。4月10日，六里乡农会会员等在嘉定县委书记沈金生、省委特派员周慰农等的带领下，包围了反动乡董傅企周的家，没收其财产分给农民，并放火烧毁了傅的房屋。农民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扩展到黄渡、外冈、朱桥、娄塘、马陆、方泰等地，参加暴动的农民由几十人增加到800多人。4月12日夜，400多名农民分三路进攻外冈镇，将镇上地主土豪的房屋都付之一炬。接着又攻打葛隆镇，冲进镇上的派出所缴获了4枝长枪和300多发子弹。自15日开始，党组织又连续组织农民在几处地方一共烧毁了地主房屋100多间，将他们的财物尽数分给贫苦农民。面对嘉定农民汹涌的斗争浪潮，国民党嘉定县政府连连向上司告急求援。4月下旬，国民党当局派出一营兵力前来围剿农民暴动。嘉定的党组织和参加暴动的农民不得不转入地下，用秘密斗争的方式继续与敌人较量。

为了加强党对上海郊县农民斗争的领导，1928年10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建立了淞浦特委，由杭果人担任特委书记，陈云担任组织部长。在淞浦特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奉贤县庄行的农民经过长期的准备奋起发动暴动。1929年1月21日，在杭果人、陈云、奉贤县委书记刘晓及庄行党支部书记盛一新等的率领下，约有

600 名农民群众拿着大刀、铁叉、棍子、长矛、土枪等向庄行镇挺进。当天晚上，他们将庄行团团围住，分三队人马向镇中攻打。一队攻打西市梢的公安分局，一队攻打东市梢的商团与褚泾庙内的公安分队，一队为放火队，切断商团与公安分局、公安分队的联系。经过艰苦的战斗，暴动农民先后攻下了这三个重要机构，将庄行镇反动武装全部击溃。暴动的农民接着拥入镇上一户户地主豪绅的家中，抄出各种帐册、地契、单据等，当街焚毁。又将他们的金银浮财全部予以没收。庄行镇上到处响彻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充满了一片欢乐的热闹景象。当第二天早晨县里大批反动军警赶来庄行时，暴动队伍已全部安全转移，反动派扑了一个空。

到 1930 年夏天，地处东海杭州湾北岸的南汇泥城一带也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泥城暴动”。长期以来，南汇沿海的农民、盐民、渔民深受地方当局的压榨剥削，苦难重重。在这里开展革命工作的群众基础较好。8 月 9 日，在中共南汇县委委员沈千祥和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黄理文的领导下，近千名农民、盐民、渔民汇集在小漈港外的海滩上，泥城暴动开始了。暴动队伍直奔小漈港盐厫，一把大火将其全部烧毁。接着向 10 多里外的横港公安分局进袭，当场击毙了敌分局长和 6 名警察，缴获了长短枪 10 余支。队伍又开进镇上大地主朱心田家，将所有的粮食、衣服、钱财全部分给贫苦群众。泥城暴动胜利后，队伍本来准备前往攻打南汇县城的，但因反动当局调兵遣将，大举前来镇压，因此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分头隐蔽下来，转入了地下。

上海郊县的农民武装暴动狠狠地打击了当地的各种反革命势力，同时引起了上海和江苏两地的反动统治当局很大的震动。由于这些暴动是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敌我力量悬殊，因此它们结果都失败，或者并未能继续开展下去，但它们充分证明了这一伟大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

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

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日益走向法西斯化。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加强对其内部的控制和监视，打击反对派及异己力量，蒋介石从上到下逐步建立起庞大的法西斯组织。1929年，CC系即后来被称为“中统”的特务系统成立。1932年又成立了后来被称作“军统”的“蓝衣社”特务系统。蒋介石通过这些特务组织，另外利用流氓、帮会等势力，用盯梢、恐吓、绑架直至暗杀的手段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同时，蒋介石政府还利用国家机器强行颁布一系列法律，使法西斯统治合法化。早在1928年3月，国民政府就颁布了一个《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凡“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是破坏三民主义”的各种行为都以“反革命罪”论处。1931年又颁布了一个《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扰乱治安者，私通外国图谋扰乱治安者，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均处死刑；凡“为叛徒购办或运输军用品者，以政治上或军事上之秘密泄露或传递于叛徒者，破坏交通等行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等。这个紧急治罪法实际是一个专门打击革命、镇压人民的法西斯恐怖法。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这一时期，“左”倾路线不断地在恶性发展，从瞿秋白开始，李立三、王明等党的领导人没有能正确地认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成长发展，因此错误地强调阶级决战、全线进攻等。在白区城市工作中，他们不同程度地提倡和采取了并不符合实际形势的许多左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形式，如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许多脱离群众的各种赤色团体，又经常无条件地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城市武装暴动等。结果暴露和孤立了自己，使革命遭到不必要的损失。在上海这种损失最为严重。这里是反动力量的集中地，军警、特务密布。国民党当局还公开勾结租界当局共同在租界中监视和镇压革命活动。党的中央机关、上海地方党组织以及革命群众团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暴露和破坏，斗争越来越艰苦。

1932年底，为了保存力量，取得有利的环境，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往已经建立的江西苏区。不久，在上海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央局，负责联系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及江西等省的党组织，并作为一个主要据点，帮助中央传递信息和处理中转事务等。

蒋介石政府疯狂地推行法西斯反动统治，加剧白色恐怖，使革命人民深受其害，连蒋介石集团的反对派、异己力量也不能免，受到严重迫害，这激起了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和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极大愤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不顾个人得失，毅然挺身而出，决心联合全国进步力量建立一个营救政治犯的组织，并通过这个组织揭露和抗议蒋介石政府的法西斯暴行。1932年10月，宋庆龄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提议组织一个特种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宋庆龄为此事专门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交涉，但并未得到结果。12月18日，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表宣言，公开宣布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明确地提出，组织同盟的目的为：(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

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12月29日下午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宋庆龄患病，未能出席，由蔡元培代为宣读了她给新闻界的书面讲话。在讲话中宋庆龄特别地提到："有一件重要事实我愿意强调指出。本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① 杨杏佛报告会务，同时宣布同盟在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临时执委会由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林语堂任宣传主任，并决定在上海公开征求委员，成立同盟上海分会。

1933年1月17日，中国民盟保障同盟第一个分会——上海分会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内成立。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邹韬奋、许申、吴汉祺、陈彬和、林众可、郭蔚然、胡愈之、鲁迅、周建人、王造时、郑太朴等16人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15条，发表了宣言，并投票选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九人为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由于盟章规定总盟执委不得兼任分会执委，在3月18日上海分会又进行了改选，除保留鲁迅和陈彬和外，补选郁达夫、洪深、吴迈、沈钧儒、王造时、钱华、宁明予七人为执委。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以同盟上海分会的名义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决议，并决定派员赴上海公安局调查犯人的待遇情况。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后除了成立过北平分会以外，在其它地区并没能按照计划建立分会，即使是北平分会因受到了破坏，实际只存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上海分会事实上是同盟的基本队伍。

从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起，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的领导下，总盟和上海分会的盟员积极地开展了各种活动。1933年5月，

---

① 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上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为新中国奋斗》第43页。

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严重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暴行，以援助恐怖统治下的德国政治犯和牺牲者。同年9月，同盟在上海秘密地安排举行了世界反帝大同盟的远东反战会议，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反对国民党围剿苏区红军等一系列的决议。总盟和上海分会的盟员还不断地发表宣言通电各方，为维护人民的民权而到处奔波，他们特别在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的知名人士中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如：

1.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是国际赤色工会远东分会上海办事处的秘书和共产国际远东局①的秘书，其夫人是他的助手。因中共党内叛徒的出卖，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寓所被租界当局逮捕，随即被引渡给国民政府。在狱中，牛兰夫妇为了抗议国民党的迫害，多次绝食。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内外的进步人士为营救牛兰夫妇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在成立以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继续进行积极的营救工作，并给牛兰夫妇及其狱外的孩子以极大的关怀。宋庆龄还随同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亲往南京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不敢对牛兰夫妇下毒手。

2.营救陈独秀

1932年10月，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民权保障同盟会成立以后，杨杏佛等继续为营救陈独秀而进行宣传、奔走。蔡元培于1933年去苏州监狱看守所探望陈独秀，并在同年4月为《独秀文存》写序言，以行动表明对陈独秀被捕的抗议。

---

① 该局设于上海。

3.营救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等北平爱国师生

1932年的12月，北平反动军警逮捕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各校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接着又拘捕了各校大批爱国师生。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联名致电蒋介石、宋子文和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要求立即释放爱国师生。民权保障同盟又分别给北平市长、公安局长和南京中央党部拍发了营救电。后许德珩很快被释放，大部分爱国师生都获释。不到一年，侯外庐、马哲民也被营救出狱。

4．营救陈赓、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谭国辅5名革命者。

陈、罗、廖、余、谭5人于1933年3月下旬，在上海分别被国民政府逮捕。4月1日，宋庆龄发表了庄严的《告中国人民》，其中写道："昨天被捕和引渡给国民党的五个人，正如所有与他们遭受同样命运的同志们一样，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①。4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和上海分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4月5日，宋庆龄亲自率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赶往南京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司法部长罗文干提出四项书面要求：①即刻释放一切政治犯。②废止滥刑。③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④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当晚代表团去监狱探望了陈赓、罗登贤、余文化、谭国辅四人②。回上海后，民权保障同盟继续进行营救活动，并积极进行宣传工作，扩大社会影响。

---

①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45页。

② 廖承志此时已被释放。

5.营救左翼作家丁玲、潘梓年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左翼作家丁玲、潘梓年。5月23日，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林语堂、陈彬和、胡愈之、郁达夫等联合文艺界人士共38人，通电南京汪精卫、罗文干营救丁、潘两人。5月25日民权保障同盟还专门成立了"丁潘营救委员会"，进行宣传、募捐工作。在为营救丁、潘募捐的启事中写道："我们要以这个斗争展开阵线向蓝衣社戕害工人、学生及知识份子的恐怖猛烈进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受迫害的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大力奔走呼吁，进行了许多的营救活动。他们毫无畏惧地站出来公开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手段，无情抨击它的黑暗统治，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恐，特别是民权保障同盟的广泛的宣传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舆论影响，国民党反动派甚感狼狈。他们因此不断地对同盟进行攻击中伤。如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报刊诬蔑同盟是"由杨杏佛献策"，由宋庆龄组织起来的，"抱住国际共产党的粗腿"的组织，扬言它的成立根本"不合民运法规"①。南京市党部大肆诬蔑同盟是"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的组织，竟要求最高当局下令"解散该团体"②。

但诬蔑恐吓并没能使同盟退缩，蒋介石政府密谋用法西斯手段来对付同盟，杀害它的领导人。由于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蔡元培为国民党元老，威望素著，国民党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加杀害，他们便决定对杨杏佛开刀。1933年6月18日晨8时，杨杏佛与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小佛乘一辆篷盖车准备去大西路骑马锻炼，汽车刚从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国际品交换处驶出，早已守候在马路边的4名戴笠手下的军统特

① 陈漱渝、陶沂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民国史资料丛稿)第180页。
② 陈漱渝、陶沂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民国史资料丛稿)第183页。

务立即冲上前去从四面向车内开枪。枪声一起，杨杏佛迅即扑倒在小佛身上，使儿子免受其害，杨杏佛自己却连中三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尖。当杨杏佛被送到医院后，很快就逝世了，时年仅40岁。

杨杏佛的被谋杀震惊了上海，震惊了国内外的舆论界。这是蒋介石犯下的又一个滔天的罪行。但是，国民党的屠杀、恐怖政策不但不能把民权保障同盟和广大革命人民压垮，相反只有使他们更加认清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凶恶面目和反动本质，更加激励他们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争取人民的自由、解放去进行不懈的努力奋斗。在杨杏佛被刺身死后，民权保障同盟和宋庆龄、蔡元培都发表抗议。宋庆龄所发表的声明，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民权保障同盟以及一切革命的人民当时的思想和意志："这批人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其领导成员的政治信仰与主张，本不一致。鲁迅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是坚决的。"② 鲁迅自然也是坚决的，他为杨杏佛送殡，连房门钥匙也不带③，以示不回的决心。送殡回来，鲁迅写的一首绝诗传诵一时："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但是，也有人退缩了。林语堂就

① 宋庆龄：《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为新中国而奋斗》第73页。

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10页。

③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161—162页所载《冯雪峰谈民权同盟》。

是。他要求同盟停止工作，说否则同盟的会员都将遭到杀害①。诚然，同盟并不是因林语堂的要求而停止工作，但在事实上，这个组织的工作无法进行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计存在与活动时间，不过半年，然其影响于国内外者，甚大甚著。

三、特别市和大上海计划

在"四·一二"政变以后的第6天，即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迅速成立了国民政府，以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立即对上海表现出特别的重视。这主要是由于上海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巨大重要性所决定，且上海西距南京仅300多公里，作为交通枢纽，上海成了南京的门户和出入的重要通道，因此具备了"绾毂南北"和"屏蔽首都"的特殊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因此破格将上海定为特别市。

5月，南京政府任命国民党元老黄郛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由此至1937年4月为止的10年期间，国民政府陆续委派张定璠、张群、吴铁城等人前来担任上海市长②。

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正式成立，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蒋介石特地从南京飞临上海参加，在会上蒋介石发表"训词"，强调上海对自己整个统治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盖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

---

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150页宋庆龄《追忆鲁迅先生》。

② 十年中各市长在任期为：黄郛1927年7月7日(就职)——1927年9月；张定璠1927年9月——1929年3月；张群1929年4月—1932年1月；吴铁城1932年1月—1937年4月，4月吴调任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上海由原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代理市长，直至抗战爆发。

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则不能有头绪……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① 接着黄郛在就职演说中同样也强调了上海在全国的突出地位：“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轮轨辐辏，商贾云集。近且密迩首都，资为屏蔽，于军事、政治、外交、金融各端，莫不属全国中心，而为之枢纽。中外观瞻所系，关系实为重要。”②

新成立的特别市市政府进行了全面的新型的组织机构建设，以便管理和控制整个上海华界。在分别接收了沪北工巡捐局、上海市公所、上海县会丈局以及淞沪商埠督办公署下属所有机构以后，市政府建立了秘书处和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公用、教育、土地、农工商、公益等9局，不久将公益局撤销并入于其他局内。在第二年，市政府又将农工商局改为社会局，另外又成立了一个港务局（后裁撤）。各局下设科、股，并制订了各项章则，公布施行。1927年11月，市参事会成立，后过渡到临时市参议会。在军、警方面，1927年9月，上海正式组织了淞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年又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1933年，市长吴铁城还亲自兼代警备司令。为了加强法西斯专制统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在1932年，于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之外，又特设了一个市保卫处。在以上种种机构以外，市政府另外还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色委员会。通过所有这些机构，加上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国民党市党部，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就建立了党、政、军、警一整套的组织系统，建立了管理上海华界的最高统治机构。

在地域上，南京国民政府破例划大片土地作为上海特别市的范围。除原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辖的上海县全境和宝山县1市5乡之地仍归上海以外，另又增划宝山县属的大场、杨行两乡，松江、

①② 1927年7月8日《申报》。

青浦两县所属七宝乡的一部分，松江县莘庄乡的一部分和南汇县周浦乡的一部分，归上海特别市治辖。这样上海就跨有上、宝、松、青、南5县之地，拥有市乡计共30个，占地面积494.67平方公里，单从面积上说，确也堪称为"大上海"了。但市界虽经中央政府命定，由于江苏和上海划界上的种种困难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地方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到1928年的7月，市政府实际只正式接收到上海和宝山两县的17个市乡，其余尚须缓行接管。为了与以前的行政区划有所区别及管理上的方便，市政府将旧市乡一律改称为区，17市乡先行改为如下17区：沪南区、漕泾区、法华区、蒲淞区、闸北区、引翔区、殷行区、吴淞区、江湾区、彭浦区、真如区、高桥区、高行区、陆行区、洋泾区、塘桥区、杨思区。这是近代上海设市划区之始，是上海出现近代城市意义的区的行政范围之始。在行政区以外，上海市又有自治区域之设。1930年为了筹备所谓的地方自治，根据地理的便利和户口的疏密，市政府将市境又划为40个自治区，在自治区内组合"区、坊、闾、邻"。一自治区分成十坊，一坊分成二十闾、一闾分成五邻，五户合为一邻。这实际上是国民党在上海实施的新的保甲制度。但接着因日寇侵略，时局动荡，"加以财力亦复短绌"，① 上海的这个"地方自治"并没有继续下去。

南京和上海是国民党政府确定为特别重点进行开发建设的城市，国民党需要将这两个城市营建成为国内最为优良的城市，作为自己理想的统治基地。对于上海这个"中外观瞻所系"的都市，由于已经有了国内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外国租界的缘故，人们很容易将国民党华界与租界进行比较对照，因此更加"非有完善之建设不可"，一切"当比租界内更为完备"②。

从上海特别市成立始，市政府就在筹画如何开发建设上海。但

① 《上海市政概要》第十一章《自治》。

② 《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上的训词》，见1927年7月8日《申报》。

市政府管理的这个上海是一座充满矛盾的特别畸形的大都市。尽管从整个上海城市来说，其近代化的程度优于国内所有其他城市：它已经有了延伸很大的港区和通向南北的两大铁路线，在杨树浦、闸北、沪西、高昌庙等处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工业区，在租界的中心地已形成高度繁华的商业区和高楼林立的金融区，在市中区（主要是租界）已经有了棋盘型的交通道路和富丽的建筑群。但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在上海仍旧保存着"国中之国"式的租界，使得整个上海仍然处于"三界四方"的支离破碎的奇异局面。这就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横亘于城市的中部，华界南市和闸北被拦腰截断，分处南北，两者的市政建设都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直还在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们在西北面、西面和西南面有着大片的越界筑路区域。以公共租界为例，这时它的北区的越界筑路面积是 1700 亩，而西区越界筑路面积竟达 45840 亩①。这些越界筑路区域大体上在帝国主义当局的控制管理之下，其市政建设也就部份地按照它们的殖民利益盲目地发展着。帝国主义的侵占，上海城市建设的多元化和无政府状态，还造成了上海城市布局和功能上的混乱：整个城市没有整齐的、有效率的交通网，建筑物参差不齐，公用事业的管道各界自成系统，极为纷杂混乱，上海港区和铁路互不衔接……此外，由于近代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和畸形发展，由于上海作为一个都市的特殊地位，上海的人口一直在大幅度地增长，城市压力大大增加。作为连锁反应，上海的居住、交通、卫生、治安等各种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且愈趋严重。而所有这一切对于基础较差的华界尤为突出。

面对着这样一个奇特的畸形发展的城市，国民党政府究竟准备如何着手来进行开发建设呢？

---

① 《驻沪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三卷。

最现实的问题是租界如何处理。在五卅运动以后，尽管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收回租界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汉口、九江的外国租界也已在1927年上半年收回。但是，由于上海的租界与众不同，它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侵略的大本营，是它们在华利益的主要汇聚地，因此这是它们无论如何也要死守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这就加重了收回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在国民党政府这方面，在北伐军进驻上海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都没有着手将上海外国租界进行收回。蒋介石政府虽然发表了废除与各国所订已满期的旧约和另订新约的宣言，但实际所为，只是限于不彻底的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对上海租界的收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无积极的思想和积极的外交活动。国民党政府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上台的，今后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帮助，因此它对殖民主义各国在华势力仍然执行妥协退让的政策。此外，上海租界收回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也更使蒋介石政府不敢在这方面跨出实际的步子。

国民党政府既然并不从收回上海租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就只能在不触及收回租界，不损害帝国主义在上海已有利益的前提下，来考虑改造和建设上海的计划了。这就是必须绕开租界，仅仅在华界迈出步伐。国民党政府的思想基点是："以上海言，所以能有今日之发达，无非因其为东亚唯一大港故。今若欲继续增进上海之地位，则港口之开发，实有必要。"① 港口这个进出口咽喉，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国民党政府确实想努力开辟，并将其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当时的华界，南市主要是破烂的旧区，闸北离黄浦较远，无港务之利。浦东虽可开发，由于黄浦江横亘其间，交通不便。于是上海市政府把目光落到了黄浦江的下游，浦西吴淞和江湾之间的大片未经开发的土地。在他们看来，即使租界收

① 上海市工务局局长沈怡在中国工程学会的演讲《市中心区域建设计划》。

回以后，“现在之租界，是否可以为将来上海全市之中心，殊属疑问……就现状加以推测，苟吴淞开港有实现之望，而现有铁路之布置可以变更，则江湾一带，必不难一跃而为未来之市中心”①。他们认为，如果华界出现一个新的市中心的话，它将一定可以和上海现有的外国租界相颉颃。

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这一步终于跨出了。1929年7月，市政府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划定上海市区外东北方向的江湾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及周南十图、衣五图以西的土地约7000余亩，作为新上海的市中心区域。8月，成立了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以后由该委员会陆续提出了市中心区域的分区计划、道路计划，黄浦江虬江码头的建造计划，以及上海市市分区和交通计划等。这些计划构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大上海计划”，也称“大上海建设计划”或“新上海的建设计划”。

“大上海计划”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市中心区域计划

1.分区计划　将市中心区域划分为政治区、商业区和住宅区三个区域。政治区位于市中心区域的中央部分，即南北、东西两大干道交叉点的周围一带。市政府各局、市党部、市参议会、市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和重要的公共建筑都设在此区内。市中心区域的北部临近未来的吴淞港，并靠近铁路总站，商业区设立于此。另外主要干道两侧也划为商业区。除去政治区、商业区，市中心区域其余部分都作住宅区。住宅区分为甲乙两等。甲等建于园林、空地近旁，数量较少，为高等住宅区。乙等建筑数量多，面积大，为普通住宅区。

2.道路系统计划　整个市中心区域造成一个纵横交叉，紧密而又整齐的交通网。区域内道路设计为干道和次要道路两种。干

① 上海市工务局局长沈怡在中国工程学会的演讲《市中心区域建设计划》。

道呈辐射状，由区域中央向周围伸展，联系吴淞港、虬江码头、铁路总站和上海其他各个区域。干道宽度最高为 60 米。次要道路是适应区域局部交通所需，采用棋盘式或蛛网式，宽度在 30 米以下。

第二，港口铁路计划

在租界以外，黄浦江下游吴淞地方江水较深，市中心区域东端虬江口沿江一带也可停泊吨位较大的轮船，决定先在虬江口建造码头。虬江码头岸线确定为 1400 米左右，面积约 800 余市。在内河运输方面，上海至江浙内地运输大都取道吴淞江，下游两岸并有工业区，拟积极对吴淞江加以疏浚。另外，如果市中心区域一旦建立，蕴藻浜将成为上海对外水运枢纽之一，因此设想在一定的地点开凿一条运河，把蕴藻浜和吴淞江联结起来。铁路方面，货运总站和客运总站必须分立，为此，原京沪、沪杭甬铁路在上海的线路必须改道。计划客运总站设在市中心区域西境外、江湾镇东北的中山北路旁。货运总站设在真如。两站之间增辟新的线路以相联系。另外从真如至大场向北筑两条支线，一支通往商港区各码头，一支经蕴藻浜工业区，直达吴淞炮台湾。

第三，全市分区计划

“分区制为城市设计之基础”。市中心区域既经划定，全市的分区规划也应进行。计划将整个上海城划分为五大区域：行政区、工业区、商港区、商业区和住宅区。新的市中心区域中央部分为行政区；除保留吴淞江及蕴藻浜下游两岸和高昌庙沿黄浦一带已有工业区外，还确定真如——大场附近为未来的新工业区。以后建造的吴淞港和火车货运总站之间的铁路线将横贯这两个工业区；吴淞镇以南，殷行镇以北沿江一带为商港区，并打算将对江浦东岸线作为商港区的扩充地带；除保留租界方面已经形成的商业区外，确定市中心区域和沪南旧县城城厢一带为商业区；江湾、大场之间，租界与沪南区的西部，以及真如、梵皇渡、法华镇、龙华镇、漕河泾各点的周围确定为住宅区。

第四，全市道路系统计划

计划全市干道共20余条，总长度约500公里。以市中心区域为中心，拟从宝山镇起筑一大道，渡蕴藻浜，经江湾镇接北四川路。再经租界区穿上海旧县城、南车站，过江接上南公路直达闸港镇。此为主要南北干道。拟自江湾镇向东由翔殷路到达浦滨，向西则经大场与沪太路相接，此路为主要东西干道。除全市干道系统计划外，另对沪南、闸北、沪西、浦东等局部区域的道路系统都分别制订了具体规划。

“大上海计划”是近代上海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规划，具有开创性。这个计划包含着一定的振兴华界，与外国租界媲美、抗衡的意图，因此客观上是积极的。从计划的具体内容来看，不乏可取之处。首先，选择在黄浦江下游建造虬江码头，并打算将来在吴淞开辟新港的设想，抓住了上海城市建设的重点。因为上海是作为长江口的港口城市而发展起来的，港口直接关系到这个城市的对外贸易，关系到这个城市的工、商、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前途。因此，只有掌握这一重点，才有利于城市经济的繁荣。从地理上来说，虬江和吴淞一带的江岸，接近长江口，腹地较大，交通方便，远比旧有的黄浦江港区位置优越，因此以这两地作为新港区，确是比较理想的。其次，上海当时已是一个具有3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原有市区（包括租界和华界）人口拥挤，建筑稠密，地价、房租昂贵，市民居住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开辟新的市区，对上海城市的发展，对解决城市住宅问题，有其现实意义。此外“大上海计划”中有关城市按功能划分不同的区域，港口和铁路互相衔接，交通道路系统化等等计划，都具有合理性。所有这一切正体现了我国的一些城市规划设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希望改变上海城市面貌的明知灼见的一面。但是，“大上海计划”又存在着根本性的、严重的问题。由于受着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计划自身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而开辟新市中心区域的计划，又决定其实行的难度

将是非常大的。第一，“大上海计划”是在承认被帝国主义侵略者霸占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继续存在于上海城市内部的前提下提出的，国民政府对租界无权过问，因此这一计划不能包括整个上海地区，它的有效性实际上只是华界而已。由于对租界没有管理权，所谓“大上海计划”从根本上说来，只不过是上海的区域计划。由此，计划中的所谓按功能划分城市区域（如将租界划为商业区），全市交通网系统化（如将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域也进行规划）等等的内容，就纯属纸上谈兵，完全不可能实现。此外如果单单实行区域计划的话，从长远来说，难免要失去改造和建设整个城市的全局性和完整性。第二，“大上海计划”的核心是市中心区域计划，这是一个离开原市区去另辟新区的计划。从一个方面来看，江湾“地势平坦，村落稀少”，开辟新区“可收平地建设之功，而无改造旧市区之烦”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即从近代上海的历史进程和整个上海城市的改造和发展来看，这个计划又是一个避开近代化的市中心，被迫抛弃开埠以后已经具有80多年历史的上海近代城市的精粹，抛弃可以使上海城市更快、更顺利发展的原有基础（这里既包括租界也包括华界南市和闸北）的一个计划。平地草创，固然没有改造旧区那种累赘，但在草木丛生的郊野开辟新的城市中心区就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市政工程设施必须齐全，生活服务、文化教育设施必须跟上，通向这个区域的道路系统必须周密安排，而为这个消费区域提供经济基础的现代工业区域也须考虑兴建。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说，一个新区的创建并能对市民具有充分的吸引力，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才能逐步达到。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力量和以后取得的有限成果及不知何日才能完成的实际工作过程相对照，可以看出“大上海计划”中的移动市中心，开辟新市中心区域的计划，从指导方针到具体内容都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① 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

色彩，而这正包含了它必然走向失败的主观的因素。

国民政府一成立，就忙于新军阀混战，忙于围剿工农红军，巨大的军费支出以及战争对国民经济种种破坏，使它从上到下根本没有经济实力来实现这一计划。中央政府虽然明知上海地位重要，为了抓住上海这个地盘，必须加紧开发建设上海，但"大上海计划"制订后，却并没有给上海拨过任何款项。上海市政府要实施这个计划，只有从上海市民中来集资了。就在划定市中心区域的当年，即1929年，市政府为"筹建设之经费起见"，开始发行市政公债。该年度的市政公债发行额总计为300万元，以本市房捐收入作为担保，定于1937年前分14期偿还。在市中心区域计划公布后不久，市政府又采用了"招领"市中心区域"余地"的办法。当市政府会议刚一通过划定市中心区域范围的决定，便立即宣布停止该区域的土地买卖过户。接着以市政府的名义按当时的地价（约1000元左右1亩）在这个区域内收进了土地5400余亩。为了筹集开发这片土地的资金，市政府对这片宽广郊原的繁华前景作了动听的宣传，以鼓动市民前来投资。1930年7月，市政府正式宣布第一次"招领"区内的"多余土地"，以供市民"建造楼房"。招领的土地位于市中心区域的西区，面积达829亩。招领的土地分甲乙两种。甲种每亩收费2500元，乙种2000元。通过这次招领，共收到1755560元①。市政府从中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因招领土地之法对吸引资金十分有利，于是同年10月进行了第二次"招领"，一九三五年春天又进行了第三次招领。

"大上海计划"从1929年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进行和完成的实际工程主要有以下几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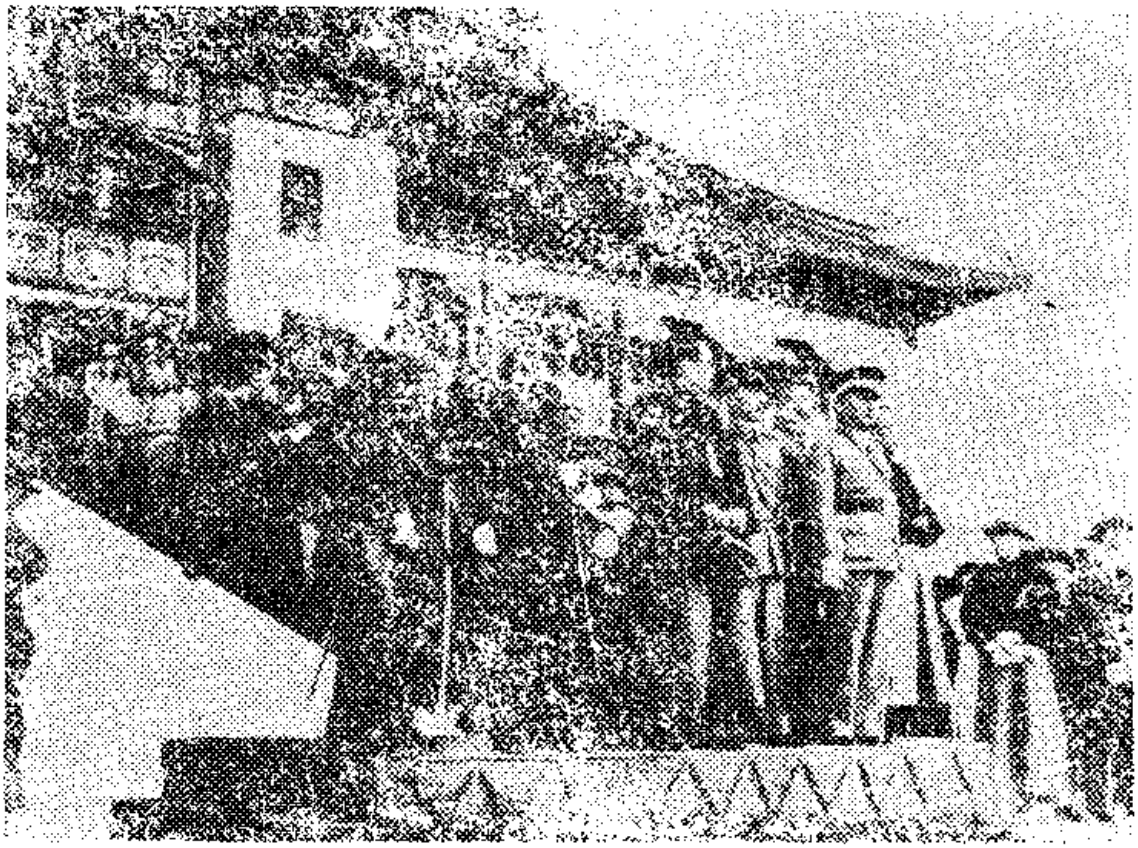
（一）开辟道路

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在市中心区域内开辟了较多的马路，

① 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上海市市中心区域招领土地说明书》。

另外市政府在城市外围也修筑了一些道路。这些新辟道路中的主要干道有：中山北路、其美路（即今四平路）、黄兴路（即今宁国北路）、三民路（即今三门路）、五权路（即今五星路）、浦东路（即今浦东南路、浦东大道）等等。

（二）建造市政府新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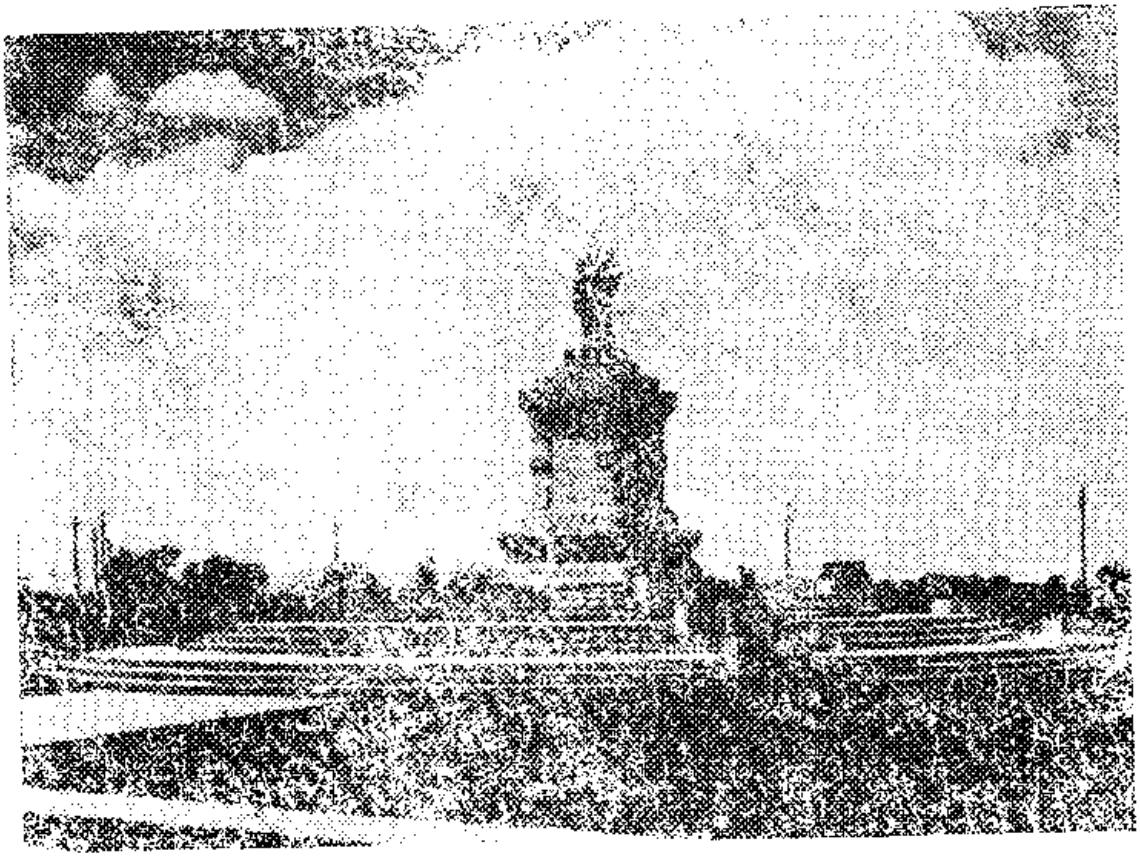


江湾上海市政府新厦落成典礼

政治区是市政府所在地，是市中心区域的主区。上海市政府划地一千亩，首先开辟政治区，以供建造市政府新厦和其他设施之用。

为具有适宜的建筑形象，1929 年 10 月 1 日，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公开悬赏征求市政府新屋设计图案，悬赏奖金高达 3000 元①。次年二月得奖图案揭晓，但当局对各种图案并不满意，于是

① 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上海市政府征求图案》。



江湾市政府新厦北侧的孙中山像

取其所长，集大成而另作设计，采用了“涂彩中国古典梁柱式”大楼的建筑式样。1931年6月，市政府新厦正式开工，至第二年1月中旬，工程已告竣十分之七、八。但是“一·二八”战争爆发，日寇进攻上海，市中心区域正好位于战区之内，工程被迫停工。3月，上海实现停战，但沪北战场满目疮痍，处处废墟。上海市政府尽管此时“市库支绌”，又需要进行大量的善后工作，但对市政府新厦这一关系到其统治据点的工程，又立即紧紧抓住，千方百计为工程筹集经费，七月又重行开工。这次工程又进行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到1933年9月完工落成。同时落成的还有社会、土地、卫生、教育、工务等五局的临时房屋。同年底，市政府和上述五局相继迁入市中心区域新楼，于是大上海市中心区域的“行政区”（也称作“新市行政区”）宣告成立。

（三）建造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和市卫生试验所

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拟在区内建造一些配套的体育、文化和卫生设施，但建造这些设施需要巨额经费。“一·二八”事变后大量的善后工作必须进行，而市库库金却捉襟见肘。为了能使这些工程迅速上马，1934年初，市政府在与各局磋商以后，决定再发行1934年度上海市政公债。公债定额为350万元。为了能顺利地收到这笔款子，市政府同时宣布这项公债除由市政府“无条件担保”外，还以汽车、运货汽车、机器脚踏车及脚踏车牌照捐作为“该公债之第一担保品”①。

1934年8月，上海市体育场在市政府新厦西南方向正式开工。体育场规模很大，占地达300亩，“建筑之伟大，范围之广袤……其于体育场之地位，目下远东殆无与匹”②。在建造体育场的同时，附近还建造了体育馆和游泳池。

同年12月，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也正式破土动工。它们分别建于市政府新厦的南面，“取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之混合式样”③，东、西两楼遥遥相对。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同时动工的还有上海市医院和市卫生试验所，它们建在市政府新厦的东面，两座大楼互相毗连，作为未来“全市之医药中心”④。

至1935年下半年，体育场（包括体育馆和游泳池）、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和市卫生试验所五项工程先后竣工。

（四）建造虬江码头第一期工程。

市中心区域委员会早在1931年12月就拟订了建筑黄浦江虬江口码头的计划。这个计划中的虬江码头建造期长，规模十分巨大。全工程拟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工程开始以后，第二期工程于第三年动工。而第三期工程在第十二年才能开工，全工程共需14年完成。3年工程的总经费（包括工费和地价）据估计共需1417

① 《上海发行市政公债》《市政评论》第二卷第五期。

② 1936年《上海市年鉴》。

③④ 1936年《上海市年鉴》。

万元。对于这样巨额的资金，计划设想通过“或投资，或借款，或发行公债”① 等办法来筹集。

黄浦江虬江口码头计划公布不久，“一·二八”战争爆发，市政府除应付市政府新厦等几个公共建筑外，对巨大的码头建设工程根本没有力量进行。因此这个计划拖拖拉拉，一直搁到1934年11月，因中央银行觉得此事有利可图，于是名义上算是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复兴“国民经济”，又算是“协助市府计划之实现”②，才决定投资200万元，承办虬江商港的若干码头和仓库的建造。1935年2月，中央银行和市政府在拟定了兴建虬江码头“互惠办法”四条后，即成立了“虬江码头设计委员会”，5月虬江码头正式动工建造，到1936年秋后，所定工程大体完成。

“大上海计划”虽然进行了以上数项工程，但是总的实施的境况越来越恶劣。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财政一直处于支绌的状态，1927年和1928年上海市的财政收支大致还能达到平衡，但从1929年开始已入不敷出，1929年财政差额为23万9千元。1930年为136万元。1931年为167万，1932年为97万4千元③。以后几年，上海市的财政更是每况愈下。市政府在“招领”土地和发行市政公债中确实得到了一笔收入，但工程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这两笔收入，国民党政府对计划的继续进行在经济上显然已无力承担。“大上海计划”在进行过程中，又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深入侵略我国之际，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华界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损失惨重，战后的上海不得不进行大量的战后恢复工作，难以再顾及上海的新的开发和建设。

外患日重、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使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大上海计划”的实现变得非常地渺茫。在1937年的《元旦告市民书》中，

---

① 上海市市心中区域建设委员会《上海市建筑黄浦江虬江口码头计划报告书》。

②③ 1936年《上海市年鉴》。

计划的总负责人、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回首既往，过去之五载实在予人以惨痛之教训……都市问题复杂，……终以限于财力，格于环境，不获副原有之期望。"他不得承认："市府成立，兹甫十稔，既往之成就与将来之理想，其间距离，正复甚远……"①

在实际工作方面，仅仅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部分——市中心区域计划的执行，自1936年底至1937年初已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1935年图书馆、博物馆和体育场等公共建筑建成后，其他大的工程就再也没有进行过。虬江码头第一期工程结束后，远比第一期工程大得多的第二期工程，自后包括中央银行在内都无人敢来问津，衔接虬江码头的铁路线尚未开辟；密如棋格的交通网难以全部完成；旷土空地上的住宅建筑要等待市民来自建。

但更可悲的是，"大上海计划"的丧钟提前敲响了，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上海，这个宏大的城市发展计划随着上海的沦陷，被迫宣布完全结束。

四、官僚资本大本营和民族资本的衰落、破产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搜刮民财，以遂其私，他继续寻求资产阶级，特别是近在身旁的江浙财团的财力资助。就在4月12日的当天和以后的几天中，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表示蒋介石军队"度支紧急"、"库藏非常支绌"，财政所需"急于星火"、"不容刻缓"②。要银钱两业赶紧设法再予续垫银洋300万元。蒋介石自己则不止一次地亲自发电给上海银行界的巨头陈光甫，要其转告上海商业联合会："日来军事进展，饷项奇绌，"催促商业联合会立即将前已

① 1937年《上海市年鉴》

② 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第53页。

承允捐助的300万元筹足送缴南京，还说："革命成败，国家存亡，全在此举"①。

江浙财团这时对蒋介石的清党镇压革命，打击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拥护和感激的，他们还十分地幻想蒋介石会制订发布新的政策，来"保护实业，维持金融"，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对蒋介石的要求表示"愿作后盾"，"军需急迫，商民应效驰驱"②。在4月25日，由上海银钱两业向蒋介石政府献垫了300万元。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军费开支空前庞大，蒋介石既要镇压革命人民，又要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争权夺利，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经费。上海银钱两业几百万元的接济无济于事，在金融资本家钱新之等的策划下，蒋介石决定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4月底，南京政府指令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出面，正式发行这种库券3000万元，于5月1日全数向江浙资产阶级摊派。库券月息7厘，指定以江海关所收的全部二五附税作为偿还本息的基金。为了加强这次发行的信用和影响，还专门组织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基金保管委员会"。基金保管委员会除由中央特派员和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外，还让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等各商界团体派出代表参加。但在这3000万以外，蒋介石还明令指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预垫二五库券1000万元，接着，在1928年初，南京政府财政部又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4000万元，向江浙资产阶级继续广泛地进行摊派。在这以后，南京政府又接连发行了数种公债。

在工商业并不十分景气的情况下，如此大额的，接连的摊派，损害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和企业的基础，因此上海的大小资本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第63页。
② 同上第62页、第63页。

家明显地开始表现出不满和抵触。

第一次"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的3000万元，按拟定上海银钱业为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等商会为300万元，上海绅商为1000万元，江浙两省为1200万元①。上海各商会、行业将所承担的库券层层向下属各公会、公所等全面摊派。如上海商业联合会多次开会动员认定库券数字，结果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不得不各认定50万，面粉公会不得不认定20万元，其余公所、公会等分别承购1万至10万不等，只有极个别的公会、公所承购数千元。这些公会、公所等接得数额后再向下属各个企业商店摊派，无一遗漏。蒋介石对上海各个大公司和重点企业还亲自点名定数，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正式发出通知。如定华商保险公会、南洋烟草公司各50万元，南市电气公司、粤侨联合会各30万元；闸北水电公司、内地自来水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各25万元；商务印书馆20万；华成烟草公司、丝茧总公所各10万元。但是许多行业，许多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因时局不稳，自顾不暇，很难在短时间内承担如此大额的库券，因此纷纷诉说苦衷，要求减免。如上海电机丝织厂同业公会，只有会员厂30家，其中资本较大者仅一、二家，所以"纵竭力劝募，对于五万认额决难如数。经一再劝销，公决勉认一万五千元"②。参业公所定额10万，"苦劝同人，蹉[磋]商至再，仅能凑集两万元，已觉精疲力尽"，表示"万难再加负担"③。上海南北市报关公所接1万元承购数后，"不得不极力筹办，忍痛承销，连日奔波，所筹之数未及五千"，而同业已"力竭声嘶"④。洋货商业公会因银根紧迫，各处放帐分文无着，时局不靖，"再三劝喻，始由各业勉力认销，约共洋叁千元之数"，离原定

① 后来还对两淮盐商加派了300万元。

② 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第287页。

③ 同上书第292页。

④ 同上书第299页。

3万之数尚相差9/10①。铁业公会"经连日邀集同业十九家极力劝募，唇焦舌敝，万分困难，集议数次，勉由十九家各竭其力，仅得五、六千元左右"②。上海工商企业中也有对蒋介石的这种硬性摊派坚决抵制的，如旧县城城厢内有朱隆兴等6家铜锡号虽经铜锡业公会开会号召，数次登门相劝，始终"坚不肯认"，弄得其他商号都相率观望。据铜锡业公会认为，这6家商号事实上是有认购力量的，但是"极致反对，有意捣乱"③。

不仅中小行业、企业如此，即使是大的行业和企业同样如此：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就是其中一个。中国银行是国内实力雄厚的华资银行，但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到1927年4月底止，各地分行为北伐军共垫借出了660余万元，如果再继续大额向外垫出，那就要影响到自己发行钱钞的准备，失去与上海林立的外商银行的竞争能力，甚至会使自身"不克保全"。为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不得不函达蒋介石，表示苦衷，并指出："军政与财政相表里，财政与金融相维系；巩固金融机关，即可以确定财政基础，然后得以维持久远，以利军事进行。"④宋汉章婉言表示上海分行只能勉力承担200万元，即指定的1000万的1/5。

对于上海资产阶级对库券的这种态度，蒋介石不仅不体谅其困难，相反恼怒异常，不惜使用了恐怖压迫手段。

蒋介石在给宋汉章的回电中说："贵行在汉竟供共产政府⑤以1800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涂毒同胞，殊堪痛惜。此次沪上借款，以有确实二五税作抵，信用卓著，而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明达如先生想不至此。"⑥这是明显的恐吓、威胁了。宋汉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第300页。

② 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第302页。铁业公会按商业联合会拟定承购库券数应为五万元。

③ 同上书第306页。

④⑥ 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第96页。

⑤ 指武汉"国民政府"。

章接电后惊慌万分，连忙回电表明中行"绝无丝毫反对作梗之意，不图引起误会，上烦廑虑，惟有痛自引咎……"① 只得如数将1000万元库券全部购下。

对上海广大中小企业的大批资本家蒋介石首先找了个荣宗敬来开刀。荣为上海和无锡棉纺织业、面粉业的大老板，资产雄厚。原派购库券50万元，但荣宗敬未予应承。蒋介石即以荣"甘心依附孙传芳"为名，下令通缉，并密令无锡县政府着即查封荣在无锡的所有产业。荣宗敬因居住于上海租界才免遭逮捕。后经吴稚晖竭力求情，保证荣宗敬决无依附孙传芳的事实，另外张静江、蔡元培等也从旁为荣剖白，在荣宗敬答应如数承购50万元以后，蒋介石才撤销了对荣的通缉，并同意启封他的产业②。据上海外报报道，蒋介石还通过地方当局或指使地痞流氓逮捕或绑架一些资本家的家属作为人质，来胁迫这些资本家大额承购库券。1927年5月14日，居住法租界的一名富有的颜料商石宝森(音)的儿子被作为反革命份子逮捕，在石同意"捐献"20万元以后，他的儿子在5天后被释放③。先施公司的经理欧炳光的3岁儿子被绑票，棉布富商徐宝成(音)的儿子被作为共产党份子逮捕拘留，两家都被勒索相当数额的金钱，才同意让他们的儿子恢复自由④。

江浙资产阶级经过如此的折腾，好比做了一场恶梦，从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四·一二"政变起，到被迫承购大额库券为止，江浙资产阶级最后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只有极少数的巨头如钱新之、陈光甫等人被安插到了政府经济机构担任了职务，或者在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等高级银行中被委以董、理事之衔，从而初步地挤入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行列。另外，就是若干大银行从承购

---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第97页。

② 《荣家企业史料》上第19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③ 《字林西报》1927年5月30日。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6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6月25日。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7页。

库券中，终于取得了蒋政府承认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旧欠的保证，它们和其它的一些银行从承购库券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但是，江浙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他们得到的与他们热切的愿望完全相反。在政治上遭受到的是恐吓威胁，在经济上他们的利益并不是得到巩固和扩大，相反是受到严重的，还要不断延续的损害。他们面临的局面仍然是社会动荡、经济不振，甚至于自身可能难保的局面，他们因此而灰心、失望、痛苦、不安。在1927年的11月，上海商业联合会就是在这种局面中被迫宣布撤销。在其发表的结束宣言的拟稿中，可以充分看出江浙资本家普遍的恶劣心情以及对当局存在着的深深疑虑不满："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习处于憔悴呻吟之下，乃始而垫款，继则库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绞脑沥血之金钱，无非促进政治。及其结果，则后方之邪许，虽已烂额焦头，而政费之拮据，愈觉捉襟见肘，壶浆箪食，无济时艰……乃自清党以还，应有清明之望，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事与愿违，心余力绌，痛定思痛，危乎其危……"①

江浙资产阶级支持和追随蒋介石的结局确实是悲惨的。蒋介石上台以后并不是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相反，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背道而驰，他在全国要建立的是以自己为首的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正由于此，从南京政府成立起，蒋介石集团就加紧了在势力范围内建立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独裁政权的步伐。它一方面从政治上建立和强化对人民的法西斯专政，并长期地进行反革命内战，掠夺财富，打击异己。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则殚思竭虑于垄断全国经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集团采取的重大步骤就是垄断全国的金融。其办法，第一，在上海建立由自己控制掌握的国家最高、最具权威的新的金融机构。第二，将远在北京的迄今为止的

① 《上海商业联合会结束宣言》（四稿）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工商联合会》第29页。

国内最有影响、规模最大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攫取过来，控制于自己手中。

1927 年 10 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中央银行条例，宣布："中央银行为特殊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① 并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筹备处。到第二年的 11 月 1 日，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总行即设于上海。国民政府拨给中央银行"公债预约券"② 2000 万元充作资本。蒋介石以政府名义授予中央银行有经理国库、发行钞票、经募内外债、调剂金融等等最大的金融权力。中央银行的总裁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自兼任，后又由孔祥熙担任。这样，中央银行就成为紧紧地控制于蒋介石集团手中的最主要的金融工具和财政支柱。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原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蒋介石要建立自己庞大的金融体系，将上海辟作为国民政府的金融基地，必须把这两个银行的总行迁到上海，并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就在 1927 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北平移设上海，蒋介石政府强行将"官股" 500 万加入中国银行作股金，占其原全部资金 2000 万的 1/4 。这样官僚资本就初步地渗入了中国银行。受南京政府的"委托"，中国银行成为国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具有经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经理政府存在国外之各项公款及收付事宜，发展及扶植海外贸易事宜，代理一部分国库事宜以及发行兑换券等等的特权。这样中国银行事实上就开始蜕变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工具了。但是，中国银行毕竟是商股势力占据优势的银行，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还不能予取予求，完全自由地摆布。到了 1935 年，国民政府乘白银风潮引起的金融危机，发行 1 亿元的金融公债，号称"充实银行资金，拨还垫款，巩固金融，

① 《我国中央银行之演进》，《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

② "公债预约券"是因为公债券未印出来，故暂用题写的预约券进行代替。

便利救济工商业”①。其中拨出3000万给中央银行增加资本，拨出2500万作为“官股”加入中国银行。加上以前的500万，这样蒋介石政府在中国银行中的“官股”就达到了3000万，比原中国银行自己的商股资本2000万多了1000万，官僚资本与商股资本的比例成了三比二。蒋介石还下令把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璈调往中央银行担任副总裁，派宋子文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掌理全局。尽管不久中国银行股东会召集会议，强烈要求官股只入1500万元，使官商对等，南京政府也勉强表示同意，但是，中国银行的商股势力已经完全失去优势，用人行政的自主权也已不再存在。中国银行事实上已在蒋介石集团的把持和控制之下了。

1928年交通银行总行也不得不由北平移迁上海。南京政府强行加入“官股”200万元，但结果只交了100万元，占交通银行总资本的1/10。南京政府规定交通银行为政府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具有代理公共实业机关发行债券及经理还本付息，代理交通事业之公款收入，办理其他奖励及发展实业计划，代理一部分国库和发行兑换券等权利。到1935年，也在白银风潮引起的金融危机中，蒋介石在1亿元的“金融公债”中，拨出1000万作为“官股”加入交通银行，加上前100万“官股”，共为1100万，官僚资本在交通银行的总资本额顿时占到了55%，从而明显地取得了优势。蒋介石还派出宋子文的亲信胡笔江和唐寿民分别担任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交通银行的行政管理权遂被蒋介石集团所掌握。南京政府的所谓“官股”，其实仍是“公债预约券”。同样是并不付予现金，仅仅凭着几张题有股金数字的债券，就轻而易举地把国内原先声望最大的中、交两行攫为自己的附庸了。

同在1935年，以服务于蒋介石反革命内战起家的“豫鄂皖赣

① 《中华民国法规大会》第三册第2871页，转引自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

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一个经营储蓄、信托、保险等业务的大型的“中央信托局”成立，加上已设立的在全国各地都有活动的“邮政储金汇业局”，这样就形成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六家被称为“四行二局”的机构掌握国内金融的局面。蒋介石集团有了“四行二局”这些金融支柱，确立了它在全国的金融垄断地位。

蒋介石集团还把势力伸向一大批具有实力的民营银行，兼并排挤、打击它们，使之都变成为仰仗于它的金融垄断鼻息的附庸。同时，对一般的银行钱庄也并不放过，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动摇它们的经济基础，限制它们的经济来源，使它们最后都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在1935年金融风潮中，蒋介石集团通过中央、中国、交通3行故意积聚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3家银行发行的钞票，然后突然集中抛出，使这三家银行顿时发生钞票挤兑，处于危亡局面。蒋介石集团接着以帮助它们摆脱危机为名，乘机派员接管改组，从此便直接控制掌握了这3家银行①。在这前后，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还在南北各地广为活动，结果无论是“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还是“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和广东银行等都纷纷落入了它们的支配之下。1935年的6月，蒋介石集团还指使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专门开设了储蓄部，大举办理储蓄业务，广泛吸收储蓄存款。在社会动荡，经济恐慌，商业行庄时有倒闭的形势下，市民对一般私营银行钱庄的信用前途本来就心存怀疑。看到资金雄厚，信用卓著的中交两行开办储蓄业务，纷纷将自己存款从原存行庄中提出转存于两行。大多数行庄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摇摇欲坠。上海钱业公会所属的钱庄紧急召集会议商量办法，不得不请求政府伸手救助，以度难关，蒋介石集团乘

① 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官僚资本创办的中国国货银行有“小四行”之称。

机示意杜月笙等出面组织钱业监理委员会，迫使所有汇划钱庄接受苛刻条件。从此一般银行钱庄被卡住了脖子，不得不同样听凭于蒋介石集团的随意摆布。

从蒋介石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迁移和霸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到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完成全国金融的独占，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官僚资本，其所有的垄断活动都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国内所有重要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都是总行、总管理处设在上海，或者在上海设有主要的分行，营业重心都在上海。随着国民政府金融中心在上海的根本确立，各个具有实力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更加加强了在上海的金融力量或把重心倾于上海。上海作为蒋介石集团的金融基地成了官僚资本的大本营。正是通过上海的金融垄断，官僚资本把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去垄断全国的工业、商业、农业、对外贸易，去霸占铁路、公路、矿山、森林、牧场等，去无穷尽地残酷掠夺和剥削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富。通过上海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蒋介石集团一步步地将上海营建为官僚资本的大本营的时候，上海整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各种因素的交叉影响，正经历着一个走向衰落和破产的历史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在战后的一段时期中，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和战后的恢复，因此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我国国内，由于五四运动发生以来，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中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外货斗争，这使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较为广阔的商品市场，取得了更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使江浙、上海和周围地区结束了旧军阀割据的局面，暂时取得了没有战争侵扰威胁的相对稳定的形势，这也给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有利因素。在1927年后的3—4年间，上海的民族资

本主义工商企业虽然因国民政府的发行公债等而加重着负担，但是从总的来看有许多行业和企业还是获得了程度不等的上升。如上海的华商纱厂发展的情况如下表①：

	全市纱厂总数	纱锭数	布机数	年产棉纱	年产棉布
1927年	23家	677756枚	5916台	415194件	2219297匹
1928年	23家	742388枚	不明	436990件	2489753匹
1931年	27家	1032920枚	7864台	559918件	3936206匹

从表中可以看到，1927 年至 1931 年间，上海纱厂的规模和年产量都有很大的扩大和提高，其中如纱锭数，1931 年比 1927 年增加了 52% 以上，全业年产棉纱和棉布分别增长了 35%和 77%。在这期间，上海其他的行业如橡胶、缫丝、面粉、搪瓷、毛纺织等工业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增长上升。民族橡胶工业在几年中由于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下跌，制品价格上升，容易获利，因此华商投资橡胶工业增多，大多数厂并有了显著的发展。在 1927 年底，上海华商橡胶厂只有 7—8 家，1928 年和 1929 年各增加了 5 家，在 1930 年和 1931 年又分别增加了 17 家。除去改组或关闭的以外，1931 年上海民族橡胶工厂，一共已有 48 家，是 1927 年的六倍。上海的华商橡胶工厂数占到当时全国华商橡胶业的 70%左右②。

在这一期间，上海的民族资本商业从总的来说也是向上发展的。上海的银行充当了国民党政府推行公债的工具，在公债买卖投机中大发其财，于是一些民族资本家竞相投资金融业，开设新的银行。从 1928 年至 1931 年，上海全市新开的银行达 23 家，信托公司也新设了 10 多家。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上升也刺激了民族

①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的数字。

②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资本商业的兴盛、市场的活跃。上海的百货、棉纱、棉布、西药、杂品等业都比较兴旺。以棉纱交易为例，1927 年全市各纱号棉纱成交量为 354626 件，1928 年增为 372471 件，1929 年达到 611860 件。1930 和 1931 年分别是 571406 件和 551304 件，比 1929 年有所下降，但是也远远超过了 1927 和 1928 年的水平①。

但是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盛并没有能一直延续下去，自 1931 年以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遽变化，相反迅速进入了全面的衰落和破产之中。

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加剧，给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接着华北也逐渐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中。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北方市场完全失去。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推进，日本走私商品大量进入我国，在各地排挤国产货品，上海产品的国内市场广泛地受到了冲击。

1932年"一·二八"战争在上海爆发，中日战争拉锯于闸北——江湾——吴淞的华界地带，使上海的民族工商业直接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在被日军侵占的区域内，集中着全市工厂的 1/4，商店近 13000 家。这些工厂和商店主要属于民族资本。炮火使这些工厂受损达半数，商店受损达 7/10②，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如上海橡胶业中的国民、厚生、溢中、福星、永和五厂就毁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中，而受到战争影响不得不倒闭的有大华、大新、大东、普天、中华、明华、华顺、天星、宝通共 9 家。一年之间，上海整个民族资本橡胶业，由原先的 48 家，减少到 34 家。

在租界以内的民族工商业也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影响。如上海的民族机器工厂在战前共有四百余家，它们集中在虹口一带很多，

---

① 数字引自《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② 《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淞沪战事之统计》。

约有二百多家。在战争期间，闸北境内的民族机器厂直接遭到了炮火的摧毁，而虹口境内的民族机器厂因为在日本侵略势力的直接管制下以及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各厂不得不遣散职工，“全部停工二个月”①，接着都进入了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

1929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滞销，在几年中，这种危机也波及到了我国国内。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困境，加紧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转嫁危机。大量商品倾销我国，使中国的国内市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上海的民族工商业陷入了进一步的恶化之中。如上海的民族缫丝工业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31年5—7月，由原来的107家减为70家。丝车由25395台减为18326台。至第二年5—7月，又减至46家，丝车再减至12262台。1933年，情况更糟，工厂倒闭共36家，最后只剩下10家丝厂，共2500台丝车了。外国商品成本低，因此价格也低，使中国商品难以与之竞争，民族资本工厂因此越来越难于维持下去。前面提到的“一·二八”战争后上海仍存有34家橡胶厂，据《工商半月刊》介绍，1933年中，这34家工厂除极个别的以外，都已是气息奄奄，难以生存。这34家的情况如下表②：

全部开工者	一　厂
开工五成至七成者	五　厂
开工三成至四成者	十三厂
开工一成至二成者	五　厂
停工者	十　厂

①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

② 《工商半月刊》1933年五卷二十二号。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官僚资本的残酷掠夺，是上海民族工商业衰落和破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从1927年以来国民政府接连发行大量的公债，极大地加重了大多数民族资本家的负担。在另一方面，也使上海的公债投机大大加剧。原先流于上海的大量游资便十分自然地聚向公债以取厚利，这样一来，造成工商业资金短缺，发展或维持更趋艰难。许多民族工商企业不得不告贷于银行，银行在公债利重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借贷利息，民族工商业的负债额因此越来越大，陷入更大的困境，如1933年，永安纺织系统负债的利息额已占其全部利润的49.76%。官僚资本银行乘火打劫，把势力渗入一些重要的民族工商企业，就此将它们控制在手中。1936年，以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为主的债权团借申新纺织系统经济困难要求贷款，乘机控制了申新二、五两厂的经营管理权。永安纺织系统因经济支绌，在1936年不得不向中国银行借款250万元，宋子文官僚资本乘机渗入。这些企业从此被官僚资本掐住了脖子。

自1928年起，国民政府对棉纱、卷烟、面粉等工业品的销售实行了统税政策，根据这个税收办法，凡这些商品在销售中只要缴一次统税，不必再缴其他税款。但是统税税率很高，并且连年调高。如卷烟统税税率起初为从价22.5%，到1931年增加到55%。火柴统税在1933年提高到1931年税率的一倍以上，有的厂生产的火柴每箱税款就等于一箱的成本①。这样的重税使民族工业负担沉重，而且各地割据严重，统税政策不可能行效于各地。因此上海运往别处的商品，在一路上实际还须完纳各地的"地方"税，满足各处的勒索，这就更加重了民族资本家的负担。

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将大片河山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对内积极镇压革命运动和爱国斗争（包括抵制外

①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

货的斗争），连年发动反革命内战。为了筹措进行反革命内战的经费，蒋介石政府除举借内外债外，还滥抽苛捐杂税，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在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下，劳动人民生活艰难，饥寒交迫。特别是在农村中，由于战祸频频、灾害连连，经济凋敝，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大多挣扎在死亡线上。广大人民生活的困苦使社会购买力日益减小，民族工商业的市场越来越狭窄，所谓"农村经济窘迫，百般兜售，终少受主"①，就是这时上海民族工商业的产品和商品所遭受的境遇的真实写照。

从1932年开始，上海的许多民族工商企业由此被迫关门或倒闭。一时市场萧条，各业商店生意清淡，1932年上海百货业的营业额仅及1931年的50%—60%；杂货业的营业额下降了一半以上。这一年因年终亏蚀，百货业有10余家商店倒闭，花纱商业停歇者有17家。金号倒闭特别多，全市138家总共倒了36家。接着1933年一年内，上海民族资本工商企业一共倒闭了214家，难以维持被迫改组的达61家。1934—1935年，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困境达到了顶点。上海市场益发萧条，工厂纷纷停工减产，倒闭和改组之风狂卷上海。连以往几年借公债投机发财的金融业也未能逃脱厄运。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钱庄倒闭者一共为425家，改组者1383家。1935年全市倒闭的工厂有187家，商店422家，银行和钱庄为87家，加上经营地产的公司和营造厂等其他行业，全市倒闭的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商企业达895家，比1934年的倒闭数增加了整整一倍多②。这就是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民族工商业的悲惨处境。

上海的民族工商业直至1936年才有了转机。1935年底，国民政府实行了法币政策，完成了蒋介石集团金融垄断的最后形成，

---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

② 数目引自《上海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以纸币代替了历来使用的银元，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从而统一了货币，摆脱了白银市场的影响，稳定了币值和金融市场，促使物价在惨跌中回升，市场逐步活跃。1936 年又适逢我国农村获得普遍的大丰收，农村购买力增强，消费市场扩大，这一切使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倒闭歇业之风终于得以刹住。相对以前的不景气，市场产销大有增长，一些行业和企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如 1936 年上海华商橡胶厂生产的胶鞋达 3000 双，与 1934 年生产的 1200 双相比，增加了一倍半；1936 年全市的棉纱市场成交量比 1935 年增加了 8 万多件。不少行业的工厂数都有明显增加，如以前曾锐减的民族机器业，1936 年计新增了 23 家，1937 年抗战爆发前又增加了 79 家。至1937 年六月底，全市工厂已达 5515 家，比 1936 年增加了 1000 多家。但在民族危机深重，官僚资本垄断统制之下，上海民族工商业的转机显然只是强心针下的暂时产物，前面隐伏着难以估计的巨大危机，到“八一三”炮声一响，这点生气自然就很快地被战火卷走了。

五、左翼文化运动的高涨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以后，革命转入低潮。一批原先投身于政治斗争的革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重返文化战线，陆续来到上海。各地不少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和文学青年，也纷纷流亡沪滨。在这同时，从国外，特别是从日本，一些受到世界左翼文艺思潮影响的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士也先后回国，留居于此。在上海逐渐汇集起一支开展革命文化运动的雄厚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左翼文化运动磅礴掀起。清末西学东渐以来，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国文化的发展及其影响中，上海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而在这次左翼文化的大发展与大高涨中，上海既着先鞭，发难于前，尤始终执大旗以进，影响及于全国。

1927年5月，沈端先（夏衍）从日本回到上海。8月，沈雁冰（茅盾）由武汉经庐山抵沪。10月，鲁迅偕夫人许广平由广州乘船至上海。鲁迅在上海度过了他最后1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在10月和11月，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先后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了革命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以后，文学青年柔石、胡也频、丁玲、叶紫等人都从各地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文艺创作。瞿秋白、冯雪峰、潘汉年、周扬等文化人而兼党的领导干部都陆续来到上海，先后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工作。

从1928年初开始到1929年冬，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在上海的进步文艺界中首先爆发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战。创造社的郭沫若、冯乃超、成仿吾、李初梨，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等和鲁迅、茅盾之间就革命文学写下了一批论争文章。同时，为了能够深刻地了解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和方法，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双方都对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进行了翻译介绍工作。通过论争和翻译，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得到了传播，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思想觉悟都获得了提高。鲁迅的世界观由进化论而跃为阶级论，最引人注目。

对敌斗争的形势迫切需要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迅速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战斗的阵线。中共中央为双方的联合做了不少工作。1929年秋，中央宣传部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决定在上海筹建一个左翼作家的联盟。

在文委的领导下，经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他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内正式成立。鲁迅、冯乃超、阳翰笙、孟超、沈端先、潘汉年、彭康、钱杏邨、田汉、柔石、郑伯奇、冯雪峰、李初梨等40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的左联理论纲领，强调指出：革命文艺是解放斗争的武器，"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艺术才能够焕发它的明耀的光芒"。宣布：

左联"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① 会上鲁迅针对当时左翼作家队伍中的实际情况，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讲话，大会选举出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左联常务委员，并通过了与各革命团体和国际革命文艺组织发生关系，组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创办左翼文艺杂志，参加工农革命实际活动等十七项提案。左联的诞生标志着我国革命文学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标志着党对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导已经从思想领导进入到组织领导的阶段。

左联将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和太阳社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作为机关刊物，另外还先后出版了《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一卷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刊物。通过这些战斗阵地，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或好的文学作品和理论，左翼作家继续提倡无产阶级文学，阐发革命思想，用笔作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文化围剿，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和回击。同时，在文坛上数次发动了对具有错误倾向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进入30年代，正是蒋介石疯狂地建立和扩大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的时期。国民政府一方面调兵遣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猖狂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则对日渐兴旺的革命文化运动大肆进行文化"围剿"。在左联成立后的第三个月，国民党发起了一个"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它是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党部直接策划下出笼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亲自上阵参加这个运动。其成员还有穆

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理论纲领》1930年4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时英、张若谷、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都是一些党棍、特务和反动文人。6月1日，这些人成立了一个“六一社”，出版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和《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他们还重金聘人拼凑了一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宣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攻击左翼文艺“满足着零碎的残局”，使文坛陷入了“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过程”，因此必不可免地要崩溃。这些人创作的作品赤裸裸地鼓吹法西斯主义，宣扬反苏媚日，掩饰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

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猖狂挑战，左联作家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写了一批杂文予以坚决的还击。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辛辣地讽刺这场“文艺运动”由警政人员主持的滑稽情况：“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文学家’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啼哭呼喊，是必然要发生的，如果不这样作，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民族主义文学明则提倡“民族主义”，实则为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张目的丑恶面目被揭露无遗。

在鲁迅撰文的同时，瞿秋白写了《民族的灵魂》、《狗样的英雄》、《屠夫文学》等一批杂文，茅盾发表了《“黄人之血”及其他》、《“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性。茅盾深刻地指出：在中国，“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联合的统治阶级早已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向工农剥削，所以民族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①。而“民

① 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

族主义文学家们”演出的这场丑剧，引人恶心，《前锋月刊》仅出了七期就不得不关门歇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随之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既没有真理，在文化上则实在太贫乏了，终于被左翼文艺运动的反击迅速打败。

在左联的下面设有许多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左联成立后，在《拓荒者》、《大众文学》上初步地展开了文艺大众化意义的讨论。1932年在《文学月报》、《北斗》等杂志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这次讨论较多地涉及了大众文艺作品的意义、内容、形式和语言问题，但也接触到了作家如何才能产生这样的作品的问题。

到1934年5月，有汪懋祖、许梦因等人掀起了“文言复兴运动”，反对白话文，鼓吹恢复文言。左联作家为了批判这股复古逆流，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大众语运动。这也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撰文主张大众文艺可以使用大众的方言和土语，但也要加入新的东西，也可以吸收外国的、古代的语言。他批评了对大众语和使用大众语的错误看法。这一阶段的讨论反击了文言复兴运动，同时基本明确了建设大众语的方法。然其间有废除汉字、采用拉丁化的文字的主张，则脱离实际，近乎偏激。

在讨论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左联的一些作家积极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在上海，他们发展工农通讯员，提倡街头文学，举办工人夜校、工人读书会等等。左翼戏剧工作者深入工厂、学校中去演出，组织和辅导工人演剧，甚至和工人、学生同台联合演出。许多作家进行了创作大众化文艺的尝试，产生了大量以工农为题材的作品。左联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以及活动，是左翼文化人民性的充分反映。文艺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根本问题，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以来，左联在这方面迈出了有力的第一步。

1931年7月，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

讲演，以高屋建瓴之势，论述了鸳鸯蝴蝶派的起始和变迁。接着又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和"至今没有穷尽"的鸳鸯蝴蝶派的武侠狂，作了概略的批判。这一时期，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文章中对鸳鸯蝴蝶派的消极作用提到理论的高度进行了剖析。他提出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思想实质是"维新的封建道德"，是"改良礼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又尖锐批判了鸳鸯蝴蝶派的"笑骂一切的虚无主义"。1932年，钱杏邨也写了《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的长篇文章，对鸳鸯蝴蝶派作了全面的论述和批判。

鸳鸯蝴蝶派在理论上始终是贫乏，因此对来自左翼作家的批判仍然只能作出无力的还击。在30年代后左翼文化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下，他们的地盘和影响越来越小，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后来对鸳鸯蝴蝶派的作者采取了既斗争又团结的态度。

在左联成立后，左翼作家对新月派的批判也继续进行。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1928年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这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文学组织，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罗隆基、陈源（西滢）、梁实秋等。新月派政治上不赞成阶级论，提倡纯文学，反对无产阶级文学①。左联成立前后，鲁迅等人发起了对新月派人性论文学主张及其提倡者的异常激烈的批判。新月派人性论理论的主要代表是梁实秋。他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

① 新月派政治主张是错误的，文学观亦有谬误，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写出了传世的诗篇，在文学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另外闻一多在抗战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一个人民的诗人和战士。

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① 。“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② 。梁实秋还认为文学不是人民群众大多数人的事业，只是少数天才的工作。针对梁实秋的理论，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尖锐地指出：描写人的文学“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鲁迅坚持文学阶级性的观点，论证了无产阶级文学出现的必然性，从而回击了徐志摩、梁实秋等的挑战和攻击，维护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地位。同时也应当看到，人性论问题是文学上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在当时阶级斗争错综尖锐的环境中，不可能从学术上对其深入地加以考察，从而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另外，由于梁实秋等公开明确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导致鲁迅等不免过激地在政治上、文学上将他们完全加以否定，把他们根本地归入到反动阵营一边了。

从 1931 年底到 1933 年的 7 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还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 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同样激烈的论争。胡秋原在《文化评论》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等文章。胡秋原自称为“自由人”，提出文学“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③ 。对此左联作家立即进行反驳。瞿秋白、冯雪峰等在《文艺新闻》上陆续撰文，抨击胡秋原以

---

①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第 2 卷第 6、7 期。

② 《文学与革命》，《新月》第 1 卷第 4 期。

③ 《阿狗文艺论》，《文化评论》创刊号。

"自由"为名，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掀起与高涨。紧跟"自由人"又有"第三种人"苏汶即杜衡出来为胡秋原助战。苏汶称自己既非左翼又非右翼，既不属资产阶级，也不属无产阶级，故是一个"第三种人"。1932年7月，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接着又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为胡秋原鸣不平，宣扬文艺自由论。苏汶攻击左联"不要真理，不要文学"，只是热衷于眼前的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是"目前主义"。为了眼前的功利和需要，拿文学来"为革命，为阶级"因此使文学变成了"卖淫妇"。苏汶还指责左联霸占文坛，粗暴压制作家自由，从而使"第三种人""搁起了笔"，"难乎其为作家"。

1932年秋，左联开始系统地发表文章，批驳"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①。周扬写了《"自由人"文学理论探讨》、《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文学的真实性》等文章，同样非常明确地申明："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②。

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左联展开的文艺思想斗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斗争，也是30年代上海文坛上最重要的文艺大论争。胡秋原和苏汶否认文艺的阶级性，宣扬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观，显然是错误的，它对于无产阶级独立地建

① 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第一卷第6期。

② 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三卷第1期。

设本阶级的文学艺术无疑是一种干扰。左联领导从维护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出发，对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从而为马列主义文艺观的传播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继续发展扫除了来自一个方面的障碍，这是有很大意义的。但同样也应看到："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实际是一批中上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们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同时，也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对腐朽的反动文艺予以激烈的谴责。如他们尖锐地指出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是"比所谓颓废派下流万倍的东西"，"中国文艺界上一个最可耻的现象。"左联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支配，对毕竟是属于中间派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完全采取排斥、打击的态度，错误地把他们划入到敌人的阵营中去了。

在对待胡、苏的态度上，鲁迅比较客观和慎重。当论争开始时，鲁迅并没有参战。对左联有些论者的简单粗暴的方式，鲁迅反而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提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在苏汶上场以后，鲁迅才加入了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写了《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等重要文章。但鲁迅在文章中既没有把"第三种人"划入敌人的营垒中，也没有附同左联一些领导人"政治即艺术"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观点。鲁迅除了批评苏汶抵毁文艺大众化的错误以外，着重剖析"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原因："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鲁迅同时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团结前进的独特意见："左翼作家……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鲁迅的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在鲁迅的这些文章发表以后，这场论争事实上已接近尾声。

到1936年，在上海左翼作家的内部也出现了一场大的论争，这就是"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

1935年底，在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号召下，左联的领导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决定解散左联，建立更广泛的文艺界统一战线，一些领导者单纯地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新的口号。

对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鲁迅等是有一定的看法的。为了能更确切地说明新时期文学的性质和任务，也指明这种文学的阶级性，鲁迅经与冯雪峰等商量后，决定提出一个“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然而在6月1日，胡风以个人的名义竟先在《文学丛报》上提出了这个口号。由于“国防文学”的提倡者并不知道这是鲁迅提出的口号，在宗派情绪的支配下，便形成了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

这个论争是围绕着文学如何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展开的。周扬写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等文章，指出：“国防文学”就是“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又明确地强调：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但由于一种民族共同的利益而和我们日益接近，愿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我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的作家，和他们取得密切的合作，通过他们的媒介，把民族革命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①。这些认识是符合建立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势的，并且明显地有纠正以前左联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不良倾向的意向，因此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个口号的缺点在于并未能正确地同时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和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努力地扶植和发展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学的内容。另外，周扬等文章又偏激地提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有人甚至还认为不是“国防文学”，即是“汉

①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一卷二期。

奸文学”，这就把那些要求抗日而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写“国防”题材作品的作家排斥到抗日统一战线之外了，结果还是产生了关门主义。

6月10日，鲁迅根据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的理解，写出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大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论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强调说明了在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是主体，它肩负着重大的领导责任。鲁迅对于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领会显然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8月，鲁迅抱病又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鲁迅认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只能以政治上是否抗日为联合条件，而不能把文学创作是否写“国防”主题作为标准。在这篇长文中，鲁迅极其明确地申述了他对两个口号关系的根本态度：“国防文学”虽然有“不明了性”，但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主要是对一向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不能说成是“统一战线的总口号”。鲁迅因此主张两个

口号并存。鲁迅的申述正确地评价了两个口号，这对加强革命文学阵营的团结，促成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非常有益的。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在国内阶级关系和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动时期发生的，尽管这两个口号因侧重点不同而发生了分歧论战，但它们毕竟都是爱国的、抗日的口号，在论战中许多人都希望双方停止争论，携起手来。自鲁迅的比较客观、坦率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发表后，这场论争终于逐步结束。

两个口号的论争并没有导致革命文学队伍的分裂，相反扩大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使左翼作家普遍提高了对这个政策的认识。为了促进团结和建立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冯雪峰、茅盾、郑振铎在各方作了很多工作。10月，一个有鲁迅、郭沫若、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洪深、林语堂、茅盾、陈望道、夏丏尊、周瘦鹃、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傅东华、郑振铎、郑伯奇、黎烈文、赵家璧、丰子恺21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在上海发表。这21人既包括了"两个口号"论争双方的作家，也包括了"鸳鸯蝴蝶派"等的知名人士。《宣言》明确提出："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①。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在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

左联自1930年成立至1936年2月自动解散，另行筹组由更广泛的文艺界人士参加的"中国文艺家协会"② 止，近6年中，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与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的论争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革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组织和培养革命文艺队伍和人才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左

① 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

② "中国文艺家协会"于1936年6月7日在上海成立。

联中，拥有并涌现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努力磨炼，向敌人奋勇冲锋，在文学创作、文艺评论和翻译工作中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为当代和后代留下了许多名篇巨作。其中包括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等，丁玲、张天翼、叶紫、沙汀、艾芜等的短篇小说，郁达夫的散文和诗歌，田汉、洪深、夏衍等的剧作，周立波、曹靖华等的翻译，瞿秋白、冯雪峰、夏衍、周扬、阳翰笙、钱杏邨、胡风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等等。左联的作家群星灿烂，左联的创作琳琅满目。正是左联作家的英勇斗争和辛勤劳动，再加上活动在上海的一些进步作家，如巴金、曹禺等人的优秀创作，才使得30年代的上海文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使我国的新文学面貌美不胜收，灿烂一时。也正是这些文艺作品，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动员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作英勇斗争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左联成立不久，在上海还有“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相继成立，它们和左联一起，还共同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联合机构“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到1933年3月，在上海还先后出现了“左翼电影小组”和“左翼音乐小组”。所有这些左翼文化组织在党的“文委”的总的领导下，从各个方面开展革命的文化活动，宣传革命，推动抗日救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社联成立于1930年5月20日，它的纲领规定“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是“中国各个进步的社会思想家的切身的任务”；强调“理论与行动的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谁要是空谈理论，而不作实际行动，那他就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社联和左联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一些左联人员同时又是社联的成员，一些社联成员同时也参加了左联。社联的基层组织主要是上海交通、复旦、劳动、大夏、光华等各个大学的社研小组，

另外还在闸北、小沙渡、杨树浦一带工厂中成立了工人读书班，一些工人也成了社联的盟员。社联为了培养年轻的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成立的这年冬天，又另设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在青年中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许多青年经过学习革命理论以后，进步很快，有不少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由于“社研”和社联的工作有点重复，领导力量显得分散，约在1933年，“社研”并入社联，统一工作。

社联成立的前后，正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争的高潮时期。这是一场马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激烈交锋的尖锐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托洛茨基分子为了抵制和取消革命运动，断言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社联组织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地加入了这场大论战，在朱镜我主编的《新思潮》杂志上，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彭康、朱镜我等社联盟员对以任曙、严灵峰、叶青等为代表的托派观点予以严厉的抨击，指出当时中国的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充分肯定中国社会完全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社联成员的参加论战，他们所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不仅辩证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在国内的影响。

社联曾先后出版了《新思潮》（后改名《新思想》、《新兴科学》）、《社会科学战线》、《书报评论》、《研究》、《社会现象》、《现代文化》、《现象月刊》等多种理论刊物。但国民党反动派对社联大加摧残，迫使这些刊物先后迅速地被迫停刊。如由柯伯年主编的《研究》只出了一期，便被当局封闭，由许涤新主编的《社会现象》周刊，一共出了七期，同样遭到查封的厄运。

社联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还计划出版《社会科学讲座》，其宗旨是“内容由浅而深，由理论而实际，务使青年读者，得一有系统而正确的社会科学读物。”此书预告的内容十

分广泛，包括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家与法律、帝国主义论、经济学、经济政策、土地问题、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等14个方面。《社会科学讲座》的第一卷于1930年6月由光华书局出版，第一卷中载有朱镜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吴黎平的《唯物史观》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社会主义》的译文，林伯修的《国家与法律》、王学文的《经济学》、柯伯年的《经济史底阶级性》、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潘东周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等；这些都是极富科学价值的社会科学论著和译文，但此书仅仅只发行了一卷，便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查禁，不得再行出版①。

在白色恐怖之下，社联要出版自己的刊物已经极为困难，即使秘密的打游击式的出版，也数量有限。社联的有些成员便积极地利用上海的有些合法和具有影响的刊物来发表自己的文章，传播革命思想。艾思奇以"李东明"的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文章。张耀华、许涤新和邓拓等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在社会上属中间性质的刊物，历史久、资格老，影响颇大。由于得到了两杂志内进步的编辑和主持者如胡愈之、张明养、钱亦石等的支持，这些文章得以公开发表，通过这些文章，社联盟员向社会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正日盛一日，同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的罪恶用心和希特勒政权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等问题②。随着《东方杂志》和《新中华》等销行全国，社联的革命见解也从上海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剧联的活动可追溯到"艺术剧社"。在最初无产阶级文学倡导

---

① 丁景唐《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史话》《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六。

② 许涤新《忆社联》，《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六。

运动进行的时候，上海的进步戏剧界也闻风而动，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戏剧。左联筹备时，党通过夏衍、郑伯奇在上海发起组织艺术剧社。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下的白区第一个左翼戏剧剧团。它首先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0年1月3日，剧社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第一次公演，演出《炭坑夫》([德]米兰顿)、《梁上君子》([美]辛克莱)、《爱与死的角逐》([法]罗曼·罗兰)三剧。由于内容进步，导演手法新颖，演员表演严肃认真，赢得了观众的称道。为了团结一致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和进一步推动新兴话剧运动的发展，3月，由上海艺术剧社和另一个进步戏剧团体摩登剧社发起，联合南国、辛酉、复旦、大夏剧团和戏剧协社等5个戏剧团体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4月，艺术剧社假虹口日本剧场上海演艺馆举行“红五月”第二次公演。除演出德国反战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外，还加演了冯乃超、龚冰庐合作的独幕剧《阿珍》。这次公演比前次公演更为成熟，因此获得了广大观众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连外国记者也赶来进行采访报道。公演引起了上海各剧团及戏剧工作者的极大注意，为左翼戏剧运动奠定了基础。

艺术剧社成员的革命活动和两次公演，特别是第二次公演冲破了敌人的封锁，在社会上得到了显著的成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4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出百余名武装和便衣警察，悍然查封了艺术剧社，没收了剧社的全部服装道具，并诬指演出用的木枪、军装等为阴谋叛乱的工具，当场捕去社员5人①。以后又捕去若干人，剧社的领导人和主要演员都不在社内，未遭敌人迫害。8月1日“上海剧团联合会”改名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31年1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为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在党的领

① 郑伯奇《回忆艺术剧社》，三联书店《忆创造社及其他》。

导下，剧联在介绍进步的戏剧理论，开展左翼戏剧的创作、演出，发展进步的电影事业，团结和培养革命的戏剧、电影工作者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剧联领导的上海大道剧社、三三剧社、光光剧社、戏剧协社、骆驼剧社等剧团以及受它影响而在联盟外的一些进步剧团在上海十分活跃。它们走向社会，走向群众，为工人、学生、农民演出，敢于揭露社会矛盾，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和鼓动抗日救亡。1931年9—10月，剧联在党和进步工会的帮助之下，在上海沪东、沪西、沪南及浦东等工人区内先后建立了一批“工人蓝衫剧团”向工人广泛作革命宣传。它们曾演出了反映工人斗争和生活的《炮口移动》、《工场夜景》、《活路》等优秀剧作。为了能使剧作内容明白易懂，演出达到宣传效果，“工人蓝衫剧团”还采用上海话演出。在日寇侵我河山，国土沦亡的严重形势下，剧联的作家们创作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剧作。如《S·O·S》（适夷作）、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集体创作），深受大众欢迎。12月，上海抗日救亡各团体在上海市商会举行反日联合大公演。暨南剧社、大道剧社、大夏剧社等演出了《血衣》、《乱钟》、《决心》、《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以及《工场夜景》和《活路》。当时钱杏邨撰文赞扬《活路》是1931年左翼戏剧创作中最优秀的剧目，因为它向社会指出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斗争！”1932年11月，剧联还通过一些社会关系打入一些官商举办的大型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在新世界游艺场举办的国民党公路建设道路展览会上，春秋剧社和戏剧协社将《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连续上演了一个月。不久在工商界主持的救济东北难民大会上又连续演出了20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

在左翼话剧蓬勃发展的时候，党还通过剧联加强了对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1932年初，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夏衍、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5人为领导的“左翼电影小组”，由夏衍任组长。自后，左翼电影运动迅速开展。在5月前后，电影小组非常巧妙

而迅速地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将上海各家主要报刊副刊上的电影专栏，一一争取到自己的掌握之中。如《时报》的《电影时报》栏，《晨报》的《每日电影》栏，《申报》的《电影专刊》栏，《民报》的《电影与戏剧》栏，《中华日报》的《电影新地》栏等等，它们都是对社会发生很大影响的电影评介专栏。电影小组通过这些阵地介绍左翼电影理论，宣传革命文艺思想，打击猖獗于影幕上的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电影以及所谓的"软性电影"。在党的领导下，电影小组在7月即组织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发动了一次对联华电影公司影片《人道》的批判。这是左翼文化运动对昏沉的中国电影界第一次敲响了宏亮的警钟。1933年6月18日，在《晨报》、《每日电影》创刊一周年时，在电影小组的组织下，夏衍、阿英、郑伯奇、洪深等十五位电影工作者以《今日电影》同人名义，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控诉，今后的批判》，建设性地提出了电影批评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电影小组还在报上介绍苏联的电影发展情况和苏联的革命电影理论。1933年中苏复交，苏联电影在我国公映后，电影小组大力推荐和宣传苏联电影的进步性，引导观众踊跃观看苏联影片，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促使中国的广大电影工作者认真学习苏联电影的主题构思和创作技巧，以提高自己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34年5月，《民报》又创办了《影谭》专刊，开辟了《电影时评》、《映画列车》、《银色随笔》、《银色杂写》、《谈影集》、《断片集》等专栏。《影谭》敢说敢评，其他电影副刊上难于发表的东西，它都敢于刊登。1936年5月31日和6月21日，星期实验小剧场假座新光大戏院举行第一次公演和第二次公演，遭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蛮横干涉和无理禁演，《影谭》在6月23日不顾威胁，以《东北是谁的领土？上海是谁的领土？》为题，严正发表抗议书，呼吁："演剧的要争'演剧的自由'，看戏的要争'看戏的自由'，整个民族，要争呼喊'东北是我们的领土'的自由，同时更要实践地去收回失地，回答他们那是我们真正的领土！"

革命力量还直接进入一些电影公司，陆续拍摄出一些进步电影，使上海的银幕上出现了新气象。在电影小组成立之后，受明星电影公司之邀，夏衍、郑伯奇、阿英担任了该公司的“编剧顾问”。明星原以拍摄武侠神怪影片《火烧红莲寺》出名，以后多以这类影片招徕吸引观众，自三人进入后，明星的出片大为改观。1933年由夏衍编剧的《狂流》拍摄完成。影片以“九·一八”事变时期长江16个省惨遭水灾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尖锐地揭示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题。影片公映后，被誉为“明星公司的划时代的转变的工作”，“中国电影界新的路线开始了。”这一年还拍摄了夏衍等编写的《上海二十四小时》，影片暴露了都市上海的贫富悬殊。还摄制了郑伯奇的反映大革命时代知识青年各各不同的命运和道路的《时代的女儿》。夏衍在这一年还将茅盾的名著《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是中国新文学作品移上银幕的第一次成功尝试。

在1933年初，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成立。夏衍、田汉、阳翰笙等都进入了该公司。艺华先后拍摄了田汉编剧的《民族生存》、阳翰笙编剧的《中国海的怒涛》等，热烈呼唤爱国激情，激励人们英勇战斗。

当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查禁普罗文艺的密令后，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即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11月12日夜，这个“铲共会”指使暴徒捣毁艺华在沪西新建的摄影场，并散发油印的“反共宣言”，警告艺华和其他电影公司（联华、明星、天一等），如“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①

特务的暴行与恐吓并不能压制左翼电影运动的继续高涨。1934年6月，联华影片公司由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和孙瑜编导的《大路》摄制完成献给观众。《渔光曲》描写了渔民的苦难生活，

① 《大美晚报》1933年11月12日，引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大路》抒写共同创造平坦大道的理想，两剧的主题歌流行于上海乃至全国各地。1934年的年初，在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在斜土路还兴办了一个“电通影业公司”（“电通”），以推广三友式录音机为掩护，积极筹备拍摄爱国进步影片。“电通”第一部摄制的电影就是有名的进步影片《桃李劫》，此片根据孙师毅以前为南国社编的《未完成的戏剧》所改编，由田汉、夏衍、阿英、郑伯奇、阳翰笙等剧联领导反复讨论修改而定，导演为应云卫。影片的主题歌《毕业歌》的旋律鼓舞了无数爱国的青年学生。“电通”首炮打响，接着又拍摄了《风云儿女》，主题歌即《义勇军进行曲》。当田汉创作此歌歌词时，他已经被敌人逮捕押在龙华监狱。他将歌词写在香烟纸盒的背面传送给外面的聂耳。这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他在上海先将歌词谱了一曲，到日本后不久，再重新创作了正式的曲谱，寄回上海。《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新中国的代国歌。“电通”摄制的第三部影片是《自由神》，由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主题是表现妇女为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第四部影片是《都市风光》编导都是袁牧之。这部影片是从“西洋镜里”来看“十里洋场”，揭露都市上海在五光十色面幕后面的种种罪恶，是旧上海社会黑暗的一幅漫画。

显然，左翼电影工作者并没有被反动派的迫害所吓倒，整个左翼文化运动是一直在坚强地无所畏惧地向前发展着。自1936年以后，包括“左翼电影小组”在内的各左翼文化团体为了组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而都陆续地解散了，但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仍然坚持斗争，坚定地向前行进。他们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和争取人民的解放的新形势中继续不断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六、“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上海受到的惨重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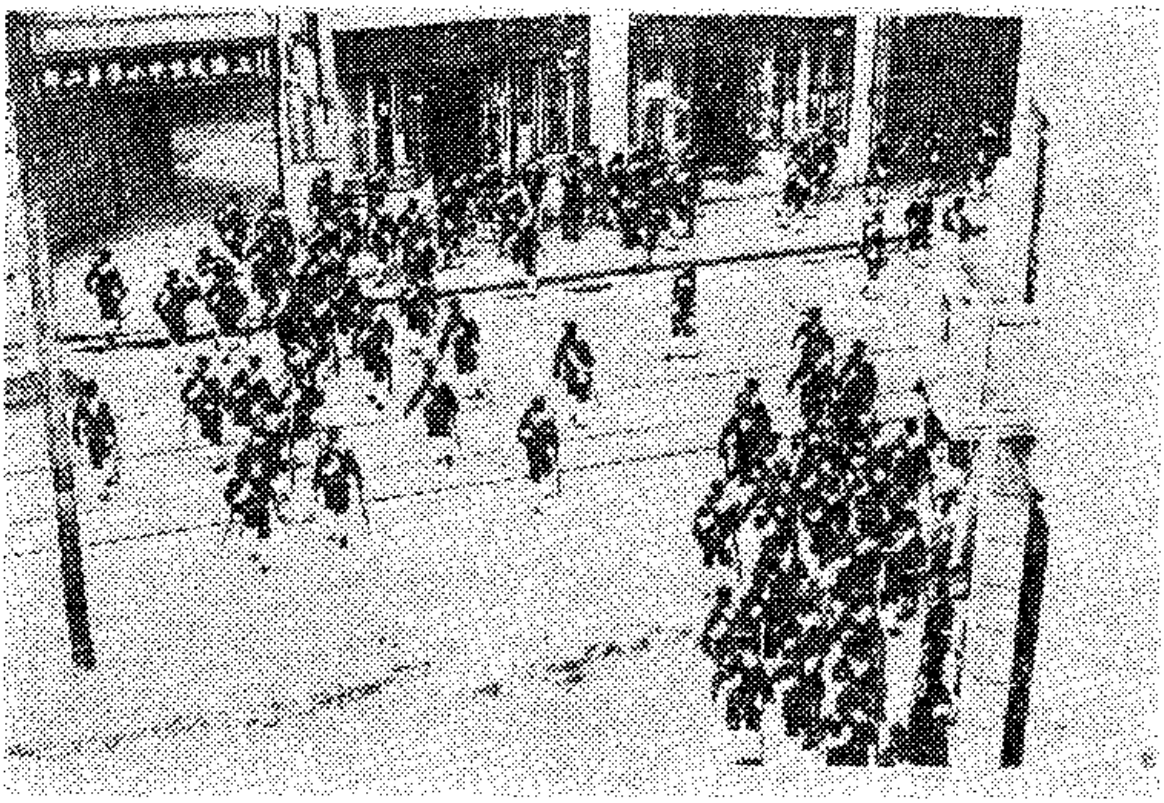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加紧，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并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进而图谋华北，并密谋在华南打开缺口，把战争推向中国内地。为了迫使国民政府和西方各国承认它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取得进攻内地的最理想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把目标集中到了上海，策划战争阴谋。

1932年1月18日，在日本当局的策划下，5名日本和尚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棉织厂附近进行挑衅，被工人殴打。20日凌晨，日本浪人40—50名借口此事系该厂抗日义勇军所为，携带火酒、汽油、硫磺等前往三友实业社棉织厂两次纵火，并袭击附近岗亭，砍死公共租界华捕一名，刺伤两名。当天下午，日侨数千人举行居留民大会，决议请日本政府派兵来沪，会后还进行了示威游行，在北四川路殴打行人，捣毁中国商店，叫嚣要“杀尽中国人”；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往市政府向市长吴铁城蛮横提出抗议，要求上海市政府对日僧被殴事件道歉、赔偿和惩凶，并取缔一切“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尤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行解散。

数日间日方紧急调兵遣将，大批日舰开抵上海。国民政府慑于日帝咄咄逼人的气势，授意上海市政府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要求。27日夜，上海国民党军警当局悍然封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及浦东、吴淞、杨树浦、曹家渡等六处分会，通令取缔一切抗日组织。28日下午，由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将吴铁城复牒郑重地送往日本领事馆，对日僧被殴事件“深表歉仄”，答应赔偿、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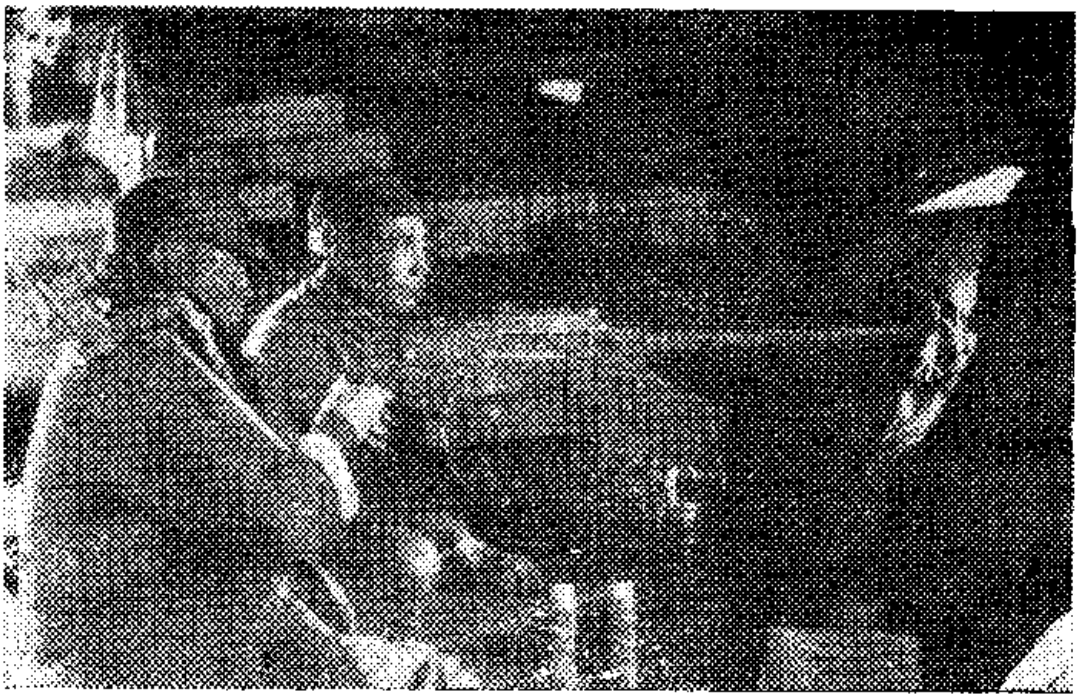
凶，并表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领导的抗日活动系“越轨违法行为”，已予取缔。村井仓松对此表示“满意”。

但是国民政府的屈辱让步已经根本不能阻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狂妄野心。在沪日军已经做好了发动闪电战的准备。当晚 11 时 25 分，由日本领事馆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的“公告”送交市政府和市公安局，蛮横宣称“帝国海军”鉴于多数日本人住居闸北一带，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要求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公告刚送达 15 分钟，日军已向闸北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



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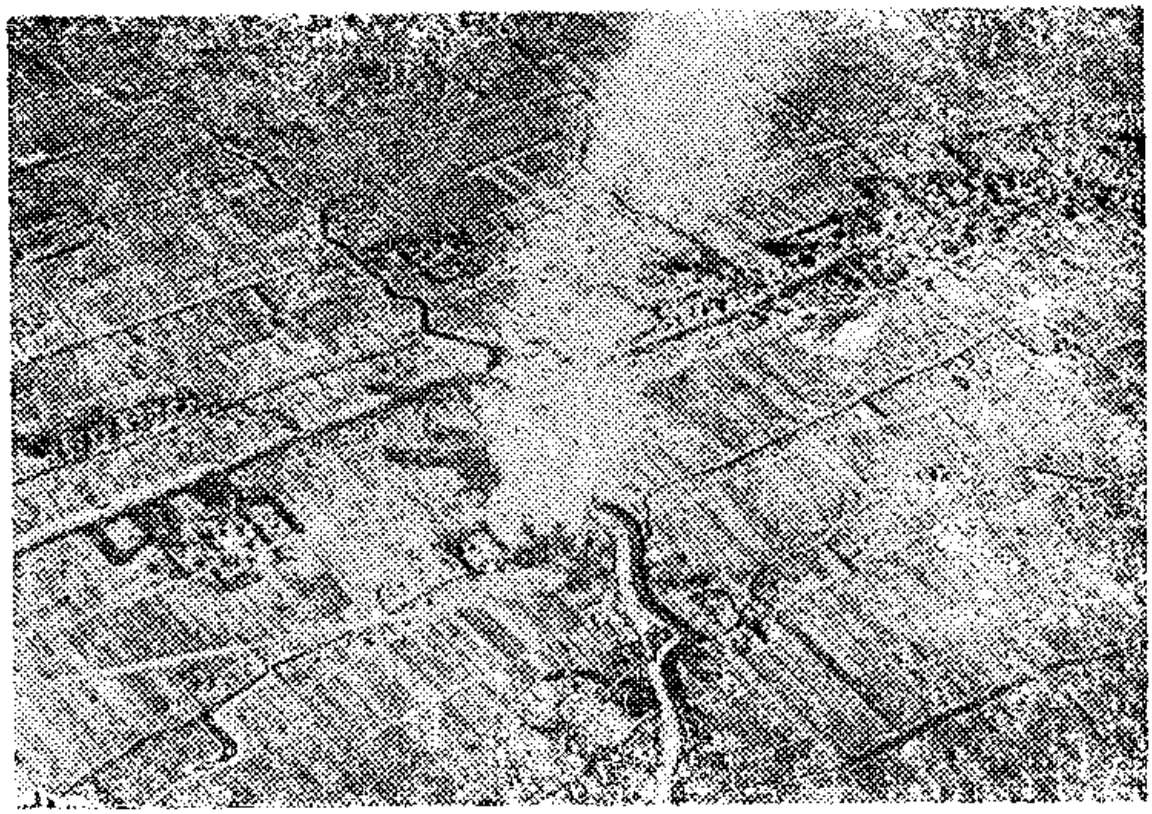
日军数十名陆战队驾驶着机器脚踏车首先抢占了北四川路底陆战队司令部北面的淞沪铁路天通庵站，然后在铁甲汽车的前导下，3000 余名日军从淞沪铁路及虬江路两个方面向闸北进攻。盐泽狂妄叫嚣在 4 个小时内攻占上海。



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进攻

驻防闸北的是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在“九·一八”东北全境沦陷的刺激和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对日寇仇恨满腔，在爱国将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指挥下，立即奋起抵抗，打退了日寇连续数次的冲锋。12时50分，日军又派增援部队发动强攻，十九路军并力还击。半小时过去了，日军毫无进展，不得不退回天通庵以东，双方枪声渐稀。近2时，机枪声又起，日军再次组织强攻。十九路军士气旺盛，一以当十。到2时45分，日军向广东街方向退去。敌军在撤退途中疯狂地纵火焚烧商店和居民住宅，租界中各处救火会望见大火，不敢前去扑灭。3时许，天通庵站日军被十九路军全部歼灭，车站复入我手。盐泽4个小时攻占上海的大言破产了。这天，日军发动强攻死伤的人数在800名以上，3辆铁甲车被十九路军缴获，1辆被毁。

29日凌晨，日军重新组织兵力分三路再次猛扑闸北。一路由江湾路入天通庵路，一路由吟桂路(今秦关路)西进，一路由虬江路、福生路(今罗浮路)直取北站。十九路军将士再接再厉，奋勇抵



日机轰炸上海

抗。在虬江路、吟桂路、川公路、广东街一带都发生了激烈巷战。日寇伤亡惨重，尸首横藉。陆战进行时，停泊在黄浦江战舰上的日机飞临闸北轰炸，主要目标为北火车站和商务印书馆。北站是上海的铁路枢纽，运输重地，而商务印书馆系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是我国近代所创、收藏极丰的著名图书馆，与总馆一街相隔。对这两处，日寇蓄意进行重点破坏。10时许，日机轮番低飞轰炸商务印书馆。到下午3时许，全厂80余亩土地上一片火海，厂房和所有印刷机全部被毁。北站在上午即遭到敌机轰炸，下午1时左右，管理局大楼屋顶被炸，火势朝下延烧至底层办公室，大楼只剩下了断垣残壁的外壳。车场内停靠的二列列车轰然一声，化为灰烬。货栈也着弹猛烈燃烧，所有货物未能抢出，全部焚毁，仅此一项损失就在百万元以上①。直到晚上10时，北站

① 《淞沪血战经过》。

的火焰还未熄灭。至于东方图书馆，当商务印书馆中弹燃烧，火焰冲向马路时，尚未受到大害，但到2月1日8时许，东方图书馆突起大火①。黑烟腾涌，纸灰飞扬到市中心一带，直到傍晚图书馆终被焚毁，30年来所有苦心搜罗的中外图书杂志，包括大量的孤本、珍本、善本图书，全部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的被毁，是我国近代文化事业的巨大损失，也是日寇蓄意毁灭文化的滔天罪行。

在29日，日机轰炸助战的时候，地面进攻的日军并未得势，相反，在十九路军的猛烈还击下，下午，进攻的日军全线败阵，纷纷向租界溃逃。十九路军追击到海宁路时，面对着"中立"的租界，却"尊重条约"，到此为止，眼看着那些残敌得以逃生，获得喘息和调整的机会，再从租界里发起新的进攻。租界成了日寇的庇护所，而华界却是反复争夺、破坏频仍的战场。

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大举挑起新的战争激起了全国上下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十九路军不畏强暴，坚决粉碎敌人占领上海美梦的英勇行为，使全国人民振奋鼓舞，斗志倍增。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上海民众反日会领导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慰劳和爱国宣传活动，发动了沪西日本纱厂40000多工人的反日大罢工，组织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上前线，支援十九路军。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代表上海人民亲往前线表示热烈慰问，并筹设了几十所伤兵医院救护伤员。市商会和银钱公会通告全市商店行号罢市御侮。各界人士紧急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进行支援前线、稳定后方的工作。国民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也通告全市工人举行总罢工。大敌当前，全市各界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工人、学生、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夫，街头摊贩，从老人到儿童，无不踊跃捐钱、捐物。许多妇女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慷慨献

① 当时传闻系日本浪人潜入纵火焚烧的。

出，许多儿童省下自己的零用钱送往前方，无数贫困的劳动大众不顾饥寒将自己血汗换来的一点零钱捐献给英勇的将士。每天收到的现款、衣服、日用品、食品、药品堆积如山，难以计数。当报上透露出“目下军中所最需要者，为运货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① 的消息时，不到半天工夫，各式各样的汽车、脚踏车、运货车、机器脚踏车等从四面八方献来，立即送往前线，迅速解决了前方交通工具不足的困难。全国各地的慰问信、电、捐款捐物源源不断地送到上海，海外爱国华侨也汇来了巨款。上海抗战军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得到了巨大的鼓舞。民众的抗敌力量和无私支援深深地感染和教育了十九路军的将士。蔡廷锴曾经这样深切地体会到：“这回战争上所表现的力量是民众的；所以，如有光荣可言，亦是民众的光荣。惟民众的力量才是伟大的、真实的力量，离开了民众，我们便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和存在的价值了！”②

上海抗日军民的英勇反击使日寇屡攻屡败。为了整顿残兵，等待援军，30 日日方请英美领事出面召集双方要求停战 3 天。我方因战区内有数十万难民须疏散安排，遂同意英美领事的调停，停战 3 天。

增援的日军和兵舰陆续开到。2 月 2 日下午，未等停战期满，日军提前发动猛烈进攻。他们改用向闸北与吴淞两处同时并击的新战术，企图利用空中优势、炮舰优势以及控制军工路和黄浦江的交通便利，迫使十九路军顾此失彼。但是这个新战术并未见效，两处日军都遭到了迎头痛击。

7日，盐泽被撤职，改由野村吉三郎中将担任海军总司令，指挥上海战事。野村采用了重点进攻吴淞，次攻江湾，包抄闸北十九路

---

① 1932年1月31日《申报》。

② 引自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

军后方的战术，从7日凌晨开始，他集合海陆空大军限24小时内攻占吴淞要塞。血战竟日，吴淞要塞岿然不动。日军陆地冲锋部队几乎全部被歼。8日拂晓，日军又加入新到6000余名日军，再攻吴淞。自拂晓到傍晚，前后发起10余次冲锋，终未得逞，13日，日军3次架设浮桥竹筏偷渡蕴藻浜，第三次1000余名日军过河成功，但是立即遭到吴淞守军三面包围，双方发生激烈的肉搏战。十九路军喊杀之声震天动地，过河日军全部被歼，无一生还。14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开来淞沪，接替左翼防务，与十九路军并肩抗战。

日军屡战屡败，东京内阁又派出号称国内最精锐的第九师团，以植田谦吉为司令官来代替惨败的野村。18日，植田居然向十九路军狂妄地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中国军队后撤20公里。蔡廷锴通电全国，誓以铁血答复敌人。上海市民联合会代表300万上海市民发表宣言愿作坚强后盾，坚决拥护和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到底。20日上午7时半，植田下达总攻击令，以海陆空全部武装力量向吴淞、江湾、闸北发动全线进攻，主攻目标为江湾。22日因我方江湾阵地非常坚固，不能突破，植田调集30000军队在凌晨3时乘雾直攻庙行镇，企图断绝闸北与吴淞之间的联络。敌军炮弹密集，数十架飞机又频频投弹，我方战壕工事多被炸毁。第五军将士临危不惧，奋勇抗敌，与十九路军的援兵三面夹击敌军。从早晨一直血战到晚上8时30分，日军伏尸遍野，被歼3000人，余部不得不向引翔港方向退去。庙行之战威震中外，身经此战的张治中将军说：经此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英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① 23日，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反攻进击江湾周围的日军，取大包围形势，逐渐合围。敌军冲锋10余次都遭失败，大炮、飞机也不能援救其困境，日军1700名被击毙。

---

① 张治中《第五军参加淞沪抗日战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

从2月20日总攻开始到28日之间的八天内，日军遭到了比以前任何一次总攻更为惨重的失败，其主力部队已经丧失战斗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向上海增兵，派出十一、十四两师团，并任命前田中内阁陆相白川义则大将为总司令，由陆军大将菱刈隆充当总指挥来指挥上海战事，29日日军向我方发动了超过以前任何一次规模的全线总攻。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分别经过一个月和半个月的苦战，特别是数次重大的决战，虽然不断取得胜利，坚守了阵地，但是由于消耗过大，得不到兵力增援、充足的粮弹补充和休养整顿，力量已渐渐不支。从"一·二八"开战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始终执行着消极抵抗的方针，力图通过外交和谈，英美等国的调解，用妥协让步的办法来促使日方停止战争。南京政府一直未对日方正式宣战，相反急急忙忙迁都洛阳，并散布不抵抗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1月31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无视日寇在上海的疯狂烧杀、上海军民和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竟电告吴铁城：要部队"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对抗日爱国的民众则谓：凡"假托爱国名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亦须周密注意"①。即使在十九路军反击不断取得成功，日本侵略者伤亡惨重，战局于我有利的形势下，何应钦还是鼓吹我国必败，日方必胜的论调，向爱国军队和爱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大泼冷水："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② 日本军队源源而来，事实上国民党同样具有充足的兵力。但国民党的数十万军队却大多摆在江西等地围剿红军，镇

① 《何应钦致吴铁城电》1月31日，见《"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历史档案》1984年4月号。

② 《何应钦致吴铁城电》2月9日，见《"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历史档案》，1984年4月号。

压革命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那些追随者来看，“剿共”远比抗日重要得多：“江西之兵如何可调？……由江西抽出一师赴沪，对倭无致胜之望，对匪有先败之虞。夫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勿剜不可剜之肉，而补不能补之疮，则国家生命望苟延一息。”①

从开战以后，国民政府仅仅派出第五军开往淞沪，再无增援。对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军械装备、所需粮食物品，国民政府不但不予充足的供给，相反却拖欠军饷，扣下各界人民的捐款，使得前方将士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蒋介石借口税收减少，国难严重，停发非嫡系部队的饷款，从1931年10月起，十九路军就没有领到过分文军饷。淞沪抗战开始以后，海内外同胞捐献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700万元，军政部借口此款应归公有，并不将其全数交给十九路军使用，仅仅分出部分抵充欠饷。②第五军亦复缺粮缺饷，为此张治中在十四日开拔上海前线时不得不致电参谋部，声诉粮饷欠缺的困苦：“粮食最关重要，而本地米粮来自无锡，现在交通梗阻，来源几断，征集綦难……再者：战时例发军米，前在淞沪，曾由总指挥部间有领取，今自此间，请领无着。若言饷项，则友军按月十成，且闻有加一之说，而本军例发八成，尚积欠四、五月之久……”③

2月29日日寇发动总攻时，其投入的总兵力已达10万左右，而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兵力仅35000人上下④。双方力量悬殊。敌人又有百余架飞机和大批军舰帮助陆战队进攻，而我军既没有

① 《熊式辉致何应钦电》见《“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历史档案》1984年4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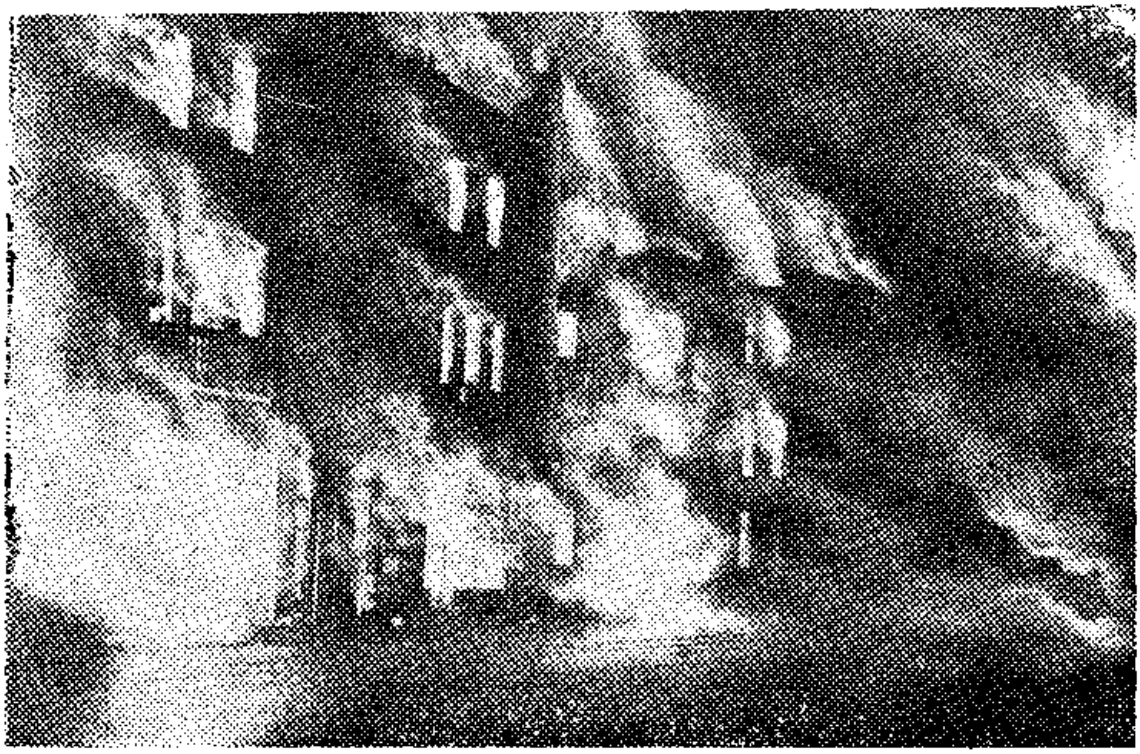
②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

③ 张治中《第五军参加淞沪抗日战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

④ 《淞沪抗日之血痕》。

海空力量配合作战，同时防守的战线又绵延百余里，兵力分散。作战形势显然对我方已十分不利。

2月29日凌晨1时，日军进攻正式开始。8时日军以铁甲车为前导，数千名步兵向江湾、庙行我方阵地大举发起冲锋，同时在飞机、大炮、坦克车的掩护下，日军重兵死力猛攻闸北八字桥。每一小时落在八字桥周围的炮弹达300余发，附近民居全部起火。敌军冲锋10余次，3次占领八字桥阵地，但3次为我方夺回，日军死伤至少在3000人以上。入晚，双方用重炮对轰，整夜不息，直至第二天凌晨5时。3月1日，日军向八字桥、天通庵一带，江湾、庙行周围继续



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的奥迪安戏院被焚毁

发起强攻。日机狂轰滥炸，大炮不断轰击。闸北虬江路、大统路、青云路，闸北与江湾之间的大片民居陷于一片火海之中。大火绵延10余里，入晚遥望烈焰腾空，红光冲天。日军在各处地面攻击的部队伤亡惨重，但后援部队不断增加，继续死战强攻。4000余名敌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猛冲江湾杨家楼，双方白刃相接，血肉横飞。庙行方面日军从两路进犯强攻，十九路军全力抵御，日寇尸体横

藉，但以尸为垒，死战不退。后十九路军不得不从浏河调来一个团，才夺回被敌占领的阵地。在敌人的炮击、轰炸和反复强攻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伤亡同样十分惨重。扼守广肇山庄附近的七十八师一五五旅士兵死伤过半，光营、连长就死伤12人之多①。各部预备队全部用尽，阵地因伤亡而产生的空隙已无力补充。

当晚载着陆军20000余人的日运输舰在空军和海军的保护下，驶抵浏河，乘着夜色在杨林口、七丫口登陆。浏河守军因白天大部已抽调至庙行作战，仅存二连兵力。见日军来攻奋起抵抗，终因众寡悬殊，难以抵挡，阵地被敌攻破。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想派兵急驰援救，但这时几路敌军在各处同时发起总攻，已无力移兵浏河。总指挥部急电军政部速遣两师驰援，但军政部对此竟置之不理。浏河一失，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侧面和后方，均受严重威胁。如果继续坚守前沿阵地，那么自吴淞、庙行、江湾、闸北以至大场、真如的第一线内的守军可能会全部陷入敌人重围之中，后果不堪设想。万不得已，当天下午蔡廷锴下令全军总退却，撤向太仓——嘉定——黄渡第二道防线。

吴淞方面3000守军加上铁血军400余、上海市民义勇军100余人，在要塞司令谭启秀、旅长翁照垣的统率下，虽然接到撤退命令，但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死守炮台阵地与吴淞镇，继续与敌人激战。日机从空中轮番对要塞滥炸，黄浦江上的大批敌舰重炮加入狂轰，日军步兵30000从四面合围强冲猛打，遭到了守军的顽强抵抗。到3日上午，吴淞地方团体眼见守军形势越来越恶劣，派人强请翁旅长暂时撤退，以保持精锐。经再三的恳说请求，翁旅长始答应撤兵。队伍沿蕴藻浜突围向西，日军拼命追击，但被预设的伏兵痛击，才不敢逼近。

3月2日，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了退守待援的电文，并表

①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

示了与暴日不共戴天，血战到底的决心：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①

自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退守第二道防线以后，日军节节进占，前锋迅速推进到六浜口，浮桥、岳王市、陆渡桥、外岗、安亭、白鹤港等地。日军并在南翔设立了司令部，直接指挥前方战事。日军的援兵继续源源而来开赴战场。一批日舰溯长江而上企图暗袭江阴，包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后路，但遭到了江阴要塞守军的顽强还击，未能得逞。

淞沪战争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震动，世界舆论反应强烈。同时，上海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所在，战争直接损害了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经济利益，引起了与日本的关系复杂化。3月4日，国际联盟召开大会议决中日两方立即实行上海停战。国民政府对此决定正中下怀，立即表示遵照国际联盟的公议办理。日本方面由于遭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速战速决的战略已经完全破灭，而其发动战争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因此也表示："现在中国军队已撤退二十公里，日本目的已达，故今后停止进攻。"②

此后，双方就基本进入了停战状态，英美法意等国居间进行"和平"调解。谈判若断若续，其间又遭到日方的不断拖拉挑剔，直至5月5日始达成协议，正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按照《淞沪停

①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

② 引自《淞沪抗日战事纪略》。

战协定》规定："日本军队应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但是"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点。"所谓"毗连地点"根据附件所示，即吴淞、江湾、闸北内的大部分地区，这就是说：日军具有"暂时"在吴淞、江湾、闸北大部分华界地域的驻兵权。中国军队的驻扎情况是："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按照附件的说明：中国军队的驻兵位置如下："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北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与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与四基罗米突之一点，再由此，西北上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①。根据这样的规定，中国军队只能驻扎在安亭——浒浦口以西地区，对淞沪地区已经完全没有驻军权，中国军队在上海华界的北部——中国的土地上竟不能驻军，这是极大的屈辱投降。上海军民的淞沪抗战终于被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扼杀了。

《淞沪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可耻协定，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慨。早在协定正式公布前的二天，上海群众为此痛殴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郭泰祺，表示强烈抗议。协定公布后，全国抗议舆论激烈。上海《时事新报》在一篇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无辱国丧权不可得也。"② 5月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就《淞沪停战协定》发出通电代表全国劳苦大众，否认这一卖国协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以民族战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二八"淞沪战争使上海受到了空前的惨酷打击。在战争

① 引自《淞沪抗日战事纪略》。

② 1932年5月6日《时事新报》。

中，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受伤 8584 人，阵亡 4086 人①。敌人的疯狂烧杀和滥炸狂轰，造成了闸北、江湾、吴淞等战区内的我方民众人亡屋毁，工厂、商店、学校等大部分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破坏。根据战后中央统计处的调查，上海市府辖境内（不包括嘉定、太仓等县战区），被敌侵占的面积约 474 平方公里。受直接损害的居民达180816户，814084 人，占全市华界人口总数的 45%。其中死亡 6080 人，受伤 2000 人，另有 10400 人失踪不知下落。在敌人侵占区内，居民的财产价值为 800000000 元，损失达 7/10；房屋价值为 240000000 元，损失 8/10；从全市来说，财产受直接与间接损失的价值达788173492元，计住户财产 584104054 元，房屋204069938元。在敌人侵占区内共有工厂 597 家，占全市工厂 1/4。其中受损者过半数，损失达 67991874 元。全市工厂受战争直接与间接损失的价值达 97151287 元。全市工人因战争而失业者达8/10，单棉纺厂失业工人就有 25 万。敌人侵占区内商店计有 12915 家，受损失者达 7/10，全市商业受战争直接与间接损失的价值为 59836074 元。在金融方面，因战争关系，市面萧条，金融呆滞，全市银行与钱庄的营业减少了8.5/10②。

战争给上海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创伤。市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战区内则到处是废墟一片，凄惨万状。《时事新报》的战地记者对战后的闸北曾作了一次踏勘，他写道："…… 由宝山路而至永兴路，几如身涉乱砾丛中，极目四望，但见一片残垣断壁，周围数里，一月前鳞次栉比之市房，至今已无一完整之屋宇矣，而且各处马路，都坍屋倒地，将路途塞断……宝山路两边之厦厦巨屋，尽若罗马废丘。……闸北全区数万幢房屋，在昨日记者所经之处，完好者可称寻不到一所，其有未经全烧者，亦门户开洞，物件劫掠一

① 《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淞沪事变之统计》。
② 《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淞沪事变之统计》。

空矣。”①

七、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的纵容和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下，步步向华北紧逼。1935 年 6—7 月间，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接着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加紧分裂华北。11月，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已沦亡在即。

民族垂危，灾难深重。1935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 9 日，北平的六千余名大中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与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接着，全国许多城市的爱国学生纷起响应和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斗争，也相继发动和举行了各种形式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高涨。在上海，自“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上海各界人民始终保持着抗日的热情，但蒋介石反动派采用高压政策打击抗日斗争，并以法西斯手段对待抗日爱国人士。1934 年 11 月，蒋介石派特务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坚持抗日宣传，对蒋介石剿共政策不满的爱国进步人士、《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935年 5 月，国民政府竟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无理抗议，悍然在上海将刊登《闲话皇帝》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逮捕入狱。“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终于冲破了

① 《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淞沪战事之前后》。

上海的压抑空气，使抗日救亡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2月 12 日，早已酝酿着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由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郑振铎、章乃器、李公朴等 283 名文化界爱国人士签名，正式发表。《宣言》呼吁："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宣言》严正地提出了"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八项具体的主张，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①。

在以后的几天中，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救国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上海的学生界积极地行动起来了。12月 19 日下午2时，由复旦大学 200—300 名学生首先发动，列队至江湾市政府请愿，提出书面要求五条：（一）取消华北自治组织；（二）释放北平被捕学生；（三）惩办压迫学生运动之官吏；（四）保障学生爱国运动；（五）讨伐殷逆汝耕。从下午 4 时开始，暨南、交通、大夏、光华、持志、沪江、大同、麦伦、南洋模范、暨大附中、光华附中、敬业、务本等 45 所以上的大、中学校学生共 5000 余人陆续汇集于交通大学。至晚上 9 时，这些学生从交大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黑夜长途游行，队伍循中山路向北，经水电路，于凌晨 3 时许，到达复旦大学。在复旦略为休息集中后，继续向江湾市政府行进。凌晨 5 时 30

①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

分，全体队伍抵达市政府。学生主席团向市长吴铁城郑重地提交了书面要求七条，要市长保护全上海爱国运动，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自由，并转请中央制止华北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保全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在此期间，各路学生队伍继续向市政府涌来。9时30分，正风中学、育青中学、大同大学、大同附中等10余所大、中学校的1000名学生冒雨陆续抵达市政府。中午，又有各校中学生2000余人在南市一带游行后冒雨向江湾进发。下午4时，另有1000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也赶到了市政府。从这天的上午开始，在上海市城南，经过城厢、南市，远至徐家汇一带，还有二批大、中学生分别约1000余人顶风冒雨高呼爱国口号进行示威游行。

12月23日上午，复旦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会上一致通过组织请愿团立即出发去南京请愿。在此以前，北平已组成南下学生请愿团来京请愿。1000多名学生当即列队奔向北火车站。但在站上受到了当局的阻止，路局全线停止发车，请愿团学生夜宿车站月台上，发表了《敬告同胞书》，内称："吾人认为国家处此危迫之秋，和平早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舍抵抗不足以言救亡，唯斗争方可立国。"① 24日早晨，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东南医学院、正风学院、建国中学、新亚中学等校的2000多名学生也纷纷赶来北站加入请愿团队伍，坚决要求乘车晋京。整个北站人山人海，口号之声震天。下午4时，市政府恐交通断绝和事态扩大，不得不下令让列车放行。5时1刻，2000名学生分乘二列列车从北站启行。但国民党当局指使路局沿路拆毁铁轨，捣乱滋事，列车时行时止，最后停在无锡站内，不能前进。请愿团学生排队进入无锡城中绕城游行一周。在得到无锡当局和专程赶来的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答应向中央转达学生请愿要求的保证后，全体学生迫不得已，乘原

① 1935年12月24日《申报》。

车返回上海。

12月21日，由上海中华妇女同盟会、妇女生活社、妇女园地社、妇女大众社、妇女文化协会等团体以及史良、陈波儿、邓裕志等人发起，召开大会，支援北平学生界爱国运动，并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大中学生、工人、教师、职员、医生、护士、律师、作家、演员等近千名妇女。何香凝到会讲话，号召"全国妇女应一致起来，武装救国"。会上选举了史良、沈兹九、罗琼、胡子婴、韩学章等11人为理事，并通电北平学生表示"本会誓与诸君共同奋斗到底"，另外还发表宣言动员全国妇女"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贯彻我们的主张。"① 大会结束后，在薄暮中举行示威游行。队伍从北四川路折入南京路，在南京路上不断有群众插入，连许多男工、男学生也加入了示威行列。游行队伍越来越长，声势越来越大。一些中外记者如史沫特莱都赶来采访、拍照，工部局的马警队不敢贸然冲击队伍，队伍经南京路、西藏路、北火车站，到北四川路解散。

12月27日，在沪的教育、新闻、出版、电影、戏剧、法律界等三百多名爱国人士集聚于西藏路宁波同乡会，正式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了大会章程，选出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沈兹九、江问渔等35人为执行委员。大会发表了第二次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继续坚持上次宣言中的八项主张，并更具体提出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罢免并严惩一切卖国的亲敌官吏，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要求，号召全国文化工作者在各自的领域内，用各种方式，激发大众斗争的意识，联合组成救亡的统一战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① 1935年12月22日《申报》。

1936年1月2日，“上海小学教职员救国联合会”成立，8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成立；27日“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以文化、教育界为主的上海爱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声势越来越大。在大敌当前、困难日重的紧迫形势下，各救亡团体深感团结联合的必要性。1936年1月28日，在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和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等团体的联合发起组织下，在市总商会礼堂举行了纪念“一·二八”四周年的大会，各团体800余名代表出席了这个庄严的大会。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相继发表了热情而沉痛的演讲。在这些人士的演讲间，由青年歌咏团领首指挥大家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一·二八纪念歌》，歌声悲壮激烈，声震场外。会上宣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出了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马相伯等30人为理事。会议通过提案：上海各社团工会分子都可加入救国会，另外要扩大组织并筹备成立全国各界的救国会总会，把救亡运动更深入地推向全国各地。会后，主席团率领到会的全体代表举行游行。场外各界人士纷纷参加，共达近万人。尽管遭到了巡捕的阻挠和殴打，但他们英勇不屈，秩序井然地通过租界闸北，到达宝山县庙行，公祭了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牺牲的无名英雄墓。

2月9日，由沙千里等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到会约1000人。23日，由陶行知等领导，以工、农、店员占多数的上海国难教育社成立，入会者最初就有700余人。他们都加入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在上海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邹韬奋在1935年11月主编出版了《大众生活》周刊。这是一个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影响巨大的进步刊物，在这份刊物上面，邹韬奋等发表了大量动员民众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力文章。它成了当时上海及全国救亡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每期销数达20万份，创中国杂志发行纪录。但1936年的2月，国民政府下令取缔封闭《大众生活》、《世界知识》

《妇女生活》、《读书生活》、《生活知识》等进步刊物。

《大众生活》被迫停刊后，除由金仲华、钱俊瑞相继主编出版《永生》周刊来替代外，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五团体共同为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在5月6日创刊。《救亡情报》为半公开的周刊。在它的右上角，每期有"征求会员"启事，上写："一切愿意参加救国会的民众们！各救国团体都是广大人民的救亡联合战线团体，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参加。"《救亡情报》刊载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系列文件，介绍上海和全国救亡运动的各种情况，成为当时上海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喉舌和主要宣传阵地。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巨大声势，鼓舞着各地的爱国人士和广大的爱国民众奋起投入救亡队伍，扩大救亡阵线，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妇女界、学生界等救国会先后建立。各地的救国会需要互通声气，互相支援，开展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此，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加紧与各地救国会进行联络，积极筹备成立全国性的救国联合会总会。

1936年5月29日，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沪召开，全国各省几乎都有代表参加。大会响应中共号召，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要求发动全面抗战并决定把"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改名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两天以后，即5月31日，相聚在上海的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70余人，在圆明园路青年会隆重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会议共进行两天，第一天会上，由上海代表作时事报告，各地各重要团体作情况汇报。晚上讨论通过了大会宣言。第二天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十九路军的代表也赶来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总结检查了以前各地救亡工作的优缺点，然后讨

论通过了由各地代表提出的各种提案。最后通过大会章程，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陶行知、邹韬奋等41人为执行委员，其中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10人为常务委员。会议至晚上11时30分，在异常高昂热烈的气氛中胜利闭幕。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宣言指出："在这敌寇日深而内部纠纷依然严重的时候，天良未泯的人民，都渴望着有一个广大的团结，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就是"为了这种要求"而建立的"一个统一的人民救国阵线"。宣言认为："抗日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的任务，有历史上的重要性"，因此主张，全国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人民救国阵线愿作谈判的"介绍"，并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履行"和对违背行为的制裁。宣言坦诚地阐明："我们决不忍见国内任何的势力，再在相互冲突中遭受一丝一毫的损失；我们要把他们好好的维护起来，统一起来，巩固起来，作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力。"①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一系列文件的发表、传播，在国内外各界爱国同胞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救国会鲜明的政治主张和光明磊落、公允无私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在全救会的指导和影响下，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的救国团体和救亡刊物纷起迭出，繁若群星，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在上海，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等救国团体陆续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和加强对各个救亡团体的领导和帮助。在各界救国会团体中党都秘密地建立了"党团"或支部等党的核心小组。在一些救国会中分别都设有理事

① 《救亡情报》第6期。

会和干事会，理事会是由社会上知名爱国人士组成的，对外完全公开；干事会是秘密的，许多地下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加入了干事会，负责救亡团体的具体工作，推进运动的深入展开。共产党员是救国会的中坚骨干力量，救国会是共产党团结广大国统区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的极好的组织形式。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及全国各界的救国会团体在成立以后都发展很快。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如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在这一年的10月，已经发展有1300多名会员，下面设立了7个干事会，联系着上海为数众多的广大职工和店员群众。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寓所。噩耗传来，各界人民悲痛异常，痛惜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此失去了一位坚强、英勇的伟大战士。鲁迅先生的治丧委员会迅即成立。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曹靖华、许寿裳、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中外各界人士组成。中共上海党组织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经过周密研究，决定为鲁迅先生举行盛大的葬礼，把葬礼办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救亡活动，一次轰轰烈烈的反日大示威。

鲁迅的灵堂安设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灵堂内布满了各界团体和群众敬献的挽联和花圈。在3天内，前来灵堂瞻仰鲁迅先生遗容的团体代表和群众川流不息。据签名统计，团体有156个，个人达9470人，而未签名者更是不计其数。22日下午1时50分，出殡开始。由14位青年作家扶送棺柩上车，各界前来送殡的达6000余人，队伍长达里许。队伍的前导为写着“鲁迅先生殡仪”的白布横幅。接着是哀乐队，一长列持挽联、肩花圈的执绋者和一大队歌咏队。其后是布底墨画的巨大鲁迅遗像，遗像后是灵车，由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儿子周海婴、兄弟周建人以及宋庆龄、蔡元培等伴随。灵车上覆盖“民族魂”三个大字，为沈钧儒所书。再

以后就是送殡者的巨大行列。队伍出万国殡仪馆，从胶州路经爱文义路、极司非尔路、愚园路、地丰路，折入大西路，再进入虹桥路。一路上，租界与国民党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送葬的群众唱着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还唱着《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坚定地向前行进。沿路送葬队伍并不时地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中国不会亡！""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努力人民解放斗争"、"要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等口号，同时还散发了大量的《鲁迅事略》、《纪念鲁迅先生要继续鲁迅先生救亡主张》、《哭鲁迅先生》等传单。随着队伍的缓缓向前，一路上无数的工人、店员、学生及其他市民群众纷纷加入送殡行列，将近虹桥路时，灵车后的送葬队伍已经超过了出发时的一倍以上，足有二里多长。

4时30分，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纪念堂先举行了葬仪。首先由蔡元培致词，沈钧儒报告鲁迅生平事略。接着宋庆龄、章乃器、内山完造、邹韬奋、肖军先后发表简短演说。宋庆龄说："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① 在胡愈之致哀词后，全体送殡者静默致哀。在哀乐声中灵柩缓缓地移入了穴内，复上了石板。

救亡的歌声和口号冲破了上海阴霾的云空，鲁迅葬礼是1936年下半年上海人民举行的一次最大的抗日救国示威行动。上海各界的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决心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去迎接新的战斗，实现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伟大目标。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蔓延高涨以及各地抗日救亡团

① 《救亡情报》第24期。

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使国民党政府甚感惊恐。尤其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以全国规模的联合组织出现，得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普遍拥护，它公开批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策及其错误，号召停止内战和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统一战线，全力以赴地进行抗日斗争。这些是蒋介石政府所难以容忍的。只是慑于全国人民救亡浪潮的汹涌澎湃，蒋介石政府只能逐步地推进对救亡运动的迫害。

早在1936年2月，针对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面，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大肆攻击文化界救国会的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是皆利用'救国'的呼声，以作其叛逆行为的掩护"。① 还恶毒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利用民众的热情，乘机煽惑，将文化团体知识分子当作了工具使用。国民党政府想通过这些恐吓诬蔑，制造"救国有罪"的反动舆论，抵制救亡运动的发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立即发表文章给予针锋相对的反驳。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正》中，尖锐地挑明："中宣部对于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辞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辩正》坚决表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诬蔑文告所能恫吓得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② 国民党理屈词穷，只有借助于手中的国家机器，用暴力箝制和镇压救亡运动，不久《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就颁布了。其中规定，军警当局可以用武力镇压抗日群众，取缔抗日救国运动，逮捕爱国分子。接着，由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等24种抗日刊物被以"鼓动学潮，诽谤政府"为名查禁封闭，复旦大学学生救国会的11名负责人遭到了逮捕拘禁。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沈钧

① 1936年2月12日《申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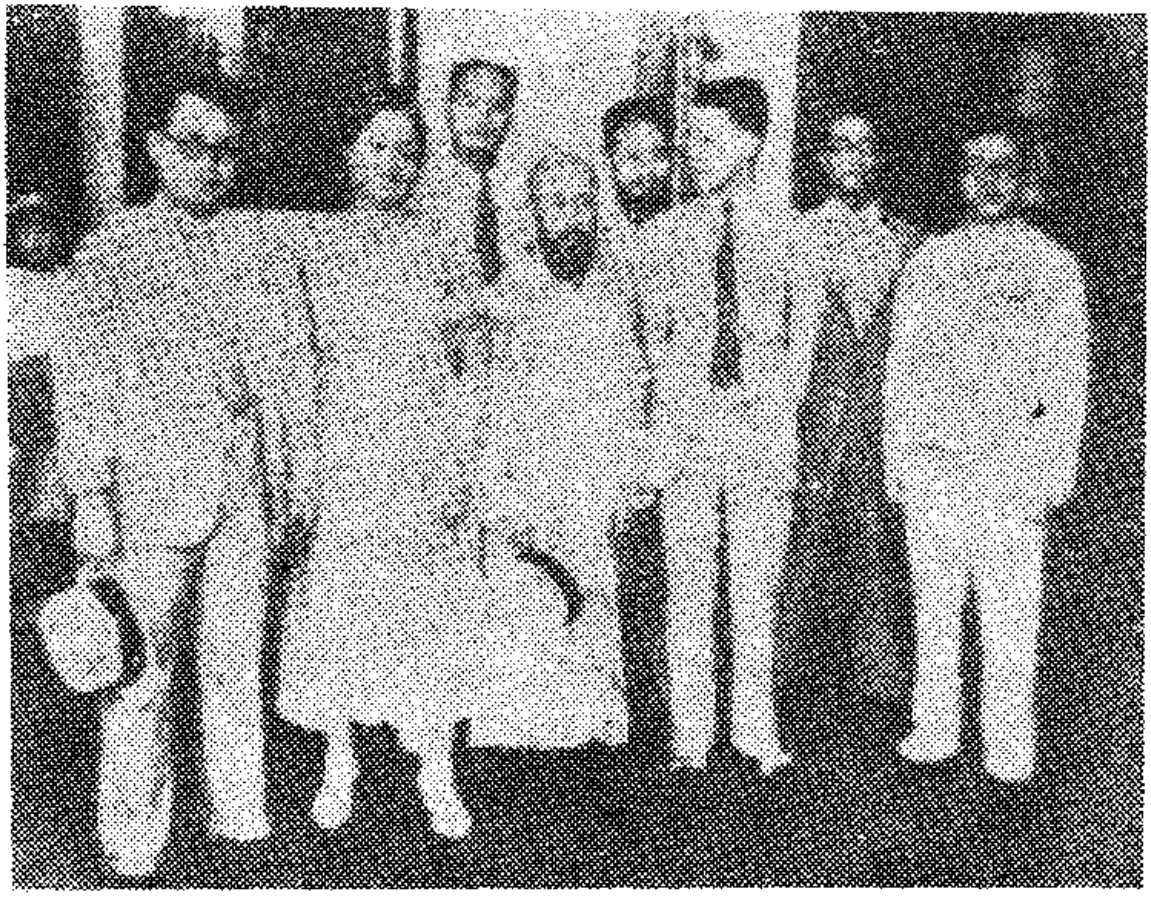
② 《大众生活》第1卷第15期。

儒、章乃器等在第二天亲自将全救会的宣言和初步纲领郑重地递送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希望得到政府的认可，取得合法的地位。但是吴铁城很快在一个场合公开扬言："现在有少数野心家，组织了一个什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这个团体简直是一个反动的东西"，还宣称要取消"救国会以及一切类似的反动组织"，逮捕救国会的领导人等。对于来自反动政府威胁重压，救国会领袖毫不畏惧退缩。相反，他们坚决地申明：我们"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① 宋庆龄还专门写信给救国会其他领袖，互相勉励，并表明心迹："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②。

1936年11月，华北局势更加严重。在数月的对绥远骚扰侵犯后，10日，日本帝国主义又调动日伪军40000人大举向绥远发起进攻。绥远危亡在即。全救会为绥远问题发表了宣言，尖锐指出：绥远是中国人民的绥远，绥远如再有失，中央实无以对人民。在全救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号召下，上海全市掀起了热烈的援绥运动。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日商纱厂的工人不堪忍受日本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形势的影响下，又发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工联、纱委、共青团、国难教育社等分别进行了罢工的组织和发动工作。8日，杨树浦日商上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以及同兴第二厂、东华厂等七家日商纱厂的15000余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接着日商大康、上海第六、沪西内外棉六厂等厂的6000名左右的工人也相继罢工。以后又延及日华、喜和、丰田及浦东等厂，共达26个厂50000工人。救国会对工人反日罢工运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发表宣言呼吁全国援助，并专门组织了一个"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后援会广泛向社会募集捐款，然后将捐款换成"米票"发给工人，工人凭"米票"可向米店兑

①② 《救亡情报》第6期。

米，从而使罢工期间的日常生活得到了保障。这次的工人罢工由于得到了救国会等社会各界的援助，并注意斗争策略，坚持 18 天，迫使日本厂方答应了增加工资5%，资方不得打骂、开除工人等5个条件。



“七君子”合影(另一人为罗青)

蒋介石政府决定向全救会采取暴力行动。1936 年 11 月 22日深夜至 23 日凌晨，上海警察局勾结租界巡捕房在上海分别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邹韬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政府将七人迅速地移解苏州，关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内。在上海市政府发表的所谓逮捕原因的公告中，对七位爱国领袖和救国会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

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 复由立论而见诸行动，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①

11月24日和27日，全救会为七领袖的无辜被捕，发表了《紧急宣言》和《告当局及国人书》，驳斥国民党政府强加给救国会的罪名，申明救国会的宗旨和救国会领袖的行动完全是光明正大的、大公无私的，这次逮捕"实在是一种对于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一种公开的无理摧残。"全救会在宣言中坚决表示："我们全国所有救国会的会员，却决不因为领袖的逮捕而放弃我们的抗敌救亡的主张的。不，不但不会放弃我们的主张，而且我们将更坚决秉承了领袖们过去的言论、主张，而永远继续地奋斗下去！"② 宋庆龄为"七君子"的被捕发表了声明，愤怒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③ 声明还揭穿了国民政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下，作出这样的行动的。

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外屈内压，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巨大震惊和愤慨，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一个营救"七君子"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上海，各界人民积极地开展了广泛的、具体的援救活动。如发动市民群众签署《援救意见书》，聘请著名律师出庭进行辩护、派出代表到苏州向国民党高等法院请愿要求释放"七君子"。爱国老人马相伯亲赴苏州探监，愿与七君子同坐牢。在北平，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李达、许寿裳、许德珩等107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称救国会七领袖"热心救亡，全国景仰"，要求政府即日开释他们"以慰群情，共赴国难"④。北平的大学生救国联合会召集了紧急会议，一致议决罢课两天，并推派15所大学各委2名代表组成请愿队，代表北平学生界赴南京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诸领袖，开放民

① 1936年11月26日《申报》。

②③ 《救亡情报》第28期。

④ 《救亡情报》第29期。

众抗日运动”①。蒋介石对抗日爱国志士的迫害，也引起了国民党一些上层人士的不满，他们挺身而出也进行了营救活动。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的营救运动；李宗仁等从广西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要人请求迅予援救7人；张学良还专为此事飞抵洛阳面见蒋介石，指责蒋介石的专制政策。

“七君子事件”也使海外爱国华侨和国际进步人士愤慨。旅美华侨广泛签名发表《告海外同胞书》，发起了海外援救爱国会七领袖的运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人，“团结抗日”；国际著名的学者和社会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罗素、孟禄等，都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以中国朋友的名义，对救国会七学者的被捕感到严重的不安，要求南京政府能恢复他们的自由。

蒋介石本想通过逮捕救国会七领袖，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扑灭压熄，效果却适得其反，全国各界的救亡运动并没因为受到暴力的威胁压制而动摇、退缩，相反，这个运动更加广泛地得到了国内各阶层以及世界进步阵营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更加声势汹涌地向前发展，掀起更大的救国浪潮了。这正如宋庆龄在声明中所指出的：“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这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忿怒和爱国的热诚。”②

在“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的一些日子里，我国的政治局势进入了急遽的变化之中。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巨浪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下，用“兵谏”的强硬办法，把蒋介石逼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内战渐渐停止，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

① 《救亡情报》第28期。

② 《救亡情报》第28期。

国会所坚决倡议和为之艰苦奋斗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逐步形成了。

紧接着，仅仅隔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卢沟桥枪炮大作，“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七君子事件”在对日宣战后也终于彻底解决，7人全部释放出狱。

烽火四起，强敌压境，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从此跨入了八年抗战的艰难而伟大的战斗历程。

第二十一章　一种过渡形态的城市生活

在近代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上海出现了各种新兴阶级与阶层：买办、侨民、产业工人、中小商人、职员、城市公务人员和各类无业游民；同时，破产的农民、落魄的文人、失势的官僚也不断进入上海。在他们被改造成近代城市市民之前，还保留着不少旧式特征。这些新旧阶层在本质上与旧时或内地封建秩序下的官、绅、士、民各等级都有很大区别，但又在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与之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过渡形态的城市市民。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上海市民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城市特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它以工业化、西方化、城市化，亦即近代化为自己的发展导向。但是，又远不象它在城市建筑外观表现的搬用了西方城市模式那样，它在生活方式的整体建构过程中，一直混合了新与旧，中与西。它把中国的五湖四海，西方的英美法俄等不同文化内容结合起来；把不同社会的善恶、美丑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色彩。即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所谓文化上的结合，并非易事。一种文化形态的转换，往往需要积几代几世之功。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上海这种过渡形态中的生活方式往往是一种拼接，显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痕迹。由于上海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中开始较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

长；又由于它在文化类型上始终兼跨中西，代表了百多年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全过程，所以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具有典型意义。

从文化类型的总体比较上说，上海的新兴市民阶级创造了一种新型生活方式，但是转而对这种生活方式进行内部观察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统一的市民群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群所组成。他们具有各自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背景，有时在行为中还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华人和侨民，旧文人和新学堂学生，劳工和帮会无业游民之间无疑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各自从事的职业，组织自己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社会分列叙述，才能更清晰地理解这个社会的典型意义，才能具体地细致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在各方面处于一种过渡形态。

一、知识阶层的生活

上海新知识分子群的产生有一个过程。19世纪40—5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和文化的需要，从上海和江浙邻县地区逐渐集拢来一些旧文人。他们与被称为“西儒”的基督教牧师（他们长期是上海西侨中受教育最高的阶层）一起译书、办报，开学堂、立书馆。结成了上海租界上最早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江浙一带的士大夫们纷纷携资率眷避地上海。由于租界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保护”和生活享受，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上海就成了士大夫们的栖息之地和寓居之所。在这种氛围中，一种借用西方文化来批判传统的风气已经形成。但是，总的来说，上海的知识分子还未蔚然成群，他们在买办、商人、官绅中颇有寥落之感。他们的思想主张影响了当时的洋务思潮，但自身却受着多方面的歧视。戊戌变法以后，清朝统治进一步动摇，知识分子改变了对中央的向心倾向，进一步向当时已相当繁胜

的上海聚集。他们渐渐地摆脱了官、绅、士的身份，以市民的身份从事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辛亥革命后，这种情势更是每每重演。几乎在每一次政治变局中都有大批士绅文人迁入上海。这就为上海社会造成了当时中国最庞大、最庞杂的知识阶层。20—30年代，上海和国内各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成为一个新兴阶层。他们和稍后时期大量留学欧美、日本的返国学生一起，是第一代完全由近代城市文明培养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以后，麕集北京官场的文人学士也南下至沪。于是，上海的科学、教育、艺术、娱乐、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等事业无不取北京代之，成为全国的新文化中心。上海成为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据统计，至1949年底，在上海专业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在经济、社会各部门从事文化活动和受到较高教育的人）的人数就达到117000多人①。

上海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从事着较新式的职业。与旧式耕读生活的士大夫不一样，他们是近代商业社会中的雇佣者。新闻出版业成为最能吸引新旧文人的地方。这种新兴事业最初是由基督教传教士输导的。1843年，英国伦敦会在上海设立了墨海书馆，雇佣了李善兰、蒋敦复、王韬、钟天纬、沈毓桂等中文编辑，翻译和编写了大量印刷品。但由于这些印刷品大都是单张经文、布道演讲和宗教画片，所以这批文人在当时信教圈以外影响不大，甚至还被传统士大夫视为“名教叛徒”、“士林败类”。

太平天国动乱平息后，中外双方的各种势力在上海携手合作。各传教会顺势改变了以前单纯直接布道的方法，用新闻出版、医疗和教育作间接传教手段，以此迎合在上海开展起来的洋务活动。如林乐知创办于1868年的《教会新报》，于1874年改名《万国公

① 据邹依仁《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0页统计表综合得出。其中包括：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和国家机关及教育、卫生、艺术和社会事业中的职员。

报》，从宣传宗教为主转变为以时评政论为主。这份报纸每逢中外交涉的重大时机都发表大量的文章，成为最吸引上海及口岸地区知识分子的报纸。1890 年，该报的发行量已达 11300 份。至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发行量猛增到 20000 多份①。有一期甚至重印第二次。这个数字自然是全国性的，但无疑在上海的发行量最大，它在上海引起反响，然后通过上海辐射全国。当时，“有一位居住在上海的翰林先生，是如此地赞赏《万国公报》，以致每期都要购买 30 本之多。他定期地发送给在京城的翰林老友们”②。该报能在上海知识界引起这样巨大的反响不是偶然的。租界各项事业兴起后，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脱离清朝中央和文化正统。这使得上海知识界在当时全国兴起的对西学渴求热中处于最前沿。而《万国公报》虽属教会举办，却辟有各种国内外时事专栏，悉载本月的大事。电报传讯，既快又准。报纸还经常以独立发言人的笔调发表时评，言论时政颇为中的，使士大夫侧耳愿听。尤其是该报注重各类文化消息，文章风格被称为华丽古雅，这就更超出一般报刊而为文人学士所喜爱。

在 19 世纪末期之前，教会主导了上海的新闻出版业，传教士不但活跃在教堂的讲坛上，而且以他们的政论学术声震上海学坛，成为上海知识界的重要力量。例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携一批中文译员，主持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他们翻译的西方近代数理化生、制造工艺、海陆军作战术、天文、地理、历史、法律等各科入门书，成了知识界的“新学”佐助。1877年，丁韪良、狄考文、林乐知、傅兰雅、韦廉臣、黎力基等传教士倡议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分头纂写了中国第一套新式学堂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在一段时期内被接受为上海及全国各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的教材。1884年，

① 见《广学会年度报告》1890年卷，1895年卷。据称该报最高发行量曾达三万九千份，见李提摩太《在华四十五年纪》第 231—232 页。

② 《广学会年度报告》1895年卷。

韦廉臣创办"同文书会"，目的就是要在知识界而非下层贫苦阶级中传播西学、西教。此会在1890年由李提摩太接任总干事后，易名"广学会"。他成功地伸入上海及全国最高的知识阶层，在戊戌前后影响巨大。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主要因繁荣起来的商务需要，上海出现了不少中外文的日报。其中最著名的是中文的《申报》和英文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

通过新式的新闻出版媒介，一批报人成为上海的著名文人，其名望甚至超过了许多功名显赫之士。如长期主理《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被推为"一代耆儒"。塾师出身，屡试不第，浪迹于香港、英国、日本，终而归居上海的报人王韬，被上海士人敬为"言论巨擘"。他曾为郑观应的《易言》作序(1880)，主评有康有为参加的变法论文竞赛(1894)，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修改润色(1905)。可见他在上海知识界地位之隆重。还有先为《申报》主笔，后被广学会罗致的蔡尔康，傅兰雅的译书助手钟天纬等许多报人都成为戊戌前后谈论西学和时政的重要人物。

在这一代人身上有着非常有趣的转变和过渡现象。他们一般都不通外文，却翻译着各类西学著作。其任务只是根据别人口译的原著大意选择切宜的中文字句，称为"笔述"、"译意"，显然是一种初步的翻译。象王韬身已受洗入教，却绝少受教俗约束，全然保持着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在上海过着花丛柳间的冶游生活。冯桂芬这类显赫学士在文字上对上海滩的买办竭尽鄙薄之能事，而在内心却对他们的财富地位羡慕不已，表现了一种受冲击的复杂心态①。即使在那些"西儒"身上也出现着中西混合，新旧交错的倾向。林乐知和沈毓桂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校名就是中西书院(1882)。花之安、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更是身着儒服，深研性理之学。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起初显然是为了传教的需要。然

① 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冯芳辑《冯申之先生日记》。

一经“中化”，也就两相适应，使“西”与“儒”这绝然相反的文化融于一身。当时，“中西并重”、“东西合璧”的口号盛行。这显然是这种转换时期的社会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上的反映。

进入了20世纪以后，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大的活动天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大批出版机构顺应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兴起，编辑出版了大量新小说、新文化、新教育、新史学、新哲学的书籍。大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20世纪初，英语已在上海成为日常商务用语，通事买办的洋泾浜英语不敷应用。因此商界、学界兴起学习英语的热潮。商务印书馆抓住时机，编写了《华英字典》、《华英初阶》等畅销的英语教科书。“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扶持了亚东书局，刊印了《守常文集》、《吴虞文录》、《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文集。一时受到具有激烈文化革新精神的青年一代的欢迎•思想上的突破给上海社会生活带来活力，反抗家庭约束，争取自主自由的呼声在上海的报端、剧场屡屡出现。20年代始，上海及全国学术界有一股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且不同于复古的趋势整理国故，一时成为风尚。此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华书局亦出版了《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30年代中，由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以苏俄欧美进步文学和大量抨击时政的文章吸引了与时俱进的青年读者。当时国际上流行社会主义思潮，上海社会中中小知识分子的激进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这股思潮的反映。上海社会的矛盾之处在于，就在新文化思潮不断推演的同时，旧文化一样兴盛。尊孔复古之风甚嚣尘上，一些书店出版的公案侠义小说、志怪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作品照样也有很好的销路。而被称为“洋场恶少”式的租界文化，则更是上海的特殊产物。

这里附带把上海的新闻出版业规模列举一下。至1946年为

止，历经抗战烽火和国民党开始的新闻检查，上海的报馆、书局仍是林林总总，十分活跃。重要的报纸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文汇报》、《大晚报》、《华美日报》、《大英夜报》、《联合晚报》。重要的书局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开明书店、光明书局、大东书局、华夏书店、作者书店、作家书屋、上海文化服务社、广益书局、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正中书局、教育书店等等。书局、书店以福州路最为集中，列在1946年版《上海指南》上的31家书店，其中有14家坐落在福州路上，另有十一家位于与福州路交汇的河南中路、山东中路口。福州路被上海知识界称为文化街。

知识分子的另一云集处是上海的各类新式学校。上海一直是基督教教会的办学中心。他们率先在上海举办高等教育。办得较好的教会大学有：圣约翰大学(1897年，美国圣公会)，震旦大学(1903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沪江大学(1907年，美国浸礼会)，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美国监理会)。这些大学除了聘用少量外籍教师和管理人员外，课程大都由中国教员担任。并且在教内外广泛招收中国学生。教会大学办学历史一般较长，又比一般学校的经费充裕，并有高水平的师资和较严格管理，因此办学成就较大。例如圣约翰大学于1905年在美国华盛顿注册，该校兼有了美国国内大学的地位，毕业生可直接升入美国的大学研究生院肄业。优越的办学条件和良好的学生素质使该校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约大的毕业生在上海的商界、政界很有势力。还有为数很大一部分学生去美国深造。震旦大学也与法国教育部挂钩，该校的大学预科和正科毕业证书，法国大学均予承认。大考时，中法两国共同监试，毕业证书由学校与法国公使共同署发。沪江大学则领取美国佛吉尼亚州颁发的学位授予准可证。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管理最为西方化。它不但同约大一样在校内使用英语教学，而且课程全以英美法律为教材。院内教授除精通英美法律的王宠惠

外，余皆为美国人。象美驻华法院院长罗炳吉、工部局督办费信惇、美国律师公会会长佑尼干等都曾为该校教授。该校学生在上海租界及国民党政府中承担了大部分的法律事务，势力颇大。这些学校教育出一届届熟悉当代事务、具有现代职业精神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尤其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了解世界。尽管在某些人身上染有浓重的民族自卑情绪，但总的素质比之旧式士大夫有天壤之别。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自办大学，其中较好的有：交通大学（1896年，国立）、复旦大学（1905年，私立，抗战期间改为国立），中国公学（1906年，私立，后为国民党教育部勒令停办），同济大学（1907年，初为德侨办，1917年收为国立），暨南大学（1906年创立于南京，1924年与上海东南大学合并迁至上海，国立）、上海法政大学（1924年，私立）、光华大学（1925年，“五卅”运动中由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创办，以商科著名，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1年，私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09年从南洋公学脱离，先后隶属海军部、交通部）。由于旧中国战事频繁、政坛黑暗，各种事业难以开展，因此上海的大学就成了留洋归国学生和一般正直学者的栖留之地。例如，1912年，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并与任鸿隽、赵元任等人共同创办中国科学社的胡敦复、胡刚复回到上海，举目四顾，全中国满目疮痍，学无所用，只能以办教育来实施自己的救国主张。他们在上海创办了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大同大学，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哲学家全增嘏，经济学家叶元龙，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胡明复等人都于返国后在该校任教。该校的教学质量堪与著名的教会大学、国立大学比美，在会考中常与圣约翰、交大相匹。

不过，上海本地社会经济某些部门的迅速发展却使许多受过职业教育的知识青年能方便地谋求出路。例如，上海租界实行英国式的法制，频繁的讼事需要为数众多的律师。早期的律师多由苏州、绍兴两地的旧式讼师转化而来，师爷们在上海大获其用。以后

从欧美各法律院校及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新型律师渐多，加上东吴法学院历年的毕业生，上海的律师队伍十分壮大。又如，从20年代起，上海的民族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迫切需要进一步的专门知识。黄炎培、穆藕初、钱新之等人结合职业与教育，使上海的教育界与企业界携手合作。这种情况打破了传统社会学与商的对立，进一步表明上海的知识分子完成着新旧形态的过渡。在上海这个近代城市中，士大夫文人不再是一个有力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多因其职业而与某种新式事业结合在一起。他们被迫放弃由士入绅、由士入仕的路途，投身在上海的商业社会中，成为各种各样新型职业的雇佣者。如果说知识分子间还有什么共性的作为维系的话，这就表现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尚有一些共同的社会价值倾向。

从开埠伊始，上海的知识阶层中一直保持和发展着一股西化倾向。戊戌以前，它表现在上海城厢的一系列改良活动中。同光年间，邑绅张焕纶仿行东西洋小学规制，改私塾为学堂，建梅溪学堂。1895年，上海马路工程总局成立，开始仿租界办法改造南市城厢。李平书、姚文楠、莫锡纶等士绅为发展城厢，坚持要求拆除城墙。终于在1911年施行。使这座典型的旧式传统城市向近代化大都市转化。辛亥前后，上海的一批新式知识青年提倡西式婚俗，以反对当时盛行的婚丧嫁娶中的奢靡之风，“破社会之积习”。当时，“开通之士相约不贺新年而行团拜礼”①。同样，用证婚人的新式婚礼，由牧师主持的教堂婚礼也在知识阶层中流行。

新文化运动以后，上海知识界对来自西方的学术信息更加敏感。1919年4月30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由胡适陪同至沪。陶行知，蒋梦麟代表上海学界热烈欢迎。5月2、3、4日，连续在江苏省教育会会堂讲演，讲题为：“实验主义”、“平民教育主义”。杜威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国土的西方哲学大师，又适逢当时盛

①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

行科学主义，所以他在上海这个新文化的策源地收到热烈的反响，“一时青年思想颇受其影响”。①

同一时期，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罗素应中国公学之邀，在上海登岸，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数年逗留。1920年10月13日，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基督教救国会、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共同在大东旅社举行联合欢迎集会，盛况空前。他在沪期间，以“中国宜保存固有之国粹”、“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能”为题，发表了三个演讲。罗素的演讲在上海知识界亦引起很大反响。如果说杜威学说以其实用主义与上海知识分子的科学求实精神和追求知识实现的热情合拍的话，那么罗素精神中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以及他对东方民族的同情心则拨动了知识分子的另一根心弦。罗素对西方文化不满，他推崇东方文化，主张东西文化交融，更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探求之心。杜威和罗素的名字在上海报刊上持续出现了好多年，足见其影响之深。时人称之为“思想界转变之一关键”②。

由于上海知识界较能采纳新意识，所以许多新文化的尝试都在此进行。清末上海流行京剧，但是从皇宫回到民间的京剧带有了严格而陈腐的程式，限制了艺术的健康发展。于是，一批戏剧爱好者力图对传到上海的京剧加以改革。张聿光、夏月润、夏月珊、潘月樵等人自费出国考察戏剧。光绪末年归国后建新舞台于南市。这种舞台仿行西式，改变了戏台与茶园混同的局面，扩大表演空间，采用真实道具，他们还编演了一些能反映时人心境的剧目。这些改革为京剧在上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改革后的海派京剧影响了全国各地的戏剧发展。1914年，欧阳予倩等人以春柳社名义，在上海演出《猛回头》、《社会钟》等剧目，这是中国舞台上较早出现

①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673页，上海通志馆，1937。

②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673页，上海通志馆，1937。

的“文明戏”。1923年，洪深从美国学习戏剧返回，提倡“爱美”剧(Amatuse,业余)，打破了传统的男女分演陈规，推行男女合演。一出《终身大事》(胡适编剧)的演出，受到上海观众的一举肯定。从此，上海舞台上逐渐流行合演制。1915年7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于乍浦路校址举办学生成绩展览，公开展出了女裸体习作，引起社会轰动，众说不一。某女校校长在报上斥为：“刘海粟真艺术之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蟊贼也”。但是事件的结果反映了人们观念的更新，该校在事件后“遐迩驰名”，使报名入校学生人数大增，以致学校扩大迁址①。于此数例可见，上海知识界确实较易接受新事物，新文化。也由此可知，开埠以后输入中国的种种新思潮都是在上海首先流传并非偶然。上海成了中国新文化的摇篮。

上海租界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工部局和公董局在意识形态上采取的放任态度，使得知识阶层的活动比之其他地方要自由得多。这里的文人结社、集会、演讲都很普遍。在上海知识界按历史阶段，次第出现过如下一些重要社会团体。

南社。1909年，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人在苏州发起成立了这一文学团体。入社者多为江、浙、皖一带以民族气节自励的文人，他们“借诗文以鼓吹革命”，取名“南社”以为“反抗北庭的标志”，有继明末东林、复社、几社之意。这样，一个文学性的团体实际成了集结在上海的知识分子抒发反对清朝统治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前后，它成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而宋教仁、宁调元等反袁人物都曾为该社领袖。民国以后，该社的政治威望增高。众多名流加入，鱼龙混杂，使它的政治倾向产生分化，而新文学、新艺术思潮的涌现，又使它的文学主张明显落伍，因而式微。及新南社成立，虽欲重振旗鼓亦不可得。该社在20—30年代演变成一个在沪旧式文人以诗文画会友的交谊团体。后期南社成了政坛元老、耆旧

① 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349页，上海通志馆，1937。

硕儒的怀旧感伤之所。象马叙伦、叶楚伧、邵力子、苏曼殊、黄宾虹、李叔同、沈尹默、陆澹安、包天笑、胡朴安、周瘦鹃等许多人都是积极分子。该社一度在上海联络人数达千名以上，深入到新闻、教育、艺术各界，其规模为结社史上所罕见。

在年青的一代中，组织这样规模庞大的社团已无基础。他们都因坚持各自的艺术创作主张和政治倾向而结成更为紧固的小团体。这种三五成群的小团体独树一鲜明的旗帜、标榜一家一派，使得上海的文坛显出十分强劲的活力。1921年3月，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耿济之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上海设有分会。后由于会员南迁及发行社刊的缘故，上海成了该会活动中心。由研究会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量反对旧文学、旧文化的作品，他们发扬"五四"后探索人生、人性的文学主张，以刻画被压迫的人性见长。发抒了二十年代青年向往人类真善美境界的渴求。这股清新文风在上海文坛上构成了对鸳鸯蝴蝶派旧文艺的冲击。

同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人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创造社。这些青年作者在日本学习了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注重表达强烈的自我感受和内心情绪，追求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他们的《创造》季刊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在大中学生和中小职员中有很大的阅读圈。后来社中许多作者长年居住上海，他们开始转向描写上海市民和工人的社会生活，上海的社会生活使这一浪漫主义流派转向现实。

其他在上海活动的青年文学社团还有：欧阳予倩、沈雁冰、郑振铎发起的民众戏剧社，社刊《戏剧》。胡山源等人发起的弥洒社，社刊《弥洒》。田汉的南国社，社刊《南国》。加上许多外地社团在上海出版发行社刊，上海实际成了当时全国各种社团的集聚地。构成一股巨大的新文化、新文学潮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大盛，上海

的文学社团更多了。

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留学生们倾向于把社会的凋敝归咎于科学与教育的不发达。为此，许多滞留上海的知识分子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来组织社团。这类社团多能与上海的社会经济事业结合，所以产生的社会效果也较大。

1915年成立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科学社，其立社缘起中，有仿行英国皇家学会的初旨。但发起人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都是校友同学，回国后的活动方式也仍以同仁聚会、讲习科学为主。它实际是一个科学普及社团。1918年，学社迁至上海，立社所于大同大学，并于 1928 年在陕西南路设立总社所。它在南京、北京、杭州、苏州、广州、重庆等地设立分社。还在上海设立明复图书馆(1928)、创刊《科学》月刊(1915)、《科学画报》(1932)，每年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七项单科奖评选。它的活动从1916年至1948年从未间断。到 1948 年会员人数已达 3700 多人，是上海组织得最好的一个民间团体。由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华学艺社(又称丙午学社)，活动中心亦在上海，他们在推广科学上甚多贡献，几与中国科学社齐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知识分子队伍人数众多，从事的活动广泛，组织得十分严密。他们凭借上海各类新式文化事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对全国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上海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陡然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海的新文化之所以产生并影响全国，有其必然的社会根源，它与整个社会的新兴事业有机关连，是社会变迁以后必然提出的文化要求，而不仅仅是受政治潮流的冲击所致。当然，上海知识分子从开埠后的最初集结，到 30—40 年代的定型，其中一直交杂着新旧不同的品质因素。因此也不可以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来命名。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种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在逐渐形成，旧的、传统的因素正在退隐，而一种新的，适合近代生活的观念和行为正在壮大。

二、市民阶层的生活

开埠以后的上海人口一直呈急剧增长趋势，至1949年，人口总数已达5455007人。其中包括了欧、美、亚、非近五十个国家的侨民和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县份地籍的迁居移民。1942年，侨民总数曾达到150931人。如此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和这样复杂的人口构成，大大地突破了所有中国旧式城市的模式。甚至在当时世界上也堪称人口最多、国际化和移民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诸如此类的称呼，反映了上海社会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形象。确实，建立在这种新模式上的市民生活果真呈现着一种古今中外所未见的新局面。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并存，处在文化过渡中的上海社会生活十分活跃。

上海的一般区划分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华界又专指在租界兴起前就繁荣着的南市和随着租界兴盛而发展起来的闸北。直到租界收回前，在几经扩张之后，公共租界的土地面积已达到22.6平方公里，法租界也已达到10.2平方公里。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所辖面积，包括南市、闸北、大上海新区共860平方公里①。上海从一个国内南北贸易港口，陡然成为一个亚洲最大的内外贸易、商业、金融、工业、教育、科技、文化中心。

这一变化最明显地在它的人口结构中表现出来。在1949年开始户籍管理前，上海居民中近85%的人口是外地籍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本代迁徙人口。他们都是出生外地而迁居上海的。租界收回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共设区30个，有黄浦、老闸、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长宁、静安寺、新成、江宁、普陀、闸北、

① 此据1939年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出版《上海要览》第14页所引数字。

北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榆林、杨树浦、新市街、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龙华、杨思、洋泾、高桥、真如。其中新成、黄浦、提篮桥、普陀等区的居民中迁徙人口均达到或接近95%。连洋泾、吴淞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分别达到59%和54%。(1950年1月统计)①

这些人口在上海受雇于各种各样的新式职业。1950年1月，全市就业人口(不包括各种非正式就业)206万，占当时人口的40%以上。即使考虑到男性青年人口比例较大的人口因素，在剔除了很少就业的妇女、儿童数量之后，这样的就业率还是较高的。这说明上海的各项事业较为开展，有吸引人口流入的巨大引力。就从业的行当来看，商业最多(65万)，建筑业次之(近47万)，工业再次之(近45万)。还有近20万人从事金融业、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事业，以及国家管理、自由职业和宗教职业。②

上述的人口和职业构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市民生活的多样性。不同地区的移民和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在上海有着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这里先叙述一下上海各生活社区中的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上海旧城厢(南市)内存在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埠前，这里曾以其旧式商业而繁荣一时。开埠后，在毗邻的两个租界发展刺激下，这里积极改良市政，移风易俗，以顺应上海近代生活。例如，因城池阻隔了与租界的交通，使商业难以进一步发展，故于1907年南市绅民们加辟了小北门、新东门、小西门。使城门增至10个，并于1912年拆除旧城墙，与租界联为一体。虽然南市旧城终于随着上海的近代化而进入现代，但比之租界，这里的生活方式仍有浓重的中国传统特点。

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本地籍贯。1929年的华界(闸北、南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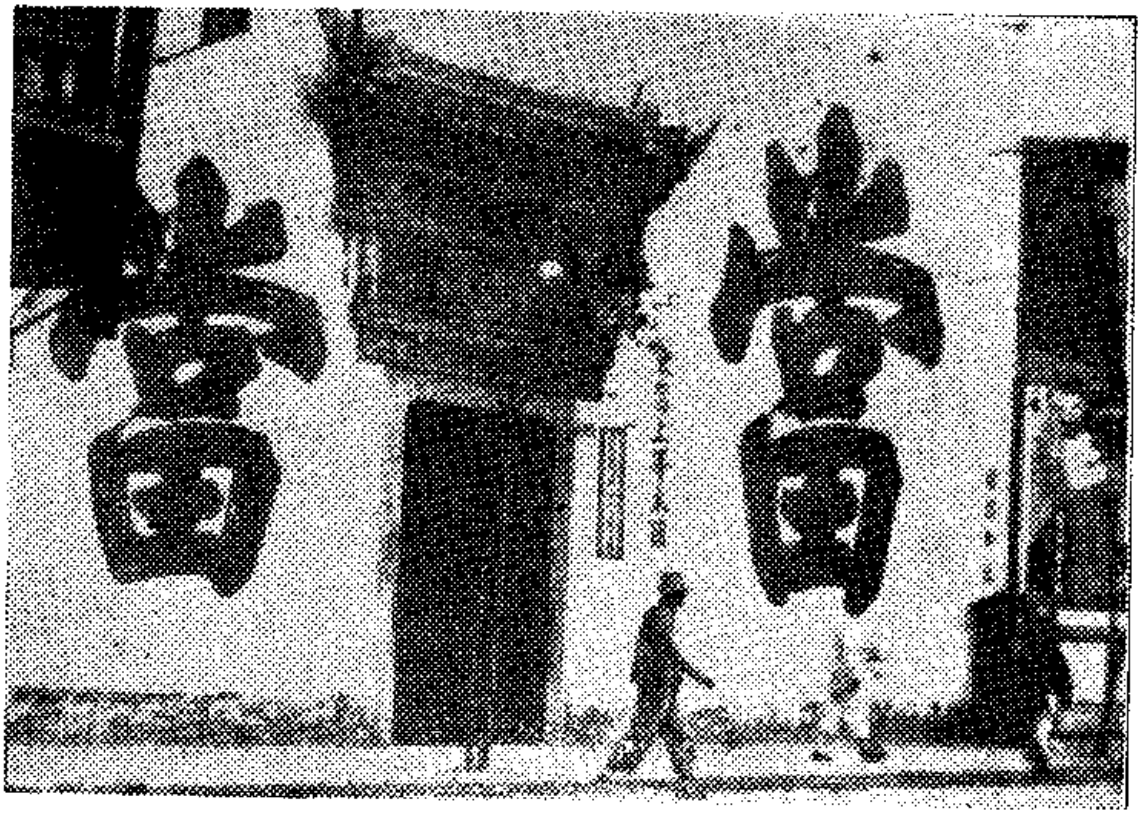
① 均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13页。
②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第114页。



旧上海街景：烟杂店

人口中，上海籍贯人口占28%，剔除闸北有较高的移民数量的因素，则南市的本地籍居民比例应更高。由于南市较少有近代工业，他们的职业便也多是传统型的商业和手工业。如大东门外的顾绣，老城隍庙附近的玩具作坊，豆市街、花衣街一带的竹木雕刻作坊，老城隍庙内的小吃店摊，外马路的各式商号南北货等。其他许多一街一弄也都经营各种专门商品。这些行业有的向国内各地供货，有的还专供外贸出口。它们为城内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藉此衣食者数万人"①。这种带有传统色彩的经济在抗日战争以前一直是发展着的。有些行业甚至以民族风格为招徕，在上海及国际市场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如绣品、家俱、竹编等工艺品一直大宗出口。直到"一·二八"和"八·一三"战争中，南市经两次浩劫，才一蹶不振。

① 朱梦华《南市话旧》，载《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一辑，第427页。



旧上海街景：当　铺

城隍庙是上海传统民俗的一个象征，是传统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志。该庙于明代永乐年间，用西汉大臣霍光行祠改建而成。当年该祠除了祭祀城隍以外还兼祀霍光，有“前殿为霍，后殿为秦”（指秦裕伯）之说。以后历朝官绅商民都有重修扩建。及至豫园主人潘氏家族衰落后，这片精美的园林在乾隆时被绅商们购得并入庙区，称为西园。乾隆五十九年，城隍庙后楼兴建，盖成上海最大的戏台，经常演出昆曲、徽班等剧目。每逢朔望，香火缭绕，人们在此祈祷晴雨，宣讲乡规民约，听戏、赶会、游乐者摩肩接踵。这里成了旅沪、寓沪者的一个消闲好去处。每年的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城隍神为居民保佑福祉，生者为亡故亲人祭扫安魂。此三日夜晚，有彩灯长队从郊区牵引入城隍庙内，队伍时常达4—5里，称“三巡会”①。

① 见《老上海十二月的行事》，载《上海研究资料》（初集）第504页，上海通志馆。

南市的另一文化活动的场所是文庙。文庙是中国传统教育及文化制度中的一项设施。庙中立孔子和各位先贤哲人的遗像，是士人演习祀礼、讲学论道的场所。上海在11世纪设镇后始建文庙。以后多有迁移。1856年最后重建于今址。近代上海兴起后，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城内的私塾、书院逐渐改良为小学、中学堂。文庙也逐渐失去其旧有功能。这个场所转为士大夫集聚和议政之地而保留下来。1931年，政府辟建为文庙公园。大成殿原址被辟为市立民众教育馆。该馆曾将原来实有其用的祭器、祭服、乐器、舞器200多件布置为，祀孔祭器陈列所。整个文庙公园成为上海"市民得于公余之暇，藉此为怡情养心之所"①，象征这项旧制度已被上海人民送进了博物馆。但是，民国期间由政府推行的几次尊孔浪潮中，文庙又数度被粉饰重新使用。政客们利用士大夫们的怀旧心理，在此重演被上海市民视为滑稽的仪式。1914年，1925年和1934年，北洋政府和民国中央政府多次下令上海举行"丁祭"，以配合当时全国的祀孔高潮。不过，这种闹剧总是草草收场，过后便烟消云散。如果说传统生活方式在城隍庙，在下层市民中还有某些活力的话，那么文庙中体现的上层士大夫文化生活则已彻底崩溃了。在上海兴起的科学与民主化的思潮，已使儒家政治文化丧失了根基。

除了在上海旧城厢较集中地保留了一些传统生活方式以外，原上海县辖地内也还散点式地存在着一些传统文化的遗习。三月十五日，龙华寺周围桃花遍野，扫墓、游春、赶集和进香者如云如雨。四月八日，释迦牟尼诞生日，称"大佛诞"，上海各寺庙都作"浴佛会"，举行诵经法会和庆祝盛典。自1881年起，静安寺每年在此时节举办三天的庙会，租界内外和周围数县的居民云集，是每届佛诞节的活动中心。

上海有"沪城八景"之说，形成于明朝，沿流入清。所谓八景

① 《上海研究资料》(初集)第471页，上海通志馆。

是："海天旭日"，从东门城楼望太阳从浦江对岸初升；"黄浦秋涛"，八月十八日，站在吴淞江、黄浦江口观潮涌；"龙华晚钟"，月下柳间，听古刹钟声；"吴淞烟雨"，初春时节上城楼观江中春雨，朦胧一片；"石梁夜月"，小东门外方浜口万云桥下，中秋月影穿环而过；"凤楼远眺"，五月端午日，立于丹凤楼观浦中龙舟竞渡；"野渡蒹葭"、"江皋霁雪"，泛指为江畔田边的山水画般的意境，无确切地点①。显然，这种恬静优美的诗情画意必然要为近代上海的城市建设所打破，而代之以巨轮、洋楼、货栈，浓烟的近代工商的画幅。

城北租界完全是另一种文化景观。农业生活格局中的墟集、灯会和带有宗教庆典性的神会不适应近代社会生活。整个社会需要一种商业经营的娱乐业，以满足投机者、暴发户、商业经纪人及一般市民的各种目的要求。于是，一种中西混合形式的现代娱乐业便受到租界生活的刺激而得以膨胀式地发展。广东路及福州路一带次第得到发展，在上世纪末便有驾南市而居上之势。1891年，一位外地绅士在他的游沪笔记中写道：（戊寅，1878年）"热闹之区独称宝善街（即广东路）为巨擘，今则销金之窟盖在四马路（福州路）焉"②。四马路的商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达到最繁荣的时期。这条不长的马路上，集中了各种戏馆、各帮酒楼，书场、茶室、烟寮、妓院比肩而立，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一时著名的便有："丹桂戏院"（京剧）；"天乐窝"、"小广寒"、"桃花趣"、"也是楼"、"皆宜楼"、"万华书屋"等12家书寓，称"书场十二楼"；酒楼有："聚丰园"（苏帮）、"鸿运楼"、"益庆楼"（宁帮）、"中和馆"（津帮）、"杏花楼"、"中华园"（广帮），"海天春"、"一家春"、"一品春"、"杏林春"（西菜）；茶室是："五层楼"、"一层楼"、"万华楼"、"升平楼"、"菁华楼"、"乐心楼"、"青莲阁"。这些楼宇中，除了西餐馆外都主营或兼

① 《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八《名迹》。

② 池志徵《沪游梦影》未刊手稿，胡珠生整理，藏温州市博物馆。

营烟室、妓院。傍晚，公务人员辞馆下班后是这条街道最繁忙的时刻。“每当夕阳西逝，怒马东来，茶烟酒雾，鬓影衣香氤氲摇荡人心魄”①。显然，这种娱乐方式的来由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是近代城市夜生活在上海的滥觞，另一方面它又是脱胎于传统士绅的奢侈生活方式。这种吃喝玩乐形式比之旧式士绅的情趣是大大地商业化了。原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市民阶层侵袭了士大夫们的生活方式。

租界中戏剧爱好的演变也反映了上海社会生活的发展。上海原只流行本地滩簧。上海滩簧，植根甚浅，形式简单，唱词浅陋，其时尚不足以称为一种剧种。它能流行，只是其时少竞争者而已。及至道咸之际，昆曲传入上海，因其典雅华美，念唱含蓄而被称为“文班”，曾盛行一时。惟时移势异，处在近代城市生活中的租界观众更需要激越动人、雅俗共赏的娱乐。于是，声、情、形并茂的徽调、梆子、京腔盛行。同治初年，“满庭芳”，“一桂”等戏园立于宝善街，“昔之崇尚昆曲者一变而盛行徽调”②。光绪中，四马路又兴起不少专演京剧的戏园，许多茶楼酒肆也兼唱京腔，而“三雅”（南市诸戏园名）因专演昆曲虽“调甚悠扬，时人以其不及京腔之繁缛，不喜也”③。从滩簧、昆曲到徽调、京腔，这一戏剧史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租界市民的审美情趣正逐渐地从深沉含蓄的古典形态向热烈豪放的近代形态过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戏剧，这种转化演变，反映在全国各地，大约皆然。上海的特殊处则在于以北京为正统的京戏，在上海历经变化经过创造与发展，以海派京戏而闻名于时。另一方面，区别于旧戏（戏曲）的新剧，从文明戏初露端倪，吸欧美之风，发展而成为话剧，再进而为电影，在全国属于独创或先行者的地位，这是由于上海这个独特城市发展之所必然。

---

① 池志征《沪游梦影》。

② 胡寄凡《上海小志》卷七《梨园》。

③ 池志征《沪游梦影》。

租界中书场的转化也十分显著。首先是规模比原来要大得多，远非是昔日父女、母女的独立演出可比。四马路在全盛时，其书场达几十家之多，每家都雇有歌妓十数人。用吴语演唱虞调、俞调、马调。传统的歌妓是卖艺不卖身的。但在这里，这种规矩在慢慢地瓦解，有与近代妓院制度联为一体的趋势。过去只坐演，现在则常常出"堂差"，应客人邀请上门演唱，还常被召"叫局"，赴宴乐场合，为客人"侑酒"，周旋调笑。以往只熟客才能登堂入室，现在则惟视钱财礼物馈赠之多寡。书场中有一种"书寓"（高级歌妓的演唱兼寝居的寓所，就演化为一种高级妓院，专供巨富者长期定包）。

20世纪初，上海的妓院分为多种，其性质各有不同。有书寓、长三、幺二等各种名称。书寓的门品甚高，其寓所布置豪华，服务周到。这些妓女一般都工诗书传奇，常被尊称为"词史"、"先生"。能京调者已属等而下之。他们的服务对象多是士绅巨贾，且以卖艺为主。书寓主人须姿色，更须才艺。书寓最盛的时期是同治、光绪年间。"长三"在等次上与"书寓"相差无几。他们虽不一定能弹擅唱，但都须周知礼节，善于应酬，有一定艺术修养。据说是因每侑酒一次必收费三元而得"长三"之名。这二类妓院的营业语言是吴语，故均由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妇女从事。不能操此语言的江西、湖北、天津、广东等地的妇女则多从事低一级的"幺二"妓院。这里的房间较简陋，每馆人数较多，可达十数人或数十人。妓女未受过专门艺术训练，游客也不固定，人品较杂。传统的妓院最初集中在城内中心的虹桥一带。咸丰年间开埠后逐渐移向城外，集中在四马路、宝善街的各里弄中。民国九年（1920年）后，公共租界工部局抽签禁闭妓院，逐渐渐移帜于法租界东新桥、南阳桥等处。洋泾浜各桥头又弦管歌舞声嚣。除了这种从传统歌妓、艺妓发展而来的妓院外，还有人称"咸肉庄"的下等妓院和在马路上拉客的"野鸡"，则以中小职员和工人为主顾。在虹口一带还有许多由粤籍和外国妇女从事的妓院。粤籍妓女专门接待外国水手。被谑称为"咸水妹"。

虹口同时还有西洋妓院，最初是西班牙女子居多①，后来各国籍人均有，而以白俄居多；日本妓院，俗称"东洋堂子"。妓院的兴盛和变化，造成性病流行。

餐馆业的变迁也印证了上海的发展历史。最初上海只有苏、宁、徽三帮菜馆。而以徽馆为高："顾客类多上流中人"②。显然，这和同光年间租界中多徽籍流亡士绅贾人有关。后来随各地人员的大量涌入，上海又继起了京馆、粤馆、南京馆、扬州馆、西餐馆。30年代中又兴起了闽馆、川馆热，一时又蔚为时尚。此中盛衰只有靠顺时应变来掌握。因为在当时的上海，吃食已不是个单纯的生理性口味问题，而是种排场、门面的文化消费行为。因此单单以地方特色的烹饪手法为标榜不足以长久保持吸引力，须全面地讲究门面，店堂的豪华布置，菜谱、服务的典雅舒适。当然还要及时捕捉顾客为时尚所驱的心理变化。各帮菜馆在这方面的角逐是十分激烈的。同治间盛极一时的徽馆，"因牢记旧习，不知发展，今日（30年代）几不能列于酒肆之林"③。粤馆也有类似经历。如杏花楼等馆早在上世纪末就已开设，但初仅知制作些广式点心，固守当时粤人日仅二餐，夜半加一"消夜"的习俗，所以生意十分清淡，"番馆（西餐馆）已较廉于它馆，而消夜则又廉矣"④。但是随着粤商在上海地位的上升，加之粤菜馆努力发掘本帮特色菜谱，布置豪华的店堂，粤菜终于在三十年代后跻身各帮之首。开业于1931年的梅龙镇酒家的发展最能说明菜馆业只有适应上海市民的品尝和鉴赏习惯才能得以兴旺。该店的创办者之一吴湄女士原仅是一位上海小姐，暨南大学文学系的毕业生，出校后鉴于各店在设备、道具、招待、供应上多有缺陷，与盛誉于世的中国菜名声不符。故在此方面刻意追求。她

---

① 见王韬《瀛壖杂志》。

②③ 胡寄凡《上海小志》卷九《酒肆》。

④ 池志征《沪游梦影》。

与李伯龙和另一郑姓者合股，谐音取名“梅龙镇”酒家“设计幽丽、寓东方趣味于时代精神”①，又选择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川帮菜，并在口味上加以调整。因此，酒店始终以最优美的服务和合适的口味吸引了高层人士和远方宾客的光顾，在当时上海堪称第一家，且至今而不衰。

90年代后，租界突破了旧格局，向西急剧发展。当时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已逐渐地去旧出新，产生了大量现代娱乐方式，接受了许多来自西方的新玩艺。因而在沪西最早出现了一些新式娱乐。双清别墅、味莼园和愚园先后在光绪年间建立，一时“争奇斗胜，鼎足而立”。市民游乐踏青尽往沪西，“游屐往还，宛若山阴道上”②。其中以味莼园最为有名，规模最大。该园原为西人格农所建，光绪十年为无锡人张叔和购入，故又称张园。此园和其他两园一样，内中建筑均为西洋式，广植西国花卉。而园内又设景以供赏玩憩息，不无中国式园林之趣。张氏在沪西地价还便宜的时候，把园址从20亩扩为70亩，搞起综合性的游乐。服务内容有品尝洋菜洋酒，“一桌一椅无不依照西式”③，又设立茶室、书场、申曲、弹子房、抛球场、照像馆。还以每日40—50元的租金出租小剧场（安垲第），供演出昆曲、京剧、演讲、跳舞、宴乐用。清末留学生和革命家即经常假座这里发表演讲、举行集会，张园安垲第之名一时大著。后由于经营不善和日后租界事业的发展，张园消失在许多后起的竞争者中，但是这种中西合璧的游乐方式开启了上海近代娱乐业的先河，为后起者纷纷仿效。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又涌到了大批携有巨资的旧官僚文人。同时，上海的工商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迎合日益兴起的消费热情，游乐业大量兴起。此时受地价上涨的影响，游乐场的

---

① 《上海时人志》“吴涓”条。

②③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570页。

占地大为缩减。楼宇游乐代替了园林游乐，并改而在闹市中心建设。1912年，大商人黄楚九率先开办了一家游乐场楼外楼。这种游乐场扬弃了庭园形式，而集各种中西游乐于一楼，经营颇为合理，故获利甚厚。1915年，黄楚九又与中国营业公司（英商洋行）买办经润三合开了新世界。同一时期，公共租界内陆续兴起了10多家游乐场。它们都集有一些照相、电影、保龄球、西洋镜、哈哈镜、赌台等西洋名物，但更多更普遍的是一些书场、剧场、茶馆、商铺、餐馆等旧式宴乐。从形式上来看，这种娱乐业已与租界西侨的总会、俱乐部相似。

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游乐场当然要数大世界了。1917年，黄楚九因与新世界的合伙人不和而退出，另谋建立一更大规模的大世界。他在南京路周围已难以觅到合适的楼址，而当时的法租界又因受南市和公共租界的夹峙，商业长期不得繁荣。他们想通过一个超级游乐场的兴办来带动商业市面的发展。所以用优厚的待遇诱使黄楚九来界内建楼。大世界于当年初在今址动工破土，仅历7个月便落成开幕。这个游乐场不仅在楼宇面积上超过各家，而且把当时所有的游乐项目一应



旧上海街景：马路招贴

俱全地开设起来。从电影、马戏到赌场、剧场无所不备，还经常搞一些无奇不有的展览、拍卖。许多人被这里吸引，弃北就南，整日消闲于此。不久，以大世界为中心的银行、钱庄、洋行、商号纷纷建立。这使法租界嵩山地区的地价和营业税均大幅度上升，达到了租界当局的目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工部局纳税人会决议通过把公共租界划为四区。此后，传统上就把外滩以西，西藏路以东的旧英租界



旧上海街景：马路招贴

称为中区。西藏路以西广大区域称西区。旧虹口租界的东部称为东区，西部则称北区，以虹口河为界。在中区繁荣和西区开发的同时，工部局当局处心积虑的是想要通过四川北路、吴淞路等线，借助"越界筑路"的办法，把租界的辖区扩展到宝山县境。达到他们向江湾、吴淞的黄浦江口扩展的目的。因此，北区和东区在进入20世纪后有了一个大发展。发展前的虹口，一直是广东、宁波、浦东、南京、苏北移民的混居地区。武昌路一带广东人较为集中，海宁路附

近宁波人较为集中。他们因为地价廉、离市中心近而聚居这里。这些人大都从事小商业。这里在开埠后一直秩序混乱，各帮口争勇斗狠，时常有抢劫、诱拐和械斗发生。侨民中只有传教士才来此活动。当初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的原因之一，亦即美侨民无力组织有力的治安体系。但直到本世纪，工部局并未实施严格的治安管理。1908年5月，工部局致函领事团，要求帮助实现将"公共租界与(沪宁)铁路之间之一带土地尽行划入租界之内"① 的计划，而实际他们在1903年就已把四川北路一直修到宝山境内很深的虹口靶子场。他们开始改造苏州河上的一座座大桥，投下巨资，准备借虹口这块固有的租界把繁荣起来的闸北与公共租界连为一体。1907年，工部局拆除了营业收费的韦尔斯桥，建立了当时最现代化的钢架公园桥(外白渡桥)，以鼓励中外绅商过桥居住。这股开发热情和投资热，使文惠廉主教在1848年开辟的美租界在一度冷落之后迅速发展。

遵行发展北区和东区的既定方针，1910年以后的工部局越界筑路举动集中在这一地区。沪北方面共越界筑有：黄罗路(长1200米，宽30米，今黄渡路)，江湾路(长4500米，宽50米)，施高塔路(长2000米，宽40米，今山阴路)，窦乐安路(长1700米，宽20米，今多伦路)，白保罗路(长400米，宽20米，今新乡路)，北四川路(长8000米，宽50米，今四川北路)，赫司克尔路(长700米，宽30米，今中州路)。沪东方面共越界筑有：欧嘉路(长1000米；宽50米，今海伦路)，狄思威路(长5000米，宽50米，今溧阳路)，哈尔滨路(长150米，宽40米)。筑路以后，工部局在这里增设了北四川路捕房，哈尔滨路捕房。加上原设在三角地菜场附近的捕房，构成了一个治安网。

由于沪北、沪东的事业发展和人口增加，北四川路一带的商

① 转引自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4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业、娱乐业和服务业应运而生，市面出现了繁荣。积累了少量资本的宁波、广东移民在此开设一些商行、店铺，外籍冒险家也纷纷在此开设各种新式事业。武昌路段开设了广东大酒楼，粤商大酒楼、味雅、太白楼等粤菜馆，还有品芳楼、玉波楼、宴琼楼等西餐馆。加上众多的茶园、宵夜馆、点心店，似有与四马路的宴饮业相对峙之势。宁籍和苏籍移民多有从事南北货贸易和中小手工业投资的。海宁路段则更是店铺林立，百业并起。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海宁路、乍浦路开设虹口影戏院，于是这种新型娱乐形式便首先在虹口发展起来。雷玛斯见虹口、杨浦、闸北的观众蜂拥而来，过苏州河特来观看的老租界观众亦不少，故又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建维多利亚戏院。独自经营着上海唯一的两家专业电影院。此后几年内，北四川路附近又继起许多洋商、粤商的电影院。至1925年止开业的共有：爱普庐戏院（北四川路海宁路）；爱伦戏院（海宁路北江西路）；上海大戏院（北四川路虬江路）；中国大戏院（虹口海宁路桥东，梧州路口）；沪江影戏院（武昌路）。当时全市共有影院15座，而北四川路附近即有7座，几乎占了半数①。30年代以后，大批日本侨民开始进入已经开发和繁荣起来的虹口。在这一地区从事和中国人相类似的各种职业。1942年日本侨民数达到最高点，共有95000人。其中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北四川路一带。他们把虹口妄称为“小东京”、“日租界”。这时的虹口便进入了另一发展时期。

沪东地区的工业开发与沪北地区的商业繁荣基本同步。10—20年代是中国民族工业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虹口到杨树浦沿江一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码头、纱厂、烟厂、铁工厂、船厂。工厂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方便的口岸交通而取得成功，而成功的工厂又唤动了江浙一带的破产农民及全国各地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这种循环流动缔造了当年的“杨树浦奇迹”。

---

① 据世界书局《上海宝鉴》1925年版统计。

沪东地区由提篮桥、杨树浦、榆林三区组成。后来被称为"东三区"。由于居民多依赖近代工厂就业，因此这里存在着上海最典型的近代工人群众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这里的居民多是"从手到口"，出卖劳力、手艺的劳动者。惟有工作勤勉，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虽然总的来说他们的收入较他区为低，但其中的差异仍是很大的。一些资本小，设备落后的民族资本企业只得借压低工资经营，所以职工工资较低。而一些外资企业和技术程度较高的企业的工人收入则较高。据1929年统计，沪东地区最为集中的棉纺工人和缫丝、烟厂工人的日工资仅分别为0.5元和0.4元。机器工人和丝织工人可达八角。美商的杨树浦上海电力公司电厂的一般技术工的日工资则为1.2元——2元①。据1939年上海总工会在沪东地区纱厂的调查，平均4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仅252元。其中64.3%用于食；9.5%用于衣；房租和灯火燃料又占去16.7%。剩余的杂项开支只有9.5%。这种消费结构之下显然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因此，这里的娱乐业、宴饮业、高中档商业、楼宇地产业的发展都较他区弱小得多。最不堪生计的是在边缘地区居住的一些棚户居民。他们大都是后到上海，在这里又没有什么根基的苏北、皖北和山东移民。他们只能以打短工、摆地摊，拣城市垃圾为业。晚上栖身在杨树浦一线的河边棚户，由于人数多，不断地改造，不断地形成，所以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社区。他们离开了家乡故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又不为上海近代的经济文化所接受。因此不但生活贫困，而且还有文化上的孤独。在语音、习俗乃至社会价值观念上与别地居民相隔阂，成为当时和日后上海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许多行业工资较高、就业较为稳定的工人比之上面所说的人们，在生活上要优裕些。他们的生活较接近近代城市市民的水准。

---

① 见《上海产业和上海职工》第9页、第2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丝织厂的青工“西装革履，行坐车，吃包饭，类似学生生活”。他们“接受现代都市文明较为容易”①。经营情况很好的外资公司职工待遇更好。不但工资较高，而且福利较全。象上海电力公司电厂每逢元旦、春节、美国独立日、圣诞、孔子、孙中山诞辰、中秋、端阳、双十节都照例放假。这些职工的文化程度较高，文化生活也丰富些。他们常常在星期天去四川路、南京路听戏看电影。有的兄弟姐妹会还集中起来，在宿舍和厂里练习业余演唱，票友玩京剧、越剧、沪剧等。他们都是些青年职工，预示着一个新的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都市化②。印刷业中的排字工人，情况更显得有些特殊。他们有技术，有文化，收入亦较稳定，多着长衫，人称为排字先生。其生活方式，也与一般工人不同，而多接近于中产市民。

三、帮会——城市社会的赘瘤

帮会组织，是上海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它们组织严密，分布广泛，人数众多，而且公开活动。渗透进工、商、军、政、新闻、出版、教育、艺术等各界，可说是无孔不入，构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了解帮会是了解上海近代社会的一条通道。

与当时全国十分普遍的青洪帮会和各种会党相比，上海的帮会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传统社会中的封建组织在近代大都市正完成着种种转化。作为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组织，其内部实际存在着各种发展倾向，因此，这种转化实际也是一种分化。旧式帮会成了上海社会发育中的一个过渡，成为一个有待割去的赘瘤。

---

① 《上海产业和上海职工》，第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 见《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中对职工生活方式的调查各节。

帮会是明清社会中带有强烈政治色彩，以原始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下层民间组织。明清时佛教结社盛行，会道门林立，一些宗教异端组织或反抗团体也借此旗帜活动。洪帮，又称洪门。它即起源于南方的一些反清复明的团体，并托附福建莆田的少林寺和尚为祖师，敬佛拜神。他们以“义”为信仰宗旨，订立“家规”、“帮规”。使用各种暗号、隐语。清政府防不胜防，视为洪水猛兽。清末的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大刀会、三点会、致公堂等都源出洪门。在上海开埠前后，洪帮的势力曾一度随南方的移民进入，但在上海最有势力、长期掌握上海治乱的还是原先便集中活动于运河沿线及长江流域的青帮。

青帮，又称清门。据传约在乾隆年间为承运运河漕粮才正式形成。亦有说从洪门安清帮中分出者。帮会奠定之初，依附佛教。他们祖述禅宗初祖达摩。以明洪武年间曾任都督粮台的金幼孜（号碧峰，后出家五台山修禅宗临济派，法号清源）为第一代祖师。把他与罗清、陆逵并称“前三祖”。后来的青帮都认雍正年间活动的翁岩、钱坚、潘清三人为始传三祖，称“后三祖”。翁、钱、潘原都是天地会的道友，后都投在著名佛师陆逵门下。雍正三年，漕政失理，运河上械斗争抢成风，清政府招贤管理。三人献策改变旧有的全线统管或分段派员的行政办法，采用帮会的规条，附以禅宗的教义，用社会团体式的组织实施管理。这样既团聚了散漫的各地粮帮，又使原来秘密活动的帮会得以公开发展。三祖从陆逵处得到祖传的24字“字派”作家谱，广招门徒。这24字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觉。”青帮各辈成员遍布沿江沿河一带的各省份，逐渐垄断了运河漕运。72个半码头各自有帮头控制，运河上几成非帮莫行之势。后来不少青帮成员参加了乾嘉时期的白莲教、清门教等起义，因此，乾嘉以后青帮的活动随即遭到清政府的严禁。太平天国起义中，南方两湖两江一带的青帮有不少人连船参加了太平军水师。动乱以后，漕运废除，沙船和汽船

的海运业相继兴起，粮帮也被遣散。这部分失业船民，以及在岸上各阶层中已广为发展了的无业游民仍保持着帮会组织形式，他们散落在各地，成为晚清的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上海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为这批游民提供了出路。他们加入了移民队伍，混迹于上海，寻觅各种生计。其中一些人逐渐发迹，成了头面人物，这就使上海的青帮组织大为发展，而各地青帮游民来者更众。在这些头面人物中，如"大"字辈有原籍扬州的曹幼珊（江淮泗系统），安徽婺源的汪禹丞、河北河间的马玉山、山东滕县的张仁奎、安徽芜湖的樊瑾成（均兴武六系统），山东济南的米占元、江苏泗阳的刘登阶、江苏桃源的王九皋，（均嘉兴卫系统）等 39 人，而统计其时全国的同辈人数总计是 162 人，上海约占全国总数的1/4。"通"字辈中情况更为突出。当时全国同辈人数 410 人，居于上海的（绝大多数是移居的）就有 232 人，占了一半以上。这些统计收入的还仅是那些正式领有字派，有资格开门收徒的人。倘计入在帮的兄弟总数，以及那些流动于上海与外埠之间的人则比例更高①。至悟觉二辈，上海更成为青帮的大本营。

活动于近代上海舞台上的青帮分子大都是一些"大"字辈。他们是上海青帮中的元老。但是，在上海真正有势力的则是他们的一些土生土长的"通"字辈门徒。如果说"大"字辈中的一些人还带有较多的内地帮会遗风的话，那么"通"字辈中的门徒已开始向适应近代城市的社会生活方向过渡。他们的帮会也开始向着一个近代社会组织方面转化。

"大"字辈中的不少人在新旧官场有势力，陕西人徐朗西是同盟会元老，洪门峪云山山主。同时他与陈其美、蒋介石换帖，与青帮中人交善。凭借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他公开地从事各种正当事业。辛亥革命以后，他以办教育自任，创办新华艺专，自任校长。他

① 据陈国屏《清门考源》中《近代家里知闻录》表格整理。

所收的门徒也多为知识分子和正道人物。安徽人汪禹丞属"大"字辈，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卫队长。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寒云)亦是"大"字辈。他的辈份和政治地位使不少人肃然起敬，连黄金荣、杜月笙等也不敢怠慢。他喜文墨，戏曲界、新闻界和自由职业者投拜者甚多。这一类人多有较高地位，与上海下层社会原无什么联系。另一类"大"字辈人虽无显赫的政治地位，但却靠着他们的门徒们显扬起来。象安徽樊瑾成，江苏刘登阶进入上海后原无甚实力。只凭着他们的字派，在接受了张啸林、顾竹轩这样的高徒的投奔之后，成了青帮中的头面人物。总的来说，"大"字辈中的人一般都是成年后移居上海，与上海当地社会的各种复杂势力没有密切的联系，他们都不会根据上海社会的复杂情况展开活动，只是凭着原先的辈份和政治地位在活动。

"通"字辈的青帮人物来自上海近代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适应上海的中外夹峙、五方杂处的环境。在他们这一辈中，青帮逐渐脱去了传统的宗教、宗法色彩，表现出多种近代倾向。"通"字辈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大人物。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实力地位以及活动方式远非前辈能比。只有他们才能被人称为"大亨"、"闻人"、"老板"、"先生"。

黄金荣，1868—1953年。原籍余姚，随父迁苏州、再迁上海。长年在茶园酒肆鬼混，混迹在地痞流氓当中。1892年，因他家熟悉些衙门捕快业务而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充当包探(警察)。他利用这一有利身份，成为下层流氓社会和租界政府间的斡旋者。他培植和掌握了十六铺的"三十六股党"，法租界的"八股党"。手下拥有"一百零八将"。黄既利用他们侦查破案，又策动和保护他们从事各种非法事业。由于他成了租界安全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升至了督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维持治安有功，被聘为法租界公董领少将衔。这是当时法租界中华人达到的最高职位。1925年退休以后，他专心广罗门徒，从事各种敛财的营业。设烟馆、摆赌台、开戏

院乃至黑道贩运无不插手其间。1953年病逝于上海。

顾竹轩，1877—1956。江苏盐城人。16岁时从家乡来上海闸北谋生。先为黄包车夫，后一度被招为英租界巡捕房华籍巡捕。他靠着刘登阶门徒和"通"字辈的身份，以闸北为基地广收门徒。他的势力遍及闸北、虹口、杨浦和英租界等"三大亨"势力较弱的地区，因而被称为"江北大亨"。他还出任闸北保卫团团长。借绅商组织地方武装之际来扩张自己的帮派。由于顾的声望和热心家乡救灾，被同乡推为江淮旅沪同乡会主席、苏北旅沪同乡联合会副主任。抗战后，任为上海市参议员、江苏省政府参议。他在上海青帮中以凶狠，鲁莽著称。曾派人枪杀营业中的对手、京剧名角常春恒。还因涉嫌杀害大世界经理唐嘉鹏。1956年病逝于上海。

张啸林，1877—1940年。浙江慈溪人。20岁时移居杭州。在当地混得小有名气。1912年在杭结识"通"字辈、上海英租界白相人季云卿之后来到上海。他见上海的青帮势力很大，为站稳脚跟起见拜了"大"字辈的樊瑾成为老头子，厕身于上海的"通"字辈之列。张啸林的另一靠山是在杭州结识的军阀卢永祥，何丰林辈，再加上季云卿的吹嘘，取得了黄金荣的青睐。特别在"共舞台事件"中，经张啸林、杜月笙斡旋，黄金荣始获释。三人结拜兄弟，沪人称为"三大亨"。他们合伙经营的"三鑫公司"，包揽了上海的鸦片运销。后张啸林日渐与黄、杜反目。抗战后他勾结日本势力，走汪伪门路，企图另寻势力发展自己。在欲就伪浙江省长之前，于1940年被国民党军统组织暗杀，一生以流氓始而以汉奸终。

王晓籁，1886—1967。浙江嵊县人。出身富户，曾中县试举。1907年后来上海闸北经商。一般青帮谱牒不见有他的记录，他与青帮的关系可能始于1907年前，其时他加入了王金发、秋瑾领导的绍兴光复会起义。据此推算，他应是低于王金发一辈的"悟"字辈。他一生多致力于经商，曾创办上海商业银行，中央信托公司。就任上海总商会会董、闸北商会会长。1927年又任上海商业联合

会总务长。1950年后任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他还在1927年上海脱离北洋政府后任市民代表大会主席、临时政府主席。他的成功原因有二。一是参加反清、排袁、反共、抗日，始终与国民党力量保持良好关系。另一则是在闸北和全上海广泛利用帮会手法组织升社，控制各种势力，抬高自己地位。1949年春，他离沪去港，1950年初返沪，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1954—1958），上海市政协委员（1958—1967），1967年在沪去世。

杜月笙，1888—1951年。上海人。从帮谱上算，杜月笙是"悟"字辈。他10岁以后，因家境贫穷，从浦东高桥到上海南市打流，曾以从十六铺贩卖水果为生 后因聪颖机灵得到黄金荣的赏识，在身边留用。他与张啸林一起为黄金荣解决了那场十分难堪的"共舞台事件"，乘黄的威望衰落之际而逐渐上升。杜月笙比他的前辈更能顺应上海社会在20—30年代中产生的变化。当时上海的各项事业都在发展。工人运动壮大，新闻界日趋活跃，工商事业正在兴起。尤其是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后上海地位日显重要，而碍于租界的法律地位，军政力量又一时难以深入。杜月笙深知仅凭帮会的旧形象难以有所发展，所以便改变旧习，以"正派人"的面目把社会关系扩展到军、政、商、学、工运等各界。1927年，他纠合"共进会"，在"四·一二"事件中充当走卒，始得蒋介石赏识。因他的金融事业的发展，孔祥熙成为他的座上常客。他以地方士绅的身份与上海著名文人如黄炎培、杨度、章士钊、史量才、沙千里等结交。在军界，戴笠、陈群、杨虎都是他的密友和把兄弟。此三人在帮内高出他一辈，但在上海行事却对他言听计从。他的亲信徒弟陆京士，原是黄色工会活动分子，被他推荐为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军法处处长。他还利用与朱学范的师徒关系把势力达到上海总工会内部。杜月笙调解工潮的手法最为巧妙。他曾在1925年到1932年的7次法电工人罢工、1934年的上海电力公司罢工、1936年的日本纱厂反日同盟罢工中居间调解。他使用纵横捭阖术，压低工人谈判条件，自己出

资补偿工人损失。既在上海中外势力面前显示自己，又博得了仗义疏财的美名。

杜月笙深知自己出身下层，又从事过贩烟、聚赌等黑道上的生意。为此，他除了用上述手法掩饰自己的形象外，还竭力设法通过经营各种正当事业来跻身上流。当时上海的各种机会以及他所积聚的巨资都为此目的提供了可能。他用自己鸦片经营的资金，造起豪华大楼，开设中汇银行。他是浦东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还进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当董事。他由此而出任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俨然以金融巨子自任。他还任中纺公司、荣丰纱厂、恒大纱厂和大达轮船公司、中华公司、通路公司的董事长。又像煞是位实业家。他还赞助和投股文化事业，他兼任世界、大东两大书局的董事长，《申报》、《新闻报》和《中央日报》的董事长和常务董事。借此，上海的舆论界和文化界的部分人物每每为他捧场。当他有什么义举便大加报道，使之博得"大善士"、"慈善家"的名声。如此种种，使杜月笙的地位如云升腾，最后出任了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1934 年，杜月笙光宗耀祖，在浦东高桥家乡修建家祠，其盛况在上海可谓空前绝后，也是对他势力的一次大检阅。"祠成之日，自上海宅中奉主渡江，军商等界均以乐队相送，礼仪车马载途绵延十里。行经租界，电车为停二小时，渡船有轮无轮者共百十艘犹不足也。上海全体伶界及北平伶界杨小楼、梅兰芳等数十人并集祠中演剧三日。此三日中渡江宾客自各国领事商家以及本国官商人士每日皆逾万人"。

抗战期间，杜月笙跟随国民党政权去重庆，在上海多年经营的事业失散，力量受到打击，从此一蹶不振。1949 年，他被蒋介石等人劝说去香港。1951 年病逝。

青帮组织给上海社会带来了很多危害，三大亨贩卖烟土，进行军火走私流毒社会。在他们的包庇操纵下，青帮的徒子徒孙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危害社会，鱼肉人民。他们作案手法很多。如从十

六铺到外虹桥沿江一带有一批“水老虫”，他们常常在黄浦江中推翻驳运货物的小划子，然后偷捞沉箱。下层帮会分子还与英法两租界捕房内的帮会头目沟通，从事贩卖人口的营生。有专贩男孩者，称“搬石头”；有专贩女孩者，称“摘桑叶”。还有贩运华人出洋的，称“贩黄鱼”。流行在帮会中的最狠毒的治人手段是“种荷花”。谁开罪于帮会，只要“大亨”们一使眼色，爪牙们便把敌手架至吴淞口，倒栽入江中。有一种“剥猪猡”的手法，拦截街头的豪绅贵妇，把身上的钱财首饰洗劫一空，令其单衣而归。由于租界捕房采取治其小不治其大的策略，经常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故这类犯罪行为总不能治绝，以致上海市民一听这些切口、暗语便如谈虎色变一般。

从上海的青帮情况来看，“大”字辈与“通”字辈之间有一条大体可分的界线。“大”字辈大都是传统青帮的遗留，而“通”字辈以下则是上海社会本身的产物。青帮组织在这两辈人之间发展着一种过渡和转型。

首先，附丽在早期青帮组织身上的宗教形式的油彩减弱了。从青帮起源之日始，它便奉达摩为祖师，挂上了佛教禅宗的招牌。它还拜民间社会的道德信条“义”、“信”、“忠”为教义。杭州拱宸桥（潘氏祖宅）建有青帮家庙。传衣钵者还设有大香堂，内供从释迦牟尼到三祖师的塑像和牌位，每每焚香进奉。这些都表明青帮虽是一个十分世俗的组织，却有一个准宗教的联系形式。上海青帮至“通”字一辈已把这种形式基本上废除了。他们一般都不再设参祖香堂。有些新进的门徒，只认得自己的老头子，连几代祖师也记不全。当时被老一辈人斥为“重帮轻道”、“未免忘本”①。帮规中原还设有小香堂，专为门徒投帖用，伴有香堂唱词，香堂音乐。到“通”字一辈，这种投帖仪式很少举行。黄金荣、顾竹轩收门徒几千，大

① 见陈国屏《清门考源》第133页。

多只收取钱财，潦草地填一份帖子了事。甚至连面也不见。

其次，上海的青帮打乱了原有严格的宗法关系。青帮中一向是"兄弟字派有高低"。"弟若为师兄作徒"的现象被指为"欺师灭祖"。在这一点上，黄金荣的行为最肆无忌惮。他十分渺视帮规，自己还未正式入帮，就以"通"字开堂收徒。老辈人慑于他的权势只得忍让。顾竹轩与黄金荣同为"通"字辈，但顾为了借助租界势力又拜为黄的门徒，黄也照纳。另外，黄金荣还把同辈的金九龄收为门徒，并举他为法租界巡捕房探长。黄金荣向不敬师，与"大"字辈的张镜湖（黄本人师）、曹幼珊称兄道弟，还自夸自己是比"大"字还多一划的"天"字辈。青帮的字辈制度原是为协调一个统一组织而设立的，是用宗法式的社会联系来平衡各派系的利益争端。但在上海这样各种势力互相争斗，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这种宗法统一性当然不能维持。代之而起的是各派系按实力的独立分野，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新组合协调。

第三，从"大"字辈起，青帮的社会基础和活动倾向逐渐改换。青帮原先活动于运河和长江沿线的漕粮船帮中，后扩展到这一区域的破产游民中。在晚清的多次政治、军事和社会动荡之后，许多原属下层社会的青帮分子通过各种途径流动到了军、政、商各界，成为上层显赫分子。但是，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在内地环境中活动，与上海这样的口岸都市有不同的背景。上海地处海滨，固非青帮盘踞之地。开埠以后，"大"字辈中的强人纷纷迁居上海，使上海陡然代替淮扬姑苏，成为青帮活动中心。有人统计上海39位"大"字辈，其中38人是从外地移入的①。这些人物移居上海后，一般都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基础，必须伸入上海社会各阶层各派系中，重建势力范围。这就导致了青帮组织在活动倾向上的极大分化。几乎在所有场合都有帮会分子的参与。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的青

① 见陈国屏《清门考源》载《近代家里知闻录》。

帮曾一度有不少人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揭竿反清，是当年上海光复起义和革命政府的主要依靠力量。这时几乎有使青帮组织改造为革命团体的倾向。这种进步倾向以陈其美、徐朗西为代表。蒋介石、戴笠等人与青帮亦有这层干系。另外，也确实有一股明显的倾向引导着上海的青帮组织向近代城市的黑社会过渡。因为在上海逐步近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批城市流氓无产者，动荡不定的社会秩序是他们的活动土壤。他们那种半城市化和半无产者式的生活方式与上海青帮的转换形态正好同步，因此帮会组织在这一阶层特别活跃。这类青帮分子经常从事贩毒、赌博、拐骗、绑票、凶杀等非法行为。这种活动在治安较差的地方更为严重。“三大亨”及顾竹轩在早期活动中更多地暴露这种倾向。但是最突出的一个倾向是，青帮分子利用他们聚敛来的财富逐步地转向娱乐业、金融业、商业、慈善业、工业、新闻出版业等正当事业。这些正当事业本身是上海新兴民族工商业的一部分。这种性质使他们与通过其他途径上升为城市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刚刚形成的早期资产阶级乐意放低道德标准，接受以任何“冒险”、“投机”方式致富的人物。凡是大一点的帮会头目都有这种倾向，而以杜月笙的道路和人格最为典型。他在 1936 年出任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时候说了一段表露心迹的话：“我原来是强盗扮的书生”，“现在是曲蟮（即蚯蚓）修成了龙”①。无论他是否是条真龙，亦无论他修炼方法是否正当，他们要成龙的愿望是真实的。他们还有机会成为社会上流。最后还有一个较弱的倾向，即它在一部分城市市民中充当了联系感情、利益纽带的作用，类似社团、兄弟会的形式。上海的城市中产阶级，包括各行业职员、技术工人、收入稳定的各业职工及自由职业者，在不断壮大。但是这些刚从旧式生活中走出的人们还不习惯用新方式组织自己。工会、

① 《旧上海的帮会》第 29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社团、协会、联合会、读书会、夜校等形式往往不如帮会形式来得更合适。于是青帮就成了在这一阶层中活动的理想形式。李立三等人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就曾运用了这一形式，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和一系列政治罢工。总之，上海的青帮是个十分复杂的转换过渡中的组织。它瓦解了，仅存一个统一的名称形式，内部正完成着一个多元分化。

第四，在上海的青帮中出现了以社团形式活动的新型组织。这种组织有代替帮会组织之势。1927 年，黄金荣、张啸林纠合了各自的门徒，联合组织了中华共进会。1936 年，黄金荣又在漕河泾黄家花园组织了忠信社，取园内蒋介石书赠的“文行忠信”碑文之义。杨虎则有兴中社。两社曾一度联合对付日益兴起的杜月笙。“大”字辈的张仁奎(锦湖)在辛亥以后组织了仁社，常在重庆路的一幢西式楼房中聚餐。他是北洋政府通海镇守使，陈铭枢、韩复榘、范绍增、黄绍竑、黄金荣、陈世昌等新旧显贵与军阀常常参加。张啸林早年组织忍庐，投日之前，他在上海的门徒又纠合为新亚和平促进会。此外还出现过黄金荣的荣社，金廷荪的铭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王晓籁的升社。这些社团名义上是新式组织，实际上均无什么明确的政治宗旨和组织章程。它们所起的作用是打破帮会封闭组织和秘密活动的方式，并争取与其他新式社团平起平坐的地位，进而有利于他们的活动。在突破旧帮规上比较突出的是杜月笙组织的恒社。该社成立于 1934 年，取“自强不息，如日月之有恒”之义。恒社一直活动到 1949 年。它没有社章，表面规定理事由社员大会推选，不得连选三任。社“以联络感情、互相扶助为宗旨”，“设总社于上海，……三十人以上得设立分社”。入社不一定投帖，亦无甚入帮仪式，以师生而不以师徒相称。这种改革获得不少中产阶级人士的称许和加盟，似乎有些民主和新派。而实际对杜月笙来说，他打破了字辈间的阻隔，掌握了更多的骨干分子。恒社初立时社员有 324 人。其职业遍布军、政、警、商、学、工、律师、记者、金

融、公用事业等各业。该社使杜月笙稍稍改变昔日“老头子”的形象起了不少欺人耳目的作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集合形式取代了过去青帮以码头为中心的集合形式。

尽管青帮中的后起之秀努力改变帮会的旧规，以适应上海近代社会；某些帮会分子的个人事业获得某些成功，成为上海“闻人”，但帮会本身的必衰之势在40年代以后就显露出来了。这时的上海社会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租界收回了，产生“大亨”的社会土壤正在逐渐消失。

青帮活动的一个基础是上海租界的存在。由于中西社会的隔阂，租界当局要借用和操纵帮会分子，以维持社会秩序。又由于条约保护，中国当局及各派势力、政治力量都须借助帮会才能在租界行事。曾有几届法租界公董酝酿打击帮会势力，独任捕房事务，均因帮会抵制而失败。最后许多由别途出任包探的警官也不得不投入帮门。如英捕房督察长刘绍奎拜在蔡洪生门下，法捕房的徐阿东曾严惩流氓犯罪，伤及许多帮会分子。最后慑于上司黄金荣的势力，只得听任杜月笙之流为所欲为。出身青帮的蒋介石、戴笠更知青帮分子在上海无所不能，杜月笙成了蒋介石在上海办事的走卒，戴笠甚至把杜控制的上海青帮武装改编为“忠义救国军”，使之与军统特务合伙掌握江南局势。

抗战开始后，这种帮会基础彻底改变了。杜月笙随迁重庆，人员、资财损失惨重。重庆是哥老会的天下，他一无施展。黄金荣蛰居上海，本系统分崩离析，他的地盘也听任日本侵略者和汪伪分子的宰割。张啸林因投日而被杀，手下人树倒猢狲散。顾竹轩出狱后亦减少活动。这样，到了抗战胜利后实际只有杜月笙才有可能重振青帮。但是，租界收回后国民党中央政权各派系大举侵占上海，蒋介石对杜月笙也无须如过去那样的倚重，杜系回卷上海后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有何施展了。戴笠死后，他更被蒋介石闲置不理。1946年以后，杜月笙受到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一连串的非礼。他的

亲信总管万墨林被控舞弊而被捕；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公开要杜月笙退还门生帖子，并在报端上攻击。1948年秋，蒋经国到上海整顿经济秩序，以杜月笙子杜维屏在证券交易所搞场外交易违法案而拘捕。这实际是国民党为控制上海而欲向帮会开刀的表示。杜月笙感到这世态炎凉，叹道："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① 与国民党关系如此之深的杜月笙尚且如此，余下的小山头之命运更可以想象。青帮分子在上海经营几十年的大小事业被馋红了眼的"劫收大员"分肥殆尽。长期为租界当局看门的黄、杜大呼"秩序大乱"，国民党"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还不止"②。这反映了他们对失去了原有的政治保护的感叹，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况。

青帮组织这颗社会赘瘤原先在自行溃烂，它或许具有可以被健康起来的上海社会机体所改造的可能。但是最后它被国民党政权攻破了，尽管攻破它的目的并非出于国民党本身有什么改造社会的愿望与措施。确实，由于公开的官场黑暗代替了帮会地下活动的罪恶，上海的社会秩序比之租界治理时期更糟，国民党的治安体系实际无力整治下层帮会分子的活动。

① 《旧上海的帮会》第2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② 《旧上海的帮会》第2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第二十二章　“八·一三”英勇抗战

一、上海战役始末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宛平县卢沟桥发动事变，向我守军进攻，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在《昭和十二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拟定：“在扬子江下游地区作战时，以约三个师团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口登陆，另以二个师团为基干的一个军在杭州湾的乍浦附近登陆，同向南京进攻，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地带”。① 可见，日本侵略者当年侵略我国的指导思想是速战速决妄图通过攻占上海，来有效地遏制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以求速胜。当然，在上海发动进攻，势必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产生直接的矛盾，甚至冲突，日本侵略者正可以藉此试探英、美等国对他的态度，以便制订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计划。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爱国人士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之后，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各地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情绪，极为高昂。上海是国际瞩目的大城市，国民政府这时需要在上海表现出他的作战能力和抗战决心，以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

从敌我双方的着眼点也可以看出，面临的上海之战，是一场恶

① 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第一卷第二分册，第85页。

战。为了迎接这场战斗，8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最高统帅部——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对原来的军事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和调整。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30分，有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驾着一辆汽车，闯入我虹桥机场警戒线，我机场卫兵加以阻止。车上日军竟向我卫士开枪射击，我军奉命不得还击，闻枪声即卧倒伏地，日军亦原车折回。当时驻扎机场附近的我保安队，闻声赶来，日军竟向我保安队瞄准射击，被击中一人。至此，我保安队不得不开枪还击，车上两名日军，均被我军击毙。这便是"虹桥机场事件"，亦即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经过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日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均被代表中国政府的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断然拒绝。8月11日深夜，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奉命率领驻京沪铁路沿线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向上海市推进。这支部队的官兵中，不少人参加过1932年的"一·二八"之役。同时，奉命赶来上海的有原驻汉口的九十八师。原驻蚌埠的五十六师以及第二十独立旅的两个团和一部分炮兵，亦奉令向吴县（苏州）附近集中。这些奉令保卫上海的部队，给人的印象和过去国民党军队很不相同。上海英文《大美晚报》记者勃鲁司报道说："此八十八师队伍，俨如曾受高等训练之外籍军队，御新式合用之制服，头戴德国式钢帽，往来巡逻，极为尽职"①。

8月13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向我闸北进攻，我军当即迎头痛击。从此开始了为期约3个月的上海地区的抗日战争。它是长达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上海史上光辉的一页。

上海地区的抗日战争，按照日本侵略者进攻的次第和规模，大

① 勃鲁司著《上海不宣之战》，1937年12月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发行，第6页。

致可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8月13日至22日，日军增援部队在吴淞登陆以前是第一阶段。

8月23日，日军开始进犯吴淞、罗店，至9月12日我军放弃第一道防线为第二阶段。

9月13日至28日，日军大批援兵到达前为第三阶段。

9月29日起至11月11日，我军撤出大上海为第四阶段。

8月13日上午9时15分，原驻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由天通庵路及横浜路跨过淞沪铁路侵入宝山路口，向我驻西宝兴路附近之保安队发起进攻，我保安队迎头痛击，揭开了上海保卫战的序幕。同一天内，江湾路、八字桥以及闸北青云路、宝兴路、虹口北四川路……也相继接火开仗，停泊于高桥的日本战舰，向我虬江码头至沪江大学一线，猛烈炮轰。下午4时1分，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地，挂出信号旗，命令日军全线出击，于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在上海市区全面展开。

"八·一三"保卫战开始时，我方兵力，约共20000人。而敌军仅海军陆战队6000。我方海军和空军，频频出击，与陆军协同作战，重创敌军。中国的空军、海军，在上海保卫战中，也能发挥作用，这是日本侵略者没有意想到的。在所处的地形上，我方也处于有利的地位，因而从8月13日敌军向我正式发动进攻起至8月22日这一阶段，我军战果辉煌。

杨树浦方面，我军攻下了日军作为司令部的公大纱厂。极司非而路上，日军重要据点丰田纱厂，以及地处北四川路底日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堡垒——日本海军俱乐部，先后均为我攻占。8月19日，我军攻下了汇山码头，从而将日军战线一切为二，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取得了作战以来的最大胜利。据报道，汇山码头被攻下后，日本侵略军大批向南逃窜，通过外白渡桥，主动缴械，要求租界予以收容的，至少有300—400人。

8月22日，我军两翼，向东逼近杨树浦路，西南已到达横浜路，与进攻北四川路之我军，共同向日军进攻。当时日军只有死守几个主要据点，以待援兵。气焰嚣张万分的侵略者头目，做了多年的“二十四小时内占领上海”的美梦，被中国人民彻底粉碎了。

上海当时的租界地区，因其特殊的地位，虽没有正面遭到炮火的攻击，但战争的气氛也同样弥漫于租界上空。8月14日下午，我军飞机被敌击伤，炸弹误落大世界门口和南京路外滩，死伤数百人。23日下午，日机有意轰炸南京路浙江路口的先施公司，又伤亡700余人。在租界闹市中心的三次巨大伤亡，使租界上中外居民身受战祸，也更激起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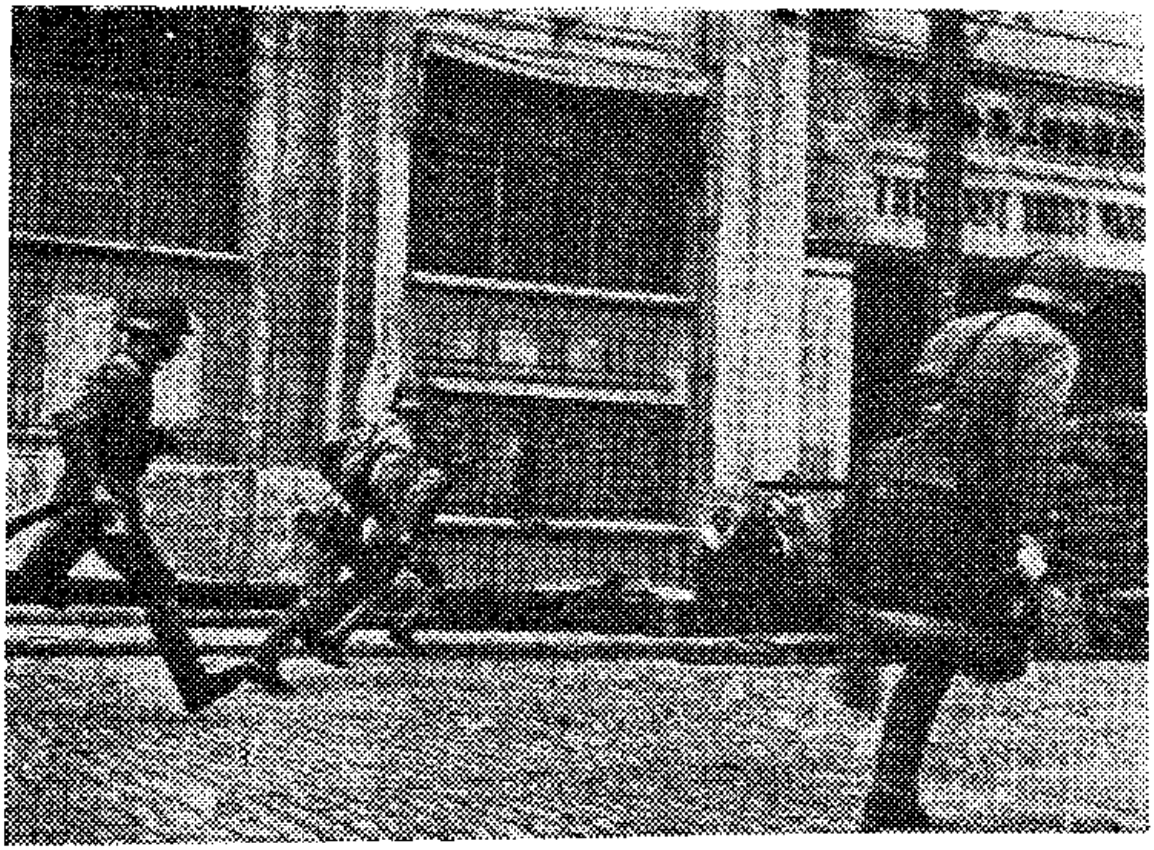
8月21日，日本侵略者援军到达吴淞口。23日，日军分别在蕴藻浜及吴淞登陆。先头部队开抵罗店。日军的意图是打通吴淞与罗店的联系，使浏河、罗店、宝山、吴淞、蕴藻浜、江湾以及北四川路底之日军联成一线，并从此线向我发动总进攻。位于海边的宝山是这条线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宝山不下，日军无法连接，有被我各个击破之可能。当时，我方增援部队亦陆续到达，第九十八师五百八十三团第三营于8月30日奉令固守宝山。宝山县城在日军战舰上大炮射程之内，自9月1日起，遂成为日舰主要攻击目标。日本飞机轮番前来轰炸。同日清晨，日援军再度在吴淞镇登陆，激战数小时，我军后撤，日军继续向宝山推进，营长姚子青率部出城迎击，重创日军。日军死伤数百人，退回吴淞。2日，日军分别由浏河、吴淞镇及虹口、江湾等地进犯宝山，我军又予击退，4日，日军再度猛扑宝山，并与川沙口的日军，互为呼应，对我宝山实行夹攻。姚营长率领部队迎战于金家宅。当天晚上，日军由炮台湾登陆，向宝山发动攻击，姚营长及其部属，通宵血战，宝山城岿然不动。日军因宝山久攻不下，于5日起结集日舰30余艘，飞机20架，步兵辅以坦克20余辆，对我宝山守军实行海陆空三面围攻。我军城外阵地全毁于炮火，奋勇据城死守。当时这营官兵，虽已伤亡过半，仍坚决抵

抗。7日晨，日军大炮将宝山城墙轰开一缺口，日军拟由缺口处入城，亦为守军击退。姚营长与全体官兵抱定与宝山共存亡之决心，于这一天同时殉国。宝山保卫战历时共9天，日军发动海陆空三军，花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才将宝山攻占，据报道，日军为占领宝山，单所耗弹药一项，价值便在10万美元以上①。

马君武《抗日纪事诗》中，咏我宝山守卫军云：

"六百余人齐授命，宝山应改号姚营，肉弹枪械争强弱，国土官兵共死生。"②忠实地描述了姚子青营长及全体官兵的英勇和壮烈。

宝山于9月7日失守，其他阵地（如闸北、江湾），无不遭到日军的猛攻，到9月12日我军放弃第一道防线，开始了八·一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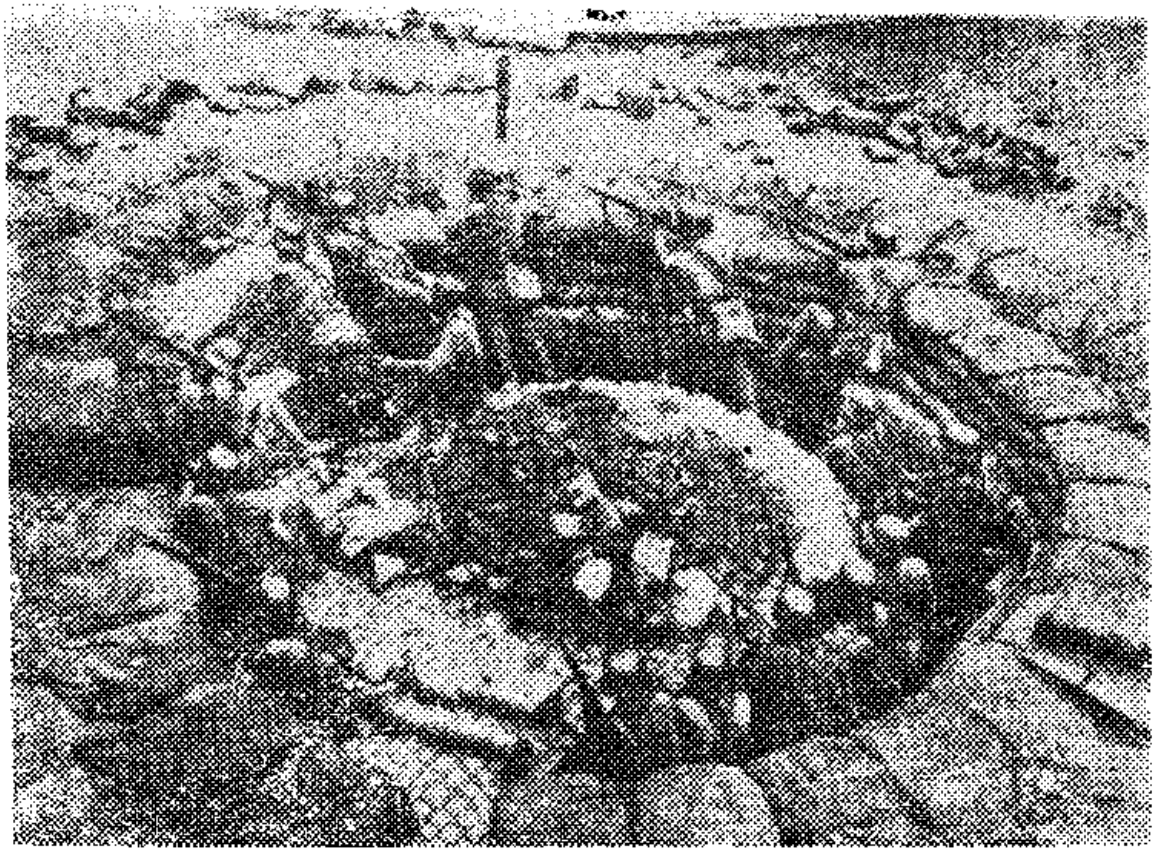


我军在闸北出击

①② 张开编著《中日大战记》，第35页，1945年10月重庆出版社。

战的第二阶段，也是最剧烈的阶段。是役，日方投入兵力已达10万之众，我军愈战愈勇，日军藉其轰炸及炮火，摧毁我军阵地，我守军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寸土必争。几乎每一阵地之得失，都要经过反复冲杀，短兵拚搏，双方伤亡，均极惨重，日本有人称这阶段的战争是"血肉磨房"，战况之剧烈，由此可见。

9月12日，我月浦守军奉令后撤，新市中心区及杨树浦阵地撤至江湾。我军于浏河、罗店、八字桥、刘行、庙行、江湾镇以及闸北、北站重新布防。由于阵地转移，需要巩固防线，重新部署队伍，而日军则有待国内及台湾援师，故从9月13日至28日约半个月时间内，双方未展开激烈战斗。在整个八·一三之战期间，这半个月是较为安谧平静的第三阶段。



江湾街垒战

9月28日深夜，日方援军部署既定，立即向我进行第四次总攻。他们的设想是在10月15日以前将我军逼至嘉定、南翔。至此

上海保卫战的第四阶段开始了。

我守军的防线，当时左翼是罗店、刘行以迄顾家宅。右翼由庙行联接闸北、江湾。进攻开始时，日军对我左右两翼同时猛攻，而其实际目的在于突破我左翼罗店、刘行、顾家宅阵地，从而迫使我军左右两翼同时撤退。激战至10月1日，日军向罗店、刘行、顾家宅一带进攻次数分别有七八次以至十数次之多，均未得逞。10月2日，罗店至刘行公路一线之守军被迫西移，3日，侵占刘行之日军向广福推进，遭到我军坚决抵抗，8日，我军反攻，日军败退至公路侧，沿获泾据守。日军因进犯多日，并无多大进展，乃改变战略，将正面进攻改为两侧夹击，直到10月10日，日军犹未能攻下广福。但自本月4日起，全线战斗中心，移至蕴藻浜两岸。日军拟强渡蕴藻浜，中央突破，直取大场。大场如不守，我内线闸北、江湾守军势必为日军所团团围困。11日拂晓，日军猛攻大场，经血战半月，大场终于26日失守，守军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自戕殉国。同日，驻守江湾、闸北之我军奉令后撤。

当闸北、江湾我军撤退时，我八十八师五百二十四团奉令断后，团长韩宪元率两营官兵掩护大军，团副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带领部份官兵共约800人，扼守要点。10月27日晨4时，我军撤退完毕，日军迟至6时30分始推进至北站附近，谢晋元率领之部分将士本可从容退却，但他们以团长下落不明，而守土有责，为了复仇雪恨，抱着与阵地同存亡之决心，决定与日军作殊死战。这便是当时名震中外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或称八百孤军)。

大军撤出后，谢晋元将大部分战士安排据守新垃圾桥北之四行仓库，另有少数士兵，分守附近其他大楼，与四行仓库互为犄角。四行仓库，南临苏州河，北与火车站相望，东为西藏路，地当要冲。仓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又较密闭，架设了武器，便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在这里设置据点，确实能收牵制敌人之效。我军部署已定，日军尚未到达，此时与四行仓库一河之隔的租界武装(英国驻军)见

我军陷入重重包围，曾主动劝告我八百壮士放下武器，并准许由租界通过，但我八百健儿，抱死战决心，谢绝假道。

是日午间，日军大举向四行仓库进攻，欲求一举攻下我军这一最后据点，因我军早已作好应战准备，予以痛击，进犯日军当被击毙80余名。因而日军对我四行仓库守军不敢正面进犯，改用包围形式，与我军对峙。下午6时30分，谢晋元、杨瑞符吁请上海各界捐助食品，要求盐、糖各500磅，光饼50000枚。此讯传出，居住上海租界市民，奔走相告，无不为八百壮士之爱国守土之热忱所感动。这时，谢晋元等已公开宣布："誓与敌拚死一周，永无遗憾。"不少市民冒险前往四行仓库慰问和输送食物，美联社记者等也到现场采访。当天通过广播为壮士征集光饼，第二天就收到20万枚之多，因捐赠物品太多，谢晋元不得不函谢上海市民，并婉言拒收，其中有云："如果盛意难却，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作全国抗战牺牲官兵之抚邮，以免浪费而切实际。"①

28日，上海各报纸均以巨大篇幅在显著地位报道八百壮士英勇事迹。顿时四行孤军的英名传遍海内外。关注中日战局之国际新闻界，全部瞩目于此。上海人民的支持，国际友人的称赞，进一步鼓舞了八百壮士的斗志。28日晨，日机多架飞临四行仓库上空，侦察多时，经守军不断的机枪射击，始行离去，显然，日军想采用最残酷手段对付守军，拔除我军闸北最后之据点。此时，租界英军再度劝告四行仓库守军放下武器，仍为谢晋元等所拒绝。下午3时，日军不敢正面进攻，改在远处射击，同时又将四行仓库四周建筑完全焚毁，原派驻其他大楼之我军将士，大多数均已以身报国。29日，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已经进入第三天，下午3时30分，日军派铁驳船两艘，满载钢炮机枪，打算由外白渡桥冲入苏州河，向四行仓库沿河大门发动进攻，此举为租界英军所阻而未

① 谢晋元致杜月笙函，转引自张开《申日大战记》，第47—48页。

果。晚9时，日军又大规模进攻，10时日军再度进攻，均被我守军击退。日军是日晚间的进攻，是当天下午设置陷阱的延续——29日下午，日军故意将包围四行仓库的队伍稍稍后撤，诱使我军突围出击，不料我军与四行仓库共存亡之决心不可动摇，敌军这一诱骗手段未能得逞。30日，孤军奋战已经3昼夜，日军以平射炮向我军猛轰，炮弹多至每秒钟一发，我军坚守，四行仓库安然无恙。当夜日军炮火、炸弹使四行仓库成为一片大海，延至31日凌晨2时15分，守军奉命放弃四行仓库，进入租界，当时，孤军实有327人，伤员28人。

历时4天的孤军作战，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不可侮。其中团副谢晋元贡献尤巨。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人民设置了“晋元路”，“晋元中学”和“晋元公园”，纪念这位率领八百壮士坚苦奋战的抗敌将领。1985年，上海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又在晋元中学内树碑以志不忘。

10月26日撤退之大军，由沪西造币厂起向西，经真如、江桥，转北至小南翔，迤东至广福、登桥镇，与浏河成垂直线，战线缩短至30里，同时已远离日海军战舰炮火射程，本可固守，终因日军强渡苏州河，我军被迫撤至新泾以南地区。

10月30日，日军向苏州河南岸发动猛烈进攻，我守军英勇抵抗，战况之剧烈较罗店、大场之战，有过之无不及。一位外籍记者曾目睹日军在沪西罗别根村附近渡河之实况，报道说：“日军先将坦克车运至苏州河之北岸，日军在坦克炮火掩护下，曾奋勇渡河，先后凡六次之多，但每次皆被南岸华军阵地内之机关枪扫射退回。双方伤亡皆重”①。11月4日，日军大部队渡过苏州河，我军在堵击过程中伤亡惨重。当日晚，日军由台湾调来一师团兵力，利用大雾天气分别在漕泾镇、金山卫等地登陆，登陆日军趁我军调防之

① 勃鲁司著《上海不宣之战》第50页。

际，直扑松江。8日，松江陷于敌手。9日，上海市区，除南市尚有一部分守军与武装警察在继续战斗外，其他各线我军均已分别撤离阵地。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猛攻南市，我军坚决抵抗。11日晚11时，防守南市之我军奉令撤退。历时92天的上海保卫战就此结束了；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宣布上海沦陷。

八·一三之战，我方投入兵力共约50万人。右翼防守浦东，约10万人，左翼在大场、罗店一线，兵力约共15万人，担任正面防守的，共约25万人，这些部队来自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各地，东北军也曾奉令调来参加战斗。淞沪战场上，众军云集，敌忾同仇，充分体现了上下一心，共赴国难的决心。这种团结御侮、并肩作战的振奋人心的局面，为民国以来所罕见。

日军在淞沪战场，投入兵力20余万，海军、空军占有绝对优势，但我军能在淞沪战场上激战三个月之久，完全出乎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意料，他们不仅口头上扬言三个月可以亡中国，事实上，他们的作战计划确实也是按照为期三个月的时间制订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日方首席代表重光葵在他的《昭和之动乱》中承认："海军认为上海及华中的扬子江流域应为对华作战之重心，陆军不赞成，以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解决中国，只要动用驻在华北的少数部队便可优为之"①。八·一三抗战给这些趾高气扬、根本不将中国人放在眼里的日本侵略军头目以沉重打击。

八·一三之战，我方伤亡数字，依当年参战将领估计，在18—20万。日军伤亡，据战后日本防卫厅调查，战死10224人，伤31257人，共计41481人②。至于非战斗人员，我方平民丧生，合租界内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92页，1937年5月台北《综合月刊》社。

② 顾高地《我所知道的八·一三战役片断》，《抗战风云录》下册，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35年。

外，亦当数以万计。至于财产之损失，估计达数十亿元。当年战场如闸北、虹口、江湾、杨树浦以及南市均化成一片瓦砾场，战争遗痕，迄今犹可概见。中国人民因损失惨重，无数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上海经营工商业的日本平民，因为战争损失、影响，以致产业无存者，也颇不乏人。据说，战争在虹口进行时，日本侨民有因家产荡然而投火自杀者。

八·一三之役，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又彻底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被包围的我方战士有被日军强迫自掘坟墓活埋的；至于对非战斗平民之烧杀、奸淫、掳掠，更是世所共睹。单单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这一天中，被杀死投入杀人塘中的平民便有60多人。村民熊阿大，路过杀人塘，先被日军拳打脚踏，砍了一刀，当场昏厥，次日清晨苏醒后，爬回家中，被日军发现，又拖回杀人塘，连砍数刀，踢入杀人塘中（杀人塘原名“赤旱塘”，因日寇在此杀人太多，人们改称为杀人塘）①。日寇在侵占金山卫的最初三天中，烧毁民房3059间，杀害我同胞1015人。一女童躲在竹林中，被发现后拖了出来，恣意奸淫后开枪打死。一怀孕3个月妇女手抱3岁幼儿，也未能幸免，奸污后母子均被刺死，这不过是日军无数暴行中的一例，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如此。

历时三个月的八·一三之役，在上海史以及我国甚至世界现代史上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上海之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美梦，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言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高，国际反侵略舆论一致认为，中国人民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是有自卫能力的。10月28日，《泰晤士报》社论指出，在上海英勇反抗日本侵略军的中国部队“脱颖而出，此为近世中之第一次”；

---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页88，1986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十周血战，将有一日证明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之兵力基础”。

上海之战，不仅大大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锐气，使之无法长驱直入；同时，又为我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的西移，赢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由于南京政府中一些人对和平存在幻想，八·一三战幕初揭时，还有人希望能再次以一·二八的方式来结束这一事件，对南京政府布置的政府机关和重要企事业机构迁往大西南的计划，并未认真执行。到了9月上旬，国民党政府才看清战争不但要继续下去，而且必定要扩大，这才注意到重要工厂的西迁和后方根据地建设的加强。由资源委员会主持的上海工厂的内迁，得以在这段时间里进行，当时由上海迁出工厂共约150余家，这些内迁的工厂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上海之战，教育了上海和全中国人民，使大家普遍和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英勇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在我军浴血抗战的英雄事迹的感召下，上海各界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走上火线慰问将士和伤员，在捐款、劳军、收容难民、肃清汉奸……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群众团体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最广泛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八·一三抗战告一段落后，这些在上海从事救亡的组织和人士，不少离开上海转往祖国各地，陆续从事动员组织群众共同抗敌的救亡运动，为实现全面抗战作出了贡献。

八·一三抗战，我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当时南京政府能较早下定抗战决心，对和平不存在幻想，特别是对11月初的“《九国公约》会议”不抱希望，主动掌握战机，我方部队能及时按原定作战计划，退守苏州至福山的国防线，不作最后那段时期的无谓牺牲，我方的损失当可以大大减少，南京也不致陷落得那么快，那么狼狈。

二、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

“七·七事变”点燃了抗日烽火，坚决抗战成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上海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迅即蓬勃开展。7月9日，文化界人士：洪深、郑振铎、胡愈之等140余人集会，致电蒋介石、宋哲元(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二十九军军长)，要求力保国土；保险业职工200—300百人率先成立战地服务团。13日，各大学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决定各校员工捐薪一日劳军；被国民党政府无理拘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在狱中致电并汇款100元慰问华北前线将士；全市163个同业公会举行联席会议，议决汇款1000元并成立募捐会进一步筹款劳军。

各界群众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国民政府为了控制群众运动，由国民党市党部发起，吸收各行各业头面人物、社会名流和一部分进步人士参加，在7月22日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由杜月笙、潘公展、汪曼云等9人组成主席团，掌握领导权；并规定该会为上海各界群众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全市所有抗日团体都必须加入抗敌后援会，受其管辖。国民党上海总工会筹组的“上海工界救亡协会”与“上海农界救亡协会”于8月7日同时成立，企图控制工农基本群众的救亡运动，但是它们缺乏群众基础，其实质是限制而不是发动，因而活动不多，徒有其名。

群众热望参加抗日，国民党力图限制，迫切需要有正确的方针、办法来领导群众支援抗战。在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就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又要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注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把党组织扎根于群众之中；先后派刘晓、刘长胜等来上海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张爱萍、余立金、吴克华到沪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为了适应形势，进一步发动和组织

群众扩大救亡运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上海地下党决定各个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以团体会员名义参加抗战后援会，公开合法而又独立自主地领导群众救亡运动。

7月28日，由文化界救国会改组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举行成立大会，推举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茅盾、张志让、严谔声等83人为理事；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15人为常务理事。成立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收复失地、制裁汉奸和扩大救国宣传等决议。至8月，“文协”有个人会员251人、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都是当时上海的著名文化人。团体会员著名的有“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又名“话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游艺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由“报告文学者协会”、“诗人协会”、“文艺界战时服务团”合并组成）、“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戏剧界救亡协会是当时最活跃、影响较大的团体之一，正式成立于8月17日。它先后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主要由电影、话剧界组成，活跃在上海各个剧场、里弄、学校、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等处，对群众起了有力的教育和动员作用；后来除第十二、十三队留沪外，其余各队都陆续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救亡，为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

“文协”在8月24日创办《救亡日报》，由巴金、王芸生、金仲华、郭沫若、曾虚白、叶灵凤等30人组成编委会，阿英和夏衍负责具体工作。《救亡日报》以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迅速的报道和勇敢的战斗风格，赢得了读者的欢迎，成为中共领导的、又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文协”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等，都是当时的主要救亡刊物，拥有大量读者。

“文协”还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宣传我国的抗日，争取国际舆论和爱国侨胞的支持。宋庆龄和颜惠庆的广播讲话和文章，呼吁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几乎世界各国主要报纸以及上海外文报刊，均以显著地位和相当篇幅刊载，收到良好

的效果。

9月12日，由职业界救国会改组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正式成立。据当天统计，有团体会员28个，人数在千人以上。10月份，会员又增加五倍。主要领导成员有沙千里、李文杰、黄逸峰、王纪华、周肇基等人。“职协”是会员人数最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救亡团体。团体会员中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海关同人俱乐部”、“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益友社”、“蚁社”、“精武体育会”、“上海职业妇女会”、“上海各业员工战时服务团”、“量才补习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等都有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它的会员，主要是广大店员和职员，同时也吸收经理、工程师等高级职员以及工商业者参加，它还邀请各行业中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担任一些领导职务。争取团结这些上层人物，使团体更加公开合法，变阻力为助力，有利于广大店员和学徒能参加进来，发展强大的群众基础，这也就使国民党不敢公然压制。“职协”主办的《救亡周刊》是当时主要的救亡刊物之一。“职协”领导的“国民歌咏救亡协会”，在各个救亡协会歌咏队中是影响较大的一个。它由53个歌咏团体组成，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何士德、麦新、孟波、孙慎等都是该会成员。他们的歌声，唱出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心声，鼓舞着群众的革命激情。“职协”的戏剧宣传活动，是仅次于“文协”的重要力量。

由工人救国会改组的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主要由中共党员金子明等负责。中共领导工人群众成立了“上海印刷界战时服务团”、“上海纱厂工人救亡协会”、“上海人力车夫救亡协会”等工人救亡团体。纱厂工人大都是日商纱厂工人，他们对于袭扰敌人起过特殊的作用；人力车工人曾组织300辆人力车、500人的运输队，赴前线服务；法商水电公司工人组织“星期服务团”，300余人利用休假日上前线帮助军队挖战壕、修工事。

10月28日，由学生界救国会改组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简

称"学协")正式成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一向居于领先地位,但当时适值暑假,所以成立较迟。但在成立之前,已有两支生力军来沪:一是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在7月25日,成立留日同学救亡会,有会员200余人;一是大批平津学生南来,于8月30日成立上海市平津流亡同学会。这两个组织促进了"学协"的成立。"学协"的理事和会员,均以学校为单位,共有40多个团体单位参加。他们在进行救亡活动的同时,还举办失学、流亡同学登记,帮助安排入学。

8月24日,由教育界救国会改组的上海教育界救亡协会成立,共有大中小学教育界人士800多人入会。理事会中有王造时、刘湛恩等爱国进步人士,也有潘公展、陶百川等国民党人士。教育界面向青少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影响深远。上海战时普及教育服务团还在里弄办学校,解决失学青年的读书问题,很受欢迎。

8月4日,在妇女救国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正式成立。它不仅用了国民党团体的名称,而且还邀杜月笙、俞鸿钧的夫人担任该会副主席,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国共合作的精神。何香凝、史良、许广平、沈兹九、胡子婴等起实际领导作用。参加的有中国职业妇女会、中华妇女互助会、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华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妇女节制会、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等22个团体。

各个救亡组织相继成立以后,都纷纷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运输队等,组织会员参加各项抗日救亡活动。"文协"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拥有队员2000,有二个战地服务团分别到张发奎、陈诚的部队里进行工作;"职协"有50个宣传队、40多个慰劳队;"学协"有10个歌咏队、10个战区宣传队,20个慰劳队;……他们活跃在前线后方、大街小巷,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推动了群众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抗日战争一爆发,上海各界人民多年来压积在胸头的抗日爱

国热情倾泻而出。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好形势下，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职业和社会地位，也不管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所有的上海市民都投入了蓬勃开展的救亡运动，出现“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就是平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阶层也参加进来了：里弄居民成立了居民联合会、住户互助会，家庭妇女也组织了服务团，佛门弟子成立了拥有100多人的僧侣救护队，舞女也组成上海舞女界救亡协会。爱国老人马相伯以98岁高龄积极参加救亡活动，并号召成立“老子军”。小孩也有儿童救亡协会的组织，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并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捐献给祖国。上海市商会所属社会童子军团的战地服务工作成绩颇为突出。8月14日，这个组织即成立战时服务指挥部，组织团员进行随军救护及输送慰劳物资工作。女童子军杨惠敏向四行孤军献旗，实际送去的国旗过小，谢晋元要求另送一面大旗，这个任务由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完成，六名团员将一面大幅国旗亲自送给了四行孤军。

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无论是亲上前线与抗日将士并肩作战、慰问将士、救护伤兵、输送给养，还是在后方募集款项、赶制慰问品、宣传教育、发动和训练群众，以至安置难民、救死扶伤、惩治汉奸等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现了许多光辉事迹。动人例证，不胜枚举。从“七·七”到8月20日，上海各报馆收到的救国捐款就达80000多元。为了防御日军使用毒气，需要香烟罐赶制防毒面罩；一声号召，一天之内便征集到60000只。11月我军后撤时，随军撤走的青年，至少有5000人。在抗敌救亡的旗帜下，全上海人民团结一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与日本侵略者作最坚决的斗争。这种热火朝天，抗敌救亡，万众一心，保卫祖国的伟大场面，为上海历史上前所未有。上海战役后期，已届深秋，上海的劳动妇女、家庭妇女、也包括平日无所事事的贵妇名媛，纷纷为将士赶制寒衣。她们千针万线，日夜辛劳，一批又一批地赶制出来，送上前线。当最

后一批寒衣缝好时，我军已经西撤，四郊已为日军占领，征衣欲送无从送，亲手缝制寒衣的妇女便抱着寒衣流泪。她们的爱国赤忱，人们深深为之感动。

上海人民以他们的具体行动，向全世界宣告：上海人民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侮！

三、工厂内迁

工业，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战争物资的保障。上海工业，是全国的中心，如何保存这些工厂企业，应是长期抗战必须部署的。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爱国的经济界人士就提出了上海工厂的内迁问题，沉痛呼吁"一·二八上海之役，可为殷鉴"①；"鉴于战时运输困难、迁移不便等原因，所以必须于战争未爆发前，依原料出产、货物销路情况，将各种新式工厂分移于各省。"②但国民政府却对此反应冷淡。

卢沟桥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还是没有长期抗战的打算，对工厂内迁仍然没有积极的规划和措施，只是把上海市机器五金同业公会负责人颜耀秋召到南京，表示让"在野人士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内迁"③。直到3个星期之后，才决定派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赴沪调查上海华厂内迁的可能性。

民族资产阶级却要主动积极得多。中华国货维持会早就主动要求政府赶紧派员指导军用品生产，明确表示誓为政府长期抵抗后盾。林继庸到沪之后，上海市机器五金同业公会即于7月30日召开迁厂准备会议，作出内迁决议；会后还委派胡厥文等为代表专

① 谷源田《中国新工业之回顾与前瞻》，载《中国经济研究》，1936年4月。
② 刘百川《国防工业建设实施》，1937年3月，第118—119页。
③ 颜耀秋《抗战期间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纪略》，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赴南京，向资源委员会要求赶快内迁翻砂、打铁、电器及五金厂，以应军事制造之需。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等八家专业厂也向林继庸提交了内迁计划。

在上海爱国企业家的促进下，直到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才议决通过资源委员会制订的“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批准提供经费56万元，对原案提出的奖金却予“缓议”，并指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组织监督委员会严密监督、克日迁移。12日，以林继庸为主任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沪成立。颜耀秋为主任、胡厥文、支秉源为副主任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也随即成立，积极负责各项具体事宜，实际领导这项工作。上海工厂内迁工作总算正式开始了，但上海也已成为战场。

工厂内迁开始，许多爱国企业家都积极表示支持。纷纷报名，并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誓不以厂资敌”以至“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①。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国货运动联合会等主要轻工业团体联名呈文、委派代表赴南京面陈，提出具体的内迁计划，要求政府大力协助轻工业厂内迁，以保证后方民生的需要。对民族资本家的这种爱国行动，国民政府没有给予积极支持。九月中旬，“监督委员会”以缺乏经费为名，公布了新办法，规定严格限制成品运输，把原先到武汉的运输补助费减半，只补助到镇江为止等等。对这种限制内迁的新办法，上海民族工业界的代表人物荣宗敬等32人，立即联名致电行政院：“全面抗战应有长期计划，以便与敌持久周旋”，“政府自应力助各厂设法迁移安全地带照常工作，输运务求灵活，捐税或减或免”，委婉地提出批评②。9月27日，国民党政府工厂调整委员会按照

①② 转引自孙果达《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载《上海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辑。

行政院决议，审议同意资源委员会提出的“上海工厂迁移内地扩充范围请增经费案”，为化工、造船、印刷工厂增加迁移经费52万6千元。同时宣布上海现行迁移工厂办法即行截止；今后只酌情补助军事上必需并自己有能力在内地站住脚的民营厂内迁；其余要求内迁的民营厂自己承担一切费用、一切后果，政府不负任何责任。这确实是政府对民营厂内迁“不负责任”，听任它们在战火中毁灭或被日寇占有。

即使那些批准取得补助的内迁工厂，也还遇到了种种严重困难。

首先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拖延误事，丧失时机，造成工厂内迁在战火下进行，损失极大。“职工们都在不顾危险地抢拆机件，日本飞机来了，就伏在地上躲一躲，日机飞走，又站起来拆，拆好了就扛就走。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嗳唷’，就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继续工作。许多冷冰冰的机器上都涂染上了热腾腾的鲜血。”① 由于战时运输紧张，加上江阴设置了封锁线，长江航运中断，内迁机件和工人只能乘坐木船，缓慢地在吴淞江上划到苏州，然后由小火轮拖带到镇江，再换乘江轮西往汉口。闸北失守，吴淞江被阻，只能改从黄浦江绕道松江，转往苏州、镇江；杭州湾失守，松江危急，又改装外轮运至南通，然后再改装木船，运往镇江。这些木船、江轮，都成了日机扫射轰炸的目标。天原化工厂的部分机器，就被炸沉在吴淞江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的内迁船只，也都遭到炮火轰击，损失惨重。

其次，是国民党官僚机构造成的种种磨难。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没有统一的领导，“监督委员会”只能负责机器业，别的行业所属各有关部门又互相推诿，以致丧失时机，阻碍内迁；迟至11月14日，才成立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全面负责战区厂矿内迁工作，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646页，1974年台北综合月刊社版。

但其时上海已经沦陷，势难行动。内迁工厂领到内迁经费的支票，银行却以限制提存为由拒绝兑现，每周只能提取150元，以致有些厂连伙食也难以维持，动不得身，经"迁移委员会"四处奔走，几经波折，浪费了许多时间，才解决了兑现问题。搬迁需要交通工具，但政府掌握的大批运输工具，却为官僚机构及其企业服务，"虽窗门木板亦满载无遗，至于民用机件虽极重要亦难得吨位，欲行不得"①，几乎全靠各厂自行解决。内迁厂千方百计，搞到了船只，还有个通行证问题，警察局的通行证，军队防区不准通行；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又百般刁难；直到9月中旬，"监督委员会"好不容易领到淞沪前线总司令部的100张通行证，又被官僚机构仗势夺走99张；再经过近一个月的奔波，才重新领到通行证。有了通行证，还不能通行无阻，还要受到沿途军队的留难，这连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也承认："惟沿途军警机关林立，……故迁移一物势非具备四、五道通行证不可。且军事机关所在地时有变更，往往本局亦未能知其地址，厂商更感无门呼吁之苦。"②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种种留难，不仅使内迁厂历尽艰辛，同时也使许多准备内迁的工厂，知难而退，严重挫伤了内迁的积极性。

此外，国民党政府在内迁开始时，规定各厂迁往武汉，但在武汉却毫无准备，致使许多厂到了武汉，根本无法立脚；随着战局的变化，再规定以川、黔、湘西为主。各厂又在战乱中再度长途迁移，这又使内迁厂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如大中华橡胶厂到达云南，内迁物资已损失殆尽；新中工程公司到达重庆，2000吨物资剩下的只够装一卡车了。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内迁民营工厂，共146家。运达武汉的器材共14600余吨，随厂内迁技术工人2500人。在这146家中，计

---

①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第55页，1942年出版。

② 转引自孙果达《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载《上海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辑。

机器五金业 66 家，造船业 4 家，炼钢工业 1 家，电器及无线电业18家，玻璃陶瓷业 5 家，化学工业 20 家，文化印刷业 14 家，纺织印染业 7 家，食品业 6 家，其它工业 5 家。1939 年 11 月在大后方复工的只 74 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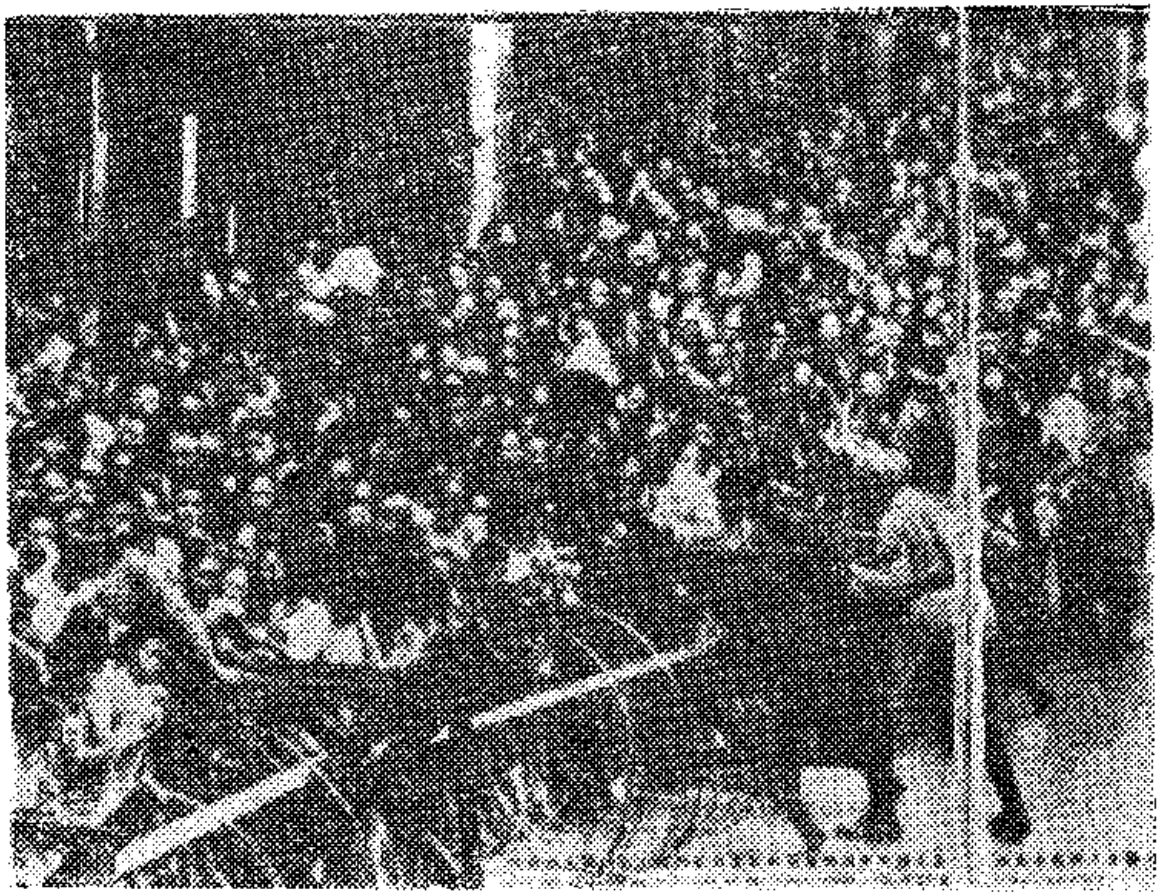
尽管上海内迁工厂从数量上来看，少得可怜，而在搬迁过程中，又损失惨重；但在大西南这个工业落后的地区，它们的到来，立即起了骨干作用，无论是对军工生产，对为民用工业提供机电设备，还是促进其他工业的发展，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内迁工厂，主要是上海内迁工厂，被誉为"抗战初期厂长与职工为迁移工厂而流洒的血汗所培养出来的花蕾"，"大后方工业生产之洪流"，是并不过份的。在上海内迁工厂中，还有一家利用五金厂，迁到武汉后，工业家沈鸿带了十多名技术工人和十台机床，于 1937 年11月，到达离延安 70 余里的安塞县，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被誉为"边区工业之父"。要不是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拖延，上海的工厂内迁是会有更大规模和更大成绩的。

四、难民工作

战争爆发，战区居民家破业毁，沦为难民。随着战区的扩大，难民不断增加。他们纷纷拥入租界，高峰时达 70 万人。这许多难民扶老携幼，无家可归，无亲可投，露宿街头，处境极为凄惨，冻饿而死者日达百人以上。还有许多难民，被两租界当局拒之界外，更是处于绝境。安置难民，成为上海的迫切问题。

上海的一些慈善救济团体、同乡会、教会等组织，在爱国人士的倡导推动下，纷纷成立难民收容所。它们分属三个系统，工作方

① 转引自孙果达《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载《上海史研究通讯》1985 年第 1 辑。



难民拥入租界

法各有不同。

上海市地方协会所属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后改组为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分会），初由潘公展负责，后由赖延芳负责，建立收容所67所，收容难民20000余人，管衣、管食、管住。以后又组织难民遣送委员会，会同其它单位先后遣送难民约20万人离沪。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所属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参加的除中国的慈善团体外，还有国际的慈善团体；领导成员中也有领袖领事、工部局董事以及基督教会等外国人士。具体负责的是法国人饶家驹神父(R.P.Jacjuinot)（天主教，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八·一三抗战爆发时，已经致力于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23年之久。在一·二八抗战中，他曾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因而受伤失却右臂。这时，除了在法租界建立了6所难民收容所，

他鉴于鸽候于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民国路上的大量难民，租界已无法容纳，而南市居民已大部进入租界十室九空，提出了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经过他的奔波活动，取得了中日双方的同意。1937 年 11 月 8 日，国民党市政府发表布告，声明南市难民区"系国际间一种难民救济性质，绝不损害我方丝毫领土主权，所有该区域内治安维持，仍由我方派警负责"。9 日，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以南市北部，约为旧城厢 1/3 的面积划为难民区，南起方浜路，东西北三面均以民国路为界。成立的当天就收容难民20000多人。最高额曾有收容所 130 余所，收容难民 10 万人以上。难民区由以饶家驹为首的外籍人组成监察委员会负责管理。饶家驹热心工作，多所建树，并曾在工作中为流弹所伤。但从日军侵占南市起，日伪就多次侵入和干扰难民区，经过多次交涉，才勉强维持到 1940 年 6 月 30 日，始告结束。

救济委员会和国际救济会的难民工作，为收容和安置大量苦难同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能济一时之急。但它们的工作都局限于单纯的收容救济，没有同抗日救亡的总目标相联系，与下面即将述及的慈联会的难民工作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慈联会，全称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成立于 1937 年初，以许世英为主任，黄涵之、屈映光为副主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赵朴初当选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主持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社会局也派了一些人参加工作。8月 14 日，正是难胞聚集，急需收容救济之时，恰巧大世界误落我国空军所携炸弹，死伤多人。该会就在落弹之处附近，那些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却丢下难民不管，一走了事。赵朴初、吴大琨连夜率领大批难民来到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爬过铁栅，打开大门，设置了慈联会第一个收容所。一夜之间，他们用同样的办法，设立了十几个临时难民收容所，把难民暂时安顿下来。从 1937 年 8 月到 1940 年，慈联会先后共设置收容所 50 余所，收容难民 50 万人次。是三大系统中收容难民最

多的。据 1937 年 9 月 22 日《救亡日报》报道，慈联会收容的难民，每天需要大米 400 担，咸菜 8000 斤。可见给养和管理工作是十分繁重的。

这样繁重的难民工作，得到了广大市民、职工、文艺、教育、工商以及宗教等各界的支持，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便说明了，难民工作不是单纯的救济工作，而是整个抗日救亡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挑选一些思想进步、热心公益的人来参加。赵朴初的这种想法和要求，得到了中共的支持。中共江苏省委认为难民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失业职工等一批基本群众，必须加强在难胞中的宣教和组织工作。在 1937 年冬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派遣一批党员通过赵朴初等人安排到收容所当管理员或教师，有的则以难民身份在难民中工作，任务是采取短期突击的办法，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聚集积极分子，吸取基本群众中的精华到党组织中来，为抗日这个总目标服务。慈联会为难民工作委员会的活动开拓了阵地，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实际上领导着慈联会的难民工作。

慈联会的收容所不仅解决难胞的衣食住，还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难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不仅在识字班、文化课贯彻政治教育的内容，而且还组织成人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举行报告会、讨论会等。同时还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如说书场、歌唱会、戏剧会演、小茶馆，读报、讲故事，座谈时事等，夏天举办纳凉晚会。由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在收容所里，除了挂国民政府的国旗外，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说是一个'小解放区'。许多工作人员在这里得到了类似解放区行政组织领导工作的锻炼，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①

① 赵朴初《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载《抗日风云录》下册，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为革命输送力量是慈联会收容所的突出成就。收容所在难民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在上海近郊战事方酣之际，组织了一批难民到前方参战，并把一部分工人和近郊农民（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送到工厂和近郊开辟工作。最具规模的是以“移民垦荒”为名，在1938年7月、年底和1939年初分三批组织积极分子，在中共党员的带领下，通过日军和国民党的检查盘问，经温州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人数共计在1000人以上。从1939年到1940年，还通过秘密交通线分散地输送大批难胞到苏南的嘉定、青浦、松江和无锡、常熟、苏州、昆山、太仓、江阴等地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到苏中的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参加人民武装斗争。两年间累计有3000人左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慈联会的难民工作，成了整个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艰苦扎实的宣教和组织工作，它把大量难胞引上了革命之路，为抗日救亡作出了贡献。

第二十三章　不屈的"孤岛"

一、"孤岛"的形成和演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占领中国，排斥英美，独霸远东。但当时它不仅没有力量与英美等国直接对抗，而且军事物资、军事运输还有赖于美英支持，因而日本与英美等国之间一时还不致爆发公开的对抗。

我军西撤后，英美法等国力图维持这块经营了近百年、拥有巨大资产和可猎取大量利润的上海租界，继续享有其特权；而日本侵略军也就不敢马上开进租界与英美相冲突。在这既争夺又妥协的对峙形势下，两租界处于日军占领区的包围中，故人们称之为"孤岛"。不过原公共租界的苏州河以北地区，早已沦为战区，被日寇所占领，不属"孤岛"范围。

孤岛，仍分别处于工部局和公董局的管辖之下。从表面上看，似与上海沦敌无关。就在这块孤岛上，国民党政府的驻沪单位，照常工作：两个特区法院照常行使职权；中央通讯社照常发稿；四大国家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照常营业；江海关照常收税；……中华民国的国旗仍然在租界上空飘扬；极大部分报刊仍坚持抗日立场；租界上300万居民，除个别民族败类外，依旧公开保持抗战热情。但这只是初期的状况。英美法的绥靖政策和日本的独占野心，决定了孤岛将逐步被吞没。

1937年11月27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开声称："关于上海

公共租界问题，在必要时，日本或将以武力从事”，凶相毕露。12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公开声明，“英国不承认租界内任何一个国家，有单独解决关于该租界行政问题之权利”，表示反对日方接收租界。1938年1月12日，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对日本的要求，“美国态度殊不赞成，并坚持此态，决不变动”。

与外交上表态的同时，日本采取了实际行动。1937年12月3日上午，不顾领事团的反对，日军6000人，携带轻重武器，从沪西丰田纱厂出发，经过福煦路、爱多亚路、虞洽卿路、南京路，外滩，过桥至虹口。名为“调防”，实为日本侵略军庆祝胜利的示威游行。租界当局面对日军的挑衅，竟让其耀武扬威地通过。对于这伙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日本强盗，上海人民无不切出痛恨，怒目而视。在大世界前面修钟的青年工人，怒火中烧，高呼爱国口号，从高架上跃入敌军队伍，堕地牺牲。在南京路、广西路附近，一热血青年向日军投掷手榴弹，炸伤3人。日军即封锁南京路、虞洽卿路一带，断绝交通；经多次交涉，延至晚上8时，才将岗哨撤走。投弹青年身受枪伤，日军不许抢救，即在现场牺牲。5日，日军还向租界当局提出四项要求：“日军如有必要，可于任何时候，通过公共租界。无须事先通知；工部局兹后应尽力阻止此类不幸事件之再发生；如有类此之事件再发生时，日本陆军即采取独立及有效之行动；为辅助工部局维持公共租界内之和平及秩序起见，日本陆军如认为有必要时，可采取独立行动及调查租界内之嫌疑犯及其他事件。”对于这样的蛮横要求，工部局当局实际上是默认的。1938年春，在日方压力下，工部局任命一日人任巡捕房的特别副总巡，并把日警分队提高到与外警分队同等地位。随着英美积极策动东方慕尼黑阴谋，英国政府在租界问题上的妥协投降，就更加露骨。1939年4月，天津英租界发生汉奸被刺事件。6月，日军正式封锁该租界。随后英国和日本缔结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华消灭抗日活动有特殊需要，保证租界在治安与经济方面与日本合作，并将

在英租界被捕的抗日志士4名，引渡给日方。在上海，同年4月，应日军要求，公共租界禁止在8个特定假日外悬挂中国国旗；5月，两租界当局会衔公告：取缔租界内的一切政治活动，违者一概不予保护；并不时派出大批捕探检查行人及住户。

英、美不断妥协退让，日本就步步进逼。到了1939年9月，欧战爆发，特别是1940年5月，英、法联军在法国北部惨败以后，意大利也向英、法宣战，英、法已自顾不暇，日军就更加咄咄逼人。此时，日本驻沪海军司令邀请各国驻沪海军将领，“讨论上海局势”。日方在会上提出，目前情况下，在公共租界，交战双方（按指英法与意大利，公共租界向由英、美、日、意四国联合统治）不可能合作；既然如此，不如委托第三国代管，维持现状；其他问题，留待战后解决。日本妄图乘机攫取上海租界的阴谋，遭到了英美法三国的一致坚决反对，未能得逞。但在此前后，日本早就向租界当局进行各种进攻了。1940年1月6日，工部局总办费利浦（Phillips.G.Godfrey）乘汽车回寓，被一群“黄包车夫”拦住去路，向他连开八枪，均未命中，幸免于难。2月，工部局当局与日伪当局在江湾伪市政府签订协定，成立“沪西特别警察局”，名为“共同管理”，实际上由伪市府派特务潘达为署长，重要员司均由日本人担任。公共租界原辖大片沪西越界筑路区，全部落入日伪手中。不久工部局又同意日方要求，加推日本人冈崎为副总董，渡正监为副总裁。整个工部局便在日本人的监控之中了。从此，租界当局做了不少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和侵犯中国主权的勾当。如：7月9日，工部局总办费利浦将市政府寄存租界的土地局卷宗312箱，全部移交给伪市府土地局；11月8日，法租界当局将第二特区法院移交给伪方接收；12月23日，日本宪兵由法籍巡捕带路，将市府寄存于蒲石路的田地房屋捐册底册全部运走等等。两租界当局对日本侵略者，尽管如此迁就妥协，以至于仰承鼻息，并未能使日本侵略者满足，杀害租界官员之事时有发生，1940年12月16日，法公董局政务督办杜

格，被狙击身亡。1941年1月13日，工部局举行纳税人特别会议，投票通过征收原市政税40%的附加税。此举为日本纳税人所反对，日侨纳税人会会长、日旅沪侨民会会长林雄吉竟拔出手枪向工部局总董凯自威(W.J.Keswick)射击，另2名日人动手焚烧会场。事后，工部局虽将三案犯拘捕，旋即释放。日方一面拘留林雄吉押送长崎受审，日总领事出面道歉；一面由官员在日文报纸上叫嚷："除非工部局根本改组，否则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林雄吉出现。"①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存在了4年。在这4年中，工部局和公董局表面上没有变，仍统治着两个租界；其实质却在不断变化，英美法势力日渐衰微，政治权力逐步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租界由几个帝国主义共管的殖民地向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逐步演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开进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则因维希政权的关系，当时在名义上未被日军所接收，公董局仍然存在，直至翌年方为汪伪政权在所谓收回租界时所取消。总之，两租界所称为的孤岛的时期，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后即告结束。

二、封锁掠夺中畸形发展

在战争中，特别是侵华日军蓄意对中国工厂的轰击和破坏下，华商企业损失惨重。据市政府社会局的估计，闸北地区几乎全部、杨树浦和虹口地区的70%、南市地区的30%的企业遭到破坏。中外各方都估计，上海华商工业的损失在8亿元以上。当然，战火无情，外商企业也不可能保全。日商企业损失2亿日元，英商企业损失50万英镑。在租界上未遭战火损害的工商业也普遍陷入战

① 转引自巴尼特：《经济上的上海：政治上的抵押品》第一章。Barnett.R.W：Economical Shanghai：Hostage to Politics；New York，1941。

时萧条，一片凋敝现象。上海电力公司出售的工业用电量，从1937年4—7月平均6,127万千瓦/小时，下降到9—12月平均1,318万千瓦/小时，便可见一斑。

国军西撤之后，孤岛周围沦陷区中所幸存的华商企业财产，又遭到日军、浪人勾结汉奸、流氓抢劫破坏。如闸北竞昌骆驼绒厂所有机器和物资被洗劫一空；杨树浦的中国统一毛织厂，锅炉和部分机器被拆走，毛织机全部被敲坏，只剩下几台驼绒织机①。又如沦陷后的申新八厂，幸存的细纱车，全被用重磅锄头敲坏，无一幸免；车头马达、台口油箱，亦均击破。据日人称是丰田纺绩厂日人所破坏②。即使经过这样洗劫破坏的工厂，日军还不放过，宣布"军管理"，加以霸占。上海被"军管理"的企业达76家，都是大中型企业，如上海水泥厂、纺织业的申新五、六、一、八厂，永安一、二、四厂，恒丰、嘉丰诸厂，章华毛纺厂浦东分厂，面粉业的福新一、三、六厂等等。此外，还有榨油、卷烟等厂。这些厂被"军管理"后，即由日军"委托"某些日商企业经营，利用华商厂的资产，为其牟利。除了这种赤裸裸的掠夺以外，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方式，进行掠夺。1938年11月，日寇在上海成立"中日合作"的"华中振兴会社"，规定中国投资51%，日本投资49%，以诱骗中国资本家与之"合作"，夺取更多的华商企业。在"华中振兴会社"之下，先后成立了16个子公司，掌握煤、铁、盐、电、铁路、航运、地产、缫丝、海产、烟草等企业，垄断沦陷区的经济命脉。所谓"合作企业"只是一种名义，实际大都是日本人霸占了中国产业，例如"华中电气公司"即由原华商的闸北水电公司、华商电气公司、浦东电气公司、兴华电气公司等组成；"华中铁道公司"即由原沪宁、淞沪、沪杭、宁芜等铁路组成，日本人只是从东北或日本运来一些车皮作为投资。企业经营权却完全操在日人手中，绝大部分利润也

① 《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第113页；中华书局，1963。

② 《荣家企业资料》下册，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归其所有。这种刺刀下的所谓"合作"，纯属骗局。在这些垄断性公司成立之后，华商企业即使不愿参加"合作"，原料、销售均受其控制，也就难以生存。所谓"租赁"，只是分得一些残羹剩饭的"租金"；而"收买"，那更是连资产总值一半也不足的大拍卖了。总之，在沦陷区里的中国企业，被日寇以种种形式所侵占，幸存的一些企业，完全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陷于绝境。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区的经济掠夺，是以"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和"以战养战"为基本政策，目的是使沦陷区殖民地化，为侵略者提供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因此，日军在侵占华中以后，除了上述的侵占华商工厂外，对粮食和棉花等还实行统制，禁止自由运销，指定由日商采办，以供应日军和日商企业。在孤岛时期，日军不仅禁止将粮食棉花运入上海租界，甚至原煤等等也属禁运范围，孤岛上海不仅处于日军的军事包围之中，也处于它的经济封锁之中。

但是，孤岛经济又有一些特殊的条件，使它复苏和发展。首先，租界当局标榜"中立"，其统治在表面上没有变化，孤岛上海似乎处于战争之外，与整个中国战火弥漫比较，相对稳定和安全。其次，除了中国船只，外国船只尚能继续出入上海港，与中国沿海口岸和海外各港口进行通商贸易，因而维持着它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地位。正因为这样，在日寇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可以进口大米、棉花、原煤以及其它工业原料以至工业设备，以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

第三，有很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孤岛上海不仅有大量本市难民，而且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来沪避难的人也越来越多。租界人口直线上升，据两租界统计，1936 年，两租界人口为 167 万，至 1938 年下半年，两租界人口已达 450 万，增长了 1.7 倍。在 1938 年冬至 1939 年 8 月，还有欧洲难民(主要是犹太人) 18000 人前来上海。这些人中间也有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据工部局报告：公共租界地区的工人数，1935 年底为 20 万，1937 年底降至 27000

人，1938 年底又上升至 237000 人。其后两年又上升了 50%左右。这是指在业工人。直到 1940 年底，闲在公共租界的收容所里还有 16000 多难民等待就业。就是这些在业工人，实际工资却在不断下降。以当时获利较丰的棉纺业申新九厂为例：

申九纺部工人日计实际工资的下降

（1937—1940年）　（指数：1936年＝100）

年份	每人每日平均工资（法币元）	工资指数（每人每日平均）	工人生活费用指数	实际工资指数	每人平均产值指数	实际工资指数与平均产值指数之比
1937	0.468	116.42	119.08	97.77	102.63	95.26
1938	0.479	119.15	150.62	79.11	135.24	58.50
1939	0.626	155.72	197.52	78.84	130.55	60.39
1940	1.023	254.48	428.35	59.41	136.96	43.38

（据《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 342 页资料编制）

至于全市工人实际工资水平则更低：

上海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

（1937—1940年）　（1936＝100）

年　份	1937	1938	1939	1940
货币工资指数	84.83	92.38	119.09	242.47
工人生活费指数	118.15	152.90	203.25	438.22
实际工资指数	71.80	60.42	58.59	55.33

（据巴尼特：《经济上的上海：政治上的抵押品》，第52—53页）

但是回到沦陷了的故乡必然是冻馁而死，只有忍受严重剥削尚能苦度岁月，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市场，为孤岛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四，大量资金的集中。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曾两次下令限制提存，防止了资金的外流。在上海战役前后，华商企业的资产大量迁入租界。战前向国外订制的设备，陆续交货抵沪。沪宁、沪杭沿线的工厂也相继迁入。不断扩大的战区中的富有阶层来上海避难，携来不少游资。由于孤岛上海的相对安定，形成内地资金大量流入，据上海银行界估计，1939 年 1—9 月，每天收到内地汇款平均有 20 万元之多；从重庆汇上海的汇水从 1938 年的 25% 上升到1939 年的 35%。欧战爆发引起对冻结资金的担心，也加强了英领地资金的向沪流动，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年度报告估计，1939 年仅从香港流沪资金就有 1 亿 5 千万元；随着日军的加紧封锁和英国的妥协，1940 年夏，香港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估计又有 1 亿 5 千万元调沪。资金的如此大量集中，也为孤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五，市场需求的增长。租界人口的猛增，沦陷区工业的被大量破坏以及日本国内经济的转入战时体制，对日用工业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内地也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向上海寻求商品。欧洲局势的紧张，特别是欧战的爆发。英法等国无暇东顾，东南亚市场的需求也转向上海。例如上海向东南亚出口，棉纱从 1936 年的46209 担，到 1940 年的 127917 担，增长了 1.78 倍；纱袜从 1937 年的 470985 打到 1940 年的 2763943 打，增长了 4.87 倍。

由于上述种种条件，孤岛经济在萧条萎缩中，逐步复苏，并走向发展。据工部局的统计，1935 年底，公共租界内，共有工厂 3421 家，雇佣工人 17 万余人。其中百分之六十在东区。1938 年 1—4 月，在公共租界（除东区）新设工厂 560 家，至这年底，工厂总数猛增至 3879 家；雇佣工人从战前的 98000 人增至 155000 人。再加上已被日寇控制的东区 830 家，雇工 82000 人（绝大多数是日商和外商厂），无论是企业数还是雇工数，都已超过战前。而分布地区却集中在孤岛的西区、北区以及越界筑路区，有不少小厂就挤在里

弄居民的住宅之中，使原已拥挤的租界更加拥挤不堪，房地产业随之大为兴旺。从电力公司供应工业用电来看，到1939年下半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到了1940年4月，甚至超过了历史纪录。

在工业的复苏中，最显著的是棉纺织业。在1939年新设的纱厂就有9家。棉纱不仅畅销内地和南洋，而且成为投机囤积的筹码，工厂可以出售栈单以牟利，因而利润大增。申新二厂，1938年获利272万元，利润率达52.61%；申新九厂，这年获利692万元，比1937年增长了二至四倍。英商怡和纱厂的盈利也从1937年的271万元上升到1938年的618万元。其次，是缫丝业。上海原有丝厂多在闸北，在战火中几乎全毁。由于国际市场的价格高昂，至1938年底，在西区已有45家。生丝出口从1936年的1,303吨上升到1939年的2,528吨。

在对外贸易方面，1937年上半年，上海的进口占全国的60%，出口占52%；至1940年上半年，上海的进口仍占全国的40%，出口占68%。仍然保持着外贸的中心地位。外国来华船舶吨位中上海所占比重，则由1936年的35.83%上升到1939年的50.33%，这是由于广州、汕头、福州等港被日寇占领、封锁所致。

孤岛上海的经济复苏，总的来说，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它的优点是根据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转变快，适应性强；但企业设备大都简陋，技术落后，经济力量也薄弱。从行业组成来说，也以轻纺工业为主，五金机械以至化工工业也大都为轻纺工业服务，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基础工业。尤其是原料、燃料，大都依赖进口，运输也靠外轮。它面临着外商企业特别是日商企业的竞争和吞并。这一切是畸形的孤岛经济的殖民地特征。

孤岛经济的畸形状态，还在于游资过多，投机盛行。孤岛上海在日寇的加紧封锁下，原料和运销的困难日益加深，欧战爆发以后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人心动荡，于是从1940年下半年起，工业生产开始逐步下降。而社会游资大量集中，据上海《银行周报》1940

年6月的估计，社会游资达3—4亿元，银钱业又无法运用，曾经实行降低利率以应付；这些游资首先是随日寇以法币套购外汇之风，争购外汇、黄金、外币；其后，公债、股票以至房地产等等，都成为投机之标的；与此同时，游资还进入市场，囤积商品，几乎所有商品，都成为囤积的筹码，尤其是棉花、棉纱、棉布以及大米、原煤等，更为热门。疯狂的投机囤积，形成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局面，这又引起了工商业和银钱业都投入了投机囤积的阵营，于是物价狂涨，一般老百姓叫苦连天。

在此期间，还有货币混乱，恶性膨胀。在孤岛上，除了法币以外，还有"日本军用票"、"华兴券"以及"中储券"流通。"军用票"是日军用刺刀在华中强迫搜购物资所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在日本国内以至中国的东北地区都不能使用，只能在华中地区使用。到1940年6月，在华中就有6亿元"军票"在流通。"华兴券"是日伪在1939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华兴商业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与法币相对立，稍后又规定每元等于英币6辨士，支付关税、地方税和日管区房租，均须使用此券，强使法币贬值。但是这种"华兴券"为孤岛人民所拒用，因而流通量不过600万元。"中储券"是汪伪政府在1941年1月成立的"中央储备银行"所发行的"新法币"开始时与"老法币"等值流通。它的发行权控制在横滨正金银行手里，以军事政治力量强迫推行。目的是以此套取法币与重庆政府开展货币战，破坏重庆政府币制信用和它的战时财政，搜括物资和外汇。法币本来因通货膨胀而在不断贬值，再加上那些强迫使用的日伪币大量流通，就更加助长了重货轻币的心理，与投机囤积之风相互激荡，造成了物价的不断上涨。上海主要商品趸售物价指数从1937年6月到1941年12月。上涨了约十五倍，亦即币值从1元降到6分3厘了。

孤岛形势的相对稳定、对外渠道畅通、廉价劳动力供过于求、资金充沛、市场需求孔殷等等这些特殊条件，使孤岛的工商各业，

一片看好，巨额利润刺激消费，消费增长又促进了生产，再加上买空卖空、囤积居奇的兴起，更进一步加剧了孤岛的畸形繁荣。而这就使贫富悬殊，更见突出。因战争而倾家荡产者固比比皆是，但大发国难财者也日见其多。有钱人凭借孤岛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歌台舞榭，酒绿灯红，孤岛成了他们纸醉金迷的世界。至于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则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下降。有职业的尚能勉图温饱；失业者，特别是那些已被遣散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吃尽当光之后，只有坐以待毙。据工部局年报，在公共租界内马路上的无主死尸，逐年猛增：1935 年 5590 具，1937 年 20746 具，1938 年 101047 具，1939 年 110173 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孤岛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至于走出孤岛，所见到的则是满目战争创伤，百业萧条，日寇肆意烧杀掳掠，饿殍盈野的人间地狱。

三、转变策略 保证坚持抗战

1937 年 11 月 13 日，上海英文《泰晤士报》刊出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惇谈话：“工部局当以全力维护租界之中立地位；同时，吾人亦须将激烈团体使之入优美之秩序，其中尤以各种反日宣传品为最甚。”这就显示出租界当局将限制甚至取缔抗日活动。孤岛人民的抗日斗争，必须迅速转变策略，改变形式，才能坚持长期斗争，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当时上海抗战刚刚结束，3 个月的抗日热潮尚燃烧在上海人民心中，特别是许多进步群众及其领袖还缺乏思想准备，习惯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能适应时局的变化。鉴于这样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立即调整策略方针，确定工作转变的措施，以保证孤岛奋战的进行。

首先是改变组织形式，使群众工作合法化、公开化、社会化、群众化，把各个抗日救亡团体、战地服务团等组织形式，改组为公开

合法的联谊会、俱乐部形式。这种组织在国民党机关或工部局办过登记，取得公开合法地位；成员中有上层经理、知名人士的支持和掩护；公开宗旨和活动内容是开展正当文化娱乐，联络感情，切磋学术研究，适合群众的需要，团结教育更多的群众。早在1936年，洋行华员俱乐部和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创造了这种形式积累了活动经验。1938年初，江苏省委推广这种形式，在各行各业中发展联谊性质的团体，广泛发展会员。先后成立的有：益友社、中法校友联谊会、印刷业联谊会、职业妇女俱乐部等，洋行华员俱乐部改名为华联同乐会。这种联谊团体发展很快，会员达到上千人以至近万人，影响很广。与此同时，开办劳工夜校，并通过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神州职业夜中学等团结教育工人、店职员和部分学生。在联谊团体和职工学校中并开展戏剧、歌咏等文艺活动，举办义演、义卖、捐献等。这就把各行各业以至社会上分散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对教育群众，团结中上层人士，开辟和掩护党的组织，都起了积极有力的作用。设在浦东大楼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还办过四期现代知识讲座，讲授马列主义和文艺、法律等知识，进行时事形势教育。参加学习的不少青年，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当时有“上海抗大”之称。神州职业夜中学，曾举办两期无线电收发报训练班，将学员输送到新四军工作。至于劳工夜校，当时发展到200—300所，参加读书的职工达数千人，他们学文化，求进步，办一所夜校等于办了一个工会。

在迅速发展联谊团体、职工学校等外围团体的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及时转移工作重心，使救亡运动深入基层。他們把工运工作重点放到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公用事业、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厂企业以及敌人的军工生产和经济要害部门中去；把党的发展重心从下层穷苦职工转移到在单位中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工人和职员中，利用他们在技术、文化、经验、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与上层人士

的联系等方面的优势为党工作；在地区上，有步骤地从原来的沪东、沪西扩展到吴淞、江湾、浦东、南市以至龙华等富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经过艰苦努力，在全市纱厂、造船、机器、印刷、绸厂、烟厂、橡胶以及六大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中，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工委系统的党员从抗战初期的几十人，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已发展到750人。职委系统在银行、洋行、海关、百货等方面的工作，也深入发展。党员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党的力量大大增强。这些隐蔽在产业和基层企业中的力量，是党领导抗日斗争的扎实基础，也为面对一旦日寇进入租界如何开展新的斗争进行了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在极为复杂的孤岛环境中坚持抗战，进一步加强了统战工作。中共组织了各种聚餐会，如上海各界有实力的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的"星一聚餐会"、与各救国会领袖联系的"星三聚餐会"、工商界著名人士的"星二聚餐会"等等，通过聚餐会，掩护共产党同上层人士的联系，宣传党的主张，交流情况，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江苏省委把统战工作深入到各行各业、各种活动中。如通过联谊团体把各行业的巨子、社会名流与工部局华员争取过来，通过慈善团体与宗教界团结起来、学生界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把上层人士争取过来，并开展一部分国际友好人士的工作。上层人士的支持，促进了职工、文化、学生工作的广泛开展；许多爱国人士掩护了党的机关和干部；通过上层统战关系，还打入敌伪和国民党机关，进行情报与策反工作。即使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统战政策。例如1939年以后，物价飞涨，一部分不顾大局的资本家加重剥削，工人生活困苦，劳资纠纷增多。面对这样的矛盾，一面要维护职工利益，同资本家作适当的斗争；一面仍然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教育职工顾全大局，尽量通过谈判解决劳资争议；即使发生罢工，也采取克制态度，及时求得解决。以抵制汪伪工会的乘机而入。

改变组织形式、转移工作重心、加强统战工作，根本目的是领

导孤岛人民坚持抗战。

在孤岛如何进行反日伪斗争，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中，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及重要的工商业区域中，不必有什么特殊举动，应埋头苦干，而不要虚张声势①。在抗日情绪高涨的上海，并不是所有进步分子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长期隐蔽方针的必要性。日寇扶植起伪维新政府后，企图通过这个汉奸政权来接收租界中的海关、邮局、法院等机构，于是爆发了护关、护邮等反日伪斗争。5月7日，海关职工在地下党支部提出的"反对英日协定，不与敌伪合作"、"保护海关主权"、"反对悬挂伪旗"等斗争口号的鼓舞下，举行了维护海关主权反对伪政府接管的政治罢工，宣布成立"上海海关华员护关会"，发表宣言，要求各界声援。全市职业界、学生界等各方面立即纷纷发表宣言，予以支援；各报并为此发表社论。声势浩大的护关斗争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凶焰，伪关长李建南很久不敢上任，日籍关员在一个时期内也不敢上班，连接收邮局也搁置下来。护关斗争开展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上海设法结束护关斗争，指出要说服自己同志不要因为群众中抗日情绪的高涨，用无望的冒险行动来代替目前环境的具体分析②。果然，日伪不久就采取恐怖手段，先后绑架了税警杨汉龙和帮办张鸿奎；英籍税务司罗福德屈服于日寇压力，借口"海关职工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下令解散了"护关会"。迫于形势，海关职工于9日复工。其后，罗福德又把在护关斗争中暴露的37名积极分子，调往其它口岸，分散海关中

① 张承宗《抗战八年的上海地下斗争》，载《抗日风云录》(上)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张承宗《抗战八年的上海地下斗争》，载《抗日风云录》(上)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的进步力量，护关斗争遭到了挫折。从此，孤岛反日伪斗争，不再采取全市规模的形式，转入灵活分散的不同形式。例如日伪经常租用出租汽车绑架爱国人士，偷运私货，他们害怕暴露真相，就杀害司机以灭口。1939年3月上半月，先后杀害了3人。祥生、云飞、泰来、银色等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表宣言，拒绝出车虹口；并于3月20日，驾驶挂着花圈挽联的百余辆出租汽车尾随灵车，后跟1000余人的送殡队伍，手举"民族共愤"、"勿忘报仇"等横幅，从大众殡仪馆出发，在公共租界最热闹的马路上缓缓行进。这种"大出丧"，实际上是一次特殊形式的示威游行，控诉日伪暴行。

孤岛人民坚持抗战，突出表现在积极支援新四军。

上海各界人民以献金、义演、义卖、节约救难、征募寒衣等形式，筹款支援新四军。在献金运动中，各行各业的职工每月少则一、二角，多则一、二元，在2—3年中，总计献金30余万元。征募寒衣运动成绩显著，参加者逾10万人，征募总数达92万元。节约救难运动，由各银行、各报馆代收，仅《译报》馆代收的捐款即有17万8千余元。这些很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支援新四军抗战的无限热情。

上海人民还千方百计为新四军输送物资器材。1938年冬，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募集了龙头细布7000匹、胶鞋40000多双和大量药品，通过上海地方协会，分出细布3000匹、胶鞋20000双送给第三战区的顾祝同的部队外，其余设法送给了新四军。中共上海地下党职委，协助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配备一批秘密交通员，帮助建立采购物资的联络关系。皖南事变后，还成立了中国药物建设公司、振兴贸易公司等工厂行号，采购药品、布匹、五金、颜料、日用品以至无缝钢管、柴油机、无线电器材等物资，通过各种关系，冲破重重封锁，支援苏北、苏中和淮南等地的新四军。新四军的印刷厂、医院的设备器械都是上海输送去的。

同时，大批职工和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投入抗战。上海除了曾输送难民1000余人参加新四军外，抗战头两年中，就有5000余职工到各根据地参加军队和生产。百货业职工中有中共党员200余人、非党进步职工400多人参加了新四军。印刷系统有100多名党员、100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去根据地，对印钞、出版事业作出了特别的贡献。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就是以上海工人和青年为主体组成的。同时，还有不少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新四军，开展文艺宣传和教育工作，有些报刊从社长、编辑、记者到漫画木刻人员，都是上海去的。上海各界人民的积极参加，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根据地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许多人锻炼成为革命干部。

1938年12月和1939年2月，上海各界人民派代表，先后组成了两个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表达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爱戴和敬意，受到了军部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一部分慰问团成员便参加了新四军。一部分成员回沪后就分头向各界汇报见闻和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并组织报刊报道。慰问团的活动，鼓舞了部队的斗志，也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孤岛的抗日救亡工作。

新四军肩负着“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重任，是华中抗日游击战的中流砥柱，也是孤岛人民的有力依托。上海人民的积极支援，使上海成为新四军财力、物力和人力供应的一个重要基地。人民和人民军队、沦陷区和根据地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狠狠打击了敌人。

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上海郊县开展敌后武装斗争，配合全国抗战。

上海各郊县相继沦陷之后，乘日寇立足未稳、兵力不足之际，郊县人民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但鱼龙混杂，有爱国人士、有国民

党、也有流氓土匪，各自掌握着武装，情况复杂。中共江苏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在1938年初，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上海附近各地区的游击战争，多次派出不少骨干力量分赴各处，先后成立了浦东、青浦、嘉定、崇明等地的工作委员会，领导各县的抗日武装。这些武装多次袭击日伪军，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1938年8月，青浦自卫队集中常备队员300余人、后备队员1000余人联合行动，一晚上拆毁、烧毁青沪公路上从八号到十八号的十一座桥梁，使日军交通中断，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就是一例。1939年5月，陈毅遵照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派第六团三个营，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番号，从茅山出师东进，6月，到达嘉定、青浦。“江抗”与当地部队会合后，在嘉定、青浦地区，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袭击，并连续消灭了不抗日、只扰民、专搞反共磨擦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几个顽劣部队，缴获大量的枪枝弹药武装自己，取得了辉煌胜利。在奔袭时，曾到达七宝、虹桥飞机场一带，影响甚大，敌伪震惊，上海市民奔走相告，信心大增。1940年春夏，日军调集重兵，对青浦、崇明等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江苏省委决定青浦、嘉定的工委和部队转移到苏常太根据地，崇明工委和部队北移启东、海门地区，划归江北特委领导。

1940年5月，江苏省委决定将外县工作委员会移交给新四军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在东路军政会领导下，改组浦东工委，浦东部队陆续发展到四个大队、四个教导队，建立淞沪中心县委，以青浦和昆山的武装为基础。组建青昆支队（又名淞沪游击支队），活动在淀山湖地区。1941年3月，青昆支队一部，遭“忠救军”袭击，损失严重。其后，“忠救军”进一步与日寇勾结，夹攻淀山湖地区。淞沪支队和中心县委奉命撤离，再度转入秘密活动。与此同时，浦东部队也面临严重的“清乡”形势，浙东沦陷，出现了发展武装斗争的有利形势，浦东主力奉命陆续开赴三北，开辟浙东根据地。1941年5月，中共江南区委成立，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淞

沪中心县委扩大为路南特委，加强上海周围的工作。

1942年7月，上海郊县（除崇明）工作，改由浙东区党委统一领导，路南特委改为浦东地委，下辖浦东、浦西、浦南、嘉定、海北5个工委。9月开始，日伪以重兵对浦东地区进行“清乡”。浙东区党委命朱亚民率精干武装重返浦东。经二年的艰苦游击，终于粉碎了“清乡”，浦东淞沪支队得到了发展壮大。浦西也重建了3支小武装，在青昆地区打击敌人。1944年底，浦东地委改为淞沪地委、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转以青浦观音堂为活动中心。原浦东部队整编为3个大队，原浦西部队整编为3个中队，继续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伪，迎接抗战的胜利。

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与新四军东进部队相结合，坚持游击战争，在牵制、打击日伪力量，支援华中、浙东根据地和配合上海城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郊县抗日游击战争，是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华东广大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上海城乡人民相互配合、互相支援、艰苦斗争的辉煌胜利，也是无数先烈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光辉历史。

四、新闻出版和文艺界坚持斗争

上海沦陷，大量的文化界人士北上延安或西去武汉、重庆。留在孤岛上的文化界爱国人士，立即投入了更加坚韧、更加艰苦的斗争。他们在孤岛上海树起了正气的旗帜。

报纸是发行最广泛、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影响最大的宣传阵地。11月29日，日本侵略者强行接收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在公共租界的新闻检查机构。12月13日，又通过工部局通知各华人报馆必须向所谓“大道政府”的“新闻检查所”送检，否则不准出版。这时，《救亡日报》、《立报》、《时事新报》、《民报》等已停

刊撤退，面临是否接受检查的是《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报》等几家。《申报》和《大公报》采取义不受辱、宁为玉碎的立场，于14日分别发表《告别上海市民》和《暂别上海读者》，宣告停止出版。接受日伪检查继续出版的，有《新闻报》、《时报》和经过改组的《大晚报》。这些送检报纸，大都是委屈求全，与敌办报纸、甘心附逆的汉奸报纸有所不同，有时在字里行间还透露出一些抗日信息。

洋商报纸，日伪无法管制，尚能照常出版，与日伪报纸相颉颃。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美商《大美晚报》。该报原为英文，后加出中文版，它站在正义立场上，不断揭露和挞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在上海抗战期间，还出版了该报记者实地拍摄的《上海不宣之战》和《中日战争史迹》两本影集，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无情揭露日寇兽行，受到读者的欢迎。1938年初，还一度加出《大美晨报》，加快消息的传播。日伪对《大美晚报》的严正立场，既怕又恨，采取了卑鄙的暗杀手段。首当其冲的是该报副刊《夜光》的编辑朱惺公。朱惺公，原名松庐，江苏丹阳人，父亲是个穷中医，本人自学成才，1938年2月，进《大美晚报》社当副刊编辑。他在《夜光》版连续发表《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忠奸对比，爱憎分明。敌伪恨之入骨，向他发送附有子弹的恐吓信。1939年6月20日，朱惺公在该报，发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庄严宣告："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字字掷地作金石声，浩然正气，大义凛然，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气节。2个月后，8月30日下午，朱惺公在寓所附近遭暴徒枪杀，年仅39岁。身后家徒四壁，景况凄凉。朱惺公的牺牲，重于泰山，给孤岛

人民以深刻教育。几天之内，家属收到各界人民表示慰问的邮金20000余元。其后，《大美晚报》馆的发行人张似旭、国际版编辑程振章、副经理李骏英也先后被害。

在孤岛上海。还出现一批"洋旗报"。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为了适应当时的客观条件，高薪聘用英美人当发行人，总编辑，向英、美领事馆立案，打出"洋商"旗号，以避免送检并得以公开与日伪对抗。

1938年1月21日，首先出版的"洋商报"是《每日译报》，这实际上是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和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先后由夏衍，梅益、恽逸群、戴平凡、杨帆、王任叔主编。开始，大部选用外国通讯社稿件，故名"译报"；其后，才逐步刊用自编稿件，与日伪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每日译报》社还出版《译报周刊》和《公论丛刊》，充分发挥战斗作用。

接着，《文汇报》在25日创刊，由《大公报》馆派出部分未撤退人员参加筹备和工作，徐铸成主持笔政。其后还有中共领导的《导报》出版。《译报》、《文汇报》、《导报》的言论，不仅与日伪报纸相对立，而且也不同于《大美晚报》的中立立场，它们以鲜明的旗帜，犀利的笔锋，直指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因而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被誉为孤岛的三枝花，为我国近代新闻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们在短短几个月里，发行量大增；特别是《文汇报》，发行量超过了老牌的《新闻报》，居全市报纸之冠。《文汇报》报馆也不断遭到日伪的袭击，从送有毒水果、肢解人手，以至安放投掷炸弹。但这些恐怖活动从反面激励了从业人员的斗志，继续坚持出版。

1939年5月1日，两租界当局在日寇压力下，宣布取缔租界内"一切政治活动"，公开压制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10日，工部局借口"抗日言词激烈，影响租界治安"，罚令《译报》，《导报》，《文汇报》和《大英晚报》停刊一周。可是一周后这四家报纸都没有复刊。原因是雇佣的英籍发行人都不愿再干，显然这是由于英国政府对

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绥靖政策。但挂美商旗号的"洋商报"尚能继续出版。如1938年10月10日复刊的《申报》，11月1日创刊的《中美日报》，1940年9月20日创刊的《正言报》以及《新闻报》，《大晚报》挂的都是美商招牌，这说明了日美关系的微妙，当然坚持正义的美国人不畏强暴也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国报人则为了继续出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美商"报，也几乎全都遭到日伪特务的不断袭击。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褒奖的殉难报人，上海即达15人之多。

孤岛时期的爱国报纸在重重压迫和残酷斗争中战斗不息，在传播信息，鼓舞斗志，展示前途和揭露敌伪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出版事业在孤岛时期，也有突出的成就。1938至1939年间，生活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排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国家与革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问题》等6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运送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对传播马列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阿英创办的"风雨书屋"出版《文献》杂志，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文件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王任叔主编的《民族公论》转发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这两个刊物及时向上海人民传播了中共中央的声音，在鼓舞人民抗日斗志上起了重大的作用。由胡愈之、王任叔等出面主持的复社，出版了《列宁选集》、《鲁迅全集》、斯诺的《西行漫记》、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黄镇的《西行漫画》以及瞿秋白的《乱弹及其它》等等。这些进步书籍并由上海流传到大后方，教育读者接受革命思想，收效很大。其中，《西行漫记》不胫而走，影响尤著。

留在孤岛上的文艺工作者，既有老一辈的辛亥革命诗人和著名作家，也有一定数量的青年作者。他们同心同德，利用孤岛的特殊条件，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在民族大义的激励下，即使是鸳鸯

蝴蝶派作家，绝大多数都能保持政治上的清白，在作品中也能反映了抗日的呼声和民族的苦难。孤岛时期文艺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以杂文，戏剧和报告文学的收获，最为可观。

杂文是久居上海的鲁迅运用得最成功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投向敌人的锐利武器，也是教育人民的解剖刀。孤岛时期，继承这个传统的新老杂文作者，与孤岛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良好效果。

孤岛话剧舞台也出现过一段时期的空前繁荣。这是因为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演出产生强烈共鸣，得到鼓舞，人们喜爱这种艺术形式，而话剧演出较为分散灵活，不似电影需要巨额投资和制作时间较长而又易于被扼杀，所以宣传抗战、鼓舞斗志的话剧在当时风起云涌，盛况空前。

当时活跃于上海的剧团有原十二演剧队成员组成的“青鸟剧社”和“上海剧艺社”，中国旅行剧团、中法剧艺学校、大钟剧社、华光戏剧学校等。演出的剧目有反映上海现实的《夜上海》以及借古喻今的《海国英雄》等，还有不少后方创作的剧目，也在“孤岛”上演，如《妙峰山》、《蜕变》、《上海屋檐下》、《心防》等。在蓬勃的专业话剧活动中，业余话剧演出与专业剧团并肩前进，社会各阶层，如学生、洋行职员、店员、宗教界人士甚至舞女，都纷纷演出反映自己生活的戏剧。在这种形势下，剧本创作繁荣，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历史剧，在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鞭挞卖国求荣以及号召人民团结御侮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深受孤岛人民的欢迎。除了话剧外，其它戏剧也有发展，例如周信芳演出《明末遗恨》，《文天祥》盛况空前，为爱国群众所喜爱。

孤岛文艺的第三方面重大收获在报告文学。1939年，柯灵主编的《大美报》华文版副刊《浅草》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介绍延安文艺活动的通信，在当时当地是空谷足音。各报刊关于大后方以及各个战场的报道，在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

尤其是1939年3月，通过《华美晚报》社、由林淡秋、戴平凡、梅益和杨帆等编辑出版的《上海的一日》，从两千余篇400万字的应征稿中编选出100万字的报告文学文集，全面反映了上海各个方面的现实生活，是一幅规模宏大的社会画卷；同时也如该书编者所说，“证明上海文艺界底层蕴藏着无限的潜力”。

此外，孤岛的文学期刊也是一个重要阵地，它与报纸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茅盾、楼适夷主编的《文艺阵地》。当时茅盾在香港，作者大都在后方，而印刷发行却在孤岛上海。从稿件、编辑到印刷发行，要从后方、香港、上海间通过重重封锁，来回往复，但半月一期，从未脱期，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1940年始迁往重庆。这奇迹般的成绩，反映了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紧密配合，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利用文艺形式与敌伪进行坚决斗争，从而发展成长起来的孤岛文学，与大后方文艺、解放区文艺相呼应，共同组成当时中国文艺的全局。

五、上海伪政府和“七十六号”魔窟

日本帝国主义始终以其“以华制华”的原则，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来统治人民，而自己则在幕后控制指挥。

国军西撤之初，12月5日，上海浦东东昌路就出现了“上海市大道政府”，挂出中有太极图的杏黄旗，“市长”苏锡文，福建厦门人，早稻田大学毕业。苏锡文曾任福建省政府财政局长、广东大元帅府财政署长兼民政司长。“华北自治”时，苏锡文北上投敌，任兴中公司嘱托(顾问)。1938年3月28日，日军扶植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28日，伪大道市政府改称“督办上海市政公署”，受伪维新政府管辖，改挂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10

月16日，“督办公署”又改组为“上海特别市政府”，迁江湾市府原地址，由傅筱庵任市长，苏锡文改任秘书长，日本人甲斐弥次郎任顾问。傅筱庵，字宗耀，浙江宁波人，曾任日清轮船公司买办、上海总商会会长、招商局办事董事，中国通商银行总理及董事长、汉治萍公司副董事长等职，自恃一贯亲日，妄想当了“市长”，总能名利双收。事实上傅的一切行动都须征得顾问的同意，绝无自由。傅原想安排几个亲信当僚属都不可能，只派得几名参议，连“侍卫长”也由日人指定。傅曾对其亲信说：“我每月薪水公费收入为2000元，只够用来敷衍日本海陆军军官和浪人，有时还得赔本”，哀叹“我现在是骑上虎背，由不得自己作主了。”①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取代了“维新政府”，于是又挂起带黄尾巴的“中华民国”国旗。10月11日，傅筱庵被刺毙命。11月20日，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出任“市长”，1941年8月，成立“上海市保安司令部”，陈又兼任保安司令，并辖奉贤、南汇、川沙、太仓、嘉定、青浦、昆山、崇明八个县的保安大队。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任命周佛海兼“市长”。1945年1月15日，周佛海就任，并兼警察局长、保安司令等职，罗君强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等职，主持实际工作。

“大道政府”与“督办公署”，是傀儡政权，全由日寇操纵；而由汪伪集团两个主要头子领衔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同样是傀儡政权，不仅有日籍顾问，各局还有日籍局长，进行操纵和监视。这种傀儡政权，就是由汉奸出面，在主子的监督下，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者压迫和掠夺沦陷区的老百姓。

面对孤岛人民的抗日活动，日伪穷于应付，便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去镇压爱国人民。同时，国民党有不少特工人员潜伏上海，任务之一便是锄奸，对甘心附逆、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加以剪除。在

① 《傅筱庵》，《民国史人物传记》第十一辑。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伪和国民党特工人员之间开展了一场“特工战”。敌伪汉奸走狗的惨无人道，横行不法，令人切齿。

日伪在孤岛上海的特务活动，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海沦为孤岛开始，到1939年2月为止。这一阶段日伪特务的主要组织“黄道会”，是青帮流氓常玉清在日军直接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常玉清是个老牌汉奸，“一·二八”战争时，就曾参与组织“闸北地方维持会”，充当日寇的走狗；上海沦为孤岛，他又组织一批地痞流氓于1938年2月在虹口成立“安清总会”，“黄道会”就是这个“总会”所属专事暗杀、绑架和爆破等恐怖活动的特务组织。这个组织成立后一年左右时间内，在租界的电线杆上悬挂人头，威胁抗日人民；向《文汇报》经理部投掷炸弹；刺杀爱国教育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拒绝出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长），制造种种恐怖事件。国民党特工人员，先后杀死了出任伪职的陆伯鸿、周凤岐、俞模、唐绍仪、陈箓等人。1939年8月，常玉清本人亦遇刺毙命。

日伪特务活动的第二阶段，大致开始于1939年初，到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租界止。特务组织的首恶分子为李士群、丁默邨，总部即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魔窟。

李士群，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投靠国民党，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国民政府西迁，他奉命潜伏南京，出于政治野心的驱使，再加上情妇（名为女佣，实为日本特务）的勾引，于1938年下半年逃往香港，经日本驻港总领事介绍来沪，在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领导下为日本人搜集情报，又利用旧关系，拉了一批与他沆瀣一气的国民党特工人员落水。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艳电”，公开投敌，以“和平运动”为幌子，进行卖国勾当。他们看中孤岛能与各方接触，进行各种活动，认为是从事“和平运动”的理想基地。可是孤岛人民的抗日讨汪斗争却如此高昂，日本侵略者深感要有一支原国民党特工人员组成的特务队伍，

命李士群策划其事。李士群知道凭他的资格、地位显然不够，便建议邀请他的原直属领导、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的丁默邨来主持，自己甘居副职。丁默邨当时正郁郁不得志，在昆明“养病”，经李士群派人去专程邀请，也就欣然投敌。

在日使馆的引领下，丁默邨、李士群谒见了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送呈《上海特工计划》。经过研究，日本大本营于1939年2月10日，正式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三月份以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枝，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①。从此，一个由日军大本营直接领导、晴气少佐坐镇指挥，无恶不作的特工总部正式形成。根据大本营的训令，这个特工组织的活动，必须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5月6日，汪精卫一伙来到上海，8日，住进土肥原公馆。在日本侵略者策划下，汪精卫与丁默邨进行商谈，达成联合行动的条件：承认丁、李的特务组织是汪伪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经费由汪精卫供给；在即将成立的伪政府中，分别授丁、李等以内政部长、江苏省主席等职务。丁、李负责在7月以前，清除上海孤岛上的抗日力量；汪精卫一伙在沪的警卫工作，由丁、李负责。从此，这个由日本侵略者一手组建的特务组织，便成了汪精卫卖国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特工总部”于一九三九年春在日本侵略者的精心安排下，迁入极司非尔路76号。从此，“七十六号”便成了日伪特工总部在上海的魔窟的代名词。他们选定这个地方，是因这里属于租界的“越界筑路”，租界当局只负责马路治安、对马路两侧无权过问。特务在这里作案，只要往路旁弄堂里一钻，租界捕房便无奈他何。正是这种畸形的行政划分，为特务们为非作歹提供了方便。

据当时报纸统计，1939年1年，租界内因遭狙击而死伤的，达

---

① 晴气庆胤《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44人之多（包括被国民党特工镇压的汉奸）。而这一年正是“七十六号”成立的第一年。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七十六号”的滔天罪恶，罄竹难书。上文所述袭击报馆、杀害爱国的新闻工作者不过是其中的一角。这里再扼要叙述几件：

茅丽瑛，中共党员，原为海关职员，后以启秀女中教员身份，主持职业妇女俱乐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7月，在工商界人士赞助下，茅丽瑛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救济难民和支援新四军，遭到“七十六号”的恐吓威胁。她不顾个人安危，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使义卖活动如期举行。由于混进职业妇女俱乐部的日伪特务告密，于12月12日晚，当茅丽瑛步出南京路福利公司二楼会所时，遭“七十六号”特务枪击，身中三弹，送医院抢救无效，于15日逝世。茅丽瑛的英勇牺牲，使上海人民对日伪特务更加痛恨，有2000余人参加了她的葬礼。有挽联写道：“茅丽瑛，有后续者为国努力，死当无憾；刽子手，你杀害了热血同胞，生亦何荣?!”4月29日，中共党员、法商水电公司工人领袖徐阿梅也遭“七十六号”特务暗杀。

1941年1月，日汪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与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相对抗。在这场货币战中，“七十六号”又犯下血腥罪行。“中储券”发行之初，上海的银行、钱庄两公会议决拒绝与“中央储备银行”往来；商店也拒收“中储券”。“七十六号”特务便手持“中储券”前往各大商店购贷，遭拒，即拔枪相向，以武力迫使商店收受。各银行、钱庄也都收到恐吓信，声称如不与“中央储备银行”往来，便要以“最严厉手段”对付。就是这种流氓手段，强使“中储券”流入租界市场。为了维护法币、阻止“中储券”流通，国民党特工人员剪除了几名推行“中储券”最积极的该行人员，袭击了伪中储上海分行。日伪为了报复，更为了确立其“国家银行”的地位，于3月21日深夜至22日凌晨，“七十六号”特务连续制造两起骇人听闻的血案。一是霞飞路江苏省农民银行宿舍中的十一

名职工被集体枪杀。一是极司非尔路中国银行宿舍"中行别业"被包围，两次共抓走中国银行职工128人，作为停止暗杀活动的人质。直至4月7日，才宣布交保释放。24日，设在亚尔培路和白克路的中央银行两办事处，又被放置定时炸弹，炸死15人。4月17日，国民党政府所属上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宣布停业①。

为了篡夺租界法院司法权，1939年11月23日，"七十六号"特务枪杀了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接着，又暗杀了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庭庭长钱鸿业。敌人的残暴，未能使爱国的司法人员屈服，公共租界的法院，一直坚持到孤岛沦陷。

为了夺取沪西越界筑路区的警权，"七十六号"特务还袭击工部局巡捕，打死打伤多人。

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活动，时常枪杀受雇的出租汽车司机以灭口。

至于对工商界人士敲榨、绑架，那更是常事，孤岛人民，是他们可以任意宰割的鱼肉。

在这一阶段，国民党特工人员虽也刺杀了汉奸穆时英、卢荣桂、张啸林、傅筱庵等人；但由于丁默邨、李士群了解国民党特工内情，软硬兼施，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团部、军统上海区、中统上海站等组织先后被破获，不少人投降日伪，为虎作伥，更使"特工总部"猖狂一时；国民党特工人员又力图报复，于是相互暗杀，特工战愈演愈烈。这正适应了日寇"以华制华"的需要。

"七十六号"除了制造血案、绑票敲榨以外，在贩毒、售毒、开设

① 蔡德全、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7页。

赌场等方面，无不为所欲为，毒害了无数同胞。制毒、贩毒，本是日寇的一项财源，并以此麻醉中国人民。至于开设赌场，有人估计上海沦陷期间，受毒害的达50万人以上，倾家荡产的在4000户以上①。“沪西歹土”，是附在孤岛身上的巨大毒瘤，是不见血迹的杀人场。

一提起“七十六号”，孤岛人民无不切齿痛恨，对这伙罪恶滔天的恶魔，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这些疯狂一时的头子，李士群与负责行动的“警卫总队长”吴四宝，都因发展到与日寇利益产生矛盾而被毒毙；丁默邨在抗战胜利后也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① 余芷江《敌伪毒化上海》，见《上海地方史资料》(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第二十四章　租界变成日本殖民地

一、从“维持原状”到“交还”租界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向英美开战。是日凌晨，日军进攻英美在沪军舰，美舰威克号投降，英舰彼得烈尔号被击沉。从此，苟安四年的孤岛局面结束，上海两租界的人民生活在日军刺刀的直接统治下，开始了上海史上最黑暗、最艰辛的年代。



日军进入租界

黄浦江上的炮声，震惊了孤岛人民，租界陷入一片混乱。这天上午，日本海陆军代表各一人，在日驻沪总领事陪同下，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见总董李德尔，要他“协助皇军，照常工作”。至于租界前途如何，日军是否要来接管，已处于交战状态的英美籍雇员如何处理，

……日方无一语道及。工部局要求日方协助行政、治安，以便遵照日方意旨，执行原有职务。不仅公共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依然存在，英美籍职员照常供职，日军还同时通知租界所有司法、报馆、学校以及银行、工厂、商店一律照常工作。

同日上午10时，日军由吴淞江上各桥分头进入公共租界，东起外滩，西至越界筑路地段，所有路口，都设置岗哨。街道上出现"上海方面大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的布告，宣称日军进入公共租界，是为了确保租界治安。中午12时，日军岗哨又全部撤走。一度封锁的吴淞江上各桥梁也同时开放。但日侨如欲进入租界，须得军方特许方可过桥，英美侨民也照此办理，中国人却可自由通行。日军还宣称对"七十六号"的胡作非为，严加禁止；汪伪下令通缉杀人魔王吴四宝，以安抚人心，挽回恶劣影响。

是日上午，"日本支那派遣军上海陆军报道部"班长酒井称奉部长之命，向各报馆宣布：各报应照常出版，所有人员照常工作，



日军封锁南京路

"洋商"名义不必变动，所挂洋旗也不必取下。可是，一小时后，又有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来到山东路、汉口路、河南路、福州路，实行封锁，将这个地区的报馆全行封闭。到了下午，封锁解除，各报馆也一律启封。这种混乱措施，反映了日本陆军与海军的矛盾和政策分歧。经过调停，以虞洽卿路为界，由海陆军分管租界。虞洽卿路以东，属海军管辖，各报馆也属其辖区，因陆军已宣布"照常出版"，便由陆军管理，一年后再交给海军。

当天，各银行已一律停业。日本宪兵大队长国口大佐在国际饭店召见各银行、钱庄主要负责人，一见面就其势汹汹地斥责他们不该利用租界支持法币，拒用中储券。接着又说，他要对各行庄尽保护之责，劝各银行钱庄复业。最后还说，以前种种误会，来自双方隔膜，以后经常见面，就没有什么不能谅解的了。于是各银行、钱庄，一律于10日复业，营业时间照旧；洋商的汇丰、有利、麦加利、大通等银行则每天只许营业两小时。

日军进入租界，尽管出现过步调不一、自相矛盾的混乱，但从工部局、治安管理、报馆到银行的处置，都基本照旧，没有立即采取野蛮行动。工厂、商店，娱乐场所，一如既往开工营业。只有英美洋商企业，由日方派人"保管"，所挂英美国旗一律改悬日本旗。

这是纳粹德国所起的作用。上海法租界当时由法国维希政府管辖。维希政府虽是纳粹德国的盟国，实际上是个傀儡政权。纳粹德国把上海法租界视为囊中之物。而如果能维持公共租界的"原状"，那么它也就能参与管理，分享权力。此外，纳粹德国还出于种族主义的立场，力图避免白种人在黄种人面前过份出丑。因而纳粹德国特使魏特曼，便竭力怂恿其盟国日本不要急于改变租界现状，尽可能一切照旧，以保持"国际都市"的面貌。

日本侵略者的高层领导也看到，照常生产比一切停顿对他们更有利，德国的意见有可取之处，因而决定"维持原状"，利用工部局出面管理，由日军幕后操纵的策略。高层领导的决策，仓促间未

为中下层所掌握，再加上陆海军之间的分歧，由而产生了种种混乱。汪伪政府不知底蕴，更是处处碰壁。

12月8日当天，汪精卫就与侵华日军总司令、参谋长以及公使就日军对英美宣战一事举行会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决定，支持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共命运。汪伪对租界觊觎已久，如今日军开进租界，当然想乘机插手，分一杯羹。汪伪宣传部派人接管报纸，为日本主子的"照常出版"所不容，未能得手。伪司法行政部派人接收公共租界法院，更是闹剧一场。汪伪接收人员赶到法院门前，拿出"部令"与早已把守在那里的日本士兵交涉。日军把"部令"撕得粉碎，丢弃在地。汉奸还想申辩几句，被哨兵喝令滚开。这些乘兴而来的接收人员，连大门也进不去，只能灰溜溜地败兴而归。汉奸们没有想到，他们的主子——日本侵略者要租界"维持现状"，法院也要"维持现状"。他们想成立一个既不属于重庆国民政府，也不由南京伪政权领导，仅听命于日寇控制的工部局的"上海特区临时法院"，甚至想继续留用第一特区法院原院长郭云观和书记长查良鉴。可是这两个人已不敢公开露面，工部局又急于恢复法院，乃由警务处在报纸上发表布告，悬赏1000元，征求两人下落，但无踪影。日本宪兵队却找到了原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徐继震，由工部局加以委任，才恢复办公。这个问题，一直拖到1942年2月，东京大本营提出了"对华政策一元化"，才由伪组织接收了公共租界中的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及最高法院分庭。

奉命"维持原状"的工部局，第二天(9日)就按照日本人的意旨，由总办费利浦发出布告，规定市民不许存储消费量一个月以上的米和煤。第三天(10日)又发布所谓"取缔政治恐怖办法"八条，这是日本人向纳粹德国学来的以无辜人民为人质来制止抵抗运动的办法。主要内容有：如某一地区发生"恐怖事件"(即抗日活动)，该地区就将被日军封锁，禁止出入，该地区的住户代表，将被拘送

日本宪兵队审查惩处等等。接着，办理户口登记、编制保甲、办"自警团"，发"市民证"，举行"恐怖演习"以至限制用电、发售户口米等等一切统治压迫市民的措施，都由工部局公告实行。法租界虽无日军进入，但公董局亦步亦趋，发出与工部局一模一样的布告，唯一不同的只是布告是由法国驻沪总领事马杰利签署的。工部局、公董局发布的这些布告，一次又一次地以事实揭穿了"维持原状"只是个骗局，一步一步的暴露出种种伪善后面的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

尽管工部局已经沦为完全听命于日本当局的工具，但日本人的目的是要独占租界，"维持原状"只是临时措施，英美等籍人士终究是敌国人民，岂容长期"照常工作"。1942年1月5日，离日军进入租界还不满一个月，工部局总董李德尔(美籍)、董事明恩德(美籍)、卜洛克(英籍)、沙卜(荷兰籍)等均被迫辞职。又隔了两个月，3月1日，仅存的总办兼总裁费利浦(英籍)也"自动退休"。6月，存在了90年的工部局武装万国商团被解散。这样，工部局只剩下一块照牌，成了日本人独占的统治机构，实权完全操在日籍总董冈崎胜男和首席副总监渡正边的手里。至于英美等国侨民，那更是从趾高气扬的大人物逐步变成俯首帖耳的囚徒。日军进入租界后，即办理英美侨民财产登记。1942年1月，英美两国成年侨民到日本宪兵队排队登记领取外侨身份证，计英籍男侨2681人、女侨2412人，美籍男侨700人，女侨477人。2月，日本宪兵队宣布在公共租界破获"国际间谍机关"，捕获"间谍"多人，皆在沪英美籍著名人士及部分工部局前任职员，如《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英文《大美晚报》主笔奥柏以及《远东》杂志主编伍德海等均在其内。3月，收缴英美侨民军火、武器，4月，征用"敌侨"汽车，10月，规定"敌性国"侨民年满13岁，均需佩带红色袖章，袖章上以A、B、N、X分别表示美、英、荷兰、其它国籍，禁止他们进入游艺场所，工部局洋员也须佩带红袖章。11月宣布冻结"敌侨"财产。1943年2月，开始把男性"敌侨"

圈禁于浦东"敌侨集中营"。那些带红袖章的雇员进了集中营，工部局就是日人的天下了。

经过一年多时间，"公共租界"已名存实亡。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又导致了一场"交还租界"的闹剧。

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占上风，英美从牺牲中国转为支持中国抗战，以分散日军兵力，减轻对它们的压力，于1942年10月宣布放弃在华特权，1943年1月11日与中国政府分别签订了新约，其它有关国家随后也签订了新约。日本政府于1942年2月18日声明将广州、天津英租界的行政权移交给汪伪政府，但仍抓住上海租界不放。直到12月21日，在英美放弃在华特权的挑战下，特别是战争形势逆转，急须加强汪伪政权以诱降蒋介石集团并取得更多的战略物资，日本政府才决定以交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处理在华敌产等手段促使汪政权参战的方针。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宣布向英美宣战，汪精卫和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随后，意大利和法国维希政府也先后声明，宣布交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6月30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大使谷正之签订《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了解事项》。规定于8月1日由汪伪"收回"公共租界，但汪伪"应依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筑路等地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它之权利利益，并应对此取必要之措置"，对"侨居该地域内之日本国臣民之居住、营业及福祉等，至少应维持向来之程度"①。同日，汪精卫发表谈话，感谢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7月29日，汪伪接收上海两租界委员陈公博与日本公使田尻爱义签署了《上海特别市市政备忘录》，确认收回的公共租界与周围沪西、沪北及(江湾)市中心接近租界部分地区组成"上海特别市第一区"，设立区公署为其行政机构。第一区公署各处处长

①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92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原则上由市政府各局局长兼任，财务、工程、消防三处长得暂由日籍职员充任；第一警察局局长由市长兼任，另设副局长两人，由中日两国籍人分别担任①。

7月22日，汪伪市计部长夏奇峰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参事柏斯颂签订了《上海法国专管租界交还实施细目条款》及《了解事项》。

7月30日上午，汪伪政府正式"接收"上海法租界，特派夏奇峰监收，伪市府正副处长以上官员、公董局中外董事，日本各有关机关代表出席了"接收"仪式。原法租界地区改称"上海特别市第八区"，任命陈公博兼"第八区公署"署长；原法租界总巡捕房改称"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由陈公博兼局长。法籍人员除个别不愿留任外，均按法方"制度及人事暂不变更"的条件，一律加委留任。

1943年8月1日上午，由褚民谊监收，汪伪政府又举行"接收上海公共租界仪式，仍是陈公博兼任"第一区公署"主任和"第一警察局"局长。下午，伪市府召开"上海各界代表庆祝收回租界反英美大会"，汪精卫偕最高顾问柴山出席了大会。

在上海存在了整整100年的租界"收回"了，汪伪政府自诩"中国领土主权从此完整"，又是庆祝，又是感谢，着实热闹了一阵，日本主子和汉奸奴才相互往脸上贴金，以蒙骗老百姓。其实第一区公署也好、第八区公署也好，仍然为日本侵略者所直接掌握。例如"第一区公署"不仅有日本顾问，而且8个处的正副处长中，就有3个正处长、4个副处长是日本人；公署秘书处的7个课中，6个课是日本人担任课长②。上海市8个警察局，都是日籍副局长直接控制。所谓"交还"、"收回"租界，从上述"实施条款"和"市政备忘录"、以及区公署组织安排，都可以看出纯粹是一场双簧戏，丝毫无损于日本侵略者的特权。日本宪兵队在上海的暴行，就是历史见

①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120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②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122—123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证。

日本宪兵队机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始终是日本特务机关公开镇压、破坏我抗日活动和残害人民的杀人魔窟。如果说，在孤岛时期，它还设在孤岛以外地区，主要指使汪伪"七十六号"进行活动，在日军进入租界之后，它的机构已进入租界，并经常亲自动手，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它的总部设在北四川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除沪北分队设在天潼路外，还在法租界的贝当路设立了沪南分队。它们用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一切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火烙、电刑，甚至放出狼狗乱咬，进行刑讯逼供，折磨和杀害我爱国同胞。被抓进去的人，如果不愿当汉奸，那就往往受尽酷刑，即使生还，也遍体鳞伤，或终身残废。但是满怀爱国主义热忱、坚持革命气节的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中共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在被捕后，多能坚持斗争，视死如归。例如文化界的许广平、工商界的姚惠泉、宗教界的圆瑛法师等均曾受刑逼供，仍忠贞不屈。而且经过这样的生死考验，在生还之后，更坚定地投入抗日斗争。日本宪兵队的种种暴行，是完全凌驾于汪伪政权之上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就是那些汉奸也都处在日本宪兵队的监视之下，如有不驯服的，也会遭到追究以至杀戮。这也证明上海已成为日寇独占的殖民地，租界"收回"与否，毫无改变。

日军进入租界，直接镇压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形势更为险恶。早在1941年5月，对于上海党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已有指示，立即将已暴露的党的干部，同情分子中的文化人和基层支部中比较暴露的党员，送往新四军区域。1942年，上海环境更加恶劣，日伪积极破坏我地下党。中共中央又指示取消省委，特委组织，只保留县委；如县委也不能保留，只保留支部，各支部要长期独立地工作，每个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1942年6月，中共印刷区委被破坏，10多个党员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数人先后在狱中牺牲。9月，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破坏，报务员李白被日本宪兵

队逮捕。10月，江苏省委按照中央命令，将省委机关及全体委员转移到新四军军部所在的淮南根据地，工委、职委、学委、文委等主要干部以及一部分暴露的干部也陆续撤退。中共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也同时撤至华中局，旋即转往延安参加整风。1943年初，华中局成立城工部，继续领导上海地区的地下斗争。这时地下党基本采取单线联络、个别碰头的方式进行领导，但仍保持有工委、职委、学委等党的组织。除已撤退者外，1943年约有党员二千人左右。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就是鼓励党员深入基层，在学习上、生产上、业务上起模范作用；努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使党员成为群众领袖和核心，把优秀的群众领袖吸收为党员，使党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得到社会的掩护，真正埋藏在广大群众之中。这正是党在敌占城市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具体贯彻，它保证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日军进占租界之后，未受严重影响、未遭重大破坏，并能不断壮大。日军占领租界后，追捕迫害爱国的知识分子、专家和民族资本家，日甚一日，同时又大肆拉拢，引诱他们为其服务。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保护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有用武之地，上海地下党曾动员他们中大批人去抗日根据地，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本家、银行家。如1943年上海曾动员原南通学院部分师生到江淮地区兴办江淮大学，校长就是上海的著名教育家解放后曾任本市副市长的韦悫。

日军进占租界，使上海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无论"维持原状"还是"交还"租界，都是为独占服务的策略。中共地下组织，及时改变组织领导和工作方针，继续领导上海人民坚持斗争，度过了这段最黑暗困苦的年代。

二、掠夺搜刮"以战养战"

日军开进租界，再次掀起掠夺狂潮。首先是接管"敌性"企业。

英、美、荷、比等国的工商企业、银行、仓库全被接管。据统计，至1942年3月已有82家企业、15家银行被劫夺。为了保存企业而挂了洋商招牌的华商企业也被视为"敌产"而被军管，于是租界内的华商企业，至1942年2月，又有90家被"委任经营"，66家改为"中日合办"，33家被强迫"租赁"，16家被强迫收买。华人存放在洋商银行中的存款、洋商仓库中的货物，也全被冻结，须经许多周折，隔好几个月才能解冻，损失自不待言。

其次是物资的登记统制。日军进驻租界没有几天，就由"大日本陆海军最高司令部"和工部局先后颁布《重要物资申报布告》，规定粮食、食油、汽车、五金、橡胶、化工原料、药品、木材、燃料、颜料、油脂、建筑器材等均须限期登记，"隐匿不报或呈报不实者，依军法处置"。申报期满，有些物资即遭收买，所给代价只是市值的百分之十五①。1942年3月27日，上海日本陆海军司令部布告，规定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麻及麻制品、皮革、橡胶及其制品、木材、矿油、煤炭、工业药品颜料及油漆、油脂及树胶、医药及其附属品、机器及其附属品、米及食粮、铁桶和纸类共18种为统制物资，所有库存，非经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发给许可证，一律禁止移动和使用。在此前后，还组织"上海铁钢工业统制协会"、"华中非铁五金业统制协会"，为其收买五金原料，代价提高至市价的百分之七十五；由中日同业公会合组的橡胶原料、化工原料、皮革等统制协会也纷纷成立，但大多数中国资本家持消极抵制态度，逃避登记统制。为了搜括物资，至同年7月，又取消对五金原料的统制，改为同业间可自由买卖，在自由买卖中，按市价收购。

日军的疯狂掠夺行为，但也遭到中国工商界的种种抵制，如多方要求解除军管发还企业、转移隐匿设备物资、拒绝登记收买等等；再加上日本陷入战争泥淖已久，国内战略物资日益枯竭，而太平洋战争形势逆转，更急于加强掠夺中国被占领区的战略物资。于

① 王卫《上海的五金工业》，《经济周报》一卷四期，1946年。

是，日本侵略者在1942年12月制订《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在政治上加强汪伪政权，促使其对英美宣战的同时，在经济上，“在占领区要重点地谋取重要的战略物资，并积极地获得敌方物资。要促进中国官民积极的经济活动及对日合作，并以此帮助国民政府加强政治力量”①。根据这个方针，经过日汪双方的谈判，日本政府承诺：一、将物资统制权移交汪伪政权，汪伪负责供应日军战略物资；二、迅速全部解除军管理，将尚未交还的军管理工厂交还华方业主；三、中日合办的“国策公司”中与军事无直接关系的得适当调整；四、停止发行新军用票，华中及华南地区统一行使储备券，并积极协助汪伪加强财政，稳定币值。这些问题原是日汪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焦点。日方的承诺，在汪伪眼中是很大的让步。而日方的目的就在于利用汪伪政府力促华商参加官商合作、中日合作，实行经济上的“以华制华”，取得更多的战略物资。

日军侵占华中之后，即由日陆海军机关实行物资统制，严格禁止一切商品自由贩运，汪伪政权根本无权过问。1941年6月，汪精卫第一次正式访日时，提出日汪加强合作调整军需与民用物资统制工作的要求，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8月，日汪双方有关机关组成“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长规定由遣华日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担任。下设干事会由双方机关派员参加，处理具体工作。又规定由日驻华中登集团军高级参谋任干事长，日军总司令部经理部上海第七出张所所长任常务干事。这种日汪合作，全属形式，有名无实，物资统制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日寇军部手中。汪伪参战后，日方同意取消“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将物资统制权移交给汪伪政权，由日汪双方联合设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为华中物资统制的最高决策机关，委员长由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担任，日驻华公使堀内干城任副委员长，秘书长及其干事会总干事均由伪方指

① 转引自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派；并由汪伪政权指派中国工商界有力人士组成“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作为华中物资统制的最高执行机关，在汪伪政权主管部门指挥监督下，负责执行“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审议决定的事项，日本工商界不参加这个上层机构。在“商统会”下设立各种专业统制委员会，由中日双方各该专业同业代表联合组织，负责执行各项统制物资的收购、配给及供应业务。至此，物资统治权，表面上已移交给汪伪政权管理，改变了日军赤膊上阵的局面。

1943年3月11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任命唐寿民为理事长，袁履登、林康侯、吴震修、叶扶霄、江上达等13人为理事，闻兰亭为监事长，周作民、郭顺等5人为监事。同时通过《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规定从3月16日起在沪宁两市及苏浙皖三省实行。12日，日方陆海军当局及驻华使馆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取消陆海军有关长江下游占领区物资移动取缔规定，按照汪伪政权的《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施行，原由陆海军核发物资移动许可证的权限，移交全国商业统制总会负责办理。15日，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正式在上海成立，由汪伪实业部及粮食部共同指挥监督。（5月改属伪行政院直接领导）。“商统总会”的理监事网罗了当时上海有名的工商业家如袁履登、林康侯、闻兰亭等和银行家如唐寿民、周作民等或其代理人。为了拉拢这些上层人物，日本的田尻公使曾亲自出马，但碰了不少软钉子，遭到种种推托。汪伪实业部两个部长多方游说，以所谓“尽可能争取维护华商利益”相拉拢，设盛宴招待请求通力合作，才把“袁林闻”等拉下了水，请来了日本公使请不到的“第一流”人物。汪伪的《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不仅照抄日军规定的18种，并且还把统制物资扩大到烟草、糖、蜡烛及其原料、火柴、肥皂和卷烟等民生日用品。

日寇把物资统制权交给汪伪政府，是为了掠夺更多的物资。“商统总会”成立后，迅即着手组织各种专业统制委员会，直接为日寇掠夺效劳。

"米粮统制委员会"(简称"米统会"),成立于10月1日,由袁履登任主任委员,日方米商代表油谷恭一为副主任委员。日军侵占长江下游地区后,就按照"以战养战"方针,号召各路侵略军"就地自活",禁止粮食自由运销,由日商垄断收购供应军需。但由于战争对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凭借枪杆刺刀限价强购,遭到农民和米商的抵制,以致到1941年,还不能实现"就地自活",不得不继续从日本调运或进口大米以补充军粮。汪伪政府成立后,划区分别购粮,以供军需与民食。"米统会"成立后,仍分甲乙两种地区收购粮食,甲地区即军米区,仍由日方米商负责收购,乙地区为民米区,由华商负责收买。由于收购价格过低,如1943至1944年收购限价每石储备券720元,而市场价格,1943年1月,即为780元,12月已涨至1000元左右,1944年2月又暴涨至2000元左右,各地的消极对抗,再加上汪伪粮食部门与粮商勾结牟利,收购计划难以完成,如1943年10月计划甲乙两地区共收购63万吨,至1944年2月,只完成13万吨;1944年计划收购55万4千吨,实际完成只有25万4千吨。而这25万4千吨大米,必须保证日陆海军的计划供应数22万吨,所余3万余吨,供应汪伪军警尚难满足,沪宁市民的户口米就毫无着落了。可见"米统会"主要为日军的"就地自活"提供了保证,而民食的供应却每况愈下,无法保证。户口米的不断迟配以至停配,市民陷于饥饿死亡绝境。上海市民忍无可忍,于1945年春爆发粮荒暴乱,连汪伪上海军警中也因之发生反日暴动。

"棉花统制委员会"(简称"棉统会")于11月27日成立,由闻兰亭任主任委员,申新纱厂代表童侣青及日方纺织厂代表菱田逸次任副主任委员。和食米一样,1938年起,就在日军直接领导下,日本棉花商组成华中棉花协会包办原棉的收买配给。虽然华中棉花产量从1939年的200万担左右逐年增加到1942年的340万担,但华中棉花协会强迫收买的棉花却逐年剧减,从1939年的190万担降到1942年的120万担。由于原棉不足,日商及被占华商纱

厂的开工率下降到战前的40—50％。这时，日寇又以解除军管为诱饵，拉拢华商，合作收购原棉，企图增加收购量。“棉统会”就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棉统会”组织中日纺织厂联合成立棉花收买同业协会具体负责收购原棉，日商负责江北产棉区的收买，华商负责江南产棉区，在各地建立棉花公库验收和保管。“棉纺会”收买来的棉花，60％交日军使用及运往日本，40％按开工纱锭数分派给中日纱厂。由于华商纱厂在军管期间大量机器设备被代管日商厂擅自拆走，因而在分配额中仅获1/4。可见“棉统会”收购的棉花，九成为日方所得，华商仅得一成。原棉供应不足，再加上电力限制，华商纱厂纷纷减产以至停工。如申新二厂至1944年已经停工，申新九厂1944年棉纱产量只有1941年的4.9％。

此外，还先后成立了“粉麦统制委员会”统制小麦、面粉、大麦、裸麦、燕麦、高粱、玉米及麸皮；“油粮统制委员会”统制食油、油菜籽、大豆、花生及豆类杂粮；“日用品统制委员会”统制食糖、香烟、肥皂、火柴、蜡烛、煤油等日用品，都由中日同业代表组成，中方代表任主任委员，其作用和“米统会”、“棉统会”一样，为日军搜括物资服务。

“商统总会”的成立，貌似日本把物资统制权交还给了汪伪政府，实际上仍聘用日人为顾问，特别是各专业统制委员会，华方委员毫无实权，主要物资完全控制在日商手中；原来直接控制经济的堀内、田尻等人，不愿放弃特权，处处横加干涉，矛盾重重。由此日寇进一步掠夺物资的目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达到了。

至于迅速全部解除军管理和调整“国策公司”的承诺，那更是空头支票。从形式上看，自1940年10月到1943年7月，分13批全部解除军管理，交还华商经营。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有的是在被迫接受“中日合营”（如章华毛纺厂浦东厂与日商合办上章毛绒纺织公司）或“租赁”（如上海水泥厂、申新七厂）条件后才宣布解除军管的，有的企业在解除军管前被搬走了机器设备，有的企

业虽然解除军管，实际上仍是日军用品的加工厂（如毛纺厂代织军毯、毛呢，全部面粉厂都成为收购全部成品或接受加工收取加工费的工厂，不得自销产品），有的虽然宣布解除，实际上仍企图强迫收买，收买不成，仍由代管日厂霸占（如中新一厂、八厂）。总之，这些华商企业，虽然在名义上解除军管，即使幸免吞并，也仍毫无自主经营的权力，再加上原料、成品以至燃料、电力等的统制，维持企业十分艰难。

调整"国策公司"更是敷衍了事。解散了华中蚕丝公司，将江浙两省各地丝厂发还原业主，原来蚕丝主要出口美国，这时已无法出口，无利可图了。改组了华中盐业公司，将日股让与中国方面组成中华盐业公司。仅此而已。其余公司，仍然掌握在日寇手中。

关于停止发行新军票，支持储备券问题，早在1942年3月6日，日本政府就通过《华中通货暂行处理要纲》，规定：（一）对法币进行压迫，使其价值低落。……并考虑禁止旧法币流通的措施。（二）立即废止中储券与旧法币的等价交换，限制旧法币存款，并向中储券存款转变。……（三）使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整顿扩充顾问制度，采取圆满而积极的方法，获得中储券①。从此，日伪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旧法币。到了5月27日，周佛海宣布禁止旧法币流通，规定旧法币以二与一之比兑换中储券。此举不仅是对重庆政府的打击，也使华中、华南沦陷区人民手中的货币和银行存款被夺去了一半，而日伪则把对折换来的旧法币，再设法运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搜购战略物资，掠夺手段之凶狠，实属罕见。《要纲》关于"使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军费及其它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的要求，正是通过"停止发行新军票"实现的。日方借监督之名，由正金银行掌握中储券的发行权，而在停止发行新军票之后，正金银行就无限制地以中储券支

① 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1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付日寇军政机关及商民所需的资金。这样，日寇既可摆脱维持军票价值的负担，又可逃避战后清偿军票的责任，而储备银行却真正成了他们所需一切资金的"调剂银行"，达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寇在1942年末提出新方针，以"加强"为名，作出种种"让步"姿态，以上所述是日寇利用汪伪政权加强掠夺的基本情况。日伪勾结、掠夺、搜括中国人民的方法，还有许多，罄竹难书。再举其要者，以存历史概貌。

强迫收购棉纱棉布，进行公开掠夺。1943年8月9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在沪召开临时会议，以"调节物价、安定民生"为名，议决通过《收买棉纱棉布实施要纲》和《收买棉纱棉布暂行条例》，收买上海市内现存棉纱棉布。"条例"规定：棉纱棉布之所有人或占有人拒绝或妨碍收买时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万元以下罚金，其货物没收之。13日，商统总会收买棉纱棉布上海办事处成立。23日，开始在上海强制收买棉纱棉布。

收买价格，规定：棉纱以20支兰凤纱每件1万元为准，棉布以龙头细布每匹375元为准。付款办法规定：半数按每条(10两)4万元之定价折算，付给中央储备银行黄金特别定期存单，满3个月付给半数，满1年再付给半数，另外半数付给储备券特别定期存单，每半年付给1/6，但满2年时得将余额一次付清。此项特别定期存单非经许可不得抵押或转让。

这种强制收买，是对棉纱、棉布工厂和商店的一次大掠夺。首先，按当时市价，20支兰凤纱每件为4万元，黄金每条为14万元。每被收购20支兰凤纱一件，可得黄金0.125条(1万元×50%÷4万元)，储备券5千元，以市价计共得22500元，(14万×0.125+5千)，净损失17500元，即被掠夺去44%。其次，至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垮台止，那些特别存单，黄金部分已兑现，储备券部分只兑现三期，还有一半成了废纸，这样又损失了应得货款的1/4。再其次，资金被长期冻结，特别是储备券特别存单，须每满半年兑现1/6，

而储备券的购买力迅速贬值，据伪上海市经济局所编“上海特别市趸售物价指数表”① 计算，前三期兑现时，即使包括年息6厘，分别只值1943年8月的44.26％、23.17％、4.20％，这是又一笔损失。至于现货成了“存单”，脱离生产、流通，不能周转贸利，损失就无可估算了。总之，日伪强制收买棉纱棉布，抢走了收买总值的绝大部分，厂商所得大约只有1/5多一点。

纱布是上海的主要商品，也是上海投机市场的主要货物，据日伪物资调查委员会调查，当时上海游资约75亿元，45亿元集中在纱布投机。强制收买棉纱棉布，使那些投机囤积者，倾家荡产，特别那些超过本身资产进行囤积的，无法归还借款，往往住进旅馆服毒自杀。以致那时旅馆对棉纱棉布业的人前来投宿，一律婉言谢绝，可见情况之严重。

通过收买，日伪攫取了纱布40余万件（其中华商20余万件②，日商约20万件③），冻结了资金160多亿，也暂时抑制了物价的暴涨，货主因恐各种囤货被收买而抛出货物。但是日军无限制发行储备券，要稳定物价是不可能的。

横征暴敛，捐税重重。上海除了汪伪政府开征的统税、直接税、印花税、田赋和种种附加、战时消费特税等税种外，伪上海市政府开征的地方捐税，据上海市档案局《日伪上海市政府》编制的“市政府统治期间征收各类捐税表（1938年1月—1945年5月）”共达54种。有些税种到了荒唐的地步，如装用电话要付“电话税”，“侍役外赏捐”在服务员赖以为生的小费上还要搜括2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赌台税、逸园跑狗场娱乐捐、中央运动场（即回力球

①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754—759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② 潘士浩“如何处置坊余纱布”：华商被迫登记棉纱95,754件，白坯布36,110件，加工布131,842件，其后保留29,849件，免除26,712件。见《申报》1946年1月3日。

③ 上海日商所存纱布约20万件，亦被收买，以日本公债券29亿日元一次付清。

场)娱乐捐和跑马税四种赌博税，据估计，日伪在沪西越界筑路区的七家主要赌台，每天就可收入15万元①。1945年1月，汪伪军事委员会还密令在配给烟土时每两附征地方治安特捐五百元②。这和日伪在沪西、南市开设大量赌台烟馆腐蚀人民完全相同。此外还有棉花特税、随田赋带征军警米等名目，尚未列入该表。除了捐税，还有献金、库券等等的搜括。1943年11月，伪市府发动"民众献机运动"，指定同业公会向工商界派认、由"区公署"经保甲向居民"劝购"，甚至规定土行、赌台、妓院也须"自愿缴送"，连分发给每个市民棉布配给证也附收献机捐款③。到了1945年，日伪已面临灭亡。还发行库券、公债，加紧搜括。1月，借口"调整配给米价格""全市各种慈善救济基金"的需要，发行"上海特别市政府三十四年临时救济库券"15亿元，以代替市政公债；7月，又决定发行"上海特别市建设公债"50亿元④。如此种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无孔不入，简直是敲骨吸髓般的横征暴敛，上海人民实在无以为生！

搜括废金属。1942年6月，日寇在沪成立"金属特别回收总部"，除向日侨商民征收外，并通知伪市府、工部局、公董局"加以措置"。伪市府遂即密令社会局"迅拟征收金属办法"。伪社会局于8月16日发出向机关、社团、厂商征收废铁及非铁废旧金属的通告，为日军搜括制造弹壳的原料。伪市府还秘密训令各机关"尽量捐输，广为征集"以"协助军需"。从伪社会局年底呈报的"各界献纳废金属一览表"反映出：交纳废金属的机关18个，社团5个，工厂12个，总计搜括到废金属5吨多，废旧汽车19辆。有的交纳"旧电风扇一只、旧钉书机一只、旧铜墨盒四十七只"，有的交纳"旧圆凳四只，铁水管一根，铅桶二只，铅壶念只"，可见大多是虚应故事，敷衍

①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第131页，New York，1941。

②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751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③ 同上，第680—687、695页。

④ 同上，第741—748、781—783页。

了事①。1943年12月6日，陈公博和日本公使田尻又分别发表谈话，宣布上海从8日起，开展回收废金属运动，双方各自成立金属回收委员会。第一期回收铁类3万吨、铜类5百吨，以及铅、亚铅、钨等②。这次搜括范围扩大到学校、公共场所、街头以及居民家庭。无所不包；并硬性规定工厂、商号视规模大小至少捐献5—30斤、1—10斤，如果拒绝捐献或认定捐献品后延不交纳，将受处罚③。于是原公共租界沿界的28扇大铁门、原法租界马路上800多块铁制路牌，都成了"捐献品"，原汇丰银行门口的铜狮被搬走，甚至马路上的阴沟铁盖也作为废金属被收起。至于居民，弄口以至住宅的铁门，墙上、窗台的铁栅，全被拆走，日本浪人乘机抢走居民的铁锅、铜吊。显然，这不是"捐献"、"回收"，而是穷凶极恶的抢劫掠夺。

招募华工。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伤亡的增加，日军的后备力量日益枯竭，征兵范围不断扩大，武装和使用伪军又心存疑惧。征集更多的兵员，势必使其国内劳动力更加紧张，影响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日本军国主义者除了以妇女替补外，就用华工来弥补劳力之缺乏。日寇在华强拉劳工，是其惯技。在上海这样人口稠密、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强拉有所顾忌；而上海工人有技术优势，于是它就使出"招募"的一手。在日军侵占租界之初，就通过工部局、公董局调查上海工人情况，下令各厂均须填送工人表格上报。1943年1月底，日同盟社公开报道，当局训令上海劳工北移或移往日本，尤注意造船业及工厂、机器厂工人④。上海市档案局发表的伪市府档案，从1943年4月到1944年10月，有关日方在

---

①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597—604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② 蔡德金、李惠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③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687—690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④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第1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沪招募华工的文件，计7件。反映了在汪伪政府的配合下，共招募6次，5次共2500余人，其中3次是造船工人。不仅招男工，还招女工。所招工人大部去日本，还有255人去菲律宾①。对于"招募"，上海人民知道是怎么回事。日商纺织厂中受剥削被压迫最严重的包身工，就是"招募"来的。这次"招募"，更有飘洋过海、插翅难飞之苦，尽管宣称待遇如何，多数工人是不愿去的。但也有不少工人处于饥寒交迫的绝境，在招工头的利诱下，也就铤而走险，应募前去。这一去，就沦为奴隶，任人驱使宰割，不少人被榨尽最后的一滴血汗而客死异国，能熬至生还，为数极少。还有不少人至今下落不明。

仅此数端，即可看出上海租界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后，日寇利用汪伪政权，疯狂掠夺上海人民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罪恶阴谋的概貌。在这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不可避免陷入了极为悲惨的境地。

三、物价狂涨　投机狂热

在日伪进入租界直接统治的4年中，上海人民最痛苦的是物价飞涨。在"孤岛"时期，上涨的幅度，毕竟还不太大。速度也比较缓慢。至1941年12月，上海主要商品趸售物价总指数，为1937年6月的15.98倍②，这时抗战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非沦陷区的物价，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自从日伪于1942年5月27日硬性规定禁止使用法币，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为二比一以来，人们被迫使用中储券。对于伪币，人民是不信任的，钞票到手都争着购买物品，这一来就必不可免地

① 上海市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265—272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② 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出现物价上涨。更主要的是日伪不断增发通货，造成恶性膨胀。从日军进入租界后不久，即开始了物价上涨与滥发纸币的恶性循环，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等待不敷应用，中储行便增发通货，新伪钞一出笼，又刺激物价上涨。1944年6月，中储行发行面值200元、500元的大钞。1945年2月，发行1000元券。6月、7月，相继发行5000元券和10000元券。而且从2月起，这种钞票上连号码都没有，至8月1日，连10000万元券也没有号码了。此时，伪钞已经完全丧失了通货的作用，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农民贩米到市区，带回去的也是实物。甚至连敌伪控制的电力公司也要以煤易电，工厂要缴纳多少煤，才供应多少电。这时市面上还出现以高价收买小额伪钞的罕见现象。（一元票30张可换得百元），因为印小额票的纸价，已经超过了它的票面值。

大钞陆续发行后，物价上涨更烈。物价的飞涨，交易额的迅速扩大，出现了现钞奇缺的局面。5月，伪金融当局索性改用"拨款单"代替现钞在市面上流通，各银行钱庄也以签发本票来应付。"拨款单"、"本票"上的金额不似钞票之固定。数字，任人填写，这无异是开了个无底洞。一时，拨款单、本票满天飞，物价的上涨到了疯狂的程度。上海的黄金黑市，每10两从1944年5月的17万元猛涨到1945年5月的963万，一年涨了近55倍。趸售物价指数同期上涨20倍，6月比5月又猛涨3倍，为1937年的32300倍①。但拨款单、本票毕竟是银行之间的收付凭单，不能兑现。企业发工资、居民买东西还得使用现钞，于是又须付出贴现费，才能换得现钞。倒霉的还是普通商民。1945年8月，胜利消息传来，店家非万不得已，不肯出售货物，8月11日，米价上午为每石300万元，下午是600万元，鲜肉每斤5万元，自然这些数字已经失去了"物价"的意义，它只能说明，伪钞已经成为谁也不愿留在手里的废纸。

---

① 据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计算。

物价上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每次涨风，几乎都是敌伪官方带头，公开破坏敌伪的限价法令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敌伪控制的公用事业。例如1942年6月17日，已被日人掌握的工部局规定：一切物价均应按5月28日的法币定价，减半折收中储券，不得擅自提高，违者予以重惩。时谓限价政策。但就在这一天，公共租界公用事业，宣布调整价格：电话费按法币定价改收伪币，并另加50％；电灯、自来水、电车收费均按法币定价再加一倍。换句话说，新价格比限价高出二至三倍，带头冲破限价。再如1945年5月，日伪一面禁止黄金黑市，一面举办金证券市场，发行一月为期的金证券，5月7日，每两售78万元；5月21日，发行第二期，售价提高为83万元；6月4日第三期，又上升为125万元；6月20日第四期更猛涨至204万元①，这实际上是按照黑市行情，抛售黄金，带头抬高市价。

物价飞涨的最根本原因是日军严厉统制和大量搜括物资，以致市场上商品匮乏，奇货可居。1945年6月，米价涨至每石90万时，6月16日，敌军总部宣布停收军米，米价便跌至60万一石，下降了1/3。

日军进入租界后，工商业可说是百业凋敝，原因不外原料来源中断，产品市场缩小，物价上涨太快，出现过成品价格低于原料价值的倒挂现象。可是在这普遍萧条的上海，却有一种行业，异常兴旺发达，它便是与赌博无多大差异的投机业。从事投机者，今天可以是百万富翁，明天便可以倾家荡产成为赤贫，这些人的钱，来得方便，去也容易，上落出入极大，整天处于紧张状态中，需要寻求刺激，所以在民不聊生、举目凄凉的上海，歌台舞榭、酒家旅馆，依然酒绿灯红，轻歌曼舞，色情行业，也大为兴隆。活生生地画出了“隔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江犹唱后庭花”的写实图。

投机者买卖的对象，主要有证券（包括股票、公债等）、黄金、外币、房地产……，发展到后来，根本不需要任何具体东西，只要一个抽象的名目，便可以买进（做多头）、卖出（做空头），一些长袖善舞的投机家便大肆呼风唤雨，价格大起大落，他们得以趁机猎取暴利。这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越出正常经济活动的轨道，是赌博之一种。在上海沦陷前，也有交易所，也有投机活动，但那时，正常工商业毕竟占主导地位，交易所的波澜起伏对整个市场虽有一定影响，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日本侵略军进入租界后，情况大变，工商业每况愈下，到了1944年，工厂无法开工，商店无货可卖，投机业却一直是一枝独秀，越演越烈，不少人因善于投机而暴富，当然也有更多的人投机失败，倾家荡产以致一死了之。

投机买卖在这段时期，又与囤积居奇结合在一起，大囤户一收，物价立即上涨，大囤户一放，物价马上下降，这种投机是随着战争带来物资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说来，上海的囤户，在整个抗战8年期间，可说是无往不利，但也受到日伪的剥夺。

当时投机活动的猖獗，首先与汪伪首脑人物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有南京伪政府的首脑，如周佛海（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钱大櫆（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李士群（即“七十六号”大特务，伪江苏省政府主席）。他们名义上是平抑物价的主持人，投机事业的管理者，而恰恰正是他们，利用职权，挪用公款，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在投机市场兴风作浪。他们既是这种变相赌窟的支柱，又亲自下赌注，以他们当时的实力，一般投机者，当然斗不过他们。他们亦官亦商，稳操胜券。但如此兴风作浪，社会舆论大哗。日方掌握的报纸大肆攻击，并策动原“维新政府”的傀儡们在伪监察院制造舆论。汪伪最高国防会议乃决定派员来沪彻查。彻查发现了与汪精卫妻子陈璧君、与李士群有关的投机囤积大户，当然不会公布、更不会严办，只能虎头蛇尾，拍几只“苍蝇”了事。其实日伪

对投机市场的态度也是出尔反尔、游移不定的。如证券市场，日军进驻租界不到半个月，工部局就准许证券市场正式复业，可自由买卖华股，1943年3月，又将证券市号一律封闭，11月，又准其正式复业。这种反复无常的动机，都与它搜括物资有关。它认为游资太多，影响物价，就开放以吸引游资；它认为股票上涨太多，影响了物价，就予以封闭，但物资缺乏，工商凋敝，游资找不到出路，总要兴风作浪，它也只能朝令夕改，自相矛盾了。黄金市场也是这样，时而准许自由买卖，时而严禁黑市，但从未正式取缔。

其次，游资充斥、投机盛行，银行、钱庄有利可图。于是富商巨贾以及银钱业中人士相率创办银行钱庄。银行多至208家，钱庄多至212家，分别比战前多出134和120家①，增加了一倍半。这些行庄单靠利息收入，不敷开支；乃经营黑市高利贷、参与投机囤积，成了投机囤积的金融支柱。

第三，上海的大批工商业者因为没有正当生意可做，纷纷投向投机市场，他们有的经营股票，有的经营原料或产品，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力。

第四种势力来自专营投机的集团，即所谓多头公司、空头公司，他们呼朋引类，翻云覆雨，善于投机。他们也有一定数量的财力，诡计多端，擅于造谣惑众，他们是投机事业的基础。等而下之的便是所谓散户，亦即想通过投机谋利的个别人。这种人，财力有限，信息不灵，是上述几种主要势力的吞噬对象。当时还出现过不少滑头公司，根本没有资金，他们趁投机活动泛滥的机会，混水摸鱼。

疯狂的投机活动，促进了甚或诱导了物价的疯狂上涨。投机、物价，互为表里，恶性循环，吃亏的，总是普通老百姓。日伪控制下的上海，对任何人说来，都是地狱，只有对少数投机者说来，才是他

---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们的天堂。他们的欢乐，是绝大多数上海人民的灾难。

绝大多数人在贫困、饥饿中挣扎，少数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这便是日伪直接统治上海这段时间，上海人的基本面貌。

上海物价的疯狂上涨和物资匮乏，表面上看来原因相当多，但归根结蒂，总的一点是日本侵略者的以战养战，他们利用战胜搜括、掠夺来的金钱、物资充当他们的战费，这样可以延续他们维持战争的能力。

四、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胜利

从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支柱——食米的供应可以看出这段时期上海人民生活的艰辛。上海自"八·一三"抗战爆发，因附近的产米区都成了战场，交通运输多阻，米粮来源成了问题，加以租界人口剧增，对食米的需求量日益加大，投机商人乘机操纵、囤积，以致战争一爆发，便影响到米价。为了维持租界的安定，在粮食供应这点上，工部局做了一些工作，国军西撤后，米粮来源更见困难。因日本侵略军禁止米粮运入租界，这样做，一方面是与租界为难，制造人为的恐慌；另一方面，主要是有利于日本侵略军搜括军粮。幸好当时海运尚通，租界当局便邀请一部分海上闻人，组成"平粜委员会"，从东南亚进口粮食。采办工作由工部局具体负责，所需经费由上海市商会所属各行业垫付。这一措施，使孤岛的民食暂时得以维持，在稳定上海租界秩序这点上，起了一定作用。

虽然日本人禁止米粮运入租界，实际上仍有不少小贩，冒着危险，偷越日军封锁线，从郊区将米粮运来孤岛，所以当时一般米店同时出售"大米"（国产米）和"洋籼米"（称为平价米）。

平价米开始供应时，价格订得不高，数量也不予限制，随着物价的上涨和米源日益困难，平价米售价也不断上涨，购买数量也逐步实行限制。日军进入租界前限购数量为每人每次不得超过5斗，

每石米价为法币 130 元。事实上，黑市米价比这要高得多。所以米店门前经常有长长的队伍，等候购买平价米。

日军进入租界后，第一张布告便是市民不许有一个月以上的存粮。12月 16 日，工部局又宣布平价米每人一次限购 3 升，价格提至 4 元，3升以上不许搬运。19日，3升米价又涨为 4.1 元。1942年 1 月，又规定公共租界米店只允许 250 家，其中半数发售平价米，法租界米店规定为 150 家。限制越来越多，购买越来越困难，黑市米价越来越高，购米成了劳动人民的头等难题。

1942年 3 月初，黑市米价涨至每石 300 元。工部局奉日本侵略者之命禁止郊区米市场营业，并严禁国产米运入租界。他们这样做，本来是想消灭黑市，事实上和他们想像的相反，郊区米市场被关闭，更多的人从农村贩运食米来沪。为了对付这些米贩，日本侵略军设置了铁丝网、警犬，不少人为了运米来租界被警犬咬伤，以至被日本兵枪杀，但因封锁线太长，难免松弛，日本哨兵亦借此敲榨，所以每天仍有一定数量的大米流入租界。

米贩大多数都是将米暗藏在身上，进入租界后，在弄堂里四顾无人时才敢轻声喊道：大米要哦？大米要哦？人们听到这喊声，悄悄地把米贩引入屋内，私下成交。有的成了宾主，便可按时送米上门了。“大米要哦？”的叫喊声，许多老上海至今记忆犹新。

日本侵略者禁止米粮运来租界的第二天，黑市米价上涨至每石 400 元，第三天涨到 600 元，米店门前等候买平价米的队伍愈来愈长，米店 9 时开门，天还没有亮，队伍已经排得看不见尾，因为米店 12 时便停止营业，排在后面的人，很可能空手而归，巡捕房的巡捕，手执皮鞭藉口“维持秩序”，没头没脑地向队伍中抽去，每天总有人被皮鞭打得鼻青眼肿。

排队买平价米的，主要是上海的中、下层居民，如工人、小店员、小学教员、摊贩、失业人员以及城市贫民，这些升斗小民，高价黑市米，对他们说来，实在无法负担。而平价米不论质量，即使数量，也

远远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上海居民中，有相当数量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马路上公开抢食物的人日见增多，不少人在早上吃大饼油条时，被早已隐藏在角落里的饥民一把抢走，并立即狼吞虎咽地三口两口吞下了肚。另一个更惨的现象是倒毙路旁的死尸，愈来愈多，特别是每经过一次寒潮，倒毙者的数目往往猛增，以致收尸的慈善团体（如普善山庄）收都来不及，任其暴露街头。

同年7月，工部局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实行计口授粮，市民凭"市民证"领取购米证，每星期配给整米一升半，碎米半升。而这些米至多只够供一个人食用2—3天，一星期中还有4—5天便没有着落了。这些米，杂有大量的砂子、泥土，有的已经发霉变质。日本侵略者采用这种办法来不断更新库存的军粮，那时只要能买到便是万幸，米的质量人们怎能计较。9月份起，工部局改每星期配给一次为每十天一次，而米的数量并不增加。从1942年7月到1944年底、1945年初，原上海租界地区，两年半的时间里，日伪共发售配给米（上海人称之为"户口米"）70次左右，而每次供应的数量，包括碎米、苞米、糙米，每人总共不超过2升。亦即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日伪供应上海市民的米粮，总共每人不过140—150升，无论如何，人们无法靠这点少得可怜的户口米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只有求诸黑市。

日本侵略者为了打击黑市，曾多次加强封锁，以更残酷的手段对待米贩，他们愈是这样做，黑市米价涨得愈快，1942年底，黑市米价每石涨破了千元大关，翌年1月，涨到1500元。10月，涨至2100元，12月，涨至2600元，1944年3月，涨至4400元，5月份涨至6800元，6月份，售价10000元，7月，售价13000元，到1944年12月米价涨至55000元，最高时达70000元，是战前每石11元的6000倍左右。（如加上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率，这数字还要加一倍）。这还属是比较"正常"的。到了日本败局已定，胜利在望的1945年上

半年，米价高达几十万元一石，（这年5月底为30万，不到一个月，涨到90万）。这是因为人们眼见伪币即将成为废纸，日伪即将崩溃，这种涨价和因供求关系紧张而形成的涨价有所不同。

粮食问题如此严重，民怨沸腾。在汪伪政府的文件中也有所反映。1943年1月21日，伪浦东南区署呈文称："查本区粮食米麦豆类及所制各品，同于本月十三日已被大日本宪兵队挨户查封。升合之户深感无处购买，数口之家待哺嗷嗷，啼嚎之声比比皆是，民食问题顿成极端严重，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杨思、塘桥以及周家渡等处，从未办过公粜配给，居民家无颗粒存储，一旦蒙此影响，市中无处购买，十九相率断炊，饥荒情形溢于言表。……苟再牵延，必致饿殍载道。"要求迅速办理公粜、恢复切面业，以维民命。2月9日，伪市府转报市商会呈请增加户口米数量致函日本公使，委婉地提出了对粮食问题的意见。市商会呈文，首先指出户口米配量不敷消费："就华人每日之食量，中人消费至少约需五合以上，其劳动者流则非一升以上不饱，大概每市民每月所需平均约为二斗。而当局计口授粮，……每人仅敷四日之消费，其余六日之需求，不得不求诸街头之负贩与夫坊间之食肆露摊。价值虽远逾于平米，要亦无可如何之一法。"其次指斥禁止米贩之失当："溯负贩与夫坊间食料之由来，大抵有赖本市封锁线以外之供给。今若绝对予以封锁，试问平民除计口授粮以外，其不足之数何以抵补？""市民苦于计口授粮之不足，不得已而求诸负贩者，纯为供求之常态，无所谓黑市，似此倒果为因，未免谬（原文如此）于事实。""市民只蕲每期户口米增至整米五升、面粉数量如故，则所谓黑市自然消灭。""今后假如授粮数量虽增而仍不足，复又禁其供应之途，岂得谓平？"最后要求中日平等待遇："拟请俯卹民艰，据理力争，我华人计口授粮须与日本侨民数量相等，俾华人亦得足食，……以昭平等待遇之实，而无优劣轩轾之分。"市商会的呈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南民力已竭，元元涂炭，无所依诉，……弥切忧惶"，"目击心伤"的悲

惨境遇；但天真地竟要与侵略者讲平等，要取消统制，虎口夺粮，岂非梦呓？

煤，特别是煤球的供应同样也是令人叫苦连天。日军进入租界的第一张布告便是限制米、煤的存储量。上海附近不产煤，加以交通运输困难，沦陷之后，和米荒一样，长期存在煤荒。日本侵略者进入租界未几，煤球涨至每担 30 元(1943年3月)，1943年 11 月，黑市煤球价高达每担 100 元，到 12 月涨至 300 元，至 1944 年，又从 7 月的 500 元涨到 10 月的 1200 元。而当时工部局的限价不过51元。巡捕房巡捕对运煤车辆采取新的勒索办法，即一遇到煤车，先将之翻倒，煤球滚得满街尽是，逼迫出售者非留买路钱不可，这种公开敲诈也加速了煤球价格的上涨。因黑市煤球太贵，改烧木柴，而上海市区无木可伐，于是柴贩子应运而生，他们沿着沪宁、沪杭两线收购木柴，以致有些地方连桑林也斩伐殆尽，到 1944 年 5 月，柴价每担高达 10000 元，有些人家，只有将门窗、桌椅拆下来当柴。法租界的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曾将附近薛华立路的沥青路面掘起作燃料，由此可见这段时期燃料问题的严重。

和粮食燃料同样重要的还有住房。抗战爆发前，“借房子”(即租屋住)并不困难，两租界都有不少空屋待租待售。八·一三之初，不少南市、闸北居民迁入租界时，都没有花特殊的代价或遇到什么困难，顺利地找到了新居。当时不少人都以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都只想在租界上暂避一下战火，事平之后，仍回原处居住。随着战争的延长，进入租界的人愈来愈多，不仅上海市内非租界区居民迁来租界，江、浙两省、甚至比这更远的地区，由于战火蔓延，凡是有条件的，都逃来上海，两租界人口一下上升到 200—300 万(日本侵略者进入租界后，于 1942 年 2 月统计过两租界人口共有2440401人)。因而住的问题，同样也显得异常突出。大多数人的居住条件日益恶化，住房面积普遍紧缩。从这时候开始，承租房屋要付“顶费”。所谓“顶费”即“顶替费”，也就是承租权、租赁权的转

让。至于房租，那就和户口米一样，人们只愁无法将它弄到手，价格高低，也就不可能去计较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住房的实权掌握在有租赁权的二房东手中，大房东（房屋所有人）反而无权过问（因大房东手中所有房屋都有人居住），这一奇特现象，也是由此而来。

日伪对电力供应，采取罕见的蛮横手段。日军一进入租界，从12月10日至15日，工部局奉令公布了一系列所谓"节电"措施。主要内容：电灯用电以最近3个月的平均数为限，如超过一度，课以二十五倍的罚金，连续超过两次者，停止供电。商店不得使用霓虹灯，规定一律晚9时停止营业，舞厅、酒吧间可延长至10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停止使用。电车也要耗电，因而公共车辆（包括公共汽车）行驶时间定为上午7时30分至9时30分，中午12时30分至1时30，下午4时30分至6时。这一来，繁荣的上海顿时改观。不夜城进入了漫漫长夜。过了半年，1942年6月，又采取进一步缩减电力供应的措施，其中规定，各商店及一般家庭住户，按半年来用电量的平均数，限用45％，超过限定量科以罚金并将超过数字在下月用电量中扣除，如再超过，即停止供电。1943年12月起，对居民的照明用电又规定不得超过12月以前平均数的65％，用水量不得超过60％，煤气不得超过70％。1944年元旦起，又规定各商店营业时间至晚8时止，商店招牌用灯要提前1小时关熄，舞场、饭店规定11时熄灯，其他娱乐场所延长1小时。这年秋天，同盟国空军开始空袭上海后，日伪于11月24日起，公布电灯用户以一户一灯为限，电灶、电炉等除医用外，一律停用，工厂除军工外一律停止供电，1945年2月起，市民照明用电供应时间，限于晚7时至10时，用电量比1月份再减一半，电车行驶时间为上午6时30分至10时，下午4时至9时，其他时间，不是班次大大减少，便是完全停驶。这时上海居民不但出门无车，而且照明无灯。又，自美机开始空袭上海以后，日伪施行灯火管制，本为断断续续，后来

改为无限期灯火管制，每晚10时后，全市灯火全部熄灭，连路灯也不例外，全上海完全处于黑暗中，人们晚间无法外出，不仅因为一团漆黑，还因为没有路灯，为暗中路劫创造了条件，以致“剥猪猡”（剥去成年人的衣服）、“剥田鸡”（剥走儿童的衣服）等现象，不足为奇了。夜间无电照明，那就倒退回去，用火油灯、蜡烛，可是火油是统制物资，到了1944年1月，蜡烛也成了配给物资，这样，大多数居民只能在黑暗中生活。与蜡烛同时宣布实行配给的还有棉纱棉布、火柴、肥皂、砂糖以及卷烟。总之，从衣食住行到日常生活都处于统制之下。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日军侵入租界后，上海人民生活水准的江河日下。事实上，当时上海人民生活的艰辛、困难，这里所述，不过是最普通的主要几点，其他种种困苦，不能尽举。特别是1944年以后，日伪日暮途穷，我方胜利在望，敌伪疯狂搜括，豪强普遍勒索，令人无以为生。敌伪发行的货币形同废纸，绝大多数人生活愈来愈苦，在这段最后的日子，可以说几乎全上海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上海人民，最为痛苦的当属工农劳苦人民。在上海市郊，日伪还实行“清乡”，按计划分为：第一期南汇、奉贤、北桥，第二期崇明、嘉定、宝山，第三期川沙、浦东南、浦东北。在“清乡”中除了日伪军联合进攻和搜索人民抗日武装，大办保甲，加强伪警力量以外，还借着清乡封锁，加紧掠夺清乡区内的物资，人民把“清乡”称作“清箱”，反映了那些清乡人员掠夺人民财物的罪行。仅增加赋税一项，据“清乡事务局”的统计，前两期6个区总计达970万元。至于工人，在日军进占租界后，工商业日益凋敝，失业情况也日益严重。他们有的被迫遣送回乡，有的被骗、被抓去做苦工，有的不得已去贩米、跑单帮，又遭日伪军警的没收、毒打以至横遭枪杀。即使在业工人，由于物价飞涨，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尤其在日厂工作的华工，每月工资仅一、二斗米，维持本人的生活，尚有

困难。他们迫切要求增加工资，以维生计。中共地下党及时指出要采取“有组织的斗争和无组织的形式”“得到风，就转篷”的斗争策略，以避免遭到镇压和破坏，从而取得稍稍改善，点滴地积聚和发展力量。以日军管制的上海电力公司为例，1942年夏，地下党支部事先通过积极分子布置了行动计划，第二天中午，日籍管理人员去吃饭的时候，全厂工人一齐集中到泵浦间门口，席地而坐。等到敌人发觉，工人已集合完毕。敌人要工人派代表谈判，大家不理，只是讲“肚皮吃不饱，生活做不动”。敌人无法，一面答应考虑增加工资，一面叫海军陆战队抓去十几个工人。工人坚持不散，要求释放被捕者。敌人深怕停电，又查不出为首的，只好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资。这场“无头斗争”得到了预期的胜利。日寇为了对付“无头斗争”，又施出“插红旗”的诡计。在1943年春的一次“无头斗争”中，日寇指使汉奸王某站出来伪装积极，“代表”工人激昂慷慨提出很高的要求，企图刺激为首的工人站出来讲话，好下手逮捕追查，但工人没有上当，日本人马上表示过几天给工人答复。事后，党支部就劝说群众要认清王某的真面目，不要坚持王某提出的条件或站出来争论，以免暴露。后来，敌人果然只接受了一部分条件，群众也乘风落篷表示同意。第二天，敌人忽又把王某抓走，企图刺激工人出头营救，即可下手，还是无人理睬。过了一星期，日本厂长派汽车把王某接了回来，“插红旗”的阴谋彻底破产，“无头斗争”再次取得胜利，群众更加信任党的领导。其次，在日本军事工厂中，地下党支部不仅组织群众磨洋工、少生产，以争取待遇上的点滴改善，而且领导工人故意浪费材料，破坏生产，从侧面打击敌人。到了1944年下半年，日军经常发出空袭警报，美空军也开始轰炸上海。这时又创造了逃警报斗争。开始拉警报时，日寇紧闭厂门不准工人出厂，而对被炸死炸伤的工人又不负责任。引起群众非常气愤，纷纷起来斗争。日寇不得不答应工人逃警报，但又害怕工人不回厂，影响生产，答应逃警报的工时，工资照发；每跑一次警

报，即增发户口米或工资；被炸工人，厂方发给补助费等条件。这时抗战已进入反攻阶段，地下党员在厕所里挂个罗卜（上海人叫日军"罗卜头"），宣传"天快亮了，大家起来，磨刀切罗卜"，以鼓舞斗志；地下党还分批组织非党群众领袖和知名人士去根据地参观，使他们受到鼓舞和教育，回沪进行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增强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规定了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夺取大中小城市的任务。华中局城工部立即向上海各级党委传达这一指示，轮流调集各委领导干部去城工部学习并制订工作计划，并积极布置筹建上海城市地下军。上海地下党以工人、近郊农民的工作基础，并吸收了部分警察巡捕，掌握了部分地方自卫队，以淞沪游击区的青浦朱家角为训练基地，组织了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人们固然对胜利的将要来到，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但如何才能取得胜利？盟军的轰炸是否会使上海成为一片废墟？如何才能使日寇放下武器（当时日军调集重兵，以上海为中心，去沿海设防，准备顽抗，包括使用毒气），这些问题，一直都积聚在上海市民心中。胜利固然无疑，自身及家庭前途如何，谁也无法作答。因而当时的上海市民，除了物质生活的匮乏，精神上也很茫然，有条件的，纷纷离开上海，通过封锁线，前往大后方，有的逃到屯溪、场口，有的遁居于青浦、朱家角或苏州、昆山（主要是对美军的地毯式轰炸感到恐惧），而绝大多数上海人只有坐以待变，除了等待，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离开上海的人固然多，跑单帮做买卖的也不少，以致车票之紧张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有些火车上的不法工作人员，人们称之为"黑帽子"的，种种横行，令人切齿痛恨。

暗暗的喜悦以及无穷的忧虑和随时都会发生的恐慌，一直在伴随着上海市人民，直到抗战胜利的来临。

第二十五章　争取和平民主

一、“天亮”之后

1945年8月初，美军在广岛、长崎相继投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进攻日本关东军。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7道命令，令全体人民武装向日伪军全面进攻。9日晨，中共中央华中局即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并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刘长胜（书记）、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未到职）、陈祥生组成，立即在沪发动群众，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受尽苦难的上海人民，获悉日寇投降，人人笑逐颜开，含着激动的热泪纷纷上街，欢呼“天亮了”，燃放鞭炮，通宵达旦，庆祝抗战胜利。他们热切希望从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能够过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但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政府一心独占胜利果实，内战、独裁的乌云密布天空，形势险恶。

十一日，蒋介石下达三道命令：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制止人民军队受降。1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汪伪政府要员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

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以及浙江保安队等伪军，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13及14日，先后任命钱大钧、吴绍澍为上海市正副市长。

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17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按照美国和蒋介石的命令，发表布告声称：于津浦沿线、长江沿岸地区，"对日军采取不法攻击态度，或要求解除武装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之轨外行动，不得已时决采自卫行动"，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19日，周佛海宣布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成立；同时，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一部从浙江匆匆赶到上海，准备与行动总队配合，进攻上海附近的新四军。

18日，美军在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登陆，替国民党抢占战略要点；27日，美军用飞机开始帮助蒋介石政府运送军队，抵达上海、南京、北平、开封等地。9月，更空运大量军队到内战前线。汤恩伯部即由美机运来上海，经沪转运往内战前线的还有九十四军、七十四军等等。

在美军的支持和参与下，蒋日伪军队合流，日伪军不仅拒绝向人民军队投降，而且配合蒋军向解放区进攻。8月29日，何应钦密令国民党各战区大量印发蒋介石在10年内战期间所编写的《剿匪手本》，积极部署进攻。内战危险十分严重。中共中央为了集中力量和表示和平诚意，决定新四军北撤，撤消对上海的进攻。中共淞沪地委、淞沪支队以及在组织地下军活动中已经暴露的干部和战士，也随军北撤。

蒋介石要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的方针已定，但要把远在西南后方的军队运赴前线，还需要时间；同时，全国人民反对内战斗争的兴起和日益高涨，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便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使出假民主、假和谈的一手。8月中下旬，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到达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允诺召开容纳各政治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但仍拒不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集会举行反内战活动，国民党军警特务屠杀殴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死4人，伤60余人，制造了“一二·一惨案”。这就暴露了蒋介石政府坚持内战独裁的真面目。全国各地奋起声援昆明学生，掀起了以学生为主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1月13日，上海学生在沪西玉佛寺和各界人士10000多人公祭昆明死难烈士。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组成主祭团主祭。学生、教授、工人、职员的代表纷纷在会上控诉国民党的暴行，群情悲愤。大会通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实现四项民权、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要求。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四人一排，绵延两里，高呼“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取消特务”、“惩办昆明惨案凶手”等口号。这是抗战胜利以后上海人民反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一次联合行动。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努力，通过了实际上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对人民有利的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但国民党对此毫无诚意。2月10日，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直接指挥下，打伤了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主席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60余人。这是公开撕毁政协决议、打击政协代表的暴行。全国各地民主人士，纷纷通电抗议，要求惩办凶手。11日，上海文化界43人、文艺界41人，分别联名电慰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惩凶。上海民主人士并发表《民权到底有没有保障?》、《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等一系列文章，斥责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从“一二·一惨案”到“较场口事件”，都证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是假，准备内战是真。民主

协商是假，独裁统治是真。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死活，坚持打内战，目的就是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而它要打内战，就要凭借独裁统治，才能拉丁征粮、镇压反抗，任意横行。所以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相辅而行的整体。人民的反内战、争民主斗争也是不可分割的迫切要求。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也实施一系列的专制独裁措施。1946年1月10日，正是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政协在渝开幕之日，钱大钧却在沪向市民作广播讲话，借口实行地方自治、统一全国地方政制，动员编制保甲和清查户口，继承法西斯衣钵，加强对人民的统治。5月4日，市警察局决定自6月1日起，实行"警员警管区制"，规定每个警察管辖80—120户或400—600人，警察得在任何时间随意进入管区中任何一家私人住宅或商店，作定期或不定期的"访问"，"借以明瞭各户详情，俾宵小匪徒无以匿迹"①。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公然声称："人民之住所，依照法律，可以侵入、搜索或封锢，又岂仅访问而已！"② 简直把全市人民都看作是罪犯，是专政对象。对于这样露骨的专制独裁制度，进步报刊一致反对，就连国民党人办的《时事新报》、《前线日报》也发表社论，表示反对，英文《大美晚报》《字林西报》也加以抨击，《密勒氏评论报》指责这种制度"在世界任何地方是绝无前例，目前也无例可援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反对警管制宣言》，指出：这是"以人民血汗换来的金钱，添设特务变相的警员，来管制全体市民的生活，剥夺全体市民的自由"，表示"官逼民反"，400万上海人民"准备应战"③。尽管中外人民一致反对，反动当局一意孤行，相继在静安、常熟等分局实行警管区制。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还在对待汉奸和人民的态度上反映出来。

---

① 《群众》11卷5期，第6页。

② 《周报》37期，第12页。

③ 《民主》32期，第810页。

对于汉奸，全国人民尤其是沦陷区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一致要求予以严惩。中国共产党多次声明，坚决主张“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坚决反对国民党“利用敌伪，残害同胞的谬谬行为”。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惩治汉奸的压力下，蒋介石不能不惩办一些汉奸。他从杀人灭口以掩盖其与日寇私下谈和的需要出发，首先枪决了曾经代表蒋介石与日寇和谈的缪斌，判处了北洋军阀王揖唐、梁鸿志以及陈公博、褚民谊、林柏生等以死刑。但是，从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蒋介石集团与汉奸彼此素有勾结，因而无视民族正气和国法尊严，对不少汉奸加以包庇或得钱买放。他们利用敌伪“维持治安”，加以委任，其后为了打内战，收编了伪军20多万，任用大量伪军头目充当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他们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曾为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证据确凿者，得减轻其刑”，就是为包庇汉奸而设。巨奸周佛海就凭此条特赦为无期徒刑。至于军统特务、司法机关乘机向汉奸敲榨勒索，得钱买放的那更是人人皆知，当时曾有“三阳开泰”、“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的民谣。所谓“三阳(洋)开泰”、“五子登科”就是讽刺那些“接收大员”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乘火打劫，抢劫敌伪的房子、车子、金子、衣服料子和女子的贪婪丑行。所谓“有条有理，无法无天”，则是指国民党司法人员贪赃枉法，汉奸只要献上“条”子(金条)、“法”币，就能得到从轻处理甚至得以脱逃。协助日寇掠夺物资危害民生的经济巨奸袁履登、闻兰亭、林康侯获得保外就医、轻判5至6年有期徒刑的奥秘，就在于此。对于这种情况，国民党监察院江苏监察区监察使曾于1946年1月4日发出代电，反映汉奸案件“处办实况，一若漫无标的，张弛不一，甚至借名恫吓，巧取豪夺，民情怨愤”，“亟应纠正”。经过层层批转，上海市政府于1月30日收到行政院“仰该市政府切实查禁”的训令后，竟“来文照登”、“不另行文”，敷衍了事①。上海市政府包庇放纵汉

① 《上海市政府公报》2卷12期，第299—300页。

奸，也是众所周知的。例如1945年10月，新新公司职工800余人联名揭发该公司总经理李泽的汉奸罪行。《周报》杂志发表了这封来信。老闸警察局即传讯该社记者，提出“李泽当汉奸有什么证据？”“职员投函检举，未盖图章，何以径予发表”等质问，蓄意进行压制。对李泽却并未传讯追究。翌年元旦，新新公司职工再次以同人联谊会名义，组成检举汉奸李泽的10人代表团，公开发起检举李泽的运动。市警察局又传讯检举代表团，质问动机，公然污蔑职工张贴检举汉奸标语为非法行为，施加压力。但百货职工坚持斗争，工人、学生、妇女、文化各界亦加声援。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逮捕李泽，又拖了5个月，直到6月3日，才判处有期徒刑3年，褫夺公权3年。国民党政府对汉奸如此“温情脉脉”，对广大人民呢？他们把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工人、学生、职员，宣布为“伪工人”、“伪学生”、“伪职员”，都要进行“甄别”。国民党经济部准备在接收的敌厂开工，要工人重新登记、甄别，提出了许多荒谬的限制，如35岁（一说22岁）以上、16岁以下、不识字、面貌不漂亮、体胖、小脚都不要。工人对这样的歧视打击，理所当然地起而反抗，经过坚决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工人分期抽签复工。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敌伪专科以上学校的毕业生都要进行登记甄审。上海学生提出了“反对歧视”、“争取读书权利”的口号，向国民政府举行了多次请愿、示威，在社会各界的同情支持下，国民政府被迫承认学生学籍，取消对学生的“思想训练”。通过“检举汉奸”、“反对歧视敌占区人民”、“争取读书、做工权利”等斗争，使上海人民看清了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的真面目，也看到了团结战斗的力量。

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还表现在压迫内迁工厂的回沪人员。抗战胜利后，内迁工厂要复员回沪。可是国民政府忙于运军内战和接收，垄断了交通工具，大量急于回沪的人，留在那里，不能成行。有的人吃尽卖光，尚未成行，只能流落异乡。即使那些历尽艰辛回到上海的工人，又陷入没有工做又无法生活的悲惨境地。他们在

所谓“招待所”里，睡的是水泥地，吃的是面疙瘩，以致疾病丛生。后来的，竟被当作乞丐游民送进了庇寒所。1946年3月22日，180多人到社会局请愿，争取到每人发一袋面粉，协议按二八比例复工，即工厂开工，八成用上海工人，二成用后方回沪失业工人。但此后能复工的仍然很少。4月12日，300多人又去请愿，结果仅允增设两个招待所，最根本的复工问题，社会局、经济部驻沪办事处和市政府三方相互推诿，未获解决。5月31日，800余人举行第三次请愿，竟遭到楼上浇开水、门外军警包围的待遇，经过力争，取得了一周内成立办理救济及介绍职业的机构，二周内在公大纱厂筹备招待所收容流落工人，组织合作工厂三项诺言。可是事后一件也没有兑现。9月，他们又去市参议会请愿，仍未获结果。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特务流氓强行接收了后方来沪失业工人代表团，使那些回沪工人失去组织，流离失所。那些内迁企业工业家组织的迁川桂工厂联合会上海办事处，理所当然向国民政府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可是市警察局却以“有人假借名义活动”为由，强令该会“停止活动”。对此，当年为工厂内迁出过大力的胡厥文，怒斥国民政府当局勒令迁川工厂联合会停止活动，是“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政府拿有利可图的工业自己来做，把民营工厂丢在旁边”，“连目前这些脆弱的民族工业还不予培养，要发展到工业化，无异痴人说梦”①！内迁工厂的工人和厂主，在抗战初期，历尽艰辛，流血流汗，承受了许多牺牲，支持抗战，是有功于人民和国家的。可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的却是这样的待遇，还有什么民主和真理可言?!

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还表现为官匪难分。绑架著名企业家荣德生就是一例。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在去总公司的路上遭到绑架。绑匪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

① 《经济周报》2卷19期，第16页。

捕证”，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证件和汽车，批准“逮捕”行动的是军统特务头目、后来出任市警察局长的毛森。后来被作为“华大企业公司总经理”、“单帮客人”被枪决的匪首吴志刚、黄绍寅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和军统特务。荣氏被绑，全市震动，时已有某军事机关与匪徒暗通声气，参与绑票的街谈巷议。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出动大量军警，进行“侦破”以掩人耳目。他们散布疑阵，绑匪要求把赎款50万美元送到长乐路警备司令汤恩伯住宅附近交款。荣家送款去，未见绑匪接款，而被警备司令部稽查人员查获。警备司令部假惺惺地发还赎款，以掩盖真相，欺骗社会视听，并为以后勒索破案奖金张本。过了两天，又是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将赎款取去，绑匪乃放荣德生回家。最后，警备司令部宣布“破案”，发还吊出约合美金12—13万元的赃款，把匪首8人枪决，杀人灭口，7人判处徒刑。荣氏即向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各送去美金4万元，以示酬谢。可是反动军警并不满足，还一次一次去勒索破案酬金。荣氏被绑一案，先后共付出60余万美元，当然影响了申新系统的生产资金。而毛人凤、宣铁吾、毛森、陶一珊等头目以及反动军警却大大地捞了一把。更有甚者，荣氏获释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江苏省党部书记长、无锡县长等又纷纷乘机借名勒索①。仅此一例，可见国民党反动派亦官亦匪，是一伙掠夺人民的法西斯匪帮。

国民政府当然也还要有“民意机关”。1946年3月28日，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参议员50名，候补参议员25名，全由钱大钧提名经行政院批准聘任，根本不是民主产生的。而这种参议会，在没有任何权力的状况下作出的决议，市政府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充其量不过是个咨询机构。同日，决定正式选举市参议

① 荣案具体材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470—4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员，选举办法规定分区域选举和职业选举两种。区域选举，就掌握在各区区长和保甲长手里，因而选举弊端百出，甚至大打出手，长宁、榆林两区不得不宣布重选。竞选失败的人还联合向地方法院控告民政局长和各区区长选举舞弊，要求宣布全市参议员选举无效。那当然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被法院驳回。职业选举，规定："参加职业选举以在选举前依法成立之各职业团体之会员，而实际从事该项职业三年以上者为限"，亦即只有经过社会局登记核准、为其控制的商会、工会、新闻、医务、会计等职业团体的会员才有选举资格，不参加它的御用团体的一概被剥夺选举权。至于参议员候选人，则须经他们考核及格，方能有被选举权。在校学生则不问是否到达法定年龄，一律停止被选举权。正因为有这种种不民主的规定，选出的171名参议员，大多数为国民党骨干或拥蒋反共人物。于同年8月正式成立上海市参议会，由市党部主任委员潘公展出任议长。显然，这绝不是民意机关，而是替专制独裁粉饰，制造"民意"的御用机关，为人民所唾弃。

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在欢庆"天亮"的上海人民头上，又布满了乌云。种种倒行逆施，使上海市民从对国民党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发出了"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感叹。经济政策上的掠夺，更使国民政府失尽了人心。

二、接收敌伪　人民遭劫

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更是独占胜利果实，继续掠夺人民财产，发展官僚资本，使社会经济迅速恶化。

首先是借收兑伪币，对收复区人民进行劫收。1945年7月的商品趸售物价指数，上海为1937年1—6月的41886倍，重庆为1645倍。两者相比，约为25.5∶1。8月，抗战胜利，中储券将成废纸，上海的趸售物价指数猛升到86400倍，重庆为1795倍。两

者相比，约为 48：1，可是国民党政府宣布的兑换率，却为 200 元中储券兑换法币 1 元，大大超过了实际比价。这个兑换率，使当年被迫以二比一的比率接受中储券，被掠夺过一半的沦陷区人民，又被抢去四分之三。这是对收复区人民的公开洗劫。这种不合理的比率，人为地使收复区的物价比后方低得多。据联合征信所讯，9 月 20 日南京食物平均较重庆低八倍至十倍，衣服平均低五至八倍，燃料平均约低十倍，其它物品约低八至十倍。即以黄金价格来说，当时上海黑市价为每两伪币 800 万元，折合法币为 4 万元，而 9 月 28 日，国民党官方规定重庆黄金每两售出价为 89000 元，相差达一倍以上。两地物价如此悬殊，得利的是谁呢？是国民党官僚资本，是那些从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他们带来大量法币、关金券，甚至把接收来的尚未发行之伪币大钞，整箱整箱的搬出来，拚命抢购黄金、美钞与高档物资，运至后方脱手，大发其胜利财。其结果使西南、西北地区物价猛降，发生工业危机，停工减产。而收复区经过日伪的掠夺，商品存底本属有限，经此大量争购外流，物价自然大幅度上涨。特别是国民政府直接掌握的邮资、火车客票在 10 月份就带头涨价十倍。市政府同时批准水、电费也涨 10 倍。于是上海的趸售物价指数从 9 月的 346 倍，到 11 月就上涨至 992 倍，涨了 1.87 倍。上海人民以二百比一换来的法币，实际购买力又只剩35%了。国民党政府用这样极不合理的比率收换伪币，装满了他们的腰包，上海人民的财富被他们剥夺殆尽。

第二，利用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中饱私囊。国民政府在上海接收敌伪财产的情况极为混乱。首先是国民党特工人员、汉奸、流氓地痞，摇身一变，自封“抗日英雄”。他们近水楼台，熟门熟路，恣意抢劫了一番。其次是国民政府的军事机关，陆海空三军，利用他们掌握交通工具的优越条件，捷足先登，大肆掠夺。待得国民政府指派的正式接收大员驾到，已经是第三批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赶来上海，目的无非是假接收为名，行掠夺之实。于是，出现于

上海市的正式负责接收单位，有89个之多。他们抢着接收敌伪产业，大搞"五子登科"。他们只知道掠夺财物，根本不管生产，不顾工人死活。如接收工厂，封条一贴，便归接收者所有。可以移动出卖的资产：盗卖殆尽，搬不动的厂房、机器设备，就任其风吹雨打、损坏被窃。好好的工厂，因"接收"而陷于瘫痪的不在少数。至于生产如何恢复，工人生活如何安排，他们全然不管。造成大量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牧场被接收后，因无人管理，奶牛无人挤奶、饲养而胀死、饿死。仓库被贴上封条，里面的物资却从后门转移走了，整个仓库就只剩下一个外壳。例如江南造船厂，接收时仅大小仓库共40座，堆满了钢板、铜管、角铁和大小五金材料，足供全厂用两年以上。但据该厂老职工回忆：被接收的仓库"白天里死气沉沉，晚上却是灯火辉煌，汽车成群，明目张胆地大量偷盗"，"把仓库里的大小马达，用汽车向外装，把长大的钢板割成几块夹在旧料里盗卖"，"日本人刚投降时，我还看见几间仓库里满满地堆着紫铜管和汽车轮胎，接收后几天，仓库都被搬空了"。①

第三，独占胜利果实，发展官僚资本。日寇多年来从掠夺中国人民财富中建立起来的金融机构、工商企业，都是人民的财产，抗战的胜利果实。国民政府以"接收"名义，霸为己有。国民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敌伪的正金银行、住友银行、朝鲜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等一批金融机构及其财产。仅中储券的准备金一项，即达黄金50万两。据当时的中央银行统计，截至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区3489家银行中，由国民党控制的官营银行已达2446家，占70%。其他私营银行，也大都有官僚资本渗入而间接加以控制，真正的民营银行已寥寥无几。国民政府就凭借这股官僚金融势力，乱发货币搞通货膨胀的是它，紧缩信贷使工商企业破产的也是它，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第256—25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在金融市场上翻云覆雨带头搞投机活动的又是它。总之，垄断金融资本，控制着经济活动，吮吸着人民血汗。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7月的报告，国民政府接收了敌伪工厂2411家。在此基础上，它建立起许多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独占组织。在上海成立的就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官僚资本企业。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例。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民族资本，曾宣称在胜利后，轻工业可由民族资本经营。因而民族资本家对接收的敌伪纺织厂，积极要求代营和承购。可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945年11月27日决定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自营全部敌伪纺织工厂。宋子文于1946年1月22日对记者的谈话说得很坦率："经营纺织业的利益，可以对本对利，而经营者既一时无力购买，政府自决无此种义务，必须以此项纱厂售给现有财力的少数人民，助其发财。"① 对此，民族资本家表示愤慨，"认为（这种做法）不特违背国家既定的经济政策，且系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②。国民政府为了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又规定"中纺公司"营业年限为二年，必要时，得呈准展期一年。当然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共有工厂85个，分布在上海（38个厂）、天津（10个厂）、青岛（13个厂）、东北（24个厂）四个地区，总公司设在上海。它独占了1946年全国纺锭49%，布机86%，棉纱产量39%，棉布产量74%，全国精纺毛锭56%，粗纺毛锭34%。当年上缴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盈余达法币391亿元，对于支持反革命内战，弥补财政赤字，维护反动统治，起着重要作用。

在商业垄断方面，1946年1月，扬子建业公司正式在沪营业。由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汉口、福州、南京、天

① 香港《经济通讯》第三期，1946年2月9日。

②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406—407页。

津和香港、纽约设立分公司。营业项目有：工矿开发、运输、仓库、保险、房地产、国内外产品运输及工商投资等，几乎包罗万象，垄断一切。它和16家美国公司订有总经售合同，利用特权充当买办。属于孔系的还有嘉陵企业公司，由孔令俊主持，规模略小，但在上海的地产、证券和黄金外汇等投机买卖中，颇为活跃。此外，还有宋系的孚中公司、二陈系的太平兴业公司等等都是这类商业垄断组织。

官僚资本独吞胜利果实，取得空前发展，使民族资本在战后繁荣发展的希望迅速破灭，处境日益困难。1946年5月2日，著名企业家吴蕴初在接受《经济周报》记者采访时，指责中纺公司不买国产的烧碱、漂白粉等化工原料，而向美国进口，政府不供电、不贷款，致使天利厂无法开工。呼吁工商界联合起来"速挽救经济的崩溃"①！6月1日，新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和社会部长谷正纲在市商会召开资方代表会议，吹嘘要保障工商业、鼓励生产，取缔投机、安定物价，提倡节约以裕国库。会上各业资方代表声述痛苦。万象织造厂资方很不客气地说："部长市长们的训话太偏理论，太不了解民族工业的实际情况。劳资纠纷固然是危机之一，但是今天工人即使好到做工不吃饭，不拿工资的地步，而促成民族工业崩溃的官僚资本和外货充斥市场的最大因素存在，民族工业还是要崩溃的。"工商界的闻人王晓籁也说："我们的痛苦讲两天两夜也讲不完。"②国民政府把接收搞成了劫收，人民在被劫中叹息："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

---

① 《经济周报》2卷18期，第15—16页。

② 《生活知识》28期第5页。

三、奋起反对内战独裁

针对国民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中共中央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据此，中共上海市委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开展广泛的爱国民主的统一战线，团结上海各阶层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准备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自卫战争，保卫解放区，保卫和争取上海人民的生存、生活和民主权利，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在各阶层人民奋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裁的斗争中，民主党派相继创建和开展工作。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上海成为各民主党派的活动中心。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了上海。1945年底，组织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为劳动群众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或团体，但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资援助。国民党民主派的何香凝、柳亚子、李济深、陈铭枢等也来到上海，参加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酝酿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抗战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和出版界的著名知识分子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郑振铎、严景耀、雷洁琼、柯灵等，在敌伪统治下，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实际斗争使他们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集会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

旨”。1946年1月，先后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书》和给旧政协会议的《建议书》，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积极组织、推动会员以实际行动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2月起，中国人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陶行知、沙千里、史良、张志让、胡子婴等先后回沪。他们从1936年成立救国会起，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贯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1942年，中国人民救国会正式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1月14日，在沪招待新闻记者，介绍救国会的政治纲领和在渝参加政协的经过，针对形势，提出保障人民权利的要求。17日，上海30多个民众团体联合举行欢迎救国会同志的大会。沈钧儒代表救国会发表长篇讲话，呼吁实现国内和平，力争民主团结，以求建立一个新中国。其后，民主同盟的领袖人物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也陆续来沪，在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12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由渝来沪直接领导民盟中央的工作。

1946年4月，以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为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由渝迁沪。它的主要成员是民族工商业者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代表人物。民主建国会积极参与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11月10日，成立了上海分会。

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移驻南京。16日，以《新华日报》社宿舍名义在上海租赁思南路107号（现73号）筹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可是国民党政府横加阻挠，不让设立办事机构，乃于6月22日公开称为“周恩来将军公馆”，实即中国代表团驻沪联络处。周恩来等在这里领导着同国民党谈判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的革命活动，同时，也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给以及时而必要的指示。4月，刘晓从延安回沪。其后，就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由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

副书记，刘少文和钱瑛任委员，统一领导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及江浙其它地区的地下党工作。

在此同时，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茅盾、马寅初、司徒美堂等也陆续来沪。

8月，九三学社中央由渝迁平。上海成立了分社。

1947年2月3日，以章伯钧为首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在沪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主张“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

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云集上海。中共代表团以及中共上海局开展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汇集到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来。上海代替了重庆，成为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此外，当时尚在民盟内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领导机构，也来到上海，先后在沪召开它们的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是各民主党派的活动中心，也是和平民主的舆论中心。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决定发刊上海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未能实现。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间接领导的，报纸有《时代日报》（1945年9月1日创刊）、《文汇报》（1945年8月18日复刊，徐铸成任总主笔，马季良任总编辑，1946年1月起，宦乡、陈虞孙任副总主笔）、《联合晚报》（全称为《联合日报晚刊》，以美国新闻处中文部名义出版，1946年4月15日创刊）。杂志有《群众》（1946年6月3日迁沪改为周刊）、《文萃》（1945年10月9日创刊，12月起，由黎澍接手主编）、《经济周报》（1945年11月1日创刊，由吴大琨、谢寿天等主持）、《生活知识》（1945年11月12日创刊，纪康、陆象贤主持，上海地下工委指导工运的刊物）、《世界知识》（1945年12月1日回沪复刊）、《读书与出版》（1946年4月

5日复刊)、《消息》半周刊(1946年4月7日出版)等等。进步报刊还有《新民报晚刊》上海版(1946年5月1日创刊,赵超构任主笔)、《周报》(1945年9月8日创刊,唐弢、柯灵主编)、《民主》周刊(1945年10月13日创刊,郑振铎主编)等,这些报刊是和平民主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在教育群众、发展进步力量、揭露和打击美蒋反动派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处于中间状态的报刊,有《大公报》沪版(1945年10月1日复刊),它既批评国民党,也批评共产党,而反对内战的主张则始终坚持,且随着美蒋反动派日益反动,它的立场也有所变化,特别是该报有不少编辑记者是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因而它的不少报道和文章,也还是有利于人民的。还有《时与文》、《观察》等杂志,较长时期坚持第三条道路的立场,但仍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疑忌终被查禁。

至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的报纸,从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进步报纸。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新闻报》作为"敌产",被"接收"、"整理",分别由潘公展、程沧波任总主笔,成了CC系的报纸。此外,还有上海《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和平日报》、《时事新报》、《正言报》、《立报》、《中美日报》、《大晚报》等报纸以及《新闻天地》等杂志。这些报刊的全部版面上充斥着反共反人民的叫嚣。如在全国人民奋起反内战的形势下,《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老百姓要改变眼光》,要老百姓"协助政府努力剿乱,此时而犹希望政治解决者,非如白日做梦,亦等梦中呓语耳"。(1945.11.11)《申报》坚持封建法西斯的法统观念,硬说"翻开中国廿四史看,只有平内乱,所谓内战,只有美国南北战争方可称之"。(1946.7.20潘公展谈话)这种谰言,当然不会有市场。

文斗不行,就使用暴力,任意抄没、禁止进步报刊,甚至迫害、杀戮记者。如《周报》刚创刊,发刊词揭橥了"加强团结,实行民主",就被国民党市党部召去谈话,要它立即停刊。费了无数唇舌,

才获继续出版。原《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于1945年10月10日复刊，可是只出版了两个星期，就被国民政府禁止。对于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上海新闻出版界进步人士针锋相对，坚持斗争。1946年1月，上海新闻记者于友等61人，为名记者羊枣被迫害瘐死杭州狱中，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呼吁言论自由，人权保障。3月25日，由《文萃》等25家杂志社署名发表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被压迫同业宣言"。这些抗议，在全国甚至国外新闻出版界都得到了反响。这也反映了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进步舆论的中心。

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和平民主，最根本的力量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和组织力量。在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工人和学生是最主要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通过庆祝胜利、对敌清算、要求复工、检举汉奸、反对"甄审"歧视等等活动，很快组织起来了，成立了联谊会、工会筹委会等组织。1946年，物价继续上涨，6月份比1月几乎上涨了三倍。上海职工为了维护生存、生活的权利，开展了一系列争取按生活指数计薪、提高工资底薪等斗争。1—6月，罢工斗争215起，10151个单位，参加人数458297人次；劳资纠纷640起，5249单位，319238人次。这些统计数字，与上海80万工人比较，可见参加的面很广，而且联合性的大规模斗争较多。如1月，16000多棉纺织工人参加全市性罢工，要求发给年奖。经过坚持斗争，取得胜利。2月，棉纺织工人又进行以争取依照生活指数追加工资和调整底薪为主要内容的斗争。15日，沪东、沪西两棉纺工会各派出十几个工人代表，到社会局与资方谈判。谈判中，私营厂资方斤斤计较，中纺公司代表自恃后台硬，态度傲慢。工会乃发动工人分别进行怠工和罢工。当时纱布生产获利甚厚，拖久不利。于是私营厂资方首先同意按生活指数加薪；中纺代表陷于孤立。22日中午12

时，全市47家棉纺织厂13万余工人在5分钟内一齐罢工。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资方终于同意工人要求。谈判笔录签字后，各厂立即复工，显现了工人的组织力量。再如酒菜业职工争取发年奖的罢工斗争。首先是粤帮菜馆职工在中共党员的领导下，与资方谈判破裂后，1月30日先实现17家罢工，到第三天，全市粤帮83家大小菜馆3000余职工全部罢工。罢工坚持了15天。苏、锡、沪、徽、川、扬六帮职工代表，又向社会局请愿，表示不及早解决，将怠工援助。在强大压力下，社会局最后仲裁解决，粤帮职工罢工胜利结束。接着西菜帮11家、老正兴等81家也相继罢工，各帮菜馆资方均被迫接受条件。酒菜业职工取得了全市性的胜利。这一时期的斗争，绝大多数取得了胜利，为成立工会奠定了基础。上半年成立的产业工会有141个，职业工会93个，共有会员20万人。大多数的工会领导权为中共党员所掌握，其中著名的有法商水电公司工会、三区百货业工会、四区(沪东)机器业工会、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工会、颐中烟草公司工会等等。

在这些罢工和成立工会的活动中，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量的破坏和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暴露了它的反动面目，从反面促进了广大职工的觉醒。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职工运动为例。1945年8月，上电职工通过与日寇及国民党的斗争，取得了“损失费”，组织了工会筹备会。9月，经过斗争，又迫使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美国资本家签订了劳资协议：承认该公司存在华籍职工与外籍职工同职不同薪的事实，同意“同职同薪”的原则，愿意今后纠正；承认工会合法与工会代表有进行工会工作的权利；同意调整工资、发给职工胜利慰藉金等。事后，资方勾结国民党社会局一再不肯执行中外职工“同职同薪”等协议，连续裁员，借端开除工会筹备会总代表，阴谋破坏工会组织。1946年1月23日，工筹会在中共支部的领导下，发动全体职工2800余人，集中在发电厂内举行罢工，提出被裁职工全部复职、保障职业、保卫工会、改善待遇等要求，并决定

不到万不得已，不停止发电，以争取社会同情。上电职工带了铺盖留宿厂内，吃大锅饭，坚持“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一天不离厂”。资方和国民党特务用各种办法挑拨分化，毫无结果。颐中烟厂、上海煤气公司职工捐款购买大批大米送去慰问，各业职工也纷纷支援。罢工坚持了 9 日 8 夜。31日（农历小除夕）下午，国民党反动派驱使一批妇女，冒充职工家属，到厂门口大吵大闹，要丈夫回家过年。特务打手和警察乘机冲进厂里，打伤工人 10 余人，捕去代表19人，全部职工被驱逐出厂。“索夫团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大肆宣传“家属与工会冲突”、“工人互殴”，企图蒙蔽社会舆论。进步报刊立即揭露事实真相。六大公用事业职工联谊会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暴行。2月 1 日下午，上电职工 2000 多人包围社会局请愿，高呼“立即释放被捕代表”“实行真正民主”等口号。国民党调派大批马队，企图冲散队伍。但请愿职工靠墙而坐，秩序井然，屹然不动。各公用事业单位职工纷纷送面包茶水进行慰问，支援斗争。请愿坚持到午夜，法电职工借口上电工人罢工供应法电的电力不足，停输部分电力，向国民党施加压力，配合斗争。国民党连忙释放 19 位代表。请愿职工欢呼而回。以后经过谈判，资方收回开革工筹会总代表的成命，同意被裁职工复职、罢工期间工资照付等条件，承认工会在保障工人职业方面的监督权，斗争再一次取得胜利。经过多次斗争，工筹会团结教育了广大公司职工，并迫使资方承认了工筹会的合法地位。4月 12 日，工筹会召开工会成立大会，民主人士马叙伦等和公用事业各兄弟工会代表在会上一致勉励工人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受到了职工的热烈欢迎。社会局的科长在会上却百般挑剔，指责工会章程草案这条不对，那条不合。上电职工报以嘘声，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了民主的工会章程。在选举中，国民党分子宣传某人某人是共产党，唆使工人不要选他们，妄图篡夺领导权。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占了2/3，民主工会终于胜利成立。其它的民主工会，无不经过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了种种斗

争，才得以成立。工人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蜡烛不点不亮，国民党不斗不倒”。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于1946年3月1日召开理事会，决定改名为上海工人协会，通过新的工作纲领：协助各业工会及一切工人组织，加紧工人间的团结；努力于工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参加民主运动；进行工人生活改善，举办各种福利事业；进行工人的文化教育及技术教育，提高工人的知识及能力；谋与资方合作，加紧上海工业的恢复及其发展。它领导上海工人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上海学生通过反对登记甄审、要求读书权利等斗争，特别是通过“欢迎马歇尔”、公祭昆明死难烈士的活动，各大中学校学生都组织了学生会。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掠夺，物价高涨，人民生活艰难，许多学生面临失学危机。1946年1月，圣约翰、之江、东吴、沪江、大夏等大学学生，发起建立上海市学生助学联合会（简称“助学联”），在各大中学校建立“助学联”分会，领导全市学生举行义卖助学章运动。2月初，正是农历春节期间，98所大中学校的10000多名学生出动，在街头和公园演讲、演出活报剧，张贴漫画和标语，在剧场电影院放幻灯，到电台广播，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同时义卖助学章。这次活动，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对国民政府的控诉，得到了全市人民、特别是进步报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也遭到了国民党方面以“未经主管机关核准”“请各界人士切勿轻信”为名而施加的破坏。助学活动，帮助10000多名学生解决了学费问题，从而加强了学生的团结，提高了政治觉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学团联”）。

3—4月间，中小学以至大学教师因生活无法维持，纷纷要求提高待遇，并进行了怠教、罢教以至游行请愿等活动。为了发动群众解决教师困难，支持教师斗争，“学团联”出面开展“敬师运动”，组

织义卖、义演、义赛和劝募等活动，目标为1至2亿元。遭到了国民党三青团的破坏，甚至有的同学被捕，被开除。市教育局为了缓和教师情绪，与三青团控制的"学生总会"组织"尊师运动委员会"，计划募集20亿元。但直到5月初，国民党只募得3000—4000元。为了利用合法打开局面，"学团联"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派出代表通过教育家陈鹤琴促成与市教育局谈判，协议由教育局、"学生总会"、"学团联"联合举行尊师运动。办公地点设在市教育局，实际活动中心却在上海幼稚师范学校，利用合法，放手发动群众。5月24、28日，"学团联"组织105所学校30000多名学生上街义卖尊师章，募得20000元。义演、义卖、义赛等活动，到6月中旬基本结束，总共募得10亿元。6月16日，在天蟾舞台召开尊师联欢庆功大会，有学生和教师4000余人参加。郭沫若、林汉达等在会上讲了话，从教师生活困难的原因谈到必须停止内战，把庞大军费用到建设和教育上来。"裁减军费"、"解决教育危机，保障师生权利"等口号声和"反对内战，要和平"的歌声响彻全场。教育局和三青团头子气急败坏地退出会场。大会通电全国，呼吁立刻停止内战，并创议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联合会。学生运动与全市人民的反内战运动汇合在一起了。

知识界也组织起来了。1945年8月27日，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简称"小教联"）成立。1946年1月26日，又成立了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简称"中教会"）。它们都以举办学术讲座、演讲会等活动，分别把分散的私立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组织起来，开展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活动，并在保障职业、要求提高待遇等活动中扩大了组织。3月29日，上海市教育界同人团体联合会（简称"教团联"）成立，包括大中小学教师的团体和"职教社"等代表，支持教师活动，扩大社会影响。

青年技术人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于3月17日把"工余联谊社"改组成立中国技术协会，把400余名青年技术人员团结起

来，发展会员，开展活动。

经济界也逐步组织起来。5月20日，上海商学院、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保险学会、工商协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银行学会、济经周报社等10多个单位联合成立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公推马寅初为名誉会长，经济周报社为总干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财政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抨击。

大工业家于5月23日成立了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有180多个单位、25个同业公会参加，吴蕴初等25人当选为理事，提出确定国营与民营范围以免与民争利，发还被敌强占工厂，修正原料进口税率及估价标准，保卫民族工业等要求。中小工厂主则在沪成立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向国民党政府争取中小工厂的生存权利。除此之外，工商界人士为了交流经济情况、了解时局发展以利企业经营而组织起各种大小不一的叙餐会。随着时局的动荡，一些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常被邀请参加，共同分析形势、研讨对策，因而这些叙餐会也逐渐成为工商界人士参加和平民主活动的中心之一。

总之，为了争取经济的、政治的以至生存的权利，上海各界人民都逐步组织起来了，都汇集到一个目标，那就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

可是内战形势却越来越严重。政协决议刚刚签字，全国人民欢庆之际，国民党就在全国发动一系列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事件，3—4月，又在重庆召开它的六届二中全会和御用的四届二次参政会，公开撕毁政协决议，表明它决心要发动内战来维持其法西斯统治。与此同时，它又在西安、东北、济南、南通、北平、广州等全国各地演出一系列法西斯暴行，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查封进步报刊。在上海，2月23日，国民党组织上海学生2000余人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向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示威，然而参加的大都是受骗的中小学生，“似乎是中小学生领导了大学生”的游

行①。3月，社会局拨款筹建隶属该局的“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简称“工福会”），6月正式成立。主任委员陆京士，委员有童行白、周学湘等人。其主要任务就是借“指导”工人福利之名，进行特务活动，阻止和破坏工人运动。

面对着严重的形势，5月5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的那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各工会、学生、妇女、教育、文化艺术及工商等68个团体的200余名代表，举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选出马叙伦等29人为理事，通过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2日，举行第一次理事会，选出沙千里、马叙伦、胡厥文、林汉达、罗叔章、许广平、陈巳生、汤桂芬、甘田等9人为常务理事，马叙伦任主席，梅达君任秘书长，并发表《反对警管区制宣言》。其后，参加的团体达到92个。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福建省、湖北省、广东省三党务改革委员会在《文萃》第30期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本党六届二中全会的表示》，指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本党党内封建顽固的小组织希望继续垄断政权和更进一步的包办党务的表现”。6月6日，上海工人协会发表《为反对内战挽救工业危机告工友书》，指出目前工业危机“全因政治不安定，内战不休止，官僚资本垄断所致”，“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实行民主，挽救工业危机，保障职工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号召全市工友和职员为这一共同目标而携手奋斗②。同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由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马寅初等168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同时致书中共代表团转奉毛泽东，附寄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16日，上海经济团体联合会通过呼吁和平的宣言，指出经济

① 马叙伦的评论，见《民主》周刊20期。

② 《生活知识》第29期，又《群众》第11卷第7期。

危机已达极点，而当局正把每月2000亿的庞大经费用于内战，内战又破坏生产，所以解救的办法，只有首先停止内战，澄清政治。19日，70多校代表集会正式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号召全市同学联合起来制止内战。不到两天，在150多所学校建立了分会组织。在全市各界一致呼吁和平的形势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集近百个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会，协商推举出马叙伦（前代理教育部长、教授）、黄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胡厥文（合作五金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张绚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著名东北籍人士）、雷洁琼（教授）、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吴耀宗（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总干事）9位人民代表，晋京请愿。上海市"学联"也推选出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联主席）、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两代表，和人民代表一起赴京请愿。

上海人民代表即将赴京请愿停止内战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又进行破坏和镇压活动。18日，大中社发出消息："警察局认为本市出版之《文萃》、《周报》、《民主》、《昌言》、《人民世纪》等若干刊物，有违反出版法并抵触刑法之处，拟于日内予以查封。"① 21日，"学生总会"组织了"上海市学生反内乱大同盟"，举行反共游行，共约2千人。手举各大中小学旗帜，在复旦大学校旗下，有学生14名，大都是老师照应着的小学生，每将"反内乱"喊成"反内战"。前有流线型汽车开道，后有市政府派的5辆救护车保驾。第二天，国民党御用报纸大肆渲染为"二万人反内乱大游行"，目击者无不传为笑谈②。22日，国民党"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制止"内乱"问题。"代表"80万上海工人上书蒋介石，否认马叙伦等人

① 《周报》第42期第2页。
② 《生活知识》第31期第8页。

为上海人民代表①，为发动全面内战、策划“下关惨案”制造反革命舆论。但人民革命斗争，是吓不倒的。压迫越甚，反抗越烈。

6月23日晨，上海50000多工人、学生、职员、教师、工商界人士齐集北站，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在站外广场举行欢送大会，由王绍鏊、林汉达主持。陶行知在大会上说：“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并表示了第一次请愿不成，第二批去，发动群众步行赴京请愿的决心。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队伍由大学生带头，机器、纺织、百货、西药、银钱、公用事业、酒菜等各主要工会的职工，都参加了游行。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第一次喊出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等口号，分发了传单、宣言。沿途市民都鼓掌、呼口号表示支持。队伍从北站出发，经北浙江路、南京路、江西路、中正东路、西藏南路、林森中路、雁荡路到复兴公园，历时5小时。行经八仙桥青年会时，国民党特务从楼上掷下酒瓶、瓷盆等物进行捣乱破坏，引起了群众的愤怒。纠察上楼捉住3个特务，带至复兴公园。国民党派出大批警察，开动警车，将3个特务劫去，并在游行途中，捕去4名纠察，诬为“打手”而判刑。这是解放前上海一次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地下学委的吴学谦、李琦涛等建立了秘密指挥部进行指挥。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冯文彬、张承宗等都到现场。在获悉国民党反动派阴谋逮捕林汉达等人后，即组织力量加以掩护，不久就将林汉达转移到解放区。

代表团10人（胡厥文后去）还没有出发，就受到阻挠。反动当局企图停开火车，在群众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将车开出。但车经苏州、镇江，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布置的“苏北难民”的阻挠。车至南京下关，预伏的大批特务便对代表团成员横蛮地围困殴打。国

① 《生活知识》第31期第8页。

民党军警有意溜走不加制止。暴行从下午7时一直延续到午夜12时，代表们都受到了伤害，特别是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4位代表，还有大公报记者高某、新民报记者浦熙修以及民盟派往照料的叶笃义，受伤颇重，有的咳血、有的昏迷。这就是国民党预谋制造的下关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党还封锁消息，禁止报纸报道真相。

中共代表团闻讯，周恩来连夜率领邓颖超、李维汉、滕代远等赶往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分致三人会议国民党及美国代表备忘录，对国民党政府放纵下关暴行表示严重抗议，提出惩办祸首、取消特务机构、赔偿损失、保证代表安全等六项善后意见。毛泽东、朱德也致电上海人民请愿代表，表示慰问。25日晚，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等又在梅园新村欢宴上海市各界反对内战晋京请愿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因伤重未能出席），就中共一贯努力和平民主之经过作了说明，并阐述了中共对土地、工商业等各项政策。

民盟代表罗隆基等也赶往医院慰问。民盟为下关惨案致函国民党代表，要求惩凶、取消特务机关，保证人民自由。

24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全国和平运动大会致电蒋介石，要求“彻查凶犯，严办治安当局”，致电代表表示慰问。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沪西、沪东工人反内战民主促进会、百货业职工会以及各学校纷纷开会，发表宣言，表示抗议，一致要求严惩凶手，保障人民自由。上海工人协会号召全市80万工人誓死作代表后盾，为中国和平奋斗到底。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等八个文艺团体联合致电晋京代表，表示慰问。文汇报从6月24至28日，5天内收到捐献医药费20u余万元。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25日，陶行知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的名义，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和控诉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当晚，不少外国报纸就把下关惨案真相公布于世，国际舆论为之震动。为

此，国民党又策划暗杀陶行知。陶不得不离家隐蔽。

26日，上海请愿代表终于见到了蒋介石，力陈上海人民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希望促成长期停战和全面和谈。蒋介石假惺惺地承诺："就是这次谈判不成，我也不打，请回去告诉上海人民好了！"可也就在这一天，他密令其军队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点燃了全面内战的烽火。

"六·二三"的晋京请愿和示威游行，意味着上海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在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中汇集成声势浩大的统一战线，极大地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下关惨案"和蒋介石的诺言，又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国民党反动派决不肯放下屠刀，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上海人民只能针锋相对，团结战斗，开辟第二战线，配合人民解放军去粉碎反革命战争。

第二十六章　形成第二条战线

一、反美斗争高涨

以1946年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军为起点，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这场反革命内战，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起来的。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就扶植蒋介石，支持他打内战。美帝国主义用大量美国飞机和军舰运送54万国民党军队到内战前线，美军还直接在中国各主要港口登陆，替国民党抢占和防守战略要点及铁路交通线，驻华美军人数多达11万3千人。1946年3月，美国在中国设立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策划内战。从1946年1月至6月，美国援蒋物资达13亿余美元，为抗战8年间援华物资的两倍；为国民党军装备了25个师、训练了各种军事人员15万人。可见，是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在中国燃起了内战的火海。

美帝国主义一面在军事上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一面又在政治上扮演"调停"的角色，派出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与国共双方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制止内战。实际上是以"调处"为幌子，替国民党反动派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限制人民军队的反击，干涉中国的内政。在1945年12月，马歇尔一到上海，上海学生就在20日举行了"欢迎马歇尔特使大会"，到会有圣约翰、之江、东吴等43所大中学校的4000多学生，准备向马歇尔递交请愿书，提出撤退驻华美军、停止援助政府进行内战等要求。国民党特务冲进队伍，进行捣

乱，打伤了不少学生。学生们奋起反击，当场抓住8名行凶暴徒，愤而决定游行示威。“欢迎”马歇尔，和上海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驻华美军以殖民地主子自居，在中国犯下了种种暴行。首先是车祸。美军驾驶吉普车，横冲直撞，视中国人民如草芥，特别是酒后开车，更是肆无忌惮。如1945年12月8日，一辆美军卡车在沪连续肇祸四起，撞毁私人汽车一辆、三轮车一辆、人力车数辆，共辗死3人，重伤5人，轻伤1人。同年10至12月，据主管机关统计，此类车祸共达51起①。据《时代日报》统计，1946年8月至年底，美军在沪车祸达800起之多，平均每天肇祸5起以上。其次是抢劫。如同年1月12日，美军10余人在南京路大新公司附近，结伙抢劫行人的大衣、手表等财物。据官方统计，驻沪美军抢劫、欺诈案件，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10日的100天中，共发生31起。更为残暴的是凶杀和强奸的罪行。在沪美军酗酒闹事，殴打中国人的暴行几乎无日无之。1946年9月22日晚，人力车工人臧大咬子拉西班牙籍水兵赖令奈到朱葆三路安乐宫舞厅。赖不付车资即昂然入内。待到深夜，赖与美军伍长饶德立克走出舞厅，臧大咬子即趋前向赖索取车资，饶即一拳将臧击倒在地。经警方舁送医院，终以脑底破裂，于23日清晨5时死去。在全国人民强烈抗议之下，赖令奈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饶德立克竟宣告无罪释放。至于美军强奸妇女，也时有发生。上海人民刚从日寇的屠刀下解放出来，又遭到“盟军”如此的欺凌，无不切齿痛恨。反对美军驻华，成为上海各界人民的一致呼声。

早在马歇尔来华的时候，上海学生在“欢迎”马歇尔的斗争中，就提出了“撤退驻华美军”的要求。与此同时，马叙伦等61位知名人士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要求美国人民督促其政

① 《正言报》、《前线日报》报道，见《文萃》49期25—26页。

府：限期撤出驻华美军，“通过外交的方式协助中国政府的改造”。1946年9月22日，美国各民主团体发动“退出中国周”活动，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活动，一周时间在美国35个主要城市蓬勃开展，参加者达45万人以上。与美国的“退出中国周”相呼应，23日，上海10个人民团体联合发动“美军退出中国周”，要求立即撤退驻华美军，撤销一切足以助长内战的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援助。这一运动迅即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全国的“美军退出中国周”还不满3个月，12月24日，美军又在北平强奸了北京大学选修班的一个女生。27日，北大学生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决定罢课抗议。30日，北平学生10000人举行了抗暴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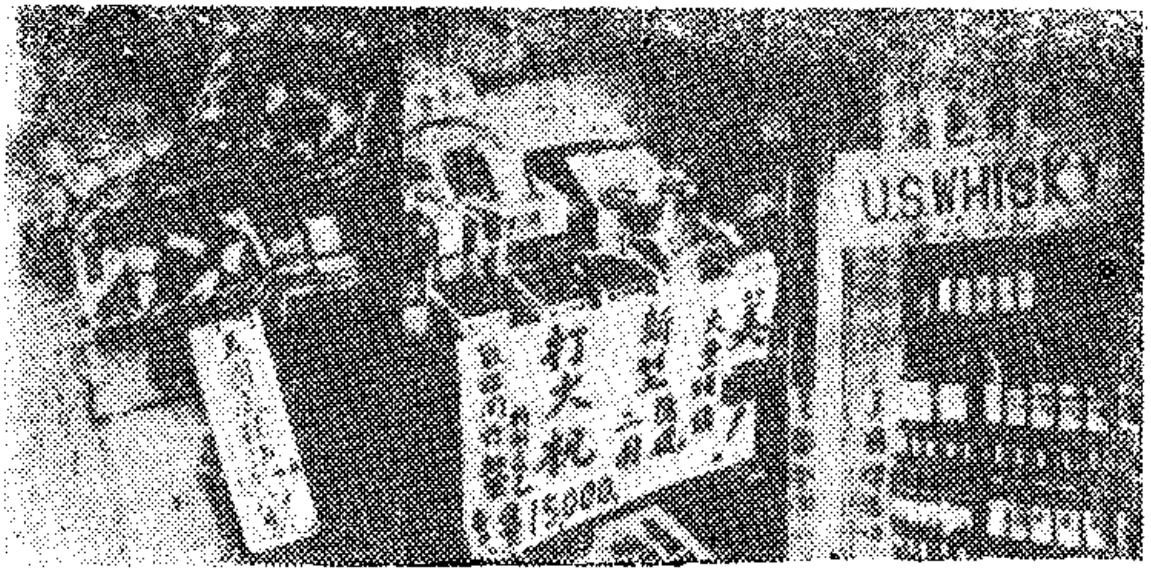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响应北平学生的抗暴斗争，28日，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召开声讨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大会。29日，“学团联”发表宣言：“全市三十万同学誓为北平同学作后盾，我们坚持美方必须公开道歉、惩凶，保证並立即退出中国。”交通大学全体学生开会，决议：学生自治会立即联络全市学校响应北平同学的抗暴行动，向美军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此类行同禽兽的美军，美军必须立即退出中国。上海妇女联谊会发表抗议美军暴行通电，坚决要求全体美军立即离华。30日起，全市大专院校学生实行罢课。31日，中共地下学委遵照上海局的决定，领导暨南、复旦、交通、中华工商、民治新专、同济、之江、光华、大夏、法学院、商学院、国立幼师等17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抗暴联”)，决定于翌日举行全市学生抗暴示威，並发出致全国同学和致北大同学两电，表示声援。同日，市政府邀集党政军各机关和各大学负责人商讨对付学生抗暴行动的对策，决定元旦只准在校内举行“新宪法”庆祝会，不准举行其他活动。1947年元旦，几十所大中学校的学生10000余人，按照“抗暴联”的决定，冲破国

民党的重重压迫，在外滩集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经南京东路、西藏中路、林森中路直到复兴公园，“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声响彻全市。平时神气活现的美军，都乖乖地躲在军营、兵舰上，不敢在街上露面。美国驻沪领事馆也大门紧闭，如临大敌。年已66岁的马寅初，在学校贴出通告，宣布罢教一天，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同日，马寅初、方令孺、田汉等38位教授联名发表《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声明上海及全国学生“对于严惩暴行、赔偿损害及美军撤退等主张，按之正义与政治上之需要均甚正确，应予声援”。6日，交大学生数百人组成10多支宣传队，深入各中小学宣传。广大同学积极响应，签名参加“抗暴联”。7日，上海工人协会在告工友职员书中，也提出了反对美军暴行的号召。3月8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沪秘密成立，担负起扩大抗暴运动和孕育全国学联的光荣任务。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迫使美军法庭不得不将强奸犯判处了15年徒刑。

抗暴斗争，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和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侵华政策和蒋政权的媚外政策，是一次重大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民主运动。

美帝国主义凭借和国民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的合作，在经济侵略方面也几乎达到了独占的程度。

美国对华资本输出迅速增加。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以美国政府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为主，至1948年6月止，实额达42亿余美元，其中“物资援助”，包括“救济”物资、租借物资、军事“援华”物资和剩余物资“售让”与“赠与”，合计净值38亿余美元，借款约4亿美元。这些“物资援助”，是美国推销过剩的军需品、农产品以及避免战后不景气的需要，也是国民政府打内战的需要。美国通过这些借款与“援助”，派人来中国建立了“联合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和“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或担任顾问，控制了国民政府的全部经济机构，对工农业生产和物资



美 货 泛 滥

分配实行"严密监督"。此外，美国各垄断财团也纷纷来华进行投资，仅上海一地，新设美商企业就有 32 家。战前，美国资本只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 8%。到 1948 年，美国在华企业和房地产投资，连同借款和"援助"，合计已占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 80%。

美货倾销的泛滥。至 1946 年 7 月，美商在上海设立的分支店达 115 所。中国买办官僚资本自设或与美商合资经营的企业，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商品推销网和原料收购网，如孚中公司独家经营美国 12 家公司的产品、扬子建业公司独家经营 16 家美国公司产品、太平兴业公司和 23 家美国公司订有经销合同。尤其是"联合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实为在华推销美国剩余产品的总机关。从 1946 至 1948 年的 3 年间，美国输进中国的物品总值(包括"援助物资")达 10 亿多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60% 以上(战前仅占 20%)。这 3 年，中国外贸逆差达 11 亿多美元，其中对美逆差占 77%。除了这些公开的倾销以外，还有驻华美军，上自司令下至士兵，利用美机、美舰、美轮以至邮包，勾结官僚资本、国民党军官以至走私集团大搞走私活动。1946 年 1 年，被中国海关查获的走私货，共值 112 亿元法币。当然这只是走私总

额中的一小部分。据香港当局公布，单由香港走私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货物，每月至少5万吨，多时达10余万吨。可见走私之严重。上海是驻华美军的中心和"联总分署"所在地，川流不息的美机、美舰、美轮以及大量的美军官兵，使上海成为走私货的集散地。

当时美货在上海可说是无孔不入，达到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几乎没有一家商店不卖美国货的畸形状态。永安等大百货公司，销售商品中有80%是美货。还出现了专门出售那些"救济物资"、"剩余物资"和走私货的美货市场，如中央商场、中美商场等等。在那里，吃的有军用食品罐头、奶粉、奶酪、花生、巧克力、洋酒、调味品直到口香糖和香烟；穿的有各种军装，从内衣到大衣、雨衣，从帽子到鞋袜；用的更是五花八门，有军毯、睡袋、蚊帐，有牙刷、牙膏、剃须刀、梳子、镜子、指甲钳、打火机，有玻璃（塑料）裤带、玻璃雨衣、玻璃（尼龙）丝袜、太阳眼镜，有钢笔、墨水、信纸、信封，有药品、化妆品直至草纸、月经纸，而且价格特别低，大抵只有国产品价格的1/3、1/5，有的甚至还不及1/10。这些货品排山倒海似的倾销，吸引了上海人民的购买力，严重地打击了上海的民族工业。

即以那些正式进口的美货来说，我国需要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急需大量工业设备，可是只占进口总额的3%左右，而且提供的也是剩余物资，都是一些陈旧落后的工业设备。其余的美货，则是"美祸"。1946年6月20日，上海《联合晚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完全给勒在进口货的手中，假若你有机会到海关去调查调查，你若发现那种货物大量进口了，那么你就可以大胆的断定，生产那种货物的我国工厂已被判定死刑了。"当年上海工业面临的情况确实如此。美国呢绒的倾销，加上国民政府改用美货麦尔登呢做军警制服，致使民族毛纺工业的开工率不及1/3，而且产品的半数以上积压在仓库销不出去①。美国剩余物资水泥以每包5000元的低价倾销，国产水泥的成本在九千元以

① 《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39页，中华书局，1963年。

上，上海唯一的龙华水泥厂被迫停产，靠出租发电机、码头仓库来维持①。在美货倾销的打击下，上海原有200多家制药厂，先后倒闭160家。上海原有袜厂240余家，有172家受尼龙丝袜倾销打击而被迫停业②。“由于美货大量倾销，沪市丝织业、毛织业以及制药业等所受打击最大，倒闭者也最多。此外，棉纺、手帕、卷烟、染织、橡胶等业亦正在焦头烂额之中。”“总计半年（1946年下半年）以来，沪市工厂行号倒闭者已达1600余家”③。连国民党海军部管辖的江南造船所的职工也发出了抵制美货的呼声：1946年7月16日，美国总统签署“海军援华法案”，规定将美国剩余舰艇271艘，供给国民党海军使用。既是倾销，又是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同日，江南造船所副所长陈藻藩领衔的16位职员在《新闻报》发表“造船业危机——只见外国船笑，那管造船人哭”的“读者之声”，要求国民党政府对美国船只进口，课取百分之百的重税，以保障国内造船工业。美货倾销，对中国农牧业也带来了灾难。美棉进口数量，1946年为1936年的20倍，造成了中国棉农的破产。1946至1948年，上海进口的美国奶制品数量超过了当时全市30年奶制品数量的总和，造成了上海的奶牛场在1946年就有半数以上停业，奶粉厂全部倒闭，连豆浆的销售也受到影响。余下的牧场只能“杀牛养牛”，靠卖牛肉来苟延残喘。牧场主不得不牵着奶牛上街游行，要求国民政府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口。

美货的大量倾销，造成大批工厂减产以至停工倒闭，大量工人失业，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抵制美货，挽救民族经济危机，已成为各界人民的一致呼声。1946年6月，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和百货业工会发起提倡国货运动。可是国民政府无视民族利益和人民呼声，于同年11月4日，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

① 《刘鸿生企业资料》（下）251、2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新闻报》，1950年11月20日。

③ 《经济周报》4卷1期，7页。

商航海条约”，即“中美商约”。条约共三十条，规定：美国人在中国“领土全境内”有自由居住旅行，从事工商、文教、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可以勘测和开发矿产资源和租赁保存土地，享受和中国人同样的经济权利待遇。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美国输入中国以及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中国“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的船舶，包括军舰，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遇到“危难”，可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中美商约”，称之为“新二十一条”。5日起，上海金融、工商、文化各界纷纷公开表示愤慨与反对。马叙伦指出，这种条约的实施，对于中国，其结果实际上走上殖民地的地位。茅盾表示，历史上任何一种条约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均无此次的露骨与彻底。6日，《大公报》社评指出：“以《江宁条约》为始的不平等条约，曾支配中国一百年的半殖民地命运。无疑问的，以这个中美商约为始的条约，又将支配中国今后的百年命运”！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上海发言人谈话，指斥“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度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政府订此条约，是为了“将获得更大更多的借款和投资，以便加强统治与扩大内战。”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严正地发表了“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但国民政府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取美援为唯一出路，其后又和美国政府签订了许多协定。

在反对“中美商约”和抗暴斗争的推动下，百货业职工反美情绪高涨。三区百货业工会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指示，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在召开了民族工商业者和职工积极分子的两次座谈会的基础上，于1947年2月5日，成立“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简称“爱抵会”），先后发表

宣言和"告各界人士书"，说明抵制范围只限于奢侈品、消耗品及本国厂商已能生产的产品和代用品，其他原料、机器、工业品不在抵制之列。号召各界人士共同行动"挽救自己的命运"。爱抵会决定2月9日在新都剧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向各工会和各工厂商店发出了请柬，同时邀请郭沫若、邓初民、马叙伦、马寅初到会演讲，以发动群众、扩大影响。

国民党特务对三区百货业工会早就十分注意，派人打进了新新分会，得悉爱抵会召开大会的密报后，即威胁新新公司资方不准出借新都剧场给爱抵会开会。资方屈服于压力，于2月8日晚通知爱抵会，剧场另有急用，不能出借。

爱抵会负责人和工会领导人知道会场临时拒借并获悉国民党准备破坏大会之后，连夜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会议改在南京路劝工银行大楼内的工会会所举行，增加纠察力量，维持好秩序。

二月九日上午九时，会场内已座无虚席，郭沫若、邓初民亦已赶到，到会群众情绪激昂，齐声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美国货、害人精"等歌曲。会议刚要开始，预先布置的两百余名国民党特务在会场内外同时喊打，亮出锄头铁尺，见人就打，见物即毁，抓起被打坏的桌椅、痰盂、茶杯，掷上主席台。职工群众对特务暴行万分愤怒，立即有许多青年职工和纠察一起，在主席台前排成队列，一面抵抗，一面保护郭、邓两人和女职工从台后安全撤离。坚持对抗了20分钟，特务仍无法靠近主席台。职工们齐声高呼："冲下去捉特务呀"。特务头子见势不妙，乃指挥特务打手撤离会场。特务在撤离时，还把永安公司鞋子部职工、在会场上激于义愤怒斥特务的梁仁达从三楼一直打到楼下，血肉模糊，昏倒在地；从会场里出来的职工，也被候在场外的特务，从楼上打到楼下，从大门口打到马路上。暴行持续40分钟，梁仁达伤重不治牺牲，还有重伤13人，轻伤数十人，会场的全部家具物品被捣毁，许多到会职工的大衣、围巾、手表、钞票等，也被暴徒抢去。在如此热闹的南京路上发

生那么大的暴行，没有一个警察出来制止，可是特务打手刚刚撤向宁波同乡会去领赏了，预先停在河南路上的警车，就呼啸而来，把受伤的职工和工会理事长等一起抓走。这就是有名的“二·九惨案”，又称“劝工大楼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三区百货业工会即分别召开各公司职工大会，由爱抵会代表报告暴行经过和梁仁达烈士被毒打致死的详细情况，並先后在各公司内设立灵堂，表示哀悼。广大百货职工，了解真相后，无比愤怒，在公司周围墙上贴满了抗议的标语，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和“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开展宣传、募捐等各种形式的斗争。爱抵会印发了《暴行经过纪详》，并派出代表到各工厂、学校报告惨案经过，控诉特务暴行。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如果没有反动政府的阴谋策划，没有预定的迫害方案和行动计划，暴徒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施展大规模的残杀与暴行？指出，这一惨案，从法律上说，是反动派侵害人民集会自由与身体自由，预谋杀害平民，危害公众治安的罪行。从政治上说，是反动派打击爱国民主运动，摧残人民力量的暴行。这不但是对上海市民的严重迫害，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挑战。

三区百货业职工的斗争，得到了全市各界人民的支援。工人、职员、学生、教师纷纷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支持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纷纷进行慰问和捐款，《联合晚报》、《文汇报》、《大公报》三报社同时代收捐款，百货职工还以吃素节约伙食费和义卖烈士纪念花等方式募集捐款，各项捐款共达9千余万元。同时，还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声援。惨案发生的当天，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等都到医院探望梁仁达，随即到黄浦警察分局交涉释放被捕职工。后来他们以及柳亚子、周建人、侯外庐、田汉、翦伯赞、艾寒松、楚图南、潘梓年等以召开记者招待会和通过《文汇报》、《联合晚报》发表意见，抗议国民党暴行。11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此召开会议，发表宣言。

指出劝工大楼惨案是较场口惨案的"更残酷、更卑劣、更无耻的翻版"！"全上海的市民，全中国的同胞，都应当从这次劝工大楼惨案中，认识今日上海统治者及中国统治者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真面目"！上海工人协会发表宣言，号召上海职工联合各阶层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特务暴行，要求惩凶、抚邮，为死者复仇，把爱用国货运动坚持扩大贯彻到底！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以及上海妇女联谊会、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等团体也先后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也致电百货业工会慰勉声援。

惨案发生后，百货职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归结起来，为三个方面。

首先，谁是凶手的问题。惨案发生当天，市长吴国桢发表讲话，称劝工大楼惨案是两部分职工"发生互殴"，"含有政治色彩之抵制美货，殊属非是"。第二天向记者谈话，进一步说："从开会的通知书及开会的唱词中看出显系别有用心"，"我决定把此次负责人找出来，在法律上、道义上均要他负梁仁达死亡的责任。"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是制造惨案的头子，却倒打一耙，说什么"上海市有人假借爱用国货名义，图遂其反美之阴谋，以致激起群众反感，发生劝工大楼之流血惨剧"，"甚盼法院当局依法究讯，必须彻底查明所谓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究系何人主持，……如此方可使梁君不白白死于政治骗子之手"。显然，他们制造了血案，还要拿被打的人来开刀，吴国桢就曾明白不讳地诬指被打的人是凶手。民主促进会在2月14日发表的《为二·九惨案宣言》中指出，"三区百货业职工提倡'抵制美货'，正是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的心理的表现"，"为提倡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三区百货业职工和允许开会的三区百货业职业工会理事长陈施君先生，绝对没有法律上或行政上的责任。如被陷诬，我们必须广大的联合，予以全力的支援"。政府当局"是在找出一个最初发起人，把一担垃圾向他身上堆，这

不仅想逃避责任，而且想'罗织大狱'。组织打人的已经够毒了，政府的用心假使真是这样，那不是更毒?!"上海工人协会的宣言，把从敌人内部了解到的特务行凶的计划、组织、动员和行动的全部真相，加以揭露。在《东南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全文转发，使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公之于众。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二·九惨案后援会于14、16两天，在《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驳斥吴国桢、方治的谬论，指责堂堂"党政大员"强词夺理，与暴徒一鼻孔出气。该会並聘请沈钧儒等十位名律师为法律顾问，准备同国民党开展法庭斗争，进一步揭露其反动面目。国民党理屈词穷，未敢起诉。通过谁是凶手的斗争，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和贼喊捉贼、诬陷爱国职工的真面目。工商界的俞寰澄说："提倡国货遭殴打，而且打到工商界的头上了，还成什么世界!"盛丕华说："看着自己的同伴被打死，谁能不表同情，不愤慨?"有位基督教友也写信给报社："百货业职工提倡国货抵制美货，在民族经济这样严重的时候，只要凡是他身体内的血还热的话，决不会加以反对"，"上海的基督徒再也不能把血淋淋的惨案漠然视之了。"《文汇报》、《联合晚报》天天刊载全国各地读者来信，反映了抗议的呼声和愤怒的火焰。连国际友人也拍案而起，如加拿大籍的文幼章教授怒斥"指挥暴徒的人是希特勒。希望中国人民起来，象良好的医生一样，把中国的法西斯的疔疮用手术割去。"

其次，是烈士家属的问题。梁仁达烈士的妻子高绍珊当时怀孕已5个月，不能上工，家中毫无积蓄，确实有许多困难。三区百货业工会成立了"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帮助料理后事，发动募捐给予帮助，同时派出梁仁达的义兄、中共党员专做高的思想工作，派女职工轮流陪伴高绍珊，帮助料理家务。社会上各阶层群众也以写信、捐款等形式向烈士家属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一切都使高绍珊感到温暖，极为感动。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她身处困境，阴谋收买拉拢。他们组织了"梁案工界后援会"、"梁仁达先生治丧委员会"，

由《立报》馆代收捐款，制造假象以混淆视听，欺骗烈属。他们派出“医生”、“护士”天天登门打针给药，遭到了高的拒绝。接着又派两个女特务经常“慰问”，进行欺骗和拉拢。高不予理睬。她们还赖在那里大谈吃喝玩乐，借此引诱和监视。吴国桢也亲自登门“慰问”，以募捐一亿元和住院疗养相诱。高绍珊不为所动，在家门口贴出“身体不好，谢绝慰问”的通告，把他们拒之门外。并通过报社发表谈话，申明梁仁达“为爱国而牺牲，必须举行大葬，不能草率了事”，“惩凶问题较之抚恤出丧等等更为重要”，“故凶手必须捉到，必须严加惩办”。义正词严的谈话，粉碎了国民党的收买阴谋。

最后，是烈士的丧事问题。三区百货业工会的“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为烈士在安乐殡仪馆举行大殓，除了百货业职工外，参加吊唁的，还有各兄弟工会、大中学校、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代表，共一千余人。共同哀悼烈士的牺牲、谴责特务的罪行。当时职工的情绪十分高涨，纷纷向工会提出要为梁仁达烈士“出丧”，借以向全市人民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向国民党示威。工会表示支持群众的要求，发表谈话，向国民政府公开提出惩凶、抚恤、赔偿及准许出丧等要求。同时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及时研究斗争策略。上海工人、职员、学生等纷纷准备参加“大出丧”，以坚决自卫与国民党斗争到底。国民党对此极为恐慌，吴国桢、警察局长俞叔平相继出面阻止出丧，並派武装军警到安乐殡仪馆看守烈士灵柩，密令殡仪馆资方不得警察局命令，不准移动。警备司令宣铁吾调动大批军警，准备在大出丧时进行更残酷的血腥镇压。中共地下组织及时分析了斗争形势，按照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在敌占大城市，决战时机尚未到来之前，必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适可而止，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因此，决定向各方面的群众做好说服工作，肯定已经取得的胜利，不搞大出丧，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改为3月15日在南弥陀寺开吊，由各界团体派代表参加公祭，适时地结束了斗争。

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既是争生存的经济斗争，又是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政治斗争。它从重点反美开始，在“二·九惨案”以后，转到了反对国民党暴行为主。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揭露了国民政府出卖主权、扼杀民族工商业、制造血腥暴行的狰狞面目，挫败了国民党的种种阴谋，使积极分子队伍和爱国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国民党统治集团更加孤立。

二、“向炮口要饭吃”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对上海人民更形加紧掠夺。

掠夺之一，苛捐杂税。根据当时《上海市政府公报》以及其他报刊所公布的正式捐税，列表如下：

上海市捐税表

1945 年 9 月—1949 年 4 月

开征年月	捐税名称	税　　率
1945.9	筵席税	20%
1945.9	娱乐税	30%
1945.12	房　　捐	依 1937 年估价，以租金额 60 倍课征 14%，按季征收，房主房客各半负担
1946.1	屠宰税	5%
1946.1	旅栈捐	20%
1946.1	所得税	
1946.1	营业税	
1946.1	财产租赁所得税	
1946.1	财产出卖所得税	
1946.1	遗产税	
1946.1	印花税	

（续表）

开征年月	捐税名称	税　　率
1946.2	娱乐税	从30%增至50%，以供应保卫团经常费
1946.3	保卫团服装费	随房捐附征100%，房东房客各半负担，六个月为限
1946.4	营业牌照税	按资本现值征5‰，或按全年营业收入总额征2.5%，或按全年佣金收入总额征6%
1946.4	房　　捐	按1937年租金180倍，14%计标，统由房东负担
1946.7	车船牌照税	按旧税率五倍计征
1946.7	防疫经费	4、5、6月随房捐附征50%，7月100%，由住户负担
1946.7	预征田赋	每亩征购白米一升，付代价法币240元
1946.7	教育补助金	随预征田赋每亩带收340元
1946.10	货物税	除卷烟、火柴、棉纱外，薰烟叶从40%改为50%，土酒从60%改为80%，洋酒啤酒从60%改为100%，糖从3.5%改为5%，並新开征麦粉、水泥、茶叶、皮毛、迷信用纸、饮料、化妆品七类。
1946.10	国民劳役代金	每人服役三日，代金每工3000元
1946.10	车船牌照税	加倍征收
1946.10	房　　捐	秋季房捐按1937年房租分甲、乙、丙三等各按2000、1500、1000倍的20%征收。冬季房捐按秋季各加一倍征收
1946.10	市政建设捐	夏季房捐带征之保卫团服装费及防疫经费停征，改征市政建设捐，除实收房租的20%由房东负担外，余均由住户负担
1946.11	市政建设捐	随电气、煤气、电话费附征10%
1946.11	地价税	年度税率为地价之15‰，黄浦、沪南、闸北、法华、引翔、漕泾六区开征。
1947.1	特种过份利得税	10—60%
1947.2	筵席捐	15%
	旅栈捐	5%
	娱乐税	25%，话剧20%
1947.5	田赋征借	依照1937年以前所征正附税总额或整编征粮底册之成果所列税额以四成计算。每赋额一元征实三市斗，征借一市斗，带征公粮九市升，合计为四市斗九市升。征借部分不另给粮食库券，自1951年起，分五年平均抵纳田赋或照数偿还，不计利息。
1947.5	屠宰税	每头：猪1.7万，大牛2.8万，小牛6000，羊3000元。
1947.9	缓征召壮丁优待金	每人3—30万元，包括大学、高中学生。

（续表）

开征年月	捐税名称	税　　率
1947.9	契税附加	随契税正额带征附加25%
1947.12	无出征壮丁住户优待金	每户2万、5万、10万、30万四等
1948.1	房　　捐	税率加倍
1948.1	营 业 税	税率加倍。医院配方，也征收营业税3%
1948.1	使用牌照税	最低50万，最高100余万
1948.1	营业牌照税	从5‰提至3%
1948.1	筵 席 捐	从15%提至20%
1948.1	娱 乐 捐	从25%提至30%
1948.1	屠 宰 税	新增驴、马二项屠宰税
1948.1	营利事业所得税	按去年6倍征收
1948.3	汽车使用牌照税	每半年，自用18.75万—60万，营业25—80万元
1948.3	汽车市政建设捐	每半年，每辆47.5万—137.5万元
1948.4	货 物 税	棉纱类从7%提至10%
1948.5	新兵安家费	无出征壮丁户分20、100、300万三级；及龄男子每人缴米五斗至十石
1948.9	土地增值税	
1948.9	缓征召壮丁优待金	每人1—4元金圆券
1948.10	田赋征借	每元征实、征借各十二升，公粮三斗六升，再按谷价每石金圆券3元折征
1949.1	地 价 税	开征7个区。上半年度征7.5‰
1949.1	自卫特捐	随地价税代征5‰
1949.3	地方保安捐	凡具有营业性之货物交易，不论出厂、批发、零售一律随货价附征地方保安捐1%（糖业、米业及其他各业征收5%）。
1949.4	地方保安捐	向各同业公会摊派“垫款”，毛纺工业公会即被派8亿元

由上表可见，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内的捐税不仅名目繁多，而且税率不断提高，税额奇重。例如田赋，抗战前每亩连同各种附税在内约1.4元，折计每亩征米一斗五升左右。而这时征借在四——

五斗以上。又如货物税，卷烟、水泥、化妆品等工业，因美货倾销，本已陷入困境，再要加征货物税，使不少工厂处于绝境。再如所刊得税，由于物价飞涨，工商业在帐面上的盈利不少，实际上是一年中物价的差价，是虚假现象，可是所刊得税就要按这种虚假的盈利累进计征，这种"虚盈实税"，是对工商业的掠夺。至于下面的种种摊派，未见正式记载，无法列入表内的更多。早在1947年1月，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讨论捐税问题时，徐永祚会计师就指出："现在每一个人，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生活，或文化教育娱乐等精神方面的生活，简直是无一不捐，无一无税"。"即使没有'万税'，至少'千税'是有的。"工商界代表一致指责："所谓'简化稽征'，实为非法摊派"；"虚盈实税再抽下去，不出两三年，工商界所有资本都要给抽完了"；旅栈捐、码头税为上海所独有，是不合法的；"义务劳动代役金"是不合法的"人头税"；这样"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是没落政府必走的途径。"这些苛捐杂税，工商界固然身受其害，但大部捐税，都在掠夺劳动人民的血汗。

掠夺之二，通货膨胀。随着内战的扩大，军费的增加，财政赤字也随之上升，国民政府除了出卖主权换取美援外，就靠滥发钞票来弥补。抗战爆发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抗战胜利时约为5569亿元，到1947年4月，即剧增至16万亿元以上。20个月时间，猛增28倍。物价随之飞涨，1947年7月的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3万多倍，比抗战胜利时也已上涨了89倍。如此迅猛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那些依靠工资收入的公教人员同样入不敷出，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即使原来略有结余的人，也蒙受巨大的损失。例如战前存款清偿问题，1946年12月，上海地方法院曾判决以1000倍偿还。这时物价已涨至5000余倍，储户已是很大的损失。但还遭到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制止。一直拖到1947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才公布"银行业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规定按每年

平均利率依月息复利计算，即 1937 年8月底前存入 1 元，这时以本利合计 1703 元偿还。此时，物价指数已经涨至 83796 倍。按此计算，1 元钱存了 10 年，连本带利只值 2 分钱了。这就是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掠夺人民的一例。不仅如此，国民政府的当权者还利用权力，拿这些日夜贬值的钞票，抢购黄金、银元、美钞、物资，使物价更加上涨，人民更加穷困，而他们却大发其财。

掠夺之三，投机垄断。上海是个生产的城市，也是个投机家集中的城市。国民政府就是最大的投机大户，就是这个大赌场的老板。它凭借篡夺的政治权力和金融垄断资本，翻云覆雨，大搞投机。例如官价外汇，控制在他们手里，民族企业是很难买到的，可是他们利用特权就可以买到。1946 年 2 月下旬，市场上每元美钞价格是一千几百元，而官价是 20 元。由陈立夫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以官价购入外汇 119 万美元。隔了不到 10 天，国民政府开放外汇市场，汇率改为 2000 元，这就攫取到 100 倍的利润。“国家”的财产就进了他们私人的腰包。如果按市场价格计算，那就至少获利 150 倍。1947 年 7 月 29 日，《中央日报》报道，在很短时间内，孚中公司获得官价外汇 153 万美元，扬子建业公司拿到 180 万美元。又掠夺了多少财富。又如黄金的投机买卖。1946 年 12 月 23 日，中央银行以抑平物价为名，大量抛售黄金，以每条(10两)400 万元的价格卖出 16000 多条，使金价降至每条 320 万元。随即又重新买进。一出一进，就攫取了 128 亿元。这样带头投机，从中渔利，一年合计获利约 6 千亿元。那些中小户就只有破产跳黄浦的份了。此外，国民政府还通过对原料、燃料等等的垄断，进行掠夺。例如 1947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由政府供给外汇之外棉产纱，由政府收购其半。20 支纱的收购价为每件 197.5 万元，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配纱牌价是 212 万元。它每收购 1 件纱，就掠夺到 14.5 万元。再如官办的燃料委员会，独占煤炭，对官营工业平价配售，而民营工业得不到保证，不得不以

高出平价一倍的价格从黑市购进。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通过这种种掠夺，官僚资本进一步发展，再加上美货倾销，工商业大量倒闭，失业工人增加，1946年，上海市失业的产业工人共30万，几乎等于全市80万产业工人的40%，许多人家在当光、卖光、吃光之后，全家挨饿。各阶层人民都面临着挨饿受冻的前景，不得不团结起来为争取生存而斗争。

上海人民反饥饿、争生存斗争是从摊贩斗争开始的。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失业职工和破产的中小商人大量增加。他们为了养家活口，只能摆设小摊，贩卖走私美货、"劫收"物资、破产厂商的存货、破产家庭的旧货以及食品等，以维持生计。而这些便宜货正适应日益贫困的市民的需要，因而摊贩业迅速发展，上海靠此为生的达10多万人。这是社会经济破产的反映，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暴露。

国民政府不顾人民生计，以"有碍市容"、"妨碍交通"为名，三令五申地限制和取缔摊贩。1946年7月中旬，市警察局发出布告，规定摊贩集中在指定地点设摊。8月10日，又公布"取缔摊贩规则"，规定摊贩须领取许可证，限时限地设摊。8月20日，市政府又发出布告，声称"为遏止窃风保护正当商业"，规定"自九月一日起，除书报外，祇准贩卖零食及来源正当之香烟设摊营业。其余摊贩仰各在月底以前改营它业，另谋生计。至期如继续设摊，即将其贩卖货物一律没收。"

摊贩对政府的决定，深感忧愤。其中原为失业的工人和警察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他们在中共地下警委的领导下，在部分摊贩骨干中进行工作，抓住时机，保卫群众生活，为争生存，与国民党进行斗争。9月，黄浦区摊贩推派代表向市政府提出收回成命等要求，并两次组织队伍，去市府请愿，喊出了"我们要饭吃"、"我们要生存"的口号。但国民政府变本加厉地下了"取缔不力，渎职论罪"的命令，迫使警察梭巡街头，一遇

摊贩就连人带货一并抓去。至11月中旬，在黄浦、老闸两区先后被捕的多达600—700人。11月30日，3000多摊贩游行，包围黄浦警察分局，要求立即释放被捕摊贩，发还没收物资。该局内的地下党员，把外面的消息告诉在押摊贩，使口号声内外呼应，并在警察中开展同情支援摊贩的活动，以配合斗争。国民政府调来大批保安警察和宪兵用水龙喷射、开枪镇压，打死7人，打伤多人。群众高呼："我们要活命"，"打倒刽子手"，"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为了镇压反抗，国民党军警当局下令全市戒严，对反抗群众"格杀勿论"。12月1日，示威群众增加到5000人以上，同时分别包围黄浦、老闸两区警察分局。军警继续镇压，在黄浦分局前，群众以石头、竹杠、木棒对抗军警的水龙、警棍、刺刀、步枪、机枪以及催泪弹，英勇搏斗。群众又被杀害10人、伤百余人。采访的记者也有两人被毒打而受重伤。

摊贩的争生存、反迫害斗争，震动全市，公交车辆停驶，大部商店停业，以示支援摊贩斗争。当晚，吴国桢向市民广播，歪曲真相，诬蔑请愿摊贩为"暴徒"，为继续血腥镇压制造舆论。合众社、路透社均称"这次骚动为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美晚报》评论："这次事件是上海经济的混乱状态及劳苦状况普遍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第二天，《大公报》的社评，也指出："内战天天在打，难民与逃役者转徙流离，外货涌涌在来，通货刻刻膨胀，工厂个个倒闭，商店日日萧条，国计民生整个成问题"，"由上海市摊贩的骚动，只此一点就可看到上海的黑暗前途"。

为了避免过多的牺牲，摊贩斗争不再扩大。而在全市人民公愤的形势下，警察不敢外出，美军也奉令禁止外出。市政府不得不允许摊贩继续营业，释放被捕摊贩、发还没收货物，並被迫撤换了警察局黄浦分局长。

摊贩斗争，使反饥饿、争生存的斗争开始进入新的高潮。它和紧接着的学生抗暴斗争、职业界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运动，形成

了全市性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革命新局面。

继之而起的是全市职工的争取解冻生活指数和学生要求提高公费的斗争。

随着军费开支的增长，物价猛烈上涨，1947年1月17日，中央银行发行250与500元票面的关金券，即发行5千、1万元票面的法币大钞。更刺激物价飞涨。加上内战的扩大，大量游资集中上海，抢购黄金、外币，2月上旬，上海出现"黄金潮"。1月6日，上海黄金价格是352万元(10两)，月底涨至近400万元。2月1日，突破400万大关，随之急剧上升。8日，涨至595万。10日，中央银行宣布停止对金号配售黄金，金价更涨达720万。11日，猛涨到960万，10天之内，涨了140%。外币及其他物价亦随之狂涨。17日，国民政府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禁止黄金、外币流通；将对美汇率从3350元提高到12000元，并实行外汇限额分配制度，进一步限制民族工商业使用外汇；冻结职工生活费指数，重申禁止怠工、罢工，违者"格杀勿论"；以"经济警察"管制市场，禁止私人资本关厂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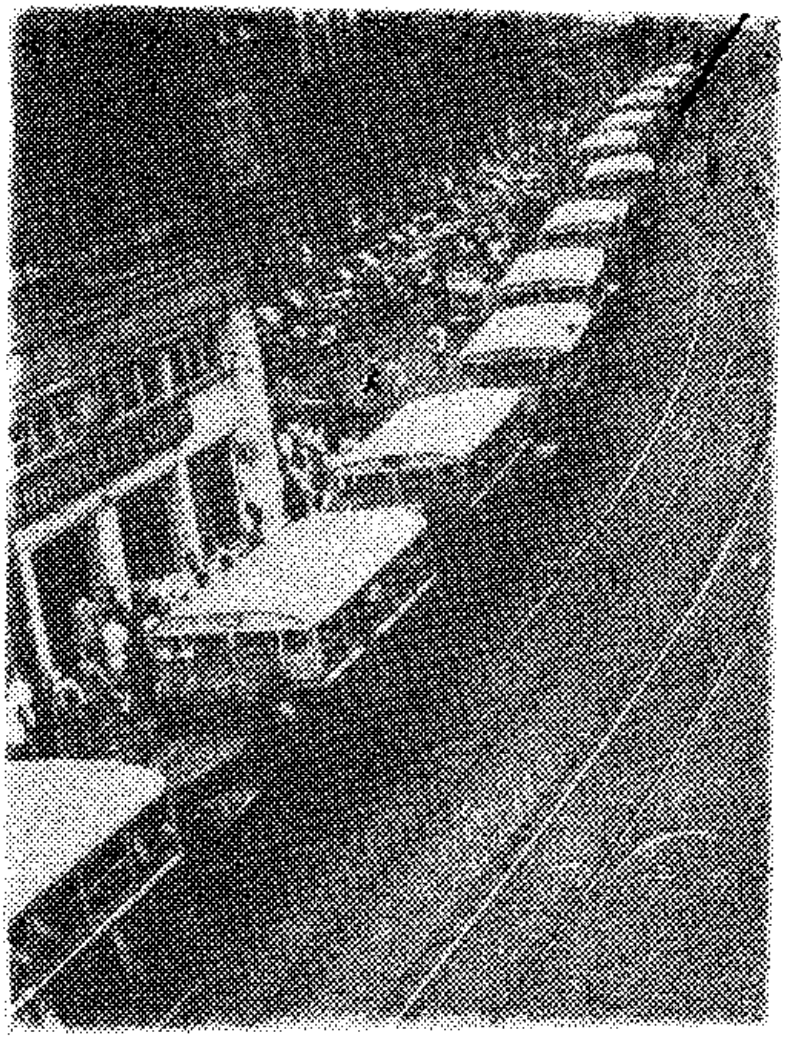
按照生活指数计算工资，是各业工人向国民政府斗争的胜利果实。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就勒令把生活费指数中占30%比重的米，从二号白粳换为次籼，并将部分米、油等价格按照配售价计算。这样一窜改，抑低生活费指数约20%左右。对此，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工会详细调查物价情况，拿来与官方的指数相对照，以揭露反动派压低指数，加紧剥削工人的阴谋。"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冻结生活指数，就是说以后不管物价如何飞涨，职工工资只能按一月份指数：工人7900倍，职员6600倍计算，而二月份公布的物价指数已达18000倍。

在这样的形势下，2月28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在白区对国(民)党对策指示》指出，人民活不下去的财政危机，人民既忍受不了，而前线继续大败，对人民也吓唬不了。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续高涨。党的策略是斗争要联系、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在工人和城市贫民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有了求生存的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恐怖、反内战独裁、反卖国的斗争上去，争取中间分子，建立广大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李维汉任正副部长，经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规定解放区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区党委均设立城工部，在蒋管区，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与平津、青岛、台湾，香港分局管辖华南及南洋各地党的工作，以加强和统一党对蒋管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上海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上海形势，于4月28日向中央报告，提出从生活斗争入手，进行突破并使之不断发展，逐步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经过由分散趋向集中的艰苦斗争过程，把蒋管区城市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按照报告的精神，地下党领导职工开展了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并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方法，目标统一，斗争分散，充分酝酿，扩大影响，去争取胜利。首先发动各业职工代表不断请愿，发表宣言，要求解冻生活指数。在纺织厂中，发动了此起彼伏的定时的关车斗争。4月29日，由上海工人协会发表“五一”宣言，集中提出了和平民主、保障人权、解冻生活指数、劳资合作共渡难关等要求。5月1日，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在跑马厅召开纪念会，企图进行反共宣传，并组织反共游行。进步工会按照地下党的指示，预作了布置。“总工会”理事长水祥云首先讲话，为了讨好工人，他提到了要求当局考虑在可能时解冻生活指数。工人群众乘机热烈鼓掌，高呼“立刻解冻生活指数”，口号声此起彼落达2分钟之久。社会部长谷正纲赶忙上台“训话”，硬说生活指数不能解冻，要工人想想“在业总比失业好”。群众议论纷纷，不愿听他讲话。吴国桢出而劝大家“束紧裤带”，作反共宣传时，2万多工人更

为不满，齐声高呼："肃清贪官污吏！""打倒官僚资本！""解冻生活指数！""实行民主政治"等口号。主持会议者马上宣布散会。散会后，工人群众亮出预先准备好的"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标语横幅，分路出发，举行游行。分散的广泛的发动，这时形成集中的力量，把国民党策划的反共大会变成了向国民党示威，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大会。接着上海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反饥饿运动就猛烈地开展起来。8日，1万多丝织工人，9日，法电全体工人2400余人，12日，3000余百货业职工相继举行游行请愿，"大票满天飞，工人饿肚皮！""物价天天涨，工资跟不上！""大米进入三十万，职工生命快到鬼门关"等标语口号，博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在50万职工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自五月份起有条件地解冻生活指数。



公交工人大罢工

在学生方面，"抗暴联"号召各校举行五四纪念会，在校内外进行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的宣传。5月4日当天，上海法学院学生在社会宣传活动中，遭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2人重伤，多

人被捕。该校学生立即决定罢课抗议。6日，“抗暴联”召开各校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上海五四事件后援会”，决定举行示威抗议。9日，各校学生代表700余人聚集在市政府院内示威，提出“保障人权”，“反对前方打内战、后方打学生”，“严惩殴打同学的凶手”，“释放被捕同学”等口号和要求。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与学生代表一起和吴国桢谈判，迫使他基本上接受了学生的要求。同日，51所中学的3000多学生游行，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反对不合理的会考制度，要求提高教师待遇。上海同南京两地中学生汇合斗争，迫使教育部同意“展缓一年”会考，斗争取得胜利。10日，交通大学师生罢课“护校”，反对教育部长朱家骅歧视打击交大的种种措施，提出不得更改校名、不得停办航海、轮机两系，不得克扣交大经费等等要求。13日，交大2800多学生，不顾市长、警备司令、市党部主任委员等人的威胁，冲破了军警的重重阻挠，自己动手开火车去南京请愿。朱家骅赶到真如车站谈判，答应不撤院系等要求。交大总支按照地下党的拖下去对我不利，尽量不要造成流血事件的紧急指示，及时结束斗争，胜利返校。同日，上海医学院学生在体格检查中发现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病，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斗争的鼓舞下，情绪激昂，提出了增加公费的要求，当时国立大学公费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24000元，平均每天只够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上海地下党学委据此情况，决定首先支持上医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然后推向全市各校。14日，上医学生开始罢课并全体出动至各校宣传。上海各国立大专学校，立即响应，从15日开始，相继罢课，提出“提高公费，抢救教育危机”等口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在12日就发动了要求增加公费的斗争。16日起，北平、天津的北京、清华、南开等校学生，江苏、浙江各地学生也相继投入反饥饿、反内战斗争。

各地学生运动从分散汇合成全国性风暴之际，国民政府在18

日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授权各地国民政府采取“紧急处置”和“有效制裁”镇压人民的民主爱国运动。

上海学生不怕威胁，在同日成立上海市国立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同浙江大学学生代表联合组成沪杭学生代表晋京请愿团，提出：增加教育经费，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一律公费，提高教职员工待遇，学生副食费增加至每月10万元、以后照生活指数增加等要求。19日，上海国立大专学校7000多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高举“向炮口要饭吃”的横幅，有的用竹竿吊两根半油条，上写“这是我们一天的伙食金”，欢送请愿团去南京。学生的口号喊出了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5月20日上午，京沪苏杭地区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向行政院请愿。游行队伍在途中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木棍、皮鞭的殴打和消防车的水龙冲击，遭打的学生有500余人，其中重伤8人，被击流血者50余人，还有20余人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南京“五·二〇惨案”。同日，天津、唐山的示威学生也遭到殴打，被捕多人。

当晚，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刘晓与上海学委的领导人一起听取汇报，研究决定：广泛发动学生，组织全市和全国的总罢课，抗议和反击国民党的血腥暴行。向社会各界充分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广泛争取和发动社会各界以及上层民主人士，支持和声援学生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中加上“反迫害”，以表达广大人民“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要求，使运动成为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斗争。21日，“抗暴联”召集全市102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上海医学院开会，讨论了成立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问题，并决定在23、24两天，举行全市总罢课，抗议“五·二〇惨案”，同时进行社会宣传，向全市人民控诉国民政府的暴行，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推向高潮。23日，24所学校学

生响应"抗暴联"的号召，实行罢课。24日，罢课扩大到73所学校。成千学生涌向街头，进行宣传活动。他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殴打和拘捕，象战场上的勇士那样前仆后继，英勇不屈。但是国民政府在22日，就宣布"维持治安的四项紧急措施"，並从各地调来不少军队，以重赏动员军警宪特，准备继续镇压学生运动。23日清晨，特务军警冲进上海法学院，殴打和搜捕学生，有11名学生被抓走。在这学生坚持斗争、敌人杀机毕露的紧张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于23日收到了中共中央肯定4月28日报告的复电。根据上海的斗争形势和中央的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的指示，24日，上海局再次向中央报告斗争部署：为了巩固战果，争取社会更大同情，教育中间群众，避免过早与敌人决战，暂时主动停止罢课，一面上课，一面斗争，采取上课、罢课交相运用的带弹性的斗争策略。6月3日，中央复电，肯定上海局的方针，要求抓紧社会上对敌人暴行的共同愤慨，利用统治阶级中某些矛盾，坚持抗议敌人暴行，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负责者等等，以团结内部，扩大同情。

从25日起，国民党反动派对各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殴打和搜捕。25日晚，交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学生系科代表大会讨论复课问题时，遭到宣铁吾派来的手持利斧铁尺的特务的袭击。全校学生闻讯赶来，包围了特务暴徒，迫使他们撤走。第二天一早，敌人在校外架起机枪，准备血腥镇压。交大地下党遵照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宣铁吾等采取制造事件，坚决镇压的方针，企图吓退群众，摧垮进步力量；吴国桢等则怕事情闹大了影响上海局势的稳定，对己不利）的指示，由学生自治会要求教授、校方共同出面向吴国桢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使吴赶紧来校。吴国桢到校后，即与教授、校方、学生代表谈判。与此同时，在草坪上公审了两名特务学生，並押至校长室，终于开除了这两人的学籍。吴国桢在谈判中被迫接受了"释放全部被捕同学""军警不得进入校内"等要求。同学们即去警察

局将被捕同学全部领回。吴国桢开始只答应释放交大一校的学生，但交大同学拒绝单独出狱，最后吴被迫答应所有被捕同学一律释放。27日开始逐步分批复课。但是国民党继续迫害学生。就在吴国桢接受学生要求的26日，大同大学三青团学生带领大批流氓暴徒，捣毁了学生自治会办公室，自治会主席等11人被打后还被警察局拘捕。当天晚上，复旦大学举行文艺晚会，欢迎被捕归来的学生。散会后，遭特务袭击，造成4人重伤、17人轻伤的流血事件。28日凌晨，大批军警和马队包围暨南大学二院，黑纱蒙面的特务学生带领军警按照黑名单捕人。同日上午，交大四位同学分别出外办事，被埋伏在校外周围的特务非法绑架。30日凌晨，3000名军警包围交大，冲入学生宿舍进行搜捕。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学生采取了紧急措施，千方百计把已暴露的人转移出去，大部分撤到了解放区，而且学生与军警对峙，军警无法下手，一直到早上约9点钟，不得不退出学校，因而国民党要抓的人一个也没抓到。但黑名单上的16名同学被学校公布开除。学生们义愤填膺，列队往市府请愿。队伍刚出校门，就遭到埋伏的便衣队的毒打，致使3人受重伤，30余人轻伤。下午，教授会举行全体大会，决定罢教抗议，並于第二天在青年会招待记者，报告事件真相，以争取社会同情，支援学生的斗争。

5月3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在斗争中正式成立，并决定出版机关报《学生报》。“学联”成立后，继续开展反迫害、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召开各校代表联席会议，引导各校结束罢课，并决定全市各校于6月10日总罢课一天，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同学。50多所学校响应号召，在这一天罢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乃告一段落。6月1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进一步团结同学开展新的斗争。

上海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是全国学生反饥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加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的大中学

生有5万多人，在斗争中受伤和被捕的达2000余人。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教职员工的支持和社会同情，特别是不少学校教授的罢教声援，斗争取得了胜利，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上海学生的反饥饿斗争同上海职工的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相互配合，相互呼应，使上海市政府穷于应付，被迫同意从6月份起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同意提高学生的“公费待遇”。上海人民的反饥饿争生存的斗争，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很大胜利，国民党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毛泽东对这场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当时情况就是如此。

三、反迫害斗争的进一步深入

国民政府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同时，对其统治区内的和平民主运动也开展了全面进攻。

昆明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按照南京的“中共与民盟分子同样可以密报、密捕、密决”的密令，于1946年7月11、15日，相继杀害了民盟中委、昆明支部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17日，周恩来在南京代表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指出：“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18日，周恩来在上海寓所招待中外记者时，又

以无限悲愤向新闻界控诉国民党暴行。10月4日，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出席的有6000—7000人。邓颖超在会上宣读了周恩来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鼓舞人们化悲愤为力量，坚持斗争。在上海，国民党特务把陶行知列上了黑名单。陶不得不离家暂避，寄宿友人家中。7月25日，陶行知先生在悲愤和劳累中脑溢血逝世。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都闻讯赶去。周恩来拉着陶的还未僵硬的手说："陶先生，放心去吧，您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您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您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您放心去吧。……"周恩来並致电中央，建议"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代表团分别向陶行知家属致唁。

8月13日，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宣布于11月12日单独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蒋介石以为人民解放军失败已成定局，得意忘形，主即正式发布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为了掩盖其专制独裁的实质，扮演"还政于民"的假戏，以威胁利诱的手段，拉拢中间党派和著名人士，但是甘愿卖身"跳火坑"的只有青年和民社两个小党和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少数"社会贤达"。前后出席国大的代表共1600余人，60%左右是十年前的旧代表，85%的席位为国民党所占。可见其标榜的"民主"全是假的。大多数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坚持人民的立场，拒绝参加並痛斥伪国大。例如民盟代表在10月4日于上海招待记者，表示"为了避免国家的分裂，民盟不仅决不参加国大"，並"希望全国同胞们一致反对这种会议的召开"。14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3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致民主同盟政协

代表函”，对他们不参加国大的声明，表示“至佩苦心，更钦卓断”，希望“作时局之砥柱，免国家于分裂”。

11月15日至12月15日，国民党悍然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在梅园新邨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揭露国大的召开，关闭了和谈之门。19日，周恩来飞返延安。临行前，通过中共办事处指示上海局：国民党地区黑暗严重的时刻又到来，必须坚持艰苦的斗争。5年的时间，胜利必将实现。鼓舞全体地下党员的斗争决心。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蒋记国大及其制订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上海工人协会等人民团体以及许多民主人士，也都先后声明不承认宪法，要求解散国大。尽管国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蒋介石还认为它使内战政策取得了“合法”的依据。特别是从7月到10月，国民党军投入内战第一线的兵力从72个旅增加到117个旅，占领了105座城市，更使他迷信武力。12月30日，蒋介石在“侍天字第70号”密令中，叫嚣“在今后一年内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下决心迫使中共人员撤出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2月21日，它迫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等撤返延安。28日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由宣铁吾署名书面通知中共上海办事处，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与此同时，派出大批军警重重包围办事处，並占领传达室，控制电话。董必武临危不惊，从容地对办事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就要同他们斗争。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我们党的任何一点机密，落到敌人手里。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外界知道这里的情况。”3月1日晨，寄来邮件、报刊均被没收。中外记者闻讯来访，均被拦阻门外严加盘诘。经过抗议、斗争，董必武才得以外出进行交涉。到市政府，吴国桢托词有事，不敢相见。董必武又到警备司令部，义正词严地责问宣铁吾：“我们中共代表团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为什么下令包

围我们，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宣无言对答，支吾搪塞。董愤然提出“在此期间，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你要负绝对责任。”反动派是割不断党和人民的联系的。在中共办事处被包围期间，黄炎培托他的学生转递一信，进行慰问，表示对代表团的期望和信任。马寅初和柳亚子，不顾个人安危，冲破军警的阻拦，先后昂首步入办事处，会见了董必武和办事处工作人员，给以极大的支持。2日晚，董必武等先赴南京。5日晨，办事处所有工作人员13人撤离。《文汇报》、《联合晚报》等记者数人，不顾安危到办事处送行，並为全体撤退人员摄影留念。同日，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及《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分别发表“奉令撤退”的启事。《群众》周刊迁港出版。南京、重庆的中共代表同时被迫撤退。国民政府就以这种行动宣布了国共和平谈判的完全破裂，並宣称：“以后如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于是红帽子满天飞，对国统区的人民革命运动进行更疯狂、更残酷的迫害。

上海是国统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是革命宣传舆论的中心。国民政府对革命报刊一贯进行迫害。在发动全面内战之后，1946年8月，市政府就查禁书刊109种。《周报》、《生活知识》被迫停刊。上海市杂志界联谊会为此发表了“为抗议《周报》被迫停刊宣言”。9月，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群众》周刊社，抢去《群众》72本，並在各书店报摊撕毁和没收该刊。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10月，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又指令派报工会，查禁批发出售《群众》、《民主》、《文萃》等革命刊物。《民主》周刊被市警察局勒令停刊。上海市杂志界联谊会发表《致政协第三方面代表备忘录》，揭露国民党查封、禁售、没收报刊，要求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沈钧儒等39人具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在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下，《文萃》杂志于1947年3月开始，改为《文萃丛刊》半月刊，每期以《论喝倒彩》、《臧大咬子伸冤记》等书名秘密出版，坚持斗争。在上海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的高

潮中，5月25日，市政府又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下令《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上海版“永久停刊”。7月23日，《文萃丛刊》的陈子涛、骆何民和吴承德被捕，其后先后在南京、宁波被杀害，人称为《文萃》三烈士。1948年4月，《世界知识》、《国讯》等又遭封闭，接着就出版《展望》杂志。总之，新闻出版界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迫害下艰苦斗争，坚守阵地。

国民政府对其统治区内的人民革命的迫害，更多表现在镇压工人与学生。1947年7月4日，蒋介石颁发《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直接出动宪兵、警察、军队，配备机动车队，全副武装，镇压工人、学生和民主人士。9月2日，又公布《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限期要共产党员向反动政府登记“申请脱离共产党”。19日，上海国民党反动派从搜查党领导的富通印刷厂，逮捕上海电力公司职工五人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职工进行大规模进攻，逮捕了上电、法电以及三区百货工会的领袖，并武装劫收这些著名的民主工会。上海工人坚决还击。电力公司职工首先罢工，接着法电工人为反迫害举行八天大罢工，英商电车公司工人也举行罢工，百货职工也先后举行联合罢工。与此同时，丝织、毛纺、机器等业工人都先后发动罢工和怠工，互相呼应。特别是发动了上海各业职工领袖200多人共同签名呼吁保障民主和人权，反对国民党解散工会、逮捕工人的高压政策。这样的联合反迫害斗争，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方式，连国民党特务头子陆京士也承认他们的大规模进攻的计划失败了。而那些被捕的干部在狱中坚强不屈，不断地向职工发出不妥协、不屈服、坚决斗争的号召。广大职工则努力奔走营救被捕同志，募集经费接济被捕同志及其家属，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共党员的周围，形成新的核心，打进和控制黄色工会，继续团结和教育职工群众，同国民党进行斗争。

8月，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开除了爱国学生400多人，取缔上

海学联，开了2000多人的黑名单，准备大肆逮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及时撤退了已经暴露的学生，并开展反迫害斗争。10月下旬，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惨死狱中。浙大师生首先举行罢教罢课，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迫害运动。11月11日，上海学联发表抗议书，并号召用罢课、鸣钟、素食或捐款等方式表示哀悼和抗议。国民党进一步殴打、逮捕和开除进步学生，但仍有交大、复旦、同济、约大、中华职业等30余校响应罢课，其他各校学生也采取了适当的方式表示纪念和抗议。

10月27日，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部分领导人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活动。新华社为此指出：“这表示日暮穷途的蒋家何等恐慌，何等孤立，何等疯狂，此举不啻宣告蒋介石的最后政治破产。”“民盟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历史的发展，果真是这样。7日，张澜以个人名义发表《呼吁书》，号召民盟盟员继续努力。同月下旬，沈钧儒秘密离沪赴港，与先后去港的中委，重建领导机构。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几个民主派别也在港联合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们都宣布同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正式成立，继续参加人民革命斗争。1948年3月，民盟总部在上海秘密成立上海区执行部，领导苏、浙、皖、赣、鲁、豫六省和沪、宁、青三市工作。

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从1947年7月进入了战略进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赓兵团豫西牵牛，陈粟大军进军鲁西南，经过不到半年的作战，创建了联成一片的鄂豫皖、豫西和豫皖苏三大新解放区。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互配合，又收复了许多被占城市，歼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全面防御的计划。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好准备。中共中央上海局随即先后在上海及香港秘密

举办各级干部学习班，学习毛泽东代表中央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总结斗争经验，安排今后工作，适应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1月29日至2月2日，5天之内爆发了同济血案、舞潮和申九惨案三起反迫害斗争，震动全市。

同济大学学生是上海学生"救饥救寒运动"的先导。时届冬令，同济大学基督教学生团契在校内发起劝募寒衣，发放给校外的贫民。地下学委发现这种自发活动后，即指示同济大学党总支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12月19日，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基督教学生团契正式成立"同济劝募寒衣委员会"，由300多同学组成50多个劝募小队走出校门，向社会人士进行劝募。28日，全市80多所大中学校2万多学生，响应市学联的号召，上街劝募，喊出了上海广大劳苦大众的呼声："我们要饭吃！我们要衣穿！"学生的正义行动，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支持。经过先后3万多人、10多天的劝募，共募得15万件寒衣和10亿元现款。全市学生按学联的统一划分地区，深入社会底层，向饥寒交迫的贫苦人民送衣送粮，看到了贫民窟里的人间地狱，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罪恶。面对这场来势迅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救饥救寒群众运动，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慌恼怒，但又束手无策，镇压不得。于是迁怒于运动的发起者同济学生。1948年1月17日，上海学生2万余人举行抗议英帝国主义九龙暴行的全市示威游行中，同济大学2千学生又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再一次引起敌人的忌恨。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向同济学生开刀。1月9日，同济大学校长丁文渊宣布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学生自治会章程》，不许成立系科代表大会，由校方指定15个级长筹备学生自治会，各学院分别成立，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全校同学愤起抗议。被指定的15位级长也发表声明，拒绝校方指定。13日，不顾校方的威胁，投票选举了学生自治会理事。14日、18日、21日，丁文渊三次宣布，共开除和处分同学35人。21日，全校同学绝食抗议，晚上举行控诉大会。25日

晚，市学联在同济工学院召开“支援同济大学争民主反迫害大会”，60多个大中学校的代表1500人，当场成立了“上海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济同学后援会”。26日，同济学生自治会决定，如果28日下午与校方交涉再无结果，就在29日赴南京请愿。同时派代表访问教授会作最后努力，但是丁文渊悍然拒绝学生的正义要求。

29日清晨，国民党调集的几千名军警特务包围了同济大学工学院，封锁了通往市区的交通要道。集中在工学院的1000多名同济学生被堵在校内。复旦、交大、约大、大夏、法学院、南模中学、中华工商等校的1500多名学生赶去支援，也遭到阻拦。经过英勇冲击和抄小路、涉冰河等办法始得会师在一起。吴国桢等赶来“劝阻”、“谈判”，又采取拖延战术，从上午10点3刻一直拖到下午2点30分，由于丁文渊避而不见，无法谈判。僵持到3点30分，反动军警抓石块掷学生，学生也以石块还击，特务乘机捕去5人。随即骑巡队猛冲，挥舞马刀、枪托，劈打同学，其美路上鲜血四溅。学生们



学生与骑警对抗

拾起筑路石块，英勇还击。在搏斗中，69位同学受伤，重伤4人，33人失踪。反动军警也有多人被石块砸伤。其时吴国桢与学生多人在校。门外草棚内相持谈判，同学眼见如此暴行，上前向吴国桢质问，吴被挤滑了一跤，眼镜落地，当即诬称被打，其左右周围的军警特务和随从人员，随之高呼"吴市长被学生打了！"混淆视听。为了避免进一步受到袭击，学生整队退入校内。军警则把学校重重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出，准备大搜捕，妄图把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一网打尽。晚上，各校同学以更激昂的情绪，齐集礼堂控诉血债，同时派出代表向吴国桢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撤退军警，释放被捕同学，赔偿损失。吴国桢伪装受伤，並在家中招待记者，同时竟下令扣押其他学校代表，並迫令同济代表转达四条无理要求：交出今天为首闹事学生，交出已被开除的学生，交出殴打吴国桢的凶手，限期复课。同济学生续派代表严词拒绝无理要求，严正指出，政府军警殴打和残害学生，才是凶手，吴国桢自己在混乱中跌倒，亏得同学们将他扶起，何来"凶手"？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相持到9时，军警特务冲入校门，包围会场。10时，头戴钢盔的飞行堡垒打手，带着警察特务破门而入，进行威胁欺骗。同学们怒目相向，齐声怒吼："军警退出会场！""释放被捕同学！""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敌人亮出钉棒、皮鞭、短棍，几个人猛打一个手无寸铁的同学，拳打脚踢。同学们英勇自卫，坚决搏斗。同学们又被一个个强拉出礼堂，门口站着一些只露出眼睛的蒙面特务，按照黑名单指名捕人。又有200多位同学被捕。其余同学被拉到操场上，一堆堆隔开，由军警特务监视包围。同学们虽然饥寒交迫，仍坚持斗争。敌人一面派遣特务继续认捉同济的学生领袖和"共党嫌疑"，一面把外校学生按校分隔，召各大中学校校长按学生证领回学生进行迫害，没有学生证的一律逮捕。敌人以为这样总能给共党以严重打击。可是共产党员与群众有血肉联系，在广大同学的掩护下，都安全撤出。只有站在第一线公开参加斗争的同学被捕。但敌人找不到一点肯定他们

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敌人的阴谋破产了。接着，同济又开除和处分了100多位同学。其他大学也有40余人被开除。这些被开除的以及已经暴露不宜再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分批转移到解放区。而在运动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调整组织，继续坚持斗争。那些被捕的同学，在狱中坚持斗争，在校的同学则开展声势浩大的营救斗争，内外呼应，迫使敌人尽速释放被捕同学。3月15日，上海地方法院对被捕的11位同学进行审判。同济、复旦、交大、约大、师专等校3000多名同学齐集法院门口，高举"誓为同济大学被迫害同学的后盾"的大横幅，向被捕同学献旗致敬，支持他们斗争。11位爱国民主律师义务为被捕同学出庭辩护。被捕同学和辩护律师的正义声音，使敌人的审讯失败，不得不宣布"退庭"。3000名同学乃整队游行，进一步揭露国民党迫害学生的罪行。4月16日，上海地方法院不得不宣布所有被捕同学无罪释放。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一·二九"同济血案，残酷迫害青年学生的罪行，在全市各界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月29日的同济血案，已使国民党反动派疲于奔命。31日又发生了舞潮案。市政府发布了禁舞的命令。上海26家舞厅业职工和1000多名舞女纷纷起来为了求生存，要吃饭而反对禁舞。舞厅资本家和黄色工会，想利用这股力量，维护他们的利益，也在社会上造舆论。舞女成立了"上海市妇女会舞女联谊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争取支持。国民政府无视他们的呼声。提出"分批抽签禁舞"。1948年1月31日下午，舞厅业从业人员召开第三次大会，提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转业"、"反对抽签禁舞"等要求，会后集队往社会局请愿，3000多人的队伍也颇有声势。社会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引起群众不满。军警挥棍打人，请愿群众奋起反抗，痛打警察。社会局办公人员惊慌逃离。请愿群众冲进机关，切断电话线，敲碎门窗玻璃，拆毁办公桌椅，撕碎公文纸片，把社会局砸得落花流水。大批军警赶来镇压，又形成混战，最后被逮捕了500—

600人，舞女联谊会被查封。但反动政府也被迫取消禁舞令。舞女以伴舞为生，备受欺凌，这是国民党经济危机造成的。而又下一纸命令，要断绝她们的生计，屡次呼吁，不理不睬，以致矛盾激化。国民政府竟将被捕人员交特刑庭审理进行政治迫害。各方舆论纷纷加以谴责，才转而移交地方法院审理。

又隔两天，2月2日，国民政府又制造了申九惨案。1月30日中午，申新九厂工人因要求发给配给品和年终借薪，以解决断炊之忧，举行罢工。日夜两班工人7000多人齐集厂内。资方一面拖延谈判，一面勾结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罢工。国民党反动派象输红了眼的赌徒，2日清晨，又调集大批军警包围申九工厂，准备对赤手空拳的工人下毒手。反动军警在资方的欢迎下进入了第一、第二道铁门，朝第三道门扑来。工人纠察队用铁链牢牢锁住这道铁门，以为防御，与军警隔门对峙。在市警察局长俞叔平的指挥下，警察剪断铁链，以装甲车在前，警察在后，朝三门冲。工人们使劲顶住三门，不让敌人进来。不料用力过猛，铁门向外开出去，警察乘机涌入，敌人的装甲车朝工人手挽手的一道道人墙开去，许多工人被撞倒在地，血肉模糊。工人怒不可遏，用砖头、木棍、椅子、桌子、油桶、铁块向敌人投去，用水龙喷射，使军警抱头鼠窜，夺回了三道门。晚7时，反动军警又发动第二次进攻，仍以装甲车打头阵，工人们推出卡车，並开足马力对准装甲车撞去。终究卡车顶不住装甲车，敌人再一次涌进三门。接着，敌人投掷催泪弹，但恰为逆风，反使军警涕泪交流，加上工人投掷石块更猛，使军警无法前进。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开枪，屠杀工人。在这次斗争中，3名女工死难，受伤百余人，其中重伤40多人，被捕236人，其中被判徒刑26人，被开除365人。3日，反动当局把工人的求生存反迫害斗争污蔑为“极少数阴谋分子为了一己私利，裹胁善良工友罢工”，把他们的血腥镇压美化成“解救工人出围”，宣铁吾在记者招待会上杀气腾腾地叫嚷：“今后如再发生类似申九的情况，一律格杀勿论”。上

海工人协会则发表《为申九惨案宣言》，揭露国民党屠杀工人真相，号召全市工人用各种方式来援助和支持申九工人，“为死者雪仇、生者求存而斗争”。呼吁社会各阶层人士同情申九工友，共同斗争。申九惨案发生后，全市工人、学生、各界人士纷纷起来支援。各业工会组织申新惨案后援会，召开大会，追悼死难工友，控诉国民党暴行。22日，全市许多职工、学生以至警察，都臂缠2寸2分宽的黑纱，表示对申九“二·二”惨案中死难工友的哀悼，对国民党暴行的抗议。在短短几天里，就收到捐款法币3亿2千余万元，慰问受伤及被开除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

5天内三次斗争，反映了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国民党动用几千全副武装的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舞女和工人，也反映了它已开始走上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绝境。而人民的反压迫求生存斗争，已发展到敢于同军警搏斗的程度，说明人民和反动派之间的生死决战就要到来了。

在工人、学生遭到血腥迫害的同时，教师又起而发动抢救教育危机的活动。1、2月间，中等教育研究会顶住市教育局的诬蔑和恐吓，制卖“热心教育章”，筹募捐款4亿元，救济清寒学生。举办清寒学生免费助学考试，录取217名学生，保送到省吾等39所中学入学。2月6日，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与中等教育研究会联合举行校长、家长、学生和社会人士的招待会，发表“为抢救教育危机公告社会书”，要求政府负责提高教师待遇，减轻家长负担，不使一个学生失学和帮助困难学校。以周建人、郁爽秋、陈伯吹等为主要成员的上海市学生家长联合会，发表宣言支持教师的要求，并进一步提出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工资应按月调整，公立学校除书籍费外一切巧立名目的收费应由政府负担。“小教联”和“中教会”还发动赞成抢救教育危机主张的签名运动，得到各界的热烈拥护，至24日，签名的已达20万人。8日，农历小除夕，1000多名教师举行同乐会，正式成立上海市各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会，领导斗争。25

日，“抢教联”派代表6人去市参议会请愿，500多位教师以听消息为由，集中市参议会表示声援。市政府竟调集军警加以包围。教师、学生、家长组成请愿队伍，冲破封锁，经塘沽路、四川路、南京路到西藏路，不顾“游行示威格杀勿论”的反动法令，举行了示威游行。请愿队伍佩戴哀悼申九遇难工人的黑纱，高呼口号。28日，教育局被迫答应发放私校教育福利金。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提高了教师的斗争信心。

接着，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战后美国的远东政策，以反苏反共为其目标。在援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同时，扶植日本作为它控制远东的工具。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批准的“日本输出输入货物表”，对华输出的是纺织品、化学药品、灯泡、水泥、玩具等中国工厂完全可以生产的商品，以推行其“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恶毒计划，把中国重新推回殖民地的境地。美帝国主义这种扶植日本威胁中国的政策，理所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是国民政府却完全屈从美帝国主义的意旨，开放对日贸易，并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奉为上宾，把这个应受审判的战犯留作顾问。

1947年7月，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成立的爱用国货运动委员会召开全体执监委会议，决议发表宣言，反对开放对日贸易，呼吁各界紧急声援，并吁请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停止派遣赴日代表。22日，上海各大报刊登了“机联会”宣言。24日，政府输出入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及中央信托局副局长出面为政府解释。“机联会”随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意见，驳斥欺骗商民的“解释”。各报刊刊登了这一意见。各界知名人士褚辅成、孟宪章等发表文章，反对开放对日贸易。国民政府无视各界人民的反对，还是通过了开放私人对日贸易案。于是“机联会”联合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国产销协会生产促进会等工商团体，于8月6日成立了反对开放对日贸易赴京请愿团，

提出了本国已有物品不准输入、防止日货走私等五点意见。16日，请愿团14人赴南京向经济部、财政部、行政院请愿，並举行记者招待会。国民党当局为了减少舆论压力、缓和与民族工商业者的矛盾，提出工业界可推选代表二人参加对日贸易代表团。工业界在拒绝推派的同时，发表了保留对日贸易监督权的声明。这次反对开放对日贸易的活动，虽未达目的，但在社会上初步揭露了国民政府的媚外面目。这是反美扶日运动的先声。

1948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国人士，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美国扶植日本的事实。《经济周报》在3月11日出版的6卷11期上，发表反美扶日专辑，宦乡、石啸冲、宾符等都发表了专文。上海《大公报》连续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表发言记录，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并同时就此一问题发表多篇社评与专论。上海各校学生随即纷纷举行讨论会、演讲会，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

5月4日，上海学联发表《告同学书》，号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扶植日本法西斯，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当天，120所学校的10000多名学生汇集交通大学，举行盛大的营火晚会。会上孟宪章揭露了美国正加紧扶植日本的大量事实，指出反美扶日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的迫切任务。大夏大学同学出示血衣，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毒打参加反美扶日集会学生的罪行。在热烈的掌声、口号声中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

22日，10000余名学生又在交大集合，纪念“五·二〇”一周年，升起“上海学联”的会旗，高唱“上海学联歌”，列队接受主席团“检阅”。大会发起全市10万人的反美扶日签名运动。会后，运动以征集签名、举行座谈、唱抗日歌曲、控诉美日侵略罪行等各种方式在各校展开。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教授、文化工作者、进步的民族工商业者，都纷纷参加学生的集会，支持反美扶日运动。

反美扶日运动在上海发动后，南京、北平、广州、福州、汉口、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学生和各界人士，也相继奋起投入运动。

6月1日，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347人联名上书杜鲁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3日，交大学生会邀请各界人士来校举行反美扶日座谈会。体育馆坐满了人。有大中学生、教师，有新闻、工商等各界爱国人士，也有不少工人赶来参加。吴国桢应邀参加了会议，抢先发言，大谈美国救济大米养活中国人，不能忘恩负义，少数人要挑拨中美友谊，不要中了共产党的计，等等。讲罢就在一片嘘声中匆匆离去。各界代表一个紧接一个起来发言，从各个角度驳斥吴国桢的发言，会场军警密布，而人无惧色。

4日，上海教育、工商等各界领袖288人联名发表"对美国积极扶日复兴的抗议"。学联决定举行全市性的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吴国桢得到消息，召开各大学校长会议，施加压力，要各校阻止学生游行。同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招待记者发表声明，诬蔑反美扶日运动是"阴谋"，"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进行威胁。

5日，国民政府发表抑制反美扶日斗争的声明。接着《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叫嚣对爱国学生"与其养痈贻患，不如操刀一割"，"当机立断，斩草除根"。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公开号召一切国民党分子与爱国学生"作生死之斗争"。但是人民革命运动是吓不倒的。原定本日举行的示威游行照常进行。是日清晨，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军警，包围封锁了交大、复旦、同济、约大、中华工商各校，使这些学校学生无法到校外游行示威。仅包围交大，就调用了青年军一个营、保安警察一个大队、警察一个大队，共1000多人全副武装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这些学校的学生没有强行冲出包围圈。交大改为在校内游行示威，并对包围他们的军警和围观的群众，进行宣传。但是国民党军警不可能包围所有的学校。下午2时，震旦、大夏、光华、女子师范、立信专科、华实中学、储能中学、建承中学、青年会中学等校学生5000多人，

克服阻挠到外滩集合，举行游行示威。反动派又出动大批军警、马队驱散队伍，殴打学生，被捕60余人，负伤的就更多。学生们被驱散后又集合在南京路上，边游行边宣传，得到了沿路市民的同情和支持，队伍到达大上海电影院门口开大会以后，才胜利结束。这是上海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市性的大规模学生示威。

6日，吴国桢举行记者招待会，大骂学生"越轨"，诬蔑学生"假爱国之名，图卖国之实"，向交大学生自治会提出"事先何人向系科代表大会要求行动？何人主张罢课游行？"等等"七点质询"，责成交大校方"查复"，发动"神经战"。交大学生对此表示抗议。学生自治会公开复信予以逐条批驳，並提出"反质询"。吴国桢又在各报抛出"五四营火晚会何人召集"等"八点再质询"，并威胁说："如不公开答复，将由军事特种刑事法庭传讯交大学生自治会干事"。这就更激起交大同学的怒火，纷纷提出强烈抗议，各阶层人民纷纷写信表示支持。学生自治会根据党总支的指示，发出了第二封公开复信，重申爱国立场，并向吴国桢提出"爱国犯了那一条法，那一条校规？"等十一点质问。这封信在《大陆》、《正言》、《益世》三报发表后，吴国桢没有公开答复，却声称准备对学生自治会"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并迫使交大校长程孝刚和一部分系主任宣布辞职。

这场"神经战"，引起各界爱国人士的愤慨，教育、新闻、文艺、妇女等界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坚决支持反美扶日运动，抗议反动政府迫害学生。40多年前的交大校长唐文治、张元济两位老先生也在《申报》发表《致吴市长公开信》，指出"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纯系爱国正义行动"，对待青年学生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未闻与青年学生进行神经战而善治天下者"。

为了彻底粉碎"神经战"，交大学生自治会又主动出击，广泛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举行公断会。26日晚，公断会在交大体育馆举行。吴国桢表示"不予重视"没有应邀出席。陈叔通首先在会上讲话，指出：反美扶日运动完全正确，国民政府的压制完全是一种利

令智昏的行为。许广平表示："你们学生今天站在反美扶日运动第一线，我过去是学生，今天还是学生，我要跟着你们一起走。"史良说：吴国桢要交大学生限期答复，如答复不满意则将传讯，这在法律上构成了恐吓罪。表示愿意为交大学生做义务辩护律师。马寅初、张绚伯在痛斥吴国桢之后，高呼："要坐牢，我们和交大学生一起去！"万枚子、周一志、张志让、周行健、施复亮、杨烈等也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支持交大学生的正义行动，怒斥吴国桢对学生的迫害，有的还主张对吴国桢提出控告。会议开得热烈紧张，情绪高昂。公断会成了对吴国桢的缺席裁判会，显示了运动的群众基础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吴国桢的"神经战"以彻底失败告终。7月2日，文化界397人又签名发表维护祖国安全和独立的声明。

在强大的政治舆论攻势下，反动派不得不陆续释放大部被捕学生。

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运动，在斗争中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再一次打击了美蒋反动派，起了第二条战线的配合作用。

在"公断会"后的第三天，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市的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当时物价飞涨，白米每石已达1000万元，而65%以上的私立小学教师月工资还在500万元以下。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五斗米，怎能养活一家老小？因而教师群众分散自发的求生存斗争不断发生。私校校长提出要求政府发放教育贷金和配给实物的口号，以转移目标。"小教联"按照地下教委的指示，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接过这个口号，进行反饥饿斗争。6月25日，私小教师分别向教育局长李熙谋和市参议会请愿，结果都是28日听回音。28日下午3时，私小教师汇集教育局门口"听回音"，到4时，已集合500余人，当场成立"上海市私校教师争取合理生活请愿团"，推派代表去见李熙谋。李要他们去市政府向市长听回音。代表们向大家报告交涉经过，在场教师愤怒地决定"没有结果坐到天

亮”。当晚，中教会、市教福利会、大教联、大中学生和许广平等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慰问，表示支持。各区教师也不断前来参加。附近的工人、店员和居民纷纷送来茶水点心，表示同情和支持。这都大大鼓舞了教师的斗志。29日晨，请愿教师增加到1500人，还不断扩大。报纸发表了教师露宿请愿的消息和教育界知名人士杨卫玉、叶圣陶、周予同、杜佐周等为教师生活呼吁的文章。军警出动飞行堡垒，企图驱散教师群众。但学生、职工的慰问队伍，突破封锁，冲进广场，及时予以支持，声势越来越大。杨卫玉等并以调解名义去市教育局督促迅速合理解决教师的正当要求。在强大的压力下，直到下午4时许，李熙谋对教师提出的四项要求作出了答复：1000万元贷金分两期发给，1—2天内每人先贷500万元，其余由市府负责在暑期结束前再贷；五月份配米在月底前发清，如有霉米、铁块可以调换；暑期中教职员工配米价格与有关方面力争不涨价；每人每月10万元补助费，教育局无权决定，保证政府答复。至此，斗争已基本取得胜利，请愿教师便及时整队，高呼胜利，游行至八仙桥散队。这次斗争在当时的林森中路闹市区坚持了27小时，是教师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取得实际经济利益的同时，对国民党也是一次很大的政治打击。

总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上海人民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已经短兵相接，带有殊死斗争的性质，再加上全国人民的反美扶日运动，都给美蒋反动派以沉重打击，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即将到来。

第二十七章　迎接解放

一、“币制改革”与经济崩溃

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战场上的不断败退，国民党政府的收入越来越少，军费的支出却越来越大。到1948年6月，收入仅及其支出的5%。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钞票的无止境增发，使物价疯狂上涨，给各阶层人士带来了无穷的灾



市民抢购配给米

难。以上海的米价为例，1948年1月，每石150万元，3月，420万元，5月580万元，7月2600万元，半年间上涨16倍。7月18日，政府的中央银行又发行1万、2.5万、5万及25万元面额的关

金券，即 20 万、50 万、100 万、500 万元的大票。这就更加刺激物价的狂涨。至 8 月，米价已涨至 6500 万，比 7 月又涨了 1.5 倍。到 8 月 19 日止，法币发行总额为 1937 年 6 月的 47 万倍，上海的物价指数比 1937 年 1—6 月上涨 492 万倍。物价的飞涨，引起民怨沸腾。7 月初，航空信件邮资涨价一倍，而报刊的航空邮资却规定涨 5 倍，上海的杂志同业决议停刊一期，以示抗议。8 月初，上海八大公用事业收费暴涨，比 7 月上涨 1 至 3.9 倍，极大部分都涨 2 倍以上。连那些市参议员都起而反对“公用事业领导涨风”，指出“拿电话一项来讲，现在电话价格是战前的 1000 万倍，任何物价都没有这样高的倍数”。市参议会为此召开临时大会决议改为涨价 140%，在市府正式决定前“暂缓收费”和“停止照新价格收费”。可是“参议会”的决议並无效力。公用局答复说：“外商公司之专营权须予继续承认……，市政府所采之政策为尊重合约，执行法令。”吴国桢说：“如果市府不准它涨，公司可以照合约自己收费”。外商经营的水、电、煤气、电话、电车等公司，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为首，坚持按新价收费，决不考虑减价。某参议员悲叹说：“上海市民在租界时代即受洋商剥削压迫，不意在自己政府的统治下，还要继续忍受洋商的剥削，说来实在伤心！”总之，法币的破产已无法挽救。

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于 1948 年 8 月 20 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要点是：(一)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 20 亿元金圆券，限期以金圆券 1：300 万的比率收兑法币。(二)限期以 2、4、200：1 的比率收兑人民手中的银元、美元、黄金以及白银和其他外国券币，以后禁止任何人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加强管制经济，亦即限制各地物价，将物价冻结在1948 年 8月

19日的水准上，不许上涨。废除职工与公教人员按生活费指数调整薪资的办法，不许薪资增加，禁止罢工怠工和企业关门。不许报刊、通讯社刊登金融物价的黑市等等。这就是国民政府所谓“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实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这种“币制改革”，实质上是以根本不存在的“金圆”为幌子、永远无法兑现的一种新纸币代替那已完全丧失信用的旧法币、并借机以这种新纸币强制收兑金银外币，再一次掠夺人民财产。

8月20日当天，上海银钱业负责人钱新之、陈光甫、徐寄庼、秦润卿等数十人，被邀去南京行政院开会，商谈经济改革问题。同日，蒋介石在励志社召见他们，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宣布所有银行、钱庄应于9月8日前缴存金银外汇，如不遵令，即予停业。以上海金融界俗话来说，这是“最高领袖”出面“敲竹杠”，不能不“卖面子”。上海银行公会连开几天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参照各行庄实力，凑足1000万美金交差。消息传到南京，9月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破口大骂说：“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塞责了事。可知上海银行界领袖……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藐视法令，罔知大义……。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届时如其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帐，不据实陈报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并指示俞鸿钧，要他吊销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的执照，勒令停业(该行董事长李馥荪当时是上海银行公会主席)，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上海各行庄不得不进一步忍痛加码，缴兑金银外币。仅9月10日、20日两次，上海各钱庄被迫缴兑黄金2万余两，美钞32万余元，港币25万元，白银8千两，银元1万余元，加上英镑、银辅币等共值黄金约三万两。蒋介石对当年支持他上台的上海金融界尚且如此无情掠夺，其余各地金融界当然更是小心应付。

靠蒋介石一个人"管制",当然管不了,乃在上海、天津、广州、西北、西南等地设立管理区,委派经济管制督导员,严加监督,以图力挽经济危机。21日,行政院宣布:"总统特派中央银行俞总裁鸿钧兼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並派蒋经国协助督导,常驻上海办公。"

23日,蒋经国以特派员身份到达上海。他把嫡系的"戡建"第六大队和第四大队一部,调来上海,由王昇负责指挥。他指示王昇在沪收罗了7000余人,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执行"经济检查"任务,不分昼夜在各重要街口拦路搜查行人车辆,到仓库、民宅甚至机关、学校,搜查"私货"。29日,又调集青年军202师(驻苏州)、201师(驻上海)、警察、警备部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人员以及各机关、学校、工厂、市民代表,共约7万人于中山公园举行号称"十万青年大检阅"大会,会后并举行游行。蒋经国来沪后,曾邀了杜月笙、王晓籁等金融巨子、蒋介石当年老朋友开会,要他们作某些让步。也曾邀刘鸿生谈话:"请老伯带个头,交出全部黄金、美钞、外汇,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元券。""只要老伯带个头,上海工商界就会跟着照做。重托!重托!"可是要那些父执全部交出金银外币,岂会甘心。不到一星期,蒋经国再次召刘鸿生去参加"紧急会议",刘赶到那里听到蒋正向工商界著名人士大声嚷嚷:"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限三天答复"!过了几天,蒋经国抓住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判以徒刑;枪毙了林王公司大老板、大逃汇商王春哲;又将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市参议员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4名大工商业者关进监狱。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虞洽卿的儿子虞顺慰也遭到追查打击。消息传开,民族工商业者为之震动。为了保全生命,刘鸿生企业包括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章华毛纺织厂和华东煤矿共交出黄

金800大条，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元，都换成了很快就不值钱的金圆券。就这样，中央银行搜去黄金114万6千两，美钞344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元369万余元，白银96万余两。黄金、美钞各占全国被掠夺总数的68%和69%，其余三项占10—15%。蒋经国"打老虎"初期也确有成效，打击了一些不法之徒，冲击了一批平常没人敢碰的人物，但最后还是对于掌握金银、外币最多的大官僚资本无能为力，不得不收场。

至于"限价政策"，对上海人民来说，更是一场灾难。"限价"是针对民族工商业的，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並不在内。公用事业是所谓按战前标准计价。国营企业一向是带头涨价的单位。就在8月20日，中国石油公司将石油价格提高60%，全国船联会因此决议自23日起各线客货运价一律提高90%。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客货运价，提高85%，仍低于战前标准，还考虑调整。中央信托局标售日货呢绒，每码50余元，而西装花呢的限价是每码26—28元，竟超过限价一倍。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的涨价当然影响民族工业的成本增加。8月26日公布的"整理财政补充办法"还规定：海关进口税加征戡乱时期附加税，按正税征40%。盐税从每担400元法币改征金元券8元，竟提高了59倍。这也增加了工业成本。而用政治力量强制限价，违背经济规律，必然会产生黑市交易，产生隐匿物资和抢购物资，这就必然影响到民族工业的原料问题。9月3日，社会局在市商会召集全市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钢铁业代表就说，蒋督导员如果能将各地原料疏导来源，就是我们的救星，否则原料既无办法，又不许涨价，那反变成工业的尅星了。帆布业、纺线业都反映最近三天完全买不到原料，工厂将停工关门。纱厂、布厂、毛纺织厂、肥皂厂都因原料缺乏、成本高涨而减产。可是13日，蒋经国在工业界人士谈话会上宣布：在现行限价政策下，工厂不准停工减产，如有发现，政府决加以接管。在这样的高压下，工厂只有靠所存原料甚至从黑市买

进原料来勉强维持。从9月24日起，督导员办公处又先后规定食米、面粉、食油、棉纱、棉布、纸张、工业原料、食糖、肥皂、绒线、火油、木炭、棉毛针织品、香烟、橡胶制品等货物进行存货登记，隐匿不报或逾期不报，一经查获，货物充公，货主严办。並宣称，登记之货物，政府得予收买，依限价配售工厂与市民。管制愈厉害，商品愈少，黑市愈猖獗，人心也愈恐慌。10月3日开始，上海市场已是人山人海，市民抢购物资忙。4日，纱布市场奉令暂停交易。6日，食油市场又奉令停业。10日，当局又传出六大都市施行配粮，逐月调整价格至较低于市场5%为止。市场更受刺激，抢购风益炽。到10月中旬，永安公司营业时间缩至六小时，（十点到十六点），但每天营业额却比限价开始时增加近12倍。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在28日写给香港永安公司的信件中说："沪上抢购之风，日益加炽，所有日用百货，各店都抢购一空，酒楼饭店人满为患，但均无货应市，多呈半停顿状况，升斗小民，欲哭无泪。……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底日轻，难于补进。商人到此，诚难乎其难矣。"当时确实已到了早点无处可买，酒楼饭店只供应区区几十客甚至无货供应，其余商店也大都是空橱窗，基本上无货供应，真是陷入了"欲哭无泪"的绝境。29日，《商报》发表社评"老百姓太苦了"，指出"物资断流，老百姓穿衣吃饭都已发生问题了"。《大公报》在29、30日的社评写道："实际上市场已接近于罢市了"，"千千万万的人民为柴米油发急发愁，以至惶惶不可终日"。为此，提出了"为小市民的生活请命"，呼吁"政府再不可坚持这武断式的限价办法"，"否则，大家真要同归于尽了"！10月30日，蒋经国广播《告上海父老兄弟姊妹书》，宣告了他的失败。31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将物价解冻。在这次"限价出售"中，当时各公会初步估计：纺织业损失金元券5千万，毛纺业2千万，绸缎呢绒业存货全部卖光，棉布仅余20%，百货业被抢购商品，约在总存

量的 2/3 到 3/4 之间，橡胶业损失千余万。上海工商业总损失将近 2 亿金元。这种变相的没收，使上海工商业元气大伤，已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和经营，使上海工商业者进一步认识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无法生存，必须另谋出路。

限价失败，金圆券的信用一落千丈，物价再次开始飞涨。人民拿了金圆券买不到米吃，终于发生了抢米风潮。单上海一地，11 月 7 日至 9 日的三天内，即发生抢米事件不下 30—40 起。甚至连铁路局职工，也为了断炊于 8 日上午罢工，于是沪宁线一度中断。

11 月 10 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电蒋介石："金圆券发行总额，截至本月9日止，匡计已达 19 亿余元，与法定20亿限额，相距极近。现在军政需要，增加极巨，急如星火"，迫切要求"赶办放宽限额法定程序"。11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及"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宣告：每一金圆法定含金量由 0.22217 公分降至 4.4434 公毫，对金银外币的兑换率也提高为原兑换率的 5 倍。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存期满一年者，除照章计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存款银行按规定比率兑取黄金或银币。允许人民可持有金银外币，唯除银币外，禁止流通买卖。"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这两个办法更是宣布了金圆券的失败。所谓"另以命令定之"，就是宣布金圆券不再限额发行，将走上法币恶性膨胀的老路。所谓"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就是币制改革80天，"金圆"自行宣布贬值 80%，人民被迫以金银外币换来的金圆券，只值 20%了。更有甚者，人民拿这个已贬了值的金圆券去兑回黄金银币，还必须以"同额"的金圆券存入指定银行一年。一年之后，这笔存款究竟还值不值钱，当局心中有数，人民心中也有数，所以人民所有的金银外币，经过这样一次被迫收兑和存款兑取，已经只剩下 1/10，90% 被反动政府强行抢走了。

尽管要付双倍的金圆券，才能兑取黄金银元，似乎又损失一

半。但是金圆券既已走上法币的老路，势必不用一年，最多一、二个月，就会贬值一半。因此从27日开始出现挤兑。12月2日，中央银行规定限制存兑人数每天600人，于是挤兑愈烈，秩序混乱。7日，挤兑群众与警员冲突，2名警员被殴重伤，挤兑群众9人被捕。10日，又规定每人限兑黄金10两。15日，行政院发表"金圆券存款兑现办法"，又规定每人每三个月只能存兑一次，一次不超过一两。19日，原拟分发400份申请书应付公教人员存兑，结果参加挤兑的公教员工有2000个单位、40000人以上。又改定以机关为单位，抽签排定存兑日期，集体办理。愈是这样不断限制，挤兑情况愈严重，23日发生了挤死7人、挤伤20余人的惨剧。当局以"维持地方秩序，保障人民安全"为由，宣布停兑。1949年1月4日，公布"金圆券存兑金银再修改办法"，规定在原定存兑价外，加收参照每天侨汇牌价酌定的"平衡费"。但黄金的黑市价格也随之猛涨，于是挤兑的人数有增无减，死伤惨剧不断发生。16日，又废止存兑办法。至此，币制改革也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币制改革搜括来的金银外币，原来大部集中在上海中央银行。随着它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按照蒋介石亲自布置，在1948年12月，就把200万两黄金劫运台湾，1949年2月，又把57万余两黄金运往台湾，5月，汤恩伯逃离上海时，又



挤兑黄金

劫去一大批。到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黄金只剩下6180两。人民的财富，都劫运到台湾去了。

币制改革失败，金圆券走上法币的老路。11月13日，离发行还不到三个月，就推出50元、100元面额的大票。随着军事上的不断失败，国民党统治区日益缩小，通货膨胀更加恶化。1949年3月1日，又发行500元、1000元大票。到了28日，连印也来不及了，就发行5千、1万、5万、10万的定额本票。到了5月，国民党政府行将覆灭，更是乱发大票：2日，发行10万元券；5日，发行50万元券；24日，发行100万元券，在6日和16日，还出笼500万和1000万元的定额本票。

钞票无限制的印发，物价以更高的速度飞涨。"限价"解冻第一个月，上海的物价趸售指数已经涨到"八·一九"的25.43倍。市政府发表的11月份下半月职工生活指数为15.4倍。这个指数，社会局长吴开先也承认："工人仍吃不饱，老板亦付不出"。到1949年，上涨的幅度更大。1月为128倍，2月为897倍，3月为4053倍，4月为83820倍，从1月到5月，逐月平均上涨11.49倍。仅仅9个月零几天，金圆券已贬值到原值的一千万分之一。这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灭绝人性的残酷掠夺。在1949年的头几个月里，物价已是一日数涨，靠工资维持生活的职工，拿到工资得赶快跑步去换成银元或买好柴米油盐，否则放上一天，就会吃亏。人民实在活不下去了，急切盼望解放！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的工商业濒临破产的境地。物价飞涨，人民购买力降低，许多商品销路呆滞，工厂发不出工资，就把产品分给职工，让职工去摆地摊，以更低的价格去推销，维持生计。工厂已经维持不下去，国民党政府还是课以重税。例如大百万金香烟出厂价（包括税款）每箱5000元，货物税额却定为每箱5526元。而就是5000元一箱，还销路呆滞。因而除颐中、南洋等4—5家烟厂勉强开工外，有104家卷烟厂停工，6万卷烟工人失业。工业生产，

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往往产品已销售出去，原料继续上涨，贷款利息又高，因而厂盘低于成本，难以维持。于是出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情况，投机之风极盛，许多工商企业以至职员都到各种交易所去卖空买空，投机字号、皮包公司大量涌现，搞投机和高利贷活动的小银行、小钱庄也大量增加。这种投机活动，兴风作浪，对正常的生产、人民的生活以至社会风气都起了极坏的作用。当然在投机活动中，最主要的大户还是官僚资本。它们资金雄厚，掌有权力，无往不胜。例如1949年4月4日，财政部命令：黄金市场每市涨跌幅度由10%放宽至20%，即上下午两市合计涨跌幅度从21%放宽到44%。就在这一天，中央银行以涨停板的1256万5千元的高价抛出黄金五千余条，于是银根骤紧。买进者不得不低价售出，不少银行钱庄为了补足缺额，忍痛以900—970万元的低价售与中央银行二千多条。一天之内，中央银行这个大户就获利60多亿。另外，上海工业许多原料依赖进口，例如美棉、美麦、澳毛、化工医药原料、橡胶等等，在金圆券象雪崩一样贬值的情况下，原料价格飞涨，而成品价格跟不上，于是棉纺织、面粉、毛纺织、化工、医药、橡胶等工厂，都大量减产以至停工。由于工业生产的萎缩，上海电力公司供售的工业用电，从1948年4月的5327万度下降到11月的3838万度。据社会局的统计，1948年底与1947年底比较，在该局登记的工厂从3045家降至1197家，减少60%以上；公司从3580家降至2100家，减少41%；商号从55540家降至33195家，减少40%。民政局的统计，同期市区失业人员从12.1万增至15.9万。这是官方统计，事实上还有许多中小工商企业未向社会局登记，歇业的更不在少数。上海解放初期举办失业人员登记，解放前失业的达42万余人。

金圆券的迅速破产，反映了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的崩溃，上海民族工商业陷入了朝不保夕的绝境。不少企业把资金抽逃香港等地，大部分企业盼望解放。

二、黎明前的战斗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占优势。战略决战即将进行。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号召，表示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建立联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华侨利益。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并通电国内外，公开表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接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及马来亚、暹罗(泰国)、缅甸、法国、加拿大、古巴的一些华侨团体等都宣布响应中共"五一"号召。5月2日、6月13日，中共中央两次电示中共上海局就新政协问题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人士的意见。从8月起，又组织护送沪港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物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政治形势变化急剧，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孤立。

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势必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屠杀。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中

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在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既坚持了当前的隐蔽方针，又为配合解放和接管上海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4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发出逮捕爱国学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命令。27日起，上海“特刑庭”先后发出了200多张传票和拘票，迫害爱国师生。上海地下党决定撤退学生1000人、职工1000人，他们当中大部是党员。这2000人，一部分是由于在历次斗争中比较暴露，已引起敌人注意，处境危险，必须撤退疏散。一部分是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要求，为老区建设和新接管城市输送科技、工程、医护等干部。还有一部分是去解放区培养和训练，为以后的接管作准备的干部。这样的大规模撤退，是既保护又培养的积极措施。

在大量党员和积极分子撤退的同时，又在历次群众斗争中涌现、经过教育和锻炼的大量积极分子中，个别地慎重地发展新党员，以补充新鲜血液，壮大力量，直到1949年二三月基本停止发展。到解放为止，上海地下党员除输送到解放区及各地的以外，有9000多人，其中约3/4系解放战争时期入党。按社会职业来分，产业工人占40%，职员占20%强，学生占20%，教师占10%。女党员占1/3。

为了加强党对公开工作的领导，恢复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秘密的和半公开的工作。解放前夕，工协、职协、学联、教联、文协等群众团体都划给人民团体联合会领导。在团体里成立党组，由地下市委直接领导。就这样，把群众团体的公开工作与地下党秘密的组织系统分了开来，以贯彻加强隐蔽的方针。

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工作指示的同时，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已在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南京、上海、武汉已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我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蒋介石发表元旦

求和声明，企图以“和平”为名，实现其“划江而治”的企图。14日，毛泽东发表时局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同意以我党所提条件为和谈基础。

从表面上看，李宗仁对和谈比蒋介石积极得多。23日，李宗仁派张群、邵力子、甘介侯赴沪要求民盟留沪领袖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出面斡旋和谈。张澜等严正回答：“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作调人。”2月上旬李宗仁又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参加的有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邵力子以私人资格随团前往。14日，代表团飞抵北平。15日，叶剑英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代表团成员表示，此次来平，只是以个人身份，希望全国和平统一，促成国共和谈。叶剑英表示感谢四老对和平事业的真诚，允将他们的意见转报中共中央。翌日並设宴招待。22日，颜惠庆等又飞到石家庄，往平山县西柏坡村会晤毛泽东、周恩来，对和谈及南北通航、通邮诸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中央表示，中共向来愿意和平，此次“和谈”是美国指使的和平攻势，并无诚意。如真要和平，就应接受“八条”，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27日，代表团飞返南京，向李宗仁汇报。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和谈代表，29日，行政院又加派刘斐为代表，並指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对于和谈，国民党反动派鼓吹“长江为界，南北分治”，扬言共产党逼人太甚，“国军负隅死战，吃苦的还是老百姓”。受这些欺骗宣传的影响，部分群众害怕战火烧到上海，幻想无原则的和平。为了驳斥反动流言，破除幻想，阐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交大召开了“真假和平辩论会”，揭露了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仍在积极备战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使群众得以明白真相。31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告上海市民：为实现

真和平而斗争》，指出4月1日在北平的国共和平谈判，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诚意”，决不能存任何幻想。号召上海市民必须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大大发展人民力量，详细调查官僚资本的资产、切实防止其转移及破坏、以便将来接管，周密调查及检举大小战争罪犯、务使无一漏网等四项任务。

4月1日，国民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同日，南京11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多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实现真正的和平。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殴打示威学生，死学生2人，伤100余人。这件血案充分证明国民政府的“和谈”完全是假的，激起了京沪学生的极大愤慨，纷纷罢课抗议。全国各民主团体、各地人民群众也发表声明和通电，声援南京学生，要求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解放江南地区广大人民。上海学生一方面用召开追悼会、罢课抗议、募捐慰问受难同学及其家属等方式，支援南京同学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保存力量迎接解放，不组织全市性的联合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而集中力量整顿和加强基层群众的战斗组织。

在和谈过程中，关于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通邮、通航、通商问题，两地人民极为关切，有强烈的要求。2月5日，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和上海轮船业公会致电中共领袖，拟派“大上海”及“唐山”两轮载运面粉北上，交换原煤，随带邮件並派员至华北接洽。13日，毛泽东、周恩来正式复电：“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重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航业界人士遂即推派代表四人随船北上，在北平、天津逗留12天，有关整个通航的方案及其他各种航行技术问题，于3月3日，全部达成协议。可是方案在南京政府里一个多月，还在“研究”。至于全面通邮，在2月20日，就全面开始了。为

了支持通商，3月14日，华北人民政府即公布“华北区区外汇兑暂行办法”。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告，指定北平的新华、上海、盐业、中国实业和金城五家银行，办理北平与解放区以外各大城市的汇兑业务。

对于南京政府的和谈，中国共产党並未寄予多大的希望，但为了以真和平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争取尽快缩短战争时间和尽可能减少战争的破坏，还是同意了。不论和谈成功与否，接管大城市总得作好准备。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陈云及时总结了接管这个大工业城市的经验，並向中央建议各战略区都组织接管大城市的专门班子，以便依次执行接管任务。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加以推广，並要求各待解放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一切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又电示上海地下党，人民解放军占绝对优势，上海解放不需采取内部武装起义，而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

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的形势，地下市委决定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斗争。

上海工人协会和上海职业界协会，原是中共地下党工委和职委对外发表宣言、声明，指导斗争的半公开名称。这时成为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发展党外积极分子入会，组织他们开展护厂护店迎接解放，並借此在空白单位开辟工作。工协提出了“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是保住饭碗”、“保护工厂，保护饭碗，迎接解放”等口号，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响应，组织了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等不同名义的护厂队伍。他们日夜值班巡逻，保护工厂。如中纺十厂、十二厂的护厂队都提出了运布要用棉花来换的条件，阻止国民党运走棉布。国民党兵到十二厂运布，该厂1000多工人把

卡车团团围住，迫使敌人空车开回。敌人晚上又来，护厂队又有夜班，还是不能得逞。江南造船厂，是敌人搬迁破坏的重点。江南厂的职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尽可能拖延时间，阻碍搬迁，不得已时，又把破烂机器和工具擦光上油装箱，而把重要机器、工具分散隐藏在破旧箱和废料堆里。把汽车、吊车、电焊车等分散各处，使敌人无从下手。把一般图纸资料充当重要图纸装箱运台，而把建厂以来全部设计图纸和英美造船舰的资料全部转移厂外保存。在国民政府海军司令桂永清下令彻底炸毁江南厂之际，江南厂职工又在三个船坞里放满了水，把汽油换成水，以减少损失，以方棚间电路包括路灯电、电话电相告，使敌人没有破坏方棚间及其线路，并通过地下党使敌军后勤机关少发和发劣质的引信和炸药，以降低爆炸力量、减少破坏程度。5月22日深夜，敌人进行爆炸，声震数里，大火彻夜燃烧，江南厂虽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桂永清的炸为废墟的计划並未实现。总方棚间、氧气车间等重要设备和厂房仍完整无损，三座船坞除闸门被炸沉外未遭破坏，大部分重要机器、工具、仪表等都保存了下来。职协在海关提出“保护关产完整”的口号，团结职工进行武装护关。一月下旬，四行两局，装运中央银行重要卷宗帐册逃往台湾的太平轮在舟山海面撞沉，押运人员仅一人生还，其余全部遭难。这个惨痛事实，引起了震动，职工提出了“保护行产，反对撤迁逃跑”的口号，各行局相继成立“员工应变互助会”，在3月初，四行两局联合成立应变互助会保护行产，开展斗争。许多商店也纷纷建立应变组织和纠察队、防护队。永安、新新公司职工，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占驻大楼，在取得资方同意下，动员部分职工及其家属搬进大楼居住，不仅保护了职工及其家属的安全，也保护了公司财产。

学联把原来组织在学生会等合法团体中的同学，在自愿的基础上统一编入护校、宣传、救护等大队，每个大队270人，下设中队、分队、小队，以大队或中队作为独立活动单位。并对队员进行

政策、纪律、群众观点的教育和业务训练。在解放军渡江以前，全市组织在战斗队里的学生超过一万人，在重点学校中组织了全校学生的80％，一般学校约30％。

教委在年初，将“大教联”、“中教会”、“小教联”、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青年会教师团契、教职员合作社、私校校长座谈会以及社教、儿童教养机关等教师的民主团体，组成统一领导的“上海市教育协会”（简称“教协”）。从2月至4月，“教协”领导了大、中、小学教师分别开展求生存斗争，参加教师达1万人，加强了团结。4月22日，“教协”发表告教育界同人书，号召教师迅速展开护校应变运动。提出“保校、保产、保生命、保地方”的口号，在教师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同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吸收上层人士参加“教协”共同行动，并对反动校长、三青团与教育局开展攻心工作，要他们立功赎罪。最后使教育局出面布置全市市立中小学的护校应变工作，静待接管。全市教师在“教协”的领导下，斗志昂扬，坚持上课，保护学校。

护厂护校斗争，是同群众的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在1月底、2月初，吴国桢提出了“应变”问题，要上海市民“加紧民防，储粮防患，准备巷战”。借着市长的号召，工厂、商店、银行、铁路以至机关，纷纷要求发放应变费，要求储粮、储煤、储菜（咸菜、酱菜）。这些要求大部分取得胜利。而全市规模的储粮、储煤、储菜，后来为解放初期减轻市场压力，保证人民正常生活作出了贡献。

经过15天的谈判，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20日，为南京政府所拒绝。21日晨，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500多公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解放上海，已成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为了更好地里应外合，配合解放，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把已在各条战线上普遍组织的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等，统一组成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人民保安队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商店、学校、机关、仓库及公共场所，不被敌人破坏；为人民解放军作向导；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地方秩序；监视战争罪犯；瓦解敌军，收缴敌人武器。全市人民保安队约 6 万人，连同宣传队、救护队等其他形式的组织共约 10 万人。全市党的组织按照地区分沪中、沪东、沪西、沪南、沪北和徐(汇)龙(华)等几个区，工人、店职员、学生、教师和警察等都参加所在地区工作，人民保安队也分区组织和指挥，以加强领导並适应可能发生巷战的需要。与此同时，将国民党机关、官僚资本工厂企业、市政公用事业等单位的党组织，共约有 500 名党员，集中建立一个配合解放军接管的单位，一方面发动群众保护财产、档案，一方面准备资料以应接管需要。

在上海局领导下的策反委员会，做了许多工作，在这国民党覆灭之际，更加紧进行争取教育工作。早在 2 月 4 日，中共地下党就派人通过关系与市政府工务局长赵祖康直接见面，建立联系。其后，赵根据要求提供许多重要资料和市政府动态，直到配合接管市政府。同月 16 日，通过国民党军工署驻上海第五军火库的工兵组长赵聚能，将该库全部炸毁。25 日，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全舰 574 名官兵在吴淞口外起义。4月 13 日，国民党伞兵三团在团长刘农畯(中共秘密党员)和中共地下支部的领导下，于海运福州途中，发动起义，全团 2 千余人于 15 日胜利到达连云港。5 月 24 日，经过工作，国民党交警第 18 纵队和宪兵二团三连后撤，在西线撕开缺口，为解放军进攻市区打开通道。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 300 多名武装警察起义。25 日，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机动车队反正。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历史转折关头，走上光明之路，为人民革命作出了贡献。

4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

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的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逮捕、侮辱，但应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听候接收处理；（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应有准备和有步骤的进行；（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上海各人民团体、人民保安队以至警委等各个组织都充分运用约法八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以安定民心，争取民族工商业者、科技人员和上层职员留在上海，以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与此同时，也将约法八章投寄国民党军警、官员以至特务头目，提出警告，要他们立功赎罪。

敌人越是失败，越是疯狂。1948 年 9 月 30 日，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中共党员王孝和被特刑庭判处死刑。王孝和是在同年 4 月 21 日，由于国民党栽赃诬陷他“破坏发电机”而被捕的，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在特刑庭上，又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被判死刑后，王孝和还是镇静自若，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就在就义那天，他还高呼口号，打击敌人，使行刑的刽子手也为之失色。王孝和的被害，引起了革命人民的愤怒和痛悼。上电职工尤为悲愤，在一天内就为烈士家属捐款金圆券 2 千余元（时值约合大米 100 石左右），表示了对国民党的严重抗议。12 月 29 日，中共地下秘密电台被侦破，李白被捕。1949 年 3 月 17 日，中共上海市委秘密电台被侦破，报务员秦鸿钧及电台领导人张困斋被捕。幸而早有准备，启用预备电台，才能继续保持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在上海工人的求生存反迫害的斗争中，1949 年 2 月，京沪、沪杭铁路员工和上海公交公司职工为要求发应变费而罢工。国民

党实行"借人头,平工潮"的屠杀政策,16日当晚,逮捕了公交公司员工福利会领导人钟泉周等9人。17日,钟泉周、王元、顾伯康3人在江湾刑场被害,其余6人被判处徒刑。22日,上海工人协会发表宣言,对国民党屠杀公交工人提出严重抗议,并号召"全市职工团结起来,为生者求解放,为死者报血仇"!在南京解放后3天,26日,上海的反动派还于深夜出动军警特务1万余人包围各个大学,越墙而入,挨屋搜查学生宿舍,根据他们事先收集的黑名单和照片等,搜捕了学生350人左右,其中中共党员约70名。由于中共地下党事先得到了敌人大搜捕的情报,于当天下午发出通知,一些最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转移,各校支部负责人和大部分群众领袖隐蔽得较好,都没有被捕,各校党组织和群众战斗组织的指挥系统都没有遭到破坏。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宣布紧急疏散15个郊区学校的学生,限令两天内离校。这15所学校包括全部国立大学和几所重要的私立大学和中学,是学生党组织的主力所在。敌人这一强迫措施,使家在市区的同学都回家了,外地同学则无家可归在市区流离失所,原来的联络系统大都被打乱,群众工作一度陷入混乱状态。经过各支部的努力,才按原编制建立起联络网,把分散的同学重新组织成一支随时能出动的战斗队伍。被捕学生的名单,《大公报》作了披露,在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营救下,大部学生分期分批被保释出来。濒临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毛森等更是疯狂屠杀革命志士:5月7日晚,在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李白、张困斋、秦鸿钧、严庸初(学联干部)等12人。10日晚,派军警特务分赴虹桥疗养院和史良住宅搜捕民盟领袖张澜、罗隆基和史良。没有抓到。于是就张贴布告通缉。20日,在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又杀害了交大学生领袖穆汉祥、史霄雯和地下警委的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等烈士。21日傍晚,又在大新公司门口以"银元贩子"罪名杀害了策动起义的原国民党中将张权和少将李锡佑。23日,特务、警察包围第一印染厂第二工场,按照黑名单逮捕了19人(大部

是工协会员)在警察局严刑拷打，24日晨工协负责人、中共党员孙方璟和工协会员张如松、李阶平被秘密杀害。同日晚，毛森在逃离警察局前，还下令将关押在总局拘留所内的革命志士沈鼎发等9人枪杀在总局后院内。

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中共地下党采取了不少措施。如通过打进警察总局和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员了解它们的搜捕名单和行动计划，抢在敌人之前迅速报告党组织，通知这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及时撤离，免遭毒手。通过策反工作争取了上海监狱典狱长、通过警委系统的监狱支部从5月23日起就紧闭大门不准进出，控制全部通讯设备和枪支弹药，直到27日上午迎来人民解放军，保护了关押在上海监狱中的50多位革命志士，免遭敌人撤退前的屠杀。

黎明前的战斗，是艰险的战斗，也充满着胜利即将到来的信心，热切盼望着人民解放军从速解放上海，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三、解放上海战役

1949年5月12日，揭开了上海解放之战的帷幕。

上海解放之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外围作战阶段，具体时间是从5月12日夜起至24日下午止，历时共12天；第二是围攻阶段，具体时间是从5月24日夜至27日上午9时止，为时不满3天。解放上海之役胜利巨大，战果辉煌。

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沿着沪宁、沪杭线直扑上海时，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亲临上海，收拾残部、调兵遣将，组织反抗。据不完全统计，据守上海的国民党部队有正规军9个军、24个师，还有一部分空军、海军、炮兵和装甲兵，连同保安旅团、交通警察总队和宪兵，不下25万人。

在防御工事上，国民党守军设置了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三道设防地带。

浏河、罗店、嘉定、南翔、七宝至华泾为他们的浦西外围阵地，川沙至北蔡为浦东外围阵地。

宝山西南向南经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直至黄浦江边为浦西主阵地，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镇至唐桥为浦东主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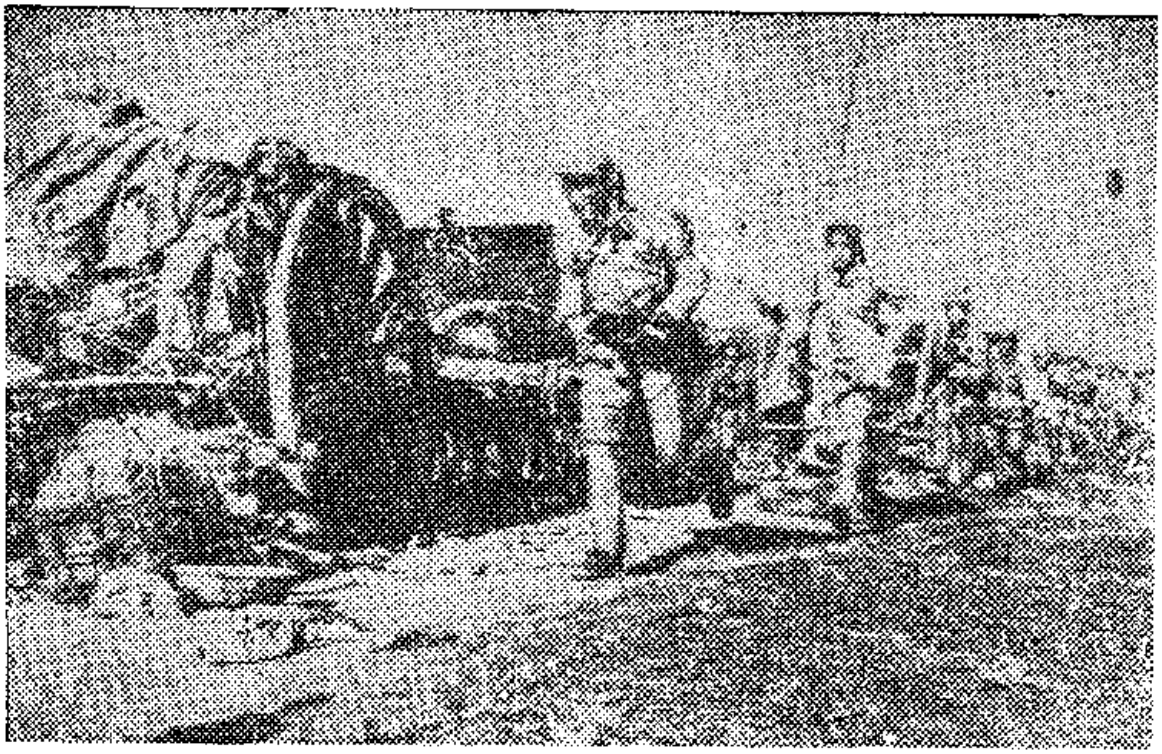
核心阵地是以市区高大建筑物为据点，各交通要冲堆积砂袋、布置木马、铁丝网。

主阵地离市区仅3000公尺，在这3000公尺纵深内，有钢骨水泥碉堡3800多座，各重点的空隙还有掩蔽体及钢骨水泥活动堡，大小碉堡共有万余座。其中甲种碉堡，垒厚2英尺有余，周围有河沟、电网、地雷阵、铁丝网等。

当时负责上海战场的国民党总指挥汤恩伯为了构筑阵地，不惜下令将上海郊区周围数十里内的许多村庄房屋、竹林拆除、砍尽、烧光，本来极为繁荣富庶的上海市郊顿时成为一片瓦砾场。沪宁路、沪杭路及各公路桥梁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汤恩伯以为凭藉这些“永久性防御工事”便可以负隅顽抗。因而在5月8—10日，连续3天举行的国民党军队最高军事会议上，汤恩伯的部属均一再表示至少可以坚守三个月以上，並发出上海是“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的自欺欺人的口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原则是将敌军主力消灭于外围，具体兵力部署是十兵团指挥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4个军攻打沪宁路以北，作战重点在吴淞；九兵团指挥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4个军跨占浦江两岸，作战重点在浦东，首先完成淞沪外围战，然后视情况再增调主力部队，会攻市区。

这两支精锐部队分成东西二路向上海挺进。西路于5月11至15日先后解放崑山、太仓、嘉定等县城及罗店、浏河、月浦和刘行等重要据点，並楔入敌军主阵地，19日占领刘行国际无线电台及其东的顾家宅，直逼吴淞。东路沿沪杭线、黄浦江及海岸长途疾进，



解放军向上海挺进

12日起，先后解放海盐、平湖、金山（朱泾）、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川沙，15日晚占领川沙城西北之杨家路镇续向高桥海滨浴场猛扑，20日，解放军连克南、北高行镇、金家桥镇、东沟镇等据点后，高行上游之黄浦江面即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炮火之下。23日夜解放军粉碎敌军工事，连下钢筋水泥碉堡百余座，24日晨占领杨泾镇、尹桥镇，完全解放了浦东地区后，又在周浦以西一举渡江成功，向市区进击；另一部在解放松江后，北向上海西侧进攻，14日解放泗泾镇及青浦县城，15日解放上海县城（北桥），及莘庄、七宝镇。23夜即猛攻上海西南郊敌军主阵地，突破纵深20里层层工事，占领或摧毁钢筋水泥碉堡500余座。24日，连续攻占虹桥镇、虹桥机场、徐家汇与梵王渡车站，越过万国公墓、大虹桥、中山西路、沪杭路直捣市区，同日下午，攻占龙华镇及龙华机场的解放军也同时向市区进发。

到5月24日下午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外围作战中，前进共200里，先后解放县城12座，歼敌20000余人，完成了对上海市的包围，东西两路兵团完成了对吴淞要塞的钳形攻势，从东西南

北各个方向，突破对方主阵地取得了上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自5月24日夜起到27日上午9时为总攻阶段。前后共历60小时。

24日下午9时许，沿沪杭线前进的解放军分别由梵王渡、徐家汇、龙华镇、高昌庙攻入市区，守敌残部向苏州河北岸逃窜，夜11时30分，各路大军在市区跑马厅会师，这时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市区。

25日上午10时，苏州河以南的上海主要市区宣告解放。此时，苏州河北守军恐慌万状，纷纷各谋生路。

25、26日两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所部二十一军、五十一军、一二三军残部共40000余人先后在真如、大场等地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26日晨，解放军分路猛进，先后攻占江湾、江湾车站、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装甲兵团司令部等重要据点及广大市区，俘敌万余人。残敌无路可逃，被迫整营、整团、整师地投降。

当解放军围歼市区之敌的同时，25日，利用已形成的钳形攻势，在黄浦江口东西两方围攻吴淞要塞。浦东方面，解放军于当晚12时攻占高桥镇，26日下午8时占宝山县旧城及海滨浴场等据点，猛追逃敌，直取三叉港、德士古码头，俘敌12000余人，至此浦东地区之国民党军事力量，全部肃清。

浦西方面，总攻宝山县城、吴淞镇的解放军于26日晨2时占领狮子林炮台，晨4时攻下宝山县城和吴淞镇，俘敌13000余人。至此，吴淞要塞全部为人民解放军所掌握。

27日上午9时，人民解放军消灭了据守杨树浦的最后残敌，上海市区完全解放。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全部战役共歼敌153000余人。上海解放之战，充分发挥了人民解放军的特色。

他们高速度昼夜兼程行军，每天步行百里以上。衣服被汗水

湿透，绞出水来，休息时，一沾地就会睡着，即使如此疲倦，只要前进号令一响，个个都跳起来往前跑，往往整整一天，从天不亮到傍晚，水米不沾唇。当时参加战斗的解放军军官战士写道："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吃不睡，也要猛追、穷追、追到底，不让敌人跑掉。"真正做到了上级所要求的："一分钟也不能停。"①

战士们是以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才将上海完整地夺入手中的。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为了减轻对城市的破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中国共产党最高当局一再强调，市区作战要尽量避免使用火炮和爆破，这就为取得战斗的胜利增加了不少困难。尤其是苏州河一带，鳞次栉比的高楼、工厂和仓库，敌军的火力可以组成严密的封锁，居高临下。在地形上对解放军的进击，十分不利。苏州河上的桥梁都设有固定的桥头堡，还有坦克流动巡逻，因而乘胜追击敌人的解放军，到苏州河边竟一再受阻。其中外白渡桥的争夺战是典型的一例。

外白渡桥是苏州河口第一桥，桥北有20余层的百老汇大厦，据守大厦及附近楼房的敌军以机枪扫射进攻的解放军，因对方处于有利地形，解放军颇有伤亡。其中有最先突破长江天险的"第一船战士"，有首先打下济南、号称"济南第一团"的班、排、连长……，为了消灭顽抗的敌人，有的部队将榴弹炮营调来，对准百老汇大楼，只要一声令下，敌方的据点便可彻底摧毁，尽管如此，为了保证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座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上级耐心教育激情高昂的战士和军官，当时领导攻打这据点的聂凤智军长反复告诉部下："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②，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完整地保全城市。

---

① 章尘等《回忆上海之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三辑，第3—4页，197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聂凤智《一场军政全胜的战争》，《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四辑，第5页，197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针对敌军作战体制已被打乱、军心涣散，内部混乱不堪的情况，当即决定改变战术手段，苏州河正面改强攻为佯攻，天黑后将一部分兵力调离市区，在西郊一带渡河，在苏州河北由西而东攻入市区，同时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密切联系，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争取敌人投诚，从而保证了上海市区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整个上海市区就是按照这样的作战方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攻克。

早在5月25日拂晓，解放军向市区行进时，所到之处便挤满了欢迎的人群，8时左右，一支支欢迎解放军的游行队伍便出现了。学生队伍经过在马路旁休息的解放军面前时，给每一个战士献上一朵胜利花，扭着秧歌舞，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等歌曲，而解放军战士也立即答以《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的歌声。

人民如此热烈欢迎解放军，而解放军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更是上海人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部队进入市区后，军、师、团、营各级指挥所未找到所址时都设在露天。部队首长以身作则不进入民房。有的在马路口，有的在垃圾箱上铺开地图，指挥作战，遇着天下雨，便张起一方油布，照样工作，所有入城的干部、战士一律在马路上露宿。当时还明文规定，进入市区的，只限于指挥机关和战斗部队，后方辎重、骡马，一律不得进入市区，所有入城部队均携带一定数量的粮、柴、油、菜。在市场流通货币问题没有作出统一规定之前，一律不准购买商品，有的部队已经进入市区而炊事班还在郊区，便在郊区将饭烧好，由战士肩挑步行20—30里送来市区，入城时，战斗部队随身携带的碗筷食具不够用，便用报纸，钢盔盛饭盛菜，用手抓来吃，有的市民自动拿出了盆碗，战士们都拒绝借用。不少战士因露宿或作战，衣服湿透，市民们要求他们到家里去烤乾或脱下来替他们烤乾，也为战士们所婉言谢绝。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上海人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种睡水门汀、盖麻布袋、吃冷



解放军在街头休息

饭、喝冷水的军队，纪律如此严明，如此秋毫无犯的部队不仅为中国历史所罕见，连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也忍不住要由衷地赞叹解放军的良好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无畏、顽强战斗、不怕牺牲以及号令严明和严格的遵守纪律……，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总攻之时，上海人民保安队紧急动员，全体出动，充分发挥了里应外合的配合作用。

在护厂护店方面人民保安队都昼夜巡逻，防止国民党军队和流氓等的破坏。国民党交警大队进驻杨树浦发电厂，竟把机关炮架在五号炉子间屋顶上，准备封锁黄浦江。如果交战起来，对护厂不利。工人就与敌连长打交道，告诉他：机关炮设在屋顶，下面是远

东最大的高压锅炉，吃了炮弹爆炸起来，方圆几里内都要完蛋。那个连长害怕了，赶紧把机关炮撤了下来。敌军要炸毁南翔收讯台，老工人立即把电门弄坏，说机器已被破坏不能再用，保护了下来。正因为护厂护店工作卓有成效，保持了水电煤气电话电讯以至公共交通始终没有停止，工厂商店也都正常开工和营业。

在协助带路方面人民解放军一进入市区，人民保安队员立即充当向导。沪西区曾应9兵团的要求，派出50名向导随军行动，直到27日战事结束。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的人民保安队，把最好的车子开出来，帮助解放军运送弹药给养，支援解放军追击残敌。

在瓦解敌军和收缴武器方面人民保安队都对驻厂驻店的国民党军作攻心瓦解工作，劝告他们放下武器，停止顽抗。英联船厂的人民保安队就争取青年军202师的一个团以及一个军需营放下武器，收缴了2000—3000人的武器装备，并协助解放军看守几千个俘虏。五金行业的人民保安队向人民解放军交了收集来的大米1900包，汽艇三艘，大小汽车4辆，汽油6大桶，战马10余匹，面粉数百袋，各种枪弹数万发，还有大量的枪枝。南市六联的人民保安队在一个药材仓库里，就搜获了敌军隐藏的机枪2挺，步枪40支，手榴弹50箱，还有大批军毯。五金业、绿营社、洞庭同乡会、益友社的人民保安队，把国民党军队向商店、居民强抢来作防御工事的整包大米、五金器材、木材、门板等，经过调查，分别送还原主，清理马路使交通畅通。

在监视敌人、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有些敌人打着“华东地下军”、“江南中共地下军”、“苏浙皖地下司令部”、“中共地下军耀字部队”、“中共城工部工作队”的旗号，有的甚至戴上伪造的白底黑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地下党统一印发的是白底红字）到处去“接管”，妄图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破坏社会治安，都被人民保安队识破，押送解放军查处。

人民保安队表现了上海人民的机智勇敢和对人民解放军的拥护、支持，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四、胜利会师　建立人民政权

解放上海，接管上海，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直接指挥。从1949年3月31日至4月20日，曾9次邀请已在北京的经济界和教育界民主人士，分别座谈接管上海问题。毛泽东曾指出，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个难关，在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

在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就着手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以华东局干部，山东、苏北解放区各区党委、地委、县委配备的党政军整套班子以及一部分上海地下党的撤退干部，组成8000人左右的"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4月24日，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了丹阳，进行紧张而细致的准备工作。华东局为接管上海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和部署。首先是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城市政策，明确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明确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到我们一边，才能接管好上海。进行纪律教育，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党我军带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是党风的体现，是接管好上海的保证。与此同时，一面组织调配干部，一面把上海地下党送去的调查材料，按机关、部门、产业等分类编印的资料，及时分发给各接管系统的负责人员，使他们了解接管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具体落实接管政策和措施。此外，还调集大量物资，主要是大米、棉花和煤炭，准备迅速运往上海，以保证解放后的上海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5月8日，在丹阳的刘晓、刘少文并致电上海市委，指示上海解放后的会师工作，一定要注意团结和纪律，凝成一片。要使地下党员了解以解放军及解放区干部为主体

的重要性。“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应即按照接管部门系统分门别类，发动党员及群众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来发动群众协助接管，支持军事代表，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党的支部书记、工作组长、工会党团书记应立即与军事代表发生联系，组织党的接管工作委员会，以军事代表为主任，并须服从军事代表”。“在各技术部门，特别是铁路、航运、国际电台、工务局、电力公司、公用局、渔管处、财政、税务、海关，请准备一批熟悉情况与有技术之干部参加接管工作，以便解放军一到，即可汇合加强接管工作。”中共地下市委立即逐级在全党传达，进行学习讨论，並要求作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执行。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准备解放接管上海的时候，国民党市政府的市长、局长都在准备逃跑。4月14日，吴国桢逃往台湾，由原市府秘书长陈良代理市长。警察、财政、教育、民政、社会各局局长也多易人。5月初，陈良改任市长。24日上午，陈良又准备逃台，召开各局、处负责人会议，宣布由工务局长赵祖康代理市长，主要负责维持治安和办理移交两项任务。当晚，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赵祖康即以代市长名义打电话暗示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通知各区警察分局立即缴械投降。又电警备司令部分别找陈良和陈大庆，要他们迅速下令撤退部队，免得危害人民生命财产。深夜2时，解放军已进抵八仙桥等地，赵又要陆大公立即在市府大厦竖起白旗，表示投降。26日上午，赵祖康又召集各局处负责人开会，按照中共代表的意见，布置维持治安、照常办公、妥善保管档案资料等任务，准备移交。

25日，华东局进驻圣约翰大学，华东局领导人陈毅、饶漱石等接见了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刘长胜、张承宗等人，表示慰问。26日，华东局进驻励志社及三井花园，领导上海的接管工作。原地下党的同志分头到地区、系统报到，上海地下党，经过22年的英勇奋斗，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



大上海解放了

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军管会”是上海市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军管会”下设四个委员会分工接管四个系统：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粟裕，副主任唐亮，负责接管军事部门。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林，副主任曹漫之，负责接管政务部门。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负责接管财经部门。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毅兼，副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负责接管文教部门。

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下午，在国民党市政府市长办公室举行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由国民党市政府代市长赵祖康将旧市府和旧市长的印信交与陈毅市长。陈毅致词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府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期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请赵先生在工务局担任领导。”5月28日，上海正式回到了人民手里，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政府，并定是日为上海市解放纪念日。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从此开始。

5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全体指战员，

全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同胞，热烈祝贺上海解放。指出，中国和亚洲的最大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27日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次作战中俘敌10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军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

3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进一步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的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移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这是对上海的地下党工作和上海人民革命的高度评价。社论还指出，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接管时的上海，情况如何呢？当时上海市面积611.7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450万人住在86.6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区。据1949年底的统计，工厂、码头、铁路工人和手工业者，共503500人；国家机关、工厂企业和私人公司中的职员449000人；从事商业的655700人(其中商店老板8万人、摊贩265100人)；专科以上学校的师生员工21500人；市内交通工作人员、家庭妇女和农民401400人。还有失业工人25万人，连失业店员及家属，共达100万人以上。贫民连家属，约65万人。游民(包括乞丐、娼妓、扒手、流浪儿童、散兵游勇、吸毒者等)连家属约17万人。逃亡地主、恶霸连家属约10万人。

解放时登记的工业企业5990家，其中只有103家能算得上规

模较大，雇用500—3000工人，其余的只能说是手工业式的企业。商业大多数为小商店，共63000家以上。1949年全年工业总产值309千万元。工业年产量：电100900万度，钢5200吨，棉纱712千件，棉布64千万米。机械工业只能修修配配。

从上述数字说明，当时从反动派手中接管的是一个生产落后、畸形发展、情况复杂的旧上海，改造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从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之日起，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力于将旧上海改造为新上海。

自上海开埠之日算起到1949年5月的100多年中，上海经历了许多变化，政权的更迭，也有多回。但它总是给人民带来痛苦。辛亥革命成功是唯一的一次人民普遍欢欣鼓舞的政权变革，又受到租界的限制，人民的欢乐得不到公开表达的机会，只有上海解放是上海有史以来空前的一次最深刻的变化，它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为了庆祝这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变化，上海600万市民在7月6日举行一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如此壮观的"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民联合大游行"。

大游行的核心、检阅台设在虹口区北四川路底。下午3时40分，盛大的检阅典礼开始。市长陈毅领先率同20余位军政首长和百多位来宾登上检阅台。4点正，游行队伍开始通过检阅台，一队队精神饱满、步伐整齐的步兵，一辆辆威风凛凛的坦克、装甲车和水陆两用装甲车，车上肃立着威严的解放军战士，另外还有骑兵、摩托兵团以及他们使用的新式武器、高射炮、榴弹炮……这是人民的部队第一次在上海人民面前显示力量，同时也向敌人显示这支部队的威力。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参加这次大游行的还有上海市各界代表，总计人数在100万以上，这是人民武装力量和上海人民的一次联合大检阅。为了让上海市民有机会目睹解放军的军容，这支队伍的游行路线是由北四川路到杨树浦，由杨树浦到外白渡桥、南京路，由南京路到曹家渡，由曹家渡到林森中路，然后再

回到原出发地，从下午4时开始直到7日凌晨零时才络绎返回驻地，历时8个小时。广大上海市民以无比的喜悦和游行队伍一起共同庆祝上海的解放。队伍所到之处，人民献花、唱歌、鼓掌、扭秧歌、呼口号……，整个上海市区成了欢乐的海洋，歌声、笑声，震撼全市，响彻云霄。

这天适逢下午下雨，尤其是5时以后，大雨倾盆，游行队伍在大雨中照常精神抖擞地游行，检阅台上以陈毅市长为首的军政首长，在开始下雨时将台上的来宾安排好避雨后，他们自己仍站立在台上、巍然地检阅游行队伍，历时4小时之久。这天的游行，象征着我人民武装力量，即使风雨交加，仍泰山般地巍然挺立，意味着我人民武装力量的坚强和不可动摇。

上海的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附录：

上海史大事记

唐

天宝十年(751年)

吴郡太守赵居贞奏请割本郡昆山县南境、嘉兴县东境、海盐县北境之地，立华亭县。县境东北的华亭海，即今上海市区。

宋

淳化二年(991年)

以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乃海舶往来的重要港口，正式设镇，派镇监。

景祐元年(1034年)

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府，开吴淞江五大浦，疏导诸水。

宝元元年(1038年)

两浙转运副使叶清臣疏盘龙汇、沪渎港，施工前到沪渎祭祀通济龙王庙。

熙宁十年(1077年)

在秀州17处酒务中，初见上海之名。

政和三年(1113年)

在秀州华亭县设市船务；改青龙镇为通惠镇。

绍兴二年(1132年)

将两浙市舶司从杭州移至华亭;恢复青龙镇旧名,设市舶务。

乾道七年(1171年)

委太傅丘崇为秀州知府,修复濒海18堰,兴筑捍海塘(即里护塘)。

开禧元年(1205年)

于长江口南岸黄姚镇(宝山县月浦附近)设买纳场,征收海舶关税。

嘉定十年(1217年)

析平江府昆山县东境置嘉定县,治于练祁镇。

景定五年(1264年)

缪相之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助士人唐时措、时拱兄弟建梓潼祠(文昌宫)。

咸淳三年(1267年)

董楷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助士人唐时措、时拱兄弟建古修堂以为诸生肄业之所。

咸淳七年(1271年)

陈珩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开始修建顺济龙王庙,为两层楼阁(元至元二十七年始竣工),手书"丹凤楼"匾额。

元

至元十三年(1276年)

上海市舶分司使费寀以上海镇归附元朝,受命为上海总管。

至元十四年(1277年)

升华亭县为府,明年改名松江府。于上海设立市舶司,委杨发为市舶使。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

在上海设立都漕运万户府,以张瑄、朱清为万户。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

划华亭东北五乡设立上海县。是年闰六月二十二日主簿郗将仕到任。

元贞元年(1295年)

浙西廉访佥事朱思诚，松江知府张之翰，委托乡万户费拱辰协助，改建县学。

大德二年(1298年)

撤上海市舶司，并入庆元。

大德五年(1301年)

上海县镇遭台风突袭，海浪涌岸，县衙被冲毁，达鲁噶齐雅哈雅忠显倡议改建，翌年竣工。

大德八年(1304年)

任青龙镇人任仁发为平江都水少监，疏浚吴淞江。

泰定二年(1325年)

县丞邓巨川屡次上书请求将冈赋稻米改征豆麦"从土之宜，以纾民困"。得到朝廷批准。乡人感激他，为他树碑立传。

泰定三年(1326年)

设都水营田使司于松江，撤松江府，上海县改隶嘉兴道。

天历元年(1328年)

撤松江都水营田使司，恢复松江府旧制，上海重归松江。

元统二年(1334年)

下砂盐场司令陈椿撰绘《熬波图咏》成。

至元三年(1337年)

邑人赵如珪等在乌泥泾修建黄道婆祠，纪念她教会乡人纺织的功绩。

至正十五年(1355年)

定准上海县垦种官民田地、池、荡21309顷72亩。

至正十六年(1356年)

张士诚攻取平江府(苏州)，改名隆平府。两部元军在松江内讧，王以敬所部哗变，纵火焚城，北走通波塘，降于张士诚。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取松江，得上海。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

吴王朱元璋派徐达围平江。松江府守臣王立中向徐达投降。朱元璋派荀玉珍为松江知府，祝挺为上海知县。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

县民钱鹤皋倡乱，攻下松江，杀荀玉珍。派姚大章取上海县。祝挺发动县民收复上海。杨维祯为撰《祝大夫碑》

明

洪武元年(1368年)

以金陵为南京，苏州、松江二府直隶南京，称苏松道。

洪武三年(1370年)

诏令松江一府输纳布匹，余征粮如故。

洪武八年(1375年)

诏令全国每50家设社学1所。上海初期举办社学59所，后发展到96所。

洪武十九年(1386年)

派信国公汤和经略浙东西沿海，整饬海防。在松江府境设金山卫城，领前、后、左、右、中及中前、中后七处守御千户所。中前所设于青村、中后所设于南汇嘴城。

永乐三年(1403年)

上海地区大雨成灾，派户部尚书夏元吉赴江南治水。夏元吉采纳邑人叶宗行的意见，引太湖水入刘家、白茆二港，开范家浜通黄浦，实现江浦合流，为上海港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永乐十年(1412年)

于县东清浦镇筑土为山，立堠表为志，引导海舟进出长江口。

山成，永乐皇帝御制《宝山碑记》记其事。

宣德五年(1430 年)

升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侍郎，总督南直隶苏松地区税粮。士人杜宗桓上书说："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提出均额之议。

宣德八年(1433 年)

周忱奏准朝廷，田税实行加耗折征例，以略减人民重负。

正统四年(1439 年)

周忱浚松江上游，使昆山顾浦诸处水急驶而下，尽涤下流沙壅，凡民间私筑堤堰，尽数毁去，并立表江心，以示水位。

天顺四年(1460 年)

巡抚南都御史崔恭巡视松江，浚治永乐初遗留未浚的东段松江，自昆山夏驾浦，中经上海白鹤江，迄嘉定庄家泾。又浚黄浦东面诸水，自曹家沟开河至新场，人受其惠，称曹家沟新河为都台浦。

成化七年(1471 年)

大风海溢，居民被漂溺者以万计。松江知府白行中，督工筑塘，东起嘉定，西抵海盐，堤长 52517 丈。

弘治十五年(1502 年)

上海县户籍 93023 户，260821 口。因赋役沉重，人口外流，较洪武初户数减少五分之一，人口减少一半。

正德十六年(1521 年)

巡抚都御史李充嗣集昆山、嘉定、华亭、上海四县民力，疏浚吴松江。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

巡抚都御史夏邦谟，巡按御史舒汀奏请朝廷，析华亭县北境、上海县西北境五乡九保之地，设青浦县，治于青龙镇。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

春三月海贼王直勾结倭寇，连舰数百，大举入犯。四月十五日

从浦东直犯上海，知县喻显科仓徨逃遁，倭寇饱掠于市，满载而去。五月初七、十二日又两次入掠，镇海卫指挥武尚文、上海县丞宋鳌迎战，殉职。六月十七日再至，指挥黎鹏举受伤，镇抚胡贤被杀。县镇连遭焚烧，闾里成墟。十月兴筑上海城，十二月竣工。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

正月十八日倭寇攻城东门，海防佥事董邦政撄城自守。围城十八日，二月六日解围。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总兵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大捷于王江泾。侍郎赵文华视师松江，劾总督张经、参将汤克宽，逮京问罪。赵文华会浙江巡抚胡宗宪，围剿陶宅倭寇，败于颛桥。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

五月初一倭船50余艘，自吴淞突至上海，攻城不能入。五月十八日夜半登城，民伕杨钿警觉大呼，城众击贼。倭寇退涉城濠，遇潮溺水，晨旦得尸67具。

隆庆三年（1569年）

吴松江因防倭筑栅而壅塞，巡抚都御史海瑞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疏浚吴松江，建闸二坝（老闸）。

万历元年（1573年）

依邑人兵科给事中蔡汝贤之议，恢复青浦县，迁县治于唐行镇。

万历三年（1575年）

夏五月，大风鼓涛，海潮骤至、冲破漘阙、川沙等处海塘，漂没人畜无数。巡抚侍御史邵陛、巡抚中丞宋仪望、松江知府王以修等捐银修塘。

崇祯六年（1633年）

邑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徐光启卒于官，享年72岁，谥曰"文定"。

崇祯十七年(1644年)

爆发奴仆之变。官宦之家、富室大户的奴仆,趁明清更代,一时统驭无主的机会,谋求自身解放,千百成群,沿家索还卖身契约。

宏光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

清兵至江南,上海地区普遍发生抗清起义。七月四日嘉定县侯峒曾、黄淳耀领导的起义失败,清兵屠城。八月四日松江郡城沈犹龙、陈子龙、夏允彝等领导的起义也告失败,清兵纵火焚城。八月二十二日金山卫城指挥使侯承祖抗清拒守也失败了。上海县起义领导者潘复,见周围抗清据点一一失守,率家人遁身入海。

清

顺治二年(1645年)

松江提督吴胜兆接受太湖义军的策反,约定于四月十六日举兵反正。十五日明定西侯张名振帅战船千艘从舟山来援,于崇明遇飓风,战船尽沉,张名振返回舟山。起义失败,吴胜兆被逮送江宁。地方士绅以"通海罪"被株连者数千人。

顺治十年(1653年)

九月明定西侯张名振引兵入吴淞,与清苏州总兵王璟战于东沟,清兵大败。明水师至闵行,掠取所需,满载出海。王璟诬指上海县民皆"通海",定谋屠城。上海知县阎绍庆、乡绅曹垂灿等长跪陈请,以百口之家担保,全城人民始免遭屠戮。

顺治十二年(1655年)

朝廷颁发禁海令,不许片帆入海,海上萧索。

顺治十三年(1656年)

依松江知府李正华之请,分华亭县为二县,以西南境设娄县,与华亭同廓分治。

顺治十八年(1661年)

江宁巡抚朱国治造江南绅士抗粮册送部,苏、松、常、镇四府及

溧阳县未能完纳钱粮的士绅 13517 名，尽被降革。其中属松江府籍者 2000 余人。此即轰动全国的“奏销案”。

康熙四年(1665 年)

江宁巡抚韩世琦上疏，请求减轻苏松粮赋，以解民困。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部份开放海禁，设江海关于华亭县漴阙。后因公廨窄狭，移驻上海县城宝带门内。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

上海和崇明籍船商在县城马家厂建立商船会馆。

雍正二年(1724 年)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将苏、松、常三府所属十三县，各分置一县。华亭县分设奉贤县，娄县分设金山县，上海县分设南汇县，青浦县分设福泉县(旋即撤废)，嘉定县分设宝山县。

雍正三年(1725 年)

掌管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奏请酌减松江府税额，准将正额税银蠲免 15 万两；上海县减去 49700 余两。

雍正九年(1731 年)

苏松道王澄慧迁来上海大东门内道台衙门。

乾隆元年(1736 年)

将太仓州并入苏松道，改称苏松太兵备道，或海关道，也称上海道、沪道。

乾隆三年(1738 年)

苏松太道翁藻捐俸购下明陆深故宅东隅之地，建屋 17 间，设立启蒙书院。

乾隆十三年(1748 年)

苏松太道翁藻与知县王侹共议，以籍入官产的原西人潘国光寓所，即明潘恩世春堂旧址，改建为申江书院。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停止广州以外港口的对外市易。特许上海、乍浦二港船去日本易铜。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

巡道杨魁将申江书院扩地增建,改名敬业书院。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地方官奏准,对去小羊山(钱塘江口)傭工及贸易的民人严加限制。时英国走私船只偷越江海关,至小羊山贩易。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钱庄总公所集银千两,买下豫园晴雪堂,以为全业集会之地。

嘉庆六年(1801年)

朝廷重申对无照民人偷漏赴小羊山者的限制,并对渎职官员规定惩处办法。

嘉庆十年(1805年)

两江总督陈大文奏请分上海县东部近海地区设川沙抚民厅,治于川沙堡城。

嘉庆十五年(1810年)

上海县户籍清查:男丁为248025人;妇女为236162人;合计总数为527472人(内包括优免人丁183人,当差人丁43102人)。

道光五年(1825年)

协办大学士英和上《海运疏略》,要求重开海上漕运。在上海雇用沙船1562艘,装运漕粮1429000石,白粮81500石,从上海直运天津。

道光八年(1828年)

巡道陈銮设立蕊珠书院于也是园内园。选敬业书院优等生36人来此深造。

道光十二年(1832年)

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林赛(化名胡夏米),译员普鲁士人郭士立(化名郭甲利),乘坐阿美士德号船,闯入吴淞口,

进入黄浦江，直抵上海城下。

道光十八年（1838年）

两江总督陶澍奏报，在上海南关外等处，一次查获窝藏鸦片烟土41000余两。

1840年（道光二十年）

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6月16日（五月八日），英国海军司令巴加指挥英舰侵犯吴淞口，中英吴淞之战爆发。

6月19日（五月十一日），英军分水陆二路，进攻上海。上海失守。

6月23日（五月十五日），英军退出上海，沿长江西犯。

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定为通商五口之一。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11月8日（九月十一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抵沪。

11月9日（九月十二日），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会商上海开埠事宜，议定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

年底，在上海登记居住的英国人计25名。

是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怡和洋行、仁记洋行、卫斯洋行、巴地洋行、宝顺洋行等共计11家商行在外滩划地建房。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11月29日（十一月一日），宫慕久公布《上海地皮章程》，英租界设立。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9月24日（八月五日），英租界西界确定为界路（今河南中

路)。

是年，清政府在外滩设江海北关(新关)。英租界成立道路码头公会。美国领事署在英租界九江路设立。美商上海旗昌洋行成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7月,徐家汇耶稣会修院建成。

是年,徐家汇藏书楼创立。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1月25日(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抵沪。

3月,青浦教案发生。

11月，英租界首次扩展，北至苏州河，西至周泾浜(今西藏中路)。

是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私据虹口地区为美租界。

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成立。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4月6日(三月十四日),上海道麟桂公布法租界四至。

是年,天主教传教士晁德莅创办徐汇公学。

1850年(道光三十年)

8月3日(六月二十六日),英文《北华捷报》创刊。

11月,英租界举行第一次舞会。

12月,英侨业余剧团开始演出。

是年,外侨辟建上海第一个跑马场,举行了上海第一次赛马。

美国格兰德女士在上海西白云观创办裨文女塾。

1851年(咸丰元年)

美国琼司女士在虹口创办文纪女塾。

1852年(咸丰二年)

外商船员在黄浦江举行首次赛船会(划船比赛)。

1853年（咸丰三年）

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挥军东进。

4月，上海西人决定组织义勇队（后改称万国商团）。

9月7日（八月五日），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攻入上海县城。

1854年（咸丰四年）

4月4日（三月七日），清军与英美军发生“泥城之战”。

7月11日（六月十七日），西人会议通过第二次土地章程，决定解散道路码头公会，成立工部局。

是年，英租界设立巡捕房。西人在泥城浜之东辟建第二跑马场。

1855年（咸丰五年）

2月17日（正月一日）小刀会起义军退出上海县城，刘丽川牺牲，起义失败。

2月24日（正月八日），华人被允许住入租界。

1856年（咸丰六年）

6月，法租界设立巡捕房。

1857年（咸丰七年）

1月26日（正月初一）《六合丛谈》在上海创刊。

3月，法租界设立管理道路委员会。

1858年（咸丰八年）

英国麦加利银行设立上海分行。

1860年（咸丰十年）

8月，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

1861年（咸丰十一年）

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8月，法租界第一次扩张。

12月，太平军攻克奉贤、南汇、川沙等处。

是年，冯桂芬作《校邠庐抗议》。

1862 年(同治元年)

1月7日，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

1月13日，上海官绅成立会防局。3月，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成立。

4月29日，法租界组织筹防公局，后改名公董局。

5月，太平军第三次进攻上海。

1863年(同治二年)

3月11日，李鸿章奏设上海同文馆，后改名上海广方言馆。

9月21日，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

1864年(同治三年)

5月1日，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成立。

是年，上海自来火(煤气)公司成立。

1865年(同治四年)

4月，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开设。

5月，江南制造局创设。

是年，英美租界开始使用煤气路灯。

1866年(同治五年)

3月，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修改《上海地皮章程》。

8月，法商自来火行成立。

是年，上海第一个近代剧场兰心戏院在圆明园路建成。

1867年(同治六年)

冬，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龙门书院创建。

1868年(同治七年)

9月5日，《教会新报》创刊。

9月15日，中国自造的第一艘机器制造的轮船"恬吉"号在江南制造局竣工后试航。

1869年(同治八年)

4月20日，《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公布，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

改为会审公廨。

9月24日，北京公使团批准英美租界擅自修改的《上海地皮章程》和法租界《公董局章程》。

1870年(同治九年)

2月，广方言馆移入江南制造局。12月23日，英领署毁于火。

1871年(同治十年)

容闳在上海设留美学生预备学校。海底电缆由香港通至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

4月30日，《申报》创刊。

8月11日，中国首批官费留美学生蔡绍基、詹天佑等30人由上海登轮赴美。

1873年(同治十二年)

1月14日，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

是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始译辑《西国近事汇编》。

1874年(同治十三年)

3月，上海开始从日本输入东洋车。

5月，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发生。

9月5日，《教会新报》改为《万国公报》。

1875年(光绪元年)

5月，《小孩月报》在上海创刊。

是年，郑观应基本写成《易言》。

1876年(光绪二年)

2月，《格致汇编》创刊。

6月22日，上海格致书院开院。

6月，英商淞沪铁路建成通车，后被清政府赎回拆毁。是年，上海道冯焌光创办求志书院。

1877年(光绪三年)

2月17日，上海轮船招商局买下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所有船

只、码头和栈房。

5月10日至24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

1878年（光绪四年）

12月，张焕纶创办正蒙书院，后改梅溪书院，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小学。

1879年（光绪五年）

9月1日，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创办圣约翰书院，后改圣约翰大学。

1881年（光绪七年）

12月，上海至天津陆路电线接通。

是年，黄佐卿创办公和永缫丝厂于苏州河畔。

1882年（光绪八年）

7月，英美租界开始使用电灯。

是年，徐鸿复等设立同文书局，影印二十四史等书。上海设立电报学堂。

1883年（光绪九年）

5月，上海自来水公司开始放水，李鸿章参加了放水典礼。

1884年（光绪十年）

中法战争爆发，法租界由俄国驻沪领事代管。

《点石斋画报》创刊。电报总局由津迁沪。

1885年（光绪十一年）

3月28日，中国客船“柳云”号在黄浦江被英国轮船撞沉，80人丧生。

中法战争结束，法租界恢复法国管理原状。

1887年（光绪十三年）

11月1日，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1894年改称广学会。

1888年（光绪十四年）

4月，上海小车工人举行抗捐斗争。

1889年（光绪十五年）

12月，上海机器织布局安装完毕正式开车。

1890年（光绪十六年）

4月，英国王室康脑脱公爵偕夫人访问上海。

夏，上海流行霍乱，死亡人甚多。

德国在上海设立德华银行。

1892年（光绪十八年），郑观应写成《盛世危言》。

1893年（光绪十九年）

2月17日，《新闻报》在上海创刊。

10月19日，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焚毁。

11月17日，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是年，上海流行天花，10名外侨和184名中国人死亡。

美租界扩张。

1894年（光绪二十年）

9月，上海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开工。

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海领事团宣布上海“中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夏季，上海流行霍乱，20名外国人和约930名中国人死亡。是年，南市马路工程局成立。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上海强学会，创办《强学报》。

2月，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设立。

4月30日，怡和轮船公司“昂武”号与太古轮船公司“牛庄”号在吴淞沙滩相撞，死亡人数近300名，大多数为中国乘客。

8月9日，《时务报》创刊。

8月11日，上海徐园放映电影，这是近代中国首例。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2月，商务印书馆创办。

4月1日，工部局决定增收小车捐，小车工人群起反对，工部局被迫取消增捐案。

4月8日，南洋公学创办。

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开办。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4月，普鲁士亨利（Henry）王子作为德国海军舰队司令访问上海。

5月31日，经正女塾开学。

7月16日，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发生。

8月5日，中国政府所筑淞沪铁路完工，9月1日通车。

9月1日，戊戌政变发生，9月24日，康有为在上海租界英人保护下，免罹于难，逃往香港。

9月26日，吴淞开埠。

是年，公共租界市政厅建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5月，英美租界扩张，旋正式改称国际公共租界。

上半年，上海流行天花，9名外侨和183名中国人死亡。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1月24日，慈禧太后立溥儁为大阿哥，欲废黜光绪皇帝，1月26日，经元善联络上海各界人士1231人通电反对。

1月，法租界第二次扩张。

2月，丹麦王子瓦德玛（Waldemar）访问上海。

6月26日，《东南保护约款》与《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议定。

7月26日，“中国国会”在愚园举行。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3月15日，上海各界人士300多名集会张园，要求抗拒沙俄。

3月24日，上海各界人士近千人再次在张园集会拒俄。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4月27日，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

夏，上海流行猩红热病，死亡约1500人。

11月16日，南洋公学发生学潮。

12月14日，爱国学社创立。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3月1日，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

4月27日，上海各界1000多人在张园集会拒俄。

6月30日，苏报案发生。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5月，上海发起抵制美货运动。

9月1日，上海发生特大水灾，租界大部分地区被水淹没。

9月4日，马相伯等创办复旦公学。

10月，同盟会上海分会成立。

11月，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成立。

12月，大闹会审公廨事件发生。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2月，中国公学开办。

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

是年，李平书集股创设上海内地电灯公司。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4月2日，《神州日报》创刊。

10月，电话局建立，开始安装电话。

是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设立广慈医院。

新剧始兴于上海。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2月，政闻社移沪。法租界有轨电车通车。

3月5日，公共租界有轨电车通车。

是年，上海第一架无线电报机安装启用。

上海第一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建成。

1909年（宣统元年）

1月，沪宁铁路建成通车。

2月，由美国提议的万国禁止鸦片会议在上海召开。

5月15日，《民呼日报》创刊，8月14日被查封。

6月18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改为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

9月，沪杭铁路通车。

10月3日，《民吁日报》创刊。11月19日被查封。

11月27日，16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在沪召开。

1910年（宣统二年）

10月15日，《民立报》创刊。

10月17日至22日，全国第一次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上海获第一名。

1911年（宣统三年）

1月6日，上海总会落成，这是上海第一座钢筋水泥建筑。

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

11月7日，沪军都督府成立。

12月25日，孙中山抵沪。

是年，中华书局成立。

会审公廨被攫夺。

1912年

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1月14日，陶成章被刺。

1月19日，上海开始拆城。

7月，沪军都督府取消。

10月7日，孔教会在上海成立。

1913年

2月，上海十一个团体2000余人在文庙参加祀孔活动。

3月20日，宋教仁被刺。

7月，二次革命爆发，7月23日，陈其美率领上海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

9月29日，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在新新舞台放映。

1914年

3月1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开会。

4月8日，法租界第三次扩张。

11月，上海锯泥水木等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

公共租界始有无轨电车。

1915年

3月18日，上海各界3～4万人集会张园，反对“二十一条”。

5月15日至22日，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

9月15日，《青年杂志》(后改《新青年》)创刊。

11月10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

12月5日，肇和舰起义，旋即失败。

是年，沪江大学创办。

1916年

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逝世。

是年，洋泾浜填平筑成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1917年

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

蒋梦麟为总书记。

7月3日，上海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共同集会反对张勋复辟。

是年，中国宣布对德国绝交，上海设立德侨检查所，调查在沪德人。

1918年

1月1日，华侨学生会在沪成立。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日，上海租界救火车悉数开出，以示庆祝。

1919年

2月20日，广东护法政府与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会议。

5月6日，上海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6月1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是年，上海流行霍乱，32名外国人和648名中国人死亡。

1920年

1月，上海日华纱厂工人举行罢工。

3月，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先到北京，后抵上海。

7月1日，第一家华商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

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

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10月12日，英国哲学家罗素来沪讲学。

11月，《共产党》月刊创刊。

1921年

5月1日，上海工人首次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30日至6月4日，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

1922年

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沪召开，制订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

1923年

1月，孙中山与苏联大使越飞在沪签署《孙文越飞宣言》。

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毛泽东、恽代英等参加领导工作。

3月，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校务长。

1924年

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沪召开，提出革命领导权和农民运动等问题。

10月12日，浙沪联军战败，卢永祥、何丰林通电下野。15日，齐燮元、孙传芳军和张允明军先后开进上海。

1925年

1月29日，奉军10000多人，其中包括雇佣的白俄军队1500人开进上海。

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宣布定上海为特别市，直属中央，电令上海自治公所的李平书等11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建上海特别市。

2月1日，上海特别市筹备会议议决将上海、宝山并为一起，建立淞沪特别市。

2月9日起，上海先后有22家日商纱厂35000余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举行同盟总罢工。

2月26日，在总商会的调停下，日本资本家同罢工工人代表签订四项复工条件，二月罢工胜利结束。

5月15日，“顾正红惨案”发生。

5月24日，内外棉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顾正红追悼大会。上海大学学生赴会途中被捕。

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等3000余人去公共租界中区演

讲、示威。老闸捕房英捕头埃弗森下令向群众开枪，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等13人先后牺牲，数十人重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分别开会，决定发动全市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

6月1日，上海开始进入“三罢”。20余万工人陆续罢工；公共租界两万家商店先后罢市；五万学生相继罢课。南京路上外国巡捕又向示威群众开枪，击毙4人，打伤10余人。

6月4日，由总工会、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商总联会四团体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

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项交涉条件，并发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6月10日，“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抵沪。

6月12日，总商会单独成立“五卅委员会”删改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另提出十三条交涉条件。

6月13日，奉军约2000人开进上海。

6月18日，六国调查委员会态度强硬，只愿就总商会十三条中的前五条进行磋商，谈判停顿。当晚六国委员离沪返京。

6月19日，总商会开会决定开市。

6月26日，各商店陆续开门营业，罢市结束。

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查封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

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提出有条件有组织的复工。

8月中旬，上海总工会同资方进行复工谈判，日本资本家被迫抚卹顾正红家属1万元，补偿罢工工人损失10万元。至9月底，各业罢工工人在资方承认一定条件后，先后复工。

9月 18 日，上海戒严司令部封闭上海总工会。

9月 21 日，工商学联合会被迫解散。

12月 11 日，段祺瑞执政府免去江苏督军齐燮元之职，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奉系派张宗昌助卢南下。

1926年

2月15日，孙传芳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5月4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成立。孙传芳自任督办，丁文江任会办。

9月 3 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提出上海要举行“民众暴动”。

10月 24 日，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仓促发动，遭到失败。

1927年

2 月 19 日，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令，号召全市工人“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

2月 22 日，上海罢工人数达到 36 万以上。傍晚，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两舰的起义官兵向高昌庙兵工厂开炮，但浦东工人未能前来接应，两舰孤立无援，只得撤离。

2月 24 日，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总工会向各工会发布复工命令。

3月 20 日，北伐军攻下新龙华。

3月 21 日，中共江浙区委发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令，总工会作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决定。上海 80 万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南市工人纠察队攻下淞沪警察厅、上海兵工厂、电话局、南火车站等，虹口、沪东、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起义工人分别占领所在地区。

3月 22 日，起义队伍攻占东方图书馆、天通庵站和北站，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

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召开，选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19名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和工人计 10 人。

3月 26 日，蒋介石乘坐军舰由芜湖抵达上海。

4月 3 日，蒋介石宣布上海戒严，将已受革命影响、比较同情工人的驻沪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开拔南京，另调旧军阀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至上海。

4月 7 日，蒋介石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作为上海的最高权力机关。

4 月 11 日，蒋介石下达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律实行清党。”

当晚，杜月笙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至家中，将其秘密绑架至郊外杀害。

4月 12 日，“四·一二政变”发生，二十六军和“中华共进会”武装流氓大批出动。总工会及各处 14 个地方的工人纠察队计 2700 名工人武装纠察全部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 120 人牺牲，180 人受伤。

4月 13 日，30 万工人响应总工会号召实行大罢工。下午，前往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的群众在行经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遭埋伏的二十六军大批士兵枪击，当场被打死者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通告取消上海总工会，另建立“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

4月 14 日，上海警察厅奉白崇禧之令发布查禁工人集会的命令，宣布工人集会与罢工概以“反革命”论罪。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中国济难会等革命机关、团体以及总工会下属的区、行业工会组织等纷纷被查抄封闭。

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沪成立。

7月 7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

1928年

1月3日，青浦小蒸农民暴动。

4月30日，嘉定六里乡农民暴动。

11月1日，中央银行总管理处在上海建立。

1929年

1月21日，奉贤庄行农民暴动。

7月，“大上海计划”开始实施。

1930年

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

5月20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

8月1日，“上海剧团联合会”改名“中国左翼剧团联盟。”翌年1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

1931年

8月9日，南汇泥城农民暴动。

1932年

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闸北。蔡廷锴、张治中等率十九路军、第五军英勇抗击。上海人民全力支援。

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

12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表宣言，宣布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

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

6月18日，杨杏佛在亚尔培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34年

11月13日，《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在沪杭公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35年

5月4日，国民政府封闭《新生》周刊，逮捕总编杜重远。

11月4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金融紧急处分令》，改革币制。

12月12日，由283名文化界爱国人士签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表。

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

1936年

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2月9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

2月23日，上海国难教育社成立。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

10月19日，鲁迅逝世。22日，举行葬礼。各界送殡者有6000多人，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救亡活动。

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邹韬奋，造成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

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

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在这期间及以后上海各界均成立了抗敌救亡的组织，与抗战将士并肩作战，为“八·一三”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8月9日下午，两名日军驾汽车一辆，强行进入我军用虹桥机场，与我保卫机场武装发生冲突。此即上海日军藉以向我发动全面进攻的所谓“虹桥机场事件”。

8月13日，日军向我闸北地区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击。“八·一三”上海保卫战开始。

8月 13 日至 22 日，我军战果辉煌：日军司令部、日本海军俱乐部、汇山码头等重要据点，先后均为我占领。

8月 14 日下午，我军飞机被击伤，炸弹误落大世界门前和南京路外滩。死伤数百人。23 日下午，日机轰炸南京路、浙江路口的先施公司，伤亡 700 余人。

9 月 7 日，守卫宝山县城之 98 师583团第 3 营全体官兵600余人，血战九昼夜，同时殉国。

9月 12 日，我军放弃第一道防线。

10 月 26 日，我军奉令后撤。27 日晨，我 88 师 524 团团副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等率领官兵 800 余人坚守四行仓库，孤军作战，历时四昼夜，延至 31 日凌晨，奉命退入租界，是为当时大长我威风的“八百孤军”（或称“八百壮士”）。

11月 12 日，上海沦陷，租界成为日军包围的孤岛。

11月 29 日，日本侵略者强行接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新闻检查机构。

12月 5 日，浦东出现“上海市大道政府”，苏锡文任“市长”。

12月 13 日，当局通知各华人报纸必须送检，否则不准出版。《申报》、《大公报》等因而停刊。

1938年

1月，《每日译报》、《文汇报》创刊。其后问世的还有《导报》、《申报》、《中美日报》等，这些都是被迫以“洋商”名义出版，在宣传抗日救亡、鼓舞人民斗志和揭露敌伪丑态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4月 28 日，“大道政府”改称“督办上海市政公署”，由傅筱庵任督办。

10月 16 日，“督办公署”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

年底，公共租界（除东区外），工厂总数达 3879 家，工人总数达 155000 人，加上由日方控制的东区 830 家、工人 8200 余人，无论工厂总数还是工人数目均已超过战前。

12月初和1939年2月，上海各界人民组成慰问团，两次赴皖南慰问新四军

1938年至1939年间，《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相继在上海问世。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9年

8月30日下午，洋商《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被敌伪特务枪杀，年仅39岁。其后，新闻出版界不少人均遭毒手。

11月23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遭敌伪暗杀。

12月12日，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遭日伪特务暗杀。17日，数千人参加公祭。

1940年

10月11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遇刺毙命，陈公博兼任“市长”。

1941年

3月21日深夜至22日清晨，敌伪“七十六号”特务连续制造两起大血案：一是江苏省农民银行十一名职工被集体枪杀，二是包围“中行别业”抓走银行职工128人。24日又在中央银行上海两办事处内，炸死多人。4月17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被迫停业。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上海全部沦陷。

1942年

5月27日，汪伪政府发行“储备券”，禁止法币流通。

1943年

8月1日，汪伪政府接收公共租界，改称上海特别市第一区。

1945年

1月15日，周佛海兼任汪伪政权的“上海市长”。

8月15日，日本投降，重庆政府先后任命钱大钧、吴绍澍为上海

正副市长。

1946年

6月22日，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在上海思南路107号（现73号）成立，因遭到国民党当局反对，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公馆”（简称“周公馆”）。

6月23日，晨，上海人民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在车站广场外举行了欢送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代表团到达南京后遭到暴徒袭击，造成闻名的“下关惨案”。

1947年

2月9日，国民党特务在南京路，制造“劝工大楼血案”，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暴徒殴打致死。

5月19日，上海国立大专学校学生7000多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高举“向炮口要饭吃”的横幅，欢送学生请愿团去南京。

5月3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

6月1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7月23日，《文萃丛刊》工作人员陈子清、骆何民、吴承德被捕，先后被杀害，世称“《文萃》三烈士”。

11月30日，2000多名摊贩游行，包围黄浦警察分局。

12月1日，示威群众增加到5000人，分别包围黄浦、老闸两警察分局，游行群众10多人被害，伤百余人。

1948年

1月29日至2月2日，5天内爆发了“同济血案”、“舞女风潮”和“申九惨案”三起反迫害斗争。

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示威大游行，参加学生有5000余人，被捕60余人。这是上海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市性的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

1948年9月30日，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被特刑庭判处死刑。

1949年5月21日，原国民党中将张权、少将李锡佑被以“银元贩子”罪名，在大新公司门前枪决。

5月12日解放上海之战正式开始。

27日，上海市区完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

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同日下午接管了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

1949年7月6日，上海市人民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民联合大游行》。参加人数在100万以上，从6日下午4时开始直到7日清晨零时，游行队伍才络绎返回驻地，历时8小时。广大上海市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和游行队伍一起，共同庆祝上海解放。

上海地区建置沿革表

时代	地域	国郡	县区
夏、商、周	扬州之域		
春秋	吴、越		
战国	楚	春申君黄歇封邑	
秦		会稽郡（公元前221年始皇划天下为三十六郡，于故吴越地设会稽郡治于吴）	娄县 由拳县 海盐县 （上海地区在此三县间）
汉	扬州（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十三部刺史巡行郡国）	楚国（公元前202年立韩信为楚王） 荆国（公元前201年立刘贾为荆王） 吴国（公元前196年立刘濞为吴王） 会稽郡（公元前154年景帝诏收复郡）	娄县（移治于娄江之阴，新莽改名娄治） 由拳县 海盐县（新莽更名展武）
东汉	扬州	吴郡（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分浙西为吴郡）	娄县（光武中兴，复旧县名） 由拳县 海盐县
三国	吴	吴郡	娄县 由拳县（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改名禾兴县，赤乌五年，公元242年改名嘉兴） 海盐县
晋	扬州	吴郡	娄县 嘉兴县 海盐县

（续表）

时代		地域	属郡	县区
南朝	宋	扬州（元嘉年间设南徐州，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复归扬州）	吴郡（元嘉中改属南徐州，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复属扬州）	娄县 嘉兴县 海盐县
	齐	扬州	吴郡	娄县 嘉兴县 海盐县
	梁	扬州 吴州（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分扬州置，大宝元年，公元550年废）	吴郡（太清三年分属吴州，大宝元年重归扬州） 信义郡（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分吴郡置） 武原郡（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侯景置）	嘉兴县 信义县（天监六年，公元507年以娄县地置） 昆山县（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析信义县地置） 海盐县（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以县立为武原郡） 前京县（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析海盐县置） 胥浦县（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析海盐、前京县地置，大宝二年入武原郡，寻并入前京县）
	陈	扬州 吴州（祯明元年，公元587年分扬州置，寻废）	吴郡（祯明元年属吴州，寻归扬州） 信义郡 海宁郡（永定二年，公元558年立）	嘉兴县 昆山县 信义县 海盐县（永定二年，公元55?年入海宁郡） 前京县（永定二年，公元55?年入海宁郡）
隋		扬州行台	苏州（废郡，改为苏州，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更名吴州，三年公元607年复为郡） 杭州（升钱塘郡为州）	昆山县（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并入吴县，十八年，公元598年复置） 嘉兴县（入于杭州） 盐官县（陈海盐县，前京县并入盐官县）
唐		江南道（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设） 江南东道（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设）	苏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名吴郡，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复称苏州）	昆山县 华亭县（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析昆山县南境、嘉兴县东境、海盐县北境置） 崇明镇（武德年间，长江入海口形成东西二沙洲，神龙初设镇）
五代		吴越国	中吴军（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改苏州为中吴军） 秀州（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设开元府于	昆山县 华亭县（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属开元府，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属秀州） 崇明镇

（续表）

时代	地域	属郡	县区
五代		嘉兴，长兴三年，公元932年置开元府，重归中吴军，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于嘉兴设秀州	
宋	两浙路（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设） 浙西路（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分两浙为东西二路） 淮南东路	平江府（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改苏州为平江府） 嘉兴府（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改秀州为嘉禾郡，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复称秀州，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改为嘉兴府） 通州	嘉定县（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析昆山县东境置） 华亭县（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初见上海之名，景定年间已有上海镇） 天赐盐场（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于崇明镇设场，隶于通州）
元	江浙行省浙西道（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设） 江淮行省浙西道（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设）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设） 河南江北行省淮东道	平江路（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升府为路） 松江府（至元十四年，公元1227年升华亭县为府，十五年更名松江府，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设都水庸田使司，撤府，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复为府） 扬州路	嘉定州（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升县为州） 华亭县 上海县（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析华亭县东北五乡置） 崇明州（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升为州，隶扬州路）
明	直隶南京	苏州府（洪武初改平江路为苏州府） 松江府	嘉定县（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州为县） 崇明县（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州为县，八年，1375年改隶苏州） 华亭县 上海县 青浦县（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析华亭、上海二县地置，至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撤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复置）
清	江南布政使司 江苏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分置）	松江府	华亭县 娄县（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析华亭县置；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撤废，并入华亭县） 上海县 青浦县 奉贤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析华亭县东南境置） 南汇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

（续表）

时代	地域	属郡	县区
清			年析上海县东南境置） 福泉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析青浦县置，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撤废） 金山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析娄县西南境置） 嘉定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改隶太仓州） 宝山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析嘉定县东境置，隶太仓州） 崇明县（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改隶太仓州） 川沙抚民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析上海县、南汇县东境设，隶松江府）
		太仓直隶州（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升太仓县为直隶州）	
民国	江苏省	沪海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袁世凯称帝恢复道制，沪海道辖十二县，除上海地区十县外，尚有太仓、海门二县）	上海县 嘉定县 宝山县 松江县（华亭县改称） 奉贤县 金山县 南汇县 青浦县 川沙县（改川沙抚民厅为县） 崇明县
		上海市（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根据《暂行市乡自治章程》升为市，领19市乡）	
		淞沪商埠（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北洋军阀孙传芳督江苏省，以上海、闸北、蒲松、洋泾四市及法华、引翔等乡和宝山县、吴淞市及高桥、殷行江湾、彭浦五乡置）	
	上海特别市（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设特别市，跨地五县，辖市乡三十。直隶国民政府） 上海市（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公布《市组		

（续表）

时代	地域	属郡	县区
民国	织法》改特别市为市）		
	上海特别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在浦东成立大道市政府。翌年十月扶植汉奸政府，改上海为特别市。）（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沪公共租界改为第一区，法租界为第八区，原六区为第二至第七区。又合并周围各县，分辖区为市区、郊区及县区。将市区及郊区编组为三十一个警区。）		南市、沪北、沪西、浦东北、浦东南、市中心六区为华界，还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1863年时已形成）。 市区：第一——第八区 郊区：江湾、沪北、沪西、浦东南、浦东北 县区：川沙、南汇、奉贤、松江、上海、青浦、嘉定、宝山、崇明县
	上海市（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抗战胜利，重新划定市区，）全市分为三十二区）		黄浦、老闸、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长宁、静安寺、新成、江宁、普陀、闸北、北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榆林、杨树浦、新市街、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龙华、杨思、洋泾、高桥、真如区。另马桥、塘湾二区仍归上海县属

上海历任知县(县尹)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元				一县长官为达鲁花赤及县尹
1294年 至元三十一年	周汝楫			至元二十七年立县
1298年 大德二年	石(佚名)			
1302年 大德六年	夏(佚名)			
1305年 大德九年	辛思仁			
1314年 延祐元年	张如砥	周道	历山	升陕西行省御史
1318年 延祐五年	单伯颜			
1324—1327年 泰定	何蒙	正叔		
1334年 元统二年	程伯颜帖木儿			
	李琦		钜野	
1345年 至正五年	刘辉	文大	汴梁	一作至正十一年 历户部主事
1347年 至正七年	何缉	子敬	泰州	
1363年 至正二十三年	苏宗瑞			
明				一县长官称知县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367年 吴元年	祝挺	正夫	鄱阳	升户部郎中
1369年 洪武二年	张平			
1370年 洪武三年	张麟			
1371年 洪武四年	王隆祖			
1373年 洪武六年	王文贞			
1375年 洪武八年	康伯愚			
1392年 洪武二十五年	林廷瑾			
1396年 洪武二十九年	张守约			
1398年 洪武三十一年	杜锰			在任十八年，卒于任
（阙年）	唐鉴			
	罗景城			
	秦宗议			
1426—1434年 宣德	方佐		宁波	
1437年 正统二年	张祯			由县丞升
正统	侯源			
1452年 景泰三年	杨昕	瑞安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452年 景泰三年	李纹	仲绣	九江	举贤良方正
1458年、1462年、1463年 天顺二年、六年、七年	吴则			
1460年 天顺四年	李纹			
1465年 成化元年	李纹			
1470年 成化六年	杜棠		伏羌	
1471年 成化七年	王崇之	守节	滑县	
1475年 成化十一年	刘宇	志大	钧州	历吏部尚书
1479年 成化十五年	李棨	从质	任邱	历光禄寺卿
1483年 成化十九年	刘琬	德贤	宜春	历副都御史
1487年 成化二十三年	李鸾		汝宁	历泸州通判
1488年 弘治元年	刘(佚名)			
1490年 弘治三年	汪直卿		鄞县	
1493年 弘治六年	黄钥	启之	鄞县	历御史
1496年 弘治九年	原应宿			
1498年 弘治十一年	郭经	载道	卢龙	
1505年 弘治十八年	石珙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507年 正德二年	徐潭	惟静	宁海	
1509年 正德四年	史璜			
1512年 正德七年	黄希英	如美	莆田	
1514年 正德九年	王轼	子敬	山阴	
1517年 正德十二年	王卿	良佐	临县	历参政
1520年 正德十五年	郑洛书	启范	莆田	
1525年 嘉靖四年	徐昭	德新	永康	历通判
1528年 嘉靖七年	曹煜	孟辉	浮梁	历南京御史
1532年 嘉靖十一年	常应文	汝实	榆社	
1534年 嘉靖十三年	杜锭	邦平	鄞县	历主事
1535年 嘉靖十四年	冯彬	用先	海康	历松江知府
1537年 嘉靖十六年	梅凌云	尚志	湖口	
1538年 嘉靖十七年	张秉壶	国镇	莆田	历给事中
1545年 嘉靖二十四年	孙渭	应清	莆田	历副都御史
阙年	莫遗贤			
1550年 嘉靖二十九年	喻显科	时晋	南昌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553年 嘉靖三十二年	刘克学	子行	什邡	
1556年 嘉靖三十五年	葛大纪	伯理	商州	历主事
阙年	刘本学			
阙年	常应文	彬州		
1558年 嘉靖三十七年	牛镜		献县	历巩昌知府
1560年 嘉靖三十九年	郜光先	子孝	长治	历兵部尚书
1562年 嘉靖四十一年	黄文炜	德华	南城	
1564年 嘉靖四十三年	陈懋观			
1565年 嘉靖四十四年	郑惟侨		石首	历南京大理寺评事
1566年 嘉靖四十五年	姜忻	克荣	南昌	历广西右布政使
1568年 隆庆二年	张岩	子谦	南城	历工部郎中
1571年 隆庆五年	邝彭龄	幼元	南海	
1574年 万历二年	敖选	国卿	金堂	历御史
阙年	张应凤		江西	
1580年 万历八年	邓炳	其文	监利	历户部郎中
1583年 万历十一年	颜洪范	仲起	上虞	历南京户部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588年 万历十六年	高进孝	遂忠	获嘉	历工部郎中
1589年 万历十七年	许汝魁	元甫	湖口	历南京通政使
1590年 万历十八年	杨遇	惟良	仁和	
1593年 万历二十一年	徐可求	观我	西安(浙江)	历佥都御史
1595—1598年 万历二十三——二十六年	许汝魁			
1599年 万历二十七年	朱垦耀			
1602年 万历三十年	刘一炌		南昌	
1605年 万历三十三年	毛一鹭	序卿	遂安	由郡司署理
1605年 万历三十三年	李继周	汝辅	南昌	
1610年 万历三十八年	吴之甲			
1611年 万历三十九年	徐日久	鲁人	西安(浙江)	
1612年 万历四十年	邹人昌	宸柱	麻城	
阙年	郝宇			
1616年 万历四十四年	吕浚	槐长	平湖	
1622年 天启二年	鲍奇谟	赤城	余杭	历御史
1625年 天启五年	陈曰宾	逵门	铜梁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628年 崇祯元年	陈昌允		宁德	
1630年 崇祯三年	熊经	南石	临川	
1631年 崇祯四年	麦而炫	章阁	高明	
1633年 崇祯六年	刘潜	念先	富顺	
1635年 崇祯八年	王大宪	依可	万安	
阙年	姜炎			
1640年 崇祯十三年	章光岳	茂阁	临安	
1643年 崇祯十六年	彭长宜	德符	海盐	
清				一县之长称知县
1645年 顺治二年	张昌祚			
1645年 顺治二年	孙鹏		凤翔	
1648年 顺治五年	高维乾		海州(奉天)	
1651年 顺治八年	姚修蔚		南昌	
1653年 顺治十年	颜绍庆	康侯	鲁山	
1657年 顺治十四年	商显仁	晦侯	淳安	
1658年 顺治十五年	高凌云		威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658年 顺治十五年	涂赞		丰城	
1660年 顺治十七年	陆宗赞		临清	
1661年 顺治十八年	王孙兰		洮州	
1662年 康熙元年	陈以恪		峄县	
1663年 康熙二年	邹宏	未庵	庐陵	
1668年 康熙七年	朱光辉	阆公	义州	
1671年 康熙十年	康文长	长儒	吉安	
1672年 康熙十一年	陈之佐	鹤亭	故城	
1675年 康熙十四年	任辰旦	待庵	萧山	历工科给事中
1679年 康熙十八年	唐朝宣			摄
1681年 康熙二十年	史彩	简庵	会稽	历同知
1684年 康熙二十三年	李经正			摄
1686年 康熙二十五年	王锐	长颖	嵊县	
1688年 康熙二十七年	朱万锦	朴愚	通山	
1689年 康熙二十八年	董鼎祚			
1691年 康熙三十年	梁以楠		广宁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693年 康熙三十二年	陈善	九皋	晋江	
1697年 康熙三十六年	张汉		山阴	
1700年 康熙三十九年	陈善			
1702年 康熙四十一年	李友枝	鹿友	山阴	
1706年 康熙四十五年	许士贞	介庵	虞城	
1711年 康熙五十年	邹廷璧		大冶	
1712年 康熙五十一年	刘洊	漱园	翼城	
1715年 康熙五十四年	尚崇安		镶黄旗	
1717年 康熙五十六年	陈锜		镶黄旗	
1719年 康熙五十八年	何自懋		潜江	
1722年 康熙六十一年	傅之铨		宁夏	
1724年 雍正二年	周中锭			
1725年 雍正三年	全乾象	健也	沂州	
1726年 雍正四年	李玟	文玉	临县	
1727年 雍正五年	钦琏			署
1728年 雍正六年	于本宏		大兴	历淮安知府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729年 雍正七年	丁铨			署理
1731年 雍正九年	秦士颙		沔阳	
1731年 雍正九年	张涛			
1734年 雍正十二年	卫苍佩			
	诸菊书		秀水	
1737年 乾隆二年	李倪昱	颙亭	晋江	
1738年 乾隆三年	徐良模			通判摄
1739年 乾隆四年	王世睿	道存	章丘	
1745年 乾隆十年	王健	燕赏	单县	
1749年 乾隆十四年	李文耀	全章	清流	
1750年 乾隆十五年	潘恂	兰谷	桐城	
1752年 乾隆十七年	李希舜	栗斋	宜良	历太仓州知州
1756年 乾隆二十一年	车策	冠英	邵阳	
	龙灿岷			署理
	刘宇成			摄
1759年 乾隆二十四年	卢师武		龙泉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761年 乾隆二十六年	于方柱	中斋	平度	历遵义知府
1767年 乾隆三十二年	张世友	益爵		
1769年 乾隆三十四年	清泰	午亭	蒙古	
1773年 乾隆三十八年	史尚确	易斋	乐陵	历苏州同知
1778年 乾隆四十三年	韩运鸿			署理
	孙恩庭	坦园	怀来	历福建盐法道
1780年 乾隆四十五年	王学廉			署理
	林培选	立斋	文登	
1781年 乾隆四十六年	巴哈布			
1782年 乾隆四十七年	范廷杰	斗南	通海	
1785年 乾隆五十年	俞锡		新昌	
1786年 乾隆五十一年	宁贵			署理
	周云翮		山阴	
1790年 乾隆五十五年	林大权		浮梁	
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	汪廷昉			摄
1792年 乾隆五十七年	郭占选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793年 乾隆五十八年	中文		蒙古	
1794年 乾隆五十九年	汪廷昉			复摄
1795年 乾隆六十年	许坤		海宁	
1796年 嘉庆元年	崔兆鼎			
1797年 嘉庆二年	汤森		仁和	
1800年 嘉庆五年	李绍浴		柯霞	
1802年 嘉庆七年	石文澍		黄梅	
1804年 嘉庆九年	苏昌阿	受堂		正白旗
1805年 嘉庆十年	张京业		历城	
1807年 嘉庆十二年	苏			
1809年 嘉庆十四年	郭元照		阳信	
1810年 嘉庆十五年	王大同	炎峰	乐陵	
1813年 嘉庆十八年	周右		钱唐	娄县丞护理
	陈文述	云伯	钱唐	
	方佐		桐城	
1814年 嘉庆十九年	叶机	莱山	定海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21年 道光元年	许乃大	溶皋	仁和	署理
1822年 道光二年	武念祖			
1824年 道光四年	吴廷扬			署理
1825年 道光五年	许乃大			
1828年 道光八年	王文炳	虎臣		
1829年 道光九年	平翰	越峰	山阴	
1830年 道光十年	沈炳垣	晓沧	桐乡	
1831年 道光十一年	温纶湛	露皋		
1832年 道光十二年	魏之瀛			
	温纶湛			再任
1835年 道光十五年	黄冕	南坡	长沙	署理
1837年 道光十七年	练廷瑞	笠人	迟平	
1839年 道光十九年	王文炳			再任
1840年 道光二十年	曾承显	文弢	虞南	
	蔡维新	柳堂	怀宁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41年 道光二十一年	刘光斗	错山	奉天	
1842年 道光二十二年	秋家丞	砚箴	辉县	
1842年 道光二十二年	蔡维新			
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	蓝蔚雯	子青	定海	
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	周沐润	文之	祥符	
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	蓝蔚雯	子青	定海	再任
1848年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	金咸	小庄	诸城	署理
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	王绍复	伯阳	蓬莱	正任
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秋	钱家骥			代理
1850年 道光三十年	平翰			再任
1850年 道光三十年七月	毓庆	秀峰	满洲	署理
1851年 咸丰元年五月	姚辉弟	子箴	辉县	三年间金陵陷潜逃
1853年 咸丰三年四月	袁祖德	又村	钱塘	署理，在任被杀
1853年 咸丰三年十一月	孙丰	兰溪	介休	
1855年 咸丰五年八月	黄芳	荷汀	长沙	
1856年 咸丰六年	孙丰	兰溪	介休	署理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58年 咸丰八年十月	刘郇膏	松岩	太康	
1861年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	王宗濂	莲塘	山西	
1867年 同治六年三月	王宗濂			再任
1867年 同治六年六月	叶廷眷	顾之	香山(广东)	署理
1868年 同治七年五月	朱凤梯	梧冈	大兴	署理
1871年 同治十年六月	陈其元	子庄	海宁	署理
1872年 同治十一年七月	叶廷眷			回任
1875年 光绪元年四月	松亭	听涛	正黄旗	署理
1876年 光绪二年七月	莫祥芝	善徵	独山	署理
1882年 光绪八年六月	范寿棠	小蘅	会稽	署理
1882年 光绪八年十一月	黎光旦	壶山	湘潭	署理
1884年 光绪十年十月	莫祥芝			回任
1887年 光绪十三年四月	蒯光华	虎臣		代理
1887年 光绪十三年八月	裴大中	浩亭	霍邱	正任
1890年 光绪十六年四月	陆元鼎	春江	仁和	署理，历江苏巡抚
1891年 光绪十七年四月	袁树勋	海观	湘潭	署理，历上海道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92年 光绪十八年六月	贺镇山	莫高		代理
1892年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	黄承暄	爱棠	萍乡	历四川盐道
1896年 光绪二十二年	黄承暄			再任
1898年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	王豫熙	欣甫	海盐	
1899年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	蓝采锦			署理
1900年 光绪二十五年 十二月	戴运寅	子迈		代理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4月	汪懋琨	瑶庭	历城	正任
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刘定荣			
1904年 光绪三十年	孙传桢			主簿署
1904年 光绪三十年	沈恩湛	鸿荪		一说汪懋琨
1906年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王念祖	少谷	合肥	正任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	李超琼	紫璈	合江	
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吴馨	怀疚		
1909年 宣统元年闰二月	李修梅	萼仙		代理
1909年 宣统元年四月	田宝荣	春霆		正任
1911年 宣统三年九月	吴馨	怀疚		再任

（续表）

在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民国				初称民政长后称县知事
1914年 民三1月1日—11月6日	洪锡范	伯言	太仓	
1914—1916年 民三11月6日—民五10月9日	沈宝昌	酝石	绍兴	丁忧卸任
1916年 民五10月9日—12月16日	景松	毓华	商城	代理
1916—1924年 民五12月16日 民十三9月19日	沈宝昌			回任
1924年 民十三9月19日—10月18日	熊烈	商衡		
1924—1925年 民十三10月18日—民十四1月10日	李寿慈	南山		
1925年 民十四1月10日—1月14日	傅文通			
1925年 民十四1月14日—1月30日	范回春		宁波	
1925年 民十四1月30日—2月5日	应季留			
1925年 民十四2月5日—10月18日	李祖夔		浙江	
1925—1926年 民十四10月18日—民十五4月7日	张思礼	受之	松江	
1926年 民十五4月7日 10月24日	危道丰	芑滨		
1926—1927年 民十五10月24日—民十六3月22日	徐韦曼	宽甫		

（续表）

在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927年 民十六3月22日— 3月24日	陈勇三			北伐军到沪
1927年 民十六3月24日 8月20日	邵树华			
1927年 民十六8月20日—	江家珺	眉仲	婺源	上海特别市成立

（据列朝《上海县志》、《上海碑刻资料选》、《上海研究资料》、《吴煦档案选编》等资料编制。

上海历任道台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724年 雍正二年	朱一凤		涿州	分巡苏松道，三年兼理海关
1726年 雍正四年	蔡永清 王玑 孙毓璞 漆绍文 孔毓璞		镶白旗 钱塘 曲阜 新昌	再任
1727年 雍正五年	魏观		获鹿	
1729年 雍正七年	徐永佑		汉阳	
1731年 雍正九年	王澄慧		睢州	八年称苏松兵备道，驻上海
1735年 雍正十三年	礼山		正白旗	
	崔琳		蒲州	
1736年 乾隆元年	翁藻		浙江仁和	并入太仓称苏松太兵备道
1740年 乾隆五年	李士杰			
	翁藻 王云铭	宝文	惠民	再任
1743年 乾隆八年	汪德馨	一庵	碭山	
1745年 乾隆十年	托恩多	湛堂	镶红旗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747年 乾隆十二年	傅椿		镶蓝旗	
1748年 乾隆十三年	陶士璜	毅斋	宁乡	
	朱霖		正白旗	
	广安	居仁	正黄旗	
1749年 乾隆十四年	邵大业		浙江	
1750年 乾隆十五年	申梦玺			
1757年 乾隆二十二年	朱奎扬	南湖	浙江	
1761年 乾隆二十六年	胡文伯		山东	
	萨载	厚庵	正黄旗	
1762年 乾隆二十七年	李永书	芳园	河间	
1766年 乾隆三十一年	劳宗发	锡山	钱唐	
1768年 乾隆三十三年	钟光豫	立斋	宛平	
1769年 乾隆三十四年	杨魁	梅村	正黄旗	
1771年 乾隆三十六年	栋文		正黄旗	
1772年 乾隆三十七年	福安		正黄旗	
	钟光豫			再任
	韩锡祚		青田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773年 乾隆三十八年	孙会申			
	韩锡祚		青田	再任
1774年 乾隆三十九年	李奉翰	香林	汉军正蓝旗	
1775年 乾隆四十年	韩锡祚			三任
1776年 乾隆四十一年	袁鉴	春圃	钱塘	
	韩锡祚 陈大化 张廷炳 盛保	封池 芸亭	庐江 镶黄旗 镶蓝旗	四任
1782年 乾隆四十七年	元克中		静海	
	盛保 袁鉴 盛保 冯廷丞		代州	再署三任 理任
1783年 乾隆四十八年	盛保			四任
1784年 乾隆四十九年	章攀桂	淮村	桐城	
1786年 乾隆五十一年	杨寿楠			
	张铭 杨寿楠	恳堂	南城	再任
1787年 乾隆五十二年	张铭			再任
	杨寿楠			三任
1789年 乾隆五十四年	汪志伊	稼门	桐城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789年 乾隆五十四年	张铭			三任
1790年 乾隆五十五年	冯鼎高		长乐	
	张铭 冯鼎高			四任 再任
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	通恩		正白旗	
1792年 乾隆五十七年	李廷敬			
	通恩 李廷敬		满洲	再任 再任
1793年 乾隆五十八年	通恩		满洲	三任
1794年 乾隆五十九年	方昂		历城	
1795年 乾隆六十年	通恩			四任
	方昂 通恩			再任 五任
1796年 嘉庆元年	李廷敬			三任
1799年 嘉庆四年	赵宜喜		南丰	
	李廷敬 赵宜喜			四任 再任
1800年 嘉庆五年	李廷敬			五任
	赵宜喜			三任
1801年 嘉庆六年	李廷敬			六任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01年 嘉庆六年	康基因 李延敬		兴县	七任
1802年 嘉庆七年	赵宜喜			四任
	李延敬			八任
1803年 嘉庆八年	田自福		深州	
	李延敬			九任
1805年 嘉庆十年	周锷		长沙	
1806年 嘉庆十一年	李延敬			十任
	周锷 郑济涛 钟琦		镶蓝旗	再任 蒙古人
1307年 嘉庆十二年	郑济涛			再任
	钟琦			再任
1309年 嘉庆十四年	蒋楙昌		睢州	
	钟琦			三任
1813年 嘉庆十八年	朱深		大兴	
	钟琦			四任
1815年 嘉庆二十年	宋如林	仁圃	汉军	
	桂昌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16年 嘉庆二十一年	龚丽正	阁斋	仁和	
	洪暻			
1822年 道光二年	龚丽正			再任
1826年 道光六年	李景峰			
	潘恭常	午亭	浙江	
1827年 道光七年	陈銮	芝楣	江夏	署理
1828年 道光八年	周景贤			
1829年 道光九年	陆荫奎	梦坡	昆明	
1830年 道光十年	葆谦		满洲	
1831年 道光十一年	赵炳言	竹泉	归安	护理
	程怀璟	玉农		
1832年 道光十二年	吴其泰	橘生	固始	
	善庆		蒙古	
1835年 道光十五年	阳金城	鉴堂	临桂	
1836年 道光十六年	汪忠增	方川	安徽	苏州知府署理
1837年 道光十七年	周祖植	兰生	商城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37年 道光十七年	毓衡	新甫	满洲	
1839年 道光十九年	汪云任	孟棠	盱眙	
	王玥	梦湘	贵筑	
1841年 道光廿一年	巫宜禊	雨池	晋江	
1842年 道光廿二年	颜以燠	叙五	连平州	护理
1843年 道光廿三年	王绍复	伯阳		
	宫慕久 吴健彰	竹圃 道普	山东东平 潮州	兼管“夷务”
1845年 道光二十五年	咸龄		满洲	一作二十七年
1848年 道光二十八年	麟桂	月舫	镶白旗	正任
	吴健彰			
1851年 咸丰元年七月	吴健彰			先署后任
1853年 咸丰三年	杨能格	简侯	汉军	正任
1854年 咸丰四年七月	蓝蔚雯	子青	定海	署理
1855年 咸丰五年三月	赵德辙	静山	解州	正任
1855年 咸丰五年	蓝蔚雯	子青	定海	护理
1857年 咸丰七年七月	薛焕	觐唐	华阳	正任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58年 咸丰八年十二月	吴煦	晓帆	仁和	正任
1862年 同治元年十二月	黄芳	荷汀	长沙	署理
1863年 同治二年六月	丁日昌	雨生	丰顺	正任，兼办"洋务"
1864年 同治三年秋	应宝时	敏斋	永康	先代后任
1869年 同治八年二月	杜文澜	小舫	秀水	署理
1869年 同治八年二月	涂宗瀛	阆轩	六安	正任，一作九年始任
1871年 同治十年二月	沈秉成	仲复	归安	正任
1875年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冯焌光	竹儒	广东	正任
1877年 光绪三年三月	刘瑞芬	芝田	池州	署理
1878年 光绪四年二月	褚兰生	心斋	嘉兴	署理
1878年 光绪四年三月	刘瑞芬	芝田	池州	再任
1882年 光绪八年四月	邵友濂	小村	余姚	正任
1886年 光绪十二年二月	汤寿铭	小秋	益阳	代理
1886年 光绪十二年八月	龚照瑗	仰遽	合肥，一说仁和	正任
1890年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	聂缉槼	仲芳	衡山一说衡阳	
1894年 光绪二十年四月	黄祖络	幼农	庐陵	正任

（续表）

上任时间	姓名	字	籍贯	备注
1894年 光绪二十年八月	刘麒祥	康侯	湘乡	署理
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	黄祖络	幼农	庐陵	再任
1897年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	吕海寰	镜宇	历城一说掖县	
1897年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	刘麒祥	康侯	湘乡	再任
1897年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	蔡钧	和甫	江西	署理
1899年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	李光久	健斋	湘乡	
1899年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	曾丙熙	经郛	邵阳	代理
1899年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	余联沅	撝珊	孝感	正任
1901年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	岑春萱	尧阶	广西	
1901年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后	袁树勋	海观	湘潭	正任
1906年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瑞澂	莘儒	正白旗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	王燮	绍延	仁和	代理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梁如浩	孟亭	广东	正任
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	蔡乃煌	伯浩	番禺	正任
1910年 宣统二年九月	刘燕翼	襄孙	仁和	正任

据(1)《同治上海县志》(2)《民国上海县续志》(3)《工部局公报》(4)《上海碑刻资料选编》(5)《吴煦档案选编》(6)《上海研究资料续集》(7)《上海近代史》(上)(8)《法领政略表》等编制。

民国时期上海行政长官员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官　职	备　注
陈其美	1911年11月	沪军都督府都督	
郑汝成	1913年8月	上海镇守使	
杨善德	1915年11月	淞沪护军使	
卢永祥	1917年1月	淞沪护军使	
何丰林	1919年8月	淞沪护军使	1924年10月离职逃往日本
孙传芳	1926年5月	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督办	
吴光新	1927年3月	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督办	
黄　郛	1927年7月	上海特别市市长	
张定璠	1927年9月	上海特别市市长	
张　群	1929年4月	上海特别市市长	1930年7月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
吴铁城	1932年1月	上海市市长	
俞鸿钧	1937年3月	上海市市长	
苏锡文	1937年12月	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	
苏锡文	1938年4月	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督办	
傅筱庵	1938年10月	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苏锡文	1940年10月	伪上海特别市代理市长	
陈公博	1940年11月	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周佛海	1944年12月	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钱大钧	1945年9月	上海市市长	
吴国桢	1946年5月	上海市市长	
陈　良	1949年4月	上海市市长	
赵祖康	1949年5月	上海市市长	代　理

上海市区旧新路名对照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二　画	
二马路*	九江路	黄　浦
二摆渡路	江西中路460弄	黄　浦
八仙桥街	桃源路	南市、卢湾
八里桥路 (Rue Palikao)	云南南路	黄浦、南市
又新(兴)街	九江路296弄	黄　浦
	三　画	
三马路*	汉口路	黄　浦
三官堂路	三门峡路	南　市
三官堂路	浦建西路	南　市
三官堂路	茂兴北路	南　市
三官堂横街	茂兴支路	南　市
三宝垄路 (Samarakg Road)	腾越路	杨　浦
三宝堂路	三河路	虹　口
三姓路	杨树浦路1889弄	杨　浦
三泰路 (Santai Road)	新泰路	闸　北

* 常见俗称，下同。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土地祠路	薛弄底街	南　市
土地堂街	薛弄底街	南　市
土地堂街	海兴北路	黄　浦
土地堂后街	海兴后街	黄　浦
士庆路	海伦西路	虹　口
大上海路	延安东路	黄　浦
大马路*	南京东路	黄　浦
大王庙街	大德路	南　市
大东门大街	复兴东路(东段)	南　市
大生路	梧桐路	南　市
大西路	金陵西路、延安中路	卢湾、黄浦、静安
大西路 (Great—Western Road)	延安西路	静安、长宁
大同路	北京西路	黄浦、静安
大华路 (Majestic Road)	南汇路	静　安
大兴路	复兴中路	卢湾、徐汇
大兴西路	复兴西路	徐　汇
大兴街	北海宁路1—7号	虹　口
大场路	崇明支路	虹　口
大连湾路 (Dalny Road)	大连路	虹口、杨浦
大国路 (Rued' Arco)	安亭路41弄	徐　汇
大佛厂街	大昌街	南　市
大码头街	复兴东路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大沽路 (Taku Road)	高桥路	南　市
大通路	大田路	静　安
大通路	牌楼路	南　市
大维路	军工路	杨　浦
大裕兴街	平湖路	南　市
大新街	湖北路	黄　浦
万安街	河南南路230弄	南　市
山东街	平定路	杨　浦
川沙路	景星路	杨　浦
广东街	天潼路	虹口、闸北
广东街	福德路	虹　口
广东街	新广路	虹　口
广东街	武昌路	虹　口
广东街	启东路	虹　口
广信路 (Kwanghsin Road)	广德路	杨　浦
广福寺街	广福街	南　市
广肇路	天目西路	闸　北
小九华街	王家码头路	南　市
小木桥街	木桥街	南　市
小东门大街 (Rue de La Porte de l'Est)	方浜东路	南　市
小沙渡路 (Ferry Road)	西康路	静安、普陀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小南门大街	董家渡路	南　市
小普陀桥街	小普陀街	南　市
马玉山路	双阳路	杨　浦
马白路 (Mapai Road)	新会路	普　陀
马白路 (Mapai Road)	江宁路1080弄	普　陀
马浪路 (Rue Brenier de Montmorand)	马当路	卢　湾
马崎路 (Moji Road)	句容路	静　安
马斯南路 (Rue Massenet)	思南路	卢　湾
马棚弄	鲁关路	虹　口
马德拉斯路 (Madras Road)	平凉路	杨　浦
马霍路 (Mohawk Road)	黄陵北路	黄　浦
	四　画	
开平街	华开路	杨　浦
开纳路(东段) (Kinnear Road)	武定路	静　安
开纳路(西段) (Kinnear Road)	武定西路	静安、长宁
开原路	武定西路	静安、长宁
天文台路	合肥路	卢　湾
天主堂街	蒲西路	徐　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天主堂街 (Rue Montauban)	四川南路	黄　浦
天主堂街	天柱山路	(南市斜桥)
天主堂街	梧桐路	南市(豫园)
天主堂后街	徽宁路(中段)	南市(斜桥)
天主堂东街	天生港东街	南市(董家渡)
天台路	四川南路	黄　浦
天同路	天水路	虹　口
天保路	热河路	闸　北
元芳路 (Yuenfong Road)	商丘路	虹　口
木渎路	方浜西路	南　市
太古路	高桥路	南　市
太平街	复兴东路	南　市
太阳庙路	太阳山路	闸　北
太和街	杨树浦路461弄	杨　浦
太康路	泰康路	卢　湾
五马路*	广东路	黄　浦
车站南路	车站后路	南　市
车站路	南车站路	南　市
戈登路 (Gordon Road)	江宁路	静安、普陀
巨泼来斯路 (Route Dupleix)	安福路	徐　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巨福路 (Route Dufour)	乌鲁木齐南路	徐　汇
巨籁路	四达路	虹　口
巨籁达路 (Rue Ratard)	巨鹿路	卢湾、静安
中山东路	中山东二路	黄浦、南市
中正中路	延安中路	黄浦、卢湾、静安
中正北一路	石门一路	静　安
中正北二路	石门二路	静　安
中正东路	延安东路	黄　浦
中正西路	延安西路	静安、长宁
中正南一路	瑞金一路	卢　湾
中正南二路	瑞金二路	卢　湾
中央路	沙市一路	黄　浦
中迪化路	乌鲁木齐中路	静安、徐汇
中道桥北街	跨龙路(北段)	南　市
中道桥南街	跨龙路(南段)	南　市
贝当路 (Avenue Pètain)	衡山路	徐　汇
贝拿勒斯路 (Benares Road)	海州路	杨　浦
贝勒路 (Rue Amiral Bayle)	黄陂南路	黄浦、卢湾
贝谛鏖路 (Rue Lieutenant Petiot)	成都南路	卢　湾
长生庵街	长生街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长白街	河南南路	黄　浦
长兴路	建国东路	卢　湾
长安路	延安西路	静安、长宁
长浜路(东段)	金陵西路	黄浦、卢湾
长浜路(西段)	延安中路	黄浦、卢湾、静安
仁记路 (Jinkee Road)	滇池路	黄　浦
仁兴街	杨树浦路1941弄	杨　浦
化子街	平定路	杨　浦
公馆马路 (Rue Consulat)	金陵东路	黄　浦
丹凤楼路	丹凤路	南　市
六马路*	北海路	黄　浦
文安路	皋兰路	卢　湾
文极司脱路 (Winchester Road)	文安路	闸　北
文昌路	文安路	闸　北
文监师路 (Boone Road)	塘沽路	虹口、闸北
文斜路	大林路	南　市
方浜桥路	方浜西路	南　市
方浜路	方浜中路	南　市
忆定盘路 (Edinburgh Road)	江苏路	静安、长宁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火神庙街	和顺街	南　市
火轮磨坊街	盛泽路	黄　浦
引南路	杨树浦路2603弄	杨　浦
邓脱路 (Dent Road)	丹徒路	虹　口
孔子路	延安东路	黄　浦
	五　画	
正丰街	广东路(福建路以西)	黄　浦
正阳路	石门一路	静　安
北川虹路	新民路	闸　北
北门路 (North Gate Road)	广东路	黄　浦
北公益路	蒙古路	闸　北
北石路	福建路(南京路北)	黄　浦
北扬子路 (North Yangtsze Road)	扬子江路	虹　口
北京路 (Peking Road)	北京东路	黄　浦
北河路	白河路	黄　浦
北新街	山东南路	黄　浦
甘世东路 (Rue Gaston Kahn)	嘉善路	徐　汇
古拔路 (Route Courbet)	富民路	徐　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古神父路 (Rue du Père Huc)	永福路	徐　汇
石牌楼	清流街	南　市
石　路* (Shackloo Road)	福建中路	黄　浦
龙山路(20—306号)	中山南二路	徐　汇
龙华路（1028—1852号 1397—1831号）	中山南二路	徐　汇
龙华路(1429—1750号)	船厂路	徐　汇
龙华西路（1—163 20—334号）	中山西路	徐　汇
平济利路 (Rue Bluntschli)	济南路	卢　湾
平桥路	北京西路(黄河路以东)	黄　浦
平湖路	济南路	卢　湾
东士庆路	溧阳路904弄	虹　口
东汉璧礼路	东汉阳路	虹　口
东台路	黄河路	黄　浦
东有恒路 (East Yuhang Road)	东余杭路	虹　口
东百老汇路	东大名路	虹　口
东自来火街 (Rue des Pères)	永寿路	黄浦、南市
东华路	军工路	杨　浦
东武昌路	武昌路	虹　口
东京路 (Tokyo Road)	武定路	静　安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东京路 (Tonquin Road)	昌化路	静安、普陀
东庙桥路	东安路	徐　汇
东泰山路	淮海东路	黄浦、南市
东鸭绿路	周家嘴路	虹口、杨浦
东新桥街	浙江南路	黄　浦
东新嘉路	五台路	虹　口
东熙华德路 (East Seward Road)	东长治路	虹　口
卡拉奇路 (Karachi Road)	眉州路	杨　浦
卡德路 (Carter Road)	石门二路	静　安
归化路	昌化路	静安、普陀
旦华路	大境路(东段)	南　市
田丰路	乌鲁木齐北路	静　安
四马路*	福州路	黄　浦
四卡子路*	鸭绿江路	虹　口
四德来路	惠民路117弄	虹　口
四德丰弄堂	头坝路	虹　口
生义弄	生义码头街	南　市
白尔路 (Rue Eugine Bard)	西门路	卢　湾
白尔路 (Rue Eugine Bard)	顺昌路	卢　湾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白尔部路 (Rue Paul Beau)	重庆中路	卢　湾
白克路 (Burkill Road)	凤阳路	黄浦、静安
白来尼蒙马浪路 (Rue Brenierde Montmorand)	马当路	卢　湾
白里图路 (Route Bridou)	吴兴路	徐　汇
白利南路 (Brenan Road)	长宁路	静安、长宁
白利南支路	长宁支路	静安、长宁
白保罗路 (Barchet Road)	新乡路	虹　口
白莲泾支路	莲南路	南　市
白赛仲路 (Route Boissezon)	复兴西路	徐　汇
印度路	广西路	黄　浦
皮少耐路 (Rue Buissonnet)	寿宁路	南市、卢湾
市政府路	平江路	徐　汇
立普路	新丰路	静　安
兰　路 (Lay Road)	兰州路	杨　浦
汇山路	霍山路	虹口、杨浦
汇司林路 (West End Road)	西　街	虹　口
汉城路	西湖路	杨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汉璧礼路 (Hanbury Road)	汉阳路	虹　口
宁兴街	宁海东路	黄　浦
宁波路 (Rue de Ningpo)	淮海东路	黄浦、南市
宁夏路	西藏南路	黄浦、南市、卢湾
宁海路	宁海西路	黄　浦
宁海路	徽宁路(东段)	南　市
永平街(路)	云南南路	南市、黄浦
永乐街	利西路	长　宁
永兴街(路)	永胜路	黄　浦
永兴街	永泰街	南　市
永安街	永安路	黄　浦
永安街	董家渡路93弄	南　市
永泰路	福建南路	黄　浦
礼查路 (Astor Road)	金山路	虹　口
民生路	民和路	虹口、闸北
民国路	人民路	南市、黄浦
加尔各答路 (Calcutta Road)	杭州路	杨　浦
加藤路 (Jardan Road)	淮海西路	长宁、徐汇
台拉斯脱路 (Route Delastre)	太原路	徐　汇
台斯德郎路 (Route Picard Destelan)	广元路	徐　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台湾路	黄埭路	南　市
圣母院路 (Routedes Soeurs)	瑞金一路	卢　湾
圣贤桥街	董家渡路	南　市
	六　画	
邢家宅路	邢家桥北路	虹　口
邢家桥路	邢家桥南路	虹　口
吉祥街 (Rue Petit)	江西南路	黄　浦
老大沽路	大沽路	黄　浦
老广东街	高雄路	南　市
老天主堂街	梧桐路	南　市
老北门大街 (Ruedela Portedu Nord)	河南南路(人民路以北)	黄　浦
老北门直街	河南南路（人民路以南复兴东路以北）	南　市
老白渡街	白渡路	南　市
老江湾路	西江湾路	虹　口
老其美路	四平支路	虹　口
老闸路 (Louzar Road)	山西南路	黄　浦
老学前街	学院路	南　市
老靶子路 (Range Road)	武进路	虹口、闸北
地丰路 (Tifeng Road)	乌鲁木齐北路	静　安
亚田南路	安亭路	徐　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亚尔培路 (Avenue du Roi Albert)	陕西南路	徐汇、卢湾、静安
亚德路 (Arthur Road)	旅顺路	虹　口
机场路	宛平南路(南段)	徐　汇
西大兴路	复兴西路	徐　汇
西上麟街	西上林街	黄　浦
西门大街	复兴东路(西段)	南　市
西长兴路	建国中路	卢　湾
西仓路	河南南路(复兴东路至蓬莱路)	南　市
熙华德路 (Seward Road)	长治路	虹　口
西江路	淮海中路	卢湾、徐汇、长宁
西自来火街 (Rue de Saigon)	广西南路	黄　浦
西贡路 (Saigon Road)	丹阳路	杨　浦
西体育会路(441号后)	中山北一路	虹　口
西苏州路	南苏州路	黄浦、静安
西武昌路	武昌路	虹　口
西庙桥路	宛平南路(北段)	徐　汇
西临安路	金陵中路	卢湾、黄浦
西姆拉路 (Simla Road)	洞庭路	杨　浦
西爱咸斯路 (Route Herve de Siéyés)	永嘉路	卢湾、徐汇
西海街	平凉路2608—2718号	杨　浦
西摩路 (Seymour Road)	陕西北路	静安、普陀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百老汇路 (Broadway Road)	东大名路	虹　口
百花街	旅顺路	虹　口
有恒路 (Yuhang Road)	余杭路	虹　口
迈尔西爱路 (Route Mercier)	茂名南路	卢　湾
迈索尔路 (Mysore Road)	平定路	杨　浦
毕勋路 (Route Pichon)	汾阳路	徐　汇
光州路	广州路	杨　浦
吕西纳路	利西路	长　宁
吕宋路	连云路	黄　浦
吕班路 (Avenue Dubail)	重庆南路	卢　湾
同孚路 (Yates Road)	石门一路	静　安
同济路	同心路	虹　口
同德街	高阳路242弄	虹　口
朱家湾街	光新路	普　陀
朱葆三路 (Rue Chu Pao San)	溪口路	黄　浦
竹行弄	竹行码头街	南　市
乔家浜路	乔家路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乔敦路 (Jordan Road)	淮海西路	长宁、徐汇
伦敦路	黄山路	虹口、闸北
华龙路 (Route Voyron)	雁荡路	卢　湾
华记路 (Hwa Kee Road)	永定路	虹　口
华成路 (Route Voisin)	会稽路	南　市
华伦路 (Warren Road)	古北路	长　宁
华昌路	华安路	南　市
华格臬路 (Rue Wagner)	宁海西路	黄　浦
华盛街(路)	会稽路	南　市
华盛路 (Whashing Road)	许昌路	杨　浦
华德路 (Ward Road)	长阳路	虹口、杨浦
自来火街	武昌路	虹　口
后　街	同仁街	徐　汇
后新街	盛泽路	黄　浦
全家庵路	临平北路	虹　口
舟山路 (Chusan Road)	龙潭路	南　市
杀猪弄	民珠街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兆丰路 (Chaoufoong Road)	高阳路	虹　口
庄源大街	旅顺路	虹　口
刘公祠弄	柳江街	南　市
齐物浦路 (Chemulpo Road)	江浦路	杨　浦
交通路 (Chaotung Road)	昭通路	黄　浦
冰厂街	江西中路460弄	黄　浦
羊尾桥路	复兴中路	卢湾、徐汇
江苏路	四川中路	黄　浦
江津路	青浦路	虹　口
江津街	方浜东路	南　市
江湾路 (Kiangwan Road)	东江湾路	虹　口
池浜路 (Tse Pang Road)	慈溪路	静　安
汤恩路 (Thorne Road)	哈尔滨路	虹　口
兴圣街 (Ruedela Mission)	永胜路	黄　浦
守署街	尚文路	南　市
安东路	丹东路	杨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安和寺路 (Avenue Amherest)	新华路	长　宁
安定盘路	江苏路	静安、长宁
安纳金路 (Rue Hennequin)	东台路	卢　湾
安南路	安义路	静　安
安康路	安定路41弄	徐　汇
安源路	安义路	静　安
安徽路(南段)	肇周路	南市、卢湾
安徽路(北段)	西藏南路	黄浦、南市、卢湾
军官路	南昌路(东段)	卢　湾
军营路	军工路	杨　浦
祁门路	陕西北路	静安、普陀
祁齐路 (Route Ghisi)	岳阳路	徐　汇
戏馆街	福建南路	黄　浦
观音堂路	佳木斯路	杨　浦
观音阁弄	甘谷支路	南　市
观音阁街	甘谷街	南　市
羽林路	天山路	长　宁
红庙弄	石潭弄	黄　浦
纤道路 (Rope Walk Road)	九江路	黄　浦
孙家浜路	徐文路	徐　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七　画	
麦尼尼路 (Route Magniny)	康平路	徐　汇
麦边路 (Me Bain Road)	奉贤路	静　安
麦阳路 (Route Mayen)	华亭路	徐　汇
麦克利克路 (Macgregor Road)	临潼路	虹　口
麦克脱路 (Market Street)	马厂路	虹　口
麦底安路 (Rue Mathieu)	山东南路	黄　浦
麦根路 (Markham Road)	秣陵路	闸　北
麦根路 (Markham Road)	康定东路	静　安
麦根路 (Markham Road)	淮安路	静　安
麦根路 (Markham Road)	石门二路(北段)	静　安
麦特赫司脱路 (Medhurst Road)	泰兴路	静　安
麦高包禄路 (Rue Marco Polo)	龙门路	黄浦、卢湾
麦琪路 (Route Alfread Magy)	乌鲁木齐中路	静安、徐汇
麦赛尔蒂罗路 (Rue Marcel Tillot)	兴安路	卢　湾
玛礼逊路 (Marison Road)	茂林路	虹　口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坝基桥北街	复兴东路264弄	南　市
坝基桥街	白渡路	南　市
坎大哈路 (Kandahar Road)	临青路	杨　浦
坎普尔路 (Cawnpore Road)	贵阳路	杨　浦
杜美路 (Route Doumer)	东湖路	徐　汇
杜神父路 (Route Père Dugout)	永年路	卢　湾
坟山路 (Cemetry Road)	龙门路	黄浦、卢湾
坟山路 (Cemetry Road)	大沽路	黄　浦
极司非而路 (Jessfield Road)	万航渡路	静安、长宁
杨家宅路	杨家浜支路	虹　口
杨家渡街	杨渡街	南　市
杨家渡横街	杨渡横街	南　市
花园弄 (Gardou Lane)	南京东路	黄　浦
花园路	花园港路	南　市
严家阁路	芷江中路	闸　北
严家阁路	芷江支路	虹　口
劳尔东路 (Route Lortou)	襄阳北路	静安、徐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劳合路 (Lloyd Road)	六合路	黄　浦
劳利育路 (Route Lorioz)	泰安路	徐汇、长宁
劳勃生路 (Robison Road)	长寿路	静安、普陀
劳神父路 (Ruedu Père Froc)	合肥路	卢　湾
克明路 (Cumming Road)	永明路	虹　口
克能海路 (Cunningham Road)	康乐路	闸　北
苏州路 (Soochow Road)	浙江中路(南京路北)	黄　浦
苏州路 (Soochow Road)	湖北路	黄　浦
杏堤路	杏山路	普　陀
李梅路 (Route Lemaire)	望亭路	黄浦、卢湾
丽水南弄	(并入)丽水路	南　市
丽园后路	蒙自西路	卢　湾
吴家弄	老新街	南　市
吴家桥南路	肇周路(南段)	南市、卢湾
吴淞江路	太仓路	卢　湾
里马路	中山南路	南　市
里郎家桥街	篾竹路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里虹桥老街	东汉阳路219弄	虹　口
吟桂路(237号前)	长春支路	虹　口
吟桂路(237号后)	秦关路	虹　口
邑庙路	邑城路	南　市
佑尼干路 (Jernigan Road)	仙霞路	长　宁
延绪山庄路	虬江路(西段)	闸　北
伯顿路 (Purdon Road)	彭泽路	虹　口
佛陀街	南京东路353弄 九 江 路350弄	黄　浦
佛阁街	府谷街	南　市
近胜路 (Jansen Road)	景星路	杨　浦
余庆街	歇浦路	杨　浦
彤云街(路)	周浦路	南　市
狄思威路 (Dixwell Road)	溧阳路	虹　口
迎阳街	光复西路253弄内	普　陀
亨利路 (Route Paul Henry)	新乐路	徐　汇
库伦路	曲阜西路	闸　北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库伦路	海伦路	虹　口
库信路	高邮路	徐　汇
应公祠弄	迎勋支路	南　市
应公祠路	迎勋北路	南　市
庐山路	淮海西路	长宁、徐汇
闵行路	真如路	南　市
汶林路 (Route Winling)	宛平路	徐　汇
沙克里路 (Shaklee Road)	福建中路	黄　浦
沪闵南柘路	斜土东路	南　市
宋公园路	和田路	闸　北
宋埠路	松江弄(路)	黄　浦
灵宝路	重庆南路	卢　湾
局前路	胡家木桥路	虹　口
张家弄(街)	清流北街	南　市
张家浜路	蒙自东路	卢　湾
陆家宅路	陆丰路	闸　北
陆家路	淮海西路	长宁、徐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属区
阿尔盘弄 (Arblury Lane)	蟠龙街	虹　口
阿拉白司脱路 (Alabaster Road)	曲阜路	闸　北
陇山路	双山路	普　陀
	八　画	
奉天路 (Mukden Road)	辽宁路	虹　口
环龙路 (Vallon Road)	南昌路(西段)	卢湾、徐汇
青阳路	宁阳路	南　市
青城路	山东南路	黄　浦
林肯路 (Lincoln Road)	天山路	长　宁
林肯支路	天山支路	长　宁
林森中路	淮海中路	卢湾、徐汇、长宁
林森东路	淮海东路	南市、黄浦
林森西路	淮海西路	徐汇、长宁
松江路	延安东路	黄　浦
杭州路	九江路	黄　浦
茂名路	茂名北路	静　安
茂海路 (Muirhead Road)	海门路	虹　口
英士路	淡水路	黄浦、卢湾
英大马路*	南京东路	黄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英华街 (Kin Woka Road)	金华路	黄　浦
垃圾塘街	福康北路	黄　浦
其美路	四平路	虹口、杨浦
其美路	新华路	长　宁
直隶路	石潭弄	黄　浦
茄勒路 (Rue Galle)	吉安路	卢　湾
拉合尔路 (Lahore Road)	宁国路	杨　浦
拉都路 (Route Tenant de la Tour)	襄阳南路	徐　汇
欧嘉路 (Urga Road)	海伦路	虹　口
迪化路	乌鲁木齐北路	静　安
迪化中路	乌鲁木齐中路	静安、徐汇
迪化北路	乌鲁木齐北路	静　安
迪化南路	乌鲁木齐南路	徐　汇
昌乐路	昌里路	南　市
明晏路	民晏路	闸　北
典当弄	盐城路	南　市
典当街	金门路	黄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国富门路 (Route Kaufmann)	安亭路	徐　汇
和平街 (Rue de la Paix)	平湖路	南　市
和平路	复兴东路	南　市
和阗路	和田路	闸　北
依周塘路	军工路	杨　浦
阜民路	光启南路	南　市
金司徒庙街	万春街	静　安
金神父路 (Route Père Rolert)	瑞金二路	卢　湾
金家庙路	维坊西路	黄　浦
金陵路	金陵东路	黄　浦
金陵路	秣陵路	闸　北
周家嘴路(西段)	定海港路	杨　浦
周家渡路	周家渡镇路	南　市
鱼行街	方浜东路	南　市
鱼行街 (Rue des Poissons)	嘉鱼路	南　市
京州路	周浦路	南　市
庙后路	泾东路	虹　口
庙桥路	苗江路	南　市
庙　街 (Temple Street)	山东中路、山东北路	黄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郑家木桥街 (Rue Tourane)	福建南路	黄　浦
怡和路	望江路	黄　浦
法大马路*	金陵东路	黄　浦
法兰西外滩 (Quai de France)	中山东二路	黄浦、南市
法华民国路	人民路	黄浦、南市
法华路 (Fawha Road)	新华路	长　宁
法雷吕波路 (Route Frelupt)	建国西路	卢湾、徐汇
法磊斯路 (Fraser Road)	伊犁路	长　宁
河南路 (Honan Road)	河南中路	黄　浦
油车街	白渡路	南　市
泗阳街	平凉路1544弄	杨　浦
泥城浜	西藏中路	黄　浦
宝山东路	宝山路	虹口、闸北
宝兴路	东宝兴路	虹口、闸北
宝昌路 (Route Paul Brunat)	淮海中路	卢湾、徐汇、长宁
宝建路 (Route Pottier)	宝庆路	徐　汇
宝带路	方浜中路(东段)	南　市
宝隆路	陕西南路	静安、徐汇、卢湾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宝善街	广东路(中段)	黄　浦
定安路	龙门路	黄浦、卢湾
定南路	江西南路	黄　浦
祈齐路 (Route Ghisi)	岳阳路	徐　汇
居尔典路 (Route Charles Culty)	湖南路	徐汇、长宁
陕西路	凯旋路	徐汇、长宁
孟买路 (Bombay Road)	河间路	杨　浦
孟神父路 (Ruedu Père Meugniot)	永善路	黄　浦
孟德兰路 (Mandalay Road)	江阴路	黄　浦
	九　画	
春山街	铜山街	杨　浦
赵主教路 (Route Mgr Maresca)	五原路	徐　汇
南川公路	川公路	虹口、闸北
南川虹路	新疆路	闸　北
南车站后路	车站后路	南　市
南车站前路	车站前路	南　市
南公益里路	海伦路	虹　口
南石街	徽宁路(西段)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南阳路	蓬莱路	南　市
南官路	徐镇路	徐　汇
南京路 (Nanking Road)	南京东路	黄　浦
南迪化路	乌鲁木齐南路	徐　汇
南重庆路	重庆中路	卢　湾
南铁道路	铁道路	卢湾、南市
南海路	建国西路	卢湾、徐汇
南通路	淡水路	卢湾、黄浦
南黄浦滩	中山东二路	南市、黄浦
南魁路	杨树浦路2639弄	杨　浦
拓皋路	柘皋路	虹　口
树本路	建德路	卢　湾
草塘街	鲁班路183弄	卢　湾
荣昌路	德昌路	徐　汇
荔浦路	新丰路	静　安
带钩桥街	山东南路	黄　浦
威妥玛路 (Wetmore Road)	怀德路	杨　浦
威海卫路	威海路	黄浦、静安
威赛路	霍山路	虹口、杨浦
拱宸路	大境路(西段)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指江庙路	芷江西路	闸　北
临安路	金陵中路	卢湾、黄浦
星加坡路 (Singapore Road)	余姚路	静　安
界　路 (Barriea Street)	河南中路	黄　浦
界　路 (Boundary Road)	天目东路	闸　北
哈同路 (Hardoon Road)	铜仁路	静　安
香山路	临山路	闸　北
科隆布路 (Colombo Road)	广州路	杨　浦
重庆路 (Chungking Road)	重庆北路	黄　浦
复兴路	曹杨路	普　陀
复兴岛路	共青路	杨　浦
复善堂街	东江阴街	南　市
顺征路	西藏北路340弄	闸　北
保安路	保屯路	南　市
俞江路	西宝兴路805弄	虹　口
俞家庙路	维坊西路	黄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钜鹿路	巨鹿路	卢湾、静安
盆汤弄*	山西南路（南京路北）	黄　浦
施相公弄	盐码头街	南　市
施高塔路 (Scott Road)	山阴路	虹　口
施高塔路底	祥德路	虹　口
前新街	山东南路	黄　浦
总局路	共和路	闸　北
慎自迩路 (Rue Kraetzes)	金陵中路	卢湾、黄浦
派克弄 (Park Terrace)	百官街	虹　口
派克林弄（路）	百官街	虹　口
派克路 (Parks Road)	黄河路	黄　浦
洛阳路（东段）	金陵西路	卢湾、黄浦
洛阳路（西段）	延安中路	卢湾、黄浦、静安
浏河路	浏河口路	卢　湾
洋行街 (Rue du Whampoo)	阳朔路	南　市
洋泾浜滩路 (Yangking Pang Geek)	延安东路	黄　浦
穿心街（路）	福佑路（西段）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神农路	军工路	杨　浦
院东街	学院路	南　市
院西街	学院路	南　市
姚主教路 (Route Prosper Paris)	天平路	徐　汇
昼锦坊街	昼锦路	南　市
	十　画	
泰山路	淮海中路	卢湾、徐汇、长宁
泰安街	宁安路59、91、107、123、133弄	南　市
珠江路	海宁路(一段)	虹　口
珠江路	鸭绿江路	虹　口
莫利哀路 (Rue Molière)	香山路	卢　湾
晋源路	晋元路	闸　北
桂平路	广西南路	黄　浦
桂林路	茂名南路	卢　湾
桂阳路 (Kueiyang Road)	贵阳路	杨　浦
桥　街 (Bridge Street)	四川中路	黄　浦
格兰路 (Glen Road)	隆昌路	杨　浦
格罗希路 (Route de Grouchy)	延庆路	徐　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格洛克路 (Rue Brodie A. Clark)	柳林路	卢　湾
哥伦比亚路 (Columbia Road)	番禺路	长宁、徐汇
贾尔业爱路 (Route Garnier)	东平路	徐　汇
贾西义路 (Rue Cassini)	泰康路	卢　湾
夏家弄	海昌路	闸　北
振丰街	东大名路(高阳路、永定路间)	虹　口
致远街	天津路(山西路西)	黄　浦
鸭绿路 (Yalu Road)	海宁路(一段)	虹　口
鸭绿路 (Yalu Road)	鸭绿江路	虹　口
晏海路	河南南路	南　市
晏海横路	晏海弄	南　市
恩利和路 (Route Henri Révière)	桃江路	徐　汇
峨嵋月路 (Crescent Avenue)	愚园路1203弄	长　宁
积善寺街	积石街	南　市
倍开尔路 (Baikal Road)	惠民路	虹口、杨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皋乃依路 (Rue Corneille)	皋兰路	卢　湾
徐家汇路	华山路	徐汇、长宁、静安
徐家汇路(914—1578号)	肇嘉浜路	卢湾、徐汇
徐镇路(433—451号)	徐虹北路	徐　汇
顾家湾路	恒业路	虹　口
铁马路*	河南北路	虹口、闸北
铁马路	彭泽路	虹　口
爱文义路 (Avenue Road)	北京西路	黄浦、静安
爱而考克路 (Alcock Road)	安国路	虹　口
爱而近路 (Elgin Road)	安庆路	闸　北
爱多亚路 (Avenue Edward VII)	延安东路	黄　浦
爱麦虞限路 (Avenue Emmanue Ⅲ)	绍兴路	卢　湾
爱来格路 (Rue Soeur Allegre)	桃源路	卢湾、南市
爱根路 (Aigun Road)	济宁路	杨　浦
爱棠路 (Route Edan)	余庆路	徐　汇
奚家浜	龙口路	杨　浦
留云寺路	柳市路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高乃依路 (Rue Corneille)	皋兰路	卢　湾
高邮路(街)	高资路	黄　浦
高昌庙路 (Arsenal Road)	高雄路	南　市
高恩路 (Route Cohen)	高安路	徐　汇
高迭安路	高邮路	徐　汇
竞华路	人和街	静　安
益元路	车站前路168弄	南　市
烟厂路	烟台路	黄　浦
浦东西路	陆家嘴路	黄　浦
浦那路 (Poona Road)	波阳路	杨　浦
浦江路	周家渡镇路	南　市
浙江路 (Chekiang Road)	浙江中路	黄　浦
海宁路	北海宁路	虹　口
海关路 (Customs House Road)	汉口路	黄　浦
海格路 (Avenue Haig)	华山路	静安、长宁、徐汇
海能路 (Hannen Road)	海南路	虹　口
海勒路 (Hailar Road)	海拉尔路	虹　口
浚浦东路	共青路	杨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寇克路 (Kirk's Avenue)	宁波路	黄　浦
陶而斐司路 (Route Dollfus)	南昌路(东段)	卢　湾
娥眉月路 (Crescent Avenue)	愚园路$\frac{1027}{1203}$弄	长　宁
通济路	普济路	闸　北
桑达坎路 (Sandakan Road)	定海路	杨　浦
桑园弄街	高雄路45弄	南　市
	十一画	
球场弄 (Fives Court Lane)	天津路	黄　浦
教会路	宁波路	黄　浦
教堂街 (Church Street)	江西中路	黄　浦
教堂路 (Mission Road)	福州路	黄　浦
基达路 (Quetta Road)	松潘路	杨　浦
黄山路	瑞金二路	卢　湾
黄陆路 (Wonglo Road)	黄渡路	虹　口
黄陂路	黄陂北路	黄　浦
黄河路	崇德路	卢　湾
黄浦滩(路) (Whangpoo Road)	中山东一路	黄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勒克瑙路 (Lucknow Road)	宁武路	杨　浦
菜市街	宁海东路	黄　浦
菜市路 (Rue du Marché)	顺昌路	卢　湾
菜市街 (Market Street)	马厂路	虹　口
菜场街	马厂路	虹　口
营房弄	文昌路	南　市
营盘街	高雄路	南　市
萨坡赛路 (Rue Chapsal)	淡水路	黄浦、卢湾
萨珠路	民珠街	南　市
梵皇渡支路	万航渡后路	普　陀
梵皇渡后路	万航渡后路	普　陀
梵皇渡路	万航渡路	静安、长宁
梅白克路 (Myburgh Road)	新昌路	黄　浦
梅园街	洞庭山弄	南　市
梅园街	周浦路	南　市
曹阳路	曹杨路	普　陀
曹真路	曹杨路	普　陀
曼谷路 (Bangkoh Road)	福宁路	杨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梨园路	方浜中路(西段)	南　市
敏体尼荫路 (Boulevard de Montigny)	西藏南路	黄浦、卢湾、南市
银河路	凝和路	南　市
斜桥弄(路) (Love Lane)	吴江路	静　安
斜徐路（1609—2533号 1632—2554号）	肇嘉浜路	徐　汇
彩衣街	复兴东路(部分)	南　市
领事馆路 (Consulate Road)	北京东路	黄　浦
象山路	瑞金一路	卢　湾
象山路	临山路	闸　北
康脑脱路 (Connaught Road)	康定路	静　安
康悌路 (Rue Conty)	建国东路	卢　湾
康提路 (Kandy Road)	黎平路	杨　浦
康衢路	中山南一路	南市、卢湾
望平街	山东中路(福州路、南京路间)	黄　浦
望志路 (Rue Wantz)	兴业路	卢　湾
商店街	四川北路1897弄	虹　口
惇信路 (Tunsin Road)	武夷路	长　宁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清和路	虬江路	虹口、闸北
清和支路	虬江支路	虹　口
淮安路	康定东路	静　安
淮安路	石门二路	静　安
淮安路	秣陵路	闸　北
淮河路	长乐路	卢湾、静安、徐汇
淳化路	襄阳北路	静安、徐汇
密索尔路 (Mysore Road)	平定路	杨　浦
密勒路 (Miller Road)	峨嵋路	虹　口
维尔蒙路 (Rue Vouillemont)	普安路	黄浦、卢湾
维新路	四平路	虹口、杨浦
	十二画	
博物院路 (Museum Road)	虎丘路	黄　浦
彭泽路	交通西路	普　陀
紫阳路	浙江南路	黄　浦
紫来街 (Rue Discry)	紫金路	黄　浦
蒋家浜路	长浜路	杨　浦
葛罗路 (Route Baron Gros)	嵩山路	黄浦、卢湾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朝宗路	肇嘉路(东段)	南　市
朝阳路	董家渡路	南　市
朝阳路	沈阳路	杨　浦
棋盘街*	河南中路(福州路南)	黄　浦
棋盘街	东棋盘街	黄　浦
斐伦路 (Fearon Road)	九龙路	虹　口
喇格纳路 (Rue de Lagsené)	崇德路	卢　湾
跑马厅路	武胜路	黄　浦
喀布尔路 (Kabul Road)	凉州路	杨　浦
黑龙路	杭州路	杨　浦
黑狮路	中州路	虹　口
锌符路	斜徐路	徐　汇
奥利和路 (Rue Orion)	浏河口路	卢　湾
番山路	伊犁路	长　宁
敦惠路	幸福路	长　宁
善钟路 (Route de Ray Zoong)	常熟路	静安、徐汇
善堂路	浦城路	黄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属区
普恩济世路 (Route Prentice)	进贤路	卢　湾
粪箕浜	望达路	南　市
裕兴街	中山北路2356弄	普　陀
	十三画	
瑞良街	清流街	南　市
瑞良北街	清流北街	南　市
瑞金路	金田路	虹　口
塘山路 (Tongshan Road)	唐山路	虹口、杨浦
勤和路	宁国路	杨　浦
靶子路 (Range Road)	武进路	虹口、闸北
靶子路	建国西路	卢湾、徐汇
蓝田路	思南路	卢　湾
蓝维蔼路(北段) (Rue de Cakitaine Rabier)	西藏南路	黄浦、南市、卢湾
蓝维蔼路(南段) (Rue de Capitaine Rabier)	肇周路	南市、卢湾
蓬　路 (Boone Road)	塘沽路	虹口、闸北
蒲石路 (Rue Bourgert)	长乐路	卢湾、徐汇、静安
浦东路	漕溪北路	徐　汇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蒲柏路 (Rue Auguste Boppe)	太仓路	卢　湾
雷上达路 (Route Paul Legendre)	兴国路	徐汇、长宁
雷米路 (Route Remi)	永康路	徐　汇
虞洽卿路	西藏中路	黄　浦
虞洽卿路	西藏南路	黄浦、卢湾、南市
锦州路	锦州湾路	杨　浦
新大沽路	大沽路	静　安
新大桥路*	恒丰路	闸　北
新广路(北段)	启东路	虹　口
新马路*	曹杨路	普　陀
新马路*	龙山路	徐　汇
新马路*	浦东南路	黄　浦
新化路	新丰路	静　安
新北门大街	丽水路	南　市
新记浜路 (Singkeepang Road)	新建路	虹　口
新民路(100—632号)	天目中路	闸　北
新民路(697—793号)	蕃瓜弄	闸　北
新民路(1000号后)	新民支路	闸　北
新闸桥路 (Stone Bridge Road)	新桥路	黄　浦
新桥街 (Rue Père Hue)	浙江南路	黄　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新桥路	蒙自路	卢　湾
新康路 (Ezra Road)	沙市二路	黄　浦
新　街	东昌路121弄	黄　浦
新新街	瑞金二路409弄	卢　湾
靖江路	桃江路	徐　汇
慈佑路	紫阳路	徐　汇
煤屑路*	邢家桥北路	虹　口
煤屑路*	斜土东路	南　市
煤屑路*	长宁路450弄	长　宁
满洲路	晋元路	闸　北
源昌路 (Yuen Chong Road)	醴陵路	虹　口
窦乐安路 (Darroch Road)	多伦路	虹　口
谨记路	宛平南路(北段)	徐　汇
福开森路 (Route Ferguson)	武康路	徐　汇
福生路	罗浮路	虹口、闸北
福兰路	福禄路	杨　浦
福建路 (Fukien Road)	福建中路	黄　浦
福建路	枫泾路	南　市
福康路	新闸路920弄	静　安
福煦路(东段) (Avenue Foch)	金陵西路	卢湾、黄浦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福煦路(西段) (Avenue Foch)	延安中路	卢湾、黄浦、静安
福特路 (Fuh Teh Road)	福禄路	杨　浦
福履理路 (Route Frelupt)	建国西路	卢湾、徐汇
障川老路	丽水路	南　市
障川路	丽水路	南　市
绳道路 (Rope Walk Road)	九江路	黄　浦
	十四画	
静安寺路 (Bubbling Well Road)	南京西路	黄浦、静安
瑗珲路	济宁路	杨　浦
韬朋路 (Thorburn Road)	通北路	杨　浦
嘉定路	石门二路	静　安
赫司克尔路 (Haskell Road)	中州路	虹　口
赫德路 (Hart Road)	常德路	静安、普陀
慕尔鸣路 (Moulmein Road)	茂名北路	静　安
蔓盘路	新昌路(北京西路北)	黄　浦
熙华德路 (Seward Road)	长治路	虹　口
槟榔路 (Penang Road)	安远路	静安、普陀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鄱阳路	波阳路	杨　浦
辣斐德路 (Rue Lafayette)	复兴中路	卢湾、徐汇
察哈尔路	新华路	长　宁
肇州路	西藏南路(南段)	卢湾、南市
肇州路	肇周路	卢湾、南市
肇勤路	沙泾路	虹　口
肇嘉(家)路	复兴东路	南　市
	十五画	
横山路	黄山路	虹　口
横浜路(100号后)	同心路	虹　口
醉白园街	周浦路	南　市
震修路	启新路	黄　浦
墨克顿路 (Mukden Road)	辽宁路	虹　口
德里路 (Delhi Road)	广德路	杨　浦
德润路	安丘路	虹　口
潘馨(兴)路 (Rue Pershing)	吴兴路	徐　汇
豫园路	豫园老路	南　市

（续表）

旧　　名	现　　名	现　属　区
	十六画	
燕子路	石门一路	静　安
薛华立路 (Route Shanislas Chevalier)	建国中路	卢　湾
霍必兰路	古北路	长　宁
磨坊街 (Rue de Moulin)	盛泽路	黄　浦
	十七画	
戴劳耐路 (Rue Delaunay)	德昌路	徐　汇
霞飞路 Avenue Joffre)	淮海中路	卢湾、徐汇、长宁
襄阳路	襄阳南路	徐　汇
糜鹿路 (Rue Millot)	方浜西路	南　市
	十八画	
瞿真人路	瞿溪路	卢湾、南市
	十九画	
警厅路	金坛路	南　市
警局路	东宁路	黄　浦
	廿三画	
麟桂路	林谷路	卢　湾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邹纪华

上海史

主编　唐振常
副主编　沈恒春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4.5　插页 8　字数 935,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8-00494-3/K·122
定价20.55元

HISTORY OF SHANGHAI

Deputy Chief Editor: ShenHeng-Chu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